外教社

中国译学大辞典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主 编 方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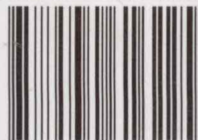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中国译学大辞典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 本辞典继承前人译学研究的成果，介绍译学新现象、新领域和新理论，并对译学研究的趋势和方向作积极的探讨。
- 全书分分类词目、译论百部、译学百论三大主要板块，收录词目1900余条。
- 分类词目分27个大类，涵盖翻译概念、翻译技巧、翻译理论、翻译史等领域，涉及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并汲取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翻译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这一特点。
- 译论百部简明扼要介绍国内外重要的译学著作。
- 译学百论总结国内外重要翻译理论家的主要翻译思想。
- 附录含《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中国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分类书目》、《国内外翻译组织与期刊名录》等内容。

ISBN 978-7-5446-1622-5



定价：120.00元

外教社

中国译学大辞典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主 编 方梦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译学大辞典 / 方梦之主编．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ISBN 978-7-5446-1622-5

Ⅰ．中… Ⅱ．方… Ⅲ．翻译学—词典 Ⅳ．H05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8648号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200083
电　　话：021-65425300（总机）
电子邮箱：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张春明　陈飘平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张 46.25　字数 1660千字
版　　次：2011 年 1月第 1版　　2011 年 6月第 2次印刷
印　　数：1 100 册

书　　号：ISBN 978-7-5446-1622-5 / H・0680
定　　价：120.00 元

代　　序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

严　复《天演论·译例言》(1898)

早就有人说过，翻译是一种科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从这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在工作过程中，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以遵循，并不完全靠天才或灵感，如某些人所说的。这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某些人凭空想出来的。

董秋斯《论翻译理论的建设》(1951)

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以实际工作论，翻译比临画更难。

傅　雷《高老头·重译本序》(1951)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钱锺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1979)

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季羡林《中国翻译词典·序》(1997)

一般说，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有本学科的专业术语词典出版，特别到了现代更是如此。

杨自俭《译学辞典·序》(2004)

专业词典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学科重要术语的系统性和理论化，如果这方面软弱，即使内容再丰富，那也只能是资料性词典。

杨自俭给方梦之的信(2006-05-21)

前　言

1927年，蒋翼振的《翻译学通论》横空出世，在广漠的学海上空划出一道闪亮的光芒。岁月留痕，但淡得被人几近忘却，难怪乎此后半个多世纪国内学人还在欧美的文字堆中苦心孤诣地探究术语“翻译学”的源头。1932年，吴曙光编《翻译论》，1940年，黄嘉德编《翻译论集》，把我国此前的译家名论汇于一体，再现了传统译论的部分精髓。20世纪上半叶，我国译家译论不断，但鲜有系统的论述者。1951年，董秋斯发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提出“翻译是一种科学”的命题。董文掷地有声，言辞凿凿。不过，此后二三十年很少有人为之投效。直至我国改革开放，“西风”扑面，等值论、等效论、功能对等论、交际翻译论、语用翻译论、符号学翻译论、结构主义翻译论、解构主义翻译论、女性主义翻译论、后殖民主义翻译论等翻译理论接踵而来，国人眼界大开，译坛空前活跃。其间，在翻译科学的一片研讨声中也有别样的杂音，“翻译无理论”和“理论无用论”或隐或现，翻译学之梦“难圆”论和“幻灭”论一时也唱出各自的最强音。历经多秋之争，翻译学科的地位终于稳固起来。2006年初，我国教育部下文在大学本科招生目录中增添翻译专业，2007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翻译硕士专业设置方案》，为翻译学科的朝阳之势再添动力。

我国的译论研究，从早期的经验式、随感式、印象式开始，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的译介式、追踪式和接轨式，近年来，实证式、批评式、创新式研究新风也日渐兴起。研究范式由语文学发展到语言学，由语言学发展到多学科研究，又从“文化转向”而至多元整合。语言学翻译研究随着语言学自身的发展而发展。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力等文化要素是当代语言学探究的课题，也是翻译研究的热点。当代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一改过去只重原文、重形式、重规范、重共时、重微观的做法，也重视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并以语料库为工具，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现在，借鉴描写学派的研究方法，以当代语言学为核心，实行多学科“综合描写、宽域规范”的多元整合的新范式已悄然兴起。我国译界学者在中国传统译论的基础上，结合西方译论，在语言学翻译研究、多学科翻译研究、文化翻译研究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西方译论在我国译坛的绝对强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国人翻译理论上的“失语症”已在逐渐治愈。

本辞典的编写目的正是在于记录我国译论研究的历史步伐，通过对译学术语的定

义和译理的诠释，一方面再现我国传统译论的发生和发展，将传统译论置于国内外历史的大背景中传其真、固其本，运用现代理论来激活传统学理，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使其具有时代意义；另一方面集中展示我国当代学者的创新成果，并将词条综合、分类，使之科学化、系统化、条理化。

术语是某一特定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术语的系统化、规范化水平往往代表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译学术语是构建译学体系的要素，是反映译学进步和走向的一面镜子。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从无到有，拔地而起，完全可以从术语的积累过程和术语的建设中看出端倪。

五六十年前，也就是在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之前，能够反映翻译理论概念的术语相当有限，常用的有直译、意译、原本、译本、忠实、通顺、作者、译者、信达雅等，屈指可数。浏览一下罗新璋编的《翻译论集》，在 100 多篇文章中，以“(浅)论翻译”“(浅)谈翻译”“翻译漫谈”“漫谈翻译”“关于翻译”为标题的就有 16 篇之多。翻译大家们写的文章，有的是有感而发，有的是经验之谈，虽然大多有明确的主题，但标题笼统，就是因为当时翻译术语乏善可陈，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以上大而无当的标题已束之高阁，我们完全可以找到表达明确概念的术语来点明主题。

20 世纪 50、60 年代到 80 年代，我国进入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阶段。语言分析带来整套术语，特别是语法术语。比如张培基等 1980 年编著的《英汉翻译教程》就以英汉语言对比为主线，系统地总结和整理了英译汉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包括词义的选择、引申和褒贬，词类转换、增词、重复、省略、正反译法、分句合句、被动态译法、从句译法以及长句译法，与传统语法中的词法和句法合理对应；再比如，“转换”(transformation)这一语言学术语的意思是：按照一定的规则，采用重新安排结构成分的次序、添加或省略某些成分等手段，把一个语言结构或几个语言结构改变成另一个语言结构的过程或结果。翻译研究把原来发生在同一语言中的这种“转换”改变成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而且把它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可以是语音转换、意义转换或修辞形式转换，不一定是结构转换。在翻译研究中，光“转换”一词就派生出许多术语，例如句型转换、层次转换、级转换、词类转换、语态转换、辞格转换、视点转换、形象转换、信息转换、语义转换等。一斑见豹，可见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重大贡献，更不用说后来篇章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分支为译学贡献的诸多术语。

80 年代后期，多学科的研究兴起，译学术语体系迅速壮大。例如，信息论中的“信息”(information)一词及其派生的诸多术语：冗余信息、交际信息、语篇信息、信息载体、信息传递等；思维科学中的“模式”(model)一词及其派生的诸多术语：语义模式、功能模式、转换模式、语义-认知模式等；哲学中的“主体(性)”“客体”“范畴”“方法论”；等等。大量不同学科的术语纷纷引入，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把翻译研究带入跨学科的疆

域。吸收和借用比较成熟的相邻学科的概念和术语已成为保证翻译学科稳步发展的重要条件。

90年代后期,我国翻译研究伴随着文化转向,"文化翻译""文化意象""文化适应""文化误读""文化移植"等术语又成了"新宠"。

半个世纪以来,翻译研究经过"多重转向"(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由语言学途径而至多学科途径,由多学科途径转向文化研究,文化转向完成后,后语言学途径复又兴起,而翻译研究最终要回归本体,文本又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随着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新的范式和途径渐次引入,新领域、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不断产生,加上本体研究的精细化,使得译学术语蔚为大观。可以肯定地说,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在逐步走向严密和深邃。但是目前译学术语的释义、理据及至整个系统远非充分或完整,甚至有些基本术语各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翻译"一词,任何一本翻译教材或一篇论文都可以给它下一个自圆其说的定义。同时,术语中一词多义或多词同义的现象也司空见惯。这些都有违于术语的科学性、单义性、简明性,预示着术语建设的不平坦进程。

本辞典的编撰方针是:中外古今并蓄,源流支脉兼容。目标是:查检,可解疑释难;细读,可了解译学要旨。本辞典力图把我国翻译研究在新时期蓬勃开展、引进、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全面、系统地组织成词条,其中史料、人物、名著、译论以国内为主,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本辞典突出学术性、史料性、检索性和实用性。

本辞典着力选收译学本体术语,尤其是已融入本体的语言学各分支学科及其他交叉学科的术语,酌收译学的外围术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一时间虽然势头不小,但带来的术语不多。像"意识形态""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权力""政治"等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共同语,它们在翻译研究中没有新义,也没有新的用法,"引入翻译研究的最大好处是我们多了一个新的、有效的研究视角,可以让我们将研究焦点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从注重忠实原文转向探讨译文的变形,从语言对比研究转向翻译文化研究"(蒋骁华 2003)。文化转向带来的影响更多的是思想观念、政治立场、研究视角、研究倾向上的。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较大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带来了新的文化范式,而在术语的建设上贡献有限,许多文化概念的表述本来就不靠过多的专用词。从译学新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来说,翻译研究与不断发展的当代语言学相结合,以及与已有的或新的交叉学科相结合,这两方面过去是、今后仍然是译学新概念和新术语的主要的生长点。

本辞典根据历年来国内外翻译研究的主要成果,采用通用的或权威的术语(英汉对照),以明确的概念汇集译论的各种流派和观点,点明国内外前辈译家和当代译家的方法和技巧,勾勒出中西翻译史的粗线条,介绍翻译学科的要点及其相关学科,以促进

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理论研究。编者广泛地收集译学的常用术语，并对之作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梳理工作，根据确定术语的单义性、简明性、科学性、系统性的原则编撰本辞典。

本辞典共收录词目 1 900 余条，主要由译学术语、译学著作和译界人物三部分组成，分“分类词目”“译论百部”和“译学百论”三大板块。译学术语是辞典的主体，以翻译本体和从相关学科吸纳的翻译术语为主，涉及翻译一般概念、传统译论、现代译论、翻译标准、翻译批评、翻译主体、翻译方法和策略、翻译技巧、翻译类别、翻译教学、翻译产业、翻译史等诸多方面。另外伴随着近年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大量语言学术语和文化研究术语为译界所运用，本辞典也收录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术语。不仅如此，本辞典还收录了能反映未来译学研究走向的有关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学、语料库等方面的术语。拙编《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中的大部分词条依然录入。除了增加大量新词条之外，编者根据读者对《译学辞典》的评述和指正，对其中部分词条作了修改或增补，有的条目予以重写。

译论百部是从近 2 000 部(套)现当代中外译(论)史、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批评与实务研究、翻译教程等著作(不包括外论译介与外论研究类著述)中遴选出来的。该部分以当代著述为主，中外兼收，流派兼顾，含口译、笔译、机译等不同门类，特别注重具有开创性和原创性、在不同时期有广泛影响的代表性著作，尤其是名家名论。该部分含国内著作 70 部、国外著作 30 部。国内部分自马建忠论译开始，国外部分涉及英、美、法、德、意以及前苏联、比利时、荷兰、以色列等国研究者的著作。词条大致包括：出版信息(书名[外文书名附中文译名]、作者名、出版社名、出版年份)、写作背景、主要内容、观点、特色以及影响、评价等。在具体撰写过程中，作者力求用历史观、辩证观、发展观客观公正地予以介绍。但由于资料来源限制，编选者学术视野与水准有限，顾此失彼、评述失当之处在所难免。

译学百论系论者个人词条，共 103 条。编者的初衷是：集中展示百余位论者的译论建树，反映现当代国内外翻译研究的理论精要和重要流脉，勾勒出现当代译论的大致轮廓。这一部分不包括对翻译事业有重大贡献但在译论方面着墨不多的著名翻译家，如利玛窦、杨宪益等人(可见“国外人物”“国内人物”部分)。所介绍的论者由三部分组成：我国已故现当代翻译研究著名人物 31 人(在“国内人物”中不再重复立条)，现今活跃在我国译坛的在某个(些)方面有建树的翻译理论研究者 38 人(绝大多数词条经本人审订)，以及国外现当代翻译研究中的代表人物 34 人。词条着重介绍论者在翻译研究中的理论成果和创新的研究方法，兼及论者的教育学术背景、代表性科研成果及其他学术贡献。编者在确定论者名单之前虽然做过文献查询并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应收未收者显有人在。

本辞典正文词目分类排列。但由于译学术语本来就处于一个特定的、共融的范围之内，其间互有包含、互相渗透、犬牙交错，有时难以将其归于一类。例如，“分类词目”部分中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类别”有时难以区分，人们常常以翻译方法来区分翻译类别，一定的翻译类别又体现一定的翻译方法。又如，“语境”是功能语言学、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翻译学等多个分支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不能因为视角不同而重复归类，只好归入最容易说明问题的一类：语用学 交际学。为了避免顾此失彼，本辞典常为互有联系的词条设参见。本辞典的分类不是学科体系上的严格的分类，而多从辞典的功能出发。由于语言学是翻译研究依赖最甚的学科，翻译研究中的大量术语来自语言学各分支。为了避免臃肿，我们把有关语言学的词条分成五类：语言学、语言、文体修辞、语法语篇、词汇语义。相反，为了保持各类词条的平衡、精简类别，也有两门学科、两种范畴合二为一的，如哲学与逻辑学、文学与美学、语用学与交际学、词典与语料库、翻译产业与机器翻译等。“译论百部”部分按著作类别分类排列。“译学百论”以论者生年为序排列（论者生年不详者列后按音序排列）。总之，分类上很难做到铢两悉称，不当之处恐依然存在。另外，本辞典还附词目音序索引，以方便读者查找。

上世纪末还有人对翻译学的名分心存疑窦，把它视为外来异物，甚至提出“翻译学”是“一个难圆的梦”。事实证明，“翻译学”既不是舶来品也不是“梦”。我国开设翻译学课程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虽然初作课程教材的蒋氏《翻译学通论》，其内容算不上系统和科学（方梦之 2007a），但使译学科学化、系统化、条理化正是我国当代学人的梦想和追求，本辞典亦可算是求索路上的一块铺路石。

本辞典编委所撰词条内容各有侧重：

贺显斌	现代译论
王宏印	传统译论及其相关部分
黄国文、张美芳	语篇分析及功能翻译理论
陈宏薇	符号学与翻译
曾利沙	认知学科、语用学与翻译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
王克非	语料库与翻译
穆　雷	口译教学
杨晓荣	翻译教学
杨承淑	口译及台湾书目补充
佘协斌	译论百部

贺爱军	译学百论中的部分国内人物
谭载喜	译学百论中的部分国外人物
易曾权	书目汇编

本辞典所涉体系纵横、学科交叉、文献浩瀚，虽有编委们的积极参与、鼎力相助，但我等水平有限，个别文献实难考证，选材未必精当，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凡此种种切望读者不吝指正，以便有机会补正。

本辞典工作于2006年初启动，在选题立项、初拟方案、业内沟通后，同年11月在广州从化召开编委会。编辑组曾借《上海翻译》2006年第3期发出《吁请翻译界人士支持编纂〈中国译学大辞典〉》书，得到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地译界朋友的广泛响应。其中有身居大洋彼岸、在繁忙的访学过程中看稿、问稿或发来电子稿的，有耄耋之年的资深学者亲自操刀、审稿或定稿的，更有众多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学者将多年研究心得浓缩成条的。为辞典供稿者百余人，涵盖了翻译研究的各个领域。涓涓细水，汇成大河。本辞典蕴含着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经过四年时间的筹备、征稿、整理、校勘、编订、增补，辞典已初具规模。在此，特别要向各撰稿人及关心本辞典的读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除了向各编委和各主要撰稿人致谢外，在此特别要感谢林煌天、杨自俭两位顾问。四年前本辞典刚刚开始酝酿，就得到两位的热情支持，他们对编写大纲、组织班子、选定要目都给予指导和帮助。上海外国语大学陆永昌教授、四川外语学院杨全红教授在辞典工作的初期参加过讨论，谨向他们表示谢忱。还要感谢更多的撰稿人、审稿人和组稿人，其中有：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和罗选民教授，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南京大学的张柏然教授和许钧教授，中山大学的王东风教授、南开大学的王秉钦教授，苏州大学的汪榕培教授，台湾师范大学的刘宓庆教授，香港岭南大学的孙艺风教授，四川大学的曹明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吕俊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的黎难秋教授，河南大学的张今教授、蔡新乐教授和杨清平教授，中南大学的屠国元教授和张旭教授，黑龙江大学的黄忠廉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桂乾元教授、陈浩教授和查明建教授，四川外语学院的廖七一教授、王寅教授和赵彦春教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孙致礼教授和韩子满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王友贵教授，北京外交学院的范守义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吕和发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的刘和平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的李运兴教授，天津理工大学的王振平教授，上海海事大学的宋志平教授，中国科学院国际局的李亚舒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罗新璋教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冯志伟，台湾学者李奭学……要感谢的人还有许多，恕不一一罗列。

要感谢的还有妻子张顺梅。她除包揽家务外，余时亦撰写词条，整理资料，输入语

料，分担本辞典的重任。与她50年风雨同舟，如影随形，相濡以沫，我的每项成果，都浸染着她的辛劳。

最后，特别要感谢庄智象教授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社领导，是他们给予本辞典以重点题材的立项支持，并一直关心它的工作进度和编写质量。该社辞书部负责人张春明对辞典工作统筹安排，全程策划，对各个环节亲历亲为，保证了工作进度和辞典质量。责任编辑陈飘平更是逐条细读，反复查证，校勘匡正，提出许多修改意见，优化了书稿质量。

辞典从立项、组织、编撰、整理、修改、校订、排版直到校对，已有四年。四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不过，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在本辞典2006年拟定的人物词条中，当时国内健在的有40位。不料，短短的数年间，竟有8位仙逝。他们是：程镇球（1919～2007）、刘重德（1914～2008）、裘克安（1920～2008）、金隄（1921～2008）、杨自俭（1937～2009）、沈苏儒（1919～2009）、季羡林（1911～2009）、杨宪益（1915～2009）。大家们淡然离去，但在辞典中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精粹，成为译界的共同财富。在我们今后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他们仍然似一盏盏明灯，将继续照亮我们。有一点是令人欣慰的，以上8位大家中，除了杨自俭先生年逾"古稀"，享年72岁，相对"年轻"之外，个个年逾耄耋。季羡林先生更近期颐，享年98岁；杨宪益先生享年95岁；刘重德先生享年94岁；沈苏儒先生享年90岁。他们的平均冥寿高达89岁(按我国民间虚岁计，该为90岁)！这比世界上任何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期望值高出一大截。可以这样说，他们在为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创造大量精神财富的同时，也为我们译界创造了一个职业群体的生命纪录。这是他们心无旁骛、潜心翻译、努力钻研、修身养性的结果。他们不仅在事业上是我们高山景行的楷模，在道德风范上也是我们修行的榜样。今天，当我们细读本辞典，再一次感受先人们的真知灼见时，崇敬之情又油然而生。我们同样要万分感谢他们，并且深深地怀念他们。

方梦之

2009年岁末改定

凡　例

一、本辞典正文词目按内容分类排列,正文前设词目分类表和词目总表,附录含词目音序索引(见附录五)。

二、分类词目排序主要考虑内容,在与内容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情况下,词条按笔画排序。意义相对的词目相邻排列,如"欠额翻译"和"超额翻译" 、"内容"和"形式"、"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等。"翻译史"部分按时间先后排序。"国外人物""国内人物"部分按人物生卒年份排序。

三、"译论百部"选收近当代著述,历史上重要的翻译论著归入"翻译史"。"译论百部"部分中各类著作按出版时间先后排序。

四、"译学百论"选收近当代翻译理论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按人物生卒年份排序。严复、钱锺书等在翻译理论方面贡献较大的人物在"国内人物"中不再重复立条。

五、词目的英语对应词处理原则如下:

1. 如一词目有多个英语对应词,则用分号分隔,如:

　转换　shift; transformation

2. 圆括号"( )"用于括注:① 缩略形式;② 补充说明性文字;③ 可省略内容,如:

　受控语言　controlled language (CL)

　正翻与义翻　zhengfan and yifan (proper translation and close translation)

　导译员　(tour) guide-interpreter

3. 方括号"[ ]"用于括注可替换的文字,如:

　语感的文化差异　cultural difference in language [linguistic] sense

六、正文提供与翻译研究直接相关的国外学者的姓,用圆括号括注,如:

　卡特福德(Catford)把文化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归纳为……

七、若某一词条与另一词条相关联,则在该词条后设参见信息,如:

　元译素 architranseme……参见"译素"

八、词条末尾的署名原则如下:

1. 表明文献来源,即该词条根据或参考某人的著述编写,如:(据王宏印 2006);

2. 单写姓名,如:(王宏印),表示该词条的编写者;

3. 文献来源作者与编写者为同一人时,一般不再重复编写者的姓名;

4. 审稿人对原稿作较大改动,原作者与审稿人齐名;

5. 同名词条有两稿,内容互补,经整理后合并,两作者齐名;

6. 参考原书(如《中国翻译词典》)而作较大改动或增补者,原作者与增补或改写者齐名;

7. 如词条系由本词典编写组编写或从《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经主编审订录入,则不署名。

九、本辞典所收材料至2008年,少量条目或材料系2009年增补,个别条目2010年补入。

目　录

词 目 分 类 表

分 类 词 目

译 论 百 部

译 学 百 论

词 目 总 表

分 类 词 目

说明：表下位概念的词目以黑圆点“·”标示，如该词目又有表下位概念的词目，则以两个黑圆点“··”标示。

1. 一 般 概 念

2. 现 代 译 论

3. 传 统 译 论

4. 翻译标准　翻译批评

5. 翻 译 主 体

6. 翻译方法 翻译策略

7. 翻 译 技 巧

8. 翻 译 类 别

9. 口 译

10. 语 言

11. 文体 修辞

12. 语言学　符号学

13. 语法　语篇

14. 词汇　语义

15. 哲学　逻辑学

16. 思 维 科 学

17. 心理学　认知科学

18. 美学 文学

19. 语用学 交际学

20. 信息论 其他学科

21. 文　化

22. 翻 译 教 学

23. 词典 语料库

24. 翻译产业 机器翻译

25. 翻译史

26. 国 外 人 物

27. 国 内 人 物

译论百部

1. 论文集

2. 翻译史

3. 翻译教程

4. 翻译批评

5. 翻译研究

6. 丛书

7. 国外论著

译 学 百 论

1. 国 内 译 论

2. 国 外 译 论

分 类 词 目

1. 一般概念

中国翻译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Chinese translation; Chinese-related translation

“中国(的)”作为一个地缘与政治概念上的国家，其定义包括“主权”“国界”“政府”等，译成英语时，倾向于用China's或in China；而作为一个人类学概念上的民族，其定义更突出地包含“血统”“文化”“语言”等因素，译成英语时，倾向于用Chinese一词。

所谓“中国翻译(研究)”，逻辑上至少包括了以下几个类别：1. 地域国界定义：任何人在中国从事的有关任何语言间的翻译实践与研究；2. 国籍定义：任何中国籍的学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从事的基于任何语言(包括汉语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实践与研究；3. 血统定义：任何有中华(汉族及中国少数民族)血统的学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从事的基于任何语言之间的翻译实践与研究；4. 语言定义：任何国籍、任何血统的学者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从事的基于汉语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之间以及上述任何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的翻译实践与研究。

“中国翻译”一语，翻译时因其多义性而存在概念和技术上的困难，视其指涉范围，对应的英语可以是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Chinese translation或Chinese-related translation。(朱纯深 2000a)

不可译性　untranslatability

与“可译性”相对，指译文不可能准确、完整地再现原文。不可译性包括两个方面的情况：1. 原作利用语言形式上的特异性来传情达意，如有节奏的语音(诗歌中的音律)、文字的特殊排列(回文及文字游戏等)之类；2. 不同语言、民族之间文化空缺或不可替代性。卡特福德(Catford)在*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中把不可译性分为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1. 语言不可译性。奈达(Nida)指出：“当某一信息的表达形式是该信息所含意思的实质性成分时，要把这种意思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很困难，通常，这种类型的意思是不可译的。”语言形式的迥异可能存在于语音、词形、词法、句法以及文体等不同层次，也就是说，在语言形式的不同层次上，均可能存在不可译性。2. 文化不可译性。这是由文化差异和文化空白所造成的。就以我国古典诗词的翻译为例，译界长期以来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主张不可译者认为，英汉(或中西)两种诗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两种诗的形式风马牛不相及，加上两种语言的语言系统根本不同，所以古诗的形式与音韵不可译。而可译论者认为，英译中国古诗是“在不可能的范围里找出个可能来”，其首要问题不是用诗体还是用散文体翻译，而是要准确传达内容。此外，不可译性是相对的，随着社会和语言的发展，今日之不可译，明日可能成为可译(Catford 1965)。

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英汉互译中的文化不可译性将会更多地、在更大程度上朝可译性方向发展。而语言的不可译性由语言的物理属性所决定，很难直接翻译成目的语，有时只能通过注释的方法解决。因此，在翻译实践中，文化的不可译性比语言的不可译性更易驾驭；而语言的不可译性比文化的不可译性会引发更复杂的状况。参见“文化不可译性”“语言不可译性”

文化不可译性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指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不可译性。卡特福德(Catford)把文化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归纳为：“与原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Catford 1965：94)“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受地理环境、生活习俗等的影响，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而文化的差异性是由人们所从事的物质生活方式以及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多样性造成的。由于各个国家的地理环境不同，文化起源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模式与特征也各不相同，特别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均有很大的差异。”(王桂莲 2004)文化的不可译性主要表现在习语、成语、典故、饮食文化等方面，反映在英汉互译对应词的意象、联想意义不同或词义空缺。虽然英语及汉语对于大部分词语都有相对应的词可以进行互译，但是有的词在源语和目的语中所体现的意象是不同的。这类可译但意象不同的词多是动物名、植物名以及颜色、自然现象、食物、亲缘关系等类词汇。

文化不可译现象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存在。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以及利用辅助手段，比如添加注释，可以将这些不可译的内容解释清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词在目的语中也会把新的联想意义固定下来。这也是异质文化本土化的过程。这种“外来异邦的文化对原有的民族文化冲突、认识、理解和共

融,从而为原质民族文化所接受,成为原有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的过程"是一个相当缓慢、渐进的和在一定范围的局部发生的现象"。这也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如,"英文化中的词语家族中亦出现 kongfu, taijiquan, Taoism, Confucius, Mencius, bare-footed doctor, kowtow 等烙印汉文化的词汇和表述形式。"(包通法 2005) （文晔）

语言不可译性　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

指在语言形式方面,目的语没有与源语文本相对应的形式特征。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源语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汇或语法单位共用一个语言形式。二、源语一词多义在目的语中却没有相对应的表达(Catford 1965: 94)。语言不可译性主要由语言文字的本质特征和物理形式所造成。汉英两种语言里有不少修辞格利用了各自语言的特点,要把它们译成另一种语言就相当困难。语言不可译性表现在修辞层、语音层、词汇层和语法层。具体的形式为:同形异义、同音异义、谐音双关、拆字游戏和谜语、连珠联、绕口令、押韵、对仗等。例如: The professor rapped on his desk and shouted:"Gentlemen, *order!*"—The entire class yelled:"Beer!"这个幽默在于 order 的一词二义:第一个意思是"安静",也是教授的原意,第二个意思是"点菜",也是全班学生故意的曲解,因此他们大声齐喊"啤酒",令人啼笑皆非。这个双关采用直译法就有一定的困难,只能通过注释来处理。又如同形异义或同音异义词造成的不可译性,如广告语:美的空调,美的享受。"美的"是空调机的一种品牌,同时,这里又可作形容词。要将以上广告语从形式到内容恰如其分地译出是件难事。 （文晔）

可译性　translatability

与"不可译性"相对,指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之间,通过翻译,可以将源语文本或单位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实现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群对同一个事物的理解。可译性论认为源语文本(包括它的文体和风格)是可用另一种语言翻译出来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西方翻译理论界长期以来争论的重要论题。可译论者认为,人类思想具有同一性,认识和思维方式具有普遍性;而且,任何一种语言的意义都打下了人类认识客观现实的印记。因此,语言之间的交际是有可能的,更何况翻译的是言语,而不是语言体系;各个单独要素中不能翻译的东西,在复合的整体中都可以翻译。此外,人类语言还具有能够描写新知的、过去没有经历过的环境的特性,这一特性又可帮助克服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可译性。(Catford 1965)

文学可译性　translatability of literature

主张文学翻译的可能论者,历代有人。近代以来,有胡怀琛的论述,可称为文学可译论的弱式理论。他在《海天诗话》中认为:"或谓文学不可译,此言未必尽然。文学有可译者,有不可译者,能文者善于剪裁锻炼,未为不可译。若据文直译,则笑柄乃见矣。"这里的基本思路是把文学分为可译与不可译两种情况,其可译与不可译并不取决于文学本身的性质或难易,而是取决于译者的才能和翻译方法。能者必能译,而直译则不可。当然,胡怀琛也承认诗的翻译,有强为之难,但又认为:"然能文者,撷取其意,锻炼而出之,使合于吾诗范围,亦吟坛之创格,而诗学之别裁也。"

另有郑振铎的观点,可谓强式理论的典型。他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一文中说:"我以为: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的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固然因翻译者艺术的高下而其程度大有不同——不独理想告诉我们是如此,就是许多翻译家的经验的成绩,也足以表现出这句话是很对的。"郑振铎借助兰尼(Rannie)的 *Element of Style* 中的观点,认为语言在于"表白",而"大多数的'表白'(expression)是可以随人之意的,所以他与思想是分离的。"他还借用思想是"水"、表白是"器"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观点。由此类推,即便是在诗中,"诗的本质与音韵是分离的",因此,诗与散文一样,"也是能够翻译的"。

郑振铎的其他相关论述可总结为:语言与思想、风格、音韵皆可分离,故而文学的可译性是绝对的,无可怀疑的。翻译的要点是"翻译思想而为文字"。最适合的文学翻译方法是"直译",直译在理想状态下可传达原作的艺术布置、段落行文、句中语序、新颖用字等特点。若是高水平的翻译,"可以把译文弄得与原文同样的美"。文学史上不少成功的翻译证明了文学的可译性。 （王宏印）

可译性限度　limit of translatability

可译性因语言形式和文化不同受到局限。奈达(Nida)在《对等的原则》一文中说"在语言间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对等,因此也没有完全准确的翻译。译文的总体影响只会接近原文,而不可能在具体内容上一致。"(奈达 2004: 156)由此可见,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并不是一对截然对立、毫不相关的独立体。正如卡特福德(Catford)在谈论可译性限度时曾说过:"事实上,可译性表现为一个渐变体而不是界限分明的二分体。源语的文本或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而不是绝对的可译或者是绝对不可译的。"(Catford 1965: 93)可译性限度是相对的。由于语言的变化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原来"不可译"的东西或许会成为可译。

内容　content

与"形式"相对,指原文的思想或其内在意义。翻译的过程是通过原文掌握原作的思想内容,然后选择适当的目的语将它表达出来——改变语言外壳,保持思想内容。哲学家贺麟(1991)说:"某一真意,可用土语向本乡人传达,亦可用京话向国人传达,可用文言

或白话向旧、新人传达，亦可用英、法、德文等向异邦人传达。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可见，思想内容的可以相通，才是翻译的基础。翻译标准虽有不同的提法，但总是把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或曰"信"，放在首位。

形式　form

与"内容"相对，是传统译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指语言意义的物质表现，包括词(字)形、句型、篇章结构、修辞格、字体排列以及各种音素形式，如声调、韵律等。茅盾曾在1954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所以，翻译既要神似，又要求形似，当两者不能兼得时，"重神似，不求形似"。

此外，从单纯的语言研究角度来说，一些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它不是由语音和语义构成的，而是由各种成分之间的关系，即对立、差别构成的。所谓形式就是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形合　hypotaxis

与"意合"相对，指句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用句法手段(syntactic devices)或词汇手段(lexical devices)。英语句法结构重形合，句中各成分的相互结合常用适当的连接词语，以表示其结构关系。汉语句法结构重意合，句中各成分的相互结合多依靠语义的贯通、语境的映衬，而少用连接词语。例如：林小姐这天从学校回来就撅起小嘴唇。她掼下书包，并不照例到镜台前梳头发搽粉，却倒在床上看着帐子出神。(茅盾《林家铺子》)(That day Miss Lin returned from school with *her* lips pouting. She flung down *her* satchel and lay down on the bed staring up at the bed curtain. Usually, *she* would go *and* sit at the dressing table to comb *her* hair *and* powder *her* nose.)例中，英文用四个 her 跟 Miss Lin(或 she)前后照应，相互攀连，这在汉语来说是多余的。汉语"到……前""梳头发搽粉"几个连贯的动作一气呵成，动词之间不用连词(英语用 and 连接)。又如以下两个短句的结合，英语用连词，汉语不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Promote physical culture *and* build up the people's health.)/*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英语中的关系代词和关系副词，如 what, that, which, who, when, where, how, however, whenever, wherever 等，常起连接作用，汉语中没有与之相应的词类，因此，翻译时经常用意合的形式转换。

意合　parataxis

与"形合"相对，指句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用语义手段(semantic connection)。王力(2000：332)指出："子句与子句的关系，在中国语里，往往让对话人意会，而不用连词。……我们研究中国文法，该从'语像的结构上着眼'。说得浅些，就是体会中国人的心理。"汉语句法结构重意合，句中成分与成分或句与句之间的结合多依靠语义的贯通，少用连接词语，所以句法结构形式短小精悍，灵活多变，英语则多用形合。例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The monks may run away, but the temple cannot run away with them.)/不入虎穴，焉得虎子。(If you fail to enter the tiger's den, how can you get the tiger cub?)

当然，也有英语用意合，汉语用形合的情况。例如：The force of expansion makes it necessary to build a bridge in sections. 因为膨胀力的缘故，桥梁必须分段制造。(试比较：膨胀力使得分段制造桥梁有必要。)

译素　transeme

范·路文兹瓦特(van Leuven-Zwart)(1989, 1990)采用的术语，指对文学文本与其整合翻译文本作语言比较时使用的基本单位。通常因句子太长而单词过短，范·路文兹瓦特建议把译素作为基本的比较单位。译素一词大体源自迪克(Dik 1978)，有两种变体：1. 包含谓语的"状态译素"；2. 作为状态译素的状语延伸的"附属译素"。一个句子通常会包含一个或多个译素。通过假定的元译素对源文本和目标文本译素的微观结构进行详尽的比较，可揭示译者的翻译策略和两个文本的宏观结果差别因素。根据源文本和目标文本译素和元译素的区别，可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归类为调整(modification)、调适(modulation)或变异(mutation)。如果能在大量源文本和目标文本译素间发生的转换中察觉到前后一致的趋向，那么就有可能掌握译者的翻译策略或翻译规范。(据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239～240)参见"元译素"

元译素　architranseme

范·路文兹瓦特(van Leuven-Zwart)(1989, 1990)创造的术语，用来表示在文学源语文本与其译本间进行详尽的语言对比时所运用的理论概念。她建议把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都细分为短语单位。她把这种单位叫做译素(transeme)，然后她又引入了元译素这一概念。元译素是理论上的共同分母，是比较源语文本译素和目的语文本译素的基础。反映在元译素中的共同特征是通过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共享的实义词或者通过释义的方式来实现的。例如，His wife saw him (他妻子看见了他)的元译素是 wife+ to see (妻子+看见)，而 He bent down(他弯下身去)的元译素是 to curve the body from a standing position (从站立姿势弯曲身体)(van Leuven-Zwart 1989：157～158)。根据在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译素与

元译素之间观察到的异同之处，可以设想出以下几种微结构：1）转换；2）调适；3）调整；4）变异。如果对大量译素与元译素进行比较后能观察到某些明显倾向，那么就能很清楚地了解译者的思想观点、解读方式和翻译策略，并能具体阐明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差异产生的原因。（据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12～13）参见“译素”

译感　sense of translation

指译者翻译时的综合性感受力、理解力和表达力，是译者运用掌握的中外文和背景知识，在翻译时分析、理解、传递原文的各种信息的综合实力的体现。若译者的译感强，译作在思想内容、文体风格、信息还原程度方面便具有最接近原作的阅读效果。在翻译实践中，较强的译感部分地来自创作灵感，而且是受原文内容限制的创作灵感。灵感是人思维过程中一种新的思路突然接通，使认识产生飞跃的心理现象。灵感的产生虽然具有随机性、偶然性，但仍然是以知识积累为基础的。在翻译实践中，灵感的作用如同一切创作活动中的灵感现象一样，都是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基础上的飞跃现象。

译感是实践性很强的命题，除了其他修养外，译者需要有长期、大量的翻译实践基础，才能产生充分而准确的译感。译感与语感有联系。语感是言语到意念的逻辑转换，是对语言文字所指意念的正确、敏锐、丰富的感受力。译感＝源语语感＋转换技能＋目的语语感。

现代外语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感。仅仅凭学习句法和词法知识不足以培养深入理解和流畅交流的能力。只有通过不断阅读和倾听，获取大量外语素材，将句法、词法、修辞等外语知识融入潜意识，才有可能像运用本族语言一样使用外语。这时就具有了外语的语感。外语学习之初，由句法学和词法学担当“领路人”是必要的。语法知识能让初学者认识到一种外语的基本架构，了解到这种语言大厦的平面图和立体结构，便于找到门路，登堂入室。

同样，翻译学习之初，各种翻译理论知识和技巧也是“领路人”。各种翻译技法都是从成功译作中提炼出来的，用于指导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例如，在句子翻译中根据源语和目的语的不同习惯，在不改动原文内容的前提下，可以对词语作增删处理或顺序调整等。但这类相对机械的翻译技巧并不能充分有效地指导复杂的翻译实践。译者融会于心的转化技能还是要靠大量实践。例如：

Everything was immense.

The great, cloudless sky. The rolling ocean of grass. Nothing else, no matter where he put his eyes. No road. No trace of ruts for the big wagon to follow. Just sheer, empty space.

这是美国现代作家迈克尔·布莱克（Black）在《与狼共舞》一书开头对大草原景物的一段描写。如采用直译，便会冲淡作者希望通过故事中的主角让读者感受到的摄人心魄的激动。一个个不完整句具有丰富的表现力，恰到好处地反映了故事主角的激动心情。如果在阅读分析中能体会到人们在激动时往往使用不完整句这一特点，翻译表达中便能采用同样心情下富有诗情画意的表达方法，翻译成：

一片苍茫，无边无际。

头上是万顷碧空，脚下是千里草原，犹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此外，哪怕望穿双眼，也看不到半点别的东西。没有道路，没有车辙，大马车无迹可循。目之所及，唯见漠漠旷野。

这段译文尽管句式与原文不同，但译文风格和阅读效果却与原文接近，精通两种语言的读者阅读译文后得到的信息与读原文近似，产生的激动与读原文时的心情相同，也许不如此不足以进入“化”境。（据贾文渊，贾令仪 2009）

学科建设阶段　stages in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logy

徐盛桓提出翻译学建设必须经过四个阶段：1. 注意阶段：学界对某一翻译理论的注意；2. 引进阶段：将某一理论完整、原本地引进，加以探讨和消化；3. 更新阶段：在应用过程中加入自己的特色和个性，有所扬弃和补充、修订和发展；4. 独创阶段：更新某些原理、方法、观念，也就是具有独创性了。徐盛桓的四阶段说基于他的“三维度标准”观点：在时间维上，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分化期；在方法维上，分为观察法、分析法、综合法、层次分析综合法；最后，在理论维上，分为直觉猜测、经验概括、学科独立、学科交叉。（徐盛桓 1989）　　（王宏印）

转换　shift; transformation

源自语言学，指按照一定的规则，用重新安排结构成分的次序、添加或省略某些成分等手段，把一个或几个语言结构改变成另一个语言结构的过程或结果。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斯（Harris）提出的转换，系作为话语分析的手段之一，其作用是把复杂的句子转换成简单的句子，以便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进行分析。他的转换限于表层结构，说明句子之间在表层结构上的互相转换关系。如主动句与被动句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列转换公式表示：NP_1 V $NP_2 \leftrightarrow NP_2$ be Ved by NP_1。箭头表示两个结构是等同的，可以互相转换。乔姆斯基（Chomsky）接受了转换的概念，把它作为语言分析的主要手段，主要含义有：1. 指句子生成的基本手段，在生成语法中起核心作用，句子生成的过程就是一系列转换过程。由于生成和转换是乔姆斯基描写整个语言和个别句子的基本着眼点，因此，生成语法的描写总是表现为动态的过程。2. 指句子生成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上所采用的手段，是连接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基本操作。句法部分即由转换规则和基础规则组成。

语言学中的转换是指同一语言内部的结构转换；翻译研究中的转换是指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卡特

福德(Catford)把后者分为范畴转换(category shift)和层次转换(level shift),其中,范畴转换又分为词类转换(class shift)、系统内转换(intra-system shift)、结构转换(structure shift)、单位转换(unit shift)(Catford 1965)。此外,翻译学中的转换不仅仅是语言结构的转换,还可以是形象转换、视角转换、文化转换、风格转换、辞格转换等。参见“词类转换”“单位转换”“结构转换”“系统内转换”“层次转换”“范畴转换”

词类转换　class shift

1. 卡特福德(Catford)四种范畴转换(category shift)中的一种(其余三种为结构转换、单位转换和系统内转换),指使用属于不同语法类别的目的语词项来翻译源语词项。词类一词指“特定单位的组别,该单位的定义须由它在上一级单位结构里的作用来决定”(Catford 1965: 78)。例如,用于名词之前的形容词与用于名词之后的形容词,各自会根据它们在名词词组中的功能而被界定为不同类别的形容词。因此,a white house(一幢白色的房子)译为法文 *une maison blanche* 时,其中的英文前置形容词 white(白色的)被法文的后置形容词 *blanche* 所替换,这就导致了词类转换(Catford 1965: 78)。必须注意,词类转换一般是由于源语与目的语的语言系统不同所引起的,而并非由于译者故意作出如此选择的结果。2. 一种翻译技巧。参见“词性转换”

单位转换　unit shift

卡特福德(Catford)四种范畴转换(category shift)中的一种(其余三种为系统内转换、词类转换和结构转换)。在单位转换中,不会严格采用级阶对级阶的对应(即源语和目的语在句子、从句、词组、单词和词素上的对等)。很显然,在这个意义上,单位转换是几乎所有“正常”翻译的一个重要特征。常常出现单位转换的一个情境是:源语词项因为没有现成的对等词而被译成一个短语,如把法语单词 *vieillard* 译为 old man(老人),或把俄语单词 *белеть* 译成 to turn white(呈现白色)。同其他类型的范畴转换一样,卡特福德所设想的单位转换表明,为了解决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存在的不相容问题,译者不得不作出强制性的措词变换。(Catford 1965)

结构转换　structure shift

卡特福德(Catford)四种范畴转换(category shift)的一种(其余为词类转换、系统内转换和单位转换),涉及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语法结构上的变化。英语句子 I love you (我爱你)的语序是“主-谓-宾”,译成法语是 *Je t'aime*,语序稍有改变,变为“主-宾-谓”。英译法这种结构上的改变便是结构转换的一个例子。和其他类型的范畴转换一样,结构转换概念证明了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系统之间在微观结构上不相容。(Catford 1965)

系统内转换　intra-system shift

卡特福德(Catford)四种范畴转换(category shift)的一种(其余为结构转换、单位转换和词类转换),产生于“源语和目的语具有结构形式基本对应的系统,但在翻译中又需要在目的语系统中选择不对应词语”的时候(Catford 1965: 80)。例如,虽然英语和法语在区分单复数的用法上有很大程度的形式对应,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采用形式对应。这样一来,一种语言中的单数词到另一语言中的翻译对等形式就变成了复数形式,如英语中 advice 与法语中的 des conseils 对应,the contents 与 le contenu 对应,等等(1965: 80)。系统内转换同其他范畴转换类型一样,通常是由于源语与目的语在结构上的要求相互冲突而译者被迫使用的一种方法。

层次转换　level shift

指翻译过程中,处于一种语言层次的源语单位转换成处于另一种语言层次的目的语单位。更具体地说,指语法层次和词汇层次间的转换;或者说,一种语言用语法表示的意义,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则用词汇表示,反之亦然。比如,在英译汉时,英语的时态特征常转换成用汉语的词汇手段表示。这是卡特福德(Catford 1965: 73～74)所提到的两种翻译转换(translation shift)之一。参见“范畴转换”

范畴转换　category shift

指翻译过程中偏离形式对应(departure from formal correspondence in translation),包括结构转换(structure shift)、词类转换(class shift)、单位转换(unit shift/rank change)和系统内转换(intra-system shift)等。这是卡特福德(Catford)(1965: 75～82)所提到的两种翻译转换(translation shift)之一。参见“层次转换”

背景　background

指对人物、事件起作用的历史情况或现实环境。任何原作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某种社会环境中创作的,会受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科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样,这种背景必然在译作中得到反映,并对其发生重要的影响。阿诺德(Arnold)在评论《荷马史诗》的翻译时指出:“现代人的毛病是常把古代世界也和现代世界一样看作自己的世界。但译者要想正确地认识荷马……必须坚定地防范自己,不要以现代人的心理猜测古代的荷马。”(Arnold 1861/1906)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很难的,译者必须超越文化障碍、心理障碍、时空障碍,深入原著作者的时代背景,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

背景知识　background knowledge

指译者具有的与翻译内容相关的知识。外部世

界对感官提供的信息或多或少被摄入大脑,积累成为知识。人们在认识每一种事物时都要在某种程度上动用已有的知识,这种已有的知识即我们习惯所称的背景知识。背景知识尽管会复杂无比,在大脑中却不会是混沌一片,而应是像物品入库一样,根据某些特征有序地存储下来,抽取信息就像用目录到书库中去找书一样,是按信息存储的结构去检索。背景知识越丰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可能越深入,表达的文字会越贴切。从相似论的观点来看,背景知识即"相似块"。通过学习和实践活动,人们大脑中积累并贮存了许多知识单元,总称为"相似块"。人们在认识外部世界时常常要依赖它的存在。所以,背景知识或相似块在翻译思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原文中的每一个词、短语、各种语法结构以至整个句子都会激活贮存在译者大脑中的相似块,与之耦合、接通。译者就是根据这些相似块去对照、分析、比较、鉴别原文的表达形式,并应用形象思维及逻辑的方法进行分类、分析,从中找出原文各结构层次间、其内涵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找出它与目的语之间的对应关系。随后对可能的各种译文进行综合优化,从而确定出最佳译文方案。只有当原文中叙述的对象与译者大脑中的相似块和谐共鸣时,才能产生感受,才会有深刻的理解,才知道如何表达。可见,翻译能力大小与相似块密切相关。任何一位成功的翻译家总是博览群书,学识渊深,经历丰富,所以他脑中积累了丰富的相似块,具有丰富的背景知识。

迻译　translating; translation

书面语,亦作"移译",即翻译。

误译　mistranslation

指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在思想意义上或在内容上背离了原文。由于语言与文化的差异以及译者意识形态、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等因素的制约,翻译不可能百分之百忠实于原文。误译通常是由理解或表达不当造成的。误译是不可取的,但纵观中外翻译史,误译又是不可避免的。误译有其主客观原因。客观上讲,过去,有的译文依据第三国文字(主要是英文和日文)的文本转译,后者如有误译,转译文难免误译;有的译者不懂原文(如林纾不懂英文),凭他人转述笔录,因他人之误而误。从主观上讲,除理解或表达不当外,有的译者借题发挥,以写代译,直抒心怀。例如,20 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Pound)用意象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他以译中国古诗而闻名于世,甚至在原诗中没有的意象,他也创造一个意象。他的译诗《神州集》被誉为 20 世纪美国最佳诗作之一。奇怪的是,获此殊荣的《神州集》,对照原文,在翻译上错误百出。[庞德对中国古诗误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是根据美国东方学者费诺罗莎(Fenollosa)的日文笔记转译。]

欠额翻译　under-translation

与"超额翻译"相对,是纽马克(Newmark)采用的术语。在目的语中,源语信息被译者忽视或打了折扣,即信息度过小,以致读者得不到理解原文意思的必要信息。纽马克在界定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时说:交际翻译倾向于流畅、清晰、简单、直接的表述,可以说是一种欠额翻译;而语义翻译倾向于复杂细致的表述,常常造成译文不畅,甚至晦涩,因其侧重于思维过程的再现,而非传递原作者的意图,往往造成超额翻译(Newmark 1981/1988)。可见,欠额翻译与超额翻译跟翻译方法有关。参见"超额翻译"

超额翻译　over-translation

与"欠额翻译"相对。目的语的意义容量超过源语的意义容量,即目的语的信息度过大,一般为增益不当所致,亦有添油加醋、借题发挥而致。(Newmark 1981/1988)参见"欠额翻译"

叛逆　treason

《大英百科全书》(*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在 Translation 词条下有 The translator is a traitor 之说,系源于意大利语警句 *Traduttore traditore*,可译为"翻译者,反叛也",或"译者,叛逆也",也有译作"译即逆"的。从表层的意思上看,就是要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或多或少会跟原文有出入,这就是译者对原作的背叛。从积极意义上来理解,这一警句提醒译者不要机械地照搬原文,而要发挥创造性。"在文学翻译里,无论是译作胜过原作,还是译作不如原作,这些现象都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与叛逆性所决定了的。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 1999:137)可见,译者的创造性与叛逆性常常和谐统一,不能分开。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Escarpit)提出"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一说,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创造性叛逆　creative treason

亦称"创造性悖谬",出自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Escarpit)的《文学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一书。埃斯卡皮解释道:"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确实,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正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才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域、超越时空的跨文化传播和接受。

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语言差异、个性差异的存在，译者的主体创造性在发挥时受到一种相反的力的诱导或牵引，以至于译文和原文的关系呈现为这样一种状态：越是具有创造性的译者或者是译者越是具有创造性的地方，译文与原文的距离越大，也就是中国清代画家石涛常说的："不似之似似之"。和文学创作倾向的"背叛"传统不同，背叛在翻译中往往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一种逻辑悖论而导致的悖谬。翻译的质量检验和评估发现，越是具有创造性的译文，它和原作的区别也越大。创造性译文显然区别于平庸的译文，但同时也区别于超额翻译和欠额翻译的译文。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其小说译文语言所取得的成就和汉语原文的创作成就几乎无异。另一个成功的例证，就是霍克斯(Hawkes)译《红楼梦》，其英文的阅读效果也有近乎阅读英文原创文学作品时的审美享受。 (王宏印，蓝春)

"假朋友" false friends

false friends 源于法语词 *faux amis*，可定义为：两种语言中字(词)面意义相同而实际意义不同的词语。貌合神离的假朋友是翻译中的一大陷阱，如不予辨别，会惹出麻烦。如英文 to assist(帮助)和法文 assister(出席)；英文 sensible(明智的)相对于法文 sensible(敏感的)及德文 sensible(敏感的)(Shuttleworth Cowie 1997：58)。又如英汉翻译中的常见假朋友：busboy 餐馆勤杂工(非"公共汽车售票员")，mad doctor 精神病科医生(非"发疯的医生")，horse sense 常识(非"马的感觉")，green hand 新手(非"绿手")，black tea 红茶(非"黑茶")，pull one's leg 开玩笑(非"拉后腿")，an apple of love 西红柿(非"爱情之果")，bring down the house 博得全场喝彩(非"推倒房子")，pull up one's socks 鼓起勇气(非"提上袜子")。

翻译 translating; translation

汉语的"翻译"可能最早只有"译"，其义指"古代翻译北方民族语言的官"，出自《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唐·孔颖达疏："寄，言传寄外内语言"，"象者，言放(同"仿")象外内之言"，"鞮，知也，谓通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吕氏春秋·慎势》中又称"象译"："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唐·贾公彦疏："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译"的第二个义项"解释经义曰译"，最早见于汉代王符《潜夫论·考续》："夫圣人为天口，贤者为圣译。""翻"的本义为"飞"；另一个义项是"改变位置"；《辞源》称："翻者，覆转也"；也有翻译的含义与用法，见于《大乘义章》："外国正音名为达磨，亦名昙无，本是一音，传之别耳，此翻名法。""翻"与"译"合成一词见于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三佛陀什》："先沙门法显于狮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翻译"还有另外的写法："翻绎""繙译""繙绎"，其含义没有差别。"《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讹'。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讹'、'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polysemy, 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钱锺书 2002：77)

"翻译"的一般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汉语和英语的"翻译"都是多义概念。英语的 translation，最权威的《牛津英语词典》与《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都说它来自法语或拉丁语，就其含义，前者说：The action or process of turning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also, the product of this; a version in a different language. 后者说：an act, process, or instance of translating; a rendering from one language or representational system into another; also, the product of such a rendering. 可见 translation 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不仅指行为或活动，还指这种行为的过程和结果。从中外最新词典看，"翻译"的含义基本还是包括"行为(活动)、过程、结果、译者"，再加"语言技能、教学方法、课程、专业名称、职业等"。因方式不同分为笔译、口译、同声传译、机译。术语的多义性表明它既可作学术用语，又可作日常用语，如不加区分，就会使用混乱，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英语中 translate/interpret; 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 translating /translated; translator/interpreter 等这些术语含义都比较清楚，但译成汉语都可以是"翻译"。因此，"翻译是艺术"与"翻译是科学"这样性质判断的命题就容易产生非逻辑的争论。

研究"翻译"，应该关注与了解人类关于这个范畴认识的发展史(即范畴史)。在中国，关于"翻译"的论述或定义影响较大的主要有：1. 支谦："名物不同，传实不易。……仆初嫌其辞不雅。……'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因循本旨，不加文饰。"2. 鸠摩罗什："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3. 赞宁："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譬诸枳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为枳。枳橘之呼虽殊，而辛芳干叶无异。"4. 魏象乾："窃惟翻译之道，至显而寓至微，至约而寓至博，信乎千变万化、神妙莫测也。惟其变化无穷，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学者不可不审焉。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也。"5. 严复："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6. 鲁迅："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面

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7. 傅雷：“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8. 陆殿扬：Translation is an art, a bilingual art. Like painting, translation enables us to reproduce the fine thought of somebody, not in colours, but in words, in words of a different language. 9. 钱锺书：“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0. 季羡林、许国璋：“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这种语言活动，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它影响到文化和语言的发展。与翻译有关的可变因素很多，例如文化背景不同，题材不同，语言难译易译不同，读者不同等等，很难把各种不同因素综合起来，都纳入一条原则。”11. 方梦之：“翻译是按社会认知需要、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的语言文化活动。”

关于“翻译”的解说和定义，在西方影响较大的主要有：1. 西塞罗(Cicero)：“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2. 昆体良(Quintilian)：“我所说的翻译，并不仅仅指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3. 路德(Luther)：“真正的翻译是把外国语变成译者的本族语言。”“翻译中必须使用地道的德语，而不用拉丁化的德语。”4. 德莱顿(Dryden)把翻译分成三类：直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拟作(imitation)。5. 泰特勒(Tytler)：“我们可以从中探求翻译的原则，得出以下结论：译文应把原文的思想完全传达出来；译文的风格和表达形式应和原文的一样；译文应跟原文一样流畅。”6. 本雅明(Benjamin)：“各种语言之间有一种超历史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存在于每一种语言整体的意指之中——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单独体现这种意指，只有每一种语言互为补充的意指的集合才能体现这种意指：这就是纯语言。”7. 费道罗夫(Фёдоров)：“翻译的等值意味着充分传达原文的意思内容并在功能修辞方面与原文完全一致。”8. 雅各布森(Jakobson)：“我们区别出阐释语言符号的三种方法：符号可以翻译成同一种语言中的其他符号，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翻译成另一种非语言的符号系统。”9. 奈达(Nida)：“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10. 霍姆斯(Holmes)：“翻译学缺乏一个广泛为人接受的名称，因此妨碍了学科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在翻译学的研究范围与学科结构方面人们毫无共识。”11. 韦努蒂(Venuti)：“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从以上22条(这只是一种选择，当然也可以是另外10条、25条或其他多少条)，可大体了解中西方关于“翻译”这个范畴的认识过程，从中窥见人们认识的趋向与规律以及中西方学者在这个领域研究的异同。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纵向逐渐深化、横向逐渐扩展、理性认识逐渐系统化。通过对古今中外这些成果的研究我们对“翻译”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现将新的认识界定如下：翻译(包括口译、笔译、同传与机译)是有文本参照的跨文化、跨语言的人类有目的的社会交际行为与活动。其对象、过程因译者意愿与社会需求的不同而不同，同理，其结果产生出无数种跟原文距离(包括内容与形式)远近不等的译文变体(translation variants)，其变体在原文和目的语作品之间构成了一个集合(set)。如下图所示：

原文 I————————I 目的语作品

T1，T2，T3，T4 ………………… Tn－1，Tn

图中从T1(＝Translation 1)到Tn(＝Translation n)都是译文，中间包括无数种译文。T1是最靠近原文的译文，也就是最忠实于原文的译文；Tn是离原文最远的译文，也就是最不忠实于原文的译文。从T1向右运动，译文越来越不忠实于原文，从Tn向左运动译文越来越忠实于原文。只要是译文都可在这个集合中找到它的位置，如宗教经典翻译多在集合的左端，可能是T1或T2或T3。林纾的翻译一定是在集合的右端，可能是Tn－2或Tn－1或Tn。译文所在集合位置的不同取决于译者的水平、经验与追求以及社会的规约和要求(包括译文使用者的要求、社会意识形态与伦理的制约等)。 **(杨自俭)**

个体性 individuality

与翻译的“社会性”相对。在包括翻译在内的人文活动中，主体带有“个性主义”性质。每个人的世界观、审美观、社会背景、文化传统、教育程度、生活经验与情感经历等往往不同。译者有各自的先有、先见和先识。同一本书，不同人去翻译，会产生不尽相同的译文；同一段文字，不同的人去阐释，会有不同的结果。翻译运思和操作是以译者个人为中心展开和进行的。译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将个性带入译品之中。译者个性包括翻译观、翻译激情、审美情趣、知识结构、翻译方法等多方面，这些因素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支配着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表达。任何译者都不可能排除其阅读经验、先在知识对理解原作、表达原意的影响。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都打上译者各自的烙印，体现着译者各自的个性，于是就产生译者的翻译风格。但是，译者的思维方式、文化积淀和独特个性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译者翻译时个性的展现会受到社会准则、社会需求、翻译标准以及原作内容和形式的种种制约。参见“译者风格”

翻译艺术 art of translation

刘宓庆认为，翻译艺术的一般特征有三：普遍

性、依附性和变通性。1. 普遍性——"翻译戏剧、诗歌固然是艺术,翻译法律文书、科技资料、宗教典籍也都是艺术。理由是:翻译不能须臾离开选择词语、调整句式、修饰行文等艺术加工。翻译艺术的普遍性和全程性使翻译运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审美活动。"2. 依附性——"翻译不是文艺创作。翻译者不能脱离源语的种种艺术要素,自行其是。从事文艺创作可以'神与物游','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翻译不容神思于山海,恰恰相反,翻译者侧身其中的是一块荆棘丛生的方寸之地,脚下布满了陷阱。'方寸之地见功夫',是翻译艺术的显著特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依附性。"方寸之地的限制太多,诸如文体限制、意义限制、语法限制、风格限制、文化限制,等等;3. 变通性——"翻译艺术受客体条件的限制,自由度固然很小,但它同时又赖主体条件的调整,自由度可放可收。翻译家掌握了翻译艺术的变通规律,就可以在方寸之地,收放自如。……审美客体的美,常常是通过审美主体的审美理想得到体现,驾轻就熟地将客体的美加以改造。"(刘宓庆 1995:31～52)

从属性 subordinateness

与"创造性"相对,指译文的思想内容、感情色彩,乃至风格韵味从属于原作,与原作保持一致,而不能背离原作。从属性是翻译的本质属性。翻译不是创作,必须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意境。对原作的内容不得任意增减,即使需要选译或摘译,也要忠实于被译的内容。同时,译者也不能对原作的感情色彩随自己的好恶而任意变化。在谈到翻译的从属性时要特别注意翻译的创造性,创造性是一切优秀译作的灵魂。语言形式的转换,形象、风格、意境的转换都需要发挥译者的创造性。

多样性 diversity

指翻译中一种意思可用多种形式表达。翻译的多样性表现在各个层面,小到一个词,大到一个篇章,即所谓意一言多。特别在词这一层面,有时必须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改变形式,一词多译,才能使译文生动活泼、顺畅贴切。如:Some fishing boats were becalmed just in front of us. Their shadows *slept*, or almost *slept*, upon the water, a gentle quivering alone showing that it was not complete *sleep*, or if *sleep*, that it was *sleep* with dreams. 眼前不远,渔舟三五,凝滞不前,樯影斜映水上,仿佛睡去,偶尔微见颤动,似又未曾熟睡,恍若惊梦。(高健译)

这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段落。其中 sleep (slept)一词出现五次,如果将它们逐个译成"睡"字,大煞风景。译者经过处理,只译出其中三个,分别为"斜映""睡去""熟睡",无一简单重复,而另有两个隐去。译得如此丰富多彩,首先在于对原文意蕴的深入发掘和理解,同时也有赖于译者运用语言的娴熟手法。在词组的层面上,同一译者也经常显示出翻译的多样性。杨宪益、戴乃迭英译《红楼梦》是译者的典范。例如:1. 必须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第七十四回)We must start killing each other first before our family can *be completely destroyed*. 2. 往后子孙遇见不得意的事,还是点儿底子,不到一败涂地。(第九十二回)Then in future, if things go badly for our descendants, they'll have something to fall back on and won't *be bankrupted*. 3. 完了,完了!不料我们一败涂地如此!(第一百〇五回)We're done for, done for! To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reduced to this*. 参见"意一言多" (蓝春)

创造性 creativity

与"从属性"相对,指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是不自由的,因为他必须服从原作的思想内容;但他又是自由的,因为他可以挑选确当的目的语形式去再现原作的内容。译者的创造性体现为原作基础上的二度创造,包括文化的移植、形象的再现、语言形式的传达、新译名的设立等多方面。参见"再创造"

再创造 recreation

指源语与目的语无法对应的情况下,为传达近似的效果而采取非对应手段。它既不是自由创作,也不是随意改写。再创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文化的移植。语言承载着各种文化信息,而语言本身又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各种典故、成语、俗语、熟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的还源远流长,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就连某些领域内的科学概念,东西方至今没有"融合点",例如:中西医术语大相径庭,一般只能采用意译或音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不断地做文化移植。

2. 形象的再现。文学是通过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形象是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观察、体验、概括、提炼的结果。语言的表现形式不一,但形象相同——这是传译形象的再创造。

3. 语言形式的传达。各种语言本身都有特殊性。由于东西方语言在音、形方面千差万别,加上词语及其搭配关系的非对应性,由音、形、义组成的言内意义的传达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汉语是象形文字,字体富于形象,英译时也须作再创造,如:人字齿轮(herringbone gear)、一字站着(stand in a row/a line);又如:三个人品字式坐了,随便谈了起来。许孟雄译为:The three men sat down facing each other and began casually chatting.

4. 设立新名。1997 年春,随着英国成功克隆小绵羊,clone 这一术语的译法曾见诸报端,受到社会关注。对此,不同的译者曾用意译、音译、半音半意译、形译、造新词等多种译法,提出 10 余种译名,最终以"克隆"定名。(方梦之 1999:111～113)

社会性 sociality

与翻译的"个体性"相对,指不同历史时期对翻译的民族文化心理、社会精神需求、社会接受程度以及译者的内在动力、翻译的外在诱因、相关学科和翻译理论自身的发展,乃至出版商提出的要求,涵盖翻译产生的社会原因、社会需要、社会作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纵观人类翻译史,翻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产生,又推动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贯串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我国古代佛经翻译是顺应人民群众避邪转运、求经拜佛的需要;清末科技翻译是救亡图存的需要;五四时期的翻译是引进"新思想"的需要;建国初期的大规模翻译是当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改革开放时期的翻译是实现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再者,译者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他的翻译意识和观念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译品的成败优劣最后还要接受社会的检验。此外,我国翻译活动的组织工作已部分地社会化,如出版单位的选题策划和审稿制度,大型丛书、百科全书、全集的统一体制、统一术语,直至统一标准,大型建设项目的翻译"会战",翻译公司的"流水作业";等等。这些社会化因素对翻译的个体性有很大限制。

从权力话语的角度来看,社会上的各种"权力"都可能渗透到翻译活动之中,以不同的话语形式表现出来:中心文化对边缘文化的排斥,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蔑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对异域文化的态度,文化转型期与文化稳定期翻译观念的不同,国家对翻译著作的监控和限制,政府对翻译活动的干预、制约或推动,等等。参见"权力话语"

科学性 scientificity

指语际转换过程的客观规律性。刘宓庆从科学的可论证性来阐明翻译的科学性,认为翻译运作的"存在实体",即源语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语义内涵,意义是一个多向度的存在实体;再则,翻译运作主要凭借抽象思维,辅之以形象思维。翻译科学性的基础为双语的所指同一。双语对同一概念的命名虽然各异,但这个概念所指的外部世界中的实体(物体、现象、状态、性质、过程等)都是一致的。翻译具有科学性,是因为译者不能主观臆造,他在语际转换中使用目的语所代表的概念,必须与源语的概念一致。而概念的一致则是以所指的一致为"实在的"的依据。概念必须赋形于"命名","命名"是概念的载体,它只是一个代表所指的符号,即能指。翻译担负的语际转换任务,涉及不同符号系统在语义、语法、语音、逻辑等四个方面的转换过程,而以语义对应转换为核心。可见,语际转换本身就是一项科学任务,是一个涉及上述四个方面转换的复杂的科学加工过程,存在着科学的方法论。

部分性 partiality

指翻译过程中必然有增删,原文的所有成分不可能全部翻译到目的语中。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调控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蒂莫奇科(Tymoczko)在《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1999)一书中提出和系统阐述的翻译的部分性有三层含义:1. 意义传译的部分性。源语文本具有多重意义,难以确定并在译文中全部再现,译者总是选择文本的某些方面来翻译或加以强调;2. 这种有所选择的译文,引起目的语读者对原文形象的部分性反映;3. 任何翻译都是部分性的,译者选择传译的原文中的某些部分就代表了原文的全部。产生部分翻译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原文和译文所在的两种语言系统之间存在着互不相容的语言特点。例如,一种语言的强制性特征翻译成不具备这种特征的语言时,就会丢失。第二,两种语言所在的文学系统之间存在着差异。比如,译者在处理目的语读者所不熟悉的源语文化因素时,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或多或少地改动了原文。第三,源语读者和目的语读者的信息负载量(information load)不尽相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使目的语读者顺利接受源语信息,必须对原文中的信息形式进行调整,以适应目的语读者的信息道。这种形式调整必然使译文长于原文。

卡特福德(Catford 1965: 22)曾将翻译分为"完全翻译"(full translation)和"部分翻译"(partial translation),前者指原文的每个部分都被翻译成目的语,后者指原文的某些部分没有翻译,而是被直接移植到译文中,如 sauna(桑拿浴,蒸汽浴)和 sputnik(苏联制造的人造卫星)二词就是直接从芬兰语和俄语中借到英语中的。卡特福德的"部分翻译"与蒂莫奇科的翻译的部分性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参见"部分翻译"

翻译方向 direction of translation

指译者是把外语译成母语,还是把母语译成外语;也可指把一种惯用的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惯用的语言,或把一门外语译成另一门外语。由于译者两门语言的水平常常是不一样的,国际上主流的看法是:译者只可将外语翻译成母语,或将一门不太惯用的语言译成自己惯用的语言,以保证译文的准确性、流利性和最大程度的有效性。相反方向的翻译被称为"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或"服务翻译"(service translation),只可用作教学练习,以检查学生的语言运用情况(Baker 1998: 63～64)。

文化地位的不均衡,造成汉译外的数量远远少于外译汉。要使文化交流更趋平等,就得将更多的汉语作品译成外语。但国外懂汉语的人很少,依赖外国人从事大量的汉语作品外译不切实际。因此汉译外(特别是汉译英)的任务历史地落在我国翻译界的身上。

其实,翻译方向还应包括是直接从源语译出,还是经由第三种语言转译。我国在 20 世纪初,多由日

语、英语等转译其他语种的外国作品,现在已能直接译出大多数语种的作品。

翻译分析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贝尔曼(Berman)(1985)认为,目的语文本中一般含有一种语篇变形系统(a system of textual deformation),它妨碍对异域成分的接受。他区分了十二种变形倾向(deforming tendencies,参见"变形倾向")和两种翻译分析,即负面分析和正面分析。负面分析(negative analysis)指对民族中心主义的翻译、模仿和改写之类的超文本翻译(hypertextual translations)中各种变形力量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贝尔曼主张保存原作中异的成分,倡导正面分析(positive analysis),即对以直觉和不系统的方式限制变形倾向的行为所进行的分析。贝尔曼似乎对韦努蒂(Venuti)的翻译主张产生过影响。

翻译行为 translational action

指产生信息传递的某种过程包括文本、图片、声音、肢体语言等各种各样的跨文化转换过程,由芬兰裔德国翻译家赫尔兹-曼塔里(Holz-Mänttäri)于1981年提出。赫尔兹-曼塔里将之定义为: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而设计的复杂行为。认为翻译"并非简单地翻译词、句或文本,而是引导有目的的合作,从而跨越文化障碍,实现其在目标环境中的功能"(Holz-Mänttäri 1984: 7~8)。翻译行为泛指译者在跨文化交际中可做的工作,翻译本身只是转换文本时所做的工作,即翻译行为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例如,一名译者建议他的德国顾客不要将寄给新加坡一家小公司的信翻译成英文,而要译成中文,因为该译者知道新加坡虽然是个双语国家,但小公司里的人不一定熟悉英文。这种行为也属于翻译行为,而当他具体地把信转换成中文时,他的行为就称为翻译。翻译行为理论特别强调并分析翻译过程参与者的不同作用:客户(client)通常是翻译行为的发起人(initiator),由他确定翻译的目的;译者制造出目的语文化的文本,以表达源语文化文本施授者(sender)的交际意图;但目的语文本的接受者(receiver)就是文本的使用者。当然,以上行为角色有的可能是同一个人。同时,翻译行为理论也强调参与者行为发生的语境条件:时间、地点、媒介。翻译行为的提出及研究使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前进了一大步。

人际互动行为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把翻译看做一种有意图的"人际互动行为",在这一行为过程中,人或媒介充当一定的角色或发挥一定的作用,并通过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相互联系。诺德(Nord) (1997)在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一书中综合了赖斯(Reiss)、弗米尔(Vermeer)和赫尔兹-曼塔里(Holz-Mänttäri)的理论,对翻译这种"人际互动行为"中所涉及的角色作了详细的介绍。这些角色包括:1. 发起人(initiator);2. 委托人(comissioner);3. 译者(translator);4. 原文作者(source-text producer);5. 发出者(sender);6. 文本创作者(text producer);7. 译文目标读者(target-text addressee);8. 译文文本接受者(target-text receiver);9. 译文文本使用者(target-text user)。发起人是指需要译文的公司或个人,委托人是指联系译者的人(参见"发起人"和"委托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他首先扮演接受者的角色,了解翻译纲要(commission/translation brief)和原文,然后展开受托的翻译任务。原文作者创作出源语文本,为翻译行为的展开提供了原始资料。在分析原文作者时,诺德进一步对发出者和文本创作者进行区别。发出者是指通过使用某文本而达到传递某种信息目的的个人、组织或团体;而文本创作者则是指根据文本发出者的要求制作文本的人。在传达源语文化发出者的交际意图方面,译者可被视为目的语文化文本的创作者。译文的目标读者即是文本创作者预定的读者群;文本接受者则是指在文本创作出来后,真正阅读文本的个人、团体或组织。赫尔兹-曼塔里认为目标文本使用者是最终将译文投入使用的人。 (钱宏)

有意图的互动行为 intentional interaction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弗米尔(Vermeer)在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翻译是一种"有意图的互动行为"。弗米尔对行为的定义是:"某一举动之所以被称为行为,是因为该行为之发出者必须(或可以)解释发出此行为而非其他行为的原因"(1989a: 176)。诺德(Nord)认为,在人际互动中有多种选择,可以选择做某种事情或选择不做任何事情(1997);弗米尔还特别强调在需要做出明显举动的情况下没有做出任何举动也是一种行为(Nord 1997)。此外,弗米尔指出,"意图性"并非指行为本身具有意图,而是交际的参与者或旁观者把该行为看做或理解为一种有意图的表达。诺德(1997)在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一书中明确了这一概念。她指出,翻译之所以是一种有意图的互动行为,是因为翻译"首先是有意改变现有的事物状态(至少是针对一些人无法进行交际的状况),还可能有其他一些更严格的交际性质的意图,如告知目的语接受者有关源语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1997: 19)。诺德认为,意图性可能与译者有关,但更多情况下是与翻译的发起人(initiator)有更密切的关系。翻译意图与源语发出者或源语文本作者在用源语进行创作时的意图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 (钱宏)

翻译过程 process of translation

指翻译活动所经过的程序,一般认为包括三个阶段:理解原文、用目的语表达、校验修改译文。其中,

理解是表达的基础或前提,表达是理解的结果。奈达(Nida)提出的过程是:1. 分析——从语法和语义两方面对原文的信息进行分析;2. 传译——把经过分析的信息在脑子里从源语转换成目的语;3. 重组——把传递过来的信息重组成符合要求的目的语;4. 检验——对比原文意义与目的语意义是否对等。总的来说,翻译过程主要是理解与表达的过程,即认识与实践、分析与综合的过程,它们既是彼此衔接的同一过程,又是互有交叉、互臻完善的两个阶段,是同一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

译前准备　preparation for translation

指译前积累材料、掌握必要的信息,是译者为了圆满完成翻译任务而需要做的一项工作。特别对于从事对外文化和科技交流的口译人员来说,译前准备更是不可或缺。无论是技术谈判、学术讲座或专业性参观,口译人员必须先了解专业技术内容、熟悉相关术语和表达方式(特别是缩略语和行业语)、探知谈判或讲座纲要、掌握对方的背景情况及我方的要求等。这样才能在翻译时掌握主动权,便于接受、记忆对方信息,并能正确地加工、传达信息。构成理解的要素是多方面的,译前准备可为熟悉宏观语境创造条件。

我国国家标准《翻译服务规范　第1部分:笔译》对"译前准备"作了如下规定:应在翻译前仔细做好以下工作:审阅原文;熟悉所译资料涉及的专业内容,备齐相应的工具书;审阅自己已掌握的术语;审阅顾客提供的术语;审阅并整理顾客提供的资料;进一步查阅单词和专业术语(如在互联网或数据库);在保密的前提下通过翻译服务方与顾客解决内容上、专业上和术语上的问题。(GB/T 19363.1-2003)

(张顺梅)

理解　comprehension

指弄懂源语的种种含义,是译者认识事物之间联系的本质与规律的一种思维活动。理解分为直接理解和间接理解。直接理解是马上实现的,是过去已经理解的事物的重现。间接理解是逐步实现的,需要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渡过程,通常是在感知、表象与再造想象的基础上借助于思维过程实现。从语言是客观世界的能指这一角度来说,任何语句序列都是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它可能是具体的,也可能是抽象的。那么,译者必须把语言的所指找出来,搞清楚原作者要表达的语气、文体、语用含义等。由于原文的内容不同,理解的性质也不同,可以区分为:1. 对语言的理解;2. 对事物意义的理解;3. 对事物类属的理解;4. 对因果关系的理解;5. 对逻辑关系的理解;6. 对事物内部构成、组织的理解。阅读中的理解通常经历以下阶段:1. 字面理解;2. 解释;3. 批判性阅读;4. 创造性阅读。因此,不能仅将揭露事物本质与规律视为理解。理解以旧经验、旧知识为基础。经验的丰富性与正确性、已获得的基本知识的数量与质量、思维发展水平等,都影响理解的水平。对于翻译来说,理解是关键,只有正确的、深刻的理解,才可能有完善的表达。

双向理解　thorough comprehension

指从本族语和外语两个方面作全面的理解,而不仅仅是对一种语言的字面理解。例如,"祖国统一"(指涉及港、澳、台的问题)译为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而不是 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港、澳、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们要实现祖国重新统一,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统一。基于对汉语这样的理解,本例中的"统一"应译为 reunification。又如,"对外开放政策"现在一般译为 the 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但刚开始时有人译为 the open door policy("门户开放政策")。后者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鸦片战争后,美国为了同欧、日列强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提出 the open door policy。显然,这与我国当前奉行的政策是不该相提并论的。(徐梅江 2000)

知识库要素　repertoreme

图里(Toury)将它界定为"不论级阶与范围大小的、构成某种常规化知识库的……任一符号"(1995:268)。"知识库"这一术语被理解为指"支配任何特定产品制造与使用的规则与材料的总和"(Even-Zohar 1990a:39)。例如,文学知识库可以描述为"生成与理解特定文本的规则与项目的总和"(Even-Zohar 1990a:40)。把属于这种知识库中的项目置于一个特定文本时,该项目"就进入了那种行为或文本特有的内在关系网络"(Toury 1995:268),从而成为一个文本素(texteme)。然而,在翻译过程中,根据一种观察到的、被图里阐述为"不断标准化法则"的翻译现象,"为了顾全来自目的语知识库的(更)习惯的选择,原文的文本关系常常被修改,有时候甚至到了完全被忽略的程度"(Toury 1995:268)。换言之,源语文本中的文本素往往被转换成目的语知识库要素(Toury 1995:268)。例如,原文中刻意安排的歧义被消除了,新颖独到的隐喻被更标准的表达方式取代。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图里认为这种倾向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但在目的语文本中形成源语文本中没有的新的关系网络时,也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Toury 1995:272)。

翻译决策　decision-making in translation

指翻译活动中译者形成译文时所经历的部分过程。列维(Levý)在 *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 (1967)一文中把翻译行为描述为决策行为。他认为,翻译就是面对连贯状态下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译者不断想出解决办法并作出决策。列维的"决策"就是选择。例如,在翻译某一语篇时遇到某个问题,会有几个可能的解决方法,这时必须作出选择,且这一选择

还将影响随后的选择。这种决策本质上很少是顺序性的,而是体系性的。列维认为,译者的主观因素(如美学标准)在决策时起一定的作用。威尔斯(Wilss)1994年发表 *A Framework for Decision-Making* 一文,对该术语作进一步完善,提出决策涉及四方面因素:译者认知体系、知识结构、跟委托人或原作者对译作具体要求的认同感以及对文本的熟悉程度。

翻译中的干扰 interference in translation

指一种语言系统的特征通过翻译进入另一个语言系统,即原文对译文的影响。纽马克(Newmark)对此作了较多的探讨。翻译中的干扰,狭义上讲,指译者把原文的句法结构、词汇、隐喻及语序不恰当地直译成目的语。从广义上讲,干扰会影响翻译句子的长短、标点符号、专门术语、新词、文化词汇等。任何翻译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原文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干扰可以说是翻译的内在属性。一般认为,干扰的作用是负面的,影响译文的地道和流畅,翻译腔就是干扰的结果。但如果利用得当,干扰可以丰富目的语文化和语言,可以加深读者对源语文化的认识。(廖七一 2001)

变形倾向 deforming tendencies

这是拉美小说翻译家贝尔曼(Berman)在《翻译与对异域的考验》(*La traduction comme épreuve de L'étranger*)一文中提出的概念(1985: 284～297)。贝尔曼认为,变形是所有翻译所固有的共性(universals of deformation),是目的语文本妨碍接受异语成分的种种表现,至少有12种:1. 调整句子结构(rationalization),包括调整标点、句型和词序以及通过其他各种方式使原作抽象化;2. 明晰化(clarification),即将原作暗含的意义明确地表达出来;3. 增加篇幅(expansion),即译作一般比原作长;4. 润色(ennoblement),即某些译者美化原作的倾向;5. 品质下降(qualitative impoverishment),即所用的目的语词不如原作的生动形象;6. 词汇量贫乏(quantitative impoverishment),即原作中多样的措辞(lexical variation)在目的语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相同词汇的重复;7. 破坏节奏(the destruction of rhythms);8. 破坏内在的指称网络(the destruction of underlying networks of signification);9. 破坏语言结构(the destruction of linguistic patterning),指句子结构很有条理的原文,经翻译后常常变得不连贯;10. 破坏原文的方言网络(the destruction of vernacular networks),指原作中的方言痕迹被抹杀或被目的语中的方言所取代;11. 破坏原作用语(the destruction of expressions and idioms),指用目的语中的习语或谚语取代源语,贝尔曼认为,这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做法;12. 抹去多语共存现象(the effacement of the superimposition of languages),指原作中的方言与共同语并存的现象在译作中不复存在。

贝尔曼对通过归化的办法而使外国文本"变形"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做法表示质疑,认为翻译行为的真正合乎道德(ethical)的目的是异化外来成分(receive the foreign as foreign)。

表达 expression

指译者把自己从原文中所理解的内容用目的语说或写出来。在表达过程中,译者经常想着读者,考虑如何用他们能够自然接受的语言,传达原作的思想和风格。理解是表达的基础,表达是理解的结果。但理解正确并不意味着表达必然正确,在表达上译者需要借助许多具体的方法和技巧。

非言词表达 non-verbal expression

指文字以外的书面表达形式,包括传递信息的特殊符号、记号或代号。例如数字和数学符号(数学语言)以及机械、电气、建筑、地质、气象等各专业的图像符号(工程图学语言)等。普通语义学(semantics)对这类非言词符号的命名、定义、解释或书写形式等是不研究的。在以集字/词释义为主要目的的字/词典中也没有它们的一席之地,只有在相关学科的专业著作或专业辞书中才有它们的地位。这些符号、记号或代号大多由政府部门(如国家标准机构)或有关学术团体规定,有些则是约定俗成。符号是任何可以用来有意义地代替另一种事物的东西。书面语中的非言词符号跟符号学中所指的鼓声、口哨、香味、体态、病征、色语等并无直接联系,与社会语言学中的旗语、手势语等也无关。 **(文晔)**

陌生化 defamiliarization

由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希尼(Heaney)提出,意指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将目的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已丧失了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使翻译确实地传播信息,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陌生化与汉语的纯洁性是一对矛盾。纯洁性是汉语赖以生存的根基,而陌生化则不断地增强着汉语的活力,两者相得益彰,不可或缺。因此,译者必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把握陌生化的限度。译者可能首先"是用符合目的语规范的语言传达原作中的新奇的内容和思想,而当原语文化的思想内容不足以对译文读者产生一定程度的震撼的时候,译者又会挖掘原文文本在语言或是文学样式等方面的陌生性,以满足读者对原语文化中陌生性的好奇。"(孙会军 2003)翻译史已经昭示:外域语言现象初进目的语,难免有陌生之感,但"有些生硬的洋话,经过时间这个熨斗熨来熨去,也渐渐变得自然了。三十年前特异的说法因为一再为人采用,已经成了'土产',再过一两代也许给人视为陈腐。"(刘英凯 1999)

信息论要求提高单位信息密度,使有限的文字传达更多的信息。这除了提高现有文字的表达质量外,

也需要有陌生化的表达。英语缩略词 OPEC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刚刚音译并转写为“欧佩克”，当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读出“欧佩克”时，屏幕下方会出现“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字样，时隔不久，屏幕下方的这七个汉字不再出现。因为人们对“欧佩克”这一说法已熟悉。由此，“欧佩克”三个字比“石油输出国组织”七个字的信息密度比提高一倍多。

检验 test

是奈达(Nida)翻译过程四阶段中的最后阶段(另三个为：分析 [analysis]、转换 [transfer]、重组 [restructuring])，即将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对照，检查译文跟原文在文字和语法上是否对应，而更重要的是译文意义跟原文意义(包括文体风格)是否对应。

逻辑校验法 logical proof

是校验译文的主要方法之一。译文中常见的逻辑错误主要是：事实不符，概念模糊，前后矛盾，上下不呼应，层次不分明等。校验译文，可根据原文的上下文，以客观事物、事实、事理为依据，对译文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运用逻辑判断、推理，认定真正含义，确定前后逻辑关系，必要时予以修正。逻辑错误包括理解时产生的错误和表达上的错误。如：To *darken* copies immediately, push toner lever (1) several times in the direction indicated by the arrow. [原译：要使复印件立即变黑，将(1)号调色杆按箭头指示方向推动几次即可。(理解错)]应改译为：要使复印件颜色立即变深，……

又如：The camera gives us a lasting picture with all details of the object. [原译：照相机给予我们包括物体一切细节的永久性照片。(表达错)]应改译为：照相机(为我们)摄下……

翻译知识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指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在翻译实践和研究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包括翻译理论、翻译方法与技巧、翻译史等。

翻译单位 unit of translation

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使用的基本术语之一。前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在《语言与翻译》一书中把翻译单位定义为“在译文中能够找到对应物的原文单位，但它的组成部分单独地在译文中并没有对应物。换言之，翻译单位就是原语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最低限度)的语言单位”(巴尔胡达罗夫，1985：145)。维奈(Vinay)和达贝尔纳(Darbelnet)(1958/1995)认为“翻译单位是一句话中必须一起翻译的最小切分”。这可理解为，翻译单位是必须放在一起翻译的语言片段。

选择翻译单位，实际上就是选择翻译方法。例如，在翻译一个语篇时，主要以词为翻译单位，层级偏低，其翻译方法就是词对词的直译；如果通篇主要以语段为翻译单位，层级偏高，则为意译；如果以语篇为翻译单位，目的语与源语所具有的最小对应的语言单位就是语篇，译文表达的任意性最大，大致相当于译述了。

翻译单位与翻译层次有关，不同文体的翻译对要达到的翻译层次有不同的要求。例如，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专业读物(非科普读物)，句法严谨，用词正式，句中词义确凿，句间衔接逻辑性强，翻译一般只涉及思维、语义、专业三个层次，大致以句子为单位。而对于需要达到文化、美学层次的文学作品翻译来说，通常由于语言逻辑不显，加上语句结构形态上或语义上的相互关系，也有部分以语段为翻译操作单位的。至于短诗或广告等，常以语篇为翻译单位。

音位层翻译 phonologica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on phonemic level

即音位翻译，指源语的音位由目的语中等值的音位来替换，即以音位为单位进行翻译，原文的语法关系保持不变，词形、词音相对应。音位翻译是那些操外国语言或方言的演员，以及语言的模仿者故意进行的实践活动，也包括外语学习者的语音或音位训练实践活动。此外，一般意义上的音译也列入音位(层)翻译。在诗歌翻译中，这种翻译法只考虑忠实于原作的声音，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勒菲弗尔(Lefevere)认为，只有在使用同源词、拟声词和翻译专有名词时，才会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其问题是，往往为了追求声音的相似而不得不常常使用废弃的词。更大的问题是，音位翻译法往往歪曲原文的意义。有时，译者为了凑相似的声音，不得不打乱目的语的句法，读者就得像玩游戏似的重新拼凑句法。

词素层翻译 translation on sememic level

亦称“义素翻译”，指源语的义素由目的语中等值的义素来替换，即以义素或词素为单位进行翻译，原文的语法关系不变，构词方式保持对应关系，即构成源语词的每一个词素在目的语对应词中有相应的词素。如：

macro-	econom-	ics
宏观	经济	学
syn-	chron-	ize
同	时	化
di-	atom-	ic
两	原子	的

词素层翻译比音位层翻译出现得更少，因为不同语言中同义词的词法结构往往不一致。但是词素层翻译对新词，特别是科技新术语的翻译有重大意义，因为大量科技新词都是通过词素的结合而形成的。如：high-tech (high technology) 高技术，comsat (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通讯卫星。

词层翻译 translation on lexemic level

即逐词翻译,以词为翻译单位,目的语和源语的语法形式和词序相对应,通常在句子结构比较简单、双语结构形式类同的情况下得以运用。如:

We are going to visit the museum.

我们要 去 参观 博物馆。

Twenty years later Kao Yu-pao returned to his

二十 年 后 高 玉宝 回到 他的

home village.

家 乡。

这两个句子基本上以词作为翻译单位,但认真分析起来,也并非完全如此。第一句中的谓语 are going to+inf. 表示将来时间,其中的 are 与"要"并不对应。第二句中,home village 为两个词,可以分开,而汉语"家乡"为一个词,不能分开;句中的 his 译成"他的"也牵强,省译或译成"自己的"更符合汉语习惯。

因此,词层翻译有很大的局限性,在绝大多数句子中只有一部分词在翻译时可以找到对应的等值词,因此,逐词翻译的可能性是小的。又如:

她的 大 女儿 是一个 纺织 工人。

Her eldest daughter is a textile worker.

句中汉语的"大女儿",在英语中对应词为(the) eldest daughter。"大"与 eldest 并不等义,只是在这一特殊组合中两者才对应。

词组层翻译 translation on phrase level

即以词组为翻译单位。当代英语研究突破了拉丁语语法分成词法与句法两大部分的框框,开始把词组作为句子结构的核心单位;汉、俄、德、法等语言也把词组作为一个重要的句法单位。词往往通过词组才能在句中发挥功能作用。因此,以词组作为翻译单位在翻译过程中具有一定意义。这可避免逐词翻译或死抠词典释义带来的译文艰涩、生硬或误译的弊端,使译文在比词级更高的层次上达到语义、风格上的等值与和谐。但是,由于不同语言的词组存在着大量非对应的情况,词组层翻译在运用范围上受限制,其有效性同样有限。

许多词组的意义并不等于各个词义加在一起的总和。这些词组通常不可能按词翻译,只能把各个词的意义"熔铸"起来,作为一个单元翻译出来,才能正确表达。以词组为翻译单位的通常有以下两种情况:1. 习语——习语作为固定词组具有整体意义,要整体译出,如:This time he *missed the boat*. 这回他坐失良机。2. 自由词组——自由词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词自由搭配组成,各单词具有独立的含义,但在翻译时把它们作为一个单位处理,译出整个词组意义。如:This receiver is indeed *cheap and fine*. 这台收音机真是价廉物美。/Note, therefore, that when we calibrate the scale to read in ohms, these calibrations *go backward*. 因此,要注意,当我们把刻度刻成欧姆读数时,这种刻度由大至小。

句层翻译 translation on sentence level

即以句子为翻译单位。句子以句号、问号、感叹号为其形态标志。汉语的子句经常相当于英语的分句或短语。句子是段落、篇章或整部作品的基本意义单位。就文字作品的大部分体裁而言,翻译操作单位的基本层次是句子。同时,在句子内部适当考虑音位、词素、词的对应,并在句子外部考虑句际关系的协调、句群的衔接、话语的连贯和风格的统一。

We live in the era of specialization. To really succeed, it is necessary to be an expert in one particular field. That leaves little chance for someone to become a well-rounded person. And a person who has good ability in several areas without being exceptional in any has little chance of real success. For the most part, the Renaissance Man is not to be found in our modern world. We are all poorer fot *it*.

我们生活在这个专门化的时代。要取得真正的成功,只有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这样一来,人就不大可能多才多艺。而在多方面具有良好才能但没有在某一方面超群的人很少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一般说来,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人在现代世界中是找不到的。比起他们,我们实在觉得遗憾。

本段原文6句,译文也6句。依次按句翻译,顺手译来,似无难处,但译到最后一个词 it,疑窦顿生。it 在本句中无词可代,如替代上句的 our modern world,语义上又说不过去,综观整段各句,似指 The Renaissance Man 的 well-roundedness。其实,这是个对 it 的理解问题。理解了,从最后一个词逆向思索过去,进行构思,按句子为翻译单位把整句翻译出来即可。

语段层翻译 translation on sentence-group level

即以语段为翻译单位进行翻译。这里的语段相当于句群或句子组合,是大于句子的语言片断。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构成的语义整体,小于或等于段落。构成语段的各个句子结构上密切联系,意义上有向心性,以一定的语言手段(包括用逻辑承接词、词汇的重复与照应、语义连接等)组合起来。语段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一篇文章的一个自然段可以是一个句子,也可以是几个句子组成的语段,还可以是几个语段或句群的相互结合。

语段层翻译的基本要求是:在翻译思维中以语段为逻辑单元,确立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关系,避免逐句逐句地、孤立地翻译,其中,词、词组或句子的转换应服从于整个语段的等值转换的需要。例如:

As the manager of the performance sits before the curtain on the boards, and looks into the Fair, a feeling of profound melancholy comes over him in his survey of the bustling place. There is a great quantity of eating and drinking ... (W. M. Thackeray, Vanity Fair) 领班的坐在戏台上幔子前面,对着底

下闹哄哄的市场，瞧了半晌，心里不觉悲惨起来。市场上的人有的在吃喝……（杨必译《名利场》）

源语中，第二句由 there is 引出，能够与前一句结尾处的 the bustling place 很好地衔接。但是，汉译的前一句词序改变了，第二句就得加上"市场上的"字样（其中，"市场"与前句重复），以便条理贯通。

语篇层翻译　translation on discourse level

指以语篇为翻译单位，最大限度地寻求（相同语境下）源语语篇与目的语语篇在意义和功能上的对等。语篇是最大的语言单位，是在交际功能上相对完整的、独立的一个语言片段。正如一个词在句子中才能确定其准确意义一样，一个句子（单个句子组成的语篇除外）只有出现在语篇中才能显示其确定、完整的含义，充分发挥其交际功能。例如，对于 However, this is not true. 这个不可能单独出现的句子，如果脱离语篇背景，孤立地对它进行分析是很难准确地反映其能指和所指的意义的。也就是说，在实际运用中，语言的基本单位不是通常所说的短语或句子，而应是语篇。可见，在翻译中以语篇作为翻译单位有利于更好地抓住原文的中心思想和总的基调，使译文中心突出、层次分明、内容衔接连贯。特别是诗歌、广告词等文体材料的翻译，更需要以语篇为翻译单位，从语篇上对韵律、对仗等修辞方式以及神韵、风格作通盘考虑。为了求得或保持译文篇章的衔接与连贯，有人把译者翻译时的篇章意识理解为"语篇层翻译"，例如：为了逃避那一双双熟悉的眼睛，释放后，经人介绍，他来到湖南南县一家木器厂做临时工。In order to avoid those familiar eyes, *he didn't return to his hometown* after release, but found an odd job in a furniture factory in Nanxian County, Hunan Province through introduction.（张培基译）

从上下文可知，湖南南县并非他的家乡，因此可"逃避那一双双熟悉的眼睛"。下文又提到他"回乡"。为使译文语义连贯，畅晓明白，宜加上 he didn't return to his hometown，以使读者不感唐突。这里，汉语原文的语义连贯转向目的语的形式衔接。

翻译实践　translation practice

实践是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有意识活动。翻译实践是译者通过翻译活动来改造现实世界、服务社会和促进人际交往的活动。翻译实践不是纯粹的个人活动，而是依存于社会的活动，即具有社会性；不是消极的适应活动，而是以变革现实为目的的主动性活动，即具有能动性。翻译实践包括以下基本要素：1. 主体及其实践意识（翻译的目的、标准、计划等）；2. 实践的对象或客体；3. 实践的方式和手段（动作、语言、信号、符号等）；4. 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周围环境，即翻译实践的环境。在翻译实践中产生许多实用的技巧和方法，有的通过总结和归纳上升为理论。翻译理论的正确性应受翻译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翻译经验　translation experience

由翻译实践得来的翻译知识和翻译技能。翻译人员经验丰富或浅薄通常决定于两方面：1. 直接参与翻译的时间的长短，即参与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2. 对在翻译过程中所得到的感性知识是否进行概括和总结，即善于并勤于概括或总结者，经验更丰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经验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认识的开端。经验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上升到理论，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

翻译思想　thoughts of translation

指翻译家对翻译之"道"高度提升或高层级认知，这种认知又反过来指导他在更高层级上的实践，由此获得新的经验，如此周而复始。翻译思想表现为对译事的某种原则主张或基本理念，通常经历三个深化（或提升）阶段：体验（experiencing，集中于对方法的实施 WHAT）；体认（knowing，集中于对规律的把握 HOW）；体悟（apprehending，集中于对理念的领悟 WHY）。

翻译思想的基本特征为：1. 高层级性。翻译思想是高屋建瓴的语际转换规律的揭示，这种揭示不是对个别局部的解释，而是对无数局部的共时的剖析和汇集以及历时的观览提升，因而是一种整体性审视，具有很强的概括力。这种高度概括功能使翻译思想具有普遍的指导性。2. 能产性。翻译思想的能产性表现为"产生"对策和"产生"技巧。3. 模糊性。翻译思想是凭借语言来表述的，语言的模糊性必然导致翻译思想的模糊性以及难以对其一劳永逸地加以判定，这就与理想的"时空绝对性"恰恰相反，使翻译思想摆脱了时空的掣肘，而可以传之久远。4. 传承性。符合翻译实际和语言民族文化传统的翻译思想都有高度的传承。传承本身具有"时间性"意义，指时间和情势的变化以及人这个主体因应时势而获得的认知经验对传承中思想意识的修正（modification），包括"调整"（modulation）、"界定"（或"再界定"redefinition）和斯坦纳（Steiner）所说的"补充"（或补足、补偿，compensation）。5. 迁延性。这里的"迁延性"（procrastination）除了指"始终一贯"（consistence）而外，还含有贬义，指翻译思想之因袭于陈规，延宕于摆脱套路，疏失于推陈出新，致使涵盖的问题积久而著。总之，只有把握翻译思想的以上五个特点，才能理解中外翻译思想的发展和现状，明确认清中国翻译研究努力的方向，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方略。（据刘宓庆 2004）

分析与研究翻译家个人或群体的翻译思想必须与社会历史语境和社会思潮联系起来。每一个历史阶段，译者（个人或群体）的翻译活动都显示出时代的特征。委托人、译者、读者的意识形态、政治观、价值观直接影响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较之于翻译理

论，翻译思想存在于更广阔的层面。例如，严复从事西学翻译，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用西学的新思想唤起民众。因此他把译书看作为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神圣事业和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重要手段。正是由于严复译书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在翻译时采用的方法是灵活机动的，遇到书中的见解与自己的看法不符的地方，就无法抑制自己不去进行批驳；遇到见解和自己的看法相同而感到意犹未尽的地方，也不由自主地要加以发挥，或者补充一些中国的实例；在发现所举事例与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或议论过于繁琐的地方，他也不顾会受到指责而大胆删节。"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转引自罗新璋 1984：137）。所有这些方式方法，无论是加入按语，还是进行选择性的翻译，都受其翻译思想的支配。（李林波，文晔）

翻译原理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亦称"翻译原则"，指翻译中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为其他规律基础的规律，也即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例如，翻译中语际转换的一般规律、审美体验的一般规律，对翻译技巧的纳归和掌握具有指导意义。

翻译能力　translator's competence

指把源语语篇翻译成目的语语篇的能力，是译者的双语能力、翻译思维能力、双语文化素质以及技巧运用能力等的综合体现。翻译能力的界定跟翻译主体（口译者、笔译者、机器翻译）及教学方法有关，如过去单纯采用语法-翻译教学法，视译者把源语句子或文本译成合乎目的语规定语法的句子或语篇的能力为翻译能力。若采用交际法，翻译能力则不但包括双语能力（包括语法能力和语篇能力），而且还包含两种文化的交际能力（包括社会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而对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来说，翻译能力则指专家系统能力（expert system competence）。专家系统是一个特殊的计算机软件包，主要由知识库和推理机制两部分组成，其辅助系统包括用户界面、监察器（monitor）和知识习得系统等。

图里（Toury）在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1980）和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1995）中用该术语探讨翻译实践方面的问题。他把翻译能力看做是翻译中各种关系的总和，认为翻译能力可以在理论上描述，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难以实现的。换句话说，翻译能力不是指解决翻译问题的方法，而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寻求解决翻译问题的方法时所依赖的语言资源。

诺伊贝特（Neubert）（1992：412～413）认为，应该培养翻译能力。一个成功的译者应该掌握三方面的能力：语言能力、主题能力和转换能力。第一种和第二种能力与其他交流者共享，而第三种能力即转换能力是一个译者区别于其他译者的主要方面，它支配着前两种能力。由此可见，双语能力和翻译能力之间不能画等号。未经受训者的双语能力，并不能保证译者一定能够有理想的翻译能力。由此可见，翻译能力是一种整体性、综合性能力，不单纯是语言能力，也不是三个能力的简单相加。

翻译理论　translation theory

指从翻译实践概括出来的相关知识的系统性结论以及对与翻译有关的现象或本质所作的系统描写或阐释，是对该学科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它研究翻译的性质和任务，可译与不可译，翻译的标准、过程、方法与技巧，作者、译者、读者及其互动关系，原著、译著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此外，翻译理论还包括研究翻译策略、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翻译管理，甚至还涉及机器翻译。20 世纪 50 年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始被引入翻译研究，现代翻译研究的序幕随之拉开。现代翻译理论触角之深广是别的学科理论所不多见的，对历史、社会、文化、语言、心理、政治等诸多方面均有所借鉴。翻译理论的多学科交叉正是其目前学派林立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翻译理论复杂性的生动写照。

翻译理论可根据其特点分为两类：一是与实践检验相联系的应用性理论，具有行动性、实践的直接性与具体性；二是与形式结构相联系的纯理论，它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具有思辨性、实践的间接性、抽象性与潜在性等特点。参见"纯翻译学""应用翻译学"

翻译的"理论化"　theorizing in translation

皮姆（Pym）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在理论化。当发现某个翻译问题时，他们往往在几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中做比较。这些方案可能各自适用于相应的语篇、目的和客户。译者在它们之间做选择，生成可能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过程有曲折，但也可能在瞬间正确地完成。每当译者决定选择这个译法，排除其他译法时，他们会有关于翻译是什么、该如何翻译之类的看法，这便可认为"理论化"。当与别人讨论时，这种理论就公开化了。（Pym 2010：1）

翻译禁忌　translation taboos

是鲁宾逊（Robinson）在《翻译与禁忌》（*Translation and Taboo*）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西方翻译史上对宗教翻译实践的禁锢和翻译理论中包含的各种限制性规定。翻译禁忌早就存在。比如，古罗马诗人卢修斯（Lucius）发现，伊希斯教（Isis）牧师的布道方式是口译该教经典《亡人书》，翻译的内容只有卢修斯和牧师知道，泄露和打听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中世纪基督教会将《圣经》内容神秘化，形成了《圣经》翻译的五种禁忌形式：不准翻译，不准译得太易懂，不得增添任何成分，不得谈论翻译，必须将译文看做原文。近代，西方殖民者认定殖民地人们没有能力将自己民族的文本翻译成西方语言，不允许"野蛮人"充当译者。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至今还有人反对翻译他们的宗教典籍。鲁宾逊结合翻译纳瓦霍语诗歌失败的经历指出,印第安文化也有翻译禁忌:纳瓦霍人相信,有些外部力量会引起人们的恐惧,因而不希望自己的诗歌被译成别的语言。和翻译实践一样,翻译理论中同样存在禁忌,诸如"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原文的意义可以像灵魂转世般完整无缺地从此文本转移到彼文本"的说法就是其表现。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认为,源语和目的语不可混淆,异化和归化不可混用,这也是一种翻译禁忌。本雅明(Benjamin)对纯语言的追求和对接受者的漠视,实际上是对翻译极为严格的限制,体现了一种禁忌。"禁忌说"揭示了西方主流翻译理论的偏见和限制性,有力地解构了传统的翻译理论。(韩子满 2004: 58~61) (贺显斌)

翻译错误 translation errors

德国译论对翻译错误作了较多的探讨,但各家对其的定义和分类并不一致。威尔斯(Wilss)(1982/2001: 201)从外语学习的角度讨论翻译问题,他给"翻译错误"的定义是"在语言接触情景中对规范的违背"。

库普施-洛泽赖特(Kupsch-Losereit)指出,"翻译错误"指的是"违背翻译的功能、语篇的连贯、语篇类型或形式、语言规约、特定文化/情景的规约和语言系统。"(转引自 Nord 1997/2001: 73)

诺德(Nord)(1997/2001: 73~78)从功能翻译的角度,将"翻译错误"界定为"没有执行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中暗含的指令,以及对翻译中遇到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她将翻译错误分为四类:1. 语用翻译错误(pragmatic translation errors):由于译者解决具体的翻译问题时,使用的策略不好所致,这类错误一般不难解决,只要具备一些翻译常识就可以了;2. 文化翻译错误(cultural translation errors):译者未能较好地传达或调整某种文化中特有的规范;3. 语言翻译错误(linguistic translation errors):由于译者的源语/目的语语言能力欠佳,对语言结构处理不当;4. 语篇类型翻译错误(text-specific translation errors):指对与具体的语篇类型有关的问题解决不当。

研究翻译错误,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开展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

2. 现代译论

现代翻译理论 mod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参见"翻译理论"

一体三环 one body with three rings

方梦之认为,译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体三环"的格局和特征。这是他 2005 年 10 月在第三届全国翻译学词典暨翻译理论研讨会上总结其《译学辞典》(2004)的编纂思想时提出的。"一体"就是译学本体,千百年来不断孕育,不断壮大,不断完善。译学之所以有今天,正是有着这样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紧靠着本体的是内环("一环"),这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由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构筑起来的,它的意义在于使翻译研究从感性走向理性,从经验走向科学。内环之外是中环("二环"),是 20 世纪 70~80 年代由哲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信息论、交际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开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意义在于使译学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单一的语言学科走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向综合性学科过渡。中环("二环")之外又有外环("三环"),这就是文化和技术。翻译的文化研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兴旺起来的。它的意义在于把翻译研究跟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全面地联系起来,从而使翻译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新世纪得到长足发展的翻译技术成了翻译研究必要的工具,而它自身又成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今后,译学研究仍将在"一体三环"的格局内运行。

翻译研究是一门开放性的综合性学科,需要借助相关学科的学术养分来发展和完善。相邻学科的新发展,其原理或方法往往会引入翻译研究。近五六十年来,语言学科、思维学科以及其他人文学科迅速发展,给翻译学科带来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术语。可以这样说,在前人千年耕耘的这块沃土上,是众多现代学科造就了译学的今天。现代语言学催生了语言学翻译理论,符号学促成了翻译的社会符号学派,哲学上的解构主义孕育出解构主义翻译观,信息论和社会语言学是交际翻译学派的理论渊源,女性主义翻译观和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各有其理论背景。

翻译研究不能脱离本体(特别是文本和译者),不管是语言学的翻译研究也好,还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也好,都要在译学的本体扎根,与译学本体相融才能生发出有生命力的学理,使译学不断丰富,不断完善。(据方梦之 2006) (文晔)

文化转向论 cultural turn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文化背景为内容,与文化学(Cultural Studies)的兴起和繁荣有关。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由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所倡导并发展。1989 年在英国 Warwick 大学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是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标志。"文化转向"这一术语首先是由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1990)在 *Linguistic Transcoding or Cultural Transfer: A 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Germany* 的论文中提出来的,该文章被收进巴斯内特(Bassnett)和勒菲弗尔(Lefevere)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1990 年初版,1998 年重

版)。在该书的序言中,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正式提出"翻译的文化学转向"这一口号,开始强调历史上翻译标准的变化,权力、意识形态对翻译和出版业的影响,并提出女性主义创作和翻译、翻译作为对原作的"操控"等问题,开始研究翻译与殖民化的关系,提出翻译是改写(包括电影的改写)的形式之一。该书的出版推动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此后,文化研究成为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译论迭出:1992 年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又合作主编了"翻译学"丛书和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1998),斯内尔-霍恩比等人也编写了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995),等等。

在我国,对翻译中的文化研究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已开始得到重视。1982 年刘山发表《翻译与文化》一文,1984 年王佐良连发两篇有关翻译与文化的文章(后均收入他的《翻译:思考与试笔》一书)。但当时的重点是对一般文化差异以及文化词语处理的研究。我国翻译界对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热点尚在 90 年代中后期。郭建中主编的《文化与翻译》论文集(2000)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学者十余年间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近几年来,虽然普遍肯定西方的文化转向论对翻译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使翻译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文化转向论有离本体研究渐行渐远的倾向,以至于有学者发出翻译研究回归本体的呼声。参见"勒菲弗尔"

生态转向 ecological turn

"生态转向"命题的出现并非针对具体的翻译过程或翻译行为,而是着重指学科研究中认知视野的扩展和延伸,或研究理路衍变的走向和理念。

当西方译学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完成了"文化转向"后,过去的十余年中翻译学界似乎陷入了后现代的迷惘之中,其理论活跃程度明显降低。人们在犹疑,在所谓"后现代"之后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应该转向何处?

本世纪之初,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基础上,国际译学期刊《视角》(国际 A&HCI 源刊)2003 年第 4 期发表了题为"翻译即适应与选择"(*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一文,文章作者图示了一条从"翻译"到"自然界"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链条:翻译→语言→文化→人类活动→自然界,即所谓"关联序链"(the sequence chain)(Hu 2003: 289)。从译学史的角度来看,翻译研究范式的推演实际体现了人类对翻译活动审视视角的变换。以往国际翻译研究的基本理路正是沿着"翻译→语言→文化→人类活动→自然界"的认知阈限次第拓展:从就翻译论翻译的经验性宣示,到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再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沿着"翻译→语言→文化"的认知阈限次第拓展的,体现了翻译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不难看出,"以往国际翻译研究范式的历时性推演,与人类对翻译活动的认知阈限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孟凡君 2007)。也就是说,上述"关联序链"具有互动性和递进性的指向特征,体现了人类认知视野扩展和理性进步的基本路径,既符合人类认知能力演化的基本规律,又符合"先河后海,源委务本"的研究理路,因此,有助于预测翻译研究在经过了"语言转向""文化转向"之后将会出现"生态转向"的视野衍展。

研究表明,"生态转向"命题的提出,除了认知阈限内在的衍展机制之外,值此全球性生态取向的大趋势,译学研究视野的"生态转向"也是由外部世界诱发的,而以往译界(Newmark 1988: 95; Wilss 1996: 123; Katan 1999; Cronin 2003; Phillipson 2006: 231 等)关于"生态""环境""翻译生态学"等的相关研究进一步促进了"生态转向",并由过去几年的"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所实践。由中国学者首倡的翻译学研究视野的"生态转向",与时代、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方向是相符合的,与中国有着可资借鉴的、丰富的古代生态智慧不无关系。译学研究视野的"生态转向",或能有助于克服"后现代"的迷思和"后现代"之后的困顿,有助于回归中华文化"重整体""讲和谐"的生态理念,也有助于彰显东方学者译论之声,更能有助于打破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刻板的界线。

可以看出,当将"翻译生态"的整体隐喻类比为"自然生态"的时候,当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研究的时候,当"翻译生态环境""适应""选择""适应性选择""选择性适应""译者生存""译者中心""事后追惩""求存择优""共生互动"等一系列有特色的概念和术语渐成体系的时候,当"生态翻译学" 研究初露端倪的时候,翻译学研究视角——"生态转向"的序幕可以说已经悄然拉开了。参见"翻译适应选择论""生态翻译学" (胡庚申)

功能目的论 Skopos theory

亦称"目的论"。参见"目的论"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功能主义"一词泛指用功能的途径研究翻译的多种理论。"功能"在这里主要指文本或翻译的功能。功能主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产生于德国,其代表人物是赖斯(Reiss)、弗米尔(Vermeer)、赫尔兹-曼塔里(Holz-Mänttäri)和诺德(Nord)。赖斯首先提出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为功能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虽然赖斯坚持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理论,"但她的对等概念并非建立在词或句子的层次上,而是在整个文本的交际功能上"(Munday 2001: 73)。赖斯的学生弗米尔则摆脱了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论,提出了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在目的论的理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译者心目中的接受者,每一种翻译都指向特定的受众,翻译就是在"目标语情景中为某一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文本"(Vermeer 1987: 29)。根据目的论,翻译的最高准

则是译文由其目的所决定,即"目的决定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赫尔兹-曼塔里进一步发展了功能翻译理论,视翻译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活动"(Nord 1997: 13)。她所提出的翻译行为理论(translational action)强调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过程发生的环境三方面。诺德则把忠诚(loyalty)原则引入功能主义,希望解决翻译中的激进功能主义问题(张美芳 2005a: 87)。"忠诚"指的是"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Nord 1997: 126),诺德认为译者应同时对原文和译文环境负责,对原文信息发送者(或发起人)和目标读者负责。参见"目的论" (钱宏)

目的论 Skopos theory

由德国学者弗米尔(Vermeer)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目的是指某个译文或翻译行为的目的(Munday 2001: 78~79)。*Skopos* 为希腊语,意为"目的"。目的论(*Skopostheorie*)是将 *Skopos* 概念运用于翻译的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目的论将翻译行为的目的概括为三种:译者的基本目的、目的语环境中译文的交际目的和使用特定翻译策略或翻译程序的目的。在一般情况下,译文的交际目的比另外两个目的更为重要(Vermeer 1989a: 100)。除了 *Skopos* 以外,弗米尔还使用了相关的 aim (目标)、purpose (目的)、intention (意图)和 function (功能)等词。为了避免概念混淆,诺德(Nord)提议将其归类为"意图"(intention)和"功能"(function):"意图"是从发送者的角度定义的,"功能"则是指根据接受者的期望、需求、已有知识和环境条件来决定使用文本的功能(Nord 1997: 28)。弗米尔曾简单地讨论过诺德所作的区分,但她基本上认为目的论概念中的"目标""目的""意图"和"功能"都是相等的,都可纳入 *Skopos* 的一般概念之下(Reiss, Vermeer 1984: 96)。因此,根据目的论,无论何种翻译,其最高规则都是"目的准则"。根据目的准则,一种翻译行为由行为的目的决定,即"目的决定手段"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在目的论的理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受众——译者心目中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有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标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文本"(Vermeer 1987: 29)。在弗米尔看来,原文只是"提供信息的源泉"(offer of information)(Vermeer 1986: 42)。翻译的目的是通过发起人指派的"任务"(commission)确定的,必要的时候译者也可以对目的确定进行调整(Vermeer 1989a: 230)。目的论还有另外两个准则:一致准则(coherence rule)和忠信准则(fidelity rule)(Vermeer 1978: 100, Schäffner 1998: 236)。前者指译文须符合篇内一致(intratextual coherence)(参见"篇内一致")的要求,是针对译文语篇内部及其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后者指译文与原文之间应符合篇际一致(intertextual coherence)(参见"篇际一致")的要求,是针对译文语篇与原文语篇之间的关系而言,译文须与原文逻辑一致。"忠信准则"必须首先服从"目的准则"和"一致准则"。

芒迪(Munday)曾对目的论作过这样的归纳:1. 译文由其目的所决定;2. 译文为目的语文化提供有关源语语言文化的信息;3. 译文不会提供违背原文信息的信息;4. 译文必须是篇内一致;5. 译文必须是篇际一致(即跟原文逻辑一致)。(Munday 2001: 79)

以上五条准则的排列体现了轻重顺序,以目的论为最高标准。目的论问世 20 多年来,赞同者无数,批评者亦不少。诺德(Nord 1997: 109~122)归纳并详细分析了人们提出的十条批评:1. 行为并非都有意图;2. 翻译并非都有目的;3. 目的论超越了翻译本身的局限;4. 目的论并非独创;5. 目的论并非基于经验结论;6. 目的论导致唯利是图的翻译家及译者的产生;7. 目的论并不尊重原文;8. 目的论是编译理论;9. 目的论不能适用于文学翻译;10. 目的论有文化相对论的特征。 (张美芳,胡文雯)

功能加忠诚 function plus loyalty

该概念由诺德(Nord)在其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1988/1991)一书中首次提出。"功能"指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按预定方式运作的因素;"忠诚"指的是译者、源语文本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忠诚原则限制了某一源语文本的译文功能范围,增加了译者与客户之间对翻译任务的商议。当初,诺德提出本概念主要是针对赫尔兹-曼塔里(Holz-Mänttäri)的翻译行为理论,同时希望解决翻译中的激进功能主义问题。赫尔兹-曼塔里把文本视为实现交际功能的纯粹工具,认为其固有的价值完全从属于其目的,译者只需对目的环境负责,目的语文本可以完全独立于源语文本。诺德则认为自由重写(free rewriting)不属于翻译的范畴,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没有源语文本,就没有翻译"。虽然"功能"是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但并非唯一的因素。译者并非可以任意处置源语文本,他要对源语文本负责(Nord 1988/1991: 28)。另外,一个文化社会的翻译惯例,决定读者对译文有何期望;假如译者所做的与这种惯例不符而又不告诉读者,就等于欺骗,违反了"指导人际关系的道德原则"——忠诚(Nord 1991)。诺德认为,忠诚"使译者双向地忠于译源与译入目标两方面,但不能把它与忠信的概念混为一谈,因为忠信(fidelity/faithfulness)仅仅指向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而忠诚是一个人际范畴的概念,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Nord 1997: 125)。诺德的"忠诚"是与传统的"忠实"截然不同的概念。它赋

予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对包括权威文本在内的原文进行改动的权力，显示出宽容和动态的翻译观；同时，它要求译者对翻译行为参与各方承担应有的责任，对自己的翻译策略进行说明或解释，以达成翻译各方的理解和共识，突出了"翻译伦理"这一重要问题，显示出翻译理论在指导翻译实践时应有的规定性。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忠诚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一种对译者职业道德的强调，"忠诚原则"的提出是对翻译目的论的重要补充，具有积极意义（卞建华 2006：36）。"功能加忠诚是诺德的独特的翻译理论，更确切地说是她的理想"（张美芳 2005a：88）。

（杨榕，黄勤）

合适 adequacy

亦译为"充分(性)"。1. 一些译者在讨论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关系属性时所用的术语。译界对于此术语的含义尚未达成共识。有时它被视为对等(equivalence)的同义词，有时为对等的替代词，有时则被认为与对等的意义不相同。在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中，"合适"的概念用以指译本对翻译纲要所规定的交际目的的合适性，是与翻译行为过程有关的动态概念(张美芳 2005a：216)。换句话说，"合适"描述的是相对于某一特定标准而言的特性。在目的论(Skopos theory)中，"合适"就是译文适合翻译纲要的要求。赖斯(Reiss)指出，"合适"是"根据目标选择符号，认为这些符号合乎翻译任务规定的交际目的"（Reiss 1989b：163；见 Nord 1997：35）。诺德(Nord)通过讨论合适与对等的关系，进一步阐明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中合适的含义。她认为，"对等是一个以结果为取向的静态概念，描述两个文本、或者较低层次上的字词、短语、句子、句法结构等之间的交际价值对等关系……翻译目的决定了合适的翻译需要何种形式的对等"(Nord 1997：35～36)。例如，对于逐字翻译，目的在于忠实地再现原文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译者逐个挑选在意义和形式上尽可能完全对应原文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这种情况下，合适的翻译就是要求在词汇和句法结构两个层面上的对等。赖斯认为，整体的概念是合适，而非对等。对等可能是翻译的一个目标，但不应当作为一个永远适用的翻译原则（Reiss, Vermeer 1984：146；见 Nord 1997：35)。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中对合适的定义与该词在其他理论中的意义几乎完全相反。2. 图里(Toury)用语，指与翻译过程所采用的规范有关的两极连线中的一极（另一极为可接受性)。如果译者完全遵循源语规范，而不顾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学规范，换言之，译者通过各种翻译转换，仅仅以尽可能保留源语的各种特征为己任，他的目标就是充分性。参见"可接受性" （钱宏）

翻译纲要 translation brief

亦译"翻译要求"，与翻译授权（translation commission)、翻译任务(translation assignment)及翻译指导(translation instruction)一样，都是译自德语 *Übersetzungsauftrag* 一词，指的是同一个概念，即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翻译纲要是弗米尔(Vermeer)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目的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这一概念的前提是，翻译是"通过指派任务"来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包括翻译的发起人、委托人、译者等。发起人或委托人出于某种目的而需要一个文本，他发出要求，让译者进行翻译。在一般情况下，委托人会详细地介绍翻译目的及文本的预期功能等情况。这些信息形成了一份明确的翻译纲要。不过，翻译纲要并不会告诉译者如何进行翻译工作，因为如何翻译完全依赖于译者自己的经验与判断力来作决定(Nord 1997：27～32)。翻译纲要也是诺德(Nord)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并被其列入功能派翻译理论中对译员培训最有应用价值的三个方面(另外两个方面分别为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分类)。诺德认为，译者常常从翻译情景中推断出目的语文本的目的。由于缺乏先前的翻译经验和习惯，受训译员很难解释在课堂上提出的不太清晰的翻译情景。因此，每一个翻译任务都应该附带有一个翻译纲要，以说明译文应发挥特定功能的环境。理想的翻译纲要应该明示或暗示以下信息：译文的预期功能、译文接受者、(预计的)译文接受时间及地点、文本传播媒介、译文目的或出版译文的动机等。只有清楚地了解翻译纲要，译者才能了解译文功能与动机，才能决定合理的翻译步骤(Nord 1997：59～60)。

（杨榕）

篇内一致 intratextual coherence

指译文符合接受者的环境，接受者能够理解译文，译文在其介入的交际环境和文化中就有了意义，这也就是目的论的"一致准则"(coherence rule)。如果目的要求与篇内不一致(如荒诞剧中)，篇内一致的概念就不再起作用(Nord 1997：33)。

篇内一致是弗米尔(Vermeer)在目的论中提出的概念，是针对译文语篇内部及其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弗米尔认为，译者所能做并且应该做的就是创造一个至少对目的语文化接受者可能有意义的文本，译文应当符合"篇内一致"的标准（Reiss, Vermeer 1984：109)。 （胡文雯）

篇际一致 intertextual coherence

篇际一致是弗米尔(Vermeer)在目的论中提出的概念，用来形容译文和对应的原文之间存在的联系，也叫"忠信"（fidelity)或"忠信准则"（fidelity rule)(Reiss, Vermeer 1984：114；见 Nord 1997：32)。需要强调的是，篇际一致应该是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其表现形式则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及翻译的目的。篇际一致有点接近传统的"忠实"标准。事实上，篇际一致可算是目的论对原文最大限度的忠实模仿，但是，"忠信"的前提是翻译的目的。弗米尔指出，这可

能就是文学翻译中人们所期待的形式,译文应当译得好像是原作,这本身就是一个目标,"忠信可能就是多数译者传统下给自己定下的目标"(Vermeer 1989b: 179, 见 Nord 1997: 32)。目的论认为,篇际一致从属于篇内一致(参见"篇内一致"),篇际一致和篇内一致又都从属于目的准则。如果翻译的目的要求改变文本的功能,翻译标准就不再是与原文保持篇际一致,而是对目的而言的合适性或合宜性(adequacy or appropriateness)(Reiss, Vermeer 1984: 139;见 Nord 1997: 33)。 (胡文雯)

迁移　transference

由卡特福德(Catford)在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1965)一书中提出。迁移是一种操作,其结果"使目的语文本或部分目的语文本具有源语中所确立的值(value),也就是说,具有源语的意义"(Catford 1965: 43)。在迁移过程中,"源语意义被植入目的语文本中"(Catford 1965: 48)。"换言之,该术语指的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某源语项目以其源语意义被用于译文中。迁移可以在词汇或语法层次上进行。由于文化、地理或其他原因,在目的语中无法找到某源语项目的合适的对等时,通常就会'借用'该源语项目。然而,真正的迁移并不常见,因为这种借用的项目通常会改变意义,其原因或是迁移过来的项目带有外国味,或是该项目在源语中所拥有的全部意义中只有一种被迁移。"(Shuttleworth, Cowie 1997: 179) (林作帅)

语法迁移　grammatical transference

由卡特福德(Catford)在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1965)一书中提出。"在语法迁移中,源语的语法项目在目的语文本中由准目的语语法项目(quasi-TL grammatical item)来体现;这些准目的语语法项目的形式意义和语境意义产生于源语的系统和结构,而不是目的语的系统和结构。"(Catford 1965: 44)例如,英语的代词系统有九个词语,而印度尼西亚语的代词系统有七个词语。很显然,这两个代词系统中的词语的形式意义和语境意义不同,但是通过对这两个代词系统中的词语的意义进行对比,通过一定的方法可创造出一套准英语的转移对等物(tranference-equivalents)。这些方法包括: 1. 可以使用现已不常用的古英语代词 thou 作为印度尼西亚语代词 engkau 的迁移;2. 可以使用附加(diacritic)字母或数字;3. 用有助于记忆的字母来修饰(modify)英语项目的字形,等等。(Catford 1965: 44～46)

(林作帅)

意义的部分迁移　partial transference of meaning

由卡特福德(Catford)在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1965)一书中提出,指的是迁移发生在词汇层上时,"源语词条并不完全保留其源语意义"(1965: 46)。例如,俄语词汇项目 *спутник* 作为一个"迁移项目"进入英语,在其出现的上下文中,它只有"(苏联)人造卫星"的这个意义。在俄语中,*спутник* 这个词是许多"词汇组(lexical sets)"中的一员,如: companion (guide to, handbook, introduction),(artificial) satellite (space-ship, rocket ... etc.),等等;但是当它被引入英语之后,只是处于一个"词汇组"里,并且具有了适当的语境意义。因此,当被嵌入(英语)目的语文本后或者被用在英语文本中时,*sputnik* 具有了英语的形式意义和语境意义。然而,因为 *sputnik* 的英语意义只与俄语 *спутник* 的全部形式—语境意义的一部分相关,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意义的部分迁移。(Catford 1965: 46～47) (林作帅)

关联翻译理论　relevance translation theory

指运用关联理论的原则和方法对翻译进行专门研究而形成的一种理论。格特(Gutt)在《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1991)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关联理论。关联翻译理论认为,文本话语的内在关联性越强,则读者在阅读中所需付出的推理努力就越少,就越能取得好的语境效果(语境含义或假设);反之,若文本话语的内在关联性很弱,则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须付出较多的推理努力才能取得好的语境效果;因此,从文本的创作或翻译来看,好的文本或译本要向读者提供最佳的内在关联性。从文本或译本的解读来看,读者理解话语的标准就是在文本话语与自己的认知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而不是最大关联。最佳关联就是用最小的推理努力取得最大的语境效果。文本的内在关联性往往与文本的创作意图、社会功能、写作风格和文体色彩等有关。例如,以信息功能为主、含义单一明确的实用文体,往往提供较清楚的内在关联性,读者很容易直达其意,而意境深远、蕴涵丰富的文学作品,则内在关联性较为含蓄,为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和推理空间。但无论文本的文体、风格或功能如何,都应该设想为读者提供最佳的内在关联性,这样才能使读者从文本话语中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由于原文作者和译者的认知环境不同,作者力图实现的语境效果同译者从原文和语境中寻找关联而获得的运境效果毕竟是两回事。这样,原文信息和译文传达的信息就不可能完全一致。此外,译文传达出来的信息内容是由译文的读者去理解的。于是形成这样的局面: 原文作者的认知不可能等同于译者的认知,而译者的认知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读者的认知;译事是一种三元关系(作者—译者—译文读者),而不仅仅是作者和译者的二元关系。参见"关联理论"

译学范式　translation paradigm

指一个翻译学术共同体所共有的精神信念、研究传统、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西方译学经历了三种范式: 1. 以注重字译/意译之别、提出翻译复制说和以

《圣经》翻译为实践先导等为特点的古典译学范式；2. 近现代语言学译学范式；3. 以文化转向、理论渗透、学科整合为特点的当代文化整合译学范式。也有把研究范式分为逻辑数学范式和现象学范式的，认为译学中的语言学与文艺学方法之争，其实是这两种范式在翻译中的运用。逻辑数学范式是一种形式分析，通过"浓缩"将具体内容概括为最简约的共同形式，最后归结为形而上的逻各斯(logos)，是一种寻求共性、统一性、普遍性的方法。语言学派翻译家主要是利用逻辑学范式对语言进行对比，努力证明语言间的可译性和语际转换可遵循的规律。现象学范式强调个性、差异性和规律性，这正是文学翻译强调再创造和带有一定艺术性特征的理论依据。傅勇林认为，在近20年，西方译学以"文化转向"为中轴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一边扬弃古典范式粗疏而封闭的研究范式，一边使近现代语言学范式得以升华，使内部研究与外向探索相携并进。而中国译学研究却是"局部精确、整体零碎"，既不能塑造中国译学研究的学术品格，建立自己应有的学术范式，亦不能以深具原创性的研究实绩汇入国际学术主流。为了中国译学研究的更大发展，有必要在清理、总结既有成绩的同时，也参考西方译学迄今(尤其是近20年)已取得的进展，并借此在学术范式的意义上反思中国译学的现状与未来。总之，他认为，建立中国译学研究范式"需置本土经验于国际译学体系加以观照，考虑本土经验与国际学术范式的整合"(傅勇林 2001)。吕俊认为中国翻译研究经历了三种范式：1.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语文学研究范式。其研究方法是一种直觉主义，以内省或者主观体验和感悟为主，受中国古典美学影响极深。其特点是：① 把翻译定位于艺术范畴，强调译者的灵感与悟性；② 有重主体与轻客体的倾向，易导致神秘主义或"不可译"论；③ 以先验的主体哲学为基础，否认翻译学的存在。2.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结构主义范式。其特点是重视系统性与整体性，重视共性、齐一性，排斥个性与差异性，同时也具有结构主义的自身调整性，具自足的性质。结构主义范式肯定语言的可译性、翻译的规律性、等值的可能性。其缺点在于将翻译研究置于一种天真的假设前提之下，即认为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之下进行的，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对话的，作者与译者是完全价值中立的，语言是透明的，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的，所以译文与原文是完全可以达到等值的。3.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解构主义研究模式。解构主义翻译观是以解释学为哲学基础，对结构主义范式形成冲击和批判，把原来所有被结构排斥在外的若干要素都纳入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从而形成了多元、多角度的翻译研究的局面，推动了翻译研究的进步。其缺点是其多元范式缺乏主干，没有本体理论的制约与统领，由于过分强调翻译活动的某一方面而破坏其基本原则甚至消解翻译活动。吕俊认为，以上几种范式都有其优点，但也都有其局限性，原因在于它们所依据的都是理论哲学，而非实践哲学，所以更偏重于理论思辨而缺乏实践指向。因此，应以实践哲学为基础建立起建构主义范式的翻译学，这是中国翻译学乃至整个翻译学的发展方向(吕俊 侯向群 2006)。

(李林波)

"忠实"观的解构 deconstruction of faithfulness

翻译的"忠实"观向来被认为是翻译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衡量译本是否合格的一个基本标准。不过，即使是对这个近乎"常识"或"公理"的"忠实"观，质疑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于译界，在近些年更是出现了对"忠实"观的解构。周兆祥(1986)在《翻译的准则与目标》一文中对"信达雅"的地位提出了尖锐的置疑，提出了"为什么要'忠信'"的问题，并论证翻译并不一定要做到忠实，只要对跟翻译有关的各方面负责即可。当时有研究者认为："周兆祥博士……论证了这个'翻译不必忠于原文'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翻译界的惊人之谈。古今中外似乎还没有一位有影响的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斯立仁 1990)这种击破忠实信念的观点在当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创新了，更是一种"叛逆"。

近几年来，解构主义的潮流对人们心中的"真理"和"常识"进行挑战，许多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被重新审视。在这种情况下，"忠实"作为翻译界最为经典的观点首当其冲，被作为解构的对象。例如，张南峰认为，中国译论的主流是以"忠实"为目标的应用翻译学，这种对"忠实"观念的盲从不但不能解释翻译中的"不忠实"的现象，而且限制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张南峰 2004：27)。王东风将"忠实"称为"翻译的神话"，提出要"解构"它(王东风 2004)。两人的观点有一些共同之处——"忠实"的主要局限有二：一是反映不了翻译的现实，二是"忠实"观是儒家"忠实"伦理道德观在翻译中的反映。谢天振(1999)在《译介学》中则更关注"不忠实"的合理性和价值，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不但没有违背什么原则，而且是一种必然存在而且相当有研究价值的因素。黄忠廉(2002)提出的变译概念也是对传统翻译标准中"忠实"观念的冲击和解构。变译不能用传统的任何翻译标准来衡量，因为传统的翻译标准强调的是译本和原文的最大关联，这种关联就意味着不同方面的"对等"，而变译意味着"失本"，不"忠实"于原文。如果说，各种各样的强调译文和原文在某种层次和程度上相似的理论是古往今来一种默认的"翻译道德"的话，变译则意味着一种"叛逆"。

此外，还有多位研究者指出"忠实"观含义模糊，可以指向翻译中的任何层面，因此应被舍弃，需要有概念更为清晰的术语来代替它。作为一个含义模糊、重理想境界而轻翻译现实的传统概念，而且是传统译论的核心所在，"忠实观"遭遇质疑和解构是意味深长的。它一方面体现了翻译研究者思想上的解放和翻

译理论研究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为深入反思现代西方思潮下的翻译理论的学术根基提供了思路和契机。

（李林波）

规范　norm

亦称"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群体诸成员共有的行为规则和标准。规范可以内化，即可以化入个人的意识，因此，即使没有外部的奖惩，人们也会遵守。规范也可以通过外部的正面裁决或反面裁决而发生作用。有特定规范的社会单位可能很小（例如一伙朋友），也可能囊括全社会所有的成年人。规范比价值或理想更具体。诚实是一种普通的价值，而在特定情况下确定诚实行为的各项标准就是规范。关于为什么人们遵循规范的问题，存在两个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和冲突论学派。功能主义学派认为规范反映了一种共同意见，即一个在社会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共同的价值体系。而所谓社会化过程，就是每个个人学习他所在群体的文化的过程。规范对社会系统所起的作用据说还要发展，以适应社会系统某种所谓的"需要"。冲突论者则认为规范是处理循环往复的社会问题的一种机制。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理论主张，规范反映社会一部分人统治其他各部分人的权力，而且以强制和裁决维护这些准则。规范还被认为是一个阶级或等级统治、剥削其他阶级的手段。此外，规范也用来表示一种在统计上确定的标准或社会群体的普遍行为、态度或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讲，规范是对实际行为而不是对预期行为而言的。图里（Toury）对规范的解释则是社会文化对翻译的约束力。参见"翻译规范""规范论"

翻译规范　translation norm

图里（Toury）被认为是第一个系统论述翻译规范的学者（Toury 1980），随后对此作出贡献的主要有赫曼斯（Hermans）和切斯特曼（Chesterman）。图里认为，翻译活动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译者为使译文获得认可就必须遵守译文社会的规范，"翻译是一项受规范制约的活动"（Toury 1995：56），于是就有了"翻译规范"。图里把"规范"定义为"对翻译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即某一目的语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和观念，如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正确的、适当的翻译行为原则"（Toury 1980）；赫曼斯的定义是："规范是心理和社会实体，是人们互动交际中重要的构成因素，属于社会化进程中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规范涵盖常规与法令之间的全部领域。"（Hermans 1996：31）从以上定义我们不难看出，翻译规范是译者的翻译行为所遵循的原则，翻译法令、翻译标准、翻译规则和翻译常规等都是翻译行为原则，它们虽然对翻译行为的约束力有强弱差异，但都应被纳入到"翻译规范"的范畴之内。

图里把翻译规范分为三类（1995：56～61），即元规范（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预规范（preliminary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后来，切斯特曼将其分为两类：期待规范（expectancy norm）或产品规范（product norm），以及专业规范（professional norm）或过程规范（process norm）。参见"预规范""元规范""操作规范""专业规范""期待规范"

规范论　theory of norms

多元系统论者经常使用的术语。不同学派对"规范"有不同的理解，传统译论或现代译论的某些分支基本上将其理解为规定（prescription），亦即指导原则，甚至理解为译者必须遵守的规则。但是，目前"规范"经常跟应用翻译理论的各个领域（例如译者培训、翻译教科书的编写）联系起来。它是某个译者、某派译者甚至整个文化氛围中产生译本的实际翻译过程的反映。笼统地说，"规范"的概念因人而异，决定于把翻译理论的作用理解为可调节的、描写的抑或是规定的。图里（Toury）对"规范"的解释是社会文化对翻译的约束力。它处于两极之间，一极是总体性的规则（rules），另一极是纯粹的个人风格（idiosyncrasies）。"规则"是客观性极强的"规范"，而个人风格又是主观性极强的个人"规范"。两极的连线构成一个连续体。图里认为，即使是一群人共同接受的规范，也因翻译任务的不同而不同，如笔译与口译不同，法律翻译与一般翻译不同，等等。图里认为，规范是解释社会活动最根本的概念，是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因此也是解释文化活动（包括翻译）的关键，在确定翻译行为上起中心作用。图里认为翻译规范主要由预规范（preliminary norm）、元规范（initial norm）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组成。（Toury 1995：53～69）参见"翻译规范""预规范""元规范""操作规范"

预规范　preliminary norms

亦称"原型规范"，是图里（Toury）不同规范之中的一种，会影响翻译过程。图里认为，由于翻译的定义会因历史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有必要预先回答一些与元规范或操作规范有关的问题，这样才能建立起可以成为翻译过程之架构的文化语境。预规范是在两个显然不同但又相关的领域之间确定的：1. 特定历史时期目的语文化的翻译政策，如对某些作品、作家、文类和流派的青睐；2. 是否允许以另一种语言的译本作为原本进行翻译（有的允许，有的容忍，有的甚至加以鼓励），可以接受的媒介或中间语言又是什么。所以，根据预规范，在特定的目标文化前提下决定选择何种原本进行翻译。（据 Toury 1980，1995）

元规范　initial norms

亦称"初始规范"，是图里（Toury）在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1980）和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1995）先后提出的

指导译文生产的基本规范之一,与操作规范相对。元规范是翻译操作的宏观抉择。元规范与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翻译目的有关,而翻译目的控制翻译过程的种种决策。图里把元规范定义为反映译者对原文忠实程度的规范。译者面临三种情况的抉择:1. 从内容到形式跟原文语篇规范亦步亦趋;2. 译者恪守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学规范,不考虑源语的相应规范;3. 前两者兼顾。实际上译者是在"合适"(adequacy)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之间进行选择,而且就大多数译文而言,是在两端之间寻求折中。参见"合适""可接受性"

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

1. 图里(Toury)在其所著的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1980)和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1995)中用来表示译文存在的两种倾向(亦称"两极")之一,另一倾向是"充分性"(adequacy)。他认为,译文在两极的连线之间处于一个位置:或者是拘泥于原文系统的规范,具有充分性;或者是靠近目的语系统的规范,具有可接受性。究竟倾向于哪一极,决定于译者翻译的元规范(initial norm)。他认为,翻译在两种倾向的遭遇中进行:对原作或源语而言的充分性和对目的语而言的可接受性。尽管任何译作都代表着两种倾向的折中,但不会在两极连线的中点,总有一种倾向占上风。可接受性占上风的译文读起来应该更像用目的语写的原作(reading as an original written in TL),而不应该读起来像原作(reading as the original)。图里不认为文学翻译只有一种合适的方法。他主张对不同时期特定的文学作品应有不同的翻译规范。

2. 当代美国篇章语言学者德·布格兰德(de Beaugrande)(de Beaugrande 1980; de Beaugrande, Dressler 1981)提出的七项语篇性标准之一,指文本的读者对文本的期望,即文本语言表达应具衔接性、语义表达应具连贯性、文本(读起来)能被接受并为已所用或切合需要。可接受性和文本类型、社会文化环境中可接受性的范围、作者意图恰当与否有关。译文文本的可接受性能在确保实现译者的意向性的同时为读者和社会所接受,从而达到翻译目的。为此译者通常应对原文本的语言表达形式加以调整(利用异化、归化、词类转化等)。参见"合适""元规范"

操作规范 operational norms

图里(Toury)在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1980)和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1995)中使用的术语,是翻译过程中的微观抉择,即"针对翻译过程本身所作的实际决策"(direct actual decisions made during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itself)而言,指对具体的翻译技巧和方法的选择,如译文针对不同对象选择语言变体、翻译过程中的层次转换、形式对应、行文等值和创造性;等等。因此,操作规范在翻译方式的选择上起中心作用。参见"预规范""元规范"

文本规范 textual norm

1. 图里(Toury)的两种操作规范之一(另一规范为矩阵规范),其作用是翻译前规范选择目的语材料,以取代源语的文本和语言材料。也就是说,源语文本项目中的翻译对等语是根据这类规范选择的。这类材料在性质上可能是语言的,也可能是文学的,可以包括词项或押韵格式等特征。文本规范可以是普通的规范(与各类翻译相关),也可以是特定的规范(只与特定翻译模式或体裁有关)。(Toury 1980, 1995)参见"矩阵规范"2. 指文本性标准在文本外规范制约下于译文文本中的体现,即衔接性规范(cohesive norm)、连贯性规范(coherent norm)、意向性规范(intentional norm)、可接受性规范(acceptable norm)、信息性规范(informational norm)、语境性规范(contextual norm)和互文性规范(intertextual norm)。(韩庆果 2006)参见"文本外规范"

文本外规范 extratextual norm

指翻译活动所处的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对整个翻译活动产生的制约。文本外规范可分为期待规范、文化和权力规范。期待规范来自于切斯特曼(Chesterman),它不仅包含读者对翻译活动、翻译行为和译文文本及其文本性的期望,译文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功能也包含在其中,因为译文的目的和功能取决于对读者、翻译活动发起者、市场等的期待的预判;文化和权力规范包括勒菲弗尔(Lefevere 1992a: 7~26)提出的译文社会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poetics),也包括了切斯特曼期待规范中所说的"两种文化间……经济、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因素的制约"(Chesterman 1997: 64)。(韩庆果 2006)参见"文本规范"

专业规范 professional norm

亦称"过程规范"(process norm),切斯特曼(Chesterman)的两类规范之一(另一类为期待规范或产品规范),指由专业的合格译者的职业行为体现出的制约翻译过程的规范,受期待规范的制约。专业规范又可分为责任规范(responsibility norm)、交际规范(communication norm)和关系规范(relationship norm)。责任规范属于(职业)道德规范,即译者在翻译中应对原文作者、委托人、读者及自己负责。交际规范属于社会规范,指译者应致力于使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各方获得最大程度的交际成功。关系规范属于语言规范,指译文文本和原文文本之间应保持一种适当的相似关系(Chesterman 1997: 67~70)

过程规范 process norm

参见"专业规范"

产品规范　product norm

参见"期待规范"

期待规范　expectancy norm

亦称"产品规范",切斯特曼(Chesterman)的两类规范之一(另一类为过程规范或专业规范)。该规范反映读者对翻译(或特定类型的翻译)样式的期待,如译文"文本类型样式及其体裁、风格,语法正确性的程度、文本性及(某些文体中的)搭配甚至某些词类的分布"。读者(可以包括翻译任务委托人)的期待受"译文文化中盛行的翻译传统、译文文化中(同一文本类型)平行文本样式的制约,还受所涉及的两种文化间及其内部的经济、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因素的制约"(Chesterman 1997: 64)。

偏差规范　deviation norm

指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相比,基于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在文本性和文本对读者和社会的影响上产生的偏差。偏差规范不是指译者主动偏离原文,而是对译文本身及其影响的客观描述。客观原因引起的偏差(与原文文本性的差异)由文本外规范的制约所致,因此也可看做是文本外规范的一部分;主观原因引起的偏差由基于读者反应论、阐释学原理等而造成的对原文理解的偏差所致,还包括译者在译文中的个人风格(idiosyncrasy)和文本理解与表达能力欠缺(即个人能力不足)造成的偏差。(韩庆果 2006)参见"文本规范"

矩阵规范　matric norm

图里(Toury)把它界定为两种操作规范之一(另一规范为文本规范)。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各种矩阵规范支配着译者如何决定对句子层面之上的文本进行组织。例如,这类规范的操作将决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省略源语文本材料("存在"),文本章节可否移动("位置"),以及文本如何进一步划分("文本分割")。这些范畴当然不是泾渭分明的,例如,把文本章节从一处移到另一处就相当于一处省略,另一处增加。矩阵规范还会决定是否需要通过添加一项声明,说明目的语文本是一个删节本或改写本,以此来承认这些改动。(Toury 1980,1995)参见"文本规范"

性别歧视　sexual discrimination in translation

指翻译话语中各种歧视女性的性别隐喻和翻译实践中以阳性代阴性的做法。翻译理论中充斥着性别歧视。由于女性与翻译在各自从属的等级秩序中都处于弱势地位,人们习惯用性别话语来描述翻译,将翻译女性化。比如,梅纳日(Menage)把不忠实原文、但语言流畅的译作比作"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èles)";斯坦纳(Steiner)将翻译的理解过程比作"侵入(aggression)",一些论者指出,他显然暗指男性对女性的性占有过程(erotic possession)。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隐喻被女性主义者指责为对女性的歧视。这类描述翻译的性别隐喻实际构成了对译者和女性的双重歧视。

翻译实践方面同样存在着对女性的歧视。具体表现是,较多的译者惯用阳性代词指称男、女两性。按照法兰西学院的阳性支配阴性的原则,像"三百个女人和一只(雄性)猫走在街上"这样的句子将不得不作阳性处理。(Simon 1996)

学派　school

指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的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学派往往有时代性,如翻译的语言学派活跃于20世纪60～70年代,文化学派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学派也往往带有地域特征,如莱比锡派、美国翻译研讨班等。

文艺学派　literary school

亦称"艺术派",与"科学派"相对。严格说来,艺术派译论既属传统译论,也是现代译论的一个分支。中西译论自问世以来一直处于文艺学范畴之中。例如,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关于翻译应保留语言的总体风格和力度的观点,英国翻译家泰特勒(Tytler)的三原则,中国佛经翻译家的"案本"和"依实出华",严复的"信达雅",都可视为文艺学派的译论。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语言学派的崛起才打破了文艺学派的一统天下,形成两派对峙的格局。

艺术派并不将翻译看成是单纯的语言对应转换,认为那样会使翻译沦为一种"技术过程"。典型的艺术派译论通常把理想的翻译过程描写为译者和作者的心灵交流过程,而语言在此不过是起到居间的作用而已。显然,这里关心的已不是语言层次的转换事实,而是译者和作者如何借助语言达到超越时空的契合。因此,艺术派的方法特点是以主体为研究焦点,而对客体的研究则围绕着这一焦点进行。艺术派通常是反复围绕原文的总体修辞风格和主题内容来对比译文的得失,从中总结经验和进行评价。它对翻译本质的解释,形象语言多于分析语言,如钱锺书以旅行者的艰辛旅程比喻翻译过程;对译作的讨论大多是印象式的,借用传统文论的概念而不加以新的语义界定。这些使得艺术派译论在具有较大包容性的同时又呈现相当的模糊性。近三四十年的翻译研究表明,艺术派在与科学派的争论中也看到对方的长处,也用语用学、社会符号学等学科的观点来阐释某些翻译现象。

文学-文化学派　literary-cultural school

包括两个有相似地理与文化背景的学派,即20世纪70年代初发祥于低地国家(荷兰与比利时)的翻译研究学派和70年代末兴起于以色列的多元体系派。它们都起源于地处当代世界主流文化边缘的小国家,且其理论渊源都是20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翻译研究学派和多元体系派在翻译思想上的差别在

于：前者更相信译文可以对目的语文化中的文学常规和文化规范产生影响，而后者则更相信目的语文化中的社会规范和文学常规主宰着译者的美学预设与先见，并进而影响到其翻译决策(Gentzler 1993：107)。这两派在诸如文学系统之间文化上的相互依赖性、文本的能产性以及所有文本的文本间相互关联性质(intertextuality)等方面为翻译研究以及随后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但是它们关心的重点显然是在文学与文化方面，而不是在语言方面。参见“多元体系学派”“翻译研究学派”

多元体系学派　school of polysystem theory

指以多元体系论为理论渊源的翻译学派，创始人为以色列学者特拉维夫大学的伊文-佐哈(Even-Zohar)和图里(Toury)。伊文借用前苏联后期形式主义学派的多层次文学体系说，创造“多元体系”(polysystem)一词，涵盖文学大系(从高级诗、韵文到儿童文学、通俗小说)，探讨译作和文学大系之间的关系，阐明译入语文化既决定作品是否翻译，又规范遣词用语。图里主张，翻译属多元体系的第二体系，其作用取决于译入语文化及其文学的强弱和发展阶段。他认为译作无固定身份，因其社会、文学和历史背景而具有多种特征。该派超越了译界中“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争，将译学与文学研究、社会和经济因素结合起来，赋予译学以历史意义，但仍囿于译入文化的可接受性，未摆脱“文化对等”的羁绊。

交际学派　communication school

指以信息论(亦称“通讯理论”或“交际理论”)和社会语言学为理论渊源的翻译学派，出现于20世纪70～80年代，以奈达(Nida)和雷伯恩(Reyburn)(1981)为代表。该派认为：人类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信息系统，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它同其他种类的信息传递一样，遵循着信息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例如，在信道接受力给定(即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确定)的情况下，为了降低信息的难度(高度)，就必须用明显的形式表示出其中暗示的部分，因而信息的长度(宽度)会增加，故而译文常常会长于原文。社会语言学对于交际学派理论的贡献是区分了语言的不同功能。根据这种区分，判断译文有效性的标准便是它实现原文中相应功能的程度。交际学派深刻地分析了翻译中信息传递的种种困难，突出了接受者的重要性。它所提出的“翻译即交际”的命题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它的欠缺在于没有研究不同话语层面上语言符号的特点，也没有很好地分析语言和文化间的深层关系。

社会符号学派　sociosemiotic school

以符号学为理论渊源的学派，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代表人物是奈达(Nida)。首先提出“符号学”的名称及符号学研究纲领的是美国哲学家皮尔斯(Pierce)。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莫里斯(Maurice)对符号学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他区分了符号关系的三方面，明确地指出：符号与其所指称或描写的实体与事件之间的关系是语义关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是符号句法关系，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是符号用法关系。与这三种关系相对应的语言符号的意义为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这三类语义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词语和话语的总体社会符号意义。不过，在不同的话语中，它们的相对突出程度有所不同，所有的语言符号都有言内意义(主要为语法意义)；在技术性文本中，指称意义非常突出；而在文学性话语里，语用意义和某些言内意义(如诗歌中由韵律所体现的音系意义)可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译者如果能把一个词语或一段话语的全部意义同时传递给目的语读者，那自然很理想，因为这样就达到了原文与译文的完全对等。但在实际上，这种完全对等的翻译是很少能够做到的。译事之难，就在于源语和目的语语言符号的各种社会符号学意义同时对应的情况极为少见。在许多情况下，译者都必须在保留什么和舍弃什么之间作出抉择。社会符号学的翻译理论从语言-文化传递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并阐明其本质。它对于翻译操作经验具有概括力和全面的解释力，对于翻译研究具有更深的穿透力。

美国翻译研讨班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

1964年，艾奥瓦大学写作研讨班主任恩格尔(Engle)首创翻译研讨班。次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设立美国翻译研究中心。同年，在美国出版了诗歌翻译的刊物《现代诗翻译》(*Modern Poetry in Translation*)。1968年，美国翻译研究中心出版了第一期该中心的机关刊物《得洛斯》(*Delos*)，旨在研究翻译史和翻译美学。从此，文学翻译在美国文化中开始占有小小的一席之地。20世纪70年代，文学翻译继续得到发展和认可。不久，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得克萨斯和纽约州立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都先后设立了翻译研讨班和各种层次的翻译专业课程，并对从事文学翻译、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学生授予高级学位。一个围绕翻译研讨班的学派随之形成。

该派侧重翻译实践，强调译作品位与文学价值，采用哈佛大学理查兹(Richards)和奎因(Quine)的方法。代表人物有：诗人、翻译家庞德(Pound)，曾译唐诗，倡导精确复现细节、词语、片断和整个形象描绘；艾奥瓦大学的威尔(Will)根据办研讨班的经验，把翻译视为命名、小说创作和认知形式；耶鲁的策德内斯(Zdnys)认为，翻译是主观思维活动，旨在阐述文学。总的来说，研讨班成员片面强调实践，反对任何理论的束缚。他们虽然也谈对翻译的种种看法，但多系个人体会和经验之谈，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研究方法停留在传统的语文学范畴之内，因此对当代翻译理论的贡献甚微，而对翻译实践的影响甚大。(据郭建中2000)

语言学派　linguistic school

翻译中所涉及的语言现象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并从 20 世纪 50～60 年代起在国外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翻译语言学理论。这一理论运用语言学中现有的、规范的术语和概念来阐述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现象。"1953 年费道罗夫(Фёдоров)的《翻译理论概要》一书问世,这本书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了较系统、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翻译理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本书使费道罗夫成了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奠基人。"(蔡毅,段京华 2000: 4～5)

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重要贡献在于它把翻译中某些问题提到语言学高度加以阐述,对翻译中两种语言的话语现象进行对比研究,并作系统归纳。翻译语言学将整个翻译活动尽力纳入语言学轨道,把翻译看做"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不变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过程"(巴尔胡达罗夫 1985: 4)。即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把翻译过程看做仅仅是"语言(语际)的综合处理",认为翻译理论"最主要的是研究对比在语言中、在话语结构中现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它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描述实际的翻译过程,即揭示原语到译语这一转换的客观存在的规律";"这一转变的规律,即翻译转换的'规则'也就是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研究的对象"(巴尔胡达罗夫 1985: 17)。从而得出结论: 翻译理论"第一属于宏观语言学;其次属于应用语言学(巴尔胡达罗夫 1985: 19)。"该派追求原文和译文的等值,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卡特福德(Catford)、早年的奈达(Nida)、前苏联的费道罗夫和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前联邦德国的威尔斯(Wilss)。

由于翻译总是牵涉至少两种语言,因此人们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是十分自然的。但是翻译活动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操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际交流活动,涉及一系列的超语言范畴,涉及语言外的文化系统。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学在不断发展,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也随之发展: 从卡特福德的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到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从科勒(Koller)的语用对等(pragmatic equivalence)到德 · 布格兰德(de Beugrande)的语篇对等(text-based equivalence)。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外有语言学背景的学者开始注意到世界观、意识形态和权力运作对翻译的影响,因为此后的语言学不仅重视语言的内部研究,同时也注意到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力等文化因素。当前,以贝克(Baker)为代表的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者建立起超大规模的语料库,对翻译作实证研究。

科学派　school of science

与"艺术派"相对,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语言科学的发展而兴起,认为翻译研究是对一门科学的研究,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可观察和实证的,因而是可靠的客观现象。在翻译过程中,这种客观实在的东西就是被语言符号相对静止化的原文和译文。它们,或者说它们之间的转换关系,便是科学派研究的对象,而主体方面的各种情况则被认为是难以测定的。如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就曾宣称:"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方面,至于实现这一过程的(译者)生理和心理因素则撇开不问。"(巴尔胡达罗夫 1985: 1)即便有时也将译者纳入研究范围,也往往是抹掉他的主体自足性,将其抽象为语际转换过程中的信息传导工具,从而降为客体的自然部分。科学派极力突破过去研究方法的局限,从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等具体学科中借用大量的概念、定理、实证方法和技术处理手段,以求在研究中取得科学研究特有的客观性。近三四十年来的研究表明,科学派与艺术派在冲突中并非绝对势不两立,而是各取所长,相互补充。例如,科学派也注意到翻译主体的研究和读者反应。参见"语言学派"

莱比锡派　Leipzig school

指莱比锡大学一群以理论和应用语言学系为基地的有影响的翻译学者。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该派学者在译坛极为活跃,目前已发展成为欧洲两大翻译学派之一。该派学者注重翻译研究的语言性和科学性,注重科技翻译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卡德(Kade)和诺伊贝特(Neubert)。

尼特拉学派　Nitra school

指最初以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尼特拉教育学院为基地的一批斯洛伐克学者,包括列维(Levý)、米科(Miko)、波波维奇(Popovič)。他们以俄国形式主义者以及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一些著作作为起点,对文学翻译特点开展研究,共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这些观点为后来的学者,特别是那些与调控学派相关的学者所采纳。例如,他们中有的强调在译文中保留原作的艺术性(Levý 1969),有的研究将文本表达特征进行分类的可能性(Miko 1970),有的强调将转换作为一种普遍翻译现象的重要性(Popovič 1976),还有的强调在广义的元文本概念下考虑翻译问题(Popovič 1976)。1980 年后,这一学派归于沉寂。

解构学派　deconstructional school

该学派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法国,其代表人物为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严格说来,解构学派并未提出具体的翻译理论,但它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哲学,认为古往今来所有哲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翻译这个概念,并且站在与西方思想传统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借助对翻译的讨论提出一系列关于语言和哲学的重大问题,所以它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解构学派的理论无视原文,认为文本中并没有什么深层结构或预先决定的意义。它拒绝任何类似"原文"与"译文"、"语言"与"意义"的划分,指出: 在翻译中,可以看到语言并

不指向任何外在的事物,而是指向它自身,因此,原文和译文之间存在的符号指意链是一条可以无穷无尽地向前追溯的链子,即译文是更早的译文的译文……(Gentzler 1993: 145～149)。对原文地位的质疑是20世纪相对主义思潮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的反映,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从时间上说,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更早些时候德国语言哲学家与文艺批评家本雅明(Benjamin)的翻译思想。他认为语言本身不指向任何客观现实;译者的任务是保证语言的生存,并以此保证生命的延续。"原文"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封闭体,相对于未来的可能性而言,它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的状态之中,包含着某种寻求自身未来生存的结构或形式,哪怕它从来不会被人翻译时也是如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它在没完没了地希冀着被人翻译,希冀着生命。译者的义务,或者说"债务",就是赋予原文新的生命,使其生存下去,生存得更好,更充分。而原文则在翻译的过程中屈膝投降,放弃自身,通过被变更和被转换来换得新生,实现成长和成熟(Gentzler 1993)。本雅明的观点暗示出:原文并无独立不变的身份,它须仰仗翻译来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

解构学派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启发我们:应当避免用任何先见(vorsicht)来阐释和评价译文。解构学派声称,翻译可以赋予原文"死后的生命(afterlife)",但是在彻底否定原文的同时,它实际上也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否定了翻译自身。

解构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发生瓜葛并对其产生影响有其内在必然性。解构主义作为一种语言哲学,反对传统的恒定中心论,反对结构主义诉诸单一结构的、片面的语言观,这些正是翻译理论中涉及创作主体和文本意义等要素时所要明辨和解决的问题。翻译理论作为一种开放性的体系,不可避免地受到解构主义的冲击和渗透,借鉴和接受相关理论的辐射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释意派理论　interpréter pour traduire;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al school

亦称"达意理论""诠释理论",还可称为交际与释意理论,以1968年《国际会议译员》的发表为标志,创始人是塞莱丝柯维奇(Seleskovitch)。1975年,她出版的博士论文《言语、语言和记忆——交传翻译的笔记研究》和勒代雷(Lederer)1981年出版的《同声传译——经验与理论》标志着释意理论的真正形成。加拿大学者德利尔(Delisle)在 *Translation: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1988)一书中,从培养应用翻译职业翻译人员的角度对释意派理论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

释意理论与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相对,是"翻译程序的基本理论"(Lederer 2005: 89),即把翻译程序而不是语言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揭示职业译员/译者的智能转换机制。该派理论研究先是围绕"意义"展开,经过反复实验和研究,提出了"理解原文、脱离源语语言外壳(déverbalisation)、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这一翻译程序模式。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得意忘形)指在理解后和表达前伴随语言符号产生的认知和情感意义,是对语言的超越。勒代雷随后提出了"意义单位"概念。翻译的任务是转达交际意义,而语言只是传达意义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译者/译员的认知补充是意义单位产生的前提条件。

释意理论的研究领域随后进入纵向和横向拓展阶段。1976年,在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创立了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点,不久后在巴黎第三大学内成立了翻译学研究中心,陆续发表专著或在各类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于2003年创办全球性翻译杂志 *Forum*,研究对象逐渐从口译到笔译,从实用文章翻译到科技、法律和文学翻译。研究涉及十几种语言,包括手语翻译。近些年,研究人员借助神经学、心理学、语言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理论成果进行跨学科研究,不仅试图回答翻译学本身提出的基本问题,而且努力就言语机制、语言与篇章的关系等作出科学回答。该派重要术语有:意义对等、词语对应、意义单位、认知补充、明喻、暗喻、教学翻译、翻译教学,等等。(Lederer 2005)　　(刘和平)

调控学派　manipulation school

即欧洲的比较文学派。该学派把翻译研究看成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出于某种目的而对源语文学作品的"调控"(Hermans 1985: 11),即译者势必会对原文进行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的处理,此学派也由此得名。该派强调文学的多元体系,认为翻译是目的语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另一文本的再现。调控学派与语言学派的宗旨大相径庭。前者着眼于文学文本的再创作,而后者着眼于等值。调控学派的优点在于:在多元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将翻译置于文化活动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使翻译和原文以外的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这有助于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调控学派的弱处在于:囿于比较文学范畴,忽视其他学科对翻译研究的指导;限于对文学文体翻译的研究,而不涉及广泛的翻译领域。这个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包括伊文-佐哈(Even-Zohar)、赫曼斯(Hermans)及霍姆斯(Holmes)等人。

辩证逻辑学派　dialectical logic school

这个学派是在研究了国内外各流派的基础上由田菱(1992)提出的。此前,"刘祖培同志提出翻译综合思维论,阎德胜同志也从逻辑方面探讨译学的建设,不少学者都对国内外各流派的理论从哲学高度提出了异议。这说明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已进入了哲学思考阶段。"(杨自俭 1994: 387)

支持此派的理由是:属于专门科学方法的语言学方法或文艺学方法,无法包容翻译学多维的学科内涵。一般科学方法的系统论、控制论等,无法真实揭示翻译学这一复杂事物的本质和整个流变过程的规

律;而建构于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的辩证逻辑思维方法却是研究翻译学的最佳方法论。因此,在考察翻译学的全部过程中,田菱采用辩证逻辑思维方法,并用它消融一般科学方法,吸纳专门科学方法,提出"翻译学的辩证逻辑学派"。辩证逻辑学派以下述六大基础理论作为翻译学理论大厦的基本构架:方法论、领域论、本质论、标准论、可译论、风格论。在辩证逻辑流动型的翻译学研究中,其基础理论将会随着科学的纷繁发现而不断拓展。

翻译研究学派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形成。早期由比利时、荷兰学者创导,创始人有:美国诗人、翻译家霍姆斯(Holmes,生前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翻译)、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Lefevere,20 世纪 80 年代移居美国)和英国学者巴斯内特(Bassnett)。后者于 1980 年发表的《翻译研究》是第一部介绍低地国家翻译研究学派的专著,内容包括翻译的一般问题、翻译理论及翻译发展史。该派重理论,强调历史回顾,采用文化译入研究手段,关注文学翻译的特点。1991 年《翻译研究》再版时,巴斯内特在书中预言:"到了 21 世纪翻译研究将忘却自己有些羞羞答答的诞生,就像英语研究忘却了自己不无相似的出世一样。"这意味着 21 世纪的翻译研究将走向成熟。巴斯内特将该派的发展分作三个阶段:1. 以对传统翻译观,尤其是对"等值体"的挑战和诘难为特征的阶段;2. 重点是描绘特定时期翻译活动模式的阶段;3. 重意识和诗学的阶段,认为译与不译的选择更多地基于意识层面(伦理的或政治的)和诗学层面;在这一阶段,"翻译被看做是调控文本的一个过程,在这里,多元论取代了忠实于原文的教条,原文这个概念本身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该派认为,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和主要方法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无助于增进人们对于文学翻译的了解,因而沿用了近代翻译时期的阐释方法,从意义的传递开始,研究翻译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如何既影响到译文及其文化(如美学规范)的发展,又影响到原文及其文化的延续,试图以此将各种文学翻译的理论统一起来,建立一种能够指导产生译本的理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该派更加重视考察译作与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参见"文化转向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食人"主义　cannibalism

指翻译通过吸收和消化原文的精华,为本土输入新的养分,来源于"食人怪"(cannibal)的比喻。食人怪是殖民者强加给巴西土著人的称呼。欧洲人初次航行来到新大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土著居民的一切(服饰、财产、技艺以及他们的语言)缺少欧洲人认为的文明社会的标志,尤其是他们的语言听起来就像是含糊的怪叫声。另外,1554 年,在现属巴西的一个图比人(tupinamba)部落的一次食人仪式上,人们吞食了葡萄牙大主教传教士萨尔迪尼亚(Sardinia)。于是,cannibal 一词就与美洲人联系起来。它原本指安第斯地区加勒比人(Carib)的一支,随后被借用指"吃人肉的人"而进入英语词汇,后来又传入其他欧洲语言。鉴于他们是"野人",是"食人怪",他们的文化被认为是原始的、野蛮的和无声的。欧洲人自认为自己的文明是先进和成熟的文明,是殖民地模仿的蓝本。在殖民者眼里,欧洲是起点,是"原文";而美洲殖民地是复制品,是"译文",是相对欧洲文明而存在的他者,是"正常的"西方文明社会的扭曲或不成熟的翻版,而复制品和翻译总被认为比起点和原文低劣。

1928 年,安德雷德(Andrade)发表了著名的《食人主义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提议将食人主义这一隐喻作为推进巴西文化发展的一种手段。他认为只有吞食欧洲文化,被殖民者才能摆脱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而吞食欧洲文化可以同时理解为对欧洲语码的尊敬和违背(Vieira 1999: 102)。这代表了与霸权文化关系的一种新态度。冈波斯(Campos)(1963)在他的《作为创造和批评的翻译》(*Da Traducao como Criacao e come Critica*)一文里正式将食人主义思想引入翻译研究,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思索在不发达国家文化中开创一种创新的先锋文学的可能性(Vieira 1999: 102)。他在翻译但丁的《神曲》时提出了移植天堂(transparadisation)、传输光明(translumination);翻译歌德的《浮士德》时提出了跨越文本(transtextualization)、创译(transcreation)和移植恶魔(transluciferation);翻译《伊利亚特》时提出了移植海伦(transhelenization);翻译希伯来语《圣经》时提出了重谱诗歌新曲(poetic reorchestration);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时提出了"想象重构"(reimagination)等。他大量采用前缀 trans- 与 re-,以显示翻译不是原文亦步亦趋的模仿或复制,而是在原作基础上的重新创作,是对原文的批判和超越。(参阅潘学权 2003: 47～48)因此,食人主义不仅反映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势文化渗透的一种文化态度,也是翻译外来文化的一种策略。食人主义将翻译比作输血,用别人的血液增加自身的体能。换言之,翻译通过吸收和消化原文的精华,为本土文化输入新的养分。冈波斯视翻译为侵越(transgression)和食人,但"食人"概念没有"掠夺、肢解、毁伤和吞食"之意,却注入了敬重和爱意,象征着通过输血吸收异质文化精华,翻译由此成为一种授权和滋养行为(empowering and nourishing act)。这与本雅明(Benjamin)和德里达(Derrida)的"翻译是确保文学文本繁衍生息的生命力"的观点十分相似。(Gentzler 1993: 192)　　(黄勤)

验证式翻译理论　empirical translation theory

指通过可以观察到的经验来证实译者的翻译过程和行为,了解译者的语言心理与认知活动情况。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译员进行心理实验,希望能更多地了解翻译思维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翻译

过程研究分内省式的数据分析法(introspection)和观察法(observation)两种。前者要求受试者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自我分析,或运用有声思维(think-aloud protocol)的方法,由本人边想边说或进行回忆,研究人员如实加以记录和分析。这种方法用于同声传译研究,以确定译员停顿的时间、落后于发言人的时间以及是否犹豫不决和停顿打结。后来,研究人员借助录音、录像、电脑技术等开展笔译研究,观察译员眼球的移动、面部的表情等行为表现。运用语料库研究翻译是一种新型的验证性研究方法。

切斯特曼(Chesterman)(1988: 228)把验证式翻译理论的目标概括为:描述译员的翻译行为并解释其成因;评估译员的行为对读者和文化的效果,并提出可以预测的因果律。

逻辑翻译理论　logical translation theory

指以逻辑分析与逻辑综合为基础的翻译理论。该理论建立在人类思维的共同性基础之上。思维是全人类的,语言是民族的。正因为思维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所以不同民族的人们交流思想才成为可能。而语言则是民族内部约定俗成的产物,因而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语言。两个民族语言的绝对差异性,一是来自民族整体思维活动允许的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一是来自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角度。因此一般说来,两个民族语言的翻译,只有从思维活动、思维方式和思维角度上进行研究,翻译理论才能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切实解决翻译活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宿语文本论　theory of target texts

指以目的语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宿语"即目的语。该理论与"源语文本决定论"针锋相对,由以色列学者图里(Toury)提出,被认为是西方译学研究中跨文化视野和文化转向的理论渊源之一。传统的翻译理论对于翻译所作出的种种要求都被想当然地推给了源语文本,认为正是源语文本决定了翻译标准和各种相关的要求,其结果便是翻译标准和相关要求的理想化,因而具有片面性。与等值翻译的模式不同,图里将他的模式建立在"差异理论"的基础之上,从理论上假定各种语言之间一定存在着结构差异。同时,他还将翻译定位在以下两极之间:一是由"宿语文化整体接受性"所构成的理论假说极,一是由"译本对应于源语文本的完整契合度"所构成的功能-动态对应极。而翻译之所以就处于这两极之间,其原因在图里看来主要是:1. 由于任何一种翻译都会涉及新信息的传输引进并使宿语系统"陌生化",因此,没有任何一种翻译可以完全为宿语文化所接受;2. 由于宿语文化规范会导致源语文本的结构转移,因此,没有任何一种翻译可以与原文完全契合。

图里是从宿语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翻译问题的。他认为所谓翻译等值并不是一种理论假说抑或人为的理想,而是一个可以验证的事实,源语文本和宿语文本之间所存在的实际关系也许会反映出某一种理论假说所预设的抽象关系,但是,译本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之所以存在,则是因为在某种宿语文化之中有可以接受的一种文本来替代源语文本。图里的理论模式满足于确认产生译本变异的各种原因,接受译本而不对译文处理手法的正确与否作出任何判断,认为只须从译本所处的语言-文化语境的内部对其进行分析,即可了解整个翻译过程。图里辩称各种译本本身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身份,只是由于时刻受制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与文学语境因素,因此被视为具有"多重身份",当然这还要取决于在特定的时间内可以控制翻译抉择过程的各种力量的大小强弱。

错觉理论　theory of delusion

指文学译作应能使读者产生错觉,以为所读的是用目的语写成的原作。错觉理论由布拉格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捷克的列维(Levý)提出,他认为,文学翻译必须采用"错觉"理论。所谓错觉,就是译者隐匿在原作后面,以原作者的面目出现,使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读的不是经过中间人(即译者)处理的译作,而是在直接读原作。这种错觉理论最适合文学翻译,因为它能客观地反映读者的心理:戏剧观众明明知道舞台上所发生的事情是不真实的,却要求演出逼真;小说读者明明知道所读的故事是虚构的,却要求小说合情合理。同样,译作的读者知道他不是在读原作,但要求译文保持原作的特征。换句话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必须使译作读起来不像译作,而像用目的语写成的原作。否则,文学翻译就达不到标准,译品就会缺乏文学性和艺术性。

"错觉"概念虽由列维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但中西方译论在他前后都有过类似的零星评述。

意识形态决定论　ideology-governed translation

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文化万象"有关的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这是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Lefevere)在其所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ture: A Sourcebook*, 1992b)中提出的。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译者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运作。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意识形态常常是赞助人、翻译委托人和出版机构强加给译者的。译者必须在目的语的意识形态和自己作为职业工作者的地位之间取得妥协。一方面,他要使其他译者相信,他无愧于翻译家的职业;同时,其译作必须不能违反自己的意识形态。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实践是与一定的历史现实相联系的实践,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按照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对原文进行重新阐释的实践,它本质上是文化政治的实践。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翻译字句,也翻

译意识,他们对译与不译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按照我们的说法,意识形态决定论就是政治立场决定论。比如,香港曾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通过不平等条约占有的中国领土。按照权威的《牛津英语大典》(1989 年版)的解释,香港"回归中国"只有译为"return to China"才能准确恰当地表达这一含义。然而,西方传媒在表达(翻译)香港"回归中国"时选择了一个法律用语"revert to China"(指捐赠者捐赠的财产到了捐赠者与接受者商定的法律期限后还给原捐赠人或他的财产继承人),如: 1. He will officially take office on July 1, 1997, the day Hong Kong *reverts* to China. (*Time*. Dec. 23, 1996. p. 47) 2. The coming British retreat at midnight on June 30 and the *reversion* of Hong Kong to rule by the Chinese mainland has spawned a plethora of handover memorabilia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 2, 1997)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可见一斑。参见"意识形态"

霍姆斯路线图 Holmes' map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72 年霍姆斯(Holmes)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翻译组宣读了他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文中霍姆斯勾勒了翻译研究的整体框架。事后,图里(Toury)用图表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见下图)。首先,霍姆斯把翻译研究分成两大领域,即"纯"(pure)翻译研究和应用(applied)翻译研究。应用翻译研究分三项: 译者培训(translator training)、翻译辅助工具(translation aids)和翻译批评(translation criticism)。"纯"研究再分理论(theorical)研究和描写(descriptive)翻译研究。前者分一般(general)研究和专门(partial)研究;后者再分产品导向(product-oriented)研究、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研究和功能导向(function-oriented)研究。而专门研究还可细分为翻译媒介(medium restricted)研究、翻译语对(area restricted)研究、翻译层级(rank restricted)研究、文本类型(text-type restricted)翻译研究、翻译时期(time restricted)研究、具体翻译问题(problem restricted)研究。

霍姆斯的上述论文在翻译研究史上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根茨勒(Gentzler)在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当代翻译理论》)(1993: 92)中认为,该文"被普遍认为是建立翻译学科的宣言书"。霍姆斯的译学范畴和体系在此后的 30 余年中已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据 Baker 2004: 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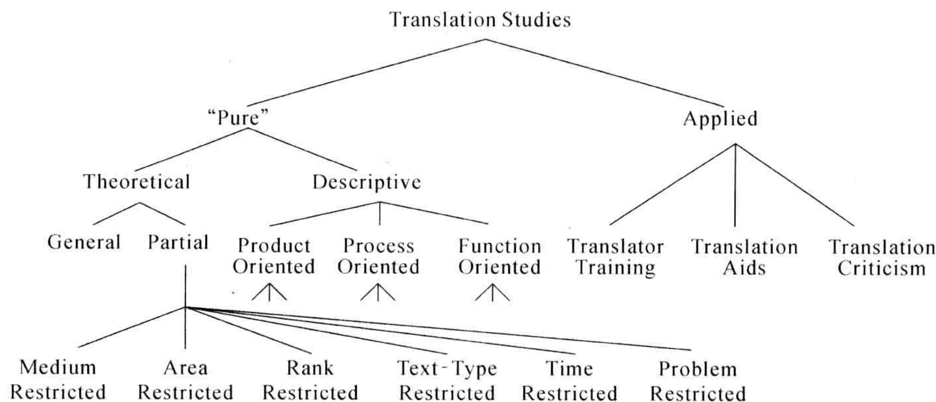
翻译学归结论 reductionist approach to translatology

由赵彦春(2005)在其《翻译学归结论》一书中提出,指以过去的翻译研究为背景,系统思辨和证伪了文化派及其相关理论,以推动译学理论范式从静态转向动态,从机械转向辩证,从描述转向解释。他指出,翻译的运行机制体现为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制衡的辩证的层级体系,由原则和参数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互斥、互补、互动。翻译学归结论共设定两个原则: 关联原则和趋同原则,前者以效度为旨归,后者以信度为取向。语篇的成篇因素和体现于形意张力之间的各种功能都属于参数范畴。原则不可违反,而参数可以调变。翻译中的理解是自上而下的关联推理过程,表达是自下而上的语码操作过程和对参数进行辩证取舍的动态过程。

归结主义翻译理论基于以问题求解为根本的可拓逻辑,但模糊逻辑和包容模糊逻辑的形式逻辑依然有效,只是它们是静态的和可以否决的,所涉及的二元项是供可拓逻辑选用和调变的,因此,可译与不可译、对等与不对等、忠实与不忠实都具有辩证的意味,科学与艺术、形式与意义、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等都处于既矛盾又统一的张力之中。作为知识系统,归结论体现于主客互动性、解决矛盾的可拓逻辑、语旨的基本保证和具有普遍价值的原道的追求,是在更高的起点上对翻译本质和机制的把握,是对翻译本体论的思考和探索,是对翻译规律及包含的悖论性、对立性、倾向性、辩证性及相反相成的本质属性的揭示。 (*赵彦春*)

翻译观 views on translation

指人们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翻译活动的总的看法,是翻译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从理论



霍姆斯路线图(Toury 1995/2001: 10)

上讲,它既包括总体意义上翻译的哲学观、科学观、艺术观与历史观,也包含从各邻近学科研究翻译的基本观点与原则。近20年来,人们已逐渐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而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翻译观有别于一般具体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前者具有整体性,而后者指的是翻译实践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和要达到的标准,具有多元性与灵活性。从事翻译研究或翻译实践的人都抱有某种翻译观,区别在于自觉与不自觉。一个译者,有什么样的翻译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和翻译实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译作。翻译理论归根到底是要研究译者的翻译观的问题。因此,在强调翻译实践的同时,我们没有理由否定翻译理论的作用或忽视翻译理论的研究。参见“女性主义翻译观”“文化翻译观”“民族主义翻译观”“建构主义翻译观”

女性主义翻译观　feminist view on translation

亦称“女权主义”或“女权运动翻译观”,以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 theory)为理论基础,其思潮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至20世纪60～70年代,女权运动在整个西方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冲击着西方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语言,甚至穿着打扮。至80年代,后女性主义开始摒弃传统女性主义“男女平等”的概念,肯定并强调两性差异,认为性别角色的区别不在于自然的生理现象,而是人的行为模式。女性主义对翻译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1.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同属文化研究的范畴;2. 女性主义将语言作为自己文化身份的表现形式,“妇女解放必先语言解放”,女性主义和翻译理论都认为语言能够积极干预意义的创造,译者不仅仅是沟通两种语言的读者,同时也是重写并操纵文本者,运用语言干预文化;3. 女性主义关于性的若干课题与翻译研究的诸多本质问题有类似之处。

女性主义的翻译观否定传统翻译理论研究对于翻译与女性相关的象征性比喻、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以及翻译行为的政治色彩,强调女性翻译家与翻译的平等与叛逆,从而消解原本与译本、原作者与翻译家之间被人为建构起来的所谓“创造者”与“创造物”的传统歧视性翻译观。它否定传统的模仿论,主张翻译是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否定视原文高贵、译文卑贱的等级观念,提出原文-译文的共生关系;否定单一和绝对的意义,强调意义的丰富性和差异,并对翻译的标准以及译者的创造性提出独到的见解。它也受到一些批评:过于情绪化、宗派化、观念化,事实上太主观;过分强调语言游戏的政治影响,其观点对许多普通妇女来说过于超前,等等。但是,女性主义的翻译观仍给我们许多启示,例如淡化“可译性”“等值”“动态对等”等极端抽象问题的议论,不把翻译视为纯粹的语言操作,不盲目认可原文-译文、作者-译者的传统等级观念和意义的绝对性。女性主义的翻译观承认个人兴趣和需要,并将个体视为特定文化政治的产物,承认这些因素对个人的见解、观点以及翻译产生的影响,重视文化差异、语境以及特定历史环境中翻译的可能性与选择性。这都有助于深入思考许多传统翻译思想的合理性,开辟翻译研究的新思路。

文化翻译观　cultural view on translation

主要内容包括: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目的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但文化移植是一个过程;语言不是翻译的主要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把翻译置于文化的背景下考察,不难发现,文化对翻译过程的介入是永恒的。审美意识、政治倾向、伦理道德等跨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有着很大的影响。译者的增删变动,都是特定时空下文化制约的结果。从翻译的主旨是促进文化交流的观点出发,译作中出现的增删变动是可以理解的,有时也是必要的,其目的或者是为了使翻译更好地服务于本族文化,或者是为了更加顺利地达成文化交流。从发展的眼光看,那些“过于超前,脱离了现实,或者不符合我们的国情”的内容今天或许要作删节处理,明天在重译时或许可以补上,因为读者的文化视野开阔了,他们对这些内容的理解与接受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又如,归化与异化问题,主要涉及作品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文化移植是一致的,而归化则是移植的逆向运动。从译作的表现形式上看,应当承认,没有哪本译作是绝对归化或绝对异化的结果。不管译者朝哪个方向努力,其译作总是归化与异化的混合物。无论怎样归化的译作,它最起码总能反映异民族的风土人情,否则它就不足以称得上是翻译。

民族主义翻译观　ethnocentric view on translation

以本民族的文化来改造其他文化,不了解或不想了解其他现实世界与本民族文化有多么不同。在翻译中表现为处处按照目的语文化来塑造译文的形象或选定词句,把不适合于目的语文化规范的因素统统剔除在外。译法上多采用归化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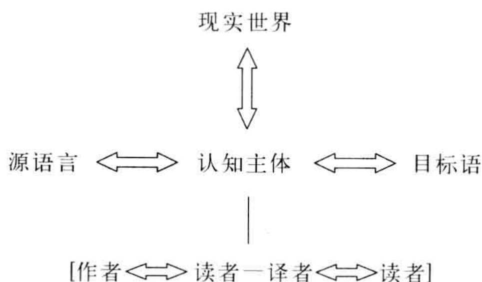
建构主义翻译观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on translation

是一种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建构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翻译研究观(吕俊,侯向群 2006)。吕俊在《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一书中,将我国翻译研究经历的过程根据研究范式的不同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前的语文学范式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以及90年代中期开始的解构主义范式阶段。他认为这三种范式都各有其优点和缺点,目前中国翻译学应该进入建构主义范式的翻译研究阶段。这是一种以哈贝马斯(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的研究范式,其理性基础是交往理性,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建构主义翻译学的提出实质上是为翻译学的发展提

出了一个方向，是一种重建性质(reconstruction)的研究。在这种范式下，能克服结构主义范式与解构主义范式的弊病，继承其优点，但并非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涉及哲学基础、理性基础、真理观、语言观等诸方面的重新思考。其特点表现为开放性、实践性、社会性，以及“主干清晰、多元丰富”的研究模式。开放性指的是这种研究从观念性文本走向现实的文本，即从人类交往实践的角度来考察和研究翻译活动，目的是促进文化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实践性指它终止了那种以思辨为特征的研究模式，开始走向现实生活；它不停留在宏观问题的探讨上，同时对翻译实践活动有具体的指导意义。社会性指翻译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一部分，应服务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它也受到社会规范和规则的制约。这种翻译学的研究模式以语言学为主干，多元丰富是该模式对与主干相关的诸因素与翻译关系的规律的研究。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这种研究模式可以看做是对于文化转向中语言学模式与文化模式之间冲突的一种解决方式，其观点是：翻译研究的中心和重心仍然应该是语言，但也涉及对诸多相关因素的研究(吕俊 2001a)。 （李林波，贺显斌）

翻译的认知观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 on translation

是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角度提出的一种翻译观：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其基础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现实与主体、主体与源语言、主体与目的语、读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包括古代语言)语篇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的语中映射转述出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同时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努力克服传统翻译理论因过于强调其中某一要素而留下的问题；译文应着力勾画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王寅在《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一文中将该观点归纳如下：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翻译具有六个特点：1. 翻译具有体验性，大致相通的思维形成了语言互译的认知基础；2. 翻译具有多重互动性，也是个不断进行语言对比的过程，需处理好与作者、读者、源语、目的语等所涉各方的关系；3. 认知具有差异性，翻译不可避免会打上主观性的烙印，必然会有一定的创造性；4. 翻译以语篇为基本层面，除了译出语篇的交际功能和语用意义外，应强调语篇层面上各类意义的映射性转述，因为选择不同的形式就表达了不同的意义；5. 交际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取得人际间的和谐协作，翻译也应以和谐为目标；6. 现实和认知世界是语篇生成的基础和词句反映的对象，翻译应尽量译出原作者和原作品对两个世界的认识和描述(王寅 2005b：17～18)。

翻译游戏　game of translation

指将翻译比作游戏，强调翻译既要遵守一定的规则，更要发挥个人的创造性的一种翻译观。戈尔里(Gorlée)(1994)在 *Semantics and the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ierce* 一书中指出，翻译可以被看做一种游戏，译者是游戏者。游戏包括一套固定的规则，但又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和技能。结果的不确定性是这种游戏的另一个特点，游戏者在作决定时总是带有冒险或赌博的成分。翻译语言游戏与交错图案智力游戏(the jigsaw puzzle)都要求技能和推理，都是启发式游戏，但翻译游戏具有更强的知识性，代表着智力训练的高级形式，具有更高的抽象水平。

把翻译看做一个探索性的、单个进行的、尝试和犯错误的语言游戏(a heuristic one-person trial-error language game)，其中的符号学模式受规则支配，同时，解释者又改变和创造规则，这样就把翻译变成了千变万化、永无止境、具有创造性技巧的游戏，就把翻译从它特有的抽象的语言属性中解放了出来，允许译者放手推理，把个人的创造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看法使我们重新找到了丢失在理性迷宫中的翻译里的游戏因素(郭建中 2000)。

翻译层次　levels of translation

许钧提出了翻译的层次观，认为翻译具有三种层次：1. 思维层次(level of thinking)。以往的翻译探讨中往往忽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两种系统各异的语言为什么可以进行转换。任何交换或转换活动都需要一个基础，翻译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是全人类性的思维共性，人类思维的共性构成了翻译的思维层次。2. 语义层次(semantic level)。翻译不可能囿于思维这一层次，首先，因为思维的实现需要语言，其次，从翻译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看，任何翻译活动都是两种不同系统的语言符号的转换，因此，翻译活动面临着另一任务，即如何按照不同语言符号来达意、传情。用一种语言符号传达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这便构成了翻译的语义层次。3. 审美层次(aesthetic level)。语言除了传情、达意之外，还有其美学职能，如文学语言，审美构成了其主要特征之一。因此，文学作品的翻译除了思维层次和语义层次的活动外，还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即审美层次，这就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层次。翻译活动在思维、语义、审美等各层次有着各自的活动内容、表现形式与传达目的等要素，这些要素自身的特征与活动规律及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不同，构成了翻译层次存在的客观性。许钧认为，对翻译的实质之所以

难以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中缺乏层次性的观点,对翻译活动的层次缺乏全面与客观的分析,争论各方站在不同层次上说话,从而影响了对问题的深入研究(许钧 1987)。

任何翻译从本质上看都是一致的,但不同类型、不同目的的翻译具有不同层次的要求,此外,还可以分出文化层次和专业层次。分别认识各翻译层次有助于认识不同层次的活动规律,从而有利于实际操作;综合考察所有翻译层次则有助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李林波)

文化层次 cultural level

文化层次是各类翻译的必要层次,是文学翻译的基本层次。语言文化特性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它牵涉到一种语言所代表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和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从翻译角度来说,这些因素不完全能从原文语义本身透射出来;往往要译者从原文语言包含的文化因素上作考察。《名利场》的大部分情节在英国展开,有了关于英国的文化地理知识,译者便可超脱词的本义,捕捉到文化背景信息。例如:

In a word, he went out and ate ices at a pastrycook's shop in Charing Cross; tried a new coat in Pall Mall, dropped in at the Old Slaughters', and called for Captain Cannon; ... 乔治先生在却林市场点心铺子里吃冰淇淋,再到帕尔莫尔大街试外套,又在斯洛德咖啡馆老店耽搁了一会,最后去拜访加能上尉……

Charing Cross, Pall Mall, the Old Slaughters' 是伦敦的三个地方,如果没有文化背景知识不可能补出"市场""大街""咖啡馆"之类的信息。王佐良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转引自杨自俭,刘学云 1994: 712)文化既是一个语言问题,又不是纯语言问题。翻译中的文化层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层次。 (蓝春)

专业层次 professional level

指从事文理各科翻译的必要的层次。语言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专业文献只有从专业角度去理解才能适得其所。除了内容的专门化之外,文献的程式、缩写词、非言词符号也是专门化的。所以纽马克(Newmark)(1988)在他的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中把专业文献翻译称为"专门化翻译"(specialized translation)。同一个词语,在专业层次上有时显示出它的不同表述,例如:

Remove the parts from quench salt and cool them in *still air* to room temperature.

把零件从淬火盐槽中取出,放在自然流动(或译"非强制流动")的空气中冷却至室温。

如把 still air 译成"静止的空气",在文学文体中或许可以,但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说,空气不会是静止的。所以,上例对 still 作了专业层次上的处理。不过,文学翻译也不能一概排斥专业层次,特别是与高科技有关的文学作品的翻译。 (蓝春)

美学层次 aesthetic level

翻译文学作品要达到美学层次。译者既要审美,又要表美。审美是表美的前提。只有识别原作的表美手段,领悟原作的美学特征,把握原作的艺术魅力所在,才能再现原作的美。

文学作品本身的美是多方面的,如思想美、意境美、结构美等。这些美的因素都必须借助语言方能得以表现。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艺术千变万化,语言表述多种多样,比如,诗歌、散文、小说尽管可以表现一个相同的主题,但由于各自的语言结构形式不同,给读者带来的美感效应也就各不相同。文学作品的美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语言美。许渊冲(1984)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把诗歌美归纳为意美、音美、形美。意美是思维和语义的表现美;音美是语符的音韵美;形美则是语符的形体美。可见,文学作品的美与思维、语义和语言符号的自身特点是密不可分的。对于译者来说,审美还不是目的,目的是再现原作的美。翻译中美的再现经常采取两种手段,即对应与重建。

语义层次 semantic level

翻译活动的基本的必不可少的层次。就翻译哲学而言,语言是第一性的,表现为声、形、义的结合,是物质现象;思维是第二性的,是大脑的属性,是精神现象。在翻译的语义层次上,译者要掌握词的意义和范围,既要弄清词的概念意义(理性意义),也要弄清词的附加色彩,如感情色彩、风格色彩和形象色彩等。在词义的选择中,努力做到传达两方面的意义。当两者不可兼得时,一般可遵循奈达(Nida)提出的原则:在信息的传达中,所指意义的传译应当居首位。在翻译的语义层次上,词——这个在语言中出现的最小独立语言单位——要服从于更大的语言单位,要联系整个话语、语段和句子的意义以确定它的意义。

思维层次 level of thinking

翻译活动的基础层次。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思维具有全人类性,不同民族具有共同的思维。翻译思维的先决条件是:译者至少必须掌握两种语言。语言在翻译中只是信息载体和转换工具,而思维才是翻译的基础。各民族所处的地理区域不同,感官涉及的思维空间不同,历史长河的渊源不同,民族文化不同,这就导致了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的不同。

在翻译的思维层次上,译者要了解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思维方式和不同思维角度的差异。思维的民族特征反映在其物质载体——语言上,就是语言的差异。在这一层次上,译者要辨清各概念的确切含义,要运用判断、推理的手段理清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把握原作者的思维逻辑在原作文字组合中潜在的决定性作用。对人类语言的研究表明,句子的各个单词和语段的每个句子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的组合受到人类共同的思维逻辑的制约。

翻译学　translat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汉语中"译学"之称,据说张之洞(1837～1909)最早使用。"翻译学"之名可能最早见于蒋翼振编著(1927年出版)的《翻译学通论》。该书为安庆圣保罗高级中学翻译学课程的讲义,其宗旨就是要引起我国译学界的浓厚兴趣。蒋翼振把翻译学定义为:"用乙国的文字或语言去叙述甲国的文字或语言;更将甲国的精微思想迁移到乙国的思想界里,不增不减本来的面目;更将两国或两国以上底学术作个比较研究,求两系或两系以上文明的化合,这个学术,叫作翻译学。"他认定翻译标准为:"艺术的真善问题就是对于原著者与读者肯负忠实的责任;译书美术的表现——译文雅俗共赏,字句生气勃勃。"他主张"翻译学是活的文学",不是"死的文学","当尽力创造一种新文体"(方梦之 2007a)。可见作者已有了较明确的学科思想、名称、定义和文学翻译标准。蒋翼振提出翻译学比西方早四五十年。艾伟1929年发表的《译学问题商榷》,吴曙天1932年编辑出版的《论翻译》,林语堂1933年发表的《论翻译》以及杨镇华的专著《翻译研究》和黄嘉德所编《翻译论集》等都论及了翻译和翻译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代表了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翻译理论的研究水平(陈福康 2000)。董秋斯1949年在《鲁迅与翻译》中提出了建立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问题,1951年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中认为"翻译是一种科学","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以遵循,并不完全靠天才或灵感"。他提出了理论建设的基础(方针):正确的科学方法,广泛的调查(考察各种语文的构造、特点和发展法则,各学科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各时代和各国家的翻译经验),深入的研究,还规划了翻译研究的目标(写成《中国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学》两部大书)、步骤和六项具体任务,并提出了翻译工作现代化问题(转引自罗新璋 1984:536～544)。此文标志着我国译学建设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由于轻视理论的学术传统的影响和译界理论意识和学科意识的匮乏,董秋斯的思想一直没引起学界,尤其是译界的共鸣,直到30年以后才逐步受到译界的关注。我国台湾学者张振玉1964年出版了《译学概论》。姜椿芳1986年提出了包含继承、借鉴、创造精神的译学建设的方针。较早提出翻译学建设性意见的还有下列学者:罗新璋(1983)提出了"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桂乾元(1986)把翻译学分为基础、应用、理论与发展四个构成部分;谭载喜(1987b, 1988)把其分成普通、特殊与应用三个构成部分;黄龙(1988)认为"翻译学是有一套完整体系和结构的研究翻译指导理论与实践规律及其实际应用的边缘科学";杨自俭(1989)说"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思维规律和方法的科学",并提出了翻译科学的研究对象、性质、三层次学科结构和建设的战略任务;刘宓庆(1990a)提出了重描写、重语义、重功能的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和翻译学学科构架的内外部两个系统。值得一提的还有1987年在青岛召开的我国首次翻译理论研讨会。这些理论与方法以及会议的交流都不同程度地对译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提高了译界的理论观念和学科意识,使中国译学研究由开创前阶段真正走上了开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国译学主要围绕着理论和实践(涉及科学与艺术)的关系、翻译学是否是梦两个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较多的争论文章集中在《中国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上海科技翻译》等刊物。整个90年代值得记载的主要成绩有: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在《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正式确定翻译学为三级学科(杨自俭1996年提出应是和语言、文学并列的一级学科);译学基础理论著作、中外翻译史、翻译理论史、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著作都陆续问世;学科建设的标准与要求已经提出;全国外语院系硕博点大都开始了翻译方向的学生培养。2001年青岛译学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标志着中国译学开始了独立建设阶段,研究者参照学科建设标准对学科系统展开了更加深广的研究,已经取得的主要成果有:提出了学科的深层理念(促进交流与进步和缩减矛盾与伤害);明确了学科建设五个支撑研究领域(传统译论继承性研究、外国译论借鉴性研究、译学现状探索性研究、相关学科吸融性研究、方法论多层次研究);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定位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学科有了独立的标志;学科理论的研究和建构已有多元趋向;学科价值系统的研究更加深广;人才培养有了本硕博教育系统;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已经开始(杨自俭 2002)。

翻译学在西方有下列几个名称:1. science of translation,最早出自奈达(Nida)(1964)的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一书中,目的是与仅把翻译看成为艺术或技术的倾向抗衡,主要用于讨论《圣经》翻译的研究方法。此术语多用于语言学派,如威尔斯(Wilss)(1977; 1982)把翻译科学分为普通、描写与应用三部分。2. 波波维奇(Popovič)(1976)和纽马克(Newmark)(1981/1988)等把 translation theory 当做学科名称。3. translatology 是法国戈芬(Goffin)(1971)提出的,为加拿大、德国、丹麦等国学者所用,以霍姆斯(Holmes)和皮姆(Pym)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它和哈里斯(Harris)(1977)创造的 traductology 一样为笨拙的新造词。4. 在英语中较多的人使用科学味较弱的 translation studies,并把它确定为学科名称,理由来自霍姆斯的名文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他认为这个名称比"科学"和"理论"等名称更能为翻译研究提供尝试性、开放性的空间;再就是调控派(Manipulation School)喜用这个术语,误认为它专指文学翻译及其译本的研究。霍姆斯把翻译研究(TS)构建为如下的系统:纯理论研究(PTS)和应用研究(ATS),前者分为理论研究(TTS)和描写研究(DTS),理论研究又分两部分,描写研究又分三部分;后者分译者培养(TT)、翻译辅助(TA)、翻译批评(TC);而后他在系统外补充了理论史、描写与应用研究史、方法论或元理论几个重要部分(Holmes 1972/2000)。巴斯内特(Bassnett 1980/

1991)把翻译研究分为翻译史、目的语取向的翻译、翻译和语言学、翻译和诗学四部分。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在努力用这个学科名称统一调控派和科学派的兴趣点与关注点，她主张翻译研究应涵盖文学和一切非文学翻译领域(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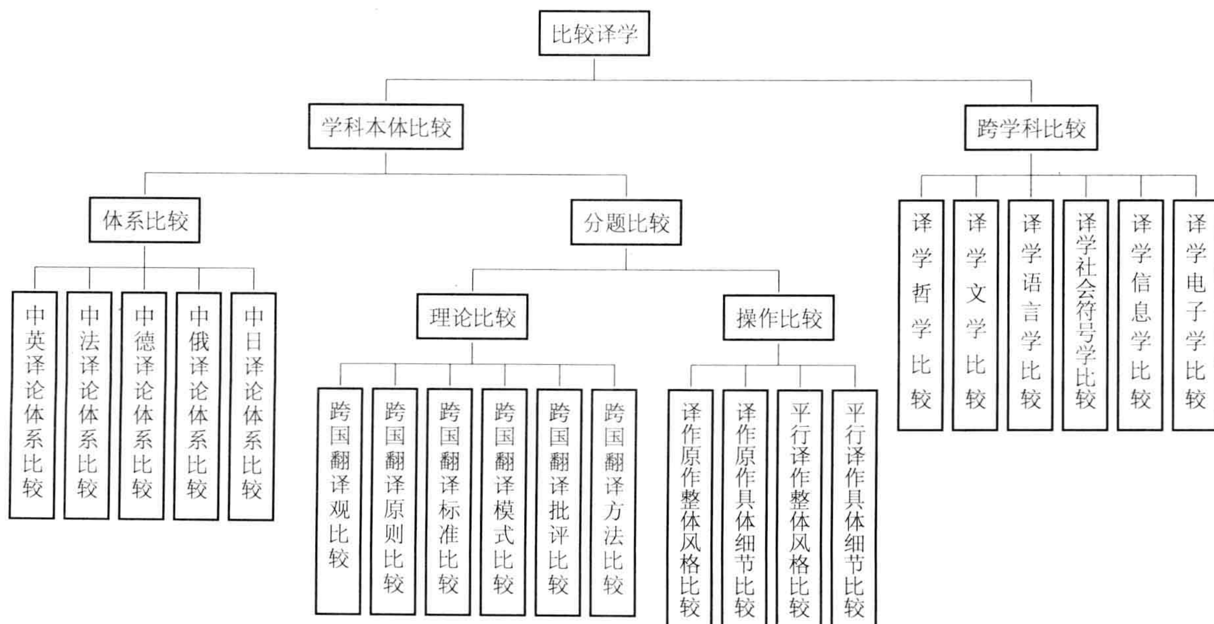
翻译及其研究虽然如此复杂(主要由于它的跨学科性、译者与研究者的主观性和研究的经验性)，但中外学者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批评了单纯重经验、重技术的观念，提高了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意识，对翻译理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和多学科的探讨，对学科系统的建构作了多元的尝试，两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在此基础上，我们对翻译学作一个这样新的界定：翻译学以翻译全过程(包括客观世界[自然、社会、思维]、原文作者、原文、原文读者、译者、翻译过程、译文、译文读者[即译文影响等])以及翻译史、译论史与方法论为研究对象，以促进交流与进步和缩减矛盾与伤害为深层理念，既重视理论的普遍性研究，也重视理论的应用性研究(包括翻译实践、翻译批评与人才培养)，是一门独立的、开放性的、综合型的人文社会科学。翻译学学科有广狭两个系统，前者叫学科制度系统，包括学科深层理念、学科规范体系、学科管理与法律系统；后者就是学科规范体系，按距实践远近和抽象程度高低依次包括元理论、翻译哲学、译学理论、策略系统、方法技巧等五个子系统。 (杨自俭)

翻译学的元理论 metathe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是以翻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即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审视翻译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哲学基础以及它们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元理论研究产生于系统科学和形式化方法之后，把一门学科的研究分出不同层次，站在上一层次来考察、研究和表述较低层次的性质。元理论研究的锋芒对准对象理论的研究对象、性质、根基及其正当性和适用性等，目的是把对象理论置于确定、可靠的基础上，从而对其作不断调整和修正，发现新的生长点，使理论更有效、更完善。一个学科的重大变革首先是元理论层面的变革。

比较翻译学 compara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是对译学本体的有关问题进行纵向比较和对译学与其他学科进行横向比较的分支学科。它涵盖两个内容：一方面，它是指对不同翻译传统、不同译论体系中出现的翻译思想、理论以及翻译方法、技巧等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它也包括对翻译学与其他学科(诸如文学、哲学、语言学、自然科学等)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前者与译学本身直接相关，因此是比较译学的主体，其基本目的有三：1. 定位，即通过比较，使人们对各个国别译论体系或分支体系在整个人类译论发展史上的相应位置、对它们各自的价值和它们对人类译论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对翻译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等有正确的了解和定位；2. 认知，即通过比较，使人们对人类翻译理论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抽象性与实用性等有充分的认识；3. 实用，即通过比较，使人们从不同译论传统和译论体系中获得启示和启发，经过甄别、筛选，把异族翻译理论、思想和方法中的有益养分消化、吸收到本族翻译实践当中来，从而更好地制定翻译的准则，厘定翻译的标准，提高翻译的质量。谭载喜提出的比较译学的构架见下图：



比较译学研究范围图

生态翻译学　eco-translatology

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科学。随着人类对生物与环境逻辑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现代生态学扩展到了研究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逻辑关系。而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更进一步使生态学逐步脱离生物学领域,上升到了对人类与自然界之间本质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一词则已转义,指自然健康、保持平衡与和谐共生的集合。生态学视角的各科各类研究,如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生态语言学、生态社会学、生态经济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展。(参阅 Gabbard 2000; Verschueren 2000; Fill 2001; Mühlhaüsler 2003;范俊军 2005;刘仁胜 2007 等)

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里,取生态之要义,喻翻译之整体,基翻译之实际,在相关研究中形成了"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系统""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等一系列术语和概念,从而使得"生态翻译学"呼之欲出。

对于翻译研究来说,生态翻译学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所谓"喻指",指的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所谓"实指",指的是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换句话说,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视角来改写翻译本体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

可以看出,"生态翻译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而可以理解为一种"翻译研究的生态学途径"(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或者"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事实上,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科学理论观念,作为新的方法论支配着普遍的社会思维方式。在当代,"生态科学"正是这样一门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学科,也是一门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终极意义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研究有着扎实的哲学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当然,生态翻译学目前尚处于理论探索和初创的过程之中,还需要不断地丰富和拓展。参见"翻译适应选择论""生态转向"

（胡庚申）

玄翻译学　metatranslatology

指关于翻译理论的理论,或指翻译哲学(a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theories)。玄翻译学是纯哲学性的(metaphysical),意在说明何种术语在理论上是有效的,应按照什么步骤、遵循什么规则才能提出一个术语,对一种翻译现象加以概括。它重理论的形成过程而不是理论本身,用以解释、评估或解构普通翻译理论。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1. 翻译作为一种人类行为的本质;2. 明确翻译理论术语的内涵;3. 翻译批评规范;4. 建构翻译理论的可能性;5. 翻译理论家必须遵循的总的原则(metaprinciples);6. 翻译理论有效性的评价机制;7. 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译者与译作,以及翻译与社会、文化、经济和个人因素等之间的关系。(辜正坤 2002)

纯翻译学　pure translation studies

霍姆斯(Holmes)译学路线图中的主类之一,与应用翻译学相对,包括描写翻译学和理论翻译学两大部分。参见"应用翻译学""描写翻译学"

应用翻译学　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霍姆斯(Holmes)提出的研究领域,与纯翻译学(pure translation studies)(包括理论翻译研究及描写翻译研究)相对,分为四个次范畴:1. 译者培训;2. 提供翻译工具(包括词典和术语工具书,以及专门为满足译者需要而编写的语法书等);3. 制定翻译政策;4. 翻译批评(1988: 78)。

威尔斯(Wilss)认为,应用翻译科学(applied science of translation)本质上具有语对特征(Wilss 1982: 20),把错误分析、翻译批评、翻译教学和翻译困难研究列为四个主要范围(1982: 159)。

"应用翻译学"也是我国学者对翻译学的分类之一,与普通翻译学和特殊翻译学并列,将两者的理论运用于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工具书的编纂和机器翻译等,从微观上对翻译的目的、功能、标准、程序和方法等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说明,以使普通译学理论和特殊译学理论在实际运用中得到检验。

企业翻译学　translation studies for enterprises

由刘先刚于1992年提出,是以企业翻译活动的内在规律性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企业翻译学所研究的客观实体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翻译活动所组成的企业翻译活动体系,在于企业活动和翻译活动的内在联系。事实上,企业活动和翻译活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企业活动的扩大和缩小,企业经营的好坏,企业政策的变更,无不制约和推动企业翻译活动体系的发展;另一方面,翻译活动的发展规模,质量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现状和前景,两种活动自然而然地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具体而言,企业翻译学以企业翻译活动体系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是企业范围内围绕翻译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口笔译实践、翻译队伍建设和统筹管理所形成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翻译活动。企业翻译学带有明显的应用翻译学的性质。下列研究对象构成了这一学科的主要内容:

1. 企业翻译的历史,包括企业翻译的产生及其发展历史、企业翻译理论史等;2. 企业翻译的概况,包括企业翻译的性质、赖以生存的条件、服务宗旨和服务对象、人员构成、分布状况及活动范围等;3. 企

业翻译的特点、变化和发展规律；4. 企业翻译理论体系，包括翻译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和技巧、原则和标准、翻译程序、翻译评估和翻译教学法等；5. 企业翻译的研究范围和企业翻译学内外部框架的建立与完善；6. 企业翻译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包括企业翻译的全国联网管理，企业翻译工作和队伍的全国性统筹或协调管理，欠缺翻译人员的调剂补充，富余企业翻译人员的去向安排，翻译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维护和提高等；7. 企业翻译工作者应具备的条件，人员素质的调整和提高，定期业务进修和培训，翻译学院和高级或专门翻译研讨班、讲习班或培训班的建立和创办等；8. 企业翻译对企业文化的形成、企业科技进步和外向型经济的影响；9. 企业翻译学和翻译学、科技翻译学等的关系，包括翻译学和科技翻译学对企业翻译学的影响和推动，企业翻译学的发展对翻译学和科技翻译学的演进和贡献；10. 全国性企业翻译研究会的建立，企业翻译研究机构的设立，企业翻译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等。（刘先刚 1992a）

特殊翻译学 special translation studies

主要研究两种具体语言的互译问题；涉及两种语言和文化对比，提出能指导两种具体语言互译的理论。各语系、语种间的翻译方法和模式有异。例如，在语言表达特点上，汉语重意，英、德、法等印欧语重形。其中，对等翻译理论来自西方，更适合于印欧语系中的双语对译。有人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实际上带有特殊翻译学的性质。

描写翻译学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是针对过去西方译学强调原文跟译文的对等关系，而忽视译文跟目的语读者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而提出来的。1972年，霍姆斯（Holmes）在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的论文《译学之名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被认为是描写译学的发轫。描写译学认为，译文的基本功能是给掌握目的语的读者提供信息，它要符合目的语的规范，也要符合目的语读者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背景。译文要忠实于原文，更要忠实于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读者，否则就失去了译文应有的功能。从这一点出发，译作是目的语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反过来又对目的语社会的语言和文化产生影响。因此，描写译学主张翻译研究要注重译者与目的语读者之间的关系，注重译文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注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和译文的独立价值与功能。在方法论上，描写译学主张以经验方法来作研究，并使之成为一门经验学科。经验方法的基础是“观察、描写、解释”。翻译过程、译作以及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都是客观现象。客观地观察和描写这些现象，以期建立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原则和参数体系，正是描写译学的目标。以色列学者图里（Toury）因其力作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而成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

普通翻译学 general translation studies

主要研究人类语言、文化及其翻译的一般规律，研究翻译的一般过程和翻译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宏观上探讨翻译的性质、功能、标准以及译者的一般职责和条件等问题，并从历时和共时翻译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的历史，其中不仅包括翻译的国别史、地域史，而且更应包括翻译的世界史。

翻译学的学科性质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影响，以及语言学模式翻译研究的发展，许多研究者都将翻译研究划归于应用语言学（参阅董宗杰1984；桂乾元 1986；刘宓庆 1990a）。在翻译学被归入应用语言学的同时，文艺学派一般把其归入比较文学。巴斯内特（Bassnett）却认为，现在应该反过来了，比较文学应该是翻译学下属的一个分支。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翻译研究者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大多研究者都认为翻译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如谭载喜（1982c）认为翻译学属于比较语言学，在1988年的《试论翻译学》一文中认为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或多边缘的交叉学科，2001年，他又在《翻译学：新世纪的思索——从译学否定论的“梦”字诀说起》一文中认为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

关于翻译学学科性质是综合性还是边缘性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不加区分地认为边缘性和综合性都是指翻译学涉及的学科范围广，强调的都是它的跨学科性质。但吕俊（2001b）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运用学科学的理论对综合性学科、横向学科、交叉学科等作了区分，认为“综合”就是翻译学的学科性质，不能因为翻译学用了某一学科的知识就被划入该学科，并认为综合学科的出现代表了目前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此外，对于翻译学应该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观点分歧较多，有的认为翻译学主要是人文科学，有的认为它具有更明显的社会科学特征，还有的认为二者兼有。如黄振定（1999）认为“翻译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王宏印（2003b）认为翻译学是一门“人文社科综合性的独立学科”。总之，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是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独立的、兼有人文与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

（李林波）

翻译学的理论建设途径 approach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y

王宏印认为，中国现代译论的诞生不外乎下列几条途径：1. 西学为主的理论路径，尤其是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学科

和理论流派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关键是要落实到对于翻译基本问题的译学思考，以便和国际译学对话。2. 国学为主的译论路径，尤其适合于文学艺术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实践的指导。只有追根溯源的扎实研究和向着建立现代译论的阐释和转变，才是国学研究的必由之路。3. 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路径，这可以说是一条比较能够兼容并包的路径，但关键在于结合得好。归根结底，需以长期的理论探索和坚实的中西学术为基础，问题抓得准确，方法也要得当，才能避免理论形态上的不伦不类和研究效果上的不疼不痒，真正于新的译学有所建树。

国内关于建立翻译学的讨论，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各种理论的和实践的努力的背后，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两种翻译学的概念：一种是普遍的、科学的翻译学，即不分国别和语种的翻译学；一种是不那么科学的、比较具体的翻译学，它可以按照不同的语种和国别而冠名，如称为"中国翻译学"或者"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等等。承认这一基本的认识上的分野，就意味着两种说法各有道理，并有并存的必要。具体而言，前者认为：既然翻译学是一门科学，科学又是研究普遍的必然的知识体系的，那么，翻译学就不应该是分国别和语种的，而应当是普遍适用的和带有原理性质的，不应强调各语种的特点或某一国家的学术传统和理论特色；后者(国学派，例如刘宓庆)认为，这种普遍的科学的翻译学固然很好，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实现，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根据汉语的特点和汉外互译的特点做一些描写性的、对策性的、语际对比性的理论研究工作，以此为翻译学的建设作一点贡献。

实际上，上述两种意义上的翻译学至少作为观念形态是存在的。理想的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理应是普遍适用的、具有终极目标性质的纯理论体系，如同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的形而上学所已经达到的程度。然而，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上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所做的一种努力(王宏印 2003b)。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简称传统译论)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这里的认识基础包括下列命题：1. 翻译学在本质上应当是理论的，即便这种理论包含对于实践的各种关系，比如，对于以往的翻译活动作出正确的理论说明，或者为今后的翻译实践提供必要的指导原则；2. 在中国现代译论建立以前(甚至以后)，我们不妨在传统译论中寻找它的理论源泉，并把形成中的中国现代译论视为中国传统译论的一个合乎历史和合乎逻辑的发展；3. 这种发展不可能是由传统译论自然而然地长入现代译论，而应当做一番人为的转换或转化工作。为了实现这个转化，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现代诠释。鉴于近代学者已经有了一些局部的、有限的诠释工作，我们要做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系统的重新诠释。相信成功而有效的现代诠释会促进中国现代译论的诞生和发展，乃至于中国翻译学的建立和完善，从而为普遍翻译学的建立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 (王宏印)

翻译学途径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学途径由谭载喜在《翻译学》(2000a)一书中提出。他认为进行翻译研究最基本的途径有：1. 文艺学途径；2. 语言学途径；3. 交际学途径；4. 社会符号学途径；5. 翻译学途径。前四种是翻译研究传统的研究模式，而"翻译学途径"则是谭载喜的提法。他认为翻译学途径主要的特点是高度的综合性、描写性、开放性和灵活性。其着眼点为：1. 进行多层面的对比；2. 提出多层次的标准；3. 建立多功能的模式。翻译学途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综合性，这种途径下的翻译研究应从多层面、多元角度展开，旨在避免翻译研究的片面性。翻译学途径与语言学途径、文艺学途径、交际学途径、社会符号学途径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能提供多功能的理论模式，而后面几种途径均只能提供单功能的理论模式。翻译学途径综合其他各种途径的特点，建立普通翻译学、特殊(或具体)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理论模式中包括翻译的普遍规律总结、特殊规律的总结和具体方法的总结。普遍规律涉及一切人类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翻译的一般原理，构成翻译理论的基本模式；特殊规律涉及具体的两种语言，解释具体双语的转换过程，检验基本模式的科学性，并不断使之完善；具体翻译方法是译学研究、特别是译者所关心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产生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根据已经上升为理论的翻译规律而提出，另一个是通过翻译实践，从经验中总结出来。而这些方法的具体运用，又在各个层次上受着翻译标准的制约。谭载喜认为，翻译学途径所要建立的理论模式，是一个综合性的、因而是多功能的模式，它既具语言学模式的特征，又有文艺学、交际学、社会符号学以及其他相关科学的特征，因此它的适用范围广，使用功效高，是翻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据谭载喜 2000a：40～53) (李林波)

翻译适应选择论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从"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视角解读翻译过程的理论，认为翻译就是译者的适应与译者的选择。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译者"适应"的是原文、源语和目的语所呈现的"世界"(即翻译生态环境)；译者"选择"的是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度和对译本最终的行文。如果运用等式表达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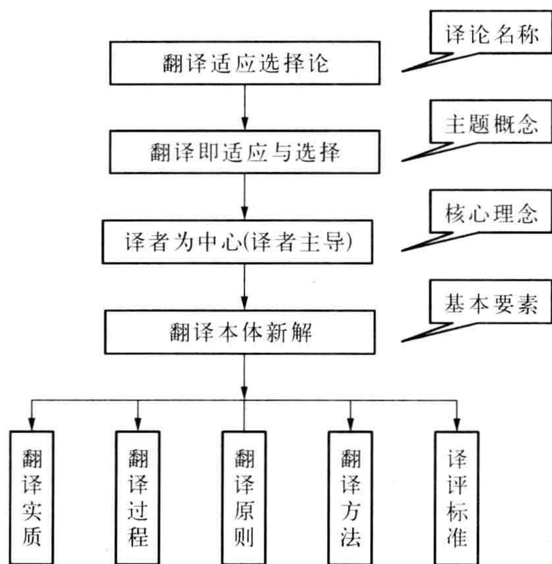
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对原文、源语和目的语

所呈现的“世界”,即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译者的选择(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程度的“选择”与对译本最终行文的“选择”)

简化一点的表达式是: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译者的选择

最简化的表达式是:翻译=适应+选择

总的来说,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译论架构(见下图)。



总之,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译评标准是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认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 (胡庚申)

翻译即适应选择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作为一项宏观翻译理论,把适应选择的人类行为引入翻译活动,并寻求“求存择优”自然法则的适用性和关联性。该论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揭示了“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选择行为的相互关系、相关机理、基本特征和规律,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解读。该论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为基调,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源语和目的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适应选择论运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提出了译者“自我适应”的适应机制和“事后追惩”的制约机制。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本体的解释是:1. 翻译的实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2. 翻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3. 翻译的原则是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4. 翻译的方法是“三维”转换;5. 译评的标准是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以及译者素质,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翻译适应选择论由中国学者胡庚申在国际和国内首次提出。参见“生态翻译学”“生态转向” (胡庚申)

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

亦称“适者生存”,来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适应/选择”学说。这一学说的实质是:任何生命体都具有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生命体只有适应了自然环境才能生存和繁衍;或者说,任何生命体的生存和繁衍都是接受自然的选择、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生命体适应自然环境的基本规律是:汰弱留强,适者生存。这就是适应、生存的自然法则。所谓“自然选择”,简单地说,就是生命体要“适应”自然环境,要接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再简单一点,“选择”就是能“支配”,“适应”就是受“制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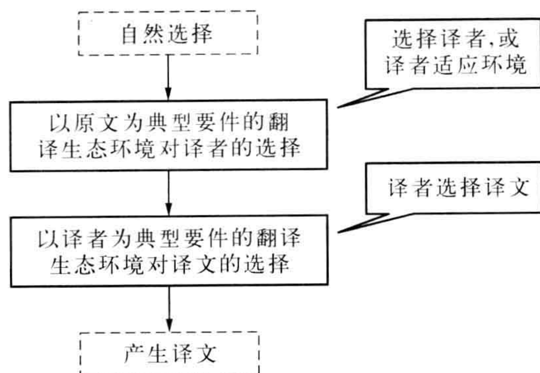
将“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运用到翻译中去就是:译者(译品)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根据这一基本原理,我们便可以对译者产生译文的翻译过程作出如下的解释:

译文的产生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自然”选择译者和“自然”选择译文(见下页图)。这里所说的“自然”指的是“翻译生态环境”;而“翻译生态环境”则指的是原文、源语和目的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

根据“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在第一个“自然”选择译者的阶段里,重点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同时,这个阶段也可以看做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即译者适应。在第二个“自然”选择译文的阶段里,重点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换句话说,这个阶段就是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选择,而选择的结果就产生了译文。

在上述运用“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对翻译过程进行的解释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是译者。由于第一个阶段的翻译生态环境是“选择译者”,因此这一阶段中的翻译生态环境是不包括译者的。但是,在第二个阶段里,由于译者的状态发生了变化,这时的译者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指的“译者”(*a* translator),而已经是一个“接受了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或者说是一个“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的”、特定的“译者”(*the* translator)。因此,这时的译者就不仅仅是能够产生译文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一般成员,而是已经成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典型要件”,可以说已经能够体现以至代表翻译生态环境来实施对译文的选择。可以看出,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

从“自然选择”视角来看,产生译文的翻译过程图示如下:



（胡庚申）

译有所为　doing things with translations

含义有二：1. 翻译出来的东西可以做事情（侧重客观效果）；2. 运用翻译可以做事情（侧重主观能动）。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行为，译者的"译有所为"可以"为"在语言创新，"为"在交际沟通，"为"在文化渐进，"为"在社会变革，"为"在文明积淀，也可以"为"在译学发展。同时，清楚认识"译有所为"的功能和实质，译者便有可能更自觉地、能动地运用翻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胡庚申）

汰弱留强　preservation of the strong and elimination of the weak

此法则在生物界和翻译界之间有一定的区别：自然界里的物种（动物和植物）适应自然环境、接受"自然选择"的"淘汰"是绝对的，是生物物种意义上的"绝迹""消失""灭绝"，例如恐龙的灭绝、南极狼的绝迹、种子蕨的消失，等等；而翻译界里译者/译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接受翻译生态环境选择的"淘汰"则是相对的，是人类行为意义上的"失意""落选""舍去""取代""未中""失落"等。这就是说，翻译活动中译者/译品的所谓"适"或"不适"、"强"或"弱"，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同时，不同的译本（文），由于它们适应了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读者对象，因而又有可能共生共存。

运用"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来解释译者产生译文的翻译过程，翻译就可以视为译者的适应和译者的选择活动。同时，对于翻译过程来说，只有译者和译文才需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而翻译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译品是译者价值的体现，译者的"生存"质量或"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生产的译品。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和译品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译者和译品在"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法则面前，利害一致。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可以说，译者和译品共同遵循着"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视角来看，翻译就是译者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被翻译生态环境因素所左右的选择活动。这样的选择发生在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存在于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出现在翻译转换的各个层次。这种选择背后的机制和动机，就正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胡庚申）

翻译伦理　translation ethics

在语文学阶段，伦理曾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议题，人们不停地要求译作忠实于原作，要求译者有克己意识，用主仆来描述作者和译者的关系。语言学译论把关注的焦点从"应该忠实"转移到"如何忠实"，伦理问题退居次要位置。进入文化研究阶段，翻译又回归到对各种伦理问题的讨论，贝尔曼（Berman）和韦努蒂（Venuti）等学者关注文化霸权和交流的不平等，强调在翻译中保存原作的异域文化成分。此外，韦努蒂还注意到译者的隐形问题以及译者在经济待遇和知识产权法上的不公正，对译者的地位和合法权益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The Translator* 杂志 2001 年出版了一期"回归伦理问题"的专辑。

切斯特曼（Chesterman）（1995：147～157）也对翻译伦理做过深入研究。不过，他认为，翻译伦理应建立在价值而不是职责或权利的基础上，并区分了四种翻译伦理：明晰（clarity）、真诚（truth）、信任（trust）和了解（understanding），分别指称译文的质量，原作与译作的关系，译者与作者、发起人和读者的关系，以及翻译的目的。这四条伦理与他提出的期望规范（expectancy norm）、关系规范（relation norm）、交际规范（communication norm）和义务规范（accountability norm）密切相关。切斯特曼（2001：139～154）后来对这些说法做了修订，改为"再现的伦理、服务的伦理、交际的伦理和基于规范的伦理"四种。"再现的伦理"回溯到了忠实译者的理想状态以及神圣文本的翻译，要求准确地再现原作及原作者的意图，做到不增不减不改，突显翻译的忠实与真实。"服务的伦理"将翻译视为一种商业服务，要求翻译最终要符合客户要求，实现由委托人与译者共同商定的目标。"交际的伦理"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而不是对其他文化的描述，跨文化交际的目标在于由合作带来互利，翻译的伦理目标是使双方进一步进行跨文化的合作，译者应忠实于自己的职业，促成跨文化交际。"基于规范的伦理"得益于描述型翻译研究和规范理论，目的语文化中的规范代表了当时目的语文化对于译作的期待，译者道德是符合规范，满足特定文化的期待。（据康培 2006）（贺显斌）

翻译伦理学　translation ethics

研究一般伦理学原则在翻译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分为描写性研究路径和规定性研究路径。翻译伦理学认为译者应该对原文作者、译文读者以及译文的质量负责，应该尽量赢得翻译交际中其他各方的信任；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两种民族文化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可以说，正确地理解、阐释、传达原文的意义是

翻译的"常态",是翻译的主要本质特征,而翻译中的"误读""改写"(按一般理解的意义)是翻译的"非常态",是翻译的次要特征。

翻译伦理学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宏观伦理和微观伦理。宏观翻译伦理探讨译者与现实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涉及译者在社会中的角色及其权利、责任和义务、译者的工作条件、译者与赞助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翻译行为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微观翻译伦理探讨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涉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文本操纵行为以及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等。宏观翻译伦理与微观翻译伦理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切斯特曼(Chesterman 2001: 139~154)提出了四种伦理模式:再现的伦理、规范的伦理、交际的伦理和服务的伦理。其中前两者属微观伦理,而后两者属宏观伦理。

翻译伦理学有两个研究焦点:译者个人的素质修养与社会公共生活中翻译各行为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及其秩序。再现伦理模式关注的是译者个人的素质修养,而其他三种模式关注的则是职业译者这个社会群体应该遵循怎样的职业程序规范以及如何协调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等问题。

目前,翻译伦理研究所借助的伦理学方法有:功利主义伦理(utilitarian ethics)和契约伦理(contract ethics)。功利主义伦理通过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判断其合理性,在翻译中体现为:产生最佳翻译效果的行为就是合乎伦理的行为。契约伦理则研究利益共同体的成员们为了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而相互平等地放弃、转让以及承诺其自然权利的过程,运用到翻译中表现为:翻译行为各方对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翻译行为达成一致的意见,对译者的义务、权利、责任和职业规范作出明确的限定与表述。总体而言,再现模式与交际模式运用的主要是功利主义伦理方法,而服务模式与规范模式运用的则是契约伦理方法。(据王莉娜 2008)参见"翻译伦理"

翻译诗学 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诗学是一种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翻译诗学指文学体系的体裁、主题和文学手段等构造要素在翻译中的集合。在翻译研究中,"翻译诗学"也可指一个文学系统在更大的社会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与其他文学或符号系统的互动关系,其研究对象是源语文本诗学与目的语文本诗学的关系。传统的翻译研究的出发点是,一种诗学形式只能在其自己的语言框架中存在,翻译的任务是以相似的形式重现原文的意义,实现对原作的忠实。现在的翻译学者既共时又历时地观察翻译中的诗学手段,译者们倾向于使译文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诗学形式,以使译作得到更好的理解和接受。雅各布森(Jakobson)、列维(Levý)等捷克学者和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学者们对语言中的诗学手段作了极为系统的探讨,而伊文-佐哈(Even-Zohar)等人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则对翻译学者分析文学以外的因素对单个译者的诗学选择的影响帮助很大(Baker 1998: 167~168)。

翻译的窘境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原为韦努蒂(Venuti)(1998b)的一本书名,指由于翻译界内部认识的不一致和其他学科与社会力量对翻译的打压导致翻译所处的边缘地位。韦努蒂认为,翻译作为一种书写形式受尽了耻辱:版权法限制它,学术界轻视它,出版商和公司、政府、宗教组织剥削它。作者是原创而译者只是在模仿原作的观念使学术界只注重翻译的准确性,而忽视翻译传播文学价值的作用,对原创的盲目崇拜限制了翻译的发展道路。现行的版权法无视译者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实际上造成了原作者特别是出版商对译者的经济剥削。教师利用翻译作品讲授文学、哲学等外国的思想和观念,哲学界以翻译作品作为研究的资料来源,同时又把翻译看做隐形的行为,无视这一行为对原作思想的改变和所带入的本土文化价值观念,使得翻译在学术上不受重视。韦努蒂对翻译的社会文化层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表面上看是为翻译的社会地位鸣不平,实质上是要解构原作的中心地位,重构无中心或多中心的话语体系,倡导文化交流的平等。(据邓红风,王莉莉 2003) (贺显斌)

翻译科学 science of translation

由奈达(Nida)在他的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1964)一书中最早提出。他受乔姆斯基(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采用语言科学的原则和方法,以实证的态度来研究翻译过程,忽略翻译工作中的非科学化的其他层面(例如艺术性、直觉等)。20 世纪 60 年代,奈达曾是翻译科学的倡导者。他提出这个术语,是为了与那种只把翻译看做艺术或技术的倾向抗衡。奈达认为,翻译过程"经得起严格描写的检验","信息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可以做出科学描述的有效课题"(Nida 1964: 3)。但奈达并未将这个术语用到所有对翻译进行严格研究的类型中,而只用于他提出的翻译过程的三段模式"分析-转移-重组"中。

德国翻译界也长期主张把翻译研究工作称作翻译科学(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但德国学者的"翻译科学"具有跨学科性,除主要为语言学之外还包括交际理论、文化研究等,代表人物为威尔斯(Wilss),其代表作为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 and Method*.(1977 年德文本,1982 年英译本)。

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与英美习惯所称的"翻译理论"、德语国家所称的"翻译科学"同义。英文对应词中的"研究"(studies)用复数,暗示着一种多元化的研究,即翻译研究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学科。起先,

荷兰、比利时等低地国家把"翻译研究"作为学科名称，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翻译教授霍姆斯(Holmes)(1972)在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一文中首先提出，包括三个分支：1. 负责描写现实世界里的翻译现象的"描写分支"；2. 负责确立可以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分支"；3. 负责将从描写分支和理论分支中得到的知识应用于翻译实践和教学的"应用分支"。霍姆斯试图用这一术语来概括整个翻译学科。巴斯内特(Bassnett)按照类似的思路将翻译研究归为四大类：翻译史、目的语取向的翻译、翻译与语言学、翻译与诗歌。近些年来，国内外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将翻译研究当作涵盖整个翻译学的名称。

翻译研究的民族性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指翻译理论或翻译研究中的国别特色。它与翻译的科学与艺术之争有一定的联系，论争的焦点是：翻译理论是否具有民族性？就中国译界而言，是否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

1984 年，罗新璋提出，把外文译成中文，两种语言不同，文化传统不一，适合于彼国的翻译理论未必就切合我国的翻译实际。翻译理论对不同国家不会都是"等值的"。生搬硬套，往往格格不入。他还认为，"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的努力，已经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罗新璋 1984：17～18)。沈宝基、余协斌认为，文学翻译必然具有民族性，理由是：1. 翻译毕竟属于人文科学范畴，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不分地域、民族，放之四海而皆准；2. 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不能脱离本国国情和民族的实际需要，它具有鲜明的目的性；每个民族的文学作品无不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色和风格(沈宝基，余协斌 1994)。

但反对者的声音也不小。一种观点认为，翻译既然是科学，而科学是不分国界、民族的，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等口号，可能令我们的译学研究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泥淖(谭载喜 1995：4)。不应过分夸大中国翻译研究的"自成体系"和"特色"，否则，只会限制我们自己的研究视野。中国翻译界应该而且能够通过与世界译学各体系的互动找到并确立自己的定位(朱纯深 2000b)。

"共性派"与"特色派"之争目前难分仲伯，将来也未必会有定论。参见"'特色派'与'共性派'" (文晔)

多重转向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的专著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2006)所用的术语。该书是作者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特别是近 30 年来翻译理论突破性进展所作的分析。多重转向的实际意思是在不同时期中翻译理论研究在其范式、途径、主要内容等方面的多次重点转移。例如，20 世纪 50～60 年代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以及后来语言学领域内的语用学转向，80 年代的文化转向，包括描述翻译研究派(亦称调控学派)、德国功能目的论派、赫尔兹-曼塔里(Holz-Mänttäri)的行动论和翻译的解构理论。到了 90 年代，出现了"超越语言"的跨学科的翻译理论，包括图里(Toury)的翻译规范论和切斯特曼(Chesterman)的密姆论和伦理观，非言语交际与翻译研究的关系以及多模式文本的翻译研究。口译研究从翻译研究中独立出来。20 世纪 90 年代，另一个转向是全球化转向，即对信息技术普及后译者工作状态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实证研究的转向。进入 21 世纪后，语言学研究方法重又兴起，等值、原型语义学、翻译语料库、翻译普遍性又成了翻译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形成了一个所谓的 U 字形转向(U-turn)。(参阅张莹 2007) (张顺梅)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

亦称"后殖民主义学派"或"政治学派"。曾是将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联系起来的重要派别。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翻译中"文化转向"和对文化的深入研究，到了 90 年代，文化研究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最后发展成"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理论。如果说，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关心的还只是文化的一般问题的话，后殖民主义关心的则是政治、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与当代文化理论中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该理论从原殖民地文化出发，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后殖民翻译理论把翻译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探讨"弱小民族"语言的文本被翻译到"强大民族"的语言时，译者因意识形态、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而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从后殖民主义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历史实践中，从前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中，以及从对种族与文化历史中所谓"他者"表述的强调中，该理论探讨翻译与殖民主义以及西方文化霸权之间的吊诡关系及其表述方式，从而揭露并消解西方形而上学话语的历史局限性。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对于正确认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间因文化权力关系的不平衡而造成的翻译流量的巨大反差、翻译文本与翻译标准的取舍以及翻译策略的最终确定具有参照价值。

作为文化学家，英国巴斯内特(Bassnett)的后期理论已显示出后殖民主义的色彩，她出版了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1999)等著作。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还包括一批出生在原殖民地而后在宗主国受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如印度的尼南贾纳(Niranjana)(代表作如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1992)和斯皮瓦克(Spivak)(代表作如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1993)；其他如曾在芬兰坦佩雷大学教翻译、后去美国密西西比大学

执教的鲁宾逊(Robinson)以及马萨诸塞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蒂莫奇科(Tymoczko)等。 (贺显斌)

综合性原则 comprehensive principl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方梦之于1996年提出了译论研究的综合性原则。综合性原则具体包括：1. 立体交叉：译学研究应该既着眼于立体架构又要重视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从而产生综合效应；2. 中西互补：关于现代西方译学的一些核心思想(如卡特福德[Catford]、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对翻译的定义、等值翻译、符号学理论)我国译家早有表述(如支谦、马建忠、金岳霖、王佐良)，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未能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这就需要融合吸收外来新理论使之发展；3. 平衡发展：翻译学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各个子系统(原作研究、作者研究、译者研究、翻译思维、翻译心理)的协调发展。(方梦之 1996)事实上，随着各种学科对翻译研究的渗透，大多数翻译理论家都认为翻译是一门综合学科，谭载喜的《翻译学》一书，就是"本着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的基本理念"(谭载喜2000a：扉页后)从学理的角度阐述了翻译学的学科性质、任务和内容、研究途径、翻译学中的语意文化对比、比较译学研究等问题。 (贺爱军)

翻译活动的基本性质 basic natures of translation activity

由一组基本关系所决定：翻译的主体性原则让译者处于翻译的中心位置，他与作者(源语文本作者)及读者(目的语文本读者)的关系构成第一组关系；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关系通过译者的翻译活动(中介)构成第二组关系；译者的翻译方法和目的语文本的客观效果与译者及其翻译活动构成第三组关系。作者是文本的创作主体，作者的创作方法对译者的翻译方法有借鉴作用，译者吸收作者的创作方法后采用的翻译方法直接作用于目的语文本；目的语文本对读者有影响，读者对文本的反应体现为翻译效果，源语文本对翻译效果具有制约作用。在译者与作者的关系中，译者的瞻顾(瞻前顾后)性和面向性(面向读者)是由他的中介作用所决定的，与翻译的转述性和解释性彼此结合，构成了翻译的第一组性质。随着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注意力逐渐从源语文本转向目的语文本，随着理解与表达两个阶段的分离和融合，译者对两个文本的对照性和权衡性既呈现出反复性，又呈现出有序性。这种对照性和权衡性、反复性和有序性，就构成了翻译的第二组性质。最后，在翻译方法上，由于译者要追求译作对读者、与原作对于读者在反应效果上的价值相当，加上主客观方面的各种差异(如文化差异、语言差异和个性差异)，就会使得翻译自觉不自觉地摆脱对创作方法的单纯模仿和一律借鉴，去追求有限度的独创性和适当的融合性，从而达到方法与效果的统一。由此得出翻译的第三组性质，即模仿性与独创性，借鉴性与融合性。三组性质都是翻译的基本性质，但因关注焦点的转移而导致理论视野的不同，可进一步确定翻译的基本性质和派生性质。例如，从人际关系(主体间性)的角度来看，第一组性质(转述性/解释性，瞻顾性/面向性)是翻译的最基本的性质，其他两组性质(对照性/权衡性与反复性/有序性，模仿性/独创性与借鉴性/融合性)则可以看做翻译的派生性质。但若从文本转换(互文性)的角度来看，则第二组性质为基本性质，其余次之。若从方法角度来看则又不同。总而言之，翻译的性质不是这些相互矛盾着的各项性质的简单拼凑。它们处于对立统一之中，且彼此制约以致连接为一个有序系统，这一系统又围绕着翻译的最基本的性质构成一个多层次的活动系统。(据王宏印 2002)

翻译悖论 paradoxes of translation

指翻译本身具有的相互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本质。翻译是一个辩证王国，充满着悖论。奈达(Nida)(1993：1～7)曾提到12种翻译悖论：1. 翻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活动之一，但又十分自然和容易，连小孩也能为其移民父母口译。2. 多数人认为，要忠于原文就要直译，而严格的直译却又误导译者。3. 翻译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却一直在进行，且质量越来越好，而不可译论者也总是毫不犹豫地同意让人翻译自己的作品。4. 有人认为，阐释(paraphrase)性翻译不对，但所有的翻译都包含着阐释。5. 人们普遍认为，应先直译，然后再润色文体。但文体是跨语交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应一开始就融入译本中；在词汇意义对应上所犯的错误比没能译出原文的美学特质更能得到原谅和宽恕。6. 翻译是一种技巧，需要大量的练习，故多数人认为，翻译是可以教会的。但特别优秀的译者往往是天生的，必须具备很高的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天资(aptitude)。翻译教学的最大收获也许是使初学者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所在。7. 在这个电脑时代，却仍然需要人来翻译。事实上，无论机器翻译多么发达，总是需要人来处理那些语义和文体复杂的材料。8. 真正难译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内容空洞的政治演说、讽刺作品和鲜有例证的讨论翻译的材料。9. 翻译永无定本，因为语言和文化都在变，而语言具有不确定性。10. 一些人以为，翻译最难的是在目的语中找到恰当的对应词和结构，但实际上却是对所译文本的指称意义和联想意义的透彻理解。11. 人们最难理解的翻译悖论是，以为只要掌握了两门语言就能成为优秀的译者，而了解两种文化、才思敏捷等同样重要。12. 最难理解的语言悖论是，语言既反映现实，又扭曲现实。

翻译的悖论基本上也是语言和文化的悖论。

中国特色翻译理论 translation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刘宓庆认为，作为世界翻译科学的组成部分，中

国翻译学必须具有它应有的特色，必须“自成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翻译学才能立足于世界译学之林。为此，中国译学研究者必须精于国学研究、精于西学研究，将中国翻译学建立在汇通中西、融合中西的思想精粹和经验提升的基础之上，才有望完成创建学科的大业。他认为中国译论的特色体现在四个方面：1. 中国译论具有鲜明的地缘人文、地缘社会和地缘政治特色，以文化战略为第一考量；2. 中国翻译思想根植于丰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中，在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历史语境中，没有偏离过允执其中、圆满调和论的主轴；3. 中国翻译理论有其独特的发展渊源、沿革和模式，表现在地缘特征、翻译题材及范围、支援科学或学科、翻译思想、翻译所涉及的语言特征等方面，与西方翻译在渊源、沿革和模式上各有所长；4. 中国语言文字自成体系。汉语最深层的独特性体现为“意念主轴”，使汉语句法获得了充足的自由度，也使意义本身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因此，中国译论必须着力建设有汉语参与的、有针对性的、有科学系统的、可操作的意义理论和文本解读理论。基于以上特点，必须建设凸显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重点：1. 中国翻译思想研究；2. 有中国特色的意义理论；3. 有中国特色的理解理论；4. 汉外互译审美理论；5. 汉外互译的对策理论；6. 译文操控理论；7. 效果理论（接受理论）。刘宓庆还认为中国翻译发展模式显示出明显的特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 与西方翻译比较，中国翻译及理论研究具有十分独特的文化战略考量。中国翻译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与民族文化心理、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的翻译活动作为理论与实务的重点。这是中国翻译的特点和优点，但也是“美中不足”之处。2. 中国翻译始终将意义放在第一位。可以说，意义转换是中国译论的本体论基本命题。汉语语言学的意义理论底子很薄，汉语传统语言的意义研究集中于文字学、训诂学。跨语言文化意义探索也不在现代汉语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因此，意义理论（以及与此有关的文本理解理论）的开发和系统构建也就成了中国翻译理论的特点之一。3. 中国翻译从一开始就依附于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具体表现为：中国翻译始于佛经的汉译，这在中国是“开天辟地之业”，而且佛经“玄意幽远”，译人深感需要“依圣人之言以明本”，就是说要依靠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来看佛经翻译问题。后来，众多译论家都是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命题移花接木于译论。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翻译应有自己的研究模式，中国的翻译理论也应体现出不同于西方翻译理论的特色。（刘宓庆 2005b）

有的研究者不同意这种“中国特色”的提法，如谭载喜认为，“科学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我们也不宜提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等口号。否则，我们的译学研究有可能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而不能产生科学的、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现代译学理论。”（谭载喜 1995）。参见“‘特色派’与‘共性派’”“本位观照，外位参照”

（李林波）

翻译理论的功能　functions for translation theory

吕俊认为，翻译理论至少有以下几种功能。1. 认识功能：它帮助我们对某些知识体系有本质性认识，如索绪尔（Saussure）的语言学理论并不会提高我们说话或写作能力，但能帮助我们认识语言的许多本质性问题。2. 解释功能：如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个句子是可以接受的。3. 预测功能：预言性理论都具有这一性质的。4. 方法论功能：翻译学学科方法论是关于认识翻译本质和解决翻译实际问题的方法的理论。5. 批判功能：这是一个理论发生与发展的内动力。任何一种理论的诞生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一功能，如翻译界目前进行的解构主义研究，其中很大部分是对结构主义思想的批判，正是由于这种批判功能，解构主义思想才得以确立和发展。6. 对实践的指导功能：主要涉及技术方法、学科方法等，是在理论结构层次中较低层次的理论，与实际操作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吕俊 2003）

刘宓庆认为，翻译理论有三种职能：1. 认知职能（cognitive function），也就是翻译理论的启蒙性。翻译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的既是一种对翻译的客观规律性的宏观描写，又是对这些规律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的深层分析。毫无疑问，翻译理论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翻译作为语际转换手段的实质和基本规范。2. 执行职能（performative function）或实施职能，也就是翻译理论的能动性、实践性。依靠翻译理论的科学方法论，人们能据以付诸实施，在实践中“执行”翻译理论所提供的参照指令。3. 校正职能（monitoring function），即翻译理论的规范性、指导性。翻译理论为我们提供种种经过语言科学或美学原理论证的选择性参照指令，使我们在语际交流活动中有了种种可供参照的实施手段；同时也就使我们能辨明正误、校正偏差。在这三项职能中，认知职能是基础，执行职能是核心，校正职能是关键。（参阅刘宓庆 1987）

（李林波）

翻译模因　memes of translation

切斯特曼（Chesterman）（1997）对有关翻译的概念、观点和理论的统称。模因（meme），又译作“密母”“文化基因”等，是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任何一个信息，只要通过“模仿”而被“复制”，就可称为模因。模因源于生物社会学，现已扩展到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切斯特曼和弗米尔（Vermeer）（1997）将其引入翻译学。翻译是模因跨越语言和文化疆域进行传播的载体。切斯特曼认为，翻译模因合在一起构成模因库（meme pool），内含源语/目的语、对等、不可译、意译/直译、写作即翻译等五种超级模因（supermemes），也包含大量次级模因。每一模因既是对以前模因的复制和继承，又存在一定的变异和发展。多数模因对翻

译理论的进化和发展有所裨益,属共生模因;而有些模因无助于翻译的发展,最终必然消亡,属寄生模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某一模因处于支配地位。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八个翻译模因演变的阶段:1. 词语阶段(words)讲究逐词对译;2. 神谕阶段(the word of God)强调语法形式和直译;3. 修辞阶段(rhetoric)侧重译文流畅;4. 逻各斯阶段(logos)置翻译创造性于重要位置;5. 语言学阶段(linguistic science)注重语言系统间的差异和关系;6. 交际阶段(communication)强调信息的功能和语用;7. 目的语阶段(target)关注规范和译本功能;8. 认知阶段(cognition)探究译者的思维和决策过程。模因处于支配地位时,就有可能演化成规范,规范就是因被认为有用而为社会广泛接受的模因。 (贺显斌)

翻译模式 models of translation

是全部翻译理论体系赖以形成的基本思想的高度集约化和条理化,是微观研究的综合结果。翻译理论基本模式通常被视为某种理论体系的构架核心。人们可以通过基本理论模式来检验、推导或论证整个翻译理论体系的合理性以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基本理论思想是否始终一贯。同时,人们还可以借助于基本理论模式来阐发、深化和拓展这一理论体系,修正谬误,校正偏差。现代语言学中的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生成语义学、系统语法、话语语言学以及符号学、信息论等,都企图从各个不同方面探索等值翻译的问题。已经提出的几种翻译模式虽能概括动态翻译过程的某些方面,但都不完全,因为翻译过程并不是按照单一的模式进行的。在具体情况下,究竟采取何种模式,或者哪几种模式兼而用之,要看源语的交际目的和言语表述的具体结构而定。主要模式有:1. 奈达(Nida)提出的转换生成学派的转换模式;2. 生成语义学派的语义模式;3. 卡特福德(Catford)根据系统语法提出的语言综合情境模式;4. 语义-功能模式;5. 语义-认知模式;6. 关联模式。参见"中国翻译研究模式""比较模式""过程模式""因果关系模式""关联模式""初级模式""次级模式""语义-功能模式""语义模式""语义-认知模式""转换模式""情境模式"

中国翻译研究模式 model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当代中国翻译研究中存在着三种主要模式:文艺学模式、语言学模式、文化模式。这三种模式的渊源、发展时间、力量和地位都各有特征。文艺学模式的翻译研究渊源主要是中国传统译论,而后者则根植于中国文学、美学、哲学等传统国学。该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是中国翻译研究中主要的模式,但从80年代后相对力量逐渐减弱,所处地位相对边缘,但它最能体现中国本土翻译研究底蕴和传统,在新的理论和学科的发展要求下,在21世纪有重新被振兴的潜力。语言学的研究模式是从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引进之后发展起来的,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长为中国翻译研究中一种主要的模式,并且现在仍然是主要研究模式之一。文化研究模式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发展,主要是在西方文化模式翻译理论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它发展迅速,力量强大,在21世纪初生长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主要模式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对语言学模式形成一定的冲击作用,同时也构成了语言学模式发展的一种间接动力。除了这三种主要的模式,中国翻译研究中还有哲学模式,它是一种影响范围较小但不可或缺的模式。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各自的理论渊源中都有体现。

这些模式在当代中国翻译研究中共存、互补,相互之间虽然有时会有冲突,但其发展现状和趋势上体现出更多的多元共存的特征。它们具有不同的理论渊源,其共存和发展体现了中西理论的融合,也反映了中国翻译研究不同的发展路线和趋势。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为中国翻译研究这一整体作出贡献。

(李林波)

比较模式 comparative model

威廉姆斯(Williams)和切斯特曼(Chesterman)(2004)在其合著的 *The Map* 一书中提出的研究翻译的三个理论模式之一(另两个模式是过程模式和因果关系模式)。比较模式呈静态,关注翻译成品,与对比语言学关系密切,用于翻译研究时间最长。翻译研究中比较的对象至少有三种:1. 原作与译作;2. 不同译作;3. 译作与目的语中体裁相似的原创文本。第一种比较旨在通过分析文本的对应情况或等值关系,了解译者的翻译决策,评价翻译质量,熟悉两种语言的共性和个性,并进而摸索互译规律。第二种比较可以是共时的,也可以是历时的,目的是进行译作鉴赏和翻译批评,确定特定时代的翻译规范,或透过不同时代译作的特点了解语言的变化情况。第三种比较运用语料库,分析翻译文本独有的特点,即翻译普遍性,或为了研究目的语中同类文本的格式和特点,以使译文符合目的语习惯。参见"过程模式""因果关系模式" (贺显斌)

过程模式 process model

威廉姆斯(Williams)和切斯特曼(Chesterman)(2004)在其合著的 *The Map* 一书中提出的研究翻译的三个理论模式之一(另两个模式是比较模式和因果关系模式)。过程模式视翻译为过程,而不是成品,引入了时间层面,因而是一种动态模式。它以"发送者(S)→信息(M)→接受者(R)"这一交际模式为基础,分析接受和明确任务、准备工作、动手翻译、校对、修改等各实际操作环节。心理语言学家则运用"输入→黑匣子→输出"模式,推测译者的心理过程。过程模式有助于了解翻译各阶段间的关系,分析不同阶段遇

到的问题,并对译者的决策过程和运用的技巧进行分门别类。该模式广泛运用于翻译教学和对翻译过程的描述与解释方面的研究中。参见"比较模式""因果关系模式"　（贺显斌）

因果关系模式　causal model

威廉姆斯(Williams)和切斯特曼(Chesterman)(2004)在其合著的 *The Map* 一书中提出的研究翻译的三个理论模式之一(另两个模式是比较模式和过程模式)。因果关系模式解释翻译的成因和产生的效应,可简单地图示为"原因(causes)→译作(translations)→效应(effects)"。箭头(→)表示"产生(produce)"或"导致(cause)"的意思。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非常复杂,有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异果、同果异因等多种情况,在具体的研究中要予以细心的分析(朱红文 2002)。有些原因是决定性的,并且可以量化,而多数只能称作影响因素而已。影响翻译的因素主要有三种: 1. 译者的认知状况: 知识结构、情感状态、翻译态度、个性和生活经历,等等;2. 外部条件: 原作的特点、客户的要求、电脑和词典的配置、时间宽裕程度、报酬,等等;3. 社会文化因素: 目的语社会的历史、传统和翻译规范、意识形态、总体经济目标、语言地位,等等。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翻译题材和译者的选择以及特定翻译方法的选用。翻译既是果,又是因,能改变读者的认知和情感状态,制约读者的行为;能改变人们的翻译观念,影响宗教的传播及目的语和目的语社会的发展。不仅如此,翻译还能极大地影响人们对异文化的看法,并进而影响各文化间的关系。翻译的因和果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比如,译者的态度受现有翻译规范的影响,同时又强化或弱化了这些规范,并制约规范今后的走向。不同的研究侧重因果关系的不同变量,翻译模式的选择取决于研究的材料和所要回答的问题。参见"比较模式""过程模式"

（贺显斌）

关联模式　relevance model

可表达为: 分析原文语境→找出最佳关联,通过推理取得理解原文的语境效果。这是格特(Gutt)在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1991)一书中提出的。关联理论认为,要理解一种语言,靠编码→解码的表面功夫只能让交际双方"互相知道"说了些什么,只有靠认知→推理的办法,才可以让双方"互相明白"对方的话。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要在接受自然语言信息的过程中,通过语境来寻找信息的关联(即取得语境效果),然后再根据话语与语境的关联情况进行推理。语境与话语的关联越密切,推理就越容易,理解话语也越容易;语境与话语的关联越疏远,推理就越费力,理解话语也越困难。

寻找关联,要靠译者的百科知识、原文语言提供的逻辑语义信息以及原文文意(包括语境和文化意义)等一些对理解原文有用的信息。因此,寻找关联的过程就是提取各种各样有效信息的推理过程。

初级模式　primary model

是翻译总括模式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一种路线。它可以清晰地分为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在二者之间有一个明显的转换过程。理解过程从源语文本的语言感知开始,进入结构分析,然后经过命题配列的实质性理解,最后达到对原文写作计划的追踪和原作者写作意图的全面掌握。在表达阶段,首先是目的语写作计划的制订,然后进入语义上的命题配列,结构析出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目的语的范型,最后则是目的语文本的语言表现与文字了。初级模式的思维方式带有很明显的逻辑思维的性质,而且是有意识的,其中检测思维参与频繁,双语转换过程明显。一般说来,初级模式适合再现类文本的翻译,但在表现类文本的翻译中也能体现出来,因此可视为次级模式的基础和发端。(据王宏印 2002)参见"次级模式"

次级模式　secondary model

亦称"高级模式",是翻译初级模式的升华和自动化操作反应,但也是另一独立的心理过程和翻译路线。它不表现为按部就班的逻辑推演和条分缕析的分析过程,而是具有直觉思维和灵感思维的特点,一般更加适合于文学艺术类的翻译,或者说是表现手法的实现机制。在高级模式中,理解和表达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而是交汇和融合的一个过程,表现为瞬时的阅读与写作的交替进行,而且很多是下意识地连续而不间断地进行。双语思维的连贯和转换的自如使译者感觉不到翻译的过程和困难,一切似乎在不经意间发生和完成。在形象思维和个体经验的参与下,理解中只从语言感知就直接进入到语义掌握,属于整体性一次性理解和掌握(包括语义和风格),而表达的语义析出就直接通向语言表现,属于整体性一次性表达,准确达意而不事修饰和修改。显然,这种情况只有在熟练的译者遇到得心应手的资料时才会出现,或者是一般译者在心理感觉极为满意的情况下才能有如此成功的表现和理想的翻译效果(王宏印 2002)。参见"初级模式"

语义-功能模式　semantic-functional model

该模式的理论原则是意义的表述形式受功能的支配。其中,功能指社会交际目的限制下的特定语境对语言形式所起的能动作用。刘宓庆认为,在意义-形式-功能这个作用链中,说话者头脑中的意念(内部言语)是起点,意念定形于句法形式,表现为语句(意定于形)。这时的语句还必须经过语用调节,可以说意念的表述形式受制于语境,即所谓"在什么场合下说什么话(形制于境)。语句表述形式经过语境-语用调节以后,说话者就可以将符合自己交际目的和效果的语句发之于外,也就是我们的听觉和视觉可以接收

到的语言信息(境适于言)。”刘宓庆将有汉语参与的语际转换基本理论模式归结为以下要点：1. 只有重描写才能保证我们的翻译理论具有明确的对象性及对策性；2. 只有重语义结构，才能保证有汉语参与的语际转换实现意义对应转换的根本任务；3. 只有重功能，才能保证翻译作为语际交际手段的社会职能(刘宓庆 1990a)。

语义模式　semantic model

翻译过程的模式之一，可概括为：意思↔话语。这一模式反映了人们由意思生成话语和由话语还原成意思的规律。将这一模式应用于翻译，是指原作者根据一定的意思生成话语，译者由这个话语理解其意思，然后再由这个意思生成另一种语言的话语。本模式像转换模式一样，区分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深层结构又区分为深层句法和深层词汇。深层句法是指言语表述各成分间的内容和意义关系，而不是指表层的句法结构。深层词汇仅指源语中的实词和词汇功能标记。所谓词汇功能标记，是指关键词和其他词之间的一定的语义关系，即与关键词搭配并表达某种基本含义的“语义参数”。

本模式的优点是揭示了双语交际中分析与生成言语表述的规律，考虑到了词汇手段和句法手段的交互作用。但是一个好的模式应当既能说明语言的内部因素，又能说明语言的外部因素。本模式的出发点是意思等同，而这不足以说明描述相同情境时语义结构的变化。

语义-认知模式　semantic-cognitive model

该模式认为翻译的理解过程是语义到认知的过程：翻译的中心是意义，而意义最终又归于主体的理解和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给翻译的启示是在语义和概念域上建立对等。所以，这一模式也可写成语义-认知-概念。源语语义和主体认知之间的纽带是语义认知场景，即语义认知规律作用的语言应用环境。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词的语义由基体和侧面两大部分组成，基体是语义结构在相关认知域中所覆盖的范围，侧面是在基体部分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部分内容。例如，以下单词自左至右就体现了其语义的衍生变化：

institution	(建立) →	an institution (机构)
construction	(建筑) →	a construction (建筑物)
mixture	(混合) →	a mixture (混合物)
selection	(选择) →	a selection (选集)
building	(建筑) →	a building (建筑物)
drawing	(绘图) →	a drawing (图)

上述名词中，前者都包含着动态行为意义，成为语义结构的基体，而后者有着这些动态行为相应的属性或属性的主体的意义，即有构成语义结构的侧面。在原文中，由于上下文的作用，名词只需要标示基体就可以了；而在译文中，通过语言应用环境的作用，侧面成为注意焦点，即处于突显(salience)的地位(在认知语言学中，突显定义为语义结构中的某一部分受到突出)。这样，在译文中就表现为一个不同的概念。此外，根据柯林斯(Collins)与洛夫特斯(Loftus)提出的激活扩散模型(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原文中同一语义在译文中可有不同表达。代表知识系统的概念结构就像网络，言语信号触动某些网点时，邻近的网点和连线也被激活。具体来说，当一个概念被加工或受到刺激，该概念节点激活，随即获得动力沿着该节点的各条连线向外扩散。激活某一节点，也可以推衍到其他临近概念域。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同一个总的概念或意象可以由不同的概念激活点获取。不同概念域可以通过节点发生借代或转移，如物质过程、行为过程、语言过程、心理过程之间的相互借代等。基于这一概念激活模式，我们就可以谈论如何利用不同的激活点达到对等的翻译。例如：He was away before dawn. (他是黎明前出发的。)/Everyone was away on holiday. (大家都去度假了。)上面两句中，away 均表示主体与原地点的分离状态，但在译文中须有不同的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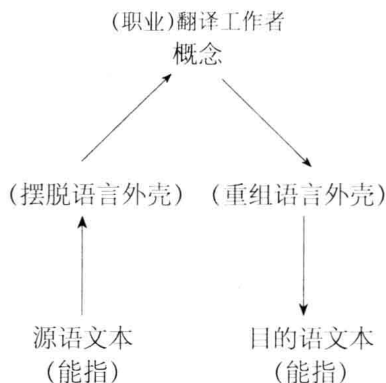
转换模式　transformational model

翻译过程的模式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由奈达(Nida)提出，初以转换生成语法为基础，后来吸收了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的观点，并作了相应修改，增加了“检验”这一阶段，现分为分析、转换、重组、检验等四个阶段，图示如下：

1. 分析：主要是确定原文文本的意义，但“意义”是指词汇、句法和修辞等各方面的意义，换句话说，在分析的过程中，内容和形式都要考虑。2. 转换：即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也就是说，从源语转换成目的语。这是译者用一种语言思维转换成用另一种语言思维的过程。3. 重组：分析的过程实际上是把源语的表层结构转换成深层结构，而重组就是把源语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4. 检验：虚线和双向箭头表示检验的过程，即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要检验的不是文字或语法上的对应，而是对比原文的意义和译文的意义是否对等。

释意模式　interpretive model

释意学认为，翻译要译意，翻译对等是概念对等。要获得文本意义，需要经过理解的阶段。而要获得正确的理解，就得对文本进行分析。下面以德利尔(Delisle)在 *Translation: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 (1988: 22)中提出的转移模式为例：



德利尔认为,翻译不能超越交际意义或思想这一环而直接进行语言符号的转移或符码的转换,必须经过理解、脱离语言外壳和重组语言外壳(表达)三个步骤:1. 理解: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知识。2. 脱离语言外壳:在转换过程中,有一个脱离语言形式(即形成思想)的过程。所以,在翻译训练过程中,译者应学会分离语言与要表达的意义,重视其他交际因素。简而言之,在理解和表达之间,增加脱离语言外壳这一过程是释意理论对语言科学进行研究并得到实践检验的成果,同时也是释意理论对语言科学的贡献。3. 重组语言外壳,即表达:释意理论认为,翻译的对象既然是交际意义,那么口译和笔译就拥有共同的特点:要表达的应主要是原讲话者或作者的思想,而不是源语的语言层次,目的语的表达方式也应符合听众或读者的语言接受习惯。另外,重组语言外壳时,要注意兼顾形式与内容。脱离语言外壳并不意味着无视源语的语言特征,译者不仅应该表达与原文一致的思想,还应采用能够产生同样效果的形式,即用相应的方式表达所理解的思想。(注意:这里强调的是"同样效果的形式"和"相应方式",而不是"同样的形式"或"相同的方式"[忠于语体或忠于篇章的体裁])。

释意派理论家注重语篇意义,强调交际意义对等,并与奈达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优秀的译文应在读者或听众中产生同原文一致或相同的效果,即等效(equivalent effect)。参见"转换模式"

情境模式　situational model

翻译过程的模式之一,可概括为"情境-话语"。描述同一情境,操不同语言的人往往使用不同的语义结构,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不同的特征,借助于不同的语言手段作不同的描写。本模式概括的翻译转换大致包括三个方面:1. 同义替换,但语义成分不尽相同,如:浑水摸鱼——to fish in troubled waters,其中,to fish除"摸鱼"外,还可以是"钓鱼";2. 表达情境相同,叙述角度不同,如:牛饮——to drink like a fish,其中,汉语是"牛",英语是"鱼";3. 情境相同,词语不同,二者在语义上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如:半斤八两——six of one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情境模式一般以译出所指功能或叙事功能为限。为使译语完善,须进一步考虑其修辞功能、语用功能和审美功能。

3. 传统译论

"八备"说　Eight Qualifications

彦琮(557~610)《辩正论》中最具独特理论价值的地方是关于译者条件的"八备"说,即一个优秀的或合格的佛经翻译者应当符合的八条要求或八项条件。原文照录如下(括号中为今译):"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第一,虔诚地热爱佛法,立志于助人济世,不怕辛苦费时;)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第二,忠诚地实践教义,严格地遵守戒律,不招致非议;)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第三,精研三藏经典,通晓大乘小乘,消除暧昧不明之处;)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第四,旁涉三坟五典,工于诗词曲赋,不使译笔生硬呆滞;)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第五,保持心态平和,态度宽容虚心,下笔不可专执武断;)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第六,埋头钻研译术,耐得清贫寂寞,不尚名利炫耀自己;)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第七,务必精通梵语,坚持翻译正途,无损害于原著义理;)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第八,掌握中文规律,了解训诂之法,成就自如自然译笔。)"

"八备"说关于译者主体性的分条阐述,隐含的体系结构可简要归纳为:第一,人生目标和道德修养(第一条,第二条),其中的宗教价值观和译者修养论不仅使得翻译事业显得神圣,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工作态度与心理素质(第五条,第六条),"八备"说所强调的淡泊名利和宽阔心胸的思想远远高于今日的职业意识;第三,学识背景与知识储备(第三条,第四条),同时兼有佛典专门知识和一般文化典籍的储备;第四,语言能力与翻译水平(第七条,第八条),强调了源语、目的语的应用能力以及相关的文字与文学修养。当然,"八备"说所强调的翻译的主体性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范畴,实际上是将八条统一到译者的人格中去,使其成为一个多元开放的系统,和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译者朝着这个理想的完善的境界,是怎样努力也不会过分的。　(王宏印)

三不易　three difficulties

佛经翻译理论家道安(314~385)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所提出的理论之一,指佛经从梵文译成汉语时,有三方面是不易做的:1. 经籍本是佛在世时因时而说的,古今时俗不同,要使古俗适合今人,不易;2. 要把圣智所说的微言深意传给平凡的人,使之理解,时间又相隔遥远,不易;3. 当时编集经籍的

人都是大智大勇、有神通的人,现在让常人来传译,不易。

“四款” four adaptations in translation

指未刊行的、作于1896年(光绪丙申年)《天演论》手稿中的《例言》中的四款,清楚地说明了严复在翻译实践上为“达旨”而做的变通处理:“一、是书以理解明白为主,词语颠倒增减,无非求达作者深意,然未尝离宗也。二、原书引喻多取西洋古书,事理相当,则以中国古书故事代之,为用本同,凡以求达而已。三、书中所指作家古人多希腊罗马时宗工硕学,谈西学者所当知人论世者也,故特略为解释。四、有作者所持公理已为中国古人先发者,谨就谫陋所知,列为后案,以备参观。”依次以现代通行之翻译术语代之,便是增减法、换例法、注释法、比较法。王克非在《鸠摩罗什与严复》中引证了著名学者陈寅恪关于鸠摩罗什译经方法的三条总结,并对照了严复《天演论》译文和赫胥黎原作,发现二者的翻译方法十分相似:1.“删去原文繁重”;2.“不拘原文体制”;3.“变易原文”。(王克非1988)严复在理论上言“信”较少,也少言“雅”,从实践上着重在“达旨”上下工夫。究其最终原因,除了力求让中国读者能懂西学精髓之外,就是他把翻译当作写作的任务来完成,淡化了翻译与写作之间的界线,使其译著带上了著作的文体特征。再加上严复的文笔流畅而典雅,配以西学元典义理上的深奥,就使得当时的士大夫读者群体大大地看重了严复的译著。难怪为严复作序的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要把严译西学名著和先秦诸子的著述相提并论了。

(王宏印)

四句模式 four-sentenced logic

宋代杰出佛教史学家赞宁(919～1001)的译论。赞宁的翻译理论和致思方式显然受到印度逻辑的影响,“六例”(具体请参见“‘六例’”)所用的理论句法基于印度哲学中的“四句”逻辑。“四句”逻辑起源于“有”“无”的对立概念,也是从四个方面来考察问题的方法。最初的“四句模式”是:(一)有;(二)无;(三)亦有亦无;(四)非有非无。其形式逻辑的内涵,前两句是P和非P,后两句要复杂些。第三句的要点是“S部分地是P,部分地是非P”。第四句来源于第三句,“它表述一种无规定性的中性状态”,作为对第三句所表述的两种现象同时存在的一种否定和超越。总体可表述如下:

1. —(P);
2. —(—P);
3. —(P+—P);
4. —(Pv—P)

四句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述如下:1. 就各陈述本身的命题价值而言,相对于同一时空条件,这四句中只能有一个为真,其余为假。2. 从1到4构成一个依次否定的关系序列,而第四句是一个最高的涅槃境界,即所谓的“离四句,绝百非。”“四句模式”首先直接影响到佛教门派的创立和分化。例如,天台宗开宗祖师智颤曾以四句模式为基础,创立了“四教四门”:一、藏教(有门);二、通教(空门);三、别教(亦有亦空门);四、圆教(非有非空门)。

赞宁把“四句模式”用于翻译理论总结,包含了若干变通和改造:其一,在命名上打破了原来的“有无是非”的说法,采用了更加灵活达意有时也更加复杂的命名方式,但保留了原来四句命名的“句法结构”。例如,第一例:“译字不译音”“译音不译字”“音字俱译”“音字俱不译”。其二,在翻译中不能保证有四种情况的时候,在理论上采取宁缺毋滥的原则,一般是让最后一项空缺,而不是为了逻辑需要而虚构一个并无所指的空概念。例如,例四和例五均有“二非句阙”。其三,由于赞宁所指的翻译中的四种情况是选择关系,即在某一具体时空条件下的语言策略问题,不存在佛经中的奥义和超脱关系,只有形态学上的单纯和混杂关系,所以,四句之间的关系只是互相排除式的否定,而不再是依次的升级式的否定。赞宁的“六例”中的每一例,作为一种情况具体的分类,只是印度佛教“四句”形式逻辑的一种变体。但在总体上,“六例”中的每一例都是一个小系统,而在整体上构成一个分类体系。这是前人对于“四句模式”在应用上从来未能达到的。参见“‘六例’”

(王宏印)

五失本 five devi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佛经翻译理论家道安(314～385)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所提出的理论之一,指佛经从梵文译成汉语时,在五种情况下允许译本与原文不一致。这五种情况是:“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此五失本也。”(转引自陈福康2000:10)意思是说,在五种情况下译文会失却原文的本来面目。第一,梵文的句子,多是倒装,翻译时,须根据汉语习惯译出。第二,梵文朴质,而汉人喜好辞采,译经过程中,会作一些文词的修饰。第三,佛经中,叙事不厌其详,常常反复叙述,尤其颂文部分更是如此,翻译时,应该简练,对原文加以删略。第四,佛经正文后另有重颂加以复述,很像中国韵文中的韵语,译成汉语时,须把这些连篇累牍的重颂部分尽行删去。第五,佛经里,往往说完一件事后说到另一件事时,又把说过的事重述一遍,翻译时,应该把这些重复部分一并删去。

道安能够看到两种语言的不同,允许“五失本”,这只是从形式上要求译文比较接近于汉语的规格,还没能从译文的表意上作出更大的突破,因而还是没能脱离比较生硬的“直译”;尽管如此,他的“五失本”在

当时还是颇有影响的，为许多译家所推崇。

“五失本，三不易”的本体论阐释　five devi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and three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道安(314～385)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说，开了中国翻译理论开端部分本体论失落的先河。原文如下(圆括号里是马祖毅的注释，方括号里是异文，标点略有出入，不计。异文和注释据马祖毅文)：“译胡(梵)为秦(汉语)，有五失本也：一者，胡(梵)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适合)众心，非文不合(可)，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梵语)委悉(说得十分详细)，至于叹咏(指佛经中的颂文)，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删略)，三失本也。四者，胡(梵)有义说(梵本在叙述后另用韵文复述)，正似乱辞(中国韵文最后总结的韵语)，寻说向(前面的)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划)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同‘旁’)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指佛三明)，覆面(指佛‘舌出复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变动)；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不可及)；乃欲以千岁(载)之上微言，传(无‘传’字)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指第一次结集)，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指五百罗汉)，迭察迭书(互相审察校写)；今离千年(载)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有‘以’字)知法者勇(猛)乎？斯三不易也。涉兹五失经、三不易，译胡(梵)为秦，讵可不慎乎？”(马祖毅 1982)

前人对于“五失本，三不易”多有论述。但由于传统译学的致思方式所限，多数只涉及本质论而不是本体论。梁启超将“五失本”视为翻译中文体的损失，并认为道安由此开译学问题之先，与钱锺书见解相同。钱锺书进一步推出翻译必有失本的道理。非有失本而不成翻译的说法，必不可免地触及翻译的异化，已经靠近翻译的本体论问题了。梁启超甚至天才地猜测到其中所包含的翻译不可能论的萌芽(通过鸠摩罗什理论的间接推论)，而钱锺书却在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努力区分失本与不失本、质与文的辩证关系。“五失本”强调的不仅仅是语言差异和文体差异，更重要的是它从原文本不可企及的角度即从翻译客体角度论证了翻译的不可能，或者形而上学层面上的不可译性。他强调的失本思想暗含了翻译本体论的失落倾向。

道安的“三不易”是对翻译本体论的诠释，揭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雅与俗的矛盾(意与言的矛盾)：以雅(宗教)为佛典之内容，以俗(非宗教)为世俗之语言。但梵语与汉语之间的语言符号的相隔终究是无法弥合的了。二、智与愚的矛盾：以圣人(佛陀)的智慧为佛典之内容，以愚众(俗众)之知解力为理解之基础，何以能达意而无误？这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智力(知识)差距问题。其显而易见的局限是：异国的宗教智慧与本国的宗教智慧毕竟难以圆通了。三、古与今的矛盾：这里涉及的是知识的直接传达与间接传达问题。佛陀作为自己知识的创造者和占有者，首先假定在认识上对自己是无所不知的，在表达上也是无所不能的。这是主体自身知识是否自明和可否自我传达的问题。然而，其最终的局限是：通过直接交际所应得到的征询知识毕竟无法在间接交往中以其他形式得到了。总之，“三不易”进一步从译者与作者的关系、读者与作者的关系等翻译活动的主体性差异的角度论证了翻译的不可能，即从社会学角度论证翻译之不可能。翻译过程所涉诸因素(主要是人的因素)之差异，可归结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问题。道安的“五失本”和“三不易”共同构成中国传统译论的第一个高峰。　　(王宏印)

“五不翻”　transliteration in the five cases

由唐代佛经翻译家玄奘(602～664)提出，直接见于文献的是宋代周敦义所写的《翻译名义集·序》，很可能是后人的总结性文字。原文如下：“一、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三、此无故，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偏知)，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而七迷之作，乃谓‘释迦牟尼’，此名‘能仁’，‘能仁’之义位卑周孔；‘阿耨菩提’，名‘正偏知’，此土老子之教先有无上正真之道，无以为异；‘菩提萨埵’，名‘大道心众生’其名下劣。皆掩而不翻。”(转引自林煌天 1997/2005：737)

唐末则有景霄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二)对于唐玄奘的“五不翻”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其中有些是举例，有些是说明。兹引证如下：“一、生善不翻，如佛陀云觉，菩提萨埵此云道有情等，今皆存梵名，意在生善故；二、秘密不翻，如陀罗尼等总持之教，若依梵语讽念加持即有感征，若翻此土之言全无灵验故。三、含多义故不翻，如薄伽梵一名具含六义：自在、炽盛、端庄、名称、吉祥、尊重。今若翻一，便失余五，故存梵名。四、顺古不翻，如阿耨、菩提从汉至唐，例皆不译。五、无故不翻，如阎浮树影透月中，生子八斛瓮大，此间既无，故不翻也。除兹以外，并皆翻译。”(转引自林煌天 1997/2005：737)

将“五不翻”转换成现代翻译理论术语就是 1. 一词多义，或多义词。2. 文化局限词，或翻译外借词。3. 约定俗成的通行译法。4. 具有神秘色彩的词语，采用音译。5. 为追求特殊效果的词语。照此可以进一步概括出唐玄奘的翻译原则和基本精神：1. 尊重已有的通行译法，不得已而改译，以免一词多译，无所适从。2. 坚持不用中国原有的哲学术语附会原文，以免以此充彼，与原文概念相混。3. 兼顾介绍外国

文化因素,不以中土名物相混同,求其统一和谐。4. 保持佛教经典的用语典雅,以避浅近和俗气,保持阅读品位。5. 保守原文词语的某些秘密,以免貌合而神离,使人阅读起来索然无味。其总体的理论意义乃在于在音译和意译之划界,同时兼顾保守原作秘密的奥义。

1919年,朱自清在《新中国》第1卷第7期的《译名》一文中发表了他对于译名的见解,其中有大段关于"五不翻"的评论,旨在说明音译和意译的分界问题,以便在主张音译的章士钊和主张意译的胡以鲁之间作一折中式的总结。 (王宏印)

"五不可翻" five non-translatables

在唐玄奘提出"五不翻"之前,广州大亮已提出"五不可翻",但鲜有人知。据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所载,隋唐时期沙门罐顶《大般涅经玄义》记述了广州大亮法师曾立"五不可翻"之说,惜多有节略。今据《续高僧传·卷十九》全文引证如下:"广州大亮云:一名含众名,译家所以不翻,正在此也。名下之义,可作异释。如言大者,莫先为义。一切诸法,莫先于此。又,大,常也。又,大是神通之极号,常乐之都名,故不可翻也。二云:名字声色之法,不可一名累书众名,一义叠说众义,所以不可翻也。三云:名是义上之名,义是名上之义,名即是一,义岂可多?但一名而多训,例如此间息字,或训子息,或训长息,或训止住之息,或训暂时消息,或训报示消息。若据一失诸,故不可翻。四云:一名多义,如先陀婆一名四实,关涉处多,不可翻也。五云:祇先陀婆一语,随时各用,智臣善解,契会王心。涅槃亦耳。初出言涅槃,涅槃即生也。将逝言涅槃,涅槃将灭也。但此无密语翻彼密语,故言无翻也。"

大亮的"五不可翻"值得注意之点包括:第一,坚持一名一义原则,以免引起名义混乱(强调名与义的统一);第二,一名多义为不翻,一名多名为不翻(注意到名与名的区分,名与义的区分,义与义的区分);第三,注意命名方式特点(声色),但不可重造或重译名称(注意到名与物的统一);第四,原文本中的密语(相当于后来赞宁所谓涉及"真"应意译的宗教词语)不翻。可见,大亮的"五不可翻"理论包含了更多的命名逻辑原理。

此一说法与唐玄奘的"五不翻"究竟呈何种关系?第一,从时间上来说,估计罐顶(561~632)在前,玄奘(602~664)在后,姑且可以把前者看做后者的前奏。第二,就实际内容和致思特点作一大致比较,即可看出:1. 大亮偏于多义现象,玄奘五种各不相同;2. 大亮长于命名学理,玄奘精于条目论列;3. 玄奘的条目类别多于大亮,至少玄奘的生善故和顺古故,大亮阙如。参见"'五不翻'" (王宏印)

六法 six methods of translation

指唐代高僧玄奘的佛经翻译"六法",实为今人根据史料总结而来。其一为补充法。张建木(1951)认为玄奘翻译时,常常增加原文所没有的词语或数字,或专有名词,以助理解。例如在译经"大德"后增加人名"法救",针对"世尊宣说"增加数字"八万行"等。其余五法见于印度学者柏乐天(Pradhan)《伟大的翻译家玄奘》一文,分别是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例如,原文应是"独觉声闻",改变顺序为"声闻独觉",此为"变位法"。又如将原文的"计前际见"和"计后际见"合为"计前后际见"。关于"译名假借法",柏乐天说:"玄奘有时候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例如一般用'识'来译 vijnana,然而他有时用'识'来意译 citta(心)。'心'字一般用来译 citta,但他间或用'心'来译 dharma (法)。……这种改译,有时可使含义格外清楚。"(柏乐天 1951)可见玄奘并非一味提倡和坚持音译而不用意译。他所谓的"五不翻",意在为意译划一限度,使其不能滥用,即便有些词语是可以意译的。而在翻译实践中,他仍然是以意译为主的。我国学者张建木和印度学者柏乐天曾对玄奘所译经典作过校勘,从中总结出玄奘的六大翻译方法,用现代译论术语来说,即:1. 补充译法;2. 省略译法;3. 变位译法;4. 分合译法;5. 假借译法;6. 还原译法。这些翻译方法的综合运用,是他取得良好的翻译效果的基本保证。(据马祖毅 1984) (王宏印)

"六例" six cases of translation

赞宁的"六例"见于《宋高僧传》(卷1)的《译经篇》(约作于988年),是借助佛经四句逻辑模式对翻译方法的重要总结,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其总纲如下:"今立新意,成六例焉。谓译字译音为一例,胡语梵言为一例,重译直译为一例,粗言细语为一例,华言雅俗为一例,直语密语为一例也。""六例"始终围绕语言问题进行逻辑清晰的立论,它属于翻译中的语言认识,而就其具有针对性的设例来看,则更多的具有语言策略的意义。扼要撮为三点:

1. 赞宁首先区分的是原始文本的语言形态(梵文)和中间文本的语言形态(胡文)。这在佛经翻译史上曾经历了长期误解而最终到达彻底的认识,具有重大的拨乱反正的历史功绩(第二例"胡语梵言")。在此基础上,赞宁提出"直译"和"重译"的概念区分,认为在佛经翻译实践上,这是两种不能混淆的基本方法。前者是针对原始文本的翻译而言的首次翻译活动,后者则是以二手和中介语言文本为基础进行的第二次翻译。与前者相比,后者的结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是要打折扣的(第三例"重译直译")。

2. 赞宁对于翻译活动势必涉及的两种语言(梵文和华言)具有清醒的认识,指出它们同时具有语体差异和风格差异,即"精粗"和"雅俗"的分野。这种情况既可以指两种语言本身作为符号系统各自所包含的复杂性和异质性,也可以指文本中基于人物身份和学养而具有的不同的谈吐风格和说话习惯对于翻译活动的要求。显然,与佛经翻译的初期相比,赞宁已

经破除了梵语的神秘感和汉语的优越论，比较能够客观而平等地对待翻译中的语言问题了（第五例"华言雅俗"和第四例"粗言细语"）。

3. 基于上述两点认识，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赞宁已经能够适中而不偏激地提出音译（译音）和意译（译字）以及直译（直语）和意译（密语）的问题，作为基本的翻译方法以供随时取用。更为可贵的是，赞宁并不像今天许多人那样简单地在音译、意译或直译、意译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直接选择，而是考虑到几种方法在翻译实践中的融合状态和综合效果。这种种考虑，有的是在分析原文本的结构和功能性要求的基础上提出的，有的则是从产生译文本理想状态的认识上提出的进一步的翻译质量的要求（第一例"译字译音"和第六例"直语密语"）。赞宁的"六例"说以及其他翻译思想是佛经翻译一千年历史的总结，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持久的影响。　（王宏印）

文与质　Wen vs. Zhi (refined and unhewn; literal quality and material quality)

从理论渊源来看，佛经译论中的文与质概念是从先秦典籍中借用而来的。文质概念最早见于孔子的《论语》。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里的"文"指的是"礼""乐"之类外在的文明表现，"质"则是"仁""义"之类的道德修养。孔子认为，礼乐仁义集于一身则文质兼备者，才称得上是君子。这显然是在论述做人的标准。把论人的文质用于论文，就有了儒家文论中的文质观。引申过来，"文"就成了文采，即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质"则是实质，即文学作品的内容方面，文与质的关系遂成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成了言谈和写文章的修辞学的同一事物的两面。"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说的是文与质彼此消长的极端效果，是不符合儒家中庸思想的。文与质的概念借用到翻译中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文中借用了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据说是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佛经译论的文质概念，也最早见于此文。例如，支谦认为天竺僧人竺将炎"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其辞不雅"。主张质派的僧人辩解道："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支谦于是也就认为佛经翻译"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虽然支谦的做法是"质直"互训，"文饰"并提的，后人在谈翻译时几乎都沿袭他所开创的译论传统，更加自觉地运用文质作为成对概念来谈论翻译问题了。

佛经翻译史上质派的代表人物是前秦时期的释道安。他在译经序言中写道："近出此撮欲使不杂，推经言旨，唯惧失实也。"（《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因本顺旨，转音如已，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道行经序》）"《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事不如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鞞婆钞序》）。文派的代表人物是后秦僧人鸠摩罗什，他在《为僧睿论西方辞体》中写道："天竺国俗，甚重文藻。……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在此基础上，东晋高僧慧远为佛经翻译提出了一个既不失朴直又不失藻蔚的圆满调和的设想，即文质兼备。慧远说："于是静寻所由，以求其本。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理想的状态便是"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大智论钞序》）这就是既要反对文派的"文过其意"，也要纠正质派的"理胜其辞"。方法则是"以此考彼，殆兼先典。"寄希望于"后来贤哲，若能参通晋胡，善译方言，幸复详其大归，以裁厥中焉。"（《三法度序》）慧远的观点称为"厥中论"。"厥"本有缺乏的意思，"厥中"也就有克服二者所缺以达折中的意思。这同儒家的"中庸"哲学思想和"中和"的美学观有暗合之处，同孔子的"文质彬彬"的做人思想也交相辉映。此后的佛经翻译的理论倾向和实践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又进入了另一个小循环。以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看，鲁迅在评论严复的翻译时总结说："汉末质直"；"六朝真是'达'而'雅'了"；"唐则以'信'为主"。这不啻是一部中国古代翻译史的缩影，其中所贯穿的正是一条从质到文再到文质合一的"求信"的历史路线。

在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理论中，最初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直译"和"意译"的说法，只有"质"与"文"的说法。只是到了宋代，赞宁的"六例"中才出现了"直译"字样，但不是后来借助外来语翻译的"直译"，而是与"重译"（相当于今天的"转译"）相对应的"直接翻译"。他对直译的界定是：直接由原文译出，"如五印夹牒直来东夏译者是。"可见，即便西方翻译理论的移入逐渐形成了和意译相对应的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翻译方法，作为与意译相对的直译方法本身也与中国原有的"直译"一词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这里有一个漫长的艰苦的演变过程，一方面是原有"文质"概念的淡化或泛化，一方面是外来语"直译""意译"的流行和系统化。但这一过程不可忽略不见，二者在概念上也不可混为一谈。把翻译中的两种方法或倾向称为直译和意译的说法，是近代引入的外来说法。直译和意译一开始就是相对的术语，而且具有不同于质派和文派的含义。因此，不能把"质直"完全混同于直译，它更加倾向于质朴的文风译风，而不是一切直译，一概排除意译。"文饰"作为修辞的说法也可以指译文在辞藻上刻意求雅，与意译的含义并不相同，也不应混为一谈。今天重新讨论文质问题，应当具有系统而严格的思维习惯和新的分析性概念。文学翻译中的文和质可能涉及三个层面六个维度：1. 就翻译所涉及的语言的传统而言，梵文和华文各有自己表达和表

现上的文与质;2. 就作者和译者的写作习惯和倾向而言,每人各有自己的才性和文风上的文与质;3. 就每一种语言艺术的作品而言,每一文本各有自己的文与质及其协调关系。这三个层次上的六个方面,都在影响翻译理论中对文与质的认识的深浅广狭以及写作与翻译过程中修辞处理的高下文野。 (王宏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Chinese learning for ethical and cultural system, Western learning for material progress

指近代洋务派思想家和早期改良派的共同主张。该主张倡导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以为本,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具体文化措施以为用。早期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均有此论。戊戌运动中,洋务派首领张之洞(1837～1909)曾在《劝学篇》一文中具体阐发这一主张:"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洋务派和改良派拒绝西方政治制度,"但用西人制造之长",维护封建名教,作为其办洋务、反变法的理论纲领,深深影响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面貌,对我国的翻译事业,特别是科技书籍的翻译起了推动作用。 (蓝春)

本位观照,外位参照 emic resource, etic reference

刘宓庆对中国翻译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与西方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所坚持的一种原则,即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为本位,以"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为外位。刘宓庆认为,对于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在"传承"与"变革"的辩证关系问题上,应该坚持"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原则,即一方面,必须因势利导,承认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传统翻译思想的传承力,让传统观念中的积极因素继续发挥推展时序的积极作用,坚持所谓"本位观照";另一方面,又必须注入与时代发展息息相通、与西方翻译思想相继相融的译事主张,不要与全球化文化交流大局、大势脱节,也不要与西方的翻译思想的发展趋势,即所谓"时潮",脱节,从而做到中外翻译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的选择、甄别和包容、兼蓄,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即所谓"外位参照"。这应该是当今中国翻译思想的主导性的考量,也可以说是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方略。这种思想贯串于刘宓庆的翻译研究的多个层面、多种领域,也成为他创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原则和方向(据刘宓庆 2001: 41～46)。 (李林波)

古本复原 resource restoration

在概念上,古本复原是一种新的翻译类型,但在实践上,也许古已有之。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王宏印基于《蒙古秘史》的翻译提出来的,意指借助翻译复原早佚的古代文献典籍。"大体说来,古本复原类似于考古学上的器物复原,主要是通过拼凑组合现存片断和修复残本以恢复文物原来的外貌和品相,使之可以作为文化器物进行认识和鉴赏。但是古本复原不是就已有的残缺的古本进行物理复原,也不是文物修复意义上的物质复原,而是通过翻译活动恢复已经散失或丧失的古本文献。也就是说,古本复原有两种,一种是古籍修复,一种是文献复原。前者通过黏合成型显示出原本风貌,后者通过文字翻译,提供了已经丧失了的原本的可能文本,前者是文物考古学的,后者是知识考古学的。"(王宏印 2006: 175～176)我们这里所谓古本复原,显然指的是后一种情况。必须注意的是界定这一概念的三个关键:古本目前被认为早佚;可靠的音译作为复原的起点和依据;严格以原文为指向的倒逆复原方向。就《蒙古秘史》而言,它的古本复原虽然从本质上是一种音译工作,但并非所有该文本的音写都是古本复原,后者是严格地以原文为指向的,是回译式音译。在秘史学界,现在主要有三种音写:拉丁音写、传统蒙文(即近现代蒙文)音写和畏吾体蒙文音写,前两种属于转写。严格说来,《蒙古秘史》是用畏吾体蒙古文写成的,因此,只有根据现有的汉语音译本用畏吾体蒙古文还其本相,才堪称"还原"。

在实践上,古本复原不同于根据几个译本进行汇译的情况,例如,不懂梵文的道安根据不同的中译本汇集结合而翻译出佛经译文的情况,或者不懂中文的美国哲学家贝姆根据不同的英译本《老子》翻译出《道德经》的情况。汇译的根据是已经有了若干译本,译者无须文字的转换,而是相互参校择其善者,由此产生出一个理想的"合和"译本。这里需要的与其说是翻译能力,不如说是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版本的判断力和精品版本的综合能力。在原则上,古本复原不等于伪译。因为,虽然旨在进行古本复原的原作已不可见,但却是实际存在过的(也可能会有残篇存在),而伪译实际上并无原作,而且译者知道并无原作,只是创作假托译作罢了;而且伪译也不可能有翻译过程,只是一种虚构的创作过程。伪译在概念上既然不属于翻译,自然就不可能和古本复原的复杂过程相提并论了。应该说,古本复原是对失落的文本本体的回溯,是一种带有一定理想化与虚拟性色彩的翻译追求。然而,只要具备相当充分的前提条件,成功的复原也并不是不可能,比如《蒙古秘史》的畏吾体古本复原。在理论上,严格意义上的古本复原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极为困难。因为按照翻译不可逆的原理,无论采用多么精密、精确、精致的翻译方法,何以经过层层倒退或回归,就一定会产生一个在文字上独一无二的原本呢?也就是说,何以能保证那个复原的文本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文字上就是那个已经消失、无从查考、无从比照的原作呢?并且在实践上,也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才有可能实现古本复原。例如在《元朝秘史》的蒙文本复原的时候,所具备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音写本的存在。在复原中倒逆的音写,即音译,也许可以回到原文,只要语音掌握准确,而且可以参照意义,那么,要回到原文也许是可能的。关于古本复原的条件,作为履行翻译本体论承诺的罗格斯

(Logos),王宏印也提出了几条推测性的说明：1. 有关的历史知识和版本、语言知识,终极的原文本存在过的状况的了解；2. 一切环节的语言学知识及其转换的技能,历时的以及倒推的翻译技能的具备；3. 必要时以原文版本的局部或残篇作为范本,以便确定古本的细节和风格精确度；4. 直接的音译环节是文字复原的必要条件,应能把意译环节减到最少程度；5. 必要的各种来源的汇译的知识作为补充,亦即复原者有形成综合判断的能力。(王宏印 2006：178)尽管如此,假若不同的译者从事同一部作品的复原,也可能会复制出不止一种原文来。

有鉴于汉字音写传统在我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和受汉文化辐射影响的周边国家民族中广泛存在,例如百越族的《越人歌》、鲜卑族的《真人代歌》、白狼的《白狼王三歌》、日本的《古事记》,等等,古本复原可以说是具有相当应用范围和学术价值的翻译活动。当然,古本复原对于原本来说只能具有相对的准确性,但除非佚籍复出,复原的古本其参考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王宏印,邢力)

"华梵双举"　huafanshuangju (transliteration with interpretation)

从一开始,佛经翻译用的是"华梵双举"的译法,即一半译音,一半译意的译法,也就是把梵文单词的音和义各译一部分组成一个汉语单词,一般是用梵文的第一音。例如,今日所谓的"忏悔",便是取梵音的"忏摩"和"此番悔过"和"此云忍,谓容恕我罪也"等意思的一个结合。简要地说,就是取了梵文的"忏"音和"悔"义结合而为的"忏悔"。"音义兼译",是后来翻译的一种方法,就是同时翻译原文的音和义,即用中文字去切外文的音,同时也能够表达一定的义。例如,unit 译为"幺匿",totem 译为"图腾"等。可见,在翻译的早期,音译和意译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为用,合而为一的。只是到了后来,音译和意译才分化出来,成为各自独立的翻译方法了。 (王宏印)

历史距离论　historical distance

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提出。他认为,尤其是翻译古典文学作品时,翻译有一个历史距离问题,但这一历史距离可以通过翻译实践加以消除。"当然,若要翻译几百年前的作品,译者就得把自己置身于那一时期,设法体会当时人们所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在翻译成英文时,再把自己放在今天读者的地位,这样才能使读者懂得那时的思想。"(任生名 1993)他以《诗经》为例,通过《诗经》中的思想和现代人的差距来说明,即便是同一民族也有历史距离问题。但他认为,跨越时空进行翻译的基础是人性的共同性、艺术审美的超时空性以及文化的类同现象。当然,翻译并不能彻底消除历史距离,因为其中还是要保留一点异国情调,因为翻译毕竟是翻译。(据任生名 1993) (王宏印)

正翻与义翻　zhengfan and yifan (proper translation and close translation)

关于名物的翻译,即属于玄奘所谓"无此故"的条目下,唐末的景霄在其《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中,有一重要的补充说明。他提出"正翻"和"义翻"的概念区分,作为对玄奘"无此故"的一种发挥。兹引录如下:"就翻译中,复有两种：一、正翻,二、义翻。若东西两土俱有,促呼唤不同,即将此言翻彼语。如梵语芬茶利迦,此云白莲花。又如梵语斫枢,此翻为眼等,皆号正翻也。若有一物,西土即存,此土全无。然有一类之物,微似彼物,即将此者用译彼言,如梵云尼怚律陀树,此树西土其形绝大,能荫五百乘车,其子如油麻四分之一。此间虽无此树,然柳树稍似,故以翻之。又如三衣翻卧具并是云云。"

这里的"正翻",指的是中外共有一物,仅其名称不同,就可以用中文名称直接替换原文名称,而不必音译。这是"完全对应译法"。而"义翻"指的是,原文的事物在译文国没有,但有一物与其相似,故而权且替代,作为外文所指之物的中文译名。可以称为"部分对应译法"。这两种译法,皆是意译,而非音译。(倘若作进一步的细究,则谓前者为"直译",亦无不可。)可见,景霄的补充,意在弥补玄奘音译法之不足,甚或匡正其在理论上强调音义法之偏痴,因此至为可贵。参见"'五不翻'" (王宏印)

玄奘译法　translation procedures in Xuanzang's times

1 300 多年以前玄奘翻译佛经的方法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它涉及译事的十一个方面：一、主译,即译场主持人,胸怀全局,贯彻始终;二、证文：朗诵原文佛经,斟酌原文是否有讹错,以便酌量修正,不使发生理解上的错误;三、笔受：根据梵音录本译出毛稿;四、度语：音译暂时解决没有对等信息的事物,据母本正音;五、缀文：又称次文,调理文辞、句法,把梵文的倒装句等重新组织成符合汉语习惯的句子,使成句义;六、证义：初稿译出后与原文对照审校,看本旨有无偏离、歪曲或遗漏;七、参译：参核梵汉两种文字,使之完全相合,不出语意上的错误;八、刊定：别称校勘、利洗,刊削冗长、重复的句子成为简练的句子,定取句意;九、润文：又名润色,负责润色文辞;十、梵呗：用高声念经的调子将新译的经唱诵一遍,以检验其是否顺口顺耳,美妙动听;十一、监阅：最后由钦命大臣终审。 (李全安)

有限创作论　"finite creation" theory

余光中在《翻译与创作》中提出翻译是有限创作,主要观点如下:"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译者的创造性之所以有限,是因为一方面他要将那种精确的经验'传真'过来,另一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还要保留那种经验赖以表现的原文。这种心智活动,似乎比创作更繁复些。"他认为,译者不必兼为作家,但心中不能不了然于创作的原理,手中也得有一

支生花的妙笔。他还针对"翻译体"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这同他把模仿甚或抄袭视为创作的对立面是一致的,因为他认为,创作的对立面不是翻译,正因为翻译是有限的创作(余光中 1997)。 (王宏印)

传统译论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指与现代译论相对存在的、不同历史时期流传下来的有关翻译的论述,包括对前人的译论有系统、有目的地整理和评论。

我国传统译论受古代文论的影响,从文本出发,追求译文和原文的全方位契合,罗新璋概括了我国传统译论中翻译标准的理论脉络,这就是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为代表的概念系统。"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罗新璋 1984: 19)与传统翻译理论研究并行的是大量的讨论具体翻译实践和翻译作品的文献,这些文献可以概括为传统译论的应用。西方传统译论指结构主义语言学进入翻译研究之前的译论,主要以语文学为基础。"语文学范式的翻译研究十分关注字词所表达的各种意义、音律和情感氛围,这无论对何种范式的研究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它强调直觉,崇尚灵感,轻视理性,对翻译学建立又是十分不利的。"(吕俊,侯向群 2006:58)传统译论与当代相关学科相结合,推陈出新,可以引发出新的理论。参见"西方传统译论""中国传统译论" (林夕)

西方传统译论 Western traditional theory of translation

西方传统的翻译主要以语文学式为研究范式,早在柏拉图时期就开始了。柏拉图认为要成为著名的修辞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中首要的是要具备"语文的天才"。他认为诗人写诗并不凭智慧,而是一种天赋和神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切知识的成果与艺术的成就就会归于一种不可知的神秘主义,这是不利于系统知识形成的。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甚至到 20 世纪初的直觉主义美学都与之有渊源关系。其代表人物克罗奇就认为艺术是一种直觉的表现,是只能感悟而不能用概念去分析和理解的,其精髓在于有异于概念的"意象",如果对意象再进一步进行判断或思考,艺术就会随之消失。因此直觉主义美学只讲感悟而不讲分析。这种研究范式虽然历时最为长久,但始终没有形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多为翻译家在实践中的体会与感悟和只言片语的散论,不成体系。其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字句的翻译方法,如直译与意译的讨论、风格的传达(如风格的可译性与不可译的讨论)、诗歌的可译性与翻译的标准等问题上。其研究方法主要是直觉主义的,以内省或者主观体验和感悟为主,较少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据吕俊,侯向群 2006: 54~56)

诠释学译论 hermeneutic approach

诠释学(hermeneutics)在词源上与希腊诸神的信使赫耳墨斯(Hermes)相联系。由于神和人语言不同,神的传达就不仅是单纯的重复,而需要翻译和解释。诠释的任务就是把一种用陌生的或不可理解的方式表达的东西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理解的前提是翻译和解释。诠释学在古代就可以说是一门关于理解、翻译和解释的学科。翻译其实就是解释,因而与诠释学有着不解之缘。

诠释学译论一般持广义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种理解和沟通行为,真正的理解就是对文本作出创造性的重新阐释;"理解即翻译";读者阅读时需要诠释原作,译者翻译时同样需要诠释原作,要完全把原文的意义反映在译文中是不可能的。诠释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伽达默尔(Gadamer)、歌德(Goethe)、斯坦纳(Steiner)等。斯坦纳提出了翻译包括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等四个诠释过程,把诠释学发展成一套全面的诠释学翻译理论。(据陈德鸿,张南峰 2000: 29)

语文学派 philological school

最早产生于古希腊罗马时代,以传统的语文学为基础,着重篇章的主题结构和表现风格,尤其侧重于作者及其创作背景,有使译文读者和译者适应作者的倾向。该派以《圣经》翻译为讨论的主体。语文学理论中形成了以阿奎拉(Aquila)为代表的直译派和以哲罗姆(Jerome)为代表的非直译派之间的争论,开西方直译、意译之争的先河。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即在现代译论勃兴之前,传统的语文学派一直是西方译论的主脉。直到 1986 年,奈达(Nida)在与德·瓦尔德(De Waard)合著的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on* 中还在论述这一问题。他们认为,近些年来,对于语文学派翻译法的种种问题所作的成效卓著的阐述和富有意义的探讨比以前大大进了一步。

中国传统译论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

大体说来,凡在中国现代译论产生以前在中国学术领域内产生的关于翻译的一切理论都属于广义的中国传统译论。这一界定的逻辑展开可作如下几点说明: 1. 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乃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2. 传统译论的时间划界并不起自中国翻译史上最早的翻译实践,其下限也不是政治史或社会学史意义上的历史分期的现当代,而应以译论本身的逻辑演进为根据;3. 因此,中国传统译论并不排除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如佛经和西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并没有大到足以改变其传统的翻译理论形态和性质的程度;4.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译论是指在翻译论题上、研究方法上、表述方式上以及理论特质和精神旨趣上都表现出浓厚的传统国学味道的译论,由此有别于别国译论。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主线说 main line of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

罗新璋(1984)《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总结了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主线。他认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分而合,逐渐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经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 据此,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说法,有些学者不表赞同,甚至否认中国有自己的翻译传统和翻译理论。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如果说有体系,也是在整体上和大体上而言,而不是就某一单独的理论部分而言,因为大部分单独的论点尚未发展到卓然成一体系的完备状态;即便认可罗新璋的这一基本线索,并且可以之为核心部分进行研究,但是其余的尚未纳入这一主线的译论有的也很重要,而且沿着其他的理论致思方向也可以形成中国新的体系化的译论思路。如果说,罗新璋的上述线索是以文本转换为中心的思路的话,那么,它所表现出的就是翻译标准作为核心的理论倾向,其基本的理论问题是:何谓好的译文?据此,别的可能的思路至少还有:1. 以音译和意译为基本的思路,从唐玄奘的"五不翻"到章士钊与胡以鲁关于音译和意译的论争,其理论问题是:何谓真正的翻译?2. 从质译、文译到直译、意译为主的译论方向,从释道安的质译倾向与鸠摩罗什的文译倾向到现代鲁迅与梁实秋关于直译意译的论争,其理论问题是:何谓好的翻译方法?3. 以彦琮的"八备"说为主体的建立译者主体的思路,其理论问题是:何谓真正合格的译者?诸多思路,不一而足。中国传统译论的"有容乃大"和对于众多翻译理论问题的辐射力和渗透性,不仅可以在单独的个体译论的层面上进一步加深和扩展同一论题,而且可能在整体态势和综合实力上展示和开拓现代译论的理论基础及其文化资源。那就是说,以中国传统译论的文本为基础,进行现代译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的诠释工作,不仅是为了清理古典的译论资料,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建立现代译论准备条件。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的文化资源 culture resources of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丰富的人文传统的民族。多源头、多民族、多语言的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在经过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激烈争鸣以后,归入了秦汉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沿袭长远。思想领域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和儒家思想的互补,以及由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的渗入。祖先崇拜、伦理政治、诗品文心融为一体的人生方式和思想方式,构成中国人际交往和跨文化交往的大背景。中国传统译论的人文精神便奠基于这样一种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的人文教化传统之上。要而言之,中国传统译论的人文精神和文化资源状况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1. 以道德为本位,强调译者道德修养和敬业、从业为本的主体性意识。西方的翻译理论喜欢把翻译视为一种职业性技术性工作的态度,而中国传统译论强调译者要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把它作为终生事业的敬业精神。这在彦琮关于翻译人才所需条件的"八备"中是居于首位的,对于每一个译者个人来说则应当是始终一贯的。2. 服务公众和社会的群体本位思想。因为中国文化的非宗教化和世俗化倾向,中国的翻译始终是面向大众而不是面向少数教徒,即便是佛经的翻译也有此倾向,即没有划分为教徒的和非教徒的译本。这一点不同于西方翻译史上基督教《圣经》反复被翻译的情况,也没有产生相信译者为神所共同感召的奇迹般的翻译实践和诸如此类的翻译理论。3. 人文主义的语言观而不是科学主义的语言观,始终是中国传统翻译实践的潜在的理论导向。由于缺乏高度发达的形式化的语言理论和语法理论,古汉语甚至现代汉语就一直处于人文主义的语言观的笼罩之下。缺乏分析哲学的条分缕析和演绎规则的操作化程序及其有关训练,使得中国传统译论在精神实质和表述方式上都比较模糊而随意。4. 人文社科类作为主要文本翻译的类型,在材料内容、语言类型和运思方式上都倾向于文学翻译的艺术性,而不是科学翻译的科学性。久而久之,以至于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都往往把翻译看做一种艺术活动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影响到中国传统译论的基本观点和表述方式及理论形态。5. 哲学的而非科学的、美学的而非宗教的,是中国传统译论的始终如一的理论基础。简约的而非繁丰的、定性的而非定量的,是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方法和表述特点。多解的而非单一的、含混的而非明晰的,是中国传统译论的文体特征和思维导向。音义之分、言意之辨、形神之似,便成为中国传统译论长期关注和争论不息的核心话题。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的缺陷 defects of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

中国传统译论的人文精神固然有其值得肯定的特质,但也暴露出它在理论上的诸多缺陷和匮乏。1. 理论意识不强:传统译论派的译论是议论式的而不是理论式的,谈论的是翻译的情况而不是对翻译的理论设定。基于个人直接经验者多而进行抽象理论思辨者少,内省式的直觉式的重复认识多而演绎式的论证式的理论展开少。结果,也就无法形成有效的理论文体,只能写出文笔优美的学术散文,和夹叙夹议的序跋小品。2. 基本范畴缺乏:理论体系的建立需要若干基本的理论范畴,以及这些范畴之间的逻辑的必然的联系和明晰的陈述,才能进行有效的判断和推导。由于传统译论多数借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艺学的术语,又不对这些术语做必要的界定和说明,这就

使得某一理论家与其他理论家之间,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在思想上缺乏必要的划界和限定,致使语义流变不居,理论难以深入和展开,在一些基本现象上一再重复。结果,就无法形成不同的译论学派,只能终止于个人意见的交流和十分有限的理论创新。3. 学术基础薄弱:学术基础薄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缺陷,其根本原因是自然科学不发达,演绎思维不发达,形式逻辑不发达,形式语法不发达,一句话,缺乏西学的治学传统和现代科学的创新精神,具体体现为学术规范不严谨,著作权和版权意识淡漠;实践理性为其主要思维导向,不能彻底追问形而上的终极问题;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周期性破坏和激变,学术传统和文明成果难以连续和有效地继承等。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阶段 s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

王宏印把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归结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包含若干有代表性的理论并可能围绕一个中心问题:1. 肇始阶段(佛经序翻译理论):该阶段以佛经翻译实践为依托,以译经序言为主要形态,关于佛经翻译的初步的理论感觉,其中最重要的译论包括: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八备",玄奘的"五不翻"以及赞宁的"六例",基本上涉及本体论、主体论、文本论、方法论诸问题,但语焉不详,好立条目,难成系统。2. 古典阶段(正名论翻译理论):该阶段以借鉴中国传统修辞写作理论和西方语言学理论为主体,试图找到和建立中国译论的基本思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包括:严复基于传统写作理论的"信达雅"三字诀,章士钊和胡以鲁关于音译意译的争论。该阶段主要围绕翻译标准和译名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理论化和操作化倾向均较前为甚,有制订翻译规则之企图。3. 玄思阶段(哲学化翻译理论):该阶段以借鉴哲学原理介入翻译理论的研究,或者把翻译问题哲学化,以求解决翻译是否可能的问题,企图建立翻译的哲学基础,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包括:贺麟关于翻译可能性的论证,金岳霖关于"译意"和"译味"的分界,主要围绕翻译是否可能或可译性问题进行玄思,但哲学思辨味道太浓,未能完全转化为翻译学本身的理论问题。4. 直觉阶段(文艺学翻译理论):该阶段以回归中国传统文艺学的直觉思维方法为理论源泉和思维特征,尤其注重借鉴语源学资料和关注语言问题,名义上试图融合东西之学,实际上乃是回归国学的根本,例如意境问题、形神问题、风格问题等,最重要的理论包括:钱锺书的"化境"说和傅雷等人的"神似"说,其核心部分仍然围绕翻译转换问题,把标准和方法融为一体,侧重于文学翻译本质论的讨论。

如果按照中国文化的社会历史分期可以采用三分法,即分为古代部分、近现代部分、当代部分。因此这里的四分法仍然可以与之对应,即古代部分对应于肇始阶段,近现代部分对应于古典阶段和玄思阶段,而当代部分则对应于直觉阶段。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近现代部分的译论实际上是古典阶段与玄思阶段的融合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并存状。古典翻译理论以严复的回归中国传统文章学的译论为代表,体现了中国译论的基本精神(即人文精神)和理论形态(即简约形态),而玄思的翻译理论,则是从哲学角度对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考察,属于比较深入而系统的理论考察。若要加以细分,则可以说在近现代的母体中,孕育了古典与玄思两个孪生儿,不过在近代与古典、现代与玄思之间各具有更多的联系而已,也可以说近现代部分同时包含了古典与玄思两个彼此有关的理论形态或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的基本问题 basic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

通过初步清理,可发现,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涉及十大比较有价值的问题:1. 质派、文派问题;2. 音译、意译问题;3. 直译、重译问题;4. 译意、译味问题;5. 神似、形似问题;6. 翻译标准问题;7. 可译性问题;8. 境界问题;9. 语言问题;10. 译者问题等。这些问题,根据现代译论的总体问题设计,可以转换和归纳为下列问题:1. 本体论问题;2. 方法论问题;3. 认识论问题;4. 标准或原则问题;5. 主体性问题;6. 可译性问题(或不可译性问题)等。传统译论中比较缺乏或严重缺乏的译论问题包括:1. 翻译过程问题;2. 效果评价问题;3. 文体对应问题;4. 语义转换问题;5. 翻译批评问题;6. 文化交流与诠释问题等。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

传统译论理论形态的转换是在意义诠释基础上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它是传统译论向现代译论转化的关键步骤,也是对传统译论进行现代阐释的逻辑归宿,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转换:1. 论题转换。论题转换就是把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不明确或不适当的问题转换为现代译论所需要、所要求的论题,从中发掘或开拓出有意义的内容。为了实现论题的成功转换,要注意排除历来翻译理论界或整个学术界的成见,从"纯理论"的高度立足发现和落实转换。2. 概念转换。概念转换并非全然是语言问题,而是基本的思维形态的转换问题。运用现代译论概念来替换中国传统译论概念的时候,要抓住本质的核心的词语进行转换,而不能拘泥于个别字句的原有意义。在缺乏基本的核心词语作为理论依托的时候,可以考虑从整体意思中抽取出一个核心意思,然后进行现代理论的命名。在一系列相关概念进行转换的时候,要考虑严格的分类和各条内容的提要性阐释。3. 形态转换。理论形态的转换比较困难,彻底的转换几乎不可能,除非原有的理论问题明确而且论述近乎完备。理论形态转换的实质不仅是表述方式和行文的转换,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理论意识和时代精神的注入。理论形

态的转换任务因原有理论与现代译论的差距和角度错位而有不同处理。这一部分阐释的主要任务是将哲学问题作翻译学科化的转化。（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　termination of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

王宏印认为，从理论上说，传统译论的终结主要是传统译论自身的问题造成的，比如：1. 理论问题有限，多数老化不堪，例如直译意译问题和翻译标准问题，有些讨论一再重复，毫无新义。2. 理论范畴有限，缺乏准确界定，例如神形、虚实、意境等范畴，使用泛滥，且无法与西方现代译论接轨，不能进入新的理论视野。3. 理论视野狭隘，甚至故步自封，例如只知文学而不懂科学，只见中国而不看世界，只会归纳而不善演绎，无从产生新思想、新方法。

现对以上三方面问题进一步解释如下。

首先，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论问题。许多传统的译论已经老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穷尽了，或者一点也无法推进了，而是说，这些问题已经不是今日的翻译理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了，已经由中心被放逐到边缘了。第二是范畴的老化和有限问题。如果总是运用中国传统美学和哲学的那些单调、固定、数量有限而又未经过严格界定的理论范畴，那么翻译理论就只能在传统理论视野内兜圈子，无法进入新的理论视野。但这也不是说这些范畴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至少在实践中，有时仍然可以用来总结和提升个人经验，只是与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创新无缘了。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即理论视野问题。这主要是指要从传统国学到现代西学的一个飞跃，需要寻找进入国际学术圈子的突破口，以便与国际译界和学术界进行理论对话。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各种要素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宏印认为，传统译论的终结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需要翻译理论工作者花一番气力，作一番努力的。这种努力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实质上包含三个方面的工作：一、历史评价。历史评价主要是历史学的研究，如对于传统译论进行概说和分期研究，对于某一理论对当时以至以后所产生之影响研究以及对于整个传统译论的历史评价。总之，历史评价只把传统译论当做历史事件和文化遗产进行对待，总结过去，洞察今天，预测未来，而不求其别的价值，但需研究者对于中国和西方的翻译史和学术史兼通，才能作出准确的评价。二、理论评判。理论评判的目的在于从理论兴趣着眼，对传统译论进行理论界定和性质确定的研究，考查的问题包括传统译论的理论来源、理论课题、理论方法、理论形态以及定性定量、信度效度等，与历史学家的眼光有很大不同。理论评判是理论专家的眼光和理论史家的眼光，其关注的要点在于评价某一译论或整个传统译论的得失，以寻求理论上的新生和出路。它需要研究人员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和公正的评价尺度，以便通向最终的理论创造。三、创造转化。创造转化是一切理论产生的文化机制。当我们对于传统译论采取创造性的阅读态度的时候，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工作就已经开始了。但一般说来，创造转化并不要求对所有的传统译论都进行彻底的研究和中肯的评价，而是按照读者的兴趣和当时正在进行的创造活动进行智慧沟通，从中激发心得火花，使新思想得以诞生，然后提出新的假设和思想，加以验证和系统化，使其产生新的译论。它要求读者有别样的学术视野和理论的创作冲动。可见，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实际上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即新译论的产生，而非传统消极的消亡。（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三法　three methods for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

王宏印（2003a）结合严复翻译思想的研究提出传统译论研究需重视以下三个方面：

一、价值判断：所谓价值判断就是对一种理论作为文化事件或作为理论本身，是好是坏、有用无用、用途如何等进行估计和判断。具体包括：1. 历史现状评价。例如，关于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所起的积极的巨大作用，一般没有异议。主要分歧在于如何评价它在当前建设中国翻译理论中的作用，有的认为“信达雅”有永久的价值，有的认为它只有目前的借鉴价值。2. 理论价值判断。不考虑该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影响作用，只就该理论本身的科学性、逻辑性、创新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认为它是好是坏，是有用抑或无用，一般以研究者本人的理论修养和理论定向为转移。例如，有的认为“信达雅”是好得无以复加、无与伦比的理论，有的则认为它根本就算不上理论，有的认为属于中国传统理论而不是现代理论。

二、理论阐释：对一种理论进行理论阐释可以是意义阐释，也可以是文化渊源阐释。前者重在揭示该理论本身所要表达的意义，后者则重在说明一种理论的来源和影响。揭示理论的意义可以用语源考察的方法进行文字的解释，可以对作者的构思意图进行推测和判断，也可以进行文本结构分析，例如可分析“信”“达”“雅”三者的关系和比重，并就该理论作为整体的本质内涵及其适用范围进行说明。进行文化渊源考察就是考察该理论的文化资源状况或作者所受的直接影响。例如，有人认为“信达雅”来源于西方翻译理论尤其是受泰特勒（Tytler）三原则的影响，有的认为这是地道的中国传统写作理论的翻版。刘宓庆则从“信”“达”“雅”的一字修辞格符合国人思维习惯等方面论证严复译论之所以历久不衰的文化历史原因。

三、现代转换：对传统理论进行现代转换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巨大影

响和学术国际化、现代化的运作局势,在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文论等领域进行现代转换已经是很多学者的着力点。因此,对传统中国译论进行现代转换乃是建立中国式翻译理论甚或翻译学的必要的理论准备,而今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也必须积极稳妥有效地进行,而不能急躁冒进。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包括概念范畴的转换,表述方式的转换,乃至整个理论形态的转换。转换应当是在对于一种理论的正确的价值判断的前提下,以准确的文本意义阐释为基础进行的语言转换。在这个意义上,转换也是一种翻译,而且是忠实的翻译。因此,不少人对于"信达雅"所作的新解释,都属于转换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只要不是要创立新的译论取而代之所做的局部修正也是转换的一部分。例如,不少人把"信"解释为"忠实",把"达"看做"通顺",把"雅"视为"风格",实际上就是在进行现代转换。就目前的情况看,概念上的转换多而表述方式上的转换少,整个理论形态的转换还有待于翻译理论界同仁进一步努力。 (王宏印)

民语互译 translation among ethnic languages

专指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转换,在多民族杂居地区此类活动较为普遍。我国拥有 55 个少数民族,在这些民族之间的社会生活、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中翻译无疑起着桥梁作用,由此形成了丰富的各民族语言互译的实践。民语互译较为发达的是新疆地区。在古代西域,多民族杂处,文化多方融合,常常双语和多语并行,西域各土著民族之间除民间口译活动之外,各种宗教典籍翻译也很兴盛。热扎克·买提尼牙孜等在《西域翻译史》中指出古代西域的翻译活动,其语种涉及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汉藏语系、印欧语系中的梵语、吐火罗语、和阗-塞语、波斯语、粟特语和阿拉伯语等。西域地区的多民族语种互译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字的地区,除占主体的维吾尔族之外,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民族也占有可观的比重,并有着各自独立的民族语言和文字,因此,民语互译也较为常见。在新疆地区的民语互译中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语族内互译,即同一语系内同一语族各语言之间的翻译,具体而言是指突厥语族内各语言之间的转换,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例如维吾尔语译为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译为维吾尔语等等。具有较近亲属关系的语族内语言在语法结构、词汇等方面比较接近,又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源头,与不同语族、不同语系语言之间的翻译相比难度较低。 (李宁)

民族典籍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y of ethnic classics

指围绕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典籍文献所展开的翻译研究活动。它是民族语文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由典籍在各民族语言文化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民族典籍翻译是典籍翻译中一项较有特色的内容。由于渊源、对象等的不同,民族典籍翻译表现出了自己的一些性质和特点:首先,民族典籍翻译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其次,民族典籍翻译中富含着为数众多、不为人知的特殊翻译现象;再次,民族典籍翻译是和具体的民族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术翻译活动。中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具有双重属性,是横涉民族学与翻译学两大学科的跨学科或边缘学科领域。一方面,它源出自民族学的翻译研究方向,承袭了纯正的少数民族血统;另一方面,它统归于翻译学中的典籍翻译研究分支,具备典籍翻译研究的一般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族典籍翻译身兼二任,学跨两科,成为民族学与翻译学融会贯通的交叉研究领域。换句话说,民族学和翻译学这两大学科在民族典籍翻译这一脉支流中得以交汇融合,使后者成为学术价值和学术潜力巨大的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可挖掘的次级研究分支和尚未被重视的旁涉研究分支。

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又可细化为民籍汉译、民籍外译、民籍民译和民籍今译四个研究分支。这是目前亟待加强的一个译学领域,也富含重要价值。建国后,民族典籍被大量译介为汉语,同时,有关民族典籍的研究也有了长足发展(例如藏族的《格萨尔》就有"格萨尔学"),这就为民族典籍汉译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一些代表性的民族典籍在国外已经有了多种语言的译本,有些甚至具有相当的意义和价值,例如,西方的蒙古学研究就是从蒙古族典籍《蒙古秘史》的翻译开始的,研究这些民族典籍在国外语言中的翻译、传播和影响意义重大。此外,我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之间也曾有过密切的交往和接触,开展了大量的翻译活动,有的甚至有了相应的理论创见,这些在《语言与翻译》、《民族翻译》等学术性期刊均有系统研究。鉴于这一情况,民籍民译研究值得重视。除了不同少数民族之间典籍的互译研究,同一民族内部同一典籍的民籍今译研究也要引起重视。除此之外,汉族典籍翻译研究中的汉籍民译研究分支和外国典籍翻译研究中的外籍民译研究分支,也应得到关注,它们是因以往对民语维度的重视不够而几近空位的译学领域,也是需要重新发现和发掘的较新方向。毋庸讳言,由于对"民语"的强调,典籍翻译研究的视野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不仅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汉籍民译研究和外籍民译研究也得到了突出。对于它们的观照有助于打破国内长期以来集中于汉族主流文学/文化-西方文学/文化翻译研究的单一模式,将为典籍翻译研究展开一片崭新而宏大的学术远景,为充实和建构完整的中国翻译学框架而开拓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邢力)

清代维吾尔族的翻译 Uygur translation in Qing Dynasty

1755 年,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控制了天山以北地区,随后在 1759 年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控制了天山以南的地区,自此,天山南北均归清朝版图,并改旧称"西域"为新疆。这一时期,由于以阿拉伯字母为

基础的维吾尔文(即察合台文)逐渐成为维吾尔族人民统一使用的文字,也是西域,即新疆地区,较为普及的文字,所以把其他文字的作品翻译成维吾尔文的翻译活动也日趋频繁。

清政府对新疆的统一和管辖,客观上促成新疆维吾尔族翻译活动的繁盛和发展。一方面,清政府改革了原有的伯克制度,派遣一批满族和汉族官员来新疆管理军事和行政事务,从而产生了对于官文和日常事务进行翻译的现实需要,清政府积极培养和召集兼通汉文和回文的人员充任通事。据《清朝通典 · 边防典》记载,1776 年(乾隆三十一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署衙就已设有通事 20 人。当时,"汉人鲜有识回文说回话者,回人识汉话者每城有三数人。"(买提尼牙孜 · 热扎克 1996: 221)通事主要由通汉文的维吾尔族人担任,政务翻译构成当时维吾尔族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统一的政治局面和相对稳定的局势,为文学翻译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维吾尔族的文学翻译发展很快,翻译介绍了大量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作品。西域与波斯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无论在回鹘西迁以前还是在回鹘西迁之后,波斯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过重要作用;加之先后多信仰伊斯兰教,两者之间的交流未有间断。清朝维吾尔族文学翻译繁盛,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译者,其中包括维吾尔族诗人、翻译家毛拉穆罕默德 · 铁木耳,他将波斯文的印度古典文学名著《卡里来与笛木乃》译成维吾尔文,除此以外,他还翻译了波斯文作品《美德篇》和《安瓦尔苏海里》等。清朝较著名的维吾尔族翻译家还有穆罕默德 · 沙迪克,代表译作为《拉失德史》;帕孜里 · 哈姆西 · 叶尔坎地,代表译作为菲尔多西的《列王纪》;穆罕默德 · 阿布都拉汗,代表译作为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

清朝维吾尔族的翻译内容丰富,包括官文、历史著作、哲学著作、民间文学、经典文学著作等多方面,其中尤以文学作品的翻译最为兴盛。同时,由于翻译家自身大多为文学家,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表现出较高的创造性,处理灵活而不拘泥于原作,对于原作的文体,甚至故事情节都有改动。例如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就由诗歌体翻译成了散文。波斯和阿拉伯诗歌、民间传说、寓言故事等作品的翻译对维吾尔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宁)

近代汉语小说的蒙古文翻译　novel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into Mongolian language

将汉语作品大量译为蒙古文,是近代蒙古族文学的一大景观,其中又以小说的翻译最为繁荣。社科院扎拉嘎研究员将这些译本分为三大类: 其一是讲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类,有《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列国志》、《英烈春秋》、《西汉演义》、《东汉演义》、《隋唐演义》、《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征西演义全传》、《粉妆楼全传》、《五虎平南全传》、《反唐演义传》、《残唐演义》等;其二是公案类,有《济公传》、《施公案》等;其三是言情类,有《红楼梦》、《今古奇观》、《金瓶梅》等。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在《中国章回小说与话本的蒙文译本》一文中,则按照中国旧时的分类法,将其分成讲史小说、烟粉类小说、灵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四类。不论分类方法如何,近代汉文小说蒙译的兴盛繁多可见一斑。这些小说译本,均以手抄形式广为流传,而且同一原本往往有多种抄译本,抄本除在中国境内流传外,还遍布蒙古、前苏联、日本、德国、丹麦、美国、瑞典等国的图书馆。

这些汉文小说的蒙译,一方面拓展了蒙古语阅读范围;另一方面也为蒙古族本子故事的繁荣提供了基础条件。这一翻译活动从总体上表现出以下一些特征: 1. 它突破了清代早期和中期汉文著作蒙译活动的整体格局,从以往以官方为主逐渐过渡到以民间为主的翻译活动,在翻译活动中减少了许多束缚译者的框框。2. 从目前保存的汉文小说蒙译本书目分析,数量上仍然以描写战争故事的讲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类最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由民族审美心理习惯所决定的。3. 根据译文的语言特征判断,近代汉文小说的蒙译活动,曾经先后出现过两个中心,一个为环绕土默特左旗和土默特右旗的东南蒙古地区;另一个为环绕库伦的喀尔喀蒙古中部地区。4. 小说的翻译多数都存在着对原著不同程度的删节、改写和补写,它们从一定意义上传达出了译者的审美愿望,具有再创造的性质(荣苏赫等 2000)。近代汉文小说的蒙译活动包含着多层面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在推动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和蒙汉文化的交流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邢力)

讹　e (deviation)

指钱锺书关于翻译的运行机制和变异功能的典型说法,尤其是追溯到汉语语源的一种文字解读,曾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论述:

>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polysemy, 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以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钱锺书 1985)

译界按照上述语源学追溯所提供的语言场,把它划分为若干个分属于现代翻译科学不同领域的专题,并加以简要的说明: 1. "化"即"化境",是"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或"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可见,这是一个抽象的、不易达到的至高的境界,也可以说是翻译的"绝对者"和形而上学。如同绝对真理或纯诗一样

不可能完全实现,只存在于观念世界里。2.“讹”即对原义的悖谬或反逆,也就是钱锺书所谓“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从原文到译文“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这是翻译的形而下的实现过程,即“异化”过程,其中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3.“媒”和“诱”“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这就是翻译的跨文化的交流作用,和译文作品对读者的感召作用。虽然钱锺书是站在本族语立场上说话的,但实际上适合于整个翻译事业,但因为作者、译者、读者个体诸多因素的卷入而使得翻译的效果实际上不尽相同。

如果说翻译是译者的“创造性叛逆”,那么,“创造性叛逆”也可以说是一种“讹”。它却是合情合理的“讹”,是翻译这种职业所允许的“讹”。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找出了几种可供辨认的“讹 ”的类型。其一是夸大式的“趣”,尤其是在当时翻译规范尚未建立,翻译方法比较自由的年代,这种沿着原作风格同一方向上的夸张之趣,就更有其存在的不可避免性了。于是钱锺书说:“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承认林纾颇能表达迭更司的风趣,但从这个例子看来,他不仅如此,而往往是捐助自己的‘谐谑’,为迭更司的幽默加油加醋。”(钱锺书 1985)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加油加醋”,也可以认为是原文信息损失的“合理补偿”。其二是对于原作效果的圆满化的修饰,虽然有弥补原作缺陷的意图,但毕竟有点“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的嫌疑,还是超过了译者的职责范围了。钱锺书说:“换句话说,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从严格的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钱锺书 1985)其三涉及译者对于原作的疑难处理不当所出现的“讹”。“不能解决而回避,那就是任意删节的‘讹’;不肯躲避而强解,那又是胡乱猜测的‘讹’。”这真是翻译的两难之境!当然,除了删节原作的难点以避免之外,对于原作进行有意识的内容上的删节,便是涉及文体的伤筋动骨的变动了。其四,除了译者有意识的“讹”,还会有无意识的“讹”。例如,林纾与口述者之间的谁“讹”谁不“讹”的问题。“而‘讹’里最具特色的成分正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也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起了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多少因此而免于全被淘汰。”可见,这一部分“讹”,倒是应当归于“创造性叛逆”的范畴了,因为它至少为译文增加了一点“文学性”。 (王宏印)

格义法 geyi (transliterate by analogy)

一般认为,格义是指用中国本土固有的思想哲学概念去比附佛教哲学和教义,以便僧俗大众易于理解接受的一种解经方法。如早期佛教徒安世高在译《佛说大安般守意经》时,就攀附道家学说,把细数出入气息防止心意散乱的“安般守意”禅解成“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为名,是清净无为也”。支谦把《般若道行品经》译为《大明度无极经》。“大明”“无极”取自《老子》的“日常曰明”和“复归于无极”。这种现象就叫“格义”。现存典籍中,给予格义比较明确解释的是梁代慧皎所撰的《高僧传·竺法雅传》,其中说道:“法雅,河间人,凝正有气度。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仕子,或附咨禀。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竺法雅和康法朗是西晋时人,由此可以知道至迟西晋时便采用了“格义”方法。“外书”,是指佛典之外的中国书籍,佛书则被称为“内书”。“经中事数”,是指佛经中的名词概念,如五蕴、四缔、十二缘生、五根、五力、七觉,等等。“拟配”,即是对比,即用原有中国的观念对比外来佛教的观念。汤用彤认为,“格”的意思是“比配”或“度量”,“义”的含义是“名称”“项目”或“概念”,所谓“格义”是“比配观念(或项目)的一种方法或方案,或者是不同观念之间的对等”(汤用彤 1995: 411～412)。因此可以说,“格”就是“比较”和“对应”的意思;“义”则是“词义”“语意”的意思。“格义”就是比较对应观念或名词意义的一种方法或手段,既是概念对等的翻译方法,也是比附连类的解说方法。使用这种方法的起因是由于学习佛典的门徒“世典有功,未善佛理”。由于佛教是外来宗教,它原来赖以产生和流传的古代印度社会历史背景和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并不完全相同,佛教的内容结构、思想方法和经常使用的概念范畴,也与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不一样,加上语言文字的隔阂,理论的艰深晦涩,因此,要使具有中国文化根底的人弄懂产生于异质文化的佛教原理,在最初的佛经翻译和解说中就必须以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思想方式来予以说明,并适应中国学说和现实社会的需要而进行一些调整和变通,于是,由“格义”方法带来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随之开始。采取格义的方式,增强了人们在它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求同倾向”和对它的认同,削弱了排拒心理,这是佛教能够在中国立足生根的心理基础,也是外来文化进入本土的必要过程。有了求同意识,就会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宽容,反之则会严加排拒。从格义方法的产生和运用,可以看到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两个方面都有着求同的倾向,这对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得以海纳百川、不断发展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陈大亮,马霞)

佛经翻译之汉语影响 influence of translating Buddhist sutra on Chinese

佛经翻译对汉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对中国声韵学最重要的影响是四声、反切、字母和等韵。汉语声韵分为平上去入四声,起于南朝齐梁之间。陈寅恪在《四问三声》一文中认为,平上去三声是依据和模拟中国当时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时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反

切是一种汉字注音方法，就是用两个汉字注一个汉字的音，分别取上一个字的声母和下一个字的韵母合在一起，就是所注的音。一般认为这种注音方法始于汉末。汉末正是梵文随佛经传译输入中国之时，学梵文者当然先知其拼音，"反切法"便是受梵文拼音的启发，利用两个汉字，按照"声合韵"的原理，注出无穷之字的读音。在中国声韵上，所谓字母是指声母，亦即"纽"的代表字。到六朝时，由于梵文的音理已为学者所熟悉，因此产生了"双声""叠韵"的名目。由于作诗押韵的需要，"韵"的研究较早就发达起来，有了成部的韵书。但对"声"却没有系统研究，直到唐末才出现"字母"。而这完全是受梵文的影响，必须归功于佛经的传译。等韵是进一步应用字母来讲明韵书上的反切，是由切语之学所变而成的。中国古代声韵学，在审音方面以等韵学最为精细，但如果没有佛经的传译，这门学问也不会产生。第二，佛经的传译带来丰富的词汇和构词方法。佛教词汇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表达抽象概念的"表义名言"和表达具体事物的"显境名义"，两者不但有"随物合成"的本义，而且有"随事转用"的引申义。因此在佛经翻译过程中，不但使许多普通词语佛教化，而且也使许多佛教词法普及化，给汉语注入了许多新的成分。同时，佛教词汇的构词方法也给古老的汉语带来新的活力。佛教"六离合释"分析了五种构词方式：一、持业释，从体用关系构词，如"藏识"，识是藏之体，藏是识之用；二、依主释，从主从关系构词，如"眼根"，眼是主，根是从；三、有财释，从所具内涵构词，如"觉者"，觉为者之财(内涵)；四、相违释，从联合关系构词，如"微妙""神通"系由相同的同义词根构成，如"生灭""厌欣"系由相反的反义词根构成；五、带数释，从标数概括构词，如"三学""五蕴"等。这些构词法运用到汉语里产生了无数的新词汇，如"发电机"，机是体，发电是机的功用，即运用"持业释"构成；"死亡""坚硬""大小""东西"即是运用"相违释"构成；"三八作风""四项原则"即是运用"带数释"构成。

（马祖毅）

佛经翻译之文学影响　influence of Buddhist sutra translation on Chinese literature

按照胡适《佛教的文学翻译》中的观点，佛经翻译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1. 鸠摩罗什等人用朴实的文字翻译佛经，创造了一种新鲜的文体。"在中国文学最浮靡又最不自然的时期，在中国散文与韵文都走到骈偶滥套的路上的时期"，这种新的文体就弥足珍贵。2. 印度民族丰富的想象力在佛经和佛经故事中表现出来，丰富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文学创造力，"中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是印度文学影响的产儿。"3. 印度文学往往注重形式的布局和结构，长篇布局之外，其他也有小说和戏曲的形式特点。"他们的输入，与后代弹词、评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转引自罗新璋，1984：76～77)

（王宏印）

佛经译论十大范畴　ten major concepts in the theory of translating Buddhist sutra

在中国传统译论中，佛经译论不仅体现了丰富的翻译实践基础，而且有很好的理论范畴可以借鉴。这些范畴的借鉴也包含了进一步发展中国传统译论的可能。王宏印(2006)在《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中整理出佛经翻译十大基本范畴：

1. 味：中国传统译论中的"味"，和印度《舞论》中的"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假如不说后者是前者的理论来源的话。至少在审美趣味上，中国和印度同属于东方民族，具有相似的审美情趣，也属于情理之中。佛经翻译中"味"的概念——其本身就是一种翻译——借助于佛经理论本身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鸠摩罗什在讲到"改梵为秦"时，唯恐"失味"。道安更是注意到审美过程中的"味"不同于生理感受的五味，因而认为"淡乎无味，乃直道味也"。唐代的司空图，主张"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现代的金岳霖更是提出了"译味"说，把该说作为区分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的关键性概念。可见佛经翻译中的"味"源远流长，影响至今，值得继承和发扬。

2. 境：佛教中的"境"，不是中国先秦语词中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是体现宗教精神的圣灵空间，强调的是本乎自然的妙悟天机，达到无差别的自由境界和去除障碍的禅意高度，即所谓的"心存佛国，圣境冥现"。而且这种境界不是经过苦思冥想的逻辑推演而能求得，而是要达到不思量便自然而然获得的艺术化境地。唐代的皎然在《诗式》中注重意境，尤其注重诗的取境。近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标榜"词以境界为最上"。翻译家林纾更是主张"境界义法，皆足以资后生而进于古"。文艺理论中的境界、意境等等说法，都是一个"境"字了得，而在翻译领域，至今仍在讨论如何传达意境或境界的问题，可见沿着佛经译论的线索，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3. 化：钱锺书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段话，集中说明了"化"在翻译理论中的作用，而且他把"化"和"境"相联系，提出了"化境"问题。其实，今日翻译中的"化境"说，也可以说来源于佛教的"化"(指教化和迁化)，要求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高度，在文学创作中强调浑然天成，在翻译中就是没有翻译腔的意思。换言之，在钱锺书那里是"脱胎换骨"，在傅雷那里则是"化为我有"。如果把"境"理解为"视阈"或"世界"，那么，"化"就是"视阈融合"，究其渊源，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早就有"大而化之"的意思了。

4. 隔：无论在认识论上还是在审美过程中，"隔"都是一个重要概念。在佛教认识论中，所谓"隔"就是主体因无明而不能认识真谛的状态，而在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理解中，"隔"是由于语言文字的关系造成主观不能见之于"客观"的境界中，因而不能尽现"话语都

在目前”(王国维语)的直观境界。沿着王国维的思路,钱锺书就“不隔”在翻译中的表现撰文论述道:“好的文艺作品,按照‘不隔’说,我们读着须像我们身经目击一样。”其实,结合到西方的古典译论,所谓“不隔”,就是译文要有透明性,使原文所写景色历历如在目前。而在一个特殊的翻译维度上,“不隔”也可以说是“信达雅”的“达”,也就是超脱或克服了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差异障碍而直抵原本境界的“信”。

5. 圆:在所有的几何图形中,圆是最美的,也是最大的。在佛教认识论的意义上,圆是周遍和不执。前者是为了执两而用中,以实现消化对立面的理想境地;后者则在于超越名相之说,直抵难以言说的自由本体。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在伦理上,圆是团圆,在感觉上,圆是圆满。在艺术领域,圆几乎无处不在。京剧唱腔要字正腔圆,书法用笔要方圆兼济。钱锺书论写文章,曰:“乃知圆者,词意周妥、完善无缺之谓,非仅音节调顺、字句光致而已。”同理,在翻译问题上,也有词圆和意圆之分,合而为一,即所谓“词理具足,不欠不余”。如果再加上译文气韵的充盈和圆足,这一圆融的思想在理论上就获得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6. 妙:不同于现代西方美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美”,甚至与中国传统美学中审美概念的“美”也不尽相同,佛教理论中的“妙”具有更高的本体认识层次和更加不可言说的神秘性。它带有“极妙穷玄”的隐微和神奇,以至于到了语言和思维、理智与想象难以把握的境地。所谓“所言妙者,褒美不可思议之法也。”在艺术创作中,强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主体自由状态。而在审美体验中,要做到“穷达幽旨,妙得言外”,才能有所感悟,有所收获。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妙极”是一种极端的赞美和感叹,而书画鉴赏中的分级,则有妙品一级。运用到翻译鉴赏和批评中,于是就有了远超于“佳构”之上的“妙译”之极致。

7. 和:“和”作为佛教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的是“不二”“无分别”“中”等概念。若是借用一个更加常见的复合概念,则可以理解为“和合”。在本体论上所谓“众缘聚会,名为合和。”在认识论上则谓“言合和性者,谓于诸法不相乖反。”所谓“和合”,按照西方哲学的说法,就是不可分离的联系在一起彼此包容成为一体的意思。以佛入学的梁启超曾经称赞玄奘的翻译达到了“直译意译,圆满调和”的境地,甚至主张在翻译语篇和文体层面上“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如果根据“和”是“中和”,不走极端,超越对立,而是让各种因素和谐共处的理解,那么,也可以认为翻译中的“和谐”说作为一种新的标准的考虑,自有其道理了。

8. 真:佛教的“真”,作为“真如”的简说,是本体论,即佛家的宇宙本体和理性极致,人格化为佛或佛性,常以莲花为喻,象征而为净界。相对于一切生住异灭的有情世界,即变动不居,因而也充满幻象的现象界,本真状态是不变的终极的本体,和修行能达或欲达的至高境界,即“即真”。僧肇曰:“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说明了妙悟或顿悟在抵达佛教本真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具体而言,在翻译研究领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说,集中体现了翻译本体论的思想,即所谓失真的问题,转换为现代译论说法,就是翻译本体论的失落。假若要返回原本的真如状态,那就是要达到“如如”。

9. 言:和道家思想一样,佛家也有语言观,而且也认为本体不可言说,所谓“道本不言,言之则粗;禅本无说,说之则末。”但是又认为,离开了语言的学说和思考,则大道又无从认识和道说,故而又说“欲识大道真体,不离声色语言。”这种“不即言,不离言”的辩证认识,实在有其深刻的道理。也就是说,语言可以表意,但也可束缚思想,可以有助于表达真如,但也可拘泥言辞,形成认识障碍。这样,在进入文学创作和接受的时候,以及在进行禅意修行和解说的时候,都可能造成桎梏,即所谓“语言之牢笼”。理解了这一点,对于掌握翻译中的不译之译,言外之意,以及若即若离,不脱不粘,不似之似似之的艺术化处理的奥秘,都是至关重要的。

10. 修:佛法的修行方法有一定的要求,一定的途径,一定的阶段性。彦琮的“八备”说,直接而全面地归纳了佛经翻译人员所要求的道德修养、心理素质、语言能力、知识结构、治学精神等,这里不再赘述。只说“戒定慧”三学作为参考。所谓“戒”,就是严持各种戒律,防非止恶,就是要知有些不可逾越之处。所谓“定”,便是坐禅入定,专注一境,指的是精神专一,渐入佳境才能有所成就。所谓“慧”,包括闻、思、修三慧,就是听闻、思考和在禅定中修观而获得修慧。如果结合佛家的悟,即未悟、初悟到彻悟的否定式进取历程,那么,对于翻译的修习和进步就有演进和极致的一般意见了。傅雷所谓的“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就是佛经译论中“修”这一范畴的体现。 (王宏印)

佛经藏译及三大原则 thre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ng Buddhist sutra in ancient Tibet

古代的吐蕃从创制藏文起就开始了翻译活动。松赞干布(617～698)时期,松赞干布从大唐、印度、尼泊尔等地请来智者和译师,与藏族文人一起组成翻译队伍,共同翻译了大量佛经经文,包括《宝集咒》、《月灯》、《宝六经》等。赤松德赞(718～797)时期,佛经藏译迅速兴起并达到高潮。当时派人到天竺国取经求法,修建寺庙桑那寺,设立译经院,从事译经活动的僧人上千名,翻译佛经 27 门,约六七百种。赤德松赞(787～815)时期,佛经藏译又一次达到高潮。赤德松赞在前人赤松德赞第一次文字改革的基础上,提出佛经藏译三大原则和四方法,形成了系统的佛经翻译理论原则。这三大原则是:1. 要符合声明(语言学)的原则;2. 要符合佛经经典的经义;3. 要使吐蕃人易于理解。四种翻译方法包括:音译、意译、直译、改译。另外,还提出翻译的注意事项若干。

(洛松泽仁,王宏印)

译名方案三十条　thirty articles for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胡以鲁的译名方案三十条主张见于他的《论译名》一文(刊于 1914 年 2 月 15 日《庸言报》第 26～27 期合刊)。首要的二十条讲的是意译,其中又可分为几种情况:

1. 尽量用汉语固有之名。虽然有的名词“具体而微”,有的“概念少变”,有的“废弃不用”,也可恢复使用。但是,有的已经被新词所替代,当然就不再沿用旧词,而应换用新词了。(第一条到第四条)

2. 国语所无,又有经过日语转译来的术语,可以借用。首先是日语中的汉字,与国语相通的,可以借用。例如,“社会”“淘汰”。有些意思大体吻合的,如“心理学”,“心”为旧义,也可借用。容易引起误解和混淆的,可改动而用之。但若日译不合汉语语法者,则不用。日文固有之词语,假同训之汉字,日人所谓宛字,则不用。(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3. 原语中一词多义,则分别译之。例如 sovereignty 可根据上下文译为“主权”“统治权”或“至高权”。语义较丰者,也可用汉语集字法译之。例如用“生计”译 economy(经济)。有不同语源的,要慎重对待。例如来自拉丁的 liberty (宽肆)和英语本身的 freedom(解脱)。(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四条)

4. 意译的几条原则包括:“取主名之新义”“取易晓之译名”。音义不可兼译。但形容词屈折词尾可兼顾音义,如“的”“性”。一义可有动、名两用之词,重在译名词,例如,definition 和 define ,译为“界说”,作动词时“则不妨加‘作为’等字”。(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5. 译名固不能求全,但“浅陋、迷信、排外、媚外等义不可有。”(第二十条)例如“器械之属,故有其名者,循而摭之;故无其名者,自我译之。” 这实际上是为译名制订了基本的原则,谓火柴为洋火,浅陋也;谓钟表能自鸣,迷信也;谓西餐为番餐,排外也;谓洋帽为大帽,又媚外也。

关于音译,凡有十条,但不是一点不能有意译。其中包括人名、地名、官职、鸟兽草木、金石化学、理学(物理学)、机械、玄学(哲学)、宗教、历史上的文化局限词,等等。胡以鲁提出的三十条详细内容中的一些具体例证不必细究。但其翻译策略和方案大部分是正确的,可以借鉴。　　(王宏印)

美化之艺术　meihua zhi yishu (beautifying translation)

指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也是他对于自己的翻译理论的最简约最形象的表达。他总结说:“我的文学翻译理论可以概括为‘美化之艺术’。一、‘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用英文说,就是 best words in best order。Best word 指具有意美、音美的文字,best order 指具有形美和音美的次序。语言学派不谈美,下焉者只谈‘形似’,上焉者也只谈‘意似’,却不谈‘神似’,不谈‘创造性’。二、‘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一句话,就是化为原作者用译语的创作。三、‘之’指知之、好之、乐之‘三之’;使读者知道原作说了什么,对译作有兴趣,译作对读者有吸引力。四、‘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三美’是本体论,‘三化’是方法论,‘三之’是目的论,‘艺术’是认识论。这就是‘美化之艺术’。”(许钧等 2001: 49)

这段话的渊源和结构可作如下分析:“三美”来源于鲁迅,为文学艺术之基本要求;“三之”为孔子《论语》中的言论改换而来,本为求学之境界或动机;说“艺术”是“随心所欲,不逾矩”,乃孔子谓人生七十之言论,作为境界是人生之极致。“三化”是许渊冲自己的见解,由传统思维之“深化”类推而出。至于何谓本体,何谓方法,何谓目的,何谓认识,则是向着西方哲学系统的归化。以“美化之艺术”归结全部,则是中国传统思维之极度简洁的体现。许渊冲的译论在总体上属于传统译论而非现代译论,但已经有了一些基于西学的归纳和力求系统化的致思导向。参见“三美”

(王宏印)

传神　lifelike

源出东晋顾恺之(字长康,约 348～409)的人物画论。《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画人》中记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意思是说,顾恺之画人物,有的几年不点上眼珠,其理由是四肢的美丑,本来和精妙处无关;而画像要传达一个人的精神气质,正是在这(“阿堵”意为“这、这个”)眼睛的神采里面。在当代,傅雷在他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说道:“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以实际工作论,翻译比临画更难。”(转引自罗新璋 1984: 558)

舌人　interpreter

古代司通译之官。《国语·周》中说:“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注》:“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也。”《新唐书》上《突厥传》说:“来朝坐于门外,舌人体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

达旨　expressing one's intention by translating

又作“达恉”,源出《晋书·裴頠传·崇有论》,意为“表达意旨”,或者说,“表达意思之所在”。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达旨”就是“表达原文的意思”。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这大致是说:译文不斤斤计较逐字逐句的对应,而意义则不使违背原文。我之所以说这是达意,而不称笔译,只是取其便于正确发挥,但实际上不是正确的翻译方法。有的学者们认为这种译法不可取,如傅东华在《译书感言》一文中说:“严几道先生那种‘达恉’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恉’而后已。”

(转引自罗新璋 1984：366)范存忠在《漫谈翻译》一文中也说道："严氏所谓'达旨'，所谓'发挥'，一般理解为意译，实际上是编纂，完全超出了翻译的范围。"(转引自罗新璋 1984：778) (林夕)

形似 alike in form; formal similarity

与"神似"相对，本为我国古代诗画评语，指书画中表现出的人、物形貌相似。在翻译上，形似是指译文与原文在形态、结构、排列、辞格等方面的相似。比较任何两种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可以发现，两种语言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当然，不同语系的语言间的差异是主要的。)这相同之处，就是翻译上形似的基础。此外，翻译是吸收外来文化和外来表达方式的手段。在翻译中适当地借助于形似，可丰富目的语，例如目的语"武装到牙齿"(armed to the teeth)、"鳄鱼的眼泪"(crocodile tears)、"丁克族"(dink)等先后被汉语吸纳。但是，如果一味追求形似，必将以形害意，傅雷曾指出："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风格传统信仰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涵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转引自罗新璋 1984：558～559)

在翻译中，最理想的是神形兼备，"以形写神"，通过形似表现出神似，使形神浑然一体。小赫胥黎有一篇小说：*Two or Three Graces*，描写一个叫 Grace 的女人。她根本没有个性，嫁了三次，人生观随夫而变。一位译者将题目译作"二三其德"，女主角的名字译作"其德"，"德"暗示 Grace。"二三其德"源出《诗经》，后为成语，意为不专一。这就是神形兼备的一例，风味隽永，似有神助。在文艺作品的翻译中，只有形似而缺乏神似的译品是缺乏生命力的，因此，当两者不能兼得时，应求神似而不求形似。

狄鞮 interpreter; translator

参见"象寄"

译师 translator; interpreter

对历史上藏族翻译家的称谓。藏文作"洛杂瓦"，为梵语之音译，亦称"世间眼""会说两种语言之人"。在藏族翻译史上分"译师"(洛杂瓦)、"大译师"(洛杂瓦钦波，简称洛钦)、"校审译师"(休钦洛杂瓦)等，以区别不同译者的翻译水平及学术地位。

译经家 translator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指中国翻译史上的佛经翻译者。中国佛教史上译经多、影响大的四位译经家号称四大译经家。有两说：一指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与不空；二指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与义净。

通事 interpreter; translator

旧指翻译人员。五代时契丹置通事，以熟晓华俗华语之人为之。金国也用之。明洪武永乐以来设御前答应大通事，统属十八处小通事。嘉靖初废大通事，其小通事悉属提督官。

得体 appropriateness

意为"得"原文文体风格之"体"。得体体现在用词、造句、谋篇的各语言平面上。我国传统文论以及由此派生的译论对得体早有阐述。在数十年前，当文体学尚未建立时，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人们把对文体的研究只看做修辞学的一部分。尽管严复求"雅"的手段为"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当代已不足取，但他把修辞的真诚和文辞的达意看做"译事楷模"，实际上已把翻译对文体的要求包括进去了。周煦良在《翻译三论》中直截了当地说："雅就是和原文内容和体裁相称，要得体。"萧乾在《翻译的艺术》中的观点是：翻译的艺术是使译文得体；认为得体是翻译的最高标准。译文除忠实和流畅外，还要得体，得体就是指译文在文体风格上与原文非常接近。王佐良也指出："一切如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刘宓庆(1995：260)强调指出："翻译风格关注的中心是对原语风格意义所在，以及对原语风格意义分析的基础上获得译文风格对原文风格的'适应性'(adaptability)……(及)'恰如其分'(appropriateness)。"此处的恰如其分，意即依分依寸、恰当贴切地再现原文的风格。方梦之(1989)以英语科技文体为例，从词、词组、句子、语段、篇章等不同语言平面首次系统地阐述他的译文得体观。得体以正确为前提，但是正确性不能代替语言交际中的得体性。(据方梦之 1989：305～317)

象寄 interpreter; translator

从事翻译的人。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中说："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象寄"两字源于我国远古文献的记载。《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是说，"寄"是翻译东方民族语言的官员，"象"是翻译南方民族语言的官员，"狄鞮"是翻译西方民族语言的官员，"译"是翻译北方民族语言的官员。根据《疏》的解释，"鞮，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后人还注释道："寄言能寓风俗之异于此，象言能仿象风俗之异于彼，鞮则欲别其有服饰之异，译则欲辨其言语之异。"

感应论 response theory

感应论是曾虚白在《翻译中的神韵与达——西滢先生〈论翻译〉的补充》(黄嘉德 1940：147～159)和《翻译的困难》(黄嘉德 1940：117～128)两文中提出的翻译的核心概念。首先，他认为翻译是模仿，但模仿意味着翻译家要"变换方法"实现文学的感应。因为其一，由于民族"风俗、习惯及思想的不同"，同样的

词句会产生不同的“感应”。第二，因为“文学上的组织”的不同，翻译必须通过“精神的改造”来传达原文的“映像”。也就是要分析原文的“映像”结构，参照译本读者的心理，重新组织语言文字，以获得类似的感应。他认为感应可以解释“神韵”，“神韵”不过是“作品给予读者的一种心灵感应。换句话说，是读者心灵的共鸣作用所造成的一种感应。”作为翻译标准，曾虚白认为，好的翻译就是“把原书给我的感应忠实地表现出来”。这样在效果上会牵涉两个方面，一个是译者是否表现了“我在原文里所得到的感应”，一个是读者是否得到了“同我一样的感应？”要之，曾虚白的感应论具有文艺心理学的渊源和特点，和奈达(Nida)的读者反应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宏印）

翻译超越论 overstepping the original

指译文在文采上或立意上超越原作，译者有意“美化”“雅化”“拔高”原作。如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是因其杰出的译作而享誉世界文坛。在前苏联，马尔夏克(Маршак)所译的苏格兰诗人彭斯(Burns)的诗远比原作流行得多，其语用效果显然优于原作。此外还指译者改正原作中存在的疏漏和错误。超越论一般基于以下三点：1. 译者自作高明或被认为比作者高明。2. “发挥译语优势”。如说：“与西方语言相比，汉语确有优势，它可以美化和弥补原作的不足，有的作品并不精彩，但译成汉语却很感人。”3. 两种文化的取长补短。如许渊冲认为：“翻译又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在竞赛中，要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转引自王寿兰 1989：238～239)古今中外都有人持翻译超越论，但无论以“信达雅”为代表的我国传统译论或以翻译对等为代表的西方译论对此都持反对态度。至于改正原著在文字上和内容上可能有的错误是译者应尽的责任，应另当别论。 （文晔）

翻译隐喻 metaphors for translation

指对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所作的各种比喻。翻译是一项古老的人类活动。人们喜欢用各种比喻，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描述翻译的功用与性质，翻译的标准、过程与方法以及原文与译文、创作与翻译、译者/作者/读者等之间的关系。比如，有人说翻译好比绘画、演戏、摄影、钢琴演奏、雕塑画像、鹦鹉学舌、嚼饭与人、戴着镣铐跳舞……；有人说译者是奴隶、仆人、媒婆、代言人、隐形人、叛徒、应声虫、传声筒……；有人把“美而不信”的译文说成是“不忠的美人”，甚至把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比作“谈情说爱”，说好的翻译好比“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坏的翻译好比“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等等。近几年来，谭载喜在比较翻译学的框架下，采用跨文化方法对翻译比喻展开研究，将收集到的 270 多项中英文翻译比喻进行归类整合，对各类比喻进行系统讨论。

以喻论译通俗易懂，但有些比喻牵强附会、似是而非，在揭示相似性的同时又掩盖了相异性。其实，翻译就是翻译，译者就是译者，任何贴切的比喻也无法完全代替科学的论证。 （蓝春）

4. 翻译标准　翻译批评

翻译标准 criteria for translation

指翻译活动必须遵循的准绳，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是翻译工作者不断努力以期达到的目标。切实可行的标准对发挥翻译功能、提高翻译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经常提到的翻译标准有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锺书的“化境”、刘重德的“信达切”、许渊冲的“三美”，国外则有“等效”“等值翻译”“翻译对等”等。

翻译标准多元化 multiplicity of translation criteria

辜正坤(1982)在其《翻译理论教程》中提出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承认若干个标准共时性存在，并认识到它们是各自具有特定功能而又互相补充。由于翻译具有多重功能，人类的审美趣味具有多样性，读者、译者具有多层次，翻译手法、译作风格、译作价值因而势必多样化，而这一切最终导致具体翻译标准的多元化。在整个翻译标准系统中，绝对标准一元化和具体标准多元化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翻译的标准系统构成方式是：绝对标准(原作)-最高标准(抽象标准、最佳近似度)-具体标准(分类)。绝对标准是最高标准的标准。最高标准是具体标准的标准。这样一来，就推翻了传统的企图建立起一个唯一的能判断一切译作价值并指导翻译实践的实用具体翻译标准的设想。同时，翻译标准系统内部存在着可变主标准和可变次标准的辩证运动。各个具体标准相对于其余的标准来说都具有互补性。总之，多元翻译标准植根于人类翻译作品、翻译实践的多样化要求，并由于翻译本身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多重性功能而日益强化其多元互补特性。

翻译标准的层次 levels of translation criteria

谭载喜认为，翻译标准的厘定是翻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跳出单个翻译理论的狭隘范围，采用综合性的翻译学途径，从多个不同的层次加以研究，才能得到比较圆满的回答。翻译标准的层次可粗略地概括为：1. 内容对等层次；2. 形式对等层次；3. 完全对等层次；4. 部分对等层次；5. 功能对等层次。这是翻译标准的几个基本层次，实际运用时还必须有：6. 话语类型层次：说明不同的话语类型必须制定不同的翻译标准；7. 言语风格层次：说明译文措词应有什么样的风格，允不允许翻译体作为一种正常的语体而存在；8. 译文实用层次：

指为了不同的实用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标准,比如,编译、摘译等的标准就不同于全译的标准。除这几个层次外,还可以从历时与共时两个层次来考虑翻译的标准。就是说,翻译标准的厘定有一定的时间局限性,特别是在言语风格方面,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翻译标准(谭载喜 2000a)。参见"翻译学途径"

(李林波)

翻译标准的类别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criteria

前苏联翻译理论家科米萨罗夫(Комиссаров)指出,翻译有若干个标准:等值标准、体裁-修辞标准、译语标准(译文既要遵守源语规范,又要考虑目的语习惯)、语用标准和应时标准——译文质量要符合本时期翻译的作用和任务所持的公认态度,译文与原文最大限度地近似,能完全等值地替代原文整体及其细枝末节。其中,最重要的是语用标准(Комиссаров 1990:229～233)。

三似说　three likenesses

即"形似、意似、神似",是陈西滢针对严复的"信达雅"的不足而提出来的。陈西滢认为,直译所能得到的最佳效果是形似,而形似的弱点是"忽略文笔及风格",致使其内容也难以传达,因此需要意似。意似,即注意到原作的个性与风格的传达,使译文达到某种程度的透明状态。至于神似,即神韵的传达;对于诗歌的翻译而言,有"愈是伟大的诗,愈离不了它的神韵"。陈西滢的"三似说"在诗歌翻译家许渊冲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应用,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和法译实践中,许渊冲在三似说的基础上融入了"美化之艺术"的翻译美学(转引自罗新璋 1984:400～408)。

(王宏印)

三美　beauty in sense, in sound, and in form

许渊冲在《毛主席诗词四十二首》英、法文格律体译文(1978)序言中提出诗词翻译"三美"论。他认为译诗不但要传达原诗的意美,还要尽可能传达它的音美和形美。三美之间的关系是:意美最重要,音美次之,形美再次。也就是说,要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音美;还要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努力做到三美齐备。"三美"论是根据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中所表述的观点而提出的,他说:"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化境　Huajing (ultimate realm of transformation)

钱锺书的"化境"说,可以推到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意境"说(例如唐代皎然的《诗式》)或"境界"说(例如近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而较早使用这一术语的则是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水浒传序一》)。"化境"说最常为人所引用的一段文字,可以作为"化境"说对翻译所下的描述性定义:"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7 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喻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钱锺书 1985)

虽然用了"化境"这样的术语,其描述的译品却只能用"忠实"这一传统的翻译标准来衡量,或者用读起来不像译作而像原作者的写作这一古老的说法来比拟。"投胎转世"的佛教说法假定了一个灵魂、两种躯壳的可能,而不是思想永远不能脱离其所诞生的语言这样一种思想(然而"投胎转世"的英译文里的"灵魂"一词是复数)。当然,这一描述性定义在后面有进一步发挥和解释的余地。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最初认为化境是翻译标准,后来改为最高境界了。钱锺书的"化境"说虽然在理论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境界"说或"意境"说,但在联系到翻译的时候,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翻译中的"化境"的基本性质。比如说,译者能够把源语的世界和目的语的世界融化为一,然后得心应手地表达出来,或者至少要说译者能够把原文的精神实质了然于心转化为自己的东西,然后用目的语自然流畅地表达出来。在企图说明翻译的"化境"的时候,他却首先追溯到"翻译"二字的语源上去寻找思想的连通,即依赖语源学的传统方法来挖掘、扩充或加深未经严格界定的意义了。

"化境"作为界定翻译的核心概念,似乎要求译者和作者在精神上和心灵上的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当然就包含了译者对于客观世界(作者与译者不同的客观世界)的一种苟同和容纳,和译者与作者在主体建构方面(比如人格结构方面)的某种一致性,同时也包含了译者对于原作精神的一种溶解于自身的同化,以及连同思想与风格表现于语言中的一种译文的诞生。概而言之,可以把"化境"理解为是包含或超越两种语言范型、两种文学传统、两种文化特性的翻译境界。这一至高境界虽然难以实现,但仍然可以作为翻译的目标而努力。

(王宏印)

反常的忠实　abusive fidelity

出自刘易斯(Lewis)一篇题为《翻译效果的界定》(*Measure of Translation Effects*)的文章。该文最初收录在格雷厄姆(Graham)1985 年编辑的哲学论文集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1～62)。2000 年韦努蒂(Venuti)把它收录到他编的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nd edition)(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一书中。刘易斯对"反常的忠实"的定义是:

这是一种新的忠实观，它要求译者关注能指链、句法过程、文本结构、语言机制对思想和现实形成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忠实的要求……远远高于对语义实质的追求，它还要求对表达方式和修辞策略也要忠实。

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翻译，它重视语言试验，破坏常用的表达方式(tamper with usage)，寻求体现原文表达方式的多价性或表达性重点，还其本来面目。(Lewis 1985：41)

刘易斯认为，传统翻译理念中的忠实具有归化性质，在处理具有诗学价值的 abuse 时，往往被"去反常化"(disabused)(Lewis 1985：45)，也就是把原文中的反常之处翻译成常见表达方式的翻译策略。他认为建立在这种忠实理念上的翻译是失败的，也是不忠实的。他接受了德里达(Derrida)的忠告——"一篇'好'的翻译一定总有反常之处"。因此，诗学的或后现代的忠实观就应该是以反常对反常，以常用对常用，而经常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则往往正是那些"反常之处"，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因而也是"反常"的翻译忠实观，即 abusive fidelity。(据王东风 2008)

多元系统翻译标准　multi-system criteria for translation

按照李运兴"语篇体系加翻译情境"的思路，翻译标准应置于一个由三个多元系统构成的参考系中加以考察。这三个多元系统分别是：1. 源语语篇多元系统；2. 目的语语篇多元系统；3. 翻译情境多元系统。前两个系统包括语篇内及语篇外的各个方面，如语篇内的衔接、连贯、意向性及语篇结构。语篇外研究强调语篇的语域、情境、功能等。翻译情境多元系统包括讨论翻译情境时所涉及的翻译意图、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等方面。因此，好的翻译是以翻译情境多元系统为支点的源语语篇多元系统和目的语语篇多元系统诸价值的最佳平衡。该多元系统将文本内与文本外的诸因素一并加以考察，将翻译标准置于一个动态的权衡过程，认为对翻译的评判要看"译者的选择(包括针对必须性对应和选择性对应的整个翻译过程)是否达到了协调与平衡"，将"译者根据特定的翻译情境对作者/原文语篇和译文语篇/译文读者的各种价值的责任的平衡"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因此，翻译标准是否达到在于是否实现平衡。这是一个更为全面、动态的标准设定体系。(据李运兴 2001)

(李林波)

和谐说　theory of harmony

郑海凌在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美学观念和当代翻译思想的审美准则的基础上，对比了中西方翻译思想的异同和各自特色，结合翻译实践，提出和谐说：翻译的艺术贵在"和谐"，就实际效果而言，文学翻译应以"和谐"为审美标准。和谐产生于对立。从文学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来看，"和谐"作为翻译标准，符合翻译艺术自身的规律。

"和谐说"的哲学基础，是我国古代文化思想里的"中和"观念和我国古典美学里的"中和之美"。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有机整体"的观念，是中国宇宙观的特色)。尚中与尚和是华夏民族传统的审美观念，也是其审美心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古代以"中和"为美的思想观念，必然影响到文艺和翻译领域。例如，钟嵘论诗，把温柔敦厚作为衡量"中和"之美的尺度。《法句经序》里称引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经论家的译论，如"辞旨如本，不加文饰，饰近俗，质近道""梵文雅质，案本译之，于丽巧不足，朴正有余矣"，每每透露出"中和"的审美思想。

从我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审美流向来看，我国历代翻译家在探索翻译审美和翻译活动的一般规律时，创造性地运用了"文"与"质"、"信"与"美"、"言"与"意"、"神"与"形"、"化"与"讹"等对立统一的范畴，在对立统一中求得和谐。因此可以说，和谐，是我国历代翻译活动的审美追求和指导原则。我国古代翻译家的"文""质"之争，文派与质派在对峙中阐发"信"与"美""言"与"意"的对立，启发了后世翻译家的矛盾的对立中寻求和谐统一，出现了唐代以玄奘为代表的集"文"与"质"于一身的"圆满调和"派。近代马建忠的"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当代许多译论者所说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实际上也是对"和谐"的艺术法则的觉悟与追求。

翻译标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审美原则，也是人们衡量译作的质量，判断译作的审美价值的尺度。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和谐"对于文学翻译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于翻译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能够体贴入微。这也正是"和谐说"的价值之所在。与以往的翻译标准相比，"和谐"的标准是具体的，易于领会和操作，它既可以把握翻译过程的每个环节，也可以观照译作的整体和方方面面，因而具有实证性。比如我们翻译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既要通观全局又要把握局部和细节，译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艺术个性、表现手法、语言特色乃至一字一句、成语、典故、反话、隐语等都要认真研究，透彻理解。他传言达意所采取的每一个举措，都有他自己审美上的意图，都要遵循一定的审美标准。如果译者心中有"和谐"观念，自觉地以"和谐"为翻译标准，以"心"写"物"，心物合一，那么他翻译每一个词句，处理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会自然地按照"和谐"的规律行事，在对原作的理解和表达方面自觉地以"中和"之道来对待原作的艺术现实，来把握每一个表达方式。

"和谐"是一个具体的、切合实际的审美价值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关系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和谐"作为翻译标准具有审美性、整体性、普遍性、辩证性、创造性等特性。(据郑海凌 1999)

话语层翻译标准　standards of translation at discourse level

罗选民在《中国翻译》1990 年第 2 期上发表《话

语层翻译标准初探》一文,率先提出该标准。该文将话语语言学的原则和方法运用于翻译研究,根据翻译的特性对话语建构的七项原则进行阐发和探讨。并提出以此作为话语层翻译的标准。这些标准是：意图性、信息性、可接受性、形式连接(衔接)、意义连贯、章际性(互文性)和场合性(情境性)。

杨自俭对这个标准的评价是：1. 该标准把翻译研究从词层、句层上升到话语层,重视研究句组、句段、全文的句际关系及其连接手段,揭示了话语层的内部结构,把过去强调就事论事的字、词、句的技巧翻译提升到篇段的高度。2. 该标准注重结合吸收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译论,融合了严复的"信达雅"、奈达(Nida)的"功能对等原则"、格赖斯(Grice)的"合作原则"、韩礼德(Halliday)的"衔接"等各家之长,兼收并吸,发展了"信达雅"的标准。3. 从方法上讲,该标准注意到文本和意义动态的开放系统,注意到译文的环境即译文的动态变化意义,使翻译标准由静态研究进入了动态研究(杨自俭 1993)。参见"意图性""信息性""可接受性""衔接性""连贯性""互文性""情境性"

"美译"　aesthetic translation

林语堂于1933年《论翻译》一文中,提出"翻译标准之三方面",其中有"美的标准"。在中国翻译史上,林语堂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翻译的美学思想。他从翻译的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审美心理和审美效果、审美情趣等方面,提出了他的"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观。在《论翻译》中他对翻译标准是这样说的：

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方面。我们可以依三方面的次序讨论它。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这翻译的三重标准,与严复的"译事三难"大体上是正相比符的。忠实就是"信",通顺就是"达",至于翻译与艺术文(诗文戏曲)的关系,当然不是"雅"字所能包括。倘是照桐城吴进士"与其伤洁,毋宁失真"衣钵真传的话为原则,为叫起来方便起见,就以极典雅的"信达雅"三字包括这三方面,也无不可。但是我们须记得所以求"信达雅"的道理,却不是如是的简单。我们并须记得这所包括的就是：第一,译者对原文方面的问题,第二,译者对中文方面的问题,第三,是翻译与艺术文的问题。以译者所负的责任言,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转引自罗新璋 1984：418)。

林语堂十分注意译文的表现形式。他把体裁分为内外两种。译者的任务是不仅要表现"外体裁",而且要体现"内体裁"。他说：

所以文字体裁,要以分外的与内的(outer form and inner form)。外的体裁问题就是如句之长短繁简及诗之体格等;内的体裁,就是作者之风度文体与作者个性直接有关的,如理想,写实,幻像,奇想,乐观,悲观,幽默,悲感,轻世等。(转引自罗新璋 1984：431～432)

林语堂的美译主要针对翻译"艺术文"而言的。他说：

译艺术文最重要的,就是应以原文之风格与其内容并重。不但须注意其说的什么并且须注意怎么说法。……一作家有一作家之风度文体,此风度文体乃其文之所以为贵。Iliad之故事,自身不足以成文学,所以成文学的是荷默之风格(Homer's manner,参见Matthew Arnold：On Translating Homer)。《长恨歌》、《会真记》之故事虽为动人,而终须元稹白居易之文章,及洪昉思与王实甫之词句,乃能为世人所传诵欣赏。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所嗜好之作者作品,无论其所言为何物,每每不忍释手,因为所爱的是那位作者之风格个性而已。凡译艺术文的人,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格调预先认明,于译时复极力模仿,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转引自罗新璋 1984：431)参见"林语堂"

传统译论的翻译标准模式　models of the translation criteria in traditional theory

按照思维方式来划分,传统译论的翻译标准模式有以下三种,即：1. 一元论模式,以"化境"为标本;2. 二元论模式,以"形似""神似"为标准;3. 三元论模式,以严复的"信达雅"为标准。传统译论的翻译标准有概念不太明确甚至不可分析,评价项目太少或覆盖面不宽,不易操作更不易量化等缺点,但简单易记、条目清晰则是其优点。与文学批评的标准相比,传统译论的翻译标准似乎过于笼统。因此,可以参考和借鉴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知音"标举的"六观",并进一步参考全书各章与"六观"的关系,依次参照体性、丽辞、通变、定势、事类、声律等各章内容。在继承传统文学翻译批评容纳新观点的基础上,可以尝试性地提出新的翻译批评标准的原则和起点：1. 提出一定量的具体评判项目以便对译文进行较全面的考察;2. 具体项目的提出和设定尽量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量化性的品质;3. 标准的设立和讨论要运用现代学术语言以便在概念上可以界定。(王宏印 2003a)

案本　follow the source text closely

语出释道安(314～385)的《鞞婆沙序》:"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案"通"按",是"按照"的意思。这四句话的大意是：于是,按照原文(梵文)的本意传下去,不使有损原义;除了时而把原文颠倒的词序改顺,我尽量将原文忠实地翻译出来。因此,"案本"即按照原文的本意(翻译)。在罗新璋(1984)《翻译论集》中,案本被认为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首要线索。就实际情况而言,这一案本而传的翻译操作原则,和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理论要求是有距离的。本体论的失落和实践上的竭力而为构成道安翻译思想的整体面貌。　(王宏印)

读者反应论 reader's response; responses of receptors

其核心论点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翻译的重点不应当是语言的表现形式，而应当是读者对译文的反应"。这是奈达(Nida)早期的重要论点之一，在其《翻译科学初探》(1964)中提出。奈达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认为翻译必须以接受者为服务中心，要根据不同接受者的要求而对译文作相应调整。奈达既是翻译理论家，也是翻译《圣经》的专家。他认为，《圣经》传达上帝的旨意，其语言对古代读者和听众来说是浅显易懂的，今天没有任何理由为追求语言的精美而阻碍平民直接聆听上帝的教诲。他强调指出，任何信息如果起不到交际，即思想交流的作用，就会变得毫无价值。"要判断某个译作是否译得正确，也必须以译文的服务对象为衡量标准。"也就是说，要判断译文质量的优劣，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同时必须把这种反应和原作读者对原作的反应加以比较，看两种反应是否基本一致。奈达的读者反应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进入我国译界，并引起了争议。

善译 good translation

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提出："……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析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转引自罗新璋 1984：126)

马建忠对语义的"推究"包括音势高下、字句繁简、文体变态、义理奥析，包含着现代语言学中音系学、语法学、文体学、语义学等方面的因素。他要求译者反复斟酌，"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直到译文"适如其所译而止"。"精理微言实"与卡特福德(Catford)的"把一种语言(源语)的话语材料替换成另一种语言(目的语)中对等的话语材料"(Catford 1965：21)或与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的"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即话语)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在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巴尔胡达罗夫 1985：4)的内涵相仿，而说"译成之文……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则与费道罗夫(Фёдоров)的"等值翻译"相仿。又说"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则与奈达(Nida)的"功能对等"相仿。可见，"善译"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现代译论的高度，只是无那种代表现代学科的术语而已。"善译"构建了我国近代译学理论的发展基础。 (文晔)

信达雅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信达雅"长期被我国广大译者视为翻译标准。这是严复 1898 年在《天演论 · 译例言》中提出来的，他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又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转引自罗新璋 1984：136)

严复的"信"是指忠实于原文的意义，"达"是指译文通达。长期以来，虽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但"信达"仍为译界普遍遵循——"忠实、通顺""准确、流畅""在准确基础上通顺"等等提法，其意与"信达"一致。唯有"雅"字，分歧较大。有的主张取消"雅"，把通常为"雅"所包含的译文风格和语言形式上的要求统统列入"信"之中，只提两条。严复的"求其尔雅"要"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显然不能为后人所接受。但有人从"修辞立其诚""言以文远""情欲信而辞欲巧"(内容要真实，文辞要美化)等观点出发，不断对"雅"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提出这种或那种论证，以体现翻译标准的完整性。

"信达雅"构成一个系统。三者的重要程度以这三个词的排列先后为序，但在不同文体的翻译中，着力点各不相同。科技文体的翻译更加强调"信"，译文的内容不可有些微偏颇，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文学文体的翻译，在"信、达"的基础上，要着力于"雅"，给人以美感。"信达雅"的总体目标是用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来传达相同的信息。不"信"，当然无所谓"达、雅"。不"达"，也会失之于"信"。不"雅"也有损于"信、达"。所以，既不能只顾"信"而不注意译文的形式，也不能只求语句通顺和辞藻华丽而不顾内容的忠实。只有从整体功能考虑，使三者融为一体，才能实现系统的总目标。

"信达雅"的来源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its origin

伍蠡甫曾说其父伍光建谓"信达雅""来自西方，并非严复所创"(转引自罗新璋 1984：461)。考察英国翻译家泰特勒(Tytler)的三原则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并无明显对应关系，虽说其话语中也数次提到写作和笔调等概念。钱锺书指出"信达雅"可以从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找到蛛丝马迹。鲁迅则认为其方法取自六朝的佛经译法，至于理论来源可追溯到中国传统的写作原理。严复明确宣布："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由此可以看出"信达雅"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渊源，其理论创造机制则可以追索到"征圣""述古"和创新等方面。 (王宏印)

信达切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closeness

刘重德根据严复及英国泰特勒(Tytler)的翻译原则，结合自己长期的翻译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提出的翻译原则，即：1. 信——保全原文意义；2. 达——译文通顺易懂；3. 切——切合原文风格。其中，不同于严复"信达雅"的提法，主要在"切"字上。刘重德不

用“雅”而用“切”是因为“雅”乃“尔雅”“文雅”之意，它只不过是风格中的一种。他说：“和‘雅’正相对立的，就是所谓‘粗犷’或‘豪放’。‘粗犷’和‘豪放’，显而易见，是迥然不同的两种文体。因此，翻译起来，不能一律要‘雅’，应该实事求是，酌情处理，恰如其分，切合原文风格。‘切’是个中性词，适用于各种不同的风格。”(刘重德 1979)

信与顺　faithfulness and fluentness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我国译界关于翻译原则的一场论战：一派主张“宁顺而不信”，一派主张“宁信而不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解……部分的曲解即使是错误……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痛快。”接着，赵景深在《读书月刊》发表《论翻译》，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因而主张“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以鲁迅为首的另一方，针锋相对地提出“宁信而不顺”。但是“所谓‘不顺’，决不是‘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转引自罗新璋 1984：275～276)

鲁迅反对“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在“顺”的幌子下，歪曲原作，随意增减，使之面目全非。他举了不少片面顾及“顺”而不能使人信服的例子，其中之一是：

今年的三月号《小说月报》上冯厚生先生译的《老人》里，又有这样一句——

“他由伤寒病变为流行性的感冒(Influenza)的重病……”

这也是很“顺”的，但据我所知，流行性感冒并不比伤寒重，而且一个是呼吸系病，一个是消化系病，无论你怎样“变”，也“变”不过去的。须是“伤风”或“中寒”，这才变得过去。

接着他又指出：“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长庚 1932)。

鲁迅还提出，既是翻译，就要“输入新的内容”，也要“输入新的表现法”。所谓“输入新的表现法”，就是引进一些外国的新词汇和新句法，以丰富中国的语言文字。鲁迅曾经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二》一文中针对日本文译者上田进君在翻译中为了使人易懂，先得解决“竭力使它归化”的观点时说：“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就原文的词法、句法及风格来说，“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

神似　alike in spirit; spiritual similarity

与“形似”相对，本为我国古代诗画评语，指在形似的基础上诗、画表现出人、物的神态、气韵达到惟妙惟肖的传神的境地。在翻译上，神似是指：必要时摆脱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如词汇、语法、惯用法、修辞格等方面的羁绊，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地道的译文传达出原文的艺术意境。神似已成为中国译论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译论之一，最早由茅盾(1921)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首先提出并在《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一文中详述。此后，郭沫若、闻一多在论及诗歌翻译时提出要译“风韵”“精神”和“气势”；陈西滢、曾虚白、王以铸等也都著文论述过“神似”。傅雷着力提倡并实践“神似”论。1951 年他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写道：“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20 世纪 60 年代，傅雷再次宣言式地表明态度：“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转引自罗新璋 1984：692)自此，“神似”的翻译主张迅速传播开来，并为我国译界普遍接受。

神似论研究　study of lifelike in spirit

“神似”论在现代中国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传统翻译理论命题而加以研究。有的对它的理论渊源加以梳理，如葛校琴(1999)认为“神似”论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形神论，其美学基础可以从孔子的美学思想上找到源头，并结合了中国古代的绘画和文艺创作理论中的“形神”论。有的对其缺陷做出总结，如朱志瑜(2001)认为“如果真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的话，‘神化说’就是了。……神似论是中国传统译论的代表，但它本身有很多缺陷，不能满足文学翻译的世纪要求，也不合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要求。‘神化’派的特点是：使用的术语定义含糊；最关心的是美学效果；大多认为文学(或诗歌)翻译不可能，但却提出了‘神韵’、‘神似’、‘化境’等可望而不可及的最高标准，特别强调翻译是艺术。”对“神似”论做出较大规模研究的代表之一冯建文，在专著《神似翻译学》中对神似论的历史、概念、含义等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和梳理。他认为“神似”论的发展过程是：传神(林语堂)——近似(朱光潜)——神似(傅雷)——化境(钱锺书)。钱锺书的“化”论是“神似”论的成熟和完善阶段。他将“神似”论分为“信、似、达、神、化、度、意”等七个二级概念加以更细致的研究和探讨。“神似”论在中国的现代翻译理论发展和建设中，像大多数传统译学概念和术语一样，并没有一成不变地传承下来，而是被予以更多的现代阐释，目的是使其自然地融入中国现代翻译理论中。　(李林波)

兼顾两面　consideration of both sides

语出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二》

一文。针对日文译者上田进君竭力使外国文学作品归化的主张，鲁迅在文章中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尽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译文既要力求通顺，使读者易懂，又要忠实于原文，也就是说，归化和异化都需适度。

等值翻译　equivalent translation

"等值"是用来描述源语和目的语文本或其更小的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相对应的术语，建立在等值基础上的翻译即为等值翻译。等值翻译是翻译对等(translation equivalence)理论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等值翻译理论建立在现代语言学理论成就的基础之上，是翻译科学的开端，随着语言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而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国外学者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开始提出等值翻译理论。1953 年，前苏联费道罗夫(Фёдоров)在《翻译理论概要》一书中最早系统地提出翻译的等值概念。布拉格学派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Jakobson)(1959)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提出在语际翻译中"信息对等"的概念。英国的卡特福德(Catford)(1965)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又提出"行文对等"论，指出翻译实践的本质在于寻求"等值成分"(equivalent)，而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则在于界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前苏联译论家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在《语言与翻译》(1985)中，借鉴了语言学的最新成果，强调全文语义最大限度的传达和话语功能的对应是等值翻译的核心，即从音位(字位)、词素、词、词组、句子、话语六个层次看，具有"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即为等值翻译"。我国学者吴新祥等在借鉴以上译论时，更吸取了结构语法、交际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等有益成分，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等值翻译初探》(1984)、《等值论与译作定量定性分析》(1985)中，把语言按五个静态等级(词、词组、句子、句群[超句体]、篇章)和三个动态层面(从语法结构表层到经修辞层，最后服从于语义深层)进行切分组合，形成 15 个等值语言平面，来立体地评估译作与原作等值的程度，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译作作出定性分析。在翻译转换时，由于语言的民族、文化特点，译文难以和原文绝对等值，译者的任务是争取达到最大可能的等值，首先是意义上的等值，其次是风格和美学效应上的等值。参见"翻译对等"

外观等值　visual equivalence

欧盟等国际组织的文件多用一种语言(英语或法语)起草，然后再翻译成其他工作语言或官方语言，但所有的文本都不叫译作。在翻译(或文本制作)过程中，有时要求各种语言版本的文件要段落数对应，标题和副标题置于和其他文本相同的位置，有时甚至要逐句对应，以使所有的语言文本看起来相同。科斯基宁(Koskinen)称之为"外观等值"(visual equivalence)(Koskinen 2000: 55～56)。外观等值既给人以所有语种的文本内容和形式都完全相同、具有绝对一样的法律效力的感觉，又便于比较、修改和更新，但可读性就要打折扣了。普通意义上的翻译等值与外观等值至少有两个区别：1. 前者指意义上的同，而后者指形式上的同；2. 前者描述的是原作与译作的关系，而后者强调既要与英语或法语原作等值，又要与其他语种的译作等值，尽管这些文件从来不区分原作和译作。

（贺显斌）

等值层次模式　level equivalent model

这种模式在俄罗斯影响最大，阐述得也最为详尽。其理论观点是言语的内容层面具有多层结构，可以划分出一定的层次并确定它们之间的层级关系。1975 年，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在《语言与翻译》(1985)一书中借助对比话语语言学将等值分为六个层次：音位(字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话语层。科米萨罗夫(Комиссаров)从语言和言语两个角度把等值分为两大类、五个层次，分别代表译文与原文之间意思等值的程度。第一类：功能语境等值，其中包括三个层次——交际目的层次、情境等同层次、情境描述手段层次；第二类：语言单位语义等值，其中包括两个层次——句法结构层次和文字符号层次。

什维采尔(Швейцер)借助符号学理论的三个方面——句法(符号←→符号)、语义(符号←→所指)、语用(符号←→人)把等值分为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次：一、句法层次是用译文句法结构替换原文句法结构；二、语义层次细分为两个小层次：(一) 成分层次——保留原文语义(义素)，但采用不同的形式结构手段，运用语法转换法；(二) 所指层次——保留原文所指意义，即使用与原文不同的语义符号组成语义等值的话语；(三) 语用层次——等值的最高层次，即考虑众多交际因素，包括交际意图、交际效果、收讯人的接受能力等，并制约其他所有层次。

该模式要求在分析原文语句阶段译者遵循自下而上的方法与途径(从语言符号到交际目的，即从句法到语用，或从音位到话语，依次弄清内容的所有层次)；在综合译文语句阶段，译者则反向进行，自上而下依次检验内容的每个层次是否与译文的最终意思相同。(据谢云才，张杰 2004)

等值概率　equivalent probability

在较长的文本中，某些特定的源语词语几乎肯定会多次出现，而它每次出现时都有一个特定的目的语文本等值成分与其相对应。经常出现的源语词语在一篇长文中往往具有不止一个目的语等值成分。每个特定的等值成分都出现一定的次数。用源语词语出现的总次数去除每一特定等值成分出现的次数，所得到的就是每一特定等值关系的等值概率。例如，在某篇长达 12 000 词的法语短篇小说里，前置词 dans (到/在……里)共出现了 134 次。该词在英语译文里的文本等值成分为 in 的有 98 次，为 into 的有 26 处，

为 from 的有 2 处，为 about 和 inside 的各 1 处，另有 6 处要么等值成分为零，要么不宜译为英语中的前置词。用概率来把翻译等值关系表述为：dans＝in：0.73；dans＝into：0.19；dans＝from：0.15；dans＝about/inside：0.0075。这表明，如果任意选择 dans 在该文中的出现，翻译等值成分为 in 的概率是 0.73，为 into 的概率为 0.19 等。用概率的术语来说，1 表示"绝对必然"，0 表示"绝对不可能"。　（穆雷）

语用等值　pragmatic equivalence

指"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的等值。同一种言外之力，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翻译中要做到"言外之力"等值，必须认真研究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表达"言外之力"所使用的语言手段有些什么不同，注意这些不同的语言手段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例如，英语的"言外之力"大多通过句法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汉语的"言外之力"则多以词汇手段表达。英语表达"请求"这个言语行为，往往使用疑问句式：Will you close the door? Would you get me a glass of water? Could you do me a favour? 英语的祈使句式一般很少用作"请求"，如果使用，大多带有各种各样的疑问附加成分。语用学是讲究源语语境的，如"Lights, please!"这个例子，在一定的语境下固然可译为"灯光！"，但在别的语境下可能该译为"请开灯"或"请关灯"。

语篇对等　textual equivalence

卡特福德（Catford）（1965）在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提出此术语。语篇（text）指的是"处于讨论中的任何语言片段（stretch），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根据情况，语篇可以是一所图书馆里的全部书籍，可以是单独一册，也可以是一章、一段、一句或一个小句；等等"（Catford 1965：21）。"当目的语的任何形式（语篇或者语篇的一部分）被认为与源语的某一形式（语篇或者语篇的一部分）对等时，即出现语篇对等"（Catford 1965：27）。卡特福德建议：语篇对等可由权威人士，如语言能力强的（competent）双语者或译者，来认定；或者在语言形式上通过接换（commutation）的方式来认定，即改变原文中的项目并观察"目的语文本是否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Catford 1965：28）。很显然，任何长度的语篇中，很多项目肯定会出现不止一次；这种情况下，语篇对等可由计算机进行数据统计来认定，即由语篇中词项的等值概率来认定。卡特福德认为，如果这种概率的得出是以足够大的文本语料库为基础的话，那么它可以用来构成"翻译规则"（Catford 1965：31）。（参阅 Shuttleworth, Cowie 1997：169）参见"等值概率"　（林作帅）

零对等　nil equivalence

卡特福德（Catford）（1965）在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提出此术语，指的是"源语的某一项目在目的语中没有对等时，目的语对等成分为零（nil）"（Catford 1965：29）。卡特福德将"零对等"与"零位（zero）"加以区分，后者是"一个在目的语中运作（operate）的术语"（1965：29）。例如，英语原文"My father was a doctor."译成法语和俄语分别是"Mon père était docteur."和"Мой отец был доктор."。其中，英语不定冠词 a 在法语译文中的对等成分是零位冠词；俄语没有冠词系统，英语不定冠词 a 的对等成分是零，即零对等。卡特福德进一步指出："一般说来，某一级阶（rank）上存在着零对等时，对等关系只能建立在高一级的级阶上"（1965：29）。　（林作帅）

等效　equivalent effect

亦称"同等效果"，西方翻译理论的一大流派。如果追溯到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Tytler）1790 年在《翻译原理简论》一书中提出的"好的翻译是把原作的优点完全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使得译文所属国家的人们能够清晰地领悟、强烈地感受，正像使用原作语言的人们所领悟、所感受的一样"这一论断，"同等效果"理论至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了。期间，类似理论层出不穷，较有影响的有德国翻译理论家坎瑟（Cancer）的"效果相当"（comparable effect, 1896）、英国翻译理论家里乌（Rieu）的"同等效果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effect, 1953）以及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以"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一致"这一观点为核心的"读者反应论"（reader's response）。其中以奈达的理论在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其实，我国早在瞿秋白给鲁迅的信中就已谈到翻译的等效问题，而最早系统地研究等效翻译原则的是金隄，他的专著《等效翻译探索》1989 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等效"理论本身具有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局限性。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纽马克（Newmark）在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一书中指出，翻译在四种情况下难以取得同等效果：1. 语言的特殊成分，如双关、玩笑、口误等等；2. 为源语读者熟悉而为目的语读者所不知的文化现象；3. 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及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的文艺作品；4. 创造性较强的、作者有感而发而非为读者所写的文艺作品。参见"读者反应论"

等效翻译原则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effect in translation

翻译的等效问题，早在瞿秋白给鲁迅的信里就谈到。而等效翻译原则是金隄（1989）正式提出的。由于受到奈达（Nida）思想的影响，加上自己的翻译经验，金隄对于严复的理论持批评态度。他分析过一般认为的"信达雅"所包含的准确与通顺的关系。在准确与通顺的关系问题上，金隄认为，准确而不通顺或通顺而不准确的译文都是可能的，但真正准确的译文

却必须是通顺的。"准确而完全不通顺的译文却是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只要确实是不通顺,那就一定是不准确的。"(金隄 1984b)他还进一步认为,忠实是译者的态度问题,而好的翻译必须考虑到读者,但他的观点又不同于奈达的读者反应论。他在1986年发表的《论等效翻译》一文中指出:"我们这里的效果,只包括信息对接受者的作用(即接受者的感受),不包括接受者的反应。"具体说来,"接受者从中所获得的一切理解和感受,包括主要精神、具体事实、意境气氛三大要素。"(金隄 1989: 18)这样,金隄的"等效翻译原则"实际上更近乎"等值翻译原则",因为他不考虑读者如何反应,也就无法得知读者的确切态度和接受情况。由此也可以看出,金隄的"等效翻译"理论与奈达的"读者反应论"仅一步之隔,但仍然在文本的阅读范围内,或者说把阅读体验作为心理过程,而没有把作为可以测量的行为变量纳入科学测量的范围。

(王宏印)

翻译三原则 thre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由泰特勒(Tytler)(1790)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三大原则是:1. 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 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3. 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泰特勒认为,首先,译者要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就必须精通原作的语言,并十分熟悉所译题材。在原文意义暧昧不明和含有歧义的地方,译者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力,选择与上下文连贯或与作者常用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最相符合的意义。仿效原文的隐晦或暧昧是一种错误。其二,译者必须具有很快辨认原作风格特色的本领。他必须正确地判断出原作是属于严肃、高雅、活泼、顺畅、华丽、考究的风格,还是属于朴实无华的风格。对此,译者必须有能力在译文中同样明显地表达出来。译者遵循的第三原则是翻译工作中困难最大的部分。泰特勒把译者比作画家。两者都从事模仿,但各自的程度却不尽相同。要临摹一幅画,画家可以使用与原作相同的颜色,要注意的是如何忠实地模仿原作的笔法和形态。只要模仿相当,摹本可具有原作的一切特征。然而,译者的工作却完全不同。他用的不是与原作相同的色彩,但必须使"画面"有同样的力量和效果。译者不能照搬原作的笔法,而必须用自己的笔法来译出完美的"摹本"。

翻译对等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翻译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之一,时称"等值翻译"。现代翻译理论从五个方面探索"对等"的途径:1. 语言学途径。(参见"等值翻译");2. 交际学途径:奈达(Nida)从语言作为一种多功能的交际工具的角度出发,先提出"动态对等",后又改为"功能对等"。(参见"动态对等""功能对等");3. 社会符号学途径。诺伊贝特(Neubert)认为,翻译的对等成分,应看做一个符号范畴,在于特定符号在特定社会场合里所具有的意义,将原文的这种意义同译文符号在相应译文场合里的意义加以比较求得对等。这一符号范畴包括符组成分、语义成分和语用成分。这些成分又构成了一个等级关系。其中,语义对等优先于符组对等;语用对等制约和限制语义对等和符组对等。这种社会符号学的方法,指明了原文和译文内部及其周围的符号与结构和语境之间的辩证关系。我国学者陈宏薇、柯平等也从社会符号学理论出发,以再现语言的意义(指称意义、言内意义、语用意义)与功能为目的探索翻译对等;4. 翻译学方法途径。该途径对双语作多层次的对比,提出多层次的标准,建立多功能的模式。就语际翻译而言,首先分为语言和社会文化两个层次。在语言方面,又可分为语言系统和语言运用(即言语)两个层次。在语言和言语之下,可有语素、字(或词素)、词、词组、句子、语篇六个层次。对这些层次的比较研究,又可从语音、语法、语义三个层次上进行。在社会文化方面,可从地理条件、生活经验,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及其在相关语言里的反映进行系统的对比,求得翻译对等;5. 文艺学途径。前苏联的加切奇拉泽(Гачечиладзе)在《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中强调,文艺翻译是文艺创作的组成部分,它所追求的是艺术对等,译者应再现原作的艺术现实,达到艺术效果和灵感层次上的等同。参见"等值翻译"

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由奈达(Nida)和德·瓦尔德(de Waard)在两人合著的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on* (1986)一书中提出。意指:译文对译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跟原文对原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大体对等。奈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对于不知道"雪"这个概念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有"白如木棉絮"这样的说法。这个说法就可用作英语 white as snow(白如雪)的功能对等语,以使目的语读者更清楚地理解原文的语境意义。在该书序言中他解释道:"功能对等"与"动态对等"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变换的原因主要是"动态对等"常常被误解,致使许多《圣经》译者无意中严重违反了其指导原则,采用"功能对等"这一术语旨在突出翻译的交际功能,消除误解。在第一、第二章中,作者对功能对等进行了论证,指出:如果一个信息无关紧要,就没有必要去翻译,但如果一个信息很重要,把它弄得模糊不清显然没有好处,除非原文作者故意采取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书中批评了那些热衷于保持《圣经》语言"古风"的译者,认为《圣经》传达的是上帝的旨意,其语言对古代的读者和听众来说是浅显易懂的,今天没有任何理由为追求语言的精美而阻碍平民直接聆听上帝的教诲。作者重申了《翻译科学探索》中提出的翻译标准,即最接近原文的、自然的信息等值,但对"信息"(message)作了进一步界定,申明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而且包括语言形式。

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

由奈达(Nida)于20世纪60年代在《翻译科学探索》(1964)和《翻译理论与实践》(1969)中提出。意思是：译文对译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跟原文对原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大体对等。为达到动态对等，译者要从各种译法中挑选最接近原文效果的译法。到了80年代他改用"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这一表达。动态对等是我国较早引进的西方翻译理论。1979年《语言学动态》(1980年起更名为《国外语言学》)第2期刊载了郑南渡的《奈达》一文，率先介绍奈达的生平和此理论。

早在1929年我国翻译家陈西滢在《论翻译》中已提出"要读者读了译文所受的感动，与读了原文所受的感动一样"，其提法跟"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的思想甚为接近。参见"功能对等"

行文对等 textual equivalence

卡特福德(Catford)(1965)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译文或部分译文与原文构成对等关系；其对等关系的条件是：当原文和译文或其中的语言单位具有相同(至少部分相同)的实质特性时，或当源语和目的语的文本或语言单位在一定的语境中可以互换时，就构成翻译对等关系。所以卡特福德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总是可以在句子这一'级'确立翻译等值关系的原因，因为句子是在具体语境中与言语功能有直接关系的语法单位。"

形式对应 formal correspondence

常指译文与原文在语言结构形式上的对应，例如词对词，词组对词组，句对句，主语对主语，谓语对谓语等。从翻译方法上讲，不顾内容，片面追求形式对应，就是死译。卡特福德(Catford)的形式对等还指两种语言在语法单位体系上的对应，例如英语和法语都有五个等级：句子、子句、词组、单词、词素，这就是说，两种语言单位的等级上存在着形式对应关系。

一般而言，形式对应对翻译的意义不大。因为翻译就是把以原文语言表达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以符合译文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重新表达出来。译文不但要保存原作的思想风格，而且必须符合译文语言习惯。由于英汉两种语言表达方式不同，翻译时应对原文的表达形式作必要的调整。不过，卡特福德认为，在双语对比中，"形式对应关系也很有意义"，因为"文本等值关系和形式对应关系之间的差异程度或许可以作为衡量语言之间类型差异(typological difference)的一个尺度。"(卡特福德 1991：39)

奈达(Nida)也用 formal correspondence(Nida, Taber 1969/1982)这一术语，他原先用 formal equivalence(形式对等)与 dynamic equivalence(动态对等)相对应(Nida 1964：159)。这种对等/对应"强调信息本身，既强调信息的形式也强调信息的内容"(Nida 1964：159)。因此，形式对等/对应指"源语文本的形式特征在接受语中被机械复制的翻译特性"(Nida, Taber 1969/1982：201)。

灵活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

参见"动态对等"

翻译批评 translation criticism

"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一个基本环节"(Newmark 1988/2001：184)，是一种具有一定实践手段和理论目标的精神活动，是从一定的价值观念出发，对具体的翻译现象(包括译作和译论)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学术活动，是审美评价与科学判断的有机统一。翻译批评的任务是以一定的翻译标准为准绳、以科学的方法对译本或译论的艺术价值或科学价值进行评判，对其不足之处进行理论上的鉴别，特别要检视翻译实践的跨文化交际效果，从中探索译者的审美境界、科学视野和艺术技巧，以提高译者和读者的鉴别能力。翻译批评对促进文化事业和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诗人、评论家阿诺德(Arnold)就曾著有《评荷马史诗的译本》，该书深入阐述了《荷马史诗》朴实的风格，对考珀(Cowper)、蒲柏(Pope)、查普曼(Chapman)、纽曼(Newman)等四位《荷马史诗》翻译家的译本作了见解独到而深入严格的批评，这对于正确理解和欣赏荷马史诗，提高艺术鉴赏力和翻译水平，起了极大的作用。鲁迅说过："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转引自罗新璋 1984：292)

文学翻译批评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文学翻译批评有别于一般意义的文学评论。它的目的主要不是分析探讨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表现手法等。文学翻译批评不仅要致力于阐述源语和目的语在语义、表达方式层面上的静态对等，文化、思想、意蕴、风格上的动态对等，而且要揭示在翻译过程中作为源语的读者/译者对原著/作者是如何创造性地接受并传达给目的语的读者/接受者的。所以文学翻译批评是多层面、涉及多学科的评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学翻译批评出现过两个高潮。第一个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翻译通报》上登出了一系列争鸣文章，就翻译批评，特别是文学翻译批评的标准与原则展开了探讨。正如董秋斯所提出的那样，当时的翻译批评苦于缺少一个较为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因而尚不能形成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时隔40年，到了90年代初中期，又一高潮掀起。1991年8月中国译协文学艺术委员会等单位召开"文学翻译评论研讨会"。1992年，国内第一本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许钧著)出版，书中就文学翻译批评的原则和方法作了比

较详尽的阐述。而始于1995年的《红与黑》的多译本讨论以及《尤利西斯》的两个译本的讨论，进一步澄清了文学翻译中许多由来已久的悖论。可以说，这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在理论指导下展开文学翻译批评及针对自身建设的系统讨论。通过讨论，译界认识到，阐释名著有多种可能，不同译品各有千秋。文学翻译批评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肯定其中的一种，恰恰相反，它应为各种可能性鸣锣开道。

文学翻译批评的六条标准 six criteria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王宏印在考察中国传统译论的翻译标准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文学翻译批评的六条标准：

1. 语言要素 (language)：译文的语言要素是构成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第一重要的问题。作为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要求，译文语言应是地道的文学语言，而不是生硬的、古板的语言。毫无疑问，语言本质上的大众化特质在译文语言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程度的混杂性，又由于翻译的居间性质，使得这种文学语言虽然有别于源语创作的语言，甚至有别于目的语创作的语言。但是译文语言仍然必须具有文学语言的一般特征，例如，在符合标准用法的基础上，要有一定的现代生活气息，有较为深厚的文化传统底蕴，有生动明显的个性化风格。进一步而言，在自然流畅的基础上，译文语言还要体现一定的文体要求和职业特点，具有相当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2. 思想倾向(inclination)：文艺创作有思想倾向问题，同样，翻译批评也应当注意思想倾向问题。这里的思想倾向偏重于作品本身所流露出来的情绪感觉是否在译文中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由于这种特有的情绪感觉贯串于作品的始终，形成整个意义价值的明显导向，所以，在译者转达作品内容的时候，应当力求保持这样一种思想倾向而不是改变它，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又是不容易做到的。最常见的情况是，译者在有意无意间就部分地甚至全部地改变了原作的思想倾向，把低沉的变为平和的，或者把热烈的变为热情的。截然相反的情况甚至也会出现。

3. 文化张力(tension)：所谓文化张力就是指译文和原文之间要有相当的距离，而这距离又是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造成的明显张力所使然。也就是说，译文和原文之间的相似性只是表面的，在这表面的相似性掩盖下，潜藏着两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张力，正是这种张力造成了原文和译文之间可以相映成趣的翻译审美机制。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差异是绝对的，相似是相对的。但这并不是说，原文和译文之间丝毫不存在可理解性和可通约性，而是说，译文是通过自己的文化来理解原文文化的，而不是把原文不加改变地"直译"过来。在译文和原文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透明性，也就是说，透过好的译文仍然可以感觉到原文的某些特点。

4. 文体对应(gender)：文体是为了表达或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而设计的一定语言艺术形式。这种语言形式不仅是约定俗成的和民族性的，而且是具有规范性和典型性的。这样，在考虑汉语诗歌翻译成英语诗歌的时候，就要照顾英语诗歌本身的特点，否则译出的英语就缺乏诗味。寻找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对应规律，就成了英汉诗歌翻译的重要问题之一。文体对应还包括别的方面，诸如诗歌与诗歌的对应，散文与散文的对应，戏曲与戏曲的对应，小说与小说的对应等。如果只是区别这些文体特征并寻求相应的表现形式，那还不算太困难。但是，如果要在同一文体内部寻求完全的对应或替代性形式，那就要困难得多，戏曲的翻译尤其困难。莎士比亚诗剧中的英语素体诗在翻译成汉语以后，几乎丧失了一切可以朗诵的语言特点，更不用说在心理上适合中国观众的戏剧唱词必须押韵的欣赏习惯了。

5. 风格类型(style)：文体是集体的统一性的产物，而风格则是个体性的和个性化的产物。英语一般不作这种区分，但文体与风格的概念在汉语中是严格区分的。假若说"文若其人"，则须依赖译者和作者的性格气质的雷同和相似。如果说风格是语言的变异状态，则对于不同语言的常态及其变体的把握本身即可认识风格的表现了。如果说风格是文体基础上的多样化表现，则各种风格之间的仔细辨析和模仿就成为翻译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了。同样，每一位作家的个人风格和每一篇作品的作品风格，也都是可以因人而异地翻译。其中有的风格是有语言标志的，在翻译时可以遵循，而有些则没有任何标记，就只能上下包孕，左右映带了。

6. 审美趣味(taste)：如果说风格是见之于文本自身的东西，则趣味常见之于审美过程中，因此后者带有更直接的鉴赏性，带有读者个人的一时心境和阅读的随机性，也不排除一定的审美习惯和稳定的审美情趣要求。趣味可以作为风格的要素和机制，但往往不那么清晰可辨，也不易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作为读者的阅读趣味，就有原作或者译作对味与否或合乎胃口与否的问题。尽管英文和汉语的味道不同，还是可以辨认的、感受的。译文的一个要求是：英译要有英文味，汉译要有汉语味，否则就是不对味、不够味。同样，散文要有散文味，不能混同于小说味；古诗要有古诗味，不可混同于现代派诗味。如果说风格是类型问题，是属于哪一类的问题，那么，趣味则可以是程度问题，是能否让人感受得到和充分享受与否的问题。也可以说，趣味是风格之间(或之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细微差异，由此构成衡量和评价译文质量和审美趣味的十分隐秘的标志之一。(据王宏印 2006)

文学翻译批评的分级系统 graded system for evaluat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译作品级的划分与评定是文学翻译批评的重要方面。译作质量的评估不应视为一个绝对的点上的

确定,而应当在一个更大的参照系统内来确定一部翻译作品的相对位置。问题的解决思路可以借鉴中国传统文论和书画作品鉴赏中的分级概念,例如逸品、神品、妙品、能品等概念,其典型例证是受到中国传统用人标准的影响而采用的"九品中正"制度。当然,翻译品级的划分和确定要尽量适合翻译作品特点本身,但仍然要强调翻译以创作为基点的连续性过程作为思考的起点。

一级分级程序的依据是一般常态的创作和翻译准则,主要结合文学创作上的"真善美"和翻译中的"信达雅"的要求,考虑到翻译文学作品的交流功能、感化功能和认知功能的实现情况,而没有考虑到更多的方面和变异的要素。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译作,除了译作本身所取得的成就以外,还有可能给人以其他方面的启示和借鉴。其中包括:1. 译文在翻译方法上有无革新和创造;2. 译文在语言运用上有无融合和创新;3. 译文在翻译理论上有无观念的启迪。这是我们阅读一篇优秀的译作时的突出感觉,就好像看到一幅名画,会改变一个人对于艺术的观念一样。把这种感觉加以整理,进而作为一种要求固定下来,就会得到以上三条补充的翻译分级评定准则,称为二级准则(secondary norm)。这是一种较高的标准,是在一级准则(primary norm),即一般翻译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佳作、妙译所应当具有的水准。而拙作和拙译,则是不能完全满足一级标准时的说法,但不一定始终带有贬低的倾向和完全没有价值的认识。

以下是文学翻译批评的分级评判标准体系和各项简要的说明:第一类,妙译:符合并超过一级标准而进入二级标准的。上品:珠联璧合,奇才妙文,难以模仿者。中品:韵味悠长,文笔灵动,读之难忘者。下品:摇曳多姿,生动自然,略有小疵者。第二类,佳译:基本符合一级翻译标准中的三条要求的。上品:译笔流畅,妙合原文,贴切达意者。中品:体貌具备,变通有术,技巧毕现者。下品:突出一点,不拘一格,难成体统者。第三类,拙译:在总体上或大部分都达不到一级要求的。上品:屈从己义,样态未合,唯有小趣者。中品:仅存大意,随意赋形,原貌几失者。下品:原作不署,版权未名,疑是伪作者。(据王宏印 2006)

翻译批评的性质　basic nature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王宏印提出翻译批评的若干基本性质:第一,翻译在本质上是实践性的,而非理论性的。作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流活动,翻译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就和其他许多相关的活动一样,例如文学艺术。翻译是创作的继续,是精神产品的再生产过程,是原文本的再造活动。原文本在译文本里得到再生和发展,在新语境下的接受中得以延续和完成。这一切本质上是实践活动。实践观可以进一步深入到翻译批评活动的本质中去,强调翻译批评本身也具有实践性的品质,是一个经过不断地认识的深化而逐渐深入作品和作者(译者)精神境界的过程,一种具有人文特点的认识和对于对象的直觉的、有理解的把握或把玩,也即是具有审美特点的认识和感悟活动。第二,翻译批评本身需要实证研究基础,缺乏实证基础的批评是空洞的。也就是说,翻译批评是对象性的活动,而它的对象是相对固定的、具体可感的。翻译批评离不开原作和译作的关系,它把重点由前者逐渐转移到后者身上。翻译要研究作品,而作家和翻译家的研究以及社会文化条件的研究,都会或多或少联系到作品,最终有利于说明和评价作品。甚至可以说,翻译批评始终是带有个案性质的研究活动。脱离实证基础,就有把翻译批评架空的危险。如果说翻译批评是科学,那么,它就是一门"具体科学",并需要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第三,翻译批评活动的认知方式是知性的。如同文学活动是知性的一样,文学翻译的批评活动也是知性的。所谓知性,亦称悟性,是建立在人的感性基础上的一种具有实践指向的认知活动,它立足于具体的感知印象,对其进行审美判断,再通过一定的推论过程,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知性是位于感性印象和理性抽象之间的半抽象的审美活动,就是说,知性活动的本质仍然是具象的,操作性的,非思辨性的,凭知解力和想象力的,具有顿悟性质的。当然,翻译批评本身需要理性思维的参与,好的翻译评论一定要上升到理性层次,进行必要的理论概括。第四,文学翻译批评是一种高级的审美研究活动。所谓审美认知活动不同于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它不是关注一般的物质对象和认知层面,而是可以透过事物物质的存在方式,例如文本的物质存在方式,进入研究对象的意识和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纯形式的部分。当然,在文学翻译批评中,这一目标是通过对翻译作品的语言分析来实现的,但又不是技术性的和机械的,而是语义的甚至是超脱语义的,即指向超越语义内容的更高的审美感悟的。文学翻译批评是审美的而不是一般的研究,但又是审美与研究的结合。虽然文学翻译突出了文学性和欣赏性的审美过程,但不是个人的随意的审美活动,而是通过评论家自己的翻译审美活动对译作进行研究,通过对具体观照对象的理解和解释得出可靠的和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所以,文学翻译批评活动,不仅是文学的和审美性的,而且是科学的和研究性的。(据王宏印 2006)

翻译批评的科学原则　scientific principles f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既然翻译批评和其他一切批评活动一样,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作用,那么,翻译批评的科学研究就应为之确立一些基本的原则:1. 客观性原则(objectivity):客观性是一切科学活动的基本原则,翻译批评的客观性包括几层含义:尽量去除批评者本人的感情色彩和好恶态度,避免个人情绪化因素的介入;利用科学手段和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的有序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可靠的客观结论;在进行评价的时

候,并不排除研究者和评价者本人的价值判断尺度,但应当将纯属个人的东西降低到最小限度,从而有效地避免主观随意性的介入。2. 全面性原则(wholeness):全面性也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所谓全面性,主要是对研究客体的要求而言的,如同客观性主要针对研究主体的状态和态度而言一样。全面性包括:就占有的材料而言,要求研究者尽量占有全部或大部分相关材料,以便作出最大限度的科学概括;就研究的角度而言,要求研究本身要能够尽可能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多角度多侧面地考虑和逼近问题,尽量避免片面性和局部性;就思维方式而言,要求研究者,尤其是评判者,能够运用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3. 准确性原则(accuracy):准确性原则既是对研究客体的确定性要求,也是对于研究方法本身的准确性要求。对于研究的客体而言,要求有明确的界定和准确的认同,不允许对象模糊或动荡不定的现象存在;研究的方法,特别是实验、测查、统计等量化方法的运用,保证了研究本身的科学准确性,避免了研究人员的主观随意性;理论概括和语言表述的准确性,要求研究者要运用准确的、有严格界定的科学术语和学科概念进行理论描述,而不许或较少运用未经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日常语言随意进行论说。4. 简洁性原则(economy):亦称"经济性原则",主要是针对语言论述本身而言的,同时涉及思维的简洁性问题,以及研究的相关性问题。依照"奥卡姆剃刀"原理,一切无关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都应当去掉,只涉及那些与主题直接有关的部分。思维的经济性,要求研究人员直接接近研究目标,以简洁的科学思维进行概括和推论,作出明晰的结论;在进行理论概述的时候,无论理论本身有多么复杂,研究过程涉及因素有多少,都应当以最简洁的语言将最基本的事实讲清楚,将一个理论的基本命题和假设陈述清楚。其他一切只不过是这一基本陈述的展开和完善而已。5. 一贯性原则(consistency):一贯性原则与简洁性密切相关,主要指研究本身的稳定性,思维和观点的不矛盾性以及整个理论的前后一致性。就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一致性而言,不允许在研究过程中发生方法或对象的游离或偏离状态;整个研究的设计和各个部分的关系应具有协调性,不允许出现相互矛盾的假设、彼此抵牾的证据和前后不一致的论证;在理论表述上,甚至在研究者的基本观点上,应当尽量前后一致,一以贯之。(据王宏印 2006)

翻译批评的方法论原则　principles of methodology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

在考察了理科和文科的不同的方法论传统的基础上,王宏印提出以下五条文学翻译批评的方法论命题和原则:1.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结合。合目的性具有人文定向的社会向善的性质,而合规律性则反映科学研究发现的客观性。二者的结合形态强调的是:翻译批评中的规律不是现成的客观规律的发现或发明,而是具有研究者目的指向的认知过程在起作用,即在终极评判的意义上,所谓的规律性可以带有价值评判的意义,而翻译作品的人文价值评判本身,甚至也可以通过认识过程的规律性的解释来实现或展示出来。2. 文学翻译批评在方法上是阐释性与论证性的结合。阐释性是对现象的理解和解释,具有语言运作的性质和特点,而论证性是逻辑推论的合理化过程,显示命题推演的运行轨迹。两种思维方式都是必要的,不过在有些时候,一种比另一种显得更重要或者更必要而已。二者的结合意味着:在文学翻译批评中不存在纯理论的,即"为理论而理论"的论证,其论证过程必然含有意义阐释和有助于理解翻译和文学现象的认知机能的实现。3. 文学翻译批评是个案性与其普遍性启发性的结合。如果说文学翻译批评的个案应当具有普遍意义,那就要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事例的深入理解而达到具有普遍启发意义的认识,但是,缺乏普遍原理性认识的个案说明其意义十分有限,而推论也要尽量避免过或不及。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批评都是阐释和说明。4. 文学翻译批评是审美性个性与社会认识价值的结合。审美个性既可以指向评论者的审美特点,也可以指向作品的美学价值,其实,二者是统一在批评者的活动之中的,即统一在审美的发现性认识之中的。由于这种审美要导向高级的研究活动,因此,审美判断要转化为认知判断才能最后完成。但这并不是说,理性高于感性,甚至真高于美,而是指批评者个人的审美经验和主观判断最终要转化为社会接受的公共财富,成为新的评价性认识的经验起点和知识资源。5. 文学翻译批评具有独立批判性与文化参与功能的结合。独立的判断隐藏着批评者独立的精神和人格力量,体现着自由意志和自由创造精神。文学翻译批评正是以批评者的个人名义介入翻译的文化参与过程,从而推动实现其文学参与功能的,一如作者在源语文化中那样。而文学翻译批评在目的语中的文化功能,则是文学翻译本身的交流与传播功能的完成和完全实现的标志之一。缺乏独立评判精神的文学翻译批评是无力完成文学翻译批评的积极的文化参与功能的。(据王宏印 2006)

翻译效果评价　effect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

翻译效果评价不同于翻译标准,它不是事先设定的固定不变的评价尺度,而是依据批评者对译文价值的认识而作出的推断性评价。翻译效果评价的含义体现在如下几对概念中:1. 原作效果与译作效果。译作效果通过阅读译作而得来,原作效果通过阅读原作而得来。二者之间的比较是发生在评论者头脑中的,作为译文读者和原作读者的阅读体验的替代评价。另一层意思是:原作效果潜在地存在于译作之中,构成译作阅读效果的一部分,因此,好的译文无疑体现原文的效果。不过与此同时,译文本身也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即译者通过翻译的创造性活动为作品

增加的艺术价值,例如朱生豪的译本就为莎士比亚戏剧增加了艺术价值。2. 总体效果与局部效果。局部效果指单个项目所产生的阅读效果,例如小说中的对话效果或心理描写效果,而总体效果则是整部作品阅读效果的综合体现。在理论上,译作的整体效果是由一个一个的单项效果或局部效果结合起来构成的,但是,实际上,总体效果并非各项局部效果的简单相加之和。因此,评价译作不能只注意单项效果,而要兼顾全面,着重其总体效果的体现。3. 内在效果与外在效果:内在效果就是作品内涵的效果和感染力,在某种意义上与内在价值可以是同义词,而外在效果则是内在效果的实现和外显。一般所谓的效果就是指外在效果。设立内在效果这一概念的目的是想说明,效果的实现和体验是一个不断发现和发掘的过程,而且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同时,从作品本身来说,效果不是一次性可以消费的东西,而是有不断可以发现和发挥的余地,原作译作,概莫能外。例如,同阅读曹雪芹的《红楼梦》原作一样,霍克斯译《红楼梦》的价值可能会随着《红楼梦》英译研究的深入不断地发掘出来,通过阅读效果转换为外在价值的实现。

(王宏印)

译文的统计学评价方法 statistical model for evaluating translation quality

指一套关于翻译批评的量化评价方法和操作程序。依据范守义的论述,总结大意如下:1. 根据扎德(Zadah)的模糊集合论,将"优良中差劣"视为一个评价集,以百分比计算,作为语言学变量的参照。2. 翻译标准包括事实信息、情感信息和结构信息,其语义信息结构由中心信息、伴随信息和结构信息构成,以此为基础建立一整套翻译标准,作为衡量译文质量的依据。3. 以分析综合模糊评价作为理论基础,建立定量分析数学模型。随机选取译文单位(句子),进行专家评价,将结果输入程序,统计出评价结果,即为该译文的隶属度。以此为基础构建译文评价的数学模型。4. 进入程序:输入数据,加权,计算,输出数据。

(范守义,王宏印)

多译本评析 multi-version critical analysis

对同一原作不同译本的差异进行系统的批评和研究,目的在于探讨不同行为主体潜在的心理表征和理据,揭示特定译者个体或群体在翻译实践中的思维形式、思维特征及运作方式。对典型译作的比较评析不仅有助于提高对翻译活动本质的认识、提升优秀译作的实践经验,而且可以作为客观实证的切入点,反思有关译学理论问题,推动译学建设。多种译本的评析以完整的语篇(译本)为对象,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并设定系统参数。首先是宏观层次的参数,如原作题材、文体功能及其相应的翻译原则等。例如,文学作品摹物状景、塑造形象、表现情感,具有审美功能,翻译的目的是向目的语读者译介异域风情及不同的文化、观念等,译文既需忠实,又要有美学特征。而应用性文体的翻译则需传达精确的信息,要求言词确凿有据。客体性质不同,目的有异,评析的方法和重点也有异。其次,为了与宏观层次的参数相适应,需要建立一组可描写、可操作、可实证的微观层次的意义参数,包括概念意义、含蓄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主题意义等。总之,需从整个译文的目的和功能着眼,从评析相关的意义参数着手,考察整体框架内文本意义互动特征和表现规律,以此来审视不同译文正误背后行为主体的主客观思维运动的形式与特征以及译者的创造性或误译的潜在的心理表征。

我国文学翻译界一直重视对名著的多译本评析,如对汉译《大卫·科波菲尔》《飘》《简·爱》《爱玛》《红与黑》《尤利西斯》以及莎剧的评析,对英译《红楼梦》唐诗等的评析。多译本的比较不仅是翻译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5. 翻译主体

翻译主体 subject of translation

狭义上指译者,或称"译者主体"(以翻译行为本身而言)。从广义上理解,认为翻译活动的全过程除有译者主体参与外,还有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参与;作者提供原本,原本是翻译的基础,读者参与原本和译本的价值创造;因而翻译主体应包括译者、作者、读者,甚至包括委托人、赞助人等。

文本 text

威恩里奇(Weinrich)认为文本是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交际单位,包括在该环境中的会话、仪式、其他模式与体裁(转引自 Gorlée 2004: 23)。德·布格兰德(de 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Dresser)也认为文本完全是一种"交际",但必须具备衔接性、连贯性、目的性、可接受性、信息性、语境性和互文性等七种特征,文本的生成与使用均受制于内部符号(文本内的信息)和外部符号(文本外的原因)(转引自 Gorlée 2004: 23)。韩礼德(Halliday)曾将文本定义为"使用中的语言单位"(a unit of language in use)或"语义单位"(a semantic unit)(Halliday, Hasan 1976/2001: 1～2),后来又从社会符号学视角赋予文本更丰富的含义。他认为,文本是一个具备意义和功能的语义单位;它既可以是口语形式,也可以是书写形式;它既是一个产物,又是一个过程;它还是意义在社会中交换的一种形式(Halliday, Hasan 1990: 10～11)。戈尔里(Gorlée)认为,文本是一个完整的表意单位;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它是一个书写的语言实体(entity),其形态可以辨识,直观上依托于"真正"的时空,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使用时呈现其意义(Gorlée 2004:

29)。文本在洛特曼(Lotman)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中则是一个核心概念。他将文本定义为“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该“携带者”既可以是自然语言写成的文字作品,也可以是任何被赋予完整意义的客体,如一幅画、一个仪式、甚至一个手势(转引自康澄2005)。

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符号学和语言学对许多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日渐彰显,“文本”也成为学术研究中使用频率很高的术语。它不仅用于语言学研究、翻译学研究、文学研究,还用于文化研究。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的学者赋予文本不同的概念。虽然上述文本的定义有差别,其内涵并无大异。倒是戈尔里将文本限制在“书写的语言实体”中,缩小了文本的范围。从符号翻译的观点出发,文本应该是一个具备完整功能和意义的符号(sign)或符号组合(combination of signs),它可由自然语言或非自然语言表示,是社会语境中交际的一个单位。 (陈宏薇)

文本隔栅 textual grid

指某一文化使用的一套被这一文化普遍接受的表述事物的方式。它先于语言存在,是人为性、历史性和偶然性三者相结合的产物(Bassnett, Lefevere 2001: 5)。可见,文本隔栅是文化的产物,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是文化模式在语言使用上的反映。勒菲弗尔(Lefevere)和巴斯内特(Bassnett)曾对文本隔栅作过如下阐述:“不同的文化可能会使用基本相同的文本隔栅。如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文化便使用同一种文本隔栅,只是在强调的重点方面稍有出入。因为这三种文化都从古希腊-罗马继承了这种隔栅,它们曾经历共同的历史变迁。而其他文化,如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它们使用的文本隔栅就别具一格,与其他文化没有共通之处。”(Bassnett, Lefevere 2001: 5)就语篇构成而言,人们在使用语言之前,首先想到的是语篇的框架。和文化一样,文本隔栅并非永恒不变。“假如文本隔栅果真存在,我们认为它确实是存在的,只是我们不能一一列数它的特点及其构成规律,那么学习翻译的人就应该给予它更多的关注。”(Bassnett, Lefevere 2001: 5)段连城曾请一位美国记者看过一篇辞藻华丽的宣传品译文,那位记者读后觉得“充满了极度夸张。使人不知所云,而且令人发笑。”(段连城 1990)。显然,这篇译文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句义,但为什么还是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造成了误解呢? 光从词句层面去解释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如果从文本隔栅的角度来分析,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对于英汉两种语言文化,文本隔栅的差异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与翻译实践和研究相关的至少有两种。第一,英汉两种语言表述事物的角度有所差别。例如,在议论文、评论和杂文中,汉语文章绝大多数用第一人称复数,而英语文章在相应的体裁中用第一人称单数和第一人称复数的比例相当。这种差异与各自的文化特点有关。中国文化被称为“我们文化”(We-culture),是强调社会和集体的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个人服从国家和长辈,不主张个人过于显山露水。在这种文化规范的支配下,语言上形成了独特的表达事物的方式。即使作者表达的是个人的看法,也用“我们认为”以避免锋芒毕露,高傲自大。另外,这种叙述方法也和中国历史上政治不够宽松有关。用第一人称复数可以掩饰个人政见,躲避可能出现的责任和麻烦。而在英语文化中被称为“我文化”(I-culture),个人主义是其核心价值。这种文化鼓励与众不同、敢说敢为,以彰显其个人价值。因此,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用第一人称单数叙述是文本隔栅的常规就不足为怪了。其次,汉英文本隔栅的差异在于文本结构章法的不同。英语文章中一般都有一个概括中心思想的句子,每个段落通常有一个概括段落主题的主题句。英语段落是一个演绎系统,主题句置于句首是英语文章通常的做法,而后通过段中其他句子进行说明和发展。而汉语的文本结构则不同,文章中一般没有概括中心思想的句子,段落也没有概括主题的句子。即便有,通常也是放在句末,因为汉语习惯先分析后总结,先说原因后说结果。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会认为这样的文本结构思路混乱、条理不清。因此,文本隔栅的差异可能会造成交流的障碍。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进行语言文字的转换,还要考虑转换文本隔栅,才能达到翻译目的。(李广荣2008) (文晔)

元文本 metatext

由前捷克斯洛伐克波波维奇(Popovič)(1976)在《元文本面面观》(Aspects of Metatext)一文中提出。是针对某一文学文本的各种各样的加工而言的,包括作家的创作、读者的阅读、评论家的评论、译者的翻译等,也包括后来勒菲弗尔(Lefevere)所说的文本“折射”(refraction)或“重写”(rewriting)。波波维奇认为,元文本是属于元信息交际更为宽广的范畴,它跟“加工(或处理)文学原本的各种方式有关”。也就是说,元文本是在原文符号和意义上的发展或加工后的文本。他还特别指出,翻译本是用来替代另一文本的元文本。它不仅传递了原文固有信息,同时,译者按其自身对现实的体验,发掘了原本中隐含的意义。

中心文本 central text

指代表某种文化的核心价值的文本。勒菲弗尔(Lefevere)(1992b)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某些文本(例如《圣经》或《可兰经》)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中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如果某一文本被认为是代表某一文化中的价值的核心,如果在该文化中起到中心文本的作用,翻译这种文本将会受到极度严格和仔细的检查,因为“不能接受的”翻译完全可能被认为能颠覆文化本身的基础。另一方

面，如果某一特定的文化在看待其他文化时，认为自己是中心文化，那么，就会以轻慢的态度对待其他文化所产生的文本。在翻译中，对处于最中心的文本而言，信任是最重要的，如《圣经》的翻译。这样的文本能使在该文化中有权人的权力合法化。

处理文本的态度，在文化中起着中心的作用。而正是中心文化翻译“边缘文化”所产生的文本，其方法最能揭示诸如意识形态、诗学和论域等因素的重要性。

（郭建中）

文本中心论 text-centered theory

新批评文论的核心观点，由新批评文论家兰色姆(Ransom)首先提出。认为：“文学的本体及作品本身是文学活动的本原与目的，作家的创作从作品中来，又回到作品中去。”因此，文学作品就成了“自存自足的实体，无须外界的一切给予。”新批评文论家用“作品”这一术语，不同于后结构主义文论家所使用的“文本”。前者以此表明对作者的“主宰”其作品的高度认可。他们只关注作品本身，反对文学的社会性、文化性、经验性的提法，甚至于忽略作品与作品的历史联系和现实联系。

文本中心论的思想在翻译中一直体现为原作的主宰地位和译文的从属地位，以及译者的奴仆形象。在漫漫两千多年的翻译长河中，以经文翻译为发端，翻译便须“案本本而传”，与原作“亦步亦趋”。我国古代译经高僧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唐玄奘的“五不翻”以及古代西方完全照字面直译的圣经《七十子希腊文本》的出现，廷代尔(Tyndale)因出版《新约》而被焚烧的事实，无不说明把原作奉为圭臬。虽然历来有“文”“质”之争，但“忠实”的标准与翻译始终形影不离。

（贺显斌）

辅助文本 auxiliary text

诺德(Nord)(2007)在 *The Role of Auxiliary Texts in Translator Training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一文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区别于手册、地图、词汇表、词典和百科全书等工具书。工具书是专门用来提供语言或非语言信息的，而辅助文本原本是用于别的目的的，但被译者用作参考资料，包括相同或类似文本的已有译文、背景性文本(background texts)和平行文本(parallel texts)。已有译文能提供翻译方法方面的信息，我们今天遇到的多数翻译问题早就有人解决过了，分析和利用已有译文能避免重复劳动；当然，翻译记忆系统(translation memory system)也能提供已有译文，并对重复性翻译特别有帮助。背景性文本提供语用信息，包括事实及有关术语、文化知识和所讨论问题的最新发展。平行文本指目的语文化中现已存在的与原作体裁相同或相似的非翻译文本，能提供有关语言使用和文体惯例(conventions)、搭配、习语和术语等方面的信息。翻译高度程式化的文本时，平行文本甚至能提供现成的译文片段。诺德认为，词典和语法书经常无法提供足以解决很多翻译问题所需要的信息，特别是专业术语和有关文体、语篇和文类(genre)惯例方面的信息。辅助文本在翻译教学和实践中既可以用于分析原作，又有助于翻译文本的制作。

（贺显斌）

杂合文本 hybrid text

杂合(hybridity)(又可译作“杂交”“杂种”“混合”等)，指由多种异质成分构成的混合体。杂合文本兼指原文和译文。杂合原文就是多语文本(multilingual text)，即原文作者在一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添加一些外语成分，以增加作品的真实感，使故事情节更贴近现实；或帮助刻画人物形象，表示人物的不同社会地位或身份；营造陌生化效果，增加阅读的困难，迫使读者进行思考；或反抗殖民权威，消解话语霸权，等等。杂合译文指译文中或多或少地包含有来自原文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成分。杂合译文并不意味着翻译腔，后者指晦涩生硬、令人难以卒读的译语。杂合译文与异化翻译策略有关，但归化程度再高的译文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异域文化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译文都是杂合的。杂合的译文有利于输入新的思想与新的语言文化成分，对文化输入国的社会变革和语言发展产生影响。但译文的杂合需注意适度。(韩子满 2002)

下列三种情况为混杂译本的产生创造了条件：(Schäffner, Adab 2001: 171～172)1. 当目的语中还没有某个既定语类(genre)时，就需要从源语中引进新语类，而这种新语类又会不可避免地受目的语语言文化本身的影响而打上目的语语言文化的烙印。因此，这种语类名曰新语类，实则为源语的纲要式结构和体现样式同目的语语言文化的融合，因而是混杂文本。新语类的产生是跨文化交际的结果。导致新语类产生的各具体阶段统称混杂化过程。在混杂化过程中，新语类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最初还没有作为交际形式完全确立下来，因而呈现出让人觉得异样的语言特征和修辞特征。2. 文学翻译领域是混杂文本产生的最佳场所。在文学翻译中，即使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中都存在类似的文学语类，译者也不一定或不可能完全依据目的语文化中的语类规约进行翻译，而往往会遵循吴南松(2003: 16)所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原则，即译者必须对翻译所涉及的两套语言和文化规范系统都予以观照。一方面，译文要与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系统有所不同，即译者要在翻译中向源语语言文化规范系统靠拢，尽量保持源语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即保持所谓的“不同”；另一方面，译文又不能偏离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系统太远，不能超出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系统所能容许的“不同”程度之外，即保持所谓的“和”。3. 同当今社会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增强密切相关。由于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增强，不同文化间的敌视情绪减少，相互交流增多，相容性也相应增强；另外，不同文化中的同类文本

(如不同国家的政治文本)因翻译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吸纳彼此的优点而同时又各具特色；同时，因国际交往的不断加强，文化的借鉴与融合日趋明显，各种媒体对异文化的快速传播，文化的本土色彩与异域色彩同时并存，因而出现文化融合(integration)现象。在翻译中便体现为将源语文化的表达形式与目的语的表达形式进行融合，以一种新语言形式进入目的语，即译文成为同目的语相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混杂文本。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2001：208)写道：混杂化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也是人们从积极意义上充分利用跨文化交际所带来的结果。

杂合译文的术语虽新，但其表达的意思却早有论及。比如，20世纪80年代，图里(Toury)就曾指出，译文总会给系统带来新的信息和陌生化的形式，不可能完全被目的语文化接受；也没有哪篇译文与原文完全一致，因为目的语文化规范总会使源语文本结构发生迁移；任何译文都不可能兼顾两极，翻译永远居两极之间。国外译界使用多个术语表示翻译的语言特点，如“第三语码(third code)”“翻译共性(universals of translation)”等。

国际交流文本　text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指为了比较实用的国际交流目的而写的原文，如国际政治、经济、法律、科技等方面的语篇。这类文本严格地说既不像目的语，也不像源语，没有太多文化背景的依托；大多先用英文写成，然后翻译成其他语言。联合国的文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内容的国际性限制了这类文本的作者用本土性极强的英文写作。为了让不同文化的人都能较容易地看懂，作者必须少用本族语中文化特征十分明显的表达法，尽量在语言上求同，以提高交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类文本从政治上说也要尽量压低个体文化，因为要建立一个政治经济的整合体，各方都要寻求语言的共同特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降低写作者自己的文化特征。一般认为，这类文本属于超文化，也就是说它不属于任何语言文化。在目前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这类文本的地位正在逐渐升高。国际交流文本的译文和原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所以翻译时有必要使译文中的一些表达法能比较容易地回译成原文，这样，使用译文的人在与使用原文的人交流时就能一下子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为达到这个目的，译者尽量不彻底改动原文的语言结构，尽量不采用比较纯正的目的语表达法，结果创造出一种新的文体。但这并不是说翻译这类文本时就没有进行目的语(例如中文)化的机会，至少在句法层上译者仍然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归化。这类文本的译文和原文一样，不可避免地是混杂的(叶子南 2003：22～27)。　(贺显斌)

文本类型理论　text typology theory

由赖斯(Reiss)提出，主要指对文本类型的研究。赖斯(2000)在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 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功能类别的问题并试图创立一种基于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功能关系的翻译批评模式。后来，她把自己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和翻译策略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具体的理论，放在与弗米尔(Vermeer)合著的 *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1984)一书中进行讨论。赖斯根据布勒(Bühler)的语言功能论，把文本类型分为三种：信息型(informative)、表情型(expressive)、操作型(operative)。此外，她还增加了第四种文本类型作为补充：视听媒体型(audiomedia)。赖斯(1989a：109)认为，原文的主要功能决定了翻译的方法，也就是说，不同的文本类型需要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赖斯把语言功能、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联系起来，并根据各种文本类型的特点确定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如下表(视听媒体型文本未列入)所示：

文本类型	信息型	表情型	操作型
语言功能	信息的(表达事物或事实)	表情的(表达情感)	感染的(感染接受者)
语言特点	逻辑的	审美的	对话的
文本焦点	侧重内容	侧重形式	侧重感染作用
译文目的	表达其内容	表达其形式	诱出所期望的反应
翻译方法	简朴的白话文，按要求做到简洁明了	仿效，忠实原作者	编译，等效

(Munday 2001：74；张美芳 2005a：71)

严格说来，尽管该理论仍然以对等论为基础，却可以视为德国功能翻译学术分析的开端并具有里程碑意义(张美芳 2005：69～71)。芒迪(Munday)指出，“赖斯的理论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超越了纯语言的层面，超越了文字及其意义，把视野拓宽到翻译的交际目的”(2001：76)。　参见“表情型文本”“视听媒体型文本”“信息型文本”“操作型文本”　(谭娟)

表情型文本　expressive text

赖斯(Reiss)文本类型理论中所提出的四种主要的文本类型之一。表情型文本通常指的是“创作型作品”，使用的语言具有美学特征，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著，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Reiss 1989a：108～109)。表情型文本侧重文本形式。形式是交际的焦点，即作者怎样表达自己比他/她表达的内容更加重要。表情型文本是由其美学特征、文体特征、语义特征及语法特征来决定的(Reiss 1971：28)。该文本类型的主要特点是它们包含了一种审美成分，因为作者“为了艺术地、创造性地交流思想，会利用语言的各种可能的表达及联想手段”(Reiss 1989a：109)。文本的美学功能补充甚至支配文本的信息内容，作者选定的文体形式与文本意义相关，文本应对读者产生一定

的美学效果。翻译时不可忽略这种美学效果,译文应采用仿效的方法,忠实于原文作者,传递原文的美学及艺术形式(Munday 2001: 75)。也就是说,翻译此类文本时,译者在重现原文语义内容时应致力于如何创造出一种类似的审美效果(Nord 1996: 83)。文学作品、官方文告、私人书信、诗歌、小说、传记等属于不同程度的表情型文本。 参见"视听媒体型文本""信息型文本""操作型文本" (谭娟)

视听媒体型文本 audiomedia text

赖斯(Reiss)文本类型理论中提出的四种主要的文本类型之一,指用可视的图像或音乐来补充其他三类基本文本功能的辅助性文本类型。电影电视或可视可听的广告等属于视听媒体型文本。赖斯认为,视听媒体型文本在本质上也可划分为若干文本类型,如信息型(通过无线电传播的演讲、纪录片)、表情型(某个话题的综览、戏剧)和操作型(喜剧、悲剧),在此类文本中,其他超语言因素补充并加强语言的其他功能(Reiss 1971: 44)。视听媒体型文本构成了其他三种文本类型之上的"上层结构",因为"视听媒体型文本类型的特殊要求要优先于特定文本所属的其他任何基本文本类型"(Reiss 1989a: 111)。翻译时,应采用"补充"的方法,用可视的图像或声音补充书面文字(Munday 2001: 75),且在译文中保留原文或源语对听者同样的效果。歌曲、连环漫画、戏剧、广播电视剧本都属于这一类型(Reiss 1989a: 111)。 参见"信息型文本""操作型文本""表情型文本" (谭娟)

信息型文本 informative text

信息型文本是赖斯(Reiss)文本类型理论中所提出的四种主要的文本类型之一。信息型文本通常是由其语义特征、语法特征及文体特征来决定的。该类型文本通常文字简朴,其主要功能是告知读者真实世界中的客观物体和现象,内容包括信息、知识、观点等。信息型文本侧重于文本所传递的内容或"话题";语言特点为逻辑性强,且语言形式和语言风格的选择都从属于信息功能(Reiss 1971: 28)。翻译信息型文本时,主要目的是向接受者传递信息。这意味着,译者应致力于建立语义对等(semantic equivalence),然后才考虑其他方面的对等,如内涵或美学对等(Shuttleworth, Cowie 1997: 79)。在翻译中,译者应力图准确、完整地再现原文的语义;在文体方面,则应以目的语语言文化的主导规范为指导,用简朴的白话文,按要求简洁明了地传递原文的指示和概念内容(Munday 2001: 75)。赖斯强调,她提出的这些文本类型表示主要趋向,而非界限分明的分类,因为一个文本还可能有其他次要的、辅助性的功能(Shuttleworth, Cowie 1997: 79)。报告、参考书、商务信函、官方文件和学术文章都属于不同程度的信息型文本。 参见"表情型文本""视听媒体型文本""操作型文本" (谭娟)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本概念及相应的模式由德国功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诺德(Nord)在海德堡大学翻译学院从事翻译教学时首先提出,最早见于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Nord, 1991/2005)。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以篇章语言学与赖斯(Reiss)的文本类型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着眼于译员培训,包括了对交际行为进行文本内外各个方面的分析,目的在于从源语文本以及即将根据要求进行生产的目的语文本中识别与功能有关的成分。在开始翻译之前,通过比较译文目的与原文功能,译者就能够识别在翻译过程中将要出现的问题,从而可以设计出一种全面解决问题的策略 (Nord 1997: 14)。这一模式的核心思想是"语篇是一种交际活动,可以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因素来实现",其强调的并非是语篇的内部结构,而是语篇的制作情景、传意功能和接受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功能。译者的角色不是要制作与原文等值的译文,而是要制作能发挥预期功能的译文。在该模式中,翻译过程的重要因素包括顾客或发起人、译者、目的语文本、目的语文本接受者、目的语、源语文本、源语、源语文本作者、源语文本发送者和源语文化;在分析文本时,诺德以布勒(Bühler)的研究模式作范例,将其按功能分为四种类型:指称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诉求功能(appellative function)和寒暄功能(phatic function,此功能为诺德所加),并讨论它们在文本中的体现方式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到具体的翻译问题。诺德指出,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关系可用"忠实-自由-对等(fidelity-liberty-equivalence)"这一公式来形容。同时,为了避免过分强调译文目的而背离源语文本,她提出了"功能加忠诚"(functionality plus loyalty)的概念(Nord 1991/2005: 28~30)。 (杨榕)

操作型文本 operative text

赖斯(Reiss)文本类型理论中所提出的四种主要的文本类型之一。操作型文本的目的是"引诱行为反应",即感染读者或"接受者"并使其采取某种行动(Munday 2001: 73),例如遵守某种规则,购买某种产品等。因此,其焦点是呼吁或感染,语言是对话性的。在此类文本中,"内容与形式都受制于文本力图实现的语言之外的目的"(Nord 1996: 83)。这意味着译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成一个与原文具有对等(equivalence)说服力的目标文本(Shuttleworth, Cowie 1997: 117)。赖斯建议,翻译时译者应采取编译的方法,并以引起译文读者的同等反应这一总体目标为指导原则,制作出一个令译文读者或"接受者"采取某种行动的译文(Munday 2001: 74)。除了传递类似的"引诱行为反应",译文还须保留基本的语义内容,也许还要再现美学因素(Shuttleworth, Cowie

1997: 117)。广告、政治宣言以及布道辞等属于此类文本类型。 参见"表情型文本""视听媒体型文本""信息型文本" (谭娟)

代理人 agent

指"处在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Sager 1994: 321)的中介人。任何翻译活动都涉及不少人,其中包括文本制作人、中间人(比如概要摘录者、编辑、校对人员和译者)、传播代理人以及读者。除制作人和读者以外,有时一个人可兼多职。翻译代理人可以是从翻译中获利的出版商,也可以是其他委派译者工作的人。他独立于作者和读者并自行决定翻译素材。

发话者 addressor

亦称"发信人"。与"受话者"相对。在言语交际中指发出信息的一方,在会话中指说话的一方,在书面交际中指作者。

发起人 initiator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functionalism)认为,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几乎没有译者是自动开展工作的,他们通常是受客户委托而进行翻译。在这种情况下,客户就是发起人。赫尔兹-曼塔里(Holz-Mänttäri)(1984)在她的翻译行为理论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概念,具体是指"启动翻译过程,并根据译文目的决定翻译步骤的人、组织或机构"(转引自 Nord 1997: 20)。发起人出于某一目的或针对目的语文化中某一特定读者群的需要而要求译者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并可要求译者提供在源语文化环境下制作的、发起人本人认为有用的其他相关信息。赫尔兹-曼塔里将这一概念与委托人(commissioner)区分开来,强调发起人是需要目标文本的人。发起人的角色可以由翻译交际/互动(translation interaction)中的任一媒介担任,如原文作者、预期的译文读者或者委托人本人。弗米尔(Vermeer)(1986: 274)曾举例说明何为发起人:某一葡萄牙籍学生希望在德国某大学求学,德国有关法律规定,递交的成绩单应为德文。那么德国立法机构就是这一翻译过程的发起人。参见"委托人" (钱宏)

委托人 client

赫尔兹-曼塔里(Holz-Mänttäri)(1984)在她的翻译行为论中提出,指"要求译者为一特定目的或特定读者制作目标文本的人"(转引自 Nord 1997: 20)。译者接受个人、社团或单位的委托从事翻译工作,个人、社团或单位即为委托人。原文由委托人提交或译者按其要求寻找。委托人往往决定译者译什么,怎样译。例如,出版社要求译者对一部小说全译或缩译,也可要求译者重译或部分重译;对于一本产品说明书,委托人可要求只译其中一部分(例如操作部分)而不顾其他。委托人对译者一般有交稿期限的要求,时间充裕,译者可能"精耕细作";时间仓促,译者可能粗制滥造。译者和委托人需要沟通,有的委托人对翻译的性质及工作的艰辛一无所知,以为懂得外语,什么材料都可以翻译,其实译者囿于背景知识或专业知识,对译文使用的情景不一定清楚,译文未必准确和得体。例如,原文是一组图片说明,如果委托人只提供文字,不提供图片及其使用场合的说明,译者盲目地将原文中的"万绿丛中一点红"译成 A red spot in a sea of green,是很没有把握的。总之,委托人不仅影响翻译的过程,更影响翻译的结果。 (林夕)

版本 versions

同一原著因翻译、编辑、排版或装订形式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本子。因读者对象不同、翻译方法不同而可有不同的版本,大致可分三种: 1. 正译本。读者对象: 从事文史研究、专业素质高的专家学者及读者。特点: 忠实原文,顺畅通达,移就风格;不加任何解释和比较;在无对等表达法时,以音译代之;另加脚注备查。意义: 完整保留和再现原作,避免"失真"。2. 释译本。读者对象: 文化层次较高、具有一定文学修养的读者。特点: 忠实原文思想,意译具有文化现象色彩的表达法,将"文化意味"浓郁的部分展开说明。从宏观上体现原作风格。意义: 疏通门径,引入原本。3. 概译本。读者对象: 一般读者。特点: 原文精华犹存,压缩复制,言简意赅。意义: 译作具备大众可读性,吸引普通读者轻松获取思想内涵。

版权 copyright

指对某一著作物的出版权。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译作属于文字作品,是版权保护的客体之一,译者对其译作享有版权。译者对译作享有的权利与原作者对原作享有的权利相同,即既有人身方面的权利(国外亦称精神权利),也有财产方面的权利(亦称经济权利)。人身方面的权利包括: 发表译作的权利;在译作上署名、表明译者身份的权利;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译作的权利;保护译作的完整性,使其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这几项权利为译者终身享有,译者去世后,除发表权可由译者的法定继承人行使外,其他三项权利只能由译者的法定继承人或法律规定的法人团体(在译者无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保护其不受侵犯,不得继承、转让和行使。财产方面的权利包括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即以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财产方面的权利,译者可以自己行使,也可以授权别人行使;译者去世后,译者的法定继承人或法律规定的法人团体(在译者无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和行使 50 年。50 年期满,译作成为公共财产,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译者对其译作享有的版权是一种专有权利,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未经译者同意,其他人不得行使。译

者作为演绎作品的版权所有者,同其被译之原作作者享有的版权是有区别的,那就是如果原作仍有版权,则译者翻译该作品必须事先取得原作作者或其他版权所有者的授权,译者对译作行使版权时不得损害原作版权所有者的权利。译者仅对其译作享有权利,而对其被译的原作不享有权利。

原文本 source text

指作者的原作,是唯一的,未经转述、翻译或编辑加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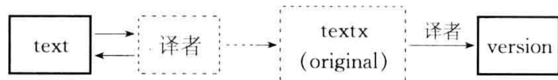
早期翻译的佛经文本并非实物,而由主译高僧凭记忆背诵经文。此经文可能已经转述,即使有文本,也是断简残篇。因此佛经翻译初期,只有源本,并无原本。

源语文本 source text

简称“源本”,翻译时所依据的原书。源语文本可能是作者的原作,可能是他人所为的改编本,也可能是使用不同于原作语言的翻译本。参见“原作”“原本/文”

原作 original

对原作有两种理解。1. 传统的理解是:原作即作家创作的文本,是译者从事翻译的依据和依归;2. 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家创作的文本(text)只不过是翻译活动的出发点,而译者在与text交流对话过程中所产生的近似text的虚拟文本(textx)才是作为翻译依据的原作(original),即textx=original≈text,可图示如下:



由图可见,译作(version)直接来自textx,而不是text,textx才是真正的源语文本。这是译者与text经过交流对话,达成“视野融合”的结果。textx是个变量,因参与交流和对话的译者不同以及时空的变化而变化,textx一般应是复数,一个译者的textx只是text多个近似值之一。

不同的翻译理论对原作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持不同的观点。事实上由于作者与译者的立场、政治观点不同,需要对原作作局部的改动,对原作不当之处(特别是翻译科技文章)应加注或作必要的修正,否则对原作者和读者都是不负责任。参见“接受美学”

源出者 originator; sender

使用信号或符号系统向他人传递某种信息以创造某种效果的人或机构;是语篇的语境因素之一。语篇作者根据源出者的指示,用符合其语言文化规范的形式写作。文学作品、专著等的源出者和作者往往是同一人。有些文本虽没有明确提供作者和源出者的姓名,但其身份依稀可见,如广告词常由广告商代拟,法律文件由律师捉刀代笔,产品标准由集体讨论定稿,等等。就文学翻译而言,要了解语篇源出者的生活经历、思想观点、创作流派、文化背景和语言背景,使目的语“文如其人”,恰如其分地在译出思想内容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源出者)的风格。

赞助(人) patronage

勒菲弗尔(Lefevere)在讨论影响文学系统及其构成系统之各文本的诸因素时所用的术语,指能推动或阻碍对文学进行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权力机构或个人,或任何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传播或可能妨碍、禁止、毁损文学作品的力量(1992a: 15)。勒菲弗尔(1992a)在*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中提到,有两种因素制约着文学系统,使其与社会的其他次系统保持步调一致。一个因素是由译者、教师、批评家或评论家构成的文学系统中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他们会抑制与社会的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相抵触的文学作品;另一个因素是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出版商、媒体、宗教团体和个人等。赞助人通过学术团体、出版审查机构、批评杂志、高等院校等机构,调节文学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的关系。

赞助人通过三种成分(components)实施对文学的操控:利用意识形态制约文学形式和主题的选择和发展;为作家和重写者提供谋生手段,在经济上予以控制;给予作家一定的社会地位,使其融入某种圈子和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三种成分可以由同一赞助人支配(undifferentiated),也可相互独立(differentiated),即经济上的成功有时与意识形态无直接关系,也不一定能提高社会地位。三者融为一体时,读者群体就会分散成许多小的群体;如果三者彼此独立,读者的期待视阈就会大受限制,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就会依赖于重写的作品。赞助人能推动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也能妨碍甚至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其影响是巨大的。

译本 version

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的本子,有全译本、缩译本、注释本、(双语)对照本等多种。

“不忠的美人” les belles infidèles

指辞藻华丽、但不忠实原作的翻译。“美人说”来自法国。为了迎合法国17世纪初期至中叶读者的口味,以德·阿布朗古尔(D' Ablancourt)为首的一批翻译家不顾原文风格,随意增改发挥,一味追求译文的华丽。这种译风在当时的法国影响很大,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如法国著名作家梅纳日(Menage)就曾风趣地批评说,“当德·阿布朗古尔翻译的吕西安的作品问世时,许多人抱怨他翻译得不忠实。而我称它

为'不忠的美人',这是我年轻时对我在图尔的一位情人的称呼,她很美丽,但不忠实。"此后,"不忠的美人"的说法就不胫而走,渐渐传开了。法国散文诗开山鼻祖贝尔特朗(Bertrand)附和说,"翻译好比女人,美丽的不忠实,忠实的不美丽。"(佘协斌,梁海军 2002)

"不忠的美人"的说法歪曲了忠实和美丽的辩证关系,因为译文可以既美丽又忠实,也可能既不美丽又不忠实。此外,这个比喻以女性为喻体,法语的 belles(美丽的)和 infidèles(不忠实的人)二词在词性上也带有女性性别标志,因此,该比喻构成了对女性和译者的双重歧视,遭到当代女权主义翻译家的谴责,也在情理之中。

可读性　readability

指书面语词语组合、章句及至语篇的可读程度,具体包括:1. 合乎语法;2. 合乎习惯;3. 含义明晰;4. 语体适应;5. 条理分明。可读性属文体修辞学研究范畴。就翻译而言,一般原则是目的语的可读性要与源语的可读性相适应。

伪译　pseudotranslation

亦称"伪翻译",指谎称译作,或常被误认为是译作的原作,也可指常被视为原作的译作。个别作者把自己的创作当作虚构的(fictitious/pseudo translation)译文出版,以便利用对翻译的大肆宣传,赢得广泛的读者,实现自己的文学计划(Baker 1998: 184～185)。图里(Toury)于 1980 年指出:一部作品被当做是从源语"翻译"过来的,然而事实上并没有与之对应的源语文本,因此也就没有实际"翻译操作过程",更不会有所谓的各种翻译关系发生。图里认为,伪译之所以在一段时期内盛行,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从文化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是因为这样做便于把新鲜的成分引入一种现存文化。其次,某位作者想要改变其创作风格时,可以用伪译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他可以宣称自己的作品是"翻译"而来的,从而可以与自己先前的风格分道扬镳,走出自己先前的影子而以焕然一新的面孔出现在读者面前。再次,伪译可以让作者逃避他所在时代严格的审查制度而使自己的作品得以面世。图里所说的伪译是一种具有伪造性质的文学创作手段,因为作者呈现给读者的看似译作的作品其实是原创的。对于翻译研究而言,伪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偶尔使用伪译,可以引入清新脱俗的创作风格,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当一种创作风格古板陈旧且极力排斥非经典创作模式和规范的时候。另一方面,伪译提供了一种洞察力,有助于人们透析那些表现翻译文本典型特征的概念,因为伪译者所使用的有些语言和文本术语也是真正的翻译者所使用的。提出伪译概念的另一位学者是拉多(Radó),他于 1979 年就提出了伪译概念,比图里还要早一年。拉多的伪译概念指那些背离原文太远因而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译作。他指出,要对一部翻译作品进行归类,最主要的标准是看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在翻译单位上的对应程度。他认为,改编、以各种文体重写、撰写游记等都可以归类为伪译(Shuttleworth, Cowie 2004: 134～135)。

图里和拉多提出的伪译虽然术语相同,但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指以翻译为"道具"进行创作的模式,作者的目的是为了给读者一种假象,他好凭借翻译这个道具从事不同于传统风格和套路的创作。而后者即拉多的伪译概念的所指对象多少有点像是翻译的样子,因为拉多所定义的伪译作品可以找到与之对应的原文,只是译文与原文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等同,两者相差太大而无法把它们相提并论。无论是图里还是拉多,他们的伪译概念在学理上并不是贬义的,他们只是把伪译作为一种创作或翻译现象来讨论(刘建刚 2007)。

伪译的例子古今中外都屡见不鲜。1669 年,法国出版了书信体小说《葡萄牙情书》(*Lettres Portugaises*),作者自称是翻译一失恋的葡萄牙修女的情书。300 年后,经历代考证,专家认定,17 世纪的"翻译者"吉耶拉葛即是作者本人,《葡萄牙修女》是他创作的小说。(刘禾 1999: 237)我国古代翻译的佛经有不少是伪经。苏曼殊于 1903 年将雨果的 *Les Miserables*(《悲惨世界》)译为 14 回章回体小说《惨社会》,译文首八回有改动,而其中六回又系创作,以致有的论者以为《惨社会》是苏曼殊的创作,而不是翻译。(郭延礼 1998: 34)这大概可以算做后一种伪译的例子。

伪译模糊了翻译与创作的界限,使得翻译更加难以界定。

(文晔)

胡本　Hu texts of Buddhist sutra

与"梵本"相对,后者是印度传入的佛典原本,即第一文本,胡本则是中国西域地区从原本转译的文本,是第二文本。胡本是指在魏晋以前,佛教初传中国,在西域流传而翻译成安息文、康居文、于阗文、龟兹文等各种西域语言文字的佛典译本。研究表明,佛教未行中原,已传西域。佛教传入中国约在公元前 1 世纪左右,最初并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到中国的,而是从今天的新疆,还有中亚国家和民族为中介间接传入的。因此,初期佛教经典的翻译并非直接译自印度的"梵本",即梵文经典,而是从大月氏、安息、康居等西域诸国语言的译本间接转译的。我国的佛经翻译,从汉朝到魏晋,所依据的经典大都是"胡本"或"胡语经典"。由于依据"胡本"进行的佛典翻译活动涉及二度翻译和转换,即从"梵本"到"胡本"再到"汉本"的转换,可以推知早期的佛经翻译与原本难免会有不少出入。另外,由于"胡本"不是印度本土的经典,也显示出一种保守性,当一部梵文佛经被翻译成中亚的"胡本"以后,往往一两百年里都用这个版本。

以"胡本"为源本的佛经翻译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从汉朝到魏晋,甚至到南北朝,内地论及佛经翻译

时还常说“译胡为秦”,其中的“胡”指的就是西域诸语。史料记载了依“胡本”译经的情况。据《高僧传》所述,在鸠摩罗什之前,佛经译文“多滞文格义”,“不与胡本相应”。支娄迦谶,即支谶,是古代月支国人,“汉桓帝末(公元167年),游于洛阳。于灵帝光和、中平之间(178～189),传译胡文”。道安提出的著名翻译理论“五失本,三不易”(《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也是以胡秦之间的转换为实践基础的。尽管相对于“梵本”而言,“胡本”在佛典原创性上先天不足,但“胡本”的出现促成了中国佛经翻译的肇始阶段,是我国早期佛经翻译的成果,也是内地佛经翻译依据的转易版本,在中国佛经翻译史和佛教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我国早期翻译理论的发展、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参见“五失本”“三不易” (李宁)

流散作家 diasporic writer

亦称“离散作家”,指那些移居海外,但仍具有祖籍国的文化背景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他们中有些人近乎流亡状态,有些则是自觉自愿地散居世界各地,或者有意识的流离失所。这样,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双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往来于自己的居住国和出生国,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这些人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他们熟练地使用英语来写作或翻译,但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其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土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沿地带。流散作家的作品里多隐含一种矛盾的心理表达:这些作家希望在异国他乡寻找心灵的寄托,但又很难与居住国的文化和社会习俗完全融合,结果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这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能同时引起本民族和定居地的读者的共鸣,模糊作者的语言文化身份,使创作的语言变得日益包容和混杂,充分体现文化的多样性。(王宁 2005: 28)一般认为,语言、文化和国籍是相互联系且界限分明的;谈到文化,我们就想到民族文化;翻译多被看做民族或国别文化间的交际活动。流散作家的这种混杂身份对这些翻译观念构成挑战。另外,一些流散作家也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混杂身份的影响。 (贺显斌)

译风 style of translation

包含两个方面,即翻译的工作作风和文字作风。工作作风与译者的翻译思想有关,表现为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译者应认真负责,坚持一定的翻译标准,不粗制滥造。傅雷的译风今天尤其值得提倡,他说:“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琢磨出来。……《老实人》的译文前后改过八道,原作的精神究竟传达出多少还是没有把握。”(转引自罗新璋 1984: 626)使用译文语言文字的作风与译者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也有关。严肃认真的译者可以“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朱生豪译莎剧,“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相反,也有胡译、乱译、死译或任意删节者。此外,译界还存在“美文风”。有的译者不问原著风格如何,一味地追求译文华美典雅,以为文字越华美、越典雅,译作越上乘。文字功底深厚的译者译出来的东西,虽然与原著风格不合,但毕竟“读来似行云流水,顺心舒畅”;但文字功夫浅薄的译者,硬要追求译文华美,结果非但没有美感,甚至还令人生厌。

死译 mechanical translation; awkward translation

指逐字/词逐字/词的翻译方法或由逐字/词翻译而产生的语意不切、意思含糊或有语法错误的、佶屈聱牙的译文。参见“逐字译”

逐字译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亦称“词对词翻译”,即将原文语句一个词一个词地对译,不考虑词在语法或词义方面的差异。逐字译虽有可能,但一般是行不通的,如: His real interests lie outside work, in his love of music. 逐字译为“他真正的兴趣在于工作之外,在于他爱好的音乐。”可改译为“业余爱好音乐乃是他真正的乐事。”又如: —What was the Lourve in Paris like? — It was so interesting that I went there several times. 逐字译为:“巴黎的卢浮宫怎么样?”“它是如此有趣以致我去过好几次。”汉译 so ... that ... 常回避“如此……以致(于)……”的对应形式。

硬译 servile translation

“硬译”一词,初见于梁实秋1930年发表在《新月》杂志上《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国翻译界曾发生“顺译”“活译”跟“硬译”“死译”的论战。所谓“顺译”,是指译文通顺,好读;所谓“硬译”,是指译文生硬,不好读。当时赵景深等主张“宁错而务顺”。瞿秋白祝贺鲁迅翻译的《毁灭》一书出版时在信中严正地指出:“既然要宁可‘错’点儿,那就是要蒙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这种主张是“愚民政策”,当时的论战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如对翻译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著作的不同态度)。针对“顺而不信”,鲁迅赞成“信而不顺”。他(1931)在《几条“顺”的翻译》一文中说:“‘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了,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对于硬译,一般指按照外国语的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不顾本国读者能否接受的生硬翻译。全面地看,鲁迅也不赞成这等“硬译”,只是在“信”和“顺”不能兼得时才突出“硬译”,即“宁信而不顺”。实际上鲁迅还提倡“兼

顾两面”。参见“兼顾两面”“信与顺”

译作　translated works

亦称“译品”，指翻译而成的作品，是翻译活动的结果，是目的语交际赖以实现的手段，是为读者的交际目的服务的。译文和原文一样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话语整体。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Escarpit)认为：“它(指译作)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 1987：137)。

旧译　old version

佛教用语，与“新译”相对。北宋从义《法华三大部补注》卷五：“刘汉以来，谓之旧译；李唐而下，谓之新译。”唐代玄奘不满意于前人译述，遂重译，而称前人所译佛经为“旧译”。后世便以唐代以后所译佛教经典为新译。新译家以玄奘和义净为代表。旧译家以后秦鸠摩罗什和南朝陈时真谛为代表。　(夏勤)

新译　new version

佛教用语，与“旧译”相对。是对玄奘的翻译的赞词。玄奘(602～664)为唐代大翻译家，由于他不仅精通汉语和梵语，而且精通佛学，因而玄奘的翻译既忠实保存了原作的意义，而且叫人读起来不佶屈聱牙。换句话说，玄奘既不像义净偏重直译，又不像鸠摩罗什偏重意译，而是善于把直译和意译结合起来，因而当时把玄奘的翻译誉为“新译”。此外，“新译”还用来表示同一原著的最新译本，在这种情况下，“新译”也称“新译本”。　(周洁)

译者　translator; interpreter

指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包括专业的和业余的。就笔译而言，译者的位置处于作者和读者中间。译者必须兼顾两头，瞻前顾后，既进入作者的创作活动，又进入读者的阅读过程；既要了解作者，又要了解读者；既要对作者负责，又要对读者负责。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受到两次接受活动或来自两方面的影响。首先，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或交流会直接影响到译文的生成。同时，译者会预测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或参与，从而在另一方面影响译者对译文的生成。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判断标准会影响他的二度创作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所依据的原文应是译文(译者的创作文本)和译者解读原文的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傅雷认为，“译书要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这就是说，译者应该翻译自己力所能及的东西。译作是译者的一面镜子，什么样的译者只能译出什么样的内容和什么样风格的译品。

主观能动性　subjective dynamics

在翻译中，译者虽然受到客观条件的种种制约，方寸之地，步履难移，但是只要他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尽最大可能将客观制约性加以抑制，则翻译仍可成为得心应手的创造性活动。发挥主观能动性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1. 选择原文。译者按特定的目的选择原文，即使对委托人的委托也是可选择的。1909年，鲁迅为了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翻译了一些“弱小民族”的作品，合成《域外小说集》。近代翻译理论的奠基人严复一心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译书的目的是用西方的新思想唤起民众，他选书的范围有很强的针对性；2. 解读原文。译者阅读原文是解读的过程。不同的读者读同一本书，可能各有侧重点，各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鲁迅就这样描述过对《红楼梦》的解读：“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当然，翻译家对同一部作品的看法，可能不至于差别这么大，但肯定在许多细节上的理解是有出入的，甚至在整体的风格上都会出现差异。例如，许钧认为《红与黑》的风格是“长于分析，文笔冷静，语言不事装饰”，罗新璋则认为这部小说的风格是“句无余字，篇无长句，似淡而实美”。译者有权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翻译；3. 决定翻译方法。翻译方法多种多样，译者往往根据原作内容和笔法、自己的翻译观和翻译素养而采用不同的译法。英国小说家乔伊斯(Joyce)的名作《尤利西斯》在国内有不同译本，读起来差别很大。萧乾、文洁若夫妇本着为读者考虑的原则，尽量将一些晦涩的地方澄清，语言也尽量流畅；而金隄的译本十分忠实原文，将一些省略的地方和艰涩之处也加以保留；4. 决定表达方式和应用翻译技巧。常有这样的现象：同一原作的几个译本，在基本意思相同的情况下，表达各具特色——有的文采飞扬，有的语言质朴，有的多用长句，有的则以短句见长。

译者个性　translator's personality

个性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范畴，是指一个人的整体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文如其人”，即指原文或译文均能反映作者或译者的个性。“译者的任务在于再现原作的面貌和精神：原作是细致说理的，译文也细致说理；原作是高举想象之翼的，译文也高举想象之翼。一篇文章的风格只是作者为表达特定内容而运用语言的个人方式，它与内容是血肉一体，而不是外加的、美化的成分。”(王佐良 1986：108)译文既要保持原作的个性，又可有译者的个性，两者是可以和谐统一的。

首先，每一个个性都具有作为人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既表现在人的自然属性(例如，高度发达的大脑、神经机制中的第二信号系统等)，也表现在人的社会属性上(例如，民族性、阶级性、职业性等)，两种属性并存。这种个性的共同性是译者能理解和翻译原作者通过原著表现的个性的基础。其次，每一个个性中都具有区别于他人的独特性，表现为不脱离人的共同性的独特心理特征及精神风貌，表现于能力、气质、

性格、信念、理想和世界观等。这样，就理解与创造来说，译著就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作者自身的影子（占主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译者的影子。当然，译者个性不是指译者主观随意地解释他人的作品，而是在忠于原著的大框架下对原著所作的选择性的表达。

译者风格　translator's style

指译者的人格倾向、选题倾向、文笔色彩以及译者所遵循的翻译标准、使用的翻译方法和译文语言运用技巧等特点的综合，尤其表现为语言运用的特点。在我国现、当代翻译史上，翻译大家无不具有自成一家的风格。鲁迅的译作凝重洗练、言之凿凿；朱生豪的译笔浑厚畅达、大势磅礴；傅雷的译品圆熟流畅、文采照人；钱锺书的译文酣畅顺达、笔下生辉；巴金的翻译明白晓畅、文气自然。译者的风格是由其世界观、创作天赋、艺术偏好决定的，并在翻译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对原文理解上流露出来的个性特点和语言转换时显现的语言习惯和语言特点。

译者要有自己的风格，绝不意味着可以忘掉原作风格，我行我素，让自己的风格恣意流露，用自己的风格代替原作的风格。恰恰相反，译者应当尽最大努力调动自己的文化素养和中外文功力，准确地传达出原作的风格。因此每个译者都面临着既要表达原作风格，又要使译文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艰巨任务。然而原作者的风格与译者的风格往往是有差距的，只有那些把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到最小的程度，达到两者之间的基本统一（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的译作才是翻译中的上品。译者要传达多种风格并非易事。一般来说，译者只有求得自己风格与原作风格的最佳结合，才可能产生翻译佳作。

译者主体性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

亦称"翻译主体性"（如果翻译主体专指译者的话——参见"翻译主体"），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即翻译主体能动地操纵原本（客体）、转换原本，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的特性。译者主体性亦即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在克服客观制约性中得到表现。客观制约性包括双语差异、不同的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等。译者主体性贯串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译者主体性研究对翻译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文学史的编写都有重要意义。参见"主观能动性"

译者角色论　translator's role

古今中外，不少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特别是文艺学派）在讨论翻译问题时，经常让译者进入某种"角色"，以论其功过是非、盈亏得失。翻译既是一种艺术，必然与其他艺术活动，如演员演戏、画家绘画、雕塑家雕塑、钢琴家演奏等有相似或共通之处。于是，演员、画家、雕塑家、钢琴家等自然而然地成了翻译家声应气求的朋友。在传统译论中，对译者的角色有多种多样的比喻，起过一定的作用。参见"翻译隐喻"

翻译立场　standpoint of translating

法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贝尔曼（Berman）在其 *Toward a Translation Criticism: John Donne*（《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一文中指出，译者的翻译立场是译者在自己的翻译冲动（即译者从事翻译的动力）、翻译任务（即译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以及内化方式（即译者所处的翻译环境对译者所产生的影响）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简言之，它是译者在面对"重制"原作时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这种态度或选择的基础是译者对原作的看法以及对翻译意义、作用或目的等的认识，同时它也要受译者所属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文学氛围及思想观念等的影响。贝尔曼强调，批评者在批评一部译作时，首先要考察的便是译者的立场问题。（吴南松 2000）

译德　translator's morals

即翻译道德或译者的职业道德，体现在志趣、责任感和品德三个方面：1. 对所从事事业的志向和兴趣往往表现出译者的使命感：译者的选题方向应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译者应是世界文明种子的播种者，而不是精神鸦片的贩卖者。鲁迅把低级庸俗的作品斥之为粪便和鼻涕。译者应当树立高尚的选材志向，摆正个人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2. 关于译者的责任感，林语堂曾说："以译者所负的责任言，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其有真正译家的资格。"（转引自罗新璋 1984：418）3. 译者的品德须是高尚的，不能为私利而做出有损国格、人格的事情；在外国友人或商人面前要自尊、自重、自爱；不能文过饰非，推卸责任；译者应通过出色的工作来促进中外双方的真诚合作。

抢译　scrambled translation

指为了某种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只求速度，争分夺秒地抢先翻译。抢译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系个人所为，二系出版营销机构。特别是后者，看准一部作品（尤其是国外的畅销书），迅速组织一批译手，七拼八凑，仓促应市。有时，同一原著，不同单位竟在同一时间炮制出七八种译本。抢译在我国早就有之，如20世纪20年代末抢译德国作家雷马克（Remarque）的成名作《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当时的《文艺新闻》周刊创刊号（1931年3月16日）上有评析："（预先出版的中译本）总加已足半打之数，不知是雷马克在中国特别走运，还是中国的纸张和印刷要

特别的遭殃！（注意：现在金价腾涨。）雷马克的著作是否有十分的翻译价值？且置勿论。但大家都一致的竞争地'抢'译，则其动机诚有可议：1. 翻名著可以扬名；2. 卖得起价钱，两者都不免是迎合市场的投机。"近一二十年抢译更是屡见不鲜。

乱译　uncontrolled translation

指在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驱动下，违背译德，无准备地、不求甚解地进行翻译。鲁迅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的一段话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转引自罗新璋 1984：298）

胡译　unrestricted translation

指不按照原文、随心所欲地进行翻译，或因中外文水平低，或因译德、译风有问题，或因二者兼有。

滥译　indiscriminate translation

1. 一般指对原作内容不加选择的翻译。本来，翻译作品应有利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然而由于有的译者态度不够严肃，选择所翻译的作品不慎重，以及某些出版单位的单纯经济观点，迎合社会上一部分人的低级趣味等原因，以致翻译出版了一些平庸的、甚至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外国作品；2. 也指乱译。参见"乱译"

图谱　mapping

霍姆斯（Holmes）（1988）用来解释源语文本与译文关系的一个概念。首先，霍姆斯评论说，一首诗歌的多种不同译文，每一种都只会为目的语读者准确地反映出源文本的某些特征，他认为"所有译文都是地图，领土则是原文"（1988：58）。没有一幅地图是权威的，任何地图仅仅为特殊的目的而制；同样，同一首诗也必须有多种译文才能对原诗有更全面的理解。其次，霍姆斯（1988）认为，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是一种在序列上和结构上同时进行的文本级阶操作。换言之，不仅需要一句一句地翻译，而且要由译者获取，并由读者不断地去参照该文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心理概念（即"图谱"）。根据霍姆斯的解释，翻译过程中用的不是一幅地图，而是两幅；第一幅反映译者从源文本中抽象出来的特征，而第二幅是在多种选择（语言、风格、音律方面的选择）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译者先从可用的各种选项中选择，再反映出目的语文本最终表现形式。此外，第二幅地图会受对应层级（hierarchy of correspondences）的影响（1988：86）；某些选项被排除仅仅是因为有其他更重要的一些选择，此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应层级。对研究源语文本与其译文关系的学者们来说，图谱这个概念有着实际的应用价值。　　（黄勤）

受话人　addressee

亦称"受信人"。与"发话者"相对。在言语交际中接受对方话语的一方。在会话中指听话者，在书面交际时指阅读者。

定译　final translation

指无法超越的译作或认为无可更新的译作。是否存在定译，争论很大，主要原因是概念界定不清。理解为唯一的译本或最后的译本，则定译是完全可能的。理解为最佳译本、后人无法超越的译本，在某个给定的时间段以内也是可能的。但这并不代表这个译本永远不会有人能够超过，因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发展的总趋势是后人胜过前人；另外，译作的评价标准受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一个时代的优秀译本到了另一个时代未必还是佳译。因此，绝对意义上的定译是不存在的；相对于某个历史时期来说，定译又是可能的。

深度翻译(法)　thick translation

亦译作"厚重翻译"，指阿皮尔（Appiah 1993：817）提到的通过各种注释和评注（annotations and glosses）将文本置于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的翻译。在"深度翻译"一文中，阿皮尔通过分析一部非洲口头文学作品译成英语时的主要问题，揭示全球文化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翻译造成的影响。很明显，"深度翻译"这个概念也适用于任何其他含有大量解释材料的译作，不管这种解释材料是脚注、评注还是扩充的介绍。提供大量背景资料的目的，是使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多一份敬意，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异文化的人们思考问题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Shuttleworth，Cowie 1997：170～171）

我国晚清时期的翻译家严复翻译的一个特点是，在译文中附有大量的按语，对原著的历史背景、作者学术观点的历史地位、论述的精髓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类似理论以及作者观点中应予以商榷之处，均一一指出，对读者有很大的启迪作用。据粗略统计，严复所加的按语约占他所译的十部译著字数的十分之一，而《天演论》的按语数则占了全书的一半以上。严复的译作大概可以算作我国翻译史上最典型的"深度翻译"的例子了。

读者　reader

指阅读翻译作品及其他文字者。读者作为一个群体，处在不同阶层、不同年龄，具有不同性别、不同经历、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修养，而且对译作各有所好。英国翻译理论家萨沃里（Savory）（1957）在 *The Art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根据读者对原文的熟悉程度将他们分成四类。第一类读者对原文完全陌生，他们读译文出于好奇或是对某种文学特别感兴趣。第二类读者是正在学习原文语言的学生，阅读译文主要是一种辅助学习的手段。第三类读者曾学过原文语

言，但已遗忘。第四类读者是熟悉原文语言的人，他们或许是学者。这四类读者阅读译文的目的不一，对译文的要求也不一。不懂原文的读者出于欣赏译作的愿望，一般爱读语言流畅、富有国外情调的意译作品。对于学习源语的学生来说，译文最宜直译，字面意义不宜变动太大，以帮助学习者领会所学语言中不同结构、不同搭配的含义。第三类读者一般文化层次较高，且对源语国家有一定了解。因此，他们要求译作读起来像原作，能充分反映源语国家的文化，并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好像是在读原文。第四类读者既了解原作的内容，也了解原作的风格，他们阅读译作更多地出于研究。

实际上每位译者在翻译时心目中都有确定的读者对象。严复的读者定位在当权者和士大夫阶层，他"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译《天演论》，刻意求雅，以向这些人宣传西学和维新思想。为便于学习者理解原文的词法、句法和句义，教科书上的译文多直译，而从阅读欣赏的角度来说，译文往往不应拘于原文的形式。读者的定位不一，译法的要求也就不一。

读者身份类型　types of readers in reality

可按年龄、性别、受教育的水平、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划分为四类。1. 普通大众(the masses)：指一般读者，是最广义的广大读者，几乎不可界定。但若就狭义的方面说，则指一般中等文化程度的非专业读者群，性别、年龄、职业、教育水平不限。他们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消遣性的，非专业鉴赏性的，但有广大的多数，又往往保持沉默，代表通俗和流行文化的多数趣味。2. 知识界 (intellectuals)：指有一定文化教育程度和一定的外国文学接受能力和审美能力的读者。他们的读书是有选择的，有时是成系统的，因此对于译文的质量有一定的要求，能够鉴别译笔的文野，评判难免带有个人的好恶。喜欢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见解，能积极参加自己感兴趣的译品的评论，但以口头谈论为多，有时比较讲究谈话的方式，有专业性术语的渗入。3. 译界(translation circle)：包括甚广，翻译家、翻译教师、翻译理论家、翻译评论家都包括在内。翻译家又是分语种的，在文学翻译家中是有国别文学和各自的研究领域的，甚至有更细的诗歌或散文的不同文类和不同作家的翻译研究领域。翻译理论家就更是有学派和个人理论观点的了。因此，他们的评论和鉴赏往往带有本专业的特点，满足本专业的理论研究和实际需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 评论家(criticizer)：主要指翻译评论家，当然，推而广之，也可以包括文学评论家，特别是外国文学评论家和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也就是有别于普通读者群体的作家、批评家、解释学家、学者等专业人士，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越来越专业化，审美修养和鉴赏评论的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前沿化，因而其评论意见的价值就越应当受到重视，对译事和译学影响重大。　(王宏印)

读者操作类型　types of readers in research

按照进入具体操作过程中的读者群体的理论概念来分类，读者可分为：1. 源语文本读者与目的语文本读者(SL text reader and TL text reader)：一般说来，在涉及翻译的实体概念时，它的读者可以分为源语文本读者和目的语文本读者。前者是阅读原文作品的读者，后者是阅读译文作品的读者。二者在分析方法的要求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但是针对的对象有所不同，主要体现为不同方面的张力。二者在理想状态下的差异包括：文化背景不同，阅读语言不同，接受心理不同，评价尺度不同。2. 单语读者与双语读者(monolingual reader and bilingual reader)：一般所谓的源语读者大概是指单语读者。当然，对于外国语言文学作品而言，单语读者指的就是目的语读者了，而与原作者(一般是单语使用者)相关的译介者往往是双语读者而不是单语读者，而双语读者对于译文一般会提出与原文对照阅读的参照要求。如同源语读者一样，是否掌握两种语言的关键似乎体现为知识界与一般大众之间的区别，在阅读习惯上甚至体现为译界与普通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不过，也有些译者甚至是单语而不是双语使用者，例如林纾。3. 目标读者与效果读者(target reader and effect reader)：巴赫金(Бахтин)把作者创作过程中与之对话和交流的他者称为"听众"，而且认为他是作品的一个重要的构成成分。有的研究者或评论家假定译者心目中必有一理想读者为其原型，然后才能思考读者问题。这便是目标读者，由此确定翻译时译者所设定的翻译目的，即按照目标读者的需要和要求确定译文的文体风格和语言难度等。这一假定的核心概念是成年男/女子大学教育程度。但是目标读者也可以因文本类型而有不同的关键因素，例如，儿童读物的读者年龄、家庭读物的读者性别等关键因素会起作用。与目标读者相对的是效果读者的概念。指的是在评价翻译效果时，必须以实际参加阅读的读者群体为概念基础，在研究上也就是说以测查对象和统计结果为依据，由此产生效果读者的概念。4. 理想读者与统计读者(ideal reader and statistical reader)：尽管存在与阅读效果密切相关的效果读者的概念，以区别于译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但是在评论家心目中也会有自己的理想读者作为调查的基准对象，例如一般认为，目的语读者如果是本族语使用者或者双语使用者，就可以具有良好的接受和评价条件，而专家作为理想读者，就比较容易反映高水平的专业性意见，等等。显而易见，理想读者在实际的研究中会转化为目标读者，而统计读者和效果读者则实际上难以完全区分，但是，统计学上的数字反映出的读者，则显然不仅是概念上、观念上的效果读者，而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数字的集合体，或折中体，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操作的精密程度。归根结底，理想的效果读者与实际的统计读者的统一，是技术性概念和理论性概念的统一体。　(王宏印)

透明的眼睛　transparent eye

指译者的眼睛,比喻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透明的眼睛”引自爱默生(Emerson)的一首诗,其意是当灵魂离开了肉体,不仅看清了世间的一切,而且看清了自己。旅美学者、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欧阳桢(Chen Eoyang)将其作为自己的一本书名《透明的眼睛：关于翻译、中国文学和比较诗学的思考》。翻译不仅能使我们认识别人的世界,而且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世界,这是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是欧阳桢这部著作的主题思想。“透明的眼睛”的另一层意思是,一般读者通过翻译去认识另外一个世界——不管是过去的世界还是现在的世界;通过翻译,也就是透过译者的眼睛。实际上,译者译得越好,也就是眼睛越透明,读者也就越能更清楚地看到原作。(郭建中 2000)

接受者　receptor; receiver

包括读者和听者。宏观语境因素之一,亦指原文所针对的读者和原著人物对话中的受话者。话语的接受者制约着源出者对语言材料和修辞方式的选择,是形成语言风格的一个要素。如果原文的读者是儿童,译者要用儿童语言进行翻译;如果接受者的群体为科技工作者,则要用科技文体进行翻译。一部译作能否赢得读者,取得应有的社会效果或达到实用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选择的作品和处理作品的方法是否与接受者的期待视野相融合。所谓期待视野是指接受者在阅读一部作品时由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式或先在结构,包括他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直觉能力、接受水平等因素。为了使译作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译者有时对原著作结构上的逐步调整(直至改写),或者加注。

假定的翻译　assumed translation

指无论什么作品,只要在目的语文化中被看成译作,就是译作。翻译概念的典型特征是可变性(variability),不仅在不同的时代、不同文化中不同,就是在同一种文化中,翻译的概念也难以统一。因此,试图对翻译加以准确的界定是不可能的。西方有人甚至指出,一部翻译史其实就是对“翻译”这个多义词加以界定的历史。

“假定的翻译”涉及三个假设：1. 假设有原作;2. 假设经过了转换的过程;3. 假定的译作与假定的原作之间有某种关系。而事实上,有些假定的译作根本不存在具体的原作,如伪译(fictitious/pseudo translation);另有一些假定的翻译后来发现不止有一个原作,如编译(compilative translation);还有些翻译有一个原作,但与假定的原作不一致,如经由其他语言进行的转译(indirect translation)。“假定的翻译”的概念拓宽了翻译的研究对象。(Toury 1995/2001)

隐形　invisibility

韦努蒂(Venuti)用以表示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他在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1995)一书开头就引用夏皮罗(Shapiro)的话来说明译者在译文中的隐形:“我认为,译文应力求透明,以致看起来不像译文。好的翻译像一块玻璃。只有玻璃上的一些小小的瑕疵——擦痕和气泡。当然,理想的是最好什么也没有。译文应该永远不会引起读者感到他们是在读译作。”(Venuti 1995：1)

夏皮罗所说的“透明”(transparent),就是韦努蒂所指的“隐形”,即译文看不见译者的存在,读者就像在读原文一样。韦努蒂指出,这种使译文透明的幻想就是要求译者努力保证译文通顺易懂——使用当代的用语,保持句法的连贯性,并确定一种确切的意义。在通顺易懂的翻译策略下,抹杀了译者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翻译的这一事实,其中包括译者对原文的干预。译文越透明,就越看不见译者的存在,原文作者和意义就被认为越可见。

造成隐形的原因有两个：译者翻译时喜欢使用可读性很强的目的语;目的语文化的读者总是把译作当作原作看待。韦努蒂认为,北美翻译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归化策略蕴涵着一种透明、流利和“隐形”的翻译风格,其目的是尽量减少目的语的外来成分。但是,他赞成异化译法或“抵抗式翻译”,以便译者的形迹可见。　　(蓝春)

媒介者　intermediator

在比较文学中,指译者、旅客、移民、政治难民、沙龙及杂志等,其活动有助于国际文学作品的交流。一般有个人媒介和集体媒介两种。个人媒介指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评论等。集体媒介指一种外国文学的环境,如外国文学研究团体、国外的文学沙龙等。

6. 翻译方法　翻译策略

翻译方法　methods of translation

指译者根据一定的翻译任务和要求,为达到特定目的而采取的具体的途径、策略、手法和技巧。翻译方法在翻译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它来自翻译实践又可指导翻译实践。翻译方法主要包括两方面：1.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传达原作内容和形式的总的设想、途径和策略以及美学态度,多与翻译理论和学派有关。一定的理论产生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方法又以一定的理论为依据。如诺德(Nord)为实现目的原则而提出“纪实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和“工具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两大翻译方法。“纪实翻译”和“工具翻译”自然成为目的论的组成部分。又如纽马克(Newmark)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也是以其语言学翻译理论为依据和依归的。不同国家、不同学派对翻译方法的

分类和命名并不相同,如前苏联文艺学派对文艺作品的翻译方法就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之分;2. 有时翻译方法也指在翻译过程中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亦称"翻译技巧"。这些具体方法如增词法、减词法、反译法、合译、分译、引申、替代等。参见"翻译技巧""翻译策略"

工厂式翻译 factory translation

指巴西对外国大众小说和经典作品的大量改编和缩译。圣保罗大学教授弥尔顿(Milton)将这种翻译称为"工厂式翻译"。"工厂式翻译"的特点是:1. 采取团体翻译和流水线的形式,进行缩译或改编;译者不一定署名;2. 主题修改得符合读者口味,不规范的语言和方言被删除,译作的篇幅和重量受到控制(书的重量涉及邮费);3. 作者的尊严受到漠视,原作的神圣性和严肃性荡然无存;4. 市场目标明确(如针对女性、青少年、文化程度高的读者等);5. 即使有错漏,也要限期完成翻译,并按时发行;6. 名著以不同形式被"再利用";7. 旧译本重印和再版流行,同一个译本常以不同形式出版;8. 重视包装;9. 很多创作被说成是译作,虚构译本或伪译充斥着市场;10. 译作生命短暂,阅后就扔,进不了图书馆,上不了信息网。

弥尔顿认为,这种现象不限于当代巴西,早在18、19世纪,很多国家就有类似的翻译工厂,批量生产小说译作。其实,我国晚清时期的翻译,情况也与此类似。目前,我国有的出版机构为了经济利益,对于热销书也雇用"枪手",不顾质量,粗制滥造,做工厂式的流水翻译。

工具翻译 instrumental translation

指德国目的学派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诺德(Nord)按照译文功能所划分的两种翻译方法之一(另一种为"纪实翻译")。工具翻译的目的是在目的语文化中实现新的交际功能。目的论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交际行动,而不仅仅是对源语作者与读者间的交际行为所做的文献记录(documentary record)。工具翻译分为三类:1. 功能等同的翻译(equifunctional translations),用于技术文本和实用文本的翻译;2. 功能相异的翻译(heterofunctional translation),即原作在文化或时间上与目的语读者有较大距离,在新的语境中保留原作功能没有太多意义,译者对原作的功能加以调整,如《格利佛游记》和《堂吉诃德》的讽刺功能对当代读者而言已经过时,所以译成供小孩阅读的故事;3. 功能对应的翻译(homologous translation),即译作与原作功能基本对应的文学翻译,如将古希腊的六步格诗(hexameter)翻译成英语的素体诗(blank verse)等;多数诗歌翻译属于这种情况。

诺德指出,工具翻译与豪斯(House)的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的区别在于,工具翻译要求译作与原作功能相容(compatible)而不是相同或对等(identical or equivalent)。(Nord 1997/2001: 50~52)参见"隐性翻译"

异功能翻译 heterofunction translation

即诺德(Nord)于1997年提出的异功能工具翻译(heterofunction instrumental translation)(Nord 1997/2001: 63)。翻译目的论者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Nord 1997/2001: 124)。目的论者认为,原文和译文是两种独立的具有不同价值的文本,会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当源语文本情景与目的语文本情景有差别的情况下,译者可能要采用异功能翻译法。例如,在信息功能与移情功能难以两全时,"目的语文本的信息功能要优先于移情功能"(Nord 1997/2001: 63):

金鹰是观众的,金鹰的节目**也是观众的**。无论是港台明星云集、劲歌狂舞的**明星演唱会**,还是经典高雅、代表国际顶尖音乐水准的**经典音乐会**,或是明星与观众互动、零距离贴身狂欢的**明星面对面**,只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快乐"。放飞心情、纵情狂欢。在这一刻,热情会尽情释放,激情将炽热燃烧。All its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of Golden Eagle TV Art Festival are designed for your merriness and happiness, which is the permanent theme permeating in all its performances such as "Super Star Vocal Concert", "Classic Music Concert", and "Face To Face With Super Stars". It is a festival filled with great enjoyment!

原文语言夸张,极富煽动性,营造了一种大喜大庆的欢快气氛。译文出于实用的角度,化虚为实,选取了一些实质性内容(黑体部分),仅传递了金鹰节的活动信息。从原文的辞藻堆砌到译文的言简意赅;从原文的虚到译文的实。这是因为,英语行文用字注重上下文的照应和逻辑上的合理搭配,强调客观简洁,层次清楚,最忌堆砌、重复、累赘,语言上追求一种自然流畅之美。汉语中那些被认为必不可少的甚至富有文采的表达在英语中往往会被认为是累赘多余甚至不合语法。这种语言异质性十分明显,鲜明地体现在各个语言层面上。

在功能性"归化"的过程中,当源语文本功能因文化或/和时空差异不太适合于译文文本时,不妨采用异功能翻译法。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实际上是一种信息性的科教读本。严复翻译时既有戏剧性的张扬,又加以取舍和评论,大大地加强了呼唤性功能,极大地唤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推动了《天演论》在中国读者中的传播。(据贾文波 2004: 8~13)

双向构建 double-sided reconstruction

双向构建是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翻译策略,表现为在翻译过程中以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为资源,运用淡化和温和渗透的办法,试图在处于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第三文化空间(the third space)里完成作品的重构,即进行双向构建。最终的

翻译产品则表现为一个文化的双向构建物(这里的文化取广义,包括文学艺术与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这一翻译策略的理论来源可从《福乐智慧》英译本 *Wisdom of Royal Glory: A Turko-Islamic Mirror for Princes* 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一定的验证。

双向构建作为译者有意识的,为实现其翻译目的所采取的积极的翻译策略,具有四层基本含义:1. 译者的文化立场。译者对原作者和译作读者、原作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原作时代和译作时代持尊重态度,而不是类似于文化沙文主义,或民族、种族、殖民主义的政治性文化态度。2. "双向"是指以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为资源,试图在处于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第三文化空间里重新构建融通两种文化的新的文本,是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这两者之间进行交互式运作。3. 构建的方式是温和的而非激进的,灵活的而非严格的,以文化交流而非政治控制为目的,体现出和而不同的容忍和包容大度。4. 第三空间点的利用,创造性地、有限度地离开原作,最终的翻译产品表现为既不同于原作也不同于目的语文学作品的双向构建物。双向构建策略以其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包容态度,在文化交流中发出了不同于殖民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的新的声音,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具有积极意义。　(李宁)

必要性对应　obligatory correspondence

李运兴(2003)提出的两种对应之一,与"选择性对应"相对,是指保证源语读者的反应共核和译文读者的反应共核基本一致,这是译文和原文必须达到对应的范畴。他认为,译者处于源语文化或目的语文化所构成的翻译情境中,要在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建立一种交际渠道,要构建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和原文相对应的译文。译者始终是整个翻译活动的中心,是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译协调人(mediator)。他的具体任务是进行一系列的选择,以使译文和原文达到某种程度的对应。第二类是选择性对应(selective correspondence)。参见"选择性对应"　(李林波)

选择性对应　selective correspondence

李运兴(2003)提出的两种对应之一,即译者根据翻译情境所作出的选择:哪些与原文对应,哪些与原文不对应,或在基本对应的选项中选择哪(些)项。不同的译者、不同的翻译情境都会有不同的选择。参见"必要性对应"

汉译西化　westernized translation; Europeanized translation

与"西(英)译汉化"相对,亦称"欧化译文",指译自外文(特别是英文)的汉语受外文的影响或采用外文的表达方式。对于汉译西化,译界持两种不同态度:一种完全反对。认为在翻译中,必须保持译文语言的纯粹性(吸收新词汇另当别论),而不应该引入其他语言的表达方式;另一种则肯定其积极的一面。即由汉译西化引进不少新的表现法和大量新词语,例如,在汉语句法中用"的"和"地"两个虚词来作为严格区分形容词和副词的符号,汉语长句的广泛使用等;而词汇的直接引进更不计其数,自梵语翻译的"涅槃""解脱"直至现代的"克隆"(clone)、"丁克家庭"(dink)等,几乎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均可找到汉译西化的例子。从消极方面说,有的译文不顾汉语规范,一味模仿西方句法,读来不顺,甚至佶屈聱牙,不堪卒读。例如:The decrease in his income changed his life style. 汉译西化为"他的收入的减少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按汉语句法拟译为:他收入减少,因此改变了生活方式)。也有译者故意不用现成易解的目的语,而采用新奇难懂的译法,如把 cracker(饼干)译作"克力架"之类,以致破坏汉语的规范与纯洁。常见的还有套用英语句式的译法,如逢 when ... 必译"当……的时候",逢 so ... that 必译"如此……以至于",等等。

归化翻译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在英美文化中,一直以提倡通顺翻译的归化(domestication)理论占主导地位。*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根据韦努蒂(Venuti)的见解,将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domestication)定义为:"韦努蒂(1995)用来描述翻译策略的术语。在此类翻译中,译文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以最大限度地淡化目的语读者对外语文本的陌生感。"(Shuttleworth, Cowie 1997: 43~44)在当代英美翻译的流派中,归化翻译理论当以奈达(Nida)的"动态对等"理论为代表。韦努蒂认为,奈达的思想把英语中透明话语的限制强加在每一种外国文化上,以符合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的规范。这是用通顺的翻译策略把归化隐藏在译文的透明度之中。这与其说是文化交流,还不如说是在归化的翻译策略掩盖下以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观点,对外语文本施加"暴力",即进行篡改和文化侵占。

韦努蒂把这一术语的起源追溯到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概念的著名表述,指这类翻译会"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Schleiermacher 1963: 47; 1977: 74; Venuti 1995: 19~20)归化的翻译要求译者对外国作者要有同情心,要求译文透明通顺。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自我陶醉。这种通顺的策略,追求的是同一性,是一种自我认同,并在外语文本中寻求与目的语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即在异国文化中寻找同一个自我。但是,译者只有在外语文本中找到自己的声音,才能对外国作者产生同情。可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无法减少的,因而,这种自我认同也往往是错误的。然而,这一误认通过透明通顺的翻译策略,在翻译过程中把差异抹杀了。在当前,透明的通顺翻译依然统治着英美文化,归化的翻译依然是英译者所追求的策

略。因此,韦努蒂呼吁,译界就更有必要重新考虑其翻译原则和策略。

韦努蒂指出:"'归化'和'异化'的术语,主要是指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道德态度,是指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而像'通顺'和'抵抗'这类术语,才主要指的是与读者认知过程相关的翻译策略的话语特征。"(Venuti 2008: 19)

关于归化与异化的关系,韦努蒂在2008年的新版中也作了补充阐述。他说:"采取异化翻译以进行通顺的实验,仍然要求译者在目的语语言和文化中吸取素材,因而就无可避免地隐含着民族中心主义,这是翻译内在的本质。"(Venuti 2008: 19)换句话说,译文中的任何异质性都是与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调和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异化翻译也是归化。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并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可以说,归化的翻译不是异化,但异化的翻译只能用归化的语言,这样说是正确的,因为翻译总是在接受语和接受语文化中进行的,是一种带有强烈的"本土化"性质的活动。因此,韦努蒂不同意异化是以源语和源语文化为归宿的说法。参见"异化翻译"

(郭建中)

异化翻译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亦称"小众化翻译"或"少数化翻译"(minoritizing translation),是韦努蒂(Venuti)(1995)使用的术语,指生成目标文本时会通过保留原文中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来故意打破目的语惯例的翻译类型。韦努蒂认为,这样的概念来自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论述了这样一种翻译类型。但施莱尔马赫并没有使用"异化"这一术语,在翻译学中,是韦努蒂第一个使用了"异化翻译"这一术语。在此种翻译中,"译者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Schleiermacher 1963: 47;Venuti 1995: 19)。韦努蒂评论说,施莱尔马赫将异化翻译当作首要的翻译策略,他建议在把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当作标准方法的"过于自信的单语"文化(如英美文化)中采用异化翻译。以这种方式采纳异化翻译将是"在世界事务的现行状态里一种战略性文化干预"(Venuti 1995: 20),因为它将对优势文化那种试图压制译文中的异国情调(亦称"他者")的心理提出挑战。韦努蒂将异化翻译描述为一种"民族偏离的压力",并因而认为它具有"记录外来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使读者置身国外"(Venuti 1995: 20)的作用。具体地说,这样的策略不仅意味着可以不必绝对地服从目的语和文本的限制,还意味着在适当情况下可以选择不流畅的、晦涩难懂的风格,可以有意地收录源语的独有特征(realia)或目的语的古词(archaisms);这些特点合起来就会达到给目的语读者提供一种"迥异的阅读经验"(Venuti 1995: 20)的效果。然而,因为即便是外国味的建立都要"依赖国内文化素材"(Venuti 1995: 29),所以韦努蒂承认异化翻译"在解释外来文本时(与同化翻译一样)有同等的偏向性";然而,他又指出,它们"倾向于显耀它们的这种偏向,而不是将其藏匿起来"(Venuti 1995: 34)。英语中异化策略的例子包括庞德(Pound)的翻译以及纳博科夫(Nabokov)(1964/1975)对普希金(Пушкин)的诗歌《尤金·奥涅金》的著名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转引自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 80)

异化的效果,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获得。首先是文本的选择。译者可以选择不同于目的语文学规范的外语文本,或甚至挑战目的语文学规范的外语文本来翻译,以取得异化的效果。韦努蒂认为,即使你使用通顺的翻译策略来翻译,这种选择偏离目的语文学规范文本的倾向本身,就是使规范陌生化,从而取得了异化的效果。韦努蒂以塔彻蒂(Tarehetti)抄袭式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Аостоевский)的小说为例,说明一个持异化主张的翻译家,不仅可以选择在目的语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外语文本来翻译,并可用一种目的语中规范的话语来翻译,从而开发一种异化的通顺策略(foreignizing fluency)产生透明的幻觉,使译文读起来像原创作品,最后能改造目的语中文学和学术的规范。(Venuti 2008: 267)

其次是多种话语策略(词语的选择)可获得异化的效果。可以运用多种语言形式进行实验,可以紧贴外语文本来翻译,也可以选择能为读者理解但并不广泛使用的词汇和句型。一个持异化主张的翻译家也可选择符合目的语文化规范的外语文本来翻译,但使用一种目的语中边缘的话语策略,对外语文本作出完全不同的诠释,从而改造当今流行的翻译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的规范。他以彼佛(Pever)和沃洛克洪斯基(Ворокхонский)翻译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说明,他们的译文不仅比以前的多种英语译文更贴近俄语原文,而且,他们采用像古语和俗语这样一些非标准语言的词语,改变了标准方言,对当今流行的通顺形式进行实验。(Venuti 2008: 267～268)

韦努蒂认为,异化实质上是一种翻译实验,用各种非标准的语言形式,来改变当前目的语的标准形式和标准方言,包括使用地方方言、社会方言、古语和俚语、行话和新的修辞方法。参见"归化翻译"(郭建中)

回译 back translation

指把被译写成另一种文字的内容再转译成原文的过程和表述。回译可分为三种:检验性回译(back translation for testing)、研究性回译(back translation for research)和机械性回译(mechanical back translation)。纽马克(Newmark)曾提出回译是为了检验译文的质量。(在翻译教学中检验性回译常作为一种题型来检验并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问题。)对于学习翻译的人来说,回译不失为一种检查翻译过程、提高翻译质量的途径。研究性回译,其目的是为了进行尝试或实验,看其在实践中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理论上应当作出什么样的解释和说明。

假定从汉语译为英语，那译文当然会含有某些汉语影响的因素，再从英语返回汉语，则其中也会带有英语的因素，因此，回译文中的两种语言的影响是交互和重叠的，而不可能是毫无影响的纯而又纯的。这只是对于语言而言的，且不用说在一再翻译的过程中，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译者本身的参与因素。机械性回译是对原文（一般是句子或句子以下的单位）的复原，如遇到人名、地名时，名从主人，恢复原名，例如：

Samuel Chao-Chung Ting is younger than either *Wang* or *Pei* and recognition came to him much earlier than it comes to many professionals. 丁肇中比王安和贝聿铭都年轻，而且他成名的年龄比许多专家成名的年龄小得多。（丁肇中为美籍华人，因此其英文名 Samuel 不译。）　（王宏印，蓝春）

名从主人　named after the original sounds

外国专有名词汉语音译的原则之一，即翻译地名、人名必须遵照原来的读音。英语专名按英、美的读音来译。俄、日、德、法等文字的专名按各自语言的发音来译。例如 Auger 是法国人名，按法语读音读为“奥热”，而不是按英语读音译为“奥格”。又如，德语人名 Bach 译为“巴赫”。其中 ch 在德文词尾发[h]音，译为“赫”。如按英文读音，ch 在词尾发[k]或[tʃ]，要译成“克”或“奇”了。但也有例外，如俄国首都莫斯科，系按英文 Moscow 转译，若按俄语 Москва，应音译为“莫斯克娃”。参见“约定俗成”

交际翻译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交际翻译包含三重概念：1. 指凡视翻译为“发生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交际过程”（Hatim, Mason 1990：3）的翻译方法。当然，几乎所有翻译方法都在不同程度上视翻译为交际，而这里所说的交际翻译是指明显地主要以目的语读者为导向的翻译途径。循此途径的译者不会把原文看作仅仅是语言单位的串合体，而是将其视作信息的提供，翻译时力求保留原文的功能，并使其对目的语读者产生效果。交际翻译与逐句译、直译、逐字译不同，原文的遣词造句只是译者考虑的诸多因素之一，而不是至高无上的唯一依据。2. 由纽马克（Newmark）在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1988：22）一书中提出的两种翻译模式之一（另一种为语义翻译）。在交际翻译模式下，“译者努力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源语读者产生的效果一致”（Newmark 1981/1988：22）。交际翻译关注的是目的语读者，译者尽力为其排除阅读或交际上的障碍，使交际顺利进行。其重点在于以符合目的语语言、文化及语用习惯的形式传递原文的信息，而非在目的语规范许可的限度内尽量保留原文遣词造句的痕迹。以交际翻译为取向，译者享有更大的自由度去解释原文，因此可以作出调整，统一文体特征、排除歧义，甚至是修正原作者的错漏。译者以特定的目的语读者群为对象，给译文定下具体的交际功能并努力使译文达到这一功能，这实际上也限制了原文的语义潜能。适合采用交际翻译模式的包括新闻报道、教科书、公共告示和大部分非文学作品的翻译。3. 赫维（Hervey）和希金斯（Higgins）（1992）在其合著的 *Thinking Translation: A Course in Translation Method: French to English* 里使用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文化互换的形式之一。他们定义交际翻译为意译的一种类型，其中需“以适合目的语语境/情景的文化对应物替代原文的表达”，亦即“译文不采用直译，而使用适合目的语文化的对应表达方式”（1992：248）。赫维和希金斯指出，虽然这一翻译技巧不应随便使用，但在遇到翻译告示和口语、俗话等其他无法直译的情况时，使用交际翻译是必须的。（Shuttleworth, Cowie 1997：21）　（梁碧滢）

纪实翻译　documentary translation

亦称“文献型翻译”，指德国目的学派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诺德（Nord）按照译文功能划分的两种翻译方法之一（另一种为“工具型翻译”）。纪实翻译对作者和源语文本的读者间的交际“进行记录”（serves as a document of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ST recipient），翻译时无须根据目的语语境作出调整。纪实翻译包括四类：1. 逐词翻译或对照译法（word-for-word or interlinear translation），重视再现源语词汇和句法特征，主要用于比较语言学和语言百科全书中，目的是体现不同语言的结构差异；2. 直译或语法翻译（literal or grammar translation），强调按照目的语规范，再现源语的词汇、句法结构和词的惯用法，常用于翻译政治人物的讲话、学术文献等；3. 语文翻译法或学术翻译（philological or learned translation），即直译加注法，常用于翻译古代文献、《圣经》或文化差异较大的文本；4. 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or exoticizing translation），故事的源语文化背景没有改变，给目的语读者造成一种陌生感或文化距离感，原文的功能有所改变，主要用于文学翻译。（Nord 2001：49～50）参见“工具翻译”

约定俗成　accepted through common practice

外国专有名词汉语音译的原则之一，指许多通行已久的译名虽与名从主人的原则不符，但已为世人所公认，一般不轻易改动。但有时可指出正规的译名，使新旧译名同时并存，以逐步过渡到采用新的译名。英国作家 Oscar Wilde 按旧译为“王尔德”，一直沿用至今；而按今日规范译法应为“怀尔德”。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的主人公 Holmes 惯译“福尔摩斯”，尽管按读音应译为“霍姆斯”；Newton 还是译为“牛顿”，而不是“纽顿”。地名的社会性要求它有相对的稳定性。（显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某些地名也有变化。）俄罗斯首都“莫斯科”（Moscow）是按英译，如按俄文应为“莫斯克娃”（Москва）。但前者已约定俗成。用于区别原

文中相同形式的不同地名的译名显然也应有一定的稳定性。例如,Cambridge,一为美国马萨诸塞州内的一个地名,译为“坎布里奇”市;而另一为英国的地名,译为“剑桥”。又如San Francisco,一为河流名,译为“圣弗朗西斯科”,另一为美国城市“旧金山”。Greenwich ['grinidʒ]一直沿用“格林威治”的译名,虽与读音不一,但仍在使用着。不过,对此有的辞典(如《新英汉词典》)也按读音译为“格林尼治”。参见“名从主人”

再现手法　expressionistic approach

与表现手法相对的一种基本手法,介于翻译策略和具体的翻译技能之间。再现手法多数用于非文学类翻译文本中,例如商务文体、新闻文体、科技文体和政论文体中,但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有相对的程度上的融合的。在理论上,再现手法相当于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和表现手法的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相对应并相区别,它追求的是逼真酷似的效果,和较为直接的功能和信息对应。从技能上来说,再现手法不像表现手法那样有一套相应的文学翻译手法,而是在运用一般翻译技能的基础上追求语义上的准确和交际上的流畅,它也可以起到文体对应和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交流的传达作用,但不追求惟妙惟肖和生动传神。相对于原作世界在翻译中的表达,再现手法和表现手法的关系之间有如摄影与绘画的区别。(王宏印 2002)参见“表现手法”

表现手法　impressionistic approach

与再现手法相对的一种基本翻译手法,常用于文学翻译。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特殊类型,历来是翻译实践和研究的中心领域。文学文本称为艺术文体而划归表现类文本,它在翻译手法上的要求也必然有其特殊的性质和非凡的方面。就翻译方法的适应性而言,当我们把文学翻译作为一种特殊问题来对待和研究的时候,还必须看到文学以外的若干类型,例如,至少应当包括涉及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因为这些以形象为核心的造型艺术作品在通过语言进行特征描述和理论表述的时候,往往同样充满了语言的艺术性,甚至不亚于一般所谓的纯文学。表现手法作为一种翻译方法,是相对于适合文学作品以外的文本的翻译手法(统称为实用翻译),即再现手法而言的,二者在方法总体系统中处于翻译策略和翻译技法之间的中间层次。当然,它们的应用基础自然会延伸到包括若干基本的翻译技法在内的应用领域,而本身的应用情况却要受制于具体的翻译策略的制约。

表现手法既重视语义转换但又不拘泥于语义,而是在译意的同时兼有译味的性质。它追求的是高于传统译论所谓忠实通顺的一般要求,进而追求译品在总体行文上的自然贴切和读者接受反应上的类似效果。因此,表现手法作为理论范畴,不是传统的中国翻译理论可以包含的,也不同于西方译论。由于在理论上运用中国传统美术和美学范畴进行表述,实际上也具有中国艺术思维的审美特征,所以,表现手法不等于一般所谓的翻译技巧的巧妙运用。由于表现手法在翻译时的着眼点要高于翻译技巧,其思维方式始终是整体的并具有理想化的追求趋势,它承认并强调的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差距和两种文化之间的张力,所以,在翻译观念上一般的翻译技巧毕竟不能和它同日而语。表现手法作为一种翻译概念和方法范畴,对于汉英翻译和英汉翻译甚至别的语种之间的翻译同样适用,但具体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参见“表现手法十种”

(王宏印)

表现手法十种　ten impressionistic methods of translation

适用于文学文本和艺术类文本的翻译,包括十大类型:1. 立名:同声相求。就思维方式而言,词语层面上的翻译既有两种语言概念之间的相应转换,也有源语词语形象在目的语中的恰当的表现等内在要求,特别是应当尽量利用目的语现有的同义或近义词汇实现直接转换。除了有必要做解释性的阐发而外,转换单位要尽量保持在相应的词语平面上。在处理词语时需考虑好六个方面及其关系:语源知识、基本定义、搭配关系、系统构建、语境变异、形式美感。2. 走笔:运思取势。虽然表现类文本的翻译和表现手法本身往往打破一般所谓句本位的翻译单元,但是也必须处理句子层面的东西而不能只限于词语层面的转换。其要点是:打破原文句子的句式格局和句与句之间连接方式,按照译文行文和立句的需要,重新组织句子信息结构和行文推进方式,以使译文和原作通顺流畅,走笔自然。3. 简洁:如沙淘金。有些现代汉语篇章文风虚夸浮肿,要按照英文表达的需要对汉语原文做一个简化整理,称为“减肥”。这种处理不同于一般翻译技巧所谓的减词译法,而是类似于书法上的中锋行笔,只取中道,而两侧的次要信息则随之发生或减或略的变化,正所谓沙里淘金,只摄取其精华。就话语信息量而言,充足就是足够清晰地表达必要的思想感情,简洁则是无多余信息量的拖沓冗长。4. 规整:变化统一。语言本身的结构特征已经决定了它面临芸芸众生的纷繁世事时是严守规整之法度的。汉语有汉语的规整之法(例如四字结构),英语有英语的规整之法(例如用连接词 and 构成的词组)。这样,在一者较为松散的,在另一者则较为规整。于是,两种语言的繁简差异就成为翻译中一种互补的常态。5. 意韵:丘壑濡染。表现主义是一个外国字眼,而表现手法却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早已存在。翻译上的表现手法与中国古典绘画艺术相通相合,犹如国画中的大写意的笔法,也犹如印象派绘画追求朦胧而逼真的效果:只求神似,不求形似。其用笔运墨,如水墨山水画法,以水墨为手段濡染胸中丘壑,谓之意韵。6. 形象:万象更新。世间万事万物的形象性及其表现,莫过于文学艺术。中国的书法艺术,就翻译的美学效果而言,则要难一个层次。一般的绘画形象是直

接的、具象的描绘,而书法却是抽象的意味形式——且不用说汉字本身对于外国人的陌生和难解——要通过译者的一笔一画翻译出去,解释得清晰可辨,描绘得生动可感。中国书画和文学一样,构成一个独特的艺术表现门类,需要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来翻译。7. 节奏: 生命律动。好的文章不仅要有生动的形象和意境,而且要有自然的节律波动。这里的节奏,实际上包含了语言的内在节奏感和整个作品行文的推进速率两个概念。前者主要表现在句子结构和句读上,是语言的自然节奏与读者呼吸相协调的产物。由于语言的语义结构不同,节奏感在翻译中与原作多少会有差别,只要大致相当就可以了。8. 连贯: 文气浩然。中国古代作文法讲究文章气韵贯通,现代西方语言学则注重篇章的黏着性和连贯性。注重对原文本一以贯之的理(思路)和一气呵成的气(文脉)的体悟和感受,是造成译文本文理通畅的必要条件。译文本自身的黏着与连贯手段的运用,乃是英文自己走笔取形、运思谋篇、得自然之势所使然。若按汉语习惯一股子安排,则往往有碍于英文的习惯而难达顺畅自然。9. 谋篇: 胸有成竹。表现类文体和表现主义的翻译手法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重新考虑文本的谋篇问题,包括: (1) 因为英汉语言的文体和文章写法不同,要求译文的开头结尾、段落分合、上下衔接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变通处理;(2) 由于内容上的原因和考虑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对原文按照译文的要求标准进行必要的增删和顺序调整;(3) 出于对译文读者阅读心理的考虑和译作接受效果的估计,有限制地利用篇目手段突出标题含义并增强译文的艺术感染力。10. 标题: 画龙点睛。标题是篇章的"眼睛",寥寥数字(词)凝聚着整个译品的精髓。大多数的标题,就原文本身的要求而言是贴切的,设置是无懈可击的和完美的。但若原封不动地照译过来,在目的语文本中就未必合适。而《京华烟云》译为 *Moment in Peking* 突出语言汉化,*Red Star over China* 译为《西行漫记》则再现纪实风格,堪称妙译。 (王宏印)

改写　rewriting

勒菲弗尔(Lefevere)采用的术语。改写是一种文体样式,包括翻译、阐释、评论、编选文集等。勒菲弗尔揭示,所有的改写者都受到目的语文化内在的诗学规范和意识形态信仰的制约。应该认识到的是,大部分人(如果不是所有的人的话)在分享某一特定文化的过程中,都不可能接触到"原作",而这一文化却声称是建立在这些"原作"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应该知道,对大部分人来说,种种改写形式,包括翻译,就是原作。由于这种 rewriting 是以某种方式对源语文本进行重新解释、改变或操纵,而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译者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和目的语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的制约,因而对源语文本的思想内容乃至意识形态会有所改变(Lefevere 1992a/2004a: 2～4)。rewriting 也译为"重写",这一概念在巴斯内特(Bassnett)和勒菲弗尔论述 cultural construction 这一概念时,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论证和阐释。(郭建中)

阻抗　resistancy

韦努蒂(Venuti)在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1995)中用该术语表示: 在文学翻译中为保留一定量的外来成分而采用的策略。欧美传统文化一向认为,译文读起来应该不像译文。韦努蒂的"阻抗性"规则要求挣脱文化约束,在译文中运用非惯用性词语以便使译文读起来有外国腔。他认为翻译就是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冲突中寻找相似点。但并非所有的冲突都能找到相似点,因此,通过阻抗式翻译,可以让译文读者了解翻译过程中的所得与所失以及难以逾越的文化障碍。

在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第二版中,韦努蒂把"归化"和"异化"与"通顺"和"阻抗"作了区分。他指出,"归化"和"异化"主要是指译者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道德态度,"通顺"和"抵抗"是指话语选择的策略。他说:"'归化'和'异化'不是一对截然不同的两个二元对立的术语,不是简单地等同于'通顺'和'阻抗'这对话语策略的术语。……'归化'和'异化'术语,主要是指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道德态度,是指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而像'通顺'和'阻抗'这类术语,才主要指的是与读者认知过程相关的翻译策略的话语特征。"(Venuti 2008: 19)

为了体现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道德态度,韦努蒂反对透明的、通顺的"归化"翻译策略,竭力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其目的不是在译文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表现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韦努蒂说,翻译是一个语言和文化之间求同的过程——尤其是寻求相似的信息和相似的表达大方式或技巧——需要进行这样的寻求,正因为是译者经常面对着差异。但译者永远不能,也永远不应该把所有的差异都抹掉。译本应是不同文化出现的场所,是读者了解异国文化的场所,而"阻抗"这一翻译策略是建立在不连贯性的美学基础之上的;不连贯性最能保留差异,保留陌生性。他提醒读者注意翻译过程中的得与失,以及文化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

"阻抗"的翻译,不是故意要让译文不通顺,而是避免译文透明的通顺,并对目的语语言的标准形式和方言以及目的语文化规范进行质疑和提出挑战,因为,透明的通顺翻译策略是以目的语语言规范和文化上的民族中心主义对外语文本进行篡改。"阻抗",即抵抗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的规范,抵抗归化翻译的民族中心主义。 (郭建中)

阻抗式翻译　resistant translation

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Venuti)翻译理论的核心之一,于 1992 年和 1995 年在其著述中提出并阐明。他说:"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

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关于阻抗式翻译，韦努蒂作了如下的解说：“‘阻抗’是异化的道德态度，在异文化中找出异质因素，表现文化多样性，突显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并颠覆目的语语言中的价值观次序。”(Venuti 2008：266)采用异化翻译的译者，一般会选择阻抗式的话语翻译策略。

运用阻抗的策略，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一种陌生感和疏远感，其目的是要把译文读者和译者从原来支配他们阅读和写作的文化紧箍咒中解放出来。阻抗的策略使英语翻译成为文化政治异己分子。这种翻译实际上是对英语文化中透明翻译的霸权地位的阻抗。阻抗来自目的语内部，使目的语本身解体，并对中心文化的地位提出质疑；这样，阻抗式译文就成为表达英语文化中被排斥的、处于边缘地位的思想和特殊技巧的载体。如果阻抗的策略产生了使译文读者感到生疏的译文，那么，外国文本也从目的语文化中获得了一时的解放，至少在符合英语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学规范的、透明的译文出现之前能获得这种解放。当译文读者在目的语中领会了文化差异，这就是外国文本得到解放的时刻。

韦努蒂认为强势国家和弱势国家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平等交流，而是存在着一种文化霸权主义。他号召译者采取阻抗式的翻译策略。他指出，阻抗式翻译不适合于科技翻译，因为科技翻译主要是信息交流。韦努蒂提倡的这种翻译策略只适用于占优势的强势文化，对于受压迫的弱势文化并不适用。

直译　literal translation

与意译并列的主要译法之一。对直译的定义历来有争议。一般认为，译文形式与内容都与原文一致谓之直译；亦即以原文形式为标准，依样画葫芦的是直译，另起炉灶的是意译。周作人提倡直译。按他的解释，直译就是信与达，“不像有人误会的那样，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他以lying on his back为例，认为译作“卧在他背上”不是直译，而是死译；译成“仰卧着”才是直译。鲁迅是主张直译的。他说过：“‘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而另一方面，他决不赞成把“跪下”改译为“跪在膝之上”。茅盾对直译的解释是：“所谓‘直译’也者，倒非一定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的翻译。那种译法不是‘直译’，而是‘死译’。‘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要能表达原作的精神”。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主张直译的人也不完全以逐词对译或照搬原文结构为圭臬。许崇信对直译的解释是：1. 以句为单位，即：原文是一句，译文一般也应译为一句。不把一个大句分成几个小句，也不把句与句之间的界限打通。因为这类句子在严肃的作家笔下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2. 在一般情况下，在处理词汇的翻译上，不采用转义的译法。因为转义有点像传话，一传再传就走了样。上面这两点，一点关系到语法结构，一点则关系到词汇问题；3. 在上面两个基本前提之下，直译可允许改动词序，改动一个句子内部各个成分间的次序，也允许改动主句与从句(副句)的次序，同样允许改变词类。

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认为，逐词翻译的直译是“层次偏低的翻译”，而只有“必要的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才能“传达不变内容并遵循译语的规范”。“层次”是指作为翻译单位的语言等级体系中词、词组、句子之类的层次。卡特福德(Catford)认为直译是介于意译和逐字翻译之间的一种译法。“它可能始于逐字翻译，但为恪守译文的语法规则而有所变化(如补充额外的词语、变换任何一‘级’的结构等)，并过渡到以意群或句子成分为单位进行翻译。”(1965：26)

直译的优点是：在吸收外来有益的新因素，在反映异国客观存在的事物和情调上，比意译更能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当在表达形式上无须另辟蹊径即可达到忠实于原文内容的时候，译者自然采用直译。

意译　free translation; semantic translation

与直译并列的主要译法之一。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谓之意译，即以原文形式为标准，译文表达形式上另辟蹊径。在翻译史上，对于意译各说纷纭。傅雷说：“我并不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无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转引自罗新璋 1984：548)他的这一主张实际上跟鲁迅、周作人、茅盾主张直译并无原则区别。艾思奇则说：“人们常常曲解了意译，以为为了要‘达’，就可以随着译者的意思任意地增删文句，不必顾虑到原著”。(转引自罗新璋 1984：437)钱歌川对意译的说法是：“采用原文大意或甚至有时改变原意，依译者自己的意思写出，结果多是不大忠于原文”。(钱歌川 1980：11)

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把意译看成是“层次偏高的翻译”。“偏高是指比传达不变内容并遵循译语的规范所足够的层次为高。”(巴尔胡达罗夫，1985：159)这里的“层次”是指作为翻译单位的语言等级体系中词、词组、句子之类的层次。卡特福德(Catford)认为“意译时等值关系是在各‘级’之间自由变换的，甚至可以超过句子这一‘级’。”(1965：26)

意译是基本译法之一。当译者经过曲微探幽，需要改变形式才能忠实地再现原文内容时，则就采用意译。

拟作　imitation

英国翻译家德莱顿(Dryden)提出的著名的翻译三分法之一(另外两种方法为逐字译和意译)。拟作是逐字译的另一个极端，只是把原作当作一个参照模式，既不搬原作的词句，也不局限于原作的思想，实际

上是一种创作而不是翻译。

形译 formal translation

亦称"像译",通过具体形象直接表达原义,实物形状由目的语文字直接显示或由目的语词语的主要义素间接显示。分两种:1. 按实物形状翻译,如 cam(机械工程常用词)译为"偏心轮""铿""凸轮",其中"偏心轮"是意译,"铿"属音译,"凸轮"则为形译,在日常应用中以"凸轮"为常见;ruling pen 译为"鸭嘴笔";dog-clutch 译为"爪形离合器";carpenter's rule 译为"角尺""曲尺"等;2. 按字形翻译。参见"字形翻译"

受限翻译 restricted translation

卡特福德(Catford)使用的术语,与"完全翻译"相对,被界定为"仅仅在一个层面上用对等的目的语文本材料取代源语文本材料的翻译"(Catford 1965: 22)。语言共有四个层面,每个层面都有与其相关的受限翻译,包括语法翻译、词汇翻译、字形翻译和音位翻译。参见"完全翻译"

字形翻译 graphological translation

卡特福德(Catford)(1965)在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提出的术语,是受限翻译的四种类型之一。字形翻译指的是"源语文本的字形被对等的目的语字形所替换。这种对等关系建立的基础是两种语言都有字形。"(Catford 1965: 62)卡特福德认为,可以将字母(或者其他的字形单位如表意符号)用许多区别性特征加以概括,例如所有罗马字母和西里尔字母可视作由许多竖线、横线、斜线以及半圆弧线组成,因此在这两种字母表的字母之间建立对等关系是可能的。(Catford 1965: 62~64)中国人写日文时出现的"漢字"书写错误和日本人写中文时出现的"汉字"书写错误,都属于字形翻译,缘于两种文字在字形上的相似。"排版人员有时为了使某一文本带有'洋'味,采用类似于字形翻译的方法来排版,这种情况在广告宣传中尤其常见。"(Shuttleworth, Cowie 1997: 68~69)参见"受限翻译" (林作帅)

词汇翻译 lexical translation

卡特福德(Catford)(1965)在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提出,是受限翻译的四种类型之一,指的是"源语文本的词汇被对等的目的语词汇所替换,但其语法未被替换"(Catford 1965: 24,72)。例如汉语句子"好久没见了"进行词汇翻译后的英语译文是 Long time no see. 在此,汉语语法被保留,但词汇"好久""没"和"见"分别被对等的英语词汇 long time, no 和 see 所替换。应该指出,"两种语言之间的词汇翻译和语法翻译正好相反,也就是说,从 A 语言到 B 语言的词汇翻译与从 B 语言到 A 语言的语法翻译达到的结果相同"(Catford 1965: 72)。参见"受限翻译" (林作帅)

语法翻译 grammatical translation

卡特福德(Catford)(1965)在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提出,是受限翻译的四种类型之一,指的是"源语文本的语法被对等的目的语语法所替换,但其词汇没被替换"(Catford 1965: 24,71)。例如,英语句子"Mother being ill, Tom stayed at home and looked after her."进行语法翻译后的汉语译文可能是"Mother 病了,汤姆待在家里 look after her。"除了 mother 和 look after her 两个词汇/词汇组以外,所有的语法都被对等的汉语语法所替换。应该指出,"两种语言之间的语法翻译和词汇翻译正好相反,也就是说,从 A 语言到 B 语言的语法翻译与从 B 语言到 A 语言的词汇翻译达到的结果相同"(Catford 1965: 72)。参见"受限翻译" (林作帅)

音位翻译 phonological translation

卡特福德(Catford)(1965)在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提出此术语,是受限翻译的四种类型之一。音位翻译指的是"源语文本的音位被对等的目的语音位所替换;除了翻译过程中产生的随意性语法或词汇偏差外,源语文本的语法和词汇保持不变"(Catford 1965: 56)。"尽管两种不同语言的某些音位特征之间或许并不存在形式对应,但是通常还可以建立起翻译对等"(Shuttleworth, Cowie 1997: 125)。这种对等的基础是"源语和目的语的音位单位都与'相同的'的语音材料或声音排列有关"(Catford 1965: 56)。这就意味着,"源语音位系统中的声音或声音组合,如果在目的语音位系统中不存在的话,翻译对等或者无法实现,或者以更符合目的语音位系统的特点的方式来实现"(Shuttleworth, Cowie 1997: 125)。例如,在音位翻译中,英语复数词 cats, 外观上可能以其单数形式 cat 出现在一种没有词尾辅音丛(final consonant cluster)的语言中。音位翻译有时会用来产生潜在的幽默效果。但是,除了一些文字游戏和电影配音以及一些诗歌翻译之外,源语的音位通常被替换,而非被翻译。应当指出,如果一个人以其母语的语音讲外语,即如果带有外国口音讲话,则可以认为这个人正在采用音位翻译将外语译为本国语。参见"受限翻译" (林作帅,黄勤)

完全翻译 total translation

卡特福德(Catford)使用的术语,与"受限翻译"相对。在形式层面上界定为"用对等的目的语语法和词汇替换源语语法和词汇,并随之用(不对等的)目的语音位与字形替换源语音位与字形"(Catford 1965: 22)。即被对等目的语语料直接替换的只是源语语法和词汇;而音位和字形层面上的替换只是前两个层次替换的伴随物。结果,音位和字形实体通常没有被对等的目的语实体替换,当然也有例外,如电影配音或诗歌翻译,其中目标文本的字形或音位有时部分对等于原文的字形或音位。

完全对应 full equivalence

翻译中的完全对应即等值。双语词句的完全对应在语义上的依据是所指同一,在语法上的依据是句法功能相同。就英汉语而言,其完全对应的词句有以下几类:1. 人称代词(但英语代词不区分"它们""他们""她们")及部分不定代词、指示代词;2. 数字及其组合;3. 数理公式及相关符号;4. 单义的名词术语;5. 单义的人名、地名、物名及其他专有名词;6. 单义的定式搭配或常用的自由搭配,如白雪(white snow),rainy season(雨季)等;7. 无变义或歧义的核心句:如I eat(SV,我吃),我爱音乐(SVO,I love music),He's a Canadian (SVC,他是加拿大人),等等;8. 若干定式寒暄语,如bye bye (再见),good morning(早上好),等等。

完全对应在双语转换中并不占优势,但由于源语和目的语的概念范畴双双明确而稳定,完全对应已成双语间对应转换的基础。参见"对应式转换""句型转换"

译味 translating tastes

由金岳霖在他的哲学专著《知识论》中提出。他把翻译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译意,另一种是译味。这里所谓译味,是把不同的句子所有的各种情感上的意味,用不同种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而所谓译意,就是把字句底意念上的意义,用不同种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转引自罗新璋 1984:463)这里的翻译要点是具体文本语句中的意义属于何种。译意指的是翻译概念意义,而译味指的是翻译情感意味。一是"要看所译的字句",即应当重意还是重味,即文本本身的特点。二是要看"译者底注重点"。也就是说,译者在这里有相当的自主权,有主观上更重视何者的选择权。

在他看来,"味包括种种不同的趣味与情感,而这些又非习于一语言底结构而又同时习于引用此语言文字底历史环境风俗习惯的人根本得不到。"更为困难的是,"如果我们要译味,我们不但要得到一种语言文字底味而且要得到第二种语言文字底味才行。"译味要重行创作。"所谓重行创作是就原来的意味,不拘于原来的表示方式,而创作新的表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就是再创作了。诗歌就更加困难。金岳霖认为,诗歌几乎是不能翻译的。他的理由如下:"诗差不多是不能翻译的。诗之所重,即不完全在味,也一大部分在味。即有时我们注重意,我们也似乎是想因意得味。"(转引自罗新璋 1984:467)

诗歌的核心是意境。金岳霖结合他的译味说,给意境一个很特别的说法:"所谓意境似乎不是意念上的意义,而是境界上的意味。"关于意境有三个要点:其一,它不能独立于民族的"历史风俗习惯环境山河城市"等。其二,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经验,意识,体会,意境是得不到的"。其三,"诗中的意境大都是'特殊'的"。关于这第三点,他又以"千山鸟飞绝"一句诗的欣赏为例,说得很详细:"诗的意境当然可以用普遍的字眼去形容,但是念诗的人所得到的意味,并不寄托在这普遍的情形上面,而实在是寄托在诗对于他所引起的,他自己经验中所供给的,类似特殊的意象上面。"那么,诗的意境是否可以传达呢?金岳霖认为,"诗既有此特殊的意境,它的意味大都是不容易以言传的。"其结论只能是翻译的再创作,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王宏印 2003a)参见"译意"

译意 translating meaning

1. 奈达(Nida)有"Translation is translating meaning."的名句。认为翻译的首要之点,是翻译信息的内容,即翻译原文的意思。因此,语言信息或语义的传译在翻译中享有优先地位。(谭载喜 1999:13)2. 金岳霖在其哲学专著《知识论》中认为"翻译大致说来有两种,一种是译意,另一种是译味。"(转引自罗新璋 1984:463)金岳霖认为,译意的根据是人类对同一或同类事物具有同样或相似的感觉,从而具有同一或相似的概念、意念或命题。但如果概念不同,就要费很大的周折,大绕圈子才能翻译。

"意义"这一概念一般认为是指思想内容、概念系统等非形式因素,但是含意本体论认为,含意性是语言的一种内在的禀性,含意化过程是话语建构必然伴随的过程。这就是说,含意与语言表达是密不可分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翻译作为一种交际活动和交际手段,每时每刻都在和含意打交道——解读原作的含意,并将其准确地纳入译文语言中。因此,译义和译意应是体现翻译实质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偏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店员对你说"We are about to close."句子的含意有可能是告诉你不要进店购物了。倘若你是店员的朋友,约好了下班一同出去,句子的含意则是让你稍等。在这两种情况下,解码得出的意义是一样的,含意却大不相同。当然,这个句子倘若译为汉语,很容易将原有的含意,不管是上述哪一种,纳入其中。但是,在翻译实践中不能纳入原有含意的情况是相当多的。例如,下句中"门板"和"铺草"的含意必须显性化,才能使英语读者明白。

1928年夏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In the summer of 1928 he set forth Six Points for Attention: (1) Put back the doors *you have taken down for bedboards*; (2) Put back the *straw you have used for bedding*; (3) Speak politely; (4) Pay fairly for what you buy; (5) Return everything you borrow; and (6) Pay for everything you damage.

全面地说,译意就是既能体现原作的某些有意义的形式特征,又能表达原作的概念系统意义,涵盖原作的含意。而事实上,这三者常常是不可俱得,译者首先割爱的是形式特征,继而是概念系统,最后剩下含意。参见"译味" (文晔)

纯散文翻译 plain prose translation

一种常用的翻译方法,用于将诗歌与诗剧译为散文,原作与译作或采用同一种语言或采用不同语言。在翻译过程中,通常以诗节划分散文译文的段落,采用散文中使用的标点符号,原作的文化特征与各种比喻均予以保留,只是没有再现原作的音韵效果。散文译文通常与原作以并列对照的形式发表,读者可以通过对二者逐字逐句的比较,较为容易地理解作品的意义,但无法感受与原作等值的效果。

直译加注 literal translation plus annotation

常用于特有文化词语的翻译。以直译法再现源语文化专有项的民族特色,辅之以注释法消除跨文化理解上的鸿沟。如王安石的一首《桂枝香 · 金陵怀古》,其中有这样一句:

彩舟云淡,
星河鹭起,
画图难足。

许渊冲译为:

The painted boat
In clouds afloat,
Like stars in Silver River egrets fly.
What a picture before the eye!

对 Silver River,许渊冲给出了注解: The Chinese name for the Milky Way。译法依语境而出,"舟""鹭"所编织的语言语境,使人好像看到一幅舟行河上、白鹭飞翔的优美图画,这提示译者最好将与它们连用的"河"译成"river",整个语篇的文化语境也昭示了这一点。如果将"银河"这一文化意象词语译成 Milky Way,则难将其与以上语境联系起来,自然不能使英译文读者理解,更不能让他们体会到诗歌特有的意境美。汉译英也有这类例子,如: Some went to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Park, a recreation center built for the proletariat during the heyday of communism. (*Time*, Apr. 1, 2002)

作者先将"工人文化宫"译为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Park,然后作文内注释。 (蓝春)

英译汉化 Sinocized translation; Chinese-coloured English

亦称"汉化英语",与"汉译西化"相对,指英译时受汉语的影响,或采用汉语的表达方式。对此,译界有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英译汉化应予否定;另一种认为对于其积极的方面应予肯定,对于其消极的方面则应否定。主张其有积极方面的人认为,英译汉化为英语增添了大量新词语和一定的新的表现法。例如: paper tiger (纸老虎), four modernizations(四个现代化),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实事求是), One arrow, two hawks. (一箭双雕), The mountains are high, and the emperor is far away. (山高皇帝远),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a cat is black or white so long as it catches mice. (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认为以上英语表达都符合英语语言规范,不存在"汉化"的问题。从消极方面看,"汉英翻译中,译文受原文字面影响的问题很多"。程镇球在《汉英翻译问题》中指出搭配、拟人和修饰词三方面的问题,并列举了一些不当的例子,如:热烈祝贺亚运会 Warmly congratulate the Asian Games(正: Hail/Greet ...),我们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Our cause has won victories one after another. (正: We have won one victory after another for our cause. or: A series of victories have been won ...)(程镇球 1991)。

忠实性翻译 faithful translation

作为一种翻译方法,其特点在于力求在目的语语法结构允许的范围内忠实地再现原作的语境意义,倾向于将原作中带有特殊文化色彩的词语"转化"为目的语中易于理解、具有普遍文化内涵的词语;对于原作中语法和词汇方面的特别之处,则在译作中适当保留,试图以此准确地再现原作作者的意图与原作的内涵。

显性翻译 overt translation

与"隐性翻译"相对。指豪斯(House)(1977)提到的一种保留源语文化、使译作读起来像译作而不像原作的翻译方法。按照豪斯的模式,有些文本在源语文化中有着独立的地位,与源语语言和文化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直接以源语读者为服务对象。翻译这类文本,有必要采用显性译法,即译文不明显以译语读者为阅读对象。在进行这种翻译时,译者无意制造"第二原作",因为,"显性翻译就是要看起来是译文,而不是原文"(House 1986: 188)。由于翻译时严格以源语文化为取向,原作的功能无法在译作中保留。显性翻译是一种较为直接的语言转换,一般不需要作细微的文化调整。牧师的布道、政治演说和艺术性强的文学作品等适合于运用这种方法翻译。(Shuttleworth, Cowie 1997)

隐性翻译 covert translation

与"显性翻译"相对。指豪斯(House)(1977)提到的一种使译作与原作功能等值、译文与目的语读者直接关联、适合于实用文体的翻译方法。隐性译文读起来像原文而不像译文。这种译法的目的是掩盖译作的翻译本质,使译作与原作功能等值,适用于翻译在源语文化中没有独立的地位,或者说与原作的语言、传统、历史或文化的其他方面没有必然联系的文本。正因为缺乏具体的文化根源,原作的功能有时可以复制出来;而要使译作的文化结构与原作的等值,需要进行"文化过滤"。翻译广告、新闻、科技资料等文体时,运用隐性翻译方法是合适的;多数《圣经》译者也采用类似的方法,以使所传达的信息与新的读者最直接相关。隐性翻译与交际翻译、工具翻译等说法

类似。(Shuttleworth, Cowie 1997: 33～34)

音译　transliteration

亦称"转写",即用一种文字符号(如拉丁字母)来表示另一种文字系统的文字符号(如汉字)的过程或结果。当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差异很大、存在语义空白的情况下,翻译不可能直接从形式或语义入手,此时,音译是主要的翻译手段。音译对象主要是人名、地名和新产生的术语。由于音译常受译者方言的影响或选择汉字不同,因而译音词常不统一。为了译音规范化,我国编制了多种语言的汉字译音表。例如,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1983)年就附有英、法、德、西、俄、阿拉伯等语言与汉字对照的译音表。按这些表的规定,例如英文 Lansing [ˈlænsɪŋ]译为"兰辛",Travis [ˈtrævɪs]译为"特拉维斯";俄文 Молдавия 译为"莫尔达维亚",Ставский 译为"斯塔夫斯基"。当然,这些译音表只是试图为以后的译音选取汉字提供某些规范,至于以前已经约定俗成的译名则不宜更改了,例如 radar [ˈreɪdɑː]译为"雷达",ballet [ˈbæleɪ]译为"芭蕾",Москва 译为"莫斯科"等。此外,音译还要遵守名从主人的原则,例如有人把 Mencius(孟子)译成"孟修斯",把 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译成"常凯申",已成笑柄。数10年前,国际上通行威氏拼音,有的至今仍沿用,如"马英九"译为 Ma Ying-Jeou,"董建华"译为 Tung Chee-hwa 等。

由于音译标准和译名原则不一样,我国大陆与港台地区在名词音译上存在分歧。如美国前总统 Clinton,台湾译为"柯林顿",大陆译为"克林顿";日本相机 BRONICA,大陆译为"勃郎尼卡",香港译为"碧浪之家";laser,台湾音译为"莱塞",大陆译为"激光";等等。更有甚者,大陆内部在译名上也不尽一致,如 engine 仍以"发动机"与"引擎"并存,而 motor 尚有"电动机"与"马达"之争。

音译加注　transliteration plus annotation

常用于特有文化词语的翻译。先用汉语拼音转换某词语,再以文内作注或文外加注的办法将该词语中特有的文化内涵表述出来,达到文化信息传递的目的。例如:

见面时点头或握手,有事时走动或通信,口头上彼此也称"朋友",笔头上有时或称"仁兄",诸如此类,其实只是一种社交上的客套,和"顿首""百拜"同是仪式的虚伪。(夏丏尊《中年人的寂寞》)We may be on nodding or hand-shaking terms, call each "friend", sometimes write to each other with the salutation of "Dear So-and-So", etc. All these are, in fact, nothing but civilities of social life, as hypocritical as the polite formula *dunshou* (Kowtow) or *baibai* (a hundred greetings) used after the signature in old-fashioned Chinese letter writing. (张培基译)

"顿首""百拜"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方式,分别被译为 dunshou (kowtow), baibai (a hundred greetings),并以"used after the signature in old-fashioned Chinese letter-writing"作补充说明。此处不直接以释义法译出而以释义法补充音译是出于上下文语境的考虑。因为上文出现的"朋友""仁兄"和这里的"顿首""百拜"互相呼应,浑然一体,因此翻译时应考虑译文的整体性。而 doushou 和 baibai 正好音节数相同,读起来朗朗上口。若直接以释义法译出 kowtow 和 a hundred greetings 则无这样的效果,故将它们放进括号作为注释。又如下例"小道消息"的英译加注:

But the *Xiaodao Xiaoxi*, the news on the street, rings with fresh reports that quickly reach workers in other cities. (*Time*, June 17, 2002)　(蓝春)

音意合译　transliteration with semantic translation

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一种翻译方法,常用于翻译术语、商标、店招等,兼有意译和音译的优点。根据译语的不同特点,此法通常有三种:1. 半音半意(对某个词的一部分采用音译,对另一部分采用意译):kilovolt 译为"千伏",Ampere's Law 译为"安培定律",sonar 译为"声呐";2. 谐音取义法(译词既有近似的读音,又有原词要表达的含义):logic 译为"逻辑",Coca-Cola 译为"可口可乐",Benz 译为"奔驰";3. 音义相应法(译词的音义与原词有相应之处):回力(球鞋)译为"Warrio"("勇士",意含具有回天之力),"味特优"(餐馆)译为"Virtue"。　(蓝春)

语义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

与"交际翻译"相对,是纽马克(Newmark)(1988)在他的代表作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中提出的翻译方法之一。

语义翻译把表达的内容限制在原文文化范围内,不允许对原文中富有民族文化色彩的概念加以改变。语义翻译为了表现出原作者的思维过程(thought-process),力求保留原作者的语言特色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语义翻译注重词、句的语义分析,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更为接近。若作者或讲话者使用的特定语言与其所表达的内容同等重要,那么,原文的表达形式宜用语义翻译来译。不管这类文章是哲学的、宗教的、政治的、科技的,还是文学方面的。一份重要的声明,其译文应尽可能地接近原文的词汇结构和语法结构。语义翻译由于强调语义分析,力求再现原文词句结构,所以容易出现过译(overtranslation)。纽马克指出,在语义翻译中,译者必须抓住原文的词句、搭配、结构乃至强调语势,亦步亦趋地翻译,这样才能全面地保持原文的语义及表达形式。

纽马克还认为,采用语义翻译译出来的作品总是要逊色于原著,因为语义翻译既然想要保持原著的一切东西,做到细大不捐,就难免顾此失彼,生搬硬套。反之,用交际翻译译出的作品则可能会比原著要好。

纽马克主张不应把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孤立起来看待，而应结合在一起。在翻译一篇文章时，常常是二者并用，没有绝对地只用一种，只是其中一种可能会多用到或少用到而已。

纽马克(1988: 39;15)曾举例说明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差别(转引自张美芳 2005a: 76)：

原文	语义翻译 (德语译文回译)	交际翻译 (法语译文回译)
Wet Paint! (湿油漆!)	Freshly painted. (油漆未干。)	"Mind the paint!" (小心油漆!)

语用翻译法　pragmatic approach

用语用学的原则和方法来处理翻译中的具体问题，是翻译方法之一。语用学致力于"研究交际情境中各参与者传达和操纵的意义，而非语言系统生成的意义"，因此，语用翻译"关注在交际情境中的使用方式及人们在语境中的解读方式"(Baker 1992: 217)。这意味着，语用翻译要努力传达内涵意义、引喻意义以及交际中的人际意义，如会话、语调、语域等(Shuttleworth, Cowie 1997: 129)。语用翻译不仅关注指称意义，还关注"话语在交际情境中的使用方式以及人们在语境中的解读方式"(Baker 1992: 217)的翻译。正如贝克(Baker)指出的，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致力于"研究交际情境中各参与者传达和操纵的意义，而非语言系统生成的意义"(1992: 217)；这意味着，语用翻译要努力传达诸如内涵意义、引喻意义以及交际中涉及人际方面的意义，如会话含意、语调、语域等。如以下两例：

(1) 昨日那种被追捕的恐慌，已经烟消云散。(曲波《林海雪原》)

(2) [陈白露]方才那一种兴奋又烟消云散。(曹禺《日出》)

两例中的"烟消云散"并非真正的"烟消失了，云散开了"，其语用用意系指"消失得干干净净"。英译文为：

(1) His panic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was quite gone* now. (S. Shapiro 译)

(2) Her high spirits of a moment ago suddenly *passed away like a breath of wind*. (A. C. Barnes 译)参见"应用翻译"

语言翻译　linguistic translation

1. 该术语适用于所有把翻译看作用等值的目的语语言单位来替换源语的语言单位而不考虑其他如语境等因素的翻译。严格地说，该术语是会产生误导的，因为现代语言学已经把语境等因素纳入它的研究范围。这种翻译策略一般运用于原文文字结构不容改动的经典著作的翻译，或者为了教学等目的而有意保留原文词句结构的翻译；2. 奈达(Nida)和泰伯(Taber)根据他们自己翻译《圣经》的切身体会把该术语定义为：原文语言含蓄而意义清晰，翻译时的所有变动都遵守转换、逆转换以及成分分析的规则。换句话说，原文的字句可以直接译出，不需要任何解释或作文化调整。他们指出，语言学翻译是《圣经》翻译最确当的策略，唯有语言学翻译才是忠实的。(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 127)参见"语言学派"

逆向翻译　inverse translation

指从译者母语(或译者通常使用的语言)出发的书面或口头翻译。逆向翻译有着明显的教学用途(如操英语的学生通常把一篇文章从英语译成拉丁语或希腊语的传统"散文翻译")。翻译方向的问题在早期没有受到重视，在当今除了用在语言学习的语境之外，英语国家的逆向翻译运用比较少，因为以英语为源语的翻译量相对较少，可以由相关目的语的母语者轻易完成。然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译者使用逆向翻译则要频繁得多，目的在于应付需要译成英语的大量工作，对某些文本类型(如旅游资料)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这些文本类型不是特别要求风格完美；而即使在其他更敏感的文本类型需要逆向翻译时，也可以通过集体翻译或者聘请目的语母语者对目标文本加以编辑，以克服这种翻译手段的诸多缺点。此外，在有些国家(如俄罗斯)，逆向翻译是口译者更喜欢的翻译方向(direction of translation)。奈达(Nida)(1964)在论述翻译的种族语言学模式时，描述了一个相似但更复杂的程序。逆向翻译的替代术语是服务型翻译(service translation)。(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 121～122)

后瞻式翻译　retrospective translation

波斯特盖特(Postgate)采用的术语，与前瞻式翻译相对，指"主要考虑原作者"的翻译(1922: 18)。波斯特盖特认为，这种以源语为取向的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向只能通过翻译了解原文的读者传递原文知识"(Postgate 1922: 22)。译者由此以来便被看成一个接受者，他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清楚地理解源语文本而不是用地道的目的语去表达。威尔斯(Wilss)(1982)用"后瞻式翻译科学"这一术语来指进行错误分析与翻译批评的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的一个分支。他认为后瞻式翻译科学"从目的语出发，来比较目的语文本的质量与源语文本的质量。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可以辨别生成目的语文本的各种表达过程，并确定这些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充分地实现了预期目标"(Wilss 1982: 59)。后瞻式翻译这一术语和"充分翻译"以及"字面翻译"的含义大致相同。(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 199)

前瞻式翻译　prospective translation

波斯特盖特(Postgate)采用的术语，与"后瞻式翻译"相对，用来描写那种"以读者为核心"的翻译(1922: 8)。前瞻式翻译是一个以目的语为取向的翻译过程，在这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关心的主要是如何

用对目的语读者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源文本的意义。译者被视为原文措词的改编者而不是原文措词的忠实追随者。威尔斯(Wilss 1982: 159)用"前瞻式翻译学"这个术语来指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这一分支理论。应用翻译理论所关注的是那些将翻译视为过程而不是产品的种种问题,如翻译教学的方法论以及翻译难题研究等。大致说来,"前瞻式翻译"这一术语与"可接受翻译"以及"自由译"的含义基本相同。(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 181～182)

逐行翻译　interlinear translation

一种极端的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类型。在这种翻译中,目的语词语逐行出现在它们所对应的源语文本项目的下方或者上方。与释词翻译(gloss translation)一样,逐行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使那些语言技能不足的人能够阅读某种文本。这种文本往往是,但并非总是,一种经书。因而按照斯坦纳(Steiner)的说法,逐行翻译是"在源语的每一个词上面提供一个词典选出来的目的语对等词",因此严格地讲,"它只是一个词汇表,词汇互不关联地横向摆放着"(2001: 324)。换言之,与大多数其他翻译类型相比,逐行翻译的译本本来就是要与原文本联系起来进行阅读,因此,它的明确目的就是用作对照本。奈达(Nida)指出,这种翻译"几乎不能称为通常意义上的翻译"(1964: 23)。在某些方面,它类似于一种语义注音(transcription),因为每个源文本项目都会自动选用一个最贴切的目的语对等项。然而被复制的不仅仅是词语本身;逐行翻译还旨在"要尽可能少作改动"地保留句法范畴,如词序(Gutt 1991: 137)。使用这类翻译会导致违背目的语言规范的情况频繁出现。基于这种考虑,格特(Gutt)认为"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极大地取决于相关的两种语言结构的相似程度",因为"它们在结构上越不相同,就越不可能既要求结构相似,又要求译文可懂"(1991: 69)。自从本雅明(Benjamin)在其相关纯语言的著名讨论中提出"《圣经》的逐行翻译译本是所有翻译的原型或理想"(1923/1963: 195; 1923/1970: 82)之后,人们在更形而上学的层面对逐行翻译发表了许多言论。很多学者都思考过本雅明这句高深莫测的言论中暗含的意思。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它是一种"理想的"逐行翻译,在这种翻译中,极端的字面译法不仅没有使源文本的意义变得含糊不清,反而使之有所加强。(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 110～111)

部分对应　partial equivalence

参见"不完全对应"

逻辑分析法　logic analysis

翻译中的逻辑分析可以在中间层次上解决一些问题,其表面层次的分析是语词和语法分析,而更为深层的分析是事实、事理、意象、原型等文化心理的分析。因此,逻辑分析可以解决一些语言和语法分析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语义含混或句法有歧义的问题,它也可以帮助词语之间,句子之间,段落之间的关系,构成语篇上的连贯性和表述的顺序,但不能最终确定语言背后的世界和原理的问题,在许多时候,也不能确定文学意象、风格、意境等的翻译问题。(王宏印)

望文生义　taking the words too literally

在翻译中只按字面形式去牵强附会,不推求确切的含义。译者所以会望文生义有以下原因:误解语法结构,不明确词义,缺乏相关知识(包括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知识等),母语的负影响以及不良的工作作风等。例如: We have a sales force at present of twenty-four salesmen *on the road*, each with his own territory. 误译:目前我们有一支由 24 名推销员组成的推销队正在途中,每人有他自己的推销领域。(拟改译为:目前我们有一支 24 名外勤推销员队伍,他们各有推销地域。)　(林夕)

散文翻译法　poetry into prose

指把诗歌译成散文。此法一度受译者和读者青睐。译作一般语言优美,忠于原文意义。但如果仔细审视译文,就会发现译文既不像诗,也不像散文。由于散文的排列无法突出诗歌中的用词特色和修辞手段,也难以重现诗歌的节奏和韵律。结果,与直译法和韵律翻译法一样,译文歪曲了原文的意义和交际意义,也歪曲了原文的句法。

猜译　guess in translation

萧乾在谈到翻译《尤利西斯》时说:"这本书许多地方必须猜译,有些地方(比如 14 章)我也表达不了原意。"从积极方面来说,猜译是一种常用的翻译方法。猜译决不是乱猜乱译,而是在对原文的某些词语或表达方法在查考无着的情况下的严密的逻辑推理的思维活动。它必须遵循文章所提供的各种线索、暗示和提示——小至一个标点、连词或先行词,大至整句、整段和整篇的主题、风格、背景和氛围,从字里行间求索信息和词义,确立他们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进行再创作。例如:

Japanese tourists want to dine in the revolving restaurant or another eyerie. (*Hongkong Nights*) eyerie (aerie, eyry)一般词典只给"鹰巢""高山住所""高地城堡"的释义,《英汉大词典》多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的解释,但这些词义在这个句子里都不合适。然而 another 提示我们, eyerie 与前面的 revolving restaurant 一样,该是摩天大楼。因此,我们有把握地舍弃词典释义,把句子译成:日本游客要在旋转餐厅或另一家摩天大楼的餐厅里用餐。

"译在功夫外"。这正是猜译的真实含义和精髓。翻译中的差错,有的确实源于猜译,那不是猜译本身的过错,而是译者语言功力不逮,或综合知识和判断

分析能力尚欠火候，或原文太晦涩，令译者无可奈何。作为翻译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不容忽视的环节，猜译应有其自身的地位。

释义　paraphrase

不逐字逐句迻译原文，而直接向目的语读者解释源语词句在上下文中的意味（sense）的一种手段。由于它既能保存原文的信息，又能给译者表达上比较多的自由，因而在翻译中应用极广。例如：

Early Reagan was a *mirror image* of early Carter. 里根上台时在做法上跟执政初期的卡特毫无二致。

为头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线袍，白净面皮，三绺髭须，真有龙凤之表。（吴敬梓《儒林外史》）The leader of the band wore a military cap and flowered silk costume. He had a clear complexion, his beard was fine and he *looked every inch a king*.（杨宪益译）

零翻译　zero-translation

邱懋如2001年提出，即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源语中的词语，这里包含两层意思：1. 源语中的词语故意不译；2. 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源语中的词语。

第一类零翻译现象出现在因两种语言句法结构差异须作调整时，例如，英译汉时不译某些冠词和人称代词，汉译英时不译某些量词。张培基主编的《英汉翻译教程》中"省略法"一节（1980：88）归纳的现象均属于这种零翻译范畴。这种零翻译是使译文符合目的语句法结构，便于译文读者理解所必需的。许多有经验的译者会本能地使用零翻译手段调整句法结构。

第二类零翻译表现在音译（transliteration）和移译（transference）上，音译是用汉语中谐音的字或字的组合翻译英语中的词语，而这些字或字的组合并不是汉语现成的有意义的词，例如：秀（show）、酷（cool）、黑客（hacker）、派对（party）、伊妹儿（e-mail）、销品茂（Shopping mall）。音译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当然属于零翻译范畴。

移译则是把源语中的词语原封不动地移到目的语中。以英汉互译为例，在中文报刊文章中常见英语词汇，如CT，ICU，CD，VCD，DVD，DNA，BBC，WHO，WTO和许多计算机词汇。又如英语的DIY（=do it yourself）这个缩略词分别用作形容词、名词和动词："DIY图书的新特点"，"许多人开始感受着DIY带来的快乐"，"生活中可以DIY的事情太多了"；英语报刊（包括《纽约时报》）上也能看到把汉语的gongfu（功夫），qigong（气功），taijiquan（太极拳），pingtan（评弹），qipao（旗袍），Yuanmingyuan（圆明园）等词移译过去的例子。例如，1999年5月16日的《纽约时报》上有篇文章提到：Many of the 1,500 Chinese-Americans there wore Chinese outfits like silk gowns or the slit dress known as a qipao. 作者甚至把qipao看成英语的可数名词，在这个词前加上不定冠词a。

第二类零翻译现象，表面上看并没有翻译，只不过用随意选择的谐音字音译原文的词或把外文照搬过来。但是，从深层次看，这种音译词或移译词包含了源语所有的含义，是最精确的翻译。所以引进"零翻译"这个概念是有其现实意义的，零翻译作为翻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从根本上解除了人们对可译性的怀疑，维护了一切都可翻译的理论基础。

零翻译的应用愈来愈普遍，有时候已成为翻译的唯一手段，如翻译计算机的英文指令和电子邮件地址，除了移译没有其他方法。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反对滥用零翻译手段。有时候在看一篇翻译文章时，满眼都是英文字母。译者把许多明明可以意译成汉语的英语词语"移而不译"，造成了对汉语的"污染"，增加了读者阅读的困难。（邱懋如2001）

隔行翻译　interlineal translation

赫维（Hervey）和希金斯（Higgins）（1992）创造的术语，指极端偏重源语的翻译类型，与极端偏重目的语的"自由译"相对。赫维和希金斯认为隔行翻译"不一定会遵循目的语语法，但是每一个语法单位与源文本相对应"（1992：20）。因此，它与不那么极端的翻译策略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有所不同。虽然字面翻译也会普遍使用脱离语境意义的词语，但是字面翻译策略通常会遵循目的语语法。赫维和希金斯认为，隔行翻译很少使用，通常只用于语言教学或描述语言学（1992：20）。应当指出，隔行翻译基本上和逐行翻译（interlinear translation）相同，不同的是，它不要求目标文本各单位直接出现在它们所对应的源文本单位的上方。（沙特尔沃思，考伊2005：110）

解释性翻译　explanational translation

解释性翻译最早由段连城（1990）在总结对外宣传英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段连城主张："一般对外宣传的解释性翻译"，是与文献和专业性翻译相对而言。前者指对外国人介绍中国的一般情况，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人民生活、名胜古迹等各个方面均会涉及，形式可能是对外书刊的一般报道、各地一般的对外宣传材料，也可能是为外国人导游，同他们的一般交谈乃至"闲聊"。至于文献和专业性翻译，则是指官方文件、高级领导人的正式讲话和著作，以及外交会谈、经贸合同、法律文书和科技交流等。这类翻译当然要求比较严谨，译者不能任意解释，但"对号入座"的译风也不可取。

解释性翻译是把要解释的内容（通常因此而加注）融合到译文中去，使译文一气呵成，巧妙传达出原文的含义与风格。解释性翻译不仅仅适用于对外宣传翻译，一般用在双语文化或语言的差异很大，目的语难以直接表达的场合。例如：

"Will you come to see us some time, William?"

"Jamais," I said.

"威廉，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呀？"

"永远不去。"我用法语回答。

"I love my love with an E, because she's enticing; I hate her with an E, because she's engaged; 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 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 her name's Emily, 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 (Charles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我爱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因为她是Enticing(迷人的);我恨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因为她是Engaged(订了婚了)。我用我的爱人象征Exquisite(美妙),我劝我的爱人从事Elopement(私奔),她的名字是Emily(爱弥丽),她的住处在East(东方)。"(张谷若译《大卫·科波菲尔》)

进行"解释性翻译",译者可以,而且应该对原文加工,一般是动三种"手术"。一是"镶补",即补充外国人不懂的背景,通常是加几个字或最多加一两句话就行。另一种"手术"可以称为"减肥"。这指的是对堆积辞藻的"美文"进行加工,删节"溢美之言"和"不实之词"。如龙舟赛的宣传品中诸如"银河流星""海市蜃楼""水晶宫""群英会"等,都可一概删节,改成简练的叙述。"抢鸭勇士谱水上凯歌"何所指,恐怕中国人也不懂,不如说"You'll see an exciting contest of swimmers trying to seize ducks"(您会看到游泳健儿在水上追逐鸭子的紧张比赛)。再一种常动的"手术",可称为"重组",就是按外文表达的需要,把原文的句子拆散,重新组合。一般而言,句子以简短为好,比较符合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段落也可重分,一般而言,段落也以短为宜。(段连城 1990)

除对外宣传英译外,解释性翻译也常用于文学翻译。

等级翻译 rank-bound translation

亦称"等级限制翻译",即源语和目的语在词、词组、分句或句子都是一对一的关系。逐词翻译是词平面上的等级翻译,例如机器翻译起先是词平面上的一对一的翻译,目前正在设计词组、分句甚至句子的更高平面上的等值翻译。等级翻译的层次偏低,不是一种理想的翻译方法。

韵律翻译法 metrical translation

在诗歌翻译中,译者力图步原文的韵律,在最大限度上保留原文的形式。但无论两种语言的体系多么相近,要在它们之间找到完全相同的诗律,是很难做到的。像音位翻译法一样,译者为了凑音步,就难以顾全意义。其结果是歪曲原文词语的本意和交际意义。要根据诗律写诗,本身已不易,要按别人的意思来翻成格律诗自然更难。

翻译关联法 correla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系英国翻译家、翻译理论家纽马克(Newmark)在其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基础上提出的方法。其基本定义为:原作或源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就越要紧贴原文翻译。(The more important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or source language text, the more closely it should be translated.)其中,"紧贴翻译"定义为最贴近字字/词词对译的翻译,既保存字/词的本义,也保存字/词的内涵意义,甚至保留其用法。紧贴的程度因上下文而异。一般说来,非文学文本的翻译有可能比文学文本的翻译更准确。文学翻译无法尽善尽美,这是相对而言的。文学翻译家有更多的文化因素和语言现象要重新处理,在文学翻译的关联因素中,美的因素至关重要:原文语言越优美,译文语言也越要优美,这样意义就不会受损;意义越不重要,就越能展现原作的声响修辞效果。据此,纽马克把翻译题材分成两类:真实性题材(fact)和虚构性题材(fiction)。两类题材的翻译在文本、词汇和语法方面呈现的紧贴程度是不一样的。

纽马克从多方面来讨论翻译的关联因素。1. 原文语言或其中任何层次的语法单位越是不重要,就越是不必要紧贴地翻译出来。相反,如果原文的权威性越大,紧贴程度应越高;2. 信息强调的是言语行为,其目的在使读者响应或采取行动,意义纯粹是描述性,则采用简化、强调和对比的翻译法;3. 翻译一篇普通的信息文本,如技术报告、新闻报道、旅游或宣传材料等,原文写得越不好或结构越差,越要加以重写或重组;4. 译文读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能接受源语的表达法。反之,程度越低,就越不能接受源语的表达法。可采用删除,或采用目的语特有的表达法替换之。原文越正规,越不能在译文内添加信息,而要采用加注的形式;5. 意识形态的成分越少,译文越容易贴近;反之,意译的程度越大。(意识形态指流行或不流行的相关思想、概念。)6. 原文文本越复杂,翻译时供选择的措施就越多,这就有赖于译者的创造性阐译。文本文化性越少,译文越易表达。

纽马克认为,最贴切的翻译法是直译。当源语和目的语在引申义和语用上相吻合时,就可将词、词组及其搭配等直接翻译过来。而源语包含的文化信息越多,越不宜使用直译。此外,尚可采用阐译,对文化词项重新给予文化意义或中和化。

翻译策略 strategy of translation

1967年,列维(Levý)提出translational"MINIMAX STRATEGE",用以保证职业翻译工作中的输入/输出的合理关系和SL/TL表达手段在语篇上的高度等值(Wilss 2001: 192)。时隔十年,威尔斯(Wilss)在他的《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一书中再度提到翻译策略(Wilss 2001: 28)。他和后来的柯尼希斯(Königs)(1987)都认为,翻译策略"是指译者在把源语文本转换为目的语文本时采纳的步骤,这种步骤可能,但不一定能导致最佳的译作"。"耶斯凯莱宁(Jääskeläinen)(1993)把策略定义为是与'目标取向性'和'主观最优性'相关联的过程,而非解决问题的过程。换句话说,翻译策略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自

认为要达到的既定目标的最佳方法。她把翻译策略分为总体策略(global strategies)和局部策略(local strategies)两种,前者指运用于整个翻译任务中的策略(如对译文风格的考虑、对读者群的假设等),而后者则集中于翻译中更为具体的操作(如寻找合适的词汇等)。"(转引自李德超 2005)韦努蒂(Venuti)对翻译策略界定为: 选择原本和拟定一种翻译方法(转引自 Baker 2004: 240)。韦努蒂的翻译策略限于母语作为目的语的翻译活动。翻译策略除了异化、归化之外,大的方面还有原文选择、确定译法以及改写、阻抗、同化、文化移植等内容。

"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有天然的联系,但两者常被混淆。即使像韦努蒂这样的"翻译策略"的阐述者和提倡者,在其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1995)一书中提到异化/归化时,作为"翻译方法"的居多,而作为"翻译策略"的偏 少,"策略"(strategy)与"方法"(method)交替出现,两者流变不居。巴斯内特(Bessnett)也有这种情况,在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ition, 2002)一书中,在对勒菲弗尔(Lefevere)译诗的见解作具体归纳时,在一句句子中开始用的是 methods,后来又把它上升为 strategies。如说: *In his book on the various **methods** employed by English translators of Cattullus' poem 64, André Lefevere catalogues seven different **strategies**.* (Bessnett 2002: 83～84)这七种"策略"分别为音位翻译(phonemic translation)、逐字译(literal translation)、韵律翻译(metrical translation)、译为散文体(poetry into prose)、押韵翻译(rhymed translation)、无韵翻译(blank verse translation)、解释性翻译(interpretation),其实均属翻译方法。

我国引进翻译策略这一术语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大概与韦努蒂的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一书的出版与传播有关,同时还成对地引进异化/归化等概念(其中"归化"一词在我国传统译论中早已有之)。

从上可知,对"翻译策略"尚无十分明确的定义。韦努蒂和巴斯内特等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翻译策略"的概念,赋予其浓重的文化因子。所以,一般认为,翻译策略(如异化、归化)处于文化层面,多从文化上考量;而翻译方法(如直译、意译)处于文本层面,多从篇章语言上考量。如果把两者都看成"策略"的话,也可按耶斯凯莱宁的说法,分为总体策略与局部策略: 总体策略为文化视角的翻译策略,局部策略为文本视角的方法策略。参见"异化翻译""归化翻译""阻抗""改写"

7. 翻译技巧

翻译技巧　translation techniques

是翻译实践的经验总结,对翻译实践有解困释难的作用。翻译技巧产生于翻译实践,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翻译技巧的研究占有突出的地位。早在1 300多年之前,玄奘就运用了各种翻译技巧,如增量、删略、变位、离合、译名假借、代词还原等,并提出著名的"五不翻",即有五种情况不宜意译而需直译。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有专章讨论"译书之法",介绍"华文已有之名"的翻译、"设立新名"的方法以及如何"作中西名目字汇"等。严复在《天演论 · 译例言》中说:"词句之间,时有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不倍本义。……前后引衬,以显其意。"他在《群己权界论 · 译凡例》中也说:"若依文作译,必至难索解人,故不得不略为颠倒,此以中文译西书定法也。"凡此种种,古人或有感而发,或经验之谈,常以简略的文字对翻译技巧和方法予以描述或规定。

在语言学进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人们开始用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翻译技巧。奈达(Nida)的早期著作不乏对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的阐述,如核心句的语法转换、语序处理,甚至具体到时间词、数量词的处理等。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在《语言与翻译》一书中专章叙述了翻译转换法,其中包括移位法、替换法(词形替换、词类替换、句子成分替换、复合句中的句法替换、词汇替换、反面着笔、补偿法)、加词法、减词法等。而我国张培基等 1980 年编著的《英汉翻译教程》更是以英汉语言对比为主线,系统地总结和整理了英译汉常用的方法和技巧,从词义的选择、引申和褒贬,词类转换、增词、重复、省略、正反译法、分句合句、被动态译法、从句译法直到长句译法,把传统语法中的词法和句法合理对应,十分到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外语学习者。

诚然,翻译技巧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词法和句法上。随着篇章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人们研究了译文篇章的衔接与连贯、段落的调整等技巧,并且注意到译文要反映原文语言的意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不同要求。传统的翻译技巧主要从语法的角度条理化、系统化;现在,学者们已从不同的相关学科的原理出发,对翻译技巧加以解释。例如:

I am so grateful to my father for his continuous encouragement during my childhood. **儿时父亲不断地鼓励我,我非常感激。**

对于译文中的省略、词性转换和词序调整固然可以从语法角度来加以考察,但同时也可从语义认知和语义结构的角度来说明。(据方梦之 2007b)

翻译技巧十种　ten major skills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基于英汉语言的对比研究,英汉翻译的基本技法可归纳为十大类: 1. 斟酌词义;2. 增补省译;3. 灵活转换;4. 调整词序;5. 断句接气;6. 正反分合;7. 重心平稳;8. 虚实奇正;9. 略赋文采;10. 综合权衡。这些技法之间并非互不相干,而是相互为用,构成一

个较完备的体系,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和层次性。第一条斟酌词义和第二条增补省译,基本上在不变动原句的基础上进行,主要是为了保证译文准确完整。前者包括词义的选择和引申、褒贬和搭配处理,后者则涉及虚词实词的应用、信息量的控制以及为修辞和语法目的而进行的变通处理。第三条灵活转换和第四条调整语序,是原句结构的变换加工,主要是为了译句流畅顺达。转换包括词类转换、语气语态转换、句式结构的转换等,语序调整涉及定语和状语的位置以及目的语信息与审美接受的顺序过程等问题。第五条断句接气和第六条正反分合,打破原文句子束缚并进行逻辑调整,以增强译文的气势连贯。断句接气是中国绘画上的术语,强调的是气韵生动,一以贯之。正反分合则是逻辑上的,但也包含艺术的考虑。第七条重心平稳和第八条虚实奇正又针对一些难译之点,深入到译文的命题结构重组和翻译的直觉把握等问题,以求文气通畅,信息安排合理,当然也包含一些特殊效果的修辞考虑。第九条略赋文采和第十条综合权衡属于最高层次。前者是对译文语言技法的艺术考虑,甚至提倡一定的唯美效果,后者则是整个译文水平和表现效果的总体配合和调度布置。不难看出,前面几条与翻译基本手法中的再现手法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后面几条在一定程度上则是表现手法的具体体现。至于这些基本技法的运用问题,既要受翻译的基本策略的导向和基本手法的制约,又在于译者匠心独运和灵巧变通。 (王宏印)

切分 cutting

指把源语中未被标点的句内成分或把连贯的话语分成一个个片段。从翻译的角度看,可有多种切分方法:意群切分、主述位切分、逻辑素切分、语言单位切分等。通过切分,找出适当的翻译单位,合并或分别译出,以使译语通顺、流畅。参见“分译”

分义 decomposition

亦称“析义”,与“合义”相对。把一个词或词组的词义拆成两半来译,使目的语显豁、流畅,符合规范,有时还给人以清新、流畅的感觉。例如:It is an important *catalyst* to the cause of our liberation.(这是促进我国解放事业的重要因素。)句中,catalyst 不译“催化剂”。又如:Various attempts were made to calculate levels on this basis, with only very limited success. About 1925 the new quantum theory originated and gave *immediate and continued success* in the mathematical solution of this problem.(在这个基础上,人们为计算能级作了各种努力,但收效甚微。约在1925年,新的量子理论产生了,并在求得这个问题的数学解答方面立见成效,且不断有所成就。)词组 immediate and continued success 不译“即时的、连续的成功”。

分译 division; splitting

把原文句子中的个别词、短语或从句分离出来,单独译出,自成短句,或使原文的一个句子分译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例如:A *movie* of me leaving that foxhole would look like a shell leaving a rifle. 我离开那个单人掩体速度之快,要是拍成电影的话,会像出膛的子弹一样。(名词译成小句)Alchemists made *resultless* efforts to transform one metal into another. 炼金术士企图把一种金属转变成另一种金属,那完全是徒劳的。(形容词译成小句。)*His failure to observe the safety regulations* resulted in an accident to the machinery. 因为他没有遵守安全规则,机器出了故障。(名词短语译成子句。)The west for a century dirt-farm poor and ignored by the more industrialized eastern provinces of Ontario and Quebec that control Canada, has lately begun to sway the nation's entire economic structure. 一个世纪以来,加拿大西部是贫困的小农经济地区。工业化程度较高、左右全国的东部省份安大略和魁北克曾对它不屑一顾。但最近以来,西部地区对加拿大的整个经济结构已产生影响。(长句分译成三小句。)

反译法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expression

参见“正反式转换”

长句翻译 translation of long sentences

长句指形体长、词/字数多、结构复杂的句子。主要因修饰成分多、并列成分多或结构层次多而形成。一般适用于精确、周密、细致地描述事理间的复杂关系。长句多用于书面语体,如政论、科技语体。一般而言,英语句子长于汉语句子,其主要原因是:英语造句偏重在关系上作出反应,从关系上求说明,关系词与关联手段非常丰富。英语长句译成汉语的一般原则是分译、短译,有必要时按信息结构和语义内容重新安排译语语序。例如:

The growth of class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workers was inhibited by continued high levels of employment and rising earning for almost 15 years, combined with the propaganda of views in the labor movement reflecting the influence of Keynesian theories about the ability of capitalism to solve permanently the problem of "boom and bust" through a "managed economy" of built-in stabilizers. 将近15年来,就业率一直保持高水平,工资收入不断增长。加之,劳工运动中宣传受凯恩斯理论影响的观点(这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能力通过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国家调节经济”来永久解决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的问题)。以上因素结合在一起,阻碍了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

汉语长句的英译经常照译为一句。但也有分译

的,如: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这一条,就稳如泰山。(《邓小平文选》) The crucial factor is economic growth, which will be reflected in a gradual rise in living standards. Only when people have felt the tangible benefits that come with stability and with the current systems and policies will there be true stability. No matter how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anges, so long as we can ensure appropriate economic growth, we shall stand as firm as Mount Tai. 除了分译外,句子结构的重新组合是长句翻译的重要方法之一。参见"重组""逆译""顺译"

引申 extension

指在保留原文全部语义的前提下,根据具体语境和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不拘泥于词语的字面意义,在译文中对词的意义和形式作适当调整,以达到忠实、通顺的目的。引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源语本身对所用词语的本义有所调整与变动,对于译者来说,这首先是个理解的问题,例如: The high-ceilinged room, the little balconies, alcoves, nooks and angles all suggest sanctuary, *escape*, creature comfort. (天花板高高的房间,小巧的楼厅,四进的斗室,僻静的角落,这一切都使人联想到静谧的圣殿、遁世避俗的处所和舒适的享受。)二是原文基本词义确凿,而用目的语表达时需作适当调整,甚至另辟蹊径。例如: *Beauty* lies in lover's eyes. 情人眼里出西施。(据方梦之 1994)

引申的层次 levels of extension

根据词义变化和调整的程度不同,亦即根据引申义与本义的差别大小,词义引申可分多个层次。这里分三个层次:近似、深化、升华。这三个层次的引申义与本义的差别按其顺序由近至远。近似的引申指接近本义,但又不为本义所限;深化的引申是指赋予新义,但与本义在字/词面上尚有蛛丝马迹的联系;升华的引申则出自本义而在字/词面上远离本义。以下例句分别说明不同的引申层次:1. His temper was as quick as his smile; in everything he did his nerves seemed on *surface*. 忽而笑容可掬,忽而火冒三丈,无论做什么事,他似乎总是神经紧张,现于颜色。(跟本义近似的引申)2. How they bow to that Creole because of her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瞧她们对那个克里奥尔人奉承讨好的样儿,还不是为着她有成千累万的财产吗!(深化)3. ... and she held *honour* — a cheque for twenty thousand pounds with his signature — quite firmly in her hands. 她把她的战利品——一张他签字的两万英镑的支票——紧紧地攥在手中。(升华)(据方梦之 1994)

句式对应法 corresponding sentence patterns

套译法中的一种。在英、汉语中,有不少句式在内容和形式上是对应的,翻译时一般可以套用。例如,as soon as 与"…一…就…"对应:他一到上海,就去参观杨浦大桥。*As soon as* he came to Shanghai, he paid a visit to the Yangpu Bridge. The more ... the more ... 与"…越…(就)越…"对应:星球的距离越远,看起来越小。*The greater* the distance of a star from us, *the smaller* it looks.... not ... until ... 与"…直到…才…"对应:他直到上大学才开始学英文。He *did not* start to learn English *until* he attended university. But for ... 与"要是没有…"或"要不是…"对应:要是没有空气,动植物都不能生存。*But for* air, plants and animals should die. 参见"对应式转换""套译"

句式调整 syntactical readjustment

常指分句先后次序的调整。中文固有的习惯语序是:先偏后正、先因后果、先假设后论证、先让步后推论;在时空关系上,先发生的先说,后发生的后说,由大至小,由远到近。这是"正序"。凡不符"正序"者,翻译时经常要作调整。句法调整的实质是从语法翻译提高到逻辑翻译。中文不说"不远游父母在",英文却说 One should not go travelling afar when one's parents are alive. 又如:1. There is the danger of war as long as there are imperialists. 只要有帝国主义,就有战争的危险。2. Take the medicine before you go to bed. 睡前服药。

调整需忠于原意和源语风格,如有违背,则应放弃调整。实际上有不少场合是顺势而行的,如:1. He had a stomachache which was caused by eating too much. 他肚子痛,因为吃得太多了。2.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Out of position, out of administration.

加注 annotation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完整地传达原文语义和风格的一种补偿方法,是为了尽可能达到翻译等值而采用的辅助性手段。吕叔湘说:"必要的注释应该包括在翻译工作之内。鲁迅先生译书就常常加注,也常常为了一个注文费许多时间去查书。当然,注释必须正确,否则宁可阙疑。"(转引自罗新璋 1984: 530)加注主要用来释文、解惑和补正。

释文是译者对译文的自我解释:为什么这样译,而不那样译,为什么原文的字面意义是这样,而目的语不照字面意义却另辟蹊径。例如: Please, Ma'am, is this New Zealand or Australia? 泼里寺、麻达姆*,这是新西兰啊,还是澳大利亚啊?(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译者注:英语"Please, Ma'am"的音译,意为"夫人,请问您……")此处是故意音译以表示阿丽思的口吻。

解惑是试图解除读者可能对译文产生的疑惑。

译者为了照顾原文形式,保留原文风格,再现原文神韵,往往不得不顾其形或音而略其义,只得用括号或脚注注出词义。此外,一些新词(特别是科技新词)最初照字面或读音译出,不易为读者理解,另注其义。如 radar 雷达(英语"无线电定位与测距"的首字母缩写词);"气功" Qigong (a system of deep breathing exercises)。

补正即对原著的创作特性予以补充说明,或对原著的错误或不当之处予以澄清或修正,或对原著的某些观点与内容提出异议或加以充实。严格说来,这种注释不属于原文的表达范围,但对正确理解原文内容往往是有益的。(方梦之 1993)参见"音译加注"

合义　blending

与"分义"相对。词与词、词组与词组,甚至分句与分句之间,在并列、修饰、动宾或其他组合关系中,有时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以致在翻译中不能分离出个别的词义来,需要把它们个别的意义融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表达。例如:1. When the history of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is finally written, the chances are that his Chinese policy will stand out as a model of *common sense* and *good diplomacy*. 当最后撰写尼克松政府的历史时,他的对华政策可能成为通情达理和善于处理的楷模。2. To see his likeness perpetuated in marble is to me today *a sad but pleasing sensation*. 今天看到他的这座永垂不朽的大理石塑像,我悲喜交集。某些成语的翻译尤需合义表达,如:1. to turn a deaf ear 置若罔闻;2. to sink or swim 无论成败。

合译　combination

亦称"并句法",将两三个句子合译为一个句子,以使译文简洁流畅、语气贯通、逻辑严密、概念明确。例如:The four men huddled there and said nothing. They dared not smoke. They would not move. 这四个人聚在那儿不说话,不敢抽烟,也不愿走开。原文三句,主语相同,汉语用流水句一气呵成。又如: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邓小平文选》) We should develo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higher and newer the technologies are, the better and the more delighted we shall be — and not just we, but the entire people and the state. 原文三句,语义上密切联系,汉语用词汇重复加以衔接和强调,如英语照译三句,就会显得松散。

补偿　Compensation

用目的语语言形式补足在转换原文语言形式时造成的语义损失。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指出:"当译语中因某种原因没有原语中某些成分的等值成分,也无适当的表达手段时,常用这种方法。"(巴尔胡达罗夫 1985:191)补偿包括增益、引申、替代、转移等方法。

赫维(Hervey)与希金斯(Higgins)将此界定为"通过使用与源语文本不同的手段,在目的语文本中产生近似源语文本的效果,以补偿源语文本的重要特征在翻译中走失"的技巧 (Hervey, Higgins 1992: 248)。他们把翻译描述为"充满妥协"的过程(1992: 34),并提出各种补偿策略来作为部分解决这种情况的手段。他们列出四种不同类型的补偿:1. 在"种类"上补偿。涉及"用目的语文本中不同类型的文本效果来补偿源文本的文本效果"(1992: 35)。如用具有类似风格效果的目的语特征来替代目的语缺乏的一种叙事时态(1992: 35～36)。2. 在"用词位置"上补偿。指对于源语文本用词所占位置特殊效果的走失,通过在目的语文本的不同位置再创这一效果来加以补偿(1992: 37)。如对一个不可译的双关语单词进行省略,随后把另一个单词变成双关语。3. 通过"词语合并"进行补偿。指"把一串较长的文字(如复杂短语)表现出来的源语特征,(压缩)变成一串较短的文字(如单词或简单短语)"(1992: 38)。这一做法经常包括用一个目的语单词代替源文本中一个较长,而目的语中又无字/词面对等语的形式。4. 采用"分拆方式"来进行补偿。指如果目的语中没有能涵盖源语单词意义范围的单词时采用的补偿方法。如将法语科技文章标题 Les papillons 译成英文的 Moths and Butterflies (飞蛾与蝴蝶)(1992: 39)。(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 33～34)

技能意识　skill consciousness in translation

指翻译者能够或力求以翻译理论(包括方法论)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的自觉性,能够或力求以翻译理论的准绳(常表现为某种技能规范)自觉地指导或检验自己的译作及整个翻译过程。(刘宓庆 1995: 299)。翻译技能意识的建立和发展一般经历以下三个过程:1. 理论认识过程——知识的启蒙过程是技能意识的萌发过程;2. 转化过程——外在的知识通过实践而内化为有指导的翻译活动,技能意识从萌发时的静态进入到能动状态;3. 熟巧养成过程——逐步做到将理论知识和翻译方法自觉地应用到翻译实践,在技能意识的驱动下进入技能的纯熟化。

词序调整　rearrangement of word order

词序既是组织句子的重要手段,也是突出句子重心的重要手段。由于不同语言的语言习惯不同,翻译时词序常作合理变动。例如:The gray-faced man *gave Henry a brief winning smile*, with a light tired gesture that made a hand-shake unnecessary. 那个脸色苍白的人,对着亨利动人地微微一笑,懒懒地打了个手势,表示没有必要握手了。本例中,英语 smile 为名词,汉语转化为动词。汉语"笑"受四个状语修饰。当一个中心词带有几个状语时,汉语的词序一般为:

靠近中心词的是单音节词(本例中为"一"),次为表示程度(如"微微")、性状(如"动人地")的状语,再是表示对象的状语(如"对着亨利"),再远一点是表示时地和能愿的状语,离中心词最远的是表示原因或目的的状语。这一顺序与英语不一致。如原句中 a① brief② winning③ smile 译成汉语后的次序发生变化:动人地③微微②一①笑。英语的后置状语汉译后通常前置。汉语定语的正常位置是在中心词之前,只是为了强调定语所表示的意义或是为使句子紧凑精练时,才可放到中心词之后。几个定语的位次一般这样排列:紧靠中心词的多是单音节的或表示类别、性质的名词、形容词,其次是动词或动词词组,再次是数量词或"这""那"等代词,离中心词最远的是表示领属或时地的名词、代词。而英语词序有时可前可后,翻译时多有调整,如:It was partly as a result of those economies that *many of*① our② *most important*③ new④ *projects in other fields*⑤ become possible. 我们②在其他方面⑤许多①最主要的③新④工程得以实施,部分地是由于采取了这些节约措施。词序调整是针对目的语而言的,有不同的目的和作用;而移位主要针对源语语法分析,两者有共同之处。参见"移位"

词语连接 cohesion

指一段话中各部分在语法或词汇方面有联系,或两方面都有联系。这种联系可能存在于不同的句子之间,也可能存在于一个句子中的几个部分之间。词语连接是语段篇章的重要特性,并由此区别于一些互不连贯、杂乱无章的句子的堆砌。词语连接的优劣,关系到话语的题旨或信息是否被接受者所理解和接受。因此译文也要通过一定的连接手段,将句子的各部分或句子与句子逻辑地组织起来,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语义单位。例如:

"There's certainly too much pepper in the soup!" Alice said to herself, as well as she could for sneezing.

There was certainly too much of it in the air. Even the Duchess sneezed occasionally; and as for the baby, it was sneezing and howling alternately without a moment's pause. The only two creatures in the kitchen that did not sneeze, were the cook, and a large cat . . .

"我看那汤里的胡椒一定搁得太多啦!"阿丽思说着就觉要打喷嚏。

实在那空气当中的胡椒面儿是不少,连那公爵夫人自己也有时候打喷嚏;要说那小孩,那就不是打喷嚏就是叫,不是叫就是打喷嚏。那厨房里只有两个不打喷嚏的,一个就是那个做饭老妈子,一个是只大猫……(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译者为了使段与段、句与句以及句子内部加强衔接与连贯,使整个语篇文脉畅通,用了不同手法,作了处理。例如,为了使段间语义紧密连接,将 certainly 译为"实在",放在句前;"连…也"(even)与"要说"(as for)则照常译出;两组"不是…就是"系据"alternately without a moment's pause"演化而来;而"一个…一个"又为铺陈需要而增设。由此可见译者在词语连接上的匠心,也可见词语连接在话语层翻译中的重要性。(据方梦之 1999)

拆字法 splitting a character

美国学者费诺罗萨(Fenollosa)指出,汉字里的形象不容忽视,它们以种种方式生发诗意,如"日""月"合而成"明"。这一看法在西方翻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一些翻译者误入字形分析的迷途,把翻译搞成了拆字游戏。如洛厄尔(Lowell)和"爱诗客"(Ayscough),英译"犬吠水声中"(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一句为:A dog, a dog barking, And the sound of rushing water. 其中 a dog barking 便是拆解"吠"字。庞德(Pound)的做法更过分,在他的《诗经》英译中,或者拆字,或者只取偏旁部首,或者凭空加添新意。例如:"娈(孌)女"译作 lady of silken word,"静女"译作 lady of azure thought,"劳心悄兮"(《陈风·月出》)译作 My heart is tinder(取"劳"〔勞〕字中"火"字头的意思)。庞德这样译,是为了向读者传达汉字里的具体形象,并进而表明他作为意象派倡导者的美学追求。批评界对此反应不一,有人苛责他对中国诗歌的意蕴随意曲解、杜撰,也有人从西方诗歌革新的立场上肯定他的做法,说他是"中国诗的发明者"(艾略特),"现在以儒家诗人而面世"(方志彤),是"我们时代第一流的翻译家"(理查德·威尔伯)。(转引自林煌天 1997: 69)

转移(法) transfer

是在无法直接再现原文语言形式所含内容或特殊表达方式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迂回翻译方法。比如,原文中有些双关语或谐音等修辞手段在译文中无法直接再现、又不可能替代时,把这些表达方式转移到同句或同段落中的其他部分上表现出来,有时也可以起到与原作基本相等的修辞效果。例如:"Listen at you, now," Lusten said. "Ain't you something, thirty years old, going on that way."例中的说话人是个没受过教育的黑人孩子,他使用的英语不规范,却具有美国南方黑人的语言特点。原文中语法不规范之处无法直接再现,但是为了传达原文的效果及其超出语言本身的内容,考虑用汉语俗语及谐音译出:"听听,你又瞎哼哼了!"勒斯特说。"你都三十岁了,咋还是这个羊(样)子。"有人用目的语的地方方言来译原文中的方言,尽管在语言形式上不尽对应,但只要能基本传达出原文效果,运用转移法做一些局部的调整,似乎也是可行的。

具体化 specification

范·路文兹瓦特(van Leuven-Zwart)(1989, 1990)采用的术语,与抽象化相对,指缩小上下文中某

一词语指称对象的外延，扩大其内涵，使读者清楚地了解确切含义。例如：Torcello，which used to be lonely as *a cloud*，has recently become an outing from Venice. 托车罗往日寂寞如孤云，近来却成了威尼斯外国的游览点。（翁显良译）/The lower rooms were entirely given over to *the birds*，who walked about them with a proprietary air，as though the place had been built by themselves，...（Hardy，*Tess*）楼下的屋子全是那些公鸡母鸡的领土，它们在那儿走来走去，把主人翁的架子摆得十足，好像盖这所房子的就是它们自己，……（张谷若译）此例中的 the birds 不译"鸟纲动物"。

具体化可以发生在语义层面，通过增词或使用包含相对具体词义的词语，使原文中相对抽象的译素（transeme）在译文中被相对具体的译素所代替，而译文译素（target text transeme）与元译素（architranseme）呈下义关系，例如，把"to have an excuse"译为"找到借口"，"找到"比"to have"在语义上更具体（van Leuven-Zwart 1989：160）。具体化的翻译转移关系还可以发生在文体层面，即原文译素包含相对综合、概括的文体意义，而在译文译素中则被相对具体、详尽的文体意义所代替，例如译文译素中采用比原文译素更加正式的表达方法（van Leuven-Zwart 1989：161～164）。范·路文兹瓦特认为，具体化现象常常与解释（explanation）现象一起发生，使翻译中的转换（shift）向明确度更高的方向进行。她的研究结果显示，译者在翻译中趋向于更多地使用具体化和解释，而不是使用概括化，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译者通常都尝试给读者展示尽可能多的外国小说世界（van Leuven-Zwart 1990：89～90）。范·路文兹瓦特力图说明这么一种现象，即文本微观结构中出现的转换倾向于前后一致，这种倾向对于译者采取何种具体的翻译策略有着重要的启示。（van Leuven-Zwart 1990：70）。 （胡文雯）

抽象化 abstraction

与具体化相对，指词在特定语境中的外延扩大，内涵缩小，使词义更趋笼统。例如：1. As far as the *head* goes，at least，she does credit to the educational system pursued at my establishment. 无论如何，就智力才能而论，她确实能为本校所遵循的教育制度增光。2. *The wolf* and *the pig* mingled together in his face. 他的脸上透着凶残与贪婪。

实数虚译 fuzzy translation of numbers

根据语境需要，在翻译时对实际数字作模糊处理，以使译文整体上和谐统一，神形兼得。事实上，数字的作用不限于表示数量，它还用作修辞手段，表示夸张或比喻。所以实数虚化成为一种常用的翻译方法。实数虚化较多地应用于文学翻译中。例如：

"He is seventy-six years of age，" said Mr. Smallweed.

Mrs. Smallweed piped up："Seventy-six pounds! Seventy-six thousand bags of money! Seventy-six hundred thousand million of parcels of bank notes!"

斯墨尔维德太太是个有神经质的老财迷，听到数字很容易跟钱产生联想。原文用夸张的手法，前后重复 seventy-six 四次，从而活现了这一形象。这里，译文重要的不是数字的确切无误，表层数字的升级隐含着深层感情的激化。据此有译者译为：

"他今年 76 岁，"斯墨尔维德先生说。

斯墨尔维德太太尖叫起来："76 磅！76 万袋钱！76 万万包钞票！"

原文中斯墨尔维德太太说的三个数字并非表示数学上确切的概念。译文中后两个数字与原作数字出入很大。译文正是取原文数字 76 的重复形式，利用数字的同音与同形，猛增位数，不断加重语气，从而达到渲染气氛的修辞效果。

实数虚化也用于其他文体的翻译。如：1. I've told you this 20 and 20 times. 我已是数十次地跟你说过这件事了。2. I have a thousand and one things to do before we set out for our holiday. 在我们出发度假之前，我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

顺译 translation in original order

与"逆译"相对，指顺着原文词序或句序翻译。顺译不是逐字翻译，不排斥个别词或词组（特别是充当修饰语的）的倒置。例如：It was to be a very thorough attack，thus looks and undertones were to be well tried. 这可是一次非常彻底的进攻战，眉眼功夫和柔腔细调都要用上的。顺译在处理长句时经常运用，特别是处理并列成分多的长句。例如：Among the great questions of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and most of the twenty-first will be how long the Sino-Soviet split lasts，how permanent the new U. S. -China relationship will be，how far along the paths of pragmatism the Chinese will go in order to develop their immense economic potential，what sort of world view the Chinese leaders will hold and what sort of world role they will play. 20 世纪末叶和 21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的重大问题有：中苏分裂状况要持续多久，新的美中关系有多大程度的永久性，中国人为发挥他们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务实主义的道路上要走多远，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观点如何，以及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将起什么作用。

逆译 translation in reverse order

与"顺译"相对，逆着或基本逆着原文的词序或句序进行翻译，亦称"反转"。词序与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有关。操汉语者时空观上大体遵循逆序法，即由大至小，由远及近，由重而轻；而操英语者的时空观大体遵循顺序法。在表达法上多有不同。例如：

1. Sympathy is welcome to the unfortunate. 不幸者渴望得到同情。2. Misery follows war. 战争导致苦难。

在翻译较长的句子时，分句或一些从属成分倒置更是屡见不鲜。例如：This dual (double) quality of being sensitive to, and curious about, small accidental occurrences, and of possessing a frame of reference capable of suggesting their true significance, is probably what Pasteur meant when he said "Chance benefits only the prepared mind". 巴斯德曾说过："机遇只对有准备的人有益。"这很可能就意味着这种双重性：对一些微小的偶发事件敏感和好奇；又能识别这些偶发事件的真正意义。

套译 corresponding

具二义：1. 用相对应的句型互译，见"句式对应法"；2. 同义习语的互译。在习语互译时，有时在目的语可以找到内容、形式、修辞色彩大致相符的习语，可采用套译法。有时甚至连形象、比喻也相同或相似，则用套译法更感贴切。如 walls have ears 译为"隔墙有耳"，castle in the air 译为"空中楼阁"。采用套译法时，力戒一味归化，而置原文的地理、历史、人文、习俗等文化色彩于不顾。参见"句式对应法"

重组 reconstructing; recasting

1. 长句译法之一，译前将长句结构完全理清，弄懂原意，之后按汉语叙事论理的习惯重新组合句子，基本上脱离原句的层次和结构安排。翻译英语长句取重组法的好处是：由于彻底摆脱了原文语序和句子形式的约束，因此比较易于做到汉语行文流畅、自然，一气呵成，有经验的翻译还可以因此而使译文平添文采。重组时要避免发生疏漏，还要注意原文的轻重、分寸及语气，如：What the New Yorker would find missing is what many outsiders find oppressive and distasteful about New York — its rawness, tension, urgency; its bracing competitiveness; the rigor of its judgments; and the congested, democratic presence of so many other New Yorkers encased in their own world. 纽约的粗犷、紧张，那种急迫感和催人奋发的竞争性；它的是非观念之严酷无情；纽约市的那种各色人等熙熙攘攘，兼容并蓄于各自的天地之中的格局；这一切都使那些非纽约人感到厌恶和窒息；而这一切，却正是纽约人所眷恋的。2. 奈达(Nida)翻译过程四阶段之一(另三个为分析、转换、检验)。在完成分析的过程后，实际上是把源语的表层结构转换成深层结构。奈达的"重组"就是把深层结构再转换成接受语的表层结构，使之"适合接受语与预期接受者的文体形式"(Nida, Taber 1969/1982)

语义连贯 coherence

是以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双方共同了解的情景为基础，通过逻辑推理来达到语义的连贯，这是篇章的无形网络。语义连贯是构成话语的重要标志。译者只有理解看似独立、实有照应的句内或句间关系并加以充分表达，才能传达原作的题旨。例如：All is silent. The coffin is closed and carried slowly down the stairway, through the corridors, and out into the windswept streets. Outside, a sea of faces. Fluttering red banner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snow. It is the coldest day, they say since 1812, but the people have stood in the streets all night. 万籁俱寂。灵柩合上了，被缓慢地抬下楼梯，通过走廊，抬到那寒风凛冽的大街上。外面人山人海，白雪皑皑，红旗飘展。据说这是自 1812 年以来最冷的一天，但人们已在街上站了整整一夜。这是 *Lenin's Death* 一文中描写列宁灵柩从工会大厦运送到红场的一段。气氛庄严肃穆。描写顺序由先至后，从内到外。尽管这一段文字中少用连接词，段中还有两个单部句，但语义联结十分紧密。译文较多地采用小句，读来深沉激昂，犹如身临其境。由于整个话语是靠细微而精妙的内在联系而达到语义连贯的，翻译这类语段时一般顺次翻译，以维系其原有的逻辑顺序，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联想。

选词 diction

不同语言的词义差异很大，大量词汇都存在着一词多义，翻译时需要寻找它们的"汇合点"。词义选择主要受各种语境因素的制约：1. 词的搭配及上下文(以 appreciate 为例)：He can *appreciate* modern music. (欣赏)/I do not *appreciate* fully what he means. (理解)/I *appreciate* the regard you have for me, but I'm not qualified to take on the job. (感谢)；2. 词的语法特征：This quiet room *became* them perfectly. (become *vt.* 适宜)/go to *church* (去做礼拜)，the *Church* of England(英国教会)(church 大小写词义有别)；3. 汉语表达习惯：The new rules *are working* well. (执行) The treatment *works* like magic. (起作用)；4. 词的专业特征：to do work(做功——物理学)，the works of a watch(手表零件——机械)；5. 文体：Men are *good* in one way, but *bad* in many. (谚语)人之善者如出一辙，人之恶者多种多样。

省略(法) omission

与"增词(法)"相对，指原文有些词不必译出，因为译文中虽无其词已有其意；或者在译文中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省略是删去一些可有可无的词，或者有了反嫌累赘或违背译文语言习惯的词。但省略并非把原文的思想内容删去。英语中一些照应关系的词汉译时常省略。如：Tom put *his* hand into *his* pocket. 译为：汤姆把[他的]手伸进[他的]口袋。(方括号中的字不必译出，下同。)又如：... *and* as always happens with radios, just at the vital moment

a crash *and* a bang *and* nothing could be understood *and the broadcast ended.* 译为：[并且]收音机老会发生这种情况：正在紧要关头，嘎拉一声，[又]或是轰隆一响，[那么]什么都没听清楚，[而]广播就完了。在英译汉中类似以上两例中的代词与连词的省略是最普遍的，其他词类，如名词、动词、介词等有时也可省译。

英译时也同样需要省略的，如"……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译为 abolish all imperialist propaganda agencies in China ...，"开办"两字不必译出，有 in China 这一介词短语，已意在其中了。英译时，范畴词经常被省略，如：说服工作(persuasion)、落后状态(backwardness)、氧化作用(oxidation)、表示方法(representation)等。

消除歧义 disambiguation

指通过语言分析方法来说明歧义句中的不同结构，这是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常用的方法。例如，The lamb is too hot to eat. 可以分析并理解为：1. 小羊感觉很热，不想吃东西。(The lamb is so hot that it cannot eat anything.) 2. 煮熟了的羊肉太热，吃不下。(The cooked lamb is too hot for someone to eat it.) 汉语中也有类似情况。如"鸡不吃了"，可分析并理解为：1. 我不吃鸡了；2. 鸡不吃食了。在语言交际中，有上下文和语言环境的帮助，这种句子仍可辨别明白，翻译时要根据语境从深层结构中传达它们的内涵意义。

替代 substitution

指用替代词(pro-form)去替代上下文出现过的词语，在翻译中，替代也是一种翻译方法。英文中的替代是为了避免重复，也是连接上下文的手段之一。被替代的词语可以是名词词组或其中心词(名词性替代)，也可以是动词词组或其中心词(动词性替代)，或是整个分句(分句性替代)。汉译时替代词可省译，也可作变通处理：例如：1. Mary needs a new dictionary. She is going to buy *one.* 玛丽需要一本新辞典，她准备去买。2. We are told that he will come back tonight, and if *so*, our meeting will be held tomorrow. 有人告诉我们，他今晚回来。如是这样，我们明天开会。

提前处理 pretreatment

将原句中的某部分提前译出。参见"词序调整"

增词(法) addition

与"省略(法)"相对，亦称"增益"。即在翻译时按语义、修辞或句法的需要，增加一些词，以忠实通顺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如：1. When I came to I was in the water, swimming automatically, though I was about two thirds drowned. 当我清醒过来时，发觉自己在水里，虽然浸得半死，却本能地浮着。2. Try again *and* you will succeed. 再试一次，你就会成功。

转换的技巧 conversing; conversion

"转换(conversing)是翻译中用得很广泛的变通手段。在一般情况下，转换是获得灵活对应的不可少的应变对策，而失去形式对应则常常是转换带来的必然结果。"(刘宓庆 1995：206)作为一类不可或缺的翻译技巧，转换类型多种多样，例如平行式转换、正反式转换、句型转换、形象转换、词性转换、视点转换、语态转换、替代式转换、辞格转换。参见"转换"

平行式转换 paralleling conversion

双语转换的模式之一，指双语语义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不同表达方式的转换，是"以形象易形象"或以此换彼的结构转换。例如：After rain comes sunshine. (苦尽甘来。)/牛饮(to drink like a fish)。

正反式转换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expressions

亦称"反译法""同义反述法""反面着笔法""反正、正反表达法"，即以"正"译"反"或以"反"译"正"的同义表达。由于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上的差异，一种语言从反面表达的内容，另一种语言为求语用、修辞相当，或出于语言习惯要以肯定的说法来翻译原文否定的形式，或反之。例如：He was 75, but he carried his years lightly. 他75岁了，可并不显老。——以"反"译"正"；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incidents wasn't lost on us. 这些事件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以"正"译"反"。

对应式转换 corresponding conversion

是以寻求并获得对应体为目的的双语转换模式之一。在双语转换中，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在形式和意义两方面存在着某些对应关系，为对应式转换提供了客观基础。对应关系表现在词语、语法等语言层面，如两种语言中某些词所指同一，句法关系相应等。对应式转换往往采用模仿的手段予以实现。如在转换风格标记时，译者往往模仿源语的句式和语式，对应地再现原作的风格特征。

汉英的完全契合对应，如："2加2等于4"→Two plus two equals four. 在双语转换中，这种字字/词词对应的转换并不多见，更常见的是需作局部微调的对应，如：I was enchanted with the music. 我被音乐迷住了。参见"句式对应法"

句型转换 conversion of sentence patterns

指不同句子结构的同义转换，是语言内部的普遍现象。不同语言中句子同义结构的多样化正是汉外互译中句型转换的客观基础。例如：If you take care of the pence, the pounds will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这个复合句可以转换成并列句：Take care of the pence, and the pounds will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汉语可译成简单句：积少成多。汉译英也经常发生句型转换，例如：天涯海角：海天一色，巨石雄踞，墨宝纷呈，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名胜古迹。The sea and the sky merging on the horizon. These huge rocks here, with exquisite calligraphic pieces by past masters, are full of legends and traditions.（常玉田译）汉语整句中含若干小句，英译则拆成两句。

形象转换　image shift

指翻译过程中喻体的转换，主要有两种情况。1. 再现形象：armed to the *teeth* 武装到牙齿/to fish in *troubled waters* 浑水摸鱼；2. 替换形象：Every *dog* has his day. 凡人皆有得意日。/I am only a small *potato* in this office. 在这个办公室里，我只是个小人物。

词性转换　conversion of parts of speech

亦称"词类转换"，既是语言内部的普遍现象，又是双语翻译的一种技巧，是产生地道的译文所必需的。通过词性转换，改变句型，以达到一定的语用目的，符合一定的文体要求和风格要求。例如：Mastery of a language requires painstaking efforts. 这是文体比较正式的书面语。如果把连系式名词词组 Mastery of a language 转换成动词不定式词组 to master a language，成为 To master a language requires painstaking efforts. 这句话文体不如上句正式。从语用角度看，以上两句的信息焦点都在 painstaking efforts。如果把 To master a language 移位到句末，在 NP 位置上添加形式主语 it，符合英语造句末尾加重的要求，变成通用文体的句子：It requires painstaking efforts to master a language. 在语用修辞方面，更加强调 painstaking efforts，因为这是述位（未知信息）在前（requires painstaking efforts）主位（已知信息）在后（to master a language）的修辞强调句。根据汉语动词占优势的特点，把第一句中英语连系式名词词组 mastery of a language 转换成汉语动词词组"学好语言"，把原文偏正名词词组 painstaking efforts 也译成动词词组"下苦功夫"，全句译成"学好语言要下苦功夫。"运用的也是一种词性/类转换。这与英语内部由词性转换而引起的句型变换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英语内部由词性转换引起的句型变换，只改变文体语用功能，而不改变语义和逻辑式；同样，英汉翻译中的词性/类转换技巧，也是只改变英汉语句的句法参数和语音参数，而不改变语义和逻辑式。语言系统内部因改变词性/类而改变句型，但不改变语义这一客观事实，是两种语言系统翻译转换时改变词类保持语义不变的客观基础。

视点转换　shift of perspective

指重组源语信息的表层形式，从与源语不同甚或相反的角度来传达同样的信息。采用这种手段的理由是源语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认知和思维习惯上的差异。常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应用这种手法：1. 原文直译不太好懂，佶屈聱牙，甚至可能招致误解。例如：I couldn't agree more. 我百分之百同意。2. 直译虽能理解，但不合乎译入语的习惯，例如：He laughed till his sides split. 他肚子都要笑破了。

语态转换　conversion of voice

英语、汉语句子的语态均可从主动转为被动或由被动转为主动。例如，She refused the offer. 转换成 The offer was refused by her. 汉语则相应地由"她拒绝了这个建议"转换成"这个建议被她拒绝了"。这两种语言内部层次之间的语态转换，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的语态转换的基础。这种语态转换的动力也来自说话人为了交际需要对语言符号手段的运用。语态的变换，首先是主位（已知信息）和述位（未知信息）、话题和评述的变换。如第一句 she 是主位，第二句变成 the offer 是主位了。当主事格不重要、不想说出，或说不清楚时可用被动语态。如第二句改成 The offer was refused.（这个提议被拒绝了）把 by her 删除。第一句的信息焦点是 the offer，强调的是"她所拒绝的是这个提议。"第二句的信息焦点是 her，强调的是："这个提议被她拒绝了。"因此被动语态可以说是适应交际时末尾信息焦点（end-focus）的要求，对句型的一种转换。在语态转换方面，英语、汉语参数除了表层语符操作规则运用不同以外，在语用修辞层次方面也有不同；英语被动语态的应用范围比汉语广得多。举凡科技文章和报刊文章在叙述客观事物和规律时，都尽量用被动语态，在修辞上带有客观、委婉、谦虚的口气。汉语被动语态用得比较少。对说话人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常用被动语态来表示。在翻译时，是复制英语的被动语态，还是把英语的被动语态转换为汉语的主动语态，主要从语用修辞层次和汉语的语用习惯来考虑。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英译汉，英语的被动态大多要转换成主动态，例如：Only objects struck by the light are visible. 只有光照射到的物体是可见的。（不译：只有被光明照到的东西才能被看见。）汉译英时则相反。

替代式转换　substituent conversion

通常指易词而译或易句而译，即用替代词（substitute）或用另一种句式来翻译原词、原句，以利于原意的表达。例如：1.（Do not touch the exhibits....）These *objects*, however, were different. Lined up against the wall, there were long thin wires attached to metal spheres ... In the centre of the hall there were a number of tall *structures* which contained coloured lights. 然而，这些展品就不同了。沿墙排列着许多又细又长的电线，下面系着金属球。……大厅中央有几个装着彩灯的高大展品。这里，词与词联系的层次是 exhibits→

objects→structures,所以把后两者都译成"展品"。2.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有志者事竟成。此译为句型的替代式转换。

辞格转换 conversion of figures of speech

辞格转换是翻译过程中常用的手段之一。大部分英语常用修辞格都能在汉语中找到相似甚至相同的修辞方式,而相似之中又各有特点。由于双方历史、文化(包括审美观)、习俗的不同,在表达同一概念时,有时使用不同的修辞格;即使采用同一个修辞格,例如比喻,在结构方式、运用范围方面也不尽相同。例如:1. He made the money fly. 他挥金如土。(暗喻转换为明喻)2. Up shot the rocket into the sky. 轰的一声火箭就上了天。(倒装法转换成拟声法)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中的"丝"与"思"谐音,语意双关。许渊冲译为 The silkworm till its death 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 (双关转暗喻)当然在辞格翻译中,不是所有的辞格都可转换的,例如英文标题 Solar System Search from Space 可译为"从太空探索太阳系",英文头韵尽失。(方梦之 1994)

移位 extraposition; permutation

语法分析的一种手段。为了突出句子中的某个信息,或为了结构上的平衡,句子成分经常发生移位。例如英语为了强调,常把语义重心提前到任何可能的位置。译成汉语时常作相应的变动如:1. *Never* have I heard such a silly story. 这样的蠢事,我闻所未闻。(比较:I have never heard such a silly story.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蠢事。)2. It was *Mrs Packletide's pleasure and intention* that she should shoot a tiger. 要亲自打死一只老虎是帕克雷太太引以为乐、梦寐以求的事情。然而,汉语的信息重心也可前置,形成与英语相同的对比焦点。例如:It is *my brother* who has encouraged me to further study here. 是哥哥鼓励我到这里来升学的。在翻译中,通过对原语的移位分析来理解信息的轻重缓急,从而在译语中采取移位或别的补偿措施。参见"词序调整"

平衡性移位 balance permutation

英语造句要求把主要内容或复杂的成分放在句子末尾,避免头重脚轻。而主要内容又常常是信息的焦点。因此,在大多情况下,末尾焦点与末尾句重是一致的。汉语句法强调末尾焦点,对末尾句重并不十分强调。因此,当英语句子两者不一致时,特别对不是末尾焦点的末尾句重句,要找出该句的信息焦点,汉译时,用改变词序的技巧,把信息焦点置于句末。定语型分裂句属于这一情况。例如:All is not gold *that glitters* 是为了符合末尾句重的语用要求从深层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转换而来的,信息焦点在 is not gold,因此译成:"发光的并不一定都是金子。"形式主语 it 型分裂句,其信息焦点并不在置于末尾的实际主语 that-分句,而在管辖形式主语 it 的述谓动词词组。翻译时应用改变词序(inversion)技巧,把 that 分句的信息前置,把述谓动词词组的信息后置,并加以强调以符合汉语注重末尾信息焦点(end-focus)的要求。例如:It *doesn't interest me* whether they succeed or fail. 译成:"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我可不感兴趣。"(吴新祥,李宏安 1990)

主题性移位 thematic permutation

在英语中,把宾语、主语补语和宾语补语移位到句首,成为话题或主题,达到进一步强调宾语、主语补语和宾语补语的目的。有的语法书称之为主题性前置(thematic fronting)。汉语的词序变化比英语更灵活,也常用这种手段,构成对比焦点。试比较下列句子的原文与译文。宾语前置:Your rage I defy. 你生气,我不在乎。主语补语前置:Fool Joe may be, but thief he is not. 傻子嘛,乔也许是;小偷嘛,他可不是。宾语补语前置:I know you were careless, but dishonest I never thought you. 我认为你是粗心大意,虚心假意嘛,我可没这样认为你。(吴新祥,李宏安 1990)

连接性移位 link permutation

这是属于句群的语用修辞问题。为了使上下句之间,第一层次的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与第二层次的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连接紧密,达到文气一贯、浑然一体的目的,英语常用这种移位方法。翻译时,译文特别要注意这方面的移位才能达到句群的等值。例如:*The great hall* was decorated with flowers and the flags of the various organiz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utside the hall* stretched queues a mile long. 大厅里安放着鲜花和共产党各级组织的旗帜。大厅外面,吊唁的人们排成了长达一英里的队列。(吴新祥,李宏安 1990)

信息焦点移位 focus permutation

为了突出原文的信息焦点,使阅读原文的读者和阅读译文的读者有相同的感受,翻译时常常要改变原文信息焦点的位置。信息焦点的移位可通过改变词序、增益等翻译技巧来完成。例如名词化(nominalization)是英语的特点。这种词组表层是名词化结构,深层是包含主谓成分的句子。在含有这类结构的句子中,其信息焦点常落在这个词组的中心词——名词化的词——之上。译成汉语时,常用改变词序的手段,把中心词移至句末。例如,On every hand was a *charming view* of rocky buttresses and wooded heights. 深层是 It was a *charming view* that on every hand was rocky buttresses and wooded heights. 译文是:"到处是山石嶙峋,密林峰巅,景色迷人。"又如,附加语副词的汉译,也因信息焦点不同而需要移位:Colours were *bewitchingly* commingled. 译成"各种色彩溶融在一起,

令人陶醉。”(吴新祥,李宏安 1990)

韵律性移位　metrical permutation

英语诗歌有时按节奏押韵的规律作词序移位。汉语诗歌也有这种情况,译文有时可以用改变词序的技巧来译,不是机械模仿原诗韵律,而是求译诗韵律的感情旋律与原作相当。现以美国革命诗人 Philip Freneau 的一首诗为例:

The Wild Honey Suckle

Fair flower that does comely grow　　a
Hid in this silent dull retreat,　　b
Untouched thy honied blossoms blow,　　a
Unseen thy little branches greet;　　b
No roving foot shall crush thee here.　　c
No busy hand provoke a tear.　　c

原诗的押尾韵 ab ab cc,第一行为了与第三行 blow 押韵,grow comely 移位成 comely grow。为了 blow 和 grow 押韵,retreat 和 greet 押韵,后置定语移位成前置定语 Untouched, Unseen。译文则也有作韵律性移位的:

野金银花

可爱的花朵
　　开得多俊俏,
躲在绿荫丛中,
　　何等静悄悄!
蜜样花儿喘着气,
　　有谁知晓?
纤细枝儿在招手,
　　有谁看到?
那漫游的脚步啊,
　　可别把你踩碎。
那忙碌的手指啊,
　　可别惹你流泪。

(吴新祥,李宏安 1990)

8. 翻译类别

翻译的一般分类　general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翻译按翻译工具分,有口译和笔译;按翻译客体性质或文体分,有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之下尚可作次级分类);按翻译主体分,有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按符号代码分,有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按译品的形式分,有全译、节译(选译)、译要、编译等。

功能分类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翻译因其功能不同可分为四类:1. 要求译文与原文一致,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要达到等值或接近等值;2. 信息内容保真,译文修辞质量允许稍逊一筹,翻译速度越快越好;3. 一对一的交谈(如电话、网络聊天室)或者无须写在纸上的各种谈话(如导游、私人谈话)的翻译;4. 多语翻译中的信息检索、信息提取、数据库访问等方面所用的翻译。以上第一种的功能和需求是为了传播思想,第二种的功能和需求是为了获取信息,第三种的功能和需求是为了交流信息,第四种的功能和需求是为了信息访问。(Hutchins 1999)

交际分类　communicative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Schleirmacher)认为,翻译是一种理解和沟通行为;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地域方言和时间方言间存在着翻译;不同社会阶层间也需要借助翻译才能沟通;翻译还可以是自己对自己。(陈德鸿,张南峰 2000: 21)

《现代汉语词典》把翻译分为:1. 两种语言文字间;2. 方言与民族共同语间;3. 方言与方言间;4. 古代语与现代语间;5. 语言文字与数码间。2、3、4、指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间的意义转换,可称作“语内翻译”;但雅各布森(Jakobson)的语内翻译指的是改变措辞(rewording),包括同义词替换、改用迂回说法等。两个概念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与施莱尔马赫一样,斯坦纳(Steiner)(2001: 47)把翻译看做一种理解、信息交流和交际的过程。他按涉及的语言类型,将翻译分成“内部翻译(internal translation)”和“外部翻译(external translation)”两种,与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划分标准相似,但概念完全不同。他没有像雅各布森那样提及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但把内部翻译分为历时(diachronic)和共时(synchronic)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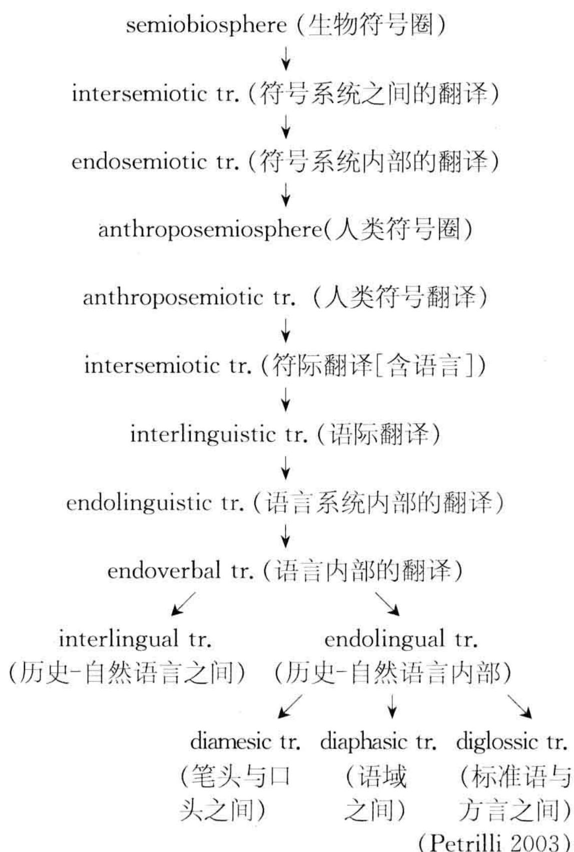
人们常说的翻译是指语际翻译,即严格意义上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参见“符际翻译”

语符分类　semiotic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雅各布森(Jakobson)(1959)在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一文中,采用皮尔士(Peirce)的符号概念,引入符号学意义观,即意义是一种关系,关系到一条有意义潜质的、不可穷尽的符号链。他认为:“任何语言符号的意义在于它能译为可以替代的特别是更加发达的符号。”(转引自 Venuti 2000: 114)他还用符号学的观念将翻译分成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三类:1.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or rewording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other signs of the same language. 2.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or translation proper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some other language. 3.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or transmutation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non-verbal

sign systems.（转引自 Venuti 2000：114）这一分类，不仅拓展了翻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奠定了将符号学用于翻译研究的基础。

但是，埃科（Eco）和内尔高（Nergaard）指出，雅各布森实际上是将语言符号（verbal signs）的解释分为三类。图里（Toury）曾建议将翻译分为两大类：符内翻译和符际翻译，再将符内翻译分为两小类：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Baker 2004：218～220）。德里达（Derrida）则认为，雅各布森分析“翻译”时，是指历史-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过程，因为雅各布森认为那种翻译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在解释语内和符际翻译时，他使用术语“改变措辞”（rewording）和“符号转换”（transmutation），但在解释语际翻译时却未用这两个术语。这说明遇到“严格意义上的翻译/translation”时准确翻译“翻译/translation”一词的困难，也说明雅各布森的三分法可能有问题（Petrilli 2003）。彼得里利（Petrilli）不仅批评雅各布森的分类不科学，而且将翻译重新分类如下图：



（Petrilli 2003）

这一细致的分类几乎包含一切形式的翻译。她认为有必要区分符号系统之间的翻译（intersemiotic tr.）和符号系统内部的翻译（endosemiotic tr.），因为它们不只在人类文化世界中存在，只要有生命的地方，它们都存在。要特别注意的是，她用 linguistic 指涉广义的语言，即包括历史-自然语言，又包括用符号、手势等代替的语言，如眼睛的语言、聋哑人的手势语、花语，还包括专门语言，如公文用语、外交辞令、科技术语、新闻用语、儿语等。所以，她的语际翻译指的是非言语符号和言语符号之间或非言语符号之间的翻译，不同于雅各布森的语际翻译。她的语言内部的翻译指的是人类历史-自然语言的翻译。

彼得里利的分类基于她的解释符号学翻译思想，她认为生命存在之处便是符号活动存在之处，而符号活动便是翻译活动，翻译活动充满了生物符号圈。另一些符号学者则认为，翻译活动是符号活动，但符号活动不一定是翻译活动。若按这种观点，去掉上图中的前三项，就是一幅全面的、基于符号学理论的翻译分类图了。 **（陈宏薇）**

互时翻译 intertemporal translation

亦称“跨时翻译”（cross-temporal translation）。该术语的形成大概基于雅各布森（Jakobson 1959）的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和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的翻译三分法，它指把某种语言较早时期的文本简单地改为现代版本。互时翻译实际上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斯坦纳（Steiner）曾经指出，除了同声传译，所有的翻译都含有互时成分（1998/2001：351），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成分由于太少而基本上可以加以忽略。然而，当源语文本是《圣经》或某个古典文学文本时，有时就必须面对源语文本自创作以来因大量时间消逝而造成的语言、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区别。此外，在互时翻译时间跨度大的情况下，常常会出现作品的源语语境意义走失或所写体裁消亡等问题（Bassnett 1980/1991：83）。由于丢失了这种决定相关意义的语境，若不存在一种本身即是经典的翻译，各代人通常都会感到有必要重译作品，因为与原文相比，译本往往会“随世界本身的发展变化而改变价值和意义”（Snell-Hornby 1987：102）。译者在这类翻译中采用的方法已发生变化。霍姆斯（Holmes）认为，诗歌的互时翻译与语言、社会文化和文学系统间的转换有关（1988：36），这三个领域相互独立，对每一个领域的译者都可能在以下三种对等形式间进行选择：1. 大致与源语文本同时代；2. 代表某种“标准的陈旧用法”；3. 本质上基本现代化（1988：38～39）。虽然霍姆斯的研究范围较窄，但他发现，似乎普遍有一种不愿制造一个“在各个层次都完全现代的，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它与先前的时间联系”的目的语文本（1988：41～42）。（据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117～118）

手语翻译 sign translation

手语，即手势语言，是由肢体、手势和表情组成的语言，是聋哑人赖以交流信息、传达感情的工具，具有口语和书面语的交流属性和演变特点。英、美等发达国家都承认手语的语言地位。手语翻译通常在手语对口语或书面语、或者在口语或书面语对手语之间进

行。手语已成为全球聋哑人的母语。

可核实性　verifiability

赖斯(Reiss)和弗米尔(Vermeer)(1984)在卡德(Kade)(1968)的论述基础上提出的术语，作为区分笔译(übersetzen)和口译(dolmetschen)的两个特征之一。在笔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修改自己的翻译，例如核实已经翻译的篇章，这即是译文的可核实性。然而，口译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可验证的。(据Shuttleworth, Cowie 1997: 194～195)　(胡文雯)

再结构翻译　translation with reconstructions

古阿德克(Gouadec)的七种翻译之一。指保留原文的全部内容而不考虑译文形式的翻译，其目的是以尽可能明白易懂的语言传达原文内容，以使全部原文信息直接为译文读者所接受。(据 Shuttleworth, Cowie 1997: 140～141)

全译　full translation

亦称“全文翻译”，即整段整句地将全文译完。许多文艺小说和其他有重要价值的图书一般采取全译。据有关部门调查，全译不是应用性文体(如商务、新闻、科技等)翻译的主要形式。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量倍增，人们工作节奏加快，需要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对原文中那些可有可无、意义不大的信息并不需要翻译。这样，节译、选译、编译、摘译、综译等形式已十分普遍。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翻译理论家提出的等值论、等效论等理论，都是从语篇的全译出发的。

自立幅度　autonomy spectrum

罗斯(Rose)提出的概念。目的在于为翻译分类提供一个框架。自立幅度是一个连续体，两极分别为“源语文本自立”和“目的语读者需求”(Rose 1981: 33)。通过这种方式，译本在自立幅度上的位置反映出译者和原材料的关系以及译本和目的语读者间的关系。在一端“做到了源语文本的完全文本自立”，而在另一端上的目的语惯例和期望得到了“完全适应”(1981: 33～34)。自立幅度是按相对一般的意义来加以解释的，它可以按照类型、功能和过程而被运用于翻译的分类。莱顿(Leighton)认为，“自立幅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现代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它有别于以前翻译分类的尝试，因为它构成一种连续的级阶，而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如字面翻译和意译的二分法)，也不是在少数几个相互独立的范畴间作出的选择。

典籍英译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典籍英译过程是一个二度翻译过程，包括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首先是语内翻译：用现代汉语完整、准确地理解典籍的古汉语原文。这一阶段在汉语系统内进行，源语是古汉语，目的语是现代汉语。其任务是借鉴吸收历代善注善译的成果，完整、透彻地把握典籍，理解古文内容、风格、意境、词义以及成语、典故等。这对英译质量至关重要。第二阶段是语际翻译，即用现代英语完整、准确地表达古汉语原文的意义。这是一种跨语种的翻译，源语是现代汉语，目的语是现代英语。典籍翻译原文为古代或近代汉语，译文为现代英语，中间语为现代汉语，无论理解还是表达都变得更加复杂，从内容到形式，译文和原文都有较大距离。典籍英译除了增加语内翻译阶段之外，为了使读者了解原文，常须对原文的古代意义作现代诠释，可以体现在译文之中，也常用各种注释加以说明。就文体特征而言，典籍包括古典散文、古典戏剧、古典诗歌、古典小说、科技文献等，其具体译法和要求各有不同。

变译　variety in translation

指译者，尤其在笔译时，根据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扩充、取舍、浓缩、阐释、补充、合并、改造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 2000: 5)可因内容的调整或浓缩与否而有不同的形式，包括摘译、编译、选择节译、综述、改写、阐译等。古阿德克(Gouadec)在其著述 *Le traducteur, la traduction et l'entreprise* (1989)和 *Traduction Signalétique* (1990)中把翻译分为七类：绝对翻译、摘译、图译、再结构翻译(即意译)、选译、视译、关键词翻译。其中摘译、图译、选译、关键词翻译均属变译。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变体是为了满足不同的翻译发起人和读者对信息内容和信息形式的不同需要。翻译变体的不同主要取决于译者对原文信息的取舍或浓缩程度，以及译者对原文的加工(包括编辑、调整、修改等)方式和程度。

夸张式翻译　hyperbolic translation

鲁宾逊(Robinson)所指译者为消除原作中可能留存的歧义而对原文进行了改进的翻译。意译(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理论主张对蹩脚的原作进行改进，其理由是，译者应译义，而不是译词(The translator must translate what the writer *meant*, not what he or she *said*)。译者通过改进原文，将自己对原文的看法加进了译文。(Robinson 1991: 175)夸张式翻译常用于一些实用文体翻译，但在文学翻译中也不乏实践者。这种翻译的结果是译文优于原文。

(蓝春)

关键词翻译　keyword translation

古阿德克(Gouadec)的七种翻译类型之一，其目的是为了满足职业翻译的需求，先译出关键词，以决定是否要对全文翻译以及如何翻译。(Shuttleworth, Cowie 1997)

改译 modification plus translation

指为达到预期的翻译目的，在翻译时对原文的形式或/和内容作一定程度的修改和变化，以适应目的语国家或读者的政治语境、文化背景或技术规范。改译可在小到词语、大到语段的范围内进行。就形式而言，可以是体裁的改变，如记叙文改为诗，问答式的访问记录改为记叙文，等等。例如：

Any object falling freely through the air accelerates each second by approximately 32 feet per second. In other words, the acceleration produced by the force of gravity is 32 feet per second per second. 任何物体在空中下落时，每秒以 980 厘米/秒的速度加速，即地心引力所产生的加速度为 980 厘米/秒^2。

原文中 32 ft/s^2 的加速度单位改为公制 980 厘米/秒^2 的表达法，以适应我国法定的度量衡制度。又如：

6 月 15 日，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委员会和赛伯世纪论坛共同举办的"第三届电子商务国际论坛（中国·天津）"在天宇大酒店举行。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吕新奎、外经贸部副部长陈新华、中国机电产品商会会长李慧芬、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顾问刘国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及天津市领导出席论坛。 On June 15～16, the Third China International E-Commerce Forum (Tianjin, China) was held at Tianyu Hotel. The forum was jointly sponsored by Tianjin Municipal Government, 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ommission and the Cyber Century Forum. Present at the forum were officials and researchers from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ianjin Municipality.（李欣译）

中文稿报道电子商务论坛的相关信息，在出席的人员中罗列了一大串政府官员的官职和姓名，这不符合西方人的接受习惯，所以文稿后面一句作了改译。（方梦之 1999：59～61）

译述 translating plus reviewing

指用自己的语言转述原作的主要内容或部分内容，不拘泥于原作的形式，行止自如。译述讲究立在读者需求和语篇单位的高度。译者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解构原作，自由建构新作。（黄忠廉 2000：141）译述一般要求译者对原作内容进行概括和提炼，对其主要观点进行评述。当然，译述的主要部分或主要工作仍然是译，而不是述，译者的工作重心是忠实而完整地再现原作的主要内容。"述"虽然不占主要地位，但译述者往往是原文主题的研究者，他把研究这一主题的心得和译文中的观点结合起来，予以评论，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译述的形式有两种：1. 先译后述，如王宗炎的《纽马克论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先"把内容摘要介绍，最后加上几句评论"；2. 夹译夹述，即译一部分，略作评述；再译一部分，又作评述；以此渐进，最后或可有一个总体性的评述或结论。

图译 diagrammatic translation

古阿德克（Gouadec）的七种翻译之一，是专业翻译工作者为特定的翻译需要而为。其中，原文内容的转换不是用语篇，而是用图。有人认为，用这种方式传达信息超出了翻译的范围。（Shuttleworth, Cowie 1997）

诠释性翻译 exegetic translation

赫维（Hervey）和希金斯（Higgins）提出的术语。他们将其定义为"一种在目的语文本中把源语文本中未能明确表达出来的额外信息加以表述、解释的翻译类型"，即"目的语文本同时对源语文本内容进行扩充和解释"的翻译类型（1992：250）。从所传递的信息量来看，诠释性翻译与要旨翻译（gist translation）策略形成了鲜明对比。一般用于双语文化或语言的差异很大，目的语难以直接表达的场合。如：

"Will you come to see us some time, William?"

"Jamais," I said.

"威廉，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呀？"

"永远不去，"我用法语回答。参见"阐译""解释性翻译"（黄勤）

选译 selective translation

亦称"节译"，即选取全文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进行翻译。节译的内容包括两种类型，其一是选译全文的主要信息，其二是选译翻译委托人或读者感兴趣的信息。报章杂志读者面广，节译的文章经常两者兼顾。对于读者面较窄、专业性较强的文章的节译，其内容往往侧重于后者。读者希望花最少的时间读到自己最需要的信息。例如，对于一份大型矿山的资料，领导干部对它的技术经济指标及生产组织感兴趣，技术人员希望了解其先进的装备，而地质人员则对该矿山的成因和地质构造更为关注。当不同的读者提出不同的要求时，译者可择需而从，以便在较短的时间内满足读者的需要。节译的原则是：一、针对性，节译的内容含量根据读者需要而定；二、客观性，节译的译法跟全译一样，对所译的部分要确切传达原意，不得加入译者个人观点；三、简明性，既然是节译，目的就是简单明了。选择有要言不烦、内外有别、避虚译实等。（据方梦之 1999）

要旨翻译 gist translation

与"诠释性翻译"对应。赫维（Hervey）与希金斯（Higgins）用以指"一种翻译类型，在这类翻译中目的语文本表达的是源语文本的浓缩版"，是一种提供"源语文本梗概"的翻译。（Hervey, Higgins 1992：250）

借代式翻译 synecdochic translation

指译者将原文的某一部分看做全文的代表，并将该代表部分翻译成目的语。借代（synecdoche）就是用部分代全体。用来代替全体的部分通常具备全体

的典型特征，是代表性的部分(representative part)。翻译过程中，原文的某些部分符合译者的观点，另一些部分与之相反，译者就会认为这些与自己观点相左的部分过剩、多余或没有什么用，在译文中可以删除。译者于是只把自己喜欢的部分翻译出来，认为他/她喜欢的部分代表了原文的全部。从译者的角度来看，译文不但没有比原文压缩，反而比原文更明晰化了。(Robinson 1991)

部分翻译　partial translation

指源语文本的某一部分或某些部分未翻译，只是把它们简单地转移并掺和到译文中。在文学翻译中，用这种方法来处理某些源语词汇是司空见惯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译者认为这些词汇“不可译”，另一方面译者可能有意将源语色彩引入译文。(Catford 1965)

综述性译述　comprehensive translation and reviewing

亦称“综合性译述”，是对同一专题的不同文献(包括不同语言的文本)，通过节译和编译作综合性的加工处理，产生一种符合特定需要的综合性译文文本。它对了解国外某一专题的历史、现状和趋势，对制定政策、科学研究或工程立项的可行性研究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译的操作步骤是：确立专题→检索文献→提取符合专题需要的文本→分篇节译→译文的综合编排，如有必要，译者或主编可加上前言后记。如某单位编印的《节能译文集》，包括节能政策、节能措施、节能设备、节能方案、节能效果等，节译日本、前苏联以及西方国家的有关文献数十篇，集世界节能之精华。综译时虽有删节，但仍强调忠于原义，保留原文有关论述的精要。当综译涉及某一学科或专业的进展、现状和前景时，常保留原文文本中的数据、公式和图表。综译是信息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由于专业针对性强，文献涉及面广，原文语种不一，重大课题往往由两三人，甚至更多人合作完成。　(林夕)

编译　transediting

“编译”作为一种文字形式早就存在，但英文的说法至今各异。其中有代表性的等义词是 transediting，此词的组成类似汉语，由 translating(翻译)和 editing(编辑)合成，首先由斯戴汀(Stetting)提出。编译是在摘译的基础上译者加了“编”的功夫，以更适合于特定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口味和习惯。“编”是指在不改变原文主要信息的前提下，译者所作的文字处理，包括为使译稿顺畅而增加一些连接性词语，为突出重点(不一定是原文的重点)而作语序或段落的调整、压缩，等等。在广告、产品宣传、译报、译刊及广播等方面，常用编译稿。编译可以以几个自然段(在科技文体中组成概念段)为单位来进行，例如美国专利《低脂油炸马铃薯片生产工艺》中的“目的”部分。

It is an object of this invention to provide potato chips by a process which eliminates deep frying.

It is another object of this invention to provide potato chips having a fat content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btained heretofore by commercial processes.

It is still another object of this invention to provide potato chips by a process which utilizes microwave heating as the sole means of reducing the water content of the potato piece to the required level and providing the color, crispness and flavor of deep fried potato chips.

编译为：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生产低脂油炸马铃薯片的工艺。该工艺无须浸炸，只靠微波加热即可使生薯片的水分降到所要求的含量，并保持浸炸薯片的色、脆、味，而含脂量却比用现有工艺生产的油炸薯片低得多。

实际上，编译稿多从全文着眼，段落着手。编译是翻译中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就其实质而言，是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并没有超出翻译的范畴。诺德(Nord 1991：29～30)认为，任何一个译本都含有编译的成分，编译是“目的论”的一种体现。因此忠实于原作和文字通顺仍应是衡量编译水平的标准。(据方梦之 1999)

摘译　abstract translation

亦称“译要”，是以翻译为手段对原文作摘要，即从原文中抽出主题内容，以简练的目的语写成摘要。国际标准 ISO 214－76 对“文摘”一词的解释为 an abbreviated,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a document without added interpretation or criticism(对原文献内容准确而扼要的表述，不加以解释或评论)。

摘译长短不一，短者数十字，其中至少要把关键词和核心内容译出；长者一般不超过原文的三分之一。译法上可摘取原文照译，也可适当改变其句子结构或段落安排，增加连接性词语等。

摘译是为了满足读者求新、求多、求快的信息需求。固然有许多定期的文摘杂志出版，一般科学研究部门的翻译人员仍需自做文摘。论文的文摘按对原文的压缩程度可分为三类：指示性文摘、资料性文摘，资料-指示性文摘。文学翻译方面也有类似做法，如说 5 分钟读一部短篇，15 分钟读一部中篇，半小时读一部长篇，华夏出版社的《中外文学名著速读全书》就是缩译的产物。(据方梦之 1999)

阐译　explanatory translation

即阐释加翻译，指在译文之中阐发原文中抽象深奥的内容，具体揭示出某词某句某段乃至某篇某书的内涵，进而注解目的语读者不解的某些文化信息，将注释与译文巧妙地融为一体的变译活动(黄忠廉 2000：306)阐释与解释性翻译的精神一致，方法上以

段连城(1990)在《对外宣传英译的"常见病"及解释性翻译》中提出的"镶补"为主。段连城结合对外宣传英译列举了四种需要"镶补"(解释或阐释)的情况:

人名地名:除极少数人,如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孔夫子、成吉思汗、蒋介石等之外,翻译人名略加几个词的解释决不多余。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访华时,弄不清刘少奇和林彪是什么人。所以,讲到秦始皇,最好加"公元前两百年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皇帝"。讲到白居易,最好加"公元8世纪的著名诗人"。外国人问我家乡何处时,我总是说:"毗邻越南和缅甸的云南省",只说云南,等于不说。

其次是历史事件,"辛亥革命",阐释为"1911年推翻最后一个王朝,建立共和国的革命";"大跃进",阐释为"(20世纪)50年代末期企图超高速发展的运动";"十年浩劫",阐释为"1966年至1976年造成全国动乱的文化革命";甚至"解放前(后)",也阐释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或"1949年前(后)"更为清楚。

其三是中国特有的体制、机构、"行话"、流行语和典故,等等,如"全民所有"译成 owned by the whole people 费解,不如 state-owned(国营)易懂;"个体户"译成 individual household 不懂,可译成 private businessmen 或 self-employed businessmen。"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就清楚得多。另如"大锅饭""铁饭碗""走后门"等,都需要简单解释。"街道妇女"译成 housewives of the neighbourhood,若直译为 street women,那就是天大误会了!"愚公移山"不加解释直译就成了"傻老头搬山",因为外国人并没有学过"老三篇"。

其四是中国的政治口号和术语特多,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精神文明建设、学习雷锋、四有新人等,可谓比比皆是。不加解释,外国人不懂或难懂。至于"五讲四美三热爱"及其派生语"市五四三办公室"等,不作"解释性翻译",根本不行。(段连城 1990)参见"诠释性翻译""解释性翻译"

(蓝春)

视听翻译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主要有三种形式:1. 字幕翻译(subtitling),将翻译文字映印在屏幕下边;2. 配音翻译(dubbing),是对舞台或屏幕剧情或故事的同声翻译;3. 旁白(voice-over),将翻译后的声音加录到原声带上;舞台字幕投影翻译(subtitling),歌剧演出中投射到舞台上方或沿着舞台投射的翻译字幕,现在这种做法已经延伸到戏剧。现代社会有不断增长的视听翻译需求,其中包括耳聋及听力有障碍者需要的语内字幕翻译(intra-lingual subtitling)。"E-mail"及"聊天室"的时代让年轻人越来越习惯用字幕去交流。由于 DVD 新技术的出现,人们不仅可以同时拥有字幕、配音两种版本,还可以同时拥有几种语言的视听翻译版本。观众不仅可以在字幕、配音两种版本之间进行比较,也可以在几种不同语言版本之间进行比较,因而拥有更多的选择。迪亚斯-辛特斯(Díaz-Cintas)认为以下几个因素影响人们对视听翻译形式的取舍:1. 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倾向采用配音翻译的形式;2. 处于政治压抑政策及没有舆论自由的国家往往偏好配音翻译的形式;3. 经济因素:配音翻译的成本约是字幕翻译成本的20倍;4. 风俗习惯因素。

视听产品作为现代工业产品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文化色彩,也有着"较大的调控力(significant manipulation power)",因而辛特斯呼吁人们给予视听翻译足够的重视,将其作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多一些实证研究,少一些直觉判断,多一些描写性研究,少一些规范性研究,并主张将其纳入高校翻译研究教学的体系内。(Díaz-Cintas 2003)

标准化翻译　standardized translation

指翻译中专业术语的固定化、表达专业概念的词语的统一化以及语篇的程式化。当前,随着高科技,特别是国际网络在全球的普及和国际经济活动的蓬勃发展,以科技、商贸、法律、电脑、金融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标准化语篇越来越多。标准化语篇中的语言符号与符号的使用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约定性和很强的互文关系。为了适应全球化的需要,也就是说为了国际交流和传递信息的准确性,必须采取标准化翻译。标准化语篇中的语言符号,其作用与交通信号灯这类非语言符号是相似的:符号与使用者之间都有高度的约定性,这些符号是客观的、单义的,排除风格与内涵变化的可能性。标准化语篇程式也极为相似。例如,商业合同有一定的格式,技术论文的构架也大同小异,除了术语外,许多概念的表达也十分接近,有同样的行话,因此同一专业领域中的不同语篇的互文性特强。这种语言表达法复现率高的特征也增加了电脑翻译的可能。实际上,人们已经在使用电脑来翻译这类标准化语篇,至少在印欧语之间是这样。

标题翻译　translation of titles

标题是篇章的"眼睛",译者要学会"画龙点睛"。寥寥几个词凝聚着整个译品的精髓。标题凌驾于篇章之上,但植根于篇章之中。只有以篇章为翻译单位,把整个篇章作为翻译思维的基点,标题翻译才能臻以完善。

文体不同,标题的风格自然不同。影片 *The Red Shoes* 译为《红菱艳》,*Waterloo Bridge* 译为《魂断蓝桥》,脍炙人口,有口皆碑,但多少带有商业性。小说 *Gone with the Wind* 译为《飘》(不译"随风而去"),*Oliver Twist* 译为《雾都孤儿》(不译"奥列佛·退斯特"),则以简短、含蓄、深邃为本。一般报刊文章的标题要求简洁醒目地点出主旨,如 *The Problems of Oil of Debt and Disarray* 译为"石油和债务问题造成一片混乱",*Sunk! A QE 2 Holiday for 99 Old Folk* 译

为"99位老人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旅游告吹!"而科学论文的标题要正确、简明,采用术语,如"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译为 Guangzhou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不用 marine, road 之类)。

由于标题简短,多为单层结构,时有省略,常生歧义。1. 结构歧义: 某教材一篇课文题目为 *Chinese Land in Antarctica*,从表层结构上看,译为"中国人登上南极洲"或"中国在南极的土地"均无可厚非。但从篇章意义上理解,前者为准确;2. 语义歧义: 有人把澳大利亚短篇小说 *Tell Us About the Turkey, Jo* 译成《乔,把土耳其人的故事告诉我》,实属错译。这里 Turkey 与"土耳其"风马牛不相及,实为"火鸡"。还有人把澳大利亚作家 Frank Dalby Davison 的长篇小说 *Dusty* 译成《灰濛濛》,而小说写的是狗的故事,书名的副题是 A Dog of the Sheep Country Dusty。Dusty 是牧羊区内一条狗的名字,应音译为《达斯提》。

国外有的报道性文章,标题夸大其词,意在哗众取宠,应按实意纠正。如 *Freeze-dried Seeds Really Last* 的科技报道,曾见有两篇译文。一篇就题译题,题目为"冻干法能延长种子寿命",另一篇就文译题,题目为"用风干-冻干两步法延长菜种的贮藏期"。后一种译法出于里手之笔,反映了原文的主旨。对于蕴涵深刻的标题,尽可能从内容到形式有相应的表达。如,英国罗素的名作 *How to Grow Old*,按其字面意思是"人是怎样老起来的"或"人是怎样变老的"。但是全文第一句是: In spite of the title, this article will really be on how not to grow old. 意思是说:"题目虽这样写,实际上本文要谈的是人怎样才可以不老。"作者故意采用文章标题与内容矛盾的写作手法。如果按表层直译,则不能充分表达。整篇文章包含着两层意思: 客观上"人是怎样变老的"和主观上"人怎样才可以不老"。译为"老之将至"(出自《论语》),即有这两层意思。总之,翻译标题的要旨是"得其精而忘其粗"。(据方梦之 1994)

应用翻译　practical translation; applied translation; pragmatic translation

亦称"实用翻译"。以传达信息为目的(同时考虑信息的传递效果)。它特别区别于传达有较强情感意义和美学意义的文学翻译。应用翻译几乎包括文学及纯理论文本以外的人们日常接触和实际应用的各类文字,涉及对外宣传、社会生活、生产领域、经营活动等方方面面,包括新闻翻译、科技翻译、法律翻译、经贸翻译、广告翻译、旅游翻译等。

法国翻译理论家德利尔(Delisle) *Translation: An Interpretative Approach* (1988)一书中用这一术语跟文学翻译相区别。她对应用翻译的定义是: 运用语用学知识对应用文本所进行的以传达信息为根本目的的翻译。应用翻译具有以下特征: 1. 匿名性(anonymous); 2. 指称性(denotative); 3. 客观性(objective); 4. 信息性(informative); 5. 暂时性(short-lived); 6. 说教性(didactic)。针对应用文本的这些特征,提出应用翻译应以清晰、表达贴切、尽量贴近原文语法和表达法作为翻译标准和手段。德利尔认为,应用翻译的提出可补功能翻译(functional translation)、科学翻译(scientific translation)、专业翻译(specialized translation)、功利性翻译(utilitarian translation)等术语的范围过狭的不足。(Shuttleworth, Cowie 1997)

应用文体翻译都有现实的,甚至功利的目的,要求译文达到预期的功能。目的和功能是应用文体翻译的依据和依归。应用文本的原文及其译文是两种独立的具有不同价值的文本,目的和功能不一定相同。作者通过源语文本提供信息,译者则将源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有条件地传递给目的语的接受者。至于译者对源语文本信息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以及译文的表现形式,则决定于翻译委托人和译本接受者的需要和愿望。(据方梦之 2003b)参见"语用翻译"

广告翻译　advertising translation

广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即非商业广告与商业广告之分。前者如政府部门、宗教团体、慈善机构的非营利的公告、启事、观念广告等,后者是以促进销售为目的的营利组织(如企业)的广告。本词条针对狭义的广告,即商业广告。美国广告协会把广告的目标归纳为认知、理解、说服、行动(awareness, comprehension, conviction, and action)。人们对新产品或新观点通常比较陌生。广告的作用在于引起公众对其注意和认识。所以,一则好的广告必须新颖独特,引人注目。同时,广告要让人理解它要传达的信息,人们才会对其中某些有益的信息感兴趣或被说服,最终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某种行动。所以,上乘的广告语往往具有诗歌的某些特点: 立意新颖、语言精练、音调铿锵、形象生动。广告语的翻译往往要作较大的变通,以广告语来译广告语,切忌死译。上海手表厂钻石牌手表的广告语为"出手不凡钻石表",可译为 Buy a Diamond brand watch, if every second counts for you. 后半句直意为"假如每一秒钟对您都十分重要的话",而言外之意有二: 1. 此表很准(一秒也不差); 2. 买者目光准(褒扬买者的鉴别能力)。Come to where the flavour is, Marlboro Country. 光临风韵之境——万宝路世界。(把商标名称嵌入广告词)又如: Coke refreshes you like no other *can*. 没有别的东西会像可乐那样使您振奋。没有别的饮料能像可乐那样令您清新。(利用 can 的歧义: 作名词意为"罐头",或作助动词)

人名翻译　translation of foreigners' names

人名翻译一般遵循以下原则: 1. 名从主人: 必须遵照原来的读音,英、美国家人名按英、美的读音来译、俄、日、德、法等国文字的人名按各语言的发音来译; 2. 汉语以普通话发音为标准,同名同译,同音同译: 如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美国风云人物 Lee A.

Iaccocca 常译为“艾柯卡”，但根据辛华编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kə]与[kəu]均定译为“科”，而不是“柯”，所以以“艾科卡”为好，尽管“科”与“柯”是同音的；3. 约定俗成：许多通行已久的译名虽与上述原则不符，但已为世人所公认，一般不轻易改动。但有时可指出正规的译名，使新旧译名同时并存，以逐步过渡到采用新的译名。如“孔子”译为 Confucius，“孙中山”译为 Sun Yat-sen 等。参见“音译”“约定俗成”

文档翻译　translation of official documents

指对目的语国家法律上有效文档(legally valid instruments)的翻译。下列任何一种材料的翻译都属文档翻译：1. 有记载的文档：出身、结婚、学业情况、死亡、遗嘱、违法行为或其他法律或行政文件(如销售协议、病历等)；2. 档案：信件、报告、空白证书、填好的证书、合法的证书、译本、官方译本、官方的有效译本；3. 各种正在生效的证件。

文档翻译经常考虑许多规范和严格规定的形式，包括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和使用习惯，它不是一项可以严加区别的活动，它与一般口译、法律翻译(legal translation)和法院翻译(court translation)在概念上和实践上都有交叉。(Asensio 2003：1～3)参见“法律翻译”

联合国文献翻译　translation of UN documents

联合国组织的秘书处设有翻译机构。联合国秘书处会议事务部下设翻译司。在联合国专门机构、独立组织及其驻日内瓦、维也纳办事处，由会议事务司或行政司下设语文翻译处。语文处设六种语文翻译科、翻译协调办公室和术语资料股。联合国组织制定了联合国组织翻译工作法，并对翻译工作中的文体及术语有专门的规定。根据联合国组织翻译工作法的要求，委托翻译的文件都须附有文件处请求(request)、文件工作号(job number)和委托部门名称。需数人完成的大部头文件，参与者须研究文件处指令和翻译要求。根据联合国组织颁发的编辑、翻译和文体手册与术语简报，决定采用的拼音、分写、连字号、缩写、略语、标题译法、音译、行话处理等。两名以上翻译人员同译一本文件时，要事先商定，采用一致的术语、语体和编排体例。此外，工作法还对译文的审校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在术语的国际化和标准化方面，联合国组织在 1985 年 2 月颁发了《常用的术语简报和词汇书目》(*Terminology Bulletins and Glossaries Currently in Use*)。《书目》提供了联合国总部、驻日内瓦办事处及其专门机构于 1970～1984 年期间发布的代表性术语文献。《书目》刊载的 135 部文献中，收入了政治、经济、外交、法律、金融、贸易、军事、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常用术语，并编入了国际会议用语、国际机构的名称、职务以及行政和财务用语。在翻译文体方面，联合国组织规定采用一种规范化应用文体。联合国文献的翻译文体要能反映它所代表的多种文化与多种语言，使各国读者都能明白易懂。翻译文体要符合公文化、国际化、规范化等方面的要求，能适用于阿、中、英、法、俄、西六种联合国正式语言，应用于联合国组织的文件和出版物。

(赵家进)

术语翻译　translation of terms

常用译法有四种。1. 意译：horse power→马力；computer→计算机；2. 音译：OPEC→欧佩克；watt→瓦特；3. 半音半意译：logic→逻辑；kilovolt→千伏；4. 音译加说明词：jeep→吉普车，neon→霓虹灯。

除了以上四种主要译法外，还有多种译法。如形译(像译)：T-square→丁字尺，I-steel→工字钢，V-belt→三角皮带。按外文字母译：X-ray→X 射线，α-particle→α 粒子，A-star→A 形星。造新字：entropy→熵，oxygen→氧，hydroxy→羟[基]。采用简称：Celsius thermometer→摄氏温度计，Vickers hardness→维氏硬度，Hertzsprung-Russell diagram→赫罗图。此外，从翻译史看，还有采用日本语中的汉字构成术语的，如“客观”“物质”“元素”“固体”“细胞”等。

我国大陆以意译为主，音译为辅；而港台地区多为音译。因此，同一事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称呼：

	大陆译名	港台地区译名
laser	激光	莱塞
space shuttle	航天飞机	太空梭(“梭”音意结合)
vitamin	维生素	维他命
minicomputer	微型计算机	迷你计算机

哲学术语翻译　translation of philosophical terms

陈兆福在其《哲学术语译名讨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哲学术语翻译的几个口诀：1. “一而多，须不乱。”例如，汉语翻译 humanism 一词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可达一词三义，以“人”字打头，井然有序，意思相连。2. “留疑窦，危害大。”他以 rationalism 为例，认为其译为“理性主义、理性论、唯理论、唯理派及纯理性主义”会造成混乱，主张词义的单一性，尽量减少或取消一词多译。3. “慎取形，少借音。”在音形义三者中间，陈兆福主张直接取义，克服音译和形译的弊端。4. “两步走，先正误。”所谓两步走就是理解和表达。理解要注重各派思想、历史演变和概念系统的建立，在准确理解的基础上采用普遍的概念性词语进行翻译，但也不排除吸取我国传统哲学术语，以表达丰富的哲学内涵。　(赖余，王宏印)

公示语翻译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公示语亦称“标示语”“标识语”“标志语”“揭示语”，是公开和面对公众，告示、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与其工作、生活、生产、生命、生态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图形信息。公示语翻译服务海外旅游者、驻华

外籍人士等,涉及食、宿、行、游、娱、购等行为与需求的文字信息内容。signs 是最接近“公示语”所蕴涵意义的英语词汇。国际标准化组织 145 委员会主席格雷(Gray)给予 signs 定义为:“Signs are anything from the simplest wayfinding or information ‘marker’ to the technically sophisticated communication of a message. Signing affects everybody — travelers, shoppers, visitors, drivers, etc., whether in the course of business or pleasure. ”(signs 包括了最简单的道路导向或信息“标志”和技术含量高度复杂的信息传播形式。不论是在商业活动中,还是在休闲娱乐中,signs 影响着每个人:旅行者、购物者、来访者和驾驶者等。)

在中国,公示语作为一种规范和术语的推广则因北京举办奥运会,上海筹办世博会,城市和旅游目的地的日益国际化而被政府、行业,以及翻译研究人员所重视。公示语在使用中的功能不同,所展示的信息状态既有“静态”,如:国际出发 International Departure;也有“动态”,如:握好扶手 Hold the Hand Rail(动态)。公示语满足的是旅游者、社会公众的社会、行为和心理需求,为此在实际应用中具有突出的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强制性四种应用示意功能,例如:问询服务 Information(指示性)、请在此付款 Please pay here(提示性)、残疾人通道 Handicapped Only(限制性)、严禁拍照 No Photography(强制性)。

公示语广泛使用名词、动词、动名词、词组、短语、缩略语、超短篇章、文字与图形标志组合、现在时态、祈使句和规范性、标准性语汇,语汇简洁、措辞精确,部分公示语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例如:售票机 Ticket Machines(名词)、请小心台阶 Please Mind the Step(动词)、因故停用 Out of Order(词组)、当心扒手 Beware of Pickpockets(祈使句和规范性)、送客止步 Passengers Only(简洁精确)、厕所 Toilet(英)/Restroom(美)(本土特征)、爆炸物发现者 您的警惕可以拯救无数生命。如果您发现可疑包裹,切勿触动。警示他人,迅速撤离。Bomb Detectors Your awareness can save lives. If you see any suspicious package or bag, do not touch. Warn others. Move away.(超短篇章)

世界各国都以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的形式推广规范公示语及图形信息。为此,规约性是公示语翻译最突出的特点,是跨文化精准信息传播。功能对等,情境相同,对象一致,目标明确,转换对应是全球化语境中公示语翻译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吕和发)

地名翻译 transl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是国家领土主权的象征,是日常生活的向导,是社会交往的媒介。翻译地名一般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1. 政治性原则:地名的翻译可能涉及国家主权、政治立场。例如,不能把钓鱼岛称为“尖阁群岛”,把肯尼亚称为“怯尼亚”,把莫桑比克称为“莫三鼻给”等;2. 名从主人:翻译地名必须遵照原来的读音。英美地名按英美的读音来译。俄、德、法等文字的地名按各语言的发音来译。如“巴黎”按法语 Paris 读音译,而不是按英语读法译成“帕里斯”。即使同一个词,发音不同应有不同的译法,例如,Verde 作为河名,在阿根廷的音译为“贝尔德”,在巴西的音译为“韦尔迪”。也有同一地名因读法差异而致使译法不同;3. 约定俗成:地名的社会性要求它有相对的稳定性。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按照英译(Vienna),按德文则是“维恩”(Wien)。印度城市“孟买”按本国读音译,而不是按英语 Bombay 音译。

地名罗马化 Romanization for world geographical names

为了方便世界各国人民使用地名,联合国地名标准化组织决定采用多数国家使用的罗马(即拉丁)字母作为拼写地名的统一形式。凡以罗马字母为通用文字的国家,其地名应以官方规定的拼写形式为准;不使用罗马字母文字的国家,其地名则应采用官方规定的或国际通用的罗马字母转写法转写,以此达到世界地名的单一罗马化。

企业翻译 translation in enterprises

指在企业范围之内发生的,或为企业服务的,或为企业所利用的,将一种语言信息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信息的活动,是促成操不同语言的人们相互沟通了解或合作共事的有声语言或有形语言移植再现的媒介。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企业翻译是科技文化交流和外语应用相互交叉实践的产物。以覆盖面为视角分析,企业翻译几乎囊括科技翻译领域和各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方方面面,而且横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它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和功效性。企业翻译直接为企业单位带来精神财富,产生出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企业翻译在将来很长时间内,仍然要处于开放的前沿阵地,担负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尖兵。由于企业翻译的广泛性特点,已形成了有着明确目的性的企业翻译活动的一条龙特点。(据刘先刚 1992a,1992b)参见“企业翻译学”

字幕翻译 subtitling

亦称“配字幕”,1929 年首次使用,翻译电影、电视等大众音像交际类型时使用的两种主要的语言转换方式之一(另一种方式为 dubbing,即配音)。可以将它界定为替电影、电视对话(以及后来的歌剧)提供同步字幕的过程。字幕可以是语际间的,也可以是语内的。字幕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转换类型,即原声口语浓缩后的书面译文。哈提姆(Hatim)和梅森(Mason)总结出了字幕翻译中的四点制约:1. 从话语到字幕的转换过程中,话语的一些特征,如非标准的口音、用于强调的语调和风格的转换、话语权的交替等不能够在字幕中表现出来。2. 由于屏幕的空间

有限，译出来的字幕只能在屏幕上保留二至七秒的时间。如果对话的速度非常快，那就加剧了阅读的难度。3. 由于第二点的原因造成了原文本的缩减，有些信息会丢失，不断变更的字幕也不允许读者到前边去重获信息。4. 字幕所提供的语言信息要与视觉形象协调一致。这四点制约给字幕译者造成了许多困难。口译和笔译中语篇方式没有变化，不存在口语和书面语间的转换，而字幕翻译则经历从口语到书面语（确切地说是文字）的转换。所以字幕翻译中的原文本是影视作品中的话语，当然也包括屏幕中出现的有必要向译文读者解释的文字。字幕译文是将话语译成书面语，这个过程本身就会丢失信息，再加上时间、空间等方面的制约，就更难保证原文信息完整地传递到译文中（Hatim, Mason 2000：430～431）。这些制约进一步解释了字幕翻译的难度。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字幕翻译在影视作品跨文化交际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字幕翻译的特殊性，在其翻译中，可从翻译目的和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能力和阅读期待出发，采取各种适当的翻译策略，不但要使译文通顺流畅，而且要容易为目的语观众理解与接受，不能局限于对原文的绝对忠实。 （黄勤）

声乐翻译 vocal music translation

包括歌曲翻译和歌剧翻译。歌曲翻译不同于歌词翻译，后者一般不顾配曲和歌唱的需要，只要理解和把握原歌词的立意、形象、语言、结构等就可以完成。而歌曲翻译必须体现译词和音乐的统一性。必须立足于“可诵、可唱、可听”。（薛范 2002：3）声乐翻译者在宏观上要研究时代、民族和音乐流派的特点，微观上要了解原作者的思想特点、艺术特点和风格特点。译前要仔细分析歌剧或歌曲的结构、体裁、段式。声乐翻译的主要特点在于“能唱”，译者要在“能唱”上下工夫。1. 处理好每个词的重音、音乐重音和节奏之间的关系。译配时，译者必须明白唱段的节奏，每小节的重音和小节中的符点与长音节等音乐重音，全乐句和全乐段的音乐重音，这样才能选择多少字数和用什么格式的汉语语义群。如三拍节奏，每小节三个音符，汉语就必须是三个字的语义群，而且重音落在第一个字上。2. 译文的重音格式要符合原文的重音格式。同时，配歌词不能产生歧义和误解，避免“破句”。3. 译配的每个字的声调要符合音乐走向，避免“倒字”现象，否则可能造成语义含混或谬误。例如，“你好”中的“好”字为第三声，如果音乐走向由低到高，“你好”就变成“你嚎”。4. 译文的句读、呼吸和气口要与原文的句读、呼吸和气口完全一致，即原文的句号或逗号在译文的对应位置上出现。原文要呼吸或停顿，译文也必须呼吸或停顿。这往往是保证演员能一口气唱下来的重要因素，但是，有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给演员一个“偷气”的机会。5. 译文在音乐高音区的用字必须是恰当的开口元音。总之，声乐翻译的专业性强、要求高，它的接收性还必须和听众的接收效果及歌唱演员演唱的感受结合起来。（据孙慧双 1999；薛范 2002）

学术翻译 academic translation

指以研究为目的的笔译。可分为两种：交际意义上的学术翻译和语言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翻译。前者是以借鉴翻译内容为目的的学术翻译（可称为借鉴式），后者是把翻译法作为手段、将翻译用于语言对比的学术翻译（可称为对比式）。对比式翻译还包括把翻译资源转化为可以直接应用于目的语研究的学术资源的翻译。

借鉴式学术翻译就是各领域的学术作品的翻译，比如西方哲学著作、语言学著作的汉译等。读者借鉴其中的理论，或作研究，或作参考、咨询之用。对比式学术翻译是用作语言对比研究手段的。吕叔湘（1980：例言）说：“一句中国话，翻译成英语怎么说；一句英语，中国话里怎么表达，这又是一种比较。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翻译作为语言对比研究的一种方法，其首要目的是借助翻译了解不同语言在结构上的差异，这是语言研究者经常采用的办法：通过翻译的手段研究语言，而非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翻译。

两种学术翻译采用的翻译策略不尽相同。交际意义上的学术翻译着重于内容的正确和行文的专业性。语言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翻译要求译者较多地考虑句子结构和字/词面形态，译者的自由度较小。（据周领顺 2008）参见“学术口译”

法律翻译 legal translation

法律文件语言精确、严密，采取各种手段防止误解或歧义；其内容必须字面化、外部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含蓄的表达、深层的蕴涵在法律文件中无施展的余地。在用词方面，法律文件除了专门术语外，还常用一部分古词、旧词。特别是 here, there, where 加介词构成的复合副词，如：hereto, herein, hereunder, hereinabove, thereon, therein, thereof, thereat, therethrough, wherein, whereby, whereof, wherefor 等。古体副词的大量使用提高法律文件的正式程度，也形成了法律文件特有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在句法方面，法律文件长句多，几十字、上百字的长句司空见惯。为了把话说得天衣无缝，不惜运用各种附加语、修饰语、说明语，以致句法成分前后编插、枝杈横生，句子结构膨胀，语法关系复杂，读来不畅。行文中少用代词，宁可重复名词。在篇章结构方面，有的甚至通篇不用逗号表示停顿。但是，为了突出内容要点和逻辑程序，法律文件也采用一定的版面手段，如大小写、变换字体、序列和布局等。美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有所谓的 Plain English Movement，纽约州等几个州还制定 Plain English Law，规定“不得使用一般人们所不懂的衙门用语”。

根据法律文件的特征，翻译上要求用词精当、要言重复、脉络清晰、简洁精练，例如：如在解释上遇有分歧，应以英文本为准。In case of any divergence of interpretation, the English text shall prevail. “解释”的对应词有 construction, exposition, explanation, interpretation 等，但这里是指对法律条文的正式解释，用 interpretation 较精当。下例原文有重复之处，译文照样重复，以示强调。Having examined *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specification*, *drawings and bill of quantities*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above-named works, we, the undersigned, offer to execute and complete such work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specification*, *drawings and bill of quantities*. 我们，即文末签字人，在审核了关于建造上述工程的合同条件、技术要求、图纸和工程量清单后，提出按上述合同条件、技术要求、图纸和工程量清单施工并完成上述工程。

经贸翻译 business translation

分口译和笔译。笔译文本主要是商贸信函、合同和规约，以及各国的经济政策、经济状况及相关文件等。其领域涉及贸易、金融、保险、招商引资与海外投资、技术进出口、对外劳务、国际运输等。商贸信函一般具有格式固定、措辞婉约、选词正式、行文严谨等语体特点，翻译时需再现之。

1. 格式类同

This Contract/Agreement is made and entered into this ________ day of ________, two thousand and ________ by and between ________ Co., at ________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art A) and ________ Co., at ________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arty B). 本合同/协议于 200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由 ________ 公司，地址：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与 ________ 公司，地址：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签订。

以上中英文格式由来已久，约定俗成，翻译时不必创新。

2. 行文严谨，表现确凿：如贵方能将尿素报价降至每吨 1 200 法郎，我方可定购 150 吨至 180 吨。If you can reduce your price of urea to 1 200 French francs per ton, we may be able to place an order of 150～180 metric tons. “吨”在不同的度量衡制度中有不同的解释。我国采用公制，1 公吨＝1 000 公斤。美制有“长吨”“短吨”之分，1 长吨＝1 016公斤，1 短吨＝907.2 公斤。此外，franc 不仅仅表示法国法郎，瑞士、比利时、卢森堡等均以法郎为货币单位。上例中，原文的“法郎”和“吨”应指“法国法郎”和“公吨”，译文相应地用 French franc 和 metric ton。

3. 委婉得体，用词正式：We are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the goods have been dispatched today. 货物业已于今日启运，特此奉告。

有关合同、协议、规约等的翻译，参见“法律翻译”。

商务翻译 business translation

亦称“经贸翻译”。参见“经贸翻译”

政论翻译 translation of expositions

译界通称的政论翻译，从文体角度而言应为议论文的翻译，包括政论文、社科论著、评论及政治性演说等的翻译。政论翻译的特点在于概念抽象、逻辑严密、语言精确、风格质朴和言词规范；不使用方言、俚语或古词废义；笔法平铺直叙，少用修辞格；句法工整，有较多长句；叙述客观，少有感情色彩。就翻译的要求来说，着眼于忠实、通顺，一般不存在再现神韵、形象之类的问题。政论翻译一般要求概念正确、背景清楚、褒贬得当、逻辑严密、文白相当。

例如，在《路易回忆录》中有一段谈及 1917 年 10 月布尔什维克猛攻克里姆林宫时，把古色古香的圣乔治教堂给毁了。列宁得知后，有一段话：A decree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ordered the preservation of all historical monuments which survived the civil war. 苏维埃政府颁布一项法令，命令保护在内战中剩留下来的一切古迹。句中，the Soviet Government 只能译为“苏维埃政府”。有的辞典释义为“苏联政府”，只适用于 1922 年 12 月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宣布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的政府。

又如：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毛泽东选集》）译文一：The development of the objective process is one full of contradictions and struggl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cess of man's knowledge is also one full of contradictions and struggles. 译文二：The development of an objective process i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and struggles, and so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 of human knowledge. 原文中“客观运动”在先，“人的认识运动”在后，用“也是”照应，体现“物质第一，精神第二”。译文一中两者没有主次之分，译文二用 and so 处理，主次清楚，符合原文内在逻辑。

《毛泽东选集》英译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ao Tse-tung's Selected Works*

《毛泽东选集》（简称《毛选》）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它收集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对推动中国社会历史进步、夺取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毛选》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版发行则将其中体现的毛泽东思想有效地传向国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有着类似历史经历的国家进行民主和民族解放斗争具有借鉴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国内最早把毛泽东著作译成英文的是许孟雄。1937 年抗战开始后，他投身于抗日战争，在我党当时的对外宣传小组从事翻译工作。先后把毛泽东的《论

持久战》等几十篇著作译成英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建国后,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量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汇编本,其中最早的是1949年12月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单行本。

《毛选》的英译工作几乎是和《毛选》编辑工作同时展开。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中央宣传部、对外联络部、中央编译局等机构开始组织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外文版的工作。1950年5月,中宣部英译《毛泽东选集》委员会成立,徐永瑛任主任。陆续参加该委员会的委员既有金岳霖、钱锺书、王佐良、郑儒箴等名流学者,也有唐明照、浦寿昌、章汉夫、冀朝鼎等党内干部。前者多承担翻译,后者在工余审稿。翻译工作集中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进行,秘书为邹斯履。1951年7月,英译委员会改名中宣部英译室,至1953年底完成任务后撤销。

1960年春夏间,徐永瑛主持《毛选》第四卷英译,同年秋完成初稿。参加者有程镇球、杨承芳、陈龙、吴景荣、方钜成、于宝榘、郑儒箴、赵一鹤等,为译稿润色的有钱锺书及外国专家莱思(Manya Reiss)、柯弗兰(Frank Coe)等。1961年5月1日,《毛选》第四卷英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至当年11月底,经国际书店对外发行遍及72个国家和地区,此书发行总数14 145册,其中精装6 762册,平装7 383册。十多年后,《毛选》第五卷英文版也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至此,整个《毛选》的英译工作全部完成。

《毛选》的翻译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在不断修订中进行的,这主要是受了《毛选》中文版编辑修订的影响。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的建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着手编辑中文版《毛选》。毛泽东从头到尾亲自主持了毛选的编辑工作。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属于内容方面的。协助毛泽东编《毛选》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从毛泽东与陈伯达、田家英的一些通信中,可以看出《毛选》的英译是与中文版编辑工作同时进行的。《毛选》英译本的完成,凝聚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翻译家的智慧和心血。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积累起的许多宝贵经验,至今对我们的翻译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据巫和雄 2007) (文晔)

旅游翻译　tourism translation

属专业翻译,涉及旅游活动、旅游专业和行业的翻译实践和研究,同时还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跨时空、跨文化、跨心理的交际活动。跟其他类型的翻译相比,旅游翻译在跨文化、跨心理交际特点上表现得更为直接、更为突出、更为典型、更为全面,尤其是旅游翻译中的导译。旅游翻译包括趣味性、实践性、综合性、特殊性、理论性和操作性等六大特性。既具有一般口笔译的共性,又独具特殊口笔译的个性。

旅游翻译活动的范围很广,几乎囊括了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以下根据一般的翻译活动,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翻译进行分类:1. 从翻译的手段来看,旅游翻译分为导译、陪同口译、视译、交传、同传、耳语口译、笔译和机器翻译等。2. 从所涉语言符号来看,旅游翻译分为:(1) 语内翻译:即在同一种语言内部进行翻译,以口译为主,很少有笔译。比如,将广东话翻成普通话;(2) 语际翻译:即旅游方面的中外口笔互译;(3) 符际翻译:即用非语言符号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例如,欧美游客不懂 sweet osmanthus(桂花),导游通过图片、幻灯、影片或实地参观将 sweet osmanthus 展现给他们。又如,导游用语言教外国游客一些本地人常用的手势语等;3. 从源语和目的语角度来看,旅游翻译分为外语译为本族语和本族语译为(一种以上)外语(如双语翻译)等两大类;4. 从翻译的题材来看,旅游翻译属于专业性翻译,但同时包含一般性翻译(如旅游应用文、社交、日常生活等翻译)和文学翻译(如山水诗歌、楹联、散文等翻译)的性质和特点。(陈刚 2006: 59～61)

旅游翻译的取向　orientation of tourism translation

因旅游活动的复杂性及服务对象的多样性,旅游翻译可有不同的取向,主要有:1. 以源语或源语文化为取向;2. 以目的语或目的语文化为取向;3. 以作者为取向;4. 以旅游者为取向;5. 以美学为取向;6. 以社会符号学为取向。(据陈刚 2006)

导译　guide-interpreting

"导游翻译"的简称。从一般意义上说,导译是与来自海外不同文化背景的有思想、有目的、有动机的、说本族语的人进行面对面、情对情、正式或非正式、目的性明确、并且当场见效的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情感的国际(民间)交流和人际交流。其过程特点鲜明,结果直接直观。"导(游翻)译"是一门艺术,一门专业和专项技能。导游与口译密不可分。导中有译,译中有导。由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教育等因素,导游翻译这个名称的内涵需要用国际上通行的10种表达法才能共同涵盖:1. 联络口译;2. 陪同口译;3. 社区口译;4. 交替/接续口译;5. 视译;6. 同声传译;7. 耳语口译;8. 医务口译;9. 法庭口译;10. 商务口译。(据陈刚 2006)参见"导游口译"

科技翻译　sci-tech translation

科技翻译除一般要求正确、通顺之外,还要得体——得科技文体不同层次的体。科技语体泛指一切论及科学技术的书面语和口语,语域的层次多、范围广。根据韩礼德(Halliday)划分语域的语境三要素——语场、语旨和语式,可将科技书面语划分为两个类别六个层次,详见下表:

文体	层次	正式程度	语场(题材或使用范围)	语旨(参与交际者)	语式(语言形式)
专用科技文体	A	最高	基础理论科学论著、报告	科学家之间、同专业科技人员之间	语言成分主要为人工符号,或用自然语言表示句法关系
	B	很高	科技论著、法律文本(包括专利文件、技术标准、技术合同等)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律师之间	以自然语言为主,辅以人工符号
	C	较高	一般科学技术论文、报告、著作	同一领域的专家之间	以自然语言为主,辅以人工符号,含较多专业术语,句法严密
通俗科技文体	D	中等	物质生产领域的操作规程、维修手册、安全条例等	生产部门的技术人员、职员、工人之间	自然语言,含部分专业术语,句法不太严密
	E	偏低	消费领域的产品说明书、使用手册、促销材料等	生产部门与消费者之间	自然语言,有少量术语,句法灵活
	F	低	科普读物、中小学教材	专家与外行之间	自然语言,避免术语,多用修辞格

科技英语的两个类别六个层次

专用科技文体的一般特点是逻辑严密、叙述客观、用词精确;结构上多用长句、名词化短语、被动语态,少用人称代词、描述性形容词;避免言词的感情色彩和浮华不实。翻译上要求概念确切、条理清晰、符合程式或技术规范。

而通俗科技文体,无论是科普文章或是技术文本都有较强的劝导性(persuasiveness),即劝导读者干什么或不干什么,怎么干;劝导读者相信什么(观点、事实、原理)或不相信什么。所以通俗科技文体常以简明的语言、生动的方式把信息传递给受众,其造句特点是用词平易、句式简单、多用修辞格,少用名词化结构、长句和被动语态。总之,在翻译时要注意文体的适切性,在用词、句式、行文风格上要适合不同层式科技文体,例如: This kind of material has been made of great value. 原译:这种材料已被搞成具有很大价值了。"搞"是个日常用词,词义范围很宽,不适合用于科技文体,为明确概念,宜改为"这种材料经过加工已有很大价值了"。(据方梦之 2004)

程式化 stylization

指按一定的格式或句型进行翻译,是科技翻译、法律翻译、商务翻译等常用的方法之一。由于世界各国的科学论文、技术标准以及专利说明书、技术合同之类的法律文件的构架趋向于国际化,加上某些文字表述的固定化,产生了翻译的程式化。例如,专利说明书的权项部分,开头语一般有:

I (We) claim:

What is claimed is:

What I (we) claim is:

Claims:

以上语句形式虽有不同,但作用和意义相同,一般译成:"请求权项""专利权要求范围""本专利的权项范围是"等句式。而不是刻板地按字面译为"我(们)宣告""所需要的是""我(们)申请的是"等。有时,在上述基本句型的基础上,英文添加承上启下的词语,但仍可如上译出,不必画蛇添足,如:

Having thus described the invention, we claim: ...

The claims defining the invention are as follows: ...

What I claim as my invention and desire to secure by Letters Patent is: ...

This AGREEMENT is made in ________, China this ________ day of ________ 2000, by and between *ABC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arty A)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 ________ and *XYZ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arty B)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 ________.

本协议于 2000 年×月×日在中国________省________市签订。签约一方为 ABC 公司(以下简称 A 方),地址:________________另一方为 XYZ 公司(以下简称 B 方),地址:________________。

商标翻译 trademark translation

市场营销专家认为,品名与商标的设计主要是一种促销艺术。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品名或商标翻译不得不考虑市场心理。计算机产品的品名或商标应散发出高技术的气息,化妆品商标要使用户反馈出无限浪漫的遐想,而服装公司的产品名称要透出一股高雅的时代风尚。一个品名或商标本身是否有重大意义并非紧要,关键在于要有一种心领神会而难以言传的意境。在译法上常有音译、意译、音意结合三律,但又以音意结合为上乘。如 CocaCola 译为"可口可乐",有口皆碑;Boeing 译为"波音"也令人神往;而 transformer 译为"变形金刚",把少年儿童求新、求趣、求变、逞强的心态紧紧抓住,这一译名形象新奇,

刚柔相济,极大地起到了促销作用。

新闻翻译 journalistic translation

新闻文体包括时事报道、社会新闻、社论、特写、书评、广告等多种类型,但常以新闻报道(news story, news report)为研究重点。新闻报道简洁明晰,语意清新,用词生动,表达客观。为了引人注目,耐人寻味,新闻报道也使用谚语、成语和典故以及比喻等修辞手段。有的词语经常反复出现,成为"行话"。例如 ban (prohibition), boost (rise, increase), freeze (stabilization), move (plan, decision), voice (to express), shock (astonishment, blow)。一般说来,新闻体词汇比较简短,既醒目,又省篇幅。此外,为了报道需要,也为了新奇,经常使用新词。

新闻翻译的一般要求是:语意显豁、朴质平易、求新求异、符合习惯,例如:可以鼓励台湾地区首先跟我们搞"三通"。They can encourage Taiwan Province first to have "*three links*" with us: *link of trade, travel and post*. 译语中,把"三通"的内容明白地显示出来。又如:A free kick by Uruguayan star forward Paz in the 20th minute forced Colombia to take the offensive and Sarmiento headed home an equaliser in the 40th minute. 比赛进行到第20分钟,乌拉圭队明星、前锋帕斯在罚任意球时破门入网,迫使哥伦比亚队采取攻势。第40分钟时,萨米恩托顶球入门,扳成平局。译句中,用了报道足球比赛的一些常用词语。

信息翻译 information translation

也是一种较为常用的翻译方法,其特征在于再现非文学著作的全部信息,有时适当改写原文,使其更符合逻辑,有时对原作的某些内容以综述的方式处理,但并不采取意译的形式。

转译 indirect translation

重译的一种,指以一种外语(媒介语)的译本为原本,将之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古今中外,转译都很普遍。例如,我国最早的汉译佛经所用的术语就多半不是直接由梵文翻译过来的,而是间接地经过一个媒介——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天竺文字或西域文字;英国译者诺思(North)是根据阿米欧(Amyot)的法译本翻译普鲁塔克(Plutarch)的希腊语作品的;匈牙利、塞尔维亚和卢森堡的译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通过德译本转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人们读到的英国诗人杨格(Young)的《夜思》的译本,是通过法国翻译家勒图诺尔(Letourneur)的法译本转译的;在日本,自明治至大正初年,也大多通过英文转译法国和俄国的文学作品。在大多数情况下,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尤其是翻译非通用语种国家的作品,因为任何国家也不可能拥有一批通晓各种非通用语种的译者。通过媒介语转译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会产生"二度变形"。叶君健曾提供了好几个因转译而产生变形的例子。他把安徒生童话的丹麦文原作与英译本进行了对照,把但丁(Dante)《神曲》片断的意大利原文与英、中译文进行对照,指出其中的巨大差异。

复译 retranslation

按照现代译论的观点,复译即重译。鲁迅在《非有复译不可》中说:"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转引自罗新璋 1984: 298)也有人认为,"复译"专指已有译本之后,又有不同译者译出的译本。鲁迅认为复译要"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译本。"参见"重译"

重译 retranslation

有三种不同的意思。1. 亦称"复译",通常指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以后出版者为"重译"。2. 译者自己对旧译在较大程度上的润色修订,如罗玉君对自己的旧译《红与黑》修订重排后附注:"一九五三·十,重译,上海。"3. 指非直接译自原著语言的翻译,即以第三国语言(特别是英语)为中介的翻译。鲁迅在《花边文学·论重译》一文中说过:"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呵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但也有人认为应把重译与复译区分开来:重译专指译者本人对旧译的修正润色,"觉今是而昨非",所以要重译;而复译专指已有译本之后,不同译者复出的译本。(转引自林煌天 1997: 93~94)参见"复译""转译"

语内翻译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1959年雅各布森(Jakobson)从符号学的观点出发,把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语内翻译是在同一种语言内部的翻译,也就是把一种语言符号译成同一语言中的其他符号。如古汉语译为现代汉语,广东话译为普通话,或唐诗译为现代诗,把英语诗歌译为英语散文等。又如,为非专业读者简化技术性文本、为儿童读者改编名著或用现代英语重写乔叟(Chaucer)的作品,这些过程都可归类为语内翻译。语内翻译在同一语言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或在其不同的变体之间进行,一般具有一致的内容和语言文化基础。参见"语际翻译""符际翻译"

语际翻译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1959年雅各布森(Jakobson)从符号学的观点出发,把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语际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把本族语译为外族语或把外族语译为本族语。翻译理论主要研究语际翻译,语际翻译的难易程度主要取决于语言差

异和文化差异。参见“语内翻译”“符际翻译”

语用翻译　pragmatic translation

1. 卡塞格兰德(Casagrande)(1954)对翻译的四种分类之一。在这种翻译中,主要目的是“尽可能有效地、准确地翻译信息”,关注的重点是“信息的内容本身,而非信息的美学形式、语法形式或文化语境”(Casagrande 1954: 335)。这种语用翻译也就是应用翻译包括科技翻译、新闻翻译、法律翻译、商务翻译等所要求的。2. 语用翻译也可以说是一种翻译观。这种翻译观亦是一种等效翻译观(何自然,1996),它更多地探讨口头语言、修辞性和艺术性语言的翻译,解决翻译中的理解与重构、语用和文化因素以及原作的语用意义(pragmatic force)的传达及其在译作中的得失等问题。参见“应用翻译”

绝对翻译　absolute translation

古阿德克(Gouadec)认为,绝对翻译是专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用的七种类型之一。绝对翻译要求译文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和原作一致,原文的语言结构和术语都必须在译文中毫无变动地加以保留,以求译文的信息量和交际值与原文一致。绝对翻译为直译。(Shuttleworth, Cowie 1997)参见“直译”

笔译　written translation

与口译相对应,指笔头翻译,是促成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书面交际的一种言语活动。活动媒介是人的视觉能感受到的文字符号。与口译不同的是,笔译的交际对象可以是明确的,也可能是不明确的。一般说来,应用性文体,包括商务、法律、科技等,读者对象是比较明确的,而文学文体的读者对象是相对模糊的。翻译理论的讨论以笔译为多、为主。

符际翻译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1959 年雅各布森(Jakobson)从符号学的观点出发,把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符际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非语言的符号系统,即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翻译,如把文字语言翻译成手势语,即用非文字符号来解释文字符号。他还用音乐、舞蹈、戏剧或绘画等手段来重新解读语言艺术为例来说明符际翻译的过程。参见“语内翻译”“语际翻译”

综合翻译　composite translation

由英国翻译理论家萨沃里(Savory)提出的翻译类型之一,指从散文体到散文体,从诗体到诗体的文学翻译,主要包括古典作品的高质量的翻译。这类翻译的难度最大,形式同内容一样重要,甚至比内容更重要,因此往往采用逐词对译。从事此类翻译的多为博学之才。服务对象也是严肃的读者。他们的求知欲远远超出了对精彩故事情节的追求。按照萨沃里的观点,从事“综合翻译”,需要译者展现高尚的情操,因为在翻译中他必须投入大量的心血和时间,是译文的金钱效益所不能比拟的。译者所期望得到的回报是翻译活动本身能带给他的精神上的享受和愉快。因此,每当这样的译者读到优美的原文作品,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冲动,急于想用自己的笔把它表达出来,以便别人能分享自己的快感(Savory 1957/1968,21～22)。

(黄勤)

隐喻式翻译　metaphorical translation

指极力追求原文与译文完全对等的翻译,通常被看做一切翻译的最高理想。理想的隐喻将事物完全等同起来:这个就是那个,他是只狮子,她是朵玫瑰。隐喻式翻译将两个文本等同起来,译文就是原文,两者完全相同。(Robinson 1991,133～193)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调控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蒂莫奇科(Tymoczko)发现,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视为隐喻的过程,即一种语言的字词、语言结构、文化标记、文学形式等为另一种语言中相应成分所替代。这样看待翻译,就使得人们只把翻译视为一种机械劳动,只进行字词的选择,造成译者的地位一直很低。蒂莫奇科认为,翻译除隐喻的一面外,还有换喻的一面,即翻译有其联系/创造功能和部分性(partiality)。翻译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与译者所处的时代、目的语社会的意识形态、翻译目的等多重因素相关。(Tymoczko 1999)

象征性翻译　symbolic translation

指为了显示文化和政治身份而不以交际为目的的翻译。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体现着民族的感情和尊严。以欧盟为例,翻译的交际功能经常屈从于象征功能,这对于小语种来说尤为如此。有时,翻译的目的仅仅是使操小语种的代表在国际组织中感受本国语言的尊严和地位,并为欧盟的语言平等政策提供证据。象征性翻译在外交场合表现得最为明显,有时也出现在文学翻译中。比如,19、20 世纪之交,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已经能熟练地阅读西班牙语作品,这时却掀起了一个翻译西班牙语的高潮,原因是:1. 塞万提斯(Cervantes Saavedra)在其作品中讴歌了加泰罗尼亚(Catalonian),赞美了加泰罗尼亚语,翻译塞万提斯的作品,就等于提升加泰罗尼亚民族的自豪感,因而出现了塞万提斯翻译热;2. 相对于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的地位这时明显上升了,翻译西班牙语实际上就是确立加泰罗尼亚民族的身份;3. 19 世纪,曾有一批加泰罗尼亚作家迫不得已用西班牙语创作,但其作品深处不乏加泰罗尼亚民族精神,将这些作品回译成加泰罗尼亚语,可以振奋加泰罗尼亚民族的士气,也更有利于表达这些作家对西班牙“大民族”的立场。加泰罗尼亚出现的这个西班牙文学翻译热属非交际翻译,发挥的也主要是象征功能。

(贺显斌)

9. 口 译

口译 oral interpretation

与笔译相对,是促成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口头交际的一种有声言语活动。活动媒介是人的听觉器官能感受到的有声音的语言——口语。口语的特点是转瞬即逝,不像笔译下来的书面语,可以通过视觉感受到并长时间继续存在。口译的交际对象明确,交际各方通过"说话",交流思想感情,达到相互理解。李越然把"准确、通顺、及时"作为质量标准。"准确""通顺"与笔译无异,"及时"是指译者反应迅速,表达及时。

口译的类别 classification of interpretation

口译按传送方式,可分为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交替传译(consecutive interpreting)、耳语传译(whispered interpreting)等;按场合和内容,可分为外交口译(diplomatic interpretation)、技术口译(sci-tech interpretation)、学术口译(academic interpretation)、工程谈判口译(interpretation in project negotiation)、会议口译(conference interpreting)、陪同口译(escort interpreting)、法庭口译(court interpreting)、媒体口译(media interpreting)、商务口译(business interpreting)、社区口译(community interpreting),等等。

工程谈判口译 interpretation in project negotiation

工程谈判整个过程分五个阶段: 1. 发标或招标(call for bid, issue of bid specification); 2. 投标(tender, proposal); 3. 评标(assessment); 4. 开谈(contract negotiation); 5. 成交(signing of the contract)。内容上包括商务谈判和技术谈判两大部分。体现工程谈判过程的,是每次会议的会谈纪要或备忘录(minutes of meeting or memorandum),体现谈判结果的是一份合同。大多数工程谈判规定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或合同语言,但对手未必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例如,日、法、德等国的出口商占相当比例。他们口音各异,表达方式也有差别,有的善于辞令,有的外松内紧,有的含蓄圆滑。对此,译员要有深刻的领悟力,明白无误地译出深层的意思,将双方的本意拧到一起,从而有助于谈判的进展。

在工程谈判的口译中,译员的作用至少有三: 1. 沟通谈判双方意图; 2. 协调谈判气氛; 3. 做好自己一方主谈的参谋。之前,译员要熟悉标书,了解招标、投标、评标的过程,掌握谈判结构和进程,并在专业上、语言上作必要的准备: 要把握设备或材料的主要性能指标、技术与经济的评价与比较、工程进度安排等重大问题,熟谙各种保护性条款(protective clauses),掌握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熟记专题中反复出现的术语,而不必花很多时间去熟悉专业人员熟悉的技术细节。

手势语翻译 signed language interpreting

指在口头语和聋哑人的体现语之间进行的翻译。手势语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现已成为全球聋哑人的母语。

电话口译 over-the-phone interpreting(OPI); telephone interpreting; telephone interpretation

指译员通过电话这种媒介提供口译服务,帮助有语言障碍的各方实现顺利交际。电话口译一般采取三方通话形式,在美国的电话口译中,通话三方常被默认为: 1. 客户,包括政府部门以及需要电话口译服务的机构、公司和个人; 2. 英语能力有限者,即 LEP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人士需要译员协助者; 3. 电话口译员。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电话口译开始在美国兴起,而且迄今一直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蕴藏着极大的市场潜力。客户群主要有: 保险业(Insurance),如保险销售和理赔;医疗保健业(Healthcare),如医院、诊所;金融服务业(Financial Services),如信用卡公司、银行等;政府部门(Government),如移民局、社会福利局等;警察执法部门/911 应急呼叫中心(Police &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911);法庭系统(Court Systems);电讯(Telecom),包括电话、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公众服务部门(Utilities),如水、电、煤气供应部门等。

美国电话口译公司(LLS)提供英语与各种外语间的互译,语种多达 175 种。LLS 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外语是西班牙语,其他排名前十的外语依次为: 汉语普通话;汉语广东话;越南语;日语;俄语;韩语;法语;葡萄牙语和阿拉伯语等。除了这些主要语言外,LLS 也提供包括依地语、非洲土语和印第安部落语在内的小语种服务。

电话口译的工作流程一般有以下三种: 1. LEP 人士致电客户,客户将他置于会议等候状态,然后拨打电话口译公司的免费电话,连接到译员后再加入 LEP 人士进行三方通话; 2. 客户先给电话口译公司打电话,接通译员后再致电给需要联系的 LEP 人士。北美地区的客户还可能要求译员直接给同在北美地区的 LEP 人士打电话; 3. LEP 人士与客户同处一室,交流出现障碍,此时客户拨打电话口译公司电话接通译员后,客户和 LEP 人士使用双听筒电话进行三方通话;如果电话是单听筒的,客户和 LEP 人士可以互相传递话筒或者将电话置于免提状态来进行三方通话。

随着网络和通讯技术的革新,电话口译这种高效便捷的形式很可能代表未来联络口译(liaison interpreting)发展的一种趋势。LLS 不断向海外推广其经营模式,将呼叫中心转移到国外,以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优势,降低成本。它的服务业务目前已经拓

展到了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而为了方便客户到美国境外出差和旅游，LLS最近和美国电讯巨头之一VERIZON公司合作推出了预付翻译电话卡，此卡可以在包括美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例如美国商人到日本出差，他可以直接利用这种翻译电话卡接通在美国的日语译员为他翻译，而不需要在当地找译员。这项业务的发展很可能对当地的电话口译以及面对面口译（face-to-face interpreting）市场带来冲击。电话口译除了在美国流行之外，在欧洲也有市场，我国2008年7月29日上海《新闻晨报》也有《沪电话口译服务悄然兴起、收费不低》的报道。（据肖晓燕，张梅 2009）

外交口译　diplomatic interpretation

指以外交为核心的对外事务范围内的口译。外交口译具有高度的严肃性，对外交际通常代表国家利益，不是个人行为，往往涉及国家有关政策。一般说来，外交口译所用的语言比较正式，其风格介于书面语和口语之间，是一种措辞准确平易，语法简明严谨的口头用语，有别于一般口语。例如：1. 今天晚上，我有机会在这里设宴款待来自斯里兰卡的尊敬客人，感到十分高兴。译文一：I'm very happy to have the chance to give a banquet to our distinguished Sri Lankan guests. 译文二：It gives one great pleasure this evening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hosting this banquet for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from Sri Lanka. 2.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没有改变。译文一：We have not changed our view on this issue. 译文二：On this issue, our position remains unchanged. 以上译文一均为一般口语，相对来说比较随意。译文二就显得更为恰当，更符合正式外交场合的要求。语言学认为：语言表达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语境，即交际环境，包括谈话的主题。口译灵活度的走向是：主题越严肃，语言越正式，灵活度越低。外交口译的主题严肃度高，因而灵活度较低。此外，外交的策略性决定了这类交际的敏感性，在表述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走向以及一个国家对某一国际事件的态度和立场等敏感内容时，遣词造句是极其谨慎的。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误解甚至导致冲突。有时外交语言也要求婉转含蓄，具有一定的伸缩性，以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并有回旋余地。所以，口译必须正确地传达原信息的全部含义并严格把握表达的分寸，词的选择和搭配、句子的架构要体现原信息携带的意义的程度。（任小平 2000）

耳语传译　whispered interpreting

指译员坐在客户身边，现场为其翻译他人的话语。这种翻译往往是同声形式，广泛运用于商务会谈、记者招待会或当庭审判。

同声传译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I)

亦称"同步口译""同步传译"，简称"同传"，是指译员在不打断讲话者发言的情况下、在讲话者发言的同时不停地将其讲话内容传译给听众的一种口译方式。同声传译是通过传译设备来完成的。译员坐在特制的口译箱内，通过耳机接听发言人的讲话内容，随时通过麦克风把源语发言人的讲话内容用目的语传达给听众，听众则用耳机选择所需要的语言频道，接受口译服务。这种翻译和发言人的讲话几乎同时进行，一般先后只相差半句到一句话。它的最大优点是节约时间。同声翻译已有近6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正式采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讯欧洲战犯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当时采用英、法、德、俄四种语言，如果一道道翻译过来，就得多费三倍的时间。同声传译在我国也有50多年的历史了。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就使用过，使用的语种有中、英、法、西、俄五种。

同传工作是对人的心理、生理和自身能力的最大挑战，耳、脑、口并用，精神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同传译员一般没有条件去借助表情、手势等辅助手段，声音是唯一的承载工具，通过适当的抑、扬、顿、挫使译文清楚易懂、悦耳动听。参见"同声传译教学"

交替传译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CI)

亦称"连续传译"或"即席口译"，简称"连传"或"交传"，是一种在发言人讲完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后再由译员进行翻译的口译方式。这种口译方式在很多场合下采用，如演讲、祝词、授课、谈判、情况介绍会、会议发言、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宴会致词、采访谈话、参观访问等。连续传译还可细分为有译稿、有原稿但无译稿以及无稿发言的三种传译形式。第一种传译只要求译员能清楚地宣读译稿，第二种要求他能够眼观原稿作口译，第三种则要求他听完一段发言后能够记住，并迅速地把它口译出来。译员一般在发言者讲述一段话后，将发言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如果发言时间较长，发言与翻译则交替进行。和同声传译相比，交替传译可能较为准确、完整，但是交替传译占时过多，特别是在需要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情况下，所费的时间就更多。目前在采用多种工作语言的国际会议上，交替传译几乎为同声传译所取代。参见"交替传译教学"

会议口译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分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和交替传译（consecutive interpreting）两种，前者占用的时间较后者少，现在国际会议多用同声传译。在同一时间内，同传语种可多达6种(联合国会议)，甚至11种(欧共体会议)。同传的时间一般不超过源语发言者。即使是交替传译，也要求译员在源语发言者讲话告一段落后迅即反应。因此，要求会议译员不仅对语义要具有分析和综合的能力，而且要求快而准的分析综合后的翻译能力。会议口译的困难之一是往往要接触多学科、多

专业,包括人文的、科学技术的、政治的,论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五花八门。困难之二是往往要面对不同的委托人,包括私人公司、政府机构、政治党派、科学社团、行政部门等,因此会议形式各异,听者有别,语境经常更换。(据 Jones 2002)参见“同声传译”“交替传译”

导游翻译 tourism interpretation

参见“导游口译”

导游口译 tourism interpretation

指以外国人为对象,介绍我国旅游资源,包括我国的名胜古迹、园林建筑、历史文物、风土人情,并向他们宣传各地的土特产品、美酒佳肴和民族文艺的翻译活动。译者除了要具有较高的中外文水平外,还要对我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有充分了解。译者在翻译时要尊重对方风俗习惯,使用礼仪用语和委婉语,避免忌讳语。对于文物古迹,一般采用解释性翻译,如:路左有一块巨石,石上有苏东坡手书“云外流春”四个大字。To its left is another rock formely engraved with four big Chinese characters Yun Wai Liu Chun (*Beyond clouds flows spring*) written by Su Dongpo (*1037 ~ 1101*), *the most versatile poe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 ~ 1127*). 在介绍我国土特产或特有事物时,尽可能用通俗易懂的词语,避免艰涩难懂或可能引起不愉快联想的词语,如“银耳”(亦称“白木耳”“雪耳”),对应词有 tremella, fungus tremella 和 white fungus 等,但以 silver mushroom(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更贴近生活。导游翻译切忌望文生义,如苏州“寒山寺”,并不建在山上,不能逐字译义 Cold Mountain Temple,译为 Han Shan Temple 即可。杭州“虎跑泉”也不是 Tiger Running Spring,此处“跑”(páo)作“走兽用脚刨地”解,“虎跑泉”宜译为 Tiger-clawed Spring(在杭州一般译为 Tiger Spring)。参见“导游翻译”

导译员 (tour) guide-interpreter

亦称“导游翻译”“导游口译”“翻译导游”“外语导游”等,源于中国同业(国外也有此名称,即 guide-interpreter 或 tour guide-interpreter)。他们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语)导游资格证书和导游证,受旅行社委派,按照接待计划,从事陪同海外旅游团(者)参观、游览并提供其他服务等事务的工作人员。导游翻译主要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仅中国,其他国家也有导游翻译以及自己的组织,如日本、前苏联、法国、美国等。(陈刚 2006)

技术口译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技术口译涉及范围包括展览会、新产品发布会、施工现场、参观及一般技术交流等。技术口译要求译员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临场经验,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技术现场口译的工作条件较差、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内容变化大、准确性要求高(特别是涉及现场施工和安装)。要求口译前作好充分的专业准备(熟悉专业知识、掌握专业词汇等),了解源出者和源语内容(如外宾简历、话题的内容提要等)以及我方的有关政策和目的,等等。

与生活口译不同,技术口译常用比较正式的语体。除了句首用称呼语或连接词语以外,中间少有插入语。由于交际内容的专业性,常用一些专业术语和行话(见下例中的斜体部分)。技术口语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科技语体书面语的规范严谨的风格。汉译则用相应语体进行翻译。例如:

Well, next, I'd like to say that during 1980, Siemens controlled a complete *wind* by means of a *microcomputer* as a supplement to normal *close-looped control* and *monitoring system*. This computer continuously calculated *the reference values* for *hoisting distance*, *speed* and *acceleration*, with the appropriate *feedback* of the position of the *conveyance* in the *shaft*. 接下来我想要说的是,在 1980 年间,西门子公司已对整个提升过程实现了微机控制,以加强常规闭环控制和监测系统。这种计算机能不断算出提升高度、提升速度和加速度的参比值,并及时反馈提升容器在井筒中的位置。参见“工程谈判口译”

连续翻译 continual interpretation

参见“交替传译”

法庭口译 court interpreting; forensic interpreting

亦称“法律(legal)口译”“庭审(judiciary)口译”或“法院口译”。涉及法庭、执法机构、监狱及其他司法机关。法庭口译的目的是克服诉讼当事人和庭审人员之间的语言障碍,帮助执法机构向证人和犯罪嫌疑人提问题,沟通律师与委托人,为辩护人和诉讼当事人庭审过程作翻译,为法院翻译证人的证言等。在大多数国家,一条普遍认可的法律原则是:不操该国法院语言的任何刑事被告有权聘请一名口译人员。(对于非刑事案例,该项权力未被广泛认可。)口译人员与不能操诉讼语言的当事人被视为有相同的语言地位。

法庭口译受伦理准则约束,要求译员保守秘密、公正无私,传译准确、忠实。法律界有一个共同期望,就是传译过程应“以一种透明的方式机械地进行”,不允许传译员提供“解释”——即:“试图通过他们的理解来传达讲者的意思和意图,以此来进行解码”(Morris 1995: 26)——因此,传译员运用的任何酌情权或判断力都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侵犯(Shlesinger 1991: 147)。然而,此种情形与以下情况却构成了冲突,即:“传译的结果几乎总是在法律上被当作原话语的有效对等形式”(Morris 1995: 29),而且记录在案的并不是原话语,而是传译过来的话语。这样一来,法庭传译员常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他们一方

面需要尽可能照字面直译话语信息(甚至包括照直传递诸如说话犹豫之类的韵律特征),而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知道,客户与法庭之间存在着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如果坚持上述直译的做法,就很可能会导致一方或另一方的意思被严重地误解。

法院翻译的历史一般认为早于历史记载,它与人类的法律实践几乎有同样悠久的历史。早在16世纪,在美洲的西班牙语殖民统治区,法律已规定可采用法院翻译。与其他专业翻译一样,法院翻译涉及众多的学科,包括法律、翻译理论、语言学、跨文化交流、人类学等。(Mikkelson 2000)

学术口译 academic interpretation

学术口译的场合包括学术报告会、讲座、学术讨论、论文答辩等,形式有同声传译、交替传译、耳语口译和远程口译、视译等多种。其特点是现场气氛严肃、专业性强、时间性强。参加学术活动的双方都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学术口译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较高层次的专业语言转换,需限时完成,也是一项要求较高、强度较大的智力活动。学术口译特别要做好译前准备。曾担任李约瑟学术报告口译的刘祖慰,通读过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科技史素有研究,但在临译前,还是"把《中国科学技术史》已出各卷的主要内容、古书名称的英译法,又临阵磨枪地复习了一遍。"学术口译,专业知识甚至比语言知识更重要,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内行,又缺乏充分准备,肯定是译不好的。如李约瑟在他的演讲中提到不少中国古籍和科学史学者,李约瑟虽精通汉文,但四声不分,不熟悉相关专业的人简直无法翻译。再如,对于学科前沿的内容,译员没有一点专门知识也是不能胜任的。(据刘祖慰 1986)

远程口译 remote interpreting

指电话翻译和可视会议翻译,是译者即时参与的异地或异国口译。考虑到旅行成本贵、请合格的稀有语种翻译难,或考虑节约时间及安全因素,而采用的一种权宜之计。一般认为,口译是为说话者双方面对面服务的,译者需要获得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信息源,但是电话翻译不但使译者失去可视信息(原本可从观察谈话者的肢体语言而获得),而且使译者难以作源语和目的语交替转换的现场控制。(Mikkelson 2000: 80)

陪同口译 escort interpretation

按照国际分类,陪同口译属于口译中的三大类型之一(其他两种为会议口译和商务口译)。它通常指为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人用两种不同语言进行的非正式交谈所做的口译,是一种非正式的交替口译形式。在陪同口译期间,译员陪同个人或团体旅游/行、访问、购物、看病、参会、会晤等。亦称为联络口译或导游口译。担任这一角色的译员叫"陪同(口)译员"或"导译员"。参见"导游口译" (陈刚)

口译译前准备 preparations for interpreting

按我国现行的国家标准(GB)《翻译服务规范 第2部分:口译》规定"译员要认真查阅相关资料、熟悉词汇、了解口译对象和双方相关人员,以及熟悉工作现场或设施情况,做好必要的物资准备,携带必备的证件和有关资料,按要求着装,提前到达工作现场。"(GB/T19363.2-2006)

口译质量的标准 standard of interpreting quality

塞莱丝科维奇(Seleskovitch)(1992)认为,口译是一种解释性的翻译,它的标准是"达意、通顺"。李越然(1999)认为,口译标准可以概括为"准确、通顺、及时",简而言之就是"准、顺、快":"准"即准确,忠实于源语的思想内容及特定情境下的感情;"顺"即通顺,目的语应符合中外语言的各自规范,并与发言人的语体风格基本保持一致;"快"即表达及时,而不是任意加快语速,口译绝不是越快越好,作为要求应该是在"准"和"顺"的基础上做到及时表达,避免出现结结巴巴、慢腾腾的现象。鲍刚(2005: 267)认为,口译标准可以概括为"全面、准确、通畅","全面"指源语所谓"纯"信息领域中内容要点的全面,以及重要的源语意象和源语内涵意义的全面;"准确"主要指的是关键内涵意义的准确,以及重要的术语、数字等代码转换的准确,而非所有语汇层次上的"准确";"通畅"主要指目的语的通达、流畅性,以及译员其他相关的目的语表达技术的完善,保证双语交际的良好效果。

综合以上各家的观点,口译的质量标准可以总结为:"准、整、顺、快"。"准"指目的语准确,忠实于原文内容;另外,"准"还指口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形式,由于交际双方在文化习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同,口译应注意文化的得体性;"整"指传译中信息传达的完整度,根据口译场合的不同,传达了源语信息的70%以上、80%以上、还是90%以上;"顺"指的是目的语的通顺和流畅,目的语表达层次分明、逻辑清晰、确切到位,遣词造句妥帖,发音清楚,听众容易听明白;"快"指译员能做到即时传译,能让异语双方的信息传递和交流顺畅地进行下去而不延误。

口述录音翻译 dictaphone translation

亦称"听打",指译员将源语按规定格式口译为目的语,录在专门的口述录音机磁带里,尔后由打字员用专门的录音机播放磁带,根据耳机里听到的口述译文按规定格式打出目的语初稿,经笔译员修改、审校员审阅后交打字员打成正稿。由于这种翻译方法大大优于传统的手写方法,在联合国六种正式语言中,欧洲语言笔译口录翻译最普遍,中文口录翻译近年来也普遍使用。

口译笔记　note-taking

口译笔记的目的在于补记忆之不足。它不是会议记录，也不同于速记。它是辅助记忆的手段，是在听讲过程中用简单文字或符号记下讲话内容中能刺激记忆的关键字符。所记内容犹如里程碑，只须在重要的转折处留下痕迹，把关键词记下来，以与大脑短时记忆相映衬。发话人中固然不乏出口成章者，但也有口才欠佳者。不管何等人士，译员得一概按逻辑要求分清主次、廓清层次，用不同符号，如大写字母、横线、竖线、圆圈、方框等帮助区分重点，并注意留出空白，以备补充。笔记的方法因人而异，但也有共同之处。为了尽量减少符号的数量，同一符号往往可以用来代表一个动词的不同时态以及与其相应的名词。例如，可用字母P来代表"我提议"(I propose)、"他提议"(he proposed)、"我们将提议"(we shall propose)、"提案"(proposal)、"建议案"(propositions)等意思。但究竟代表其中的哪个意思，往往可以根据上下文回忆起来。如怕不保险，也可以在符号后面加一两个字母注明。例如，"建议案"可写成pions。同一个符号不仅能代表词根相同的若干单词，而且可以代表意思相近的同义词。例如，代表"propose"的符号，也可以用来表示"suggest"(建议)、"offer"(提出)、"request"(要求)等。为使口译流畅，记笔记时就应把翻译的问题解决了，而不是等笔记记完之后对照笔记进行口译。

基本符号　organic symbols; basic symbols

交替口译作速记时必用的符号，是许多其他符号的发出点，由此可以生成一组或一批符号。掌握一批基本符号并在翻译实践中加以运用，可以减轻口译者的记忆负担，开发译者的脑力资源，帮助译者做好口译工作。如以箭头为例，不同方向和不同形态的箭头可表示不同的意思。

←	return, come back, reverse, regress
↗	rise, increase, grow, climb
↘	fall, decline, slide, slip, drop, shrink
⇔	exchange, relations
→	lead to, consequence of, therefore
⊂	continue
⊃	...

由以上符号加上其他文字或符号，意义可进一步拓展：

country's↗	=a country's development
↗duties	=an increase in duties
↗science	=scientific progress
↗living st^ard	=an improvement i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underline{\nearrow}$	rise sharply, jump, soar etc.
$\underline{\underline{\nearrow}}$	rise dramatically, leap, skyrocket, etc.
↗ (dotted)	faltering rise, etc.

(Gillies 2005：106～107)

口译模式　interpreting process model

指口译过程的研究模式，分为描写性和解释性两种。描写性模式着重口译过程各操作环节、各处理阶段以及思维因循路线的描写。此类模式的代表有杰弗(Gerver)与莫泽(Moser)的"理解-重新表达"模式、麦肯托什(Mackintosh)的"组织-凝聚-产生"模式、法国释意派的"理解-脱离源语形式-重新表达"模式等。解释性模式注重口译过程中译员注意力的分配及分配导致的结果，分析译员如何以相关知识对翻译主题进行预测、推理。希里埃夫(Shiryaev)和切尔诺夫(Chernov)的"预测推断-精力调动"模式，吉尔(Gile)的"译员注意力分配"模式均属于此。口译模式虽各有不同，但对口译过程的基本思想颇为一致：口译不是从源语到译语的译码，口译是在接受源语后经过信息概念转化以译语表达源语的意思。(蔡小红 2001)

参见"释意派理论""吉尔模式"

吉尔模式　Daniel Gile's model

著名的口译研究学者、法国巴黎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高等翻译学院教授吉尔(Gile)在其著作*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一书中针对口译的工作方式提出了"同声传译的口译模式"(1)及"连续传译的口译模式"(2)：

(1) SI=L+M+P+C

即：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听力与分析(listening and analysis)+短期记忆(short-term memory effort)+言语传达(speech production)+协调(coordination)

(2) Phase Ⅰ：CI=L+N+M+C

Phase Ⅱ：CI=Rem+Read+P

即：连续传译(第一阶段)=听力与分析(listening and analysis)+笔记(note-taking)+短期记忆(short-term memory)+协调(coordination)

连续传译(第二阶段)=记忆(remembering)+读笔记(note-reading)+传达(production)

吉尔模式原为同声传译而建立，后发展到连续传译(交替传译)：分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聆听、分析笔记、记忆和协调注意力，覆盖了理解分析及部分概念转换；第二阶段包括记忆、读笔记和目的语产出，覆盖了过程的概念转换及原语传达。

在上述模式中，吉尔阐述的实际上是同声传译与连续传译的口译过程。吉尔强调在口译过程中理解的重要性，并专门提出了口译的理解模式：(Gile 1995a：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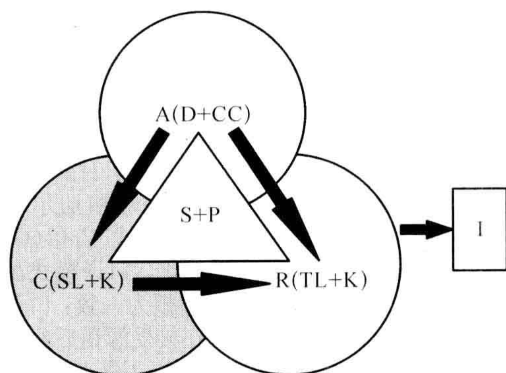
C=KL+ELK+A

即：理解(comprehension)=语言知识(knowledge for the language)言外知识(extra-linguistic knowledge)+分析(analysis)。(仲伟合 2001a)

厦大模式　Xiamen University model for interpreter training

由厦门大学林郁如及英国西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的洛纳根(Lonergan)带领的"中英英语项目合作小组"根据吉尔(Gile)模式提出的适合口译训练的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C=comprehension（理解）；R=reconstruction（表达）；S = skill（技能）；P = professionalism（职业化）；A=analysis（分析）；D=discourse（语篇）；CC=cross-cultural awareness（跨文化意识）；K=extra-linguistic knowledge（非语言知识）；TL = target language（目的语）；SL = source language（源语）；I=interpreting（口译）。

三个圆圈分别代替口译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置于三个圆圈中央的三角形说明技能(S)和职业化(P)在整个口译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C至R的箭头指明口译的整个过程，而A至C与A至R的箭头说明分析在理解与表达方面的重要意义。

这是一种非直线型模式。它旨在说明口译包括理解原文(C)和用目的语表达意义(R)两个阶段。这个交际过程只有在分析(A)语篇(D)和特定情景中的文化因素(CC)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口译员对口译技能(S)和口译职业化(P)的掌握。因此这一模式显示了分析源语和目的语同技能和职业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就确定了培训的重心在于S(技能)和P(职业化)。(仲伟合 2001a)

怯场　stage fright

指现场口译员因心理紧张而产生的言词阻塞的现象，因此不能正常发挥其业务水平。主要由于译员缺乏临场翻译经验和心理准备、缺乏自信及双语欠佳等因素造成。

配音　dubbing

指译制影片或电视剧时，用某种语言的录音代替原片或原剧上的录音，它要求影视翻译工作者照顾原影视作品中的口型来琢磨每一句台词的特定译法。虽不强求每一个发音的口型都要完全吻合，但至少要在吐词的节奏、抑、扬、顿、挫上配合得当，其中一半要求演员能一音一节地套，另一半则要求译者巧妙运用译技，充分掌握句型，刻意讲究词位，如电影《飘》(即《乱世佳人》)中的台词：Scarlett：You once said you loved me. If you still love me Rhett ...(郝思嘉：你曾经说过你爱我，如果你还爱我，雷特……)原文及译文基本上对称、吻合，长短相当。(如译者只译出意思，而未能按要求译出脚本，若导演精于此道，也能使配音演员说出和原剧中人物口型、姿态一模一样的语言来的。)

阈限　empan

为释意学派术语，指感知场，口语中等于有声语链的长度，大约几秒钟时间；笔语中等于视觉几乎同时感知的7至8个词。在这一阈限中产生意义单位，不断与其他更广泛的意义融合在一起。阈限感知需要完全掌握一种语言。当语言知识不足以满足通畅的阅读时，读者停留在字词上，阈限感知效应便受到阻碍，于是产生对含义的疑问，导致词语出现多义或含混不清。如果是口语，就会陷入对语言有声链的辨识中，意义则只能出现一部分。(勒代雷 2001：187)

(贺显斌)

10. 语　言

文字　writing system

指记录有声语言的书面符号系统，语言交际的主要辅助手段。它对有声语言来说是第二性的，是一定历史时期在有声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最古老的文字距今不过六七千年，而且至今多数语言尚没有自己的文字，即使在有文字的言语社团里也不是人人都掌握文字。文字是随着语言社会交际功能的发展、为克服有声语言口耳相传、一发即逝的时空限制而产生的。它一经产生，对社会和语言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人类文明通常即以文字为界标，划分人类的史前时期和有史时期。文字对语言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带来了书面语交际形式，使之与口语交际形式并行，而且在与口语交际形式分工的基础上为语体的分化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其次，书面记载使对语言的加工、提炼及其规范的巩固有了可能，从而为标准语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再次，书面记录的稳定形式也有利于语言的统一。文字按其基本单位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一般分成表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三种类型。

大写字母　capital

大写字母除了表示一个句子的开始之外，在书面语中有时具有修辞作用，有时具有辨义的作用，有时因在句中突显而表示强调。这些在译成汉语时必须加以传达。例如：1. WHO is going to gain from it? 这到底对谁有利呢? 2. Two blocks ahead the burning

neon word BEER hung over the sidewalk. 往前两条街，霓虹灯缀成的“啤酒”两个大字熠熠地照耀着人行道。3. I hope you can manage this TIME. 希望你能利用这段时间。I hope you can manage THIS time. 希望你这回能成功。

无标记 unmarkedness

与“有标记”相对，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重要概念。参见“有标记”

有标记 markedness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概念，与“无标记”相对。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科伊(Trubetzkoy)(1939)最早在*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中提出“marked”这一概念，用来对音位进行分类。“标记性是指一个语言范畴内的不对称现象”(孟凡胜，腾延江 2005)。最初，布拉格学派提出的标记性是一分为二的概念，拥有某个特征的音位就是有标记项(marked term)，缺少这个特征的就是无标记项(unmarked term)，没有中间项。随后，雅各布森(Jakobson)将标记理论运用到形态学。类型学发展了布拉格学派的这一概念，将标记概念的一分为二模式变为多分模式，如名词单复数，单数为无标记项，复数为标记项，但是在很多语言中还存在双数、三数的中间项。另外，类型学还建立了范畴之间的标记相关模式，如名词范畴内，个体名词是无标记项，集合名词是标记项；对个体名词而言，单数是无标记项，复数是标记项，而集合名词则刚好相反(侯国金 2005a)。格林伯格(Greenberg)(1966)和克罗夫特(Croft)(1990)提出了判断标记性的几条准则：聚合、组合、频率、分布和语义。从认知角度看，常见常用的、一般的、规则的、处于“默认”状态的事物和表达它们的词语手段是无标记项；相反，罕见罕用的、特殊的、不规则的、意外的事物和相应的表达方式就是标记项(侯国金 2005a)。经过70多年的发展，标记理论已经成为语言学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应用在音系、句法、语义、语用等各个层面。类型学、生成语法、功能语法等都在不同角度和层面上运用了标记理论。

标记理论也可以运用于翻译研究。例如，侯国金(2005a)在奈达功能等效翻译原则基础上，将标记理论用于语用学与翻译研究中，提出了12条“语用标记等效翻译准则”，并讨论了语言和语用各层级的标记价值等效翻译。他在《语用标记理论与应用——翻译评估的新方法》(2005b)中进而讨论了“语用标记价值假说与语用标记等效翻译假说”的运用问题。在翻译中，译文与原文的标记程度应该一样或者近似，如果相差很大则不能算是好的译文。标记理论还可以用来比较不同译文的优劣。 (曾利沙)

目的语 target language

亦称“目标语”“译入语”，与“源语”相对，指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时，作为转换目标的语言，如学生学习的第二语言或外语、翻译得到的译语、电子计算机输出终端得到的机器语言。

目标语 target language

参见“目的语”

字母文字 alphabetic writing system

指由表音字母构成的书写系统，如：罗马(或拉丁)字母，可用以书写许多西方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等，还可用以书写非西方的语言，如斯瓦希里语、印尼语和土耳其语等；阿拉伯字母，可用以书写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和普什图语等；西里尔字母，可用以书写俄语、乌克兰语和保加利亚语等。

汉字 Chinese characters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有四五千年以上的历史。现用汉字是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来的，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在造字原则上从表形、表意到形声。由于汉字是象形、会意、形声三结合的方块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体系，它与西方拼音文字有质的不同，它的信息载荷较大，远非拼音字母可比。视觉符号的图像性使文字作品取得补充的美学功能。汉字独有的拆字、神智、离合、联珠等修辞格，以至于字数严格、对仗工整的律诗，都与其方块字的图像美有密切关系。现行汉字中形声字约占80%以上。一个字表示汉语中的一个音节，但不直接表音，具有超方言的特点，操不同方言的人都可以依靠它来阅读书面文献。现在通行的字体是楷书和行书。收在《中华大字典》中约48 000多个汉字，常用字数约5 000～8 000个。

汉语 Chinese

属汉藏语系汉语族，是汉民族语言，和回族、满族、畲族等少数民族通用语言、新加坡官方语言之一、联合国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之一。汉语方言复杂，包括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方言、闽方言、粤方言七个大方言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现代汉语没有复辅音，除[m]、[n]、[ŋ]、[l]、[z]外，没有浊音声母，音节中元音占优势，元音收尾的音节较多，单元音可以构成一个音节；辅音一般不能单独构成音节；每个音节都有一定的声调，音节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因素组成。构词方法以词根复合为主，也有用附加、重叠、轻声、儿化等方式构成的新词。词汇以单音节和双音节词为主。没有印欧语那样的形态变化，以词序和辅助词为主要语法手段，有丰富的量词和语气词。短语和句子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词的句法组合被包含在句子里时是短语，独立时就是句子。基本语序

是：主语-谓语-宾语。汉语有四五千年的文字书写的历史，文字采用独立的表意文字——汉字。

刘宓庆针对翻译研究对汉语的特征做了研究。他认为就语言结构而言，汉语最深层的独特性是"意念主轴"。参见"意念主轴"

汉语规范化 Chinese normalization

指确立和推行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的工作。具体而言，就是根据汉语的发展规律，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的通用词汇为规范词汇、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的一般用例为语法规范，以国家规定的简化字为现行印刷、书写正体，使汉语和汉字的运用都趋于规范化、标准化，使汉民族共同语朝着更加健康、完善的方向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挥普通话的社会交际效能。1955 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大大推进了汉语规范化的理论和实践。1986 年举行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把现代汉语规范化作为当前语文建设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强调语言信息的标准化对于科技和文化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指出要改变社会上语言文字使用方面的混乱现象，进一步确定规范的读法和用法让人们遵循，以提高全民族的语文素养。

无主句 subject-absent sentence

指汉语中一种找不出主语或不必有主语的句子，如"下雨了。""失火啦！"等。这不是句子主语省略，因为省略句有明确的主语可以补出，无主句则无可补出或无须补出。英语是重主语的语言(subject-prominent language)，造句不可没有主语。汉译英时必须在原句中另择主语或补出主语。如：发现错误，要改正错误。*Wrongs* must be righted when they are discovered. 英译时，原句中的宾语"错误"被调整为主语。又如：弄得不好，就会前功尽弃。If *things* are not properly handled, our labour will be totally lost. 英译时，补出原句中没有的、隐含的主语"things"。

古文 classic writing model; classic Chinese

一般而言，古文指五四以前的文言文。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表述了他对古文的看法。他认为林纾用"古文"翻译的问题需要澄清："'古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术语，自唐以来，尤其明、清两代，有特殊而狭隘的涵义。并非一切文言都算'古文'，同时，在某种条件下，'古文'也不一定跟白话对立。……'古文'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例言》、《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块肉余生述·序》里所谓'义法'；指'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开阖'等等——一句话，叙述和描写的技巧。从这一点说，白话作品完全可能具备'古文家义法'。……那么，在'义法'方面，外国小说原来就符合'古文'，无需林纾来转化它为'古文'。不过'古文'还有一个方面——语言。"(钱锺书 1985)

把"古文"视为一种文体和写作范式，其实就已经暗示了汉语写作与英语写作的差异。也许是为了叙述的方便，钱锺书在这里只是笼统地、不加分别地提了一下，甚至认为"外国小说原来就符合'古文'"，无须在翻译中去有意改变。其实这一看法是不够深刻的，至少不符合更加成熟的文学翻译理论关于中西叙事方式存在明显差异的观点。在语言方面，钱锺书倒是有很中肯的见解。他为"古文"提出种种限定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林纾认为翻译小说和'古文'是截然两回事。'古文'的清规戒律对译书没有任何裁判权威或约束力。"他还进一步说："林纾并没有用'古文'译小说，而且也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他指出："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比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够严密，收容量很宽大。"这些文体归纳起来包括：1. "古文"里绝不容许的文言"隽语"，如"佻巧语"，像"梁上君子""五朵云"等；2. 口语，如"小宝贝""爸爸"等；3. 流行的外来新名词，如"普通""程度"等；4. 译音，如"马丹""密司脱""安琪儿"等；5. "欧化"成分，如"先生密""敝我""如是居独立之国度，近已数年矣"等。(钱锺书 1979)

（王宏印）

四字格 four-character phrase

由四个汉字组成的词组，包括大量成语和自由组合的词组。一般说来，四字格具有短小精悍、含义深刻、形象生动、音调和谐等特点，在汉译中适当运用，能使译文文字洗练、通顺流畅、语意鲜明、富有美感。例如：1. Meteors are not just *pleasing* nocturnal pyrotechnics. 流星不只是令人赏心悦目的夜空烟火。2. A nearby object falling into a black hole *is never heard from again*. 附近的天体一旦落入黑洞，就销声匿迹，永无影踪。

当然，滥用四字格将造成华而不实，诚可雕缋满眼，亦能铿锵悦耳，但不是好的译文。例如，The picture, elegantly framed, came *safely* to hand soon after Mr. Elton's return ... (Jane Austen, *Emma*) 画像配了个精美的画框，埃尔顿先生回来后即完璧归赵，还给了爱玛。"完璧归赵"是我国典故，从含义上、风格上与原文不符，这里的 safely 不如直译为"稳妥地"或"平安地"。

外位语 extraposition

在汉语中，独立于句外，同时又和句中某个成分所指相同的成分叫外位结构或外位语。使用外位语的目的在于突出某一事物，以引起别人的注意。外位结构是英语长句汉译的方法之一。例如：How energy and matter behave, how they interact one with the other, and how we control them to serve the people make up the substance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能和物质怎么发生作用，它们怎样彼此起作用，我们怎样控制它

们以服务于人类,这类问题构成物理和化学的内容。(原文主语较长,将此独立于外,再用"这类问题"加以概括。)

英语中也有类似汉语外位结构的表达方法,有时可以套用。例如: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The unification of our country, the unity of our people and the unity of our various nationalities — *these* are the basic guarantees for the sure triumph of our cause.

西式汉语　Western language-coloured Chinese

参见"汉译西化"

欧化　Europeanization

指模仿欧洲的语言文字及句式结构。欧化是20世纪20～30年代以来颇有争议的问题。傅斯年主张"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技,……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转引自陈福康 2000: 227)。较多的人认为欧化要有度。至于什么是欧化的度说法各异,而且都不明确。郑振铎和茅盾认为欧化的度是一般的中国人能懂得。鲁迅也认为:"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但是个人的理解能力本身不是一个固定概念。此度不能作为统一的衡量标准。叶子南把欧化的度解释为一种机动的"可接受性",但他自己也说:"不能笼统地提可接受性,从来就没有一种外来文化中引进的东西会同时被所有的人所接受。它总是先被某一人接受,然后推而广之。"(叶子南 1991: 15)被接受的欧化表达法,往往也会成为"汉语的基本句法结构"。王力就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概括了几条新的语法规则,如复音词的创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句子的延长、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等。(王力 1985: 334)

产生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翻译家和作家是出于改造汉语、输入新的表达法的良好愿望;有的译者斤斤于字比句次,不愿舍弃原文表层结构,或因不谙翻译技巧,摆脱不了原文的束缚;还有一些深受西文濡染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文模式带进汉语。欧化这一概念具有相对性,一个时代、一种场合显得很欧化的语言现象,到另一个时代、另一种场合也许就会完全为汉语所接受。这一概念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一个人、一个集团看来很欧化的语言现象,在另一个人、另一个集团看来也许并不十分欧化。从现代汉语发展史上看,欧化现象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影响。一方面,通过欧化汉语引进了大量词汇,增强了句式弹性,从而提高了语言表达力;另一方面,欧化破坏了汉语的自然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语的纯洁。参见"汉译西化"　　(文晔,杨莉藜)

范畴词　category words

指汉语中常用的概括性名词,如"问题""状态""情况""工作""关系"等,英译时范畴词常可省去不译。例如:1. 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needs to be straightened out. 2. 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In short, taking the country as a whole, I am confident that we can gradually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英译汉时则相反,某些由动词或形容词派生出来的抽象名词,翻译时可能要增添范畴词。例如:After all *preparations* were made, the planes were flown across the U. S. to San Francisco.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飞机就飞越美国去旧金山。

流水句　serial clauses

汉语特有的一种复句,由多个短句铺排而成,读来似行云流水。汉语流水句强调时间顺序,英译时大体可按原句的顺序译成分立单句或并列散句,并适当增加关系词,语义重心一般无须调整。比如,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土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鲁迅《一件小事》)可译成:Presently the wind dropped a little. By now the loose dust had all been blown away, leaving the roadway clean, and . . . (杨宪益,戴乃迭译)

英语长句汉译时,经常采用流水句来化解原文连锁的结构或难译的搭配。例如:I repair to the enchanted house, *where* there are lights, chattering, music, flowers, officers (I am sorry to see) *and* the eldest Miss Larkins, a blaze of beauty. (Charles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 我现在朝着那家仙宫神宇走去,那儿灯火辉煌,人语嘈杂,乐声悠扬,花草缤纷,军官纷来(这是我看着感到难过的),还有拉京士大小姐,真是仪态万千。又如:. . . and see how he has passed the long winter nights and the short stormy days. (W. Irving: *The Westminster Abbey*) 冬夜漫长,冬日苦短而多风雪,这种生活真是够那樵夫忍受的。(夏济安译)句中,long winter nights 和 short stormy days 两个偏正短语分别处理成两个小句。

意念主轴　features of thought in Chinese language

刘宓庆认为,就语言结构而言,汉语最深层的独特性是"意念主轴"。刘宓庆所谓的"主轴"是指语言生成及至定型的一种基本机制。(刘宓庆 2001: 162)他用洪堡特(Humboldt)的话来解释"意念运作"。"洪堡特认为由于汉语将所有语法形式的功能赋予了'意念运作'(the work of mind),也就是思维,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虚词或小品词(a few articles)和语序(position)来联结意义(connect the sense),这就使

汉语不同于其他一切语言;他认为'正是由于汉语语法形式的缺如,使操汉语的民族提高了他们的心智能力,得以倚仗敏锐的心智能力'来补偿形式的缺乏,并完成言语中的形式链接。"(刘宓庆 2001: 166)他还引用葛兆光的解释:因为汉字象形性的长期延续,它的独立性和任意性使它在任何场合,均无须严密的句法即可表现意义,故而句法的规定性、约束性相对比较松散,这就使得古代中国思维世界似乎不那么注意"逻辑""次序"和"规则"。因此,中国译论必须着力建设有汉语参与的、有针对性的、有科学系统的、可操作的意义理论和文本解读理论。除了意念主轴这个基本特征以外,汉语还具有以下由"意念主轴"派生的鲜明的特色:1. 因简单的直接对接(即所谓"意合")而形成的高度简约性使意义浓缩化;2. 具有明显的解释性和描写性;3. 审美感性与语言感性的完善"嵌合"。正是汉语的这些特征,要求建设有与西方翻译理论不同的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刘宓庆 2005b)参见"中国特色翻译理论"

言语　speech

索绪尔(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言语活动区分为语言和言语。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言语则是个人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前者是社会的、主要的,后者是个人的、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二者紧密相连并互为前提:要使言语为人们所理解并产生实际效果,必须有语言;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言语在现时一般指语言的使用:从动态说是一种活动,即人们使用语言进行表达(说、写)和理解(听、读)的行为;从静态说是前者的结果,即人们在表达时产生的言语作品(话语)。言语有两种主要形式:1. 口头形式或口语;2. 书面形式或书面语。有人把沉思默想时的语言使用称作内部言语。语言学界对言语有不同理解:有人把它看做既是言语行为,又是言语作品;有人把它看做只是言语行为或只是言语作品;也有人不赞成划分语言和言语,认为它们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参见"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　speech act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Austin)在他的系列讲座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1962)中,推翻了语言理解的中心是逻辑-语义的真值条件这个观点,创立了言语行为理论。该理论认为,话题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要真正理解话语,只靠句子结构分析和逻辑主义分析,只求确定句子的真假意义是远远不够的。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划分为三个层次:表述性言语行为(locutionary act)、施为性言语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成事性言语行为(perlocutionary act)。例如A对B说:"Could you pass the salt?"时,A所作的言语行为,并不单纯是希望B了解这几个字的意思,而是请求B把盐瓶子递给他。换句话说,A作出了一个"请求"的施为性言语行为。B一般应该加以领会,把盐瓶子递给A以完成成事性言语行为。翻译时,应该把即使是写在纸上的原文也当成原作者活生生的话语(utterance)。这样,才会充分把当时的一切情境,包括说话人的主观动机(illocutionary intention)及在听话人身上产生的客观效果(perlocutionary effect),加以领会,并且力求把自己的译文也当作是活生生的话语,以求对等地传达原话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否则就会出错。譬如在医学表述时,把小儿科译成pediatrics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原话和译语都不失为表述性言语行为。但是,如果把某甲鄙夷某乙时说的"小儿科!"也这样译,就完全丧失了鄙夷的语气与效果。又如某领导人说:"我们不搞实用主义",一般不能译成"We do not advocate pragmatism",因为原话的施为性言语行为是宣告中国不搞见利忘义的权宜之计,而 pragmatism 在一切西方词典中均有类似"实事求是"的褒义。所以这句话应该译为"We never base our policies on expediency"之类,这样才能照顾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眼下有些译者甚至把原话的表述行为也译错,那当然更不容许。(刘祖慰 1991)

沃尔夫假说　Whorfian hypothesis

亦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该学说认为语言的结构能够决定操该语言者的思维方法,因此,各种不同语言的结构导致说这种语言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去观察世界。该学说最初是18世纪德国学者赫尔德(Herder)和洪堡(Humboldt)提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时期,在美国得到有影响的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者萨丕尔(Sapir)的支持,而到20世纪40年代,又得到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Whorf)的支持。沃尔夫对此假说的系统阐述引起了人们很大兴趣。例如,他在对美洲印第安诸语言的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人们看待时间和严守时刻的方式可能受他们语言中动词时态类型的影响。沃尔夫认为,概念的系统阐述是特定语法的一部分或系受语法的影响而成,并且因语法不同而各异。此假说与其对立面,即文化形成语言说,曾有过许多争议。

英语　English

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日耳曼语支,是现代语言中最具影响的语言之一。英语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一般认为其发展可分成古英语(450～1100)、中古英语(1101～1500)、现代英语(1501～现在)三个历史时期。7世纪起有书面文献。乔叟(Chaucer)的著作标志着英语形成了成熟的文学语言。现代英语有44个音位,其中元音音位20个,辅音音位24个。词汇大多源自拉丁语、古诺尔斯语、法语等,核心词汇源自古英语时期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名词有单复数、通格、所有格之变化。代词分主格、宾格。动词有时、体、态和数的变

化。基本语序是主-谓-宾。按地域分,有许多变体,如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新加坡英语等。文字采用拉丁字母。

汉化英语　Chinese-coloured English

汉化英语可理解为带有中国色彩的英语。凡翻译就不可避免地都要在语言上受原著的影响,打上原著的烙印,总要带异国风味,否则不是好译文。中国作品的合格的英译文,哪怕是经过外国专家润色的,都会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带有中国色彩的"汉化英语",正如所有外国作品的合格的中译文都会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带有外国色彩的中文一样。越来越多的词汇以汉语的思维方式进入英语,为英语读者所接受,如 paper tiger(纸老虎)、one country, two systems(一国两制)、four modernizations(四个现代化)等;在英语中汉语拼音已经常作为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手段,如 wushu, weiqi, erhu 等。汉化英语要与洋泾浜分开,后者消极方面多。

中式英语　Chinglish

指口头或书面表达的不地道的英语。Chinglish 系由 Chinese 和 English 两词掐头去尾拼缀而成。中式英语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英语的规律和习惯。使用者的思维方式、表达方法以及词汇的选择和搭配都是中国式的。它是死译、硬译、字对字翻译的结果。与洋泾浜不同的是,中式英语的使用者是受过一定英语教育的人,常用来应付书面或口头的日常交际。但是从翻译的角度看,中式英语是不规范的,有时晦涩难懂,甚至容易产生误解。外交部外语专家王弄笙著文列举了中式英语的种种表现,主要有:1. 搭配不当:"来信写道"the letter writes,应为 the letter reads;"取得成就"make achievements,动词应为 score 或 attain;"革命接班人"successors to the revolution,应为 revolutionary successors。2. 重复累赘:"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美国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US relations, China needs to know the US better and (the US also needs to know China better). the development of 可省,句末括号内的文字用 vice versa 代替。3. 修饰词过多,画蛇添足:"彻底粉碎"completely smash, smash 的本意为 break completely;"完全征服"completely conquer, conquer 已含 completely 之意;"伟大的历史性转变"a great historic change, historic 已含 great 之意;以上 completely 和 great 均应不译。4. 省略不当:"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It cannot be avoided even if people want to. 句末必须加上 avoid it。5. 拟人有误:"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Innovation is the soul of a nation's progress. soul 是有生命的,innovation 没有,改译为 innovation sustains the progress of a nation。6. 词类未转换:"中国的富强和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The strength,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will pose no threat to any countries. 可改译为 A strong, prosperous and developed China will pose ...

中式英语应予避免,但是在翻译实践中也有一些英译汉化的词语(特别是反映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约定俗成,为英语所接受,成为英语中的外来语,或汉化英语。(王弄笙 2000)参见"汉化英语"

译文语言　translation language

亦称"译语"。参见"目的语"

洋泾浜　pidgin English

指硬扣汉语字眼、套用汉语词序或语法的不伦不类的英语。洋泾浜原是上海的一条河浜,位于从前的英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之间,后被填没,成为今日的延安东路。上海人用"洋泾浜"来形容过去为外国人做事或与之交往的一些没有机会接受正规外语教育的中国人所说的英语。如说:You see right no right(你看对不对),long time no see you(长久没看见你了),five flower eight door(五花八门)。洋泾浜一般指口语,辅以身势语和当时情境,只能作最简单的交际。

广义地说,洋泾浜泛指在语言交流频繁的地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自然语言混杂而成的通俗交际工具。这种语言现象通常发生在当地人与外来的商人、水手进行交往的场合。当地人学讲蹩脚的外语,外来者尽可能简化自己的语言,使之在语法上接近当地语言,结果就形成了一种交际双方勉强能接受的混杂语言。它的特点是:词汇主要取自外语,数量不多;语音夹杂当地语言的语音;语法简化;多形象、直观的表达。

语言　language

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从内部结构的角度看,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但同其他符号系统,如莫尔斯电码、旗语、灯光交通信号等,在信息量和结构、功能的复杂性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别,它们对语言来说是第二性的。作为符号的语言单位具有两个方面:一是表现方面,即语音;一是内容方面,即语义。在语言单位中,音和义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因言语社团而异,如"鱼",汉语叫 yú,英语叫 fish[fɪʃ],俄语叫 рыба['rɪba],日语叫"魚"[sakana]。语言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由各个分支系统或层次组成,如音位层次、词汇层次、语法层次等。语言成分由各种关系加以联结,成分和关系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构成井然有序的系统。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首先是交际的工具,供人们用来传递和交流信息。有些高级动物,如猿猴,也使用区别性的有声信号来传递信息,但这些信号都是不可切分的整体,也不能组合和替换或孳生更多的信息;动物的信号同人类语言是无法比拟的。语言也是思维的工具,供人们用来形成和表达思想。人们也可以用手势和动作等手段来表达一定的思想,但它们只能起辅助的作用,而语言则

是思想最完善、最有效的载体。语言具有社会性,它与社会紧密联系,互相依存;离开社会,就无所谓语言;没有语言,社会也无法存在和发展。语言具有全民性,在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上,语言都是为某一言语社团的全体成员服务的。各个学派的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给语言下定义,如有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句子的集合,有的语言学家则认为语言是受规则控制的行为,等等。其他科学也根据本身的要求来说明语言,如社会学把语言看做社会集团成员间相互作用的标志,文学把它看做文学创作的手段,信息论把它看做一种代码,等等。这些说法有助于理解语言多方面的性能。

人工语言　artificial language

与"自然语言"相对,指为不同目的而设计的辅助语言或代码系统。主要可分两类:一类是供人们使用的语际或国际辅助语,如世界语(Esperanto)、新创语(Novial)、国际辅助语(Interlingua IALA)等;另一类是供电脑使用的代码系统,如 ALGOL(算法语言)、FORTRAN(公式翻译语言)、COBOL(通用商业语言)、BASIC(通用符号指令代码)等。

世界语　Esperanto

一种人造的国际辅助语。至 20 世纪末,已有三百多种世界语言方案问世。但是,最终经受住时间考验保留下来、成为举世公认的唯一最理想的国际语是"世界语(Esperanto)"。它由波兰籍犹太人、眼科医生、语言大师路多维格·拉沙尔·柴门霍甫(Ludovik Lazaro Zamenhof)博士于 1887 年创立,公布时被命名为 Esperanto,意为"希望者"(我国沿用日译"世界语"),即希望这种语言能克服人类交流的语言障碍。世界语又被称作"国际辅助语",辅助语的含义是指使用世界语并不意味着排斥或取代任何民族语,世界语的作用只在于辅助操不同民族语的人们相互进行无障碍交流。所以,世界语的性质是中立的,没有民族性、地域性,只具有国际性。世界语的诞生及成功实践,开启了人类解决世界性语言难题。

作为一种拼音文字,世界语无疑具有发音规范、音调优美、语法简洁、单词易记的特点,并蕴含丰富的表现力,但它更主要的价值还在于发明者赋予该语言内在的人文理念:它是一个创立人工语言的里程碑;人类从来没有放弃对语言完美的追求,希望通过努力创立一种国际普遍适用的语言代码。

元语言　metalanguage

亦称"纯理语言""符号语言",与"对象语言"相对,指描写和分析某种语言所使用的语言符号集合。例如,用汉语来说明英语,英语是对象语言,汉语是元语言;用英语来说明英语,英语既是对象语言又是元语言。在辞书编纂和翻译中,释义的语句称元语言;在语言研究中,为描写和分析语言成分特征而使用的一套符号和术语,如[±Noun]([±名词])、[±Abstract]([±抽象])、[±Animate]([±有生命])等,也属元语言。

元翻译语言　metalanguage of translation

指用来描述和解释翻译理论、概念和现象的技术性语言,是分析翻译和建构理论的工具以及翻译学者使用的行话。"元翻译语言"涉及翻译实践和理论建构中的概念和用法,对有关翻译和翻译学的作用等大的课题提出一系列问题,如其他学科对翻译学的影响、翻译概念的成形、各种元语言的一致性、元话语的实用性、元语言对提高译者地位的贡献,等等。2006 年底出版的一期国际译学杂志 *Target* 就以 The Metalanguage of Translation 为专题。从其征文启事看,"元翻译语言"目前的研究范围至少包括七个方面:1. 翻译学者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有时虽使用相同的术语,却表达不同的意思。比如,研究口译、笔译、媒体或语言的学者都使用 text 一词,心理学家和口译研究者都使用 bilingualism,但意思并不一样。这些区别与所用的话语类型有何关系?翻译学者与上述其他学科的学者交流时是否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2. 学术界在何种程度上需要合适的术语?3. 进行翻译教学或培训时,学者们如何用"清晰的"语言满足学员的期望?将概念标准化能否提高翻译教学的质量?4. 元语言对学者和译者间的双向互动有何影响?进行翻译质量评价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吗?5. 学者与出版商或有经费决策权的官员等交流时该用什么元语言?需要将翻译学概念通俗化吗?隐喻对通俗化有何帮助?6. 在国际交流平台上用英语作通用语对用其他语言构建的元话语有何影响?这个问题如何应对?7. 新的技术和媒体对元翻译语言有什么影响?我国学者提出的"元翻译""翻译研究的元理论""玄翻译学"等概念和理论,与"元翻译语言"密切相关。

(贺显斌)

无声语言　silent language

指在人类社会中,除语言之外用来传递信息的各种"信号",用于非言语交际。包括:1. 人工语言(如密码等);2. 实物代用指号(如旗语、信号弹、鼓点语、口哨语、花卉语等);3. 人体语言,包括:手势、表情、姿态、神态、征兆等。翻译学在这一问题上主要侧重人体语言的文化差异与翻译问题的研究。美国语言学家霍尔(Hall)曾在 *The Silent Language*(《无声的语言》)一书中指出:"对于人类来说,语言是信息传播的载体,是思想交流的媒介,然而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间的交流往往存在着阻碍和误解。这是因为我们除了用有声的语言来表达思想外,还经常无意识地使用无声的语言来交流自己真实的情感。这就使得我们研究、分析、了解、掌握、运用这种无声的语言更成为必要和迫切……"

自然语言 natural language

与“人工语言”相对，指人类特有并充当交际和思维工具的符号系统，如汉语、英语、德语、日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等。

中介语 interlanguage

亦称“过渡语”，由塞林克(Selinker)于1969年在其论文*Language Transfer*中提出。1972年，塞林克发表题为*Interlanguage*的论文，将其定义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这种语言系统在结构上处于母语与目的语的中间状态。这个定义说明了中介语既可以指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的某一特定阶段中认知目标语的方式和结果的特征系统，即一种特定、具体的中介语言语，也可以指反映所有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整个过程中认知发生和发展的特征性系统，即一种普遍、抽象的中介语语言体系(interlanguage 或 the interlanguage continuum)。这个定义还说明了 interlanguage 是第二语言学习者独特的语言系统，这个语言系统在结构上处于本族语与目的语的中间状态，随着学习者学习的发展，逐渐向目的语的正确形式靠拢。

中介语是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者还未掌握所学语言时的语言。中介语中的错误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1. 套用母语的模式；2. 滥用所学语言的模式，例如无限制地类推；3. 用已学会的词汇及语法绕弯子说话。这样他们所用的语言就既与自己的母语不同，也与所学语言不同，所以称为中介语。他们的语言体系，可以认为是近似性体系。在翻译中，一些语言不纯正的译者常有中介语的痕迹。

方言 dialect

指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语言。关于方言在翻译中的应用问题，国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过一些探索。在实践上，有张谷若翻译哈代小说时山东方言的尝试使用，在理论上则有傅雷关于方言的认同矛盾和表现力的论述。王宏印提出一个结合创作划分方言层次和经过改造而控制使用方言进行翻译的方案，其要点包括：1. 绝对方言，创作慎用，翻译禁用。所谓“绝对方言”是指只有当地人可以听懂且会说的那一部分自然语言，不一定具有文学表现力，也不具备全民的交流功能。2. 相对方言，创作可用，翻译慎用。这一部分方言包括人们普遍可以听懂且能够辨识是何地的方言，但因为地方性太强而容易引起认同的混乱，所以在翻译中要慎用。3. 标准方言，创作常用，翻译可用。指的是人们普遍可以说出、听懂但不属于普通话的标准口语。因为标准方言既有一定的表现力和民族性，又可以广泛流传和为人们所接受，所以适合作为文学翻译语言的一部分加以应用。关于方言的翻译使用原则还可以补充几条：1. 一般说来，尽量采用口语而不采用书面语翻译文学作品中的对话。2. 采用方言的某些表现法，但不一定直接采用现成的词句，而是加以改造、保留甚或增强其表现力。3. 采用有别于标准普通话的说法，但不应直接将其接受为某一地区的方言，即扩大方言的接受面，淡化地方性特征。 (王宏印)

文学翻译的语言 languag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属文体学中的文学语，具有文学语言的普遍特质。傅雷关于翻译的文学语言的论述具有代表性，其论点散见在他关于翻译的论文和书信中。他首先论及东西方不同语言和思维习惯之间的差异问题，认为：“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此两种 mentalité 殊难彼此融洽交流。”(转引自罗新璋 1984：694)“其次是民族的 mentalité 相差太远。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是综合的、诗的。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转引自罗新璋 1984：547)傅雷密切关注语言的差异和特点，他说：“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风俗传统信仰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转引自罗新璋 1984：558～559)

傅雷在区分源语和目的语的基础上，论述了法译汉时对于汉语的要求，分析了汉语的历史和当时的状况，提出了比较具体而全面的观点。他说：“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文言在这一点上就比白话占便宜。周作人说过：‘倘用骈散错杂的文言译出，成绩可比较有把握：译文既顺眼，原文意义亦不距离过远。’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文言有它的规律，有它的体制，任何人不能胡来，词汇也丰富。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则，二无体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结果就要乱搅。同时我们不能拿任何一种方言作为白话文的骨干。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凡是南北语言中的特点统统要拿掉，所剩的仅仅是些轮廓，只能达意，不能传情。故生动、灵秀、隽永等等，一概谈不上。”(转引自罗新璋 1984：546～547)

进一步的讨论涉及普通话、方言、文学语言的关系。原文是这样的：“方言中最 colloquial 的成分是方言的生命与灵魂，用在译文中，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煞，把外国人变成了中国人岂不笑话！不用吧，那末(至少是对话)译文变得生气全无，一味的‘新文艺腔’。创作文字犯这个毛病，有时也是因为作者顾到读者，过于纯粹的方言要妨碍读者了解，于是文章就变成‘普通话’，而这普通话其实是一种人工的，artificial 之极的话。换言之，普通话者，乃是以北方话做底子，而把它 colloquial 的成分全部去掉的话。你想这种语言有什么文艺价值？不幸我们写的正是这一种语言。我觉得译文风格的搅不好，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语言是‘假’语言。”(转引自罗新璋 1984：

547)

那么,文学语言从何而来呢?从傅雷关于语言的综合描述中,可以得出一个尝试性的答案:普通话+方言=规范而又有表现力的文学语言。具体而言可以包含:1. 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2. 朗朗上口,音节和谐;3. 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4. 词汇丰富,句法、行文符合吾国习惯;5. 生动,灵秀,隽永;6. 既达意,又传情。傅雷的翻译理论和致思方式,落实到语言层面也有系统的一面。首先,他在概念上用了一个统一的外国语文和一组分离的汉语词汇——文言、白话、普通话——来描述中文。然后,在价值上,他认为外文高于或优于中文,文言高于或优于白话,白话高于或优于普通话。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从形上到形下的"为道日损"的递减过程。至于傅雷理想的文学语言范型,则可以从他的整个表述中抽取出来一个公式:文言+方言-新文艺腔=文学语言。(王宏印 2003c)参见"文学语"

本族语　native language

亦称"母语""第一语言",指人在幼儿时期通过模仿双亲或某一语言社团成员通过模仿周围成人说话而掌握的语言。

外国语　foreign language

与"本族语"相对,外国语即外国的语言,简称外语。外语通常不是儿童时期受人影响学会,而是通过语言教学来掌握。

子语言　sublanguage

机器翻译语境中采用的术语,指"专业技术领域使用或为了专业目的而使用的语言",其特点是"高频率使用专业术语,同时,它通常有一套有限的语法模式"(Arnold *et al* 1994: 216)。天气预报、医学报告、商务信函都可以认为是这种语言的例子。在机器翻译系统中设计专用的子语言,并以数据形式输入。其主要好处之一是,它需要的参数数量将大大减少,因而输出质量显著提高。其二是机器翻译中的子语言的使用与受控语言不同,它不要求使用者简化源文本,而是只要求利用所译文本类型中自然发生的语言受到限制(Arnold *et al* 1994: 159)。参见"受控语言"

受控语言　controlled language (CL)

亦称为"受限语言",指的是在词汇、句法和文体等方面受到某种程度人为限制的自然语言的子语言。受控语言通常属于某个专门的技术领域,如航空、电子、机械制造等。受控语言主要用于技术文献,如技术指南和维修手册等。受控语言通常有一个术语库和一系列的句法规则。一般来说,术语库中的每个词仅代表一个概念,并且每个词仅有一种词性。布罗克曼(Brockmann)(1977)认为:"依据其定义,受控语言具有句法和术语前后一致性特点。"受控语言的尝试至少可追溯到17世纪。奥格登(Ogden)1930年创造的"英美科技与国际商务英语(British American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English,简称为Basic English)"只有850个词汇,词义单一,句法规则大大简化。受此启发,美国的Caterpillar重型机械公司于70年代推出了本公司的核心英语Caterpillar Fundamental English;该公司一半的产品销往非英语国家,用简化英语撰写说明书,就不需要再翻译成各种客户的语言,只要对当地员工进行简短的英语培训就可以了。欧洲航空航天协会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本行业的"简化英语(AECMA Simplified English)",用于飞机操作和维护说明书的撰写。用受控语言撰写的材料重复频繁,缺乏多样性,容易理解和翻译。受控语言越来越多地用于产品说明书的制作,也日益受到机器翻译研究者的青睐。

使用受控语言可以消除技术文献中的歧义成分,其目的主要是:1. 提高文本的可读性(readability),确保文本句法简明清晰,术语和表达方式前后一致;2. 提高文本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简明清晰、没有歧义成分的源语言文本可以提高翻译质量。受控语言虽然缺少自然语言的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但是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表达能力。在国外许多相关的资料和文献中,人们常用受控语言指代受控英语,这可能与受控语言的发展历史和英语在国际上的影响有关。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受控语言包括AECMA Simplified English, Attempto Controlled English, Caterpillar Technical English等。

使用受控语言是突破目前机器翻译研究瓶颈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贝克(Baker)等人(1994)的研究表明,提高机器翻译的准确性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限制源语言文本中词汇的歧义。此外,使用受控语法也有利于提高机器翻译的质量。使用受控语法的主要目的是减少短语和句子层次的歧义现象(Mitamura 1999)。在源语言文本中的各种歧义成分被消除后,机器翻译能够以较高的质量、更快的速度、更低的费用将一种文本译为多种语言,所需的译后审校工作可以大大减少。(据袁亦宁 2003)

优势语言　dominant language

指操双语或多语的人最为熟练的、在说写方面较其他语种更为自如的语言。一个人的优势语言不一定是自己的母语,一些移民学会居住国最通用的语言后,母语表达能力就下降了。有些人在双语或多语社会或跨国婚姻家庭中长大,并长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母语的概念并不完全适用。在口译中,有时甚至在笔译中,译者的优势语言称作"第一语言(L1)",其他工作语言称作"第二语言(L2)"或"第三语言(L3)"。国际翻译界一个公认的做法是由第二或第三语言译入自己的优势语言,笔译尤其如此。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的口笔译人员注定要承担大量的中译外工作,西方目前主要依靠中国译员将中文发言

译成西方语言。由于欧盟不断扩大,原有的口译员中很少有精通新入盟东欧国家语言的,要靠这些国家自己的译员译入主要西方语言,于是,只允许口译员译入母语的做法在许多国际场合行不通了。日本和韩国的译者相当部分工作就是译入外语或非优势语言。参见"强势语言"

身势语 body language; kinesics

亦称"身体语言",指除发音器官动作外,人们在说话时使用身体的动作、姿势以及脸部表情来表情达意的手段的总和。身势语一般起辅助的交际作用,如在说话时用手势表示强调,在高兴时露出笑容,有保留、怀疑或不满时皱起眉头、拉下嘴角或耸耸肩膀等。身势语有时也能独立完成某些交际任务,如:汉族人握手礼,挥手告别,举手表示赞同或愿意回答问题;在许多国家中久别重逢时拥抱,用V形手势——食指和中指形成V形,手心向外——表示胜利,等等。身势语具有民族特点,同一个动作,不同民族表达的意义不一定相同。如汉族人跺脚,表示气愤、灰心或悔恨,而英美人跺脚,表示不耐烦;大多数民族点头表示同意,摇头表示不同意,而保加利亚人、尼泊尔人则相反。

副语言 paralanguage

亦称"伴随语言"。狭义上说,副语言仅指人们说话时伴随语言而产生的一些发音特征和语言现象,包括个人的音域、说话速度和节奏等。这些往往是不自觉的,但也有一定的辅助表达作用。如尖声说话表现出心中焦急,语音不清可能由于感冒或酒醉等。此外,有些不属于语言符号的声音,如人们说话时吃吃地笑、呜呜地哭,这自然的笑声、哭声以及呻吟声、咳嗽声、表示惊诧或恐惧的叫喊声,都是副语言现象。广义上说,副语言包括各种身势语,包括面部表情、头部动作、眼神、手势等。与狭义上的副语言不同的是,这些现象是无声的,但同样能衬托话语的内容,具有强调或别的附加意义,也即具有副语言特征(paralinguistic features)。例如,许多操英语的国家里,点头表示同意,能代替 yes, that's right 或 agreed。如果一边点头,一边说赞同话,则前者起强调作用。参见"身势语"

混合语 mixed language

语言混合的特殊情况,一般发生在双语社会(如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或在操不同语言流动人口与操本族语的当地居民接触频繁的地区。国内知识界及政府官员在内外交流中英汉夹杂,也可看成混合语。例如,1999年4月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美国时,洛杉矶市长赖尔登(Riordan)设午宴款待远道来访的客人。席间,朱总理说了这么一段话:

大使(指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当时给了我一个忠告,就是你在美国的时候,要 always keep a smiling face,但这个对我太难了,香港人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朱铁面,always have a long face。但是在今天宴会上我这个 long face,也愈来愈 shorter and shorter,尽管 far from a smiling face。

使用混合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交际,有时也为了营造一种幽默、轻松或随和的交际氛围。混合语难译,原因是有时有些英语词语没有适当的汉语对应词语;即使有,原有的格调也随之消失。

媒介语 medium language

指在翻译上作为媒介的中间语,分两种:1. 一种自然语言。例如,我国"五四"前后至30~40年代,日语曾经是我国文学翻译中极主要的媒介语。鲁迅、周作人兄弟早在20世纪初编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就通过日语(还有德语)转译了波兰等国的文学作品以及俄国契诃夫(Чехов)、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ев)等人的短篇小说。之后,包括不少大作家、大诗人在内的许多小说、诗歌、剧本,仍有不少是通过日译本转译的,如高尔基(Горький)的剧本《仇敌》、《夜店》,雷马克(Remarque)的长篇小说《战后》,裴多菲(Petöfi Sándor)的诗,等等。但是自20世纪40~50年代起,日语的这种媒介作用就明显地让位于英语与俄语了;2. 一种人工语言,机器翻译处理多种语言互译时的中介语言。机器翻译系统中,每两种语言互译就需要建立两套算法,N种语言就需要N(N-1)套算法。有了媒介语,各种语言只须建立与媒介语对应的算法,能节约大量机器设备和加快翻译速度。

第二语言 second language

按美国习惯,"外语"与"第二语言"同义。按英国习惯,两者有区别:外语是一门功课,不是教学用语,也不在政府部门或工商企业里使用;第二语言虽不是本国语,但被广泛用于教育部门和政府部门,通常除第二语言外,还可能有另一种或几种语言同时使用。

通用网络语言 Universal Networking Language

简称UNL,跨国研究者们正在组建的一个机器翻译系统,总部设在日本东京联合大学。建立UNL的设想可追溯到翻译的中枢语言模式(the pivot language model of translation)。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欧洲所进行的语言项目也使用了此种语言模式。

UNL是一种中介性的概念语言,就像身处网络中心的智能蜘蛛。使用特设软件,自然语言(如印地语、法语、泰国语等)中的语句便会先自动转换为UNL的概念代码,随之又同样自动地转换成恰当的译入语。该系统的设计特色反映了翻译领域的另一融合趋势,那就是原文撰写和翻译过程联成一体的趋向。使用UNL系统,文件或讯息通报的撰写者便会在UNL的导引下,消除歧义和句法、语义难点,从而使他们撰写的文本更适宜自动翻译。换句话说,这种机器翻译系统可提醒原文作者在翻译过程开始之前

就注意到潜在的翻译难题。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作者负责的翻译方法。

UNL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与互联网保持密切联系,它既是一种交流媒介,又是一种技术平台,主要为需要通过互联网共享文献和信息的学术交流而设计。全球范围内的一些国家级研究中心也加入了这一适用于所有语言的人机对话。

在相互作用的网络世界,在线的讯息通报翻译颇有意义。人们一旦从某一网址获取经自动翻译的文件,很自然会产生与作者取得联系、展开对话的愿望。归根结底,网络所提供的广泛联系正是作此用途。在这些情境中,以作者为基础的翻译系统(author-based translation system)是对全靠仪器操作的翻译软件的一种改进。此外,UNL还是一种分布性能较强的翻译系统,它具有将翻译功能深置于网络软件内部的特性。

语言生态　language ecology

指语言间的互补和共生所构成的语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生态语言学将语言、语言使用、语言研究作为当代生态问题的组成部分加以考察,是生态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兴语言学分支,其任务是通过分析研究语言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因素,调查影响语言功能的各种因素,揭示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并对各种语言的活力和生存状况作出评估。语言生态观把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作为基本的理论原则,认为语言不仅具有交际功能,而且具有文化功能;众多的语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是财富,也是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语言生态的平衡发展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语言生态学者关注语种的灭绝与濒危、双语区语言的单极化、局部地区语言(方言)的同化与消亡、母语权受抑制、英语的全球化对语言多样性的挑战等种种语言生态危机,提倡加强母语教育和语言规划,尊重弱势族群的语言权利,维护其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完整性;通过实施双(多)语教育,维护语言平等。　(贺显斌)

语言系统　language system

语言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语言单位(符号)组成的系统。语言系统是复杂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各个单位及其类别、形式和范畴都是复杂的类聚,分别组成不同的分支系统。在语言单位、类别及其组成的分支系统之间,存在着各种联系和关系,整体正是依靠它们联结起来的。整体和组成整体的各个单位、各种联系和关系,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整体的变化会促使各个单位及其关系发生变化,某些单位及其关系的变化也会在整体中得到反映。

翻译是从篇章这一整体着眼的,从词、词组、句子、语段的不同平面着手。等值论者认为,下一级语言单位的等值要服从上一级语言单位等值的需要。例如,词的转换要服从词组的等值转换的需要,词组要服从句子,句子要服从语段,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语言系统内部的整体性及其组成部分的制约与联系,并达到译文与原文在文情、格调、语意、体例上的和谐和确切。

语系　language family

历史比较语言学用语。语言学把具有共同来源的亲属语言归成同一个语系,每个语系包含由不复存在的同一始源语繁衍出来的一些语言。同一语系的各个成员,在最古老的、表示基本概念的词和基本语法结构方面都有对应关系。世界主要的语系有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闪-含语系、阿尔泰语系、高加索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南岛)语系、澳斯特罗-亚细亚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尼日尔-刚果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等等。在一个语系内部,又按关系的亲疏程度分成不同的语族和语支。语族是语系的下位概念,语支又是语族的下位概念。例如,汉藏语系可分成汉语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又可分成藏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和彝语支;印欧语系可分成日耳曼语族、罗曼语族、凯尔特语族、斯拉夫语族、印度-伊朗语族等语族,日耳曼语族又可分成西、北两个语支,罗曼语族又可分成东、西两个语支,斯拉夫语族又可分成东、西、南三个语支。英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

印欧语系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印度-欧罗巴语系的简称,亦称“印度-日耳曼语系”。19世纪对梵语和古典印欧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揭示了印欧语言间的对应关系,表明印欧语言具有共同来源。印欧语系包括大多数欧洲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斯拉夫语、凯尔特语等,也包括一些亚洲语言,如古代的梵语和巴利语,现代的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僧加罗语等。

汉藏语系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根据语言发生学分类法分出的语系之一,主要分布于亚洲东部、中部和东南部,包括汉语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其主要特点是:有声调系统;词序和虚词是主要的语法手段;大多数语言中量词丰富;能自由运用的单音节词根占绝大多数。

黏着语　agglutinating language

语言类型的一种。这类语言的词形变化是通过词缀“黏着”在词根上来实现的。一个词缀只表示一种语法意义,每种语法意义也总是用一个词缀来表示。属于黏着语的有阿尔泰诸语言、乌拉尔诸语言、班图诸语言以及日语、朝鲜语等。不同语言的“黏着”特征在程度上有区别。有时,人们把黏着语和屈折语合称为综合语,与分析语相对。

孤立语　isolating language

亦称“分析语”(analytic language)。有些语言学家把世界上的语言分为三种:孤立语、屈折语和黏着

语。在孤立语中,词没有构形词缀,因而也就没有形态变化。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和词在句中的作用是通过词序和功能词来表示的。一般把汉语、越南语、缅甸语、壮语、苗语等归为孤立语。在不同的语言中,“孤立”特征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在孤立语、屈折语和黏着语之间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界限。比起欧洲其他语言,如俄语、德语和法语,英语具有更多的孤立语性质,但它仍列为屈折语。

屈折语 inflecting language

语言类型的一种。这类语言中词的形式是通过屈折变化(包括内部屈折和外部屈折)来表示的。具体地说:1. 内部屈折,即词中元音或辅音交替,如英语 foot(脚,单数)——feet(脚,复数);lend(借给,原形)——lent(借给,一般过去时和过去分词);2. 外部屈折,即在词尾添加后缀,如英语名词单数形式后面加上后缀-s,构成相应的复数形式,如 letters, lamps;动词原形后加-ed,构成过去式,如 walked, called。一个词缀可以同时表示几种语法意义,如英语动词 reads 中的-s,同时表示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另一方面,同一语法意义可用不同的词缀来表示,如 desks 和 oxen 中的-s 与-en 都表示复数。有时,人们把屈折语和黏着语合称为综合语,与分析语相对。

语言迁移 language transfer

指学习语言或翻译过程中母语对所学语言或目的语的影响,是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普遍现象。王还(1986)指出:“任何人学外语最自然、最容易做的事就是把自己的母语的习惯套在外语上。有时套对了,有时就套错了。”汉译英时常把汉语的习惯用法套在英语上而造成语言失误,甚至误传信息;在英译汉时又望文生义,没有反映出原文的真实意义,使译文完全失去信度,从而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语言迁移分为负向迁移(negative transfer)和正向迁移(positive transfer)两种。负向迁移也叫做干扰(interference),即套用母语模式或规则而产生的不符合目的语规则的用法,如把 Tremendous research work is required to bring about such fantastic speeds. 按汉语语序和结构译为“巨大的研究工作需要产生这样神奇的速度”(应为:“要达到如此惊人的速度,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正向迁移指利用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一些相同的结构形式,或从外语引进一些为母语所容纳的新的表现法,例如将 clone 译为“克隆”,在计算机领域中将 menu 译为“菜单”等。

语言规范 linguistic norm

指在言语实践中巩固下来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使用各种语言材料(语音、词汇、语法)的准则和典范。在书面语中还包括书写规则。规范对于言语社团的成员来说具有强制性,是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所必须遵守的。有了规范,人们就有了应该遵循的准绳和努力达到的目标,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这样就有可能对自己的言语活动加以自觉的控制和调整,努力提高言语修养,改正不正确的发音,不生造词语,尽量避免造出不合乎语法的句子,避免写错别字,等等。标准语的确立和发展,就是从全民言语的素材中挑选出准确、鲜明、生动和具有普遍性的成分,依据语言的发展规律制订规则和明确规范的过程。这一过程叫规范化。标准语必须从全民言语中不断吸取营养,把现代的、典型的、最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吸收进来,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地吸收古典的和外来的语言成分,同时舍弃掉一些陈旧的、不适用的东西。

语言的普遍性 generality of languages

指人类语言之间潜存着一些普遍特征。能够证实这个假说的例证,不仅早已见诸各亲属语言之间(如印欧语系诸语言),而且也存在于许多非亲属语言(如英语和汉语)之间。语言间的共同之处,有着文化上极其深刻的原因。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人们也会产生某些共同的经历。如文化和语言不同的民族,或许生活在共同的自然条件下(地理、气候、动植物界),因此就对客观世界有着相同的经历,也可能有着相近的社会历程(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活动(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和经济活动),所以便会产生相同的社会、美学、行为和道德观念。因此,在语言间存在一些表达形式及意义相重合的现象是极为自然的,汉语和英语之间就能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例如,两种语言中有为数不少的短语,是以心(heart)为中心词而构成的。古时的人们缺乏现代的解剖和医学知识,误认为心脏是人类思想和感情的中枢。久而久之,这种误解就遗留在人们的语言中了。例如,heart-breaking(令人伤心欲绝的),to learn by heart(铭记在心),to lose heart(灰心)等。

语言的元功能 metafunctions of language

指人类语言的共性,不因社会制度、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宗族、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不同。语言的元功能是人类创造和使用语言的根本目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的元功能概括为三种:一、达意功能:语言能够表述我们的经验世界,将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抽象为可控数量的范畴,并能表达其中的逻辑关系;二、人际功能:语言能够在社会交往中表达我们的态度、观念和意图,并能改变他人的态度和行为,从而建立和保持适宜的人际关系;三、语篇功能:语言能够组成语篇,从而使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现实化。(Halliday 2001: 21~22)同一语言是同一社会成员间表达和交换意义的符号,而翻译则是不同语言社会的人员间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语言的元功能是语言赖以存在和演变的基础,也是研究翻译的根本基础。

语言的功能 functions of language

指交际时人们运用语言所发挥的作用。划分语

言功能并没有公认的标准和方法。语言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一般可分为以下几种:1.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人们用它来互相交往接触,传递并交流信息。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就是一种用以组织群体生活、从事生产的手段。2.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们用它来形成并表达思想。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的基本单位也与思维的基本范畴相对应:词与概念相对应,句子与判断相对应。3. 语言是积聚知识和信息的工具。它把人们思维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子积聚并存贮起来,保存和反映了前人全部的经验和知识,而后人通过学习就能掌握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和信息,不必一切从头做起。4. 语言是表达感情和影响别人的工具。它既传递信息,又是艺术表现的媒介。语言具有美学功能,它的创造性也正是通过艺术的媒介而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上述功能中,交际功能是主导。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认为语言有三大功能:达意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德国语言学家布勃勒(Bübler)提出的语言三功能是: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描写功能(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和意动功能(conative function)。美籍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Jakobson)提出语言还有另外三种功能:应酬功能(phatic function)、审美功能(aesthetic function)和评释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Newmark)认为语言有六种功能,大致与雅各布森的相当。译者力求译语产生与源语相同的效果,具有与之相应的功能。

人际功能　interpersonal function

语言的功能之一。人们见了面互相打招呼、说客套话,或者互相道贺与致谢等,其目的往往只是跟别人交流感情,建立或保持一定的人际关系,而谈话的内容本身并不一定重要。在书面语中,语言的人际功能表现在作者(发话者)与读者(受话者)因地位、处境、状态的不同而产生的一定的关系上:作者往往通过情态对所谈命题的成功或有效与否作出的判断来达到交际目的,如在陈述中要求对方承担义务,在提议中表达个人意愿等。此外,作者还通过称谓、语气、措辞方式来体现人际功能。

达意功能　ideational function

指语言表达概念的功能:把现实世界或想象世界的事情说出来,或对某些人、物、动作、事件、状态有所陈述。相当于德国语言学家布勃勒(Bübler)的表达功能和描写功能之和。

表情功能　expressive function

亦称"表达功能",指语言用以表达情感和态度的作用。如果一段话语被说话人纯粹用来表达情感,那么,该话语的概念信息就退至次要的地位,有时只能起一个表示情感的类型和程度的作用。在翻译这样的话语时,如果只注重其概念信息而忽视其表情功能,就会使译文出现功能性偏差。例如:... and whoever tries to twist you up, may the end of his nose take a twist. (I. B. Singer, *Gimpel the Fool*)译文一:谁要是捉弄你,谁的鼻子尖就会弄歪。(《辛格短篇小说集》)译文二:谁骗你,谁就不得好死。(《以撒·辛格小说选》)原文后半部分是句打赌的话,说话人的目的在于要让对方明白其态度的坚决,而绝不是要让对方认为所咒的事情会真的发生,也就是说,这句话的主要功能是表情功能,而不是信息功能。译文一只译出了原文的字面意义,情感的表达显得不够充分、畅快,在功能与效果上与原文相去甚远。译文二套用译文语言中惯用的赌咒语,虽在意象上与原文大相径庭,但在功能与效果上却与原文不相上下。

必须指出,在交际中,像上例这种带纯表情功能的话语毕竟是少数。在大多数情况下,表情功能总是与其他语言功能结合在一起的。其中,尤以与信息功能的关系最为密切。在翻译这种多功能结合的话语时,译者必须要准确地把握住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情感色彩,在体现其他语言功能的同时,为寄托在这些功能之中的情感功能选择具有同等功能的表达方式和语气。

祈使功能　vocative function

指语言使读者(听众)去感受、去思索、去行动的功能,即使读者(听众)作出文本所期望的反应的功能。招贴、广告、公告、劝说性文章甚至流行小说均具备这一功能。

评释功能　metalingual function

亦称"元语言功能"或"语言文化功能",指语言可以对语言本身进行解释、分析或评论。例如,当听到有人说 in other words 时,就知道下文将进行解释;当听到有人说 strictly speaking 时,就知道说话者准备对所说过的话进行评论。

美学功能　aesthetic function

亦称"美感功能""审美功能"。语言的美学功能是指语言用以创造艺术效果的作用,文艺语体这一功能尤为突出。译者必须对一篇文章的气质,包括意境、气势、情态、韵味、风貌等审美构成及其艺术手法有所了解,并以自己的审美认识为依据,进行审慎的、反复的审美体验,选择与原文审美构成相适应的审美再现手段,以达相同的美学功能。例如:On one of those sober and rather melancholy days in the latter part of autumn, when the shadows of morning and evening almost mingle together and throw a gloom over the decline of the year, I passed several hours in rambling about Westminster Abbey. There was something congenial to the season in the mournful magnificence of the old pile; and, as I passed its

threshold, it seemed like stepping back into the regions of antiquity, and losing myself among the shades of former ages. (W. Irving, *The Westminster Abbey*) 时方晚秋,气象肃穆,略带忧郁,早晨的阴影和黄昏的阴影,几乎连在一起,不可分别,岁云将暮,终日昏暗,我就在这么一天,到西敏寺去散步了几个钟头。古寺巍巍,森森然似有鬼气,和阴沉沉的季候正好调和;我跨进大门,觉得自己已置身远古,相忘于古人的鬼影之中了。(夏济安译《西敏大寺》)原文古朴典雅,抑扬有致,情景交融,以景见情。译文也还它一个风味古雅、韵律铿锵、深沉隽永,使读者身历其境,引起共鸣。

语篇功能 textual function

亦称"成文功能",即语言本身具有的积词成句、集句成段、组段成篇的功能。在韩礼德(Halliday)的功能语法体系中,这一功能是通过主位结构、信息理论和衔接系统来实现的。

提示功能 directive function

指语言用以指示或影响他人行为或态度的作用。说话人使用具有指示功能的语言是为了向接受者(receiver,指听者、读者)传达某种指示或命令,提出某种倡议、忠告或要求。指示性话语由于具有这样一些作用,故与信息功能密切相关。在翻译中,译者要把原文所包含的指示功能及所负载的信息清楚地表达出来,以实现指导接受者言行的目的。例如:

To the rad-lab man he said, "Has it been sterilized?"

"Sir?"

"Has the unit been sterilized?" (Michael Crichton, *The Terminal Man*)

Sir是一个极为常见的词,谁都知道它的意思是"先生"。但在上文这一特殊的语境中,却不能这样译。在这里,发话人显然是没有听清对方的话,而要求他再说一遍。如果照字面译成"先生",源出者的要求就无从体现了,因为仅仅一声称呼是不能"影响他人行为"的。为实现问话人的意图,翻译时应对该词作功能性处理,将其译作"你说什么"或"什么"。

信息功能 informative function

指语言用以传递信息的作用,是语言最基本的功能。在翻译中,译者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克服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信息。例如: His greatness is attributed by his biographers and critics not alone to his profound medical knowledge and insight but to his *broad general education*, for he was a very cultured man. 他的传记作家和评论者认为,他的伟大不仅在于医学造诣深、洞察力强,而且在于博学。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文化素养的人。(general education不译作"普通教育"。)

语言传递信息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明确,有的隐晦。对于以传递原文信息为首要任务的译者来说,无论其表达方式如何,都要尽可能地予以体现。例如: Last night an uninvited guest turned up to *make five for bridge*. I had the kind of paper book at hand *to make being the fifth at bridge a joy*. 昨天晚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桥牌桌上多了一人。手边正好有一本简装书,我没打成桥牌,却也读得愉快。译文对make five for bridge和to make being the fifth at bridge a joy所传递的信息,透过字面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描写功能 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

语言的功能之一。在互相交往中,人们经常要描绘、叙述或说明有关的事物或情况,语言描写是主要的手段。小说、散文、叙事诗、报告文学、童话、传说和新闻报道等都含有大量的描写和叙述型语言;科技著作、商品介绍和法律文件中的描写主要是实体描写和过程描写,其中的原则、原理、规定则更多地采用说明性语言。

意动功能 conative function

语言的功能之一。人们常用语言来唤起别人的同情或者激起他们的愤怒,呼唤他们去采取某种行动,或者建议、要求、敦促或指示别人去做某件事,这就是语言的意动功能。

应酬功能 phatic function

亦译"寒暄功能",指语言用以客套应酬、维护社会内部联系的作用。人们在使用应酬语言时,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互通情况,而只是为了沟通交际双方的感情,因此话语的具体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这样的话语是说了还是没说。在翻译应酬语言时,译者应注意不同文化的差异在语言中的反映,要充分利用译文语言中具有同等功能的表达方式,来体现相似或相当的应酬性。有许多日常用语的翻译就是这种功能的转换。例如道别时的So long.不译作"太长了",而译作"再见";Until tomorrow.不译作"到明天",而译作"明天见";Good night, sleep tight.不译作"好晚上,酣畅地睡",而译作"晚安,睡个好觉"。又如,宴席上"干杯"译作Cheers而不译作Bottoms up;饭前饭后一段时间的问候语"吃了吗?"不译作Have you eaten yet? 而译作How are you? 等等。

语言相对性 linguistic relativity

这是一种假说(hypothesis),即不同的语言给予人们以不同的世界观。按照这一假说,我们并非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感知世界。相反,语言已为这种感知塑造甚至创造了条件。在把握与表述世界上不存在完全中性与公正的方式,因为我们所习用的语言已将我们导向某种类型的观察图景,并预先设定某些可供选择的解释。

语言相对性一部分可能属于词汇问题。因此,不

同语言便以不同方式切分经验范围。比如,俄语用12个表示颜色的基本词语切分色谱;而英语切分同一领域则用11个词语,其中只用一个表示"蓝色"的词,以取代俄语中两个可供选用的词。在一种被称为品突皮语(Pintupi)的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有10个完全不同的指称各种洞穴的词,其中大多只能曲尽其意地被转译为英语。比如,katarta大致是指"巨蜥冬眠后破土而出留下的洞"。

不过,语言的不同更多还在于各自的词语组织方面,包括形成句子的独特方式——语法。某种语言的时态系统可能完全不同于另外一种语言。比如,英语语法至少提供两种时态,而霍皮语(Hopi,一种北美的语言),似乎根本不用时态就能使用。其动词形式反而可以区分何为主语与何为宾语。因此,这两种语言的不同语法,看起来似乎为其使用者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时间意识。

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Whorf)对上述语言现象研究后得出结论:

> *所有的观察者并非被导向天地万物的同一画面。……使用迥异语法的人被其语法指向不同类型的观察图景,以及外在的、相似的观察行为所得出的不同评价,因此,他们是不同的观察者。*(Whorf 1956: 214)

出于对沃尔夫以及另外一个与他共事的著名语言人类学家——萨丕尔(Sapir)的尊敬,这个假说有时也被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按照这个假说,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的世界景观,从而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但是,对其核心论断的公开辩论一直十分激烈。比如,人们不容易为语言相对性提供确定无疑的经验性证据。批评家也指出了各种语言之间相互转译的事实,而如果某人的母语完全限定其思想世界,那么这种转译就不可能发生。

然而,随着对语言及语言模式的兴趣日益高涨,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运动中得到证明,有关语言相对性的种种假说又被注入新的活力。如果某位后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家——比如贝尔西(Belsey)——力主一部小说就是一个话语(语言)的人工制品,它对现实的建构就像它做现实的中介(mediate)一样,那么她就在尊奉某种语言相对性理论。

原语　original language

指原作者传递信息所用的语言。当译者从原作(而不是第三国语言的译作)翻译时,原语即源语。参见"源语"

弱势语言　minor language

与"强势语言"相对,指某一地区较少人使用的语言或指在地区社会经济环境或地缘政治中处于弱势的民族和国家的语言。一般认为,全世界翻译的总体流向是从强势语言译入弱势语言,相反的流向较少,而在弱势语言之间的翻译也不多。参见"强势语言"

强势语言　dominant language

与"弱势语言"相对,亦称"主导语言",指某一地区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也可指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或地缘政治中,对大多数活动领域的口笔头交际至关重要的语言。比如,欧盟现有27种官方语言,但真正在该组织通用的工作语言只有英语、法语和德语,且逐渐以英语为主,因此,在该组织中,英语、法语、德语,尤其是英语,即为强势语言。对于全球绝大多数语言而言,要确定其地位并不容易,因为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界定标准。一般认为,全世界翻译的总体流向是从强势语言译入弱势语言或在强势语言之间进行,弱势语言很少有机会译入强势语言,而弱势语言间的翻译更少。翻译强势语言时,译者多取仰视态度;翻译弱势语言时,往往自由度更大。但语言地位并非制约翻译选材和决策的唯一因素,原作的地位、译者的文化认同和翻译观、目的语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和翻译规范等,都会对翻译产生影响。参见"优势语言"　(贺显斌)

接受语　receptor language

奈达(Nida)与泰伯(Taber)将其定义为"将信息从原来或源发语译入的那种语言"(1969: 205),与"目的语"同义。然而,"接受语"常与翻译研究的某些领域相联系,尤其是《圣经》翻译。此外,有些学者鼓励采用这个术语,因为它所传达的含义被认为比"目的语"这个词更适合用来讨论翻译。例如,奈达认为,使用"接受语"这个词所强调的是,信息不是朝某个目标传达,而必须由"接受者来解码"(1969: 484)。

储存的对等项　stock equivalent

指保留在大脑中供以后翻译时使用的对等项。有一项假说:翻译结束时,源语片段(segments)和目的语片段间建立的联系并没有立即消失,而是在译者的大脑中留下或多或少的永久痕迹,源语和目的语中某些成对的单位(coupled units)在译者的长期记忆中保持了下来。以后翻译时,译者就能自动从大脑中提取这些目的语词项,来取代源语中与之对应的词项。对这位译者而言,由于有了储存的对等项,翻译将变得越来越程式化(proceduralized)。(Toury 1995/2001)

源语　source language

亦称"译出语",与"目的语"或"译入语"相对,是译者翻译依据的语言。如果译者直接从原作译出,则源语即原语;如间接地从第三国语言译出,则源语为第三国语言。参见"重译""原语"

象似性　iconicity

指语言形式与其所指之间存在很多映照性相似特性,是相对于索绪尔(Saussure)的语言任意性(即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而提出的。皮尔斯(Peirce)指出"每种语言的句法,借助约定俗成的规

则，都具有合乎逻辑的象似性"，而并不是任意的，并提出了"三分法"，即语言符号可以分为 icon, index 和 symbol（Peirce 1940）。雅各布森（Jakobson）在 *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anguage*（1965）中第一次对语言符号任意观提出了实质性的挑战。国内学者许国璋、沈家煊、王寅等对象似性进行了较深入研究。代表性观点有：1. 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两者的结合是可以论证的，是有理可据的（沈家煊 1993）。2. 符号在音、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具有映照性相似的现象（王寅 1999）。语言象似性研究可以从语音层面、词形层面和语言结构层面三个方面进行。海曼（Haiman）（1985）提出距离象似性、顺序象似性、数量象似性原则等概念。王寅根据象似性的原理还归纳出：标记象似性、话题象似性、句式象似性、篇章象似性、滤减象似性。典型性象似性研究在于探讨特定语言符号与其所指意义之间的客观理据性。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语言符号与其所指之间既有非象似性的一面，也有象似性的一面。象似性研究也可通过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分析进行，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所表现出的象似性有很大区别。语言符号象似性还有一个程度问题，不同语言的象似度也有很大的不同。英汉两语言句法结构的不同，体现了不同的认知概念结构，也反映着不同的象似方式。近年来语言学家对语言符号象似性的研究从词语的音形平面发展到句法平面，并认为在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主要关系是象似性，而不是任意性，象似性具有自然的、本源的、主要的性质。

朱纯深（2004）从分析句法象似性在语言类型学的意义入手，讨论了句法隐喻，即句法象似性在文学翻译中的意义，认为对文学文本中的句法，要在"功用"与"功能"两方面进行观察，深掘其在认知范畴的象似潜能，而这种潜能是句法象似在文学写作-翻译-批评中的理论意义所在。辛献云（2006）从诗歌语篇中存在的各种象似性原则入手，探讨象似性理论对诗歌翻译者理解文本、选择翻译方法等方面具有意义。他认为，一个合格的译者不仅要有能力在翻译中捕获各种象似性手段，更要有能力在目的语中调动这些手段，达到与原诗相似的艺术效果。（曾利沙）

11. 文体　修辞

文风　style of writing

指社会一定时期在语言文字运用上的一种具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风气，是受制于思想的文章、说话的形式特点的综合表现，是一定时代风貌、社会风尚、阶级意识的语言反映，也是一定世界观制约的结果，与人的思想作风、语言修养等密切相关。某一时代的文风制约着该时代人们的语言运用，是形成语言个人风格的基础，表现出对社会、时代的反作用。文风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

文体　style

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指文学文体，包括个别作家的风格（参见"风格"）。广义的指一种语言中的各类文体，例如口语体和书面体。而这两者之中，又有若干分支。例如，在口语体中，会议的正式发言显然不同于日常闲谈，各有其语音、句法、词汇和篇章的特点；书面语文可分为文学语、专门语及共同语（普通语）三大类。参见"文学语""专门语""共同语"

文体学　stylistics

亦称"风格学"，是应用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等语言知识对语言风格（style）进行研究的学问。传统的文体学主要分析文学家的文学风格或作家的语言特点。近三四十年来，研究的目标开始转向语言的各种变体，也就是扩大到对不同语域（register）的研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量骤增，信息传递和交流形式更加丰富，科技文体、新闻文体、法律文体、经贸文体等实用文体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语言变体　varieties in language

任何语言都不是划一的统一体，语言都依据使用地点、时间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产生多种多样的语言变体。社会语言学家们认为语言变体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类型：1. 因地区不同而产生的语言变体，例如，中国的普通话与各种方言，又如英国英语与美国英语，等等；2. 因社会地位或教育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各种变体，例如知识分子语言和非知识分子语言；3. 因语境和交际双方关系不同而产生的变体，如雅语与俗语；4. 因交际目的和内容不同而产生的各种变体，如广告语体、新闻语体、科技语体、公文法律语体，等等；5. 因媒介不同而产生的各种变体，如口语体和书面语体。其中第三种因语境和交际双方关系不同产生的变体又可分成五种：1. 庄严体（grand or frozen style）；2. 正式体（formal style）；3. 非正式体（informal style）；4. 随意体（casual style）；5. 亲昵体（intimate style）。

从翻译的角度来考虑，主要是对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变体进行对比研究。一般来说，要求译品与原作具有同样的变体和风格。在文学翻译中，各种人物之间的对话风格，常常是因语境不同、身份不同、教养不同而不同，应当注意每个人物形象的身份及其所处的语言环境，运用目的语的变体来把握住原作中的各种人物形象。因此，可以将语际翻译的实质看成是由包括文化社会等因素在内的多种关系决定的、在变体中进行选择的语际交流途径。语内的变体可以在目的语中找到相应的表达形式。原文是韵律诗，可以译成韵律诗，也可译成非韵律诗，甚至译成散文；原文是古文，可以以古译古，也可文白相间，甚至可以译成白话一篇。所以，译者所要做的是根据不同的社会语境和

交际需要,在保持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在有一定差别的表达形式中作出选择。

语言剩余　linguistic remainder

指非主流的语言变体,如方言、行话、俗语等。韦努蒂(Venuti 1995/2008)借用勒塞尔克莱(Lecercle)的这个概念来建立自己的求异翻译理论。语言剩余的运用揭示出主流形式不过是历史和具体情况的产物,因而颠覆了其主流地位的合法性。文学创作就是释放语言剩余。翻译也是如此。翻译应该用目的语(主流)来展现外国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差异(剩余),也就是释放剩余,使主流语言不断非主流化、非合法化(delegitimizing)、非本土化和陌生化,最终使主流语言得到发展。韦努蒂提出,应该在翻译过程中努力发掘目的语中的语言剩余来瓦解目的语的语言结构,进而瓦解其占主流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念,呈现其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价值观,促进新思想的发展。这样一来,译者就不再只是传声筒,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人、原创文学和哲学的代言人,甚至是反对全球霸权的斗士。(郑红风,王莉莉 2003)　(贺显斌)

翻译中的语言变体　language varieties in translation

卡特福德(Catford)指出,"尽管变体(variety)的数目和性质因语言而异,我们可以认为,所有的语言都可以用若干变体来描述,这是一个与翻译有关的重要事实"(1965: 85)。对语言变体进行分类的范畴框架包括:个人言语方式(idiolects)、方言(dialects)、语域(registers)、风格(styles)和语式(modes)。语言变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某一个或某一群说话者(performer)来说或多或少是永久性的(permanent);另一类或多或少是瞬时性(transient)的,随着话语(utterance)的即时语境变化而变化。永久性的语言变体包括个人言语方式(idiolects)和方言(dialects),后者又可以细分为地理方言(geographical dialect)、时间方言(temporal dialect)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瞬时性的语言变体包括语域、风格和语式。语域指的是在某一场合下说话者在说话时所扮的社会角色,其标记主要是词汇标记和语法标记。风格是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主要的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与风格有关的因素有两方面:受众的数量和特点以及说话者和受众的关系。朱斯(Joos)(1967)认为英语有五种风格:呆板的(frozen)、正式的(formal)、商议的(consultative)、随意的(casual)和亲密的(intimate)。语式指的是与说话者使用的与媒介有关的语言变体。认真分析原文的语言变体,有助于在目的语中选择适当的、对等的语言变体来构建译文。(参阅 Catford 1965: 83～91)　(林作帅)

语域　register

指在某一场合下说话者在说话时所扮的社会角色,其标记主要是词汇标记和语法标记。语域可以根据题材(话语范围)区分为各种专业语言、行话等,根据正式程度(交谈方式)可分为庄重体、正式体、通常体、随便体等。譬如说,牧师、大学教授或农村文盲老大爷在谈论同一内容时,语域不同;牧师在讲坛上或教授在课堂上所用的语言与他们在家和妻儿讲话时所用的语言也有区别;他们讲伦理道德、谈论天下大事、开玩笑或讲幽默故事、写学术论文或打电话时所用语言更是风格迥异。因此,可以总结出使用语域的决定因素或判断正常语域的下列根据: 1. the addressor(说话人或作者);2. the addressee(听话人或读者);3. subject matter(说话内容或题材);4. form of communication(交际方式)。大量的语域标志出现在词汇层上,但也出现在语音、句子和语段的层面上。善于辨认语域标志在翻译实践中甚为重要,在文学作品翻译中尤其如此。翻译的理解与表达没有一步是可以离开语域分析的。译者要正确地理解原文的意思和风格,就要认真分析原文的语域。如《红楼梦》中刘姥姥的一句话"大火烧了毛毛虫",译作 A big fire burns the hairy caterpillar 就不够妥当,因为 caterpillar 为学名,不是一个粗俗朴实的农村老妪所能随口说出来的,显然与语域不符。

语域分析　register analysis

根据韩礼德(Halliday)和哈桑(Hasan)的定义,语域是"语言根据使用情况所发生的变异(variation according to use)"(1985: 41),亦即在特定场合使用的特定语言,其构成特点可被轻易辨认出。例如,新闻语言是一种与教堂里的布道不同的语域。根据韩礼德(1985)的语篇分析理论,一方面,语域包括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三个变量(每个变量的具体内容见相关词条);另一方面,语域自下而上分别由语篇体裁(genre)和社会文化环境(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来决定(condition)。

翻译理论家们认为,对语篇的语域进行界定是成功翻译的前提;只有这样,原文的语域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在译文中得到再现。贝尔(Bell 1991: 185)把语域研究作为语篇参数之一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豪斯(House 1977)的翻译质量评估理论也以韩礼德的语域分析为基础,把译文与原文的语域进行对比,从而将翻译分为显性翻译(overt translation)和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语域分析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也遇到了各种挑战,例如哈蒂姆和梅森(Hatim, Mason 1990,1997)从语用和符号学层面对语域分析理论进行了改进,提出了语篇的混合性(hybridisation)和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据 Baker 1998: 262～263; Munday 2001: 89～102)参见"体裁"

(林作帅)

口语　spoken language

指谈话时使用的语言。谈话或口语交际是由说者和听者共同参与的一种双边活动,是在特定的时

间、地点等背景下围绕一定的目的进行的,面部表情、身势、情境等语言外部因素是交际的辅助手段。口头语体中使用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短句和单句较多,因省略而有较多的不完全句。例如,以下母女对话的交际背景是Jane每星期一要上夜校:

Mother: Are you coming back for supper, Jane?

Jane: It's Monday, Mom.

妈妈问女儿是否回家吃晚饭。女儿回答:"今天是星期一。"看似答非所问,但在共同的认知背景下实现了交际目的。

口语体 colloquial language

属非正式语体(informal speech),指日常生活或非正式场合使用的语体,不特别注意发音、选词和句子结构。口语体并非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不应该被认为是次标准语。受过教育的操本族语者在与同事、亲朋随意交谈时也使用口语体。例如,在邀请熟人吃饭时说:"Why don't you come and have dinner with us next Saturday?"而不用较正式的语句"May I invite you to dinner next Saturday?"可见在某些场合,用口语体比用正式语体要得体。在词汇方面,英语口语体多用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小词"。(王宗炎 1990)参见"正式语""非正式语"

文学语 literary language

亦称"标准语",指文学作品里所用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它是语言艺术塑造形象、刻画人物性格、表达主题的基本工具。文学语言应具有准确、鲜明、生动、富有形象性、个性化的艺术感染力的特点。文学语言虽不像一幅绘画或一尊雕像那样直接给观赏者以形象感受,但能从多方面展示形象的丰富内涵,给读者的想象力和再创造能力以充分余地。因此,文学语言的根本特征,是形象的描绘性。它要求作家善于抓住所要表现的对象的特征来描绘人物、事件、景物,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触其物,如闻其声。文学语中广泛使用艺术性辞藻和情感词汇,结构灵活,句型多变,层次交叉,短句、省略句多。

正式语 formal language

1. 在文体学上,与"非正式语"相对。主要用在庄重严肃的交际领域,如法律文书、规章条令、公文书信、正式演说、学术交流等。正式语以书面语为特征,即使是口头表达(如演说、学术交流),记录下来,仍保持书面语的主要特点。正式语与非正式语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用词和句式。在用词方面,英语正式语常用源于拉丁语的书面词语,有庄重、严谨、准确的修辞色彩,而口语体常用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小词"(词体短小)。用这两类不同词语表达同一个意思的例子在英文里俯拾即是,如 request/ask for, introduce/bring in, distribute/hand out, investigate/look into, attempt/try, assist/help, increase/grow, commence/begin。在结构方面,正式语有多用被动语态、名词化结构以及句式较长等特点,在翻译时须作相应的文体和修辞上的考虑。如: The Secretary-General has received the following communication which is cir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resolution 1296 (XLIV). 秘书长收到以下来函,现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296(XLIV)号决议予以散发。2. 指国际机构或会议发布公告、文件或会议发言使用的语言,如联合国1945年成立时,规定汉语、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等五种语言为该组织正式语言,后又增加阿拉伯语为正式语言。参见"口语体""非正式语"

非正式语 informal language

与"正式语"相对,主要用在日常工作交往、商店购物、旅游、朋友之间闲谈及书信往来、不拘礼节的互访和问候等。非正式语以日常口语为其主要特征:常用小词及缩略形式,句式简短,语音同化现象与弱读形式较多等。在翻译时须作相应的文体和修辞上的考虑。如:

"But I'm not a serpent, I tell you!" said Alice. "I'm a — I'm a —"

"Well! What are you?" said the Pigeon. "I can see you're trying to invent something!" (Lewis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然而我不是长虫呀!我告诉你!"阿丽思道。"我是——我是一个——"

那鸽子道,"那么,你是什么?哼,我看得出来你在那儿想出什么来哄我!"(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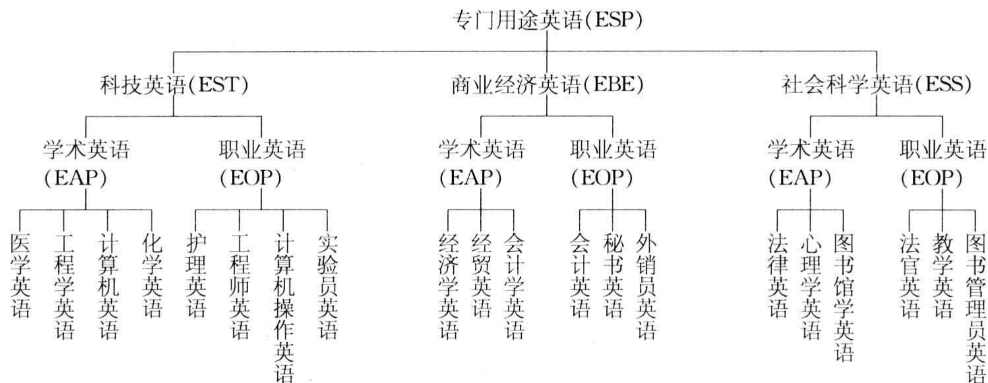
译者以口语对口语,译文中用了"呀""那么""哼""看得出来""那儿""想出什么来""哄"等词语。参见"正式语""口语体"

专门语 special language

指专家们讨论专门问题时所用的语言,如矿物学、经济学、化学等学科的论文、报告、标准所使用的语言。对专业语的研究包括两方面:1. 研究术语及其语域;2. 研究专业语的区别性特征,包括专业语不同文字品种(体裁)的区别性特征,例如,论文与报告、标准与专利文献之间的不同语言特征及体例特征,以及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性特征等。专门用途英语是专业语的一个分支。参见"专门用途英语"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 (ESP)

二战结束后,英语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作用愈益显著,英语文献量成几何级数增长,英语逐渐成为国际通用语。为了顺应日益增长的国际交往中的实务需要,适应广大学习者的要求,语言教学作出了相应的反应。20世纪60年代初,专门用途英语的教学与研究逐渐兴起,并成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专门用途英语涵盖一个广泛的领域,详见下图:



专门用途英语涵盖的领域

图中,学术英语和职业英语以下的子项只是举例而已,还可以列出其他专门项。

科技英语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ST)

专门用途英语(ESP)的一个重要分支,在 ESP 中最先出现,研究、应用且设置课程也最多,因此,常作为 ESP 的代名词。EST 的早期研究对象主要是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用语,后来扩大到医学、机械、电气等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EST 按用途可粗分为学术英语(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和职业英语(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但学术英语和职业英语并无严格区别,如医学英语与护理英语,前者学术性强,文体正式程度高,逻辑严密,用词精确,结构上多用长句、名词化短语、被动语态;后者相比较而言更多地从职业上考虑,实用性更强,句法相对灵活。按体裁分,论文、报告、专利说明书、合同、标准等都属严谨的科技英语。参见"专门用途英语""科技翻译"

通俗科技语体　popular science style

亦称"科普语体",是科技语体的变体,以深入浅出的形式向非专业人员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包括产品说明书、操作规程、生产建议、可行性报告、促销材料、实验报告等。科普读物或低中级科技教材也是通俗科技语体中的常见类别,其特点是常常把科学技术材料形象化、情节化,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解说科学知识,具体表现为:1. 少用术语,常以同义的其他词语替代,如:Scientists have made maps showing the "earthquake belts". 句中,用 earthquake belts(注意:此词加有引号)这样通俗的词语来表达"地震带"的概念,而在专业文献中常用术语 seismic regions;2. 用正式程度低的词,试比较:The earth turns round once a day. (科普英语)The earth rotates on its own axis once a day. (科技英语)以上两例中,turn 和 rotate 是同义词,但前者常用,后者比较正式;3. 用具有实体感的词来代替术语:A scientist dived below the surface of the sea in a hollow steel ball. 句中,a hollow steel ball 即 a bathysphere(深海球形潜水器);4. 用注释性词语作解释:In TV, both sound and light are changed into electromagnetic (invisible light) waves which are sent through the air. (括号内为解释语)此外,在通俗科技语体中常用比喻、拟人、排比、对偶、引用等积极修辞手段。

共同语　common language

亦称"普通语",是语言集团中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它广泛采用口头词语和俗语,语句平易,不重修饰,最大限度地包含着语言的共核,即各种文体共有的基本词汇、共同的语音、语调、拼法、词的形态变化及词缀等。

共核　common core

指某种语言的各种变体所具有的共同语言特征的总和。社会语言学认为,作为交际工具实际存在的语言并不是一种纯一的系统,而是各种变体的总和,按照不同的标准,如地区、教育程度、社会地位、话题等,可以区分出地域变体、社会变体、风格变体等。尽管语言有多种变体,但它们都包含大量共同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征,这些共同特征的总和即共核,构成各种变体的主体,是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共核也是学习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首先要掌握的语言材料。

风格　style

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体现在文艺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各个要素中。汉语的"风格"包括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人物的塑造、情节与结构的安排,以及体裁、语言、艺术手法等的综合因素,在英语中无对等词。英语的 style 主要指艺术表现的方式,如用词、句子与段落的组织、艺术手法的运用等。风格是一般中的个别,共性中的个性,普遍性中的特殊性。所谓作家的风格,就是作家的个性,是这一作家区别于另一作家的特色,"风格即人",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文学派别应该有它自己的个性。同一文学流派的作家,除了他们的流派共性之外,也有他们自己的个性。俄国文学史上

的普希金(Пушкин)与莱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是属同一时代、同一文学流派的作家。他们既有流派上的共性,还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个性。讲作家的风格应该既包括作家流派上的特色,也包括纯属个人的特色。风格的基础是语言。因此要求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不仅要准确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而且要再现作者的语言风格。

文学作品风格的翻译一直是翻译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对风格的理解存在着差异,对于语言风格的翻译问题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一种认为语言风格是不可译的,一种认为语言风格是可译的。认为语言风格不可译的人说,风格离不开语言,因而不同的语言表达不一样的风格。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风格翻译就像用铅笔或钢笔临摹水墨画,无法反映原作的风格。译文中的风格也只能是译者的风格。认为语言风格可译的人却说,语言是风格的基础,因为语言是可译的,所以风格也是可译的。他们认为,翻译风格犹如他人的走路方式,不但可以模仿,而且可以模仿得像。因此他们认为,翻译不仅要准确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而且还要再现原作的语言风格、艺术特色。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中,风格可译是主流。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如果一部文学作品的语言被准确地译成另一种语言,作品的语言风格译出来了,整个作品的风格也就再现出来了。

时代风格 style of times

时代风格是因时代因素而产生的语言运用特点的综合。随着时代变迁,语言形式也在变化,可分今用语、过时语、陈旧语、古语、废语,等等。此外,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风貌和时尚,在语言的运用上呈现不同的格调,即时代风格。以下段落引自培根(Bacon)的名篇 *Of Studies*,所用语言属早期现代英语: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And therefore, if a man write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a great memory; if he confer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a present wit; and if he read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much cunning to seem to know that he doth not. 其中,有的语言形式在现代英语中已经不用,如 maketh (makes), doth (does), had need (ought to)。王佐良用夹白的文言文译了以上两段,亦多用培根善用的排比手法,译文精练顺达,风格与原文相当: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因此不常作笔记者须记忆特强,不常讨论者须天生聪颖,不常读书者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

民族风格 national style

民族风格是因民族因素而产生的语言运用特点的综合。主要包括两方面:1. 不同民族语言要素表现形式不同,语言内部发展规律亦不同,在语言系统内的音、形、义、词汇、语法等方面有别于其他的民族语言,产生了该民族语言的特有民族风格;2. 不同民族因不同文化传统而产生不同的语言表现形式。

在翻译过程中,不同语言的民族风格在译者的思维中交织和碰撞。译者的责任就是将源语和目的语的不同民族风格相互沟通。对处理语言的民族风格问题,历来有种种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其极端是所谓的归化和西化。鲁迅在《"题未定"草·二》一文中指出,译文"必须有异国情调,……凡是翻译,它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所以,正确的做法还是兼顾原作和读者,在两者之间寻找最佳切合点;在具体做法上则尽可能保持源语的风格,包括在与汉语差异很大的情况下采用一定的变通手法(如直译加注),做到既保持原文内涵,又保留其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例如:1. They were only crying *crocodile tears* at the old man's funeral because nobody had really liked him. 在老头子的葬礼上,他们只不过挤了几滴鳄鱼的眼泪,因为在老人生前,没人真的喜欢他。2. Only fools *catch flies on a tiger's head*. 只有傻瓜才会在老虎头上扑苍蝇。

语体风格 style of language varieties

指因语体差异而引起的语言运用的不同特点,如口语语体自然生动,书面语体抽象严密。翻译时,源语与目的语的语体风格应尽量一致。例如,老舍《柳家大院》中多用口语体,英译文也用口语体,包括用较粗俗的俚语:大家见面,招呼"吃了吗?"透着和气。不说呢,也没什么。大家一天到晚为嘴奔命,没有工夫扯闲盘儿。爱说话的自然也有,可得先吃饱啦。When people meet, they greet each other with a "*Hi*" just to show their good neighbourly feelings. But if they should *cut each other dead*, nobody would care. When one's *knocked about from pillar to post* for his bread day in and day out, he won't *find ginger enough for gas and gaiters*. Of course, *there's* those who *are all jaw like a sheep's head among us*. But one can hardly be in a mood for *rag-chewing when one's guts cry cupboard*.

语言风格 style of language

语言系统中具有不同风格色彩的要素和手段系列所呈现的格调,是语言功能分化的结果。语言风格以篇章为最小单位,是在综合了篇章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语篇等所有层次运用语言的特点以后才形成的。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三要素中存在着具有不同风格色彩的同义手段系列:1. 语音中的风格要素,如押韵与不押韵、韵律的缓急等;2. 词汇中的风格要素,如口语与书面语、方言词与标准词语、本族语与外来语、古词与现代词等;3. 语法中的风格要素,如句子长短、单句复句、主动被动等。这些都是构成语言风格的主要物质材料。分析语言风格要从总体上着

眼，根据全篇总的格调来确定，如文学语体的风格是其所有的言语特点的综合。译文的语言风格要忠实于原文的语言风格、反映原文的语言风格，这就是说，原文藻丽，译文则不可平淡；原文含蓄，译文则不可明快；原文繁丰，译文则不可简洁。

翻译风格　style in translation

作品风格的确定及风格的可译性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风格有不同的种类，如个人风格、流派风格、时代风格、地域风格等，体现在作品的不同层面。目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风格是可译的。刘宓庆认为，翻译风格论关注的中心是源语风格意义的所在，以及在对源语的风格意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获得译文风格对原文风格的"适应性"(adaptability)，也可以说它研究的不仅是源语的风格表现手段，而且还包括如何使译文在与源语的对应中力求在风格表现上做到"恰如其分"(appropriateness)。译文风格对原文风格的这种依附性，使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1. 语际转换中，风格意义的转换之最基本的，也是首要的任务是发掘源语的全部风格意义；2. 风格意义的可知性从原则上基本保证了风格的可译性。但翻译中风格究竟应当如何表现，风格究竟可译到何种程度，又是翻译风格论中的关键课题。刘宓庆认为风格可译的根据是：1. 大多数风格标记是可以转换的；2. 人类的语言功能是一致的；3. 风格的翻译与译者的语言转换技能和才情功力有极大的关系；4. 风格的可译性将随着对风格的深入、系统的研究和对风格的科学论证工作的发展得到保证。(参阅刘宓庆 1990b)伴随着对风格的可译性的研究，风格的可译性限度以及随之而来的风格翻译手段、补偿手段等也都成为翻译风格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王宏印则把同一类型风格在译文中是否能够传达作为文学翻译批评的六条标准之一。参见"风格""文学翻译批评的六条标准"　（李林波）

体性　style

《体性》为我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刘勰著)五十篇中的一篇。"体"指体貌、体致，即风格；"性"指作家的才性、个性。体性是由作家思想感情的才性和语言运用的个性相结合而形成的不同风格类型。《体性》篇在论述作家个性与风格的统一关系时，按思想、表现特点的差异，把风格分为四组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这对后世很有影响，如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一书就"以语言为本位"(刘大白序)，把"表现"即"体性"的风格类型，划分为简约与繁丰、刚健与柔婉、平淡与绚烂、谨严与疏放四组八种。

体裁　genre

1.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指诗文的文风辞藻。《宋书 · 谢灵运传论》："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2. 亦称"样式"，指文学的类别，如诗、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等。每一类别又可按作品规模、性质、内容来划分，如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杂文、随笔、小品文；叙事诗、抒情诗、史诗等。文学体裁是人类长期艺术实践的产物，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夏征农，辞海编辑委员会 2002：1657)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语言中心的文托拉(Ventola)认为，体裁是生成特定语篇结构的符号系统，体裁能体现社会交往过程，是交际事件的一种分类。这种交际事件常出现在特定的职业或学术社团范围中，其显著特点是具有能被该社团确认和理解的一整套交际目的。人们的社会交往过程往往具有"重复性""习惯性"，像"履行常规一样"(routinelike)。这种使用语言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往往可分成若干"步骤"。这些步骤并不完全一样，但相似之处颇多，因此可归入相同的社会交往类型，这便构成了言语交际的体裁。例如，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下，"购物"这一社会交往活动的步骤大体上是一致的；病人在医院里与医生的交往活动，其步骤也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可辨认的有步骤的交往过程，便构成了语篇的体裁。

语言学家早期对体裁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语域和文体的研究中，后来在语篇分析中，对其特征形式也予以描述，描述这些特征形式在词汇、语法，甚至语篇修辞方面的表现。这些描述由一般到特殊，从一个层面扩展到另一个层面，逐步推进，将某一特殊语言现象和某种写作类型和文体联系起来，以此来揭示体裁的性质以及社交目的在具体语境中的传达方式。语言学家还探索某一体裁的语言特征是如何使社会现实得以体现的，某些语言特征是否能代表某一体裁的特殊规约，以及作者使用规约的策略等问题。

语言代码以一定的体裁出现才被赋予目的和意义，在两种语言代码转换过程中，必然要重视相应体裁的语言特征。翻译的所谓得体，从整体来看，正是得体裁之"体"。　（林夕）

体裁分析　genre analysis

体裁是构成语篇特性的基本要素之一，在语篇结构层面对语篇的形成具有制约作用。体裁分析有助于解析语篇的组织模式，从而挖掘特定语篇所具有的特定宏观认知结构。体裁分析一般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社会交往时应遵循什么样的体式或程式？这些体式或程式具有什么样的交际目的？体裁对语篇的建构起着什么样的制约作用？特定的体裁结构在词汇和语法层面上有哪些特定的表现形式？(秦秀白 1997)

体裁分析融合借鉴了各种学派理论的分析方法，将用于语篇各平面分析的方法揉入其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分析层面。体裁分析从以下四个层面进行，它们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各有不同的侧重点。第一层面

是分析有关语法特征。通过分析表面语言特征的选择与分布，进而挖掘深层的内涵意义，解释分布的原因。第二层面是分析语篇格式和语篇化特征，指示语言规约性使用的技巧特征，揭示某一语言团体在运作某体裁时赋予某些语言特征特殊价值的方式。第三层面是对体裁结构释义，主要揭示语言组织方面的认知特征。第四层面是语用分析，特别重视语篇中跨文化因素的分析。（李宣松 1997）

体裁分析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分析，比其他的分析方法能更好地描述口语和书面语不同形式的功能特征。它将语篇分析从描述扩展到解释，不仅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而且考虑心理语言因素。体裁分析不仅能分析出语篇的交际目的，而且能分析出作者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策略技巧。

在翻译研究中，语篇体裁经常与文本类型（text type）或语篇类型（discourse type）交互使用，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参阅 Baker 1992：113）语篇体裁是与特定的交际功能相联系的约定俗成的文本类型。（参阅 Mandy 2001：90；Baker 1998：68）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指出，语篇体裁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中（参阅 Halliday，Hasan 1989：45～46；Hatim，Mason 1990：36～37）。根据韩礼德（Halliday）（1985）的语篇分析理论，语篇体裁受限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同时又是通过语域（register）来体现的。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语域分析对原文和译文的语篇体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这对于制定科学的翻译策略有着重要的意义。参见“语域” （张顺梅，林作帅）

修辞 rhetoric

指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和表现方法，来恰当地表现写、说者所要表达的情意内容的一种活动，跟人们的思想修养、语文修养有密切关系。也可指人们据以进行修辞活动的客观规律、原则系统本身。语言的使用领域和交际目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修辞境界。

修辞手段是翻译过程中运用的主要语言手段之一。译品质量跟修辞形式的正确运用很有关系。例如，培根（Bacon）的散文以结构严谨，对仗工整，尤其以三项式排比著称。他的 *Of Studies* 有句话是：To spend too much time in studies is sloth; to use them too much for ornament is affectation; to make judgment wholly by their rules is the humour of a scholar. 翻译家王佐良不但传其“神”，而且表其“形”，即采用相应的修辞手段：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英语用三段式的排比结构，译文几乎用同样的结构呈现原意。

英汉两种语言的辞格常可转换为不同的辞格。当不能用相应的或适当的修辞格表达时，汉语也可采用其他描述性手法，但应在准确表达原文思想和精神的基础上，尽可能保持原文的生动性。例如：1. *over head and ears* in love 深陷于爱情之中 2. Early Reagan was a *mirror image* of early Carter. 里根刚上台时的做法跟执政初期的卡特毫无二致。参见“辞格翻译”

修辞学 rhetoric

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如何根据题旨情境，调动、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和各种表现方法，来恰当地表达思想和感情，以求得最佳的表达效果。修辞学以修辞现象所具有的条理、规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条理、规律和修辞观念系统的揭示，指导人们运用和创造各种修辞方法，以适应繁复的社会交际的需要。各种语文材料的修辞潜能和表现功能的特点，常常需要通过对比分析才能被揭示出来，因此比较是修辞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在英汉翻译中，辞格的转换更需进行对比分析。大部分英语常用修辞格都能在汉语中找到相似、甚至相同的修辞方式，而相似之中又各有特点。由于双方历史、文化（包括美学观点）、习俗的不同，在表达同一概念时，有时使用不同的修辞格；即使采用同一个修辞格，例如比喻，在结构方式、运用范围方面也不尽相同。

辞格翻译 translation of figures of speech

虽然英语和汉语的修辞格在分类和使用上有一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由于英、汉民族在语言环境和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往往在表达同一概念时使用不同的修辞格；即使采用同一个修辞格，例如比喻，在结构方式、喻体、喻义以及运用范围上也不尽相同。辞格翻译可分为三类：可译、难译、不能译。可译者，常可采用对应的辞格，甚至相同的结构，例如排比、拟人和比喻常是可译的。难译者，经常使用变通的手段，设法用彼辞格译出此辞格，或用意译，如对偶、拟声、双关之类。而涉及不同文字字形结构或音韵方面的修辞格往往为不可译，只能另辟蹊径。总之，不论哪一类，都应该采取恰当的、最接近原文的翻译方法，使原文中音、形、义的修辞效果尽可能完美地传达出来。

反复 repetition

指通过重复同一单词、词组或语句使人加深印象，重复部分往往含有强烈的情感或优美的节奏。英语反复有多种形式，有连续反复（immediate repetition）、间隔反复（intermittent repetition）、首语反复（anaphora）、尾语反复（epiphora）、首尾反复（epanalepsis）、尾首反复（anadiplosis）等多种。翻译时有的可作简单重复，如 Double delicious. Double your pleasure.（广告语）双份美味，双份愉悦。但根据译文修辞需要，常应作变通处理，如：Some fishing boats were becalmed just in front of us. Their shadows *slept*, or almost *slept*, upon the water, a gentle quivering alone showing that it

was not complete *sleep*, or if *sleep*, that it was *sleep* with dreams. 眼前不远，渔舟三五，凝滞不前，樯影斜映水上，仿佛睡去，偶尔微见颤动，似又未曾熟睡，恍若惊梦。原文 sleep 及其过去式 slept 一词重现五次。译文隐去两个，另三个分别译为“斜映”“睡去”“熟睡”，无一重复。有时，原语中没有重复，出于修辞的需要，译语需要重复，如：1. The point of learning is to share it, whether with colleagues or students. 学术的要点在于分享，无论是跟同事还是跟学生分享。2. 那天显得特别长，我们上床时已精疲力尽，心情坏透了。It had been a *long*, *long* day, it seemed, and we went to bed very sad and exhausted.

反语 irony

指说反话，通常使用与本义相反的词句表达本义。它可以用反面的词语来表达正面的意思，可以表示亲昵的感情，但多用于批判、揭露或警示，具有讽刺辛辣、幽默风趣的效果。当直译不产生误解时，直译之，如：If people keep telling you to quit smoking cigarettes, don't listen... They're probably trying to trick you into living.（广告语）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地劝你戒烟，不要理他——他们大概是想骗你活得长久些。但是，当直译不能传情达意时，应不拘泥于原文字面，采用补偿或变通的译法，如：They were, in fact, very fine ladies; not deficient in good-humour when they were pleased, nor in the power of being agreeable when they chose it; but proud and conceited.（Jane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事实上，她们都是非常好的小姐；她们并不是不会谈笑风生，问题是在要碰到她们高兴的时候；她们也不是不会待人和颜悦色，问题在于她们是否乐意这样做；可惜的是，她们一味骄傲自大。（王科一译《傲慢与偏见》）

双关 pun

指一个词、一句话表达两层不同的意思，或借题发挥，或旁敲侧击，借以使语言活泼风趣，收到由此及彼的效果。例如，英语和汉语中的双关均可分为谐音双关(homophone)和词义双关(homograph)。谐音双关由词义不同的词的谐音构成，词义双关是利用一词多义构成的。由于英语和汉语语音系统差别很大，多义词极少对应，所以翻译双关语时一般只能达到意义相当，而双关的情趣有失。常用的手法是翻译时用两组平行的词语或两个并列的句子把源语双关的两重意思说出来，如：1. Give your hair a touch of *Spring*.（广告语，词义双关）给您的头发洒满春色，让您的头发富有弹性。2.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竹枝词》，谐音双关）Between the willows green/the river flows along,/My beloved in a boat/is heard singing a song./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the east basks in sunshine,/*My beloved is as deep in love/as the day is fine.*

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达到双重效果，即保留双关辞格的译文也是有的。如：“娘，他们……是要剥我们中国人的脸皮啊，你知道吗？”骄阳下，柳树上，回答他的是一片“知了，知了”的蝉声。（毛炳甫《剥皮香蕉》）“Mother, what they asked me to do was not ... but to lose face for all Chinese! Don't you see?” Under the scorching sun, from the willow tree, came the confirming reply of the cicada's chirrup: “*See, see* ...” 这里，如果“知了”译成 I do，蝉声便完全丧失，现改用 see，巧妙地保留了同音同义的双重效果，完好地译出了双关语。

按照比利时学者德拉巴斯蒂塔(Delabastita)的分类，双关语翻译大致有如下方法：1. 译成相同的双关语，保留原文的两层意思；2. 译成不同的双关语，译文双关语的一层或两层意思与原文不同；3. 译成“类双关语(punoid)”，即运用重复、头韵、脚韵、所指含糊、反语等带有文字游戏性质的修辞手段来再造原文双关语的效果；4. 译成非双关语；5. 双关语译成零，即删除包含双关语的文字；6. 照抄原文；7. 非双关语译成双关语；8. 译成同类双关语，即在译文中加入一些包含双关语的全新的语篇；9. 编辑手段，即在译注或译序中解释原文双关语的意思或提供另一种译法。这些策略可结合使用。张南峰(2003)认为，译者还可以将类双关语译成双关语，编辑手段既可以在文外，也可以放在正文中。

矛盾修辞法 oxymoron

指英语中由两个意思正好相反的词或词组构成的一种修辞格，作用是揭示事物的矛盾性，产生一种出人意料、引人入胜的表达效果。汉语里的反映修辞格与之相似。矛盾修辞法常直译，例如：“It were not fit I should do so,” answered Rebecca, with *proud humility*, “where my society might be held a disgrace to my protectress.”（Walter Scott, *Ivanhoe*）“我那样做不恰当，”丽贝卡带着一种骄傲的谦虚回答说：“因为由我来做伴，会被认为使我的女保护人有失身份。”“骄傲的谦虚”揭示了丽贝卡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但她有高度的自尊心这样一种矛盾。但是，由于语言习惯或文化背景不一，这一辞格有时不能直译，可转换辞格或作词义引申，例如：painful pleasure 悲喜交集（比较：“痛苦的喜悦”），a cheerful pessimist 纵情酒乐的厌世者（比较：“愉快的悲观主义者”），cruel kindness 害人不浅的仁慈（比较：“残忍的仁慈”）。

对偶 antithesis

辞格之一，指上下两句结构整齐、字数相当、甚至讲究韵律。它形式上要求严格，但有一定的可译性，如：1. The choice is yours. The honour is ours. 您的选择，咱的荣幸。2.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毛泽东《七律·送瘟神》）Crimson rain swirls in

waves under our will, Green mountains turn to bridges at our wish.

仿词 nonce word

辞格之一,指为了表达上的需要,临时更换现成词语中的某个词或词素造出的新词语。仿词用得得当,可使语言生动形象、含蓄幽默或具有讽刺色彩。仿词有时可捉对翻译,如:1. I had no *outlook*, but an *uplook* rather. My place in society was at the bottom. (Jack London, *What Life Means to Me*) 我没有人生观,但可以说有一种向上爬观,我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底层。2.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Some people said this was *covert scheme*; we say it was an *overt one*. 但是,由于文化差异以及构词、句法的不同,仿词多用各种变通的方法译出。如:1. He is still *honey-moonish*. 他蜜月情意依旧。2. 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keep clamouring for *transformation to a mass style* but cannot speak three sentence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common people. It shows they are not really determined to learn from the masses. Their minds are still *confined to their own small circle*.

夸张 hyperbole

辞格之一,指凭借丰富想象,用铺饰张大的语言,对事物的某些方面着意夸大或缩小,进行艺术渲染。夸张一般直译,对夸张的内容无须改变,也不能改变,但在涉及语言习惯时,可略作调整,如:1. Thanks a million. 万分感谢。2. I've told you fifty times. 我对你讲过无数次了。

排比 parallelism

辞格之一,指用结构相似、语气一致、关系并列的一组语句接连表达几个相关意思。排比一般可直译,如:To spend too much time in studies is sloth; to use them to much for ornament is affectation; to make judgment wholly by their rules is the humour of a scholar. (Francis Bacon, *Of Studies*) 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王佐良译《论读书》)又如:延安的歌声是黑夜的火把,雪天的煤炭,大旱的甘霖。(吴伯箫《歌声》) Songs of Yan'an are *torches in the dark night*, *charcoal fire in the snowy weather*, and *timely rainfall in the severe drought*.

拟人 personification

辞格之一,指把人以外的无生命之物或有生命之物当作人来描写,把本来只适用于人的动词、形容词、名词或代词等用于写物,令人感到非人的事物具有人的属性。拟人一般可直译,如:1. I have ever been the sport and toy of debasing circumstances. *Ignominy*, *Want*, *Despair*, *and Madness*, have collectively or separately, been the attendants of my career. 我一向遭受害人的环境戏弄。羞辱、贫困、绝望和疯狂,已经集体地或者单独地成为我的生涯中的侍从。2. 群山肃立,江河挥泪,辽阔的祖国大地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The mountains *are standing in solemn silence*; the rivers *are shedding bitter tears*; our vast motherland *is soaked in enormous grief*.

但是拟人有时带有一定的文化背景或习惯用法,翻译时须变通处理,如:Dawn was beginning to prowl about the sky and put out the stars. 译为:黎明悄然来临,星星暗淡无光。(直译为:黎明开始在天空中悄悄地来回走动,扑灭了群星。)

拟声 onomatopoeia

辞格之一,指对各种生物或无生物发出或产生的声音的模仿。拟声造词是简单的、原始的构词法,世界各族语言都有大量的拟声词。但是对声音的模仿,受到语音系统的限制。所以不同语言据以产生的拟声词很少等同,有的相似,有的完全不同。如 growl([狗、虎]咆哮、[雷]轰鸣)、bark(吠声)、roar(咆哮,[狮]吼)、neigh([马]嘶)、bleat([羊、小牛]咩咩)。英语中模仿金属声的有 clash, clank, clink, ting, tinkle, clang, jangle, ding-dong, tick-tack 等;模仿水等液体声的如 splash、bubble、sizz、sizzle、splish-splosh 等。拟声词的翻译有三种方法:1. 照译(拟声词在句中的地位可能有变):① *Crack!* The stick broke in two. 咔嚓!棍棒断成两截。② 高跟皮鞋声阁阁地由外而来……(茅盾《子夜》) Presently there came the *click* of high-heeled shoes ... 2. 变通不译:① The cock in the yard *crowed* its first round. 院子里的雄鸡已叫头遍了。② 木柴在火中哔哔剥剥烧得正旺。The logs were burning briskly in the fire. 3. 增译:① There were no sounds but that of the tread of the men and footsteps of the two shaggy ponies which drew the van. 那时候,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以及拉车的那两匹鬃毛蓬松的小马得得的马蹄声,除此之外,再听不到别的声音了。② 阿二已经走了。两个女人对骂。(茅盾《子夜》) Ah Erh had slipped out of the room, leaving the two women *screaming* abuse at one another.

总之,拟声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英语中有的拟声动词与拟声名词同形,融音与义为一体,如上例中的 crow, scream,翻译时既要保持原文的语言特点,又要注意其差别,尽可能使译文声色并茂。

拈连 zeugma

亦称"轭式搭配法",源于希腊文 zeugnynai(用一副轭套上两只牲口),指用一个词(通常是形容词、动词或介词)来搭配两个名词,而起修饰或支配作用的

关键词只能与其中的一个词构成自然搭配，与另外的词的搭配表面上显得格格不入。这种辞格的特点在于：语言凝练、含义深刻、幽默风趣。汉语修辞格“拈连”也是用一个词与表示两类事物的词搭配：甲乙两类事物连在一起，把本来适用于甲事物的词语连用到乙事物上。所以翻译时汉语的拈连和英语的 zeugma 可互相转换，例如：weeping eyes and hearts 一双双流泪的眼睛和一颗颗哭泣的心（weeping[流泪的]本来只能与 eye[眼]搭配，与 heart 搭配应用 grieving[哀伤的]或 bleeding[流血的、悲痛的]）。

但是，英汉两种语言毕竟差异很大，zeugma 和拈连虽说形式和作用相同，但并非尽可互译。如：She lost her heart and necklace at a ball. 她在一个舞会上倾心爱上了一个人，却丢失了她的项链。（lose her heart 中的 lose 意为 give up，而 lose her necklace 中的 lose 意为 become unable to find，这里，对于汉译来说，lose 的两层意思搭不到一起，只得分译。）又如：On his fishing trip, he *caught three trout* and *a cold*. 他出外垂钓，钓得鲑鱼三条，害了感冒一场。（catch 可同时与 three trout 和 a cold 搭配，而汉语的“钓”只能与“鲑鱼”连用，不能与“感冒”结合，只得分而治之。）

咒语　incantation

指表示诅咒、发誓、祈愿之类的言词。英语和汉语都有咒语。英语常用“天堂”“地狱”“上帝”“魔鬼”等词语，汉语常用“死(亡)”“杀”“鬼”等词语。这些词在咒语中往往不表示其字面意义，所以需根据两种语言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习惯进行意译。例如，1. damn（原意为“上帝降罚”“使入地狱”）：① I'll be ～ed if I do. 我要干这事，就不是人！② God ～ you! /～ you! 混账！该死的！③ ～ it! 该死的！他妈的！糟了！④ ～ this work! 讨厌的工作！⑤ Grammar be ～ed! 去他妈的语法！2. devil(原意为“魔鬼”“恶魔”)：① You can go to the ～! 你可以滚蛋了！② The ～ take it! 糟了！该死！见鬼！③ What the ～ do you expect me to say? 你到底要我说什么呀？④ The ～ he is honest! 他要诚实才怪哩！⑤ Ha! ha! What a ～ of a name! 哈哈！多怪的名字！汉译英如：① 该死的！Damn you! ② 见鬼去吧！To hell with you! ③ 不得好死！Hang you! ④ 你这个杀千刀！You be hanged! ⑤ 挨刀货！Blast you!

委婉　euphemism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将这种修辞手法定义为“说话时不直白本意，只用委曲含蓄的话来烘托暗示”，通过使用语义模糊的词语，或者通过比喻、借代、借喻等修辞手法来描述一些听起来刺耳、不太文雅的事物或代替禁忌语(taboo)，克服这些概念给人们带来的不愉快、尴尬，或者掩盖事实真相，起到美化、粉饰的作用。例如死亡这一现象，由于其神秘性，各个时代的人们使用许多婉转的概念来描述这一令人恐惧而又无法超越的过程。描述死亡的委婉语，英语与汉语都可谓丰富多彩，并且呈现多侧面性。就汉语而言，古汉语中讳称诸侯帝王的死为“驾崩”“薨”“泰山崩倒”，平民百姓的死为“卒”“亡”；军人武士的死称“阵亡”“战死沙场”“牺牲”“就义”；领袖人物的死称“巨星陨落”；女性的死，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死，称“红颜薄命”“香消玉殒”；佛教徒的死为“圆寂”“涅槃”“灵魂出壳”；道教的说法有“驾鹤西归”；老人的死为“寿终”；年轻人的死为“夭折”；好人“死得其所”，坏蛋“死有余辜”；文雅的死有“逝世”“安息”“去了”，粗俗的死有“展腿”“翻白眼”“见鬼”“见阎王”“呜呼哀哉”。同样，英语中对于死亡的分类也甚为详尽，比如，医院里病人死了，英语中习惯用 The patient expires；家里亲属去世，英语中习惯用 be gone, fall asleep；军人战死沙场，英语中习惯用 bite the dust, buy the farm；坏蛋死了，英语中习惯用 cast into outer darkness；基督徒的死亡，英语中习惯用 go to the glory, join the choir, be with God；文雅的说法有 go to sleep, be no more, pass away, demise；粗俗的说法有 kick the bucket, kick up one's heels。

在委婉语的翻译中，文化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了解目的语与源语文化背景之区别，才可能译好。

明喻　simile

辞格之一，指把所要加以描写刻画的事物，用比喻词与另一种具有鲜明的相似之处的事物联系起来，从而更形象地、更深刻地说明事理。汉语中常用的比喻词有：像、好像、似、好似、如、犹如、若、宛若、仿佛、如同、跟……一般(样)等。英语常用的比喻词有as ... as, as ... so, as if, as though, like 等。明喻常可直译，以保留原文的文化形象与民族风格。如：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我像一朵浮云独自漫游。又如：她着实心广体胖，结实得像一条小牛。（曹禺《日出》）She is really hale and hearty and as strong as an ox.

但是，由于原文喻体的内涵与译文相应词的内涵不同，有时只得弃直译而用意译，或使之归化，或转换为别的辞格。如：1. as old as the hills 天长地久/年深日久；2. as tall as the Maypole 像电线杆一样高；3. as cunning as a dead pig 像狐狸一样狡猾。当然，同一明喻，采用不同译法也是常见的。如：1.（吕）布东西冲杀，如入无人之境。（罗贯中《三国演义》）Lü Bu went to and fro slaying all he met. He was irresistable. 2. 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鲁迅《伤逝——涓生的手迹》）She, however, was completely fearless and impervious to all this. She continued slowly and calmly on her way, *as if there were no one in sight*.

幽默　humour

指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的语言（包括肢体语

言),其拉丁文原意是"起润滑作用的液体"。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幽默是一种行为特性,它激发喜悦,引起欢乐,松弛神经,以轻松愉快的方式使人获得精神上的快感,常用双关、反语、夸张等修辞手法来产生语言的幽默感。幽默是语言文化的积淀,不同文化的民族幽默方式很不一致,因此幽默语言的翻译较多地涉及修辞格的转换及文化的移植。译者翻译幽默文本时不能拘泥于原文。译者首先考虑的不应是对原文本身的忠实,而应该是对原作意图的忠实,体现作者意欲表达的幽默效果。例如: A fruit vendor sold a watermelon to a gentleman and assured him that it was very sweet, because it was red inside. As he cycled home, the bike skidded and the watermelon fell to the ground and broke open. The gentleman was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he melon was pale pink and not red. So he returned with it to the vendor and complained loudly. "Sir," replied the vendor, "when one falls off a bike to the ground, one can expect to turn pale."该幽默文本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贩子卖了西瓜给一位先生,并保证红瓤香甜,结果这位先生大呼上当。当他抱着白瓤微红的西瓜回来向小贩抱怨时,小贩说了句幽默话,以期缓和气氛。如果译者不顾"作者意图"而将最末的画龙点睛之笔译为"先生,当一个人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时候,估计他的脸都会吓白",那么,原作中的幽默感便会消失殆尽。假如将其改译为"先生,你瞧,一个人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时脸都会吓白,更何况是一个西瓜呢?",其戏谑与谐趣则跃然纸上。

隐喻 metaphor

亦称"暗喻",即把要说明的事物比喻成另外一种具有鲜明的同一特点的事物,从而更形象、更深刻地说明事理,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隐喻经常直译。如: 1. The thought was *fire* in him. (J. London, *Martin Eden*)这种想法是他胸中的一团烈火。2. 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篇章! 这是人类思维的花朵。(徐迟《哥德巴赫猜想》) What inspiring chapters! They are the *flowers* of the human brainwork.

但是,由于英、汉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不同,同一喻体承载的喻义可能是不同的,尽管英、汉对应词的指称意义可能相同。这时,译语需要用不同手段加以表达。例如: 1. He was so fond of talking that his comrades nicknamed him "*magpie.*" (Margaret Mitchell, *Gone with the Wind*) 他如此唠叨,同伴们给他起了个"麻雀"的外号。原文中 magpie 与汉语指称意义对应的"喜鹊"的喻义产生了冲突。magpie 喻指"唠叨",而"喜鹊"喻指"吉利"。于是,只能改变形象,以"麻雀"代之。2. And I suppose she'll tell all the boys, *the old cat*. (我猜想她会告诉所有的男人,这个长舌的老恶婆!)译文通过释义把 cat 的喻义——心地恶毒、爱说别人坏话的女人——这一层意思表达出来了。

隐喻是认知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以前只把隐喻看做一种修辞格,而认知理论认为,隐喻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认知活动,可以说,隐喻是人类认知理解客观世界的重要工具和分析方法。人类思维过程隐喻化会使人们参照他们熟悉的、有形的、具体概念来认识、对待或经历那些不熟悉的、无形的、难以定义的概念,形成一个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认知方式。例如,容器隐喻(container metaphor)就是人们把人体看做一个容器,有分界面,有里外等。人们将这一概念投射于人体之外其他物体或事件,如汉语中有"长江口""心口痛""人口""瓶口""开口说"等表达;英语中也常用容器隐喻,如: The ship is coming into view. (船儿进入视野之内,可引申为"船儿出现在眼前")(VISUAL FIELDS AS CONTAINERS)所以,如果我们把翻译看做一种认知活动,而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那么在源语中所表达的那些在目的语文化中不熟悉的、难以接受、难以表达的东西,如特有事物、美学内涵等,就可借助隐喻这个认知工具来处理和解释。

移就 transferred epithet

辞格之一,指把本应描写甲类事物性质状态的定语用来形容乙类事物。例如,把本来用于修饰人的形容词移来修饰同人有关的事物。移就有常规搭配所没有的效果:不落俗套、情景交融、耐人寻味。中外文都有这类修辞格,大多可以直译。例如: 1. *Gray peace* pervaded the wilderness-ringed Argentia Bay. 一片灰色的宁静笼罩着四周荒漠的阿根夏湾。2. 然而悲惨的皱纹,却也从他的眉头和嘴角出现了。(《鲁迅全集》第二卷) *Miserable wrinkles* began to appear between his eyebrows and round his mouth.

当不能直译时可采取其他变通手段,如: 1. After an *unthinking* moment I put my pen into my mouth. 过一会儿,我无意识地将钢笔噙在口中。——变换词类; 2. Franklin Roosevelt listened with *bright-eyed smiling attention*. 罗斯福眼睛明亮,面带笑容,聚精会神地听着。——分译; 3. I had no temptation to take a *flying holiday* to the south. 我没有受假日乘飞机去南方旅游的诱惑。——释义

叠字(词) reiterative

指两个相同的字(词)重叠起来使用而形成的一种修辞手段,具有音韵之美,形体之美。英、汉语均有叠字(词),但结构和特点不同。汉语叠字有 AA 式,如"浓浓(的)""看看";A 一 A 式,如"看一看""走一走";AABB 式,如"来来往往""熙熙攘攘";ABB 式,如"黑糊糊""灰蒙蒙";ABAB 式,如"考虑考虑""琢磨琢磨"等。英语叠词有两种:1. 两个相同的词重叠,如 bye-bye, fifty-fifty, no-no, so-so;2. 两个构词成分略有不同的词重叠,但押韵,如 boo-hoo, fuddy-duddy, hocus-pocus(词首辅音不同);chit-chat, flip-

flop, zigzag(元音不同); acey-decey, artsy-craftsy, Okey-dokey(分别以元音、辅音开头,后半部相同)。由于英语中的叠词比汉语少得多,且使用面较窄,所以,汉译英时形式上很难对应,一般用语义相符的词译出。如:医生仔仔细细给病人作了检查。The doctor examined the patient *very*, *very carefully*. /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Who knows that *ev'ry* grain in the bowl / Is the fruit of so much pain and toil? (Teresa Li 译)不过,在汉语叠字英译时,也应努力寻求神韵相当的对应形式,特别在翻译拟声叠字时,例如:……凝神听着从殿前传来的一片"嗒嗒嗒嗒"马蹄声…… Their full attention was riveted on "*clip-clop*" of approaching horses ...

英译汉时应尽量选用汉语的对应词,以保持原语的韵味。例如:1. In the city the only return he ever got for his toil was the dull *clink-clink* of copper coins. 他在城里干活唯一的回报是令人讨厌的铜钱的"叮当叮当"声。2. There was so much to see, and we'd always stop to *chit-chat* with friends. 可看的东西多着呢,于是我们常停下来和朋友聊一聊。汉语叠字丰富,不但能增添声音美,而且可表达感情色彩和加强语言的形象性,因此在汉译中经常使用。如:See yonder thin column of smoke *curling up* through the woods from some invisible farmhouse. 那边有炊烟一缕,冉冉地从林中升起,林里的农舍我们是看不见的。

成语 idiom

熟语的一种,指某种语言中习用的一种固定词组。它在语言中起词的作用,整个成语构成一个句子成分。成语有的来自民间口语,有的来自文学作品,有的来自历史事件或历史故事,有的来自宗教经典。其特点是言简意赅,富有形象性,可增强说话和写作的表现力。成语的含义通常并不等于组成成语的单个词词义的总和。有些成语的组成词完全失去独立性,如汉语中的"纵横捭阖""茅塞顿开";英语中的 cry for the moon(痴心妄想);俄语中的 бить баклуши(游手好闲)等。有些成语的组成词保留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如汉语中的"一丘之貉""浑水摸鱼";英语中的 pour oil on fire(火上加油);俄语中的 в огонь и в воду(赴汤蹈火)等。有些成语的组成词基本上保持独立性,如汉语中的"骄傲自满""厚今薄古";英语中的 to make allowance(留出余地);俄语中的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参加)等。汉语的成语多数由四个字组成。由于成语结构定型、语义统一,除少数形式对应外,一种语言的成语一般难以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成语,具体译法参见"文化词语翻译"。

俚语 slang

指粗俗的或通行面窄的方言词。俚语不但出现在口语中,而且也出现在戏剧、电视、电影以及小说的对白中。英语和汉语都有性质相同的俚语。俚语一般可分委婉语、咒语和粗俗语。俚语的译法分别见各有关词条。

典故 classical allusion

指诗文中引用的历史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能引起读者的联想。典故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形象,体现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外语言中典故浩如烟海,为了正确理解并准确地译出典故的喻义、形象的联想意义,首先需要了解相关的文化历史背景。典故的译法有:1. 直译——有利于保存源语的形象和色彩,亦有利于丰富目的语的表现力,如 to extend an olive branch(伸出橄榄枝),"纸老虎"(paper tiger)。2. 音译,如张继《枫桥夜泊》中的"寒山寺"可译为 the Han Shan Temple。(有两种英译本分别把它译成 the temple on Cold Mountain 和 the Temple of Cold Hill,但寒山寺周围没有寒山。)3. 直译加注,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woul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又如 Münchausen's syndrome 一词,对少数本行的专家,直译"闵希豪森综合征"即可,但是对范围更广的读者(包括一般医务工作者),似以附加注释为好,可注释为"以著名的夸张故事《吹牛男爵历险记》中的主人公闵希豪森男爵得名,表现为幻想性虚构病史,到处求医或有住院癖"。这一术语也有简单地译为"假装急病求治癖"的。4. 意译,Naderism (the principle of "customer first")如直译为"纳德主义",几乎等于没有翻译,因为很少有人知道 Nader 是谁。Nader 为英国律师,首先提出"用户第一"的观点,据此可译为"用户第一主义"。唐朝诗人张祜的《宫词》一诗中有"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的句子,引用古代歌手何满子献歌赎罪而不得国王赦免的故事。许渊冲把《何满子》译成 the dying swan's sweet lay,改变了形象,译出了原意。5. 套译,源语典故文化特色不明显时,可采用色彩相当的目的语套译,如"破釜沉舟"(burn one's boats)与"隔墙有耳"(walls have ears)。

惯用语 colloquialism

指口语中习用的一种固定词组,其意义一般都是比喻义或引申义。在结构形式上,汉语惯用语多用三字结构,有时也可拆开、加字。例如:汉语的"碰钉子",可说"碰了(个)钉子""碰了个软(或硬)钉子"。在使用特色上,惯用语的口语性强,而成语的书面语性质较强。在惯用语的翻译中,直译的不多,如:婚外恋(extramarital love)、当家教(teach in a family)。有的在直译不能完全表达时,间夹意译,以使原有内容充分表达,如:单打一(concentrate on one thing only)、咬耳朵(whisper in sb.'s ear)。常用意译,如:门外汉(layman)、扣帽子(put a label on sb.)。也用解释性翻译,如:三陪女(a "three-service" girl who keeps a client company in eating, drinking and

singing)、连锅端(get rid of the whole lot)。当然，也有套用英语习语的，如：杀风景(be a wet blanket)、露马脚(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谚语 proverb

指在民间流传的固定语句，用简单通俗的话反映出深刻的道理，是社会经验的总结。谚语作为民间文学形式的一种，具有诗的活泼、文的凝重、熟语的简洁，因而在各种文体中都常见。谚语的洗练和深刻是一个民族在其漫长的语言文化发展中大浪淘沙、去粗存精的结果。英语中有这样一句谚语：Proverbs are the daughters of daily experience.(谚语是日常经验的女儿。)谚语难译，主要原因是：1. 有时无上下文，只是孤零零的一二句；2. 译者缺乏有关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3. 有的谚语源远流长，出于希腊、古罗马或方言土语；4. 中西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具体译法参见“文化词语翻译”。

粗俗语 vulgarities

指粗鲁、庸俗的话语，常含侮辱性，听来不悦。粗俗语用词跟性和性器官有关，但不表示其字面意思，常用来表示烦恼、惊奇、侮辱、抗拒、拒绝、强调等。英语粗俗语中的常用词如 fuck(性交)、screw(性交)、bugger(鸡奸)、sod(同性恋)、balls(睾丸)、shit(粪便)、crap(屎)、bastard(私生子)等。例如：1. “Can I have a word with you?” — “Sod off!”“我能和你说句话吗?”——“滚开!”2. Balls to the lot of you — I'm going home! 去你们的！我可回家了。3. Who has fucked up the TV? 谁他妈的把电视机搞坏了? 4. Don't talk crap / shit! 不要胡说八道！汉语粗俗语及其英译如：1. 忘了本的小娼妇儿！Ungrateful slut! 2. 他妈的，你们有话就说嘛！If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say it, damn you! 3. 还有你这个浪货，跟谁来不行，非跟他！And you too, you baggage. Couldn't you have picked somebody else? Why did it have to be him? 4. 王八蛋们，怎么又在这儿碰上啦? You devils, so we meet again.

在特殊情境下，粗俗语可表示恐惧、戏谑，甚至亲昵和赞赏。如 Harry, you old bastard! Fancy meeting you here. 哈里，你这老家伙！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你。(Bastard 的原意是私生子，这里表亲昵。)(刘白玉 2007)

歇后语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

指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句话，前一部分像谜面，后一部分像谜底，有时只说前一部分，而本意在后一部分。大部分歇后语都采用比喻这一修辞方式。歇后语的常见翻译方法有：1. 对比喻生动形象、目的语文化容易接受的歇后语，常采用直译，以保留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如：咱们俩的事，一条绳拴着两蚂蚱，谁也跑不了！We're like two grasshoppers tied to one cord: neither can get away! 2. 改变形象，用译文读者熟悉的比喻进行翻译，采用不同的比喻，传达同一种精神，达到所谓的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如：你可倒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Well, you certainly are a guy! A dog given a bone who doesn't come back for more! 原文的“肉包子”在译文中变成了 bone(骨头)。3. 对那些带有浓厚的中国民族色彩的歇后语、双关的歇后语以及谐音歇后语，只能意译，即省去前半截的比喻部分，译出后半截的实际意思，如：1. 穷棒子闹翻身，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When we pass from the old society to the new, each of us shows his true worth. 2. 对新药业，老实讲，我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To be quite honest with you, I don't know the first thing about the modern drug business.

熟语 idiomatic phrase

指语言中固定的词组或句子，只能整个应用和理解，不能随意变动其中成分，且往往不能按照一般的构词法来分析，如汉语中的“胸有成竹”“喝西北风”“吃大锅饭”“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英语中的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石二鸟/一箭双雕)，One swallow does not make a summer(独燕不成夏)。熟语与一般词组和句子的差别在于：前者作为现成的语言材料存在和使用，后者在言语过程中临时组织起来；所以熟语是语言单位，而一般短语或句子是言语单位。熟语的特征有二：1. 语义的统一性：熟语在语义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其语义超过字面意义的总和；2. 结构的固定性：其结构是定型的，不得随意更改其结构模式和增减其组成成分，如不能把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中的 stone 按汉语表达方式改为 arrow。熟语主要包括成语、格言、惯用语、谚语、歇后语等。

韵律 rules of rhyming

1. 指运用语音音素有规则的组合所构成的诗歌语言的节律。声音的高低、轻重、长短的交替配合，停顿的调协，相同音色的复现，句末或行末特定位置上的押韵等，使诗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节律。不同民族语言具有不同的声韵特点，因而构成诗歌语言韵律的因素和规则也就不同，如汉语的古典诗词通常按平仄交替、相对的格式和同韵相押的规则构成韵律，西洋诗歌则运用轻重音、长短音、音步、顿数等构成韵律。翻译诗歌强调意境和诗行形式，由于韵律构成的不同，押韵不易，翻译上常有困难，但也有做到比较完美的，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金昌绪《春怨》)——Oh, drive the golden orioles/From off our garden tree! Their warbling broke the dream wherein/My husband smiled to me. (*Complaint in Spring* Tr. by Fletcher Rew, by Z. D. Lin)2. 指话语里声调、重音、停顿、语调等所体现

的语音特征。参见"音韵效果"

译诗要不要译韵,翻译界一直有争议,赞成者居多。根据关联理论,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读/听者的期待调整相关参数,在保证交际效果的前提下,应使源语和目的语文本最大限度地趋同。韵体诗体现诗人用韵的交际意图,读/听者对此可能也有相应的期待,故译者须努力克服语言差异,再现韵律,尤其当韵律成为主要交际意图时更是如此。反对者认为,中英两国语言的语音系统不同,韵律不同,不能勉为其难。

翻译体　translationism

与本民族文学的"创作体"相对,可以泛指一切外来的翻译文学作品在文体上的总称。翻译体具有一些共同的文体学上的基本特征。例如,作品所表现出的异国情调和异国风味,社会习俗和价值与信念系统的不同,外来语言特征,包括一定程度的欧化句法和篇章构成等。参见"翻译腔""翻译症"　（王宏印）

翻译腔　translationese

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平庸的译文。平庸的译文并非有错,而且意思也能明白,有的时候意思成句明白而成段不明白,但是不显豁,不鲜活,没有文采,没有趣味,不生动,不吸引人,让人读起来提不起劲儿,俗语叫"味同嚼蜡"。究其原因和表现,多数是翻译语言的夹生状所致,因此略等于"欠额翻译"(under-translation)。二是不自然的语言。不自然的语言并非不符合语言规范,甚至是过于符合语言规范而显得没有瑕疵,就像一张用电脑设计出的美人脸,没有个性,没有生活,没有神采。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译文缺乏方言和地道的口语表达方式,而一味地规范化。当然,也有译文各种语言混杂不精的非理想状态。三是过度翻译(over-translation),即乱加文辞以显高雅,总喜欢把译文弄得文绉绉的,花哨哨的,假惺惺的,例如,一客套就是"三生有幸""荣幸之至",一痛苦就是"心如刀绞""悲痛欲绝",等等。另外,古典语言和书面语的不当使用,四字成语和典型的汉语常用句法的套用和滥用,也能形成翻译腔。(王宏印 2006)参见"翻译症""翻译体"

翻译症　translationese syndrome

主要特征为文笔拙劣,即译出来的东西不自然、不流畅、生硬、晦涩、难懂、费解,甚至不知所云。这种"症状"往往不是由于译者文化水平低、写作能力差而产生,而是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原文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和束缚,使译文不符合译文语言的表达习惯。翻译症主要见于笔译。笔译要求严谨准确,字斟句酌,有人因此而死抠字眼,在译文的用词、比喻、结构等方面力求与原文一致,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如果说译文的翻译体略见清新,翻译腔显得平庸,那末翻译症文字拙劣,须要"治疗"了。比较"翻译腔""翻译体"。

翻译修辞学　translational rhetoric

是一门研究翻译中的词语、句式以及文体选择的学问,是翻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可直接指导翻译实践。它以翻译中的广义修辞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原作修辞特色的理解与分析、译文词语和句式的选择、篇章结构的调整、文体与风格的再现以及修辞格的处理等,归根结底都属翻译修辞学的研究范畴。具体而言,翻译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分为以下五项:1. 原作修辞形式与内容的分析方法,即如何把握作者的意图,如何分析作者在特定情境、对特定对象传达信息时采用的语言手段选择艺术;2. 翻译修辞的标准,即翻译中的遣词造句拿什么作为依据和指导原则;3. 翻译修辞资源的系统描述,即对于目的语中可资利用的同义表达方式作尽可能详尽的整理归纳;4. 翻译修辞的矛盾,即翻译语言手段的选择中,作者意图和译者意图、原作情境和译作情境、原作读者和译作读者、原文修辞资源和译文修辞资源等一系列矛盾的处理方法;5. 修辞格的处理。翻译修辞学的实践意义在于提高译文的整体质量,理论意义是丰富翻译的文体学理论、翻译批评理论,充实翻译学体系。(杨莉藜 2001)

12. 语言学　符号学

语言学　linguistics

主要研究语言的本质、功能、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是翻译学最重要的交叉学科之一。它对源语把握、目的语生成,直到翻译技能的养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有指导意义。翻译理论的系统研究是从现代语言学起步的。广义的应用语言学泛指把语言学知识应用于其他科学领域,因此直到现在仍有人把翻译理论研究归在应用语言学的门下。

现代语言学把人们对人类语言的看法及其研究成果概括成一般理论。人类语言之间存在着一些普遍特征。能够证实这个假说的例证,不仅已见诸各亲属语言之间,而且也存在于非亲属语言(如英语和汉语)之间。语言间的共同之处决非巧合,而是因人类有着某些共同的思维方式、共同的自然历程、生活经历及文化背景。

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承载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现代语言学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活动提供比较科学的理论基础。20 世纪 50 年代起,有不少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试图用语言学的观点来解释翻译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或其中的主要问题,以致形成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参见"语言学派"

人类语言学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主要研究语言和文化间的关系,通常指对无文字记载的语言的研究。在美国,人类学家研究美洲印第

安诸语言和文化,结果发现人类学和语言学间有密切关系。早期学者在这方面发现了他们所认为的印第安人诸居民集团在语言、思维和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语言与文化有联系的问题迄今仍有争议,现在许多人都认为上述关系并不像当初所料想的那样密切。当前,人类学家利用语言学方法主要对亲属关系体系、植物分类和颜色术语等这样一些领域进行分析,另外还有许多人从事实地调查和语言的描写工作。

人类文化语言学 anthropological cultural linguistics

人类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操某种语言者的语言和文化行为间的相互关系。这门学科包括以下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是语言决定文化还是文化决定语言?语言对理解力和思维有何影响?语言模式和文化模式究竟是什么关系?这类问题,早为德国学者赫尔德(von Herder)与洪堡(von Humboldt)及其弟子们以理念主义-浪漫主义的传统为背景提了出来。后来在美国再度出现,是由于发现美洲印第安诸语言在结构上的巨大差别,这些语言差别则是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和沃尔夫(Whorf)提出的。他们注意到爱斯基摩语有几个词都表示"雪",而阿兹特克语却仅用同一个词表示"雪""冷""冰"等概念。关于语言、思维和文化具有相互联系的这种见解是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的形式提出的,对此说的正确性西方学术界争议颇多。(袁良平)

历史比较语言学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亦称"比较语言学"。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应用历史比较法揭示有共同来源的语言或方言间的亲属关系,比较亲属语言中的共同成分,研究其在不同时期中的状态和演化规律,构拟出基础语。19 世纪 20 年代起,葆朴(Bopp)、拉斯克(Rask)、格里姆(Grimm)、沃斯托柯夫(Востоков)等把比较法运用于语言的历史研究,创建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经过古尔提乌斯(Curtius)、施莱歇尔(Schleicher)、费克(Fick)等的工作,至新语法学派而达到高峰,使语言研究纳入了严格的科学轨道,语言学因此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计算语言学 algorithmic linguistics

亦称"算法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分支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标志着数理语言学进入第三阶段。应用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以计算机为手段来研究自然语言。着重语义研究,把深层结构作为形式语义的符号系统来处理,建立起一套算法,探讨形式语义同表层结构的抽象关系,以便有效地解决自然语言中的歧义现象。以统计语言学和代数语言学成果为基础,计算语言学在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领域内进展很快,对机器翻译、自动检索、言语识别和言语合成等产生重要影响。

心理语言学 psycholinguistics

指运用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主要采用心理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的新兴边缘学科,建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主要研究人们如何掌握和运用语言、如何运用语言进行思维和表达思想、什么是人的语言机制和语言能力等问题。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50 年代末,是其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以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为基础,着重研究语言编码和解码。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后期,为第二阶段,受到乔姆斯基(Chomsky)语言理论的影响,着重研究人类运用语言的心理过程,主要是:1. 语言运用的模式;2. 语言结构和语义的储存与记忆;3. 大脑对各类句子的处理等。60 年代后期起进入第三阶段,对语义这一心理学上极其重要的概念的研究逐渐转向句子中词与词的语义关系。心理语言学在欧美、日本和前苏联都受到很大重视,取得不少进展。如前苏联的心理语言学把言语看做能动的、有目的的活动,语言能力是语言运用发展的结果。它对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等学科都产生影响,对探索语言的起源、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翻译理论、语言教学、儿童语言发展有重要意义。

比较语言学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系统地比较有关各语言或一种语言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的对应关系。由于比较的内容、方法和目的不同,在语言学中又产生不同的分支。例如,19 世纪的欧洲学者通过语言和词形的比较追溯某些语言的亲属关系,由此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后来有人用比较的方法发现人类语言有各自的特性和某些共同现象,由此产生了类型语言学;为了解决语言教学和翻译问题而对比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有了对比语言学。所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类型(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是比较语言学的三种研究类型。

代数语言学 algebraic linguistics

亦称"形式语言学",是数理语言学分支之一,以结构语言学为基础,应用抽象代数、数理逻辑、自动机理论等,建立语言模型,对自然语言的形式结构进行抽象的数学描写,以建立形式化的普遍语法。主要在句法平面上进行研究,认为语言是全体句子的总和,语法是描写这一语言的有限的规则系统,语言模型则反映了语言和语法间的抽象关系。机器翻译的研究促成了分析性模型的建立,自然语言的形式化研究产生了生成性模型。20 世纪 50 年代兴起的代数语言学标志着数理语言学进入第二阶段,其对语言结构的深入和精密描述,为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开辟了道路,对机器翻译、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般认为,代数语言学只从句法结构的角度研究语言,因而很难解决自然语言的歧义问题。

对比分析 contrastive analysis

亦称"对比研究"(contrastive study),即"对比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对比语言学"这一术语来自美国人类语言学者沃尔夫(Whorf)。1941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刊物《技术评论》(*Technological Review*)上发表了《语言和逻辑》(*Language and Logic*)一文,首次使用这一术语。欧美学者也常常用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对比研究(contrastive study)指代这一学科。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比语言学在欧美得到长足的发展。对比语言学研究不同语言之间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异同,旨在描述语言之间的近似和差异,同时也研究对不同语言进行比较的理论与方法。它特别注意研究有关语言的当代形式,寻求语言间的转换关系、对等关系,发现并解决转换过程中的干扰现象。系统的对比研究对语言教学、翻译以及本国语的探讨都有积极作用。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活动。为了求得源语与目的语的最大限度的等值,就要进行对比分析,从对比中找到两种语言的等值成分或等值结构。对比语言学是早期翻译的语言学派的重要的理论支柱。

对语音、语法、词汇或语义的单项的局部的对比属微观对比。语言结构之外的跟语言结构有密切联系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对比属宏观对比,亦称"语用对比"。仅仅对比语言的微观结构还不足以真正认识和运用这些结构。语言跟社会、心理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外语,特别是印欧语,对汉语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新词语的吸收与借用。句子结构也是有影响的,例如印欧语句子中的名词随处可加以修饰,前呼后拥,递加相随,架床叠屋,不厌其烦,于是产生许多长句。近几十年来,汉语长句的发展不能不说是受它们的影响。(另一方面,长句便于表达精密的思想,特别是用来表达有连锁性、系统性的概念。)对比语言学既要研究外语值得借鉴的一面,也要研究语言之间的负影响——用外语比附本国语而产生的种种干扰。在翻译中,照搬外语结构的洋腔洋调时有所见。例如,印欧语中连接时间状语的 when(英)、wenn(德)、quand (lorsque)(法)、когда(俄)汉译时,常见"当……时"结构的滥用;而 so ... that(英)、so ..., daß ...(德)、si ... que(法)、так ... что ...(俄)的结构形式,总不免被套上"如此(这样)……,以致……"的汉语结构形式。汉外、外汉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翻译的理论、规律以至技巧的研究无不与对比语言学密切相关。

批评性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由20世纪70年代末开创的批评语言学发展而来。1979年,福勒(Fowler)等人出版的《语言与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首先提出了批评语言学的语篇分析方法,旨在通过对大众语篇的转述分析话语背后的意识操控来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以及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戴炜华 2002)。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和沃戴克(Wodak)等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并归纳出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原则:1. 批评性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它从社会的、文化的实践和结构出发对社会发展和矛盾在语言和其他符号中的表现进行分析,不是为了语言而谈论语言。2. 话语是社会权利关系生成和再现的场所。3. 话语构成社会和文化,话语是社会和文化再生和/或变化的场所。4. 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话语结构描写、加强、再生社会中的权利和支配关系,并使其合理化或对其提出质疑;但是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工具,不是说语篇中所有的观点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宣传性质,要对此作出判断,光分析语篇还不够,还必须考察语篇如何被解释以及它们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5. 话语是历史的,它应该被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6. 文本与社会的关系是经过中介产生的。这个中介就是话语秩序,即与特定场合或情境相关的话语实践原则。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话语构造社会结构,也被社会所构造。7. 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结构不仅是描述性的,它更是解释性的,它试图根据社会互动的特征,尤其是根据社会结构特征对话语结构进行解释。

为了探求语篇与其形成过程、语言形式与社会符号之间的辩证关系,展现它们背后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在语篇阅读中需要对语言形式作出有效的描述,即文本分析。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 1995)提出了文本分析的三向维度,即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他认为:语篇是话语实践的产物,包括语篇的生成、传播和接受,而这些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实践决定的。据此,费尔克拉夫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三个方面:描写语篇的形式结构特征、阐释语篇与生成、传播和接受它的话语实践过程的关系;解释话语实践过程和它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语篇形式结构分析包括"连贯性"研究、"语法"研究、"礼貌"研究、"普遍特质"研究等,其中,"语法"研究包括及物性、主题、情态、隐喻、词语意义和词语表达等。话语实践过程研究包括互文性研究、预设研究等。社会实践研究主要涉及话语秩序、话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方面。作为语篇形式结构的分析是语言本体研究,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基础。如传统的及物性只是句法上的区别,即动词带宾语;但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中,及物性是人们用语言描述现实的基石,它把人们的所作所为和所见所闻描述成不同的过程,并指明各种过程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现实世界中的同一过程在语言上可以用及物系统中不同类型的过程来叙述,或者用同一过程,但变换参与者的位置。选择哪一种过程,怎样安排参与者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作者自己的意识形态取向。

1975年6月2日,英国《卫报》和《泰晤士报》分别

报道了一篇独立前的津巴布韦一次国内骚乱的事件，各自的标题如下：

POLICE SHOT 11 DEAD IN SALISBURY RIOT (《卫报》)

RIOTING BLACK SHOT DEAD BY POLICE (《泰晤士报》)

《卫报》在标题中选用了主动语态，将施事者(police)放在句首，造成突显，使读者容易把开枪射杀这一行为和后果的责任归因于句首成分——Police，似乎强调警察应该为开枪承担责任。相反，《泰晤士报》把受事者(rioting black)放在句子的突显位置，把施事者(police)放在句子次要的位置上，似乎在引导读者把注意力从开枪的警察转向受害者，相信警察只是事件的回应者而不是挑起者。这两种不同的报道口径反映出这两家报纸不同的政治立场。

批评性话语分析可以为研究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影响带来一些启示。如，对翻译上述两个标题时，到底是保留原文的及物性特征还是进行一些转变，有可能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立场。 (黄勤)

系统语言学 systemic linguistics

这是由英国韩礼德(Halliday)创立的一种语言研究方法。请注意英语原名是 systemic linguistics，不是 systematic linguistics。这种方法把语言放在社会环境中来研究，而不是孤立地去研究它。其理论基础是功能主义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在韩礼德看来，语言是交际的手段，而不是一套规则。因此，比起其他一些语言学理论来，系统语言学所包括的范围要广泛得多。韩礼德认为，音系和“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即单词和语法结构)二者与意义关系密切，不能脱离意义来分析词汇或语法。他的基本原则是，人们每次使用语言，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进行选择。所选择的实质上是意义，这种意义通过语调、词汇和语法结构表达出来。

语言国情学 cultural aspects of a language

初创于 20 世纪 70 年代，是前苏联在向外族人进行俄语教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旨在向外族的俄语学习者介绍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情况。其奠基性著作是维列夏金(Е. В. Верещакин)和科斯托马罗夫(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在 1973 年出版的《语言文化》。到 1990 年，这本书经过修订和补充，已经出了四版。两位作者对这门学科所下的定义是这样的：“语言国情学是对外族人进行俄语教学的一个方面，为了保证教学的交际性质和完成普通教育和人文学教育的任务，在语言教学中体现语言的存储功能，并向教学对象进行文化移植；其教学方法具有语言教学的性质，即在教学过程中用俄语讲授国情”。不难看出，他们把语言国情学局限于应用语言学或外语教学法的范围。目前，语言国情的研究不仅限于俄语，也不是完全以俄语教学或别的外语教学为目的。这一学科以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为指导，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那些与国情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进行研究，对语言的积累文化功能(亦称“积累和贮存文化历史经验功能”)进行研究，是对所学语言和使用该语言的民族文化背景知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也有人认为，在语言国情学中，文化是通过语言进行学习的，而且选择、描写和分析所采用的也是语言学的方法，因此语言国情学可以看做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研究具有鲜明色彩、最能反映该民族文化特点和生活习惯的语言单位。语言国情学与翻译的关系见“语言国情”。

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

指应用于实际领域的语言学。德·库尔特内(de Courteney)于 1870 年就提出必须区分纯粹(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后者的研究任务是运用纯粹(理论)语言学的成果来解决其他科学领域的各项问题(《对语言学和语言的几点总的看法》)；但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才开始建立，60 年代以后得到蓬勃的发展。对这门学科的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应用语言学除传统的语言文字教学、辞书编纂、创立和改革文字、文学作品的语言分析等外，还包括失语症和言语病理、信息传递和通讯联系、机器翻译、言语分析和合成、情报自动检索等领域；也有人把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列入应用语言学的范围。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专指语言教学，特别是外语教学和第二语言的教学。翻译理论界一般反对把翻译研究列入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因为翻译理论涉及多种学科、涉及文化，远非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所能管辖。

系统的翻译研究一开始就被纳入应用语言学的轨道。直到 1992 年 11 月我国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 - 92)，仍将翻译学列入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这一定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一学科的发展。现在翻译研究已与“外国语言”“外国文学”成三足鼎立之势。参见“翻译学”

宏观语言学 macrolinguistics

与“微观语言学”相对。研究语言多方面的外部联系的学科。它联系同语言有关的各种现象对语言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包括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模糊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指联系社会因素来研究语言的学科。所谓社会因素，包括社会阶层、社会环境、教育、职业、年龄、性别、种族等。言语中的种种社会因素，往往被理解为超语言现象——与语言相关又不属于语言结构之内的现象。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都十分注意把握词在句中的概念意义(或理性意义)，并采用概念相当的词语来翻译。但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概念意义并不是交

际的充分内容,充分内容的交际应当在概念意义的基础上附加上词的相应的关联意义。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出发,不同语言不仅在概念体系、意义体系上具有不同观念,而且在价值体系上也有不同,如英国人把 sheep 视为驯顺善良的象征,把 goat 作为淫荡邪恶的代表,可是在客观意义上 sheep 和 goat 无所谓善恶。汉语中,狗象征着卑贱,"走狗"如译为"running dog"就失去原来的象征性,价值观念不一样了。社会语言学对句子以上层次的要求除可接受性外还要求得体性。可接受性主要在于句子或语段要合乎语法规则。认为合乎语法规则的语言才能为操本族语的人们所接受。而得体性是指语句要切合交际场合,因此翻译也必须符合相应的情境特征。利奇(Leech)在 *Semantics* 中有两个句例: 1. They chucked a stone at the cops and then did a bunk with the loot. **他们朝巡捕甩石头,随后带上抢来的钱溜了**。2. After casting a stone at the police, they absconded with the money. **他们向警察投掷石块后携款潜逃**。两个概念意义相同的句子,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上例为俚语体,下例为书面体。两例反映出说话者的社会差距或社会地位的不同。译文与原文的社会性变异应当相适应。

总之,社会语言学关注语言的交际本质;它的研究重点在于言语,而非语言;在于功能,而非结构;在于语境和变体,而不在于信息本身;在于语言的可接受性,而不在于语言的任意性。将社会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突破把翻译定性为单纯语言行为的藩篱,揭示以往被忽视了的翻译活动的社会层面。

语感的文化差异　cultural difference in language [linguistic] sense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论题。在信息量不断增大的当代社会中,各种新名词、新术语不断出现,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科学词语显得非常重要。一些文化学家和语言学家认为,文化差异在语感正确与否上有很大影响。语感的文化差异表现在两方面: 1. 文化背景方面,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同一词语往往有不同的理解的语感。2. 个人文化修养方面,指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层次和知识结构的人对于某些常用词在理解、语感和联想上的个人差异。前一个方面的差异是跨文化研究者特别关心的,因为它往往显示出不同文化模式的内在特征,便于文化间的比较。后一方面的差异为亚文化研究者和社会语言学家所重视。他们研究那些含义宽泛的词语如"系统""策略""效益""信息""结构"等在专业领域的学者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使用与理解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什么? 说明了什么? 对亚文化的形成有什么联系? 这种研究是极有价值的现实课题。

词源学　etymology

是语言学的分科,研究词的来源与历史以及词的形式和意义变化的学科。例如,现代英语中的 wife (妻子)的词源可追溯到古英语的 wif; deer(鹿)在古代英语中泛指野兽或动物。

语言类型学　language typology

语言类型学把语言分成不同类型。例如,碰到一种语言,可以按其是否是声调语言来分类;也可按其典型句法结构来分类;也可按传统方式把语言分成孤立语(如汉语)、屈折语(如俄语)和黏着语(如日语)。

从主语和主题在句子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语言类型学把不同的语言分成四种基本类型:一、注重主语(subject-prominent)的语言;二、注重主题(topic-prominent)的语言;三、两者都注重的语言;四、两者都不注重的语言。英语是注重主语的语言,它的基本句型有五种: SV, SVC, SVO, SVO_1O_2, SVOC。这五种句型都可看做由 SV 演化而来。这就是说,英语主要通过主语-谓语的句型结构进行描写。汉语是注重主题的语言,经常通过一种把句首成分看做话题加以评论的句型——主题句进行描写,话题和评论在语法关系上表现为主题与述题。实际上,主谓句和主题句在语言中是并存的、互容的句型。只是汉语常以主题概念为基础可以描写得更深刻,而英语则以主语概念为基础可以描写得更深刻。例如,汉语"话题-评论"句: **有一种方言,这间屋子里的每个语言学家都懂得**,在英译时需转换成主谓句: A dialect is known by every linguist in this room.

语料库语言学　corpus linguistics

是 20 世纪中后期方始崛起的一门新兴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正趋向成熟和繁荣。它不仅成为研究语言必不可少的先进工具,而且正日益成为重要的语言研究系统方法论。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和用归纳法进行定性分析,使得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更具客观性、可证性,因而更为真实可靠。语料库语言学可揭示最典型的语言特征,发现语言在实际中的使用规律,反映语言的真实面貌。对语言特征进行统计后的分析结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外语教学的盲目性。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往往根据个人直觉作出判断,但其判断常常具有不可避免的任意性和不可靠性。而利用语料库经过实际观察和分析所得出的数据显然更加准确、更为科学,故而对外语教学极具重要性。语料库还可为外语教学提供丰富的原料,是编写词典、教材和各类参考书籍的重要语料来源。

理论语言学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与"应用语言学"相对,亦称"普通语言学",因是对各种语言现象的概括和说明,从而能对具体的语言研究提供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故名。现在西方语言学界多采用这一名称。参见"普通语言学"

描写语言学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语言学的一个分支部门,指对于某一历史阶段语

言状态所作的研究。描写语言学于20世纪初开始在欧美兴起，是对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种反拨。由于受索绪尔(Saussure)语言理论的影响，语言学的重心转移到共时研究上，描写语言学便成为语言学中最基本的部门之一。特别是美国结构主义，对人们过去不熟悉的美洲印第安语言进行了描写，形成一套严格的方法和程序，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因此也有人把描写语言学与美国的结构语言学看做一回事。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描写语言学的目的不在于得出语言的规范，而在于对现存的语言状态作出客观的描写，因此并不局限于结构主义。一般认为，描写语言学与微观语言学的内容大致相当，主要分成音系学、语法学和语义学三个组成部分。

副语言学 paralinguistics

亦称"伴随语言学"，是研究副语言现象的学科。副语言是翻译中不可忽视的非语言符号。交际者所发出的信息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语言符号和副语言特征。两者互为依托，共同传递信息，传情达意。以日常对话为研究对象的话语分析更多地研究语言符号，而对副语言特征较少涉及。梅赫拉比恩(Mehrabian)(1972)曾提出，交际意义的38%是由音量、音高、笑声、感叹声等伴随言语的副语言特征传递的。参见"副语言"

微观语言学 microlinguistics

与"宏观语言学"相对。研究语言内部结构或对语言材料进行直接分析的学科。包括语音学、语义学、词汇学、语法学等。

普通语言学 general linguistics

亦称"一般语言学""理论语言学"，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与"具体语言学"相对，以人类所有语言为对象，研究其一般性质和共同规律。具体地说，它研究语言的存在形式、内部结构及其在社会中的功能，语言的起源及其存在和发展规律，语言各个组成部分——语音、词汇、语法的共同特征，语言研究的专门方法以及语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普通语言学概括并吸收各种具体语言科学研究的成果，作为其理论概括的客观依据，反过来，它的理论原则也对具体语言的研究起指导作用。它探讨和阐述语言机制，语音、语义、语法的最一般、最普通的特征和规律。语音的普遍性质是由人们发音器官构造的共同性决定的，语义的普遍性质是由客观世界的共同性和人们在意识和社会实践中对之概括反映的共同过程决定的，语法的普遍性质是由语言作为交际和思维工具这一共同的功能决定的。普通语言学在19世纪才建立并发展起来，这是由于不同言语社团接触机会增加和对各种语言材料进行比照研究的结果。

数理语言学 mathematical linguistics

语言学与数学、计算机科学、信息论、控制论等结合而形成的新兴边缘学科，以电子计算机为工具，运用语言学理论和数学方法，建立抽象语言模型，研究语言现象。数理语言学大致可分成统计语言学、代数语言学、计算语言学三个分支，分别标志着数理语言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早期研究主要应用数理统计和信息论方法对词的频度和构词问题进行统计语言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起，由于结构语言学的发展和机器翻译的需要，代数语言学兴起，建立语言模型，以揭示语言内部结构；70年代起，主要在语义学领域内进行形式化研究，计算语言学蓬勃发展。数理语言学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语言的句法结构、语义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标志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通信、脑神经科学等领域中，有人称这些应用及其研究为"应用数理语言学"。

模糊语言学 fuzzy linguistics

参见"模糊理论"

篇章语言学 text linguistics

亦称"话语语言学""语篇语言学"，是以连贯性话语，即语段与篇章为研究对象，研究话语的发生与发展、话语的模式及理解等问题。篇章语言学揭示篇章和语段的内部结构规则，突破以句子作为语言研究的局限；并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及说话人、听话人双方的认知能力出发，对话语的言内、言外及非语言因素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篇章语言学还着重研究篇章题旨的突出与隐晦，文脉的曲折与连贯。译者日常所译材料大多是篇章：一篇散文、一项合同、一页说明书、一首诗歌、一则广告、一次谈话、一个剧本、一部作品、一封书信，等等。篇章不是一连串孤立的句子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语义整体。在语言形式上，篇内各句、段之间存在着粘连性，如连接、替代、省略、照应；在语义逻辑上，全篇通常首尾呼应，概念或命题具有内在的连贯性。这些无论对翻译理论或翻译实践都有重要的启示。

翻译语言学 translation linguistics

指从语言学的角度或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的一门学问，是站在语言学的高度对经验层次上的翻译技巧和方法进行的理论概括，可分为五个分支：翻译句法学、翻译语义学、翻译语用学、翻译修辞学和翻译文体学。半个世纪以来，翻译语言学有人提倡，有人开拓，但远非完善。

符号 sign

亦称"记号"，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1. 泛指一切符号系统的组成单位，如在交通灯光信号中，灯光就是符号。2. 专指语言符号，尤其是词。一个符号必

须具备表达和内容两个方面，索绪尔（Saussure）称之为能指和所指，认为能指是音响形象，所指是概念，因此把语言符号定义为"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普通语言学教程》）。一般认为语言符号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物。有些符号学家把符号定义为一个意义关系的整体，包括指示者、所指者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的符号学家则认为符号是传递信息的中介，其特点是具备物质因素，因而能被人类感觉器官感知。

皮尔斯（Peirce）作为哲学家则研究一切符号，包括语言符号。他认为符号是一种由表现体（sign/representmen）、客体（object）和解释体（interpretant）构成的三元关系，构成这三元关系的三种要素相依相存，缺一不可。皮尔斯的符号定义颇为复杂："符号，或表现体，是某种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它是对某人而言的，也就是说，表现体在某人的心灵里创造了一个对等的符号，或者可能是个更发达的符号。我称这个创造的符号为第一个符号的解释体，它代表的某物为客体。但它并不完全代表客体，只是代表与客体有关的一种思想，我有时称这种现象为表现体的基础。"（Gorlée 1994：51）

在翻译这一符号活动中，原文文本是表现体（符号载体），它携带的信息是客体，译文文本是解释体，译者是解释者。由于原文文本是符号，它一定能接受解释，也就是具备可译性；译文文本具备生成新符号的潜力，它也是符号（解释体）；译文文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应该类似原文文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译文文本应与原文文本相似；译文文本（解释体）一经生成，就成为一个新符号，也由"被解释"符号（含一个暗指客体）和解释体构成，进入新一轮符号活动。这时的解释者可能是译文文本读者，他们对"被解释"符号的解释，也就是对译文文本的解读，很可能不同于译者。于是，在这一轮符号活动中生成的解释体，便成为延异链上的一环。译文文本读者的不同反应，译文文本批评者的不同看法，新译本的出现，都是一个个新符号，都是延异链的组成部分。这条延异链是符号活动的产物，它将无限延伸，直至符号活动停止。

对符号可作不同的分类。皮尔斯根据表达形式和表达内容之间的关系，把它分为类象符号、引得符号和记号。另外，按表达内容可分成科学技术符号、社会符号和美学符号；按功能可分成表达客观内容的指物符号和表达主观内容的思想感情符号。

符号交际　semiotic interaction

哈蒂姆（Hatim）与梅森（Mason）认为，韩礼德（Halliday）的语境模式分析语域（即语场、语旨、语式）只是探讨了语境的交际因素，并不能全面涵盖翻译中需要考虑的语境因素。因此，在合著的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1990）一书中把语用和话语符号层面的分析引入到翻译语境的研究中，构建了包括交际、语用、符号三个维度的语境分析模式，把语篇交际对应地划分为三个层面：交际关系、语用行为、符号交际。符号交际涉及了韩礼德模式从下到上的各个部分：词（word）、语篇（text）、话语（discourse）、语篇体裁（genre）。哈蒂姆与梅森认为具有符号意识的翻译工作需要按序经历下列四个步骤：辨认符号实体、辨认信息核心、解释说明、转换（1990：105～106）。他们将符号学引入翻译研究，理据在于翻译是一种跨符号系统的活动，而且语篇是由符号构成的，语篇翻译的语境分析不能缺乏对符号层面的考虑。符号的交互作用一方面"发生于语篇的各种符号之间，另一方面，也发生在符号的制作者和其意想的读者之间"（1990：101）。言语在语篇内及语篇之间的交互作用意味着对某一文本符号的解释往往依赖其他之前出现而相关的语篇，这种意义的相互依存也即语篇的"互文性"，正是哈蒂姆与梅森提出的符号交际的核心元素。

参见"交际关系""语用行为"　　（梁碧滢）

符号学　semiotics; semiology

符号学可以非常简单地定义为"研究符号的科学"。由于符号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物，它隶属于一个符号系统，与本系统和其他系统的符号有关系，产生这种关系和人类解释这种关系的符号活动（semiosis）与符号同在，因此，符号学的常用定义是"研究符号、符号系统和人类符号活动的科学。"（Cobley 2001：260～261）

符号学一词的内涵很丰富，有五种意义：1. 可以指符号特征（semiotic properties），包括符形特征（syntactic properties）、符义特征（semantic properties）和符用特征（pragmatic properties）；2. 可以指符号科学（semiotic science），是一种理论，以研究、描述这些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解释其功能与产生的影响；3. 可以指理论符号学（theoretical semiotics），这是一种元理论和元科学，从更高的层次研究 semiotics；4. 可指一种或全部符号学方法（a semiotic method or the total sum of semiotics methods），研究各类作为符号的客体；5. 在其解释方法不是用于研究单独的个体，而是研究系统化的整体时，它又指应用符号学（applied semiotics）。（Sebeok 1994）无论符号学用作科学、元理论、应用理论还是研究方法，它都能将逻辑学、文化学等全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如生物学）作为它的工具，但它与上述科学又有两点不同：首先，它能研究任何知识涉及的客体，至少，就有生命的物质而言是如此，它所研究的符号、表意和交际是任何学科都不能回避的内容；其次，只要研究客体，它就运用符号的符号功能理论，用符号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将客体作为符号进行研究。

在符号学学者看来，世界充满了符号，从事符号活动是人的天性，是人认识世界和创造世界的必由之路。德国哲学家卡西勒（Cassirer）是 20 世纪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他认为，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是一种符号活动，语言、神化、艺术、宗教等文化

形态都是一些独特的符号形式。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正在于人能创造和运用各种符号,从而创造并生活于一个与动物生活的自然世界不同的符号世界,即人类文化的世界。(冯契,徐孝通 2000：168)法国哲学家马里坦(Maritain)曾这样评价符号学:“没有什么问题像与符号有关的问题那样对人与文明的关系如此复杂和如此基本的了。符号与人类知识和生活的整个领域相关,它是人类世界的一个普遍工具,正像物理自然世界中的运动一样。”(转引自李幼蒸 1993：1)足见,符号学与人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是人不可缺少的认知工具。

人类生活在符号世界中,从认识世界开始,就在研究符号。符号学作为符号的科学,发端于西方,虽然符号在人们意识中的存在可追溯到语言文字出现以前。当第一批内科医生探索人体与大脑在特定的文化范畴内如何相互作用时,符号学便诞生了。符号学最初用于研究各种可观察的体征以诊断疾病。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能根据所观察到的患者的症状,作出确切的诊断并能预测疾病的发展。尽管符号学是一门古老的不断发展的科学,“直到 1880 年至 1980 年之间,它才成为一门学科。”(Tarasti 2000：17)在那一百年间形成了两个主流符号学派：基于语言研究的欧洲符号学派(以索绪尔为代表)和基于非语言交际研究的美国符号学派(以皮尔斯为代表)。索绪尔(Saussure)和皮尔斯(Peirce)无疑是“古典符号学”的创始人,他们的研究成果便是第一代符号学。第二代符号学学者是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格雷马(Greimas)、福柯(Foucault)、洛特曼(Lotman)、巴尔特(Barthes)、西比奥克(Sebeok)、埃科(Eco)、克里斯蒂娃(Kristiva)等人。从 1980 年开始,随着认知科学、解构主义、阐释学、现象学的发展,新的符号学观点也纷纷出现,形成了第三代符号学。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代符号学的研究成果与第一代、第二代符号学密切相关,这说明符号学的传统得到保持和发展。(Tarasti 2000)符号学已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广泛运用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如语言学(Halliday 1985/1994)、对比语言学(Hatim 2000)、教育学(Danesi 2000)、语篇分析学(Hatim, Mason 2001)、语用学(Hickey 2001)、文学(Johansson, Dines 2002)和文化学(Andrews 2003)等。

中国文化中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周易》这部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便是以八卦为基本形式的人工符号来表示深刻的哲学和其他学术思想的。据我国符号学家李先焜的研究(陈忠明,黄华新 2004：320～379),《周易》具有明显的语形结构系统和语义学思想,是我国符号学思想的重要资源。李先焜还指出,孔子、孟子、荀子的礼仪思想,《礼记》论述的“礼”作为符号系统的社会功能,“名辩”学说,研究汉字之学的“小学”对汉字、汉语含义、汉语所承载文化的研究,中国书画艺术符号的相通,《黄帝内经》中记载的许多古代治疗和诊断的方法及原理,都表明中国的人文文化蕴涵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

根据王铭玉的研究(2003),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 1980 年至 1986 年为起步阶段；2. 1987 年至 1993 年为平稳发展阶段；3. 1994 年至 2000 年为全面展开阶段。第三阶段符号学研究的特点是：1. 除了继续探讨一般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的理论,还注重引进叙述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电影符号学、话语符号学和主体符号学等分支符号学思想；2. 对语言符号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掀起了对索绪尔语言学观点再认识的热潮；3. 符号学研究在语言学、哲学、文学、文化、艺术、传播学、民俗学等领域已全面展开；4. 对非语言符号的地位、功能开始予以关注；5. 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典籍中符号学思想的挖掘和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王铭玉(2003)还认为,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在 20 多年时间内完成了西方符号学用了 40 余年走过的路。在符号学基本理论研究、语言符号学研究、符号学应用研究、文化艺术符号学及文学符号学研究诸方面均取得可喜的成果。王铭玉 2004 年出版的《语言符号学》便是我国首部专论语言符号学问题的著作。

作为最有力的研究工具,符号学的研究成果已推动了许多学科的发展。作为元理论,符号学已经衍生出许多应用符号学,如艺术符号学、文化符号学、建筑符号学、设计符号学、电影符号学、戏剧符号学、歌剧符号学、芭蕾舞符号学、时装符号学、民俗符号学、法律符号学、宗教符号学、生物符号学、动物符号学、虚拟符号学、计算机符号学、伦理符号学、心理符号学、文学符号学、语言符号学、汉字符号学,等等。它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也在扩大。

最初将符号学用于翻译研究的学者是雅各布森(Jakobson)。他在 1959 年发表的论文“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采用皮尔斯的符号概念,引入符号学意义观,即意义是一种关系,关系到一条有意义潜质的、不可穷尽的符号链。他认为:“任何语言符号的意义在于它能译为可以替代的特别是更加发达的符号。”(Venuti 2000：114～118)他还用符号学的观念将翻译分成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类。虽然这一分类法受到批评,被视为是将一个语言符号的解释分为三类(Baker 1998：218～220),但他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符号学家埃科和内尔高(Nergaard)指出,全面的普遍符号理论尚未诞生,但两种观点不同甚至有时针锋相对的符号学途径有潜力作为构建翻译理论的参考。这两种途径分别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structural semiotics)和皮尔斯的解释符号学(interpretive semiotics)。他们认为,结构主义符号学有破坏语用学之嫌,但它对文本深层结构及其生成方式的分析是有效的。用它可以将源文文本和译文文本在各种层次,从最基本的词语选择到叙述结构甚至不同声音(作者、叙述者、人物、隐含读者等)进行比

较。他们还认为,这两种符号学之间也存在相交之处,交点就在雅各布森提出的翻译分类中。(Baker 2004: 218～224)西方学者运用符号学研究翻译的成果很多,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不少符号学家将其研究重心转为研究符号学与翻译的关系,成果令人瞩目。

我国学者将符号学用于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罗进德的论文《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是第一篇用符号学思想阐释翻译的论文。罗进德指出:"既然翻译不仅仅是纯语言问题,就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加以考察了。我们能不能以符号学观点将翻译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作一番研究呢?"他预言:"符号学派的翻译观将在翻译学这一横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符号学的翻译理论模式不仅会改变翻译研究和评论的面貌,还可能改变翻译教学甚至一般外语教学的面貌。"(罗进德 1988)

近20年中,有柯平(1988,1991)等人用符号学或社会符号学探讨翻译中语义传译的论文和教程,也有陈宏薇(1996,1998, 2002)运用社会符号学理论和意义观编写的汉英翻译教程与论文,更有蒋骁华的专著《符号学翻译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造》(2003)和李明的专著《翻译研究的社会符号学视角》(2005)问世。根据中国期刊网的信息,1979年至2007年8月,各种期刊登载的符号学论文有2 774篇,运用符号学研究翻译的论文有262篇,占符号学论文总数的10.5%。它们主要涉及符号学意义观在翻译中的应用,理论论述很少。这说明我国翻译界对符号学的研究还很不够。(陈宏薇)

文化符号学　cultural semiotics

洛特曼(Lotman)在1973年出版了《文化的符号学研究论文集》,被认为是文化符号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符号学是对文化的符号学研究。洛特曼和他创立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给文化符号学下的定义是:文化符号学是研究不同符号系统功能关系的科学;这种符号系统在文化中传播。从理论的概念出发,其假设的前提是,描写纯符号系统的功能是可能的,但符号系统只能在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中发生作用。文化的内在本质是多样性的,在复杂的脉络中包含不同的符号系统和文本。文化符号学是要建立某一文化所属成员所深信不疑的一种模式的模式。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一种文化的成员都把自己看做在文化内部的人。而属于其他文化的人则是"外人"。在文化内部,生活是有序的,而且是有意义的;文化外部的生活则是混乱的、无序的和不可理解的。同时,文化内部的一切都受到高度的尊重。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中的核心概念是文本。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中,文本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客体,而是作为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载体,具有传递、保存及产生意义的功能;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中,文本不是消极的意义携带者,而是作为动态的、矛盾的现象在起作用,是文化的首要因素;洛特曼在继承与发展雅各布森(Jakobsen)文化交际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文本交际模式。文化多语性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理论支点,并使他最终寻找到了解决文化符号学的核心问题——文化意义生成机制的钥匙。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继承了索绪尔(Saussure)语言符号学传统,但对结构主义提出了质疑。在吸取了同一传统的巴赫金(Бахтин)和克里斯蒂娃(Kristiva)的有关理论的同时,又吸取了皮尔斯(Peirce)的有关符号学理论。因此我们可以把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看做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的交融,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在语言学上的转向和融合趋向的一个典型例子。索绪尔语言符号学重点研究语言符号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而皮尔斯符号学重点研究符号在作为生物的个人的认知中的作用,而文化符号学把交流和认知结合起来,把交流的社会性与认知的个人心理活动结合起来,把文化交流视为一种社会性的交流和认知活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对启迪人类智慧、更新思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翻译是两个不同文化系统的接触和相互影响,翻译研究也是研究源文本和译文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因此,文化符号学与翻译和翻译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文化符号学已成为翻译研究的诸多途径之一。(郭建中)

社会符号学　social semiotics

系统研究社会符号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教育/英语教授克雷斯(Kress)和霍奇(Hodge)。他们认为符号学的确是一种系统的、全面的理论,可以研究全部交际现象,但符号系统的性质和功能均具备社会性特征,对它们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而在20世纪80年代,"主流符号学"强调结构和代码,不顾符号系统的功能及其在社会中使用的情况,不顾符号系统在社会实践中复杂的相互作用,也不顾符号系统的源头和目标、形式和内容以及赋予它们理据的一切因素。总之,"主流符号学"重视系统和产物,不重视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以各种方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符号活动的参与者;它割断了符号活动与社会的联系,割断了符号学与社会政治思想的联系。因此,他们拟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构建社会符号学,即强调具体的个体。这些个体彼此相互作用,也与物质世界相互作用。物质世界是意识的基础与源泉,包括全部符号过程以及从物质世界和社会衍生出来的施事者、客体和力量,是理解的基础。(Hodge, Kress 1988)

克雷斯与霍奇认为,皮尔斯(Peirce)对符号学的发展有开拓性的贡献,但他的符号学思想多少带有先验论的倾向。社会符号学则能避免这种倾向,能更全面地探讨人与符号的关系、符号系统在社会实践中的功

能等问题。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符号学是对普遍符号过程的研究,即研究意义的产生、再现、接受和流通的过程与效果,该意义包括一切交际施事者使用任何形式表达的意义。社会符号学主要与人类符号活动(human semiosis)有关,因为人类符号活动从其源头、功能、语境(contexts)及效果来看,都是一种固有的社会现象;社会符号学还与人类历史上一切人类社会以任何符号形式、符号文本及符号实践建立的社会意义有关;社会符号学研究一切人类符号系统,它们的条件和内容都具有社会性。他们还指出,虽然人们并未否认语言符号系统的社会性,但在分析语言现象时人们往往仍然只关注文本及语言结构,忽略意义在社会结构中产生的社会过程。语言理论仅仅指导人们理解语言的意义是不够的,因为意义还存在于其他的意义系统中,存在于众多视觉、听觉、行为或其他代码中,孤立地研究一种代码不能达到语言研究的目的。正因为如此,语言理论应是一种研究在社会中构建并被视为社会实践的一切符号系统的理论。这就是社会符号学理论。(参阅陈宏薇 1996)

克雷斯的观点得益于其导师韩礼德(Halliday)。韩礼德在*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1978)一书中早就重引索绪尔(Saussure)的名言"语言是社会现实"并明确指出,社会现实(或文化)本身是意义的大厦;语言是组成文化的符号系统之一,它与其他符号系统的差别在于它可以解释许多(虽则不是全部)其他符号系统。这也正说明了语言的社会符号性,解释语言必须在社会文化的语境(sociocultural context)中进行。

克雷斯强调符号具备社会性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所批评的符号学研究中的偏差也在符号学发展过程中得到纠正。可以说,人们已基本达成共识,人不是孤立的个体,他(她)是社会的一员,是社会符号网络的一个接点,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交织的复杂网络中;社会在变化,语言和所有符号系统及其关系在变化,人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变化的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这些符号系统的产生、变化与重建。任何符号对符号生产者和接受者而言都具备社会文化特征。 (**陈宏薇**)

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 sociosemio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的倡导者是美国《圣经》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奈达认为该途径"重点是探讨符号在特定情况下将信息传递给受讯人所具备的意义……它注重意义的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通常被语义学的严格语义分析所忽略"(Nida 1982:19)。他指出,"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的重要特征是它的方法,该方法能借助整个符号系统清楚地表明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索绪尔(Saussure)区分能指与所指只是使符号主要与人们的概念产生关系。但社会符号学语言途径却清楚地使符号与所指的真实世界产生关系,如同符号所属的结构解释的一样。"奈达不仅用实例解释了根据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划分的三类符号,即象似符号(icons)、相关符号(indexes)和象征符号(conventions/symbols),还按皮尔斯(Peirce)提出的第一性(firstness)、第二性(secondness)和第三性(thirdness)三类范畴解释了分析意义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接触文本的第一印象,第二层次是对文本结构和背景的分析,第三层次是对文本象征意义的理解。他强调,符号的意义只能由其他符号解释;语言是众多符号系统中最复杂、指涉范围最广的一个,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它还能解释自己,因此,语言是解释其他代码的理想的符号系统。(Nida 1982:19～22)

奈达认为,尽管语言是最复杂的、开放型的代码,是反映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其变化和发展没有止境,但语言也有局限性,它不能确切地再现思想、感情和社会的行为模式,虽然它在这些方面的功能比其他任何代码都强。鉴于语言处理一切交际象征因素的能力有限,符号学就成为我们研究交际的必需。因为:1. 符号学严肃认真地对待语言的所指。它不像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系统所证实的那样受到限制,语言绝不只是任何口头和/或精神现象,它使人能接触感官体验的真实世界。2. 符号学使指称意义与所指产生关系。事实上,它先考虑所指,使意义从交际中抽象出来。据此,意义由所指派生出来,而不是相反。儿童学说话也是如此。儿童逐渐深入地理解言语符号是因为他逐渐意识到这些符号如何与特定的所指一起使用。还有,符号在词典中的定义本身也主要依据其所指的特征,它们为意义提供线索,因此,任何言语符号都具备所指的潜能。3. 符号学能有助于深刻地了解蕴涵意义,很多蕴涵意义可以通过谁在何时、何地、在何情况下、为何目的、使用什么符号的方式而获得。4. 符号学清楚地表明符号的意义何以能由其他符号所决定。5. 符号学帮助人摆脱语言代码是唯一用于思考和交际的观点。思想可以用一些相似符号表达,例如图表、公式、连环画等。宗教的交际经常用非言语象征符号表示,如基督教的洗礼和圣餐。它们是不可译的。(Nida 1983:162～164)

奈达强调符号、所指以及相关的符号系统之间的符号关系不能脱离解释者而存在,也就是说,不能脱离能够认识这些关系的有机体而存在。在人类社会中,这些关系按常规便成为文化的一部分。(Nida 1983:3)符号与其所指之间存在多种关系,因而符号具备多重意义。正如皮尔斯所指出的:鲁宾逊在孤岛沙滩上发现的脚印既是象似符号,像人的一只脚;也是相关符号,指有人曾经从那儿走过;还是象征符号,表示孤岛上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会给鲁宾逊带来危险。(Nida 1983:90)

奈达指出翻译与翻译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没有什么像符号那样渗透到人类生活之中。人所做的一切几乎都能组成符号,毫无疑问,人生在世参与

的主要活动之一便是理解与解释符号,无论它们是文字还是行为。很明显,符号最重要的是其意义,既然符号意义只能按所在的系统加以解释,任何符号的意义也只能依其所在的结构才能确定。或许,语际交际最能使人意识到符号的意义,那正是本书特别强调翻译的原因,因为翻译不仅是符际交际活动,而且十分明显,它是人们所能从事的最复杂的脑力劳动。"(Nida 1984: 137)

奈达将翻译界定为符际交际活动是对翻译认识的深化。按奈达的社会符号学意义观,"符号学是分析意义的最全面的系统;文字符号的意义永远涉及一定的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中某一交际的全过程,换言之,文本不能孤立于其社会语境;对符号的解释与符号所在的结构(structure)有关,即任何文字符号的意义只能借助与其有关的符号才能得到解释。"(陈宏薇 1996: 9～10)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1. 奈达的符号学思想沿袭了皮尔斯符号学传统。他对符号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认定和认知三个层次的解释奠定了皮尔斯符号学用于翻译研究的基础。2. 他认为翻译是符际交际活动,因此,他重视解释者(译者)的作用。相对于皮尔斯认为在符号活动中解释者可有可无的观点,他的看法是正确的。3. 他的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实际上是符号学翻译途径,只是他特别强调符号是社会存在,对符号的理解与翻译不能脱离其社会语境。他将"符号所在的系统""符号所在的结构"与"社会语境"密切联系在一起,就是将语言符号系统和其他表意符号系统与社会紧密地连在一起。4. 用社会符号学途径理解、翻译文本,不能只限于理解、翻译文字符号的三种意义,还应深入理解、翻译文本中与言语有关的一切符号(包括行为)的意义,后者是前者的保障。翻译被奈达视为社会中的符际交际活动,这无疑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

奈达的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对我国翻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多次被翻译理论著作引用,而且,柯平(1991)还将他的符号学意义观作为核心内容引进英汉和汉英翻译教程,提出符号学的翻译原则:"在译语句法和惯用法规范以及具体接受者能够接受的限度之内,采取适当的变通和补偿手段,以保证特定上下文中最重要的意义优先传递为前提,尽可能多和正确地传递原语信息的多重意义,以争取原文和译文最大限度的等值。"(柯平 1991: 43)陈宏薇(1996, 1998)则在汉译英教程中介绍了奈达的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并以符号学意义观为核心,以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语言理论为基础,兼收语用学等其他学科的成果综合成一种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参见"社会符号学翻译法"

(陈宏薇)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　sociosemiotic method of translation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是陈宏薇(1996, 1998, 2002)根据奈达(Nida)的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参照韩礼德(Halliday)的社会符号学语言理论,兼收语用学等其他学科的成果综合成的一种翻译法。该方法有以下要点: 1. 翻译即翻译意义。符号学意义观适用于翻译。语言符号有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2. 翻译即交流文化。文化是社会各种符号系统的集合。3. 语言是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语言中最重要的是语义系统,它体现语言的功能。4. 文本是具有功能和意义的语义单位,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人们交际的过程和产物。5. 语境指文本得以有生命力的环境,它也是个符号学概念,指从构成文化的符号系统中派生出来的意义集合。6. 语域指语言的语体,是社会结构的一种体现,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强调语域特征的再现。7. 社会结构界定交际的各种社会情景并赋予它们意义,是语义系统生存发展的基本因素。8. 意义和功能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具备的固有特征,也是任何文本的固有特征。翻译标准拟为: 意义相符,功能相似。陈宏薇强调,意义相符,是指称、言内、语用三种意义相符。"当译者为达到这一标准在两大符号系统之间求同存异时,他们对文化的理解将更为深刻,对文化日益深化的理解反过来又加强了他们的领悟能力。悟性提高,直觉(intuition)便增强。这种直觉不再是天生的悟性,而是经过从实践到理论,又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实践而获得的直觉,是对翻译逐步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的直觉。社会符号学翻译法有助于译者获得这种直觉,科学地进行翻译实践。"(陈宏薇 1996: 75)

陈宏薇(2002)还针对解构主义的"作者死了"的观点,提出作者与译者都是翻译这一符际交际活动的参与者,他们身上的符号束是翻译研究中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译者的符号束与作者的符号束愈接近,译者愈能理解作者遣词造句的意图与语言风格,翻译时就更可能得心应手,再创造出理想的文本。她认为社会符号学翻译法有助于避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偏差,有利于全方位、多视角地研究翻译,有效地解决翻译实践中的问题,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在跨文化交际的大视野中进行翻译研究的方法。

(陈宏薇)

符号学意义观　semiotic view of meaning

意义问题是20世纪以来人文科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按符号学观点,意义是一种关系,是由解释体所传达的表现体与客体关系的信息,既包括思想,也包括情感;意义很复杂,可大致分为三类: 言内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即符形关系体现的意义;指称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即符号与所指关系体现的意义;语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即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意义。(柯平 1991;陈宏薇 1996, 1998, 2002)符号的意义不可能孤立存在,一定得借助与其有关的符号才能得到解释;意义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

符号学三类意义分别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语形学(syntax)、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研

究的对象。符号学的三个分支是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莫里斯(Morris)构想的符号学体系。它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学科分类法,成为符号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按莫里斯的定义:"语用学是符号学的这样一个部分,它在符号出现的行为中研究符号的起源、应用与效果;语义学研究符号所具有的各种方式的意谓;语形学研究符号的种种联合,而不考虑这些联合的意谓,也不考虑这些联合和它们在其出现的那种行为之间的关系。"(转引自陈忠明,黄华新 2004:100)换言之,语形学研究符号系统内部符号形式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符形)与客体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涉及符号情景中的多种因素。瑞士逻辑学家鲍亨斯基(Bocbenski)认为,符号学的三个分支是符号学思维方法的三个维度,语形关系、语义关系和语用关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语形关系是基础,语义关系以语形关系为前提,语用关系以语义关系和语形关系为前提(陈忠明,黄华新 2004:102~103)。他的观点说明从符号学的三个分支探讨意义非常重要,具备方法论意义。 (陈宏薇)

翻译的概念 concept of translation

翻译是符号活动。解释符号学者彼得里利(Petrilli)认为,翻译是符号行为的重要环节,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个符号实体被当作对等物替换另一个符号实体。(下划线为笔者所加)翻译的前提是:1. 一系列翻译活动的存在,即一个符号实体被另一个符号实体替换的一系列行为的存在;2. 可译性,即在符号实体之间存在相互替换性和相互改变性。它们是符号行为和符号独有的权利。因此,翻译表现了符号现实,是符号学研究的对象。(Cobley 2001:278~279)

彼得里利的措辞"一个符号实体被当作对等物"很严谨。在翻译活动中,"对等"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最高期望值。因为解释体是由解释者决定的。解释者(译者)确定解释体(译文文本)的过程,是在两个不同的生物符号圈内进行符号活动的过程,他/她有宽广的选择范围,但同时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尤其受到自己作为一个生物符号和文化符号的限制。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解释体是被解释者当作对等物去替换另一个符号(原文文本)的。至于解释体是否确为被解释体的对等物,则还需要对符号开始新一轮的解释或符号活动来讨论。从解释符号学观点界定翻译,同时肯定了可译性。因为,只要符号存在,就有解释体存在,解释体是符号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

符号翻译 semiotranslation

"符号翻译"是戈尔里(Gorlée)创造的新词,是她对翻译符号活动(translation semiosis)的命名。她认为符号翻译是一种理想的模式(model),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助于翻译理论的建设。在深入系统地研究皮尔斯(Peirce)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她认为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可以充实对翻译现象的理论阐述及其对翻译现象的分析。她的符号翻译主要观点是:

1. 符号学(semiotics)和翻译理论(translation theory)密不可分。符号活动(semiosis)的逻辑意味应视为(符号)翻译的范式(paradigm);而各类翻译反过来又证明了符号活动。她认同皮尔斯的观点,即翻译等同于符号解释,符号解释就是翻译。(Gorlée 1994:153)符号活动是开放的、动态的、永无止境的过程。翻译亦然。

2. 语言符号建构在非语言符号上,与非语言符号同时使用,它们之间经常发生互动,这种相差(aspectual differentiation)对它们之间的各类翻译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索绪尔符号学只研究语言符号,皮尔斯符号学则研究一切符号,包括语言符号,皮尔斯符号学更适用于翻译研究。(参见"符号""普遍范畴")

3. 翻译与博弈有类似之处。翻译可喻为玩拼图游戏(jigsaw puzzle)。拼图游戏有规则,但规则可以改变,可以创造。译者在玩翻译这一语言游戏中,不断试探,不断出错,又不断改正错误,既遵守规则,也可以改变甚至创造规则,直到作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为止。翻译因而成为万花筒似的、永远不会结束的、激发创造性的智力游戏。

4. 皮尔斯的符号翻译是基于命题(不是词语)的过程,植根于第三性,即未来性、理性、多样性、无限性、普遍性、发展性与逻辑实用性。

5. 符号翻译是单向的、面向未来的、累积的、不可逆的过程。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网络,不应视为从原文文本直奔目标文本的一条线,而应想象成许多翻译线条向各个方向辐射,从初始状况到具备不同价值的结束状况。符号翻译不断向前发展,使翻译更理性、更复杂、更连贯、更清楚和更确定,同时不断使混乱无序、问题丛生的翻译(翻译的成分和/或翻译的诸多方面)达到和谐的境界,还要消除那些不可靠的、误导的、错误的翻译。通过逐步结合涉及客体的新信息,使客体的翻译,即原文的意义更完整、更细致、更连续。然而,信息缺失将永远存在。同理,翻译永远不可能结束,总可以改进,即使是微小的改进。文本符号的存活在于其被翻译和重译。标准译文和"权威译文"事实上既存在又不存在。(Gorlée 2004:104)

戈尔里的符号翻译研究从符号学的视角深刻地论述了翻译的本质和许多相关问题,对深化翻译研究有重要意义。她的理论已成为当今西方符号学家将研究重心转向翻译的重要依据。

必须说明的是,皮尔斯有时提到符号活动需要解释者,有时忽略解释者。这是因为皮尔斯符号学是普遍符号学理论,不涉及某个真实的人,而是涉及一个(不必是人的)解释意识(mind);该理论是出于逻辑的思考,而不是涉及个体。(Gorlée 1994:227)但翻译作为一种符号活动,一定需要解释者。表现体(第一性)、客体(第二性)与解释体(第三性)之间的关系,是

由译者认知并加以解释的。

还必须说明的是：翻译等同于符号解释，符号解释不一定是翻译。（陈宏薇）

普遍范畴　universal categories

普遍范畴理论是皮尔斯(Peirce)符号学的基石。皮尔斯认为，在现象中存在三种要素范畴：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第一性是现象的性质，它本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无所指，与他物没有任何关系，如白、疼痛。第二性是经验的事实，它本来是什么，就是什么，与另一物有关，如雪(白)，挨打(疼痛)。第三性是决定事实可能怎样的定律或思想，它本来是什么，就是什么，但它能使第二性与第一性有关，使它自己与第一性和第二性有关，如"雪是白的""挨打很疼"。第一性是第二性和第三性的基本要素，第二性是第三性的基础部分，第三性是第二性和第一性之间的中介。这三类范畴也是三类存在方式，即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或潜在性)。

在符号不可分离的三个成分中，表现体、客体和解释体分别为相互作用的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表现体(第一性)使客体(第二性)与解释体(第三性)产生认知关系，解释体(第三性)调整表现体(第一性)与客体(第二性)的关系。

符号主要分为三类，象似符号(icons)、相关符号(indexes)和象征符号(symbols)。象似符号为第一性，相关符号为第二性，象征符号为第三性。在皮尔斯看来，"没有符号，我们便失去思考的能力。""生活只不过是一系列的推理或思维。"(Gorlée 1994：42)逻辑推理有三种模式：假说推理(abduction)、归纳(induction)和演绎(deduction)。假说推理属第一性，归纳属第二性，演绎为第三性。

皮尔斯认为人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过程也分为三类范畴：直觉或一般的、无关注中心的准备状态为第一性；经验或世界的真实活动和事件从外部对个人施加的影响为第二性；习惯为第三性，它超越了第一性和第二性，将它们结合起来，变成行动，即根据经验在某种情况下用某种方式行动。

生成符号使其具备意义比从符号获取信息或理解符号更加重要。皮尔斯的普遍范畴理论解释了符号意义的生成过程，已广泛用于人文科学研究之中。它们看起来很简单，一、二、三，若在"一"前面加上0，"三"后面加上∞，就会明白皮尔斯实际上用简单的三类范畴解释了复杂的符号关系和现象。（陈宏薇）

文本翻译中的普遍范畴　universal categories in text translation

皮尔斯(Peirce)的普遍范畴理论可以这样解释文本翻译：原文文本是表现体，是存在的现实，是第一性；原文文本反映的一切信息是客体，是第二性；译文文本是解释体，是第三性。从原文文本的出现到译文文本生成是一次符号活动，参与这次符号活动的三个要素不能分开。我们感受表现体，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客体，我们便获得意义，即解释体。没有原文文本及其反映的经验的事实，就不可能有译文文本。译文文本作为原文文本的解释体，虽然成为一个新符号而独立存在，却不应割断与原文文本的关系，因为它是从原文文本派生出来的符号。作为原文文本的解释体，译文文本与客体的关系应该等同于原文文本与客体的关系，但由于解释者永远不可能全知，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永远只可能近似于世界的真值，因此，译文文本与客体的关系只能近似于原文文本与客体的关系。换言之，作为文本符号，译文所解释的意义，只能近似于原文的意义。虽则"等同"的目标永远不能实现，译者应尽可能使译文文本成为原文文本的象似符号，这是符号活动的原则。

翻译过程是符号解释过程，是思考、质疑直至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体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创新的过程。皮尔斯发现传统的两种逻辑推理方法——归纳和演绎——都无法起到创新的作用，应该有一种逻辑过程，为归纳提供事实，为演绎提供一般原理。于是，皮尔斯假设存在第三种逻辑推理过程——假说推理(又译不明推论)，即对未经解释或尚无法解释的现象，可通过直觉的飞跃作出假说，人的本能或直觉使他感到这种假说似乎(seems)是对的(第一性)，然后，用归纳法对假说进行检验(第二性)，最后，用演绎法将其形成规律(第三性)。假说推理只是暗示"某种可能性"，归纳"表明可行性"，演绎"证实必然性"。每种置疑，无论是解决科学问题还是实际问题，都要凭借本能进行推理，即使用假说推理，因为每位质疑者都需要形成并采用某些假说来论证其观点。只有假说推理才具备创造力，才体现创新精神，推动科学不断发展。(Gorlée 1994：42)

皮尔斯对认知三步曲的解释，即人的认识始于直觉，通过经验，形成习惯，也是普遍范畴理论的体现，确切地说明了学习翻译的过程。（陈宏薇）

13. 语法　语篇

平面　level

即层次，指在语言分析中由大至小或由小到大可以划分的等级，如词素、词、词组、分句、句子、语段、篇章等。上一平面的项目包含着以下平面的项目，如单词包括若干词素，句子包括词组，词组包括单词，等等。

句法　syntax

研究词与词如何组合成句以及句子由什么构成。句法在不同学派中有不同定义：1. 在一般著作中，句法是语法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为词法，即形态学；2. 在转换生成语法中，句法是语法三大组成部分之

一,其他两部分是音系和语义。句法包含组成句子结构的规则(叫做基础部分)和改变这些结构的规则(叫做转换部分)。

词序　word order

常指词在句中的次序,有时也泛指词组、短语在句中的次序。英汉语的词序差异大,翻译时经常需要作调整。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词序成了汉语的一种重要语法形式。汉语句内成分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词在句中的排列顺序来表示。词序不同,词在句中的作用以及词和词的关系也就不同。例如:我帮助弟弟。—弟弟帮助我。—帮助我弟弟。以上三句中的"我"和"弟弟"作用和地位不一样,句子的意义也就不一样。有形态变化的英语,把 I, help, brother 任意颠倒,不能构成句子。以上句子的英语相应为 I help my brother. — My brother helps me. — Help my brother. 参见"词序调整"

末尾焦点　end-focus

英语和汉语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一种相似的固定结构,即主谓结构。因为词序相对固定,句子的意义重心也就相对固定。英语经常把意义重心置于句末(汉语这种情况也不少),这种现象在语法上称为末尾焦点。例如:The catastrophe came, and she was brought to the Mall *as to her home*. 遭难之后,她被带到莫尔林荫道去,算是有了家。

但是汉语语序灵活,句子的信息中心常落在从常位迁移出来的变位上,例如可位于句首或句中,翻译时往往要作调整:在胡适先生说来,高于一切、指引一切的,是他的母亲的精神熏陶。To Mr. Hu Shi's mind, a mother's hallowed influence has been *the guiding star of his life*.

末端句重　end-weight

在英语的句子结构上看,凡是字数较多或语法结构较为复杂的成分一般都出现在句末,这种词序结构叫做末端句重。根据这一原则,英语句子一般要避免头重脚轻的现象,这就是说,句子的谓语部分应该比主语部分更长一些。英语(以及其他印欧语)句子通常是以动词为中心展开,以交代结构关系为重点,而汉语句子可以在同一施事或主题语之下作铺排,不存在末端句重的原则,因此英汉对译时要灵活调度。例如:1. I never kept notes of *what was said on this or the other occasion*, but I have *a good memory for what concerns me*, ... 在这种场合、或别的场合下,人家的谈话我从不记录下来,可是,与我有关的事我记得很清楚……2. It's good *you're so considerate*. 你想得这样周到是很好的。有时英汉语的句末重心是一致的:My idea is that we should stick to our original plan. 我的意见是我们应当按原计划办事。

逻辑顺序　logical order

指语言的常用语序或习惯语序。汉语以先因后果,先条件后结果,先前提后推论,先大后小,由远及近为自然语序。汉语语法多含隐性结构,语序是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一般按逻辑顺序连接词语和分句。英语语言的逻辑顺序除单个词可置前修饰外,一般遵守先主后从的原则。英语形态标志比较发达,且多用连接词语,句序相对灵活。英汉互译(特别是汉译)时,语序常作调整。例如:I have been delayed *by someone who has come to see me* and am a trifle late. 有人来看我,把我耽搁了,所以来迟了点。(把 who-分句提前译)又如:这帮歹徒持枪劫车,杀人越货,受到了法律严厉的制裁。This gang of ruffians have been severely punished by law, because they used to hijack trucks and loot the goods by killing drivers with guns.

非人称主语　impersonal subject

英语和汉语句子中有时不用人称作主语,而用抽象名词或实物名词作主语。在汉语中,这种句式(如: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要比英语中少得多。非人称主语句是英语的一种优美的句式,往往带有拟人化修辞色彩,语气委婉、含蓄,结构严密、紧凑,言简意赅,令人回味。英语含非人称主语的句子,从语法上看,常常是简单句,但却隐含着一定的逻辑关系,有时还表达并列句或复合句的内容。翻译这类句子时,往往要把非人称主语转换成人称主语或其他主语,有时还要拆开句子,用汉语的并列复合句、主从复合句或"断句"、无主句等句式把逻辑关系和时间顺序逐层表达出来。如:From the moment we stepped in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re and kindness surrounded us on every side. 一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我们就随时随地受到关怀与照顾。(汉译找出人称,改变结构。)又如:His weariness and the increasing heat determined him to sit down in the first convenient shade. 他疲惫不堪,天气也越来越热。他于是下了决心,一碰到个舒适的阴凉处,就坐下休息。(汉语拆译)

强调　emphasis

是有效地进行思想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人们在交际中,为使自己的思想能为听者或读者恰当地理解,必须突出重要的内容,这就需要用强调的手段。在现代英语中,强调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语音手段、语法手段、词汇手段、修辞手段等。在口语中,人们可以根据上下文的需要,通过调心(nucleus)位置的移动以达到对同一语调组中不同词语进行强调的目的。在书面语中,经常通过改变词序来达到强调的目的。例如:*Reluctantly* she agreed to help. 她同意帮助是勉勉强强的。(试比较:She reluctantly agreed to help. 她勉强同意帮忙。)*Up went* the arrow into

the sky. 飕的一声，箭射上了天。（试比较：The arrow went up into the sky. 箭射上了天。）*Only now* are we beginning to realize how great a man he was. 只是到现在我们才开始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此外，为了强调，可运用各种强调性词语或各种修辞手段。参见“词序调整”“主题性移位”

焦点 focus

通常指信息焦点（information focus），亦称“信息中心”，即句子的意义重心——给听话者带来新信息的那个语言成分，是言语交际中的主旨部分，与语序或口语中的调音有很大关系。例如“老张昨天到北京去了。”和“老张昨天到北京去了。”两句的焦点不同。针对第一句提问只能说：“谁昨天到北京去了？”针对第二句提问应说：“老张什么时候到北京去？”在汉语中成为焦点的词语也可放在“是”后面，如：“昨天到北京去的是老张。”“老张到北京去的日子是昨天。”英语的焦点常落在句末，形成所谓末尾焦点，如：1. They've been very *lucky*. 2. Shall I hear the results, *soon*? 汉语信息中心的常规虽在句末，但它常有所谓的“变位重心”，即信息中心也常出现在句首或句中，翻译时要作调整。如汉语句首重心转换成英语的句末重心：这种纠纷，你为什么要介入呢？Why on earth should you get involved in *such a conflict*? 英语的非常规重心也可能转换为汉语的句末重心，例如：A quarter of century ago the General Assembly and the Security Council symbolized, *especially for the small countries*, the supreme guarantee of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based on peace and justice. 四分之一世纪前，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曾象征着以和平与正义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最高保证，对小国来说，尤其如此。参见“末尾焦点”

语言层次 linguistic level

指语言系统的分支系统或子系统。层次性是语言固有属性之一，不仅语言的语法构造有层次（句子的结构是一种层次结构），而且整个语言系统也是分层次的。它的划分既对语言本体的认识有关，又跟描写语言系统的方法和标准有关，但方法毕竟是第二性的。这一概念由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引入语言学后，得到广泛运用。但由于各派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认识不一致，采用的分析方法和标准不一样，划分出来的层次也就不同。如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斯（Harris）划分出音位和形态两个层次，法国语言学家邦弗尼斯特（Benveniste）划分出区别特征、音位、语素、词位和述谓五个层次。一般把语言系统划分为语音层次、词法层次、句法层次和词汇-语义层次，也有人认为可以补充划分出语素-音位层次、构词层次和熟语层次等。从表现和内容两个方面来研究语言，也使用语言层次这一概念，这样就划分出表现层次（或音位层次）和内容层次（或意义层次）。语言层次和语言单位有密切的联系，每一层次的对象是该层次的单位及其相互关系。

语法单位 grammatical unit

语法分析上指语言结构的层次单位。如传统语法一般分词素、词、短语、小句（分句）、句子等从小至大五个语法单位。现代语法还研究大于句子的语法单位，包括句群（语段）和篇章。翻译单位按照语法单位来划分，两者有着对应的和不对应的关系。参见“翻译单位”

词 word

指语言中音义结合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词用以指称事物、现象、过程、特征或关系，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也是翻译单位的一种。

中心词 head

亦称“中心语”“主导词”。在词组或短语的组合中，如果词语之间有主次之分，则其中的主要词语为中心词，接受附加语或修饰语对它的限制或修饰。在语法分析上，一般以中心词的功能决定并代表以其为中心的组合体的功能。例如：“艰苦的环境”——difficult circumstances，其中，“艰苦”和 difficult 分别为修饰语，修饰各自的中心词“环境”和 circumstances，英汉词序相同。又如：“一张他签字的两万英镑的支票”——a cheque for twenty thousand pounds with his signature，其中，“支票”和 cheque 分别为中心词，英汉词序不同。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英汉语的修饰语和中心词的词序经常颠倒：汉语修饰语一般在前，而英语中除单个词作修饰语或限定词放在中心词之前外，遇到有介词短语（如上例的 for -和 with -短语）、分词短语等修饰中心词时一般均放在中心词之后。

词组 phrase

亦称“短语”，指从句子中划分出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词的组合（英语不包括主谓关系的组合，并可含虚词），是语言单位之一。词组是句子的建筑材料，由词构成，但不是交际单位，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在双语转换中，常以词组为操作单位，词组层的翻译较为常见，尤其是习语或固定词组的翻译。英语词组的构成一般围绕中心词搭配而成，并按其中心词分类，如名词词组、动词词组、形容词词组等，由此可确定其在句中的语法地位。汉语词组一般由暗含语法关系的若干词语结合而成，词组在句中的语法作用比较灵活。四字词组是汉语词组的典型代表，但与英语词组不一定有对应关系。如：典雅大方（并列词组）elegant and graceful；中国首都（偏正词组）the capital of China；达成协议（动宾词组）reach an agreement；祸不单行（主谓词组）An evil chance seldom comes alone. 参见“词组层翻译”

短语 phrase

参见“词组”

子句 clause

指汉语中具有主谓关系的语言组合,不独立成句而被包孕在句子里充当一个成分,有些语法学家称之为子句。子句有时相当于英语中的分句,例如:我相信他们能够克服困难。I don't doubt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其中,子句"他们能够克服困难"与 that-分句相当。子句有时相当于英语中的一个分词短语或独立结构,例如:雷雨把房子冲坏,他们只好住在一个窑洞里。The storm having destroyed their hut, they had to live in a cave. 其中,子句"雷雨把房子冲坏"相当于英语"名词+分词"的独立结构。子句有时则相当于英语中的其他短语。

句子 sentence

指用词和词组构成的、能够表达完整的意思的语言单位,也是常用的翻译单位。每个句子都有一定的语调,表示陈述、疑问、祈使或感叹的语气。在连续说话时,句子和句子之间有一个较大的停顿。在书面语中,每个句子的末尾用句号、问号或叹号。从结构上看,英汉语句子差别较大。英语只要是由一致关系维系着的主谓结构就是一个句子。这种以主谓为主干构成的句子,由语法框架的完整性决定,成分齐全则句子结束,意思没有表达完时可以再补上一句,但两个句子间的逻辑关系一般用句子间的连词或其他关系词显示出来。例如:"I've finished the job."已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如果意犹未尽,还可补充一句,成为"I've finished the job, which is a great pleasure to me."补充的从句部分由关系代词与主句连接,构成一个主从复合句。英语中的句子是一种严格的、非开放性的句法单位。书写形式也很严格,每一句的开头第一个字母必须大写,因而句子间的界限异常分明。汉语句子在句法上的限制不明确,主语与谓语都没有结构的标志,联系比较松散。汉人写句子"意尽为界",句子的信息量由于没有语法形式上的限制,弹性较大。例如:"他是一个好学生。"可以算作一个句子,也可以接下去写:"……人很聪明,也很好学,总是充满好奇心……"只要还有有关信息要交代,就可以接着往下写。因此,汉语的句界是不清楚的。

英语有五种基本句型(SV/SVC/SVO/SVO$_1$O$_2$/SVOC)作为各种复杂句子的主干。一般成分分明,主次清晰,多用形合,语序比较固定。汉语句子总体上分为主题句、施事句和关系句三类,还有连动式、兼语式等特殊结构,汉语因无词形变化,主要靠语序安排和功能词搭配成句,多用意合。

省略句 elliptical sentence

某些词、短语、句子成分或者分句在不改变句子原来意思的前提下的省略,构成语法学中的省略句。严格地说,只有能够复原并把它重置于原句中的句子成分才是可以省略的成分。(Quirk *et al.* 1972: 536)。翻译省略句以能省则省为原则,如:My son is using the car this morning and (my son) will be (using the car) this afternoon. 我儿子今天早上一直在用车,而且(我儿子)要用(车)到下午。但是,有时不得不把原文省略的成分表达出来,以便读者理解。如:One can't think of Africa without thinking of Egypt, the cradle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nor of Egypt without the Nile. 想起非洲,人们不可能不想到作为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埃及,而想起埃及,也不可能不想到尼罗河。原文后半句如把成分补全应为:nor (can one think) of Egypt without (thinking of) the Nile。

病句 wrong sentence

指违反语言惯例的句子。词语选用不妥,句子成分搭不拢,语序安排不当,逻辑条理混乱等,都会造成病句。特别是实用文体,翻译时要警惕原文病句的陷阱。就英语技术资料来说,来源十分广泛,不仅来自英语国家,而且还来自日本、德国、法国、丹麦、意大利等非英语国家。这些资料往往由本国语言译成英语,翻译者也并非都是懂行的英语纯熟的人。在非英语国家来源的英语资料中,有不少所谓的 German English, Italian English 或 Chinglish 语病不少。有的拼写错误显而易见,如将 direction 写成 direktion(按德文读音将 c 写成 k)。有的语序倒置,如将 hooter of disturbance(故障报警器)写成 hooter disturbance(报警器故障)。有的用语不当,如将 auxiliary fan(辅助风机)译成 auxiliary pneumatic transport(辅助气动传输)。还有不少语法问题,不胜枚举。所以对有些语言不纯的非英语国家的英语资料,译者在开译之前,要下一番纠正语病的工夫,然后才能动笔。

在文艺作品中,为了反映人物的卑微、粗鲁、没文化、没教养的个性特点,人物语言带有病句,则另当别论。翻译时可将错就错,或作相应表达。

句群 sentence group

亦称"语段""句组"或"超句体",由两个以上的句子组成,小于段落或等于段落,句与句之间有逻辑上的联系,并由一定的语言手段来体现这种接应关系,是形式上和意义上相对独立的一个语言片段,可以从语流中切分出来。句群常作为翻译单位。参见"语段"

语段 discourse group; sentence group

一个意义范围不确定的术语。在口头表达中又称"话语"(discourse),指相当完整的话段,通常限于指单个说话者传递信息的连续话语,有时相当于语篇。对于话语的专门研究称为"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这对翻译研究和实践有指导作用。在书面语中,语段相当于"句群"或"超句体"(sentence group)。参见"句群"

段落 paragraph

指连贯性话语的组成部分,在口语中用较长的停

顿,书面语中以另起一行为标志。一般由若干句子或句群组成,但有时也由一个句子(包括独词句)组成。段落中各个句子之间由一定的语言接应手段加以衔接。

英汉两种语言的段落构成有不同。英语一般讲究主题早出,开门见山,常安排段首句为主题句(也有在段中或段末的),语义呈直线式结构展开,直逼结尾,结束有力。英文行文不一定按时间顺序,多按思维心理顺序或逻辑顺序。汉语段落结构一般呈回环式,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多按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展开。汉语不讲究主题句,把主题融合在行文之中,但讲究首尾呼应,善始善终。

语篇　text

亦称"篇章"。对语篇的定义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凡能表示一个相对独立的意义的语言单位,不论是词、词组、句子还是语段,都可认为是语篇。例如:指示牌"Danger!"、呼救语"Help!"、警告语"Wet Paint!"之类的词语均可视为语篇。但一般认为,语篇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1. 语篇是一个或几个语义连贯、结构衔接的句子或话语组合,它用于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并实现一定的交际功能;2. 一个语篇定有一主题,语篇内的每个句子都是为了这个主题而联结在一起。也就是说,一个独立的语篇就是有着共同主题的句子的总和;3. 语篇是一种意义单位,而不是形式单位,它可以从语流中切分出来。

英语把语篇看做段落的扩大,如同段落是句子的扩大一样。段落之间的逻辑连接多用形合,常在段首句中用相关词语表示与上段结尾的逻辑关系,如转折、因果、递进等。英语语篇从全篇的取材和立意上强调一致性,即连贯性,其组织和发展呈直线形。汉语语篇是从通篇立意来决定段落行文的,其展开方式并不是从词语、句子到段落以至全篇的逻辑推演过程。汉语语篇发展呈螺线形,语篇的主题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的方式,而是采用迂回的方式加以阐述。汉语段落之间常常不用连接词语表明内在的逻辑联系,即倾向于意合。

德·布格兰德(de Beaugrande)和德莱斯勒(Dressler)(1981)提出语篇特征的七项标准为:衔接性(cohesion)、连贯性(coherence)、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可接性(acceptability)、语境性(situationa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他们认为,如果其中任何一项没有达到,语篇就失去交际性。

词类　parts of speech

指词的语法分类,即根据语法分析的要求对语言中的词所作的分类。英语分十个词类,从翻译角度可归纳为三大类:1. 主要词类——名词、代词、动词;2. 修饰词类——数词、形容词和副词。以上两类为实词(notional words);3. 附属词类——冠词、介词、连词和叹词,都不构成句子成分,前三种为虚词(form words),叹词为特殊的一种。汉语分十一类,也可归纳为三大类:1. 主要词类——名词、代词、动词;2. 修饰词类——数词、量词、形容词和副词。以上为实词;3. 附属词类——连词、介词、助词(以上为虚词)和叹词。

英汉语两相比较,英语无助词(包括结构助词、时态助词和语气助词),汉语无冠词;英语中虽然有相当于汉语量词的词(列入名词),但是其数量和使用范围比汉语中的量词小得多。词形变化是英语区别于汉语词类的最大特征;汉语无词形变化。英语介词、连词的使用比汉语活跃。

语法　grammar

语法是描写一种语言的结构,说明词的变化和用词造句的规则。它研究句子的结构、功能和意义。茅盾在1954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每种语文都有它自己的语法和词汇的使用习惯,我们不能想象把原作逐字逐句按照其原来的结构顺序机械地翻译过来的翻译方法,能够恰当地传达原作的面貌,我们也不能想象这样的译文会是纯粹的本国文字。"(转引自罗新璋 1984:513)所以,要搞好翻译,必须具有较高的语言文字修养,而其中熟悉外、汉语知识,学会语法分析又是基本条件。语法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各种语法单位用什么形式表达什么意义。翻译中遇到的语法问题是很多的,例如:The blind person using the reading machine controls the speed at which it talks with the keyboard. 不能译成:使用这种阅读机的盲人可控制它同键盘讲话的速度。译错的原因是 with the keyboard 修饰关系搞错,这里 with-短语应是主句动词 controls 的状语,系割裂修饰。应译为"……盲人可以用键盘控制它'讲话'的速度。"参见"语法翻译法"

系统功能语法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系统功能语法的代表人物是韩礼德(Halliday)。该理论包括两个部分:系统语法(systemic grammar)和功能语法(functional grammar)。系统语法把语言视为系统,重点说明语言的内部底层关系,它是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人们不断选择的若干个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system networks),亦称"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功能语法研究语言选择的过程或结果,是对语言结构在语篇中的功能的研究。

系统语法认为:语言由三个主层次组成。这三个主层次分别是:情景、形式和实体。情景指与语言活动相关的环境、事件、人物、交际方式和渠道等。它使语言在交际中发挥其功能,是语言活动产生的动因和环境。形式把实体成分排列成可辨认的、有语言的模式,包括两个次层次:词汇与语法。词汇指语言的个体项目和个体项目组成的模式;语法则指语言项目的类别和由不同语言项目的类别组成的模式。实体是语言的"原材料",指语言的载体:讲话的声音和书写的符号。研究语音符号的科学为语音学(phonetics);研究书写符号的科学称为文字学

(graphetics)。情景与实体从实质上讲是非语言的。前者是语言运用的环境,后者是语言的载体。

系统功能语法把语言看成一种符号系统。最早把语言视为符号的是斯多葛学派(Stoics),但他们把符号视为独立的单个个体。韩礼德认为,语言不是一个个单独的符号,而是一个符号系统,是包括音乐、民族、礼仪、商品交换等系统在内的众多符号系统之一。但它又是极为特殊的一种符号,因为它在表现其他符号系统时起作用,是通向更高符号学的工具。

韩礼德的语言功能在语言表层结构中的实现是与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连的。是社会文化环境决定语篇体裁,而语篇体裁则受制于语域分析中的三个变量：语场、语旨与语式。参见“语场”“语旨”“语式”

(张顺梅)

及物性　transitivity

根据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及物性指的是对小句进行描述所采用的系统,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过程(process)的类别、参与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ce)(Thompson 1996：78)。根据韩礼德的语篇分析理论,及物性由语言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决定。在翻译研究中,可以对原文和译文中体现及物性的各种过程进行对比分析,以发现源语和目的语在各种过程的选择上的异同及其转换规律,例如,黄国文(2006)从经验功能角度对唐诗英译进行分析。(林作帅)

主述位结构　theme-rheme structure

根据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主位结构是体现语篇功能的三个方面之一。一个主位结构由主位和述位构成,主位一旦确定,剩下的部分便是述位。一个小句可分为主位和述位两部分;主位是信息的起点,是小句的起始点(Thompson 1996：115～144)。在韩礼德的语篇分析理论中,主述位结构由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决定。主述位结构是语篇的谋篇机制之一,它以线性和层次性两种方式把语篇句子所谈论的话题联系起来,共同组成不同层次的大话题,最后体现语篇的总话题。(参阅张德禄,刘汝山2003：11)因此,研究主位的推进(progression)对于考查语篇的连贯(coherence)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翻译研究中,可以以主述位结构为切入点,对原文和译文中的小句的主述位结构及其推进展开对比分析,以发现源语和目的语在小句结构和主位推进谋篇方面存在的异同及其转换规律。例如,德耶斯(Deyes)(1978)等人已成功地把语篇类型的分析与主位推进结构联系起来,并将之用于翻译研究(参阅Baker 1992：119～175;Baker 1998：265)。参见“主位”“述位”

(林作帅)

语气　mood

在系统功能语法中,语气由“主语”和“限定成分”构成,在小句的交换功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在陈述小句中,主语出现在限定成分之前时小句是提供信息,而限定成分先于主语出现时则表示疑问。根据韩礼德(Halliday)(1985)的语篇分析理论,语气由语言的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来决定。在翻译研究中,可以以语气为切入点,对原文和译文中的语气的体现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以发现源语和目的语在语气的体现方面存在的异同及其转换规律,例如,黄国文(2006)从语气的角度对唐诗英译进行分析。

(林作帅)

语式　mode

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中的术语,指的是“交际的形式,是口头交谈还是书面沟通”(Halliday, Hasan 1985：41)。语式属于语域(register)的三个变量之一(另两个是语场和语旨)。根据韩礼德(1985)的语篇分析理论,语式与语言的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相关,后者由三个语义系统来体现：主位结构(thematic structure)、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和衔接(cohesion)。在翻译研究中,可以以语式为切入点,对原文和译文中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或衔接进行对比分析,以发现源语和目的语在语式的体现方面存在的异同及其转换规律,例如,贝克(Baker)(1992)通过观察语篇衔接系统从语篇的层面来探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其策略;也可以把语式作为一个变量来考查译文质量或描述翻译现象,如贝尔(Bell)(1991)将语式用于其语篇参数理论,豪斯(House)(1977)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中亦包含语式这一变量,等等。(林作帅)

语旨　tenor

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中的术语,指的是“交际中涉及的人以及交际双方的关系”(Halliday, Hasan 1985：41)。语旨属于语域(register)的三个变量之一(另两个是语场和语式)。根据韩礼德(1985)的语篇分析理论,语场与语言的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相关,后者与交际双方的言语角色(speech roles)、语气(mood)、情态(modality)等多方面因素相关。在翻译研究中,可以以语旨为切入点,对原文和译文中的交际双方的言语角色、语气或情态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以发现源语和目的语在语旨的体现方面的异同及其转换规律,例如,黄国文(2006)尝试从人际功能的角度出发对唐诗英译进行分析;也可以把语旨作为一个变量来考查译文质量或描述翻译现象,如贝尔(Bell)(1991)将语旨用于其语篇参数理论,豪斯(House)(1977)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中亦包含语旨这一变量,等等。(林作帅)

语场　field

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中的术语,指的是“所谈论的事情”(Halliday, Hasan 1985：41)。

语场是语域(register)的三个变量之一(另两个是语旨和语式)。根据韩礼德(1985)的语篇分析理论,语场与语言的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相关,后者通过及物性(transitivity)系统来体现(realize)。翻译研究中,可以以语场为切入点,对原文和译文中的及物性系统进行对比分析,以发现源语和目的语在语场的体现方面存在的异同及其转换规律;也可以把语场作为一个变量来考查译文质量或描述翻译现象,如贝尔(Bell)(1991)将语场用于其语篇参数理论,豪斯(House)(1977)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中亦包含语场这一变量,等等。　(林作帅)

情态　modality

根据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情态与人们日常交往中的交换物(如信息、消息、货物、服务)有关。根据交换物的不同,可以把情态分为情态化(modalisation)和意态化(modulisation)。前者指的是从可能性(probability)或经常性(usuality)的角度看这个消息的可靠性如何;后者指的是当交换物是货物和劳务时,讲话人对最终的交换成功性的自信程度。(Thompson 1996: 38~71)表达情态的手段除了情态动词外,还包括一些表达情态的副词(如 hopefully, possibly 等)和任何带有评价意义(evaluative)的词汇(如 beautiful, dreadful 等)。根据韩礼德(1985)的语篇分析理论,情态由语言的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来决定。在翻译研究中,可以以情态为切入点,对原文和译文中的情态的体现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以发现源语和目的语在情态的体现方面存在的异同及其转换规律。　(林作帅)

语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grammaticization

最早由法国语言学家梅耶(Meillet)在 *L'evolution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1912)一文中提出,其研究对象是语法的演变过程,语法化对语言本身具有重要作用。有关语法化研究的成果有海因(Heine)等人合著的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1991)、霍珀(Hopper)和特劳戈特(Traugott)合著的 *Grammaticalization* (1993)等。当代语法化研究可以分为狭义、广义和最广义三种层次观。狭义层次观指的是词汇层面的语法化,研究的对象是语言中实词演变成语法标记、语法范畴、语法构造或惯用表达的过程或现象;广义观研究对象涉及语篇和语用层面;最广义观则包括典型的概念结构、时间结构等如何演变为语法手段或构块(construction)。代表性观点有:1. 一个词语成为附着语素,一个附着语素成为词缀,以至于一个词缀成为另一个不能进一步细分析的语素(Meillet 1912);2. 语法化存在于词汇语素进而成为语法语素,或从较低的语法地位进而成为具有较高的语法地位,即从派生构形成分进而成为曲折构形成分,其范围有所增加(Kurylowicz 1965)。语法化的主要特征:1. 历时和共时,即语法化研究包括对语言共时的表述和历时的追溯;2. 单向性和有序性;3. 抽象化和专门化。如 going to 在 I'm going to the store 中不应看做是语法化,而要动词跟在 to 之后才算。在 I'm going to help you. 这样的句子中,going to 应看做是语法化。沈家煊(1994)对语法化的研究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牛保义和徐盛桓(2000)探讨了语法化成为英汉语言比较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胡壮麟(2003)就语法化研究存在的若干问题作了论述;王寅和严辰松(2005)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探讨语法化的研究。

将语法化用于翻译研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曾利沙(2000)探讨了英语抽象行为名词加-s 这一复数名词后缀的普遍现象,英语中表方式、材料、措施、工具、结果、处所、事件、数目(量)、场合(活动)、条件等概念均可以语法化,以抽象的语法形态"-s"表达出来。这是英语中词汇概念通过后缀-s 形成语法化在词汇结构中的一种体现。这不仅对复数化英语抽象行为名词的翻译提供了表征手段,也为汉译英过程中对相关概念的英语语法化的认识提供了一种视角,为转换提供了一种方法(曾利沙 2001b)。如:

Perched like six crows atop the group, surveying the wide expanse of ***operations*** of the Shell, are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of managing directors. (*Fortune*, August 26, 1991) (* -s = branch companies or affiliates) 常务董事会的六个成员置身于整个壳牌集团公司最高领导位置,俯瞰下属各分支机构的工作运转。

此处的 ***operations*** 并非指复数概念,其后缀-s 就是一种概念的语法化形态,指的是执行特定行为或动作的"群体",即壳牌遍布世界各地的各个分公司。

(曾利沙)

语法换置　grammatical transposition

赫维(Hervey)和希金斯(Higgins)于 *Thinking Translation*(1992)一书中使用的术语,指"只要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在句法结构(syntactic configuration)上存在着重大差异,原文中某些词性(part of speech)就必须被译文中其他词性所替代(replacement)或强化(reinforcement)的现象"(1992: 200)。例如,在将法语句子"Je persiste à croire qu'ils ont raison."译成英文"I still think they're right."时,译文中使用副词 still 来传达原文中动词 persiste 所表达的意义。(Shuttleworth, Cowie 1997: 68)　(林作帅)

语法学　grammar

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语言的语法构造,任务是研究语法构造的组成,各种语法单位的功能及其存在和发展的规律。语法学一般分为词法学和句法学。前者研究词的变化规则和构词规则以及词类划分等问题,后者研究短语结构规则、句子结构规则以及句子成分和句子分类等问题。古印度和希

腊于公元前3世纪已开始研究语法。我国语法研究开始较迟。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学正式形成。

语法分析 grammatical analysis

语法分析指对原文中词语之间的修饰关系、逻辑关系、主谓关系、动宾关系以及时态、语态等的结构分析。语法分析不当会造成对原文的误解,进而又产生误译。例如: Some of our most skilled people don't get the salaries of maids in the U.S.(原译:连我国一些最有能力的人在美国还比不上女佣人的工资高。)按逻辑判断,原句中in the U.S.应是maids的定语,而不是地点状语。拟改译为:"我们有些技术最好的人才,薪金还不如美国女佣高。"

语法形式 grammatical form

指表达语法意义的语言单位外形。它可以由音位及其组合(词素、词),也可以由超音质音素,如重音、语调以及词序等表现出来。例如,词形tables中的-s表示复数,这一形态在句子中与其他词可能发生一定的句法关系。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之间具有辩证关系:语法形式是语法意义存在的物质基础,但它又为内容服务,决定于内容,即语法形式以语法意义为转移。语言中语法形式多种多样,不同语言的语法形式存在着实际差异。但构成语法形式的方法是有限的,主要有词序、辅助词、语调、重音、附加法、内部屈折、异根法和重叠等。

语法范畴 grammatical category

指语法意义和表达这种意义的语法形式标志的统一体。语法意义和表达这种意义的语法手段,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构成语法范畴。如英语有数的语法意义,也有数的语法形式:day(天,日子)—days, dog(狗)—dogs, map(地图)—maps, man(人)—men;俄语也同样如此:день—дни, собака—собаки, карта—карты, человек—люди。因此,英语、俄语都有数的语法范畴。汉语"天""狗""地图""人"虽然也表示"一个"或"不止一个"的意义,但没有相应的语法形式,而只用词汇手段来表示,如"这些天""三幅地图""一群狗""那些人"等,因此汉语没有这样一种数的语法范畴。构成语法范畴的基础是对立关系,它必须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处于对立关系的同类语法意义。如单数和复数构成数的语法范畴,阳性、阴性、中性构成性的语法范畴,现在时、将来时、过去时构成时的语法范畴,等等。语法范畴具有层次性。词类是最广的语法范畴,性、格、数、时、式、体则是处于中间地位且又是主要的语法范畴,而阳性、阴性、中性、单数、复数、现在时、将来时、过去时等则为次语法范畴。也有人认为只有性、数、格、时、式、体等是语法范畴,而阳性、阴性、中性等只是属于性这一语法范畴的具体语法意义,二者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传统语法把语法范畴狭义地理解为词法范畴,即与单个词有关的语法范畴,而不包括句法范畴,即表现在大于词的语言单位(短语和句子)中的语法范畴。不过对句法范畴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语法范畴具有民族特点,各种语言的语法范畴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语法范畴,在不同语言中的情况也不一样。

屈折变化 inflection; inflexion

根据语法规则,在一个词上添加词缀或用其他方法改变其形态,称为屈折变化,亦称"词形屈折"。英语(或别的语言)的屈折变化,除了有组词造句功能外,还具有复杂的表情达意功能,在翻译时不可不加以注意。例如:1. I bet the *girls* will be hopping mad. 我敢说,那些女孩子会发疯的。(加"那些",传达词的复数信息。)2. You are not looking quite yourself. 你这会儿气色不好。(用"这会儿"来传达"时""体"信息。)

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in linguistics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欧美句法研究的主流。结构主义关注的中心是所谓"成分分析",即将句子切分为以短语为单位的"结构体",如名词短语(NP)、动词短语(VP)等,以此构成句子的结构树形图,从而使句子在结构上成为"可认识的客体"。结构主义的这种短语结构分析法不仅明确了句中各个单位之间的线性关系,为翻译中确认主语、谓语等提供了信息,还明确了各成分之间的层次关系,为翻译中厘清句义中的层次组织提供了有机的线索。结构主义通过成分切分,析出句子词项之间存在的线性组合和成分之间的层次递接关系,为翻译学的语义和结构分析过程提供了一种科学研究的途径。但是结构主义作为语言学的流派重视关系,忽略实体;重视对语言的静态描写,忽视历时研究和动态研究。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有其局限性,翻译完全靠结构分析是行不通的。

结构 structure

1. 指制约并联结成整体诸成分的各种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就这一意义而言,结构不同于系统。谈到语言结构时,强调的是各种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谈到语言系统时,强调的是各种成分的总和。有时,两者均指各语言成分制约并联结构成的整体;2. 指一个复杂单位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语法关系或语法结构,如词的结构、短语结构、句子结构等;3. 指小于句子的词与词的组合,相当于短语,如并列短语也可叫并列结构;4. 信息结构则指信息的组合与联系,如主题与述题、主位与述位等。

已知信息 given information

与"新信息"相对,指说话人认为或假定对方已经知道的内容,这或者是上文曾经提到的内容,或者是

可在一定语言环境中推断出来的内容，这种已知的内容是信息传递的出发点。

新信息　new information

与"已知信息"相对。一句话语的信息结构可分成已知信息和新信息两个相对的部分，前者指话语上文已提供的信息，后者指在已知信息基础上新增的信息。新信息是主要信息，而已知信息是次要信息。在口语中一般以语法成分、语法手段、强势语调等表达新信息。在书面语中，英汉语新信息可以放在句首，也可以放在句末，翻译时常需调整，如：1. 我原来打算今年1月访问中国，后来不得不推迟了。(*I had to postpone the visit* which I had intended to pay to China in January.) 2. 他5岁时生了一场病，变成了聋子。(*He became deaf* after an attack of illness at 5.)

主位　theme

与"述位"相对，从信息结构角度划分出来的句子的组成成分，指说话人给出的题目，即一个句子的前一部分。它表示的是听说双方已知的信息，是句子其余部分所叙述的内容的起点。换言之，是句子信息传递的出发点和句子得以叙述的基础。说话人以此来组织句子，向听话人传输有关信息。韩礼德(Halliday)从语言的功能角度，把自然语言的语义系统分成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其中语篇意义主要由主述位安排及主位推进的方式等来体现。就英汉翻译而言，许多情况下译文的主位(斜体部分)与原文可以是一致的，如：*In January 1970* I got the form that you have to apply for black lung compensation. *I* wrote down everything on that form. *Two months later* we were all told that everyone who had applied for compensation would have to go to the town of Hazard and apply again. 1970年1月，我拿到了一张申请领取黑肺病抚恤金的登记表。我在登记表上写明了一切情况。两个月后，我们全部接到了通知，要每一个申请领取抚恤金的人都到哈扎镇再申请一次。

由于英汉语表达方式的不一致，译文的主位跟原文的主位有时错位。例如：*The company* owned everything in the town: the houses, the store (shop), the schools and churches. 村镇上的一切——房屋、店铺、学校和教堂，都是属于公司的。(此句也可译成：公司拥有镇上的一切：……)

主题　topic

描述句子信息结构的术语。在一个句子中，主题部分列举人、事物或概念，是谈论的话题，为句子叙述的起点；述题部分予以评述。主题与主语、述题与谓语不是相同的概念。主语和谓语是描写语法结构的术语；主题和述题是描写信息结构的术语。从以下英汉句子对比可见，主题不同于主语：

As for education, John prefers Bertrand Russell's ideas.
（主题：As for education；述题：John prefers Bertrand Russell's ideas.）

至于教育，约翰更喜欢罗素的思想。
（主题：至于教育；述题：约翰更喜欢罗素的思想。）

As for education, John prefers Bertrand Russell's ideas.
（主语：John；谓语：prefers Bertrand Russell's ideas.）

至于教育，约翰更喜欢罗素的思想。
（主语：约翰；谓语：更喜欢罗素的思想。）

有时，主题与主语重合。例如：

John	hit Mary.
主题(主语)	述题(谓语)
约翰	打玛丽。
主题(主语)	述题(谓语)

主题有以下特征：1. 在任何句子中，主题的功能始终如一，主题是"注意的中心"，它是预告话语的话题；2. 主题的所指必须有定；3. 主题总在句首；4. 主题的概念更多地着眼于整个句子范围。

英语常用主谓框架，而汉语较多采用主题-述题(或主位-述位)结构，两者大不相同，因此在双语转换时不得不时时考虑它们之间对应的形式。例如：A dialect is known by every linguist in this room. (有一种方言，这间屋子里的每个语言学家都懂得。)这里，把英语的主谓句译成"话题-评论"型的汉语句子。其中，主题或话题是"有一种方言"，是一句话的出发点和支撑点，是结构重心；其后是环绕主题展开的评论语。汉语习惯上不说"一种方言被这间屋子里的每个语言学家所懂得"，尽管这种译法形式上与英语句子的主谓结构相对应。

述位　rheme

与"主位"相对，指说话人对自己给出的题目的说明、描写和叙述，即句子的后一部分。它用一个新信息来引申、扩展和阐发主位所表示的已知信息。因此，一般说来，它是一个句子所传输的语义内容的重点，是信息结构的核心。英、汉语中主位、述位的位置，既有一致的情况，也有不一致的情况。这主要根据英、汉语不同的信息结构的特点而定。如下面两句话，前句一致，后句不一致：But the door *was much too small*. Sadly *she shut it again and took the key back to the table*. 可是那扇门太小了。她很不高兴地把门关上，把钥匙放回桌上去。参见"主位"

述题　comment

参见"主题"

表层结构　surface structure

与"深层结构"相对，转换生成语言学术语。表层结构确定句子的语音，是实际说出的现实的句子。它由深层结构通过句法的转换部分变换而来。表层结构往往只提供句子的部分语义解释，即逻辑式，完整的语义表达还须经过其他认知系统的规则后才能得到。像"他被警察抓了"和"警察抓了他"这两个句子，表层结构不一样，但却是同一深层结构通过不同的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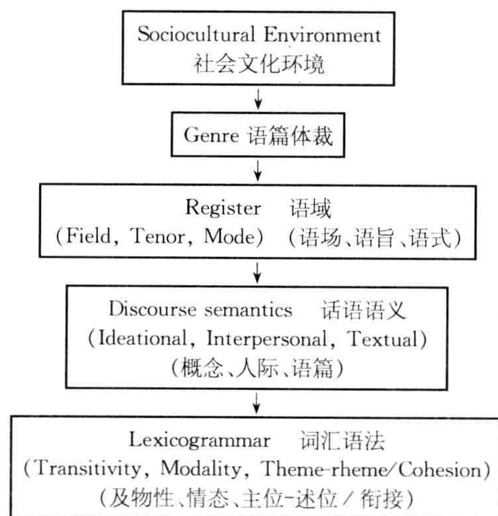
换而形成的。而“鸡不吃了”的相同的表层结构有两个意思：一是“(某人)不吃鸡了”，二是“鸡不吃(东西)了”。这是因为它是由两个不同的深层结构转换来的，其中一个深层结构中的“鸡”是施事，另一个深层结构中的“鸡”是受事。当表层结构不能提供唯一的语义解释时，必须进入深层，通过背景知识，正确理解语义。参见“深层结构”

深层结构　deep structure

与“表层结构”相对。转换生成语言学术语。由美国乔姆斯基(Chomsky)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65)中提出。深层结构就是一个句子在没有形成前存在于人们思维里的概念，即指抽象的句子结构，它确定语义解释，代表句子的语义。这种抽象的句法结构或句子成分之间的内在语法关系不能在句子的线性序列上显示出来，如英语句子 John is easy to please.（约翰易于讨好）和 John is eager to please.（约翰急于讨好别人），二者在线性序列上结构完全相同，但实际上成分间的内在关系不同。由于 please 在词法上既可充当及物动词，也可充当不及物动词，在前句中 John 是 please 的对象，而在后句中成为主体。据此，前句可转换成 To please John is easy. 或 It is easy to please John. 后句则不可作这样的转换。区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为理解和表达同形异义结构或同义异形结构提供了依据。如 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s，其深层语义是“猎人射击”，还是“射击猎人”，只有联系具体语境，通过深层结构分析，才能加以确定，因为这一短语(在深层结构中可理解为一个句子)可能有以下两种不同的深层结构转换而来：the hunters shoot (sb.)或(they) shoot the hunters. 在转换生成语法中，深层结构由基础部分输出，成为转换部分的输入，经过转换规则得到表层结构。在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不同阶段，对深层结构与语义的关系有不同的说法。参见“表层结构”

语篇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亦称“话语分析”，是一门新兴的、尚未定性的学科，没有一个单一的理论做指导，也没有公认的分析步骤和分析方法。它以合乎语法、意思连贯的语篇为研究对象，主张突破孤立的句子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对言语进行研究和分析。最能体现语篇分析应用价值的，主要有两个方面：谈话分析和完整语篇分析。进行语篇分析有多种不同的途径。韩礼德(Halliday)在《功能语法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1985/1994)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他构建系统功能语法的目的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可用来分析英语中任何口头语篇或书面语篇。此后，韩礼德的理论框架成了很多中外学者研究语言的工具。美国著名语篇分析学者斯夫林(Schiffrin)在《语篇分析途径》(*Approaches to Discourse*, 1994)一书中介绍了六种可用于语篇分析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交际文化学(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语用学(pragmatics)、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变异分析(variation analysis)。后面两种分析途径跟韩礼德的语篇分析模式紧密相关。韩礼德的语篇分析模式建立在他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其目的是研究交际中的语言。它涉及的是语言与它的使用情景(即语境)之间的关系。芒迪(Munday)(2001)把韩礼德的语篇分析模式用图式结构描绘如下：



语篇体裁、语域与语言的关系(Munday 2001: 90)

韩礼德认为，语言功能在语言表层结构中的体现与社会文化环境是紧密相连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要用什么样的语篇体裁，而语篇体裁的体现则决定于语境中三个重要的因素，即“语域”(register)分析中的三个变量：语场(field)、语旨(tenor)、语式(mode)。语场指的是正在发生什么事，所进行的社会活动的性质、特点、语言所谈及或描述的是什么；语旨指的是谁是交际者，他们的基本情况、特点、地位、角色、关系等；语式指的是语言在交际中所起的作用，包括交际渠道和修饰方式。语场、语旨、语式跟语言的三个纯理功能相互联系：语场体现了语言的概念功能，语旨体现了语言的人际功能，而语式则是语篇功能的具体体现。从更深一层看，与语场相关的概念功能又要由语言的及物性结构来实现，与基调相关的人际功能由语言的情态系统来实现，而与语式相关的语篇功能则要由主位-述位结构以及衔接手段来实现。

到目前为止，运用韩礼德的理论来研究翻译问题的著作和论文数不胜数，豪斯(House)(1977, 1997)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理论，建构了翻译质量评估的功能-语用模型。贝尔(Bell)(1991)通过英国诗人基普林(Kipling)一首诗中的第一段很巧妙地勾勒出韩礼德语篇分析思想的重点：

我有六位忠实的仆人，
（他们教我运用我的知识）；
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为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样？""哪里？"和"谁？"。

诗中每一个问题都包含了一个（或多个）语篇参数："什么"指语篇所包含的信息，是信号的意义、言语行为的命题内容，也即语篇的范围（语场）。"为什么"指信息发送者的意图、语篇问世的目的、言语行为的施为作用等。"什么时候"所关心的是交际的时间背景。"怎么样"含有两种意思：1. 交际者的态度，即语篇的基调（语旨）：严肃的还是轻浮的或是冷讽的；2. 交际的手段，即语篇方式（语式）：文字的或是非文字的，口头的或是书面的。"哪里"所关心的是交际的地点（语场）。"谁"指的是交际者的身份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决定了语篇的基调（语旨）。

要了解更多将语篇分析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的尝试，请参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Hatim, Mason 1990），*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Bell 1991），*In Other Words —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Baker 1992），*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Hatim, Mason 1997），*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Hatim 1997），《语篇翻译引论》（李运兴 2001），《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张美芳 2005a），《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黄国文 2006）。　　（张美芳，林作帅）

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先提出。互文性是语篇的一个基本特征，构成语篇分析的重要方面，指语篇生成过程中各种语料相互交叉的、复杂的、异质的特性。叙事学家普林斯（Prince）在《叙事学词典》（1987：46）中将互文性定义为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与之有关的其他文本就是互文（intertext）。要想解读一部作品，首先得对该作品中出现的与以前的其他文学与非文学文本有关的典故、神话等进行发掘与研究，从而获得对该作品的正确释义。互文性分为宏观互文性和微观互文性。宏观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的整个写作手法上与另一个或多个文本具有相似或相关之处，是文本在宏观上与其他文本的联系。例如，艾略特（Eliot）的创作曾受到两个不太重要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拉福格（Laforgue）与柯比埃尔（Corbière）的影响，因此，艾略特的作品必然在整体上与这两位诗人的作品有相似或相关之处。然而，也正是由于艾略特的成就，拉福格与柯比埃尔的诗作现在才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微观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的某些词句或某些段落的表达与另一个或几个文本相关。因此，对一个文本中某些词句的释义要牵涉到另一个或几个文本。由于文化交流，互文性的出现不仅仅局限于同一文化，一个文本，也会与其他文化中的一个或几个文本相关。

相比之下，微观互文性在翻译中对原文的理解更重要，体现得也更具体。严格地讲，译者在理解原文时，要对那些有互文性的词句、段落作深入了解，才能领会其真正的含义。就文学文本来说，互文性较多地源于：1. 希腊罗马神话；2.《圣经》；3. 历史传奇；4. 文学名著；5. 童谣。例如："There was a woman in the shop — an elderly female — quite a Griffin — . . ."这是《大卫 · 科波菲尔》中的一句话。此处出现的 Griffin 乃是神话中的一个怪物。张谷若和董秋斯的译文分别为：

张译："那家铺子里，有一个女伙计——一个快上年纪的女伙计——长得简直是个怪物——……"（直译 Griffin 之意。）

董译："店里有一个女人——年纪稍大的女性——实在是一个葛里芬——"

董在该页底作了如下的注释：（葛里芬）狮身鹰嘴鹰翼的怪物，借喻古板的女人，在英国用以称监视男女交际的陪媪。（用直译加注法点出互文含意。）

互文关系　intertextual connections

指同一专业领域的不同语言语篇之间符号的约定性和程式的标准化。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出于对科技、商业、金融、医学等方面交际和交流的实际需要，各国语言采取大量国际词（主要是概念等同的术语）、相同的格式以及类似的句式。这种语言表达交互复现的特征增加了电脑处理的可能性。由于互文关系的存在，人们已经在使用电脑来翻译这类标准化的语篇。从印欧语之间的翻译实践来看，电脑翻译已收到良好的互文效果。

翻译的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in translation

翻译中的互文性关系远比文学中的复杂得多，因为翻译过程涉及两个客体：已经定型的原文本，亦即第一文本，和正在生成中的译文本，即第二文本，这是第一层互文关系，即原文本和译文本之间的翻译互文关系，亦称"共时性互文关系"（synchronic intertextuality）。第二层互文关系建立在原文本自身文化和语言系统中的互文关系，即原文本赖以生成的文化文本的规范和资源及其操作机制，以及相应的译文本在其文化和语言中潜在的、可以依赖的文化资源和语言资源及其操作机制。这是文化语言系统内部的渊源互文关系，亦称"历时性互文关系"（diachronic intertextuality）。第三层互文关系建立在翻译转换本身，即体现在原文本中的互文因素是否有必要或者是否可能全部转移到译文本中去。这里综合了前面两种互文关系并有交错转换性质，故而可称为"转换性互文关系"

(transitional intertextuality)。由此可以建立翻译批评的互文性研究标准和方法。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1. 原文本中的典故和引语是否要一一译出来？用何方法(例如"直译加注")？2. 原文本的文化文本和语言资源是否可以找到目的语中的对应表达或表现形式？3. 此译文本产生以前有无其他译本或相关译本(即是否是重译或复译)，其中的有关线索是否一定要反映在该译文之中？4. 以上种种考虑和努力的结果，是否一定不会造成一种杂乱无章的文本，即译文本的互文性和统一性的关系如何？5. 由于文化错位和阅读错位的可能存在，那么，翻译中互文性的可理解度和可接受性如何？当然，互文性作为翻译问题尚在研究中，而作为翻译评论问题则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和发展。它在哲学和文艺学领域的讨论，必将引起翻译学界的重视和变化。(王宏印 2006)

连贯　coherence

"连贯是一种心理(mental)现象，它存在于作者和读者的头脑中"(Thompson 1996：147)。"连贯是位于语篇表面之下的概念关系网络(network of conceptual relations)，语言片段是通过语言使用者感知到的概念或意义之间的相互依赖(conceptual or meaning dependencies)而构成语篇的"(Baker 1992：218)。连贯指的是"语篇中各个单位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主要是依赖交际双方的共有知识。每个语篇都必须具有语篇特征(texture)，否则就不能成为语篇。因此，每个语篇都是连贯的。连贯与衔接紧密相关，然而使语篇片段具有语篇特征的不是衔接标记的在场，而是我们的判别能力，借助这种能力我们感到意义的连续性"(Baker 1992：219)。李运兴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译文的连贯要有一种'构建意识'：译者的思路要经历一个从原文连贯结构到译语连贯结构的转换。这种转换体现着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思维定式的对应、对照甚至冲突，需要译者在思维方式上进行调整、变通，并把这种调整在译语语篇的连贯结构中表现出来"(2001：172)。　(林作帅)

连贯性　coherence

德·布格兰德(de Beaugrande)和德莱斯勒(Dressler)语篇性的七项标准之一。参见"语篇性"

话题　topic

指交际双方谈及的内容。一定的话题会使所用词语语义专门化，从而减少因一词多义对译者理解引起困惑。如 shuttle，用于纺织方面的话题时，意为"梭子"；用在航天方面则指"航天飞机"；用在外交方面，意为"穿梭外交"。此外，话题是语域因素之一，如日常生活方面的话题与专业性话题显属不同语域。

语篇性　textuality

语篇作为一种交际活动(communicative occurrence)，应具有七项标准，语篇性七项标准是由德·布格兰德(de Beaugrande)和德莱斯勒(Dressler)在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1981)一书中提出，即衔接性(cohesion)、连贯性(coherence)、意图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语境性(situationality)和互文性(intertexutality)。如果其中任一标准没有达到，语篇就失去了交际性(de Beaugrande, Dressler 1981：3～13)。衔接性关注的是文本表层结构以一定顺序相互连接的方式，而表层结构又根据语法形式及规则互相依靠(de Beaugrande, Dressler 1981：3)。连贯性关注的是语篇的各组成部分是否彼此相关，如在表层结构下涉及的各种概念及其关系。连贯性不仅仅是一种语篇特征，而且是文本使用者认知过程的结果，是信息单位和信息单位之间的一种关系，并使之成为有意义的心理操作过程的结果(de Beaugrande, Dressler 1981：4)。衔接性和连贯性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概念，而意图性和可接受性则是以文本使用者为中心的概念。意图性关注的是文本制造者的态度，即文本制造者试图制造出在形式与意义上衔接连贯的文本来实现其意图(de Beaugrande, Dressler 1981：7)。由于有这个愿望，即使有时候所说的话由于种种原因看来并不连贯，但在实际运用上还是可以被容忍的，被认为是连贯的。可接受性指的是文本接受者的态度，这一系列衔接连贯的文本应该对文本使用者有用或者有些关联(de Beaugrande, Dressler 1981：7)。信息性关注的是文本传递的信息。除了已知的和可预见的内容，文本应当给接受者传达新的或意想不到的信息(de Beaugrande, Dressler 1981：8)；语境性指把文本与某一个情景中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的所有因素的总称(de Beaugrande, Dressler 1981：9)。互文性强调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能自足的，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de Beaugrande, Dressler 1981：10)据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比如先前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在极端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　(谭娟)

衔接　cohesion

衔接是一个语义(semantic)概念，指的是语篇中所存在的语义关系(semantic relations)；当语篇中的某一成分的解释依赖于另一成分时，便产生了衔接(Halliday, Hasan 1976：4)。虽然衔接对语篇连贯(coherence)起重要作用，但衔接不能完全保证语篇连贯(Halliday, Hasan 1985：48)。衔接是通过衔接手段来完成的。自衔接理论诞生以来，学者们对衔接手段的种类不断充实和完善，分类也越来越细。这里仅以韩礼德(Halliday)和哈桑(Hasan)于 1976 年提出

的衔接手段为准。英语的衔接手段包括语法手段和词汇手段；前者包括照应、替代、省略和连接，后者包括词汇重复、同义词、反义词、上下义词和搭配等。根据韩礼德(1985)的语篇分析理论，衔接由语言的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决定。

在翻译研究中，可以以衔接为切入点，对原文和译文中的衔接手段及其出现的频率进行对比分析，以发现源语和目的语在衔接手段的使用上存在的异同及其转换规律，从而将源语语篇的衔接关系异曲同工地复制出来。衔接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例如，贝克(Baker)(1992)从对衔接的观察入手，在语篇层面上对翻译遇到的困难及其对策进行探讨。　(林作帅)

衔接性　cohesion

德·布格兰德(de Beaugrande)和德莱斯勒(Dressler)语篇性的七项标准之一。参见“语篇性”

情景因素　factors of situation

韩礼德(Halliday)等人将情景因素归纳为三个变项：语场(field)、语式(mode)和语旨(tenor)。语场指实际发生的事场，包括语言发生的环境、话题及参与者的整个活动；语式指语言交际的渠道或媒介及修辞方式，包括书面语与口头语、正式体与非正式体等；语旨指参与者之间的角色关系，包括他们的社会地位、谈话态度和想实施的意图等。语场、语式、语旨构成语域，具有反映文化的功能和预测语篇意义和语言特征的功能，并决定着由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组成的意义系统。情景因素中任何因素的改变，都会引起整个意义的改变。参见“语域”

语境性　situationality

当代美国篇章语言学者德·布格兰德(de Beaugrande)(de Beaugrande 1980; de Beaugrande, Dressler 1981)提出的七项语篇性标准之一，指文本要切合其产生的环境。语境性将文本置于实时实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制约着信息性和可接受性在文本中的实现，同时包含了意向性。原文和译文都有各自的语境，翻译行为发起的本身就涉及目的语社会(包括读者)的需要、翻译发起者的目的和动机。译者要将(通常不同于原文的语境的)译文语境考虑在内，对原文文本进行重组、压缩或解释，以适合新的语境和达到翻译的目的。语境性将读者及译文存在的社会文化需要涵盖在内。

意图性　intentionality

当代美国篇章语言学学者德·布格兰德(de Beaugrande)(de Beaugrande 1980; de Beaugrande, Dressler 1981)提出的七项语篇性标准之一，指文本制作者的意愿在文本中的体现，即制作者要将语言成分组织成具有衔接性、连贯性的文本以有助于实现其制作文本的目的。译者想要通过翻译行为达到什么目的，和原作者的意向性相同或相异，都影响到译文语义的连贯性是否需要调整、译文表层语言结构的衔接性需要(运用哪些翻译策略，如对原文的增减、改写等)作多大程度的调整。意向性体现了功能主义视角中翻译行为论和翻译目的论的核心内容。

题材　subject matter

宏观语境因素之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1. 狭义的“题材”指构成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材料，即作品中具体描写的生活事件或社会现象，如“历史题材”“工业题材”之类；2. 广义的“题材”不限于文艺作品，而指不同领域的信息内容，与语体有关。如文学题材的文字的典型性和形象性，科技题材的文字的正式性和术语性，新闻题材文字上刻求鲜明、新颖，儿童题材文字上强调浅显生动，等等。题材分析涉及风格与文体，一定的题材常用一定的词语或语言结构模式，或常用多义词中的某个词义。要求译者熟悉与所译题材相应的语言表达方式及相关背景知识。例如“风波”一词通常可译为 disturbance 或 storm，但翻译鲁迅小说《风波》这一标题时，杨宪益、戴乃迭根据作品题材(故事所及纯属小题大做)，采用英语短语，相应地译为“Storm in a Teacup”。新闻翻译要语意显豁，一目了然。例如：In provincial towns like Shadrinsk, there is a real *vacuum* of other information. (在像沙德林斯克这样一些边远城市，其他消息完全付诸阙如。) vacuum 借自科技词汇，在新闻报道中有新鲜感，这里不宜直译成“真空”，需引申。

14. 词汇　语义

义素　sememe

亦称“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现代语言学中语义的基本单位，从词项或义项中分析出来的最小语义元素。例如，father(父亲)包括[+male(男性)]、[+adult(成年人)]、[+directly-related member of one's family(直系亲属)]等三个义素。与此对照，mother(母亲)的义素中有一项不同，即[-male(非男性)]。参见“义素分析”

义素分析　sememic analysis

亦称“语义成分分析”，语义分析的一种方法。指把词的意义或义项分解成若干语义元素。即通过词义对比，提取其共同和区别的义素(语义成分)，用一组义素来描写某个词或其义项的意义。语义成分往往通过对比来确定，找出词的本质特征，用“+”或“-”这样的符号来表示。现对部分同一类别的词作义素分析如下：

man	+animate	+human	+adult	+male
	(有生命)	(人类)	(成年)	(雄性)
woman	+animate	+human	+adult	-male
	(有生命)	(人类)	(成年)	(非雄性)
cow	+animate	-human	+adult	-male
	(有生命)	(非人类)	(成年)	(非雄性)
ox	+animate	-human	+adult	+male
	(有生命)	(非人类)	(成年)	(雄性)

互补性 complementarity

在语义分析中,常指词项之间的一种反义关系,如"未婚—已婚""儿子—女儿""白天—黑夜"等。这些词具有互补性,选择其中的一个就意味着排除另一个。具有互补性的反义词不同于对立的反义词,如"大—小""新—旧""高兴—悲伤"等。前者在词项之间不存在渐增和渐减的关系,后者在词项之间可能存在渐增和渐减的关系,如"较大""较小""更大""更小"等。这些反义词也不同于相关的反义词,如"父亲—母亲""丈夫—妻子""买主—卖主",前者在词项之间互相排斥,非此即彼;后者在词项之间互相关联,有此就有彼。有些语言学家主张用"互补反义"来取代"互补性"这一术语。

术语 terminology

指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用来正确标记生产技术、科学、艺术、社会生活等各个专门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性、关系和过程。每一术语有严格规定的意义。它以明确定义的科学概念为基础,具有单一的理性意义和感性色彩。它是描述和传播科学概念、定义和规律的基本要素。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术语是通过翻译提出的。翻译术语要求符合科学性、系统性、专业性、单义性、国际性等原则,主要方法有四:1. 直译:针对原文意义,找出具有对等意义的汉语词语,如:horse power 译为"马力",computer 译为"计算机";2. 音译:按照原文发音译出,例如 clone 译为"克隆",OPEC 译为"欧佩克";3. 半音半意译:音译和意译相结合,如:logic 译为"逻辑",sonar 译为"声呐";4. 音译后加说明词:说明词表示事物的类别、属性,作为对音译的补充,如:neon 译为"霓虹灯",jeep 译为"吉普车"。除了以上四种主要译法外,还有多种译法。如形译(像译):T-square 译为"丁字尺",I-steel 译为"工字钢",V-belt 译为"三角皮带"。按外文字母译:X-ray 译为"X 射线",α-particle 译为"α 粒子",A-star 译为"A 形星"。造新字:entropy 译为"熵"、oxygen 译为"氧",hydroxy 译为"羟[基]"。采用简称:Celsius thermometer 译为"摄氏温度计",Vickers hardness 译为"维氏硬度",Hertzsprung-Russell diagram 译为"赫罗图"。此外,从翻译史看,还有采用日本语中的汉字构成术语的,如"客观""物质""元素""固体""细胞"等。

术语化过程 nomenclatural process

指普通语转化为术语的过程,是扩展科技词汇的重要手段之一。普通语是术语化过程中最常见、最重要的起始点。术语化的基本过程是:普通语某词项所有义素中的一两个义素与某个专业概念相结合,汇入某个特定的专业范畴,成为术语。例如,drum 在普通语中作"鼓"讲,是一种乐器,圆柱状,而在计算机专业中作"磁鼓"讲,用来储存数据,成为术语。术语化过程是一个词义内涵的转变过程,通过结合词义的作用,将大部分普通义素转变为专业义素,使该词具备了相应的专业特征。

drum 的普通语词项的义素:
- cylindrical form 结合义素
- with material stretched tightly over both sides (普通义素)
- to produce a sound (普通义素)
- as musical instrument (普通义素)

drum 的计算机专业术语的义素:
- cylindrical form 结合义素
- with magnetic material around (专业义素)
- to store data on for later retrieval (专业义素)
- as peripheral storage (专业义素)

应该指出,一个普通语词项可以多次加入术语化过程。这种多重性术语化往往涉及互不相干的专业领域,如 work 在物理学上为"功",在冶金学或机械学中为"加工"。此外,在同一专业领域内也完全可能出现这种多重性的术语化现象。(梁镛 1986)

科技双术语 technical biterminology

指对术语(尤其是新术语)采用双重的做法:一方面用国际通用语——英语——作为科技教育的语言,用英语书写术语(词形国际化)或音译术语(读音国际化);另一方面又兼用本国的术语,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术语民族化"。这样做,可使大众科技工作者比较容易吸收科技知识;另一方面也可创造"术语国际化"的条件,使专业科技研究者迎头赶上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韩国都属于汉字文化圈,他们的经济起飞部分地得力于科技双术语的政策。

术语库 terminological bank

亦称"术语数据库",是记录、储存、分类、检索术语的现代化工具。这是一个电子计算机系统,全部程序由一个操作系统管理。它根据数据处理的需要,依次调用各分支程序(如读文、排序、语言翻译、文件管理、输出等)。每个术语库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完成三种功能:数据的输入功能、储存功能和输出功能。术语库可用于不同目的,如用于翻译、编辑、专业语言教学、术语标准化工作、术语推广等。用户包括翻译工作者、词典编纂家、语言教师、编辑人员等。根据建库目的的不同,术语库提供不同的资料,如:纯术语的对应词,即根据上下文提供两种不同语言的对应词;从形态、句法、正字法的不同语法角度提供术语;以及提供文献专用语、普通语言词汇;甚至提供相关

术语的图表、图像等。术语的确立与使用以及术语库的建立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欧美国家之间,有的术语库已越过国界,联机使用。早在1979年,维也纳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术语库会议,提出了由国际术语网负责进行术语库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方案。

术语规范化　unification of terminology

术语规范化的原则是科学性、习惯性、系统性和符合汉语特点。1. 科学性:指译名要准确而严谨,如noise,曾译为"噪音",古书中声与音有别,成调之声为音,音是指有规律的声,现译为"噪声";2. 习惯性:含两义,一指约定俗成,pressure一直译为"压力",后来物理界认为它是单位面积上的压力,故改为"压强",但因前者习用已久,现两词并用,把"压力"列在前面。另指尽量采用已有汉字,且不用古字和生僻字,不造新字;3. 系统性:指概念相关的译名系统化、条理化,如cardiogram译作"心电图",cardiograph译作"心电图机",cardiography译作"心电图术"等;4. 符合汉语特点:指尽量意译而不是音译(音义结合则更好),如radar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是个缩写词,译为"雷达",有音义结合的优点,laser (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原有"激射光辐射放大""光受激辐射放大""受激光辐射放大""光量子放大""受激发射光""莱塞"等十几种译名,后钱学森提出用"激光"一词,是光,但又非一般的光,照顾到汉语词汇顾名思义的特点。

术语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rminology

"术语国际化"就是使术语随同世界通用的说法,不选用本国独用的名词。"术语国际化"有两种:一种是"词形国际化",另一种是"读音国际化"。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有120来个用拉丁字母作为正式文字。他们的科技术语相互借用,都用拉丁字母书写,基本相同,只是词尾不同。所以彼此不必学习,一看就明白。这是"词形国际化",即"国际词"。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之后不久,发现科技术语民族化速度太慢,难于跟上国际步伐,不利于科技的交流和发展。于是改变术语政策,走"术语国际化"的新道路。办法是:科技术语不再意译,不造新汉字,完全用"片假名"音译,而且全词音译,不再缩短。例如:streptomycin写成ストレプトマイシン(中文意译"链霉素")。我国在这方面的现有做法是:1. 音译,如clone直接音译为"克隆";2. 借用西文,如DNA(脱氧核糖核酸)、CAD(计算机辅助设计)等。

术语学　terminology

指以概念的名称为对象,研究概念及其表现形式的学科。它从概念和术语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出发,研究术语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术语学诞生于专业语言所必须要求的精确和清晰之中。术语学起初同词汇学,特别是同词典学混为一谈,后来通过经验方法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和方法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隆多 1985)术语学的本质是跨学科的,是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信息学、分类学,以及其他多种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20世纪产生了三大学派:即以术语学通论为基础的维也纳学派;从功能语言衍变而来的布拉格学派;和以术语标准化为研究重点的前苏联学派。二次大战后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建协调全球术语学活动的国际组织。1953年,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协会成立时,便通过了旨在促进术语学国际协作的决议。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奥地利政府的资助下,在维也纳建立了国际术语学信息中心。

术语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of terminology

指对术语进行统一和规范,即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的概念通过制定、颁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术语标准化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为了规范科学术语,我国于1985年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96年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到2005年,该委员会已审定公布各学科规范名词64种,计20余万条。汉译术语标准化有单义性、理据性、系统性、简明性、能产性等原则。术语的标准化还有利于国际文化、科技和贸易往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于1946年成立,1951年成立了其第37技术委员会,名称为"术语:原则与协调"。

关键词　key word

指直接取自文献原文、对表征主题内容起关键作用的词。关键词以名词为主体,大多是文献中负载信息较大的主语名词。关键词以显著的字符排在摘要的左下方,另起一行,清晰醒目,为二次文献检索提供方便。

由于标题反映论文的中心内容,关键词首先从主标题中提取,然后从副标题、小标题中提取,以及从正文中被反复论及的、充当主语的名词中提取。论文一般选用3～5个关键词。一篇规范的论文一般有四个结构要素——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应该按照这四个要素来筛选关键词,用一个关键词代替"目的",一个关键词代替"方法",一个关键词代替"结果",一个关键词代替"结论",直到四个要素全用原文中的关键词替换完为止。替换的关键词,一般是名词,主要反映事物的性质、现象、状态、趋向、工艺过程和方法。文章作者罗列的几个关键词,就会在索引期刊的几个条目中出现,以便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查找该文的出处和有关的文章。

词义　word meaning

词的内容方面,指某一客观事物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这种反映由于经常同一定的语音形式相联系

而成为语言事实。词的"意义是复杂的。一个词不仅有直接的、表面的、字典上的意义,还有内涵的、情感的、牵涉许多联想的意义。……一词一句的意义有时不是从本身看得清楚的,而要通过整段整篇——亦即通过这个词或这句话在不同情境下的多次出现——才能确定。"(王佐良 1986: 100)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施泰因(Wittgenstein)说:"The meaning of a word is its use in the language."而现代英国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弗思(Firth)又说:"Each word when used in a new context is a new word."两位都强调上下文对确定词义的重要性。再说,"词义与用词者的意图不可分"(王佐良 1986: 99)。换言之,不能只看语言形式。试举几例: Have a drink./Would you mind opening the window? /I wondered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the luggage. 第一句不是命令,第二句不是问题,第三句不是过去时态(说 wondered 只是比 wonder 更客气)——超过任何语法形式的重要性的是说话者的含义,即他的意图。所以语言学家格赖斯(Grice)说:"Meaning means intention."(转引自王佐良 1986: 98～99)

内涵意义　connotative meaning; connotation

参见"含蓄意义"

文化意义　cultural meaning

指语言载体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素质。对于异文化,翻译中常用两种方法表述:加注和注释。例如,"四旧"一词通常译成"four olds",一般要加注。例如:他一开说,把我吓了一跳,原来开宗明义是讲男女的事儿,我说这是四旧。Once he started explaining I had quite a shock. It started off with an opening statement that it was all about sex. I said that it was one of the "four olds". 加注为:"Old ideas, old culture, old customs and old habits" — all targe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在文学作品中,加注太多会影响风格和节奏,可以作解释性翻译,字数及表面词义常有增减。比如,下象棋时常说"马走日,象走田",这是象棋规则里关于"马"和"象"的两个基本步法。"我只会马走日,象走田。"詹纳尔(Jenner)将其译作"I only know the most basic moves."参见"解释性翻译""加注"

反映意义　reflected meaning

是通过同一个词的一个义项和另一个义项的联系而体现出来的意义。如英语中的 comforter 既有"圣灵"的意思,又有"安慰者"的意思。当人们在教堂听到 the Comforter(圣灵)这词时,往往会联想到日常的非宗教的"安慰者"这意思,从而觉得这字眼听起来既温暖又慰藉。相反,当人们听到同样是表示"圣灵"意义的 Holy Ghost 时,却会联想到 ghost(鬼)的意义,于是产生一种恐惧感。(利奇 1987: 23)

风格意义　stylistic meaning

包括文体特征及作家个人的用语及行文特征表现出来的种种意义。例如,英语中 steed, horse, nag, gee 都表示"马",但 steed 是诗人用的,horse 是普通词,nag 是粗俗语,而 gee 则是婴儿用语。

功能意义　functional meaning

参见"语境意义"

本义　primitive meaning

1. 从历时的角度,指词的原始意义。与转义相对。如 Pinchbeck,源出英国宝石商 Christopher Pinchbeck 发明的一种假冒金质饰物,后转义为"冒牌货""便宜货";又如 black hole 源自天文学上的"黑洞",在普通语中转义为"没有生气"(colourless); 2. 从共时的角度,指词的主要意义,与次要意义相对,如 machine,主要意义为"机器""机床"等,次要意义为"机动车""飞机"等。主要意义一般是常用意义,次要意义是非常用意义。

主题意义　thematic meaning

利奇(Leech)对意义的七种分类之一(参见"理性意义""联想意义")。说话者或写文章的人借助组织信息的方式(语序、强调手段、信息焦点的安排)来传递的一种意义。如下面两个句子字面意义几乎相同: ① Mrs. Bessie Smith donated the first prize. ② The first prize was donated by Mrs. Bessie Smith. 但是,这两个句子具有不同的交际意义。句①似乎要回答 What did Mrs. Bessie Smith donate? (贝西·史密斯夫人捐赠了什么?)而句②似乎要回答 Who was the first prize donated by? (一等奖由谁捐赠?)与句②比较,句①表明说话者知道 Mrs. Bessie Smith 是谁。(可能上文已提起过。)两个句子都精确地描述同一情景。主题意义主要涉及不同语法项目的选择。(利奇 1987: 27～29)

关联意义　relative meaning

包括评价意义、色彩意义和文体意义。词的评价意义表示人对客观事物的评价和态度。诸如对客观事物的赞许、肯定、厌恶、否定或对人的尊敬、崇拜、蔑视等,如 man 男人(中性)——mister 先生(尊敬)、lawyer 律师(中性)——pettifogger 讼棍(憎恶)。词的色彩意义表示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或联想特征,如 red 红色(无形象色彩)——rosy 玫瑰色(有形象色彩)、mother 母亲(中性)——mama 妈妈(表示爱昵)。词的文体意义是指某个词只能用在某种特定的交际场合:用在书面语或口头语、现代语或古语、日常语或文学语,等等;例如 often(日常语)——oft(古旧语)、salt(日常语)——sodium chloride(化学术语)。

字面意义　literal meaning

文字所表达的表面意义,在大部分情况下,与指

称意义(或概念意义)重合。但"却是从两个不同角度去看的两个不同概念。指称意义是词语同它之外的某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字面意义则是单个词语最先在语言使用者脑中唤起的概念或形象。当译者从指称意义的角度考虑问题时,是把源语信息中具有相对独立的交际能力的一个词语同它所指称的实体联系起来,然后再在目的语中找出同样一个实体的对等说法。而从字面意义的角度考虑问题时,则是把源语中单个词的最常见的意义换用目的语中具有这种意义的符号表示,完全不顾发讯人的交际用意和语言符号的外在所指。例如:Indian meal 和 Indian summer 从指称意义的角度去译,和从字面意义的角度去译,译法是不同的。指称意义分别是'玉米粥'和'小阳春',而字面意义分别是'印第安饭'和'印第安夏天';类似的例子有:American Beauty(月月红)、German wool(细毛线)等"。(柯平 1993: 23)参见"指称意义""概念意义"

形式意义 formal meaning

指语言文字形式或章句安排及篇章结构在形式上的特征。如英语和汉语的修辞格、诗歌,汉语的对联、骈句等语言样式具有鲜明的形式意义。形式意义还包括语言结构形式转换时产生的暗含意义(包括形式不同所产生的褒贬、轻重、分寸等差异)。例如,主动式与被动式,分词、不定式与动名词之间的语义微差。

形象意义 figurative meaning

词的附加色彩之一。词义含有的关于被反映对象的形象感。如"金钱豹",使人仿佛看到所指的猛兽有黄色钱状的花纹。只有反映具体事物形貌状态的词才可能有形象意义。(陈海洋 1992: 290)

贬义 derogatory sense

与"褒义"相对。指带有否定、贬斥、憎恶的情感色彩的词义。具有贬义色彩的词称贬义词,如汉语的"卑鄙""坏""欺骗",英语对应词 despicable, bad, trickery。汉英语中大多数对应词的褒贬色彩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以及词的组合的不同,某些对应词有不同的褒贬色彩,例如汉语的"自由主义"有贬义,而其英语对应词 liberalism 为中性词;汉语的"实用主义"系贬义词,而其英语对应词 pragmatism 具褒义。对此,翻译时必须灵活处理。

褒义 commendatory sense

与"贬义"相对,指带有肯定、颂扬、美好的情感色彩的词义。具有褒义色彩的词称褒义词,如汉语的"光荣""好""忠诚",英语对应词 honorable, good, faithful。英汉语词语的褒贬色彩并不都是一致的。参见"贬义"

社会意义 social meaning

是语言所表示的社会环境的意义。例如,说话人所用的词语或发音具有方言性质,从中可知说话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语言的其他特征表明讲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在用法上分成不同的等级,例如,最高的等级是正式英语,较低的等级是口语和熟稔用法,最后是俚语。(利奇 1987: 19)

言语意义 speech meaning

与"语言意义"相对,指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人们在使用语言交流思想时双方所理解的特定意义和临时意义,它是上下文和语境中体现出来的,总是和特定的事物内容相联系。这种特定意义和临时意义是在语言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意义,其游移性和扩散性在具体的上下文中是十分明显的,它在上下文中的具体体现往往很难纳入词典中的某个义项。

在人类交际活动中,每个人的言语,在语音、语法、用词、造句及修辞手段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人因素和个人特点。正是由于言语的个人因素和个人特点,翻译活动才变得复杂和艰难。翻译的对象不可能是语言本身,而是人们运用语言的产物和结果,即言语。语言相对的封闭性使得某种语言中一整套公认的词汇的翻译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固定下来,成为社会共同理解的语言翻译;而言语的开放性则使得言语翻译千变万化,无法在有限的范围内固定下来。言语的整体既无法认识也无法翻译。正像言语不是对语言的机械使用一样,言语翻译也不是语言翻译的机械组合,也即翻译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搬词典释义。

含蓄意义 connotative meaning; connotation

亦称"内涵意义",是一种通过语言所指内容而产生的联想意义。也就是说,源出者(originator)并不直接把要表达的意思说出来,而是借助交际双方所共有的语言和文化背景,通过"借物寓意""借此说彼"等一系列以人的联想为基础的修辞手段,如隐喻、借代、委婉、反语、暗引、暗讽等等,将内在的思想和动机含蓄地表达出来。与概念意义所不同的是,含蓄意义不是语言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仅仅是语言的"附带"(incidental)因素。如 woman 一词,除了[+human, −male, +adult]这三个构成其概念意义的基本语义特征之外,在不同的时代、社会乃至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经历的人眼里,还有许多"附加的、非标准的"(additional, noncriterial)含蓄意义,如爱聚群、有母性本能、话多、善烹调、脆弱、怯懦、多愁善感、勤劳,等等。

由于含蓄意义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这就给翻译中的理解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稍有疏忽,就会望文生义,使原文的信息和美学功能丧失殆尽;稍有不慎,又会得"意"忘形,使原本可以体现的美学功能荡然无存。为了准确地翻译原文的含蓄意义,译者必须要对原文的语言及其社会文化背景有较全面的了解,并且还要具有较高的语境和审美意识及形象思维能力。

歧义 ambiguity

歧义是语言的普遍现象,系由语言的表达法和意

义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对一而产生。歧义分两类。一是语法歧义(grammatical ambiguity),系一个表层结构对应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深层结构。例如：Freddie hit the man *with a hammer*. 译文1：弗雷迪用锤子打人。(with a hammer 作状语)译文2：弗雷迪殴打手拿锤子的人。(with a hammer 作定语)二是词汇歧义(lexical ambiguity),其中有两种情况：1. 多义词,如hand可表示"手""手艺""指针"等;2.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可能读音相同,但意义各异。如put down one's pen(搁笔)和live by one's pen(卖文为生)中的pen,前者指"笔",后者指"笔杆子"(喻写作)。一个词或句法结构究竟表示何种意义通常由语境决定。(方梦之 1994：114)

明示义　explicature

与"暗含义"相对,由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1986)在关联理论中提出,指"话语U(utterance)所传递的假设是明说的,且仅当它是从U所编码的逻辑式中推理出来的结果"(1986：182)。明说指的是说话人的话语与他要明示的意图之间有系统的联系。这同格赖斯(Grice)(1975)所区分的"明说"(saying)与"含意"(implicature)不完全一样。根据格赖斯,明说就是话语直截了当地表达出一定的命题。为了弄清楚话语明说了什么,即明确地表达了何种命题,听话人必须对话语进行解码,以获取语义;而斯珀伯和威尔逊的明说与隐含义则重视推导过程。他们认为,从明说得出隐含意义,必须经过两个步骤：先得出隐含前提(implicated premise),然后再推导出隐含结论(implicated conclusion)。"明说"不但可以表示话语的命题,而且还能够指出言语行为类型和命题态度的信息。要识别明说了什么,关联性十分重要。有了关联性,人们才可以付出最经济的努力,获得最佳的语境效果。至于识别所表达的命题,他们认为,语句通常并不表达完整的命题,因语义表征往往是一些不完整的逻辑式,这就是说,它充其量也仅是些零碎的思想表征。所以,在确定前指关系、消除歧义等之后,语义表征才作为一种"明说"进入完整的逻辑式。换句话说,"明说"是句子的语义内容所编码成的逻辑形式的发展,人们根据这种逻辑形式确定话语的命题内容。在逻辑式中加进任何的"明说"都有助于演绎,或者说都能增加语境效果。明说的理解过程不仅包括确定指称、消除歧义,还应包括充实这一重要环节。

就翻译活动而言,源语文本的意义也包括"明说信息"和"隐含信息"。若字面意思和原作者的意图不一致,或一定要舍此留彼,又该如何处理?关联理论的解释是,每个个体的主体认知结构由逻辑、词汇和百科知识组成,从而形成了主体的认知环境。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和他们的经历,以及他们的认知能力都有所不同,特别是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他们的认知环境就会存在差异,对事物的认知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在翻译理解的过程中译者要结合交际情景和原文的文化背景、推理习惯来理解原文的意义,在重构过程中要注意结合目的语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读者的推理习惯来重构原作者的意图。即尽量让译文在译文读者身上产生出原文读者对原文所产生的那种反应。若译者要搬进译语文化,就不能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如果对该明说的不明说,便可能导致对译文信息的曲解、误解或根本不理解。译者须弄清楚,哪些话在原文背景里不加解释,而换一种语言背景必须增加解释读者才能理解(俞维玲 2003)。例如：

Your invention is fantastic; you should *send it to Munich*. 你的发明真奇妙,你应该把它送到(慕尼黑的)(德国)专利局。

就上述例子而言,Munich 的明示义只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名,但在语句中暗含的交际义则大于明示义。若译者不将暗含义(文化背景知识)明示出来,译文读者则很难明白为什么要将发明送到慕尼黑,而原文的暗含义是指送到设立在慕尼黑的德国国家专利局。明示义的增译让不了解德国国家机构的中国读者一目了然。参见"暗含义"　　　　(曾利沙)

明指意义　denotative meaning; denotation

参见"概念意义"

所指　signified

与"能指"相对,索绪尔(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使用的术语,是语言符号的实际意义。所指相对稳定,维护了语言符号之间的区别。比如说,"狗"这个符号,其所指就是一条狗,而不是别的什么动物或东西。所指是理解的基础,但在翻译这种精神活动中,译者经受两种文化的碰撞,往往会捕捉到远远超出所指的实际意义的能指。参见"能指"

能指　signifier

与"所指"相对,索绪尔(Saussure)在《普遍语言学教程》里使用的术语,是语言符号可能指示的一切意义,即语言符号的能力。能指包含了语言的功能性、多义性。比如说,"狗"这个符号,其所指就是一条狗,而不是别的动物;但能指就不这样单纯了,它可以指"公狗""母狗",鲁迅痛打的"落水狗",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狗"。能指的概念对于译者透过字面看本质以及传情达意是有借鉴作用的。能指在上下文中甚至可以改变所指,狗不如猪,但在"猪狗不如"这种搭配中,"狗""猪"同类而不分上下了。许渊冲把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译成 Sad autumn / and autumn rain / had saddened men. 译者利用 sad 及其变体 sadden 与 autumn 的搭配,刻画出凄风苦雨和郁闷焦苦的意象。全句水乳交融,谁还分得清是"秋风秋雨秋煞人"还是"愁风愁雨愁煞人"呢。"秋"与"愁"在联结中相互渗透,产生了比这两个字单纯的所指意义更深、更广的能指意义。参见"所指"

指称意义　reference

指语言符号和它所描述或叙述的主观世界或客观

世界的实体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如 apple 与它所代表的实物“苹果”之间的关系便是指称关系。从本质上讲，指称意义是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的基本特征的抽象概括，其核心内容是区别性特征。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它是语言符号的基本内容及其传递的主要信息，所以也被称为“概念意义”“认知意义”或“明指意义”。

语言意义　language meaning

与“言语意义”相对，指语言体系中所固有的意义，抽象的、概括的语言意义不受上下文的语境的影响，它舍弃了由于语言环境的不同和交际内容的变化所产生的临时意义。语言意义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脱离上下文可以轻易地体会到它，并将它同客观外界的事物对应起来。语言意义的结构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在不同的词典中具有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释义。

语法意义　grammatical meaning

指语法形式体现出来的意义，如英语名词 boy 和 girl 各有四种语法形式：boy, boys, boy's, boys'; girl, girls, girl's, girls'，代表着四种不同的意义。又如，句子 John hit Bill 与 Bill hit John，两者词序不同，意义正好相反；词序也是一种语法形式。另一方面，也有语法形式不一，而意义相同的。例如：1. she sings beautifully; 2. the beauty of her song; 3. her singing is beautiful; 4. her beautiful singing。以上各例中，物体成分都是 she 或 her；活动成分是 sings 或 singing；抽象成分是 beautifully, beauty 或 beautiful；关系成分是 of 和 her。其中，she sings beautifully 是基本核心句，其他三个表达法仅是它的转换形式，只不过各种意思的着重点不同。这对翻译尤其重要。语言在文体上的差异也就是在这种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

语境意义　contextual meaning

具有两方面的含义：1. 指词语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的意义——特定的语言环境给词的概念意义以某种调节，从而赋予它以某种联立或关联含义；2. 语言具有特定的社会环境，语境意义还包括由交际目的、交际场合及接受者因素所决定的语义信息所具有的感情色彩、情态、暗含义，等等，统称为“情景意义”或“功能意义”。

理性意义　conceptual meaning

利奇（Leech）对意义的七种分类之一。参见“概念意义”

情景意义　contextual meaning

参见“语境意义”

联想意义　associative meaning

语言符号唤起的联想以及它所暗示的概念和印象。利奇（Leech）用“联想意义”来概括“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参见“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

搭配意义　collocative meaning

是通过与周围的词的联系体现出来的意义。在英语中，pretty 和 handsome 都是“美观漂亮”的意思，但出现在两者后边的词不同，因而两者可以被区别开来。例如：

	pretty		handsome
pretty	girl（女孩）	handsome	boy（男孩）
	boy（男孩）		man（男子）
	woman（女人）		car（汽车）
	flower（花）		vessel（船）
	garden（花园）		overcoat（大衣）
	colour（颜色）		airliner（客机）
	village（村庄）		typewriter（打字机）
	…		…

（利奇 1987：24）

情感意义　affective meaning

是指语言所反映的说话人的个人感情，包括他对听者和他所谈事物的态度。例如，You're a vicious tyrant.（你是凶恶的暴君。）中的 vicious 和 tyrant 都含贬义，表示说话人的憎恶的感情。情感意义基本上是依附性的，要依赖意义的其他范畴（即理性范畴、内涵范畴或语体范畴）才能确定。（利奇 1987：22）

概念意义　conceptual meaning

亦称“理性意义”“逻辑意义”，被看做是词项的“中心”意义或“核心”意义。它直接、明确地表示所指对象。词的概念意义也就是词典对词下的定义。人们常把它等同于指称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明指意义、字面意义或外延。在翻译研究中，概念意义亦指词组、句、语段的语义信息或语义内容。如句子的概念意义则指由主位部分及述位部分组成的全句的全部概念的语义内容。

暗含义　implicature

与“明示义”相对，由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1986）提出，指语境暗含（contextual implication），即说话人的话语与意图之间没有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暗含”是对说话人意义的间接表达，它往往是在说话人明示的话语加上语境知识的基础上经过推理而得出。斯珀伯和威尔逊认为交际就是一种示意-推理的过程。交际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不是每句话都是那么直接地表示出来。虽然话语的语言形式与听话人根据语境得出的命题可能没有非常明显的联系，但说话人还是愿意用这种婉转而非直接的方式表达他的交际意图，因为他相信，听话人用更多的付出来获得意思是值得的。而“暗含意义”常常超乎词的字面意义之外，所以它是字面意义的扩展、丰富及延伸。因此在获得“暗含意义”的过程中，听话人除了解读词汇的字面意义之外，他还不得不建

立比得到明示意义时更多的假设,结合语境信息对各种假设进行推理,筛选出最佳关联的那一个。听话人通过这个过程根据语境获得词汇的“暗含意义”。确定指称意义、排除歧义以及对显性内容的扩充这三个过程都是获取暗含信息时使用的相同过程。

“暗含信息”是由语境假设和某一命题内容共同推理产生,是交际者希望听者达成的解释。如果两个语句的语境假设不同,就会传递不同的“隐含信息”。在翻译活动中,根据语境辨认源语中的暗含用意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字面表达出来的用意往往不是源语作者真正的用意。例如:

When to these recollections was added the ***development*** of Wickham's character, it may be easily believed that the happy spirits which had seldom been depressed before, were now so much affected as to make it almost impossible for her to appear tolerably cheerful. (Jane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 每逢回想起这些事情,难免不连带想到韦翰品格的变质,于是,以她这样一个心情愉快而难得消沉沮丧的人,心理也受到莫大的刺激,连强颜欢笑也几乎办不到了,这是可想而知的。(王科一译《傲慢与偏见》)

从当下语句看,译者将 the *development* of Wickham's character 引申为“韦翰品格的变质”似乎可行。但综观全书,读者可以发现:作为一个反面角色,韦翰并非一开始是“好”的,而后来“变质”了。这个人物从小就是个品质恶劣的坏孩子,专门算计达西,以博取老达西的错爱,老达西死后,他阴谋拐骗达西的妹妹未遂,成年后又带着女主角的妹妹私奔。因此,译者将其译为“品格的变质”,实属曲解了作者的原意。实际上,从语篇语境可推知此处所说的 the development of Wickham's character 并非是说韦翰的品格本身有什么“发展”或“变质”,而是说女主角对他品格的认识有个“发展”过程,即从一开始的被他蒙骗,到后来看清他的真面目,是女主角渐渐认清了韦翰的真面目(俞维玲 2003)。这说明,在翻译活动中,暗含义或暗含信息的类型和范围很广,而且很复杂,要准确地翻译原文,就要找到原文与语境因素的各种关联性,对可能有关联的各种暗含信息,结合人物关系进行合理的推导,然后才能正确地理解原文,传达原文。参见“明示义” (曾利沙)

词汇 vocabulary

指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词和熟语的总和,如汉语词汇、英语词汇等。有时也指语言词汇中某一特定的部分,如基本词汇、方言词汇、科技词汇、术语词汇等。词汇反映语言发展的状态,词汇越丰富,语言就越发达。词汇的组成十分复杂纷繁。按性质和功能,可分出基本词和一般词;按使用频率,可分出常用词和非常用词;按语体特点,可分出通用词和口语词、书卷语词;按情感色彩,可分出中性词和表情词;按使用范围,可分出全民词和方言词(包括地区方言词和社会方言词);按来源,可分出本族语固有的词和外来词;按发展情况,可分出新词和旧词,等等。词汇是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它的发展速度最快,几乎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

词汇学 lexicology

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语言中的词汇,即词和熟语的总和,任务是阐明作为语言基本单位的词的性质,确定词义及其与概念的联系和区别,区分词义的各种类型,根据不同的特征分析词汇组成等。语言中的词不是孤立的,它们构成复杂纷繁的系统。词汇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揭示词汇的系统性和确定词在词汇中的系统关系。在有些词汇学著作中也包括了构词的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描写和分析词的结构和构词规则的构词学已经独立出来,与词法学和句法学一起成为语法学的分支之一。过去对语言意义的研究限于词的意义,因此词义学也列为词汇学的组成部分。现代语义学要研究词的意义的共同语义特征——义素,也要研究大于词的单位——短语和句子的语义。与词汇学密切相关的还有词源学和辞书学,前者一般被看做历史词汇学的组成部分,后者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词汇学可分作普通词汇学和具体词汇学,前者研究词汇的一般规律,后者研究某种具体语言的词汇(如汉语词汇学、英语词汇学等)。研究词汇共时性状态的叫描写词汇学,研究词汇历史性发展的叫历史词汇学。

反义词 antonym

词与词之间存在着相反或对立的语义关系,这种关系称反义关系。词义相反或对立的词称反义词。现代语言学家以语义对比为依据来划分反义词,一般分三种:1. 相对性反义词(contraries)或级别性反义词(gradable antonyms),指的是语义相对,形成两极,两极中间可插入表示不同性质的词语,体现出对立的层次性或级别性。如 wide — narrow, old — young, big — small, beautiful — ugly 等,如在 beautiful — ugly 之间可加进 pretty, good-looking, plain 等词;2. 互补性反义词(complementaries),这类反义词是指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如 dead — alive, boy — girl, brother — sister 等,其间不容插进表示层次性或级别性对立的词;3. 换位性反义词(conversives),是指两个词在语义上既表示对立关系,又表示相互依存关系,如 buy — sell, give — receive, lend — borrow 等。

外来词 foreign word

亦称“外来语”“借词”,指一种语言从别种语言里引进的语词。汉语外来词的来源有两方面:一、外国语,如坦克(车)(借自英语 tank)、沙龙(借自法语 salon)、康拜因(借自俄语 комбайн)、菩萨(借自梵语 bodhi-sattva);二、兄弟民族语,如戈壁(借自蒙古语 gobi)、冬不拉(借自哈萨克语 dombra)。又如,英语的 fiancé(未婚夫)借自法语,al fresco(在户外)借自意大利语,moccasin(鹿皮靴)

借自美洲印第安语，tea(茶)借自汉语。

对应词　analogue

亦称"对等词"，指某一语言中的一个词与另一语言中的一个词是对等的，尽管词形和词义不完全一致。如法语的 maison 和英语的 house 为对应词。

对等词　equivalent

亦称"对应词"。两种语言对译时，一种语言的语词跟另一种语言的语词意义相近，功能相似，称为对等词。在对等词中，有些词有同源关系，如俄语的 сестра 和英语的 sister；有的是转写，如俄语的 спутник 和英语的 sputnik；在不同语系中更多的是翻译，如 спутник 或 sputnik 汉译为"人造地球卫星"。

解释性对等词　explanatory equivalent

亦称为"描写性对等词"，是双语词典学通常划分的词目译文对等词的两种类型之一。双语词典编纂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译语中寻找尽可能准确的译词，找不到时往往采取详解、加注、说明等办法。介于对译方式和详解方式之间的对等词，一般就称为解释性对等词；它通常不是一个完全稳定的词汇单位，虽然有时也可以在某些具体句子中使用，但却并非在该句情境中能够使用的最小词汇单位。解释性对等词与解释之间的差别在于，后者近似于一个定义或描述，而前者则近似于一个翻译单位，因此可能为语言所接受并加以使用，最终定型(词汇化)而得以标准化。与翻译性对等词相比，解释性对等词不属于纯语言层次，而属于概念层次，因此能够对源语词目的词义作出更多的说明。一般认为，旨在帮助使用者进行外语翻译实践的双语词典不宜采用解释性对等词；如果确实因为没有翻译性对等词而使用解释性对等词，则应该提供注解以提醒使用者。而且，只有在双语词典使用者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目的语知识时，采用解释性对等词才能够对他们产生积极的学习效果。参见"翻译性对等词"（陈伟）

翻译性对等词　translational equivalent

亦称为"插入式对等词"，是双语词典学通常划分的词目译文对等词的两种类型之一。翻译性对等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词汇单位，能够随时插入到目的语句子中使用。与解释性对等词相比，翻译性对等词所传达的信息量少，但其主要优点在于它是纯语言的，能够提供使用者直接使用的词汇单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翻译性对等词比解释性对等词对翻译实践有着更大的作用。也正是通过翻译性对等词，人们才能够对两种不同的语言加以比较。所以，无论是在翻译研究还是在词典研究领域，翻译性对等词普遍受到人们的青睐与推崇。然而，由于不同语言间的差异性与不对称性，与源语词目绝对对应的目的语对等词为数很少，所谓的翻译性对等词其实绝大多数只是部分对等。正因为如此，双语词典编纂者要么必须为翻译性对等词提供必要的注释，而且这些注释通常要比解释性对等词所需要的注释多得多，否则不能够完全对源语词目意义进行描写；要么大量罗列同义词，以增大信息量，消除与源语词目意义间的差距。但是，词典学界普遍认为，双语词典过分罗列对等词的倾向不仅对使用者没有太大用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参见"解释性对等词"（陈伟）

同义词　synonym

词与词因表达同一逻辑概念而联系在一起，这些词称为同义词。同义词意义相同，但词义色彩、词源、音位以及用法有所不同。例如，英语的 rich 和 wealthy 在以下句子中是同义词：1. He was a rich man. 2. He was a wealthy man. 但用 wealthy 比用 rich 更为庄重。由于词的多义性和交义性，两个词只是在某种语境中才有相同的意义，构成同义词；而在另外的语境中意义不同，并不构成同义词。例如，以下第一句的 repair 与第二句的 fix 构成同义词(均指修理)，而与第三句的 fix 意义不同：1. He can repair the bicycle. 2. He can fix a radio. 3. We can fix(约定) a date for the meeting.

多义词　polyseme

指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关联的义项的词。如汉语"明快"一词可表示：1. (语言、文字)明白通畅：译笔明快；2. 性格开朗直爽：他为人明快达观。又如英语 chair 一词可表示：1. 椅子：Won't you take a chair? 2. 主席：The chair called the meeting for order. 多义词显示词汇系统中语义之间的联系，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语言词汇丰富纷繁的一种表现。

仿造词　calque

亦称"借译"(loan translation)，指把一种语言的词素或词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中与之相等的词素或词。例如英语中的 almighty 一词就是从拉丁语中的 omnipotens 一词仿造而成的，因为 omni("all")＋potens("mighty")＝omnipotens，所以 all＋mighty＝almighty。日语中有许多来自汉语的仿造词语，如囲(来自汉语"围")、読(来自汉语"读")等。

半技术词　semi-technical word

亦称"次技术词"(subtechnical word)，是跨学科出现的频率很高的独立于上下文的词。半技术词大部分来自英语词汇的共核部分，但在科技领域中已获得特定意义，其中许多是经典科学的基本词，源自拉丁语和希腊语。它们的主要特点是在各类文件中通用性强，但比起普通词来词义负荷较低。

国际词　international word

指印欧语系各语言所共有的、在语音和语义上对应的词语。多以希腊语和拉丁语为其共同来源，其中尤以科技术语为多，例如：

英语	德语	法语	俄语	汉译
vitamin	Vitamin	vitamine	витамин	维生素
mineral	Mineral	minéral	минерал	矿物
zinc	Zink	zinc	цинк	锌
synchronization	Synchronisation	synchronisation	синхронизация	同时化
proletariat	Proletariat	prolétariat	пролетариат	无产阶级

技术词　technical word

指科技术语，是准确地标志科学技术专门领域的一定概念的词语，是反映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标记，用来记录和表达科技领域的现象、过程、特性、关系、状态、数量等。技术词具有扩展性、单义性、中性、国际通用性等特征。

借词　loan word

参见"外来词"

新词语　neologism

指为指称新事物或表达新概念而构造出来的词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新事物、新概念不断产生，语言中也就需要不断出现新词语加以反映。当代汉语中许多新词语来自英语，按照音译、意译或音加义译的方式构成，如"迪斯科"(源自英语 disco)、"艾滋病"(源自英语 aids)、"桑拿浴"(源自英语 sauna)、"克隆"(源自英语 clone)等。另一方面，汉语本身也产生大量新词语，如"打工仔/妹"(migrant job-hunting boy/girl)、"'豆腐渣'工程"(jerry-built project)等，一般采用阐释、归化、按字面直译等方法译成外语。

颜色词　color word

表示颜色的词，分两类：1. 基本颜色词，如：红(red)、黄(yellow)、蓝(blue)、白(white)、黑(black)；2. 实物颜色词，如：金黄(gold)、银白(silver)、橙黄(orange)、铅灰(lead-gray)、橘红(orange-red)等。基本颜色词可有不同修饰词，以表示色彩之深浅或状况，如：淡黄(light yellow)、苹果绿(apple-green)、翠绿(vivid green)、漆黑(pitch-black, pitch-dark)、灰白(chalk-white, lime-white)、深蓝(deep blue)等。翻译时要注意以下四点：1. 不同民族的色彩概念不尽相同：红茶(black tea)、红糖(brown sugar)、红晕(blush, flush)、红榜(honour roll)、红利(bonus)、红运(good luck)、红杉(Chinese larch)、红松(Korean pine)；2. 不同民族对同一色彩概念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和联想，如英语中的 blue 一词的意思和汉语中的"蓝色"就有很大不同：blue(蓝色)，the blue(蓝天，海洋)，the blues(忧郁，烦闷；伤感民歌)，blue book(蓝皮书，名人录)，blue films(黄色影片)，blue gag(下流笑话)，bluecoat(警察)，blue-collar(体力劳动者)，blue jacket(水兵、水手)；3. 不同语言中，颜色词有不同的语用意义，例如英语中的 green：He lives to a green old age.(他老当益壮。)He looks green.(他面带病容。)He is a green hand.(他是个没有经验的新手。)He has a green thumb.(他是个好花匠。)He is green-eyed.(他嫉妒心强)；4. 客观色彩往往是作者情感的外泄，处理好色彩词有助于传达作品的内涵。如英国作家哈代通过色彩词来描写苔丝孤苦伶仃的处境和进退两难的心境：She stood on the threshold, between the *steely* starlight without and the *yellow* candlelight within. 她站在门口进退不得，屋外是铅灰的星光，屋内是昏黄的烛光。

语义不对应　non-correspondence in meaning

亦称"语义空缺"。由于双语的文化差异，有些词义在一种语言中存在，而在另一种语言中不存在；反之亦然。翻译时常须补偿。语义空缺包括：1. 指称意义空缺：如，三八红旗手 March 8 red flaggers (an honorific title for women who have made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an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on the various front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直译加注；2. 言内意义空缺，即符号与符号之间关系上不对应，反映在语音层、词汇层和语法层，如韵律的不对应，字(词)形的不对应，词序的不对应(如：死读书 mechanical reading，读死书 reading useless books，读书死 die of exhaustion at one's studies)(另例见"双关"条)；3. 语用意义空缺——因符号的内涵意义或社会意义有较强的文化特征而产生，如英语 She is a cat. 中的 cat，把猫同"包藏祸心的女人"联系起来，绝非中国文化的产物。汉语说某人"壮得像头牛"，英语说 as strong as a horse；汉语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英语却说 as nervous as a cat on a hot roof. 总之，认识语义中受文化制约而产生的语义空缺，对于理解原文，采用必要的补偿手段以弥合双语间的文化沟壑是有意义的。

语义成分　semantic components

亦称"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s)。参见"义素"

语义场　semantic field

指在相似的上下文中几个意义相关联的词所构成的一定语义范围。不同的民族对同样的一些事物在分类上有可能出现不同，因此，不同语言中语义场的组成方式与范围自然有别。例如，英语表示亲属关系的词语 father, mother, brother, sister, uncle, aunt 属同一语义场，其特性包括辈分、性别、父系、母

系等亲属关系。而汉语表示亲属关系的语义场，其词汇构成显然要繁杂得多。于是，在双语词汇对比中就有对应、部分对应或不对应(词汇空白)的不同情况。语义场理论对了解不同语言间相关词汇的语义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从而有利于翻译时的词义选择。

不完全对应　partial equivalence

就词而言，双语中的两个词的语义场只出现部分重叠，其中重叠区的语义部分对应，亦称“语义交叉”(intersection)，对应部分即交叉部分。英语 open 和汉语“开”的语义场关系见图 1。

在翻译中要区别双语词汇语义场中的对应和不对应的部分，避免死抠字眼，盲目对应。除了词汇的不完全对应或部分对应外，还有句法结构上的不完全对应。

语义交叉　intersection of meaning

参见“不完全对应”

语义空缺　zero of meaning

参见“语义不对应”

语义学　semantics

语义学研究语言中意义结构并区分不同的意义种类，其研究范围涉及词、句子乃至篇章。而翻译是以理解原作，特别是以理解其词义为基础的。翻译中大量的工作是要找出原作与译作之间词汇的等值关系。因此，了解词汇的词义结构，对比两种对译语言的词义特征是十分必要的。利奇(Leech)将意义分为七种：概念意义、内涵意义、语体意义、感情意义、联想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现代语义学对词义微观层次所作的研究为翻译工作者寻求语义等值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框架语义学　frame semantics

是菲尔莫尔(Fillmore)倡导的语义学理论模式，是认知语言学范式的一部分。框架语义学的表述形式是框架，用来表述语言和经验以及语言和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一个语词的知识结构(即框架)就是理解该语词时激发(evoke)的概念知识。和其他认知语言学理论模式一样，它重视使用中的语言(language in use)，重视义形语符关系，重视涉身经验的概念语义，重视语言和经验之间的延续性关系，强调格式塔心理整体性的作用。框架语义学认为，语言交际中，仅用抽象的词典语义是无法完成言语理解的，受话者必须通过自身的语义框架(semantic frame) 来理解言语。(Fillmore 1982：134；Fillmore 1985：233)故语义框架是一种理解语义的理论概念，其作用主要体现在：1. 语义框架对语词、小句，甚至对语篇都有其表述能力；2. 框架可以表示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这些背景知识在词典中甚至是见不到的；3. 框架不只是词汇语义学的构建模式，它同时也可以用来表述小句的概念知识；4. 语义框架除了可以通过动词激发小句的概念语义，也可以在处理语篇概念语义时激发相关框架(Fillmore 1985：232)。例如：Julia will *open her presents* after *blowing out the candles* and *eating some cake*. 其中“打开礼物”“吹蜡烛”“吃蛋糕”这些事件互相之间没有内在承接性连接，但它们可以共同激活框架语义——生日聚会。换言之，“生日聚会”作为语义框架，它包含以上各事件。这样的片段是连贯的，因为它们可以共同激活相同的框架语义，并在该框架语义中连接成一个格式塔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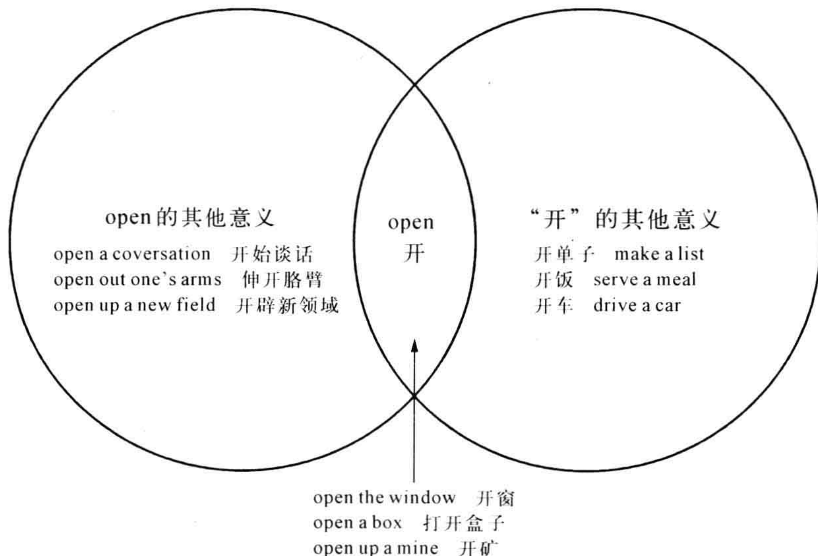


图 1　英语 open 和汉语“开”的语义场

语义框架在词汇、小句和语篇等平面上对语言概念语义的表述都有独到之处(程琪龙 2007),能为翻译过程的认知提供一种可行的表征工具。李安兴(2004)提出在框架语义学理论指导之下建立一个"英语监控语料库",将会为汉语新词的译名确定工作带来便利。王立荣(2005)从框架理论视角探讨与翻译有关的问题:框架系统与次系统、文化框架与翻译策略的运用。语言的意义主要依赖于认知框架,语言表达式是激活认知框架的触发器或认知框架的支撑点,因此翻译的实际任务就是需要找到能够激活与源语相同或相似的认知框架的语言的表达式,但应注意框架文化的差异,以便在目的语中重构框架成分时予以协调,避免框架成分之间的冲突。

(曾利沙)

(框架)连接关系　adjacent relation

美国伯克利学派的认知语言学家菲尔莫尔(Fillmore)将计算机术语——概念框架引入语言学,在 *Frame Semantics*(1982)一文中提出框架语义学。连接关系是框架语义学中的重要概念,是指框架之间的连接关系。在框架语义学中,框架被认为是概念语义的整体性单位,而在语言的概念语义系统中只是一个整体性局部。概念语义系统必须有许多框架连接构建而成。框架之间的连接关系一般是顺序不对称连接和共享连接。这两种连接关系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语词概念中。不对称连接就是突显和背景的连接,不是分类式的简单连接(程琪龙 2007)。例如,"周长"是"圆"框架的突显成分,而"圆"又是"两维空间"框架的突显成分。其中一个框架的突显成分(例如"圆")同时又可以是另一个突显成分例如"周长"的框架。如此的突显-背景关系链,可以按顺序最终抵达尽头,即抵达人类感知运动的涉身经验。以上顺序链尽头的"空间"就是一个感知运动经验。兰加克(Langacker)(1987)将关系链底部的域(相当于 Fillmore 的框架)称作基本域(basic domain)。除了"空间"外,基本域还可以有:物质(material)、时间(time)、力(force)以及各种身体感知(如颜色、硬度、响度、饥饿、痛觉等);甚至还可以有各种情感、心智状态和过程的基本知识。共享连接就是一个语词概念,同时作为多个框架的突显成分。换言之,一个突显概念可以公共连接若干个框架。例如,语词"人"的框架可以是"自然实体""社会文化实体""思维实体",即人同时是生理人、社会人和思维人。三个不同的框架有一个相同的突显成分"人"。而这三个不同的框架,又可以激活其他连接的框架。例如:生理人有生死,有生殖能力,有七情六欲等;社会人之间有各种社会交往;思维人能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些通过一个相同突显成分连接的多个框架,称作框架矩阵或域阵(domain matrix)。

框架的连接关系对于翻译的意义在于它对翻译的语用等效起一定的指导作用。它告诉译者如何在理解原文和译文意义生成的过程中,借鉴和应用框架语义学、语用学理论及其研究成果,去把握语义动态对等,追求新奇等值,实现语用等效。(成善祯 2003)

(曾利沙)

语义模糊　semantic fuzziness

指语义所指范围边界的不确定性。自然语言中大多数词语的词义是模糊的或是不确定的,需要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确定。具体可分以下几类:1. 指示"连续客体"的词,包括时间词、颜色词、年龄词等;2. 中间可插入等级的词,如 long — short, deep — shallow, wide — narrow 等;3. 表示抽象概念的词,如 love — hate, democracy — freedom 等;4. 一些空灵词,如 goblin(妖魔),ghost(鬼);5. 一些模糊限定词,如 probably, perhaps, more or less 等;6. 数词,如 hundreds, thousands, millions 等。在汉语中模糊数词用得特别多,如三朋四友、九牛一毛、百战不殆等。不同语言的模糊性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翻译时需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加以正确处理。如"春""夏""秋""冬"与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在时间上不完全对等。汉语的"春季"指阴历正月至三月,而英语 spring 在北半球是三月至五月的季节,在南半球则相当于北半球的秋季。

搭配　collocation

指语言中某些词习惯连在一起使用。如"圆"可和"桌子"连用,round 可与 table 连用。

意义丧失　loss of meaning

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其区别于另一种语言的异质性。异质性产生意义结构上的非类似性(非同构状态),因此并不是源语中存在的任何意义都可以找到目的语中的最佳对应体,最常见的是形式意义丧失和文化意义丧失。例如以下汉语诗句充分利用了汉语语言文字结构的形式美(叠字、对称、平仄、韵脚):

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

英译可以利用现在分词和名词复数(加-s)实现形式替代,以保证语句的对称,但其他三种形式美不复存在:escalating mountains, / meandering paths, / tinkling springs and / interspersing trees.

意义单位　unit of meaning; *unité de sens*

释意学派术语。指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知识对听觉或视角阈限作出反应的结果。意义单位在同声传译中可以观察到,在作品阅读中同样存在,但由于作品固定和停留在字词或句子上的可能性的存在而不易发觉。意义单位相互交错,并在相互融解后变为意义。(勒代雷 2001:192)

(贺显斌)

15. 哲学　逻辑学

一元论　monism

通常指一种哲学倾向,认为世界只有一种本原的哲学学说。肯定这种本原是物质的为唯物主义一元论。肯定这种本原是精神的为唯心主义一元论。在探讨翻译理论中的一些根本问题时,有借用一元论概念的。如张冲(1991)提出的"翻译标准的功能对应一元论":翻译标准从根本上说应该是一元的,而这标准就是"信"(faithfulness)。他认为在任一特定的翻译过程中,所进行的实质上是将作为一个实体(entity)的原语文本整体地移译于同样是一实体(entity)的译语文本之中;为使译语文本能在宏观上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文本的总体功能,其最高准则和判定标准只能是一个,也只能是"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所谓的"信",并不是对严复的三律作简单裁除之后剩下的一个字,而是以奈达(Nida)"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t)为基础,略作修改之后的"宏观功能对应"(macro-functional counterpart)。

二元论　dualism

一种哲学倾向,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精神和物质两个实体,是一种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主张。在探讨翻译理论中的根本问题时,也有人借用"二元论"这一术语,在借用时往往只着眼于对翻译中的"二元"(两种本原)及其关系的讨论,很少涉及哲学的根本问题。正像有人主张翻译标准一元论一样,有人主张翻译标准二元论,即"忠实""通顺"或者"信""达"。二元论者认为一切译文,不论它属于哪种性质,都包含原作内客观存在的思想、作者风格、原作艺术性等内容和译文语言形式两个要素。对于前者(内容要素),要求译者采取客观态度,这就是要求"忠实"地对待它,或曰"信";对于后者(形式要素),要求它合乎译文语言的规范,即要"通顺"或"达"。

十大关系　ten relationships

由孙致礼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一文中提出。他将文学翻译中的各种矛盾归结为"十大关系",即:1. 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辩证统一;2. 保存"洋味"与避免"洋腔"的辩证统一;3. 神似与形似的辩证统一;4. 直译与意译的辩证统一;5. "克己"意识与"创造"意识的辩证统一;6. 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的辩证统一;7. 忠于作者与忠于读者的辩证统一;8. 整体与细节的辩证统一;9. 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一;10. 得与失的辩证统一。孙致礼认为:"我国优秀的英美文学翻译家中,有些人能正确或比较正确地处理以上十大关系,因而他们的译文达到了很高或较高的水平。有的译者,本身的语言素养和艺术素养也不低,但是由于缺乏辩证的翻译观,翻译中存在着重此轻彼或顾此失彼的现象,译文中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孙致礼 1996)

天人合一　Tianren Heyi (theory that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用天性释人性,孟子强调"上下与天地同流",庄子主张以天为师,董仲舒有"天人感应"之说。人物分立是西方古代的哲学思想。西方哲学强调"非此即彼",强调对立。中国哲学重整体思维,重悟性和立体意识。西方哲学重个体思维,重逻辑论证和客体描述。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差异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反映,如中国画用散点透视,西洋画用焦点透视;中国音乐注重旋律,西方音乐注重和声;中国小说重视情节发展,西方小说重视人物刻画和心理描写。不同的思维方式反映在语言上就是:汉语为时间型动态结构,英语为空间性静态结构;汉语经常不强调主体,英语突出主体,常以主体为论述对象。如:1. 我(的)身体健康。(*I* am in good health.) 2. 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We* have won great success in all fields of our work.)

元翻译　meta-translation

从本体论出发,精神在其根本处总是倾向于一种对自身不同性的印证,试图超越自身,实现自身的不断更新,而元翻译正好满足了精神对"自我"的异化。精神通过设置"他者""含有他者",在改变"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他者"以及"自我"与"他者"共在的世界。这种改变和改造的本质就是元翻译——是对"他者"的吸收、容纳和消化的过程。一方面,由于元翻译可以保证个体的多元和异化的可能,翻译在进入跨语言的现实中才成为跨文化以及文化的创造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元翻译意味着人存在的可能性或人的精神的存在形式含有并且在含有中拥有意义,其意义指向已超出了技术性的、实用性的皈依于理性主义系统的翻译工具论,而指向了与人本质相关的本体论探讨,因而对于提高翻译的理论品格、构筑新的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具有一定启发意义。(蔡新乐 2001, 2002, 2005)

(赵颖)

不确定性　indeterminacy

对意义和翻译进行哲学讨论时所使用的概念。从广义程度来说,不确定性是指语内和语际交际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模糊性。但是不同学者却用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一术语。不确定性最初由奎因(Quine)(1959/1966, 1960)提出。他在其原始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概念中对不确定性进行了说明。奎因认为"翻译手册"(即语际对等系统)只体现出所有源语和目的语词项之间多种潜在的无限图谱中的一种而已,这些图谱彼此不相容,但内部又存在前后一致的关系。因此他认为:至少理论上有可能制定一套新的对应体系,它可以对已有的传统体系提出挑

战(1960：72)。这种不确定性产生于如下事实：完全不含情景或文化含义而可以翻译好的句子实在太少，因此它们不能构成固定、可靠的基础来为整个语言建立一套完整的、无争议的翻译对应体系。然而，对奎因来说，翻译中体现出的这种不确定性仅仅是对更普遍存在的语内不确定现象的一种图解。语内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如下观察而得到描述：语言中的句子可以用某种方式按不同的置换规则彼此图示；根据这种方式，尽管"句子之间的相关联系及句子与非语言之间的联系的总的模式"(Quine 1960：27)保持不变，依然可以存在许多含义上与其各自相关语句大不相同的句子。换言之，在奎因看来，即使同义词(语际对等在语内的对应概念)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一定任意成分。而且，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奎因的兴趣不在于翻译单个的词汇或句子，他认为意义(进而也就是翻译)的基本单位是整个语言(Harrison 1979：114)。因此，如果不是在"某个把(源语)所有句子与(目的语)所有句子匹配起来的整体性翻译方案"(Harrison 1979：108)中进行讨论，那么要去探求某个源语语句的"真正"目的对等语是什么，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一些学者对奎因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悲观性提出了批评。如皮姆(Pym)认为不确定性概念"普遍被看做不可译理论而非翻译理论"(Pym 1992：181)。另一方面，戴维森(Davidson)提出的不确定性概念没有奎因那么极端。戴维森提倡"宽容原则"，建议人们最大限度地去理解源语说话者想表达的意义。戴维森将不确定性概念简化为如下观点：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判断源语说话者"使用词语的方式是否与我们一样，是否只是在思想上多少有些怪异而已，也不能判断我们是否把他翻译错了"(Davidson 1984：101)。戴维森评论说，要理解不确定性概念就要承认某些明显区别并不重要。他总结说："不确定性的存在是由于即使事实很明显，陈述事实的方式仍可多种多样"(Davidson 1984：154)。但不确定性产生的歧义并不抑制目的语接受者领悟信息含义的能力。彼此的理解绝非遥不可及。(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101～102)

分析　analysis

1. 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法之一，与"综合"相对。把一件事物、一种现象、一个概念分成较简单的组成部分，找出这些部分的本质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区别本质的与非本质的、偶然的与必然的各种因素。西方民族的思维方法重分析。在语言上强调结构完整、主谓并举、形式规范。又如在事物的命名上重分轻合，对"物体表面的一层组织"，汉语统称为"皮"，然后又分以"人皮""树皮""兽皮""书皮"之类，而英语没有相应的统称，分别以 skin, bark, hide, cover 表达之。汉语重意合，较少注意形式规范；理解上重悟性；语法呈隐性。汉译英时常需作一番分析才能下笔，如：两个女孩子紧挨着走，走着，走着，林道静突然站住身，回过头，愣愣地对小陈说："小陈，我不能上学了。……"说这话时，她的脸色异常苍白。(杨沫《青春之歌》)The two girls set out, one just in front of the other along a narrow path. They had walked for some time when Taoching, who was ahead, turning and stared fixedly at her companion. Her face was unusually white, "I have got to give up my studies, Wei-Yu! . . . "

原文两句，英译三句。汉语句读不严，第一句又长，经分析后宜分开来译，基本上保留原文词序、句序。汉语第一句中的"紧挨着走"，要读到"回过头"三字时才明白是"前后挨着走"，而不是"肩并肩走"。对此，英译时开头就把它说清楚。英语通过许多连接词语把句内成分和句子连接起来，如 one, the other, they, who, her 等，既显示了语句的表层关系，又表明了其间的内在层次。

2. 奈达把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和检验。分析主要指确定原文文本意义。"意义"包括词汇、句法和修辞三方面；每种意义一分为二：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亦称"内含意义")。基本分析方法有三种：线性分析、层次结构分析和成分分析。

分类　classification

亦称"归类法"，指根据对象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将对象区分为不同类的逻辑方法。客观事物有多方面的属性，事物与事物之间亦具有多方面的联系，因而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依据不同的标准，将对象事物进行分类。为保证分类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在同一次分类过程中，应按同一标准进行，否则即会出现分类重叠或分类过宽的逻辑错误。同时应遵守下列规则：必须按属种包含层次进行逐级分类，不得越级划分；分类后各子类项必须不相容，否则会出现子类项交叉的错误；分类必须相应相称，分类所得的各子类项之和必须与被分类的母项正好相等，否则会出现分类过窄或过宽的逻辑错误。例如，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按文体和翻译目的可分为文学翻译和科学翻译两大类。文学翻译就是翻译文学作品，科学翻译就是翻译科学著作。那么，广告、函电、合同、日记、演说的翻译算不算翻译呢？如果算是翻译，又把它们列入哪一类呢？显然，这是犯了分类不相称、子项未尽的逻辑错误。

分类法在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利用它可以使大量繁杂的材料条理化、明晰化，为人们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创造条件，同时依据分类系统所反映的事物内部规律性的联系，为寻找或认识某一具体事物及其本质提供认识上的向导。关于翻译的分类，可有：1. 口译和笔译——按翻译工具分；2. 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按翻译客体性质分；3. 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按翻译主体性质分；4. 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按符号代码分；等等。

方法论 methodology

指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是对各种具体方法的原则概括和总的认识。方法论与世界观是统一的。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为一切科学方法规定了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也成为翻译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翻译研究中的方法论包括翻译理论研究方法论、翻译实践方法论、翻译批评方法论、翻译教学方法论等。参见“译学方法论”

认识论 theory of knowledge

与“实践论”相对，是关于人类认识的起源、内容与发展过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唯物论，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认识使认识论与本体论有着内在的联系。翻译哲学的认识论问题主要研究主体对客观的认识过程与反映机制，着重说明翻译中认识与实践的关系。

反翻译 anti-translation

从本体论角度，指“自我”使自己成为“唯一”并且不断“物化”“他者”的精神倾向。在理性主义对“绝对中心”的追求中，存在的意义不是来自人本身或人的存在，而是超越人本身的一个始源或者一种神圣的东西。这种观念系统不仅本末倒置地将人放在被创造物的地位，使人丧失了应有的自主性，而且把文化的原则作用在于人这一基本思想交付给了上帝。按照这一观点，只有一个声音在讲话，那就是说话者自己；也只有一个看问题的视角，那就是“自我”将“他者”固定为对象的视角。从这个角度讲，一方面，说者自说，因而翻译便沦为说者的传声筒和“神”与他的听众进行交流的工具，翻译的独立身份难以确立。另一方面，“他者”因已沦落为物，交流自然不复存在；于是人的精神对自身更新、超越自身的要求也就不可实现，生命趋于凝滞。将这一观点推及到翻译理论，则表现出的是一种“反翻译理论”，即拒绝交流与对话，回避变化所需要的系统中的“化”本身的不断解构以便将翻译本身从其中解放出来的趋向。（蔡新乐 2001，2002，2005）

（赵颖）

本体论 ontology

是描述某一本体，即某一事物、某一现象或某一社会事实的学问，是关于存在与存在物的学说。翻译的本体论主要是从客体的角度研究翻译，研究翻译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翻译的本体论涉及翻译的概念和性质、翻译活动的形式和特征、翻译活动的基本矛盾和内部规律、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等一系列与翻译有关的问题。

矛盾律 law of contradiction

与同一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并列为普通逻辑的四大基本规律，亦称“不矛盾律”，指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反对或互相矛盾的命题不能同时为真，其中至少有一个为假。其作用是要求人们在正确思维中排除自相矛盾的错误，故又称为不矛盾律。矛盾律的公式为：A 不是非 A。

矛盾律的运用是有条件的，它要求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同一条件下，对同一事物不能作出两个相反的判断。如果在不同地点、时间或不同方面、条件下作出相反的判断，并不构成逻辑矛盾，也不违反矛盾律的要求。由于矛盾律要求人们保持思维的前后一贯，避免自相矛盾，因而它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认识现实的必要条件。进行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都要遵守矛盾律。违反矛盾律要求所发生的逻辑错误，通常叫做“自相矛盾”。例如，为了证明翻译是创造，有人说：“事实上，这篇文章（王佐良译的《论读书》）除了思想是来自原作者、英国著名哲学家、英语语言大师培根的外，其余已经都是译者的贡献了。”然后又说，“如这篇《论读书》，译者之所以用这样的语言去表达原作，是因为原作本身是一篇古色古香、用词精炼、含义深刻的典雅散文。”前面说只有思想是培根的，后面却说译者模仿了培根的语言，岂不是前后矛盾？

对比 contrast

一种整理经验材料的逻辑方法，通过比较来确定两个或两类事物的共同点或不同点。翻译本来就是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对比中进行的。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在《语言与翻译》一书中指出，在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时可以看到，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着一些典型的、反复出现的关系，同时，还存在着大量非普通、无规律的、仅仅适于某个具体情况的关系。翻译理论研究者关注两者之间那些反复出现的、普遍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明的。

对比可在词、词组、句子、句群、段落、篇章的不同语言单位上进行，可以在语言逻辑、语言文化、语义和风格等不同层次上展开。除了两种语言的对比之外，也可对同一原文的不同译本（如果存在的话）进行对比，从中发现不同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一些风格倾向和个体特征，进而概括出一般特征。

论证 deduction

是科学思维发现真理的重要形式。逻辑论证是使一切论断具有说服力的必要条件。它在认识真理、宣传真理和驳斥谬误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翻译研究是探索翻译本质和规律的工作，是发现真理和认识真理的工作，科学发现的过程需要逻辑论证。每一个科学论断的确立，只有经过严格论证的论断，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人们才会承认它、接受它。论证的方法很多，有事实论证（例证法）、理论论证（引证法）、因果论证、类比论证、对比论证、归纳论证、注译论证、反面论证、引文论证等。例如，贺麟用引证法来论证

翻译的哲学基础:“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即可用无限多的语言去发挥表达之处。”(贺麟 1991)

科学论证对于建立一门新的学科至关重要。过去,翻译理论表现得相当疲软,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科学论证,而让印象式、随感式的议论占有一定地位。只有通过更多的严密、科学、客观的论证,翻译学科才能真正确立起来。

同一律 law of identity

与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并列为普通逻辑四大规律之一,是人们思维基本规律的核心。同一律的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个思想必须保持其同一性。即“名实同一,同一概念的含义的前后同一,思想体系统一”。同一律的公式为:A 就是 A,或 A 等于 A。

比如,有人给“逻辑转换单位”下定义:“逻辑转换单位是能从原语中独立区分开来,单独进行分析、研究,且在译语中能找到等值物的语言单位”。被定义项“逻辑转换单位”应该是逻辑学中的单位,可是定义项中的属概念却是“语言单位”,这就违反了同一律。

多元论 pluralism

一种哲学学说,认为世界是由许多本原构成的。多元论分唯物主义多元论和唯心主义多元论。唯物主义多元论认为,世界是由多种物质元素构成的。如中国古代的“五行”说,认为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是世界的本原;印度古代唯物主义的“四大说”,认为宇宙万物是由水、火、地、风构成的。唯物主义多元论在肯定世界是物质的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它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则是不科学的。唯心主义多元论认为世界是由多种精神实体构成。作为一种多元思维,人们在翻译研究中往往突破原文和译文对立、作者和译者分离等的二元切分,在翻译标准的讨论中,有多元互补论。参见“翻译标准多元化”

价值观 view of values

亦称“价值观念”,即对价值抱有的观念。其核心是作为衡量事物价值之基本依据的价值标准。价值标准的形成与人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不同民族的语言棱镜折射出的世界是不尽相同的:各民族对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赋予同一事物以不同的意义,反映在语言上对词的褒贬不一。英语对绵羊(sheep)和山羊(goat)有明确的区分。sheep 驯顺善良,可指好人;goat 指坏人,淫荡邪恶。汉语对绵羊和山羊统称为“羊”,日常生活中不加区分。在客观意义上,sheep 和 goat 无所谓善恶。在中国人看来,“龙”是神圣的帝王的象征。“真龙天子”世代被奉若神明,顶礼膜拜。“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飞凤舞”“乘龙快婿”“活龙活现”等成语一直沿用至今。但是“龙”的英语对应词 dragon 给西方人的印象是可怕的,因为据《圣经》记载,“龙”是罪恶的象征。难怪西方人对国人自称“龙的传人”无法理解。因此,为了照顾英美读者的价值观念和阅读心理,在外宣中也有改“龙”为“虎”的!如:International attention on the so-called “*four tigers*” has many people asking who will be the fifth rising economic star after Singapore, ... and South Korea. (*Shanghai Focus*, Sunday, March 19, 1989)诚然,改“龙”为“虎”也只是照顾读者心理的权宜之计,实际上语言和它载荷的文化都具有吸收功能,在不少场合下也是照直翻译的。

不同的价值观在政治术语方面的反应更为突出。revisionism 我们通常译作“修正主义”,并赋予它与马列主义完全相对立的政治内容,屡遭批判。但是,这个词在世界论坛上意思主要是积极的,是指对历史上已有结论作不同评价。汉语中的“自由主义”与英语中的 liberalism 差别很大。前者指无组织无纪律或行为的任意性,是贬义词;后者指一种颇为开明的政治、哲学态度,反对给人施加政治的、精神的外来束缚或限制。又如,“实用主义”一词,其对应的英语词可为 pragmatism。“实用主义”在我国的辞典中被定义为近代的一种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潮,而 pragmatism 在西方的词典中均有类似于“实事求是”的褒义,翻译时要注意纠正因不同的价值观而带来的词义偏差。

价值体系 value system

指各种类型以及不同水平的诸价值观念,在一定的价值基准下形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体系化的、统一的复合体。人们面对一个特殊事物时,往往遵从特定的价值基准而抱有一套信念、原则及标准。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往往有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如人类学家比德尼就认为,一种价值体系可作为任何既定文化的一个整合的焦点。

价值取向 value orientation

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上和行为上的稳定趋向。价值取向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它既在意识层次上,也在下意识层次上发生作用。它决定人们的意志、注意力和智力的方向,是调节和决定个人动机的重要因素。人的价值取向是否发展,标志着个性的社会化程度。个人的价值取向一般要受社会价值和社会目的的影响和制约。如果个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发生偏离,就会出现越轨行为;如果进一步与社会价值对立,就会出现反社会行为。

交叉科学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亦称“跨学科研究”,是广义理解的边缘科学,科

学现实世界的知识反映。现实世界包括众多的,甚至是无限的层次。对某一层次的专门研究叫专门科学。对两个层次的边缘部分进行交叉研究即为边缘科学。还可以对多学科的边缘部分进行研究,便出现更复杂的多边缘交叉研究。翻译研究就是复杂的多边缘交叉研究。交叉科学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几个重要特征: 1. 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辩证统一; 2. 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化和技术科学化; 3. 自然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 4. 科学的整体化和传统科学(包括传统分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解体。在形式上表现为纵横交错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在理论方法上表现为综合性的。世界(包括人类社会)是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科学自身发展的逻辑程序,使交叉科学必然繁荣起来,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之一。交叉科学标志着包括哲学、思维、逻辑、经济、社会科学乃至艺术科学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体化。

充足理由律　law of sufficient reason

与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并列为普通逻辑的四大基本规律。它强调任何真实判断都必须有其可靠的根据(理由),否则便是虚假的判断。充足理由律的公式如下: 由于 *B* 真,所以 *A* 真。该公式包括"理由"和"推断"两部分。"*B*"标志"理由","*A*"标志"推断"。其具体要求是,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必须根据真实的理由推断出真实的结论。例如: 有人说:"英汉两种语言之间之所以能够转换,是因为它们的句子主要结构是相同的。"这里,判断的根据是不可靠的。可译性究竟是建立在全人类思维内容与思维规律相同这一点上,还是建立在两种语言"句子主要结构是相同的"这一点上?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然有它存在的条件和原因,这种条件和因果联系的客观规律性,就是充足理由律的客观基础。充足理由律的作用就在于它保证思维的论证性。违反充足理由律就要犯"虚假理由"或"推不出"的逻辑错误,思维就缺乏论证性。充足理由律与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有密切联系,在论证过程中,如果违反了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必然也违反充足理由律。

形式逻辑　formal logic

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则,内容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性及形式逻辑的一般规律。思维形式结构是关系到思维正确性的极重要的因素。只有遵守逻辑形式的基本规律,如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及由它们导出的逻辑规则,才能保证思维清楚明确,无逻辑矛盾,前后一贯和有论证性。逻辑思维贯串于整个翻译过程,它的主要功能有三: 1. 有助于理解。逻辑从来被认为是人们的认识工具。要正确地翻译,首先要正确理解,而正确理解基于概念、判断、推理的正确; 2. 有助于表达。运用现代英语及汉语逻辑,有助于改进译文,使译文符合不同的习惯。各民族对现实要素的思维角度不同,形成了各自语言特有的表达习惯。举例来说: He had a stomach-ache *which* was caused by eating too much. (他肚子痛,因为吃得太多了。)这里之所以把 which 译为"因为",就是根据句中的逻辑关系来处理的; 3. 有助于校正。翻译过程包括理解、表达和校正。逻辑活动可以产生正确的思想,必然也能验证表达的思想是否正确。译文的错误,很大部分是逻辑错误,其中包含理解中的逻辑错误和表达中的逻辑错误,通过逻辑检验是容易发现的。如: After all, all living creatures live by feeding on something else, whether it be plant or animal, dead or alive. 错译: 因为,毕竟所有活着的生物,不论是植物还是动物,死的还是活的,都靠吃某种别的东西生存。(汉译逻辑混乱,语法上把 it 误以为代替 living creatures,而实际上指 something。)另一种逻辑错误在于表达不当,例如: The camera gives us a lasting picture with all details of the object. 错译: 照相机给予我们包括物体一切细节的永久性照片。(句中"照相机给予我们……照片"是不符合汉语逻辑的。)

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具二义: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哲学著作的名称,为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早期编辑者创造的一个词汇。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产生于"自然物之后",即出自事实的或科学的问题,但又超越事实和科学的范围。因而将亚里士多德讨论事物本性、本质以及事物发生发展原因的著作编排在其《物理学》著作之后。我国在翻译这一名称时,依照《易 · 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遂译为"形而上学"。哲学家贺麟在谈到语言与意义时说:"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前者为一,后者为多。"(贺麟 1991)二者颇似哲学中谈论的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就此理解,意与言、原本与译文,应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某一真意,可用土语向本乡人传达,可用京语向国人传达,可用文言或白话向旧人新人传达,亦可用英、法、德文等向异邦人传达。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2. 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或方法论。它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种增减或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于事物外部。

系统　system

由若干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源于希腊语 systema,原意为由部分组成的整体。系统具有整体性、层次性、稳定性、适应性和历时性等特性。(大辞海编辑委员会 2003: 703)在文学理论上,活跃在 20 世纪早期的文学理论家、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著述中首先使用此

术语。

就翻译研究而言,伊文-佐哈把系统界定为“一系列假定可观察物的假想关系网”(Even-Zohar 1990a: 27)。这个定义中的“假定可观察物”通常是语言、文本、文学或文化现象。换言之,系统是一个“层状体”(Toury 1980: 142),由语言、文本、文学或文化中所有相关因素的动态相互关系产生。该术语能表示不同大小的实体,例如作为一个整体的20世纪英语文学或仅仅只是20世纪80年代译入英语的作品。但如果是指由许多小系统组成的大系统即“系统之系统”(Even-Zohar 1990b: 88)时,通常会用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个术语。此外,图里(Toury)或多或少将“系统”这个词用作“能力”(competence)的同义词,指某种语言(或文学等)的规则在理论上能产生的“所有可能实现的事物”。(Toury 1980: 23)这种语境中,“系统”和“能力”一样,与“规范”和“运用”(performance)形成对照的概念。(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

译学方法论 method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方法是指认识、表达与实践的具体做法,内容包括思路、途径、方式、程序。方法论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比方法抽象程度高,属于理论层面,内容包括元方法论、哲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落实在翻译学领域产生译学方法论。其中元方法论应该研究翻译学方法论系统及其同哲学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关系;哲学方法论应研究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应用其原理与定律研究翻译学方法论系统。方法论有相对独立性,不都是理论派生的,也不都是依附于理论的。当理论还未成熟或理论有了危机的时候,可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或用新的视角审视研究对象,从而创建新的方法来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理论的最本质的意义是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凡理论都有方法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来说,理论和方法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说理论常带上方法,说方法也常加上理论。知识创新其主要形式是理论与方法的更替。方法论已成为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开拓、改革、成功、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翻译学方法论系统的上位概念是翻译学学科系统,即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下位概念包括这个学科方法论的各个层面,即翻译实践的方法论、翻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翻译教学的方法论和翻译批评的方法论。这四个不同层面都应属于它的子系统。(杨自俭 2007)

直观 perceptual intuition

指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直接接触而获得的感性知识。采用直观的方法使抽象信息形象化,便于接受者直接感知、理解和领悟。任何抽象的理性思维,都离不开直观所得到的感性认识。翻译是再创作,创作需要体验生活,再创作也同样要体验生活,要体验作者所体验的生活,要熟悉作品中人物的生活,才能用另一种文字把原作形象、生动、逼真地再现出来。

事实上很多翻译家都求助于直观手段。如德国人伊姆霍伊泽尔(Imhaliser)翻译《登月记》(*Lunar Landing*)时,曾经四次采访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为翻译《登月记》提供了必需的感性知识和有利的直观要素。终生翻译左拉(Zola)作品的毕修勺,对“左拉笔下的场景,他一一走访。他竟还找到当年为左拉斟过酒的女招待。”(王寿兰 1989)

规范性 normativeness

指关于价值的判断或价值的标准。规范性陈述或理论与经验的述说不大相同,前者阐明的是主观偏好,后者描述的是实际存在的事物;前者陈述是“应该”或“应当”的问题或判断,后者涉及“事实上是什么”的问题,即可以检验和证实的陈述。规范性见解不必接受科学的检验或证实,因为它们不存在证明是否真实的问题。它们都是些哲学见解,且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因为人们对规范观念的看法是不相同的。“诊断性理论”体现了关于理想的社会目标和如何实现其目标的规范性判断。

时空观 view of time and space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哲学家金岳霖在其《知识论》中对意念、时空和语文是这样表述的:“所思都是普遍的,普遍的意念无分于特殊的时空,当然也无分于不同的语言文字或引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转引自陈福康 2000: 352)

人在表述意念或信息时的途径是多向的,多向性也意味着空间性。高新技术的发展要求不断产生新的术语,它给语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词汇方面的,也包括修辞的和语用的。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 把抽象的无形的电脑网络比作一条条高速公路联结起来的网络,这在修辞上是比喻。在这一比喻的带动下,许多有关交通方面的词语因义生情,因情取义。navigate, tunnel, cruise, travel, traffic 等词,各以其主要义素,通过术语化过程而加入 information highway 的术语系列。信息高速公路方面的词汇通过空间的想象与传播,英汉两种民族文化意境能和谐一致,这正应了我国的古训: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思想由语言表达,语言由词汇构成。词汇的意义空间,即配价关系,构成语言的空间形态;思想即处于这一空间形态之中。而任何两种语言,其词汇的配价关系基本上并不完全重合。如 doctor 有“大夫”“博士”之意;而汉语的“大夫”,除了指医生外,还指古代的一种官职;“博士”也一样,并非专指学位,它源于战国,是官名,后用于对一艺专精的官名。但是,英、汉两词在空间配价关系上重合(在特定语境下)之处,即是译者可以对译之时。语言或概念不仅沿着空间序

列彼此联系，还沿时间序列发展和变化。在不同社会的不同时期，在不同文化发展阶段上产生的翻译理论和原则、翻译技巧和方法，其中许多都是共通的或是延续的，从而不断地丰富着译学研究的内容。

规定　prescription

翻译研究中的规定是指对翻译方法和翻译原则的主观确定。规定的方法或原则所依据的常常不是对翻译过程的全面描述，而是翻译（理论）家根据自己的经验或体味提出的观点，把他们认为是最好的译法或规则作为规范定下来。

实践论　theory of practice

与"认识论"相对，指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能动性、客观性和社会历史性等特征，与主体论及历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翻译哲学的实践论是从主体与客体的实践关系上来解决思维与存在、翻译理论与翻译活动的关系问题。

命题　proposition

逻辑学中"命题"指表达判断的语言形式，由系词把主词和宾词联系而成。命题一般用陈述句。例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这个句子就是命题，并且它是真的。"长春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亦是命题，但它是假的。"翻译是艺术"，"翻译是科学"，"翻译是艺术也是科学"，这些命题中外译界争论已久，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判断。有的命题的真假要经过反复的科学论证才能确定。

物质性　materiality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 1976：128）翻译的物质观认为，储存在人脑的知识单元或所谓"相似块"，是主观世界高级组织的物质；语言文字及符号代码系统是客观世界的一般物质。主、客观两个物质世界运动的吻合、协调发展，便产生了翻译思维活动的过程。由于两种物质有别，决定了译作只能是无穷地接近，其峰值便是最佳近似度。根据能量守恒和转换（转化）定律，非孤立系统的转换或传递都有能量的损失。翻译既是人为实现的两种语言间的"代码转换""信息传递"或"文化移植"，其损失就不可避免。绝对的"信"或"忠"或"等值"是不可能的。

翻译的物质观还认为，翻译研究应尊重客观，任何臆测、武断、断章取义都是无本之木。翻译理论若脱离实际，流于空泛，从哲学高度看，就是因为脱离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有的理论（如描写性理论）虽然不以指导实践为直接目标，但也不能因此否认其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定义　definition

指对一个事物或概念区别于所有其他事物或概念的解释，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即指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形式逻辑定义的方法是把某一概念包含在它的属概念之中，并揭示它与同一属概念下的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即"种差"。如给"人"这一概念下定义时，指出"人"的属概念是动物，在动物这一属概念下，"人"和其他动物的差别是"能制造生产工具"，从而得出"人是能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所以，定义的公式是：被定义概念＝属＋种差。

根据所提供的属概念的范围大小，以及在属概念下揭示的种概念之间的差别的确切程度，可分为正式定义（formal definition）、半正式定义（semi-formal definition）和非正式定义（non-formal definition）。只有正式定义才能反映概念的本质属性，半正式定义只能反映其基本属性，而非正式定义只能反映其一般属性。在科技论文中，当必须对概念作精确解释时，要用正式定义；当对概念作初步或笼统的解释时，可用半正式定义或非正式定义。根据不同的需要，对同一事物或概念，可以给出严谨程度不同的定义。以 gage（量规）为例：1. 正式定义：A gage is a mechanical instrument which uses a scale or dial for indicating quantity. 量规是一种利用刻度或刻度盘来表示尺寸大小的机械器具。2. 半正式定义：By definition, a gage has a scale or dial to indicate quantity. 量规可解释为：它用刻度或刻度盘来表示尺寸大小。3. 非正式定义：A gage is an instrument or a means for measuring or testing something. 量规是一种测试器具。

正式定义常用 We can define, may be defined as, is known as, means 表示，半正式定义或非正式定义形式多样，常与上下文有密切关联。

范畴　category

即基本概念。客观事物普遍本质在人的认识中的概括和反映。作为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范畴有具体科学范畴与哲学范畴之分。前者概括的是具体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只适用于该学科研究范围；后者概括的是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最一般的最本质的特性、联系和关系，对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起着一般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范畴。如数学有点、线、面和正与负等。政治经济学有商品、货币、资本等。哲学上的范畴是反映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的、最本质的联系和关系的逻辑概念，如物质与精神、形式与内容、偶然与必然、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等等。

范畴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的范畴标志着人对客观世界认识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既是以往认识成果的总结，又是认识进一步发展的起点。随着科

学和实践的发展，人对客观事物本质认识的深化，范畴也会随之变化。一些范畴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另一些范畴会得以充实和引进。

我国传统译论的范畴十分有限，一般限于直译、意译、忠实、通顺之类，千余年来甚少开拓，致使翻译理论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翻译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开放性、学科交叉性很强的学科，不突破传统的封闭性观念，学科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近数十年来，相关学科迅速发展，推动着翻译学科的发展，一些传统的译学范畴注入了新的内容，有不少新的范畴不断加入译学的范畴序列。可以这样说，范畴的研究和拓展是译学建构和完善的基础。

下位范畴　subordinate category

与"上位范畴"相对。按照相反的、具体化的方向发展，即产生下位范畴，如由"狗"到"猎狗""牧羊狗""哈巴狗"。下位范畴是在基本层次范畴上的进一步细分。在下位范畴上，人们很难区分原型，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因为它们之间的微小差别已不影响人的完形感知。下位范畴的语言多是由基本层次范畴词构成，多为复合结构。其属性来自它的基本层次范畴，这些属性不仅包括客观的，还包括联想的和经验的属性(Ungerer, Schmid 1996；赵艳芳 2001：65)。下位范畴词除了具有基本范畴的属性外，还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属性。如果这类属性超过一定的数量，就会产生新的基本层次范畴。另外，除了表示下位范畴的复合词外，还有一些简单词也表示下位结构，如：daisy, dandelion, poodle, terrier。实际上这些词是由一个隐含的中心范畴和一个明显的修饰范畴组成的。但是也有例外。如：rose 是 flower 的下位范畴，但是它自己也可以被完形感知，可以作为一个基本层次范畴。这种矛盾说明，基本层次范畴和下位范畴是逐渐过渡的，没有明确界限。

有关范畴化及其相关概念，无论是对于翻译实践或是翻译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任何一个概念都是范畴化(包括上下位范畴的划分)的结果，具有范畴成员的共性特征。在人的认识思维中，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涉及范畴化思维。在翻译过程中，其关注点在于那些抽象概念在特定语境中的范畴化认识问题。如：

One of the key features ... has thus been a transfer of the less sophisticated ***end*** of the manufacturing market, such as toys, textiles and footwear, and the like, from the more to the less developed nations, ... (*Euromoney*) …主要特征之一是：发达国家将工业品市场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产品，诸如玩具、纺织品和鞋类等的生产转移到欠发达的国家。

对该句中 *end* 的翻译，词典释义无一能照搬，译者必须建立起 *end* 的上位范畴与其下位范畴成员 *toys*, *textiles*, *footwear* 的范畴层级关系才能确定其抽象概念在此语境中的具体化语义特征——末流产品，其翻译才能实现(曾利沙 2001c)。在谈到词汇概念范畴差异对翻译产生影响时，郭聿楷(2005)指出，因为不同民族范畴结构存在差异，翻译中有时找不到层级等值的范畴，此时应对范畴层级作适当调整，而不可一对一地死译。参见"上位范畴"　（曾利沙）

上位范畴　superordinate category

指从基本范畴衍生出的相关概念，与"下位范畴"相对。客观世界反映在人的思维和语言中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混沌世界，而是一个有序的系统，其基本形式是范畴层级结构(郭聿楷 2005)。范畴层级结构包括：基本层次范畴，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基本层次范畴具有明显的原型成员，是人们认识世界最直接，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们对世界事物进行范畴化的有力工具。范畴向更抽象的方向不断发展，形成上位范畴，如由"肉""粮食""菜"到"食物"，由"狗""牛""羊"到"家畜"。上位范畴是寄生于基本范畴之上的，因为它们依赖基本范畴获得完形和大部分属性。上位范畴具有两个功能，一是突出所属成员明显的共有属性；二是聚合功能，即集合下属范畴成员的共同属性构成，此过程重复多次就构成范畴等级。例如，VEHICLE 这一范畴里的成员的共有属性是 move people and goods around，这是其下一范畴即基本范畴成员 CAR, BUS 和 MOTORCYCLE 所共有的属性。当需要获取 VEHICLE 完形时也主要是借助其基本范畴成员的完形。由上位范畴向下位范畴运动的原型性范畴化目的在于将原型范畴具体化，而由下位范畴向上位范畴运动的图式性再范畴化(recategorization by schema)，其目的则在于通过省略原型范畴的部分具体性语义内容而将原型范畴抽象化。人们用有限的词语来描述世间纷繁芜杂的事物，而使人们的认知有规则、有组织的窍门就是范畴化。所以，范畴化认知也充分体现在语言符号中，词义的形成及演变就是不同层面上的范畴化的结果。上位范畴——基本层次范畴——下位范畴构成了语言的等级结构，人们通过这一结构来认识世界、解读世界。在基本层次范畴的基础上，人们进行归纳、抽象、概括形成上位范畴(superordinate category)，突出所有成员的明显的共有属性(Ungerer, Schmid 1996/2001：73～84)。参见"下位范畴"　（曾利沙）

范畴化　catagorization

是人类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的高级认知活动，是主客观，即人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过程(赵艳芳 2001：55)。对反映规律对象的不同属性进行概括即是一种范畴化的过程。从认知系统看，人们不仅对自然界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命名取向趋向于将其范畴化，而且体现在对抽象事物的认知思维中。其结果就是范畴。范畴性是指对事物联系和发展统一的客观环节的表述，"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之

网的过程中，通过一个个范畴把认识的成果凝结起来，如同打上一个个结，这样就能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之网中理出个头绪来，即把事物、现象的本质反映出来。"（列宁 1976：90）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最早在哲学领域对范畴化理论进行阐述。之后，康德（Kant）、黑格尔（Hegel）、胡塞尔（Husserl）等都对此进行了阐述，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20世纪50～60年代，维特根施泰因（Wittgenstein）发现古典范畴理论的缺陷，提出"家族相似性"概念。在语言学界，罗施（Rosch）和拉波夫（Labov）把具有相似性的这些自然范畴称为原型范畴（李洁 2007）。范畴还具有等级性，分为基本层次范畴、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Ungerer, Schmid 1996）。原型是物体范畴最典型的成员，范畴围绕原型这个认知参照点建构，其边界依成员典型性程度向外扩展（赵艳芳 2001）。范畴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相邻范畴相互重叠，相互渗透（Ungerer, Schmid 1996：19）。

范畴化过程是动态的，永不停止的。范畴化包括无范畴、范畴化、非范畴化和重新范畴化四个阶段。实体从无范畴状态到有范畴状态，然后又逐步失去原范畴的某些特征，开始非范畴化过程，经多次反复使用之后，从一种中间状态逐渐过渡成为一种具有稳定范畴身份的词语，完成了重新范畴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陈建生，杨玉娟 2006）。从根源上来说，范畴化的过程也就是通过意象图式模式建构可以直接理解的基本范畴与通过隐喻和转喻模式建构需要间接理解的抽象范畴的过程。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须注意范畴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在翻译理论研究中，范畴这一个概念既具认识论特征，又具方法论特征。每门科学都有自己特有的一系列理论范畴，范畴在学科中又具有最广泛的概括性和实用性。将一个个范畴按其前后相继的层次关系组织起来的结构体系就成为系统。杨自俭（2000）指出范畴在翻译学科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翻译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要看理论体系的建立，而理论体系的建立要看"是否有分级的范畴，范畴的界定是否清楚并前后一致；范畴是否形成严密的体系"。刘华文和李红霞（2005）以维特根施泰因的"家族相似"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中的基准范畴理论为分析依据，认为可以发现阈限性、层级性、寄生性和双向优选性等认知特征贯穿着汉英翻译的再范畴化的认知过程。肖坤学（2005）从认知范畴视角讨论了词语的翻译问题，认为词语的翻译在形式上表现为语码转换，但在本质上是一个认知范畴的移植过程。曾利沙（2001c）将范畴化视为翻译活动规律的一种特质，是连接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并在《从外宣翻译原则范畴化看应用翻译系统理论建构》（2007）一文中进而从系统理论建构入手，对应用翻译系统理论范畴化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认为传统所论的翻译原则以孤立的概念存在，不具可阐释性、可印证性、可描写性和可操作性，而翻译学科发展应从范畴理论建设出发，建构相应的翻译理论"原则范畴"，包括目的论原则——需求论原则——价值论原则——策略论原则——辅助性准则——可操作性规则，各范畴之间具有内在的推衍机制及其逻辑联系。（曾利沙）

基本范畴 basic category

对基本范畴的研究始于布朗（Brown）。他观察到，人类在认知客观世界中，首先从基本范畴层面，即大脑是从中间层面开始认知事物的，因为其成员具有明显的能被感知的对外区别性特征。基本范畴处于范畴的中心地位，是人类对事物进行分类最基本的心理等级，是认知与客观世界最基本、最重要的关联。罗施（Rosch）（1975, 1978, 1988）、泰勒（Taylor）（1989/1995）、昂格雷尔（Ungerer）和施密德（Schmid）（1996）、熊学亮（2002）等国内外学者对基本范畴给予了不同的描述。其基本观点有：1. 基本层次范畴最自然，感知辨认最快，功能反应层次最高，习得命名较早，知识组织最有效，所用词语最短且使用最频繁；2. 基本层次范畴是人类用来对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和有机体进行分类的工具（陈治安，文旭 2001），具有重要认知功能，是其他范畴意义的基础：通过突出其一般特征，我们能推断出上层范畴，而通过突出独特的特征，能派生出从属层范畴；3. 基本层次范畴的事物具有视觉上的完整性，即完形，也叫格式塔（Gestalt）。完形是在人类经验中反复出现的有组织和统一的整体，是人们对于某一事物感知的一种完整的结构或形式，而不是各组成部分间的简单相加；4. 基本范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最高，人们最熟悉，经验最多，因此，其突显性最强。此外，基本范畴是儿童最早习得和掌握的事物，对其识别和分类也是最快的；基本范畴成员具有感知上基本相似的整体外形，并能形成反映整个类别的单个心智意象，具有最大的内部相似性。

刘华文和李红霞（2005）从再范畴化角度讨论了汉英翻译过程中的问题，认为译文往往优先选择基本范畴作为原文范畴的对应项，其原因是，在人的认知心理活动中，基本范畴之间最容易区分。由于语言和语言之间在范畴分类系统上是不同的，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范畴不一定会在另一种语言中有着绝对的对应，所以翻译实践中，会出现语言层级的错位。但是基本范畴的特点是翻译再范畴化的一种牵制力量，这样就避免了翻译再范畴化在各范畴层级之间作无序式的跳跃。虽然原文范畴和译文范畴发生了错层，对等性的忠实原则仍然在暗中发挥导向作用，而正是基本范畴保证了这一导向性作用的实施，不至于让译文范畴在属性内容上过度地偏离原文范畴。曾利沙在《论语篇翻译概念语境化意义生成的认知机制》（2007）一文中运用基本范畴与次（较低）级范畴之间的衍生关系，分析了翻译过程中概念语义生成与范畴映射关系的一种认知模式，并指出：从概念范畴理论看，语篇中一个较高层次的抽象范畴概念不能直接获得较低或

低层次范畴的概念语义的映射。它不能将自身的义素直接映射给受其制约的范畴概念,必须通过对其进行语义范畴化概括后,获得中间范畴概念,才能间接实现其映射。（曾利沙）

非翻译　non-translation

指无法定义和进行理性分析的"本体"存在形式,类似于《易》中的"易简(非变)"和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讲的"德国的绝对的形而上学"的三种情况中的"精神的自在"(the being-with-itself)。"易简"指"变"与"不变"的概念之外的精神状态：静止,拒绝逻辑判断,排斥概念的分析和归纳。"精神的自在"则要求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以及根本上的本质差异性：它是它自己,它是一存在者。这个存在者不依附于任何别的存在者而独立存在,它只存在于它自身,无法用任何概念和范畴对其加以限制,否则它就只是一种"表现"或"现象",而不是"本体"或"自在"。在此意义上讲,"非翻译"意指原初的可能性,它超出变与不变的二元对立,将精神的生命活力聚拢在一个真正的始源。在这个始源中,人的存在是自然的存在,人与自然合一,这里可以"积蓄"无限的力量,一种强大的、无法命名的生命活力。而且在这一始源里多元寓于某个单一,复杂寄居在简单之中,也就是说,在始源的那个"源"内,早容有"异""他者"。而"元翻译"表现了"异"与"我"和谐共存的可能性。因此,"非翻译"这一始源才可能是翻译的源头。(蔡新乐 2001,2002,2005)

"非翻译""元翻译"和"反翻译"间的关系并非是以设置"他者"开始,通过认同"他者"并最终回归"自我"这样的一个封闭式循环。人的精神不断以"非翻译"的本己状态为根本,不断地设置"他者",想象以"他者"的视野来看待新的空间,不断扩大的空间,这样,"元翻译"就把"非翻译"的不变的根本带入一个新的异化了的地域中,而其自身也因此具有"反翻译"的"归返"或"反动"的性质。这也就意味着,"元翻译"本身容有"非翻译"的意义,而且兼有"反"的不断解构。蔡新乐将"非翻译"译为 non-translation,而该英文词通常指译文中"没有被翻译的成分"(Gentzler 2004：192),或指作者拒绝让人将自己的作品译成某些语言的"不翻译现象"(廖七一 2000)。参见"元翻译""反翻译"　（赵颖）

结构主义　constructionism

指由结构主义方法论联系起来的一种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前驱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这种方法论的主要特点是：在研究中,将对象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然后重新组合,以引起整体性的变化;强调整体对部分的优先性;认为对对象的研究不应停留在表面(表层结构),而应深入到对象的内在联系(深层结构)。在结构主义的理论中,"系统""结构"等处于核心地位。索绪尔把语言系统分为深层(语言)系统和表层(言语)系统,深层系统由社会因素构成,它是静止的、规范的;表层系统则是个人的言语表达,它受到个人的、物理的和心理的因素干扰。(索绪尔 1999：35～36)结构主义语言学关注的是一个封闭系统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把人与时间的因素排除在外,对外部因素弃之不顾,只是把系统自身及内部因素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结构主义思想的核心是"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即认为语言表达之前先有明确的内在意义,语言文字只是其外在形式,结构主义者设想有一个超然结构决定符号的意义,成为意义的根据或核心,并力求对这个结构作出客观描述。其目的是要探寻现象背后的秩序或结构,强调整体优于部分,共时优于历时,强调能指和所指的紧密结合。

早期的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以结构主义的原则为圭臬。"奈达早期受美国结构主义派布龙菲尔德和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的影响较大,在语言研究中重视语言素材的搜集和分析。他通过到世界各地考察和接触各种不同语言的机会,收集到不少有关言语差异的实例。但他不是把言语差异当做语言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是当做相同本质的不同现象来加以描写。"(谭载喜 1999：XVI)苏联时期语言学派的代表巴尔胡达罗夫也只是把翻译看成是意义等值下的结构的转换。他说:"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是对翻译这一语际转换过程,即把一种语言的话语改变为与之等值的另一种语言的话语的过程,给予科学的描述。换句话说,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任务是把上述意义的翻译过程模式化。"(巴尔胡达罗夫 1985：2)参见"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ism

由结构主义发展而来,因否认结构主义所主张的固定结构而得名,是现代西方哲学学说与流派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巴尔特(Barthes)和德里达(Derrida)。他们认为结构没有中心,也不固定,而由一系列的差别组成。由于差别的变化,结构也就变化,因而结构有不稳定性和开放性。德里达认为文本不具确定的意义,作品的终极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就像巴尔特比喻的那样：文本就像一个葱头,"是由许多层(层次、系统)构成的,里面没有心,没有内核,没有隐秘,没有不能再简约的本质,唯有无穷层的包膜。其中包着的只是它本身表层的统一"(Barthes 1971：10);文本总是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其意义是过去意义的继承而且有待进一步延伸。也就是说,文本完成以后,由于语言符号之间多层次、多维度的互动和联系,原文作者已无法使文本的意义固定化,在语言符号之间不断流动着的意义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解读出不同的意义。解构主义关注的是变动不居的现实,但它所指涉的又不仅仅是停留于"在场"(present)的现实,而是超越这种现实,但不是像结构主义那样超越到抽象的永恒性与普遍性上去,而是超越到"在场"背后

“未在场”的现实事物中去,这些不在场的事物与在场的事物一样,同样是有现实意义的事物,而不是抽象的永恒或本质。(吕俊 2002)

解构主义语言观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解构主义要义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解构主义翻译观,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翻译本质、翻译标准、原本、译本等遭到质疑甚至颠覆。参见“解构学派”

延异　differance

与“差异”difference 只差一个字母,是德里达(Derrida)的杜撰词。法语动词 différer 有两重意义:推迟/拖延,不同/相异,新造词 differance 可同时既指差异,又指延迟。延异和差异在内涵上却大相径庭:1. “延异”不是一种有限的差异,而是一种无限的差异,是“差异的自由运动”(play of difference)。它不仅包括了索绪尔(Saussure)从共时的空间概念上阐述的差异的内容,指代所指与所指、能指与能指间以及所指与能指之间的空间差异关系,构成横向的不断“播撒”的“异”的概念,而且指代各种符号因素在历时的时间概念上的差异关系,构成纵向的“延宕”的“衍”的概念。在德里达看来,符号的意义不仅是在空间性的差异关系中显示出来,同时也在时间性的延衍关系中显现出来。2. “延异”所指代的不仅是语言符号内部不同的所指或能指间的差异关系,而且还指代语言符号外部所有事物间的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关系。这就突破了索绪尔把语言局限在自身系统内部,与现实世界相分离的樊篱。索绪尔的“差异”仅仅指语言系统内的不同语言元素之间的差异,而在德里达那里,语言符号和现实世界是不可分的,没有语言符号,现实世界便无法呈现出来,“事物本身就是符号”,“文本之外无物”,所以他的“延异”的外延远远大于索绪尔的“差异”,指的是一切存在物的差异性。

德里达以“延异”的观念看待语言意义,认为一个语言符号的意义根本不是根植于它自身的内在性(如概念、所指等),而是根植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差异关系,它的意义是由它的“他者”所赋予的。在《书写学》、《延异》等论著中他反复指出:“没有保持在同一中的他者,就没有差异的运行,就没有意义的产生。”“每一个所谓的在场的因素,每一个显现于在场的场景中的因素,都与那不是它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所指概念从来不是呈现在它自身、不是它本身,不是在某种指向自我的充分的在场中。每一个概念,本质地和规律性地被铭刻在一种指向他者、指向其他概念的链条或系统中,借助差异的系统性的运行表现出来。”(转引自肖锦龙 2004: 10)任何符号的意义都决定于它周围的其他符号。例如,“主任医师”只有在卫生技术人员系列的符号链中才有意义,在这个系列中还有“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医师”“医士”等。

从他者思维出发,原文所表达的意义已不在于原文自身,而在于与之发生关联的众多他者因素,在于它与这些他者因素的差异关系之中。故而翻译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自然就不应是原文,而应是原文相关联的他者因素,诸如导致原文或译文产生的文化因素、文本之外的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等等。(李龙泉 2006)参见“德里达”

差异　difference

索绪尔(Saussure)指出,符号有两个相关的特征:任意性和差异性。他认为语言的价值,不管是概念部分还是物质部分,都由一个符号与这一语言系统内的其他符号的关系和差异决定(Saussure 1983: 116)。语言系统即是一系列的语音差异与一系列的概念差异的结合,这些语音与概念的关系是任意的,每一个不同的语音都有一个不同的概念与之相匹配,语音不同,以语音表达的意义也会随之改变。一个符号与其周围的其他符号的关系比这个符号本身所包含的意义或语音更重要(Saussure 1983: 118)。也就是说,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取决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这一意义不是先验的,也不是确定的。

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哲学观,德里达(Derrida)认为,“所指”这一概念本身并不“在场”(present),因为每个概念都是通过系统的“差异的游戏(play)或运动(movement)”(即“延异”)而写进一个链或一个系统,在这个链或系统内,它可以指涉其他概念,产生意义。符号的位置通常被认为是其替代物的位置,然而,如果语言只存在差异而没有确定的词语,那么符号所标记的位置便不是确定的空间的“在场”,而是与语言系统中其他符号的一种差异的关系(Derrida 1972/1982: 9~11)。符号的概念意义也不是直接指涉“在场”,而是依赖于这一符号与其周边其他符号的关系。“符号是一种(时空)延迟的在场”(Derrida 1972/1982: 9)。既然每一个“能指”并不是指涉语言外的“所指”的“在场”,而是指涉其他“能指”,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只存在“能指”。这样,“所指”与“能指”的二元对立关系就被解构。“能指”即符号,也是“印迹”(trace),通过与其他符号的“差异的游戏”产生意义。意义总是存在于差异的运动中。

德里达还通过巴别塔的故事来阐述语言差异的起源。当闪米特人为统一语言、统一人类而即将建成通天塔并以此扬名时,上帝进行了干预。上帝使语言混乱,让人们无法沟通;上帝驱散了他们,建造通天塔及其城市的努力也告终结;上帝将其命名为:“巴别塔;混乱”(Babel; Confusion)。从词源学上讲,“babel”一词与希伯来语词“balbal”或其缩写词“balal”相联系,意义既是“神之门”(gate of god),又是“使混乱,使迷惑”。因此,希伯来语中“巴别塔;混乱”两层意义集于一词。这样一来,巴别塔这一未完成的建筑结构与繁杂混乱的语言预示了语言与结构的关系。在德里达看来,“巴别塔”(Babel)是一个专有名词,是城市的名字,也是上帝的名字,存在于闪米特人的语言之外;同时它又是一个普通名词,意义为“混

乱”,存在于闪米特人的语言之中。因此,专有名词既存在于语言之中,又独立于语言之外。上帝解构了通天塔,同时也终结了天下一统的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充满差异,意义从一开始就具有不确定性,包括最确定的专有名词。(徐敏慧 2008)

思辨 thought recognition

哲学上指运用逻辑推导而进行的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思辨的褒义是逻辑严密,说理性强;思辨的贬义是没有实验事实、脱离客观现实的空洞推论,抓不住要领、在枝节上咬文嚼字的无聊推敲。思辨作为一种思维特征和哲学方法,最早可上溯到古希腊时期,早期智者派与柏拉图在论证其观点、建构其体系时都带有很强的思辨性质。近代,思辨亦成为辩证法的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所借用。

哲学 philosophy

哲学是人们对于整个社会(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对任何别的学科均有指导意义。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从根本上具有工具性,可为各科所应用。但是,由于哲学思维的思辨性,哲学作为方法论,只提供一般的原则——适合于一切科学研究的最普遍的方法论原则。唯物辩证法是指导人们进行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唯一正确的学说。它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它为一切科学方法规定了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哲学的思想原则和方法论的指导。哲学跟翻译学的关系就像跟别的学科一样,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它是翻译工作者认识、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本质的锐利的武器。

语言哲学 philosophy of language

一般地讲,语言哲学是为了哲学的目的对语言的某些一般性质和一般特征(例如意义问题、指称问题、真理问题、言语行为问题、必然性问题和意向性问题等)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研究语言,即把对语言的哲学理解看做理解思想乃至世界的途径,这是当代哲学跨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不少当代哲学家认识到,能够通过语言来表达的不仅是能思想的,也是能存在的,当我们考察语言、从而考察我们的思想时,就会发现某种关于世界本质的东西。这是因为,语言、思想与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平行关系。

语言哲学翻译论 linguistic philosophical view of translation

语言可分为工具性语言(metalanguage)和对象性语言(object language),我们用前者谈论后者,后者是前者讨论的对象。翻译可以看做是工具性语言对对象性语言的解释。任何原文本都可以是对象语言,对它进行评论的另一个文本(即评论语篇)则是工具语言。对一个原文本的解释需要进行多次,这便是工具性语言的高频率的再度解释现象。工具性语言的扩展式所指的工具语言,的确是对对象语言的分析、解释和讨论,但绝对不是重言反复或者照本宣科。翻译是工具性语言扩展式的一种。一般工作性语言是在一门语言内部,翻译是一种语言内的解释关系扩展到不同语言文化间的解释关系中去。求真是语言哲学翻译论的核心,只要不违背信念心态沟通原则,用不同种的工具语言表示的真之定义是完全可以充分的,但这种沟通只是整体上的实现,信念沟通原则与异质文化间的斗争,永远使翻译呈现大局上的可译性与小局上的不相容的状态。(钱冠连 2003)语言哲学可为翻译的定义、原作与译作的关系、重译、翻译的创造性和可译性等问题提供新的解释和研究视角。

原始翻译 radical translation

指翻译一种迄今为止我们从未接触过的不懂的语言(如热带丛林中某个与世隔绝的土著部落的语言)。原始翻译是美国当代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奎因(Quine)在《语词与对象》(*Word and Object*, 1960)一书中设计的一种思想实验,是语言翻译的极端情形。翻译这种语言需要经过以下步骤:1. 看到某个东西(比如一只兔子)时,语言学家记录土著人所说的词句,作为尝试性翻译,以待日后在更多的语境中加以检验;2. 这种事物再次出现,语言学家说这个词句,看土著人是同意还是反对,通过多次重复,可以识别土著人表示同意或反对的话语;3. 语言配对,即建立土著人的词句和语言学家母语词句的对应关系,但语言学家可能发现,两种语言中的词句并不完全对应,于是产生了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奎因此书的主题就是翻译的不确定性,他设计原始翻译也是想说明这个问题。(郭建中 2000)

预设 presupposition

亦称“先设”或“前提”,是逻辑学中的重要概念,它依靠概念、逻辑、语境等来推断意义;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已知信息,或是交际双方共同认可的背景知识。此概念由德国哲学家弗雷格(Frege)于 1892 年提出,先后有罗素(Russel)、斯特劳森(Strawson)和肯普森(Kempson)等人著书讨论过这个问题。利奇(Leech)在 *Semantics*(1974)一书中将其作为语义学研究中的一个相关概念进行了讨论。莱文森(Levinson)(1983)将其运用于语用学研究。在交际过程中,预设表现为一种推理关系,它以话语中的某些词句为基础进行推理,这些能作为预设基础的词句被称为预设触发语。尤尔(Yule)(1996)将预设划分为事实预设、存在预设、词汇预设、结构预设等。不同类型的预设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理论依据,如:自然语句中任何有意义的语句都能推导出一个背景假设(预设),若该假设具体体现为某一特定事实或行为,

则为"事实预设",根据其语义形态又可称为"命题性预设"(何自然 1987: 126)。由于中西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在语言表达或言语交际过程中对预设具有不同要求和规范。操汉语的人可能认为某些信息是不言而喻的前提,无须明示出来,但操英语的人却认为有必要在语言中表达出来。

预设思维是语言交际中常见的思维形态,对翻译过程中的选词择句具有理据性的阐释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若能将各种形态的预设思维与翻译实践结合起来,会有助于培养敏锐的认知关联性思维,从而对翻译过程中选词择句的心理机制和认知思维形态有个理性认识,提高翻译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戈玲玲(2002)从翻译技巧如直译、意译、替代角度结合预设进行了讨论;曾利沙(2006)结合翻译教学对预设思维的性质和语言特征及其转换形态作了进一步分类概括与分析,并指出预设思维是翻译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对翻译实践中的相关问题作出理据性说明,揭示词句选择的心理机制和思维差异与不同语言形式行文要求之间的制约关系,尤其是对语言中存在着的种种矛盾、差异和不明显的东西作出可证性的说明,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的课题。例如:

He had ***missed*** the death in the battle, ***and*** his heart was ***bitter*** within him. 他(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因未能战死沙场而内心十分痛楚。(第十二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英译汉参考译文)

译文"因未能战死沙场而内心十分痛楚"表达的是直接因果关系,隐含一个信念预设,即加里波第将军在此次战斗之前就有"**能够**"战死沙场的强烈愿望,此译产生一种不合情理的信念预设。爱国将士希望为国捐躯,战死沙场,表现的是一种无畏气概,然而又有哪位将士内心希望自己**能够**在某次具体战斗中战死呢?何况是一位深谋远虑、肩负民族独立使命和重任的将军。从一般信念系统看,原文 and 连接的两个分句之间实际上是两个相互矛盾的小命题,隐含一种转折关系,前者在语义上并不直接从属于后者,这种关系强调的是说话者的某种信念或态度:在残酷激烈的战斗中**虽然**没有战死沙场(本是值得庆幸的事),**可**他内心却感到痛楚?为什么?原文在这里是要表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一连串难过、沉痛、痛楚、悲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

改译:他虽未战死沙场,然而他此时难过、沉痛之心有加。

(曾利沙)

描写 description

指用语言、文字、符号、图案等再现对象状态,或将主体头脑内的意象显示出来,是翻译研究的方法之一;目的是从纷纭的语言现象和复杂的翻译过程中寻找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客观地将它们表现出来。翻译研究中的描写侧重于语言事实、"翻译现实"以及社会需求和反馈等,其目的是对被描写的事物有一个准确的、理性的认识。描写不应带有感情色彩。如严复《天演论 · 译例言》中对西文句子结构的客观描写及翻译对策:"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支,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转引自罗新璋 1984: 136)语言的描写带有更多的参照性。严复在以上对西文的描写(前两句)中用了表示或然性的字眼:"多"(随举随释)、"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至于后面两句,严格地说已不是描写,而是议论了。描写是解释或论证的基础,而解释或论证又将进一步推动更高层次的描写,然后作出新的解释或论证。

描写性翻译理论以翻译和翻译活动为对象,对被描写的对象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预测性,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特点,但它的理论目标不在于"指导实践"。

翻译描写方式 ways of translation description

适当的描写方式是翻译描写的必要前提,可以使描写的结果趋近翻译活动的事实。描写翻译的方式通常有共时的对比描写、以统计为基础的共时和历时描写、历时的对比描写、历时的译史描写以及共时和历时的翻译批评描写等五种。原作与译作对比是最常见的共时对比描写形式,也可对比同一时期不同原著的译本。对比须检视译者署名、著者姓名、译书序言等译本正文之外的部分。运用统计可以共时地描写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也可以比较不同时期的翻译活动。统计应该是多维度的,可以比较不同学科、不同年份、不同国别的译书数量。历时对比包括对同一原著在不同时期内出现的不同译本进行对比以及对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内所译的同一原著或不同原著的对比,还可以比较不同原著在不同时期内的译本。历时的译史描写以史论结合的方式,阐述各历史时期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因素,为其他翻译描写提供文化背景;这种描写还包括对翻译发起者、操作者和出版机构等的描写。对翻译批评的描写为文化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补充性的侧面,共时的批评描写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一种翻译行为或现象;历时的批评描写能使结果更准确。(范祥涛 2004)

(贺显斌)

翻译描写对象 objects of translation description

翻译描写涉及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制约翻译的目的语文化、翻译目的、翻译批评、译本的细节以及翻译的社会功能和目的语文化的变迁。各描写对象在逻辑和时间上不具有优先性。描写目的语文化可通过对比分析和确定制约翻译的各种参数进行,这些参数有意识形态、哲学观念、伦理道德、政治经济、权

力关系、文学规范等。翻译目的上承社会文化，下启翻译的选择；有基本层次和最高层次之分，两极之间还有中间层次，不同层次目的的描写应是多视角的，须相互参照；译者的行为并不都有意识和理性，只有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翻译选择才蕴涵翻译目的。细节对比是深入描写的必要条件，但对比单位的确定并非易事，价值判断也是翻译描写无法避免的；如将翻译操作区分为常规性和非常规性，比较单位的选择尤其要关注后者，因为它更能反映语篇外因素的制约作用。对翻译批评的细致描写可发现文化对批评的制约及翻译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摆脱规定性能使批评更符合翻译现实，对比与历史文化的相互映射是批评的基本原则；批评不应局限于错误分析，而需确认各种推移的内在原因。目的语文化变迁总是呈现出多维性和复杂性，因而也最难把握，依据翻译中所涉及的其他层面的描写结果，进而描写特定历史时期的主导文化因素的演变则完全必要，也切合实际。（范祥涛 2004）

（贺显斌）

排中律　law of excluded middle

亦称“拒中律”“不容间位律”，是普通逻辑的四大规律之一。它要求人们在作出判断的时候，必须有所断定，不能无所断定，也不能对互相矛盾的可能问题都加以否定。其恰当的公式为：某物或者是 A 或者是非 A，无第三种断定的可能。

即对于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断定都要有明确的“是”或“非”，不允许出现含混不清的第三种思想。它和同一律、矛盾律不同，从一个新的角度要求思维的确定性，排除两个矛盾判断之间的中间者，故称排中律。排中律的主要作用是排除模棱两可的思想。比如，当人们在辩论过程中，对于同一事物在同一条件下双方作出互相矛盾的断言，这时排中律要求两者之中必须确定其中之一，不允许两可或两不可，以便使人的思维有其明确性。例如，有的书上说：“合成名词并不是所有语言都有的，而只是日耳曼语言的特点。”对于这一判断的真伪，可通过上述公式，用实践检验之：同书提及的 steam engine（蒸汽发动机）和 diesel engine（柴油发动机），中英文均属合成名词，即有“第三种断定的可能”。因此，上述判断违反排中律，不能成立。

界说　definition

参见“定义”

推理　inference

人类特有的心理活动，从至少一个命题推出另一命题的思维形式。这种思维形式是建立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经验和认知的基础之上的，离不开人脑和人们所生活的外部世界。语言理解所涉及的推理既离不开语言本身，又和语言以外的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翻译过程是一个明示-推理的交际过程，离开了推理，这种交际就不能成功地进行下去，译者就不可能正确地传递原文作者的真实意图。推理支撑着翻译过程的正常进行，只有满足了一定的条件，推理才可能正确，翻译这种跨语言、跨文化交际活动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也就是说，推理正确是翻译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例如：

Lights, please!

这是在学术报告厅里听到的一句话。报告人可能需要利用电影或幻灯进行某些讲解或说明。对这句话的理解和翻译，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确定报告人的真实意图：开灯还是关灯。

推理 1　大前提：The lights may be on or off.
　　　　小前提：The lights are on at present.
　　　　结　论：The lights are required to be turned off.

推理 2　大前提：The lights may be on or off.
　　　　小前提：The lights are off at present.
　　　　结　论：The lights are required to be turned on.

译者所运用的推理都是从他的认知语境中调用出来的。译者是否调用了相关信息，或者他是否有足够的相关信息直接影响着推理的成败。如果他的认知语境中有相关信息，但没有达到激活的阈限，该相关信息仍然没有调用起来，这会导致暂时的推理失误。（张荔芸等 2006）

演绎推理　deduction

与归纳、类比并列的三种推理形式之一。演绎推理有两个重要性质：1. 它是根据前提的逻辑性质进行推演的；2. 它是必然性结论的推理。性质 1 告诉我们，作为演绎推理，思维之向前推进主要依据的是前提（命题或判断）的逻辑性质。性质 2 告诉我们，演绎推理是逻辑必然地从前提到结论的一种推理形式（陈尚文 2000）。

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1986）认为推理是一种非展示性的（non-demonstrative）演绎推理过程，话语的理解过程就是语境的建立过程。非展示性推理由前提形成（hypothesis formation）和前提论证（hypothesis confirmation）组成，因而这种推理前提的命题是不完整的，前提的补全成了整个推理过程的关键。斯珀伯和威尔逊认为，演绎式为主导形式，指的就是在前提形成以及论证的过程中主要是演绎法在起作用。补全前提，也就是说，语境是不具有必然性的，因为由于人们的认知结构不一，前提的形式也就不一，同一语言信息未必能推导出同一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推理是或然性的，在推理中明示话语和认知语境构成前提，由前提按照演绎的逻辑关系推导出会话含意。孟建钢（2002）认为，认知语境由四个因素构成：1. 演绎装置中的记忆内容，即已经经过逻辑推理而获得的结论或假设；2. 具有综合目的

或用途的短期记忆内容；3. 有关世界的百科知识；4. 可以从交际场景中直接获取的信息。认知语境可分为大境体和小境体两类。大境体是逻辑境体，表示受话者运用特定的逻辑关系进行推理的能力以及关于语言能力和语言交际规约的认知能力；小境体是直接环境境体，它是短期而变化的（新信息产生时，旧信息随时有可能被遗忘）。在演绎推理时，大境体是作为表示相关语境假设的大前提（被激活的相关语境假设），小境体则是推理时的小前提（激活百科知识中相关语境假设的现时语境假设）。大境体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是认知主体的常规，使人类语言交际具有共性从而使交际得以实现；而小境体则随语言内容和认知主体不同而发生变化，但交际双方会"自动"寻求一种趋同。话语理解就是依靠由客观事实决定的普遍逻辑，通过话语和认知语境相互介入来完成的。

在翻译研究中，演绎推理能从逻辑的角度揭示译文在意义转换或意义表达过程中的关联度，对翻译过程的心理表征研究具有工具性或方法论作用，也可成为翻译批评的理论工具之一。因为翻译批评涉及争论或论证，而"能争论、能辩论的只是逻辑，所以一切争论、一切辩论都必须化为逻辑问题才有意义"（刘永富 2002：31）。在一定条件下，翻译批评必然是要诉诸常理或常情的、可推论的逻辑性论证。

逻辑 logic

源于希腊文 Logos，原指思想、言辞、理性、规律性等，作为哲学术语，起先音译为"逻各斯"。1902年，严复将英国逻辑学家穆勒（Mill）的《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一书译为中文时，将 Logic 音译为"逻辑"，但作为学科名称，则又意译为"名学"，故穆勒的这部名著被译为《穆勒名学》。1909 年，章士钊在《论翻译名义》一文中主张取音译"逻辑"作为学科名称，并在后来将其逻辑学著作名为《逻辑指要》。"逻辑"一词是个多义词，其含义因上下文的不同而不同：1. 指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如"事物的逻辑"）；2. 思维的规律性（如"论证要合乎逻辑"）；3. 指一种特殊的理论、观点（如"这是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4. 指思维的科学——形式逻辑（如"学点文法和逻辑"）；5. 指处世做人有章法（如"他的生活很有逻辑性"）。

匈牙利翻译家久尔吉（Giurgi）指出："翻译是逻辑活动，翻译作品是逻辑活动的产物。"把翻译看做逻辑活动，基本的出发点在于人类思维的共同性。思维是全人类的，不同民族存在着共同的思维；语言是民族的，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语言。对于同一事物的思维表现形式不一，语言的语法结构不一，语言表达的形式也就不一。西方翻译界重视研究"等值""对等""等效"等理论，核心是合乎逻辑的思维活动的对等、思想的对等，实际上是要求达到用不同语言反映共同的思想。乔姆斯基（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其核心是用数学公式标出逻辑主语和逻辑谓语，从而揭示深层结构怎样转化为表层结构的。转换生成语法强调语言的普遍现象，也就注意共性的研究，例如，共同的深层结构、抽象的规则系统，等等。在两种语言代码的转换过程中，这一共性就是深层语义的一致性，也就是合乎逻辑的思想内容的一致性。在翻译运思过程中贯穿着逻辑性，而译文的校验更要运用逻辑规则，许多译句的差错往往就是逻辑问题。

逻辑分析 logical analysis

指翻译时译者在辨清原文概念意义的基础上，运用判断、推理等手段，理清各概念之间逻辑纽带和关系的分析过程。其具体要求是透过各种语言现象，揭示出原文中词与词、词组与词组、句子与句子，乃至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逻辑分析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运用于翻译的各层次。译者应把握原作者的思想逻辑，力戒用自己的逻辑代替原作的逻辑。例如：For the rest, the Old Bailey was famous as a kind of deadly inn-yard, from which pale travellers set out continually, in carts and coaches, on a violent passage into the old world.（原译文：**此外，老贝利还以一种死亡客店的场院闻名于世，脸色灰白的旅客们坐着运货或载客的马车，不断由那里出发，经过暴力的过程，进入另一个世界。**）原文中有多处描写死刑犯受刑前乘囚车游街示众去刑场，道路坑坑洼洼，车辆颠簸，所以 violent passage 译为"经过一段颠颠簸簸的路程"才合乎逻辑。参见"逻辑校验法"

逻辑素 logeme

指翻译中逻辑活动的单位，是体现翻译模式的动态概念。之所以说它是动态的，是因为它的范围随语篇层次的不同而不同。但不同层次的逻辑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各自都有一个逻辑上的理由作为根据。语篇的所有系统都有逻辑素，如：内容逻辑素属于语义范畴；超语言逻辑素指语篇的文化、符号系统及历时性；形式逻辑素涉及格律、音素等一切形式方面的问题；超切分逻辑素则体现语篇的音响、音韵并反映情景变化的一些情况。逻辑素应用于翻译有四个标准：1. 语文学标准——译者是否正确判断原作的逻辑素；2. 取舍标准——译者对原作逻辑素的取舍功夫如何；3. 补偿标准——舍弃的逻辑素在译作中是否得到了适当的补偿；4. 艺术标准——译者再现原作逻辑素和安排补偿成分的艺术水平如何？

语言逻辑 logic of language

人们的思维具有一定的语言形式，例如英语、汉语、日语等。语言逻辑研究思维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东西方民族思维方式和思维角度的不同导致语言形式的不同，不同语言有各自的语言逻辑，例如，英语民族的思维反映现实要素的顺序是：某一主体→它的行为→行为的客体→行为标志。这一思维习惯造成英语句法结构的顺序为：主语＋谓语＋宾语＋

状语。这种基本句法结构又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如英语长定语和状语后置，动词时体体系十分复杂等。汉民族反映现实要素的思维顺序是：某一主体→它的行为标志→它的行为→行为客体。相应的汉语句法结构是：主语＋状语＋谓语＋宾语。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是，状语、定语一般前置，不需要复杂的动词时体体系（因为行为标志已指明在先）。这样，在翻译过程中，大多不能照搬原文结构，而须根据译文的表达习惯，对原文结构进行转换、增删和调整，其依据还是语言逻辑。例如：Take the medicine before you go to bed. 睡前吃药。（汉语将行为标志，即状语移到句前。）又如：The finest view of the whole cataract is from this point. 从这里看，整个瀑布景色最美。（本句的汉译正好与源语词序相反，按照汉语语言逻辑，先交代观察点或立足点，然后再叙述被观察的事物。句中，动词“看”字也是根据情境表达的需要而加上的。）

道义逻辑　deontic logic

亦称“规范逻辑”（normative logic），是研究包含“必须”“允许”“禁止”等表示规范的词语的命题和使用这种命题进行推理的逻辑学说。规范逻辑从一开始就与伦理的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与规范相比较，道义更具有伦理方面的含义，因此人们更多地把规范逻辑称为道义逻辑。图里（Toury）认为，规范是解释社会活动最根本的概念，是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因此也是解释文化活动（包括翻译）的关键。道义逻辑区分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行为概念（praxeological concept）；和行为有直接关系的概念，如选择、决定、渴望、自由、意愿等；规范概念（normative concept）；价值概念（axiological concept）。道义行为受规范的约束，规范本身又受价值的约束。某个规范之所以被人们当规范接受是因为它体现了或倾向用于某种价值。道义逻辑用于翻译伦理研究，有助于翻译伦理概念精确化和明晰化。

综合　synthesis

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法之一，与“分析”相对。把分析过的对象或现象的各个部分、各属性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对事物作多样性统一的整体考察，把握其本质与规律。与西方民族相比，汉民族重综合思维。反映在语言上则强调整体平衡、全面领悟、综合分析；语言方法上主张成竹在胸、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重意合，不重形合。汉语命名重统一观、系统性。例如汉语中的星球可统称为“星”，分“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等。英语虽有与“（行）星”相应的 planet，但命名其下属各星球时，均需重建，形态上毫无关联，即分别以 Venus, Jupiter, Mercury, Mars, Saturn, Uranus 和 Neptune 表示。东方人思维方式之一是天人合一，主客观和谐统一。在语言形式上经常不强调主体。如：我的法语看报很吃力。I can't read newspapers in French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又如：The thick carpet killed the sound of his footsteps. 他走在厚厚的地毯上，一点脚步声也没有。（不译“厚厚的地毯消灭了他的脚步声。”）

属性　attribute

指事物特征在人们心理中的体现，是主体的认识和客体（或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认知语言学原型范畴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区别于经典范畴理论中的“特征”。泰勒（Taylor）（1989）主张用“属性”代替“特征”，以区别原型范畴理论和经典范畴理论。这与经典范畴理论中的特征是范畴所有成员共有的概念是不同的。特征具有客观性、二分性、不可分解性、普遍性、抽象性、先天性，而属性具有主观性，多值性，可分解性，差异性，具体性和后天性（王寅 2005a：124，127）。范畴中有些成员具有这样一些属性，另外一些成员则可能具有其他属性，不存在所有成员共有的属性，而且这些属性也不仅属于这一范畴成员。经典论认为范畴特征具有普遍性，因此，各语言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语法或规则。而原型理论则认为属性不具有普遍性。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会因语言不同而有很大差异。由于不同民族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各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必然会有较大差异（王寅 2005a：127）。

考虑到语言的特殊性，在翻译时要从语言的特殊属性出发，不同语言的翻译采取相应的策略，采取符合目的语属性的翻译，而不能一概而论。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看，“物质世界是统一的，物质的统一是‘多’（多样性）和‘一’（统一性）的对立统一”（肖前等 1981：208）。作为认识对象的理论也具有相互联系、对立统一的多重属性，对翻译理论的认识也同样经历过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曾利沙（2003）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属性观出发，在对一般理论概念的界定、分类、基本属性阐释的基础上，从 15 个方面对翻译理论的属性进行了概述，并指出只有对翻译理论的多重属性逐一认识，然后才能把其各种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和达到对翻译理论的整体认识。　（曾利沙）

概念　concept

指反映对象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概念是思想的细胞，一切思想都是由概念组成的。概念总是通过语词而存在和表达的，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语词是概念的物质外壳。有时，一个概念可以存在于不同的词语之中，例如‘定义’和‘界说’指的是同一个概念；另一方面，有时一个语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例如‘逻辑’一词既可以指客观事物的规律，又可以指思维规律，还可以指研究思维规律的科学。辞典解释词语，最简单的只提示该词语所表达的是什么概念，较详细的则进一步提示该词语所表达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内涵”指“概念

中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概念的内涵是对事物特有属性的反映，属于思维范畴，并非事物的特有属性本身。……辞典解释词语，重要的方式之一是用实质提示概念的内涵”。而“外延”指“反映在概念之中的、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事物”。(杨祖希 1992)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因此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反映客观事物的特有属性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人们的认识，开始总是认识事物的外部特征。这时，人们形成对某事物的概念只是一个初步概念。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才逐渐认识到某类事物的深刻的本质，产生深刻的概念。例如，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开始停留在“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但是经过不断实践和研究，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项语言活动，而且是一项重要的人类文化活动，即翻译是按社会认知需要、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的语言文化活动。对翻译的认识还在深入下去，由此形成的概念必将进一步深化。

意一言多　one meaning, many expressions

出自哲学家贺麟《论翻译》(1940)一文：“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前者为一，后者为多。”贺麟从哲学高度概括了原文内容(意义)与译文形式(目的语)之间的关系。扩大地说，即一种意义可用多种形式表达。参见“辩证性”“多样性”

意识形态　ideology

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艺术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作为一个理论性概念，意识形态源于马克思的名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确立了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理解知识、表述与意识的形式、内容与目的，不能脱离生产的物质性与社会性活动，不能脱离阶级斗争。

意识形态是某一阶级、政党、职业内的人对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它是某一国家或集体流行的信念，包括有系统的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观。

一般认为勒菲弗尔(Lefevere)首先把意识形态引入翻译研究。他阐述了翻译的“两要素”(1992b: 14～15)，即翻译始终受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影响。蒋骁华(2003)撰文论述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多方面的影响和关系。其中包括：

1. 翻译为政治服务。例如，美国虽号称新闻完全自由，报道讲究真实、公正。但通过阅读，就能发现美国的重要媒体，如 *Time*，*Newsweek* 等在报道有关中国消息时，常有损华或抑华倾向(王祥兵 2002)，通过翻译中国的文化词语和新闻报道有意无意地向全世界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2. 影响选材。严复译书以民富国强为宗旨，选译并探究格致新理，译文取明深义。鲁迅同情弱小民族，在《“硬译”及“文学的阶级性”》中说，“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期，我国意识形态向苏联一边倒，译书绝大部分是俄文书。

3. 译者设法迎合读者的主流意识。所谓“主流意识”或“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简言之，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伦理、审美、价值观等的倾向。当原文所描述的某些事实与读者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抵牾时，译者往往舍“信”媚俗，删改事实，以求得读者对译文的接受。

4. 影响译者对原文的解读。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译者对原文的一种阐释。换言之，同一原文在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译者手里，译文差别会很大。

5. 迁就社会伦理。许钧在翻译法国作家博达尔(Bodard)的《安娜·玛丽》时，“考虑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转引自蒋骁华 2003)，删去了书中有关性的描写，因为他认为，即使他不删，出版社的编辑也会以这些描写有悖我国伦理而删去。

6. 迁就目的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当 19 世纪末福尔摩斯的故事集开始被译介到中国时，译者考虑到(或者说，为了迎合或迁就)当时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将其中的西洋美人大都改造成了中国传统美人，或添加了中国传统美人的特征。

7. 女权主义翻译观反映了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一个侧面。这一理论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feminized)的过程、原因及其负面影响，并最终动摇那些歧视女性、歧视翻译的深层结构。

将“意识形态”引入翻译研究的最大好处是多了一个新的、有效的研究视角，可以将研究焦点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从注重忠实原文转向探讨译文的变形，从语言对比研究转向翻译文化研究。(蒋骁华 2003)

解释　explanation

指在分析的基础上予以阐明。在学术研究中，解释是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以事实和现象为根据，说明含义、原因、理由等。例如，在语言学翻译理论中，对不同的语言转换方法作出解释，使人了解其原理与作用。描写使人知其然，解释使人知其所以然。总的说来，国内外翻译研究停留在规定和描写阶段。参见“描写”

辩证性　dialectic

翻译的辩证性存在于翻译活动的各要素之间：译者与原文、译文与原文、意义与形式、译者与社会、

原本与社会;等等。对于翻译实质的辩证性,哲学家贺麟(1940)表达得非常透彻:

从哲学上讲,所谓翻译又是什么意思呢?翻译乃是译者(interpreter)与原本(text)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communication),这种活动包含了理解、解读、领会、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translation),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而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亦即言与意、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言为心声,为意之形……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前者为一,后者为多。二者颇似哲学中谈论的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就此理解,意与言、原本与译文应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某一真意,可用土语向本乡人传达,亦可用京话向国人传达,可用文言与白话向旧、新人传达,亦可用英、法、德文向异邦人传达。

这里,哲学家用体与用、道与器的辩证关系来说明翻译的本质;用一与多、意与形的辩证统一来说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说明翻译以表达原文的“一意”为准则,因为译文是原文的一意的不同形式。在谈到翻译活动与社会的关系时,贺麟在《论翻译》(1940)中又说:

翻译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华化西学,使西洋学问中国化,灌输文化上的新血液,使西学成为国家之一部分。……这乃正是扩充自我、发展个性的努力,而决不是埋没个性的奴役。……翻译为创造之始,创造为翻译之成。翻译中有创造,创造中有翻译。

这里把翻译与发展、翻译与创造的辩证关系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在翻译实践中经常碰到信与顺、雅与俗、神与形、异化与归化等几对矛盾,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联结,又相互排斥、相互对立,是辩证统一、相反相成的,运用辩证法可帮助译者处理好这一对对矛盾。

翻译哲学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张今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认为:研究一般翻译和文学翻译所遵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翻译哲学。翻译哲学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我们的翻译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研究一般翻译和文学翻译时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翻译科学和翻译艺术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是不可分割的,两者必须接受翻译哲学的指导。

翻译哲学是系统化和理论化了的翻译观。翻译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译者思维同翻译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翻译是一种有意识的定向活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每时每刻都在处理思维与原文世界、译文世界乃至两个世界背后的作者世界、读者世界以及文化领域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处理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翻译的目的是否达到,翻译的价值是否得以实现,译者的意图和读者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在观察翻译现象和处理翻译问题时,翻译哲学提供一般的指导原则,特别是对翻译的方法论原则。

翻译原型　translation prototype

最典型的翻译活动,翻译范畴的中心成员。具体说来,翻译原型指一定文化一定时期的人都接受为是翻译的翻译,也可以是一些经典翻译的范例或人们心目中最理想的翻译,如钱锺书所说的达到“化境”的翻译。从翻译类型看,语际翻译是翻译范畴最中心的成员(Halverson 2000: 13);从翻译标准看,翻译原型指既完全传达出原文的意义和形式,又符合目的语规范的翻译;从翻译方法看,如本雅明(Benjamin)所言,“《圣经》的逐行翻译译本是所有翻译的原型或理想”。不过本雅明所指的是一种“理想的”逐行翻译,在这种翻译中,极端的字面译法不仅没有使原文的意义变得含糊不清,反而使之有所加强(Shuttleworth, Cowie 1997: 82)。翻译原型最能体现“翻译之所以为翻译”的本质特征,可以作为区分翻译和非翻译的认知参照。某项活动如果与翻译原型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就可以归入翻译范畴;如果与翻译原型偏离太远,则不属于翻译范畴。另外,翻译原型也可以作为决定各种各样的翻译活动的范畴属性的参照。在翻译范畴内部,除了典型的翻译(即翻译原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翻译活动(即非典型的翻译),这些翻译活动主要体现了翻译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属性,与翻译原型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因此在翻译范畴内具有不同的成员地位。而关注某种类型的翻译,或突出翻译某一方面的属性的不同视角的翻译研究在翻译学本体意义上可以被认为具有不同的译学价值。　(龙明慧)

16. 思维科学

双文　bi-text

指1988年哈里斯(Harris)在其所著的 *Bi-text, a New Concept in Translation Theory* 中使用的一个术语。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原文和译文共存于译者的思维。”当然,随着原文不断地向译文转化,双文现象逐渐淡化。因此,哈里斯又把双文现象比作“两种不同颜色原料的交互相叠”,从而说明了原文和译文在翻译过程中的互映。

可操作性　serviceability

思想含有明确具体的运作目标和可掌握的运作规则程序,从而具有可使人们通过学习掌握其运作规则程序而达到预定目标的性能。可操作性是思想具有的一种性能。思想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1. 该思想含有具体明确的运作目标作

为操作活动的纲,否则操作活动就是无方向、无序的,因而也是无效的;2. 该思想含有人们通过学习能够掌握的运作程序规则作为操作活动的规范,否则操作活动就没有有效的保证,就会偏离目标,就要中途中断。可操作性是思想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思想能否变成现实,不仅要看它是否正确和是否深刻,而且要看它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较之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更能够广泛传播。例如,通过英汉语对比,可以找出一些翻译的运作规则程序,它们具有可操作性。

同构 isomorph

指人类意识相通的基本的思维结构机制,是操不同语言的人能够通过语际转换,进行思想感情相互传递的基本条件,即存在着信息转换的共同通道。同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如照片和被拍物体之间;2-4-8 和 16-32-64 两组数字之间,皆因具有相似关系而成为同构体。同构现象在几乎所有的语言层次上也存在,例如:"John hit Bill with a snow ball."和"The paroled thief struck the poor old lady with a heavy club."这两个句子就因行为执行者、行为、行为承受者和工具的组合方式相同而存在同构关系。在翻译上,同构强调的不是形式上的相似而是功能上的对等。即奈达(Nida)所谓的功能同构(functional isomorph),例如,英语成语 to grow like mushrooms 与汉语"雨后春笋般地成长"属功能同构。

同构适用于翻译,是可译性的理论依据。所有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认知对象都是同一个客观世界,都具有相似的生物基础和思想基础、相似的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因而具有一些关于客观世界的共同知识,并具有一些共同的思维方式。在操某种语言的人们头脑中关于客观世界的概念不会与操另一种语言的人们的概念在本质上相违背,语言之间的翻译因此才成为可能。操不同语言的人具有共同的认识依据,即他们认知的物质基础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可以使他们在各自的头脑中构成一个疏略的但基本相同的概念系统框架。这就是思维认识论上的同构原理。

先结构 prestructure

由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首先提出。现代阐释学告诉我们:由于人的一切活动都必然受着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人们理解任何事物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而是以其固有的意识去积极地参与。翻译的过程首先是译者接受"本文"信息的过程。但是译者决不是被动地接受。他通晓源语及目的语,并掌握了其一定的文化历史结构,因而他具有一定的 R_1 和 R_2(分别为源语读者和目的语读者)因子。但除此之外,他还更有自己的立场、观点、趣味和风格,也就是他的"主观性"。这三个因素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译者独特的先结构,更准确地说,译者的先结构实际上是受制于 R_1 和 R_2 的主观性。不管译者是否意识到,是否承认它,这种先结构总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且十分活跃。当译者接受"文本"时,其先结构便开始同原信息相互作用,将其具体化,而译者最后所感知的信息就是这种相互作用后的具体融合信息,也就是说,原信息发生了不可避免而又十分微妙的形变。

论域 universe of discourse

亦称"(话语)全域""论述全集"或"文化万象",指特定的思维过程所涉及的事物的范围。一般指特定群体的成员共同具有的概念、思想、意义和观点的总和,是演绎逻辑中使用的分析工具,也常见于语言学、哲学、数学等其他学科。在翻译学中,论域指特定文化在一定时期所特有的事物、概念、信仰和习俗等内容的总和。翻译策略深受译者对原作所表达的论域和目的语社会论域的态度的制约,而这种态度又取决于原作的地位,不断变化的目的语文化的自我认同感,目的语中某些文本类型和措辞的可接受度,目标读者的特点及读者所习惯的行为模式。原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地位低,翻译的自由度就大;自我认同低的文化喜欢翻译更先进的文化;体裁与主流的一致,则译作更受欢迎;面向的读者不同,翻译方法自然也不同;如果原作中含有目的语社会不习惯的行为模式成分,将对译者构成很大的挑战(Lefevere 1992a: 87~98)。 (贺显斌)

模式 model

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即事物、实践活动或动作的定型样式。模式分客观物质模式(如作为样本的典型事物)和主体意识中的模式。人们在认识一个事物时,总是把事物符合的模式程度作为评价它的依据。意识中的模式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数据模式,一类是思维模式,它们可以是字符形式,也可以是形象形式。翻译理论中的基本模式,如语义模式、转换模式、情境模式等均属思维模式一类。参见"翻译模式"

思维 thinking

指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脑科学的研究表明,思维是人脑神经元中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运动形式的综合,是一种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人体内承担反映机能的物质运动表现为意识活动,它有感性活动与理性活动之分,对客体深远区层的穿透性反映即思维属于高级意识活动范围,因此思维又可说是发生于人脑中的理性意识活动。理性意识对客体深远区层穿透反映的决定性环节是实现对处于客体深层的质性规定(本质)的反映。

思维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思维的人类性是翻译得以实现的基础。共同的思维能力和思维规律使不同民族的人民对相

同的事物可能取得共同的认识。另一方面,思维反映现实和语言不可分割地联系着。一般地说,不论从思维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还是从认识的逻辑过程来看,不仅思维依靠语言表达,而且就其形成来说一般也得借助于语言。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是语言的思想内容。在双语转换过程中,翻译客体(原作及其作者)和翻译主体(译者)之间的沟通靠的是共同的思维规律,必须取得共识的是思维内容。所以,思维活动在翻译过程的心理机制中占有中心的、主导的位置。思维活动的规律及其内容制约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

思维发生于人脑,但它一旦发生,又可以扩展于人脑以外的和人脑结构具有某种相似(可能不完全相同)的物质。计算机、智能机和某些灵长类动物可以具有人类思维的某些功能就是证明。但是机器的思维、动物的思维不能和人的思维相提并论,前二者是模拟性思维,后者是原发的思维。三者的物质能量结构、功能和发展程度很不相同。20世纪,计算机的发明和灵长类动物的思维训练实验结果扩大了思维的概念。

思维广度 range of thinking

指在思维过程中所展现的视野,包括视野的大小、广狭、宽窄。凡是在思考问题时表现出大、广、宽的视野,能思考到问题的各个方面、各种联系,能从各个角度来认识一个问题或对象,能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态来思索对象,就叫做思维有广度性。发散思维、聚合思维、整体思维、过程思维和开放型思维等,都是思维广度性的表现。如果在思考问题或对象时表现出小、狭、窄的视野,不能思考问题或对象的各个方面、各种体系,不能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时态来思考问题或对象,就是思维无广度性。思维的无广度性表现为线式思维、单向思维、片面思维、静态思维和封闭型思维等。

思维习惯 thinking habit

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中谈到"模仿"(imitation)时,就认为"模仿发端于[人的]幼年,但却对今后的人生影响深远,并最终形成习惯(habit),构成'第二本性'(second nature),进而影响[人的]身体、声音乃至心智"(Plato 1992: 27)。显然,柏拉图所指的"习惯""第二本性"已经构成了"思维习惯"形成的基础。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用希腊字 hexis 表达与"思维习惯"类似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与"惯习"(hexis)紧紧相连的概念就是"定势"(dispositions),也就是说,处于不同社会层面,具备不同"定势"的人都有其"各自合理的方式反映现实"。而年龄(小孩儿、中年人、老年人),性别(男、女),民族(斯巴达人、帖撒罗尼迦人)等等因素都会对"定势",也即是对"惯习"产生影响(Barnes 1984: 2246)。在布尔迪厄(Bourdieu)看来,"思维习惯"构成了人的实践行为的核心,它处于客观环境、历史、人的心理倾向三者互动关系的中央,从而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使人们能够全面地看待人类行为。那么究竟如何定义"思维习惯"呢? 简单来说,布尔迪厄认为它就是"构成体系的定势"(Bourdieu 1993: 18)。但这样的定势绝非如乔姆斯基(Chomsky)所说的"语言能力"一样天生而来,自在于每个常人的头脑之中,而是要通过"显形的或隐形的习得"才能获取;同时其作为"一种生成机制[在实践层面]发挥作用"(Bourdieu 1993: 76)。如此一来,"思维习惯"就"引发出富有意义的实践,并生成赋予意义的理解"(Bourdieu 1986: 170)。因此,从其功用来说,"思维习惯"作为一种"转换机器"而存在:而发掘其本质,它既是"一种结构化的结构(a structuring structure)",又是"一种被结构化的结构(a structured structure)"。汤普森(Thompson)在为布尔迪厄的《语言与符号权力》(*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一书所写的前言中对"思维习惯"的定义做了很好的总结:

> 思维习惯是一系列导致行动者以某些方式开展行为以及有所反应的定势。这些定势在不受任何"法则"有意识地协调或制约的情况下生成"常态的"实践、理解和态度。构成思维习惯的这些定势是被反复灌输而来,是结构化的、持久的生成性的以及可变型的——所有这些特征都有必要进行简要的探讨。这些定势的获取是一个长期的教与学的积累过程,其中早期孩童年代的经验尤其重要。经过大量的日常教学,比如有关餐桌礼仪的内容("坐端正","不要狼吞虎咽"等),个体就会习得一套能够真真切切造就人并构成第二本性的定势。(Thompson 1991: 12)

这些生成的定势显然是被结构化的,因为其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习得过程中的社会环境条件。

"思维习惯"作为"认知"和"社会"视角的二维融合,充分彰显译者本身对翻译行为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内化为译者本身的性情,"思维习惯"直接影响到译者对翻译的理解、态度乃至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这补充了以往描述翻译学侧重"规范"影响下的翻译框架,认为翻译行为的诱因可能并不仅仅在于外部因素的干预,也可能是源自主体自发的行为。透过"思维习惯",我们能够看到译者违反"规范",体现"多变性""创造性"乃至充分进行"个人发明"的可能性,从而为更全面地解释翻译这一多元、杂和系统中涵盖的各类现象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当然,在分析"思维习惯"对译者的影响时,也应力图避免庸俗决定论的倾向。(邢杰 2007)

思维内容 thinking content

指思维主体在思维活动中加工、处理的一切信息和知识。思维内容决定于思维主体在社会实践中所接触的思维对象。在人的思维活动中,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一定的思维内容

决定一定的思维形式的运用。文艺翻译工作者表达艺术思维的内容,一般主要用形象思维的形式;翻译理论工作者表达科学思维的内容,主要用抽象思维的形式。表达思维内容必须用适当的思维形式。正如别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所说,哲学家用三段论说话,诗人用形象和图画说话,如果用抽象思维的形式来表达诗歌的内容,就不会产生优美的意境。

思维方式　mode of thinking

指体现一定思想内容和一定思考方法、适用于特定领域的思维模式。对于同一思维内容,不同民族的思维角度可能不一致。如汉语表示"做一件事得到两方面的好处",有一成语为"一举两得",如改用形象的说法,可说"一箭双雕"。相应的英语成语为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石双鸟),德语为 zwei Fliegen mit einer Klappe schlagen(一个拍子打两只苍蝇),法语为 faire d'une pierre deux coups(一块石头打两处),俄语则为 одним выстрелом убить двух зайцев(一枪打死两只兔子)。这里,思维内容是十分接近的,都要表示"用一种工具达到两个目的",只是思考方法不一样。思维上的这些民族特征从语言差异上反映出来。这种差异靠语言本身的规则是解决不了的,只能靠研究民族文化和与此相关的不同思维特点去解决。对于个体来说,思维的人类性是共性,民族性亦是一定范围内的共性。译者用自己的思想把握外部世界,形成自己的认识,并由此形成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外化表现。但是,译者个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总是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也受到个体差异的制约。在翻译过程中,他还受到原作风格和原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而且,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同样的社会条件下,译者受教育的状况、他的实践水平和认识能力、他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他的思维方式和认识工具,乃至他的生活和心理状况等,也都是制约他的思维的重要因素。

西方思维方式　Western thinking mode

西方思维方式是西方文化精髓和内核,并显现为西方人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较为稳定地表现出来的致思取向、思维特征与思维格局。就其基本特征而言,西方思维方式大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崇尚自然,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致思取向。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识的学术传统。在西方文化中,以自然为研究对象,就是把自然作为与人相区别,外在于人的独立的客体来研究,着重探讨自然界的独立规律,寻觅认识自然、把握自然的方法和途径,与此相联系,研究自然的学术活动,基本上是一种纯粹为了追求知识而探索自然的奥秘,不把自然与社会伦理相比附,不从现实的利益需要来看待自然。表现在哲学上,就是西方古代自然哲学的发达,许多大哲学家同时就是大科学家,反过来也一样。第二,实证性、局部性、精确性的思维特征。把握客观化的自然,在思维上必然要求实证型的演绎,这带来了西方实证科学的发达。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古代思维,以天然纯朴的形式出现,自然界被当成一个整体,而不是从细节方面加以考察。人们受这种朴素的、直觉的思维方式的支配,并以这种思维方式来猜测有关宇宙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图景。这种思维方式重视观察和实验,强调例证和归纳,体现了近现代经验自然科学的最根本的特征。不过,随着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征亦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如实证原则和精确性在许多科学领域中(特别是在微观物质领域中)得不到支持;而只看局部情况的思维方式,亦容易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妨碍了对世界的全貌和事物间总体联系的把握,因而,20 世纪的西方思维方式,开始衍生出一种实证性与规范性、局部性与整体性、精确性与模糊性同时并存、互为支持的新特点。不过,在这种互为补充的思维特征中,主导的方面仍然是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所谓规范性、整体性与模糊性只是对前者的限定与补充。第三,强调逻辑思维,重视理论体系的思维格局。西方的逻辑传统发端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传统形式逻辑的奠基人,形式逻辑的三大规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都是由亚里士多德奠定的。现有形式逻辑的许多内容,在 2 000 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即已具备,近代以后,以培根(Bacon)、穆勒(Mill)为代表的归纳逻辑,弗雷格(Frege)、罗素(Russell)为代表的数理逻辑以及此后公理逻辑、形式逻辑的迅速发展,表明逻辑思维乃是西方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与此相联系,逻辑思维的传统也引起了建立理论体系的兴趣。由于西方文化把聚焦点投射于自然界,在探索自然界奥秘中以"求知""爱智"为目标,追求理性的享受,因而知识发展很快,各种理论体系像一个个螺旋上升的圆圈,绵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在西方思维方式中,自古希腊以来就重视构筑理论体系的传统,这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一种思维格局。这种格局,对于知识的完善和理论自身的发展,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东方思维方式　Eastern thinking mode

东方思维方式产生于东方古代社会,是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以较稳定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致思取向、思维特征与思维框架,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大致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 天人合一的致思取向。在东方哲学中,人天关系为各种哲学思想所极为重视,被作为一切哲学问题的基础而提出。与西方哲学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实行人天二分,对自然界抱着纯客观主义立场加以看待不同。东方哲学对自然界持有一种疏远的态度,既缺乏关于客观自然界的秩序的观念,又存在着各种脱离自然规律的玄想。由于文明发展的地域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的限制,东方哲学大多以社会的伦常规范比附外在自然界的客观秩序,以人伦化的自然取代客观化的自然;2. 直觉内倾的思维特

征。由于东方哲学在致思取向上的人伦化特征，导致它在思维方法的运用上存在着典型的直觉内倾化倾向。对泛道德主义的自然的把握，要求的则是某种心灵的内在体悟。东方哲学普遍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宇宙整体观，把自然看做是多元的，即由众多的实体构成的神人一体的宗教物，倡导以内省体验的方式把握对象，这也导致了知识论演绎体系的贫弱；3. 普遍的自我优于个别化的自我的思维格局。由于东方哲学在致思取向上的泛道德主义与思维方法上的直觉内省特点的影响，东方哲学在论证社会时表现出来的，大多是一种扩大了的类概念自我，既缺乏自我与他人的区分，也较少注意到个别自我的存在。非主体性价值自我与泛和谐化价值目标，成为东方社会伦理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不断扩展，进而转化为思维方式层面的东西的一个重要表现。不过近代以来，在东方思维框架中不断地在吸纳崇尚科学、重视理论的思维特征。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thinking modes

东方包括许多国家，这里主要讲中国。其实，在亚洲，中国的思维方式跟日本或别的国家有差别，但是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相对欧洲和美洲，有它的共性。东方思维方式，特别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受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在儒家哲学体系里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是修身，也就是讲究道德文化。而西方是基督教文化。东方文化重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相通，强调人的社会伦理生活，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并不像早期中国人那样，由于地域限制和灾难性气候的威胁而产生某种疏远和对立的情绪。由于地域条件的优越，古希腊人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又由于手工业生产、商业和航海业的实际要求，引起了天文学、气象学、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形成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的思维传统。具体来说，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 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比如中医和西医，中医强调整体，辨证论治；西医从解剖学的角度，重视整体中的局部。在中外日常交往中，中国人以客随主便为礼貌，而西方人很少说“随便”；2. 在义利关系中，一般来说，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中国人常说人生四大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对于“他乡遇故知”，西方人表现淡漠；3. 求同思维与求异思维。汉民族哲学上强调“和为贵”“求同存异”或“求大同存小异”。而西方比较主张标新立异。求同思维是遵从传统的逻辑规则，沿着单一或归一的方向步步推导，以获得某种答案的思维模式。求异思维则是不拘泥已有的经验或规则，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出发寻求各种各样解决办法的一种思维模式；4. 意会性和直观性。汉民族作文、言谈喜欢含蓄、意会，西方人更多是直观性。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十八里相送”用那么多的暗示来表达爱情，而不说“我爱你”。音乐中有所谓的“此处无声胜有声”，在文艺作品中以描写的细腻和深沉为美。

思维方式是客观形成的，总体上说，无所谓孰优孰劣。既然东西方思维方式有差异，就有互补性。翻译的任务不但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而且要引进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法　thinking method

广义而言，指人类在理性认识中认识客观事物的一切方法；狭义而言，指抽象思维过程中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分析与综合被认为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法。在人们的具体思维过程中，还要运用一些更具体的思维方法。比较、分类、抽象、概括和具体化等，这些都是一般的思维方法。形象思维活动中的思维方法更加多种多样。想象与联想是常被采用的基本方法。在艺术创造中，典型化是被经常采用的思维方法与创作方法，它可以博采众长，用形象进行概括，显现同类人物和事物的本质特征。科学创造中的思维方法有聚敛、分散、逆向、顺向、等价交换、变换、合成及思想实验等许多种。

思维过程　thinking process

指主体对于客体本质的反映过程，即主体对于收到的客体信息加工变换的过程。思维过程的起点是外部信息被人脑接收，从而引起思维活动；终点是对于被认识的对象形成合适的概念和判断，作出正确的解释。译者从阅读原本接收信息到分析、解释、语言符号转换、组织、调整，再到最后信息以另一种语言的形式输出，要经过一系列繁复的程序。不过，人脑有时在极短的时间内自动地完成了这一过程，并没意识到过程的繁复；有时却绞尽脑汁，不得要领，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思维定势　thinking potence

指思维主体在思维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稳定性的倾向或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定势原为心理学术语，指由一定的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倾向性准备状态，决定后继心理活动的趋势。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存在着某种习惯性思维方式或思维状态，它对人们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产生消极影响。思维定势有时对词义理解会有影响，望文生义，造成误译，例如：

《哈姆莱特》第五场：在露台上，哈姆莱特和鬼魂相会后，他对友人霍纳旭和马西勒斯说：

Touching this vision here
Is an honest ghost, that let me tell you
For your desire to know what is between us
O'ermaster't as you may.

译文：讲到这一个幽灵，那么让我告诉你们，它

是一个老实的亡魂；你们要是想知道它对我说了些什么话，我只好请你们暂时不必动问。

原文中的 honest 是可以译为“老实的”，但它在这里的意思是 true, genuine。原译可改为：

讲到这个幽灵，那么让我告诉你们，它是一个真正的亡魂，你们要是想知道鬼魂和我说了些什么话，我只好请你们暂时不必动问。(桂扬清 2004：207)

思维结构　thinking structure

指人的意识中反映事物内部联系的由若干基本经验、概念、范畴、规律、规则组成的对事物的思考系统，即认识内容内化于人脑而形成的能参与人脑思维活动的意识系统，是一种功能结构。它在翻译活动中发挥作用，是主体翻译能力的主要构成因素。思维结构具有两种功能：认识功能和实践功能；对于译者来说，即为理解功能和表达功能。一定的思维结构是译者认识和适应外部世界，从事翻译工作的基本条件和手段之一，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认识的发展、新知识的加入，原先那个思考系统得到充实或更新，使得思维结构更加完善。

思维深度　thinking depth

指思维能够揭示现象的本质及现象间多种内在联系的程度。现象背后的本质是多层的，本质之后还有更深刻的本质；现象之间的联系是多方面的，有的明显，一眼可见；有的联系则要经过深入思考才能发现。思维深度就是思维活动揭示事物本质的级层和揭示现象间联系的广泛程度。思维深度是主体思维能力的最重要的表现。具有一定深度的思维，可以深刻地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科技工作者有了一定的思维深度常常可以导致发明与科学发现。在译论研究中，研究者有了一定的思维深度，也可有所开拓，有所发现。

思维模式　thinking model

指人脑的思维内容和思维方法的统一，它既是以往思维活动的结果，又是思维进一步运动的前提和起点。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特定的思维模式占主导地位。思维模式的更替必将导致科学革命和哲学变革。思维模式是人的思维能动作用的关键问题。人们总是依据过去有关的全部知识和经验，利用已有的思维模式去认识当前事物。人类思维的能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从个别到一般的形成思维模式的过程和从一般到个别的运用思维模式的过程。一个民族思维模式的形成是在该民族长期的哲学背景、文化传统下确立的，语言在其中起着巨大的凝固作用。汉民族从总体而言表现出一种重整体、重悟性、重主体意识的思维模式，反映在汉语中，就是在造句、谋篇上形成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和模糊关系的语言结构特点，不滞于形，以意统形，削尽冗繁，辞约义丰。而西方民族的思维模式重理性、重分析、重个性，语言上讲究形式完备，诸如主谓配套、结构完整、形联意合。

思维活动形式　thinking action model

指在思维过程中处于意识活动状态的人脑反映客体的形式。主体在思维过程中反映客体的形式有结果形式(如概念、判断、经验、艺术形象，等等)和活动形式(如推理活动、想象活动、直觉活动，等等)，思维活动形式即指后者。基本的思维活动形式有三种，即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茅盾说过：“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与想象”(转引自罗新璋 1984：513)，这种“思索与想象”不外乎逻辑思维或形象思维。钱学森把逻辑思维学、形象思维学、灵感思维学合称思维学，认为这些是思维科学基础科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见，思维活动形式的研究是思维科学最关键的研究内容之一。

人脑思维　man's brain thinking

指人类直接运用自身的思维器官——脑进行的思维活动。对应于非人脑模拟思维，包括机器模拟人脑的思维(人工智能)和某些高级动物经过特殊训练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人脑的思维。人脑思维与思维本来是同义词，在机器模拟人脑思维部分地实现、动物模拟人的认知活动初步得到实验证明以后，可思维物质的概念扩大了。在人脑思维之外，存在着机器和某些动物模拟人脑的思维，而且有不同于人脑思维的特点。翻译学首先与人脑思维有关。在思维研究上，可分为人脑思维直接研究途径和人工智能研究途径。这两种研究途径目标相同，即弄清思维的规律和机制，但具体方法有别。人脑思维直接研究途径又可分为脑科学途径和信息加工途径等。

开放式思维　open-minded thinking

指没有固定思维空间与思维框架的思维。开放式思维具有以下特征：1. 思维不固定于某一对象领域，主体适应着环境的变化，随时扩大或变换对象领域；2. 不只吸收本对象领域的信息和知识，而且还吸收其他各种领域的相关信息和知识用来解决本对象领域的问题；3. 思维不局限于某一框架之中，能够突破既定的框架进行思考。译学是一个开放系统，但也不是漫无边际地涉及一切其他领域；它需要通过开放式思维从相关领域中吸收信息和知识，但又应保持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开放式思维应能打破原有的不适应实践和理论需要的对象领域和思维框架，在广阔的思维空间寻找并吸收支持学科发展的新信息、新知识，探索新的思维框架，最终找到适合需要的对象领域和思维框架。

立体思维　three-dimensional thinking

亦称“整体思维”“空间思维”。在时空四维中，对认识对象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学科、多手

段的考察、研究，力图真实地反映认识对象的整体以及和周围事物构成的立体图形的思维形式。它反映认识对象在一定时空内的外在或内在结构、位置、网络，以及这种结构、位置、网络运动变化的立体形态或全息轨迹。立体思维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立体思维指含长宽高的空间三维思维加上时间的四维思维，是最简单的、最经典意义上的立体思维。广义的立体思维指含有时空四维在内的多侧面、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的系统性、完全性或整体性的多维思维。立体思维具有鲜明性、具体性、开放性、层次性、多维性、联系性、系统性、整体性等内外特征。立体思维是辩证思维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发散思维 divergent thinking

指思维主体在展开思维活动时，围绕某个中心问题，向四面八方进行辐射状态的积极的思考和联想，广泛地搜集与这一中心问题有关的各种感性材料、相关信息和思想观点，最大限度地开拓思路，从而导致一系列相关的发明与发现的一种思维品质。中国晋代文论家陆机说的“精骛八极，心游万向”，指的就是文艺创作起始阶段作家们所进行的发散性思维。发散思维是进行发明创造所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可以拓展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如“风筝有什么用途”这一问题，如用发散思维思考答案，除了“风筝可以放到空中玩”这一答案外，还可以有“用来测量风向”“可以传递军事情报”“当射击的靶子”“在雷雨天作雷电试验”等答案，以此引发产生一些新的科学设想或学术观点。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常常是并用的。一般来说，在充分进行发散思维以后，再进行收敛思维，选择并确定解决中心问题的最佳方案或最优措施。

创造(性)思维 creative thinking

指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有创新意义的思维，是一种高度发展的思维形式，是人的创造力的核心。主要特点是：思维形式的反常性，思维过程的辩证性，思维空间的开放性，思维成果的独创性以及思维主体的能动性。1. 思维形式的反常性经常体现为思维发展的突变性、跨越性或逻辑的中断，因为创造性思维主要不是针对现有概念、知识的循序渐进的逻辑推理的结果和过程，而是依靠灵感、直觉或顿悟等非逻辑思维形式；2. 思维过程的辩证性，主要是指它既包含有抽象思维，又包含有形象思维；既包含有逻辑思维，又包含有非逻辑思维；既包含有发散思维，又包含有收敛思维；既有求异思维，又有求同思维。两两之间分别构成对立面，既相互区别、否定、对立，又相互补充、依存、统一，由此形成创造性思维的矛盾运动，推动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思维过程的辩证性又经常体现为创造性思维的综合性，即创造性思维实际上是各种思维形式的综合体；3. 思维空间的开放性主要是指创造性思维需要从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考察问题，而不再局限于逻辑的、单一的、线性的思维，由此形成了发散思维、逆向思维、侧向思维、求异思维、非线性思维及开放式思维等多种创造性思维形式；4. 思维成果的独创性是创造性思维的直接体现或标志，常常具体表现为创造成果的新颖性及唯一性；5. 思维主体的能动性表明了创造性思维是创造主体的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创造性思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一般认为，人们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切对创造成果起作用的思维活动，均可视为广义的创造性思维。狭义的创造性思维则指人们在创造活动中直接形成创造成果的思维活动，诸如灵感思维、直觉思维及顿悟等非逻辑思维形式。通常人们讲的创造性思维多指狭义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的活动过程一般包括准备期、酝酿期、豁朗期、验证期四个阶段。

形象思维 figurative thin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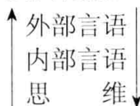
指以形象为主要思维手段的思维活动。形象思维包括以下方面：1. 把握对象的形象特征来识别对象。不仅识别对象的表层，而且识别对象的本质；2. 把握对象的形象联系来理解、推断对象，例如闷热潮湿的暑天，使人理解到大气水蒸气的饱和，推断可能变天下雨；3. 把握对象形象的景貌、神情来描述对象，包括艺术文学的描述和科学技术的描述；4. 把握对象形象的构图来控制人对对象的操作活动，包括已有形象的复制操作和未有形象的创造。形象思维是人的基本思维活动形式之一。

形象思维也是翻译思维的主要方式。任何文体(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都需要形象思维。翻译工作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离不开用形象来进行思维活动。特别是文学翻译工作者，他们要通过形象思维来再度塑造原作构建的典型环境、典型情节和典型性格。并利用具体的形象素材，运用具体的典型艺术形式，来再现原作所体现的客观现实。科技翻译实际上也需要进行形象思维。例如，在翻译有关设备的技术资料时，未必有机会见过这类设备，即使能见到整体，也未必能将零件一一拆卸而直观其各种构件。译者就得依据原文中所提供的信息建立起总体构思，设想整套设备的构造和运行状态，然后用目的语描述出来。实际上，文学和科学都离不开形象，这正是文学和科学的会合点。现代核子物理奠基人之一、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波尔(Bohr)就是作如是观的：Niels Bohr's taste also ran to poetry. He said to Heisenberg, “When it comes to atoms, language can be used only as in poetry. The poet, too, is not nearly so concerned with describing facts as with creating images.” That is an unexpected thought: when it comes to atoms, language is not describing facts but creating images. But it is so. What lies below the visible world is always imaginary, in the literal sense: a play of images.(转引自王佐良 1986：33)“这就是说，最高的科学境界同最高的诗的境界都是只能用形象表现

的。"(王佐良 1986：33)

言语思维　speech thinking

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Вигоцкий)在《思维与语言》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语言思维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



其中内部言语是解释这一整体的关键层面，它是言语思维的独特层面，是与词语相联结的思维。外部言语中思维是由词来体现的，而在内部言语中随着词产生思维，词就消亡了。内部言语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纯粹的意义来控制的，它是在词和思维之间波动着的动态的不稳定的东西。思维的特点是整体呈现的，而在言语中则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相继展开，因此由思维向言语转化必须通过意义。从思维直接过渡到言语是不可能的，只能以一种迂回方式进行，即由思维经过意义，再经过词，在这个过程中言语和思维是密不可分、紧密相连的。翻译活动是利用语言为中介进行的交际活动，实质上是包含以上三个层面的反复推进的言语思维活动。

灵感思维　inspirational thinking

人类已发现的三种基本思维类型之一。灵感是借助直觉和潜意识活动而实现的认知和创造。它往往能导致艺术、科学、技术的新的构思或新观点的产生或发展。一般思维活动是有意识发动的被意识到的思维活动，亦即显思维活动。灵感思维过程是潜思维活动转化为显思维活动的过程。潜思维内容被意识到并转化为显思维内容的过程，就是灵感的出现。灵感思维是三维的，它与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有不同的特征：突发性、偶然性、独创性和模糊性。优秀译文的"神来之笔"，有的就是出于灵感或顿悟。灵感不是神灵之感，而是人类长期积累的智慧之花。译者的灵感来自生活体验、翻译实践、渊博的知识、语言文字修养和思维能力等多方面。从心理上讲，译者突然获得非凡的或期待已久的创造性想象或译法，从而迅速消除译笔的滞阻。由此，常带来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释然感。著名翻译家杨苡(1983)在《一枚酸果——漫谈 40 年译事》一文中如是说："有一夜，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房子里。我嘴里不知不觉地叨着 Wuthering Heights ……苦苦地想着该怎样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上接近它的字音……忽然灵感自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字！"(转引自王寿兰 1989：312)译者的灵感是一种顿悟。顿悟是对旧有的"凝集式"知识经验的摆脱，从而建立起新的形象或新的概念的组合。

抽象思维　abstract thinking

参见"逻辑思维"

直觉思维　intuition thinking

人类思维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一般认为，直觉是对突然出现在面前的事物、现象以及对所要解决的新问题的一种敏锐的洞察、天才的猜断及总体的把握。对机遇的迅速捕捉及对新现象、新问题内含价值的敏感意识即是直觉的一种表现。直觉过程有很大的随机性，不具有严格和精确的逻辑模式，但依赖各种思维手段的巧妙组合，是在人的下意识或潜意识思维水平上瞬间实现的大量逻辑思维手段和以往社会及个人的所知的高度浓缩和凝聚。直觉思维在翻译创造实践中比比皆是。有时译者面对原文，思如泉涌，一挥而就，所谓"凭感觉"翻译，这种"感觉"大致就是直觉。要想获得较强的直觉思维能力，首要的是丰富知识，积累经验，加强实践，让直觉成为把原文转换成译文的信息快车，以提高翻译效率。应该指出，直觉思维的特点在于它的敏锐性、瞬间性、洞察性和不确定性。直觉思维固然可以提高翻译效率，但由此而带来的不确定性须通过加强对译品的校验而克服。

非常规思维　informal thinking

与"常规思维"相对，其进行过程没有固定的顺序和方向，顺序可以改变，可以跨越一个或几个步骤而径直达到目标；方向可以是多变的、多元的，甚至可以与常规思维方向完全相反；采用全方位扩散、辐射的方式，在扩散、辐射中寻找并选择与目标一致的思维线路，而不是在逐步收敛中达到目标；其过程是常规思维的省略或压缩，并在潜行中进行，不能清楚、全面地显现和表示出来。由于思维方式、方向、顺序的变化，非常规思维往往可以收到创造性思维的成果，因此是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非常规思维主要有逆向思维、横向思维、发散思维、顿发思维、直觉思维、灵感思维等。

封闭式思维　confining thinking

指在既定的思维空间、思维框架中的思维。封闭式思维的基本特征是：1. 长期在固定的领域内思维；2. 长期在固定的框架中思维。封闭式思维有两种，一是自觉的有条件封闭式思维，二是盲目的无条件封闭式思维。在一定的时间内对于一定的对象领域，某种思维框架是最优的或满意的，主体自觉地使思维活动暂时固定于这一对象领域和某一思维框架，以求达到预期的思维深度，这就是自觉的有条件封闭式思维，是有益的。没有时间的限定、不问社会的变迁、无视人类认识的发展、不管新的实践要求，一味使思维活动长期固定在某一对象领域内和某种思维框架中，

这就是盲目的无条件封闭式思维，它一般是无益有害的。其进一步发展将成为具有形而上学特征的封闭式思维，其特点是：把一切事物都归结为一个简单模式；思维的一维性、直线性；只求同不求异；把演绎法夸大为绝对方法。

科学思维 scientific thinking

指认识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意识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性的思维活动。科学思维有以下特征：1. 高度的客观性。科学的使命是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科学思维就必须具有高度的客观性，要尽力排除主观性成分；2. 是围绕求得科学答案展开的思维。科学答案是针对科学问题作出的，另一方面，科学问题也隐含在科学答案之中。任何一个科学答案的作出，都会引出新的科学问题；任何一个科学答案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科学问题；3. 采取理论思维的形式。科学不能纯粹经验地思考问题，而要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对象。在日常运用中，科学思维与非科学思维相对应，其含义是指在思考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遵循科学规范得出结论，而不是主观唯心地作出判定。

逻辑思维 logical thinking

亦称“抽象思维”，指运用逻辑工具对思维内容进行抽象和推演的思维活动。客观对象总是具体的，经过思维处理而变成抽象，这是思维把握对象的一个基本方式。把思维内容予以抽象，是一切逻辑推演的前提。抽象的基本特点是：1. 对象纯粹化：客观的事物和关系都不是纯粹的，而是混杂、掺入他物、他种关系、杂质的东西，而思维舍掉其中的不纯成分，保留纯粹属于对象的内容；2. 映象清晰化：思维舍弃对象中的模糊映象，保留其清晰的映象，或者通过某种方法化模糊映象为清晰映象；3. 含义一般化：思维舍弃对象的个别、次要属性，保留其普遍属性和基本属性，用以概括表示同类对象。这三点的综合，称为对象抽象化。只有这样，才能进行逻辑推演，获得新知识。所以，逻辑思维规律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手段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是获得对事物本质特征及内在联系的认识的规律。抽象思维以概念为思维细胞，通过判断、推理等形式结构来认识世界、表达思想、证明真理。人类的翻译活动不单纯是言语活动。语言给人们以概念。译者凭借语言文字中所摄取的概念进行判断、推理、论证。翻译中正是运用这一思维方式，达到正确理解原文、表达原文信息以及检验译文准确与否的目的。思维活动贯串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抽象思维是其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思维方式。

理论思维 theoretical thinking

指按照一定的概念、原理、观点的体系对于现实对象进行思考。如理论推导，就是根据一定的理论体系及它的方法，推出的具体结论；理论计算则是根据一定的理论原理及相应的计算方法进行的运算。理论思维有以下特征：1. 在纯粹状态下考察对象，如自然科学中的理想气体等，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也是力求在纯粹状态下考察资本的运动；2. 由思想到思想的推移，有严密的逻辑性；3. 力求抓住对象中普遍的、必然的联系，通过这些普遍的、必然的联系来理解特殊的和个别的事物。理论思维对于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建构翻译学已是不争之论。问题不在于翻译实践，而在于如何超出实践层面展开理论思维，同时严密地、有针对性地、科学地进行系统的研究。

常规思维 formal thinking

指形式逻辑思维，其进程按固定的顺序、方向展开，采用逐步收敛的方式，最后导向并集中于目标，其过程可以清楚地、全面地显现和表示出来。常规思维还包括理论思维、形象思维等。

惯性思维 inertial thinking

与“求新思维”或“创造(性)思维”相对，是一种固有方式的思维，具有守前性、稳定性和习惯性。惯性思维具有两重性。在相同或相似的条件下，惯性思维使人们迅速作出反应，解决问题。在条件变化时，惯性思维使人们反应迟钝或错误、延误问题的解决。这是在已知范围内的思维活动，不产生新的知识。惯性思维活动虽然不产生新的知识，但对于培养熟练的操作技能却是必要的。某种操作技能达到熟练程度的一个标志就是只需惯性思维活动来控制规则性的动作，而不必进行求知性思考。惯性思维无助于创新。

横向思维 transverse thinking

指一种从相邻甚至相距甚远的领域取得启示的思维方法。人们在利用横向思维解决问题时，广泛涉猎不同领域，“左思右想”，充分利用“局外”信息以获得解决问题的途径。英国学者德·波诺(de Bono)将这种思维能力同眼睛的侧视能力相类比，称它为“侧向思维”。横向思维在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探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三四十年以来，翻译理论研究跳出单纯语言学方法的窠臼，吸收并采用相关的多学科领域的原则和方法，从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提出命题、扩大范畴，使理论研究更深入、更系统。横向思维引导译者头脑中贮存的知识同客观事物产生广泛的联系，不断扩展概念的外延，以扩散思维方式，寻求多个表达中心。

翻译思维 translation thinking

指双语转换过程中进行的思维。在翻译运思过程中，翻译客体(原作及其作者)和翻译主体(译者)之间能够沟通，靠的是共同的思维规律，取得共识的是思维内容。翻译思维包含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

思维,以逻辑思维为主。在任何文体的翻译中,译者的认识要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的手段反映客观现实。这就是说,译者的思维活动形式是运用他所掌握的语法概念判断句中词项与词项、句子各部分以及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以推断语义,确立总体的语义结构。除语法概念之外,翻译者必须运用他的专业知识、文化背景等认知条件,否则不能获得正确的判断与推理,不能符合规律地进行语际转换的思维活动。同样,任何文体的翻译也需要形象思维。其中,特别是文学翻译工作者,他们要通过形象思维来重新塑造原作建构的环境、人物和情节,并利用具体的形象素材,运用具体的艺术形式,来再现原作所体现的客观现实。科技翻译也需要形象思维,译者往往要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来建立总体构思、想象形态、物态或运行状况,然后用目的语描述出来。(刘宓庆 1995)参见“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

三元数据分析模式　triangulation module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对于翻译过程的研究随着“有声思维法”(think aloud protocols, 简称 TAPs)的运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 90 年代得到快速发展,其研究方法也在这 20 多年来有了很大突破。随着翻译过程研究的逐步深入,脱胎于内省法的 TAPs,因其数据的主观性特征,在某些方面难以满足人们对数据收集的严格要求。基于对数据客观性、自然性的诉求,丹麦学者雅各布森(Jakobson)和舒尔(Schou)于 1998 年推出了 Translog 软件。该软件可以在不干扰电脑文本输入的前提下,记录所有的键盘操作活动。Translog 的诞生很快受到译界学者的关注,因其实验过程具备较高的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似乎可以满足人们对实证研究的要求。然而,Translog 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所记录的是翻译行为过程,而非翻译认知心理过程。从其线性序列(linear representation)分析翻译心理过程,少不了回溯和推断,但这种推断的线索要比 TAPs 语篇提供的线索少得多。于是,这两种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研究方法,很自然地走向结合。雅各布森率先提倡这种合作,他把 TAPs 和 Translog 结合的方法归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三元数据分析法(Triangulation)。随后,阿尔维斯(Alves)(2003)主编《三元数据分析法:透视翻译过程研究》一书,他对三元数据分析法的解释是:“书中所有文章运用的方法都好比是航海时运用的三角测量定位法。假设轮船航行时通过航海图未作标记的海域,这时,就应当依据几个已标记的地点来确定此处的方位。推及到社会科学方面,本书作者均使用多种数据收集的方法,分析自己关注的问题,使翻译过程的本质问题明朗化。”(Alves 2003: Ⅶ)可见三元数据分析法源自航海技术中运用几个定点定位某一未知点的三角测量法。所不同的是,翻译过程的研究不是依靠仪器或量具来测量,而是运用多种数据来分析。因此在移植三角测量法(Triangulation)概念时,我们主张在汉语中用三元数据分析法来表述,并把运用该方法的翻译过程研究模式定义为三元数据分析模式。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运用多种数据交互验证,减少单方面数据的不足和偏误。同时,三元数据分析模式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它不限定由具体哪些研究方法组成,只要运用多元数据收集法进行研究分析,就可以算是三元数据分析。例如李德凤的研究指出,60%的 TAPs 翻译研究运用了三元数据分析模式,这里的模式大多是由 TAPs 与后期采访、问卷调查、译语文本分析组成(Li 2004)。当然,该模式也在翻译学发展的同时与时俱进,目前翻译过程三元数据分析模式的组成部分主要是 TAPs 和 Translog。(郑冰寒 2008)参见“有声思维法”

有声思维法　think-aloud protocols (TAPs)

指国内外翻译界用口语报告法的原理对译者的翻译思维进行测定的方法,其过程是: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随时将自己的思维活动用语言表达出来,通过录音机同步录下来然后进行具体的分析。比如,翻译单位究竟是词、词组、句子或是更大的单位;碰到生词,译者一开始就查字典还是先根据上下文进行猜测;如果是查字典,又碰到了哪些问题,是怎么克服的,等等。实验者用了量化的办法,让受试者将同一篇旅游手册译成英语,事后将录音材料进行整理,用符号、图表的形式形象地展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思维活动。这种方法可以准确地记录下译者稍纵即逝的“活思想”,带有实验性质,而不是译者事后的回忆,侧重的是翻译的过程而不是翻译的结果,具有较大的客观性。

17. 心理学　认知科学

心理学　psychology

指研究心理现象的本质、作用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有自然科学性质,又有社会科学的性质。人类的心理现象指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感、意志、能力、性格、气质等,它们构成了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根据心理学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客观反映都有一个思维过程——要经过认知、理解、分析、判断等阶段。翻译过程就是译者运用大脑对接受的源语信号进行认知、分析、判断、记忆,把信号客观地转变为目的语信号的过程。心理学可为译学提供阐释翻译心理活动、心理定势、译者个性的理论基础;心理结构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原文作者的创作心理;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有助于探知读者的反映与需求。翻译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双语转换活动,表现为一种心理过程——译者直接受语言信号刺激而在头脑中进行的一系列思维、想象等心理活动的过

程。心理学正是与译学的中心问题之一——翻译思维交叉而成为其交叉学科的。

心理空间 mental space

指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而构建的概念包(conceptual package)(Fauconnier, Turner 1996: 113)。福科尼耶(Fauconnier)于1985年出版《心理空间》(1994年再版),认为人们使用语言时不停地构建心理空间,产生空间里的分子及其关系。如当谈论莎士比亚的戏剧《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时,人们就可能构建了不同的心理空间、剧本空间或现实空间等。在语言使用中,人们可用Julius Caesar去指历史中的真实人物、剧本中的角色、扮演角色的演员甚至孩子的玩具人像,并且这些事物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福科尼耶和特纳(Turner)(1996: 7)提出了获得原则(principle of access)或识别原则(identification principle):"只要空间a在认知上与空间b有联系,空间a的事物a′就可能触发空间b里的事物b′,那么表达a′(触发物trigger)的用语就能激活(因而可指代)b′(目的物target)"。像使用同一种语言时构建空间一样,语际交际或翻译时译者也在构建两大空间,原文本为空间A,目的语世界或译者空间为空间B。原文本空间的事物能使译者触发自己空间里的事物。

福科尼耶(1997,1998)在心理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现象中人类心理空间的认知操作模式:概念合成(conceptual blending)。这个模式包含四个空间:两个输入空间,这两个空间之间的跨空间映射产生第三空间——类属空间(它对每一输入空间映射,即反映输入空间所共有的一些抽象结构与组织),两个输入空间部分投射至第四个空间产生合成空间。

下面举例简单说明这个模式。库尔森(Coulson)(1997)介绍了废纸球投篮游戏,这个游戏被看成是概念合成的结果。输入空间1为打篮球,输入空间2为将废纸球扔进废纸篓。类属空间所反映的跨空间影射是将某物扔进容器里,产生映射的基础是:篮球——废纸球、篮筐——废纸篓、运动员——孩子。合成空间包括输入空间1的部分投射:比分、对手、输赢;和输入空间2的部分投射:地板上的废纸篓、纸球;两个空间共同投射的部分:扔物体进容器。合成空间所产生的游戏是崭新的、创造性的(不同于投篮,也不同于扔废纸),但包含两个输入空间的部分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合成的结果因投射方式和内容而定,因而是确定的。空间理论完全可以用来解释翻译过程:原文本空间和译者空间为两个输入空间,译文是两个输入空间中概念合成的效果,即合成空间。(孙亚 2001)

心理定势 psychological potence

指一定的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倾向性准备状态,决定同类后继心理活动的趋势。这一概念最初由德国心理学家缪勒(Müller)和舒曼(Schumann)在1889年提出,后经心理学家加以改造,发展成为一种理论,并形成"定势心理学派"。对定势进行研究的一种实验是:让一个人重复(10~15次)感知两个大小不等的球以后,再去感知两个大小相等的球,感知结果为不相等。这种对过去事物的感知给予对当前事物感知的心理定势影响是存在的。在翻译中,在语言的运用上,译者往往有固守本族语习惯的趋势,以致产生所谓的"西化汉语"或"汉化英语"之类,这在一方面是语言心理定势所使然。

心理结构体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儿童发展心理学先驱、发生认识论的创立者、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提出的心理结构概念涉及图式、同化(assimilation)、顺应(accommodation)和平衡四个基本概念(李晓萍 2001)。在认识发生和发展中,同化把经验纳入到主体已有的图式之中,丰富和加强主体的动作,引起图式发生量的变化,使图式的数量和内容丰富起来;顺应则是在主体的图式不能同化客体时,主体建立新图式或调整原有图式,引起图式质的变化,使主体的认识结构适应环境(石向实 2006)。这样通过同化和顺应这两种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主体的认识结构就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地发生和发展起来,主体就越来越适应环境了。皮亚杰指出:"可以把适应解说为同化和顺应之间的平衡,也就是主体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平衡","发展是一个继续前进的平衡过程,从低级的平衡状态走向较高的平衡水平"(皮亚杰 1982)。心理结构这个概念占有重要地位,智慧的本质就是适应,而每一个智慧活动都含有一定的心理结构(即认识结构)。

为了从认知科学的角度阐释人类的语言交际行为,关联理论突破了传统的语境概念,把语境看成是一个心理结构体,即存在于听话者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何自然,冉永平 2001)。大脑对信息的处理有一套信息处理模式,根据这一模式,外部信息按照一定的心理结构进行有序的编码、存储和提取。皮亚杰之前的行为反应公式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单向的S→R公式。皮亚杰认识到此公式的不足:主体只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客体的刺激。于是他提出了S←→R主客体双向运动的公式,认为认识就是这种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1970年,皮亚杰又将S←→R公式发展为S←→AT←→R公式,这里皮亚杰引入了一个中介系统"AT"。其中"A"表示同化作用和顺应作用,"T"表示主体原有的心理结构,皮亚杰称为"图式"或"格局"。这个图式正是人同外物相互作用的中介,是人的认知心理结构,是反应的认知基础。皮亚杰认为外部刺激需要经过认知图式的"过滤"才能输入内部,主体才能作出反应。过滤有两种方式:同化和顺应。同化和顺应是皮亚杰构建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个体适应客观环境的两种主要机能。认识心理结构(图式)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结

构,当同化和顺应发生时,原有图式的平衡被打破,主体吸收了新的经验、新的知识,图式便由不平衡达到了新的平衡,产生了新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图式不断进行的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过程,正是其不断构建的过程。

心理结构体理论对于翻译研究而言,其中"认识就是这种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衍生出的相关概念,如同化、顺应和平衡以及关联理论将语境看成是一个心理结构体等观点,对语篇或文本翻译过程的描写性和阐释性具有启示作用。如近年来,译学界重视译者主体性研究,但如何将主体和客体之间互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揭示出来,并将其纳入心理结构体进行阐释和构建,值得进一步努力探索。

口语报告法　verbal report

评估自我监控的主要方法之一,其特点是个体以口头言语的形式陈述出自己的心理活动过程及行为表现。此法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著名心理学家冯特(Wundt)提出的内省法。冯特的做法是,给被试一个明确的指示,要求被试报告自己头脑中的活动、形象或心理状态。但是,在不同的实验室里用内省法得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被试又可以给出不同的报告,同时又没有检验报告正确性的方法。如今,具有内省性质的口语报告法与冯特时期的内省法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科学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已被广泛用于认知心理学和语言习得研究,成了探索被试的认知过程的主要资料来源,而且被认为是研究翻译的一种有效方法。采用这一方法可部分地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思所想。该方法为研究翻译思维的有效方法之一。参见"有声思维法"

认知　cognition

指包括感觉、知觉、想象、注意、记忆、思维和语言的理解和产生的心理活动过程。在思维学科中,指直接依靠主体感知能力和思维能力,而不借助于实践手段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翻译正是需要译者运用其掌握的知识使译作本身能体现源语文本的思想内容、美学品格、价值取向及情感依归。在翻译过程中,源语文本脱离源语语境,进入目的语语境。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译者的认知心理限制,即受译者已掌握的知识和思维能力的限制。

认知心理学　cognitive psychology

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知识获取方式的学科,研究知识在大脑中是怎样获得、贮存、转化和运用,特别与思维、知觉、理解、记忆、学习的过程有关。翻译过程是一个语际转换的心理过程。转换的优劣往往因人而异。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造成译文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译者原有的认知结构不同,或者拿图式论者的话来说,就是译者头脑中原有的图式不一样。译者的源语水平不同,他们的语用知识、前提知识、背景知识、社会语言学知识、文体学知识、联想能力以及表达能力等各不相同,因而译文的不同也是理所当然的。

造成译文差异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译者在理解和翻译原文时产生的"能动认知语义"(active cognitive meaning)。例如:一个 500 克量杯中装入 250 克水,三人对这一客体进行描述。乐观者说:"The vessel is half-full."悲观者说:"The vessel is half-empty."而折中主义者则说:"The vessel is neither full nor empty."

认知过程　cognitive process

指思维、记忆、感知、识别、分类等心理过程。在翻译认知过程中,认知环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认知环境由认识主体产生理解的一系列事实所构成,是获得正确推理结果的基础。在翻译过程中,正确地理解源语的认知环境,是译者与原作者沟通思想、形成契合、达到思维耦合的必要条件。可以通过以下句子中 hand 一词的类属划分来看认知过程在英汉翻译中的解释作用:1. Peter shook her *hand*. (手) 2. He still writes a schoolboy *hand*. (手笔) 3. The *hands* of a clock move backwards. (指针) 4. ... Mr. Hunter suddenly failed, and all *hands* in the mill were turned off. (职工)传统译论认为,译者对多义词的处理要采用一种名为"词义选择"的翻译技巧。认知理论认为,同一个词(多义词)与不同的词组会形成不同的范畴和类别,而翻译正是将一种语言里的类属划分正确地映射到另一语言里的类属划分。参见"类属划分"

典型性　prototypicality

亦称"原型性",典型性研究属于范畴化研究。"典型性"一词来源于科尔曼(Coleman)和德·凯(de Kay)(1981)的认知心理学论著中的"语义典型"(semantic prototypes)理论。该理论认为,语义典型将一个词项与一种先语言认知图式或形象(prelinguistic cognitive schema or image)联系起来,说话人有能力判断目标词项(或其他的内部特征)与典型图式或形象匹配的程度。换言之,说话人对词项或词义的典型性有超语言的认知能力。范畴研究经历了从经典理论到典型理论的发展过程。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为代表的经典理论认为:1. 范畴是由必要和充分的条件联合定义的;2. 范畴的特征是二分的;3. 范畴的边缘是清晰的;4. 范畴内的所有成员地位相等(Taylor 1995)。经典理论之后,维特根施泰因(Wittgenstein)开始对其进行质疑。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美国心理学家罗施(Rosch)(1978)以大量实验结果为依据证明了"经典理论"的局限性,首先提出了典型理论。典型理论(亦称原型理论)认为:1. 范畴是凭借典型特征,而不是什么必要和充分的条件所建立起来的"完形"概念;2. 范畴成员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彼此之间有隶属程度差异;3. 范畴成员之间存在相似性和共性

特征,可以构成一个连续体;4. 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典型范畴具有典型性和层级性。例如:在"鸟"范畴内,"知更鸟"和"麻雀"常被视为典型成员,而"企鹅""鸵鸟"等则为非典型成员,因为前两者具有鸟的最核心和全面的特征。典型性研究对范畴化过程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无论是对翻译理论概念的研究,或是对翻译语料收集分类及其样本化过程,都会受到典型性原理的规约。典型性理论被广泛用于语言学、二语习得、词典学、对比研究中。

国内外也有学者用其解释翻译现象。最早把原型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的是德国学者诺伊贝特(Neubert)(1985)。在他的建议之下,国际应用语言学笔译与口译科学委员会(AILA Scientific Commission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于1987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召开了以"翻译原型"为主题的研讨会。诺伊贝特采用了原型分析的方法对源语语篇进行分类。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1988/1995)则把原型分析的方法延伸到了对目的语语篇的分类,并建议采取一种以连续体(cline)各点上动态变化的原型为基础的格式塔整体理论原则来替代古老的二元划分(dichotomy)和经典范畴观。挪威学者霍尔沃森(Halverson)(1998,1999,2000)从科学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角度论证了经典范畴理论范式下的翻译研究所存在的缺陷,而且还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翻译"确实是一个原型范畴,体现出原型效应,即范畴成员之间表现出隶属度的差异、范畴边界模糊等。她认为,把翻译范畴视为一个原型范畴不仅有利于翻译语料库的建设,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描写翻译学研究。美国学者蒂莫奇科(Tymoczko)(1998)则认为"翻译"不是一个原型范畴,而是一个像"游戏"一样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集合概念(cluster concept)。王仁强、章宜华(2004)认为,把翻译规范看成是翻译原型更有利于深化我们对翻译标准的认识。符合或接近翻译规范(翻译原型)的译作是典型的翻译,是佳译;偏离翻译规范(翻译原型)的翻译是非典型的翻译,是边缘的翻译。不同的翻译会呈现出典型程度的差异。原型之所以与规范具有共通之处,是因为原型性也是一个描写-解释概念。曾利沙(2005b)从范畴化的典型特征出发,试图区别文学翻译主体艺术创造过程中"艺术再现"与"艺术表现"的典型性特征,分别对其作了描述性界定,并通过实例对不同思维特征进行了程序推导性分析与论证。(曾利沙)

格式塔心理学 gestalt psycology

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流派,于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出现,主要代表人物是科夫卡(Koffka)。该学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在认识事物时首先认识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个特定的部分,整体不是各部分的相加,而有其自身特性。语言研究在一个多世纪的分析之后发现了这一心理学派观点的意义。科夫卡认为人都是依照组织律经验到有意义的知觉场的。这些良好的组织原则包括:1. 相似性原则:相同或相似的东西容易组成整体;2. 接近性和连续性原则:距离相近的或间隔较短的部分容易构成整体;3. 完整和闭合原则:彼此相属的部分易组成整体。而且人有一种把不连贯的有缺口的图形尽可能在心理上使之趋和的倾向;4. 突出性原则:人们的注意力更容易观察和记忆事物比较突显的方面(赵艳芳 2001:99)。这些原则都是从图形的角度考察,但是实验证明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更复杂事物的认知过程。认知语言学推崇具有完形特征的原型说。事物的突显部分以及它们的功能对事物的整体感知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具有完形特征的原型是这些突显的功能部分以最优化的比例的结合。整体感知是指超越部分刺激相加之总和所产生的一种整体性知觉经验。最初拉波夫(Labov)用茅屋分类进行实验来探索范畴化的过程。随后认知语言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类似的试验。这些实验的结果表明,范畴化过程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就是对事物的整体感知,第二步就是对整体感知到的事物分解成各个部分或者属性(Ungerer, Schmid 2001:33)。现代心理学认为,知觉的刺激是包括了数个部分刺激的组合,在此情境之下所得的知觉经验是整体的。

格式塔在范畴化过程中不仅是基于知觉,而且还可以利用格式塔心理学的相关原则及其功能。在格式塔原则的基础上,研究认知对语言整体句义和篇章理解的综合作用成为认知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原型范畴,意象图式,图形-背景感知都具有完形结构,是对事物整体感知的结果(赵艳芳 2001)。

格式塔完型心理学与整体感知性对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原则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从全文着手,不要只拘泥于单个句子或段落,应先从全文把握再进行翻译,即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曾利沙)

认知补充 cognitive complement; compléments cognitifs

释意学派术语。认知知识库和认知环境的相关内容及情感成分,与语言含义结合产生意义。同语言知识一样,它对诠释有声语链或拼写是必不可少的。(勒代雷 2001:186)

认知知识 encyclopedic knowledge; cognitive baggage

亦译作"认知知识库"或"百科知识",释意学派术语,指每个人通过以下方法获得的知识和情感整体:1. 个人生活(经验知识);2. 言语(通过阅读、受教育、看电视、交谈等获得);3. 个人思考。对一篇文章或讲话的理解深度取决于相关认知知识的广度。不借助认知知识,翻译就会成为代码转换。(勒代雷 2001:185;许钧等 2001:182)

认知语言学 cognitive linguistics

涉及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

语言学等学科，是在第二代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理论融合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是认知研究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认知语言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 1971 年，原指真正研究大脑中语言机制的学科(Lamb 1998：381)，但目前所作的研究内容及运用方法与兰姆(Lamb)所说的不同。目前盛行于欧洲、北美及其他国家的“认知语言学”指的是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 80～90 年代得以迅猛发展，并于 21 世纪初已渐成主流的新兴语言学流派。认知语言学尚处在发展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学派内部存在较大分歧。王寅认为“狭义认知语言学是一门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王寅 2005a：2～3)

互明原则　mutual manifest principle

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否认互知原则，提出了互明原则。互知(mutual knowledge)指人们在语言交际中随着交际内容的变化，交际双方必须随时相互知道有关语境的所有信息。在实际交际中，这是不可能的。故斯珀伯和威尔逊认为，互知不合常理，它不能反应语言交际时交际双方的认知状态，因此主张用“互明”代替互知。互明，即“互为显映”(mutual manifestness)(Sperber，Wilson 1986/1995：39)，就是双方共同明白的事实或信息，或者是双方对共同明白的事实的表现。这些表现就是关联理论中的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人们能彼此交流信息，得益于他们所共处的物质世界和思维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在同一世界中的人们享有完全相同的世界知识。一方面，人们各自所处的直接环境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人们拥有的认知能力也有差异。所以，虽然人们共同拥有同一物质世界，但各自所建立的认知环境却或多或少地呈现差异。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需要获取大量的语境信息，并形成一定的语境假设，这些语境信息和语境假设对交际双方来说都是相互明白的，因而就形成了一个互明的认知环境。当两个人的认知环境中显映相同的事实或假设时，在他们之间便产生认知环境的重叠，或者说，他们共享同一认知环境。一个事实或假设对某人显映，是指它能为此人所感知和推理，以获得新的信息，丰富自己原有的认知环境。交际双方的认知环境互为显映，是指他们具备靠相似的物质环境和认知能力所构成的交际基础。例如：

The *lady* at the *desk* in the hotel was quite friendly, full of stories of *girls waiting for a divorce*.

原译：那家旅馆写字台后的那位夫人很友好，她知道许多关于等待离婚的姑娘们的故事。

上例中的 lady，desk 和 girls 的基本释义分别为“夫人”“写字台”和“姑娘们”，但由于受空间语境因素 at the desk in that hotel 关联性制约，将 lady 和 desk 译为“夫人”和“写字台”不能产生最佳关联；而 girls 一词则受其修饰语 waiting for a divorce 的预设性制约，即对汉民族的人来说，准备离婚的女性显然不能称为“姑娘”，汉语中的“姑娘们”一般指未婚女子，而没结婚的姑娘就不可能说是 waiting for a divorce。所以，若译者仅单纯地根据词汇概念的一般“共有知识”确定词义就难以保证译文的达意。因此，从互明原则的角度应将上例改译为：那家旅馆服务台的女办事员待人挺友善，她有一肚子关于闹离婚女人们的故事。

由此可见，话语中语词概念的会话含意往往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因前提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因而在翻译中保持动态“互明”原则对原文意义的准确传达具有重要作用。

认知环境　cognitive environment

关联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核心概念，最早由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在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1986)一书中提出。在关联理论里，认知环境被定义为对于某个人能够明白的一组事实。这些事实体现为认知环境里的各种元素，包括对的东西和可能对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概念，它们可以具体和抽象，共同组成认识主体的总认知环境。认知环境是人能够理解事物和思想的一系列百科知识和语境知识、智能分析和认知推理能力的综合环境，是认识主体获得正确推理结果的基础。现举例说明如下：……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这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胜利的坚强保障。(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译文①：... All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oups have united in good faith. All sections of the people have joined forces to save the nation. This points to a bright futur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ffords a firm guarantee for victory over Japan. 译文②：... All the parties and groups have united forces to save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 All this points to a bright path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ffords a firm guarantee for victory in resisting Japan.

译文①与译文②分别是由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翻译的。比较这两段译文，不难看出两位译者由于各自认知心理的不同，从而造成理解上的差距。这是 1938 年 5 月 15 日发布的布告，中国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一个大的语境。在译文②中，其一，把“各党各派”译成“All the parties and groups”，显然是对当时中国的现状了解不足，其实，并非“All the parties and groups”都参加了抗日。而译文①加上了一个 political，所指更为准确。其二，“协力救亡”译成“to save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显然是囿于形式的逐字对等。“extinction”有“灭绝”之意，类似于希特勒在欧洲实行的“种族灭绝”，与中国的情况不符。译

者由于受自身认知心理的影响，未能准确地把握语境，因而就不能与原作者的思维产生耦合。译文①就准确地译成"to save the nation"，表达出了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拯救民族之危亡"的思想。

认知环境理论应用于翻译中，其意义在于要求译者考虑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认知环境，使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认知环境。其次，关联理论将认知环境视为一系列互明的、可认识的事实，并承认主体总的认知环境的差异性，为翻译研究的语境观提供了新视角，也为翻译过程中因认知环境差异而产生的语义调节提供了理论依据。 （曾利沙，蓝春）

认知语义 cognitive meaning

认知语义是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中的概念内容及其组织形式，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内容及其组织的本质。认知主体对语义的理解本质上就是一种认知行为，语义理解是大脑认知机制对语言处理的心理过程，涉及交际者对信息的选择、接受、处理、理解和储存的能力及过程。所以，由于认知环境和人的认知结构都是动态的，认知主体不断改变认知假设，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认知语境制约和影响交际双方语言的生成和理解，同时也揭示了语义理解的心理过程。

认知语义在对语境化词汇概念语义嬗变的翻译过程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可阐释性和可描写性作用。以用引自《英语世界》2006 年第 3 期的译例作一解析：

Robots will be able to react in lifelike ways, though we may end up releasing some unwelcome ***creations*** — ***like*** *Hal*, the computer murderer of ***the film*** *2001: A Space Odyssey*.

译文：**机器人能像真人一样作出反应，虽然最终也许会造出某些不受欢迎的作品——就像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杀人电脑哈尔。**

在上述译例中，原文中的 creations 为什么被译为"作品"，而不是其词典释义"创造物"？译文"作品"的生成无疑是一种语境化认知语义的结果，有其特定的认知机制及其思维推导过程与理据。在认知上，我们必须将 film 这一具体概念抽象为较高层次的范畴概念——artistic works（通过艺术思维创作出来的产品）。然后，将这种抽象出来的范畴概念语义映射到 creations 之上，这样，creations 则间接性地获得"作品"的范畴化概念语义。参见"认知语言学"

（曾利沙）

认知语义学 cognitive semantics

认知语言学的一部分，代表人物有杰肯道夫（Jackendoff），拉科夫（Lakoff），约翰逊（Johnson），兰加克（Langacker）及塔尔米（Talmy）等。杰肯道夫和兰加克认为：认知语义学主要研究人类的概念系统、意义和推理（inference）。简而言之，研究人类的推理（human reason）。认知语义学是描写概念结构，而概念结构又是认知的产物，认知又与人类的心理经验、认知模型、认知结构等密切相关，这就构成了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基础。他们充分强调人类的经验能力和认知能力，认为没有独立于认知以外的语义，也没有独立于人类认知以外的客观真理。他们坚决反对客观主义的真值对应论、真值条件语义论，认为语义是一种心理现象，语义的形成与人类概念的形成同时并举。（王寅 2005a：170）认知语义学否定传统形式语言学的语音、句法及语用模式，将语义学视为有意义结构的认知表示法。它的四项原则为：语义结构是概念结构；概念结构是具体化的；意义表示法是百科性的；意义结构是概念化的。认知语义学的特点可概括为：可解释性、透视性、突显性、隐喻性、百科性。认知语义学认为，语言传递的信息并不是关于真实世界的，而是真实世界反映在大脑中的投射世界；我们感知到的世界是经过大脑自动地、无意识地重新组织的结果，这即是认知过程；语义必须以关于投射世界的信息为基础，即以认知为基础，所以就有了认知语义；语言的意义就在于人类如何对世界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赵艳芳 2001：53～55）。参见"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境 cognitive context

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在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1986）一书中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意义的"认知语境"的概念，认为当听话者接收到新信息时他会在这个认知环境中搜寻并调用和新信息相关联的概念与新信息相互作用，进而推导出说话者的交际意图。斯珀伯和威尔逊将认知语境定义为"人们所明白的一系列能感知并推断的事实或假设构成的集合"，一个人的总认知语境是由他的认知能力和其所处的物理环境所决定的。语境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前者指语言前后搭配、上下文语言连贯等内在联系，后者指交际双方生成和理解话语时拥有的社会文化知识、认知能力等情景语境对语义理解的制约和影响。斯珀伯和威尔逊认为语境在理解过程中产生的是一个心理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1986：15），是听话者对整个世界认识的一组假设，正是这些假设，而非客观世界本身，制约着听话者对话语的理解。因此，语境不仅限于上下文，还包括对未来的期待、科学猜想、宗教信仰、记忆和文化知识等，这些都会影响听者对话语的理解（Sperber, Wilson 1986：107～123）。在话语理解中，认知语境对语义理解影响最大，对语义理解起制约作用，因为认知主体所感知的内容有待于心理表征在具体的语境中触发，激活相关的心理表征。大脑借助于思维，产生关于言语的心理期待，并借助于百科知识对心理期待加以选择、解释、修正。在关联看来，语境假设就是认知假设，认知主体综合利用认知环境中的逻辑信息、语言信息和百科信息生成相关联的语境假设。可

见，语境不是进行交际前已知的或给定的，认知者需要综合许多背景信息进行推理，选择相关的信息从一个假定推出另一个假定，直到交际双方的认知环境显映了相同的事实或假设时，即互为显映时双方才能作出共同的认知和判断并实现理解沟通。认知语境标志着意义研究从静态转向动态，认知语境观揭示了语义推理的认知心理理据和心理状态，理解话语是一个"认知-推理"的动态过程。关于认知语境的构成，比较典型的观点有：1. 认知语境由三种信息组成：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语信息（何自然，冉永平 1998）；2. 认知语境涉及情景知识（具体场合）、语言上下文知识（工作记忆）和背景知识（知识结构）（熊学亮 1996）。

认知语境理论对翻译过程研究具有阐释性作用。如果说翻译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那么译者选择判断词义、推导含意、选择概念的过程必然涉及认知语境因素的假设、求证、明确与建立。周红民（2002）提出了认知语境的种种理据，揭示了三种认知个体在源语到目的语的信息转换过程中的介入流程和对信息编码的影响，阐述了认知语境在翻译中的功能和认知能力的获得过程，旨在说明翻译过程是通过认知来重构信息的过程。韦晓萍（2003）通过实例分析，说明了认知语境对小说翻译中判断词义的作用和语境化意义生成的制约性特征。例如：There was a reviving pleasure in this intercourse, of a kind now tasted by me for the first time — the pleasure arising from perfect *congeniality* of *tastes*, *sentiments*, and *principles*.

原译：交谈中，有一种令人振奋的乐趣，是我第一次尝到的，是一种来自趣味、感情、原则完全一致的乐趣。

原文为小说《简 · 爱》第 30 章内容，简 · 爱从桑菲尔德出走后身无分文，绝望无援，被后来才知道是她表兄的圣 · 约翰和表姐黛 · 安娜、玛丽收留救治。简 · 爱康复后与这两姐妹一番交谈，发现自己与她们十分投缘。这从下文语句的三个层次内容得到内在关联性照应：I liked to read what they liked to read, what they enjoyed delighted me, what they approved I reverenced. 根据关联性语境因素，通过认知判断与分析，sentiments 应为她们交谈中涉及对谈话内容或事物带有感情特征的"看法"，而非"感情"概念本身；将 principle 译为"原则"在上下文中不能产生最佳关联，得不到关联性照应，给读者造成认知困惑。在此认知语境中，principle 应指"本性"，即指她们的本性或天性的趋同；而 congeniality 即"情趣相投"之意，而非"完全一致"。上述原文可译为：和她们交谈，给人一种令人振奋的乐趣，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尝到的乐趣，是一种来自情趣、看法、本性十分相投的乐趣。

（曾利沙）

认知脉络　cognitive context; contexte cognitif

释意学派术语。阅读一篇文章可以获得一种知识，作为认知知识库已存知识的补充。积累的知识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在大脑中以非语言形式存在，帮助读者理解篇章。阅读理解文章时，积累的记忆储存起来，成为零散的知识。一段时间后便融入广泛的知识总和，构成认知脉络。（勒代雷 2001：187）口译中言语链转瞬即逝，不允许听讲人停留在某个语链上，否则信息就会出现短缺和流失。语篇意义就产生于认知脉络的动态作用中，产生于言语分析、整合和逻辑推理之中，意义随阐释而诞生。（贺显斌）

认知域　cognitive domain

亦称"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是认知语言学在描写语义时所涉及的概念，它可以是一个简单的知觉或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复杂的知识系统。各种概念和知识系统构成一个具有层次的认知域网络，构成了反映整个世界的百科知识体系。兰加克（Langacker）（1987）将认知域定义为任何一种概念化：感觉经验、概念、概念复合体、复杂的知识系统；泰勒（Taylor）（2002）把认知域定义为对一个语义单位的概念形成过程提供语境的任何知识构架，即与刻画意义有关的任何知识构架。认知域可以分为基本认知域和非基本认知域，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基础和参照。基本认知域来自人的基本经验，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具有普遍性，是无法再简化的（irreducible）。基本认知域大多与人的基本感知有关，因为人们往往从自身出发，用身体和物质经验去表达一些抽象概念。根据兰加克的观点，空间（时间）、颜色、感情、味（嗅）觉、触觉（温度、压力等）、亲属关系等属于基本认知域。基本认知域中，最基本的是空间域，因为我们处于空间中，自身的身体就是个三维体，接触的许多物体都是有形的，一切活动也是在空间中进行的。基本域中的其他认知域乃至非基本认知域都是根据空间概念来认知的。如时间、温度、音度、颜色、亲属关系都可以用长短、高低、深浅、远近等来定义和理解，所以有 high flavor, high pressure, high-pitched sound 等表达法。基本认知域之间也可以发生对应，所以可以互为定义，于是有 piercing cold, warm feeling, hot taste, loud color, cold color 等，汉语中有冷色、冷淡等表示法。不同民族由于人类经验、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反映在认知域中，翻译过程中就会产生认知偏移，即源语和目的语使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达相同或相似的意思。如：a rat in a hole（瓮中之鳖），a drowned cat（落汤鸡），"When shepherds quarreled, the wolf has a winning game."（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认知域或概念域是隐喻研究和隐喻翻译中的常用概念。传统翻译理论对隐喻翻译研究多以修辞为取向，倾向于把隐喻的翻译视为修辞层面的语际转换。如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Newmark）根据隐喻语义转移的程度，从大到小，把隐喻分成了六种：dead metaphor, cliche metaphor, stock metaphor, adopted metaphor, recent metaphor, original metaphor (Newmark

2001：106～113)，并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翻译隐喻的七种方法。赵亮和张轶前(2007)指出纽马克等的隐喻翻译修辞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认为认知语言学能给隐喻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可以从认知角度探讨隐喻翻译及具体策略，讨论了隐喻翻译中的认知对等、认知偏移和认知移植的问题，认为通过认知域或概念域映射的移植把负载独特文化内涵的隐喻移植到目的语中就是文化交流的具体形式。因此，认知域或概念域映射的移植不仅是处理蕴涵独特文化内涵的隐喻翻译方法，而且起到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

（曾利沙）

认知模型　cognitive model

指储存在人脑中的关于特定认知对象的所有认知表征(Ungerer, Schmid 1996：51)，类似于菲尔莫尔(Fillmore)(1975)的“框架”概念以及尚克(Schank)和埃布尔森(Abelson)(1977)的“脚本”或“结构化的场景”(structured scenario)概念，即一个言语社团进行某种活动时所依据的按时间和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的一个标准化、理想化的事件和状态的系列。兰加克(Langacker)(1987)和拉科夫(Lakoff)(1987)都有所论及。拉科夫认为，人们是通过所谓的“理想化的认知模型”(ICMs)来组织我们的经验和知识，而范畴结构以及范畴所表现的“原型效应”只不过是该组织方式的副产品而已(1987：68)。同时，拉科夫认为，一般来讲，一个概念范畴可在其认知模型中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对应成分。认知模型具有开放性及网络构建倾向性特征。所谓开放性是指对某一特定概念范畴的认知描述尽管具有高度选择性，但永远都不可能穷尽，因为认知描述应该是历时性的，而非共时性的。认知模型的开放性坚持了人类在对真理的认识上发展的观点。所谓认知模型的网络构建倾向性指的是认知模型本身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形成的一张认知模型的网络。范畴化的认知模型可归结为：命题模型、意象图式模型、隐喻模型以及转喻模型(成军 2006)。人最初的经验就是空间经验，基本的意象图式就是空间图式。人们将空间图式用于理解抽象的经验，使人具有形成抽象概念和复杂结构的能力。

认知模型对口笔译的心理表征具有一定的可解释性、可描写性、可推导性。比如，认知图式和框架等概念都具有认知模型的特征。苏晓军(2007)对西方同声传译研究中的“决策过程模型”“语义模型”和“概率预测机制模型”三种认知模型作了述评，并提出了一些关于我国口译同传教学的建议。（曾利沙）

目标模型　target model

与“始发模型”相对，两者是隐喻系统中一对密切联系的主要概念。人们理解隐喻从始发模型开始，始发模型帮助人们理解思维中无形的、抽象的或不太好构造的认知模型，获得新的认知，即获得目标模型。参见“始发模型”“认知模型”

始发模型　source model

与“目标模型”相对，是隐喻系统的两个联系密切的重要概念之一。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形的和具体的认知模型在概念隐喻系统里通常被用作始发模型，帮助人们理解思维中无形的、抽象的或不太好构造的认知模型，即目标模型。拉科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以 *Metaphors We Live by*(1980)一书开创了现代隐喻研究的新途径，提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概念系统(metaphorical concept system)。昂格雷尔(Ungerer)和施密德(Schmid)(1996)则称隐喻为“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是从始发模型向目标模型(target model)的映射，也就是从一个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向另一个概念域的结构映射。始发模型向目标模型的映射使得两个概念域之间形成系统而稳定的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s)，即从一个人们比较熟悉且易于理解的概念域映射到一个不熟悉或较难理解的概念域。人们在对客观世界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互动实践的体验过程中逐步理解了现实世界中人、事物、事件、现象之间的联系，通过人类的认知处理掌握了其间的互动关系和规律性，并对这些经验和知识作出了抽象的、统一的、模式化了的理解，储存于人们头脑中，形成了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常规性的认知模型。隐喻是人们进行思维、行动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的方式，其本质是一种跨越不同概念域间的映像关系，这种介于两个概念域里实体间的对应使得人们能够运用始发模型里的认知知识结构来彰显目标模型里的知识结构。例如，在“He is not a man; he is a machine”这一句子中，man 是始发模型，machine 是目标模型。man 这一概念是由 machine 概念来投射说明。

在翻译的描写性研究中，始发模型与目标模型这一对概念主要用于解释和描写隐喻的翻译过程。由于源语和目的语各自包含的认知模式不尽相同，其中的相同与差异会在语际的转换过程中体现出来。翻译过程的完成就是在目的语中为被转换单位寻找认知心理理据的过程。认知模式在翻译过程中的源认知域和目的认知域之间的映射关系相应地也会发生变换。刘华文(2003)对此作了相应的分析。例如：

After the first *drink* Mrs. Wilson and I called each other by our first name. 第一杯喝下肚之后威尔逊太太和我就彼此以名相称了。

在上例中，“drink”具有完整性的谓词概念，所以可以用来代替“人＋ 喝 ＋ 酒”这个配价图式，用这个表示整体性的概念构成的源认知域来代替由“人＋ 喝 ＋ 酒”的这个完整图式构成的目的域。参见“目标模型”“认知域”“概念域”（曾利沙）

认知操作 cognitive operation

从认知角度的操作观而来。所谓系统操作观就是对致使对象及其相关系统作形式表述时,在考虑到其概念语义和各认知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和词汇语法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同时,还考虑到这些连接关系的操作可行性。操作就是从概念内容到语言表达的产生过程,以及从语言表达到概念内容的理解过程。系统是可操作系统,因此它必须是概念语义和语法结构连接而成的义形系统。这一概念现已被广泛应用于认知语用学、框架语义学的研究中(Fillmore 1982)。从广义认知观点出发,(认知)系统是可以(认知)操作的系统。从可操作系统(亦称"系统操作观")的角度出发,理解语词不仅仅只是激活语词的抽象(词典)语义,同时还可以激活更丰富(百科知识)的一组具有整体性的概念语义。一个语词的输入,可以激活该语词的概念,同时还可能激活和语词概念连通的背景知识。从可操作系统的角度出发,语词概念及其背景知识概念构成一个框架,一个整体子系统。它的整体性表现为一个语词可以激活整个概念语义框架;要理解语词,有时需要激活它的整体性框架。当然,框架中的突显概念成分总是激活的,而背景成分至少可以处于无意识的"半激活"状态,通过形式表述的语词框架是可以进行如此操作的(程琪龙 2005,2006,2007)。例如:"阿姨"作为一个突显的概念成分,它的背景可以有"我""妈妈""妹妹"等。这些成分构成"称谓系统"。激活"阿姨"时,根据这些成分的连接关系,它可以使"我""妈妈""妹妹"半激活。在语言加工需要时,这些半激活成分也可以激活。如果"我"被告知"甲"是"我阿姨",那么根据半激活的成分,我可以激活并推导出"妈妈的妹妹"的概念成分。同理,我们可以从"半径"推导出"圆心""圆"等。

认知操作可解释翻译活动。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掌握整体性的概念语义,不能只囿于语词的词典释义,而是要在理解一个词语语义概念的同时,很好地把握该概念的背景知识,这样才能确保译文准确到位。从翻译理论研究看,认知操作的心理表征对翻译过程的描写和阐释也提供了可行的理论工具。

(曾利沙)

突显观 prominence view

亦称"凸显观",认知语言学的表征方法之一。兰加克(Langacker)在接受格式塔心理学相关原则的基础上,在*An Overview of Cognitive Gramma*(1988)一文中提出了语言的突显观,也是昂格雷尔(Ungerer)和施密德(Schmid)(1996)提出的当今认知语言学中三种表征方法之一。突显观认为语言结构中信息的选择与安排是由信息的突出程度决定的。突显观主要讨论图形/背景分离理论在介词和句法结构上的应用。该理论认为,有形状、结构、连续性等特性且处在背景前面的图形比无形状、无结构且均质的背景更易被感知和记住,具有突显性。通常具有完形特征的物体,小的物体或运动着的物体用作图形(Ungerer, Schmid 1996)。用该理论分析介词结构时还运用到意象图式、射体、界标和路径等概念。动态的图形经过的轨迹是路径,移动的图形叫射体,背景是界标。在语言表达上,一般是将突显的成分放在主语位置(邵军航,余素青 2006)。在分析句子结构时,兰加克提出了角色原型和行为链的概念。角色原型包括施事、受事、工具和经验者。行为链则是一个携带能量的能量之首通过某一行为作用于另一个物体,使之接受并消耗能量的过程。在只有施事和受事的情况下,施事是能量之首,是最突显的部分,因而通常被给予句法图形即主语的地位。而对于心理行为和状态,角色原型为经验者或被经验者。经验者处于突显地位,因此作主语。兰加克认为词性的选择和认知的能力与认知输入的浏览能力有很大关系,为此他提出了总结式和顺序式两种浏览方式(邵军航,余素青 2006)。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应该意识到,真值条件完全相同的两个句子,其语义不一定相同,这完全取决于射体的选择和确定。如"给这个婴儿穿上罩衣很容易"这句话可以有如下翻译:

(1) It is easy to get this baby into these overalls.

(2) This baby is easy to get into these overalls.

(3) These overalls are easy to get this baby into.

这三种译文的真值条件相同,但是主观突显意义不同,(1) 是常用图式句;(2) 突显的是婴儿听话,是从长辈的角度出发;(3) 突显的则是罩衣。因此翻译时应注意突显问题。陈建生、吴曙坦(2004)根据兰加克的"意象意义假说"中结构突显的原理,对翻译过程中的突显作用进行了尝试性分析。突显观对翻译理论研究中的某些现象似乎能作出一定的解释。如不同的研究者对"翻译"有不同的认识,所给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对翻译所下的若干种定义,实际上就是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定义者将其自身的特定感知或认识,将翻译的一般特征或将翻译活动多样化特征或属性的某一侧面或某些方面突显出来,同时也虚化或背景化了翻译的其他特征或属性。参见"注意观""经验观"

(曾利沙)

注意观 attentional view

认知语言学表征方法之一。注意观建立在另一个基本假设上,即人们实际上用语言表述的是某一事件中抓住了我们注意力的那一部分情景(Ungerer, Schmid 1996: 39)。例如:"The car ran into a tree."实际上只撷取了整个事件中抓住说者注意力的最后一刹那。其他如小轿车如何急速驶来、如何失去控制、偏离方向、冲出车道等均被略去。注意观提供了解释句子信息的选择和安排的另一种方法。注意观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框架和视角。框架即"某种认知结构,为理解语词所引发的概念所必须"。视角指的是在某句子的表述中,通过动词和句法结构的选择而体

现出来的对某情境所采取的认知角度(蓝纯 2001)。框架理论是描写句法结构的另一种尝试,因涉及认知主体在组织信息时注意力的分配问题,昂格雷尔(Ungerer)和施密德(Schmid)把它称为认知语言学的"注意路向"。被纳入该路向的代表人物有菲尔莫尔(Fillmore)、明斯基(Minsky)、尚克(Schank)和埃布尔森(Abelson)。菲尔莫尔认为,框架是认知结构,是作为词语概念的先决条件的知识。与框架概念紧密联系的是视角(perspective)。如在"商业事件"框架中,所涉及的基本方面有买方、卖方、货物、货币等,可以分别从这四个方面出发来组织话语信息。明斯基(1975)将框架理论引入计算机文字处理领域,用来解决为什么在餐馆、商店、飞机等场所中,服务员、店员、乘务员及相关设施第一次出现却要用定冠词。他认为一个范畴可以激活整个框架,框架还包括一些次框架。他的框架概念已经超出简单句子的范围,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尚克和埃布尔森将事件发展的动态引入框架理论,提出了"图样"概念,是指专门为经常出现的事件序列设计的知识结构。人的头脑中储存着很多图样,根据语境和经验形成的图样,人们可以预测事件的各个方面。框架理论和注意观适用于各种语言,但认知语言学认为,在不同的语言中,这些基本框架会用不同的形式表达。比如英汉两种语言主动和被动语态的选用就大相径庭。因此,在翻译时要考虑同一框架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表达,然后再作出适当的翻译。萧立明(2001)以英汉两种语言的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的比较分析为例,从注意观出发,就其翻译问题作了说明。参见"突显观""经验观"

(曾利沙)

经验观 experiential view

认知语言学的表征方法之一。20世纪末拉科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在批判客观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体验哲学的概念,成为第二代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该理论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王寅 2005a)。昂格雷尔(Ungerer)和施密德(Schmid)(1996)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经验观认为人类认识结构来自人体经验,并以人的感知、动觉、物质和社会的经验为基础,因此对语言的研究应采取较实际的方法。人们对于不熟悉的或间接的经验,则运用隐喻或转喻的方式形成自己的认识。概念隐喻就是用一个认知域的经验来理解另一个认知域的经验,而一般都是用自己熟悉的认知域的经验来理解不熟悉的认知域的经验。人类对世界共同的经验都在语言中得到反映并通过人们的交流体现出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世界的经验有一定的差异,这就形成了认知的文化模型(Ungerer, Schmid 1996)。但是由于人类有相同的身体构造,所生活的环境空间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感知体验虽有差距,但仍有很多共通之处,这就成为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语义结构的基础。经验观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范畴化,强调范畴化过程中人的认知经验的重要性。认知范畴中类典型现象、认知范畴内部的家族相似性以及范畴化过程中出现的意象图式等都是人的认知经验影响的结果。作为认知工具的概念隐喻也基于人的认知经验,因为由已知到未知、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必须以认知经验为基础(邵军航,余素青 2006)。

根据经验观,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码转换,而是一个双重认识的过程。在翻译中要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根据目的语读者的历史和生活体验,将两者相互融合以达到基本等值效果。如:shotgun wedding 这个词牵涉到美国西部开发,译者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应结合目的语读者的体验作出合适的翻译(萧立明 2005)。参见"突显观""注意观"

(曾利沙)

界标 landmark

在认知语言学中,兰加克(Langacker)等语言学家用射体(trajector, TR)和界标(landmark, LM)这对术语取代了图形和背景。射体与界标可以说是图形与背景的不同表达形式,也可以说它们是图形与背景的具体应用。射体与界标是来自物理学的两个概念,是构成空间概念的基本要素。空间概念可以是物体的空间位置,也可以是人、知觉、情感、情景的空间位置以及各种内容的抽象关系。根据兰加克等人的射体-界标理论,"意象图式主要由射体、界标和路径(path)三部分组成,表现的是 TR 与 LM 之间某种不对称的关系,TR 为这一不对称关系的主体",其空间方位有待确定,LM 为参照物,为主体的方位确定提供参照。TR 所经过的路径称为 PATH。如果某个客体处在相对于另一个客体的位置,或向后者移动,那么前者就叫"射体",后者为"界标"。而当勾画一种关系时,其参与者被不同程度地突出。最突出的参与者称为"射体",它是被评价和阐释的实体,是被勾画的关系内的主要焦点。作为次要焦点,被突出的另一参与者称为"界标"。如在语句"他儿子进了书房"中,"他儿子"是射体,"书房"是界标。实际上,确定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的空间方位的方法涉及射体与界标之间的某种不对称关系。通常,人们可以根据物体的大小、包容关系、支撑关系、方位、次序、距离和运动等来识别这种不对称关系。如果在射体与界标之间没有明显的不对称性,那么,人们通常给它们强加某种不对称性。有几个重要因素可用来确定某一物体作为界标:1. 大、静止的物体常用作界标;2. 遇见频率高的物体常常用作界标;3. 物体的突显性是确定界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4. 典型性也是确定物体为界标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以上四个因素并不是彼此独立的,有时在确定界标时它们可能会同时起作用。射体/界标表示动态,射体处于运动状态,有两方面的基本意义:第一方面,射体从界标的空间范围内运动到界标的空间范围外。这一运动又有两种情况:1. 射体和界标的空间位置关系的变化,即从空间上

的连接或包含关系变成空间上的不连接或不包含的关系；2. 射体运动留下的运动轨迹，它表达的是一种距离，同时还表明射体会达到此距离的终点。如："Let's drive out the old practical way."根据射体和界标在起点的位置关系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四类：(1) 射体在界标上；(2) 射体为界标的一部分；(3) 射体是界标的一个成员；(4) 射体位于界标的空间范围内。第二方面，射体运动的结果，即射体处于界标的空间范围外。如："There is a tree out of the room."射体运动的结果是静态的存在(Langacker 1987；文旭，匡芳涛 2004；肖坤学 2006)。

射体/界标分析法对句子翻译提供了新的解释方式。句子是以动词为中心构建的语言表达形式，句子射体/界标的选择不是随意的，它会影响到句子的结构与意义，译者需要正确选择译文句子中的射体与界标，处理好两者的关系。陈建生、吴曙坦(2004)用此概念解释表示事件动态句子的翻译，认为译者需要着重考虑动词与射体、与界标的协调问题。如下面同一意思不同形式的(1)(2)两个句子均可译为"**在决赛中巴西击败了德国**"。

(1) *Brazil* defeated *Germany* in finals.

(2) *Germany* was defeated by *Brazil* in finals.

从认知语法观看，以上两句有突显上的区别：(1) 以 Germany 为界标(亦称背景)确定 Brazil 的地位，(2) 则以 Brazil 为参照点确定 Germany 的位置。突显的部分不同，语义结构也不同，这种突显部分和界标(背景)的非对称性是主语和宾语区分的基础。

(曾利沙)

射体　trajector

在认知语言学中，兰加克(Langacker)(1987)等语言学家用射体和界标这对术语取代了图形和背景。射体与界标可以说是图形与背景的不同表达形式或具体应用。两者来自物理学概念，是构成空间概念的基本要素。空间概念可以是物体的空间位置，也可以是人、知觉、情感、情景的空间位置以及各种内容的抽象关系。参见"界标"

概念表征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所谓表征(representation)，指信息在心理活动中的表现和记载方式。表征是人的认知历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步骤，也是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车文博 2001：610)。概念是指带有各种不同特点并与其他观念相联系的观念或想法，可以用来描述抽象的思想或具体的思想(斯滕伯格 2006：199)。通常，一个单一的概念可能记录在一个单一的语词中，如"苹果"。每个概念都与其他概念相联系，如"苹果"与"红色""圆形"或"水果"相联系。通过范畴(category)，我们可以获取一种对概念进行组织的方法。概念表征是指对语言的语义概念信息的一种呈现方式。关联理论认为，在语言交际中，听话者对世界的假设以概念表征的形式储存在大脑中，构成用来处理新信息的认知语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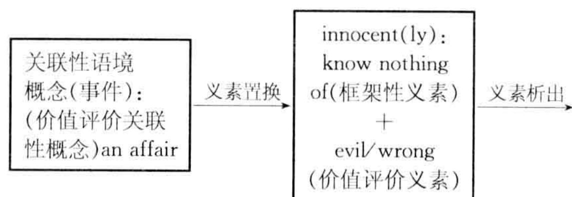
概念结构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主要有两种理论：一种是特征表说(feature list theory)。该理论认为，概念是按一定规则组合起来的事物的定义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s)或有关特征。即将一个概念分解为一系列特征成分，这些成分单独而言都是必要的，联合起来足以为范畴下定义，这些成分可以被看做定义性特征。如："鸟"的概念特征包括"羽毛""动物"两个定义性特征及其关系之和。定义性特征是一个必要条件：对于某一个物体，如果它是"X"，那么它必定具有那种特征；不然的话，它就不是"X"。例如，"妻子"一词是由"已婚""女性""成年人"三个特征组成。另一种理论是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该理论认为概念主要是以原型，即它的最佳实例，所表征。如在思维活动中涉及"鸟"的概念时，我们常会想到"鸽子"，而不大会想到"企鹅"或者"鸵鸟"。范畴是以代表性特征(characteristic feature)为基础而构成的，以此来描述或代表该范畴的典型(事实上的、原型性的)模型。代表性特征通常体现在概念的样例中，但并不总会有体现。例如，游戏的原型可能包括它通常的娱乐性、有着两个或更多的玩游戏者、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但一个游戏并不是必须要有娱乐性、两个或更多的玩游戏者，也不一定要有竞争性。概念是范畴的心理表征。根据不同范畴的表征方式，我们可将概念表征分为基于规则的、基于线索的、基于样例的和基于图式的表征，它们之间形成一种双极结构，以基于规则的概念为一极，基于图式的概念为另一极，从基于规则的概念到基于图式的概念，表征的逻辑性越来越弱，但是灵活性越来越强(邵志芳 2006)。

概念表征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的范围也很广，因为翻译必然涉及双语概念语义直接或间接的转换问题。可以说，对概念表征的充分认识与呈现方式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也具有理论价值。不同语言中的有些概念表面看来相似或对等，但实质上并非如此，有时作者只不过意在使用或突显某个概念语义诸种相关特征中的某个或某些特征或义素，并期待读者的参与，将该突显的特征或义素与语境相结合，能动地重构出该概念在特定语境中的嬗变义。曾利沙(2007a，2007c)对文学翻译中的概念表征呈现方式与特点以及英汉转换过程中的概念语义转换的认知机制进行了解析。例如：

When Les Miller heard about the event, from his wife, Lisa, who was breathlessly fresh from a session of gossip and women's tennis. It seems incredible, he was stung by jealousy: he and Veronica had had ***an affair*** the previous summer, ... ***Lisa innocently told her husband***, "that here she's nearly thirty and apparently has never been stung before, so nobody

knew she would react this way. ..." (John Updike, *Delicate Wives*)

上述例子的英语概念 innocently(副词)派生于形容词 innocent,有五个义项：1. not guilty; 2. suffering harm though not involved; 3. harmless; innocuous; 4. know nothing of evil or wrong; 5. foolishly simple。从语境关联性看,只有义项 4 可以作为释义的基础。但从翻译的语义连贯看,该义项却不能直接参与转换,译者必须对该义项中突显性语义特征或义素与语境关联性概念 an affair 的语境化语义内容进行置换才能成功地进行翻译。其义素置换与义素析出过程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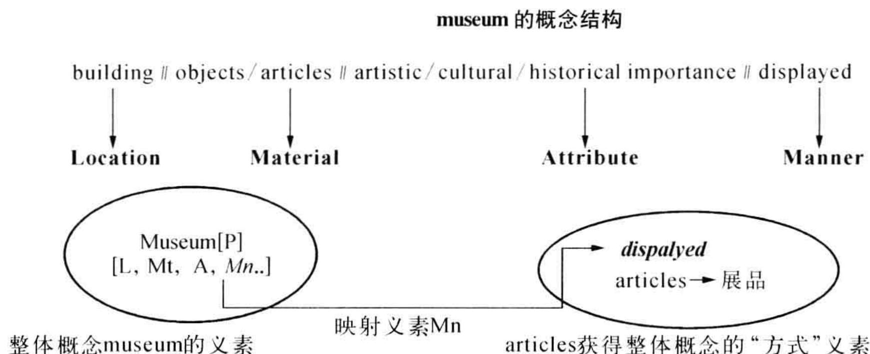
在英语原文中,an affair 指的是男女私情这一事件,即莉萨的丈夫和韦罗妮卡有染。丈夫越轨,背着妻子与另一有夫之妇有隐情,到了难分难舍的地步,而妻子莉萨却全然不知。作者用一个副词 innocently 简洁含蓄地向读者暗递了此信息,同时刻画了莉萨的个性。为了对概念语义特征或义素置换的认知机制作出描写,我们可对 innocent(ly)的基本语义结构 know nothing of evil or wrong 的义素作一切分和定性概括,将 know nothing of 称为"框架性义素",将 evil or wrong 称为一般"价值评价义素",evil or wrong 具有一般抽象概括性语义特征,是对特定行为或思想性质的价值判断。这样,我们就可以对 innocently 的概念语境化意义生成的认知机制作出描述：首先,将 an affair 置入 innocent(ly)的框架性义素 know nothing of 之内取代其一般价值评价义素 evil / wrong,同时析出 evil / wrong。一般概括性义素能够被置换,是因为 an affair 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具有 evil 或 wrong 所蕴含的价值评价特征,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内在认知语义关联的基础所在。这表明,我们通过概念语义表征的特征分析,在认知语义关联上找到 innocnetly 与 affair 之间产生可交换的内在的突显性语义关联性特征：affair←→evil or wrong。而原文作者之所以使用 innocently 一词,意在突显其概念框架性特征,并召唤读者在语境关联性概念的作用下,将上文事件性概念的语境化内容置入该框架义素之内,取代其一般价值评价性义素,从而使 innocently 获得新的语境化概念语义结构：Lisa who knew nothing of ***the affair between her husband and Veronica*** told her husband, ...,其相应的语义连贯性译文是：……不知隐情的莉萨跟丈夫说,……。

(曾利沙)

概念结构 conceptual structure

即概念的心理表征,主要涉及概念由哪些因素构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认知心理学家布鲁纳(Bruner)、古德诺(Goodnow)和奥斯汀(Austin)对概念及其结构进行了专门的深入研究。之后,在认知心理学领域,便一直有理论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概念结构理论：1. 概念结构的特征表说(feature list theory)。该理论由伯恩(Bourne)等人提出,他们认为每个概念都由定义特征与特异特征构成。定义特征是定义一个概念所必需的特征,相当于概念的本质特征;特异特征对概念有一定的描述功能,相当于概念的非本质特征。例如,"有翅膀""有羽毛"是鸟的定义特征,"会鸣叫"则是鸟的特异特征。2. 原型说(prototype model)。该理论由罗施(Rosch)(1975)等人提出。这一理论认为,概念是以原型,即它的最佳实例,来表征的。概念是由原型和范畴成员代表性程度两个因素构成。3. 样例说(example theory)。该理论由梅丁(Medin)(1989)提出,他认为,类别是保持在人们认知系统中的一组特殊例子和情境,它们并没有以特定的组织进行储存,而概念由它的所有样例组成。如"鸟"的概念不仅包含麻雀的表征,还包含企鹅、鸵鸟的表征。4. 心理本质论与心理语境论。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以解释为基础的概念观占优势。解释的概念观有两种形式,一种被称为心理本质论,另一种是心理语境论。5. (概念分类的)层次网络模型说(hierarchical network model)。该理论由柯林斯(Collins)和奎利恩(Quillian)提出。在该模型中,语义记忆的基本单元是概念,每个概念具有一定特征。6. 激活扩散模型。由柯林斯和洛夫特斯(Loftus)(1975)提出,他们放弃了网络模型中概念的层次结构,而以语义联系或语义相似性将概念组织起来。该理论认为网络中每一个结点代表一个概念,而每一个概念又与相近概念连接,当外部刺激产生时,会激活长时记忆中具有联系特征的一个概念结。概念结构涉及的理论研究还有概念隐喻、典型性、认知模型、心理空间、意象等。它们共同研究的一个对象就是范畴化问题。(韩劢 2004;李斐 2007)

概念结构用于翻译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于对文本翻译过程中语词概念如何在特定语境中发生意义嬗变的认知机制作出描写,语词概念自身的定义性语义特征结构在词典中往往具有比较稳定的结构意义,但一旦进入文本往往就变得不稳定,其概念结构中某些可变性意义结构在(概念化的)语境因素的作用下会发生语义的嬗变,而这种概念结构与概念结构之间因互动而产生语义结构嬗变的认知机制值得翻译研究者的深入探讨,并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表征。如："The ***articles*** are untouchable in the *museum*."(博物馆内展品禁止触摸。)可将英语原文中的 articles (物品)生成汉语译文"展品"的概念语义结构嬗变的认知模型图示如下：



以上图示表征揭示了整体概念突显性义素映射于部分概念的一种认知模式，表明了翻译过程研究中概念结构嬗变的可描写性。曾利沙(2007a)将其理论认识概括为：在认知语境中，当一个部分概念与其相对应的整体概念发生关联时，二者在语义关系上则形成最大关联性语义参照。其概念语义的语境化生成过程是：作为整体概念的 museum 将自身概念结构语义中的关联性义素，即表方式的义素 displayed 投射到 articles 之上。也就是说，当部分概念 articles 与整体概念 museum 发生认知关联时，就获得了 museum 投射于它的关联性概念语义-义素特征，从而使得 article 的语义内涵扩大，外延缩小：物品→展品。 （曾利沙）

概念域 conceptual domain

与"认知域"同义，是认知语言学在描写语义时涉及的概念，特别是隐喻研究和隐喻翻译中常用到的概念。参见"认知域"

概念隐喻 conceptual metaphor

概念隐喻是指一个概念域(源域 source domain)的结构直接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目标域 target domain)的隐喻。西方有关隐喻的传统研究可追溯到2 000多年以前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代，其研究侧重点一直限定在修辞学或词汇学层面。随着 20 世纪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学者们开始质疑隐喻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的传统观点，而隐喻的认知功能逐渐受到广泛重视。拉科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合著的 *The Metaphors We Live By*(1980)一书标志着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他们基于经验主义哲学观，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并系统分析了存在于人类思维中的隐喻概念体系。他们明确指出，隐喻性表达不是语言上的，而是思维上的，是普遍的"跨概念域的映射"。概念隐喻可进而分成三种主要类型：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和实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结构隐喻是指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方位隐喻指参照空间方位而组建的一整套隐喻概念，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人们的空间感知，因此也称为空间隐喻；实体隐喻根据人类对物体的经验，尤其是对自己身体的经验，把抽象的概念看作是实体和物质。他们还提出了概念隐喻的两个主要特征：概念隐喻的系统性(systematicity)和文化一致性(cultural coherence)。这两个特征形成了构建日常语言系统的基础，同时也是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基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隐喻概念系统与社会文化的最基本价值观念相一致。例如："她唱戏唱红了"和"His mood grew *blacker*."两个语句中的颜色概念"红"与"black"都不是指颜色本身，而分别指"出名"和"生气或沮丧"。韩礼德(Halliday)在其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中，将语法隐喻理论分为概念隐喻(ideational metaphor)和人际隐喻(interpersonal metaphor)。概念隐喻包括及物性隐喻(metaphor of transitivity)和名物化(nominalization)。韩礼德和马希森(Matthiessen)对概念隐喻进行了归纳，总结了 13 种类型(Halliday, Matthiessen 1999)。

国内有学者从概念隐喻的语篇多维分析视角出发探讨概念隐喻的语篇体现性(任绍曾 2006)。在翻译理解过程中，充分了解英汉概念隐喻的语篇相似性和文化差异对于翻译表达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具有方法论意义。何伟和张娇(2007)以概念隐喻为依据，从翻译研究中意合与形合的角度来探讨古诗词英译中的一些问题，发现概念隐喻可以解释从意合向形合转换中的一些诸如紧缩句、模糊性以及无主句的英译问题。 （曾利沙）

概念整合 conceptual integration

是为了发展和完善心理空间理论而提出的概念，是探索意义构建信息整合的理论框架，它涉及心智空间网络动态认知模型合并的运作过程(王正元 2006)。最早由美国语言学家福科尼耶(Fauconnier)以及他的认知语言学同事所创立，目前被应用于认知语言学及小说语用分析领域。概念整合就是将来自不同心理空间的信息整合起来的一系列认知活动，它是将两个输入心理空间(input mental space 1 and input mental space 2)通过跨空间的映射(cross-space mapping)匹配起来，并把它们有选择地投射到第三个空间去，即一个可以得以动态解释的复合空间(blended space)。跨空间映射需要诉诸输入空间里

共有的图式结构，该图式结构包含在第四个空间即类属空间里(generic space)。这四个空间通过投射链彼此联系构成一个概念整合网络(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Fauconnier 1997)。福科尼耶和特纳(Turner)(1998)指出，要得到合理的复合空间，概念整合必须遵守五条优化原则(optimality principles)：1. 整合原则；2. 构造原则；3. 网络原则；4. 解包原则；5. 充分理由原则。王全智(2005)认为，概念整合理论中的"理由充分原则"是对莱布尼兹(Leibniz)的"充足理由律"的继承，其他四项原则是对可能世界理论的发展。心理空间理论强调人的认知结构在语篇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作用，而可能世界理论则较多地借助于语言之外的场景解释语言意义。概念整合理论可以有效地用于解释复杂的隐喻现象(Grady, Soulson 1999；汪少华 2001)；概念整合网络的显著特征就是要构建一个具有新结构的复合空间，同时又与整个网络保持概念的连接，概念整合网络在虚拟句、范畴延伸中都非常突出(苏晓军，张爱玲 2001)。

心理空间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翻译中某些概念或文化转换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孙亚(2001)用心理空间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去解释翻译过程，认为译文的产生是原文本和译者理解共同作用的结果，译文空间是原文本空间和译者空间概念合成的产物，而合成空间具有创造性，符合译学界"翻译是译者的创造性劳动"的共识。例如：Finding that reference was just the *icing on the cake*.(找到那个例证如蛋糕上的糖霜，无之丝毫不损，有之锦上添花。)原文 icing on the cake 词典释义为 an attractive though inessential addition，隐喻的认知联系说明"例证和论点"正如"蛋糕和糖霜"，对于已经得到充分说明的论点来说，没有此例证丝毫不减说服力，有它则是锦上添花。由于这种隐喻关系在译者空间里不存在，不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故译者的处理方法是将原文的语言形式"蛋糕和糖霜"投射到译文空间，把其传递的隐喻关系用目的语表达出来，二者累加形成整合空间里的概念。王斌(2001)从认知结构的角度将翻译研究纳入概念整合网络，使之具有动态操作性，以期解决传统翻译观中难以解决的种种矛盾。参见"心理空间"

(曾利沙)

认知科学 cognitive science

指研究人的思想过程中信息处理机制的一门科学。学术界普遍认为，认知科学是一门了解人的智能性质及人们怎样思维的科学，它运用信息技术来研究人类思维活动。认知科学涉及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生理心理学、人类学和哲学等学科范围，是在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和语言学深入发展的推动下产生的。认知科学以认知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人的大脑如何感觉、知觉，如何构词造句、归纳整理、分析综合，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 人的意识、知觉、记忆、思维等过程；② 人的记忆过程的机制，外界信息暂时贮存、选择、分类、强化、唤起、联络的过程；③ 人如何通过语义网络进行联想，唤起言词、概念、往事的记忆，进行联想、推论；④ 动机、情绪因素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教育和训练在认知过程中对思维程序改变和改良的机制，认知系统操作的规律及其结构，语言及物理符号的处理过程。目前，认知科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功地揭示了人类的一些思维过程，借助计算机成功地进行了几何定理、物理定律的重新发现，再现了人类科学发现的过程。

记忆 memory

记忆是脑储存信息的一种机制，是思维主体对经历过的事物有所反映，并在大脑皮层的暂时神经联系中留下痕迹的过程。记忆的基本过程是识记、保持、回忆和认知。识记是接触各种事物，进行辨识，在大脑皮层上留下记忆的痕迹；保持是使大脑皮层上储存着的信息不致遗忘消失；回忆是指接触过的事物不在面前，回想起感知时的印象；认知是当过去接触过的事物再次出现时，能重新加以辨认。这四个环节是密不可分的。识记、保持是回忆或认知的前提，回忆或认知是识记、保持的结果。根据记忆时间的长短，记忆可分为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根据记忆内容的不同，记忆可分为感知形象的记忆、语词概念的记忆、情绪的记忆和运动的记忆等。牢牢记住或想起自己所读、所听、所思的内容，是对翻译工作者特别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翻译工作者，特别是口译人员，想尽各种办法来加强记忆力。参见"记忆方法"

工作记忆 working memory

一种短时记忆性质的记忆体系，指在执行认知任务过程中，既负责信息存储又负责信息加工的一个资源有限的认知系统。工作记忆的语音信息保持量很小，时间也很短，但可以通过"默读复述"(subvocal rehearsal)(亦称"默读发音"[subvocal articulatory])对所存储的信息进行暂时性加工，不断激活存储的语音表征以防止记忆痕迹消退。

同声传译既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信息处理活动，同时又蕴涵着复杂的心理认知加工过程，特别对口译员的工作记忆资源有重大影响。一方面，同声传译活动干扰了工作记忆系统对输入信息的加工处理，影响信息保持效果；另一方面，同声传译训练和实践又对提高工作记忆能力，特别是加强信息存储容量，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长时工作记忆 long-term working memory

一种能迅速而可靠地向长时记忆提取信息的机制。"长时工作记忆中的信息可以稳定地较长期地保留，同时又可以通过短时工作记忆中的提取线索，建立一个短暂的提取通路"(杨治良 1999：138)。因此，以前认为信息固定、存储和提取速度缓慢的长时记忆

也可以参与在线信息处理。

口译过程中译员从听到语音信息到口译完成需要暂时储存和保持相当的信息,这就要求译员具有超强的工作记忆。倘若仅仅依赖短时记忆中即时存放的信息,而不借助于长时记忆中的知识,就无法整理信息并使之系统化,难以完成此后诸如理解、做笔记(主要在交替传译中)、转换、表达等过程。埃里克松(Ericsson)等人认为长时工作记忆参与了阅读理解过程,这时长时记忆也起了作用。"阅读理解的特点是对连续出现的句子形成一个连贯的表征。当前的信息要成功地与这个表征结合,读过的信息必须在工作记忆中随时可供提取"(Ericsson 1995)。需要扩大工作记忆容量来储存和保持这个连贯的表征,使新信息能不断与之结合,保证理解的进行,短时工作记忆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只能依靠长时记忆中的一个缓冲器,即长时工作记忆,将工作记忆与长时记忆迅速可靠地联系起来。

虽然长时工作记忆理论只讨论了阅读理解,而未涉及听力理解,更未涉及口译时的理解,然而"阅读理解与听到语音信息时的理解非常相似"(Ericsson 1995)。因此,有理由相信长时工作记忆参与了至少部分的口译过程。参见"工作记忆"　　(曾利沙)

记忆方法　memory methodology

指克服遗忘、加强记忆的方法。长期以来,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翻译工作者,特别是口译工作者,运用这些方法收到了良好效果。这些方法有:1. 理解记忆法。加深对内容的理解,有助于增强记忆,如口译人员译前对所译内容的了解;2. 语词辅助记忆法。如口译人员通过速记关键词、中心词来记忆住大量材料;3. 形象记忆法。通过想象和联想的办法,借助于形象记忆抽象材料。如一位资深口译人员谈翻译经验时说道:"尽管我对他(外宾)讲的许多具体词句已经记不清楚,但是他描绘的种种情景却像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留在我的眼前,我不是逐字翻译,而试图用中文来再现他描绘的画面。"4. 谐音记忆法。根据所记材料(特别是抽象的数字与符号)的读音与另一组语词读音的相似性来加强记忆;5. 反复记忆法。定期进行复习,能保持较长时间的记忆。记忆的根本方法是增强所记信息与脑内储存信息的广泛联系,密切表象、意象和概念之间的联系,促进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相互配合。

长时记忆　long-term memory

与"瞬时记忆""短时记忆"相对,指一种较长时间的记忆。心理学中一般认为,凡是保持时间超过 1 分钟,乃至终生不忘的记忆,都属于长时记忆。在长时记忆中,信息的储存比较牢固,难以忘记。但随着人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增加,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异和淡化。长时记忆与瞬时记忆、短时记忆是密切相关的,任何长时记忆都由一部分瞬时记忆、短时记忆经过反复感知,或某一方面的感知信息特别新鲜、奇异,转化为长时记忆,并在神经系统的生理机制中形成较稳固的神经联系。

人类在社会实践中要高效率地进行思维活动,思维主体的长时记忆所储存的大量信息是十分重要的。通过积极主动的思维,加深对记忆内容的理解,是实现长时记忆的重要一环;借助于形象思维过程中的情感性、趣味性、多维性,是达到快速记忆、长时记忆的关键因素。

在翻译过程中,长时记忆影响理解和表达。在处理句子的过程中,记忆的结构在积极地活动。交际中,人们经常使用多义词或歧义句,可是它们一般不会使人误解,因为谈话的特殊语境只容许某一种意义存在。例如英语的 sentence 有几种意思,如果在讨论语法时提到它,准是指"句子",而不会是"宣判"等意思。需要表达时,就按这样的理解去表达。这当然和长时记忆中的知识有关。

短时记忆　short-term memory

普通心理学中根据记忆时间长短对记忆类型的一种划分,一般是一分钟以内的记忆。口译工作者需要加强短时记忆的训练。研究认为,短时记忆是由于瞬时记忆的信息受到充分注意而形成的,是以语言听觉形式编码的。它的特点不同于瞬时记忆,也不同于长时记忆。其一是人在短时记忆中对信息有了一定的加工,了解到信息的某种意义,而不是被动的表面感知;其二是记忆时间较短,记忆痕迹易随时间推移而消失;其三是记忆容量有限,主要是识记临时接触并应用的某些信息。短时记忆对口译人员是极其重要的,例如:但是,我亲自考察过四川阿坝自治州地区的森林,八年到十年就可以长成森林。(朱镕基)口译成"However, actually, I also once paid an inspection to the A'ba region in Sichuan Province to see the situation of the growing of the *trees and forests*, and *I learned that* it would usually take 8 to 10 years *for the infant trees* to grow up and form the forests."原话中没有"我了解到,幼树经过"之类的字句。口译员在短时记忆中理解了信息的内涵并迅速作了加工,于是在译语中补充了 I learned that 以及 for the infant trees 这些成分。同时,口译员为了使译语在不违背原话意思的基础上更有逻辑性,在翻译中间一个逗号的前面一部分时合情合理地加上了 trees (树木)这个词,这样就使逗号前后两部分在逻辑上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

瞬时记忆　immediate memory

亦称"感觉记忆",指感知停止后,瞬间即逝的短暂记忆。其特点是:每次记忆的容量有限,保持时间短,容易受干扰等。经过专门训练的同声翻译人员具备较强的瞬时记忆能力。在听觉范围内,瞬时记忆的材料保持的时间约在 0.25 秒至 2 秒之间。其生理机

制是在感觉通道的末端,在刺激停止后有关神经元的活跃状态的短暂继续。从控制论的观点看,瞬时记忆是对信息的比较简单的储存,不进行心理加工,还未意识到所感知的材料。信息的储存是以感觉痕迹的形式保存下来,具有鲜明的形象性。

反应 response

1. 指机体受到体内或体外的刺激而引起的相应的活动。人受刺激所引发的显思维活动和行为表现大都是反应,其中尤以言语反应的心理机制为复杂。译者应具有较强的言语反应能力。反应特别是口译人员的基本功之一。言语反应首先来自正确的判断。例如,在记者招待会上口译下列句子:**谁赞成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就支持谁,我们就跟他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让步,让步给中国人嘛。**(朱镕基)(Whoever stands for one China will get our support, and we can have talks with him, and our talks can cover anything, and there can also be concessions made on our part, *but these concessions will be concessions made to our fellow Chinese.*)句中的"让步给中国人嘛"这部分较难翻译,因为它跟这句话的其他部分的逻辑关系不很明显。口译员此时对这句话要作出类似这样的反应:"只要你承认你还是中国人,我们就可以作出让步,因为毕竟咱们都是中国人嘛。"然后把"源语概念"迅速"换码"为"目的语概念",进而把"目的语概念""解码"成"目的语符号"。

皮亚杰(Piaget)通过对 S—R(刺激—反应)公式的否定,提出了 S→(AT)→R 公式,即那某一特定的刺激(S)被个体同化(A)于认识结构(T)之中,才能对刺激(S)作出相应的反应(R)。皮亚杰这一否定,揭示了先有主体对客体刺激信息的过滤与变化,才能有主体的反应。而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实质,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反映,决不可能是完全的反映。而这一切,又都是以主体的一定"图式"为依据与原因的。在翻译实践中,译文也只能是对原文刺激的同化的结果,是译者以一定"图式"为依据,对原文或一定形象组合的筛选和改变的结果,也是译者对来自原文信息的能动加工和消极变异的结果。这种"图式"主要包括译者的主体性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两方面。

2. 奈达所用的术语。他认为:"翻译的重点不应当是语言的表现形式,而应当是读者对原文的反应。"这种反应不完全是心理意义上的反应,而包括感觉、意见、态度,甚至行动。参见"读者反应论"

内化 internalization

与"外化"相对,原为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中的一个概念,指人的肢体动作投射到脑内,转化成为脑内映象的处理动作,或对象运动变化投射到脑内转化成为脑内映象的运动变化。从思维发生的意义上讲,思维就是动作的内化。在单语交际中,含意内化是指在特定语境中语言单位的形音义承载隐性表述的过程。即将显性表述转化为显、隐表述关系的过程。

在双语交际中含意内化则是指原文信息内化于译文语境、寓意于言外的语言转化现象,内化的结果是原文的显性表述在译文中转化为显、隐表述的关系。总之,内化是一个形式上表现为化显为隐、化繁为简,而思维上表现为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推理过程。在翻译过程中,内化的具体表现是减词。当然,减词不都是内化,其中,有时采用减词的译法只是目的语的结构性调整,属于语法性减词。例如:He was thin and haggard *and he* looked miserable.(**他消瘦而憔悴,[……]看上去一副可怜相。**)汉语主语往往可承前省略,连词 and 从汉语句子结构考虑更不用译出。这里所说的减词侧重于信息传递方式的转换,即属于语义内化。又如:In the bus station lobby, I looked for signs *indicating* a colored waiting room, but saw *none*.(**在长途汽车站大厅里,我找来找去[……]就是不见[……]黑人候车室的牌子。**)例中,sign 本身蕴含 indicate 之意,属冗余信息,英语主要用于衔接;在汉语里,对此无须赘言。此外,在转换过程中 none 的指称意义归并于它的先行词"牌子",因而化显为隐。内化程度的高低不在于减字多少,而在于源语显性表达中冗余信息的含量及其可转化的隐性表达的程度。

外化 externalization

与"内化"相对,原为皮亚杰(Piaget)发生认识论中的一个概念,指主体脑内的映像操作和经过操作被加工的映像转变为作用于相应客观对象主体的肢体动作。若把思维看做动作的内化,则动作就是思维的外化。在思维的认知实现过程转变为思维的物质实现过程中,外化是关键环节,能够外化的思维才能够物质实现。不能外化的思维不能转化成为物质成果。

翻译中的"外化"就是指把语义深层的内容上推,提升到语符表层。这是一个将原文信息化隐为显、形式上化简为繁的过程。特别是要将源语隐含的文化因素外化,例如:*Hygeia* herself would have fallen sick under such a regimen; and how much more this poor old nervous victim?(**按照这样的养生之道,别说可怜的心惊胆战的老太太了,就连健康女神哈奇亚也会害病。**)把 Hygeia 简单地译为"哈奇亚",国内读者就感到茫然,不知"哈奇亚"为何人何神甚或何物。一般西方人知道 Hygeia 是希腊神话中的健康女神。为了使译文读者的感受跟原文读者的感受相当,宜将 Hygeia 的基本特征显示出来,加上"健康女神"四字。

再现 reproduction

亦称"重现",指经验过的事物在头脑中重新呈现出来的记忆过程,如回想起已掌握的知识,做学过的动作,再体验经历过的情感,都是再现。翻译中所说的再现是指把一种文字的思想内容及相关形式用另一种文字表现出来。心理学认为,再现是在某种刺激物,特别是有关词的影响下,引起头脑中已形成的相

应的暂时神经联系的兴奋,表现为原有的刺激痕迹的活跃,或已贮存的信息提取的心理过程。

翻译中的再现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而是在译者的意识控制下,运用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通过译者的意志和努力进行的。刘宓庆从审美过程的理解层面开始谈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构成的理解(了悟)→对理解(了悟)的转化→对转化结果的加工→再加工结果的再现。可见再现的起点就是理解,它是高层级的审美构建过程。"(刘宓庆 1995: 298)

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的术语,表示人的需要层次结构里最高层次的需要,即成长、发展、利用潜力的心理需要。在马斯洛看来,大多数人都有想要变得越来越像人的本来样子、实现自己的全部潜力的欲望,却只有极少数的人真正达到。这极少数的人是人类中最好的典范,他们精神健全,具有非凡的能力和崇高的品德,能充分地开拓并运用自己的天赋、能力、潜力,不断地发展或发现真实的自我。一个人趋向自我实现有八条途径:1. 充分地、活跃地、无我地体验生活,全身心地专注于某一事业;2. 不断地作出成长的选择,保持积极和进取的态度,不趋向于防御、畏缩、安全;3. 倾听自我内在冲动的呼唤,排除外界的干扰,让自我得以显现;4. 当有怀疑时,老实地说出来而不隐瞒,敢于承担责任;5. 保持独立性,敢于与众不同;6. 竭尽所能,在任何时刻、任何程度上实现个人的潜能;7. 高峰体验是自我实现的短暂片刻,此时的人比平时更果断,更坚强,更能把握自己;8. 揭露自己,弄清自己的底细,如自己是哪种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自我实现一旦成为译者的一种需要,将驱使译者不断去完善自我,以"最有效和最完整的方式"去表现自我,努力将最好的译品奉献给读者,而只有当读者对译品的反映达到预期的效果时,实现自我的需要才会暂时得以满足。然而,对于一个矢志于翻译事业的人来说,自我实现的这种需要并未终结。为了实现这种需要,译者甚至可以把个人最宝贵的东西——健康和生命都赔进去。朱生豪贫病交加,十年中译出莎剧31部半。同时,他还将研究和翻译莎剧的心得、体会、见解写进序文、提要、题记、书信之中。在临终前不久,他不无遗憾地说:"夫以译莎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于兹矣。"(朱宏达,吴洁敏 1988)

自我意识 self-consciousness

指主体对自己及自己在人们的共同社会活动中的地位的一种认识,是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心理学家习惯于把意识的内部结构分为知、情、意三个部分。人们通常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自我意识,即对自我的认识、对自己的态度以及对自我的行为的调节。自我意识包括自我感觉、自我评价、自我观念、自我监督、自尊心、自信心、自制力、自卑感、独立性等。自我意识的完善可以极大地调动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翻译主体虽然处处受到客体的制约;方寸之地,步履维艰;"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是译者仍然在不断地完善自己,表现出对翻译的自信以及对翻译行为的自尊心和责任感。

形象 image

指客观物质存在的具体形态。物质是一切形象的共同本质,形象是物质的具体存在形态。形象不只是日常生活中所指的视觉形象。科学的形象概念,还包括物质形象的各个方面——形象在空间的内部层次结构,能发出的音响、散发的气味及其温度、硬度等。在人类社会中,除了第一性的形象——自然物质形象外,还有第二性的形象,即人经过有意识的思维活动创造的形象。后者是前者能动的反映,即经过重新加工组合的形象,是人的精神意识和自然物质形象的统一,文学形象或艺术形象属第二性的形象。参见"文学形象"

直觉 intuition

一种特殊的思维活动,是"直接的了解或认识",是与地点、时间感密切结合着的专注而迅速的思考。具有直接性、理智性、快速性,以及对思考结果正确性的自信感等特征。通常表现为:对感知的事物一瞬间作出的直接的确定的评价、创造性任务的迅速而直接完成。例如,当译者读到原文的片言只语(如标题)时,可能直觉地了解到原文的主要内容或内容倾向,甚或树立起一个大致的形象。当译者在表达时,觉得某个句子不通,但并没有以句子的语法分析为中介,而是直接感到它有毛病。这种思维形式有别于一般的思维形式,它是直接觉察而不是间接认识,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说是思维过程跳过"所以然"。直觉有时是在直观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思维活动,有时是在阅读中产生的一种瞬时反映。例如,对工艺品或文学作品的美能"心领神会",作出正确的判断,但说不出理由和依据,甚至连自己的审美观和艺术标准是什么也不知道,这就是直觉。翻译中的语感是一种直觉,对翻译的理解和表达都有一定作用。但翻译主要不是靠直觉,而是靠艰苦的充分的思考与实践。

表象 figurativeness

思维主体在较长时间内所记忆的客观事物感性形象的总称,是人脑反映客观世界的最基本的映象,也是形成理性意象和创造性再造意象的基础与前提。按照传统心理学的一般解释,表象是指人脑中所保持的客观事物的印象,也就是记忆或储存在人的主观世界之中的客观世界的形象。与后像不同,后像是一种最直接、最原始的记忆,是经过形象信息刺激作用后

直接形成的，存在的时间较短，表象却可以相对长期地保存在记忆中。表象与意象也不相同，意象是被思维主体认识和理解了的一部分表象。人们所记忆的表象，不可能被思维主体同时全部理解，当思维主体对某一客观事物形象的内在属性或本质有所了解时，表象就转化为意象。

注意　attention; notice

指把意志放到某一方面，思维主体在思维活动中的指向性和集中性。思维主体一旦被思维的对象所牢固吸引，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会产生思维的专注性。注意在人的一切社会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注意力是一个人的个性品质和能力结构的重要因素。

心理学上区分四种注意力：集中注意力(focalised attention)、选择注意力(selective attention)、共享注意力(conjoint attention)和持久注意力(maintained attention)。四者当中，共享注意力对于口译尤为重要。因为，口译过程中，双重或多重任务的共时性要求译员采用共享注意力来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关于人类把注意力分配给几个共时任务的能力，现今有三种假设。第一种认为，活动主体要在同一时间完成几个不同任务，需要付出额外的精力。第二种认为，活动主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时进行几个共时任务，而是学着怎样使注意力在不同任务间迅速转换。第三种认为，活动主体掌握了使用共享注意力来同时完成几个共时任务的能力后，可以在自动化的状态下完成其他的共时心理活动，而不必要用同一中央控制系统来监视每一个活动。兰伯特(Lambert)对于口译注意力的研究比较多。他指出，职业译员所具备的共享注意力是一种"习得能力"，上述的三种假设在这种能力习得过程的不同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在初级阶段，译员将被迫采用额外的注意力或者迅速转换注意力的策略来完成口译任务。但是，当译员具备了在几个共时任务中分散注意力的能力之后，这种额外的精力将减少，某些心理活动也将成为高度自动化的过程。(Lambert 1995)

兰伯特在前人提出的假设基础上，通过实验进一步检验了集中注意力对同声传译的作用。(Lambert 1995)他发现，职业译员在语言输入和语言输出间任意转换注意中心并没有什么益处。因为，对于职业译员来说，同声传译是由一系列的不同任务构成的，且其中的大多数已经高度自动化，随意变换注意中心只能事倍功半。他同时还发现，职业译员在语言输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左耳的优越性与注意机制的相关功能无关，而有可能和译员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功能侧化(cerebral 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有关。

除了兰伯特的研究外，吉尔(Gile)还观察了交替传译过程中记笔记与注意力的关系。他通过实验证实，记笔记能转移译员用来"听"的注意力，并导致译员听力质量的明显下降。吉尔认为，记笔记需要消耗掉部分正常情况下用于"听"和"分析"的注意力，这将影响译员专心地听发言人的讲话。(Gile 1991)

纵观口译领域注意力的研究可以发现，现今的研究还仅局限于揭示不同类型的注意力在口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将来此范围内的研究应该向口译注意过程的模式化方向发展，这将是口译认知过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明 2008)

语言心理　linguistic psychology

亦称"语言文化心理"。当代心理学的实验对语言制约人的思维与认知作了肯定的论证。根据斯特鲁普(Stroop)的干扰实验，熟练掌握自己母语的人，当使用某一特定词的时候，必然在内心里激发起关于这词的语意代码。例如中国人看到或使用"红(色)"一词时，经常跟喜庆、欢乐、好运、荣耀、革命之类的意义联系起来，而西方人对 red 一词的联想除了也有"喜庆""欢乐"的一面外，却也有"暴力""流血"的一面。或许，出于这样一种文化心理，英国翻译家霍克斯(Hawkes)在翻译《红楼梦》时，回避"红"字，将这部巨著的篇名译成 *The Story of the Stone*，取其原名《石头记》，而不用现名《红楼梦》；将"怡红院"译为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将"怡红公子"译为 Green boy；将"悼红轩"译为 Nostalgia Studio，等等。又如，黄色在汉文化中代表万世不变的大地的自然之色，在汉民族语言心理中代表帝王之色。皇宫和寺庙以黄色为主，给人以辉煌、庄严、崇高之感。天子登基按黄历(almanac)择黄道吉日(lucky day)，黄袍加身(to be acclaimed emperor)。而后，他可以示黄榜(emperor's document)，派黄衣使者(high-ranking officials)。及至现代，皇帝早已入土，"黄"字的词义色彩又有变化。在文化领域内，黄色小说(filthy novels)、黄色音乐(vulgar music)、黄色电影(pornographic films)已入"横扫"之列。

一个民族的语言结构和词语运用与其心理结构和心理活动有内在联系，因而对源语的分析和理解必须符合说话人的真实心理活动过程。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对源语的分析和理解必须符合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语言认知心理。

类属划分　categorization

认知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主要方式和分析手段。现代心理学实验证实，人类的认知是以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类属划分为基础的，反映到语言上就变成词语范畴化。范畴是把那些互有联系的事物归为一类，划为一属。类属划分的认知过程对翻译有一定的解释作用。现有下面一组典型英译汉例子：the motion of *matter*（物质运动）；printed *matter*（印刷品）；a *matter* of 3 kilometers（3公里左右）；The article is full of *matter*.（该文章内容丰富。）；What's the *matter*?（什么毛病?）同样一个英文单词 matter，为什么要译成不同的汉语词？按"规定"式译论做法，首先罗列出若干实例，然后加以规

定：matter是一词多义，具体含义视上下文而定，等等。其实，matter在客观世界对事物的不同的类属划分，反映到汉语里自然也有相应的划分，于是就有了"物质""品""内容""左右""毛病"之类的概念。所以，从认知的类属划分看，翻译是将一种语言里的类属划分映射到另一种语言里的类属划分。译者的认知能力使他能够判断某一特定事物、事件该用某一特定的语言范畴来划分类属，即什么时候matter解释为"物质"，什么时候解释为"内容"，等等。

图式理论　schema theory

心理学名词，指人脑内发生的关于外部世界秩序的组织化了的心理结构，是人们赖以认识和理解周围事物的基础。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周围的人、物体、事件和情景，在大脑中形成不同的认知模式。这样的认知模式不是大量事物和经验的简单罗列和堆砌，而是围绕不同事物的有序的知识系统——图式。图式学说及其建构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是如何准确地被组织到人的头脑中去而形成人的正确认识的，对揭示反映的实质有一定启发意义，对探索人脑创造性思维的机理也有很大借鉴意义。现代信息加工理论学派则把图式学说提到了更高水平。持这一观点的人把图式看做信息加工过程所依据的基本要素，与计算机的程序软件有某些类似之处，即图式是有结构的，可以形成网络，也可以嵌套，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子结构，可以在各种抽象水平上表征知识。参见"知识图式"

知识图式　knowledge schema

认识主体在认识各种客体，如人、物体、事件、情景等过程中，往往在大脑中形成各种有序的知识系统。如kidnapping(绑架)这一事件的知识图式结构包括"绑架者""被绑架者""匿名信(或匿名电话)""赎金""恐吓(不得报警)""撕票"这些结构成分。这些成分在任何一个绑架事件中除了"撕票"这一结构成分有时具有不稳定性外，其他的结构成分一般都是稳定和必然的。故一个有关客观事物的整体认识被感知加工后，即形成相对稳定的、可以预知的图式结构。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Bartlett)最早在*Remembering*(1932)一书中提出这一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课题，因为要使计算机识别和理解典型的场景和话语，计算机就应像人那样具备各类场景、物体和事件的"常识"。随之，知识图式又被语言学家们用于研究阅读和理解不同文本和话语中所包含的文本图式。心理学实验证明，知识图式对阅读理解和记忆的提取有重要作用。它对翻译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 为解释篇章提供参照：在信息读取过程中，篇章内容与读者头脑中的知识图式交汇融合，构成新的、更为具体的图式，从而完成理解过程；2. 有助于词义的确立和选择：词在不同场合表达的意义往往不同，假如你在美国餐馆里听见有人在点submarine，那么，即使你不知道他要的是一份三明治，你大概也能猜出他要一份食物，而不是一艘潜水艇；3. 有助于对下文的预测：文章内容可以激活读者头脑中相关的知识图式，于是有可能顺着已知内容展开下一步情景。除了知识图式外，还有语言图式和文本结构图式。解读一经完成，概念就从源语文本中剥离。这时，语言图式和文本结构图式作用于目的语的产出阶段。

贝尔(Bell)(1991)尝试用系统语言模式结合认知图式描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大脑的工作过程，并用"聚合体"(aggregates)、"整体"(wholes)、"系统"(system)等概念描述认知过程；王立第(2001)运用图式理论相关概念和典型分析法，剖析了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程式、代表发言内容、有关法律文献特点等，探讨知识图式对口译过程中理解源语、记忆与提取信息以及目的语表达等方面的作用；刘明东(2002)就图式在翻译解码与编码过程中的作用作了实例分析；周红民(2003)通过对图式与语言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翻译的认知过程就是译者利用知识图式对源语文本意义进行认知，形成概念，用目的语图式对译文的表达方式进行干预的过程；陈巧玲(2004)运用脚本理论探讨口译行为；张美芳(2005b)运用贝尔的认知图式分析隐喻的翻译过程，以期探讨译者如何根据自己的经验去理解原文中的概念代码，以及如何根据目的语环境进行概念代码的转换以产生出一个能在目的语中与原文相似功能的译文。参见"图式理论"　(曾利沙)

容器图式　container schema

人类潜意识中认为自身的整个躯干是一个容器，身体内部有各种器官、骨骼、血肉等，皮肤是身体与外界的界限，这是容器图式的身体经验。人类最先意识到的是自身的存在状况，然后才会延及其他事物。通过容器图式，人们可以把许多抽象的、杂乱无章的语言现象联系起来，形成有规律的、系统的结构。拉科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1980)认为在身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认知图式是先于概念而存在的，容器图式是认知图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人体是一个三维容器，有"吃进""吸入""呼出"和"排除"等生理现象，还有"走进""走出"等一系列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物理空间关系，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抽象的图式，即容器图式(Johnson 1987：21)。基于"里-外"关系的容器图式的结构组成为：内部，界限，外部。该图式的基本逻辑是：任何事物只能在容器内或外。如果容器A在容器B中，X在A中，那么X一定在B中。例如，在"He falls in love with Helen."中就可把love看成是一个容器，He的位置在容器里，于是，他就处于"恋爱"状态之中。容器图式可以通过隐喻扩展运用于抽象的认知域，如视野、事件或活动、社会群体、状态、心智或观念、时间、困难等都可以被看成是容器。拉科夫和约翰逊把容器图式看成是由一组本体隐喻组成的图式。人们通过对

自身的了解，投射到对其他具体的空间领域和日常生活经验的抽象事物上，从而了解身体以外的其他事物、事件或状态。这样，其他事物或事件等也可看成人的身体，想象成是一种容器，把它概念化，于是就产生了容器隐喻。(Lakoff, Johnson 1999: 36；李瑛 2004；李云 2007)

容器图式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翻译过程中某些概念转换呈现出的差异现象。例如：All they *think of* is money. (他们脑子里想的全是钱。)刘华文(2003)对此种翻译现象给予了说明，认为在由"容器"和"内容"组成的认知模式中，一般来讲，容器的显著度要大于其所包含的内容，因此常常是用"容器"来转指内容(这也是转喻的认知机制)。在汉语中，由于人们在认知过程里，常认为"脑子"(即容器)较其所含的内容显著，所以常把它作为认知的入口，于是，就用一个由"脑子"组成的源认知域指代内容，也就不难理解译者为什么把该句译为"他们脑子里想的全是钱"。参阅"知识图式" (曾利沙)

意象图式 image schema

最早由拉科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在 *Metaphors We Live By*(1980)一书中提出，是概念隐喻相关理论的概念之一。其后，约翰逊在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1987)一书中详细地讨论了意象图式的体验基础以及意象图式在意义建构和推理中的作用。后来被运用于认知发展、心理语言学、诗歌研究、文学批评、语法理论等领域(Langacker 1991; Mandler 1992; Gibbs, Colston 1995)。拉科夫(Lakoff)在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1987)一书中运用意象图式理论建构了自己的范畴理论。不同研究者对意象图式给予了不同的界定。代表性的观点有三：1. 意象图式是感知互动及感觉运动活动中不断再现的动态结构，给我们的经验以连贯和结构(Johnson 1987: xiv)；2. 意象图式是指"空间关系和空间中运动的动态模拟表征"(Gibbs, Colsten 1995)；3. 意象图式是为了把空间关系和空间结构映射到概念结构而对感性经验进行压缩性的再描写(Oakley 2004)。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意象图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主体对空间事物运动的一种感知结构，并且这种结构是动态连贯的；二是意象图式具有对现实事物进行抽象概括的可表征性，体现为一种描写性的概念结构；三是意象图式具有可体验性，是不断再现的；四是意象图式与人的经验结构相匹配，不过是一种经过压缩了的经验结构的映射关系。如"进城"这个意象图式的空间关系与空间结构映射到概念结构之中则为：起始(出发)——行进(途中)——目的地(终点—城里)。这是一个经过压缩(或简化)了的具有动态特征的空间关系经验结构，并且具有可体验性和再现性。意象图式也可为翻译研究提供特定的视角，尤其是从英汉对比研究角度考察，能提供一种描述工具。如：He went to town yesterday. (他昨天进城去了。)英语语句激活的意象图式是：起始点——途中——终点(他离开家——他走在去城里的路上——他进到城里)。在该英语语句触发的意象图式结构中，动词 went 触发的意象是该意象图式结构中的中间结构部分，突显的是往目的地去的途中——走在路上；而相应的中文译文"他昨天进城了"，突显的是目的地，"了"是行为动作的完成式标记。在无特定上下文的情况下，该汉译文语句的意象图式还蕴涵着一种扩展式的意象图式，即"他"去到城里并且从城里返回家中的返程意象图式：离家——往城里去——进到城里——返回——往家里走——回到家。就上述语句翻译而言，传统上认为是等值的译文，若从意象图式视角来看，其心理图景的突显方式及结构等则是不等值的。这无疑给翻译性质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考。 (曾利沙)

联想 association

指由一人、一物或概念而想起别的人、事物或概念。联想是信息在大脑中的一种加工方式和规律，即由当前的事物所放射的信息刺激在大脑中所形成的信息组织样式激活其他事物在大脑神经网络中所贮存的信息组织样式，或由大脑中所贮存的某个信息组织样式的兴奋而激活其他事物在大脑网络中所贮存的信息组织样式，从而使信息组织样式之间形成一种暂时的神经联系。

翻译中的联想是主体发挥能动作用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理解与表达的重要心理手段。译者通过联想在头脑中建立词与词、词与物、物与物以及音、形、义之间的相互的暂时联系。例如 snake 的首字母 s 可使人联想起蛇"咝咝"的响声，也可以联想起它在草中滑行时作 S 状。由 positive 可联想起它的反义词 negative，由 Six of one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 可以联想到它的汉语同义表达"半斤八两"，等等。联想可分简单联想和复杂联想。简单联想包括接近联想、类似联想、对比联想；复杂联想亦称"关系联想"，包括因果、种属、部分与整体、作用与效应等的关系联想。联想是信息提取的一种重要方式。有些联想不一定直接提供现成的译法，但可引起其他联想，间接地有助于理解和表达，或可激发想象与思考。

情感 affect

指以自身的某种生理感觉为特征的情感体验，包括喜欢、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即情感活动。

情感除了可以决定译者的选材以外，其作用还贯串于整个翻译过程。现代心理学认为，情感及其体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行为动机，成为人的活动和各种动作(包括动作完成的方式)的持久或短暂的动机，从而产生具有某种目的的意象和欲望。在翻译中，译者是否具备强烈的情感表现为其能否具备持久的注意力和深入感知翻译材料的兴趣。一般说来，在

强烈情感的驱使下，译者的深层心理容易被唤醒，译文中的情感世界与译者内心世界中积累的种种情感相互撞击而融化，从而激发出新的情感并凝聚于译文中。

情感，尽管是人类共有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相同。由于民族、性别、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以及所接受的文化教育等不同，人们对同一客观事物引起的情感也会不同。由于东西方人对红色的观念和情感不同，霍克斯（Hawkes）几乎把《红楼梦》中的红颜色都改译成了绿颜色。由此可见翻译主体的情感作用。问题是：译者既要正视自己的情感，又不能滥施情感；既要传达原作的情感，又不能完全埋没自己的情感。这就是处于矛盾中的译者情感的局限性。

想象　imagination

指在原有感性形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如译者在翻译文艺作品时构想人物形象，在翻译科技作品时构想实物形象。想象的生理基础是已有的暂时神经联系重新配合构成新的联系的过程。因此，人的想象是以记忆中保存的表象材料为基础，然后经过分析和综合等加工改造，可以创造出从未感知过的或实际上不存在的事物的形象。但是，构成新的形象的材料，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人的想象是在社会实践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表象材料对译者的想象有重要作用。有了丰富的表象材料，译者依据语言文字、图样、符号的描述或示意所作的再造想象才能顺畅。表象是想象的基本材料，没有必要的基本表象，大脑就无法进行合乎现实要求的、鲜明的再造想象；记忆表象越充实，再造想象越生动、越具体，译文才可能更贴近原文的形象或场景。毕生翻译左拉（Zola）作品的毕修勺曾“踯躅于巴黎的小酒店、咖啡馆、百货公司、菜市场……”（王寿兰 1989）可见，表象材料的积累，是译者根据语言的描述或图像的示意产生再造想象的基础。

感知　perception

由感觉形成知觉，即客观事物通过感觉器官在人脑中的直接反映。感觉是知觉的“材料”或“构成部分”，知觉在感觉的基础上形成。对于正常人来说，感觉总是“立即”或“自动”综合为知觉，极少存在孤立的感觉，但感知和感觉却是在大脑半球不同区域形成的。以口译为例，当译者听（感觉）到发话者的声音后，几乎同时把它转化为语言信息。此时，译者的大脑是异常活跃的。他要全神贯注于语言的内部结构即音、词、句以及语言的外部结构即情景及文化语境，通过发话者使用的各种衔接手段找出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并联系语言及文化语境对发话者的言语作出客观分析。笔译者通过朗读或默读把视觉符号（原文文字）转换为听觉符号，也就是通过语言感知使语音直接作用于言语分析器，与此同时，语言所承载的信息（语义）通过视觉符号本身的刺激作用反射到大脑。不同的是，口译对语音的感知倾向于从知觉的总体性接受一连串不间断的音流（其间包括节奏疾徐、语调升降、重音起伏等）。而笔译对视觉符号的感知却由于词语的间隔、标点符号的分隔、词语或结构的生疏而显得不连贯，从而眼球运动显示出跳跃性和往复性。语音感知和符号辨认都属于感知这个较低的心理直观层次，但由于视觉的广度较大，输送给大脑的信息相对多些。语音感知和符号辨认对翻译中语义的把握都具有直觉的透视作用。

意会　sense

指接受主体不用语言而凭借形象信息领会对方含义的形象思维方式。当人们欣赏意蕴含蓄的古典诗词时，常常会有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含义似乎可以心领神会，但却不能够用概括性的语句把心中的感受准确地表达出来。由于诗歌主要是由形象思维的形式意象组合而成的意境，在鉴赏的初级阶段只能给读者朦胧美的感受，而且由于读者的主观条件及欣赏环境不同，各人所意会到的理性内容也不完全一样。特别是我国古诗想象丰富，语言精练，“蕴藉含蓄，意在言外”，引喻用典，扑朔迷离，诗行间多省却主语，少关联字眼，意义上虽极有逻辑，但常有跳跃。所以译家无不感叹诗难译，有的甚至断言诗不可译。译者抽象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有高低，经过逻辑分析，大部分意会到的内容可以用语言说清楚（但译诗时有的仍须含蓄），但未必都能作相应的表达。

意识　awareness; consciousness

在哲学意义上，意识即精神。在思维学意义上，意识是人脑认识活动的保持和认识结果的保存状态。在人脑中，只要认识活动（从感觉直到思维）保持着，认识结果（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保存着，意识就存在；如果人脑中认识活动中止了，认识结果不再保存了，意识就丧失。始终能为主体自我觉察的意识活动称为显意识，在一定阶段不为主体自我觉察的意识活动称为潜意识。人脑仅限于取得对客体表层的认识结果的认识活动，是感性意识；人脑进而成为取得对客体深层认识结果的认识活动，是理性意识。人脑思维是具有理性意识形式的物质运动。

显意识　manifest consciousness

与“潜意识”相对，指能被“自我”有意识地控制、提取并参与思维活动的一种显态意识。显态意识或来自通过学习所继承的前人积累起来的知识信息，或来自经过人自身大脑的思维活动总结而概括出来的种种感性和理性的认识。显意识活动一般是自觉的。人们要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思维活动，就不能没有显意识，否则，人们的思维和言行就会变得盲目而混乱。因此，具有显意识和显意识控制的思维活动，是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人类显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它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词、概念和符号来加以表达或显示。人类的一切抽象思维活

动,主要是在语言、概念、符号等抽象信息构成的显意识控制下进行的。在形象思维活动中,意象的组合与分解运动同样也要受显态意识的控制。只有在灵感思维活动中,显意识和潜意识相互作用,突破或超越显意识的控制,并推动显意识不断深化和发展。

潜意识 latent consciousness

与“显意识”相对,指储存在大脑中的、不能被“自我”随意控制、提取并参与思维活动的一种潜态意识。潜意识活动通常是不由自主、不自觉的,如夜晚做梦。潜意识活动的存在,说明大脑的活动是分层次的。潜意识活动对于创造性思维、灵感思维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人们的思维如果只在现成的显意识活动,不激发与显意识相联系的潜意识活动进行创造性思维,认识就无从发展,新的创造也就不会产生。潜意识和显意识的划分是相对的,两者不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且也可以相互转化,有时犬牙交错,并无严格界限。有时,译者在翻译运思中感到滞阻,而一旦触发潜意识,豁然开朗,翻译的创造性由此而生。如陆谷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拳头产品’的译法问题,原译者根据某一部汉英词典硬译为‘fist product’,自然乖谬。当我煞费苦心想出‘blockbuster product’一语之后,走去打开电视机收看美国拳击比赛,看着看着脑际突然闪出‘knockout’这个词来,发现以‘knockout product’翻译‘拳头产品’意形兼备,至为妥帖,这种神思闪出[由潜意识转化为显意识——编者]的时刻确使译者体验无穷的创作之乐。”(陆谷孙 1998)

意象 imagery; image

属心理学、美学的基本概念,是形象思维创造与描述环节的基本思维形式,是由表象概括而成的理性形象,是事物的表象与主体对其深层之理解的辩证统一。意象以语词为其物质形式。语词既有抽象概括性,又有具体形象性。文学艺术通过语词表达形象化的观念——意象,进行形象创造。意象可分为:1. 单个意象和组合意象。单个意象是形象思维的基本单位,指可以构成组合意象的具体的个别的事物。组合意象则是由许多单个意象有机组合而成的,包括二重组合意象、多重组合意象,等等。2. 局部意象与整体意象。局部意象与整体意象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两者的划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由若干局部意象构成的整体,就是整体意象,而构成整体意象的若干局部的方面,就是局部意象。3. 静止意象和流动意象。反映事物相对静止状态的意象是静止意象,反映事物变动的意象是流动意象。静止意象亦称“静态意象”,流动意象亦称“动态意象”。如绘画中的静物写生是静态意象;舞蹈家的舞姿为动态意象。

在美学范畴中,它是指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艺术再现,映现主体对取象(客体)的情感移入。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它是主体头脑中的一幅“似象”的图像,是一种认知过程,这种认知过程的活动是主体头脑中有一幅与世界实存的情景相似的心理图像,而这种图像渗入了主体的意识情感,并具有文化与社会特征。因此,意象是语言借以映衬和匹配指称而融合了主体的主观感受的情感意味的心理表征。中国学者认为“意”是主体对客体的体验,“象”是客体,“意”加“象”便是主体对客体能动反映的产物,主体意象实现的基础是情物相连、情景交融。西方对“意象”的研究晚于东方。1913 年,庞德(Pound)首次对“意象”作了描述性定义:“理智与情感在瞬间的复合物”。后来,他从认知角度丰富和补充了意象这一概念,认为意象并非一个单纯的意念(idea),而是一个融合在一起的辐射中心或集束(a radiant node or cluster),充满着能量。最后,他将这个充满着能量的意象集合定义为“漩涡”(vortex),并认为意象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漩涡。与第一次对意象的定义相比,庞德后期对意象概念的理解,既承认其“情景交融、情物相连”的实现基础,又从人类认知加工和审美心理角度对其实现基础进行更深入探究,说明意象的实现基础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前提下的认知运动与发展。这也使其与福科尼耶(Fauconnier)基于语义映射所提出的合成空间理论(blended space theory)产生契合点。意象与隐喻研究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将“意象”这一概念运用于翻译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空间,除了隐喻的翻译研究外,还多用于对诗词中荷载文化特征的意象分析及对意象翻译过程中转换方法的归纳与概括(习华林 2001;陈婷,韩蕾 2004);魏家海(2003)对意象的分类及其在诗歌翻译单位中的前景化问题进行了阐释;祝朝伟(2005:171~175)对庞德诗歌翻译中意象并置手法的理论依据作了分析。对于一般文本中意象的翻译处理,也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如廖七一(1995)提出英汉翻译中意象处理的若干方法,以期求得功能、形式和文化上的等同;周凤鸣(2003)和邱文生(2004)探讨了英汉民族中一些文化意象的表现形式以及意蕴,揭示了翻译中因处理不当而产生的问题,并提出了处理文化意象翻译的方法。 (曾利沙,文晔)

需要 need

人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现实需要,可分为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低级需要以物的占有为表征。古人云,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人对翻译事业的追求和需要显然是在低级生理需要基本满足之后才产生的。但是,过分强烈的名利动机会给翻译事业带来损害,使翻译活动从美的创造、信息的传递或文化的交流变成市侩的牟利手段,不少滥译、胡译均源于此。人的高级需求以精神的满足为标志,往往表现为对某种理想的追求。严复从事“西学”的翻译,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要以西学的新思想唤起民众。鲁迅翻译《毁灭》等作品乃是为了介绍“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以鼓励中国人民的斗争”。(方梦之 1999:89~90)参见“高级需要”“低级需要”

高级需要 higher need

人的高级需要以精神的满足为标志,并往往表现为对某种理想的追求。严复翻译西书抱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他要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所谓“愈愚”。1899年,他写信给张元济说:“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转引自陈福康 2000:113~114)

鲁迅的译品分两大类:一类是文艺理论和革命的文学作品,另一类多为科普读物。他曾多次对人说,翻译理论书籍,那好比是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是直接为革命服务的。至于他翻译《毁灭》等前苏联的作品,乃是为了介绍“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以鼓励中国人民的斗争”。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他说:“人往往以神话中的 Prometheus 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转引自高惠群,乌传衮 1992:70)

鲁迅翻译知识性的书籍,目的是为了对读者有用、有益。

在进行翻译活动的高级需要中,有兴趣爱好之类的情感宣泄,也有好奇探究等与本能联系较密切的审美再创造的需要。翻译家方重“翻译乔叟开始是兴趣”。他说:“乔叟开始给我的兴趣是他叙事方面的叙事诗、小说、故事,重要的是坎特伯雷的故事。他在早期写过一首叙事诗,这首诗使我兴趣更浓厚……”翻译家杨苡也说:“首先我必须对这一本书或这一篇文章或这一首诗发生兴趣,感到由衷的喜欢,渴望介绍给读者。”许许多多翻译工作者都是带着对作家作品的兴趣或对翻译本身的爱好而步入译坛的。

对成就的需要,可以推动人去从事或完成他认为重要的工作。而自我实现则是翻译家以最有效和最完整的方式表现其潜力,实现其本质的需要。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一文中说:“我热爱文艺,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做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众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正是这种事业心和成就感使傅雷的翻译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方梦之 1999:90~91)

低级需要 lower need

低级需要是以物的占有为表征的。大多数人从事翻译活动出于社会的、精神的需要,但与物质需要、家庭生计也不无关系。特别在新中国成立前,白区文化战线上的某些革命者,靠翻译赚取稿费养家糊口。翻译大师朱生豪,一生清贫,宁死不为汪伪政府效劳。“当时(1943年),除少量房租外,基本无其他经济收入。就靠译稿所得稿费维持5口之家。”(朱宏达,吴洁敏 1988)可见,基本的物质需要对保证译者的翻译活动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古人云,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人对艺术的追求和需要显然是在低级生理需要基本满足之后才产生的。但是,过分强烈的名利动机会给翻译事业带来损害。近些年来,不断有人载文提出批评:不少译者一拿到书就立即动手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不查词典,不翻阅参考书;就连一些常用词不分辨词义就贸然下笔;对原文乱删、乱改;无视原文结构,乱编乱造,以致使译文错误百出。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有的出版单位由经济利益所驱动,助纣为虐,粗制滥造。有材料称,1986年前后,*Iacocca: An Autobiography* 这一热门书的中译本就出了近十种,其中多为争时间、抢速度的急功近利之作,翻译质量可想而知。(方梦之 1999:89~90)

翻译心理过程 mental process of translating

指译者在翻译时大脑对现实反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心理现象,即认识、情感和意志等心理活动。认识是基本的心理过程,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想象和思维等,反映的是源语(客观事物)的形式和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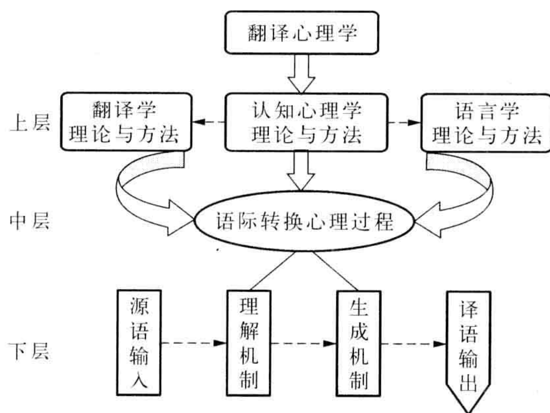
笔译从阅读源语开始,伴之以感觉、知觉、记忆、想象、联想等心理活动。理解过程基本上是用源语思维的过程,以分析为主,综合为辅。表达过程保持着想象等心理活动,但基本上是用目的语进行思维的过程,以综合为主,分析为辅。在理解与表达之间的转换中,一方面渗透到源语思维的理解阶段,另一方面进入目的语思维的表达阶段,在双语思维的交叉重叠、辗转进取中,在分析与综合交相作用中,使表达相对完善。

口译的心理过程与笔译很不相同。译者首先是听辨源语,然后依据听辨到的主要语音结合已有语言经验查检词义,并参照语境、句法知识等综合句子及语段意义。几乎与此同时,出现“脱离语言外壳”的概念、形象、情感等言者欲传播的信息瞬即经源语发布进入译员大脑的信息,还原为目的语的同一概念的信息,然后由译员将此概念信息传达给听众。口译者的心理活动目标指向概念、形象、情感等话语的实质性内容,不可能顾全所有单词,至多记住主干词语。据研究,人脑不可能一次记住瞬间即逝的语段中的冗词或意义不大的词语。正是这种口译独特的理解源语、并使之概念化的心理过程,才能解释译员记不住孤立的成百个单字,却可以准确地传达依照一定语言规则排列起来的词句所代表的信息这一现实。

翻译心理学 translation psychology

一门研究翻译心理的交叉学科,与心理学、脑神经学、语言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翻译的过程从本质上看是心理的、认知的,它不仅表现为源语输入和目的语产出这一外在的言语行为和言语事实,而且也反映了译者语际转换的内在心理机制和言语

信息加工的认知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心理学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应具有鲜明的语言学性质和心理学性质。翻译心理学的构架如下图：



以上三层示意图的具体特点如下：1. 认知心理学构成翻译心理学的主流理论或核心理论，且其相关的研究方法构成翻译心理学的基本方法；翻译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为翻译心理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相关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2. 作为以"心理"和"过程"为研究取向的翻译心理学理应以"语际转换的心理过程"为其学科的研究对象或总体研究目标，认知心理学理论构成实现这一目标的理论基础或指导性框架。3. 翻译是源语至目的语的语码转换，是一头连接输入、一头连接输出的语码信息的加工、重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听话人(即译员)的源语理解过程和目的语的生成过程，而翻译心理学要重点研究的是理解和生成发生的心理机制及认知过程。

翻译心理学的学科构架图的上层展现了与该学科紧密联系的"上层建筑"，而中下层所表现的学科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构成了与上层建筑相对应的"经济基础"。显然，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作用于上层建筑，两者构成了翻译心理学心理过程研究的有机的内部系统。除了内部系统外，翻译心理学的学科交叉性和"过程"研究的认知多元性又决定了该学科还应与更多的学科发生联系，从而形成本学科的外部系统。(刘绍龙 2007：20)

翻译心理活动　mental activity of translation

翻译过程是心理活动过程，表现为一个完整的翻译心理活动系统。从心理活动的性质来分析，该系统可区分为意向活动和认识活动两大分支。

翻译心理活动
- 意向活动
  - 态度意向：情绪、意志、行动
  - 目标意向：注意、兴趣、需要、愿望
- 认识活动
  - 高级认识：创造性想象、创造性思维
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直觉思维
  - 初级认识：感觉、知觉、表象、记忆

在翻译过程中，首先是意向活动起主导作用，决定着为何译、译什么。然后才是怎样译，这时，想象和思维处于核心地位。译者需要通过想象和思维，特别是抽象思维才能正确理解原著。在表达阶段，虽然译者的认识活动是主要的，但意向活动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时译者的意志、情感、兴趣、对翻译的激情以及审美理想等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所反映，以致在译品中有翻译个性的投影，形成所谓译者风格特征。

18. 美学　文学

文艺学　science of literature and art

指研究文艺的各种现象，从而阐明其基本规律及基本原理的科学，亦称"文艺科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文艺理论、文艺史、文艺批评三个方面。

翻译学与文艺学历来有着血肉联系。文学作品是一个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高度和谐的统一体。研究文学翻译规律、进行文学欣赏与开展文学批评都必须以文艺学理论作指导。文学艺术的创作属于艺术活动的范畴。从文艺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学，主要是为了探索艺术领域的语言特点。茅盾有言："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样的翻译过程，是对译者和原作者合而为一……"(转引自罗新璋 1984：511)，译者的翻译过程类似作者进行创作的过程：作者需要认识、构思与创作，译者同样需要以原文为基础进行再认识、再构思与再创作。作者与译者在心灵上是息息相通的。以文艺学理论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翻译理论并形成学派的，称为文艺学派。

文学的多元系统　polysystem of literature

由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的著名学者伊文-佐哈(Evan-Zohar)(1978；1990)提出，指文学各子系统的集合，包括"典范的"文学形式诗歌及"非典范的"文学形式少儿读物、通俗读物，还包括翻译文学。按照多元系统理论的观点，翻译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其存在的社会的各种文化体系相关联，受目的语社会的许多条件，如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的制约。根据一些国家的文学史来看，翻译文学曾占过主要地位，也曾占过次要地位。当翻译文学在特定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中起主要作用时，它就会"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起次要作用时，它只是"巩固现有的语言项目和表达模式"。伊文-佐哈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其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而翻译文学的不同地位反过来会影响译者的翻译决策。当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处于主要地位时，翻译文本与原文文本的界限是模糊的。为了表达原文的文化和思想，译者往往努力使译文接近原文的形式，其结果是接受文化的原创文学和翻译文学都会

丰富起来。但是,当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处于次要地位时,对接受文化的主流文学难以形成重大的影响。翻译文本所遵循的是该文化既定的传统规范,即译者的翻译策略往往是保守的,往往不自觉地在翻译中寻求现成的语言形式,巩固现有的审美规范,不注意引进新的表现方式。

文学形象　literary image

指用语言塑造的艺术形象。参见“艺术形象”

文学翻译　literary translation

文学翻译的任务是要把原作中包含的一定社会生活的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用茅盾的话说,是“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转引自罗新璋 1984: 511)。“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是一种寻求主客观统一的过程。一定社会生活的映象和作家的形象都是客观地存在于原作之中的。但是,这种客观的东西,只有经过译者头脑的加工制作,只有经过译者能动的创造,才能在译文中重新客观化和物质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文学翻译作品不但是作者精神活动的产物,而且也是译者精神活动的产物。”(张今 2005)在翻译过程中追求语言艺术美、再现原作的艺术性是文学翻译工作者的任务。

语言是塑造文学形象的工具,因而文学的形象性特征必然要在语言上表现出来。文学语言的特征,诸如形象、生动、鲜明、含蓄、凝练、准确、风趣、幽默、辛辣、滑稽、悦耳、民族特点、地方色彩,还有行业习语、民间的俚语、谚语,等等,都是作家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是辩证统一的,翻译要保存原作风格特点,因此要求译文生动形象、形神毕肖、雅俗等同、简洁精美、词情并茂,例如: 1. Just as we see the bee settling on all the flowers, and sipping the best from each, so also those who aspire to culture ought not to leave anything untasted, but should gather useful knowledge from every source. (独不见蜜蜂乎,无花不采,吮英咀华,博雅之士亦然,滋味遍尝,取精而用弘。)(钱锺书译)钱锺书的翻译语言精美,不枝不蔓,言简意赅,自然工丽。2. “I kept it from her after I heard on it,” said Mr. Peggotty, “going on nigh a year. We living then in a solitary place, but among the beautifullest trees, and ...”(“打我那时听了消息后,”辟果提先生说,“瞒她要一年了。那年头呆的地方老偏的,前前后后都是好看得一塌糊涂的树,……”)辟果提文化不高,句法失当的形象和谈吐在译文中生动地表达出来。参见“诗歌翻译”

文学翻译表现手法　expressionistic method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适合于文学文本和艺术类文本翻译的表现手法,具体而言包括十大类型: **1. 立名: 同声相求。**就思维方式而言,词语层面上的翻译既有两种语言概念之间的相应转换,也有源语词语形象在目的语中的恰当的表现等内在要求,特别是应当尽量利用目的语现有的同义或近义词汇实现直接转换。除了有必要做解释性的阐发而外,转换单位要尽量保持在相同的词语平面上。在处理词语时需考虑好六个方面及其关系: 语源知识、基本定义、搭配关系、系统构建、语境变异、形式美感。**2. 走笔: 运思取势。**虽然表现类文本的翻译和表现手法本身往往打破一般所谓句本位的翻译单元,但是也必须处理句子层面的关系而不能只限于词语层面的转换。其要点是: 打破原文句式格局和句与句之间的连接方式,按照译文行文和立句的需要重新组织句子信息结构和行文推进方式,以达到使“译文具有和原作一样的通顺和流畅”(Tytler 1907/2007)。这样译出来的句子没有翻译腔,要求译者高屋建瓴地泼洒笔墨,以别具一格的译文造成目的语的句子结构和运思取势的自然走向。**3. 简洁: 如沙淘金。**有些现代汉语篇章文风虚夸浮肿,要按照英文表达的需要对汉语原文做一个简化整理,称为“减肥”。这种处理不同于一般翻译技巧所谓的减词译法,而是类似于书法上的中锋行笔,只取中道,而两侧的次要信息则随之发生或减或略的变化,正所谓沙里淘金,只摄取其精华。就话语信息量而言,充足,就是足够清晰地表达必要的思想感情,简洁,则是无多余信息、不拖沓冗长。**4. 规整: 变化统一。**语言本身的结构特征已经决定了它面临众生芸芸的纷繁世事时是严守规整之法度的。汉语有汉语的规整之法(例如四字结构),英语有英语的规整之法(例如用连接词 and 构成的词组)。这样,在一者较为松散的,在另一者则较为规整。于是,两种语言的繁简差异就成为翻译中一种互补的常态。**5. 意韵: 丘壑濡染。**表现主义是一个外国字眼,而表现手法却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早已存在。翻译上的表现手法与中国古典绘画艺术相通相合,犹如国画中的大写意的笔法,也犹如印象派绘画追求朦胧而逼真的效果: 只求神似,不求形似。其用笔运墨,如水墨山水画法,以水墨为手段濡染胸中丘壑,谓之意韵。**6. 形象: 万象更新。**世间万事的形象性及其表现,莫过于文学艺术。中国的书法艺术,就翻译的美学效果而言,则要难于一个层次。一般的绘画形象是直接的具象的描绘,而书法却是抽象的意味形式,构成一个独特的艺术表现门类,需要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来翻译。**7. 节奏: 生命律动。**好的文章不仅要有生动的形象和意境,而且要有自然的节律波动。这里的节奏,实际上包含了语言的内在节奏感和整个作品行文的推进速率两个概念。前者主要表现在句子结构和句读上,是语言的自然节奏与读者呼吸相协调的产物。由于语言的语义结构不同,节奏感在翻译中与原作多少会有差别,只要大致相当就可以了。**8. 连贯: 文气浩然。**中国古代作文法讲究文章气韵贯通,现代西方语言学则注重篇章的黏着性

和连贯性。注重对原文本一以贯之的理(思路)和一气呵成的气(文脉)的体悟和感受,是促使译文本文理通畅的必要条件。译文本自身的黏着与连贯手段的运用,乃是英文走笔取形、运思谋篇、得自然之势使然。若按汉语习惯安排,则往往有碍于英文的习惯而难达顺畅自然。**9. 谋篇:胸有成竹。**表现类文体和表现主义的翻译手法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重新考虑文本的谋篇问题,包括:① 因为英汉语言的文体和文章写法不同,要求对译文的开头结尾、段落分合、上下衔接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变通处理;② 由于内容上的原因和考虑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对原文按照译文的要求标准进行必要的增删和顺序调整;③ 出于对译文读者阅读心理的考虑和对译作接受效果的估计,有限制地利用篇目手段突出标题含义并增强译文的艺术感染力。**10. 标题:画龙点睛。**大多数的标题,就原文本身的要求而言是贴切的,设置是无懈可击的和完美的。但若原封不动地照译过来,在目的语文本中就未必合适。如《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的翻译突出语言汉化,《西行漫记》(*The Red Star over China*)的翻译再现纪实风格,堪称妙译。　(王宏印)

自然主义　naturalism

亦称"形式主义",是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并存的三种文学翻译方法之一。指译者只知复制原文的语言形式,对原作中思想内涵或艺术意境漠不关心,因此不能把这两者再现出来,甚至有可能加以歪曲。从理论上说,自然主义者的错误根源,在于他们不懂得,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同一切其他艺术有着质的区别。在一切其他艺术中,艺术形象是直接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而在文学中,由于使用的表现工具是语言,艺术形象并不是直接诉诸人们的感官,而是首先诉诸人们的思维。换句话说,用语言塑造的艺术形象不可能给人以直观的可视外形,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由于各民族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相联系,在文学翻译中原封不动地复制原作的语言形式,即令办得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可能引起和原作大致一样的艺术联想,因而也不可能重新创造出和原作大致一样的艺术形象。(张今 2005)

形式主义　formalism

参见"自然主义"

现实主义　realism

与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并存的三种文学翻译的方法之一。俄国现实主义创始人卡什金(Кашкин)所谓的现实主义翻译,指的是"传达风格的一种方法"。现实主义的翻译方法有两个特点:1. 以再现原作艺术意境为目的;2. 从内容走向形式:译文在语言形式上往往与原文稍有出入,但却能真实生动地再现原作艺术意境。加切奇拉泽(Гачечилазе)认为,文艺翻译是文学创作的形式之一。文艺翻译中的原文,其作用正如原创作中的现实生活一样。也就是说,译者心目中的原文等同于作者心目中的现实生活。既然原文等同于艺术现实,而翻译又是这一现实的反映,加之读者如果也是现实主义者,那么,译者的反映方法就应当是现实主义的。译者总是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反映原作中的艺术现实。译文在再现原文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时,也势必表现出译者的创作个性。(张今 2005)

浪漫主义　romanticism

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并存的三种常见的文学翻译方法之一,指译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运用自己的全部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把自己的灵魂倾注到译文中去,对原作艺术意境积极地给予社会评价和审美评价。在文学翻译中,采用浪漫主义方法的译者,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来重塑原作的形象。浪漫主义翻译方法的消极方面是译者多主观臆测,译文的表述完全服从于译者的创作手法。浪漫主义的方法如能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规范之,使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则不失为理想的翻译方法。不过,加切奇拉泽(Гачечилазе)反对在文学翻译中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张今 2005)

戏剧翻译 drama translation

戏剧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同时具有文学性和舞台性。戏剧又是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其对话必须适合表演。戏剧翻译可以按文学翻译的一般原则和要求来做,把原文的形象、风格、联想、内涵一一介绍过来。但这样产生的译文适合阅读和学术研究,却不合适表演,即所谓的一度翻译。真正的舞台演出,需根据"动态表演性原则"(performability),在原译本的基础上作二度翻译。动态表演性意味着适合演说,即译文流畅,演员在朗读台词时毫不费力;从舞台表演效果看,往往涉及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的冲突(决定于可演与不可演)。阿瑟·密勒(Arthur Miller)的 *Death of a Salesman* 的翻译就是这样。该作品的翻译,无论是一度还是二度都由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一人所为。作为译者,他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怎样忠实于原文,怎样尽量做到原文与译文相匹配。然而作为演员,他思考得更多的是观众的接受问题,深刻地感到了一度翻译的局限性,深知只有以一度翻译为基础,从挖掘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入手,才能适应观众的需要。观众需要的是"纯粹的祖国语言",以及从祖国文化的角度可以接受的方式。观众反映不好或不接受就意味着失败。凡是看过《推销员之死》的译文,同时又看过英若诚主演的《推销员之死》的人都会惊奇地发现,原译本与演出本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

原译本:

林达:威利,亲爱的。再跟他们谈谈。为什么不让你在纽约工作,那是说不过去的。

威利:纽约不需要我。我是新英格兰人。新英

格兰少不了我。

演出本：

林达：威利，亲爱的。还是跟他们说说吧！为什么不能让你在纽约工作呢？

威利：纽约用不上我。我在新英格兰有路子。新英格兰这边离不开我。

“有路子”虽然于原文有切合之意，但我们感觉更多的是，它明显带有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做生意不仅仅只是做生意。通关系、找门路往往是做买卖的必经之路。英若诚深知这条潜规则，于是他在创作舞台形象时还真用上了。

（俞树村）

诗歌翻译　translation of poetry

诗通过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中、英诗各有自己的格律。英诗有音步之分，每一行分若干音步，每音步分若干音节，音节轻重相配，节拍均匀，抑扬有效，产生节奏感。汉诗没有轻重音节之分，诗中以“平仄”而产生抑扬顿挫，同样具有节奏感。

诗歌翻译重整体，重精神，成功的诗歌翻译首先是一首诗，而诗律是不可移植的。连语言学派的雅各布森(Jakobson)也认为，不论是语内或语际，诗歌是不可译的，只能是创造性的移植。庞德(Pound)则说，译者应钻进原诗作者的灵魂深处，与原诗作者达到“神合”，才能超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译出原诗的精神和效果。庞德还说，诗歌的音乐感是很难翻译的。语言学派的奈达(Nida)也认为，诗的格律、诗的离合特征和头韵都属于带个性的语言现象，是难以不折不扣地翻译出来的。

吴富恒(1984)认为，诗的组成有两个主要因素：格律和隐喻。因而译诗，把一种语言写成的诗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诗，必须着意这两个主要方面。首先要在声律、句法、诗体等形式上对照比较，在尽量保持原意的条件下，以另一种语言适当地表达出来，求其近似。但译诗的重点还在文字。要明确诗中每一字的直接语义，但更重要的是钻研它们的各种含义，即每个字的隐喻变化，从简单的比喻到由隐喻形成的语义引申，还要联系蕴含在文字背后的作者的思想、感情、态度、情趣、风格、意境以及用字的个人特点等。具有同一基本语义的词，在两种语言中通过隐喻过程引起的引申变化是不同的。用两种语言写诗的诗人的文化背景和心理过程也是不同的，因而从语义的转译方面来说，也只能求其神似或近似。所谓即景生情、移情作用、情景对应、情景交融，文字在中间起了组织作用。译诗必须分析这个结构，充分理解它，翻译才能神似或近似。吴富恒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进行了分析：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在这首诗里以锦瑟自比，倾诉他坎坷一生的悲惨遭遇。中间用了四条典故，借“迷蝴蝶”“托杜鹃”“珠有泪”“玉生烟”等意象抒写他的迷惘、哀怨、纯洁以及有情有热的情操、理想和美感。隐喻起了组织生动的情景交融的作用。以下是刘若愚(James J. Y. Liu)的译文，可供对照研究：

The Richly Painted Zither

The richly painted zither, for no reason has fifty strings;

Each string, each bridge recall a burgeoning year,

Master Chuang, dreaming at dawn, was confused with a butterfly;

Emperor Wang consigned his amorous heart in spring to the cuckoo.

By the vast sea, the moon brightens pearls' tears;

At Indigo field, the sun warms jade that engenders smoke.

This feeling might have become a memory to be cherished,

But for that, even then, it already seemed an illusion.

格律体英诗的译法一直有争议，大致有三种译法：1. 采用中国传统诗、词、曲的格律或其变体；2. 不拘格律采取自由体或散文诗的格式；3. 移植英诗的格律，特别是“以顿代步”，即以汉语中的顿代替英诗中的音步(foot)，以再现原诗的节奏。（吴富恒 1984）参见“韵律”

以顿代步　yidundaibu (use dun to replace foot in poem translation)

音步是古希腊、英、德、俄等语种格律诗诗行的节奏单位。每个音步由一个重音节和一到两个轻音节构成，轻重音节不同的组合就构成了不同的音步。若干音步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英诗的格律(meter)，如四步抑扬格、五步抑扬格等。在英诗汉译中，由于汉语是声调语言(tone language)，没有轻重音节的变化，也就没有英诗中以轻重音节变化为主要特征的音步。所以，人们便想到用“顿”来代替音步，主张把汉语的“顿”或“音组”当作诗行的基本节奏单位。为了尽可能相似地再现原诗的节奏，翻译时要求译诗每行的顿数都与原诗的音步数一致，简称“以顿代步”。孙大雨、卞之琳、殷宝书、吴兴华、屠岸等所译英诗和诗剧，何其芳所译德诗，余振、顾蕴璞、丁鲁等所译俄苏诗，钱春绮所译荷马史诗等，皆用此法。除了要求译诗每行的顿数都与原诗的音步数相同外，译格律诗还要求译诗各诗行的字数(即音节数)与原作各诗行的音节数有一种对应关系。实际上，这种译诗要求是把孙大雨、卞之琳的“以顿代步”的译诗标准再向前推进

一步——增添了在译文中限定字数(即音节数)的要求。显然,按照这种要求译诗更为困难一些(当然,在个别情况下可略作变通),但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因为原作的绝大多数诗行中本来就既有音步数也有音节数的限制。目前按这种要求译的译者虽极个别,但以这种要求译诗是可行的。这种译诗要求的优点不仅在于更全面地反映出原作的格律特点,而且,由于利用了汉语一字即一音节的天然特点,按此种译诗要求译出的格律诗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种整齐匀称的图形美。更重要的是,这种图形"体现"了原作及译文的格律特点,因此,除了具有审美价值外,对不熟悉原作格律的读者来说是一种明确的提示,使其在阅读前即获得一种"鸟瞰"式的印象,在阅读后则可加深对译文乃至原作的理解和记忆。 (杨德豫,黄杲炘)

表现的翻译法 expressive method

成仿吾在《论译诗》中提出的译诗方法之一。他说:"我所谓的表现的翻译法,是译者用灵敏的感受力与悟性将原诗的生命捉住,再把它用另一种文字表现出来的意思。这种方法与诗人得着灵感,乘兴吐出新颖的诗,没有多大的差异。"表现的翻译法要求译者与诗人同样伟大,在译诗中全身心地投入和融化在诗的境界中,"然后把在自己胸中沸腾的感情,用全部的势力与纯真吐出。"(转引自罗新璋 1984: 384～385)

(王宏印)

古诗英译的自由格式 free verse model of classical poem translation

黄新渠认为汉语古诗英译可以采用现代语言,不一定要用古体诗和格律诗形式。他参考和批评了国外近年来写诗译诗的自由体倾向,认为其优点是"语言高度准确、凝练、流畅,不受格律的限制,不足之处是容易译成分行的散文,缺乏诗词的音乐美。"他主张译诗需"行数大体整齐,押大致相近的韵","要有一定的节奏感,特别是译文内在的自然节奏要强,才容易上口。"他还主张遇到人名、地名、历史典故等可以加注,以促进我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播。(黄新渠 1981)

(王宏印)

形神兼备说 faithful in both form and matter

在诗歌翻译的形神关系问题上,主张形神兼备的可以江枫为代表。他批评了以汉语古典格律形式翻译西方诗歌的格律派,也批评了以自由体形式翻译西方诗歌的自由诗派,认为诗歌的形式具有重要意义,而英语格律诗的形式可以移植到汉语中来。他的观点是:"神以形存,失其形者也势必亡其神。"在翻译雪莱诗歌的时候,江枫尽量保存原诗的形式,甚至遣词造句也尽可能贴近原文,包括建行与脚韵,甚至行内韵也尽量保持,只要不因韵害义就行。(江枫 1982)

(王宏印)

诗歌翻译的好处 benefits of poem translation

"诗不可译",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王佐良提出诗歌翻译在有所损失的同时,具有三大好处:"所得到的是深层的文化对话,是新的创作契机,是给这个多难的世界以慰藉和希望。"他主张诗人译诗,而且强调译诗对于诗人的好处:在破坏旧有文学观念的同时,有利于建立新的文学观念,而在好的翻译里,传统和创新可以并存;在语言上,译诗可以保存语言的活跃状态,而且可以滋润诗歌语言和使语言有适应性;最后,诗人译诗,也有利于自己的创作,也即"用新的方法震撼它,磨炼它,使它重新灵敏、活跃起来。"这里王佐良甚至提到诗人翻译自己的诗作,这也许就是最早的"自译"概念了。(王佐良 1992)

(王宏印)

译诗八论 eight aspects for poem translation

许渊冲的诗歌翻译理论。最早分上下篇发表于《中国翻译》1991 年第 5 期和第 6 期上,后在《北京大学学报》1992 年第 3 期增补为八条,合称"译诗八论"。概述如下:1. 译者一也。乃文字与思想统一之谓。2. 译者依也。依据原作再创造之谓。3. 译者异也。译文有标新立异之谓。4. 译者意也。传达作者之情意之谓。5. 译者易也。传情达意总要变易之谓。6. 译者艺也。如何异中求同,传情达意,乃艺术之谓。7. 译者益也。目的是使读者收益之谓。8. 译者怡也。怡性悦情之谓也。此一思想,结合外国文学理论名著《镜与灯》中的艺术四大要素的模式,即作品、艺术家、宇宙、观众,改造为翻译理论中的六大要素,即世界、作者、作品、译者、译作、读者及其关系,进行具体的理论阐述,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不仅适合于译诗,也适合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值得进一步研究。(许渊冲 1991a, 1991b) (王宏印)

译诗的形象性与模糊性 image and ambiguity in poem translation

林同瑞认为诗歌翻译的要点是形象,形象包含广义的形象和狭义的形象。前者是一首诗的整体形象或总形象,后者是一些具体的词语的形象,在翻译中后者的传达是为前者服务的。在保留形象的时候,诗歌语言往往具有一语数意(multiple meanings),甚至于含义模糊者(ambiguous terms),实在是诗的精妙之处,必须设法传达出来。关于汉语古体诗的翻译,林同瑞认为要点是节奏(rhythm)和音韵(rhyme),而英诗的节奏更为重要,主要由轻重音构成。目前国外的自由诗潮流不强求押韵,但也不排除自然的韵,更不意味着就很容易翻译,尤其要注意英诗本身的自然波浪(rhythm wave)作为最低限度的节奏表现。(林同瑞 1980)

(王宏印)

民族化 nationalization in poem translation

文学翻译中的一种倾向,特别是以袁可嘉为代表

的诗歌翻译的民族化倾向。袁可嘉(1989)在《关于译诗的几点随想》中认为,民族化不是要把外国诗歌译成中国的民歌和五七言格律诗,它主要指的是在语言上要运用"当今中华民族大多数人习用的口头语和书面语,当然也包括常用的古代语和外来语,而且这个民族语言正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它是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体系。""就诗体而论,当今的'民族化'应指白话新诗体而非五七言近代诗体。就思想内容说,译过来的外国民族的思想情感,怎么能要求他跟我们民族化呢?"袁可嘉认为,所谓人类共同的思情是无须"民族化"的,而"我们要在民族语言许可的情况下,尽力追随原作者的洋味道、洋风格,才算是忠实于原作者民族的特色。"他赞成以新的格律诗译外国的格律诗(例如以顿代步),但不赞成过分拘泥字数和音律。而自由诗的翻译,则要注意其特点,也不应过于自由。

(王宏印)

构成的翻译法　compositive method

成仿吾提出的译诗的方法之一。"我所谓构成的翻译法,是保存原诗的内容与音韵的关系,求构成原诗的情绪的意思。译者须把原诗一字一字在内容上的关系与在音韵上的关系拿稳,然后在第二的一国语言中求出那样的内容的字,使它们也保存那种音韵上的关系。"与"表现的翻译法"那种分析的、远心的(离心的)逻辑不同,"构成的翻译法"是综合的、求心的(向心的)。(转引自罗新璋 1984:387)　(王宏印)

格律派　rhythmic model for poem translation

许渊冲依据吕叔湘在 1947 年 6 月撰写的《中诗英译比录》的序言,将其中所述及的译者分为三派:格律派、自由派及创造派。所谓"格律派"系指"以诗体翻译"的初期译者,其代表人物是翟里斯(Giles)。后来的继承人为特纳(Turner),其代表作是香港出版的《中诗金库》。蔡廷干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译者中"格律派"的代表,其代表作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唐诗英韵》。格律派的代表人物还有 40 年代的谢文通等。后来,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许渊冲、陆佩弦及吴钧陶合编的《唐诗三百首新译》,这部唐诗英译选集可以说把"格律派"的译法提到了"三美"的高度。　(董史良)

柔巴依的翻译　Ruba'I translation

柔巴依(Ruba'I)是一种独立的传统诗体,广泛流传在波斯人民和中亚某些操突厥语的人民以及我国新疆维吾尔族、塔吉克族人民中间。"柔巴依"原由阿拉伯语"柔布"一词演变而来,意为四行诗,基本特点为一、二、四行押韵,语言精练,内容富有哲理。它还出现于阿拉伯文学中。一般认为这种诗体是由波斯—塔吉克文学泰斗鲁达基(Rūdakī)定型的。波斯另一位著名诗人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将这种诗体的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柔巴依"在古波斯语中又叫"塔兰涅",含有"绝句"之意。郭沫若把这种诗体译为"鲁拜",维吾尔诗歌汉译者一般都把这种诗体译为"柔巴依"。柔巴依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生命力,古往今来西域及中亚各民族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柔巴依诗人,留下了辉煌的诗篇。从 15 世纪起,维吾尔人便随波斯、阿拉伯人的称法,把四行诗也称作'柔巴依'。时至今日,新疆维吾尔族以及中亚各民族仍然用这种诗体进行创作,它在维吾尔族诗坛上享有"诗歌皇帝"之美誉。

最著名的柔巴依翻译当属《柔巴依集》的翻译。《柔巴依集》原作者欧玛尔·海亚姆是生活于 11、12 世纪波斯人,其主要的兴趣是天文学,哲学和数学,但也善诗,留传后世的诗歌有一千多首。据伊朗学者赛义德·纳菲斯博士统计,海亚姆的柔巴依诗歌的英文译本就达 32 种之多,而仅纽约图书馆就藏有 500 多个各语种的版本。其中最著名的则是 1859 年出版的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的英译本《柔巴依集》(*Rubaiyat*)。受到研究波斯文学的青年学者考埃尔(Cowell)的启发和介绍,菲茨杰拉德开始翻译波斯诗歌。从 1859 年他选译了 79 首,刊行为《柔巴依集》,到 1889 年菲茨杰拉德共出了四版。这一集子不仅引起全世界对其波斯原作的注意,其本身也成为英国诗歌中的精品并获得世界性声誉,在其他不少国家也成了频繁翻译的对象。这种情况在诗歌史、翻译史,乃至文学史上都可说是独一无二的。

柔巴依这样的东方诗歌能够在西方和全世界赢得广泛的关注,菲茨杰拉德的英译可谓是功不可没。在某种程度上,19、20 世纪翻译活动促成了柔巴依在世界现代文学界的繁荣。在我国,从菲茨杰拉德英译本转译和从波斯原文直接翻译的译本也不少。除了近年来波斯文原著译者张晖(1988)、张鸿年(1991)之外,从 1912 年起至 1999 年,以英译为底本,翻译欧玛尔·海亚姆四行诗的中国文人先后有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孙毓棠、吴剑岚、赵宋庆、伍蠡甫、李意龙、潘家柏、黄克荪、李霁野、黄杲炘、陈次震、孟祥森、虞尔昌、柏丽——恐怕这还是不完全统计。除波斯诗集《柔巴依集》的翻译之外,其他柔巴依的翻译活动也很频繁。尤其,自 11 世纪以来柔巴依在新疆地区一直是活的诗体,并延续至今,维吾尔语柔巴依的汉译和其他民族语言的翻译,甚至英译活动都有开展。新中国成立后,维吾尔族的柔巴依大量地被译为汉文,例如赵国栋、赵玉珍翻译了乌铁库尔等人的柔巴依,取名《心泉集》出版。《福乐智慧》的英译本也保留了其中柔巴依的诗歌体。目前对维吾尔族柔巴依的汉译、外译探讨仍然不够,需要进一步努力加强。

(李宁)

和歌的汉译格式　Chinese equivalence of Japanese Waka

和歌是日本典型的诗歌形式。林文月认为和歌不适合翻译为中国的绝句,因为日语中的一个音节往往不是一个单词,所以不等于汉语的一个字,而汉语

的单音节字是有意思的，所以，31个日语音节的和歌并不适合翻译为31个汉字，也不适合套用中国的绝句翻译为20个字（五绝）。此外，汉语的绝句比一首和歌具有更多的内涵，在套用时会增加原文所没有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将和歌翻译为绝句会混同于汉语的绝句。在语言问题上，林文月认为，还是用白话文翻译更好，因为文言文的单音节字比较生硬，而多音节的日语则比较缠绵。（转引自刘靖之 1991）

（王宏印）

歌唱性　singing effect

歌唱性是歌曲翻译和歌剧翻译所要讲究的首要原则。歌唱性翻译所受到的限制包括以下八个方面：1. 译文字数、音符数量和外文音节的严格限制。2. 译文句式受乐句结构和外文句式的严格限制。3. 译文中每个词的重音受音乐重音和节奏的限制。4. 译文的风格受音乐风格的限制。5. 译文每个字的声调受音乐走向的限制。6. 译文韵脚受音乐情趣的限制。7. 译文的句逗、呼吸和气口必须和原文的完全一致。8. 译文在音乐高音区的用字必须是恰当的开口元音。

（孙慧双，王宏印）

《红楼梦》西译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DRC*) translated in the West

《红楼梦》是西方译介最多的中国古典小说之一，有将近20种文字的近60种译本，其中全译本12种。《红楼梦》的西译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节译期和全译期。节译期持续较长。1830年，距《红楼梦》首次排印成书（1791年）约四五十年，英人德庇时(Davis)爵士即选择第三回中两首《西江月》，载入他是年出版的《汉文诗解》。事过不久，又出现了英人汤姆(Tom)的零星节译和居茨拉夫(Gutzlaff)的简单译介（均在1842年）。至19世纪本裘里（H. Bencraft）的两卷本英译（共56回）于1893年问世，译介规模才稍大。20世纪初叶，有两个重要的节译本行世：一是王际真的英译本（1929年），一是孔舫（Franz Kuhn）的德译本（1932年）。王本第1～57回删节较少，其余则大加删削，重在讲述宝玉和宝钗的恋爱故事，1958年，又出增译本。王本可读性很强，流传很广。孔本与原文相比，前详而后略，但因是全书的节译，故事较完整。后来它有了荷、英、法、意、匈五种转译本。在前苏联，1958年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汉学家帕纳秀克译出了两卷本（总页数分别为878页、862页）的俄语全译本，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前苏联及俄罗斯为收藏《红楼梦》的版本曾费尽心力，目前俄罗斯图书馆保存有60多种刻本的《红楼梦》及其续集。1973年霍克斯(Hawkes)的英译《石头记》（第一卷，第1～26回）问世，从此开始了《红楼梦》在西方的全译期。霍译共五卷，1986年出全。霍克斯坚持"包括双关语在内一切皆译"的原则，保存了原文致密的肌质(texture)，因此译文比较信实可靠，颇得读者的喜爱。20世纪80年代，西方又接连出现了李治华夫妇的法译本和王和达（Oldrich Kral）的捷译本（均为全译本）。此外，还有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译本。我国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英语全译本（1978～1979），在西方也很流行。这个时期仍然有一些片段的节译，但其地位已不如早期那么重要。《红楼梦》在西方被视为"中国的百科全书"，读者常有一睹为快的心理，因此有些译本一经问世，便会产生轰动效应，如王和达三卷捷译本，一天之内竟售出13 000套。

（周发祥，李明滨）

《红楼梦》译评　critical appreciation of *DRC* in translation

目前所看到的最早的译评是中国比较文学大师吴宓于1929年10月7日发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王际真英译节本〈红楼梦〉述评》一文。文章首开《红楼梦》译评之先河。不仅涉及此前的西人节译本和韦理氏取胡适之说对红楼梦的评论，而且简要评论了王际真的节译本："译者删节颇得其要。译笔明晰简洁，足以达意传情。而自英文读者观之，毫无土俗奇特之病（西人译述东方事文笔往往故意如此，殊可厌），实为可称。"文章最后还说："闻王君更将续译他书，吾人谨拭目以待之矣。"此后，较为重要的《红楼梦》译评，当推海内学人林以亮在得知霍克斯译本出版后很快写出的《〈红楼梦〉西游记》一书，副标题为《细评〈红楼梦〉新英译》，是由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1976年9月出版的。书中有霍序、自序，和正文八章，涉及颜色词、双关语、称谓、口吻、诗词、漏译、误译、评价等内容，虽不能说是全面（因为当时霍译五卷尚未出齐），但却颇有见解，值得一读。

世纪之交，王宏印主编的《长安译论——陕西省新时期翻译研究论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出版）纳入了第一个《红楼译评》栏目，收录六篇论文。他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于2001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士聪在该书的《序言》中认为："在我国，莎士比亚的翻译与研究已有较久远的历史和较丰厚的成果，其人与日俱增，其势与日俱劲。作为世界文学瑰宝的《红楼梦》的翻译与研究，翻译界也应有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相信将来能有更多的译本和研究专著出现，使其形成与'红学'相媲美的一门学问——'《红楼》译学'。希望这一局面，尽快到来。"该书《前言》中曾提出霍译杨译比较研究的"六条标准"，以及建立文学翻译评论的七个条件，包括译文文本、译评队伍、研究成果及发表、规模与影响、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等方面，已初步构成文学翻译批评建设的基本思路。

2002年10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总结大会上，王宏印正式提出"《红楼》译评"的建议。他认为先提"《红楼》译评"，作为围绕《红楼梦》译本进行评论活动的开端，构成文学翻译评论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其最终的发展方向，则向着侧重理论研究和规模效应的"《红楼》译学"的建立和发

展而努力。它有待于《红楼梦》译本的语种的增多和交互比较的研究规模的形成，以及理论上的统合机制的形成和完善而走向成熟。这些提法和问题的提出，基于这样一种考虑：红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作者及家世考证（如“新红学”胡适之的研究）和文学研究（如社会历史学派的思想研究），20 世纪末期和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进入以多语种的译本，即文本变体，在世界各国流传和接受的新时期。此时，《红楼梦》译本研究和翻译批评，适逢译界普遍关注中国翻译学的建立，而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典籍的翻译和评论已成独立分支。于是，以文学翻译评论为基础的《红楼梦》译评活动，就成为必然之势，因而有了必要的发展条件和坚实的学科依托。

在学科归属上，就发展的远景来看，“《红楼》译评”或“《红楼》译学”既属于在中国目前正在建立中的翻译学，又属于已经有了多年发展历史的“红学”。也就是说，《红楼》译学或译评，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甚至一个新兴学科，可以对翻译学和红学研究的建立和发展提供支持，也可以受惠于这两个方面的发展而从中吸取营养和动力。它的最终目标和势头，连同它的研究成果，将汇入世界的普遍的翻译学的宏大事业并通过比较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广阔领域。这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珍品进入世界文学和文化宝库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翻译学形成自己特色和优势的必要的准备条件和发展阶段。可以说，没有世界名著《红楼梦》译本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是残缺的和苍白的，同样，没有《红楼梦》翻译的译学研究，翻译学也是空洞的和无力的。两者结合一定会诞生一个交叉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那就是“《红楼》译学”。（王宏印）

散文翻译　prose translation

广义的散文指诗歌、小说、戏剧之外的具有文学性的散文文章，包括通讯、特写、报告文学、人物传记、回忆录、游记、杂文等。狭义的散文指篇幅短小紧凑、抒写自由灵活、语言生动活泼，情理相融，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文学样式。其主要特点是“体物写志，形散神聚”。形“散”是指运笔如风，不拘形式，清淡自然；神“聚”指意旨明确，紧凑集中，既散得开，又收得拢；既有豪放的特色，又有清幽的特征。人们常把钱锺书的“化境”作为散文翻译的标准，译者深悟原作的背景与氛围，得其精义，然后不断揣摩如何用散文化的目的语再现优美的意蕴，在译文中重铸原文的风姿。散文翻译重在简约，重在节奏，重在意境。若译文与原文对照，二者形神兼似，无丝毫雕琢痕迹，这就达到了“化境”的标准。如：“Living thus, he came by chance one day to a clear fountain, and (being in the heat of noon) lay down by it; when beholding in the water his own image, he fell into such a study and then into such a rapturous admiration of himself, that he could not be drawn away from gazing at the shadowy picture, but remained rooted to the spot till sense left him; and at last he was changed into the flower that bears his name; a flower which appears in the early spring; and is sacred to the infernal deities, — Pluto, Proserpine, and the Furies.”(Bacon, *Narcissus*)（朝夕如此，一日偶至清泉一泓。时值晌午，天气炎热，遂卧躺泉边；俯观水中倒影，不觉凝神观照，继而自我恋慕，如痴如狂，谛视自家面貌若隐若现；良久不去；出神入定，有如树木扎根，直至感觉消失；终于变成水仙，名曰那咯索斯；水仙早春开花；遂为冥府诸神之祭品——普路托，普路塞尔皮娜，复仇三女神。）（杨自伍译）

译文读起来清新爽快，容易理解，语义正确，又保持了古雅优美散文语言的风格。

刘炳善认为，散文翻译不像小说那样有情节和故事容易吸引读者，也不像诗歌那样音韵和谐朗朗上口。散文是作者的独白，因此要翻译得好才能吸引读者，感染读者。刘炳善认为翻译散文时，译者一定要喜爱散文，要以创作的心情对待翻译，重视散文的文采和风格表现，把每一篇散文都当作艺术品来对待。（刘炳善 1992）刘士聪认为，翻译散文的关键是韵味，其中包括个性化的话语方式、意境和氛围的营造，讲究音响和节奏感等艺术因素的掌握和传达。他特别强调译者要多读多写，特别是对于外文的掌握要注意积累材料和语感，也要注意精益求精，提高目的语的表达质量，讲究内在修养和有品味的幽默，在语言表现上尽量做到朴实无华，才能译出感人的散文作品来。（刘士聪 2002：前言）高健认为，风格的传达是可能的，他把“语句的衔接、长短的搭配、停顿的间隔、节奏的变换、形象的使用，乃至标点系统的繁简，等等”都理解为是“风格形式”因素。（高健 1985）

（王宏印，蓝春）

小品文翻译　translation of essay

小品文是散文的一种，特点是深入浅出，夹叙夹议地讲一些道理，或简明生动地叙述一件事情。小品文具有强烈的“个性”，即个人主义色彩。作品从内容题材到表现方法均不受限制，可以是对日常生活、工作琐事的所见所思，也可以是对世间大事的严肃思考。既可用平淡简练的笔调，也可用优美古雅的文笔；既可用幽默风趣、冷嘲热讽的手法，也可用引经据典、举例实证的手段。小品文翻译中，风格的把握是关键，只有做到语言和意义的最佳结合，才能在小品文翻译中完善地传达风格。

首先，要从整体上把握住原作品文采，从细微处把作者的用词造句的个性表现得惟妙惟肖。其次要在译文中再现小品文的韵味。如在张培基所译夏丏尊的《中年人的寂寞》的译文中，原文古朴的行文风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中多次出现带有文言色彩的表达法，如“入世既深”“不免互异”“隔膜”“晤谈”“盛年”，这些短语都体现了夏丏尊古雅的写作风格，张培基在译文中分别将这些短语翻译为“with much

experience in the way of the world", "are bound to differ", "lack mutual understanding", "conversation", "in the bloom of her youth"。这些都是成语、正式或文雅的语言,恰当地体现出原文的风格。而对于"减少""暗暗地""要在心中替他们祝福"等原文中通俗的表达方式,张培基也添加了庄重的色彩,分别译成"dwindling away", "inwardly", "offer them my best wishes"。他大概认为,如果夏丏尊的英文也和他的古文一样好,也会这样表达的。再次,要在译文中传达作者独特的修辞和结构特点。为了打动读者,小品文通常会使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借用各种修辞手段。要在译文中将这些特点体现出来。《中年人的寂寞》文中有一句话,"眼睛昏花了,记忆力减退了,头发开始秃脱而且变白了"。作者用三个"了"字,表现出对生命流逝的无可奈何,流露出感伤的语气。张培基将这句话翻译为"to find my eyesight and memory failing, my hair thinning and graying",一唱三叹的"-ing"贴切地传达出原文感伤的色彩。参见"风格"

（蓝春）

影视翻译　film and TV translation

影视翻译专家钱绍昌指出,影视语言既含一般文学语言的要素,也有它自身的特点:聆听性、综合性、瞬间性、通俗性和无注性。1. 聆听性,指让观众耳熟能详,例如 He, She, It 译成中文同音,必须让听者明白;2. 综合性,指译文(对白或旁白)须与画面、音响、演员表演等和谐一致;3. 瞬间性,指让观众一听即懂,无须多加思索;4. 通俗性,指对白通俗易懂;5. 无注性,指译者不得加注(旁白虽然也是一种注释,但这是原本因剧情需要而设置的)。在翻译技巧上要注意演员台词与其口形吻合(即译文与原文音节相当)。注意抑、扬、顿、挫的安排(特别是顿,由于汉、外语言结构不同,常常不能对位,要作补偿)。注意体态语的配合。影视片中双关语、文字游戏及有文化背景的语词用得很多,当中国观众听到预录笑声而觉得对白并不可笑时,翻译就失败了。如《成长的烦恼》第 52 集中有一男孩将 I like Mike,写成 I lick Mike,引起哄堂大笑。like 与 lick 字形相近,而汉语的"爱"与"舔"相距甚远,谁也不会把"爱"写成"舔"。翻译时将"舔"变通地译为"受",成为"我受迈克",则产生相当的效果。总之,影视翻译要在"信"的前提下,强调"达",为观众所接受。(钱绍昌 2000)

比较文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指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学关系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学科。它的任务包括对一种文学给另一种文学乃至对另一国家社会带来的影响的研究,对另国译者、文学翻译史、文学翻译理论的研究等。目的在于寻求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并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提供文学发展的横向借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确立,以 1886 年英国波斯奈特(Posnett)《比较文学》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之后,欧美许多国家开始了比较文学的研究。1937 年,法国学者梵·第根(van Tieghen)出版《比较文学论》一书,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比较文学的原理和有关的研究方法,很快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比较文学学派——法国学派。此后,在比较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研究的重点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主要有:法国学派,即影响学派;美国学派,即平行学派;苏联学派,即着重类型学研究的学派。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比较文学研究逐渐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和苏联中心论的局限,引起了亚、非研究者的重视。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我国掀起了研究比较文学的热潮。在 90 年代,国内外比较文学界呈现出文学比较研究转向文化比较研究的一种明显趋势,而翻译研究也向文化研究靠拢,两者正好合拍。其中,翻译文学恰好为跨文化系统研究提供了最理想的研究园地。

艺术形象　artistic image

指作家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经过艺术概括而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的具体生动的生活图景。艺术形象包括文学艺术形象,绘画艺术形象,音乐艺术形象,雕塑艺术形象,戏剧、曲艺和电影表演艺术形象,等等。以语言为手段而形成的艺术形象,称文学形象。文学形象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学形象泛指文学作品中整个的形象性表现、形象体系、生活图景。文学作品的具体因素如环境、人物、场面、情节等可理解为它的具体表现。狭义的文学形象是指人物形象,与人物、性格、角色、典型人物、主人公、抒情主人公等的含义相同或相近。文学形象一般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形象以人物为主,称人物形象;在抒情性作品中有时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物与景是作者所塑造的形象。为了区别这两种形象,有时也称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以外的形象为艺术形象。通过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生活是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主要标志,也是区别于用其他材料和手段塑造的艺术形象的重要特征。文学形象作为用语言塑造的艺术形象,既有一般艺术形象的共同特征,又有它自己的特征。

艺术性　artistry

指文学作品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思想感情所达到的审美和感人程度。它包括形象的典型性、生动性、准确性,形式、结构、表现技巧的严密性、独创性、完美性,语言的形象性、个性化和风格的民族性等。艺术形象、形式、表现手段愈完美并富有创造性,就愈能表现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感染力也愈强,艺术性也愈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紧密相连,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一般地说,优秀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高,两者是统一的。艺术性与作家的世界观、生活经验、艺术修

养联系密切。社会主义文艺要求完美的艺术性与高度的思想性的统一。

美学 aesthetics

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一门学科，古老而又年轻。古代学者提出过不少影响后世的美学观点。孔子提出"尽善尽美"，孟子认为"充实之谓美"，荀子坚信"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美学观则是：美是和谐与比例，柏拉图(Plato)的美学思想以"理念"为基础，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美学思想则以"模仿"为核心。德国古典哲学家鲍姆加登(Baumgarten)第一个使用"美学"这一术语。此后美学逐渐演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文学艺术乃至人们的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全面的、系统的，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是透彻的。广大翻译工作者在翻译实践中努力认识美、发掘美、再现美、创造美。国内外不少译者对翻译美学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有的具有明确的操作性。一般认为，语言表达以精确为美、整齐为美、和谐为美、有序为美、得体为美。在翻译实践中，美的发现离不开明察秋毫的语感，离不开辩证睿智的思维，离不开奔涌飞越的文思。捕捉原作者往往意在言外的神思、气度，这是审美体验中最精微、最令人神往的任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是原文的接受者，可以将自己对审美客体的审美认识注入译文；另一方面，他又是阐释者，必须考虑到译文读者对译文可能产生的想象与感觉，以选择与原文审美构成相适应的审美再现手段，从而避免读者对译文可能引起的不是原文审美构成的联想。总之，译者在再现原文的内容和精神时，也要再现原文的美学特征。"原作是细致说理的，译文也细致说理；原作是高举想象之翼的，译文也高举想象之翼。"(王佐良 1986：108)翻译时原文审美构成的再现过程为：对原文审美构成的认识→对审美认识的转化→对原文审美构成的再现。参见"翻译美学"

接受美学 reception aesthetics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新兴的文艺美学流派，其基本主张是反对"文学文本具有决定性"的说法，不承认文学文本只有一种绝对的意义，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的图式结构，它的意义可以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地作出诠释。接受美学认为，原作者的创作行为已将他的部分读者包括进去了，作品本身只不过给予读者一系列的提示，是由许多空白组成，需要读者去填补。这就是说，一个积极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权利、也应该进行想象，将自己的感觉补充到作品中去。这种想象和感觉就是对审美客体——原作——在欣赏过程中的审美体现。接受美学认为，文本的美学价值永远是一个"非稳态系统"。其结论是：接受者的审美能动性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考虑到读者的这种审美能动性，并选择与原文审美构成相适应的审美再现手段。

翻译美学 aesthetics of translation

《译学辞典》(方梦之 2004)对翻译美学的描述为：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在充分认识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翻译审美主体(译者)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剖析客体的审美构成和主体的翻译能动作用，明确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提供翻译中审美再现的类型和手段，以指导翻译实践。中西美学流派纷呈，翻译研究的涉及面又广，翻译美学只能宽口径、多角度、多层次地涉及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毛荣贵(2005)根据《译学辞典》中的描述认为：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原文、译文)，翻译中的审美主体(译者、读者)，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中的审美判断、审美欣赏、审美标准以及翻译过程中富有创造性的审美再现等。

刘宓庆认为翻译美学是中国翻译理论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翻译学的重要特色之一。中国译论与美学之间的渊源不可忽视，美学是译论的一个待开发的宝库。语言审美是一切有汉语参与的语言传播和语际转换的重要课题，当然也是中国翻译学的重要课题，这一点与印欧语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翻译理论的审美课题涵盖：1. 中国传统美学与翻译学的关系；2. 语言审美与翻译；3. 翻译审美活动探讨；4. 翻译的审美价值观论和表现论；5. 翻译美学学科架构探讨。(刘宓庆 2005a)翻译美学理论的任务，就是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包括对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和审美关系的研究，对翻译中审美体验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对翻译中审美再现手段及翻译美的标准的探讨，等等。(刘宓庆 1986) (李林波)

美感 aesthetic feeling

指观赏自然或鉴赏艺术作品时产生的高级情感，即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及其在艺术中的反映的感受、欣赏和评价。美感是从具体形象得来的，因此具有形象直观性和可感性等基本特征。美的标准，既反映客观事物的属性，又受人的思想意识制约。所以，引起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阶层的人美感的事物，既有共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它不是一种孤立的情绪体验，而是与道德感等情感、情绪相联系的。不仅美的现象能引起美感，对丑的现象暴露的真切、大快人心，也能引起美感。审美就是对美与丑进行鉴别、赏识。客观的美的现象只有通过审美鉴赏活动才能产生美感。翻译时译者对原作的美感也只有对它品味、鉴赏之后才能获得。美感是形象性、思想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内容美 beauty in content

翻译中的内容美涉及原文的内容美和译文的内容美。译文的内容美是原文的内容美(假设原文具有内容美)的再现,它必须和原文的内容美保持一致。是否忠实地传达原文的内容美是衡量译文质量的主要标准。在翻译中,只有正确地理解原文词、词组、句子、语段直至篇章的含义,才能准确地表达原文的内容美。否则,就不能表达原文的内容美,甚至损害或破坏原文的内容美。(傅仲选 1993: 50)

内容美与形式美密切联系(两者应该和谐统一,但也有不协调的情况)。一切美的内容都必须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一定的形式美也不能脱离内容而存在。形式受内容支配,但反过来又影响内容的表现,并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一种形式往往可表现多种内容,一种内容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表现。例如: The floor looked like glass under the feet of the dancers. 跳舞的人脚下的地板看来好像是光溜溜的玻璃。——译者用复制明喻的手法来表现原文的内容美。又如: A blackbird, standing on the rail, felt a rhythm grow faintly, miles away, like a heart beginning to beat. 静立钢轨上的一只乌鸦,感觉到了远处传来逐渐增强的脉搏。——译文舍弃原文明喻的形象,将所指意义表达出来。

形式美 beauty in form

指客观事物外观形式的美。事物的外形因素及其组合关系,被人通过感官感知,给人以美感,引起人的想象和一定的感情活动时,这种形式美就成为人的审美对象。翻译是一种语际转换活动,原文的语言外壳与译文的语言外壳截然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任意抛弃原文的形式美。事实上,翻译时译者始终受原文形式美的制约,总是尽可能地把原文形式上的诸种审美要素用相应的形式在译文中保留下来。只有在形式和内容实在不能兼顾时,才不得不抛弃形式而保留内容。语言的形式美分不同的层次: 音位(字位)、词、句子、语段,直至篇章,其中包括节奏和韵律运用、语法(语音)变异以及辞格的运用等。在翻译时,译文应尽量保留或再现原文的各种形式美。例如: 原文一个或一组没有意义的音可以成为一种修辞手段,作者用它来渲染环境气氛,刻画人物语言,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类修辞手段在译文中一般都能用相应的形式保留下来。如: The pounding of the cylinders increased: ta-pocketa-pocketa-pocketa-pocketa-pocketa. (J. Thurber,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可译成嗒——噗咳嗒——噗咳嗒——噗咳嗒——噗咳嗒——噗咳嗒,汽缸的隆隆声加快了。又如: 原文中使用的辞格也是可以在译文中再现的, 如 Bowling is good for the stone and reins; shooting for the lungs and breast; gentle walking for the stomach; riding for the head; and the like. (Francis Bacon, *Of Studies*)可译成: 滚球利睾肾,射箭利胸肺,慢步利肠胃,骑术利头脑,诸如此类。(王佐良译《论读书》)译文复制了原文的排比格。(傅仲选 1993)

语言美 beauty in language

指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写作中语言的思想内容、表达方式、语气、习惯方面的美。语言是交流思想、表现心灵的一种工具,人的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等都可以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美是人的心灵美的外在表现形式。语言美主要通过人的遣词造句和谈吐表现出来。不同时代、阶级、民族和国家对语言美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

翻译与其他语言文字创作活动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是以原文为根据的一种语际转换活动。因此译文的语言美离不开原文,处处受制于原文。译者的责任是挖掘原文的内容美和形式美,在再现原文内容的同时,用恰当的、优美的目的语表达出来。脱离原文的“创造”和“发挥”不是真正的翻译,没有翻译意义上的美学价值。翻译以原文为根据,但又不是原文的简单翻版。译者在深入理解、把握原文的基础上,用自认为最美的目的语将其表达出来,形成译文。译文是译者思想和言语活动的产物,也是译者语言美的具体表现。

色彩观 sense of colour

色彩的象征意义丰赡繁多,寓意迭出。不同语言国家的人民对色彩的反应、欣赏和想象是文化传统长期熏陶、培养的结果,是受各自文化传统制约的。中国的“红白喜事”与西方的婚嫁丧事使用的传统色彩截然相反。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明显例子。

翻译时,不能忽视这种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例如 a white Christmas,如果只照字面直译成“白色的圣诞节”,一般读者是难以理解的,更不知“白色”的深邃隽永的意境。结果导致译文淡而无味,富有诗情画意的雪景便无法寻觅了。其实,岁末一场大雪,西方人也庆幸称好: 瑞雪兆丰年。这样,a white Christmas 译成“大雪纷飞的圣诞节”或“银装素裹的圣诞节”就较为贴切,使 white 的含义跃然纸上,调动了读者的视觉,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创造了“吸收读者的艺术意境”,得到了美的感受。

肤色也反映出东西方相异的色彩观和审美态度。西方人认为,肤色黝黑,或赤如古铜,是健美的表现。因此,他们酷爱日光浴、海水浴,把皮肤晒得黑黑的,叫 tanned 或 yellowish brown,而中国人却以皮肤白皙为美。例如:“You look darker after the holidays.”可译成“你度假回来,显得更健康了。”黝黑的皮肤显示了体魄健壮,因此,翻译时把 darker 处理成“更健康了”。

诗意 poetic quality

指具有审美价值的形象画面所显示的某种意蕴

或情思，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诗意指诗中表达的给人以美感的意境。广义的诗意泛指一切文艺作品和自然景物中所蕴涵的像中之意或景中之意，特别是抒情散文和叙事作品中的景物描写，与诗歌中意境有共同意象单元。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这历来是中外诗人所追求的目标。所以，诗难译，首先是诗意难译，其次是诗的形式，包括韵律、节奏等也难译。从整体看，一首诗的意义、意境和形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过译者的努力，还是可译的，而且也不乏成功的译例。例如：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
山中一夜雨，树梢百重泉。

（王维《送梓州李使君》）

In countless valleys trees soar to the skies;
A thousand peaks resound with cuckoos' cries.
A heavy rain in the mountains all night
Brings cascades from the tree-tops on the height.

（许渊冲译）

神韵 nuance

神采气度，精神韵致，常指诗文书画的风格韵味。源于我国诗论，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认为诗歌创作只有表现出冲淡闲远的意境，写出不同景物的风神韵致，才能称为佳作。神韵说现广泛用于各艺术门类上，讲究精练含蓄，自然流畅，风格清新明丽。至于翻译上的神韵，王以铸在《论神韵》一文中说："语言的精细微妙的地方，语言的神韵，或是借王国维先生的话来说，语言的'境界'，那么它就不会是表面上的东西，而是深藏在语言内部的东西；……我们把握住了语言的 nuance，那么我们才得以体会到语言的感情。到了这个地步，译者才有可能把原文的神韵毫无遗憾地发挥出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中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当然，'闹'与'弄'两个字在这里应该是最传神的地方。如果有一个译者想把这两句译成外文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求这位译者应有鉴赏和把握原句的神韵的能力，才能使译文读者所得的印象，至少能约略相当原文给予原文读者的印象。"（转引自罗新璋 1984：567～571）

（蓝春）

音韵效果 sound-effects

指通过精心运用元音、辅音、音节以及词语与句子结构的重复等手段使文字具有一定的韵律，阅读时可以产生不同于一般散文的效果。翻译中音韵效果最为典型的范例是对诗、词、歌、赋的翻译。文字的内容与形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音韵效果对加强文字效果的表现力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力求在译作中再现原作的音韵效果。

寓意 sub-text

指不在字面而在字里行间的隐含意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恰如其分地再现寓意。再现时要把握原文的风格与韵味，切忌将寓于字面背后的含义在译文的字面上袒露无遗，而应当想方设法采用与原作同样含而不露的方式再现原文所暗示的文化心理内涵。

意境 mood of literary works

语言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描写所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是所描述的景象和所表现的情意相交融的产物。意境的追求和创造，是修辞上获得最佳表达效果所必需的。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以追求原作的意境为己任，以再创造等同的意境为目标。被人称为"今古七律第一"的杜甫的两句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卞之琳译为：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译文传达了原诗的格调和意境。

审美文化 aesthetic culture

指用美学观点观察、分析、研究人类社会各个领域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由苏联美学界 1960 年提出并广泛运用的一个概念。包括三个基本层次：1. 人们的审美意识，即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一切领域的各种事物的审美评价；2. 人们的审美活动，包括一切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审美处理、审美对待；3. 人们的艺术实践，包括艺术创作中的一系列美学问题。审美文化对客体的要求，是要美化客观世界，使人的环境更适合人的发展；对主体的要求，是要求人本身更加全面、和谐地发展。

（郭建中）

审美主体 aesthetic subject

和审美客体构成一定的审美关系。翻译的审美主体就是译者，是再现原文审美价值、创造译文美的能动因素。译者不是作家，也不是单纯的鉴赏家。在翻译实践活动中，他一开始就受制于审美客体——原作。所以，客观制约性是翻译审美主体的基本属性之一。翻译审美活动的过程是译者通过对原作的审美实践（审美客体的审美信息解码），经受审美体验，达到对审美客体的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统一，然后实现译文的审美再现（目的语的编码）。

审美再现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读者对原文（客体）的审美构成有了认识，获得各种审美信息，经过审美转换后，对转换结果进行加工，用目的语再现源语的审美信息。审美再现的基本手段为模仿和重组。

以源语为模仿原型的翻译再现旨在以源语的审美信息特征和结构为依据复制为目的语美的信息。例如：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And therefore, if a

man write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a great memory; if he confer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a present wit; and if he read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much cunning to seem to know that he doth not. (Bacon, *Of study*)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因此不常作笔记者须记忆特强,不常讨论者须天生聪颖,不常读书者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

重组是摆脱源语的形式束缚,按目的语的习惯组织译文,其特点是便于体现译者的审美理想,例如中国古典诗词重组为西方现代诗体:

自君之出矣(张九龄)

自君之出矣
不复理残机
思君如满月
夜夜减清辉

Absence

Ever since the day
You went,
And left me here alone,
My lord,
The world is changed!

Upon the loom
The web, half woven, hangs
Untouched.

My thoughts
Are all of you,
And I am like you silver moon,
Whose glory wanes
And grows more pale
Each night! (Henry H. Hart 译)

审美价值 aesthetic value

指一种从价值观角度对事物的审美属性所作的界定。审美价值的观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并为阶级性和民族性所制约。具有审美价值的现象和对象纷繁多姿。按照美的规律造型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以及自然界,都具有审美价值,有的还有着超越时代、民族、阶级的共同审美价值,如艺术等。翻译审美客体是指能满足人们的某种审美需要的审美客体。那种文句佶屈、色调灰暗、情感空泛、内容反动的作品就没有审美价值,因此也就没有翻译价值。当然,翻译不同于一般语言的审美行为,有的原文虽无多大的审美价值,但有一定的信息价值,也是需要翻译的。

审美体验 aesthetic experience

指经过感知、想象、情感、理解等多种心理功能共同活动而产生的审美愉快。它有多种名称,一般称为"美感",亦可叫做"审美感受""审美经验""审美满足",等等。也可说审美经验是多次反复形成的美感体验。在人们从事艺术欣赏时,以往的审美经验总要参与现实的、具体的美感活动中,以激发起丰富的想象,产生创造性的心理。人们的审美经验为审美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基础。艺术家将他的审美体验表现于作品中。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云: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的头两句是作者的审美体验的再现,是一种美的感性认识;后两句则是理性认识,是他对"物我齐一"论的艺术演绎。翻译家不能身临其境,但要从感觉、知觉出发来审视原文的美,运用想象、联想、分析判断,凭借直觉、思维、情感来捕捉源语的审美信息特征,以对原作者的审美体验有所体验和感悟。

审美观 aesthetic conceptions

指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审美活动)中形成的对美、审美和美的创造、发展等问题所持有的基本观点(包括标准、趣味和理想等)。是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观既有时代、民族、阶级差别,也有个人差异。集体、个人的审美观都受时代、民族、阶级的社会生活的各种影响和制约,受社会文化条件、政治哲学和道德观点、宗教信仰、自然科学观点,乃至年龄、职业、心理素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每个人的审美观都是社会实践、审美实践的产物,既有一般社会性,又有个别性。各时代、民族、阶级的人由于社会实践、审美实践有延续性、共同性,他们的审美观常常互相影响,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每个时代的人们的审美观又总在某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和发展。

审美观的核心是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根据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否相符合,不同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可以大致划分成进步的或腐朽的,健康的或颓废的。进步的、健康的审美观能帮助人们正确地发现并深刻地感受美,能分清美与丑,并按美的规律改造自身和世界。

审美图式 aesthetic schema

刘宓庆在《翻译美学导论》(1995)中提出文学翻译的审美图式。他将文学翻译看做分解源语文学美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逐级上升的平面:观览(主要借助于感知)→品味(主要借助于想象与联想)→领悟(主要借助于理解)→再现。该图式可概括为:观→品→悟→译,贯串全过程的是情感。这就是:1. 观览:审美主要集中于源语文学美的外在形式,即文学美的第一层——声色之美;2. 品味:审美主要集中于源语文字美的内在形式,即文学美的第二层——意象之美;3. 领悟:借助于对象征(隐喻)的解读,以恢复源语的艺术意蕴为目标,审美主要集中于作品潜隐的理性内涵,即文学美的第三层——涵蕴之

美;4. 再现：通过模仿、重建等手段,再现源语的文学美,这也是文学翻译审美图式中的终端环节。参见"审美再现"

审美活动　aesthetic activity

指人对生活美和艺术美的欣赏活动,辨别美丑的活动。广义的审美活动,包括审美的创造活动。审美活动是人类从精神上把握现实的一种特殊方式。同人类其他认识活动一样,它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产生,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改造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发展。审美活动始终不能离开对具体个别感性形象的感受。人在审美过程中,由直观对象的触发引起联想和情感活动,体验、认识审美对象的内容和形式的审美属性,其中有多种心理功能综合地发生作用。审美活动主要是一种再造性和创造性的形象思维及情感体验活动。对于译者来说,其直接目的不只是审美享受,得到感情上的感染和熏陶,而且还在于审美再现,将原文的内容美和形式美通过译文再现出来。

翻译审美活动一般包括审美认识、审美转化和审美再现。在翻译审美活动中,译者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决定着译者追求美的境界以及对原文审美构成的认识和理解,而且决定着对它的表达,并最终决定着译文的审美品质。

审美客体　aesthetic object

即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构成一定的审美关系,是审美主体的审美认识和审美创造的对象。翻译的审美客体就是原作,是构成译文美学要素的客观依据。翻译的审美客体的属性中最基本的是译文的依附性。离开原文去追求、探讨译文的美如果不是哗众取宠,也是不真实的。

审美能力　aesthetic ability

即人们发现、感受、评价和欣赏美的能力。审美经验的实现过程,究其实质来说也是审美能力的境界和提高的过程,又是人的审美情感的塑造过程。审美能力是鉴赏力,是各种心理功能综合活动的能力,是在情感和想象中对审美对象的知觉完形及其意味进行充分理解、感受体验的能力,它本身来自社会实践造成的内在的自然人化。翻译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审美主体审美能力的提高。而审美能力的养成,一方面固然与所谓的审美潜质(包括生活阅历、智能水平、审美经验、文化素养等)有关;另一方面却是翻译主体通过长期审美经验的实现和积累,使审美情感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心灵不断得到陶冶和塑造的结果。

审美理想　aesthetic ideal

产生于人的社会实践,是人的审美体验的积累和升华。人的全部社会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断地认识现实、产生理想并实现理想的过程。艺术通常是人审美理想的集中表现和反映。艺术家在感受认识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常常塑造出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或生活场景,这些艺术形象虽取材于客观现实生活,但却常常是概括化、理想化的产物。

翻译的审美理想与上面所说的审美理想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不同之处是：一般美学中所说的审美理想以外物为审美对象,将体验体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因此文艺创作的审美理想也可以说是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原则;而翻译美学中所说的审美理想则是翻译家对如何体现原作美的一种理性和感性认识的统一,也可以说是翻译家对待翻译艺术实践的原则主张。因此,翻译审美理想与翻译审美再现是密切相连的。(刘宓庆 1995)

审美意识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指人的主观对客观存在的美丑属性的反映,包括人的审美感觉、认识、感情、经验、趣味、观点和理想等。审美意识为客观存在的美所决定,同时又反作用于客观存在的美,帮助人们更自觉地创造、欣赏美。译者的审美意识积极参与翻译审美活动,对原文(第二现实)进行审美感知、审美认识、审美判断和审美评价,将其具体化,形成译文。译者对原文的审美掌握取决于他的审美意识的水平。译者的审美意识水平越高,他审美掌握原文就越完整,越深刻,越正确,他的译文质量也就越高。反之,译者的审美意识水平如果不高,他对原文的审美掌握就会不完整不深刻,甚而会是错误的,他的译文自然也是低品位的。而译者的审美意识水平又与才能和天赋有关。

翻译文学　translated literature

文学的一个门类,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的翻译文学,它是外国文学的承载体——把外国文学"载运"(介绍)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谢天振 1999：231);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促进文学的进步和繁荣起着重要作用。译介学和比较文学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对翻译文学进行探讨和研究。参见"译介学""比较文学""文学的多元系统"

翻译艺术十大矛盾　ten contradictions in the arts of translation

由张今提出,大意如下：一、译者世界观和作者世界观的矛盾;二、社会真实和细节真实的矛盾;三、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矛盾;四、译者风格和作者风格的矛盾;五、译文艺术内容和原文艺术内容的矛盾;六、译文语言形式和原文语言形式的矛盾;七、译文语言形式和译文艺术内容的矛盾;八、译文整体和细节的矛盾;九、译文语言自然性和民族性的矛盾;十、译文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矛盾。这十对矛盾,还可以用另一种通俗的表述方式,变成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也是对中外翻译思想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的归纳：一、文学译品应该反映作者的世界观,还是应该反映译者的世界观？二、文学译品应该着重揭示原

作中生活画面的社会意义,还是应该满足于客观地再现这一生活画面?三、文学译品应该追求神似,还是应该追求形似?四、文学译品应该反映原作风格,还是应该具有译作风格?五、文学译品应该如实地反映原作艺术意境,还是应该给这一艺术意境蒙上一层非固有的社会和审美色彩?六、文学译品应该采用直译方法,还是应该采用意译方法?七、文学译品应该“忠实而丑”,还是应该“不忠实而美”[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Groce)语]?八、文学译品应该忠于原作的精神实质,还是应该忠于原作的词语细节?(关于诗歌应该译成诗体还是散文体的争论也属于这个问题的范围)九、文学译品读起来应该像原本,还是应该像译本?十、文学译品读起来应该像原作同时代的作品,还是应该像译者同时代的作品?(张今 2005)

19. 语用学 交际学

专业交际学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该学科是从科技英语发展而来,主要以专用英语研究的技能中心法和学习中心法为理论基础,结合电脑技术而形成的语言教学法。随着专用英语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脑技术的迅速普及,专业交际学作为一种新型学科在美、英等国家得到了迅速发展。根据美国专业交际协会提供的资料,至20世纪末,美国有120多所院校开设了专业交际学课程,旨在提高各科学生的职业性交际能力。

随着技能中心法的出现,人们开始从寻求各专业语域间的个性转变为寻求它们的语言共性。物理学、化学、医学、经济和贸易等学科的专业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在进行信息交流时所使用的专业文件的类型、作用和格式是大致相同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通信:包括广告单、电子邮件、备忘录和信件;2. 营销:包括经营管理文件和推销促销材料;3. 操作和使用说明书;4. 建议书;5. 报告书。对这些专业文件进行语言学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在目的、内容、写作方法和对象选择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言语交际学 speech communication

该学科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是研究言语交际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其主旨有二:一是把处于交际中的言语形式看做是一种过程(过程观把一切人类行为看做是动态的、进行着的、不断变化的连续体);二是设计出言语交际的模式(即制订出一种分类的封闭系统,对过程中潜在的变项进行抽象并使之范畴化)。

互为显映 mutual manifestness

最早由法国学者斯珀伯(Sperber)和英国学者威尔逊(Wilson)于1986年在其合著的*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提出。该概念是与认知环境、互知及互为假设紧密联系的,目前被运用于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及会话分析中。根据关联理论,当两个人的认知环境中有显映相同的事实或假设时,他们之间就产生认知环境的重叠,或者说他们共享同一认知环境,即我们所说的“相互认知环境”。在一个相互认知环境中,每一个假设显映就是我们所说的“互为显映”(Sperber, Wilson 1986: 42)。认知环境的互为显映是人们交际能否成功的主要因素。交际双方的认知环境互为显映,是指他们具备靠相似的物质环境和认知能力所构成的认知基础。一个事实或假设对某人显映,是指它能为此人所感知和推理,以获得新的信息,丰富自己原有的认知环境。关联理论提出的互为显映不同于格赖斯(Grice)提出的共有知识,其区别在于:1. 前者比后者更为具体;2. 前者比后者更接近信息交际时的认知状况。相比之下,共有知识过于笼统,且与人们的交际心理不大相符(张亚非 1992)。互为显映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表现在:1. 交际对象虽然可能都明白所处环境里的信息,但是相互间对同一问题的明白程度因时因地而不同;2. 交际对象的视觉器官可能先感觉到环境里的某些现象,而不是同时感知到所有的现象;3. 交际对象将对先感觉到的现象进行加工、理解;4. 交际对象既能够从已知或明白的知识中推理,也能够区分出对已知知识的明白程度。

互为显映这一概念的提出,告诉我们由于人们各自所处的直接环境及所拥有的认知能力不同,人们各自建立的认知环境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差异。因此,我们只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差异(如不同的知识结构、信念结构、价值观念等),才能使解释原则更为实际和灵活地反映认知效果。关联理论中的互为显映观对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烙印的语际翻译过程中表现出的原文与译文之间差异性的成因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这是因为不同的语言及其依存的社会文化必然存在着差异,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的认知环境很难做到同步的互为显映,因此需要交际参与方给予一定的调节。就翻译而言,因语言和社会文化差异导致的原文与译文之间形式的差异性,必定通过最佳关联性予以弥补或嫁接,才能达到一定程度上的互为显映。孙昂(2003)和徐勇前(2006)从语际交际观出发,对翻译行为过程中译者表现出的调节策略进行了译例分析,并就语际转换中互为显映的差异性处理问题作了讨论。

(曾利沙)

交际 communication

源于拉丁词 communis,是 common(共同)的意思。交际意味着要在共同的(交际手段、文化背景)基础上人与人才能进行有效的接触交往。符号是人们交际时使用的主要手段,任何符号都可以用来进行交际。交际是一个编码和解码过程,信息交流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心理活动。人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交际

必然发生在一定的社会之中,所以交际行为是社会行为,受到社会中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交际是文化的一部分。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交际能力的习得是与人的社会化同时发生的,人们又通过交际建立起内部和外部世界——交际是人们赖以生存、社会赖以活动、文化赖以传承和储存的最重要的机制。所以,对交际符号系统的理解往往取决于对文化的认同或共识。显然,翻译是一种交际活动,不过它是涉及两种语码、两种文化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非言语交际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指一套与有声语言和书面文字平行的符号系统。有时,在谈话中,当口头语无法或不便使用时,非言语交际能巧妙地起到补充或替代作用。这里的"非言语"包括非语言的声音(咳嗽、鼻音、声调等)、面部表情(特别是眼神)、身体的姿势、手势,以及衣、食、住、行的各种变化或习俗等,这些无不反映着信息。大多数研究交际的专家认为,在面对面的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非言语行为传递的。研究表明,在表达感情和态度时,语言只占交际行为的7%,而声调和面部表情所传递的信息多达60%。所以,在与不同民族打交道时,也应像理解有声语言一样去理解非言语符号,入乡随俗,才能通达。

交际方式 form of communication

指语言传播的方式或媒介,有口头、书面、屏幕、电码之分。口头靠口耳相通;书面靠文字表达;屏幕用光、电显示,且有电影和电视之分;电码还有电报和计算机语言之别。从表达的角度上看,又有直接与间接、对白与独白的不同。交际方式对语言材料和修辞方式的选择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表现在语言应用上就有不同的特点,具体地说,就是在调音、遣词、造句、设格、构段、谋篇等方面有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不同的文体。在翻译中,译者根据原文所采用的交际方式确定其文体或风格,以规约译文的语言表达。

交际过程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哈蒂姆(Hatim)与梅森(Mason)在他们合著的*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1990)中将语用学、符号学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把语用和话语符号层面的分析引入到翻译语境的研究中,构建了一个新的语境分析模式,里面包括交际、语用、符号三个维度,把语篇交际对应地划分为三个层面:交际过程(或交际关系)、语用行为、符号交际。交际过程涵盖语篇制作者/译者与接受者之间语篇交际的各方面因素,需要考虑的是语言的"用者"(user)变量和"使用"(use)变量。交际不但受个人言语风格、方言(包括地域方言、时代方言、社会方言、阶级方言)等"用者"变量的影响,而且受限于一系列"使用"变量,即韩礼德语篇分析模式中的语域部分,包括语场、语旨、语式。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尤以语旨最能反映语篇制作者/译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交际过程这一层面的重点。哈蒂姆与梅森曾举两个例句说明"用者"变量和"使用"变量的不同分析视点"1) I hereby declare the meeting open. 2) Shall we make a start now? "(1990: 39),他们指出,从语言形式(如语法和用词)上看,两句话的区别是与语言的"使用"有关的,而如果考虑到说这两句话时的具体发音,则是考虑到交际的"用者"因素。哈蒂姆认为,"意义"是个多面体,解释"意义"关键要考虑相关的语境因素。在交际过程这一语境维度,交际双方"在一定的语场中感受概念意义,在一定的语式中感受语篇意义,在一定的语旨中感受人际意义"(Hatim 1997: 28)。 (梁碧滢)

交际地点 place for communication

宏观语境因素之一,指话语产生地或文本创作地,与地域背景有关。了解交际地点,有助于译者正确处理与特定地点有关的词语,如《名利场》的大部分情节在英国展开。有了关于英国的地理知识,译者便可超脱词的本义,捕捉到文化背景信息:

In a word, he went out and ate ices at a pastrycook's shop in *Charing Cross*; tried a new coat in Pall Mall, dropped in at the *Old Slaughters'*, and called for Captain Cannon;...(一句话:乔治先生在却林市场点心铺子里吃冰淇淋,再到帕尔莫尔大街试外套,又在斯洛德咖啡馆老店耽搁了一会,最后去拜访加能上尉。)

Charing Cross, Pall Mall, the Old Slaughters'是伦敦的三个地方,如果没有文化背景知识不可能补出"市场""大街"和"咖啡馆"这些信息。又如《岁月无情》有描写天津的场景,译者对之了如指掌,翻译起来得心应手:

只要民航通知当天不飞,两个人立刻跑到街上去玩,看电影,去找十八街桂什么祥的麻花,还去劝业场和起士林……The moment the airline office announced that the plane wouldn't fly that day, the two of them would immediately head downtown, go to the movies, look for local specialty foods such as that fried, crispy dough down on 18th street, or go to *the biggest department store*, *Quanye*, *and the famous coffee shop*, *Kislings*... (Loretta L. Gibbs 译)

交际关系 communicative transaction

哈蒂姆(Hatim)与梅森(Mason)构建的语境分析模式,里面包括交际、语用、符号三个维度,把语篇交际对应地划分为三个层面:交际关系(或交际过程)、语用行为、符号交际。参见"交际过程" (梁碧滢)

交际时间 communicating time

宏观语境因素之一,指话语产生的具体时间,也指文本创作的时代或历史背景。交际时间对词义有

制约作用。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同一词语在不同年代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碑林采英》有言：欧阳询曾任隋，为太常博士。可译为：Ouyang Xun, an official in the Sui Dynasty, was conferred the title of Taichang Court Academician. 句中的"博士"非今日之 doctor，而是专精一艺之学官。"太常"为司祭祀礼乐之官。

交际线索 communicative clue

是格特（Gutt）在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1991）中提出的。在此书中，格特首次提出了"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和"间接翻译"（indirect translation）的概念。表达话语风格特征的语言特征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语言特征不但因语言而异，而且同样的语言结构（如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并不一定具有同样的风格特征。所以格特认为，在直接翻译中，与其说是在努力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不如说是在保留这些语言特征所提供的"引导读者获得交际者的本意的""交际线索"。对格特来说，所谓保留原文的风格就是保留这种"交际线索"。当译文努力保留原文中所有的交际线索并得以保留原文的风格时，就是直接翻译。直接翻译有赖于"语言特征的相似性"，努力达到完全的相似的阐释；反之，当译文只求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保留原文的基本意义，对原文的表现形式作较大的改动时，这种翻译就是间接翻译，间接翻译意在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的相似性"。他指出，"通过语言编码产生的语义体现是抽象的大脑结构，必须通过推理使之充实才能用来代表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这些语义体现的用处在于它们是对信息发出者（作出）假设的基础"（Gutt 1991：131）。也就是说，它们提供交际线索。交际线索不只体现在语音、重读上，还体现在句法、语义、语用、文体等各个层面。风格的再现要求译者从原文中发现交际线索（音韵、句法、修辞、语用等特征），然后在译文中再现这些交际线索。绝大多数的交际线索能被识别和再现，在双语转换中都可以做到比较理想的契合，风格意义的可知性从原则上基本保证了风格的可译性。例如：

"Wanna go to a movie with me sometime. Jess?" asked Davey Ackerman.

"*The name* is Jessica. And no. I wouldn't , I don't go out with juveniles."

"杰丝，想不想什么时候和我一起去看场电影？"戴维·阿克曼问道。

"名字是杰西卡。不，我不和你去看电影。我不和未成年的孩子出去。"（范家材《英语修辞赏析》）

上述会话中，男孩戴维以昵称 Jess 称呼女孩 Jessica，想套近乎。但女孩对戴维毫无好感，定冠词 the 为语用交际线索词，具有特定的语用交际意图，暗示了女孩的冷淡态度；其交际意图并非想要告知戴维她的名字是 Jessica，而是不给他套近乎的机会，要求对方称呼她的名字，而非昵称，语句具有祈使功能。照字面译"名字是杰西卡"（直叙形式）传达不出女孩那种冷冰冰的话语效果，而且不具口语化，与下文的衔接也不是很连贯达意。此处宜译出带有语用交际意图的线索词句为好，即译为祈使语气句：

"杰丝，想不想和我一起去看电影？"戴维·阿克曼问道。

"叫我杰西卡。你拉倒吧，我才不呢。我不和小年青出去。"

（曾利沙）

交际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海姆斯（Hymes）1972 年提出，交际能力包含四方面内容：1. 能分辨合乎语法的语言形式（语法的正确性）；2. 能分辨实际可接受的语言形式（语言的可行性）；3. 能分辨得体的语言形式（语言的得体性）；4. 能分辨一种语言形式的常见程度（语言的可接受性）（Hymes 1972）。交际能力不仅包括语言能力（听、说、读、写），而且也包括对与语言使用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充分了解。

关联理论 relevance theory

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在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一书中提出与交际和认知有关的关联理论，给语用学带来了新的研究热点。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它不以规则为基础（rule-based），也不以准则为标准（maxim-based），它主要不是讨论如何通过语用学理论去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而是概括出一条总的认知原则——关联原则。在 1995 年版本中，关联原则又被修改扩充为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两条。主要观点有：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含因素使听话人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但他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潜在的全部意义都理解，他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通的标准去理解话语，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关联性与语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成正比，与处理努力（processing effort）成反比。因此，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的关联性。要找到对方话语同语境假设的最佳关联，通过推理推断出语境暗含，并最终取得语境效果，才能达到交际成功。斯珀伯和威尔逊的学生格特（Gutt）将关联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出版了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1991），并于 2000 年再版时增加了一章后叙，使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更为充分。格特将关联理论用于解释传统翻译研究中未能给予很好说明的现象，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理论观。他倾向于从人的能力（competence）而非行为角度看待话语交际，试图说明人脑信息处理机制在人际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就对语境作用的认识而言，他认为语境是个心理结构，是听者关于世界假设的一个子集。语境并非确切地指话语双方的外部环境中的某个部分，如话语前后的话

语片段、环境情况和文化因素等,而是指交际双方关于世界的假设的一部分,即"认知环境"。格特指出,通过语码产生的语义体现(semantic representation)是抽象的大脑结构,必须通过推理使之充实才能用来代表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译者在意义的认知理解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按照关联理论观,由于认知环境的不同,接受语读者或听众缺乏原文某个概念所承载的信息,因此需要使隐含意义明晰化。但这并非要把话语中所有的隐含意义都解释出来,因为这样会使读者需要付出的努力太大,尤其是这些信息在语境中并非都能产生出语境效果来。格特的关联理论为翻译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如"刺激取向翻译模式"和"理解取向翻译模式"等。

关联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可行的理论框架,拓宽了研究空间。赵彦春(1999)认为,关联理论对翻译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并试图建立关联翻译模式:一价元-推理模式与二价元-推理模式;曾利沙(2005a)从关联理论概念出发,衍生出"社会文化语境关联性融合"的理论框架,以此解释在语篇翻译主题制约下译者选词择义的理据性。国内也有文章对关联理论的解释力予以质疑,认为关联理论对跨文化交际翻译的解释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它无法解决最佳关联赖以存在的缺省模式之一——文化缺省的移植问题(王斌2000;王建国2003)。参见"关联翻译理论" (曾利沙)

交际假设 communicative assumption

是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1986/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现被广泛应用于语用学、话语分析及认知语用学等。交际假设可以是语境前提,也可以是语境结论,它不是听话人对语言结构进行解码以后获得的。根据关联理论,含意仅仅是一种通过语用推理获得的交际假设。与交际假设有着紧密联系的另一概念是语境假设。在关联理论中,语境也称为"语境假设"(contextual assumption),在交际过程中,双方互明的共知环境称为"相互认知环境"(mutual cognitive environment)(冉永平 2001a)。在言语交际中,对话语理解起主要作用的是构成听话人认知环境的一系列假设,因此,语境不限于现实环境中的情景或话语本身的语境;言谈交际中的语境不是双方事先知道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关联理论将语境看做在互动过程中为了争取理解话语而存在于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理解每一个话语所需要的语境因素是不同的,因此,听话人要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为每一个话语构建新的语境。由于人们的认知环境与认知结构不同,话语推理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隐含结论。总之,关联性是制约人类交际的基本因素,它可以看做一个常量,而语境则是一个变量,语言的交际过程受认知环境的制约,涉及语境假设的形成与验证。

关联理论框架下的语篇理解采用动态的阐释法。译者通过语篇中新出现的信息不断调整已有信息,当新信息与已有的语境假设产生矛盾时,新的信息否定旧的语境假设,触发调整以顺应新的语境,取得语境效果。语篇理解是译者对语篇信息不断推理的动态认知过程。不同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会因翻译角度和个体思维模式、知识结构、文化背景等认知能力的不同而在理解时发生差异,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就应该紧密联系原文语篇的交际假设与语境效果,呈现给读者最贴近源语篇的译文。假如译者未能充分考虑到认知假设和语境效果的因素,就会在译文中造成有悖于原文的认知假设和语境效果。如:

"He's as like her, "said my aunt, emphatically, "He's as like her, as she was that afternoon, before she began to ***fret*** — bless my heart, he's as like her, as he can look at me out of his two eyes. "(Charles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 "他真像他妈",姨奶奶加重语气说道,"他真像她那天下午开始烦躁之前的模样——老天知道,他那两只眼睛往我这儿一看,那模样和他妈完全一样!"(庄绎传译《大卫·科波菲尔》)

上述译文将原文的 fret 译为"烦躁"(取其基本义),产生完全不同于原文的交际假设和语境效果。从交际假设看,所谓的"烦躁"是一种心理的、情感的变化,其认知假设则必须是有某个特定的外界事件(态)作为大卫妈那天下午开始烦躁的成因,但原文上下文中并没有交代这一令人烦躁的特定事件(态);其次,原文强调的是大卫的眼神,而译文说大卫与他妈那天下午"开始烦躁"之前的模样真像,无疑给读者造成认知困惑:儿子的模样,尤其是眼神,难道与母亲某个特定下午开始烦躁之前的模样竟然有着遗传意义上的相似性?可见此译未能达到原文的语境效果。其实,原文 that afternoon 是指大卫的姨奶奶在大卫长大成人后,回忆起大卫母亲快要生大卫的那个特定下午的情景,此处 she 和 her 指的是大卫的母亲。原文的 fret 是说那天下午产妇(大卫的母亲)在临产之前的产痛,这是小说作者用的一种委婉而抽象简练的表现形式,此处宜译为"产痛"。其认知假设和语境效果指的是一位母亲产子之前眼神里那种因幸福和喜悦而流露出的安详、富有神采的神色。 (曾利沙)

交际意图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指交际者通过社会交际要达到的目的,或要获得的结果。德国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Husserl)最早重视到意向问题,于19世纪初提出了意向性理论,认为意向性(这里指人类的心理活动)的赋义活动使得语言符号具有意义。半个多世纪以后,语言哲学家格赖斯(Grice)认为,意义即意图,亦即话语的意义表现为说话人的意图、信念等心理意向状态。后来,在意向性与意义的关系、言语行为与意向性的关系上,瑟尔(Searl)发展了格赖斯的意向意义理论,他认为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基础,人们通过言语行为描述世界,言语行为是大脑各种意向活动的再现。关联理论认为,

交际传达的是意图,意图又分为两层: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认为,信息意图是指说话人向交际对象表达或进一步表达一组信息的行为,或者可以说是话语的字面意义、自然意义(natural information);第二层则为交际意图,是指说话人在说话时,不仅要表明他有某种传递信息的意图,更要向对方表明他有传递这种信息意图的意图,即交际意图。可见,交际意图是以信息意图的理解为基础,是高于信息意图的一种意向性。张德禄(1998b)把交际意图分为四个层次,主要包括两大类:显性交际意图和隐性交际意图。从主观上讲,显性交际意图指交际话语要取得的直接结果;从客观上讲,它指的是话语的言语功能。言语功能是显性交际意图,因为它是可以根据交际者的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进行检验的。例如,你要给对方一本书,你说:"给你这本书!"对方接受了你的赠送,交流就算成功了,言语行使了其功能,实现了给对方赠书这一交际意图。其他层次的交际意图是隐性的、非语言的,而且又影响语言选择的个体心理现象,所以不能直接根据形式特征来确定,而只可根据情景语境和话语进行推导。例如,"Give you this teapot!"这句话的言语功能是明确的:提供,但其主要交际意图是隐含的。它可以是为了诚心帮助别人,也可以是因对方曾给他一件礼物而以此作为回报,以利于保持和发展友情等。由此可见,显性交际意图是用于实现隐性交际意图的,而隐性交际意图则是显性交际意图的动因(motivation)。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为了保证翻译交际活动的成功,译者不仅要传达出原文的信息意图,最重要的是传达出原文的交际意图,在两者不可求全之时,则取其交际意图。例如:

"You fool, why do you catch at a straw?" ***calm good sense*** says to the man that is drowning. "You villain, why do you shrink from plunging into the irretrievable Gazette?" says ***prosperity*** to the poor devil battling in that black gulf. (W. M. Thackeray, *Vanity Fair*) 常识丰富的人从从容容地对快要淹死的人说:"你这傻瓜!抓住一根草当什么用?"一帆风顺的大老官对那正在掉在深坑里挣扎的可怜虫说:"你这混蛋,你的情形早晚得在公报上登出来,你为什么还要躲躲闪闪捱着不肯说?" (杨必译《名利场》)

英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萨克雷的成名作《名利场》是一部讽刺小说,展现了英国19世纪初期上流社会的全景式画面,作者广义上的交际意图是"揭露和讽刺中上等社会各类人的丑恶面目与本质特征"。而在作品的微观层次上,作者分别对追名逐利之徒、忘恩负义的暴发户、闯荡江湖的骗子、脑满肠肥的寄生虫、堕落空虚的纨绔子弟、无情无义的亲朋等不同类型的人物进行了讽刺性刻画。如上述引文就是对忘恩负义的暴发户(债主)冷酷、自私、落井下石行为的讽刺。具体而言,作者是通过借代手法揭露这类人物的可鄙面目,鞭笞丑恶的社会现象。但译文"常识丰富的人"和"一帆风顺的大老官"并非面目丑陋之人,不属于作者所要讽刺批判的人物范畴,同时与上下文语境中隐性所指的"忘恩负义的暴发户(债主)"之间并无内在关联性。此处译文应传达作者的交际意图:上文谈到爱米利亚的父亲赛特笠原是个很成功的证券经纪人,后来由于公债跌价,一夜间变得倾家荡产。老奥斯本曾受到赛特笠的恩惠才得以摆脱卑微的出身,一跃成为伦敦的商业巨头。按常理,他本该报答恩情,向赛特笠伸出援手。但恰好相反,在债权人会议中,对赛特笠最强硬、最狠毒的就是老奥斯本。一来他想用证实对方"行为恶劣"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忘恩负义,二是因为在老奥斯本这一类人看来,破产是最大的罪过,而且还连累自己受损失,当然不能放过。上述原文黑斜体部分语言活泼,形象生动,明褒暗贬,是作者以借代的修辞手法对特定典型人物的讽刺性描写,翻译时要求译者充分表现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这种人物特征和受话者的对比照应关系,以及说话人幸灾乐祸、漠然,甚至落井下石的口吻。试改译为:

处境无忧、镇定漠然者劝那溺水者说,"你这笨蛋,死到临头还抓住根稻草又有何用?";而那敛财有术、春风得意者则冲着在丑闻深渊中挣扎的可怜虫叫嚷,"你这混蛋!干嘛还遮遮掩掩?反正早晚要给《公报》抖露出来的,不如趁早说出来吧!" (曾利沙)

交际关联 communicative relevance

米勒(Miller)和斯坦伯格(Steinburg)把交际定义为:"交际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递信息的过程"(转引自卢长怀 2004)。何自然(1995)认为"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交际双方之所以能配合默契,主要在于一个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何自然、冉永平(2001)指出所谓交际行为相关或交际关联,指的是语言显现对受话人有刺激,可产生相关性,足以促使受话人作出信息处理努力。以格赖斯(Grice)为代表的语用学家们提出了交际的推理模式(the inferential mode of communication),试图解决代码模式不能解决的问题,认为交际能够成功是因为一方面由说话人提供其意图的(话语)证据,而听话人则由这些证据推断出说话人的意图。但是交际推理说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着漏洞。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1986)批判地继承了上述两种模式,提出了关联理论,进一步将交际相关/关联原则解释为:语言的显现刺激如果与交际者的能力和爱好一致,即可视为是最相关的。这样交际最佳相关/关联假设就变成了:1. 语言显现刺激的相关性,足以使受话人所作出的话语信息处理努力产生效果;2. 语言显现刺激如果与交际者的能力和爱好一致,即可视为是最相关的。援引斯珀伯和威尔逊的例子加以说明:

Peter: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cinema?

Mary: I'm tired.

斯珀伯和威尔逊分析最佳的语境效果是Mary很累以至于不能去看电影。这符合理解话语时的最佳关联

性。关联理论对语言交际中人的心理认知过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而对交际过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要交际双方敏锐捕捉关联因素,寻找最佳关联,在听、说中利用相关语境因素,即可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

从关联理论对交际关联的解释看,用以阐释的典型样例主要见于日常会话,其特征是参与交际的一方(受话方)往往并不直接或明示地向另一方(发话方)提供其所需的信息,而是间接或含蓄地传达自己的信息意图或态度。这就需要发话方根据对方提供的明示话语建立起潜在的交际关联性,并从中推导出自己所需的交际信息。对翻译研究来说,交际关联这一概念主要适用于解释小说或影视会话翻译现象,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仅在话语语言本身,还在于参与会话的交际双方或其他方的身份、性格、地位、关系等,以及交际环境等对话语形式的影响。由于翻译具有跨文化交际的特点,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来说,即使交际环境、交际内容和交际目的相同,用以构成话语形式的手段也会有差异。这就要译者考虑译文受众的认知能力,给予相应的调节。例如:

鲁大海:(抽出手枪)我——我打死你这老东西!

鲁贵:(站起,喊)枪,枪,枪,(僵立不动。)

鲁四凤:(跑到大海的面前,抱着他的手)哥哥。

(曹禺《雷雨》)

Hai:(drawing his pistol) I'll — ll kill you for that, you old swine!

Lu:(leaping to his feet and shouting) ***Help! Help! He'll shoot me!***

Feng:(rushing across to Ta-hai and seizing his wrist) Ta — hai!(王佐良译)

上述译例中,鲁贵在受到生命威胁时,大喊出来的是"枪,枪,枪",其关联性交际意图则是向在场的四凤求救,并非是想告诉四凤大海手中拿的是枪;而四凤所理解的话语交际关联也正是前者,所以才跑到大海面前抱着他的手。因此,译者将其译为 Help! Help! He'll shoot me!,这是因为英语民族的人在生命遇到威胁或危险时,习惯于大叫"Help! Help!"(常规性交际关联形式),不同于汉语民族。翻译时如照汉语话语形式译出,就难以让英语民族读者建立起交际关联,难以理解其情其境人物的内心活动与语言表达之间的逻辑联系,故有会话话语形式上的调节。　　(曾利沙)

关联准则　relevant maxim; R-principle; relevance principle

这一概念被广泛运用,但由于理解和翻译的差异,其英文原指不尽相同。格赖斯(Grice)(1998)的"会话含义学说"将"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化解为九项准则,分别纳入数量准则(quantity maxim)、质量准则(quality maxim)、关系准则(亦称"关联准则")(relevant maxim)、方式准则(manner maxim)等四个范畴之内。其中,关联准则要求:说话要贴切;交际时的表达必须与所处的时间、场合一致;话语之间要有关联,即说话与话题要相关,不要答非所问或脱离话题。这四条准则在客观上是必须遵守的。然而,在实际交际中人们并不总是恪守这些准则,有时在某些场合下会有意违反这些准则,形成会话含义(implicature)。曲言方式的广泛使用导致会话中产生大量违背合作原则的现象,西方许多学者感到"合作原则"的累赘,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对"合作原则"进行修订。霍恩(Horn)(1998)将格赖斯的九项准则并为两项:数量准则(Q-principle)和关联准则(R-principle)。所谓关联准则就是要使你的话语只是必须的,不说多于所要求说的话(以数量准则为条件)。根据关联准则,说话人所说的只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能不说的就尽量不说,说最经济的话语,便于听话人推导出话语的下限隐含意义。对"合作原则"修订幅度最大的当属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的单一关联准则体系,即关联理论。他们认为,如果一个话语违背了质量准则(话语不真实)、数量准则(多说或少说),或者方式准则(言辞不清),它必定同时也违背了关联准则;这是因为说话人没有尽最大努力使话语相关或因怀有不同目的而故意模糊话语的实际含义。关联理论认为,说话人竭尽全力使话语最大程度上相关联。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含使听话人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听话人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所表达的全部意义都得到理解,他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通的标准去理解话语,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关联性与语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成正比,与处理努力(processing effort)成反比(Sperber, Wilson 1998)。

从"语用关联"及其相关概念"会话含义"的内涵特征看,关联准则对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指导作用主要在于对小说和影视作品中人物对话特征的分析,涉及人物话语所体现出的量、质、方式与关联性之间关系的把握。译者能否对人物发话过程中选择违背合作原则的诸种曲言方式所产生的会话含义的准确把握对译文的贴切性会产生质的影响。黄倩、蒋靖芝(2005)与魏泓(2005)结合关联准则和会话含义,对《红楼梦》两种英译本中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通过运用各种译介手段,充分再现作品中人物的会话含义和小说的艺术魅力的译例进行了解析。　　(曾利沙)

逻辑关联　logical relevance

"逻辑"是以推理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是通过理论思维对历史的再现,概括地反映历史的过程(张焱 2005)。逻辑被运用于关联理论,即关联逻辑。熊学亮(2005)认为,关联推理分初始假设和最终假设。初始假设含有输入的新信息 P 和旧信息 C。原有语境假设 P 和 C 的组合,就是 P 在 C 中语境化的演绎前提,能派生出单个 P 或单个 C 都不能独立派生的语境隐含(contextual implication),即最终假设,或者说 P 只能在 C 中产生语境隐含从而产生下面的论证结果:

1. 当且仅当 P 和 C 的组合非琐碎地(non-trivially)隐含 Q;

2. P和C分别不能独立地非琐碎地隐含Q时,P假设在C中才能语境隐含Q,因为只有P假设(积极地或消极地)改变了C,才能产生认知效果P和C的互动。产生认知效果有下面三种情况:(1)增强语境假设;(2)消除语境假设;(3)与语境假设合并产生语境隐含。语境假设C是关联逻辑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永远取下面的逻辑形式:

① P

② P→Q

③ ~P→~Q

P是输入的新信息,P→Q是输入新信息触发或激活的逻辑式,输入信息得到加强就取这种逻辑形式,输入信息被消除时就会得到与它相应的否定式~P→~Q加入"加强"(P+)和"取消"(P-)两种概念,就可以得到下述逻辑式:

a. P→P+(P→Q)

b. P→P-(~P→~Q)

c. (P+∨P-)+C=CI

(CI=contextual implication)

对①的加强会导致②(P→Q),对①的冲突和抵触会导致③(~P→~Q),这种逻辑可以通过下例进行论证:

假如X从上海乘10点的火车去南京开会(P),产生的语境假设(P→Q)就是:

1. P可能赶上火车

2. P→Q赶上火车就能按时开会

如果输入的新信息能加强,那么就得到:

3. 赶上火车了(P)→Q(加强了原有假设)

然而一旦输入的新信息与P抵触或与原有假设冲突,就可能取消P→Q逻辑,从而产生下面这种派生逻辑:

4. ~P→~Q赶不上火车就不能按时开会

从而得出下面的结论:

5. 未赶上火车(~P)→~Q

关联逻辑对于翻译实践具有可推论性作用,帮助译者有理据性地推导出原文中那些隐性或缺省的意义,而对于翻译研究则具有一定的可证性和可描写性作用。例如:

... Martin was slightly ***disturbed*** by the cashier, a young and ***giggling*** Wisconsin school-teacher ***with ankles*** ... 望着眼前的这位年轻出纳——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女教师,马丁被她那银铃般的咯咯笑声和轮廓清晰的漂亮脚踝弄得有点心旌动荡。

原文语境C中蕴含两个互为加强的初始语境假设因子 P_1(giggling)+ P_2(ankles),构成语境化的演绎前提,其派生的最终假设(或语境蕴含)也就是译文中增译的"银铃般的(咯咯笑声)"和"轮廓清晰的漂亮(脚踝)"。在原文中,disturbed(使人动心)作为语境假设触发语,一方面受giggling和ankles这两个语境假设因子的强化,另一方面又强化了两个语境假设因子的共性隐含义:美妙动人。其关联性演绎逻辑前提是:能让一个男人动心的女性形体部位和声音特质必定是美妙动人的。而giggling和ankles又相互强化其触发语"disturbed":美妙动人的女性特质必定能让一个男人有点动心。在原文语境C中,giggling和ankles的特质被具体化为"银铃般的"和"轮廓清晰的漂亮(脚踝)"则具有逻辑关联性:姑娘的咯咯笑声常和"银铃般"相关联,而姑娘的漂亮脚踝应与轮廓清晰相关联(常规关联),而非与"肥嘟嘟"或"胖墩墩"相关联。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关联理论中的逻辑关联这一概念对翻译现象具有一定的阐释力,也是翻译批评理论的重要工具之一。曾利沙(2007b)对翻译的意义本体论批评与价值评判的逻辑基础进行了讨论,指出逻辑特质是翻译活动重要的思维特征之一,它和其他种种思维形态一样都是翻译活动或研究不可或缺的,并且有其不容置否的客观基础,对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逻辑联系的探讨是翻译学科建设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与途径,也是一种永恒的研究主题。 (曾利沙)

阐释相似性 interpretive resemblance

由格特(Gutt)在其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1991)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人们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阐释的相似性"。所谓阐释,是间接性质的,是用一种已经被描写的思想来解释其他相关思想的过程。对翻译来说,作为原文的阐释者,译者必须使他的译文与原文存在着某种阐释的相似性,即"共享着某些分析性含意和/或语境含意",从而达到与原文的最佳关联。也就是说,翻译的阐释相似性就是源语话语和目的语话语之间的纽带(武红2005)。在 *Translation as Interlingual Interpretive Use* (2000)一文中,格特认为,"翻译是语际间阐释的使用"。换言之,译本是与原文本阐释性相似的接受语文本。这样就把翻译的概念与非翻译区分开来,语际之间的描写性应用及不涉及两种语言的阐释使用不属于翻译。翻译与解释的区别是语际间没有确定最佳关联的阐释使用属于翻译。在阐释使用中,关联原则与译者对原文所作的最佳相似的假定一致:与原文阐释性地相似。译本与原文具有的相似性与最佳关联的预期一致,即用必要的认知努力就可期望得到充分的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性抓住了翻译忠实的要害,在阐释性使用方面,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认为,"说话者保证他的言辞足够忠实,可以代表原语即在相关方面与原语足够地相似。"(Sperber, Wilson 1995)这样,最佳关联原则严格地限定了译者要翻译与受众(audience)充分相关,即能提供充分语境效果的那些方面。翻译要能实现意图而不必使受众做不必要的努力。忠实性在跨语阐释使用的理解与应用也与关联原则一致。

在关联理论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语内或语际)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众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convergence)。格特强调,有时译本取得了较高程度的相似,但却是以总的关联效果降低为代价的,因为解读译本需要付出的认知努力超过了它所取得的语境效果,在这些条件下,相似度较低的译本通常是能够成功交际的译本。田华(2006)认为,关联翻译理论的忠实受关联的制约,翻译的忠实性限制在对语境的充分敏感上,而译文要与原文在"相关方面相似"。 (曾利沙)

最佳关联 optimum relevance

关联理论的重要概念,指人们在理解话语时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而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即与最佳语境效果密切有关。关联理论认为,人类认知往往与最大关联相吻合,但在交际中,我们只能期待产生一个最佳关联。话语要取得最佳关联,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 话语的语境效果足以引起受话者的注意;2. 受话者为取得语境效果而付出了努力。在交际中,不管受话者会有何需求,不可能总希望发话者生成最大关联性的话语,他也许不愿意或不能够提供最大关联的信息,或者无法以最恰当的方式呈现该信息。最佳关联的提出旨在研究根据话语理解时交际者所付出的认知努力和语境效果以及受话者应产生什么样的期待。根据关联论的交际原则,每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一个话语的关联性可以比期待的关联要大。为了取得完满的语境效果,在寻找关联的过程中,要进一步追求较高层次的关联。于是就有了修改以后的最佳关联假设:1. 明示刺激(ostensive stimulus)具有足够的关联性,值得受话者付出努力进行加工处理;2. 明示刺激与说话人的能力和偏爱(preferences)相一致,因而最具关联性。(Sperber, Wilson 1986/1995)之前的"最大关联"只考虑受话者的利益,而如果考虑到发话者的利益,在发话者能力和意愿允许范围内的最大关联性,就是所谓的"最佳关联性"。最佳关联假设是涉及受话者和发话者两方面的关联程度问题。发话者要对某人发话时就期待话语具备最佳的关联性。当话语具备足够的关联性而值得受话者去进行加工处理,特别是当话语具有最大关联性、发话者又愿意并且能够把它说出来时,那么这个话语就是最佳关联性话语。

在翻译的关联论中,格特(Gutt)认为,"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intention)与译文读者的预期(expectation)相吻合"。他认为关联原则对于译文想传达什么以及如何表达都起到了很大的制约作用;换言之,译文试图传达的是那些与听众有着足够关联性,即能够产生足够语境效果的部分,而在表达方法上应做到既能产生原文作者企图让原文读者作出的解释,又不让读者花费不必要的处理努力。(Gutt 1991: 100)参见"最佳语境效果" (曾利沙)

社会环境 social environment

包括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氛围,俗称大环境。译者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从事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政治制度一边倒,在文艺作品的翻译中前苏联作品占绝大多数;经济体制上也依靠苏联,展开以前苏联援助的 156 项工程为重点的大规模工程建设,科技译作绝大部分源自前苏联。这一时期译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很少。有的译者即使不懂俄文,也要想方设法从别的语言转译俄文作品。

社会环境往往决定译者译什么,为什么而译,并且对怎么译——在表达方面也产生较大的影响。王佐良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作了分析:"当时的当权派顽固守旧,排斥新事物,严复要给他们介绍新知识,就得蒙上一层糖衣——使用汉以前的古雅的文体。结果他的译本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林纾之所以用章回体来译外国小说,也是为了迎合当时人们的审美心态。"

信息社会给翻译界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忠于原作者"的传统信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需要翻译的作品多为文学作品、人文社科学术著作和科技资料以及宗教宣传品等,这些翻译要求准确、传神,"忠于原作者",译者主要向原作者和原作负责。进入信息社会以后,商业文件、产品宣传资料、新闻、法律、金融等方面的实用性文件翻译的数量迅速增加,翻译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吸收信息,原作者和原文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译者的职责是顺应读者的要求,对"委托人"负责,即对译文的使用者负责,使译文读者受益。翻译内容的性质改变造成译者态度取向即效忠对象的改变。

社会情境 social context

指交流信息的情境,即话语的社会背景。按韩礼德(Halliday)的看法,语言的社会情境可以从三方面来分析:1. 话语范围(field of discourse),如正在发生什么事,包括正在被谈论的事;2. 话语基调(tenor of discourse),特别是谈话的参加者及其身份、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3. 话语方式(mode of discourse),如语言在具体情境里起什么作用,采用什么体裁,通过什么渠道(书面还是口头,或两者兼用)。例如,一份合同,其话语范围是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共同遵守的条文;话语基调是当事各方的平等关系;而话语方式是措辞古板、结构严密、正式程度很高的书面语。翻译时必须掌握话语的社会情境,使译文与原文在内容、措辞、体裁上吻合。

明示-推理模式 ostension-referential model

根据福特(Ford)的认知理论,结合语码模式和推

理模式，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提出了明示推理模式。他们认为，交际是一种保证取得关联的明示行为(ostensive behavior)，对听话人来说，交际就是一个识别说话人意图的推理过程，以扩大双方的相互认知环境。可见，关联理论把交际(言语的、非言语的)视为一种认知活动，交际能否成功取决于双方认知环境的相互明白。他们把明示推理交际定义为：说话人发出一种刺激信号，使之对交际双方互相显映，通过这种刺激信号，说话人意欲向听话人显映或更加清楚地显映一系列命题(Sperber, Wilson 1986/1995: 63)。明示与推理是话语交际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前者与说话人有关，后者则与听话人有关。从说话人的角度来说，交际是一种明示过程或示意过程，即说话人明白地表示自己有表示某事的意图。可见，明示就是把信息意图明白地表示出来，它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说话人不仅要表明自己有传递某种信息的意图，而且更要向对方表明自己有传递这种信息意图的意图。从听话人的角度来说，交际又是一个推理过程，即根据说话人所提供的明示语义信息(即字面意义)去推导对方的交际意图。推理就是指听话人根据说话人提供的明示信息去推导说话人隐含的意图。听话人的推理是关联理论交际观的核心，因为交际的成功离不开听话人的推理。

关联理论认为，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进行语内或语际阐释的明示推理活动，是一种涉及大脑机制的言语交际行为。翻译作为交际的一种，也具有交际的明示—推理本质特征，只是其过程更为复杂，涉及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两次交际活动。蒋小元、周永红(2006)从认知推理角度，借助关联理论框架探讨了关联理论和翻译的关系，认为在语码转换过程中，关联性起着关键作用，决定着译文信息和形式等相关因素的取舍；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中依据动态的语境，进行认知推理，找到最佳关联，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企盼相吻合。例如：

I think he was married and *has a lioness* at home.

该句中的 lioness 字面意思是“母狮”，这是该语句的明示信息，作者将其要表达的意思通过 lioness 一词进行展现。但是，作者的意图并不是说“他结婚了，家中有头母狮子”。在西方社会文化里，人们往往用 lion 或 lioness 来形容处于主宰地位的人物。在翻译时，译者必须调用相关的知识进行推理，理解源语作者的意图，找到最佳关联，并根据中国人的文化习俗，找出最佳的对应。此句中的 lioness 是暗喻的运用，实指 his wife，但直译为“母狮”则难以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和理解。汉译过程中只能将可推导性关联性概念表达出来，上例可套用汉民族相应的比喻而译为：*我想他已经成家了，他太太在家可是母老虎。* （曾利沙）

语用学 pragmatics

研究语言运用及其规律的学科，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初由美国哲学家莫里斯(Morris)于 1938 年提出。他把符号学分成三个组成部分：(1) 语形学(syntactics)，又译句法学或语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2) 语义学(semantics)，研究符号与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3) 语用学(pragmatics)，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后者构成符号学即关于某种符号系统的描述和理论的基础。语用学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度，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看做受各种社会规约支配的社会行为，研究特定语境中的特定话语，着重说明语境可能影响话语解释的各个方面，从而发现语用规律。(戚雨村等 1994: 449)根据语用学的原理和方法，译者应该努力使译文的效果尽可能地接近或等于原文的效果。但由于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不同，要对两种语言的读者产生等同的效果，不仅仅要求译者在译文中保留源语的语义内容，还要尽可能地反映原文的文体结构，同时还要译文能贴切地转达原文中所包含的诸如社会、文化等背景因素。所以，要真正理解原文，只靠句子结构分析，靠逻辑-语义分析，只求确定句子的真假意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信息的传递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形式的安排问题。它更多地取决于说话人的意图和话语环境。语用学告诉我们，要注意带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特征的词语，也要注意言外之意与话语的命题内容常常不一致的一些词语或句子的理解与翻译。要从文化背景和语境中掌握其语用含义，尤其是翻译习惯用语或文化语义负荷较大的词语及成语。

模块语用学 modular pragmatics

模块语用学中的模块概念源于心理学，后被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借鉴，用于认知语用学领域。认知心理学家福多尔(Fodor)在 *The Modularity of Mind* (1983)中对认知系统结构提出两分假设，认为它由两大块构成：信息输入系统和中央(加工)系统。其中信息的输入系统分为传感(无加工简单录入)和输入系统(简单加工)两个阶段，从传感获得的是原始素材，而经过输入系统简单加工获得的是对原始输入信息进行分析归类，形成模块储存。这就是经典的认知模块论(或心智模块论)关于心智结构的假设。福多尔虽然没有直接给模块下定义，但他还是给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表述：“以信息封闭性、快速、限制性通达、神经结构特异化等为特性的领域特殊的计算系统。”他总共列举了模块的九个特性。后来他又进一步精练为“封闭性”“不可通达性”“领域特殊性”和“天赋性”这四个特性(熊哲宏 2005)。在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第一版中，斯珀伯和威尔逊将语用学视为涉及大脑中枢思维(central thought)非特殊化(nonspecialised)思维过程的一种推导系统。在第二版中，他们对此又进行了修正，并指出，“在过去的 10 年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应根据模块理论来分析所谓的大脑中枢系统”(Sperber, Wilson 1995: 293)。后来他们试图证明，

即使语用问题涉及大脑中枢系统，人们也可以生成一些饶有兴趣的语用理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反对将大脑中枢系统和模块系统明确分隔开来，并提出了有实际意义的心智模块理论。研究认知的进化论观点对模块性的性质进行修正并提出新的看法，认为不应该把模块性理解为福多尔赋予输入系统的那样一组属性（飞快、必不可少、局部、封闭等），而应该理解为若干专门机制，这些机制不是在广义范畴运作的一般机制的具体化，而是体现为在某些专门区域对自然规律的生物顺应，有它特有的规律性和原则。这样，模块就被赋予了新的、更广泛的意义。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或理论假设，语用学就应该具有这种广泛意义的模块性特征。

模块语用学理论可运用于翻译心理学的研究，用于解释翻译过程中思维的心智特征与认知模块的关系问题。曾衍桃（2006）指出，目前，学界对认知加工系统的模块性有了新的认识，不把模块性视为其属性而视为其机制；且发展心理、发展语用以及神经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表明，人类认知理解有层次性和程度性差异，不同程度/层次的理解有其特有机制和规律，这似乎为语用认知的模块性提供了心理现实依据。由于翻译过程的首要环节就是阅读理解，而理解又必然涉及心智阅读，阅读过程无疑具有一定的认知思维特征，离不开心智的推理机制。就翻译心理研究而言，这一语际转换活动的首要环节中的思维心智机制是否具有模块性质及其相关问题值得探索。如模块形态的可表征性、模块形成的心理机制、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适用范围等。目前，这一翻译研究领域还有待于拓展。（曾利沙）

语用顺应论　theory of pragmatic adaptation

维索尔伦（Verschueren）语用综观学说的核心内容。该理论认为，使用语言就是连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使用要从语境、语言结构等方面，动态地根据不同的心理意识程度而作出某种顺应。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可变性、协商性和顺应性。以此观点审视通过两种语言转换进行交际的翻译活动，则翻译也应是不断作出选择的过程。它不仅具备单语交际中语言选择的基本特征，而且还呈现出翻译活动自身的选择特性。选择贯串于翻译全过程，发生在源语和目的语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无论译什么，还是怎么译，无不涉及对多种选项的择定。顺应是选择的目的，是保证交际得以成功进行的关键。同样，翻译过程中各阶段的选择，也都以实现语言结构和语境关系的顺应为目标。换言之，从宏观上的社会文化规范，到微观上的语篇句式法则，无不约束着翻译目的的确定和各种选择的决策。整体来看，翻译选择与顺应之间表现为非线性的互动关系，语境的时间因素、意义的多元阐释、译语表达的灵活多变，都表明了动态顺应性特征是翻译选择的实现方式。此外，顺应过程涉及某些认知心理因素说明，译者的选择都是在一定的意识程度下做出的。研究分析译者的意识突显程度，对于翻译教学或培训，发展完善元翻译理论很有意义。以选择和顺应为主线的语用顺应论将语言、语境、社会、文化、认知、心理等诸多因素纳入其中加以综合研究，为我们深化对翻译活动这一复杂过程的认识，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宋志平 2004）

语用分析　pragmatic analysis

指借用语用学理论和方法，对翻译中涉及的语言使用问题作交际意义上的综合分析。界定特定语境中语言成分的多种意义要素，进而确定该成分意义的交际价值，对翻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根据语用学理论，语用意义视语境的变化及语符使用者、接受者与语符的关系而定。语用分析要揭示的是语言成分在实际运用与特别语境中的意义。语用分析有助于揭示言外意义、蕴涵意义以及交际意义的附加价值。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手段，随着语言、文化、读者、时间、空间等语境因素的变化，必然涉及语用问题。译者的服务对象是对源语社会文化不了解或不甚了解的目的语读者，译者有责任通过语用分析，把属于源语语言文化的产物，用符合目的语语用习惯的译文，介绍给目的语读者。例如，油条（*Youtiao*, deep fried twisted dough sticks served for breakfast）；大锅饭（all eating from the same pot — equal pay for unequal performance）。又如：一听说妈妈要退休，他立即行动起来，……（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He had acted as soon as he learned that his mother was retiring and *that one of her children could take her job.* 在我国有一段时期，父母退休，孩子可以顶职。这一蕴涵意义需在译文中明晰化，以便读者理解。

语用失误　pragmatic failure

指言语交际中导致交际者本人未能取得完美交际效果的语用差错。在翻译这一交际活动中具体表现为译文不得体而误导目的语接受者，令目的语接受者感到别扭、不舒服、唐突、可笑甚至侮辱等不良后果。这些都可能对正常沟通形成阻碍，影响目的语预期功能的实现。翻译实践中如果只讲"准确"，不讲"自然"；只讲语法，不讲语用得体，就可能导致交际失败，出现语用失误。因此，译者应了解目的语（英语、汉语或其他语）为母语者如何使用语言进行交际，了解源语及目的语的各自词语中包含的语用信息，并在翻译实践中得体地加以应用，在必要时进行相应的语言调整，做到既符合目的语规范，又符合接受习惯。

语用行为　pragmatic action

哈蒂姆（Hatim）与梅森（Mason）认为，韩礼德（Halliday）的语境模式分析语域（即语场、语旨、语式）只是探讨了语境的交际因素，并不能全面涵盖翻译中需要考虑的语境因素。因此，他们在以韩礼德的语篇

分析理论为基础的合著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中把语用和话语符号层面的分析引入到翻译语境的研究中，构建了一个新的语境分析模式，里面包括三个维度：交际维度、语用维度和符号维度，即谁对谁说话(交际过程)，为何目的(语用行为)，通过何种社会文化符号(符号交际)。

在哈蒂姆与梅森的语境模式中，他们将言语行为(speech act)理论融入翻译研究，构建成语境分析的语用层面，要素包括言语行为、会话含义、预设、语篇行为、释意与推理、关联性、翻译中的效力与效能等问题，而核心问题是语篇制作的意图(intentionality)。哈蒂姆认为语用价值"不是单纯依附于语言形式，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面从讲话者/写作者的意图中积累而成的"(Hatim 1997：176)。哈蒂姆与梅森认为，就翻译而言，译者的任务不单是表现原文的命题意义，同时还需要表现主导原文的施为性言语行为(illocutionary force)，即"语篇行为"(text act)，并且要能获取适当的言后效果。他们建议，翻译时要取得对等的语篇行为效果，传递原文的语用强调比复制片言只语更重要。(Hatim, Mason 1990：78～79)参见"交际关系""符号交际" (梁碧滢)

语用前提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指交际双方对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所共有的背景知识。有了语用前提，在交流时就可以省去一些对双方来说不言而喻的语言成分，从而提高交际效率。缺省的部分包括语境缺省和文化缺省。前者的内容可在语篇内搜索到；后者的内容在语篇之外，为同一文化圈内的人共知，而为不同文化者感到陌生。译者须将语篇内的信息与语篇外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填补因缺省而出现的"意义真空"，建立起理解话语所必需的语义连贯和情境连贯，使译文读者不因缺乏原文读者的语用前提而产生误读或梗阻。参见"文化缺省""语用分析"

语用推理　pragmatic inference

最早出现于格赖斯(Grice)提出合作原则之后。法国学者斯珀伯(Sperber)和英国学者威尔逊(Wilson)在其合著的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一书中提出关联理论，从人类认知角度，将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发展成一个具体的心理认知模式。他们认为理解话语的标准是人类认知假设，认知假设就是语境假设，即说话者在话语明说的基础上凭借认知语境的三种信息做出语境假设。语境假设的过程要进行推理，而推理是一种思辨过程。这就是最初的语用推理。徐盛桓(1991)认为，"理解语用蕴涵的思维活动的一种推理，称为语用蕴涵推理，简称语用推理"。该理论现被广泛应用于会话含义分析、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及翻译领域。语用推理与逻辑推理相比，具有以下特点：1. 从形式看，不一定要求固定的格式，有些推理不一定在判断之间进行；不一定有明显的联系呼应；2. 从过程看，语用推理是在参加语用推理的话语中提取"论域"，而且通常要加上附加性前提，该附加性前提在有关语句中是找不到的，应从交际双方的共有知识去找；3. 从内容看，语用推理着眼于具体内容，而不注重判断的真伪，其结论不排除不确定性。语用推理是策略性质的，其目的仅仅是在无法论证的现象上寻找最佳解释，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认知语境或归纳逻辑、信仰和知识状态所构成的知识系列和策略系列的影响(熊学亮 1999：180)。

语用推理应用于英汉翻译，在正确判断话语交际过程中，发话者的语用意图以及听话者如何准确把握所蕴含的会话含义方面作出可证性的解释。翻译是一种双语活动，在这一活动中，语义的转换是其核心。而意义只能靠推理，不能进行解码。理解原文是翻译成功的关键，而结合语境对源语意图的推理是翻译的重要手段(殷习芳 2006)。语用推理在翻译中的应用简称为语用翻译，其首要目的是使译文对接受者所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接受者所产生的效果基本相同。为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求正确地理解原文，成功地抓住原文话语的隐含意义及核心意义，再结合相关联的语境进行语用推理，力求使译文达到原汁原味地体现原作者的意图和写作风格。语用推理可以用来有效解释语境化因素蕴含比较丰富的话语的翻译。孙翠兰和任怀平(2002)探讨了语用前提推理结合语境分析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对单纯利用上下文或语法结构和搭配关系准确理解原文意义的一种补充性分析工具。

语用照应　pragmatic anaphor

"照应"(bridging)，亦译"搭桥"，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心理语言学家克拉克(Clark)率先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根据某个显性结构对它所隐含的指称对象进行推理的过程。语用推理的照应(bridging reference)，或称语用照应，是话语的待释名词词组与前述话语中指称对象的照应关系。根据韩礼德(Halliday)和哈桑(Hasan)(1976)的解释，照应是指语篇中某一成分和另一成分之间在功能意义上的相互解释关系。在动态的交际中，一方面，听话人在理解话语时，常常需要通过推理寻求语用照应；另一方面，为了使得听话人更好地理解并寻找到语用照应，说话人要顺应交际双方的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进行语言选择，这种选择是动态的。说话人在选择语言时，要尽量使听话人从选择使用的语言中得到他意图表达的照应关系。克拉克(1996)从心理认知出发，把根据语言交际的某个显性结构对其隐含的指称对象进行推论而验证假设的非显性的认知过程称为照应(bridging)。日本学者苫小松井(Tomoko Matsui)(2000)在她的 *Bridging and Relevance* 一书中进一步分析了语用照应(pragmatic bridging)和关联现象，从一个更新的视角讨论了语用照应是含义照应、推理照应的实质。何自然、冉永平

(2001：361)指出：语用照应是语用推理的照应(bridging reference)的简称，指下面话语中用斜体标示的待释名词词组(bridging NPs)与前述话语(preceding discourse)中指称对象(referent)的照应关系：

① Mary got some beer out of the car. *The beer* was warm.

② Mary got some picnic supplies out of the car. *The beer* was warm.

①的待释名词词组 the beer 在前述话语中很容易就找到作为它指称对象的照应词语或先行词语(antecedent)，即 Mary 从汽车取出来的那些 beer；但要在②的前述话语中找出 the beer 的先行词语，那就要费点工夫了，因为前述话语的字面上并没有提到 beer。不过，人们能够根据前述话语做出推想(bridging assumption)，即设想在 picnic supplies 中包括有 beer，从而认定待释名词词组 the beer 的指称对象是 picnic supplies 的内容之一。王正元(2002)认为语用照应的类型包括：直接照应和间接照应。直接照应指已知信息往往是对刚刚提及的事物、事件或状态的一种照应，可再分为等同照应和替代照应。等同照应如：

I heard *a man* talking at the hospital yesterday. *The man* complained of the treatment.

替代照应如：

I heard *a man* talking at the hospital yesterday. *He* complained of the treatment.

间接照应又可分为：置换照应、局部照应、联想照应、角色照应以及功能照应。置换照应主要是增加了关于照应对象的信息，根据对象的特征替换别的词语。如：

I heard *a man* talking at the hospital yesterday. *The bastard* cursed everyone in sight.

局部照应指人们对某整体中的一个或多个局部求取直接的含义推理照应。如：

I met *two students* yesterday. *The boy* spoke to me in Cantonese.

联想照应是一种间接含义推理照应，已知信息中有一些先行信息是不直接提及的，但它又同特定的事物、事件或情景紧密相关。如：

I looked into *the* room. *The ceiling* was very low.

角色照应也是一种间接含义推理照应，已知信息往往在先前提及的事件或情景中扮演一个角色。如：

John was murdered yesterday. *The murderer* got away.

功能照应指先行信息可能不是先前发生的事件的主体、对象或工具，而是表明该先前事件的某种功能-目的或理由、原因或结果，或只是作为先前事件的伴随状态。如：

John fell. What he wanted to do was scare Mary.

在交际中，语用照应的实质是语境假设照应，其过程是帮助听话人构建恰当的语境假设过程，使听话人以最少的努力获得对说话人意图的认知理解。语境是在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动态互动(dynamics of interaction)中产生的。语用照应要求说话人所选择的话语、话语结构等都要照应到听话人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如果没有这种语用照应的约束力，语境动态生成性会给交际目的的认知带来很大困难。如："I will do it"，听话人可以理解为一种"承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主动的"自愿"(volunteering)。同样一种表达结构会产生两种意义的认知，这是因为听话人从不同语境中得出的不同理解。语用照应的运用可以使听话人构建出期待的语境。当说话人在交流中能照应到听话人的背景、环境、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时，"I will do it"的真实意义才能体现出来。所以维索尔伦(Verschueren)(1999)在讨论语境动态性时指出：我们应当避免使语境具体化，使语境僵化的错误，避免这种错误的有效办法是语用照应。

从照应的类型看，其语言表现形式多样，关系比较复杂，除上述几种类型外，还有人称照应、指示照应和比较照应等。

从其内在的语义照应关系看，不仅对双语对比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对翻译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实用参考价值。在翻译过程中，明确待释名词词组或代词与其先行词或照应词语所指对象间的内在联系是保证译文连贯通顺的前提条件。如上述局部照应例子的译文应译为"我昨天碰到两位学生，其中一个男生用广东话和我交谈。"　（曾利沙）

语境　context

指影响言语交际者交际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言语使用者的目的、身份、思想、性格、职业、经历、修养、爱好、性别、处境、心情等。客观因素大至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小至交际时间、地点、场合、对象以及上下文等。语境理论是韩礼德(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最早(1923年)提出语境理论的并不是韩礼德，而是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马林诺夫斯基把语境分为三类，即话语语境(context of utterance)、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简单地说，话语语境是指字、词、句、段等的前后可帮助确定其意义的上下文。情景语境是指语篇产生的环境。文化语境是指某种语言赖以植根的民族里人们思想和行为准则的总和。伦敦学派的核心人物弗思(Firth)接受并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理论，他指出：情景语境不仅包括说出来的话，而且还包括说话人的面部表情、手势、身体的姿势以及所有参与交谈的人和这些人所处的那一部分环境。弗思的学生韩礼德把语境划分为两类，即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前者包括篇内语境(intratextual context，主要指语篇内部结构之间在语义上的连贯性和黏合性)和篇际语境(intertextual context，主要指上语篇与下语篇之间在语义上的连贯性和黏合性)。后者包括情

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篇内语境即微观语境,篇际语境即宏观语境。微观语境指词、短语、句子、语段或篇章之前后关系,是语言内部诸要素相互结合、相互制约而形成的语境。宏观语境是指使用某个语言项目时的广阔的社会背景,即与语言交际有关的语言外部诸要素相互结合、相互制约而形成的语境。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对语言动态性与多维性研究的不断深入,语境对语义的制约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语境理论已成为社会语言学、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和翻译学等多种学科研究的热点。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在其《语言与翻译》一书中专题论述语境的作用和意义。他的结论是:"在翻译过程中'排除'语言单位的多义性和选定翻译等值物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这就是:狭义上下文、广义上下文和超语言环境。不考虑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就不能理解言语产物,因而也就不能进行翻译。"(巴尔胡达罗夫 1985:143~144)基于上述基本的语境理论,近年来翻译语境已成显学。参见"翻译语境"

上下文　verbal con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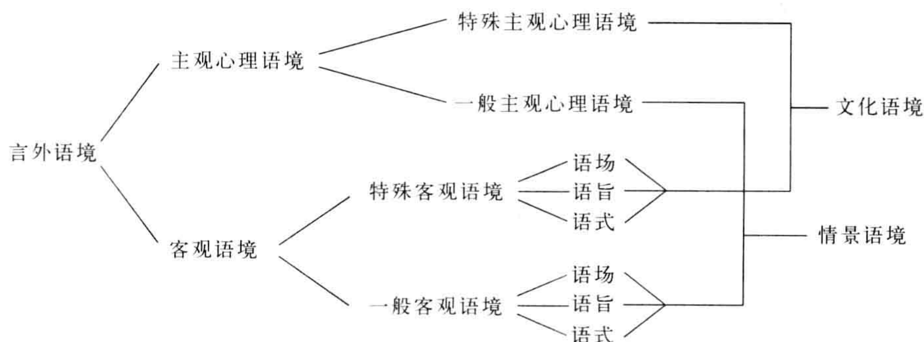
语境因素的一种类型,即微观语境。上下文有广义与狭义之别。狭义上下文指一个语言单位出现的环境,也即位于这一单位前面或后面的其他单位或成分。对多义的语言单位来说,上下文有助于确定其具体意义。例如,appreciate 一词在以下各句不同的上下文中有不同的意义:1. He can *appreciate* modern music.(欣赏)2. I do not *appreciate* fully what he means.(理解)3. I *appreciate* the regard you have for me, but I'm not qualified to take on the job.(感谢)

有时,原文的词义大致一样,但因译语上下文关系表述不一。以下 work 一词意为 to be active in the proper way,但译意有别:1. I think your suggestion will work. 我看你的建议行得通。2. The new rules are working well. 新规定执行得很顺利。3. The treatment works like magic. 这种疗法功效神奇。

广义的上下文是指全段、全章乃至全书与某一语言成分的语义关系,这种关系时空跨度较大,常常被译者忽视。例如,uncle 到底是"伯父""叔父""舅父""姑父"还是"姨父",往往不是在段内能找到答案,有时要涉及前后的章节。

文化语境　context of culture

最早由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一书中提出,他认为情景语境之外是"可以叫做文化语境的东西","词语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语境"(Malinowski 1935:58)。这种思想把语境一分为二,即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但两者的本质区别与联系何在,马林诺夫斯基没有具体说明,也一直困扰着中西学界。弗思(Firth)对"文化语境"的提法不以为然,主张把语境分析的重点放在情景语境上,因为他不相信语言或文化本身是一个单质的和谐的整体,在话语分析中缺乏可操作性。韩礼德(Halliday)赞同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两分法,认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相互关联,并不断试图探析两者的区别与联系,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时而从具体、抽象视角区分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参阅朱永生 2005:11);时而说情景语境具有局部性,文化语境具有整体性(Halliday 1978:109);时而又认为近距离看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情景语境,远距离看到的则是总体的文化语境(参阅朱永生 2005:11)。文化语境与翻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弄清文化语境的内涵,对文化语境与翻译的探讨就很难深入。从本质上说,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在构成要素上是一致的,均由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交际工具的关系构成,都是主客观因素的集合。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情景语境由一般的主客观因素构成,而文化语境由特殊的主客观因素构成。也就是说,文化语境中的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交际工具的关系(即语场、语旨、语式)表现特殊而已。从特殊的人与物、人与人、人与交际工具的关系出发探讨翻译问题,可以发现语境的三大关系与文本意义系统对应关系在语际转换过程中的特殊规律。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内在要素及本质区别可以用简图表示如下:



(彭利元 2005)参见"情景语境"

共享知识　shared knowledge

共享知识是指话语交际中双方共同享有的语境知识,它使受话人得以理解发话人通过某一话语所表达的意义(王红昕 2005)。共享知识是语境的一部分,是交际双方共同推论的基础。无论语境如何划分,语境的共享知识都将涵盖各个方面,它既包括共同的语言知识,如言辞、语法语境,同时也包括共同的情景知识和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如具体参与交际的人、发生的事、时间、地点、交际的正式程度、交际者的相互关系、心理情感、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

传统语用学认为,话语的理解是建立在共享知识的基础之上的,根据共享知识的假设,要成功地进行交际,交际双方不仅要有共有知识,即:

(1) A knows that P.

(2) B knows that P.

而且双方还必须相互知信,即:

(3) A knows that B knows that P.

(4) B knows that A knows that P.

(5) A knows that B knows that A knows that P.

(6) B knows that A knows that B knows that P.
(何自然,冉永平 2001: 135)

从认知角度来说,话语理解是对话中的一方把握对方的话语所表达的意图,其前提是对话双方应该有某种共同的知识结构,一方才通过言语将新的知识或信息添加到另一方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去。交际双方相互重叠的这部分知识,即共享知识在话语理解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这种共享知识,说话者才可能对受话者说某一句话,并认为受话者能够理解他所说的话;基于这种共享知识,受话者才可能正确理解说话者所表达的意思。如:

A: Do you like rugby?

B: I am a New Zealander.

A 只有知道"All New Zealanders are rugby fans."才能理解 B 的话语,即"B likes rugby",而 B 之所以间接回答 A 的问话"I am a New Zealander",而没有使用 yes/no 的模式,是因为 B 认为 A 具有与其相同的共享知识"All New Zealanders are rugby fans."。总之,由于说话者与受话者具有共享知识,他们才能够将会话成功地、顺利地进行下去。如果缺乏相关信息,或者未能激活记忆中的相关信息,那么他们就不能或难以实现话语的理解。

会话双方语境知识的共享程度越高,甚至完全对称,听话人所推导的话语意义就会与说话人的真实意义更接近,交际的成功率越大;反之,如果交际双方语境知识共享程度低,不完全对称或完全不对称,那么,听话者将会偏离甚至误解说话者的真实意义,最终导致交际失败。共享知识欠额、共享知识过额以及共享知识错位经常是导致交际失败的主要原因。其实,这也是翻译活动中常见的问题,如欠额翻译、过额翻译等。例如:

... Martin was slightly disturbed by the cashier, a young and giggling Wisconsin school-teacher ***with ankles...*** *? ……马丁被那个年轻的出纳员、威斯康星州的女教师的咯咯笑声和脚踝弄得有点心慌意乱。

如将上述原文按字面翻译则属于欠额翻译,因为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之间不具有共享知识,未能达到应有的语境效果,造成译文读者的认知困惑:为什么马丁会被女教师的脚踝弄得有点心慌意乱。这显然属于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引起的共享知识的不平衡,即女性的脚踝是英美男人的审美部位之一,而既然是女性的审美部位,那么其脚踝应是轮廓清晰的、漂亮的,所以只有将英美男性对女性审美部位差异中的文化信息增译出来才能为译文读者所理解,译文才能达到通顺:望着眼前的这位年轻出纳——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女教师,马丁被她那银铃般的咯咯笑声和轮廓清晰的漂亮脚踝弄得有点心旌动荡。　(曾利沙)

动态语境观　dynamic context perspective

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1986)的语境观不同于传统的语境观。他们认为,语境是动态的,是构成听话者认知环境的一系列假设,是在互动过程中为了正确理解话语而存在于受话者大脑中的各种假设。这些假设来自词汇信息、百科知识和逻辑信息。受话者在处理发话者的语言信息时,从一系列语境假设中进行选择,找出正确的作为理解话语的语境。在关联理论看来,理解每一个话语所需要的语境因素是不同的,因此听话人要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为每一个话语构建新的语境。语境不是"给定"的,而是选定的,是一种动态的语境观。关联理论认为,交际双方的语境对于双方是否能够交际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而语境,包括上下文语境、互文语境、语言外语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交际过程中时刻注意语境的变化,才能真正完成交际。(张秀会 2006)

关联理论的动态语境观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推理-交际活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任务既不是坚持采用某一种翻译理论进行翻译工作,也不是过分强调单方面地去迎合译文读者或原文作者,而是要从整体的动态语境出发,正确评估原著和译本之间的语言文化语境,其中既包括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和共性,也包括原文作者所处的语言文化环境和译本读者所处的语言文化环境之间的差异和共性。所以,译者必须努力营造合适的交际语境,使得交际各方在语境认知中取得最大化的交集,使三方交际取得成功,求得在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著的同时也能够让译文读者充分理解原文含义及领略源语文化精华,从而达到翻译的最佳效果。动态语境观对翻译的启示在于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能根据语境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翻译方法,若译者不能或不善于把握文本或语篇的动态语境,往往会出现译文失误或不当。　(曾利沙)

行业语境　field context

指切合于某一特定行业的物、术语、话语结构、思维模式、表达习惯等以及由此建立的一整套自然的、社会

的和思维的网络。行业语境潜在地规约了并规约着行业人们的语言游戏规则。常见的情况是：懂外语的人不懂行业知识，而行业专家又不会或很难用外语自由对外沟通。因此对外语专业的学生进行中外对比的行业知识教育、为从事对外工作的人员提供了解各行各业的背景知识平台就成为我们口译教学与研究人员的必须重视的课题。吉尔(Gile)曾经说过，很多客户，甚至有些专业译员也认为：只有当你对那些行业了解得如同那一行业的专家一般，你才能译得像模像样。(In fact, many Clients, and even some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feel that Translators can only perform a decent job in fields they know as well — or nearly as well — as specialists.)(Gile 1990：86)

语境效果　contextual effect

按照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1986)的关联理论，语境效果指新信息与旧信息相互作用产生的语境含意，即在交际中对已有认知语境的改变，产生新的认知语境。一般说来，相关的信息会取得一定的交际效果，但他们将语境效果看做"相关"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取得一定语境效果的信息才是相关的，新的信息和现有认知语境具有三种关联方式，因而产生三种语境效果：1. 新信息与语境相互作用产生语境效果；2. 新信息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以加强已有语境；3. 新信息与已有语境相矛盾，因而放弃原有假设。语境效果也是一个概括性词语，它包括信息效果(informative effect)、人际效果(interpersonal effect)、幽默效果(humorous effect)，甚至还有诗意效果(poetic effect)，等等。所以，相关与不相关最终以语境为参照。语境效果也具有不同种类，很难以量来衡量，语境效果的强弱与相关度的大小也就很难进行比较(赵艳芳 1998)。

翻译是一个双重明示-推理活动，它包含了原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译文读者的交际活动，原作者与译者交际的效度取决于原作者与译者以及译文与译文读者交际的效度。参见"最佳语境效果"　(曾利沙)

最佳语境效果　the optimum contextual effect

关联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与最佳关联密切相关，指新信息与旧信息相互作用产生语境含意，形成新的最佳认知语境。翻译是一个双重明示-推理活动，它包含了原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译文读者的交际活动，原作者与译者交际的效度取决于原作者与译者以及译文与译文读者交际的效度。总而言之，译者要在原作者明示意图基础上把自己从原作者那里获得的语境效果传递给读者，即译文给译者的语境效果要最大程度地接近于原文给译者的语境效果。其交际的基础在于原作者对译者认知语境的假设以及译者对读者认知语境的预测的准确度。交际的效度取决于多大程度上这三者的重合(凤群 2004)。如"Jones *has bought the Times.*"这一语句的翻译可以是：① 琼斯买了一份泰晤士报。也可以是：② 琼斯买下了泰晤士报。译者首先必须确定其信息传达的意图究竟是①还是②，而信息意图的确定取决于与该语句意思相关语境因素的最佳关联性判断，如说话人所谈的话题以及其所谈论对象——琼斯——的身份、职业、社会地位、所处环境等。若说话人在谈论企业公司的并购，且琼斯又是一个大富豪，那么该语句则和②产生最佳关联；若语境表明琼斯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就很难将该语句意思与②关联起来，会产生交际困惑，转而寻求说话人传达信息的最佳关联性。这说明"最佳相关与最佳效果也只是交际的一种目标，一种期望，交际的成功是在此基础上的不断推测、验证、调整、适应的过程"(赵艳芳 1998)。参见"最佳关联"

(曾利沙)

情景语境　context of situation

最早由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一文中提出，主要指文本的即时语境，即围绕话语的、即时的所见所闻(Malinowski 1923：306～307)，"不但包括说出来的话，而且还包括脸部表情、姿势、身体活动，所有参与交谈的人和他们所处的那一部分环境"(转引自桂诗春，宁春岩 1997：87)。弗思(Firth)把情景语境一分为三(即参加者、事物/事件、言语效果)，以探讨语境与话语的内在关系。韩礼德(Halliday)继承并深化了弗思的语境观，在对语篇体裁(genre)进行描述时，把因语言使用(use)而涉及的语域(register)变量称为"情境语境"，并建议从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三个方面对之加以分析(Halliday, Hasan 1985：45～46)。并且，韩礼德和哈桑(Hasan)强调，一个语篇的连贯同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情境语境即语域上是一致的；二是语篇本身是衔接的(Halliday, Hasan 1976：23)。另外，某些语篇的连贯必须依赖于与情境语境的衔接，如威多森(Widdowson)(1978：29)的一个著名例子：

A：That's the phone.

B：I'm in the bath.

A：OK.

此语篇涉及的情境语境是：B在洗澡，A告之有电话打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尽最大努力充分了解原文的情境语境和对译文的情境语境作出准确定位，这样在表达阶段才能根据译文的情境语境生成适当的译文，以便读者能够读懂译文。在翻译研究中，可以对原文和译文的情境语境作对比分析，从中发现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并总结其中的规律以便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参见"文化语境"

(林作帅，贺显斌)

翻译语境　translation context

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构建起来的两种语言文化相关主客观因素互动的总和，包含四个关键因素：译者、原作语境、译语语境、互动。其公式如下：翻译语

境=(原作言语←译者→译语言语)+(原作语言←译者→译语语言)+(原作情景←译者→译语情景)+(原作文化←译者→译语文化)。(彭利元 2008)

翻译语境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及圣经翻译家肖(Shaw)(1990)在 *The Translation Context: Cultural Factors in Translation* 一文中提出,指翻译过程中由译者聚合起来的文化互动的总和,包含信源、译者、信宿三因素,图示为"信源←→译者←→信宿"。信源是为即将翻译的文本提供意义的文化,信宿是原文本得以重构的文化,译者是两种文化的调节器、协调员。肖的翻译语境观着眼于文化视角,可以和奈达(Nida)、勒菲弗尔(Lefevere)、图里(Toury)等同样关注语境的学者归入文化学派。英国学者受从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到弗思(Firth)、韩礼德(Halliday)的功能语境观影响,主要从情景语境(即语场、语旨、语式)视角讨论翻译语境问题,主要代表人物有卡特福德(Catford)、哈蒂姆(Hatim)和梅森(Mason)、贝克(Baker)、贝尔(Bell)等。贝克为《语用学杂志》(Vol. 38, Issue 3)主编的"翻译与语境"专刊体现了翻译语境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但目前国外明确使用翻译语境概念的仅肖一人。

国内学者对"翻译语境"的研究始于朱文振,但他使用的是"语言环境"概念,没有区分翻译语境与创作语境。其他学者如郑诗鼎、刘宓庆、李运兴等有较强的翻译语境意识,但功能主义倾向明显,且无人清晰界定翻译语境概念。郑诗鼎提出翻译对语境的绝对依赖论,指出了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翻译批评对语境的绝对依赖关系,且认为翻译"离开了对原文语境或对译文语境的认真思考和研究都是不行的"(郑诗鼎 1988: 41)。刘宓庆提出"译必适境"的观点(刘宓庆 2003: 366~373),认为"词语适境是双语转换的最基本要求"(刘宓庆 2001: 325)。但两者都没有提炼"翻译语境"概念,未明确翻译语境与创作语境的区别与联系。程永生明确使用了"翻译语境"概念,认为"译者翻译时一方面根据自己的语境,另一方面根据作者的语境确定意义,这就是译者的翻译语境"(程永生 2001: 57)。李运兴(2001: 30)先是使用了"翻译情境"概念,认为翻译情境主要包括翻译活动发生的社会背景、发起者/译者的动机和目的两类因素。严格说来,这都不是对翻译语境的定义说明,仅仅罗列了翻译语境(翻译情境)涉及的两个方面而已,没有明确其内涵和构建机制。前者仅罗列了译者自己的语境和原作者的语境,忽视了译语语境;后者仅罗列了翻译活动发生的社会背景(即特定译语情境)和发起者/译者的动机和目的,排除了源语语境或原作语境。李运兴(2001: 37)提出的翻译研究的三个多元系统参考系,显然把源语语篇多元系统和译语语篇多元系统排除在翻译情境之外。李运兴(2007)发展了先前的观点,明确使用了"翻译语境"概念,用以统括先前提出的三个多元系统参考系;明确了翻译语境的三大交际角色(作者、译者、译语语篇读者)、两组语境参数(源语语境、目的语语境)和三个世界(语篇世界、外部世界、心理世界);构建了"译者语境视野"与"翻译研究者语境视野"两种不同的语境模式,可以说是国内翻译语境研究的一大进步。但翻译语境的内涵和定义究竟是什么,依然模糊不清。彭利元 2002 年开始把肖的翻译语境概念引入国内,并试图结合文化学派和功能学派的翻译语境观,把"翻译语境"概念修正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构建起来的两种语言文化相关主客观因素互动的总和,包含译者、原作语境、目的语语境、互动四个因素;分析了翻译语境的基本内涵和四大基本层次(即语言、言语、情景、文化),并从语境层次动态演变不同步的特点入手,提出"语境球体"假说和"翻译语境球体"构想,构建了翻译语境时空距离经纬网。认为语境系统整体是以语言为内球体,以言语、情景、文化为环绕语言的外球体的多层次球体形态;认知贯串始终,沿着时间和空间两种不同维度,推动语境系统球体以语言为中心,沿着时间轨迹,做滚雪球式的运动,周而复始,雪球越滚越大。翻译语境是两个语境球体的碰撞与交融,是在源语与目的语两个不同语境球体的互动中构建的。从宏观和整体视角看,翻译语境也是球体形态。翻译语境球体可以像勾画地球经纬网一样,勾画出翻译语境球体时空经纬网;翻译语境时空经纬网可以定位每位译者及其翻译行为。译者在翻译语境球体上的时空位置不同,其译文也就有所不同。双语翻译和一般语言理解一样,都是从语境系统球体的不同角度出发,针对特定言语形式展开的永恒对话;翻译语境的时空差异是导致翻译动态变化的根本原因;翻译是原文在跨文化语境中不断语境化的意义构建过程。　　(彭利元)

最大最小原则　minimax principle

列维(Levý)在讨论翻译的"语用维度"时采用的术语。他并不是指翻译特定文本语境方面的问题,而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能要面对的一些非文本方面的问题。比如,译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迎合目的语读者可能的偏好或期望。根据这一原则,在任何翻译过程中都会涉及抉择过程,译者"要在所有可能的方案中,决定选用能以最小努力取得最大效果的那个方案"(Levý 1967)。比如,在许多文化传统中,再现原诗韵律时所产生的额外效果,在译者看来往往不值得为此付出大量努力。列维认为,译者通常采取一种"悲观的策略"(Levý 1967),拒绝所有可能不符合译本读者审美或语言期望的方案。他指出,译者会下意识地预测读者会怎样评价他们的翻译;这又会反过来影响翻译过程中所做的决定。结果,那些被认为不属于目的语语言系统所固有的语言因素就有可能被故意避开不用。(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　　(黄勤)

跨文化交际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源于美国,一般认为霍尔(Hall)在 1959 年出版

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一书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开端。主要研究交际和文化的关系,具体地讲,其研究内容包括五个方面:1. 学科的理论概念(诸如交际、文化、社会、跨文化交际、交际过程概念);2. 学科的哲学思想(主要涉及研究方向,动态多变的交际过程及其制约因素,文化、知觉、赋义及交际行为之间的关系);3. 影响跨文化交际过程、交际行为及编译码过程的诸因素;4. 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的文化异同;5. 探究干扰交际的文化因素,实现有效交际。该学科存在两个侧重点不同的研究领域:跨文化对比研究和跨文化交际过程研究。

跨文化交际学的产生与三大因素相关,即:1. 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产生的世界性时空的紧缩所带来的全球化意识;2. 形形色色的文化交融、各种各样文化群体间的交往所形成的集体意识;3. 在当今文化交织而且多变的世界上想成为善于跨文化交往的现代人的个人意识。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多学科渗透的边缘学科,对其影响较大的有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哲学、民族交际学,等等。但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其理论核心是普通交际学的交际论,即:跨文化的交际过程和同一主流文化的人际交往过程所涉及的变量基本一致;任何人际间的交际在本质上都是跨文化交际,差异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

跨文化语用失败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哈蒂姆(Hatim)在 *Text Politeness: A Semiotic Regime for a More Interactive Pragmatics* 一文中的用语。他认为,在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中,大家普遍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语用"意义不仅是可以转换的,而且是多变的。翁(Ong)指出,允诺、回答、问候、断言、威胁、命令、抗议和其他一些所谓的言外行为,在书面文化和口头文化中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是跨文化语用失败的根本原因。(转引自 Hatim 1998/2001: 73)其结果是会对某些民族的人形成一种成见,认为他们在实现承诺或回答质询方面"不诚实"。　(郭建中)

翻译关系　translation relationships

指两个或多个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民族或地区,通过书面或口头翻译发生的关系。从翻译类型看,它可以指所有种类的翻译活动,如文学翻译、文化翻译、商务翻译、政治翻译、外交翻译、科技技术翻译等;从翻译方向看,它可以是甲译乙(如外译汉),也可以是乙译甲(如汉译外)。翻译关系又分为完全翻译关系和不完全翻译关系两类。前者指主要种类的翻译活动,双向的翻译活动都比较充分地发生了;后者指单向的、主要种类不齐全的翻译活动,亦可称"部分翻译关系"。

跟贸易关系一样,翻译关系是一种因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关系。因此,其主要作用是反映国家和地区间在不同领域的需要和依赖程度。其发生、发展、变化和消失,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国家、民族、地区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甚至可以揭示两国间比较隐蔽的关系。它可以看做检视国家、民族、地区之间关系的一个"硬"标示(indicator)。它可以是显性的,亦可是隐性的;它与外交、政治等关系密切相关,但比后者更普遍、更具弹性和韧性。譬如,两国之间尚未建交或建交后断交,若此时两国间既无贸易关系又无翻译关系,那两国之间几乎没有关系;若它们之间还存在贸易关系或翻译关系,那就说明它们彼此需要对方,或仅仅是甲方需要乙方,或者相反。翻译活动越频繁,需要越大。对翻译活动主动一方的考察,可以揭示该国对输出国或译入国的态度。在此情形下,一国主动翻译越多,表明它对另一国的特定需求越大;翻译活动较集中的某一个或多个种类,表明一方或双方在这个或这几个种类的需求比较大。因此,翻译关系的发生、嬗变或剧变,往往比较客观地反映国家或地区间关系或明显或微妙的变化。　(王友贵)

20. 信息论　其他学科

信息论　information theory

指运用数学方法研究信息的计量、发送、传递、接收、加工和储存的学科。香农(Shannon)和韦弗(Weaver)合著的《通讯的数学理论》(1948)最早提出了信息论的思想和方法。信息论把信息看做是消除不定性的量,在信息处理过程中以消除不定性的程度来表征信息量的大小。其目标是提高信息传递的能力和保证传递过程中信息的完整性。现代语言学广泛运用信息论的思想和方法,对语言的信息结构进行探索和解释。信息论对研究翻译过程中信息的转换和传递多有启示。信息论要求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解决三个问题:准确度、精确性和有效性。准确度是技术上要解决的问题(信息工程学主要研究该问题),而对于语言转换来说,这主要是语言形式上的问题;精确性是传递信息的语义学上的问题;而有效性更多地涉及语用学上的问题。

作者或说者发出的信息如果通过译者全部被读者所理解,则通信效率达 100%,信道畅通无阻,信道保真。如果信息未被译者、读者全部接受,通信效率小于 100%,信道不畅,信息有失真之处。如果译者、读者接受的信息大于发出的信息,则信息增值,信道有问题;如果小于发出的信息,则信息贬值,信道有故障;如果偏离原信息而造成误解,则产生信息差。可见,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贬值、增值偏离、缺损主要跟译者、读者的信道接受力有关。译者对原作的文化背景一般是熟悉的,而译文读者对原作的文化背景就不会那么熟悉,对于文化特征明显的信息,其信息接受力会小于原文读者。因此,译者在转换信息代码时要特别考虑文化特征和语用特征,使之适合于一般译文读者的信道接受力。

反馈　feedback

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基本概念之一，是控制过程中的关键机制，即通讯过程中信息发送者从接收者处得到的反应。系统输出的信息(给定信息)作用于被控对象后产生结果(真实信息)，再把结果通过一定的通道返送到输入端，从而对系统的信息输入和再输出发生影响，这个调节作用过程称为反馈。美国控制论学者维纳(Wiener)称反馈过程为“信息传递和返回的过程”。有些语言学家认为，反馈是人类语言独有的特征，以此可区别于其他符号系统。人们在运用语言时，总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反馈来检测自己的言语行为。负责的译者在定稿之前往往倾听读者(即使是有限的一二人)的反馈意见，以改进之。接受美学认为，一部文学作品要有生命力，没有读者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译者应将读者摆在重要的地位，预设读者可能的反馈。朱生豪曾说，“每译一段，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转引自张经浩，陈可培 2005：76)

代码　code

1. 一套约定的符号规则，将一种符号系统转换成另一种系统，实现信息的传递，被广泛运用于符号学、语言学、通讯理论等领域；2. 社会语言学用语，为语言和其他交际系统的中性名称，以便同标准语、方言、个人语言变体等术语相区别。有时在狭义上使用，指能被特定社会集团成员共同理解的词语。

信道　Channel

信道在社会语言学中指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的方法，最常用的为语言文字，其他如击鼓、放烟、打旗号，等等。用于信息论，指传递信息的途径，如电话通讯，信息被电话转变成电信号输送出去，这时，通讯的信道就是电话线。

信道接受力　channel capacity

指信道接受(或通过)外来信息的一种能力。译者的信道接受力是指译者的源语和目的语功底、文化与专业素养、译事经验与责任感等的一种综合能力。信道接受力超过信息的容量、速度、频率等综合量值，则信道畅通无阻，否则会产生阻碍。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有一个信道接受力跟信息的内容与难度是否相适应的问题。如果译者的信道(C_T)接受力偏低，则对来自信息源的 M_1 (message$_1$)在解码时会产生不解、误解或漏解，使 M_1 在通过 C_T 时局部受阻，造成通信损失；反映在 M_2(译文)上，则可能产生过译、欠译、漏译或误译等情况。对译者来说，信息的内容与难度是两个重要因素。信息内容如果偏离译者的知识结构，如让文学翻译工作者去搞科技翻译或让科技翻译工作者去搞法律翻译，则信道偏离——信道没有对上。对此，译者往往难以胜任。信息处理的难度如果超出译者的信道接受力(如让初出茅庐的译者去涉足莎士比亚作品)，一般来说，因信道受阻，也不能让信息完满地通过。所以，译者不必勉为其难，可根据自己的能力与特长，翻译那些信息内容与难度适当的材料，以保证信息顺利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通信损失。

信息　information

广义地说，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是物质之间同构性的相互联系的一种形式，它表述它所属的物质系统在同任何其他物质系统全面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以物质、能、波动的形式所呈现的结构、状态和历史。简而言之，信息的本质是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运动状态的表征。广义的信息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 信息源于物质，但不是物质本身；2. 信息与能量密切相关，又不等同于能量；3. 信息可以作用于人类或生物，可以被感知、检测、识别、存储、传递、处理、加工、利用；4. 当信息作用于人类时，可以转化为知识，观察者可以通过信息了解和认识事物的运动状态。信息可以分为从低到高的四个不同的层次或形态：1. 自然界中无机物之间的信息网络；2. 生物界的信息网络；3. 人类社会的信息网络；4. 人工控制系统中的信息网络。各层次内部以及各层次之间又存在着纵横交叉关系，形成更为复杂的信息网络。

语言是人类社会常用的主要的信息载体，它所荷载的是观念信息。在社会交际活动中，信息有时通过符号、形象、手势、色彩、图画……来传递或交换。语言文字本身又是一种信息系统，由它的各构成部分——语音、语义、语形、语法等——形成有目的地排列起来的符号序列。一种信息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传递或交换。不同的语言形式可以表达相同的信息内容。所以，翻译即是以表达相同信息内容为目的的不同语言形式的转换。

文化信息　cultural information

指含有某种文化特质的信息。各文化群体的语言是该群体文化的主要载体。语言本身有其文化特点。例如，语言中的亲属词就显示了这一特征。中国由于封建习惯由来已久，等级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姐”是姐，“妹”是妹。而在英语、俄语及许多其他语种中，只用一个词来表示。例如：

A：Behave yourself，I'm your sister.

B：I'm your sister too.

在例句中，A 是 B 的姐姐。A 不让 B 外出，B 不听姐姐劝阻。A 的意思是“我是姐姐，你应听话。”对话中前一个 sister 是“姐姐”，第二个 sister 显然不能译成“姐姐”，但若译成“妹妹”又失去了原文的机智与顽皮。最常见的动植物名称也常有明显的文化印记。汉语中“狗”的形象是不受欢迎的，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却相反。

冗余信息　redundant information

信息论认为，冗余法则是信息传输和变换过程中

所要求的一条法则。输传信息时,为了避免遭受信道(channel)和噪音(noise)的干扰,人们往往借助于信息重复和信息累加,以便对方能接受到明确的信息。也就是说,为了保证理解,总是挤出比实际需要多得多的信息。这种"比实际需要多得多"的信息,便是冗余信息。语言是人类输传信息的主要工具,因此,冗余法则在语言中的运用颇为广泛。如简单的"I am a teacher",从信息输传不是词语运用的规则的角度看,am已表明了主语的人称,因而I所传递的信息已属冗余。据计算,从字母的信息量看,英语的冗余度(冗余信息的量度)为67%~80%。

英、汉互译中的省略法,实质上是利用了语言中的冗余信息。也就是说,正因为原文中存在着冗余信息,译文的省略才有可能。语言的冗余性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信息的复现和信息的蕴涵。这两种形式与翻译中的省略法关系颇为密切。

冗余度 redundancy

指传递的信息超过最低信息量的程度。如果冗余信息过多,则冲淡了主要信息,并使对方产生厌倦感。在学术讲座中如果冗余性过高,则表示讲演者思维不严谨,逻辑性不强,或者过于啰唆,离题太远。但适度的冗余信息则被视为语言使用中的调节剂,如口语中的调整语、口头禅的运用可以起到缓和气氛、消除心理疲劳等作用,书面语中的重复通常又有突出重点、达到强调等效果。试想如果人们在运用语言时都像在接暗号时一样精确无误,那么语言将会是多么枯燥乏味。如果夫妻之间的对话仅仅是一问一答式,毫无冗余性,则意味着出现了家庭危机。冗余度极小的成功语篇的范例莫过于林肯(Lincoln)的*Gettysburg Address*。短短的200余词,却能娓娓道来,震撼人心。其冗余度几乎为零,因为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反复酝酿,不可或缺的。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冗余度为零就是最恰当的。有时为了达到一定的修辞效果,冗余度的运用可谓锦上添花。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一段演讲: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to play together; to struggle together; to go to jail together; to stand up for freedom together knowing that we will be free one day. 其中together一词反复出现,似可省略。但省略后的语句效果则平淡无奇,失去了强劲有力的修辞效果,因此其冗余是合适的。翻译中当然力求做到冗余信息的适度:多一字则过,少一字又嫌不足。

(陶卫红)

风格信息 stylistic information

风格信息是风格意义的体现。一个作者,由于时代、民族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他的作品就带有时代性、民族性以及个人的特点。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语言风格是华丽、富有哲理。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作品幽默,讽刺性强。海明威(Hemingway)的语言简洁凝练。译者要再现原文的风格特点。例如: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e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Francis Bacon: *Of Studies*)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采,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采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王佐良译)原文属中古英语,译文也配以半文半白的色调;原文是三段式的排比句,译文也还以三段式的排比句。译文充分体现了言简意赅的作者风格。

交际信息 communicative information

指交际过程中要传递的实际信息,有时指暗含在理性信息中的真实信息。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不仅注意"说什么"这一信息内容,而且还注意"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方式、对什么人说"。信息传递者想传达的往往并非是理性信息,而是另有所指。说"It is so cold here",可能是想让你关上门。交际信息是信息结构的焦点和核心。有时,话语的交际信息与其理性信息是一致的。像"上课不准睡觉"译为"Don't nap in class",这样的翻译既传达了理性信息,又达到了交际的目的。但有时,交际信息与理性信息不一致,或相去甚远。

形式信息 formal information

所谓"形式"是指语言表象形式,包括语音结构及形态变化体系。形式信息是语言符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任何概念信息都必须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使符号所承载的内容成为可感知的实体。概念信息是话语信息的核心和主体,但并非全部,有时形式信息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概念信息。如在口语交际中说话人的音调、语气、口音、语速等信息有时比话语内容更能说明说话人是高兴还是悲哀、是激动还是惊讶、是有修养的人还是粗俗的人,等等。形式信息是一种语言所固有的特点,所以它在翻译过程中能被传递的部分很少,而且一般说来,在翻译中也没有必要保留。但是,特有的形式往往是原作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当原作者赋予语言形式以特殊作用时,这种形式信息就不可忽视。例如,当作者利用原语的语音、构词特点制造谐音、双关的效果时,形式信息就非常重要了。(熊友奇 2002)

形象信息 figurative information

指词句借助形象比喻产生的修辞比喻义。形象比喻的使用是构成原文风格的重要方面,因此,是翻译转换中不可忽视的一种信息。"形象化"是语言反映外部世界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借助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形象的特征,因此,形象化语言的特点就是它的具象性或描绘性,其功能不在于唤起人

的理性思维，而是为人的思维提供一个有形、有色、有声的映象。(熊友奇 2002)参见“形象意义”

美学信息 aesthetic information

指在一定场景中恰当地编排运用语言代码而使人获得的美的信息。话语中的形象词语和辞格的恰当处理都能带给信息接受者美的信息。例如：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有些书只需浅尝辄止，有的则只需囫囵吞枣，而少数的却要细细咀嚼和消化。）译文再现了原文三段论的美学信息。

但是，有些话语的美学信息并非像上例那样易于传达，如诗歌、对联、习语、双关语等。要使译文与原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统一起来，是有难度的，但也不是没有可能。例如：Some people said this was a covert scheme; we say it was an overt one.（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把 covert scheme 和 overt one 译成“阴谋”和“阳谋”，使外部形态和内部意义都得到恰当的翻译，既巧妙又不失真。

修辞信息 rhetoric information

修辞信息是理性信息的附加信息，是理性信息和交际信息的必要补充。理性信息是一个人的肌体，交际信息是人的心脏，而修辞信息则是得体的服饰。修辞信息是说话人主观情态的反映。修辞信息可进一步分为感情信息、语体信息和美学信息。

理性信息 conceptual information

参阅“概念信息”

概念信息 conceptual information

亦称“理性信息”，是语言信息的核心和主体，是语言交际中最基本的信息。概念信息是语言中由词汇、语法意义所限定的相对固定信息，它是信息整体的基础。理性信息反映话语的所指。对于词来说，概念信息是由它与其所标志的实物、现象、性质、过程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在语义学中被称为所指意义或指称意义。词典中每个词条下所收录的词义就是该词的概念信息。对句子来说，概念信息指由主位部分和述位部分组成的全句的全部概念语义内容。理解原文的概念信息或理性信息是进行翻译的必要前提。话语“你吃饭了吗？”似乎是说话人想知道“你是否吃过饭”这个信息，本身传达的是询问功能的信息。但是说话者想表达的意思并不一定局限于字面的意思，传递原文话语的理性信息并非完全是翻译的目的，翻译时尚需根据其他信息。况且，就英汉语表达的理性意义而言，也可能有差异。例如汉语里的“正月”不是英语的 January。“正月”是中国历法上的一月，而 January 是公历上的一月。二者在翻译时不应作为对等词。

感情信息 affective info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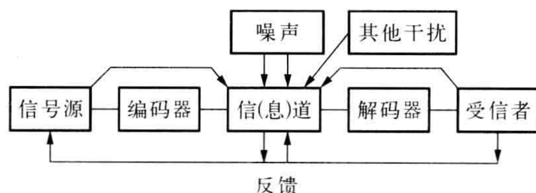
感情信息用于表现作者或说话人对某事的主观倾向(赞扬或贬斥)及情感(喜怒哀乐)，是感情意义的体现。“谁说我不去上课！”这句话有强硬的态度。“你真傻！”这话可用于嘲笑别人，也可用于恋人间的娇嗔。《红楼梦》中小姐丫环们常用“小蹄子”来骂人，但表达的情感却不同。翻译中也应反映出说话者态度的不同。例如：... and whoever tries to twist you up, may the end of his nose take a twist.（……谁骗你，谁就不得好死。）虽然此译文与原文的理性信息有出入，但却恰当地表达出说话人的态度，起到了同样的效果。

信息加工 information processing

亦称“信息处理”，指按照一定目的对原始信息进行的筛选、分类、分析、转换、存贮与传输过程。翻译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加工过程：输入语码→解码(提取信息)→译码(编码)→输出。信息加工，广义地讲，指利用特定设备(比如电子计算机)对信息进行的各种操作。从狭义上讲，专指图书馆、情报组织对信息所进行的存贮、加工和传输。信息加工是信息工作的关键环节，是利用信息资源的重要前提，其目的是通过对信息的筛选、分类、分析，改变其原始形式，集中存贮，提供给特定的用户，或从原始信息中生出新的信息。从思维学或心理学而言，这是对输入刺激进行“组织、解释”并作出“反应”的过程，是按阶段或步骤进行的，如输入、编码、储存、提取、译码、输出。信息加工是在记忆系统中完成的，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亦称“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感觉记忆主要是对输入的刺激进行识别。工作记忆相当于计算机中的内存，是进行信息加工的主要场所，对输入的信息进行概括与总结，并将经过深度加工的结果输到长时记忆中。长时记忆中储存的内容是“抽象观念”(即概念、命题等)。在工作记忆中信息加工越完善、越彻底，转换到长时记忆中的信息量就越丰富。

信息传递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信息传递的过程和简单机制如下图：



某甲同某乙讲话。某甲讲的话某乙懂得，后者就不要翻译(编码)。假如某甲讲的话某乙听不懂，那就要翻译，这里用编码器来做比喻。然后要通过信道，两人讲话就是通过声波，靠空气传递；如果打电话就靠电波传递。语言信息的传递无论通过空气或通过电波都可能产生一定的干扰。可以把任何一种语言都看做一个语码系统(coded system)，而一个文本的

读者可视为一个解码器。文本信息通过某一个信道传递给解码器(读者)。问题在于,原文的解码器与译文的解码器通过不同的信道接收信息。原文的读者在阅读原文时,原文的信息是通过一个适当的信道传递的。然而,如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死扣原文的形式,势必就会使译文出现一些怪异的词组或句法,从而加大了原文信息的通讯负载(communication load),致使原文信息无法通过目的语解码器的信道,译文读者难以理解译文,也就谈不上对译文作出与原文读者相对等的反应。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对原文的形式作必要的调整,使信息的通讯负载适合目的语解码器的信道容量。

信息形式　information form

常指传达信息的语言符号的各种组织形式,即指不同层次的语言结构,通常分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宏观结构指整个语篇的组织结构。微观结构指句子及更低层次的语言结构。从篇章语言学的角度看,讨论译品要从语篇着眼:科普文章与技术论文的信息形式不一样,小说与剧本的信息形式也不一样。而从微观上讲,更是千差万别。相同内容可用不同的信息形式加以表述。当然,译者应尽可能传达原作的信息形式,在不能传达时则作变通处理。如:a stick-and-carrot policy 如译为"软硬兼施的政策",只表达了基本思想;如译为"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则形意双全。

信息性　informativity

1. 当代美国篇章语言学家德·布格兰德(de Beaugrande)和德莱斯勒(Dressler)提出的七项语篇性标准之一。(参见"语篇性")2. 构成语篇的要素之一,指给接受者传达新的或意想不到的东西。从翻译角度讲,指译本能够提供给目的语读者关于原文中的事件、状态、过程、物体、人物、地点、机构等方面的信息。译本给目的语读者提供的原文信息应该适度。根据翻译发起人的要求和读者的具体情况,译者有责任对信息作适当调整或补偿,令译文的信息性达到合理的适当的程度。例如: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marked an unprecedented great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译文不是把"新中国"简单地译成 new China,而是对不了解背景的外国人作了信息补偿,使译文具有适当的信息性。此外,对于某些蕴涵较丰富的原词或原句,要根据语境挖掘内涵,予以表达;对此,常用增益的手段。例如:He stepped right in after them, like it or not, and he was determined that nothing as petty as good manners should keep him from a chance of *enlightenment*. 他不管人家欢迎不欢迎,紧跟着他们走了进去。什么礼貌不礼貌,他顾不得这一套了。他决心不错过这个机会,把心里的问题弄明白。

广义地说,信息不但包含内容与意义,而且包含形式与风格。对于后者的充分表达,有时甚至也是很重要的。例如:

"Fury said to
a mouse, That
he met
in the
house,
'Let us
both go
to law:
I will
prosecute
you. -
Come, I'll
take no
denial;
We must
have a
trial:
For
really
this
morning
I've
nothing
to do.'
...
..."

火儿狗在屋子
里头遇着个
耗子。狗说
"你别充忙,
咱们去
上公堂。
我不承
认你赖,
谁不知
道你
坏?我
今儿早
晨没事,
咱们同
上公堂。"
……
……

这是《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赵元任译)中一段老鼠诉说的“尾曲”(委曲),原文故意排成一条长尾巴状,译文也如法安排。这种文字形式所提供的信息给人平添了老鼠尾巴的形象性和“尾曲”的真实感,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林夕)

信息载体 information carrier

指负载信息的物质存在形式。物质和能量是信息载体,例如,语言文字、各种符号、记号,以及光波、声波、电磁波等物质的能量信号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应用大为普及,其载体还有磁盘、磁带、芯片、光盘等形式。无论怎样,传统的语言文字仍是今后主要的信息载体之一,各种声、光、电的能量信号主要也是以语言文字为基础的转换形式。

信息度 information degree

指思维的认知结果中所含有的合适信息数量标准。每个思维的认知结果中均含有一定数量的被接收加工过的信息,含有信息数量有一个客观的合适数量标准(如译文中的信息是强、是弱或适中),即信息度。思维的认知结果(如某种译文)中所含的信息数量有三种情况:1. 所含信息数量达到所需量,思维的认知结果是使人满意的;2. 所含信息数量太少,则认知结果中所含的信息贫乏;3. 所含信息数量太多,超过合适数量,这是认知结果中所含信息的冗余。翻译中的欠额翻译、过额翻译正是信息度过小或过大的表现。有时,译文不得不调整信息度,如减少冗余信息,或因显化内涵而提高信息度。如:Vasco da Gama and Columbus enlarged the world and Copernicus enlarged the heavens. (Russel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有人译作:瓦斯寇·达·伽马和哥伦布扩大了世界,而哥白尼扩大了天界。这种译文不明不白,甚至令人误解。如补之以必要的信息,即可释然:达伽马绕好望角抵印度,哥伦布西行发现新地,而世界为之扩大。哥白尼立日中心说,而宇宙为之扩大。(古庄译)

信息变换 in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指信息内容、形式或载体的改变。客体的某个信息可以分解为若干个信息,若干信息也可以组合成为一个新的信息;经过分解或组合的信息,内容发生变化。信息的形式(码)可以由这一种改换成另一种,译码就是码的改换。信息的载体也可以变换,即转录。翻译过程虽然也是一个分解、组合过程,但要求信息内容不变(尽管这是很难做到的),语码形式变了,但载体的特质并未改变,除了偶尔口语要转译成书面语,或某种图像、记号要转译成口语等。如果把信息作为主对象,翻译思维就是高级意识参与信息变换;如果把意识作为主对象,翻译思维就是高级意识对信息的加工。

信息密度 information density

信息密度可定义为单位信息所占的时间或空间。如果信息用语言文字来传递,则信息密度为单位信息所用的词汇量或字(母)数,亦即词汇信息密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按字数计,后者的词汇信息密度为前者的3倍半。又如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简称USA,后者的词汇信息密度为前者的7倍。由于简称的信息密度高,在一般书写、交谈、通讯中广为使用,只有在庄重或正式的场合才需要用全称。有人对英汉语的各类文本作统计分析,发现总体上英语文本的篇幅是汉语的1.7至2.2倍,说明汉语的信息密度一般要高于英语。信息论要求既要提高信息的传递效能,又要保证传递信息的完整性。这一原则用到翻译上可解释为:目的语既要忠于原文、保持原文的信息量,但又不能言词累赘,占有过多的时间或空间;反过来,也不能强调言词简洁而有损原意。这中间,词汇的信息密度起到重要的作用。

信息密度比 information density ratio

指在用不同语言传递同一单位信息时,源语单位信息的用词量与目的语单位信息的用词量之比即为词汇信息密度比。可表达为:

$$\text{信息密度比}=\frac{\text{源语单位信息用词量}}{\text{目的语单位信息用词量}}$$

例如,OPEC(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将五个词缩写为一个词,过去一般都译为“石油输出国组织”,为四个词。那么,源语与目的语的信息密度比为¼=0.25。又如dodar (determination of direction and range)译为“超声波定向和测距装置”,英汉语的信息密度比为⅙=0.167。英译汉的信息密度低,说明为了传递源语的信息,汉语要用更多的意义单位,这是不经济的。

信息量 information content

指表达特定符号载荷的离散信息的数值量度。符号由于被选择使用而扬弃了不确定性,信息量说明了接收到这个符号时不确定性减少的量,信息量同符号本身的出现概率有关,如We are going away中,away的出现概率较小,are的概率则很大,因此away的信息量比are大。在通讯理论中,以被选定符号的概率对数的负值来表示信息量,即 $H=-\sum_i p_i \log_2 p_i$,其中 P_i 为第 i 个符号的概率,故也称作“负平均信息量”或“负熵”。

信息意图 informative intention

最早出现在斯特劳森(Strawson)对于格赖斯(Grice)理论的修正和补充中,后由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在其合著的*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提出,并被广泛应用于语用学

的会话含义分析、言语行为及非言语行为分析中。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模式以人为出发点,提出了意向交际的观点。斯特劳森在此基础上重组了格赖斯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为通过话语X表达意义,言者S必须意在：1.使S的话语X在听者A一方产生某种反应;2.使A识别S的意图a;3.使A对S的意图a的识别至少起到A作出反映r的部分原因的作用。其中,"使A识别S的意图a"就是斯特劳森所提出的信息意图。由此可见,信息意图是指告诉听者某些事情的意图。但学术界对此定义的看法不尽相同。语用学家将说话者的信息意图看做一种引导听者对某个命题产生某种特定态度,尤其是确信该命题属实的意图。而斯珀伯和威尔逊则认为,说话者的信息意图是一种被用来直接形容和修饰听者的认知环境而不是听者的思想的意图。(Sperber, Wilson 1986：58)信息意图是为了使听者对会话中的一系列假设更加清楚。因此,它为会话含义分析、言语行为及非言语行为的分析开辟了新的视角。交流本身含有一种强弱程度。言语行为的程度较强,当说话者非常明确地表达其信息意图和假设时,该假设就被充分传达。而非言语行为的程度相对较弱,说话者信息意图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听者对于那些隐性内容的理解和把握。(张亚非 1992)

信息意图对于会话的翻译过程与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方面,译者有时不能按照字面意义或语篇表层结构形式进行机械的翻译,一定要注意说话者对其信息意图的话语组织,发掘其内涵,并在翻译时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有时发话者选用特定的语篇表层结构形式或选词用句,用以传达某种信息意图,译者则应充分意识到这种表达形式所蕴含的信息意图,尽量保持原文特定的结构形式(如主位与述位结构),以传达特定的信息意图。　(曾利沙)

通讯　communication

即语言学中的"交际",指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使用一套代码传递或交换信息的过程。通讯过程包括发送者编码,通过信道传递,接收者解码。在语言通讯过程中,发送者和接收者为互相联系的人,使用的代码即自然语言。

编码　encoding

信息论认为编码是把信息转换成一整套符号的过程;心理学认为是信息放入记忆之中的过程。在言语编码中,说话人必须：1.选出一个需要表达的意思;2.用语义体系(如概念、命题等)、语法体系(如词、短语、句子等)和音系体系(如音位、音节等)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转换成语言形式。不同的交际系统采用不同的信息编码符号。有人对翻译过程解释为：对源语解码——用目的语符号编码的过程。

解码　decoding

有两种意义：1.指设法理解词、短语或句子的意思的过程。对语句解码时听话者必须(1)把语句储存于短暂记忆中;(2)通过分析,使语句成为若干切分成分并分辨出其中有哪些分句、短语及其他语言单位;(3)辨认出潜在的命题及言外之意;2.指对任何含有意义的符号(如密码或莫尔斯电码)作出解释。

控制论　cybernetics

是研究信息处理过程和控制过程一般规律的学科,现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信息科学的理论基础。维纳(Wiener)于1948年发表的《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标志着控制论的诞生。广义的控制论把机器的自动控制、动物(包括人类)在自然界的活动都看成其自身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信息传递过程,并着重研究这种过程的抽象数学关系而不管其内在的生物、化学、物理等现象。狭义控制论指与计算机运用有关的数学和技术学科的知识。控制论的发展促进了信息论、计算机科学、现代数学和动物神经系统分析等学科的发展,给语言学也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如在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形成了控制结构主义。

传播学　communication studies

是一门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它起源于20世纪10～20年代,形成于40～50年代,60～70年代对它的研究空前繁荣。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活动,其本质是传播。无论何种翻译,要完成的任务都是信息的传播。翻译具有传播的一般性质,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翻译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由原文作者、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和译文读者因信息传递而组成的系统,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信息传递系统。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过程是跨文化的,译者所操纵的符号也不仅仅是源语的符号系统,而是源语和目的语两套符号系统,但其原理与普通传播原理却是相同的。翻译传播理论试图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来重建翻译理论,其产生标志是威尔斯(Wilss)的《翻译学：问题和方法》(*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威尔斯认为"翻译乃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Wilss 1982：14)。这一定义深刻地阐明了翻译的传播本质。另外,奈达(Nida)也从信息的角度讨论了讯息和信道容量的关系。国内主要的研究者是吕俊和侯向群。他们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把翻译过程视为一种传播过程并纳入传播学的框架,进行本体研究、载体研究、客体研究、环境研究、主体研究、控制研究、效果研究。(唐卫华 2004)

人类学 anthropology

一门研究人、探索人类体质与文化奥秘的科学。它探索有关人类进化和生存的各种问题,如人类的起源、进化规律、体质特征和差异、古往今来不同社会的不同文化及其发展规律,等等。通常分为两大分支,即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前者包括古人类学、人种学、人体测量学、分子人类学、灵长目学、灵长目行为学等;后者包括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民族志、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社会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心理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医药人类学,以及利用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处理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造福人类的应用人类学。人类学的显著特点是:1. 研究范围较广泛,它直接、明确地涉及世界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从200多万年前直至未来)的人们,而不仅仅局限于周围有限区域或某个历史时期内的人们。2. 整体地对人类进行研究。例如,当人类学家描述他研究的人类群体时,往往会论及这些人所生活地区的历史、自然环境、家庭生活结构、语言、村落模式、政治经济体制、宗教、艺术和服饰的风格等。因此,人类学与生物学、遗传学、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地理学、工艺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语言学、艺术、文学、音乐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关系。3. 强调实证,注重实地调查工作,参与观察,作泛文化比较,主张从实践中总结、归纳出一般性规律;这些方法已逐渐地为其他学科所认识、接受和运用。人类学可以使人们变得更宽容,它能告诉人们,异民族的一些看来不太合适,甚至可能感到不快的习惯和行为却是前者为了适应某些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而形成的。人类学的价值还在于它能使人们了解人类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从而能使人们充满信心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因传教与人类学关系密切,奈达(Nida)很早就把人类学应用于《圣经》的翻译。 (袁良平)

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

人类学的主要分支,是研究人类创造的并由社会继承下来的技术、经济、社会结构、政治法律、习惯、道德、宗教、艺术等的学科。它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文化"是其关键性概念。其中心任务是:解释人群文化行为的相同处和相异处;描述不同文化的特征和稳定、变化、发展的不同过程。这一学科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最初主要研究原始民族的习俗和生活,对欧洲以外的许多民族作了实地调查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后,开始研究当代欧洲和美洲社会的文化现象。这门学科在美国称为"文化人类学",在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在西欧大陆各国则称作"民族学"(ethnology)。1920年以前,这三个名称包括的内容和研究范围大体相同。1920年以后,在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中,加入了新的内容,应用的范围有所扩大,成为包括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人类学等内容的学科名称。

奈达(Nida)首先把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应用于翻译研究和实践。很早他就发表了 *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 in Translation Problems*(1945),*The Rol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Christian Missions*(1959)等论文。

东方学 orientalism

指将东方文化与人民当做"异域风物"(foreign)——在西方的观看或凝视中常常作为异己对象或奇异对象而展开的历史建构。这个概念与赛义德(Said)影响广泛的专著 *Orientalism*(1978)相连,他将东方学确定为18世纪以来西方对待东方的态度与写作上一个关键性特征。最好是将东方学理解为一种话语,它既臆断又促进了西方的"我们"与东方的"他们"存在某种根本差异的意识。东方学的话语建立在由西方的作家、学者、官员及政治家所秉持的特定意识形态假定之上,历史性地体现在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实践中,而西方社会利用这些实践得以支配东方及东方文化,并获得对它们的权威。

赛义德认为东方学的话语最终显示的与其说是东方学所指涉的东方国家的特征,不如说是观看、研究以及力求施加规则于它们的西方群体的意识与文化。作为一组用于理解"陌生者"——东方——的历史观念,它们更多显示着"我们的世界"——西方欧洲文化的偏见与结构。翻译对东方学的传播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译者用"透明"归化的策略把东方文化纳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范畴。这也是当前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所揭示和反对的翻译中的殖民主义倾向。 (郭建中)

译介学 medio-translatology

译介学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跨文化研究,关注翻译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与扩展等问题,关注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意义(谢天振 1999:1),其理论要点包括:分析翻译文学的性质、归属和地位,确立翻译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对翻译中不同文化的误解与误释、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的研究,重写"翻译文学史"的必要性和方法论,等等。

语文学 philology

1. 对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的语言文字研究属语文学范围,我国过去的小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研究一般也属语文学范围。与语言学的不同在于:它没有脱离哲学、逻辑学或经学的范围,着重书面语,目的在于文献资料的校订、考证和诠释;而语言学则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既重视口语,又重视书面语,目的在于探索语言存在和发展的规律。2. 人文科学有关学科——语言学、

文艺学、校勘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统称。3. 在英国,语文学或比较语文学是历史语言学的传统名称。在采用语言学途径研究翻译之前,人们采用语文学的方法和原则来研究翻译。

媒介学　mediology; mésologie

是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的重要部分,考证产生影响的具体手段和途径,是研究从传递到接受的中间环节的一门学问。各国文学交流从来是多向度的:英国人理雅各(James Legge)早在19世纪就译有*The Chinese Classics*(《中国经典》,1871),美国人庞德(Pound)的译本*Cathay*(《华夏集》,1915)一出版立即在西方兴起一股"中国热",并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佳的十余首诗之一"。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就开始通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旅游、互访、书刊互换、国际会议等是重要的媒介途径,而互联网更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起着媒介的作用。

模糊理论　fuzzy theory

1965年美国科学家扎德提出"模糊集"的问题,开始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学科,如模糊逻辑、模糊数学、模糊语言学等(戚雨村等1994),构成模糊理论。翻译研究特别与模糊语言学有关。模糊理论告诉我们,世界上许多事情或现象不能采用度量衡或"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方法来描述。在语言中,模糊性是从符号、符号所指对象及符号的使用者三方面关联中产生的。模糊性是客体(符号所指对象)和主体(符号的使用者)在语言(符号)中相互"碰撞"的结果。这是语言的普遍现象。许多模糊词语广泛地运用于各类文体(包括在科技文体)中。

傅雷提倡的"神似"是模糊学原理对文学翻译的最好的解释与运用。"神似"就是译者与原作的模糊神交与神移。在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中,形象思维的主导方向是模糊思维。文学翻译的首要任务是在模糊和朦胧的意境中捕捉形象化的美的意念,并且尽最大努力把这种意念用优美的语言传达出来。译者的审美过程是对原作语言模糊神化,然后又从美感的、形象的模糊性中人化为译文语言。所以,翻译中语言的转化过程就是用译文语言的模糊性功能取代原文语言的模糊性功能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就单个词而言,有的可能要多少丧失点原意。这正是词组的熔铸、句意的熔合所必需的。语言的这种模糊性功能正是正确翻译的基础。参见"模糊翻译理论"

模糊翻译理论　translation theory for fuzzy language

亦称"模糊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 of fuzzy language),把语言模糊性置于翻译学框架之内展开研究,在主体上构成了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所谓模糊翻译理论,即是在翻译学的框架内,运用模糊理论的思想方法,来研究和处理语言中的模糊现象,特别是语际模糊、互文模糊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在翻译中的处理。而从它的具体构件看,这个翻译学分支学科又是一个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与模糊数学、模糊逻辑学、模糊语言学一起,构成整个模糊理论(亦称"模糊学")的四大支柱。

模糊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为语言的模糊性、各种模糊语言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在翻译中的处理。内容主要包括:模糊语言现象的本质特征,语言模糊性与其他相关现象的区别和联系;语义模糊性的各种表现形式,模糊语言现象的系统分类以及它们在翻译中的处理等。模糊翻译理论旨在解决翻译学研究、翻译教学和语言应用中的各种具体模糊语言问题。研究方法涉及模糊词语隶属度的确定,模糊度的计算,模糊推理方法,模糊词语的聚合和组合及其逻辑运算,模糊词义的量化和形式化描述,等等。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可以运用模糊翻译理论的多种策略来处理语言的语际模糊特性和互文模糊特性等方面的问题,其中至少可以包括"对应""添加""忽略"与"变通"等四大常见策略。　(邵璐)

博弈论　theory of games

亦称"对策论",可定义为:个人、团队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地选择策略,并加以实施,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该理论的理想目标就是找到最适合的均衡。博弈论是用严谨的数学模型研究冲突对抗条件下最优决策问题的理论,主要研究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局中人采取何种合理的策略才能处于"优越"的地位,以便取得较好的效益。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它是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最先由美国经济学家冯·诺依曼(von Neumann)1937年提出。1944年,冯·诺依曼和经济学家摩根斯顿(Morgenstern)撰写了*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奠定了该理论的基础。1950年,塔克(Tucker)提出"囚徒困境"模型,是其中最经典的范例。1996年维克里(Vickrey)、莫里斯(Mirrlees)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经济学中博弈论的研究和发展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除了经济学之外,博弈论还应用于政治学、管理学、国际关系学、人际关系学、外交、犯罪学等十分广泛的领域,几乎所有的决策问题都可以认为是博弈。参见"翻译与博弈论"

翻译与博弈论　translation and theory of games

此概念建立在对翻译过程与有些活动进行的类比基础之上。首次作此类比的是维特根施泰因(Wittgenstein)。他把"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包括在一系列语言游戏的例子之中(Wittgenstein 1953: Ⅰ: 23)。然而是列维(Levý)(1967)第一次把这一概念运用到了翻译专题的讨论中。在列维分析翻译即抉择(Translation as Decision-making)的过程中,他借用了卢斯(Luce)与雷法(Raiffa)(1957)首创

的博弈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并将这些概念应用于翻译过程,以此来突出翻译文学文本时,译者通常必须作出抉择的特点。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之上,列维又区分了分别以象棋与扑克为代表的两类基本游戏,并指出,由于"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受到前面所作抉择的影响,并受这些抉择的结果的影响"(Levý 1967: 1172),所以,翻译类似于象棋。这样,每作一个抉择,译者便为随后的一些抉择创造了语境。翻译过程与这类游戏(亦称"完整信息游戏")之间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类似之处在于:尽管这些抉择不是随意的,但它们仍然受主观倾向的影响(Gorlée 1986: 99)。列维指出,分析特定目标文本中翻译抉择的等级将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文学作品中各种因素的重要程度"(Levý 1967: 1172)。戈尔里(Gorlée)将翻译过程描述为"一个需要创造性心理技能的、万花筒般的、永无止境的游戏"(Gorlée 1986: 103);然而与列维不同的是,她认为,与下象棋相比,翻译更像组装拼板玩具(只是翻译与拼板游戏之间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差异,即翻译中不存在一种有待发现的预先存在的解决方法)。

国内也有人用博弈论来分析翻译过程,把翻译活动看作非合作博弈。根据非合作博弈中动态和静态、完全信息与不完全信息所构成的分类,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处于一种完全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状态。一种文化本质上具有继承性和稳定性,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客观存在的,是永恒的。从这些事实出发,认为翻译活动中包括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可应用典型博弈矩阵"囚徒困境"(the prisoner's dilemma)、"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和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解析翻译理论,把博弈论延伸到各个角落,实现翻译博弈中的归化和异化的最终辩证统一,这或许正是翻译博弈所带来的最大魅力所在。(王斌 2004;樊军,郑志军 2007)

博弈论把翻译当成一个千变万化、永无止境、具有创造性技巧的游戏,把翻译从它特有的抽象语言属性中解放出来,使译者的创造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观点使我们重新找回在翻译的理性迷宫中的游戏因素。参见"博弈论"

翻译社会学 translation sociology

最早由霍姆斯(Holmes)在《翻译的名与实》(1972)中提出。他认为,关注译本在译语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发挥的功能的"功能描述翻译学",可以发展成为翻译社会学的一个领域,或者叫社会翻译学(sociology-/socio-translation studies)(Holmes 2001: 183)。后来,卡隆(Callon)在《翻译社会学的要素:圣布里奇湾的渔民和扇贝的驯养》一文中又提出了"翻译社会学"一词。自此以后,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翻译社会学提供了一个研究模式。翻译作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被广泛运用,翻译社会学就等同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此处的翻译是指广义的转换行为,一切发生变化的行为都是翻译,可以称其为广义的翻译社会学(general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从社会学的角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信息转换行为的翻译行为,可以称其为狭义的翻译社会学(special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近年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关注翻译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古恩维克(Gouanvic)借用布尔迪厄(Bourdieu)的符号生产、场域、资本、符号商品、惯习和幻象等社会学概念,提供一个翻译的社会学研究模式(Gouanvic 1995)。特特希(Tötösy de Zepetnek)关注作为社会交际的翻译,探索翻译在建制(包括出版政策、文化互联等)、个人和实践范围内的社会和文化意识(Steven Tötösy 1998)。海尔布伦(Heilbron)认为,作为文化世界体系的书籍翻译,存在中心-边缘结构,使得语言群体间的翻译流动不均衡,因此翻译在不同语言群体内的作用差异很大,提出了翻译的一般社会学模式(Heilbron 1999)。福塞(Díaz Fouces)运用社会学上的准则、偏差、符号边界以及后结构主义方法,提出翻译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模式(Díaz Fouces 2001)。切斯特曼(Chesterman)在分析各种翻译研究模式和方法的基础上,也提出过建立翻译社会学的构想(Chesterman 2003)。因吉莱里(Inghilleri)运用布尔迪厄的社会文化理论,把翻译置于更广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把翻译置于社会结构、社会建制内,分析翻译的文化、历史、政治特性(Inghilleri 2005)。沃尔夫(Wolf)认为翻译是一个受社会调整的行为,是一种社会实践,译者既是翻译的建构者,又受到社会的建构,因此对翻译的社会含义,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虑(Wolf 2005)。

翻译网络不预设原文中心、译文中心或译者中心,而是看原文、译文或译者在翻译生产过程中与其他行动者的联系紧密的程度。他们没有预设的次序关系,也就不存在微观和宏观的区分,因为网络中的行动者是经过无数的联结而变得具有战略意义,而一旦联结断裂,各行动者就不具有意义。翻译网络中的各结点对其他行动者的征召能力存在差异,关键是看其在网络中的地位,是否可以成为强制通过点,征召与之相关的行动者,从而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翻译网络。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那就是跟随译者。只有跟随译者参与到整个翻译过程,真实记录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实地考察有哪些行动者被征召进翻译活动中,他们是如何协商和相互妥协,从而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网络。采取这样的策略,可以避免"说做难题"(say-do problem),即译者事后所言说的,可能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或者翻译过程中所做的有差异,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也可能被译者忽略。在翻译的社会学转向过程中,不论是借用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卢曼(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还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均把翻译看做一种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

的语言间的转换问题,把翻译置于更大的领域来考察,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翻译社会学的建立提供了依据。(黄德先 2006)参见"行动者网络理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由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Latour)和卡隆(Callon)提出,劳(Law)将其在社会学中发扬光大。他们认为过去的社会科学大部分以人类为中心,清楚地划分"自然"与"社会","人类"(human)与"非人类"(nonhuman)二元论述,但是这样的划分并不适合用来思考我们的世界,因为我们的世界组成中含有许多不同的非人类(Murdoch 1997: 731～756)。拉图尔和卡隆跟随在行动中的科学家进入实验室,追踪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结果发现,"真正从事科学的人们并不都坐在实验室里,相反,实验科学家的存在只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实验室以外的其他地方从事科学"(Latour 1987: 162)。那些在实验室外部活动的科学家,同科学界、政府、生产部门、用户、传媒、公众保持着联系。一旦这些联系中断,实验室内部的研究工作将陷入停顿。科学知识也并非因为它是"真理"才被人们接受,而是因为它能从"社会"中发掘出并调动起各种建构与辩护的资源才成其为"真理"。因此,所有参与知识生产的行动者均是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应同等对待他们,即采取对等原则。

作为语言信息转换的翻译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所提供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翻译的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翻译网络中不存在孤立的译者。"要么你是孤立的,但很快不再是一名专家;要么你继续是专家,但这意味着你不是孤立的"(Latour 1987: 152)。在翻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译者是在与其他行动者的合作和协商中来完成翻译任务的。除了译者外,翻译中还存在各种既合作又对抗的行动者,如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翻译评论者、翻译审查者、赞助人、封面设计者的决策、促销策略、版权政策、稿酬制度,以及其他组织机构。译者要获得翻译任务,需要编辑或项目主管提供原文。要获得原文的翻译授权,需要作者或版权所有人的同意。翻译过程中,译者要不断和编辑、译审等人进行沟通。翻译的出版又需要另一个网络的存在。翻译的营销和消费过程,把更多的行动者容纳进来。当然,那些仅把翻译当作自娱自乐的孤独的译者,对研究者的兴趣不大。要分析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中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种行动者纳入进来,从而使他们的行为变得可预测。尽管这些行动者不可穷尽,关键是看影响、制约和决定翻译行为的因素,由研究者自己来判断,哪些才是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因素。这并不是要否认译者的贡献,尽管他们确有其超人的天赋,但他们也是整个网络中的一部分,为完成翻译任务而动员了整个网络。诚如牛顿并不是单独一个人就建立了重力学说,他需要来自天文学家的数据,来自几何学的知识,伽利略的力学知识,三一学院的实验室和实验设备,实验室的其他工作人员,还有无数其他行动者的参与。翻译的成功依赖于动员各个行动者,相互协商、妥协,重新确定了各个行动者在翻译网络中的角色,并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网络。作为一种多维的思维,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和译文的对立、译者和作者的分离等二元的划分。由各种异质行动者构成的翻译网络,使得唯一的翻译标准变得不可能。透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强大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也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任何终极的根据,因为一个行动者在某种意义和层面上归属于某个世界,而在另一种意义和层面上又从属于另一个世界。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那就是跟随译者(follow the translator)。只有跟随译者参与到整个翻译过程,真实记录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实地考察有哪些行动者被征召进翻译活动中,他们是如何协商和相互妥协,从而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网络的。(黄德先 2006)参见"翻译社会学"

阐释学　hermeneutics

阐释学的基本意义是"解释的艺术"。根据帕尔默(Palmer)的意见,它有八个主要分支:一、释经学(解释《圣经》理论);二、一般语言学方法论;三、理解语言的学科;四、研究人文科学的基础方法论;五、存在与存在思维的现象学;六、为理解神话、象征和行动后面隐藏的意义所使用的解释系统;七、关于解释过程和其有效性的理论;八、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人的阐释学经验学派。

阐释学与翻译的联系主要在于如何解释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纯语言差距之外的文化和思维差异,如何较恰当地理解源语,表达目的语。翻译中的阐释是译者对源语文本在理解基础之上作出的评判、解释,是他在用目的语诉诸书面表达之前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是附着于理解和表达这两个环节的。"理解总是阐释",但是"理解始终已经是应用"。换言之,理解是与实践、与文字表达紧密相连的,而阐释这一中介环节是对理解的内心解说,是"隐形"的,是领悟文本字面意义和产生联想意义之间的联系过程。

若把阐释学中关于阐释的片面性、以两个甚至更多方式意指同一事物的可能性等思维方法引入翻译研究,对于探讨以至解决一些有争论的理论问题将大有裨益。在翻译领域内,对字面意义的阐释开了直译之先河,而寓意阐释则成为意译之滥觞。中国历史上恰也产生过与翻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释经学"——对佛经的解释与翻译。

21. 文　化

乙型病状　symptoms of type B

段连城针对我国对外宣传的翻译错误而开出的诊断书中将错误分成“甲型病状”和“乙型病状”两类。前者指由于译者外文水平不够而出现错误的表达，包括“语法错误和用词错误”。而后者主要指由于文化差异造成“译文无误，但读者费解”的情况。因此，段连城认为，对外宣传翻译应当尽可能采用“解释性翻译”，具体包括“镶补”，即必要的加词加意；“减肥”，即减掉夸张多余的部分；和语句和段落“重组”等手段，以便符合外文的语言和接受习惯，适合现代节奏。(段连城 1990)　　(王宏印)

文化　culture

文化的经典定义于1871年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现代文化人类学把文化的本质特征概括为：1. 文化是经由社会习得的，而非遗传获得的；2. 文化是一个社团成员所共有的，而非某一个人所独有的；3. 文化具有象征性，语言是文化中最重要的象征系统；4. 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文化中的每一方面都和其他方面相互关联。

文化人类学家们在分析文化构成时，一般把文化划分成至少四个大系统，即技术-经济系统(包括生态、生产、交换和分配方式，科学技术，人工制品等)；社会系统(包括阶级、群体、亲属制度、政治、法律、教育、风俗习惯、通史等)；观念系统(包括宇宙观、宗教、巫术、民间信仰、艺术创造和意象、价值观、认识和思想方式等)；语言系统(包括音系学、字位学、语法和语义学)。

语言是文化中一个颇为特殊的组成部分。首先，它是整个文化的基础，正是通过语言，文化才能保存下来，并传递给同时代人和后人。其次，语言直接反映一种文化的现实。所以王佐良说：“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

互动方式　interrelations

文化上的互动方式就是交流方式，主要由双方在交流中的信息流向和所取的态度决定。所谓的文化态势只有在一定的互动过程中才能进入交际角色，也才能起作用。互动方式包含以下的关键性因素：1. 流向(direction)：流向是指交流中信息给出的源泉、传播的方向和接受影响的情况。一般指具体的、局部的交流项目而言，可以按照相对的强弱和流向分为顺向和逆向两类。当然，其中总体上的强项和局部的弱项也可能会起作用。例如，佛法东来，在古代东方两个强势文化之间进行交流，但从印度到中国的流向弥补了中国文化宗教一维的不足，就属于顺向交流。相反则是逆向交流，例如，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瓷器制作的工艺，进口有关技术，则是非主流的。必须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逆向交流也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2. 态度(attitude)：态度包括主位(本土文化)对于客位(外来文化)的接纳或拒斥态度，或者采取无所谓的容忍态度。例如，严复对于西方社会伦理文化的有意译介就表明一种积极的接纳态度，由此解释他翻译《天演论》的综合方法和比照策略，就是很合适的(至于在潜意识中对于本土文化深层价值观的坚持则是另一问题)。又如，由于基督教的入侵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征服和商业入侵，所以引起中国人的拒斥态度。由此也可以解释何以当时的西方传教士要采用适合中国士大夫趣味的迎合性《圣经》翻译策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说明了即便在基督教传入中国文化的时候，中国文化至少在宗教传统和心理能量上已不能全然视为弱势文化(惟其政治、军事的地位处于劣势而已)。3. 平衡(balance)：没有哪一种文化在一切方面在一切交流中都永远是强势文化。所谓强势弱势始终是相对的，文化交流的最终结果趋于平衡和稳定(包括实质的和精神的)。例如，中国古典小说有很强的势力和久远的文学传统资源，但和西方现代小说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差距，例如叙事模式和表达方式上的差距。这样，当晚清中国社会需要小说革命动员民众心理的时候，大量西方社会政治小说的翻译就采用了归化的策略。因为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有足够的勇气和能量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由此取得的平衡就是现代小说的形成和中国古典小说的终结。另外一个中外科学交流史上的典型的平衡态势，就是中西医学在当代中国医学界的并存和互补所达到的一种平衡或均衡，而非在总体上实现了有效的科学的结合。参见“文化态势”　　(王宏印)

民族文化　national culture

狭义而言，指某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创作，如俄罗斯文化、希腊文化、藏族文化等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广义而言，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规、习俗以及所有该民族成员所获得的各方面的能力和习惯，是以往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扬弃后的积淀。各民族文化都深藏着并从多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具有为该民族成员所普遍接受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其中各个部分彼此适应，互相调整，处于一种系统的平衡状态之中。民族文化具有较强的地区性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从深厚的民族生活的土壤中生长出来。民族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反映了一种人际关系与价值体系，每一个文化都有其共同的民族心理、文化行为、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保持民族尊严的手段。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完全地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全盘接受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然而民族性的文化中有人类的因素，因此人类文

化才可以交流。民族文化的发展趋势是逐渐融合,各民族都会吸收其他民族中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全球意识下建设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现代新文化。

正式文化 formal culture

霍尔(Hall)在《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把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技术文化、正式文化和非正式文化。卡坦(Katan)的《文化翻译——笔译、口译及中介入门》(*Translating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引用霍尔的观点阐释了文化翻译的理论。所谓正式文化是不具有客观性的,是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正式文化是需要通过教育获得的。比如文化传统、准则、习惯、行为方式等。我们一般不会注意到周围生活的习俗,但一旦习俗没有受到尊重,我们会立即意识到。比如说,在英国成长的小孩,在应该说"谢谢"的场合下忘记说或没有说,大人一定会用以下的问题提醒他/她:"你该说什么?"或"该说什么有礼貌的话?"孩子通过试验和错误在家里而后是在学校学习这种形式的文化。然后他们能很快学会被接受的行为方式。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语言在语言学中称之为语言体裁。日常生活的语言体裁一般是不作分析(这正是正式文化与技术文化的区别),但是可以学习和教会的。例如,商场的柜台用语就是正式文化的一个例子。在相同的场景下,不同的文化可能会有不同的用语。例如,英语用"Can I help you?"汉语说:"你要买什么?"但不同文化交际的频繁,可以使一种文化中的用语逐渐被另一种文化所接受乃至采用,例如,英语中的"Thank you for coming."变成汉语中的"谢谢光临!"已在中国的商店中被普遍使用。

这种正式的行为方式,是成年人强加给年轻人的。学习正式文化的主要观点是给年轻人灌输一整套的习惯;这些习惯是不容置疑和挑战的。霍尔指出,正式文化的行为模式,往往是犯错误后经别人指正才学会的。 (郭建中)

技术文化 technical culture

霍尔(Hall)在《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把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技术文化、正式文化和非正式文化。卡坦(Katan)的《文化翻译——笔译、口译及中介入门》(*Translating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引用霍尔的观点阐释了文化翻译的理论。所谓技术文化是在科学层面上的交际,可以精确地加以衡量,也没有语外意义。在技术层面上,交际是清楚明白的,并特别注意意义的传达。就语言而言,需要翻译是一种陈述性的语言,是词典上的所指意义(denotative meaning)。这种形式的文化,现在是全球性的,在全世界,工业和商业上都有统一的标准。在技术层面上,意义几乎不会损失或极少损失。在技术层面上的交际,没有语外意义。文本是权威性的,而且表达清晰。试以翻译 second 一词为例:

A second is the basic SI unit of time: the duration of 9 192 631 770 periods of radi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wo hyperfine levels of the ground state of caesium-133.2. 秒,国际单位制(SI unit)的时间单位,等于 9 192 631 770 个辐射周期持续的时间,相应于铯-133.2 原子特定的跃迁。

目前,科技翻译不仅要满足专业人员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产品的使用者——广大顾客的需要,如电子产品的使用说明等。对译者,则要求不仅懂得两种语言和文化,还得熟悉专业,包括术语和表达方式。对非专业的译者而言,更需要知道迅速、有效地获得有关科技知识的途径。因为不同文化的民族,行为方式不一样,而且往往是无意识的。纽马克(Newmark)(1988)在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中曾经指出,在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文化和职业上的差异,在翻译科技文本时,译者必须考虑这种差异。比如,现在经常碰到的计算机软件"本地化"(localization)的翻译,就是一个很能说明技术文化翻译问题的例子。 (郭建中)

非正式文化 informal culture

霍尔(Hall)在《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把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技术文化、正式文化和非正式文化。卡坦(Katan)的《文化翻译——笔译、口译及中介入门》(*Translating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引用霍尔的观点阐释了文化翻译的理论。所谓非正式文化,是没有惯例的文化。这种形式的文化,既不是教会的,也不是学会的,而是非正式地获得的;更重要的是,是无意识地获得的。根据霍尔的说法,这个术语是精神病学家沙利文(Sullivan)创用的。他用这一术语把个性中的我们自己能意识到的部分(in-awareness)与我们自己无意识但别人能看到的部分区分开来。这一概念可追溯到弗洛伊德(Frued)。他认为,控制我们自己的不是意识,而是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植根于孩提时期的记忆中,并引导了我们成人的生活。

这种无意识学习的模式是模仿。学习行为的理由往往不是明显的;也就是说,这种习惯是不明显的,只有当这种习惯被破坏后才会显现出来。一系列的相关行为是一次性学会的,在很多情况下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学习支配自己的行为模式或习惯。在某种程度上,非正式学习是条件作用的一种形式。

我们感情上的反应,并反映出自己本我的,正是这种无意识。这一层次是:"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怎么说的"。根据言语行为理论,我们对言外之力作出反应,而不是对言内之力作出反应。正如霍尔指出的,在这一非正式层面上,我们的反应是无意识的——但决不会在技术的层面上。换句话说,我们是对话语的内涵意义作出判断和反应,而内涵意义是取

决于文化和社会的价值判断，是隐含在词义之中的。卡坦用小说 *The Bonfires of Vanities* 中的一个片断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非正式文化层次。

小说主人翁舍曼 · 麦科伊穿着便装，带着他的宠物狗走出高级公寓的房间去遛狗。在电梯里遇到邻居波拉德 · 布朗宁。布朗宁上下打量了麦科伊和他的狗，打招呼说："Hello, Sherman"。这称谓，这四个音节的简短的招呼，发出的信息很明确："你，你的着装和你的狗玷污了我们用桃花心木镶嵌的新电梯。"我们只有植根于派克大街（美国纽约市的豪华大街）的合作公寓的文化中，才能理解布朗宁的反应，并对此作出自己的反应。麦科伊感到愤怒，但他弯腰抱起了狗。根据言语行为理论，"把狗抱起来"是言语效果行为。麦科伊发现，这一效果出于自己的无意识行为。（郭建中）

亚文化　sub-culture

指某一社会中的某群体所拥有的一种既包括主流文化的文化特征，也包括某些独特的文化特征的活动方式。在复杂社会中，包含有多种亚文化。社会中的个人常常在一个以上的亚文化中发挥作用，而且他们在一生中也会经历不同的亚文化。亚文化的相异性是由职业、种族、地域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一般说来，这些群体都各具有其自己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则散布在种种主流文化信仰之间。它们并不否定主流文化，仅仅是忽视其某些方面，并以自己的特有形态补充主流文化。因此，亚文化是主流文化的替代性文化。亚文化通常会产生特殊的生活方式、语言和价值体系。如在美国，移民群体保存了许多自己原有社会的价值观：讲家乡语言，在美国自由随便的生活习惯中仍保持某些传统的处世方式，维系传统的宗教信仰，注重旧有家庭生活的牢固性等，这些都表现为一种群体亚文化的特征。亚文化的特征常常可以传播到群体之外，而且也可以传到主流文化中，例如，迪斯科最初流行于纽约的同性恋者和时髦仔中，到1977年，美国有大约 10 000 个迪斯科夜总会。迪斯科亚文化的足迹，带着它对个人表现、性感刺激、怪诞服饰等方面的追求，遍布美国各地，跻身于美国主流文化中。

形象文化　iconic culture

亦称"后现代主义文化"（postmodern culture）。指现代西方世界的视觉文化，包括广告、摄影、电视、录像、路牌等。按照美国学者杰姆逊（Jameson）的说法，"形象"这一概念与萨特（Sartre）的理论及拉康（Lacan）的结构式精神分析有关。由于现代社会商业化的发展，形象信息渗透入人们的生活，开始悄悄地但却有力地影响着现实，同时也影响着人的精神形态。因为形象不仅具有物质意义，而且具有象征意义，它的广泛出现削弱了他性，使外部的事物发生一个内在化过程，距离感随之消失。形象文化之于人的作用，就是距离感的消失，人们对距离的重新确认。如电视形象使外部客观世界发生的一切都成为人们自己世界的一部分，成为自身经验的一部分。形象文化的特征是美学上的民粹主义，是复制、新的平面性、无深度感，以及严格意义上的表面现象。它诉诸直接经验，无需任何解释，一切高度形象化。这种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将是形象垄断和爆炸，让人在形象的濡染中失去行动果断性和自决性。

语言文化　linguistic culture

指由人们的语言行为所构成的文化形态。语言作为人类主要的符号象征之一，从一个方面揭示着人们文化生活的内容和方式。人类创造了语言符号又借助于它来保证自己的有效生存，这反映于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根本意义。在文化学家看来，一个只有口头语言而没有文字语言的民族文化是有缺陷的文化。语言作为一种维护一个民族文化独立存在的屏障，其有效作用取决于这个民族语言系统的完整性。同时，一个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和扩散也要取决于这种完整性。语言文化圈的划分是以语系、言语、语言变体（地方语言）为变项的。因为这些不同序列的语言符号象征，事实上反映着文化的深层结构，或者是文化心理特质的外部符号行为的一种表达。特别是作为各种语言变体，它往往与不同社会身份、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文化形态有着密切关系。不同的语言变体反映着语言文化形态上的差异。

文化专有项　culture-specific item

由西班牙艾克西拉（Aixela）于 1996 年提出，定义为：在文本中出现的某些项目，由于在目的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项目或于该项目有不同的文本地位，因此其在原文中的功能和含义转移到译文时发生翻译困难。所谓有不同的文本地位，也就是因意识形态、惯用法或使用频率等方面的差异而有不同的价值。什么是文化专有项，它不单独取决于项目本身，而且取决于目的语文化所理解的该项目在文本中的功能。这就是说，凡是目的语文化中的一般读者或者任何当权者在意识形态或者文化上不可理解或接受的，就是文化专有项。（Aixela 1966：57～58）

文化专有项实质上是某一特定社会背景区别于其他社会的特质。对文化的层次，不同的学者作了不同的分类。西班牙学者达尔（Dahl）将文化分成三个层次：1. 表层：人类的各种产品（包含所有属于文化范畴的最直观的内容，它包括：语言、饮食、建筑、各种艺术品等）；2. 中层：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规范与价值观（这决定人们在共同的生活中关于孰好孰坏的认同，人们交往中的行为举止，待人接物的方式等）；3. 内层：某一特定文化环境下的基本判断（人们对于生活是什么，如何看待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什么是美都有一个基本判断，这些基本判断是在生活中长期地、无意识地形成的，很多已成了生

活中不言自明的东西)。(Dahl 1998)例如,在中国文化专有项中,诸如太极拳、鱼香肉丝、孔子庙、宋词等都属于表层的东西;诸如"人活脸,树活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属于中层的内容;而诸如"班门弄斧""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之类的典故,则属于文化专有项的内层。文化专有项涉及的内容广,层次深。作为文化专有项比较密集的汉语文学作品,翻译策略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模仿法、释义法、音译加注法、直译加注法、淡化法、替代法等。参见"文化词语翻译" (蓝春)

文化词语翻译 translating culturally-loaded expressions

指有一定文化背景或深刻文化意蕴的词语,包括在一定历史阶段沉淀下来的谚语、典故、特殊的人物名称等以及现行的熟语、习语。对此类词语的翻译,译者以文化交流为出发点,客观估计读者的文化接受力,采取灵活的翻译手段,尽可能做到译语既保留原文的文化信息和文化色彩(或形象基础),又具有可读性。文化词语的翻译因其本身内涵和形式的不同和上下文的不同,而有不同译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七种:1. 直译,例如:①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旧瓶装新酒);② 现在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的紧急时期!(茅盾《子夜》)(Never, he thought , was the proverb "An inch of time is an inch of gold" more true than now.) 2. 直译加注,例如:①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朵朵乌云衬银里,黑暗之中有光明。) ② "铁饭碗"如今已被一个新出现的词"跳槽"代替。(The phrase "iron-rice-bowl", which refers to the job-for-life system, has been replaced by a new term, *tiao cao*, meaning "to seek better troughs.")3. 释义,例如:① He started to repair his car himself, but realized that he *had bitten off more than he could chew*. (他动手修车,终于明白自己力不胜任。)② 送上茶具一套,真诚祝贺你们生活永远幸福,新人白头偕老。(We are sending you a tea set with our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and best wishes for a *lifetime* happiness and *companionship*.)4. 套用,例如:趁热打铁(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浑水摸鱼(to fish in troubled waters)。5. 改变形象,例如:black sheep (害群之马),水中捞月(to fish in the air)。6. 转写,将源语(主要为英语)直接写入目的语,如CT, VCD, XO, Internet, ISO9001 国际品质认证等。7. 音译,如 Benz(本茨、奔驰),AIDS(艾滋),clone (克隆)等;其中有音译加类别词,如 jeep(吉普车), hamburger(汉堡包),parka(派克大衣)等。

接受语文化 receiving culture; receptor culture

文化学派所用的术语,指目的语国家具有的文化。勒菲弗尔(Lefevere)在 *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ture: A Source book* (1992b)中谈到,译者经常需要根据接受语文化的诗学改写原作,以取悦于新的读者,并保证译作能被阅读。但译者也经常利用自己的译作来影响自己所处时代诗学的发展。译者在源语诗学和接受语文化的诗学之间力图取得妥协;这种妥协能使我们窥见文化适应的过程,并提供了无可争议的证据,即有关某一特定诗学权力所发挥的程度。

(郭建中)

文化入侵 cultural invasion

亦称"文化侵略",指一种为武力征服和维持压迫的目的服务的异族文化强行介入形式。文化入侵是一种狭隘的现实观,一种固定不变的世界观和把某种世界观强加于另一种文化之上的野蛮行径。它意味着侵略者的"优势"和被侵略者的"劣势"以及前者占有了后者又担心失掉他们而强行灌输自己的观念准则。这种现象在近代以来的世界文化史上屡见不鲜。欧美文化以基督教为前锋,以炮舰武力为后盾,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强行介入就是文化入侵的典型例证。

(郭建中)

文化中介者 cultural mediator

奈达(Nida)在 1976 年的一篇题为 *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的文章中把翻译纳入交际理论的框架内,把翻译看做语际交际的活动。斯坦纳(Steiner)在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1975)一书中提出,"不论是语内交际或语际交际,都是翻译。"纽马克(Newmark)则在 *Translation Theory or Spoof* 一文中指出,"翻译是向另一种文化解释一种文化最经济的方法。""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中介。"依据上述观点,卡坦(Katan)在《文化翻译——笔译、口译及中介入门》(*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一书中,把传统的口、笔译翻译工作者的新角色定位为"文化中介者"。译者作为"中介者"的概念,早在 1975 年,斯坦纳在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一书中就指出:"译者是在两个操不同语言的社团单语交际参与者之间的语言中介者。"但斯坦纳在这里强调的只是"语言的中介者"。

文化中介者这一概念,首先是由博希纳(Bochner)在 1981 年出版的 *The Mediating Pers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在书中提出,口译和笔译,不仅仅是翻译或传译,而是文化中介。他对文化中介者下了如下的定义:"文化中介者方便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之间的交际、理解和行动。中介者所起的作用是在两个不同文化的个人或社团之间解释双方的言语、意图、看法和期望;也就是说,在双方之间建立和协调交际关系。为了成为双方之间的纽带,在这一意义上,中介者必须是两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者。因此中介者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是双文化人。"

塔夫脱(Taft)在 *The Rol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Mediator (1981)一文中提出，中介者在两种文化中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能力：1. 社会知识：历史、民间传说、传统、风俗习惯、价值、禁忌、自然环境及其重要性，邻近的人们，社会显贵等；2. 交际能力：书面的、口头的和非语言的；3. 技术能力：作为中介者所需的技能，如使用计算机、得体的着装等；4. 社交能力：有关社会关系准则的知识和控制感情的能力，如自我控制的水平。

文化中介者应该是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沟通的专家。（郭建中）

文化历史分析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ulture

要了解语言的内涵色彩，不作文化历史分析，断难究其底蕴。语际转换中的文化历史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并注意这些问题对语义调节所起的作用：1. 民族文化传统、发展沿革与历史背景：这常常是词语语义最大的也是最广泛的参照系，它涉及词义的演变过程，特别是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包含的特定词义与色彩。词汇通常既是民族文化丰厚的历史沉积又是民族文化的新生代。2. 民族心理与意识过程：同一民族由于处在相同的文化、历史参照系中而形成相同的"集团性心理趋势"，表现出大体相同的精神气质、心理素质、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审美情趣，等等，这一切必然会反映在文化上又表现在语言中。3. 民族的地域性特征以及自然条件的影响，在前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独特的风俗、习惯、信仰、观念形态，等等，这一切也必然要反映在文化上并表现在语言中。4. 以上三种因素作用于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比如汉族在思维上重意会、重具象，在表述上重动静结合、虚实结合。这就必然会反映在汉语的语言结构形式及总体风貌上。（刘宓庆 1990a：97～98）

文化对比　cultural contrast

拉杜（Lado）在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 (1957)中有一章集中谈文化对比。他指出，每一文化中构成模式的定型行为都有它的形式（form）、意义（meaning）和分布（distribution）。它们构成文化对比分析的三个层次，但三者并不孤立地存在。这里，分布不仅指词语可能出现的环境，而且指它们在实际语境中的使用。这样，文化对比可以通过形式、意义和分布三者的关系进行：1. 同一形式，不同意义；2. 同一意义，不同形式；3. 同一形式，同一意义，不同分布。

文化对比主要涉及文化共性与个性两大方面。各民族文化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有着各自的个性。文化个性反映到词汇里，便造成"词汇空缺""词汇冲突"；反映到语法里，便造成结构上的差异；反映到观念上，则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在阿拉伯文化里，骆驼是耐力、力量的象征；在古埃及文化里，奶牛是神圣的象征；在印度文化里，大象是吉祥的象征；在基督文化里，绵羊是驯服的象征；在中国文化里，耕牛是勤劳的象征。英语说。He is as thin as a shadow，而汉语要说"他瘦得像猴子"，英语说 six of one,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汉语则说"半斤八两"。译者要重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通过深入的文化对比，才能认识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别是辨别不同文化的个性。

（林夕）

文化同源现象　universals in cultural studies

指由于人类的普遍心理机制、历史上的文化接触或者自然地理环境的相似而形成不同文化在文化观念、表现形态等多方面的相似性或一致性。泰勒（Ta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从广义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时候，人类的性格和习惯就出现了形似和一致的现象……毫无疑问，相似性和一致性都可以从两方面来按迹探求：一方面，从人的本性的一般相似点；另一方面，从其生活环境的一般相似点。"也就是说，即使相隔很远，在历史上也没有过文化接触的两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俗也有可能会出现巧合的情况。这其实就是非文化接触类同源现象。不同文化的同源现象表现为多种形式，或者说因多种原因而产生。借鉴泰勒对非接触类同源现象的两分，再加上文化接触类同源（有直接线索的同源，在文化交流史上很普遍），就可以粗略地将同源现象划分为：人类普遍心理同源，自然环境相似产生的认知同源，文化传承源头同源三大类别。前两类别较容易辨认出来，而第三类文化传承源头同源，或者文化接触类同源现象必须从民族历史和文化发展史进行追溯。由于一些同源现象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传承，往往容易被忽略。在翻译和翻译研究过程中，文化同源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和理解译者的基本文化态度和翻译策略，需要注意的是同源现象的翻译往往被想当然地视为忠实的翻译。（李宁）

文化共核　cultural common core

指人类文化中共同的核心，即各种文化特征相覆盖的部分。以它在语言中的反映为例，许多伴随语言的表情身势都是人类共同的，如赞许和高兴时，说话都伴以笑脸；训斥和沮丧时，说话都伴以严肃和忧愁的面部表情；说话人距离近表示信任和亲密，距离远则表示关系和感情的疏远；真正的笑脸不可能展示忧伤，哭泣不可能表示愉悦，如此等等。这就显示了文化共核生成的生理基础。另外，各个文化和社会的人们一般都倾向于避免敌对而追求互爱，追求文明和进步，反对野蛮和倒退，这就显示了文化共核的人性心理基础。虽然文化区别乃至文化冲突仍是跨文化交际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还是不能忽视文化共核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非常复杂的、辩证的调节作用。

文化共核对翻译起着调节作用。当目的语与源语在用词、搭配、修辞以及借用形象的文化心理趋于

一致时,可直译,例如: to cultivate the land(开荒), Only the good die young.(好人死得早。)as pale as death(像死人一样苍白)。当两者不存在文化共核时,只好按目的语的文化模式来处理。例如,汉语的"一贫如洗"译成 as poor as washing,操英语者不知所云,只得译成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两者的喻义虽然一样,但两者的文化形象大相异趣。

文化产业 cultural industry

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或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2004 年我国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将文化产业分为三个层次: 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其中,文化产业核心层包括: 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产业外围层包括: 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其他文化服务;相关文化产业层包括: 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

文化多元性 cultural pluralism

指在同一社会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的现象。在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加拿大就是一个讲法语和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共存的社会。在中国,由于各民族是小聚居大杂居,不同民族文化共存的现象更是常见。但将来如何呢? 有些人类学家认为,随着交融的增加,世界上各文化将会融合成为一个大同的文化。但有些人类学家认为,未来仍将是个文化多元性的社会,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单一性。因为从目前情况看,尽管在许多国家中,其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已趋于一致,但其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不但没缩小,反而在扩大。因而,即使将来全世界各民族的物质生活趋于一致,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也是不会消失的。不过,那时各民族可能会更加和睦友好地生活在一起。

文化过滤 cultural filter

指捉捕 (capture)源语和目的语在读者期待视野和话语规约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的一种手段(House 2006: 99),由豪斯(House)在 *A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1977)一书中最早提出。豪斯认为应在隐型翻译中使用文化过滤,即"译者要试图以译语读者的视角来看待原文"(House 1997: 70),从而使译文获得与原文对等的功能。但在豪斯 1977 年最初提出的翻译评估模型中,"文化过滤"曾经引起比较大的争议,因为人们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存在较大的主观性。而对翻译质量评估者来说,如果对原文和译文的社会文化差异缺乏客观的认识,会很难评估由于运用文化过滤所带来的变动是否合理。后来豪斯本人也意识到,如果能对两种语言文化环境中不同社会文化所决定的不同的交际倾向进行实证研究,将更能充实文化过滤这一概念,也更能解释在隐型翻译中使用文化过滤的合理性。她在自己的相关研究中明确提出"合理使用文化过滤的手段不能单单依靠译者主观的、突发的直觉,而是要尽可能地与相关的实证研究相一致"(House 2006: 100)。豪斯之后收集了大量语料,对德语和英语进行了对比话语研究,并结合其他学者对英、德两种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最后得出德语和英语在五个维度上的文化差异。这五个维度的文化差异使文化过滤这一概念从抽象变为具体,同时也消除了对这一手段过于主观的质疑。在豪斯修改后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型中,她再次将这一概念整合到隐型翻译之中,目的是尽量抹去译者和译文的痕迹,并使译文实现与原文对等的功能。 (钱宏)

文化冲突 cultural conflict

指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所发生的差异、冲击、矛盾、斗争。文化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生产力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科学技术的不同而使本族与外族文化难以适应;文化本身的阶级性,难以被所有人接受;在本族文化内的法律、哲学、宗教、艺术、伦理价值等观点的影响下会产生一种习惯势力,抵制外来文化,这些因素都会引起文化冲突。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是文化传播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两种现象,前者是文化传播中矛盾斗争性的表现;后者是文化传播中矛盾同一性的表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常会碰到需要处理文化冲突的问题。 (郭建中)

文化传播 diffusion of culture

指一种文化元素或文化丛由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或多个社会的转移或互动,包括从另一社会借用其所创造的文化元素的文化采借。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 1. 无意的传播。亦称"自然传播",指人类在相互接触、交往过程中,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交流,不知不觉地输出或从其他社会吸取了许多新异的文化元素,造成某些方面的相似;2. 有意的传播,指一个民族或国家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输出或吸收其他文化的文化元素或文化丛的现象。一般认为,文化传播的前提是文化接触。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文化传播主要靠人们的迁徙、交往来进行。到了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传播的媒介已有了很大改观。在传播过程中,采借的一方通常都要通过评价、选择、调整等过程才能将外来文化元素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其中,翻译是现代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传播,包括翻译,对于改变旧文化影响甚大,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因之一。 (袁良平)

文化抗拒 cultural resistance

指一个民族对某些外来的信仰、思想和行为模式等拒不接受的情况。这个概念与"涵化"和"传播"概念密切相关。翻译中译者可能受目的语文化的制约也会有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抗拒翻译行动。

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参见"文化转向论"

文化构建　cultural construction

这是巴斯内特(Bassnett)和勒菲弗尔(Levevere)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一书中详细阐释的一个概念。翻译工作者在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相互作用方面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翻译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构建的行为。通过翻译把另一种文化的形象改造成能适应(acculturation)本民族文化的形象,从而完成了一种社会构建和文化构建。翻译研究实际上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翻译研究派的研究证明,翻译不仅不是次要的或派生的文学样式,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工具。大型的社会机构——教育制度、艺术委员会、出版公司,甚至政府,都利用翻译"操纵"某一特定社会,以"构建"符合其愿望的那种"文化"。勒菲弗尔在 *Acculturating Bertolt Brecht* 一文中,分析了德国戏剧作家布莱希特(Brecht)作品 *Mother Courage* 的三个译本,揭示了从二战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学及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偏见,指出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的有效结合,尤其是前者通过另一种形式的"共谋",在西方为不懂德语的人成功地重塑了布莱希特的形象,完成了一种社会构建和文化构建。根茨勒(Gentzler)在上述论集的《序》中指出,"20年来翻译研究派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目的语的社会规范和文学规范,及其对译者制约所产生的影响。勒菲弗尔的文章不仅有效地揭示了这种制约,而且也揭示了翻译家和评论家如何参与这种文化构建的。"　　(郭建中)

文化态势　encountering in culture

指交流的文化双方所处的相对位置(position)和所采取的策略态势(posture)。它首先取决于双方的势力(power)和对于自己相对于对方势力的理解。文化态势应是包括历史渊源、综合实力(当前势力)和心理认同的统一体。正确认识和评估这一统一体,在交往理论上可避免看问题的片面性和只认势力不看精神力量及综合资源的庸俗的文化观点。参见"互动方式""强势文化"　　(王宏印)

文化的标准形象　canonized image of culture

由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一书中提出的术语。他认为,文学作品能否存活,并不完全决定于其内在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对作品的重写;重写与作品本身的价值对文学作品的存活几乎同等重要。如果一个作家不被重写,他/她的作品就会被遗忘。而作品是否被重写或遗忘,是与某一历史时期文化的标准形象有关。如果一种文化形成了其过去的标准形象,那么,不符合其过去形象的作家和作品就会在文集或评论的编辑中被删除,久而久之,作家及其作品就会被遗忘。这种所谓的文化标准形象,则取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和诗学。　　(郭建中)

文化采借　cultural adoption

指一种文化经过选择而接受其他文化之要素的过程与现象。这是不同文化之间长期接触的必然结果。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要素的采借,并不是盲目的,而是经严格筛选的。它总是输入那些自身文化传统能够容纳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不利的东西,以保持文化系统的稳定性。文化采借也不仅仅是照搬照抄,而是必须根据自身文化的需要对采借的异文化元素进行改造或再解释,然后将它们整合到自身的文化体系中,成为自身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文化采借对于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每个文化体系的组成中都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借自其他文化的。一种文化正是通过不断地采借并改造异文化元素而得到发展。翻译在文化采借中起到重大的作用。

文化学　cultural studies; culturology

研究文化现象或文化体系的新兴学科。主要探讨各种文化现象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本质以及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一般被视为文化人类学的一部分或脱胎于文化人类学的一门独立学科。

文化学的概念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1871年,英国著名学者泰勒(Tyler)的名著《原始文化》问世,使"文化学"概念进入英语。现代文化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从事现代文化学理论体系研究的,首推美国人类学者克罗伯(Kroeber)。克罗伯认为(1952),对现代学术中的"文化"的概念,至少应从五个层面来研究:1. 文化包括行为的模式和指导行为的模式;2. 这种隐形或外显的模式都是后天习得的,学习的方法是通过人工构造的符号系统;3. 这些模式体现在人类的人工作品中,因而后者也属于文化;4. 文化的核心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价值系统;不同质的文化,可依其价值系统的不同而相区别;5. 文化系统既是限制人类活动方式的原因,又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因而在他看来,"文化科学"的对象就是分析和揭示文化系统中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模式、结构。在克罗伯的基础上,美国新进化论的主要代表怀特(White)的《文化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采用唯物史观的决定论方法分析文化的演化,进一步发展了许多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受到学术界重视,为现代文化学的兴起准备了理论条件。怀特也因此而被人誉为"文化学之父"。

奈达(Nida)首先把文化学列入翻译研究的相关学科中。巴斯内特(Bassnett)在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一文中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起,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研究者开始借助文化学中的概念

和观点研究翻译,并开始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Bassnett, Lefevere 1998)1976年在比利时勒芬召开的学术会议被西方许多学者认为是翻译研究派成立的历史性大会。1990年,由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Lefevere)合编的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0)一书出版,第一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方向,开始了翻译研究的又一次突破性进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领域的新学派——文化学派。在此书中,巴斯内特还提出了现在应该是文化研究向翻译研究转向的时候了。总之,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文化学)关系密切,互相促进,互为补充。

(郭建中)

比较文化学　comparative culturology

为对不同文化系统采取比较的方法研究其异同的文化学分支。它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跨文化性,即涉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民族以及不同种族之间各种文化要素及整体文化的比较分析。二是跨学科性,即从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诸方面,对不同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比较文化学既是文化学的一个主要分支,也是研究文化的一种独特方法。自19世纪人们开始从近代科学意义上研究文化以来,它始终是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多元文化论　multi-culturalism

原为西方文化学术语,对包含不同而相关文化传统与实践的社会予以的承认与研究;常与整个社会组合中不同族群的构成相联系。承认社会是多元文化的,需要有两个逻辑上的推论。第一,需要对某种文化具有单一性(unity)的通行假定进行反思。例如,对"英国人"的概念不得不进行修改,以顾及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亚洲人、非洲人、加勒比海人、中国人、中东人以及其他定居的族群群体。这种修改不具有"同化"这些群体的那种企图,因为同化的观念意味着这些群体将被改变成主流文化中难以区别的"成员",而并不对主流文化进行任何相应的调整。这是社会整合政策所需的效果,多元文化的研究将这种效果定为霸权性的。第二,多元文化需要对某种文化具有多重性或多样性的通行假定进行反思。仅仅承认存在着许多不同种类的人民与文化活动还是不够的,因为,它忽略了这些不同群体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多元文化的研究则试图从文化权力的强弱关系方面,而不是从多少带有异域传统的个案方面来说明不同的文化实践。

(郭建中)

文化定势　stereotype

指国家、民族、地区、群体、社团的整体式的文化取向。学者们常以地域、国家、民族的不同把文化宏观地划分为中国文化、美国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汉民族文化、英语民族文化等,把某一文化群体的每一个成员当作文化定势的代表,或当作整体文化的形象。的确,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人们通过教育和交际,确认、建立、维持和强化了各种文化身份,习得了不同的知识和交际文化。当人们长大成人时,就掌握了成套的在各种不同社会情景中与人交往或参与社会活动的形形色色的规则与规范。这就是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人们习得各种不同的群体文化、信仰文化、地域文化,以及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和角色关系,形成文化定势。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或在语言对比研究中,常把文化定势作为文化比较的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有效,但因忽视个性,有时也不免带来困惑。文化定势不是绝对不变的,翻译就是要为不同群体打开外界知识的窗口。正如鲁迅所说,"不懂的"东西"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转引自罗新璋 1984: 277)

文化背景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of cultural background

翻译不是在真空状态下发生的,它必然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依托一定的社会历史潮流和时代演进特点,服务于人类一定民族的物质生产与文明传播的任务。所有这一切就构成翻译过程中所谓的背景变量(background variable)。作为外部因素,这些背景变量往往是和翻译本身的内在因素,如特定翻译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和文本互动关系相比较而言的,同时也是通过这些内在关系而起到对于翻译的影响作用的。以科学研究的一般因果关系而论,背景变量属于独立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而内在因素则属于依赖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的不同认识,可以构成翻译研究中的各种工作假设。但是,翻译中的背景变量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可分析的。它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也不像在理论上那样认为起最终的、单向的决定作用。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流和交际活动,它发生在两种文化的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并以之为情境(situation)或语境(context),而情景和语境也是处于相对可变的态势之中,并要作用于人的心理的。这就要涉及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力量对比、跨文化的交流方式以及民族心理的或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等问题。这些因素在进行交互作用的时候,都是作为可变因素,即本来意义上的变量,而起作用的,因此,必须作为翻译批评研究的一部分加以个别的、独立的考察,以便获得一些基本的认识。参见"文化态势""互动方式"

(王宏印)

文化差异　cultural difference

指人们在不同的生态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语言、知识、信仰、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文化上的差异,尤其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了人们对同一事物或理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解释。例如,中国文化是群体取向的,讲求的是集

体主义,而西方文化是个体取向的,讲求的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是一种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哲学。而《现代汉语词典》(2005)对个人主义这个词的解释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观念,主张把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等价值及权利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极端自由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相违背的。"由此可见,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了 individualism 这个词在西方社会中是褒义词,而"个人主义"在汉语中有时为贬义词。又如,在用于哲学术语时,materialism 的意思是"唯物主义",而 idealism 的意思是"唯心主义"。由于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立场和观念的不同,在英语中,这两个词并无褒贬可言,而在汉语中,对唯物主义是肯定的,对唯心主义则是否定的。由于文化差异,翻译上常需采用变通的译法,如若把"我们不搞实用主义"误译为 We do not advocate pragmatism 定会给西方人以"中国不主张实事求是"的错觉,不妨译作 We do not base our policies on expediency.

文化适应　acculturation

指某一群体或个人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因与另一文化相接触而发生的顺向变化。原指外国文化对本国文化的影响,即外国文化进入本国文化,并与本国文化相融合。这是两种文化交流的结果。佛教融入儒学、汉字融入日文等,都是文化适应的例子。勒菲弗尔(Lefevere)在 *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ture: A Sourcebook* (1992b)一书中认为,从译者在原作的诗学与目的语文化的诗学之间作出的妥协,我们可以窥见文化适应的过程(the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也可无可辩驳地见证特定诗学权力影响程度。

文化迷惘症　culture shock

亦作"文化休克",指一个人进入另一文化环境时所产生的不适应、恐惧或不安全感。这种症状可以通过调适(adjustment)得到治愈。例如,当一个人移居国外时,开始可能有文化迷惘症,直至熟悉这个新的文化环境为止。

文化误读　cultural misreading

指译者在阅读时,因受本国文化的影响,习惯上按自己熟悉的文化来理解其他文化。文化误读往往造成误译。如汉语的"一个早春二月的日子"被译成 a day of February in early spring 或 an early spring day in February。在英国,公历二月尚值冬天,这里不宜出现 February。可简译为 a day in early spring 或 an early spring day 即可。又如将 She is a cat. 译成"她是一只猫"。而 cat 在英语中是魔鬼的化身,是中世纪巫婆的亲密伙伴,因此它是邪恶的象征。这句话应译成"她是个包藏祸心的女人"。可见,文化误读往往给译者带来负面影响。

文化素　cultureme

由弗米尔(Vermeer)在 *Translation Theory and Linguistics* (1983b)一文中提出的术语,诺德(Nord)在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中作了进一步阐释。弗米尔把文化特征(cultural features)称之为 cultureme,指的是一种文化中被本族成员认为有意义的社会现象,也是属于某一特定文化的社会现象,其形式可能不同,但功能相同(如亚洲一些国家的黄包车与出租汽车);或作用不同,形式相同(如在西班牙,喝茶主要是指头痛时喝草药茶)。文化特征只有在两种文化进行比较时才会显露出来。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某一社会现象只存在于某一特定的文化中,而是在进行比较的两种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中也可能存在。因此,翻译是文化的比较。外国的文化只有与自己的文化进行比较时才能看出异同,发现为该文化所专属的文化素。（郭建中）

文化缺省　cultural default

指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对双方共有的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从语言交际的角度看,缺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交际的效率。这个被缺省的成分虽然不在话语中出现,但却被特定的语境激活于话语接受者的记忆之中,于是话语中因缺省而留下的语义真空就会被接受者记忆中的文化知识参与而充填,从而不影响接受者连贯的语义理解。

然而,日常交际中这种普通得几乎让人难以察觉的交际策略,在翻译中却变得非常棘手。因为,由于文化的差异,原作者与原文读者之间的这种默契不可能天然地存在于原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这种缺省如果不经译者补偿,译文读者会难解语义疑团;而补偿过量又会损害原文的含蓄性和简洁美。缺省补偿要尽可能地不影响或少影响原文的语用目的和修辞效果。补偿的方法有:1. 直译加注;2. 意译;3. 归化;等等。

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

原是与"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相对的一个社会学的概念,首先是由布尔迪厄(Bourdieu)提出来的,此后被广泛应用于多种学科。其基本含义是指某个特定的社会中知识的种种表现形式、技艺和教育,以及一切能使个人在社会上取得较高地位和能有较高期望的有利条件。勒菲弗尔(Lefevere)在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一书中使用这一概念,是指个人在某个特定文化环境下所需要的一切知识;这些知识使其能被归属于一个"合适的阶层"。但勒菲弗尔进一步认为,这些知识是通过翻译得到调控和传播的。知识与文化资本的区别是:知识是从事职业工作所需要的,而文化资本是你在所生活的环境中能被归属于"合适的阶层"所需要的。

(Bassnett, Lefevere 1998: 42)

拥有文化资本,是一个人社会化过程的结果,这种社会化过程就是接受教育;而教育使你被自己的社会所接受。举例来说,在西方社会,即使你是一位原子物理学家,或者是其他学术领域中出色的专家,你得在社交场合在某些话题上能参与谈话,从15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Rambrandt)到当代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思(Philip Roth),从16世纪前叶的法国洛可可画家华托(Watteau)到20世纪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施泰因(Wittgenstein)你都要能谈上几句。当然,不同的时代,文化资本所包含的知识也会发生变化。文化资本也是个人文化程度和社会认可度的体现。文化资本是一种象征性资本,它的外化形式就是文化产品。作为文化资本的拥有者,在市场生产和交换环境下,他们本身就是社会普通生产者中的一员,这种定位也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社会表现。

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Bassnett) 把文本分为四种类型: 信息类、消遣类、劝说类和文化资本类。当然,每种文本都可能具有其他类型文本的因素。其中第四种是那些属于某个特定文化的文化资本或属于"世界文化"的文化资本。例如,17世纪英国小说家特罗洛普(Trollope)还不能说是属于世界的文化资本,只可以说是属于英国的文化资本;但莎士比亚的作品则既是英国的文化资本,也是世界的文化资本。属于文化资本的文本起初可能是属于其他三种文本中的一种、两种或甚至三者兼而有之。属于文化资本的文本,不管是提供知识的,还是提供消遣娱乐的,都是通过翻译传播、分配和调控的。这不仅在不同的文化之间进行,而且也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中进行。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认为,翻译研究就应该研究一种文明的文化资本如何翻译到另一种文明,研究文化资本是如何通过翻译传播的。 (郭建中)

文化资源 cultural resources

指包括文化遗产在内的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分为有形的或物质的文化资源与无形的文化资源两类。前者指以物质形式表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与事实。如各种考古学的遗迹与文物、人类创造的各类物品等。后者指没有物质载体的各种文化现象和事实,以及由物质载体所体现与反映的各种文化精神,如社会组织、语言特征、思想观念、心理特征、建筑风格等。此概念是在1966年美国国家历史文物保护法案通过后产生并逐渐流行起来的,主要用在文化管理、经济计划决策等领域,应用人类学对此有较多的研究。

文化接触 cultural contact

指两种文化互相影响的情形之一。它直接关系到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文化特质的相互采借和融合。如果文化接触是局部的或规模有限的,其表现形式可能就是文化丛和文化元素,如观念、风俗、物质对象等的单向或双向传播。如果文化接触是全面性的,就可能产生两种文化的融合。英国人类学家福蒂斯(Fortes)认为,对后一种情况来说,必须把文化接触视为是不同文化群之间的一种连续的互动过程,而不仅仅是文化元素从一个文化移到另一个文化之中。在英国之外,这后一种情形通常被称为文化涵化。翻译是文化接触的主要渠道之一。

文化密码 culture code

亦译作"文化符码"或"文化代码"。法裔美国人类学家(文化学者)拉帕耶(Rapaille)在他的《文化密码》(*Culture Code*)一书中指出,文化密码是指我们通过我们生长的文化,无意识地赋予任何东西的意义,比如一辆轿车、任何种类的食品、某种关系,甚至某个国家等。美国人看到轿车所想到的是身份,德国人想到的是工程技术。这是一个人所生长其中的文化给他留下的烙印。不同的文化给人留下的是不同的烙印。美国人有拓荒的文化记忆,法国人和德国人有战争和被占领的文化记忆。因此,人们赋予轿车的意义在无意识的层次上是不同的。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最根本的是人们所成长的世界不同,文化也不同。许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对同一个信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处理的方法也不同,或者说有不同的理解。美国人之所以是美国人,德国人之所以是德国人,或日本人之所以是日本人,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密码为他们"编制了不同的文化程序",犹如DNA为我们编制了不同的生理程序一样。拉帕耶为我们解开了深藏在我们语言和表情之后的无意识,即文化密码。这是一种文化中最强大的符号,是一种无声的原型系统,是行为方式的根本原因。根据哈蒂姆(Hatim)在 *Text Politeness: A Semiotic Regime for a More Interactive Pragmatics* 一文中的说法,文化密码能充分地为各种不同的制度和社会化进程服务。只有理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密码,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 (郭建中)

文化涵化 cultural acculturation

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接触、影响和发生变迁的过程。它是一种横向的变迁过程。文化涵化的前提是文化接触。通常在文化接触后,通过一段时间的相互影响,可使文化接触的双方都发生一定的变化,其结果一般有: 1. 接受,包括自愿接受的"顺涵化"(positive acculturation)和被迫接受的"逆涵化"(negative acculturation)及"对抗涵化",也包括单方面的与双方的互动。2. 适应,包括单方适应(文化同化)和双方适应(文化融合,文化互化)。3. 文化抗拒,包括单方面的文化抗拒和双方面的文化抗拒,这意味着文化涵化的失败。参见"文化融合""文化抗拒"

文化脚本 cultural script

指预先建立的关于文化准则、职责、法规和设想

等的人类生存体系。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一书中,把"文化脚本"定义为在某一文化中对人们所担当的某种角色所期望的、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行为模式。例如,17世纪的法国人对"国王"这一角色有非常固定的"文化脚本"这一脚本由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充分展现。(Lefevere 1992a/2004a: 89)

文化联想　cultural association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民族由于在生态环境、宗教信仰、民族风俗、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在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作用下,必然会产生词汇本身概念之上的不同的联想意义。这种联想意义与词义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可是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中它却能产生某种特定感觉。因此,词义的内涵也是不同的,联想意义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从社会文化视角看,同一指称概念的词语会产生附加在概念意义之上的不同的文化联想意义。词汇的联想意义体现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文化间的共性赋予词汇一致的联想意义,而文化间的个性则会导致不同的联想意义。例如,比较典型的是,不同民族的语言对颜色词、数词、动植物词等有不同的文化联想意义。英汉文化差异往往对词汇联想意义产生影响,从而导致语用交际失误。

词义的文化联想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两种文化中,某些词汇表面上指的是同一事物或概念,但是其联想意义却存在着差别或部分相同;二是同一词汇会让人联想到某些事物或概念的特征,但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们所产生的联想特征却迥然不同甚至相反;三是有些词汇为一种语言所独有,有丰富的联想意义,但在另一语言中没有对应词,造成词汇空缺。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要对两种语言中词汇的联想意义进行比较,探讨两种文化的意蕴及差异,翻译更是文化转换。英汉语言中大量词语在文化意义上的差异给翻译带来了障碍。对于英汉词汇的文化差异的翻译,大致采用以下五种模式:文化移植、文化阻断、文化诠释、文化融合和文化归化。参见"文化意义"

(郭建中)

文化替代　cultural substitution

1974年比克曼(Beekman)和卡洛(Callow)在其所著的 *Translating the Word of God* 一书中所用的术语,是《圣经》翻译中处理源语有而目的语无的事物的一种方法,其定义为:"用译入语文化中的所指事物来替代原语中不为译入语所知的事物。两项所指具有相同功能。"(Beekman, Callow 1974)他们认为,当某事或某物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词时,就要采用"文化替代"的方式。但需慎用:1. 不要用说教性的言词来替代历史;2. 选择最适合的而不仅仅是功能最明显的;3. 避免源语和目的语在功能上的冲突。

文化竞赛论　cultural contest

许渊冲提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文学翻译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译作和原作都可以比做绘画,所以译作不能只临摹原作,还要临摹原作所临摹的模特。""文学翻译的目的是成为使人'知之、好之、乐之'的翻译文学;也就是说,文学翻译不止是'传递信息'('知之'),还要使读者有兴趣('好之'),对读者有吸引力('乐之')。……翻译是竞赛,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两种不同的文字要表达同一内容,总有哪一种文字表达得好一点,哪一种差一点,或者两种文字不相上下的三种可能。无论哪种可能,在我看来,都是竞赛。我把表达得好一点叫'优势',差一点叫'劣势',不相上下叫'均势'。一般说来,出发语多占优势,目的语多占劣势,而'对等论'者却认为目的语和出发语不相上下,可以取得均势。西方文字之间差距比较小,做到'对等'或均势比较容易;中西文字之间差距比较大,做到'对等'或均势就不容易,有时甚至是不可能,所以我说要发挥译语优势。发挥译语优势,就是要用目的语最好的表达方式。"(许渊冲 1998)文化竞赛论在国内尚未得到普遍支持。

文化借用　cultural borrowing

赫维(Hervey)和希金斯(Higgins)在 *Thinking Translation: A Course in Translation Method: French to English* 一书中运用的术语。他们认为,在文化移植过程中,源语中的某些词语,由于在目的语中无法找到恰当的对应语,只能按字面意义逐词地移入目的语。借用的词语可能不作任何改变,也可能稍作改动,但其意义在目的语文本中必须明白无误。(Hervey, Higgins 1992)

文化移植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赫维(Hervey)和希金斯(Higgins)在 *Thinking Translation: A Course in Translation Method: French to English* 一书中运用的术语。用以表述"文化置换"的最高程度。在文化移植过程中,源语文化被目的语文化成分所替换,部分原文在目的语文化背景下重述。尽管这种方法有时会取得成功,但赫维和希金斯认为这不能被看做常规翻译。(Hervey, Higgins 1992)

文化置换　cultural transposition

赫维(Hervey)和希金斯(Higgins)认为,在原文文化译入目的语文化时,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偏离于直译,所有形式的文化移植都是替代直译。在作不同程度的文化移植时,都会优先考虑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而不是源语和源语文化。其结果是,译文只含有少量外国文化和有限的源语特色;译文更贴近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习惯。(Hervey, Higgins 1992)

文化意象　cultural imagery

指蕴涵文化意义的意象。在文学作品中,文化意

象渗透在言词之中,包含着广阔而深沉的内涵,往往传达出一种美的境界。文化意象是文学翻译中需要着力转换的。人们不仅要求译文优美流畅,更要求译文能尽可能地完整、准确地传达原作特有的文化意象。无论多么好的译文,如果失落了甚至歪曲了原文的文化意象,那就会使读者感到美中不足,有遗珠之憾,有时还会使读者产生错误的印象。例如,唐诗英译者特纳(Turner)在翻译被蘅塘退士誉为"千古丽句"的李白的诗句"烟花三月下扬州"时,把这句诗译为"Mid April mists and blossoms go,"而把原诗中"扬州"一词略去未译。英译者很可能以为此句中的"扬州"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名罢了,略去不译也许与诗意无大损害。(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考虑译诗押韵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翁显良指出:"殊不知'千古丽句'之丽正在于'烟花三月'春光最美之时,前往'扬州'这一花柳繁华之地,时与地二者缺一不可。""倘若他(指英译者)了解唐代扬州的盛况,听过但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故事,大概不会这样处理。"(翁显良1982)这里,"扬州"就是一个文化意象。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的笔下,"扬州"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它不仅代表一个风光旖旎的风景地,一个城市名,在古代中国文化这样一个上下文中,它更代表了一个古代中国文人所向往的享乐去处,一个令他们销魂的所在。文化意象的翻译大致有归化和异化之分。如把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归化为"穷得像叫花子";有人则主张保留原文的文化意象,译为"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又如"He is an old screw."不译成"他吝啬得像一只铁公鸡,一毛不拔",而代之以"他吝啬得像一枚起不动的螺丝钉",等等。认为后一种译法不但同样传达原文信息,而且还能引入新的形象,丰富汉语的文化意象。

文化模式 culture pattern

指一个文化中的文化特质或文化从按一定的内部关系构成的协调一致的体系。是一个社会的成员所普遍接受的,因而也是一种长期存在比较稳定的文化结构。本尼迪克特(Benedict)在《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中,把文化模式看成是一个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思想和行为的整体。她认为,这种模式是人类在可能的范围里,选择那些人们乐于接受的行为,而排斥与此相反的行为的结果。克罗伯(Kroeber)曾把文化模式分为四种类型:1. 普同模式,即所有的文化共同具有的特点;2. 系统模式,即由文化元素构成的系统或复合体,因其效用已得到证明而趋于持久稳定;3. 基本模式或全文化模式,这是一种文化的根本;4. 风俗模式,即一种能使文化目标得以达成的方法或态度。

文化融合 cultural fusion

文化调整的一种方式,指两个独立的文化体系通过长久的接触,互相借用、互相影响而大致达到接近的程度(通常较难以达到完全相同的地步)的现象。它一般发生在两个相关文化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文化融合的结果,可能产生第三种文化体系,而原来的两个文化体系随之消失,或成为新文化体系中的亚文化。如果两个相关文化中有一方为优势文化,则可能出现文化调整的另一种形式——同化(cultural assimilation)。

文化翻译 cultural translation

1. 着力于对文化内涵的准确转达,甚至基于本土文化视角的重新解释。即用一种语言表达的文化内容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忠实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所涉及的两种语言的掌握程度以及由这两种语言在内容表达上产生的细微差别。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当"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时,我们的注意力常常放在大量地引进外国(西方)文化上,研究的路子往往也是跟在西方学者之后,试图以牺牲本民族的文化特征来达到与西方学术界的单向度接轨,而未能达到与之进行交流和对话的地步,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与国际接轨了。而在当今这个时代,西方文化本身已出现了某种难以摆脱的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逐步认识到另一种文化(东方文化)的价值和精深内涵,因而弘扬东方文化并使之与西方文化得以进行平等的对话已成为翻译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任务。

2. 奈达(Nida)和泰伯(Taber)根据他们自己翻译《圣经》的切身体会把"文化翻译"定义为:"把原文的内容或者原文中明白无误的语言信息进行调整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翻译。"(Nida, Taber 1982: 201)换句话说,文化翻译是指当源语词语无法直接译入目的语时所作的补充,这些补充可能是完全异于源语文化的东西,也可能是一些有关源语的背景材料。

文化翻译学 cultranslatology

文化学、文化语言学与翻译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学科。翻译学是研究不同语言民族之间沟通思想、交流文化的科学,它的任务和目的决定了它必然列入交叉研究范围。翻译学和文化学一样,也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的多维模式。文化翻译学属基础翻译学。它的研究对象既是语言文化,又是翻译,是语言文化中的翻译问题和翻译中的语言文化问题的统一;它以语言文化为对象,但立足于翻译,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换言之,应当从文化的全方位,即从复杂而又处于动态多变过程中的整个文化场中考察语言翻译,发掘翻译中一切文化因素,并从翻译中反观文化。对文化翻译学的结构和体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构想:第一,属于文化翻译学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第二,属于文化翻译学实践方面的研究;第三,属于文化翻译学相关学科知识来源的研究。

在文化翻译学相关学科中最主要的是两门:一门是文化语言学,一门是跨文化交际学。文化翻译学

的研究方法可分为：1. 历史方法；2. 比较方法；3. 心理学方法。

综上所述，翻译离不开语言与文化。对语言来说，影响它的因素是多维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等。而这些因素也同样影响着两种语言的翻译。如果从文化视角透视语言，便形成"文化语言学"。同样，从社会视角透视语言，便形成"社会语言学"，等等。那么，如果从翻译视角透视文化与语言，便构成了"文化语言翻译学"，简称"文化翻译学"。（孙迎春 1999：126） （郭建中）

文化霸权 cultural hegemony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葛兰西（Gramsci）创用的术语，指不同的文化被某一集团或阶级所统治或控制，日常行为和共同的观念成了复杂的统治制度的基础。现在往往指代表美国文化的影视、快餐和商标压倒了其他国家中的传统文化。在翻译方面，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还表现为以大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影视、音乐和各种娱乐方式通过翻译输入其他国家，而自己则用透明的"归化"策略翻译其他国家的东西。

（袁良平）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指过去20年间日益增强的一种跨国流通与进程的综合运动，是世界范围运行的经济与文化网络加速与增长的过程。全球化与有关"世界文化"（World Culture）的争论密切相关，作为一个批判性概念出现在1980年代后期。"全球化文化"的兴起，在于跨国市场与跨国公司、传播与媒介技术以及对它们进行生产与消费的世界体系均出现重大的变动与发展。这个进程有别于"文化帝国主义"，它被理解为更具复杂性和总体性，而其结果不具多少组织性或可预见性。

对最近的某些研究者来说，全球化的文化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文化的大杂烩，可被视为后现代状态的一个显著方面。从这种观点看，20世纪末影响民族文化与经济结构的因素已发生决定性变化，国家的历史疆域与"安全"已不得不越来越面对国际化与全球化的整合这一现实。这些进程的结果，被表述为一种新的、独特的文化"空间"——全球——它侵蚀和动摇了古老的、既定的种种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有人认为，这些文化与认同由一种"全球-地方"的向度（global-local dimension）所取代，如今地域性的日常文化已无所不在地浸润着全球化的意味。这一进程的核心在于传播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出现，它们使世界范围的交易、旅行与互动变得更快，更密集，更相互依赖。这些进程与其他进程的快速发展及互相冲撞，以及它们对各种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冲击，为讨论与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需要密切关注的平台。文化与传播研究对这些全球性的变化予以认识与反应是非常重要的。

权力 power

指某些个体与团体能够借以支配他人，甚至面临反对与抵制也能贯彻和实现自身特殊目标与利益的手段。这个术语主要是指支配、控制与顺从的根源、方式与关系，就像它们在具体的社会进程与情景中获得的历史性展现。权力可能是纯粹强制性的，包括直接使用惩罚性的有形力量以实施与保持对他人的支配。权力也可能指对社会基本资源的级差式（differential）拥有与分布所产生的结果；这种资源既指物质方面的财产、财富、技术或原材料，也指诸如知识、书写文化、科学以及其他类型的文化资本等符号形态。尽管在其制度化与组织化的形式中，权力有时被认为局限在政治上的公共领域，但在互动的所有社会关系与时间中，在建构与划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权力都潜在地或实际地发挥作用或发生冲撞（play or contest）。在文化学派的术语中，翻译也受到目的语社会中权力的制约，包括政府、出版社和赞助人等的权力。

权力话语 power discourse

由当代法国思想家富科（Foucault）提出并加以阐发。富科把"话语"与"权力"结合在一起考察，认为社会制度、权力机制对话语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有形的权力（国家政权、军队、法律等）和无形的权力，如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宗教等交织成一个动态的权力关系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任何行动着的个人都是权力关系中不可分割的要素。富科提出"知识""权力""语言"三者构成"话语"。其中，"权力"是最根本的因素，影响和控制着"话语"运动，而真正的"权力"又通过话语来实现；"知识"则成为权力的表现形式。知识的"面貌"常掩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潜移默化的"政治"，特别是当它以话语形态呈现的时候。这正是富科关注的那种"微妙的、独特的、隐藏于个别之下的各种各样的痕迹"，它们以非政治姿态显示着"话语的秩序"，这秩序本身就是政治的痕迹。权力话语有扩散性和制约力。在翻译活动中，主体受原文作者和译者自身各自权力话语的双重制约。在不同的权力话语下，对于同一文本，作者和译者（或读者）的期待不同，感受不同，会有不同的阐发和诠释。从翻译史上看，译者的翻译思想、选材动因、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等无不与当时的权力话语密切相关。任何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与历史或现实的权力话语及政治都有内在联系。

双文化意识和实践 biculturalism and ambiculturalism

由迪尼（Deeney）（1995）提出的文化翻译术语。翻译不仅是双语转换的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交流的活动。根据文化学派的观点，翻译就是文化翻译（cultranslation）。因此，译者不仅需要具有双语转换的能力，而且必须具备双文化的态度和意识与双文化交流的实践能力。双文化意识（biculturalism）是要求译者必须具备双文化知识、态度、意识乃至感情、思维

和习惯。但这还不够,译者还必须具有双文化交流的实践能力(ambiculturalism)。ambi-不仅有"二""双"的意思,还具有"能力"的意思。 (郭建中)

后殖民主义 postcolonialism

是文化学与翻译研究相联系的热点之一。后殖民主义是研究不同集团、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权力关系的一般文化学方法。权力关系在语言、文学、翻译中都起着作用,传统上经常与过去的殖民地有关,但并非总是如此。(Hatim, Munday 2004: 106~107)尼兰贾娜(Niranjana)是当代最负盛名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之一。她于1992年出版《给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与殖民主义语境》一书。她呼吁后殖民地人民要正视问题的严重性,重新给翻译定位,把它当作一个抵抗和转化的场所。在这个基础上,尼兰贾娜对以前的翻译理论和民族学理论作了全面的批评,认为传统译论对原著忠实的观点,阻碍了翻译理论去思考译本的力量。人们没有注意到隐含在翻译中的权力关系。而"殖民话语活动的一个方式,就是建立现代与原始、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与野蛮、文化与自然等一系列对立,然后将它们'自然化'或者非历史化,其结果是把不同语言间存在的历史的不对称也自然化,直至理论家们能够轻松自如地谈论翻译中的'普遍原则'问题,将之确定下来、范畴化,然后,'不管涉及何种语言',都能用于文本-理论-文本的循环之中。"(转引自潘文国 2002)

异国情调 exoticism

赫维(Hervey)与希金斯(Higgins)(1992)将其界定为文化置换(cultural transposition)的最低程度。源文本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只作了很少改动或未经改动就转移到目的文本中,结果目的文本看起来就有一种明显的"外国"味。这可能是为了使目的文本对目的语读者更有吸引力,但这种做法对目的语读者产生了一种源语文本对源语读者所未有的影响,因为对源语读者来说,源文本决无外国情调(1992: 30)。

韦努蒂(Venuti)区分了"异化"与"异国情调"。他以英美翻译其他国家和犯罪小说为例加以说明。"我审视了最近的一些外国犯罪小说,我认为,这些犯罪小说的翻译,不是异化,而是带有异国情调(exoticizing),译文的效果是产生一种表面的差异,一般是涉及外国文化的一些特征,如地理、风俗、烹饪,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保留外国地名和人名,或一些古怪的外国词汇。英语译文并没有产生异化的效果,因为,这些译文并不质疑或颠覆英美文化中的价值观、信仰和语言的表达方式,更没有质疑或颠覆英美文化中犯罪小说的规范。"(Venuti 2008: 160)当然,他也谈到,也有一些犯罪小说的翻译,以巧妙的方法,突显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这些译作以其对犯罪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在形式和主题上的改变,取得了异化的效果。(Venuti 2008: 160)他以伯恩鲍姆(Birnbaum)的 *All She Was Worth* (1966)的译文为例说:"伯恩鲍姆的译文突显了形式和主题的差异,但其译文的易读性非常强。他的译文不是靠使用当今的标准方言,而是扩大了语言运用的范畴,涵盖了词汇和句法的各种通俗口语。"(Venuti 2008: 162)因此,韦努蒂认为,持异化策略主张的翻译家必须在目的语文学中,找到一些被忽视的或偏离的形式和主题的特征,以突显新的语言和文化的差异。(Venuti 2008: 153)

由此可见,仅仅保留外国地名、人名或地理历史和风俗习惯等文化特征,是肤浅的"异国情调"而已,不能算是"异化"。异化的概念,要深刻得多。

(郭建中)

往复翻译 back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s

一种文化反哺现象,也是近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种奇特的翻译现象。"近些年来,中、英文之间围绕中国传统典籍的'往复翻译',似乎成为某种值得注意的现象。这里所谓'往复翻译'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种典籍被翻译成英文,并附上了翻译者大量的注释,这些注释不仅涉及某些具体的历史知识、文化背景,更涉及作者对于典籍的理解与诠释,也常常会涉及典籍翻译本身,诸如说明此一段或此一句何以要如此翻译,等等。如果此一类著述再被翻译为中文刊行,差不多是经历了'中文→英文→中文'的往复循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则可以理解为两种语言之间的'往复翻译'"(安乐哲,罗思文 2003: 325)。

与其他翻译形式相比,往复翻译具有下面几个不可忽视的特点:首先,复译、重译、转译是同一文本的反复翻译,甚至是朝着不同方向的反复翻译,但不涉及对于这一文本的文化层面上的改编,而往复翻译却涉及对于文本进行大量的注释和说明,因而从学术看,添加的意义上具有往复翻译的独特价值。其次,顺译、逆译和回译涉及的是译者的语言能力和翻译习惯问题,更多关心的是文本本身翻译的难度和质量问题,而往复翻译则涉及对于文本的理解和阐释,更多关心的是原文的思想价值在跨文化层面上的认识和接受的变异与可能。对于中国文化本身而言,往复翻译具有文化反哺的意味和文化返销的意义。它的独特价值在于经过文化输出之后,中国典籍在异域文化中得到检验和评价,甚至经过重新改编和包装,再度返回本土,于是就有了文化上重新认同的价值。也就是说,有了在异质文化关照下的新的文化因素的介入和评价尺度的映照。所以,往复翻译的学术思想价值与文化运作方式别具一格,是其他文化介入途径所不能替代的。

有趣的是,往复翻译中典籍正文的"还原"是百分之百意义上的回译,是完全返回原作语言状态而无须任何加工、也不允许有任何哪怕是字面上的改动的回译,即"原文复现"。余下的问题只是要翻译原译中增加的部分,例如注释和疏解,也就是文本(text)以外的副文本(subtext)。而这一部分,正是原译在翻译以外的创造,或曰创造性阐释。它的翻译回来,是一种

文化的输入,体现的是西方主流文化以外的另一种西方文化,即对于汉语和汉学的西方文化眼光的关注或关注视野,也就是所谓西方汉学的学术与评价视野。传统文化在经过自己的典籍输出和评价之后,进入了一个异域的和现代化的新视野,使得这一部分国粹不再是古董,而是活了起来,成为可以转化为现代精神的那一部分文化产品和普遍的价值来源,为本民族和全人类所共同享用。参见"回译" (王宏印)

语言国情 cultural background of a language

指语言中的文化因素与操该语言的民族所在国的国情的联系。语言国情学的代表作之一,维列夏金(Верещакин)和科斯托马罗夫(Костомаров)合著(1973)的《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把语言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痕迹和文化因素归纳为七类:1. 无等值词;2. 有背景意义的词;3. 有文化感情色彩的词;4. 成语典故;5. 名言警句;6. 客套用语;7. 非有声语言。翻译是一种语言的、文化的转换活动,翻译中传达源语的国情内容,是译者的重要而艰难的任务。例如:虎妞很高兴,她张罗着煮元宵,包饺子……Tigress was in high spirits. She bustled about boiling *sugar-filled glutinous rice ball for the festival*, as well as *ravioli*. 这一译例中,"元宵"的译文过于冗赘,而"饺子"的译文又变成了意大利语中"有馅小包子的总称",完全失去了中国的民族特征。表示食品、乐器、度量衡单位和货币等民族特有事物的名词,一般采用音译的方法比较好。因为这些事物民族色彩很浓,有一种不可取代性,音译可二者兼得。正如西方食物 salad 译为"色拉",sandwich 译为"三明治"一样,用字少,使用方便。参见"语言国情学" (文晔)

症状阅读 symptomatic reading

文艺学术语,把对精神分析对象的话语分析方法用于对文本的解读,将连贯一致的文本中的断裂(rifts)、不连续性(discontinuities)和旁注(marginalia)视为一种症状,并通过揭示某种被压制的或潜在的内容而对其加以解释。韦努蒂(Venuti)将这一概念引入译学研究领域,试图改变阅读译文的方式,并揭示了这种翻译阅读方式如何参与文化的演进。症状阅读把文本中的不连续性定位在措词、句法或话语的层面上,揭示了翻译对目的语文化的策略性干预的重要手段,即对外国文本的暴力重写,这种阅读译文的方法可以看做通过展现断裂来使归化翻译陌生化或异化,它对于揭开当代英语翻译透明性错觉的神秘面纱也是有益的。韦努蒂认为,将症状阅读引入翻译学,就是要把精确性的典律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赋予其历史意义(historicize),以揭示翻译中的民族主义的暴力和利己本质。(封一函 2006) (贺显斌)

惯例 conventions

指特别场合下的标准,诺德(Nord)在 *Skopos, Loyalty, and Translational Conventions* 一文中使用的术语。她认为,如其他社会行为一样,翻译必然受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三类:规则、标准和惯例。惯例没有明确的程式和规范,只是依赖普通常识和共同期待而存在。任何翻译活动都必然涉及三种惯例:源语文化的、目的语文化的和翻译过程本身的。(Nord 1991)

跨文化 cross-culture

指一种注重文化活动之相对性的比较分析。这种方法始于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旨在将特殊研究对象与其他文化的视角进行对比。于是,就有婚姻礼仪的跨文化研究、亲属关系的跨文化研究、视觉错觉的跨文化研究等。

事实证明,对专注于社会规范、价值、规则与角色之相对基础的研究者来说,跨文化分析十分通行。以分析异端行为为例,如下这点就值得注意:在某种文化中可能是不可接受的,在另外的文化中则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一旦意识到研究者个人的文化视角会干扰对某个"异己"群体的观察与分析时,就会出现重大困难。当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语言明显不同之际,这个问题就尤为突出。 (郭建中)

跨文化合作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赫尔兹-曼塔里(Holz-Mänttäri)1984 年提出的取代 translation(翻译)的一个术语,首先由诺德(Nord)在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一书中译成英语。其德文原文如直译成英语是 translatorial action(译者行动)。赫尔兹-曼塔里从翻译的功能理论出发,把翻译看做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其终端产品应能在特定情景下和应用语境下起到相应的作用。文本比较或语言比较都不适用于这一关于"翻译"的观念,翻译被看做专业人员(专家)和客户之间合作的互动。以把某个机器的英文操作说明书翻译成德文为例,译者接到的英文文本充满错误(也许译自日文)。为了生成一个有用的文本,也为了不让客户认为译者无能,译者请工程师告诉他该机器的操作方法,然后根据德语机器操作说明书的规范用德语写出来。这样,德语客户获得了有用的操作说明,他会感到满意。问题是,在诺德看来,这不是翻译,而是一种跨文化合作。在这种跨文化合作中,文化障碍确实是克服了,但这不是基于原文基础上的翻译。但赫尔兹-曼塔里认为,跨文化合作是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翻译专家执行"翻译"这一概念的行动;另一方面是为了客户、译者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客户+翻译专家"的一种合作模式。因此取"译者行动"(translatorial action)这一术语。

(郭建中)

跨文化传播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亦译作"跨文化交际",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共同体的文化或亚文化之间的传播和沟通。

它是当代西方传播学和文化学研究者最为重视的研究领域之一，主要运用传播学和文化学的一般原理研究横向的文化传播问题。文化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关心的是文化的纵向传播问题。文化传播的主体、传播的媒介、传播中的文化冲突、传播内容的选择与变异、稳定与非稳定、完全与非完全传播，等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 （郭建中）

跨文化研究 cross-cultural study

指对不同国家的有关文化、历史、哲学思想进行研究，也可指对某一个民间传说在各民族文化中不同表现形式进行对比研究。从翻译学和语言学的角度，人们着重研究与交际有关的跨文化现象，尤其是词汇研究、语用研究、非语言交际研究、交往习俗研究、社会心理研究、价值观念研究等方面。而从篇章、文体、谚语、成语、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跨文化交际研究是解决翻译中许多问题的途径。

跨文化意识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指跨文化交际中参与者对文化因素的敏感性认知，通常分四个层次：一是对那些被认作是怪异的表面文化现象的认知，二是对那些与母语文化相反而又被认为是不可思议又缺乏理念的显著的文化特征的认知，三是通过理性分析从而取得对文化特征的认知，四是从异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感知异文化。（Harvey 1979）其中，第四个层次是跨文化意识的最高境界，要求参与者具备“移情”和“文化融入”的本领。译者具备这种意识就可以把握翻译尺度且不受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在交际的发生过程中，这种意识会对译者有警示和指导作用；在无具体交际事务时，它仍然能够对译者的学习和思考起引导作用。跨文化意识的有无或程度强弱将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质量。

翻译文化 translation culture

这一术语来自德语 Übersetzungskultur，由哥廷根学派创立，用来描述目的语系统中制约翻译的那些文化规范。皮姆（Pym）在他的《翻译理论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Theory*）中用示意图表示了翻译文化的地位及与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关系，即：文化1—译者—文化2，这里，译者在两大文化之间活动，他不仅是不同文化的搭桥人，而且是文化1和文化2之间交互文化的滋生者和运作者。这种交互文化即翻译文化，它既不同于文化1，又不同于文化2，但又跟两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译者翻译活动的产物也就是翻译文化的产物。

翻译文化史 cultur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主要研究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目的语文化）的意义和影响，它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特别是在通过翻译摄取外域文化精华时，翻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发生什么样的变异。翻译文化史是翻译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结合，通过对历史上翻译活动的考察，研究不同文化接触中的种种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社会、语言、文学的变化，并探究它们在思想文化发展上的意义。（王克非 1997）

翻译的政治 translation politics

指翻译中涉及的权力关系和各种调控策略，涉及一系列深层的文化问题，包括对原作的改写、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翻译与殖民主义者的“暴力”、特定语境下意识形态对原作的“强暴”以及译作的生产和流通，等等。欧洲学者温特（Winter）1961年发表的《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Translation as Political Action*）可视为最早论及“翻译的政治”的文章；多伦（Doron）与罗斯（Rose）1981年发表《翻译的经济与政治》（*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ranslation*）一文，对翻译出版市场的政治作了简单的分析；来自孟加拉国的斯皮瓦克（Spivak）1993年在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翻译的政治）之命题，并对其内涵、外延及产生的语境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将它置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视角中予以考察，对其中蕴含的权力问题作了深刻的讨论。（费小平 2005：133～134）

通常，翻译的政治的含义还包括：1. 翻译对目的语文化及社会所造成的冲击，或由翻译引起的文化潮流和思想运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变化；2. 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翻译中有意无意地造成偏见或偏差，或是权力话语和话语霸权的产物；3. 翻译活动受到现实政治气候和个人政治倾向的制约；翻译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内部，政治是经济基础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因而对包括翻译在内的其他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最为强烈，因为政治需要可以对目的语注入新的意义；在政治开明、思潮纷繁、广开言路的时期，翻译活动就比较繁荣，在文字狱盛行、思想受禁锢的时期，翻译活动就处于低潮。翻译的政治还表现为对译本的政治倾向、语言风格的选择。“五四”时期的重要文学社团由“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引发的关于翻译的功用、目的的论争，其中含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贺显斌，蓝春）

翻译的暴力 violence of translation

指翻译活动对原作以及源语和目的语文化所施加的巨大影响。该说法始于法国作家雨果（Hugo），他在1865年为儿子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译本写序时指出，当你为一个国家提供译作时，这个国家差不多肯定会把它视为针对自己的暴力行为（act of violence）。韦努蒂（Venuti）（1995）极大地发展了这一概念，认为暴力蕴涵于翻译目的和翻译活动之中。翻

译是为了将文化的他者带回来，使之成为相同和相识的东西，因而很容易将外国文本完全归化，成为挪用外国文化为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服务的手段。翻译活动是按照目的语价值重构外国文本，总是会留下目的语文化的印记。翻译的暴力也体现在译作的社会文化效应上。翻译具有加深种族歧视、促使地缘政治冲突和战争升级的潜在可能性，也能借用外国文本确认或超越目的语文化价值和体制限制。翻译所实施的暴力一部分是翻译过程本身所固有的，是不可避免的；另一部分则是潜在的，在译作的生产和接受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翻译暴力发生的程度和方向，文学自由译者是可以作出选择的。归化法是本族中心主义的，而异化法抑制翻译的种族中心主义暴力，因而是理想的译法，能对当今国际事务进行文化干预，反对英语霸权和不平等的文化交流。韦努蒂称，撰写《译者隐形史》一书的根本目的，是使译者和读者反思翻译的种族中心主义暴力（Venuti 1995/2008：41）。

（贺显斌）

弱势文化　weak culture

与“强势文化”相对，常指“弱小民族”的文化。参见“强势文化”

强势文化　strong culture

常指西方文化，与“弱势文化”相对。由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本身的原因，如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力量强弱以及文化本身的因素等，使得不同文化的地位也不尽相同，有些处于强势地位，另有一些就处于弱势地位，这就有可能导致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强势文化”“弱势文化”之类的术语在来源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影响，由此引起的一些认识上的混乱也需要予以学术思想的澄清。

所谓强势文化，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三种或至少两种，否则不能视为强势文化：1. 历史渊源(heritage)：历史渊源必须源远流长，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资源，保证了一种文化的气脉生动有力和影响持久深远，例如印度文明、希罗西欧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传统的文明。2. 综合实力(power)：在当下的交际和交流过程中显示出强盛的综合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例如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所产生的近代文明影响，使其在世界事务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和积极态势，以及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重大影响。3. 心理认同(identity)：处于交往状态的主体在文化心理上要有明确的认同感和较强的凝聚力，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信念系统抱有信心，同时也要能够尊重他人的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与交际方式等。以上三个概念应当结合起来统一认识，则可以在理论上避免许多误解。例如，不能不加思考地把中华文化一概视为弱势文化，在概念上和所谓西方的强势文化相对应；也不能在试图说明中西文化交流问题时，总是企图得出西方学者所期望的结论，或者努力使得自己的论证符合西方人的交往理论模式。参见“文化态势”

（王宏印，贺显斌）

22. 翻译教学

翻译教学　translation teaching

指为满足对翻译人才的特定需求，以塑造与之相应的翻译观念和培养必需的翻译技能为目的的教学活动。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教学包括口译教学和笔译教学。由于现实需要，大部分翻译教学是笔译教学，所以一般也将笔译教学作为翻译教学的默认理解，由此出现将翻译教学和口译教学并列的提法。同样，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翻译教学包括翻译的实践、实务和理论教学，但由于现实中大部分翻译教学是培养翻译实践能力的教学，因此一般也将翻译教学粗略地理解为翻译实践的教学，而将翻译理论教学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提出。

我国目前的翻译教学包括多种类型、多种层次。出于不同的人才需求，每种类型和层次的教学任务、培养目标直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不尽相同，主要体现在相应的教学大纲中。这些类型可以归纳为：1. 高校翻译专业的翻译教学；2. 高校外语专业的翻译教学；3. 高校其他专业在大学外语课中的翻译教学；4. 非学历教育中的翻译教学，包括以培训班、进修班、夜校等形式进行的继续教育和业余教育中的翻译教学。多种层次指从本科、硕博士研究生以及非学历的进修生等各个教学层次上的翻译教学。广义而言，翻译教学的类型和层次各自呈现为一个由典型特征向外延发散开的连续体，居于边缘的类型和层次逐渐进入另一范畴。翻译教学的典型特征是以翻译课为主要形式的翻译实践教学，教学重心是培养必需的翻译技能和塑造正确的翻译观念。

对翻译教学的定义经历了一个过程。我国此前影响较大的两部翻译(学)辞典(林煌天 1997；方梦之 2004)和一些翻译教学专著中，对“翻译教学”都没有直接定义，而是径直描述与其相关的内涵，即间接定义。如：“现代社会的翻译教学是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活动的结合。”(方梦之 2004：343)又如：“翻译教学(包括翻译实务教学和翻译理论教学)的核心任务可以总括为：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和强化学生对翻译的认知，这也是翻译学素质教育的基本目标。”(刘宓庆 2003：30～31)

促使翻译界关注“翻译教学”定义的，主要是对翻译教学内涵的不同理解引发的一些讨论或争论，尤其是围绕翻译教学和教学翻译这两个概念的讨论。

最早对这两个概念作出区别的是两位法国释意学派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育家，德利尔(Delisle)和塞

莱丝柯维奇(Seleskovitch)。1978年,德利尔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要把翻译教学与为了学习语言而"作为教学练习的翻译"即学校翻译或教学翻译区别开来(参见"教学翻译"),并于1981年将这一观点正式发表。(参阅罗选民 2002)这部论文的理论部分由孙慧双译成汉语,以《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法》为书名于1988年在我国出版,有关论述见该书第24~26页。塞莱丝柯维奇则是在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国际译协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中提出了"是以翻译为媒介进行语言教学,还是以语言教学为媒介进行翻译教学"这个区别性的问题,指出有必要"对以翻译为媒介的语言教学和我们所讲的翻译教学加以严格区别"。这篇发言题为《语言教学中的翻译问题》,由刘和平译成汉语,发表于1990年第3期《语言教学与研究》。

有关这一区别的主张引进我国之后,因其有助于更为深入、准确地理解翻译教学的内涵而很快引起注意,并得到了许多支持(张美芳 2001:18~20)。张美芳同时指出,其实我国学者也作过类似的区分,最早如张培基等编著的《英汉翻译教程》(1980)中就提出"作为教学手段的英汉翻译与一门独立开设的英汉翻译课有迥然不同的性质和任务。"(张培基 1980:338)又如刘宓庆最早于1984年,后于2003年在他的著作中区分了"作为基本功训练组成部分的翻译教学"和"作为专业技能训练的翻译教学"。概括起来,两者的区别在于,翻译教学是以翻译(观念、技能和实务)为教学目的,教学翻译是以翻译为(外语)教学手段。

我国学者对两者区分所持的不同意见包括:其一,如刘宓庆虽然作了如上区分,但认为两者还都是属于翻译教学;其二,认为这一区分过于关注专业翻译和职业翻译,忽视了覆盖面更广因而更具有重要意义的非专业翻译教学活动(罗选民 2002);其三,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截然分开,应关注其间的联系或具有共性的内涵,特别是语言能力与翻译能力的密切关系(庄智象 2007:72~77)。

我国的翻译教学最早应是起于佛经翻译时期的群体性翻译活动。东晋至隋这一时期(公元4至7世纪),在苻坚、姚兴组织的佛经译场中,即有了对翻译的集体研讨;唐代玄奘主持译场时,培养了一些优秀的翻译人才,在后来的翻译活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种通过群体性翻译活动培养人才的做法至今仍可以见到,如20世纪70年代我国几所外语院校集体承担的联合国资料翻译任务即具有这一性质。(马祖毅 1998:55~58),我国最早的外语学校是元代的"回回国子学"(1289年),后经明朝的"四夷馆"(1426年)、清初的"俄罗斯文馆"(1708年)直至晚清的"京师同文馆"(1862年),这些早期外语教学机构设立的初衷主要都是为了培养翻译人才,由此形成近代以来我国翻译人才培养的主流模式,即正规的外语专业学习之后,再经培训或直接参与实践,在实践中学习、锻炼,直至成才。(付克 1986:6~13)参见"翻译专业""翻译课"

(杨晓荣)

三步教学法 the three-step teaching methodology

喻云根提出,翻译教学可先开设英汉翻译课,然后再开设汉英翻译课。他在《翻译、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中提出采用"点题-译例引申理论-错例分析"的步骤组织翻译教学。主张教师通过点题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一系列结合单元材料的译例上去,然后通过少而精的分析启迪学生,产生教学效果。他主张以"教师讲解为主导,学生实践为主体"的两主和谐原则。其具体的三步翻译教学法指的是:启发、讲授、练习相结合的方法,完成整个翻译教学的全过程。(喻云根 1990)

(王宏印)

近代翻译法 modern translation method

20世纪50年代后,翻译法学家吸取了语言学、心理学及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总结了外语教学的新经验,将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发展而成。近代翻译法遵循以下教学原则:1. 按圆周式排列方式,以课文为中心,将语音、语法、词汇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2. 阅读领先,着重培养阅读和翻译能力,同时兼顾听说训练。不排斥口语训练,但口语练习必须在阅读、理解、翻译等具有一定语料的基础上进行;3. 以语法为主,在语法理论指导下读译课文;4. 依靠母语,把翻译既当成教学手段,又当作教学目的,以期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

近代翻译法将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等语言的各个层面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摒弃了那种将语言的三要素割裂开来的单项教学模式。此外,在以阅读为主及注重语法的前提下,注意培养学生的听说和写作能力,使语法知识和在阅读中所获得的语料为听、说、写等其他几项技能服务,从而将这几项语言技能的培养和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由于翻译法是用母语来转换另外一种语言编码,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各类信息在理解语言中有很大作用,也就是说,翻译法可触动储存在读者记忆中的母语背景知识,从而产生丰富的同类联想。因此,如果学生背景知识丰富,使用翻译法可促进学生的阅读速度并能准确地获取原文信息。通过使用翻译法,学生自觉地比较外汉语言的特征,从语言结构、遣词造句到文学修辞、写作方法等各方面的对比研究中,增强学生的语言知识,提高对文章的理解力及鉴赏力。通过比较,学生也可了解到哪些词、句可做等值翻译,什么可增,什么可减,充分掌握外汉语中词法与句法的相同与差异。然而,近代翻译法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说,这一方法较重理论,轻实践,注重传授语言知识,忽略了语言技能的培养,夸大了语法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机械地、有控制地操练语言结构,但无法保证在实际情景中能准确地运用这些结构。

语法翻译法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指以翻译和语法为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的主要内容的传统方法。这原是教拉丁语、希腊语的传统方法,

直至今天,仍有很多国家采用它。此法以语法规则的讲解和练习、课文的逐句分析和翻译操练为中心。它特别重视阅读能力的提高。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我国外语教学主要采用此法,随后有听说领先法、交际教学法等的兴起,目前此法的单独使用已很少。

翻译工作坊　translation workshop

是一种组织翻译教学的形式,首先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由基勒(Keeley)在艾奥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组织实施,旨在提供一个平台,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中向学员介绍新的译作,师生共同探讨翻译过程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正确理解源语文本(Gentzler 1993: 7～18)。在英国,翻译工作坊呈现出新的特点,即模拟或"建构"了社会上翻译公司实际翻译流程的各个环节,其中教师扮演翻译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源语文本提供者、目的语文本接受者和翻译行为指导者等多重角色;而学生则是目的语文本的制作者。

在我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院校也有采用翻译工作坊这种教学形式的,这是以提高实践技能为主、兼顾翻译理论的实用型课程组织。课程开始前,将政府机关或有关单位委译的材料以作业的形式布置给学生,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上交,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学生的译文由任课教师和外籍专家审定后,交付委托人。

翻译工作坊采用开放式教学思路,集思广益,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可按照自愿的原则建立协作小组。先独自翻译,再互相交流,博采众长。教师一般也亲自翻译,拿出参考译文,利用多媒体,师生的译文同现,进行比对和讲评。所以工作坊一般要经历学生分头翻译、小组讨论、课堂展示、教师讲评和译文审定等几个程序。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发起者兼组织者(教师)与译者(学生)之间有一个不断协商、调解与妥协的过程,由此体现了建构主义"随机进入教学"(random access instruction)的原则和"发现学习"的原理,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究的态度,养成推理和预测的习惯以及提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蓝春)

翻译专业　translation major

就教学体制而言,模糊意义上的翻译专业指的是以翻译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培养口笔译人才或翻译研究人才为教学目标的专业或专业方向,可以作为笼统的名称,也可以体现在教学机构的名称上;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专业还应经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正式批准开设并以"翻译"命名,主要体现在招生目录和学科名录中。

我国的翻译人才培养历来主要是依托高校外语专业的教学体制。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教育逐渐规范化,同时对翻译人才的社会需求急剧增长,翻译教学的专业意识开始萌发,在教学体制上主要体现为在相应的外语语种专业之下将翻译设为一个专业方向,比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方向。这种以专业方向的方式培养翻译和翻译研究人才的做法在翻译专业正式设立之后仍然延续,而且始终是一种重要的翻译人才培养途径。

1979 年,我国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初创名称为"翻译理论与实践",首批招生院校为北京外贸学院和上海海运学院。1986 年,国务院批准了以这一名称命名的硕士点,首批院校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上海海运学院。2003 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置"翻译学"专业并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由此成为我国内地可以颁发"翻译学"博士和硕士学位的第一所院校。2006 年,教育部批准设置四年制全日制本科"翻译"专业,首批获准院校为复旦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在非学历翻译专业教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2007 年 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以培养应用型高级翻译人才为特点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首批试点单位为北京大学等 15 所高等院校。至此,中国大陆高等教育体制中的翻译专业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从本科到研究生、从学术型到应用型、从学历教育到非学历教育的比较完整的教学体系。

1994 年 6 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联合国译员训练部改称为高级翻译学院,成为我国大陆第一所以翻译命名的院系。其后十几年里,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许多院校相继设立了翻译系、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或中心),标志着翻译专业在教学组织机构意义上也已经建立起来。

由于地缘和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高校中开设翻译专业、建立翻译系(所)的时间比较早,反映出对社会需求的及时应对。1972 年,香港中文大学创立了翻译系和翻译研究中心,这是香港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全日制本科翻译专业系科,至今已设有从学士到博士的全套课程。台湾地区最早设立翻译系(所)的是私立辅仁大学,该校外国语文学院翻译研究所建于 1987 年,次年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见"翻译教学""翻译专业硕士"

(杨晓荣)

翻译问题的功能层级　functional hierarchy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诺德(Nord)(1997: 67)论述功能理论应用于译员培训时提出。在传统的翻译课堂中,翻译一般采取自下而上的处理方法,也就是从语篇的表面结构开始(步骤一),然后到常规(步骤二),最后到语用(步骤三)。这样容易使学生寻求词汇和句法对等的语码转换,会带来语言干扰和错误,并且忽略文本作为一个整体在目标交际语境中应有的作用。因此诺德提出,在功能翻译中,翻译问题的处理应该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即是说,功能翻译应该从语用的层面开始,先决定翻译的目标功能(即: 是文献型翻译还是工具型翻译),然后将原文中需要照原样重现的功能和那些

必须根据接受者的背景知识、心理期待、交际需要、媒介条件以及指示需求等因素进行调整的内容区分开。翻译类型决定译文在风格上应该与源语文化还是与目的语文化常规保持一致，之后如有必要，再考虑语言系统的差异问题，最终根据上下文选择翻译问题的解决方法。译者的个人取向在不太样式化或具有文学性的文本中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因素。（Nord 1997：67～68） （胡文雯）

翻译学位 translation degree

指完成某个层次的翻译专业学习之后由院校颁发的相应证书。1980年2月12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于1981年1月1日起实施，我国自此正式开始实行酝酿了多年的学位制度，实行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

依托高校外语专业培养的翻译人才所获得的是相应的外语专业学位，按语言类专业所属学科门类，一般是文学学位。1979年起，我国开始有了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1986年开始设立"翻译理论与实践"硕士点，但所授予的学位仍然都是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允许部分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在一级学科的范围内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自主设置学科专业，仅报国务院学位办备案即可，上海外国语大学随即于2003年按这一方式设置了"翻译学"专业，具备了颁发"翻译学"博士和硕士学位的资格。2006年，教育部批准设置四年制本科"翻译"专业，首批三所院校，规定学位授予门类仍为"文学"。

为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我国1990年仿效国外的做法设置了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随后又设置了几个类似性质的专业学位。1996年7月，国务院学位办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布了《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正式开始设立可以用脱产、半脱产甚至不脱产方式完成学业、具有鲜明的职业导向、以培养应用能力为特色的专业硕士学位。2007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通过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MTI），首批获准试点院校15所，其中9所院校同时获得笔译和口译两个方向的学位授予权。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导向，重点培养学生的口笔译实践能力，对于师资队伍以及教学硬件设施均有较高要求，培养目标是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参见"翻译专业""翻译专业硕士" （杨晓荣）

翻译实务教学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

翻译实务指与翻译业务和翻译职业相关的所有知识：处理翻译难题的常识、处理翻译业务的方法、职业道德、有关法规和口笔译辅助设备等。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实务可以与翻译实践相对：翻译实践（translation practice）指具体的翻译操作，涉及的是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翻译原则、翻译观念等。也有人将翻译实践和翻译实务统称为翻译实务，与翻译理论相对。对翻译实务的掌握也是口笔译人员必备的素质，因此也是翻译教学的重要内容，教学方法包括讲授和实习。 （杨晓荣）

翻译教材 translation textbook

指以培养和提高翻译技能为主旨、有较为清晰的以教学为导向的编撰线索、用于翻译课教学的教程。一般指翻译实践类教程，教学过程中常辅以随时更新的练习材料。高质量的翻译教材应具有如下特点：1. 在选材、难度、编排等各方面适应相应的教学需要；2. 体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良好结合，具有启发性和引导性；3. 教材主线和内容的安排合理，符合翻译教学规律；4. 编撰理念体现翻译研究的成熟结果和最新成果。

我国晚唐（约公元8～9世纪）僧人义净曾编写梵汉对照读本供学习梵语之用。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外语教材兼翻译教材了。进入现代以来，20世纪上半叶，一些开设翻译课程的院校主要采用自编的教材，其中也有正式出版的，如1927年出版的蒋翼振著《翻译学通论》，即为作者在一所中学教翻译课所用的教材。1958年，我国才有了第一部完整、正规的翻译教材，即陆殿扬用英文写成的《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由北京时代出版社出版。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唯一一部公开出版的翻译教程，其影响之大，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部书成为此后30年我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大部分翻译论著的楷模（张美芳 2001：2）。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才又有了两部规范的翻译教材，这就是国家教育部委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为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编写、由张培基等编著的《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和与之配套、委托西安外国语学院编写、由吕瑞昌等编著的《汉英翻译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这两部书同样具有奠基意义，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西方翻译史上翻译教学普遍开展起来是在二战以后，翻译教材种类很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较有影响的如美国学者鲁宾逊（Robinson）的 *Becoming a Translator: An Accelerated Course*（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特点是以翻译活动为中心，从翻译使用者、译者、翻译过程、翻译中的问题等几个角度展开，兼具传统和现代要素。近年来我国引进的原版翻译研究类书籍中，有两部正规的翻译教材：一部是英国学者贝克（Baker）的《换言之：翻译教程》（*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Routledge，1992），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引进，主要特点是以语言学统领下的对等观念贯串全书；另一部是英国学者纽马克（Newmark）的《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Prentice Hall，1988），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引进，同样以语

言学理论为基础,但更富有经验色彩。 （杨晓荣）

翻译课 translation course

指为达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帮助其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念、使其具备基本的翻译素质这一教学目的而开设的课程。翻译课的具体任务是在翻译教学理论的指导下,向学生传授基本的翻译理论和常用的翻译方法、技巧以及译者必须了解的专业常识,并让学生通过反复实践获得较扎实的翻译技能。

翻译课的课型和内容依授课对象和授课层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总体来说,我国的翻译课可以分为口译和笔译两大类。笔译课中,可以把外译汉和汉译外分开作为两门课,也可以把两者合为一门课。

狭义的翻译课是以翻译实践为主的课,广义的翻译课可以泛指所有与翻译有关的课程。比如,翻译专业的课程和外语专业翻译方向研究生的课程就可以分得更细一些,如文学翻译、科技翻译、译作赏析、计算机和网络辅助翻译等;还可以包括一些稍具理论性的课,如汉外语言(文化)对比、翻译理论与翻译史等。

（杨晓荣,林夕）

翻译测试 translation test

是翻译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衡量教学质量、评价学生翻译能力和水平的有效手段。根据不同层次,采用不同题型、掌握试题的难度和信度。翻译测试是翻译教学的组成部分。试题分主观题和客观题两种。主观题如词组翻译、翻译填空、单句翻译(或段内单句选译)、段落篇章翻译、改错、译文评析等,客观题如正误判断、译文选择以及翻译知识的多项选择等。应该指出,国内翻译测试中客观题比重有增长的趋势。

扩大地说,有的翻译测试超过翻译教学的范围,如课程入学甄别、翻译等级考试、评核专业资格等。

翻译培训 translator training; interpreter training

一种非学历翻译教学活动,具有如下特点: 1. 以比较具体的市场或社会需求为导向,体现较强的针对性和职业性,即“专”;2. 教学目标一般为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提高学员的实际翻译技能,即“短”。因此,翻译培训的教学方法也体现短期高强度训练这一特点,执教者一般都有丰富的翻译(口、笔译)经验,具有较强的教学和指导能力,教学内容一般集中于某个方面的知识讲解、技能训练和现场实习。目前我国的翻译培训形式大致有: 全日制短训班(如脱产短训班、暑期班),业余培训班(如夜校);以通过某项考试(如翻译资格证书考试)为目标的考前培训班,以某项具体任务需求(如会议口译)为目标的专项训练班等。国外翻译界所说的翻译培训范畴较广,除以上非学历翻译教学活动以外,还包括院校学历性翻译教学中的实践和实务教学。 （杨晓荣）

口译教学 interpreting teaching

指以培养口译能力和口译员为目标的教学,着重培养学员的语言交际能力,包括敏锐的听力、瞬时的反应力、较强的理解力、精确灵活的表达、良好的谈话技巧。相对于一般外语课程来说,口译课的特点体现在: 1. 教学任务的不同: 一般外语类课程的任务是,提升语言能力的某个方面,如,听力课、口语课、阅读课、写作课等均有各自单一的语言技能培养目标;或是综合性地提升语言能力。而口译课的教学任务是,训练学生的口译能力以及培养学生作为口译工作者的相关素质。2. 教学内容的不同: 一般外语类课程以语言知识学习和语言技能的训练为教学内容;而口译课程则以口译技能的培训为中心,兼顾语言、知识、心理等诸方面综合素质的提高。3. 教学要求的不同: 相对于一般外语类的课程而言,口译课对语言能力(尤其是外语能力)的要求更高,因此,适合在外语专业本科高年级阶段及研究生阶段开设;在非外语专业的本科高年级阶段开设时,宜选拔语言能力及综合素质较好的学生来进行培养,或作为选修课程。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旨在通过口译课的教学以进一步提升语言能力,那就另当别论。我国口译教学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作为独立的课型开设的。

目前国内的口译教学主要有三个层次: 外语专业研究生的高级口译教学;外语专业本科生的基础口译教学;非外语专业本科生的口译入门教学。

（刘和平）

口译师资 interpreting teacher

指从事口译教学的教师。口译师资是口译教学的关键因素。由于口译教学的现场仿真性和实践性要求很高,口译教师要能够创设口译的仿真情境。因此,口译教师必须具备充分的口译实务经验,熟悉口译的每一个环节,能够预测口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并有能力提出有效的方法和策略加以解决(如进行口译示范等)。(杨承淑 2005: 111)

口译评估 interpreting assessment

主要指译员能力、口译过程及口译效果的评估,其目的主要有三种: 1. 为口译教学培训服务;2. 为口译行业实践服务;3. 以口译研究为目的。针对口译的“静态结果与动态操作”可进行“口译成效评估”和“口译过程评估”。口译成效评估包括质量评定与效果测量,前者指译员的译语质量,后者指口译服务对象对口译效果的客观反馈。口译过程评估主要评估译员在口译工作中的心理语言运用、心理因素影响、认知活动情况,如译员掌握职业技能、运用技能、发展技能、认知负荷协调的状况等。(蔡小红 2003)针对译员的素质和能力可进行“译员能力评估”,即测试受试者是否具备口译能力和译员的素质。“口译能力”指完成口译任务所需的内在的知识和技能体系,包括语言能力模块(双语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知识

模块(百科知识和专业主题知识)、口译技能模块(翻译转换能力和口译技巧)。(王斌华 2006)

口译测试 interpreting test

指对受试者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所学课程和口译能力的测试。冯建中(2005)结合巴克曼(Bachman)等的测试理论,针对不同的测试目的,把口译测试大致划分以下几类:课程/成绩测试(achievement test)、水平测试(proficiency test)、诊断测试(diagnostic test)、潜能测试(aptitude test)等。"课程/成绩测试"主要是检查、了解某一阶段内完成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情况,评估学员的学业情况。口译课的随堂测试、期中测试、期末测试和毕业考试都属课程/成绩测试。"水平测试"用来测量学员的口译实践能力,即看考生是否达到某一水平,是否能胜任某一项任务或某一种工作。各种口译资格证书考试就归入此类。"潜能测试"主要是测试考生是否具备学习口译并成为一名口译人员的基本素质和天赋。各口译专业和培训机构的口译入学考试就属于潜能测试。"诊断测试"主要是发现学员在哪些方面犯了错误并借此找出补救的办法。

大型的水平测试(如口译资格证书考试)属综合性测试。由于其涉及人员面很广,社会影响也很大,起着实际上的行业规范和行业准入资格认证的作用,其设计应该特别慎重,尤其是其考察内容,应力求全面测试应试者的译员能力。

口译测试的关键是如何把口译质量的标准和评估内容细化为可以具体操作的口译测试评分标准。国内代表性操作方法有:厦门大学的"口译评分表"把口译评分标准划分为六个大项:信息转换/完整性、准确程度、语言表达、流利程度/速度、清晰程度、应变能力。分数权重为:第一项、第二项各占30%,其余四项各占10%,每一个标准均划分为10个不同的分数段。(高亮,林郁如 1996:4)杨承淑的"口译专业考试评分表"(2005)把评分标准划分为四个大项:"忠实(准确、完整)、表达(流畅、明确)、语言(语法、选词)、时间控制"。分数权重为:忠实占50%,表达占30%,语言占20%,时间控制为在前三项总值的基础上浮动2%。刘和平(2002)把现场口译质量评估的评分标准划分三个大项:讲话信息或内容转达准确,占80%;翻译表达的准确和流畅程度,占10%;满足听众的期待,占10%。陈菁(2002)根据交际法语言测试理论编制了一份"口译量化评估表",把口译测试内容划分为:知识能力(包括语言知识和言外知识)、技能能力(包括记忆、公众演说、口译笔记、意译、概述、应对策略和职业水平)和心理能力,其中第一项占35%,第二项占50%,第三项占15%。各项又进一步划分不同的评估等级。

口译译员培训 interpreter training

指以培养职业口译员为教学目标的培训。口译译员培训的目标是发展学员的"译员能力",即口译工作者应具备的内在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以及职业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分为智力性因素模块和非智力性因素模块。智力性因素模块包括语言能力模块、知识模块和口译技能模块,以口译技能为核心,是口译译员培训的重点;非智力性因素模块包括译员心理素质(出色的记忆力、坚强的意志力、快速的反应力、良好的镇静力、敏感的跨文化意识等)、译员身体素质(能进行长时间高强度脑力工作的身体素质等)和译员职业素质(口译设备的操作、口译工作的态度、责任心和职业道德等),这一模块虽然与口译学员的先天素质有一定关系,但在口译教学中也应注意操练和提升。

如何针对以上四大模块(语言能力模块+知识模块+口译技能模块+非智力性因素模块),根据学生语文能力、知识面向、口译技能以及非智力性因素等,设计一套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式,可在模块间相互带动的系统性训练方法,加上细腻的讲解及简明的解决方案,才能提高学习效率。具体培训方法包括:明确订定教学目标、训练项目、程序步骤、培训素材、训练分量、个别反馈、评量机制、现场实践等,才能有效地巩固口译技能。 (王斌华,杨承淑)

口译教学的方法 methods of interpreting teaching

国内有代表性的口译研究者(如鲍刚、刘和平、仲伟合等)多主张口译技能教学法,即,以口译技能为纲来组织口译教学。

口译教学在围绕口译技能训练这个中心的同时,宜根据各个院校的具体情况、具体的教学目标及学生的具体水平采取切合各自实际的具体教学方法。可遵循的基本原则有:1. 课堂教学与课外练习相结合的原则;2. 课堂精讲与多练相结合的原则;3. 教师"言传"与"身教"(示范)相结合的原则;4. 口译教学仿真性的原则。

国内院校的代表性口译教学方法有: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口译教学的主要方法:教师讲解示范;三角情景练习;会议口译模拟;配对演练;小组讨论;口译观摩与赏析;口译工作坊。2. 华东师范大学的"交传技能训练五大模块"式教学。(陈翔 2005)

口译三角练习 dialog interpreting exercise

口译教学的一种组织方式,亦称"口译三角情景练习"。将学生分为三人组,设计口译情景场合,如商务会谈等,指定学生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布置会谈主要内容、交代需要完成的发言和口译任务。在此基础上,学生可充分发挥想象力充实交流活动,在真实有趣的交际活动中潜移默化地锻炼口译能力和跨文化交流意识。

口译的过程教学模式 process approach of interpreting teaching

口译的基本过程可以分解为以下四个基本步骤:

听解(听辨和理解) →记忆→转换→表达。胡庚申把它们概括为:"听"(listening)、"记"(memorizing)、"思"(processing)、"表"(delivering)(胡庚申 1993)。口译工作具有很强的即时性,以上步骤其实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可以形象地把口译的基本过程描述为"四合一",即,四个步骤必须即时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译工作模式是一种多任务(multi-tasking)同时操作的模式。基于以上口译工作的基本过程和基本特点的描述,口译教学可以采用过程教学模式,即针对口译过程的四个基本步骤来展开口译教学,包括口译听解技能的教学、口译记忆技能的教学、口译转换技能的教学、口译表达技能的教学。

口译记忆技能的教学　teaching of memorizing for interpreting

包括信息识记、信息保持和信息再现三个步骤。口译记忆技能是译员必备的基本技能,口译记忆不是对存储信息的简单恢复,而是对输入信息主动进行加工、编码之后的存储和提取。口译记忆的实质是在理解源语的基础上对源语信息的主要意义和关键词语的记忆,而不是对源语孤立的语音代码、信息符号的机械记忆。口译记忆技能训练的主要方法有:记忆方法训练;听力复述训练;听译训练等。

口译笔记技能的教学　teaching of note-taking for interpreting

涵盖口译笔记为什么记、记什么、怎么记等主要教学内容。教学重点是:口译笔记与听解的精力协调;口译笔记的记录方式和记录技巧;口译笔记的常用符号等。口译笔记是译员必不可少的记忆辅助工具。它能有效地减轻译员大脑的负担,弥补其短时记忆的不足。另外,做笔记的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整理过程,有助于译员把被动记忆转化为主动记忆,提高口译记忆的效率。

口译准备技能的教学　teaching of interpreting preparation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译员的长期知识储备,包括各个方面的百科知识以及自己经常从事口译的某些领域的主题知识,这方面主要靠学生长期坚持阅读相关文献以及为他们开设专题讲座;二是译员接到口译任务后的主题知识准备,主要是专业术语的准备,这是教学的重点。

译员应有广博的百科知识(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还应该对某些领域的知识有深刻的了解(know much about something)。口译背景知识对口译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李明远 1998)1. 背景知识能影响译员对信息的注意和记忆的程度;2. 背景知识的图式能影响译员对所接收信息的处理程度;3. 背景知识能影响译员对信息的处理速度。

口译听解技能的教学　teaching of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for interpreting

口译听解技能的教学即是培养学生以口译为目的的听辨和理解技能的教学。影响口译听解的主要因素有:双语能力(尤其是听力)、背景知识、分析综合的理解能力(Gile 1995a),口译听解技能的教学应围绕训练和提升学生的双语能力(尤其是听力)、补充学生的相关背景知识、加强学生的分析综合理解能力来展开。口译听解技能教学的重点包括:1. 训练学生"积极的听"(active listening)的能力;2. 培养学生在口译听解中以意义为中心(meaning-focused)的习惯;3. 注意锻炼学生协调口译听解任务和其他任务的能力。

口译过程精力分配的教学　teaching of split of efforts in interpreting

针对学员的主客观原因,口译过程精力分配教学的重点是:1. 提高学生单项任务的处理能力;2. 提高学生部分任务处理的自动化能力;3. 提高学生在各项任务之间的协调能力。

吉尔(Gile)提出了口译的精力分配模式(Gile 1995a: 179),总结如下:

1. "同声传译"的精力分配模式:SI = L + M + P + C (listening and analysis + short-term memory + speech production + coordination) 即:同声传译 = 听与分析 + 短期记忆 + 言语表达 + 协调。

2. "交替传译"的精力分配模式:Phase Ⅰ CI = L + N + M + C (listening and analysis + note-taking + short-term memory + coordination) 即:交替传译(第一阶段) = 听与分析 + 笔记 + 短期记忆 + 协调;Phase Ⅱ CI = Rem. + Read + P (remembering + note-reading + production) 即:交替传译(第二阶段) = 记忆 + 读笔记 + 传达。

口译过程是一种多任务同时操作的模式,口译教学的一个难点是,如何让学生学会协调各任务之间的精力分配,做到"一心多用"。吉尔在其研究中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导致译员精力分配失衡的原因以及在操作层面如何应对这种分配失衡以实现译员精力的有效分配。造成译员精力分配失衡,既有译员自身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的原因:1. 译员双语能力不足;2. 译员"言外知识"不足;3. 译员心理素质不足;也有译员之外的原因:口译任务超负荷。

口译教学设备　equipment for interpreting teaching

指用于口译教学的教室、教具、图书、器材等,包括同声传译实验室、语言实验室和 DVD、VCD、磁带录音机、短波收音机以及光碟、磁带等。口译教室的主要功能在于模拟会议口译、指导口译及学生练习口译等。提供场所及必要的设备。其口译教学设备应适于会议仿真,教具应能够重现口译的现场性。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对于同声传译设备的技术要求有明确的规定,包括固定译员厢的 ISO 标准(ISO

Standards for Fixed Booths)以及流动译员厢的ISO标准(ISO Standards for Mobile Booths)。一间标准的口译教室,若以每班不超过10名学生计算,需配备主机1部、译员机6部、会议主席机1部、会议听众席机10~20部、投影机1部、口译箱内录音设备1部、同步多轨录音机1部,另外,口译教室应设计成会议室的形态,在教室两侧设置5间口译箱,每间可容纳2人。按照现今的数码化时代需求,还需加上2部可与麦克风连动的摄录机,以便讲者打开麦克风说话时,不同角度的摄录机可以立即跟进。摄录机的功能除了保存画面,以供教师讲解之外,还可以传送画面给其他教室或会场共同使用。(杨承淑 2005: 112)

同声传译教学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teaching

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I),亦称"同步口译""同步传译",简称"同传",是指译员在不打断讲话者发言的情况下,在讲话者发言的同时不停地将其讲话内容传译给听众的一种口译方式。同声传译是通过同声传译设备来完成的。译员坐在特制的口译箱里,通过耳机接听发言人的讲话内容,随即通过麦克风把源语发言人的讲话内容用目的语传达给听众,听众则利用接收器(receiver)选择所需要的语言频道,接受口译服务。

同声传译教学主要包括四种形式: 1. 常规同传:在翻译中,译员没有稿件,靠耳听、心想、口译在同一时间内完成同声传译工作。2. 视译: 译员拿到讲话人的书面讲话稿,一边听讲话人的讲话、一边看稿、一边口译。3. 耳语传译: 不需要使用同传设备。译员一边听讲话人的发言,一边在与会代表耳边进行传译。4. 同声传读: 译员拿到书面译文,边听发言人念稿,边宣读译文。同声传读需要注意发言人在宣读发言稿的过程中增加及减少的内容,有时发言人可能会突然脱稿进行发言。同声传译教学中训练的基本技能包括: 边听边说的能力;注意力分配的能力;短期记忆的能力;思路预测的能力;信息重组的能力等。同声传译教学的主要方法有: 跟述(shadowing)练习;源语概述练习;目的语概述练习;视译练习;磁带练习(tape hours);模拟国际会议(mock conference)等。(仲伟合 2001b)参见"视译""模拟国际会议口译""跟述训练"

交替传译教学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teaching

指以培养连续交替技能为目标的口译教学。交替传译是一种在发言人讲完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后,再由译员进行翻译的口译方式。这种口译方式在很多场合下采用,如演讲、祝词、授课、谈判、情况介绍会、会议发言、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宴会致词、采访谈话、参观访问等。交替传译还可细分为有译稿、有原稿但无译稿以及无稿发言的形式。第一种传译只要求译员能清楚地宣读译稿,第二种要求他能够眼观原稿作口译,亦称"视译"(sight translation),第三种则要求他听完一段发言后能够记住,并迅速地把它口译出来。其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 口译听解技能的训练;口译记忆技能的训练;口译笔记技能的训练;数字口译技能的训练;口译转换技能的训练;口译表达技能的训练;公众演说技能的训练;口译现场应对技能的训练;跨文化交际技能的训练等。(仲伟合 2001b;刘和平 2005;王斌华 2006)参见"交替传译"

视译　sight translation; visual interpretating

1. 古阿德克(Gouadec)的七种翻译类别之一,指在事先无准备的情况下对书面材料的口译。根据要求,视译一般提供原文内容的概要。视译提供信息时,译者没有像其他六种翻译提供时来得从容(参见"绝对翻译");2. 培养同声译员的一种方法,亦称"带稿同传"。先将一份书面材料发给学员,学员用几分钟时间浏览全文,然后边看边译。视译时要像同声传译那样,依照一个个意群而不是看完整句后才译。要求学员学会断句,将句子分成较小的单位逐一译出,并用各种变通办法使之连贯成句。视译是同声传译的基本功。

模拟国际会议口译　mock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同声传译课程的一种训练方式,旨在为口译学生提供仿真的国际会议口译的训练环境,帮助巩固同声传译课程教授的基本理论与技能。学生运用所掌握的同声传译技巧,在实际操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进而掌握包括同声传译设备使用、会议各方协调、译前准备、团队合作等在内的国际会议口译的技能,最终达到提高同声传译能力的目的。常用的授课方法是,教师根据常见的国际会议专题事先给学生布置好模拟会议题目,学生自行设计和组织模拟国际会议,学生轮流发言、轮流翻译。

跟述训练　shadowing exercise

同声传译的一种训练方法,亦称"影子练习""跟读训练""源语复述练习"。指用同种语言几乎同步地跟读发言人的讲话或录音,目的是培养译员的注意力分配(split of attention)和听、说同步进行的同声传译技能。跟述训练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开始训练时,复述可以与源语同步开始,操练一段时间后,可以迟于源语片刻至一句话的时间跟述。

专题口译教学　theme-based interpreting teaching

口译课程的一种类型,与连续传译、同声传译等其他口译课程互为补充。本课程以常见的口译专题(如政治、外交、经济、贸易、金融、保险、文化、教育、科技、旅游等)为线索进行口译技能的学习和训练,同时进一步巩固和训练连续传译课程中学习的口译技巧。旨在系统地提升学生对常见口译专题的理解深度和广度,积累各类口译专题词汇,培养学生处理各种口译专题的职业能力。此类专题口译教学可以配合模拟国际会议口译,让初阶的学生听讲,由高班的学生

担任同传工作,以达到全面仿真的教学与实践。

数字口译技能的教学　teaching of figure interpreting

是针对数字口译进行的专业训练。对于译员来说,数字及其相关信息的准确快速传译是口译中的一个难点,因此数字口译训练是口译技能教学的重点之一。数字口译技能教学的重点是:外语数字的听力训练;数字的快速记录训练;汉外两种语言数字的转换训练。

译员公众演说技能的教学　teaching of public speaking for interpreting

为使译员传译的信息听得清楚、听得明白(be clearly audible and intelligible)而组织的教学活动。公众演说是译员首要的必备技能,其训练的要点是:1. 口译中应吐字清晰,音量适中,声音自然,语调中肯。译员开头译的几句话对于赢得现场听众的信任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尤其要说好。2. 讲话时注意口对麦克风的适当位置和距离,根据声音效果敏感地进行调整。3. 确保听众能跟上并听懂自己的讲话,注意稍微观察听众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语速。译到专有名词和头衔时应稍稍放慢速度,注意发音准确清楚。4. 讲话时适当保持与现场听众的目光交流。一个好的译员不应该只是埋头翻译或只盯着自己的笔记,而应该像一个演讲者一样,除了看笔记,还要偶尔抬头保持与听众的目光交流。5. 口译中一般使用第一人称,而无须转述,但在同时兼任会谈双方多人的译员时,须指明发言者身份。6. 作口译时少用或不用手势,表情不要夸张。即使出现口误,也不要做鬼脸或皱眉头,偶尔被人纠正失误,应虚心接受。7. 听众对讲话鼓掌或哄笑时,应适当停顿。(王斌华 2006)

教学翻译　pedagogical translation

指语言教学中的翻译活动,一般将其视为一种语言教学方法,亦称"学校翻译",以与"职业翻译"及其教学相区别。德利尔(Delisle)认为,教学翻译是为了学习某种语言而采用的一种方法,即以翻译为媒介进行语言(一般指外语)教学。(Delisle 1988: 24～26)在外语教学中采用翻译(口、笔译)的方法,可以较为迅速地让学生了解词句的确切意义,比较不同语言间的异同,也可以更为准确地检验学生对所学外语的理解状况。出于语言教学的目的,教学翻译对译文的要求不同于以培养翻译能力为目的的翻译教学。其主要特点是译文比较贴近原文语言结构,对译文质量的判断以相应阶段的语言教学目标为准,如必须使用某些语汇或结构以检验语言学习效果。在外语教学法中,这种方法被称为(语法)翻译法,属于比较传统的一种语言教学方法,与后来的听说法、交际法等相对。翻译法的弊端是容易形成学生对母语的依赖,特别是容易使他们将语言间的转换理解为机械对应,但如果应用得当,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此外,教学翻译在让学生初步领会翻译的一些特点方面也有一定作用。尽管如此,教学翻译的直接目的并不是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和翻译能力,而是帮助学生了解或掌握语言知识、获得语言能力。参见"翻译教学"

(杨晓荣,林夕)

翻译专业硕士　master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MIT)

专业学位教育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种形式。区别于一般意义上侧重理论、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旨在针对一定的职业背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从专业学位教育的对象来说,都是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并明确了自身今后的职业发展领域,从而选择攻读相应的专业学位。翻译专业硕士培养项目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口笔译实践能力,使之毕业后能够立即从事经济、商贸、法律、传媒、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翻译工作。课程设置的理念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导向,注意课程设置的完整性。

随着各行各业对应用型人才需求的扩大,专业学位教育正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此外,今后的专业学位教育还将逐渐与特定职业(岗位)任职资格(条件)相结合,成为国际上通行的"职业学位",即只有获得这种学位才能进入某一行业从业。

我国于1981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当初以培养教学和科研人才为主,授予学位的类型主要是学术型学位。就研究生的学位而言,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硕士、博士学位"。国务院学位办自1991年设置中国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BA)以来,陆续设置了15个专业硕士学位。翻译专业硕士学位是我国设立的第16个专业硕士学位,目的在于培养大批高层次、应用型的翻译专业人才。

专业学位的职业指向性非常明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规定,专业学位为具有职业背景的学位,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专业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但大多只设置硕士一级。各级专业学位与对应的我国现行各级学位处于同一层次。专业学位的名称表示为"××(职业领域)硕士(博士、学士)专业学位"。(仲伟合 2006)

23. 词典　语料库

辞书　dictionary

指汇集语词,逐条加以解释、说明,按一定方式编排以供查阅的工具书,为语文词典(包括字典)、专科词典、百科词典和百科全书的统称。此外,对辞书还有较宽的理解:即把手册、年鉴、表谱、书目、索引等纸质工具书以及采用现代通信技术的电子辞典、

在线辞典等都包括在内。译学词(辞)典属专科词典,主要对翻译研究中的术语予以解释和说明。经过整理的译学术语是译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

双语词典 bilingual dictionary

亦称"翻译词典",是两种语言词汇的对照辞书,通过翻译和注释,反映被译注语言词汇的面貌、特点和使用方法。双语词典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起着桥梁作用,是翻译中经常使用的重要工具书。双语词典用简单、明确、现成的对译作为释义,常辅以例证,如我国出版的英汉或汉英词典,国外出版的英俄、俄英、德英、英法等词典。由于甲语言的词义和用法与乙语言的对应词不完全相等,用翻译释义有较大的局限性,比较理想的双语词典是释义加翻译;即用原语释义,用目的语翻译,如《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用英语释义,汉语翻译。

术语词典 terminological dictionary

指收录某门学科术语的词典。对词语作专业性释义,其性质同专科词典,但收词范围有所不同,如编写语言学术语词典主要收录语言学有关学科的术语,可以不涉及语言学家、语言学著作、各个语种等词目,而编写语言学词典则可兼收这些词目。有些双语术语词典仅仅是术语的翻译,如《英汉数学词汇》、《英汉心理学词汇》等。有些术语词典也可兼收几门相关学科的术语,如《当代新术语》。

电子词典 electronic dictionary

指利用计算机技术,汇集语言(单语、双语或多语)里的词语,按某种次序排列,并一一加以解释,供人们查阅的非纸质词典。其中,双语或多语电子词典能帮助人们阅读外语、翻译或用外语写作。电子词典按其介质和功能可分为芯片词典、单机光盘词典、网络词典和翻译软件。这是一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的高新技术,开始只有万余单词容量的单片机,至今已发展到存有大量语篇的双语对应语料库。电子词典的最大特点是反应快、容量大、携带方便。靠着电脑的高速运算,不仅能瞬间显示单词的释义和用法,而且能显示拼法错误或拼法接近的词,甚至能在中间字母缺失或只有词头的情况下,快速普查词库,列出全部相关词,以供选择采用。一台容量几十万词的电子词典,体积比收词两三万的袖珍词典还小。

电子百科全书 electronic encyclopedia

汇集各门学科知识或某一门类学科知识,按照词典形式分列条目加以详细说明的电子工具书。电子百科全书具有便捷、迅速、廉价等诸多优点。在英语方面,常见的英文电子百科全书有 Microsoft Encarta (http://encarta.msn.com/)、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ttp://www.britannica.com/),以及网上的多语言免费百科全书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等。对于从事英汉翻译的译者来说,电子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是极佳的参考资料。

光盘词典 disk dictionary

是以光盘为介质的一种电子词典。欧美国家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至90年代初期达到出版高峰。国内外常见的如《汉英机器词典》、《牛津英语词典》、《美国传统有声词典》、《朗文交互式英语词典》、《韦氏新世界词典 Power CD版》、《东方快车》、《金山词霸》、《着迷词王》等。这类词典大多技术比较成熟,界面设置比较复杂,查检入口多,信息丰富。收词一般十几万乃至几十万,有的在一个版本中甚至包含10多部大型词典。有的还有"写作助理"功能,设一浮动窗口提供许多短语和词语搭配,帮助遣词造句;当需要查找某一单词时,只要输入中文,英文的对应词立即显现出来。屏幕取词、即时翻译功能是光盘词典的另一大特点。这类词典的质量参差不齐,如有的汉英版光盘词典"吃"的对应词列有 eaten, eating, feeding, have, take 等,均不够准确。其中,现在分词、过去分词与动词原形并列,而 feeding 是"喂养"的意思与"吃"有区别,have 与 take 只是在与食物搭配时才有"吃"的含义。有的光盘词典释义简单,有的较为详细。

芯片词典 chip dictionary

芯片词典是最早出现的电子词典,它把词典的各项信息储存于芯片,芯片是这类电子词典的主件。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芯片词典的收词量不断增加,功能不断完善,查检更为方便。我国市场上芯片词典主要有快译通、好易通、商务通、佳能、名人等系列。以快译通 EB8000 为例,除英汉/汉英双向功能外,还附有语音规则解析、万用词汇、复习测验以及全能记事、旅游指南、健康指南等其他功能多达数十种。此外,还配置十几种专业词典的插卡,译者可根据需要随时更换。由于翻译工作者(尤其是科技翻译工作者)经常接触的文献往往局限于某一领域及其相关领域,电子词典本身的内存就可压缩至最低限度,从而降低成本,而外存(插卡)则可用于容纳不同专业的词汇,每卡通常为一个专业(如商务、机械、建筑)的词汇库。这类电子词典也称插卡词典。

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指汇集各门学科知识或某一门类学科知识,按照词典形式分列条目加以详细说明的工具书。与语文词典不同,它收录各门学科的术语和有关知识的条目,所阐述的不是词语本身,而是词语所表示的概念。最早以"百科全书"命名的工具书,是1559年由德国

斯卡里希(Scalich)主编、在瑞士出版的《百科全书：神圣和世俗的世界学科知识》。自1751年法国狄德罗(Diderot)主编的《百科全书》出版后，"百科全书"一词才被人们普遍接受。著名的百科全书有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德国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前苏联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法国的《拉鲁斯百科全书》等，这些都是包罗较广的百科全书。也有只收一个或几个学科的专业性百科全书，如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等。

同义词词典　dictionary of synonyms

指收录同义词并分析其差别的词典。编排时把同义词列在一起，以其中一个词作为词目。词目通常是较常用的、在语体上中性的词，亦即同义词的首词。在提供释义及其用例的同时，着重辨析异同，尤其是辨异。

词典翻译　dictionary translation

双语或多语词典翻译的通称。参见"双语词典翻译"

双语词典翻译　bilingual dictionary translation

词典编纂的最主要工作就是(解)释(词)义。双语词典的释义不同于单语词典，其根本差异就在于：单语词典是通过同一种语言对词目词进行词义解释或语义分析，而双语词典则是用目的语的词汇单位对源语词目词进行对译或阐释。双语词典编纂并非如单语词典那样用释义的形式去分析词目词的语义成分，而是在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lexical units)与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之间找出意义相等的对等词；它体现的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间的对应或对等。双语词典的本质特征是对译，即两套语言符号系统的对应；双语词典的编纂过程就是双语词典的(意义)翻译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双语词典学历来被视为翻译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双语词典翻译是一种特殊类别的翻译，它在翻译对象、翻译特征、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标准等方面，与文学翻译及各应用学科的翻译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双语词典翻译主要包括词目翻译与例证翻译两大部分。近来也有学者研究认为，双语词典翻译过程应该是一个与源语语言的释义系统相对应的动态释义网络系统，渗透在词典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的各个层面。这就扩大了双语词典翻译的内容与维度。参见"词目翻译""例证翻译"

(陈伟)

义项翻译　sense translation

义项是词典词条中释义的最小单位，是对多义词所作的分项解释；也就是说，义项就是一个多义词目词意义的具体体现与反映。这样，我们可以笼统地概括说，双语词典的词目翻译本质上就是义项翻译。参见"词目翻译"。

(陈伟)

词目翻译　headword translation

指以源语释义为依据，把源语词目词翻译为译语的"对等词"或"等值词"。它是双语词典翻译的重要范畴，因为双语词典的本质特征就是针对词目词进行翻译以提供目的语对等词。衍生于词典学的立目规范，词目翻译单位主要涉及五个层面：词素层，如-let(表示"小")；音节/位层，如kaka(一种鹦鹉)；符号层，如Cm(化学元素锔的符号)；词层，如profile(侧面；轮廓)；词组层，如bedding plant(花坛植物)。根据词典学理论，词条结构中词目词的功能属性对应于语言的"语言"(langue)范畴，所以词目翻译一般又被称为双语词典翻译的"语言"翻译或"无语境翻译"。词目词反映了语言的深层结构属性，其意义具有抽象性、稳定性与共时性，因此，词目翻译首先应当力求严格的意义等值(主要表现为语义等值、语体等值、语用等值等)，实现词目的对等以及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是词目翻译的基本核心和重要前提；其次还要求译文概念清晰、准确，文字简练、规范。由于不同语言间的差异性或不对称性，相当一部分词目词都不能在目的语中找到完全的对等词，这就给词目翻译带来很大的困难。词目翻译的目的语对等词一般划归为两种类型，即翻译性对等词(translational equivalent)与解释性对等词(explanatory equivalent)。

(陈伟)

例证翻译　(illustrative)example translation

指将双语词典词条中各源语例证翻译为目的语。衍生于例证选配的不同类型，例证翻译单位主要包括三种形式：1. 词组，如the inner *ear*(内耳)；2. 短语(成语、习语或谚语，亦称为副词目或准词目)，如be all *ears*(全神贯注地听)；3. 句子，如He was always there with a sympathetic *ear*(他总是愿意倾听别人的心声)。根据词典学理论，词条结构中例证的功能属性对应于语言的"语言"(parole)范畴，所以例证翻译一般又被称为双语词典翻译的"语言"翻译或"有语境翻译"。例证反映了语言的表层结构属性，是语言具体运用的结果，表达了词目词在通用或典型语境中必然或可能有的含义和用法，具有私人性、流变性与历时性。正因为如此，例证翻译不同于词目翻译，应注意它具体的情景意义，即言语意义，努力寻求功能上的等值或等效，而不必计较词类、句法、表面意义等的对应；在方法论上应该坚持直译原则，但又切忌死抠字眼逐词对译，可区别情况采用词性变换、增减词、替换法、词序调整等转换手段。但是，例证翻译又不同于一般的篇章翻译，其特殊性在于例证本身只是一个小语境，缺失了篇章语境的整体通观，译者(双语词典编纂者)需要立足两种语言与文化对比的宏观语境，依靠有限的微观译义空间进行想象与推敲，将源语词目丰富的意义使用信息完整地表述出来，以便词典读者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有关词目词的自足、完整的语

言与文化信息。（陈伟）

词典释义 interpretation

1. 指词条中对词目作解释的部分。双语词典一般采用两种方法,即以词释词(翻译性对等词——用等义词解释词目)或描写词义(解释性对等词——有些词目尚无适当的等义词时采用)。如：internalization(1)内在化;(2)(指美国股票交易中)佣金经纪人办公室内股票买卖方式。其中释义(1)为以词释词,释义(2)为描写词义。释义还可采用图解、定义等方法,或某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2. 指在同一语言中或不同语言中用一些词、短语或句子来解释某些词、短语或句子而不改变原有的意思。语义学家认为,即使在同一种语言内,同一种语义结构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以下句子存在着释义关系：1. The food was stolen before the guests arrived. 在客人到达之前食物被窃。2. The theft of the food preceded the arrival of the guests. 食物被窃先于客人到达。

按转换生成语法分析 The food was stolen 与 The theft of the food 在深层是完全一致的。这两个句子可以互相解释,但它们的语义重点稍有不同。释义是句子之间转换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参见"解释性对等词""翻译性对等词"

词条 entry

指词典中由每一个注释的对象和注释所组成的整体。词典所收录的词条数量因规模大小而有所不同。语文词典一般把语言中公认的、稳定的词列为词条,但一部系统完整的词典在收录词条时还必须正确处理下列问题：1. 言语新词;2. 语素;3. 百科性词语;4. 旧词;5. 短语和熟语。语文词典的词条一般包括以下内容：居首位的是词目,即供查找的词项;其次是注音(如汉语拼音、国际音标)、词源和语法注释(如标明词性);再次是释义和例句,其后可有若干含有该词项的固定词组,以及相关的同义词和反义词;最后还可附辨析,即容易混淆的词(如近音词、近义词等)。有时还加有必要的插图。有些词典因为收录对象包括字、词、短语、熟语等,故也有把词条叫做条目的。

词源词典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指专门考证、解释和说明词语来源及其演变过程的词典,大型和中型的语文词典一般也在词条中列出词源,但往往失之过简。若需详细查考词的最初形式、意义及其历史演变,就要使用专门的词源词典。

详解词典 unabridged dictionary

亦称"足本词典",汇集普通词语,从词形/字形、读音、语义、用法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诠释。是单语语文词典最基本的类型,个别双语词典也有详解的。要求详尽地提供词语的全部有关信息,如标注词的发音特点、书写特征;注明词的语法属性,列出多义词的各个义项及其用例,说明词的情感色彩和语体特征,记述词的固定搭配及其组成的成语典故,等等。我国的《汉语大词典》、英国的《牛津英语词典》、法国的《法兰西学院词典》、前苏联的《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词典》、日本的《日本国语大辞典》都属此类词典。

译纂词典 translated dictionary

指对根词典(root dictionary)进行翻译后而得到的一种词典类型。通常来说,译纂词典就是指"双解词典"(bilingualised dictionary),即基于单语词典、用另一种语言进行全部或部分翻译后而生成的词典。但是,译纂词典又不完全等同于双解词典,因为它可以有两种类型(以把英语词典翻译为汉语为例)：一种是出版时保留原有的英语释义;另一种是出版时只用汉译而不保留原有的英语释义。第一种才是双解词典,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7)与《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英英·英汉双解)》(商务印书馆 1998)。第二种只是英汉单解词典,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英汉双语词典,与独立研编的英汉双语词典相区别。双解词典是一种广义上的"过渡词典"(bridge dictionary),服务于不同文化或不同种族间的人际交流。学界普遍认为,双解词典更能满足外语学习需求,对阅读等语言解码活动尤为有益。

（陈伟）

翻译词典 translation dictionary

双语/多语词典的基本目的是在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和另一种或几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之间找出意义相等的对等词,主要供翻译人员在从事翻译实践活动时查考,所以在狭义上,双语/多语词典通常又被形象地称为翻译词典。翻译词典的基本特征与供求解用的双语/多语词典大抵相同,只是在收词、立目、释义、对等词提供、内容设置、配例等方面更加力求照顾到翻译实践的需要。但并非所有的双语/多语词典都可以称为翻译词典,例如用汉语编写的英语词源词典就不是。双语/多语词典被称为翻译词典就在于它能够提供给译者/词典使用者以跨语言的词汇概念,即提供"对等词"。只有提供了对等词的双语/多语词典才能够称为翻译词典。（陈伟）

语(料)库 corpus

指在随机采样的基础上收集的有代表性的语言材料的集合,是语言运用的样本。(杨惠中 2002：8)用语料库进行语言研究(如编词典和编写语法书等)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当时以制作卡片和人工检索为主要手段,建库速度慢、容量有限,且检索不便。近 30 年来,开始用计算机对大量语料取样、储存、分类和统计分析。计算机语料库容量大、资料可信度强、信息提取快而准。它可以从多方面、多层次描述语言并且验证各种语言理论和假设,甚至建立新的语言模

式和语言观。而语库语言学也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门跨世纪的语言研究学科。语料库研究通常包括三个部分：1. 收集大量语言信息以建立语料库；2. 用电脑程序对语库资料进行语音、句法或词性等各种特征的注释；3. 设计与语料库配套使用的电脑检索软件。语料库语言学和语料库本身的发展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国外已建立翻译语料库对翻译进行专门研究。参见“翻译研究语料库”

口语语料库　spoken corpus

指自然口语语料和口语话语的汇集。口语语料库利用语料库探索口译类型、口译目标、在不同压力和语境下的语际交流过程模式，开发研究口译的方法，如采用直接的平行语料库的数据进行口语类型比较，应用目前的单语语料库提炼出口译研究的实验材料等。当前国际上已建成的大型口语语料库主要有 The BNC（British National Corpus）Spoken Corpus，The London - Lund Corpus of Spoken English（LLC），CHILDES（Child Language Data Exchange System），ICE（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Spoken Texts 等。国内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汉语口语语料库主要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的当代北京口语语料库、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汉语情景会话口语库（北京地区）（Corpus of Situated Adolescent Speech）、朗读语篇语音语料库 ASCCD[3]、自然口语独白语音语料库 CASS[4]、自然口语对话语音语料库 CADCC[5] 等。汉语口语语料库主要是语音识别语料库。国内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英语口语语料库包括：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学英语学习者口语语料库 COLSEC、南京大学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料库 SECCL、华南师范大学的国际外语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中国部分 LINSEI - China[1]、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介语口语语料库等。这些语料库主要是英语学习者口语语料库。参见“语料库”

可比语料库　comparable corpora

贝克（Baker 1995：234）采用的术语。她认为，可比语料库可收集某种语言（比如英语）的源语文本，同时也收集从其他语言翻译成这一语言的文本。但这两种文本语料在使用范围、语言变体和时间跨度上应相似，而且在长度上也具有可比性。贝克利用对比语料库对比翻译文本和非翻译文本，发现了翻译本身的三个特征：1. 显化（explicitation）；2. 简化（simplification）；3. 范化（normalization）。这些倾向体现在译文的词汇和句法特征上。与其他类型的语料库不同，可比语料库在译员培训、材料编写或机器翻译系统开发方面，并不发挥明显作用。但可比语料库有一个重要贡献，即“阐明了翻译文本的性质，说明翻译是一种经过了协调后的交际活动”（Baker 1993：243）。换言之，可比语料库包含的信息可以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什么样的语言特征是翻译文本的典型特征，而不管译本译自何种源语。具体说来，我们希望对可比语料库进行分析，以增加对翻译普遍性（universals of translation）的认识。迄今，并没有多少研究工作用到可比语料库。拉维奥萨-布雷斯威特（Laviosa-Braithwaite）率先运用此种方法，对翻译普遍特征做了严肃认真的调查（转引自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32～33）。应该指出的是，翻译工作中使用语料库的时间相对较短，因此在使用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固定性。参见“翻译共性”

（黄勤）

翻译英语语料库　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

由英文译文和原文组成的一个语料库，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贝克（Baker）创建和管理，收集了英、美翻译家译自世界其他国家语言的文本。所译的原著未经任何删改，语种涵盖了欧洲主要语种和阿拉伯语、汉语、希伯来语和泰米尔语等。到 2003 年，库容已达 1 000万词次，题材包括小说、传记、报纸和休闲杂志四种，可在线浏览和免费使用。翻译英语语料库主要用于两大类研究工作：1. 调查翻译文本与同一语言的非翻译文本在词法、句法等方面的区别，比如分析译作的明晰化、简略化和规范化倾向；2. 通过比较不同译文的类符/形符比率、平均句长、词语的搭配和叙事结构等，了解不同译者的语言风格差异。参见“翻译共性”

（贺显斌）

翻译共性　translation universals

亦称“翻译普遍性”或“翻译普遍特征”（universal features of translation），是指翻译语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变体，相对于源语文本或目的语原创文本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一些规律性语言特征。它是“翻译文本而不是原话语中出现的典型语言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不是特定语言系统干扰的结果”（Baker 1993：243）；或者说是“译文中呈现的有别于原文的一些典型的、跨语言的、有一定普遍性的特征”（柯飞 2005）。有人采用单语语内类比模式（monolingual comparable mode）对此进行探讨，有人则倾向于采用双语语际对比模式（bilingual parallel mode）。切斯特曼（Chesterman）（2004a，2004b）将翻译共性区分为目的语型共性（T-universals）和源语型共性（S-universals），前者是关于目的语中翻译文本与原创文本之间的语内类比关系，不大考虑源文本的因素；后者是基于源文本与译文之间的语际对比关系，关注译者对源语文本的规律性处理方式。近十多年来，无论在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上，论述较多的翻译共性有简化（simplification）、显化（explicitation）、范化（normalization）等。

（王克非，黄立波）

范化　normalization; conventionalization; conservatism

翻译共性之一，亦称为“常规化”“规范化”或“保

守化”,是指翻译文本“遵循甚至夸大目的语中典型模式和做法的倾向”(Baker 1996: 176～177),这两种倾向都是参照目的语的。文德劳韦拉(Vanderauwera)(1985)发现译文语篇在标点、选词、文体、句子结构以及语篇构建方面的转换均有趋向于目的语语言传统规范的特点(Laviosa-Braithwaite 2002: 55)。图里(Toury)(1995)提出的标准化法则(law of standardization)也是对翻译文本范化的关注。而关于范化的实证研究结果却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肯尼(Kenny)以德英文学文本平行语料库(GEPCOLT)为基础,对翻译中的范化和译者创造性加以考察,发现翻译中词汇范化现象的确存在,但源语文本中的创造性词汇大多数情况下却没有发生范化(Kenny 2001: 187,210)。蒂尔科-康迪特(Tirkkonen-Condit)以翻译芬兰语语料库为基础提出了独特项假说(the unique items hypothesis):目的语语言中的某些语言项/元素在源语中缺少语言对应项,相对于原创文本而言,此类语言项/元素在翻译文本中的频次低。也就是说,如果将目的语原创语言规范视为常态,那么翻译语言特征通常被认为是对常态的偏离(Tirkkonen-Condit 2002: 209),即非标准化或非范化;这一点与上述贝克对范化的定义相背离。柯飞(2003)以英汉/汉英平行语料库为基础对汉语中的特殊句式“把”字句在英汉转换中的分布特点进行考察发现,汉语翻译文本中的“把”字句比汉语原创文本中的“把”字句使用频次高(他因此提出复杂化/拟化假说),这一结果又与蒂尔科-康迪特的独特项假说形成鲜明对比。造成此种多样化的原因在于研究对象和所用语料库类型上的不同。(王克非,黄立波)

显化 explicitation

翻译共性之一,亦称“外显化”“明晰化”或“明示”,是指翻译过程中给译文添加或明示原文中隐含语言成分的过程。相反的过程则被称为隐化(implicita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维奈(Vinay)和达贝尔纳(Darbelnet)(1958/1995: 342)作为一种文体翻译技巧提出,指在目的语中将源语中的隐含信息加以明示的过程或结果,此类信息在源语本中可以根据语境或情境获得。布路姆-库尔卡(Blum-Kulka)(1986: 19)曾提出“显化假说”(explicitation hypothesis):翻译过程会使得译文相对于原文更加冗长,其表现形式为衔接方式的明晰化程度提高。贝克(Baker)最初对于显化作了这样的论述:“相对于特定源语文本以及原创文本总体而言,翻译文本显化程度显著提高”(1993: 243)。随后贝克又指出,“在翻译中,(译者)总体上往往会将各种情况加以详细说明而不是将含糊不清的地方保留下来”(1996: 180)。塞盖诺特(Séguinot)认为,显化不仅仅指原作中不存在而译作中添加的表述,也包括原文中所暗示或只有通过预设才能认识到的信息在译文中加以明示,还包括原文中的某些成分在译文中通过凸显、强调或措词等手段而加以突出的现象(转引自 Klaudy 1996: 101～102)。贺显斌(2003)认为,“只要译文中的词句意义比原文更清楚、明确、具体、易懂,逻辑关系比原文更明晰,或中心意思比原文更突出,就算发生了明晰化转换”。柯飞(2005)指出:“作为一种翻译现象,显化(以及隐化)不应只是狭义地指语言衔接形式上的变化,还应包括意义上的显化转换,即在译文中添加了有助于译文读者理解的显化表达,或者说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此外,由于所采用的对比模式不同,显化可分为语际显化和语内(类比)显化两种,前者以源语文本和目的文本之间的比较为基础,同原文相比译文发生显化;后者则以同一语言内翻译文本与原创文本之间的类比为基础,同本族语原创文本相比译文显化程度提高。

(王克非,黄立波)

隐化 implicitation

翻译共性之一,亦称“隐含化”。维奈(Vinay)和达贝尔纳(Darbelnet)最早将显化和隐化作为一组对立的文体翻译技巧加以讨论,指出它们常与信息的获得或损失相联系。他们将隐化定义为:将源语中的明确信息在目的语中变成依靠语境或情境来传达的隐含信息(Vinay, Darbelnet 1958/1995: 344)。换句话说,隐化是指文本因素由文本化(textualization)到情境化(situationalization)的转换过程,原作文本中出现的语言因素在译作中可以根据特定情境加以识别。以上定义说明,必要的“隐化”至少是翻译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技巧。图里(Toury)(2004a,2004b)认为普遍性概念本身就隐含着二分的原则,如翻译研究中“显化”和“隐化”都应是普遍性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认同。关于隐化与显化的关系,希米德(Schmied)和夏夫勒(Schäffler)(1997)指出,这样一组对立特征并非一种对称的关系,翻译中的显化往往多于隐化,原因在于前者的信息处理过程要比后者简单。克劳迪(Klaudy)(2002)提出“不对称假设”(the asymmetry hypothesis)也谈及隐化与显化的关系。她指出,L1→L2 过程中的显化与 L2→L1 之间的隐化并不对称。为了进一步证明“不对称假设”,克劳迪和凯罗里(Károly)(2005)通过对英译匈和匈译英文学文本两个不同方向上转述动词的考察发现:译者往往在两个方向上都倾向于更多地运用显化,而常常不采用隐化。她们将隐化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总结为:词汇笼统化、词汇压缩、词汇省略、语法笼统化、语法降格和收缩以及语法省略等。柯飞(2005)则认为,翻译中的显化与隐化是共存的,显化或隐化的现象和程度可能与语言形式化程度和翻译方向相关,同时还会受到译者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文本因素的影响。(王克非,黄立波)

简化 simplification

翻译共性之一,亦称“简略化”或“简约化”,是指

翻译文本相对于源语文本或目的语原创文本在整体上表现出语言难度降低的趋势。布路姆-库尔卡(Blum-Kulka)和莱文斯通(Levenston)将翻译中的词汇简化(lexical simplification)定义为"用少量的词处理原文的过程和/或结果"(1983: 119)。翻译共性研究中所谓的简化,是指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对源语文本中的"语言/信息下意识地简化"(Baker 1996: 176)处理的倾向。语料库翻译研究途径正式出现之前对简化现象的探讨主要涉及词汇、句法和文体简化三方面,又可分为由两种语言系统差异所造成的强制性(obligatory)简化,和由翻译过程本身、译者偏好、目的语语文规范等因素造成的非强制性(optional)简化两大类。基于语料库的简化研究主要借助计算机统计分析手段,对翻译文本和目的语原创文本从词汇密度(lexical density)、平均句子长度(mean sentence length)、高频词(high frequency words)和最常用词(list heads)的使用方面加以比较。一般地说,翻译文本会表现出: 1. 词汇密度低;2. 高频词使用广泛;3. 最常用词重复率高;4. 最常用词变化度小等特点(据 Laviosa-Braithwaite 1998;王克非 2004: 183)。

(王克非,黄立波)

整齐化　levelling out

翻译共性之一,指翻译文本"趋向语言连续体中央部分"(Baker 1996)的现象,也就是说,就特定语言特征而言,翻译文本表现出彼此相似的倾向(Laviosa-Braithwaite 2002: 71)。这一术语最早由施莱辛格(Shlesinger)(1989)创造,用来指同声传译中口语体向书面语体或书面语体向口语体的转换现象。她发现在英语-希伯来语同声传译两个方向上,口译过程都会将文学体的源语文本转变为口语体的目的语文本(同上)。贝克(Baker)借用此语来指翻译文本的趋同特征。拉维奥萨-布雷斯威特(Laviosa-Braithwaite)(2002: 71~73)指出,由于所采取的对比模式不同,可将这一现象划分为"集中化"(convergence)和"整齐化"两个方面,前者即翻译文本在诸如简化等翻译共性特征上显示出的更高的一致性,即相对于原创文本而言,翻译文本的多样性或个性化程度较低;后者指口译或笔译中,在口语体与文学文体之间或其他事先定义的两个维度间的变化更为规则(参阅胡显耀 2004)。奥洛亨(Olohan)(2004: 100)指出,对于整齐化的研究很不够,主要困难在于对一些文本特征缺少有效的测算手段。　(王克非,黄立波)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是指根据特定的研究目标,建立以真实翻译语料为主的语料库(包括单语类比语料库[monolingual comparable corpus]和双语/多语平行语料库[bilingual/multilingual parallel corpus]、翻译语料库[translational corpus]等几种类型)。它以语料库电子文本为基础,以计算机统计为手段,对各类翻译现象进行大范围的或特定范围的描写,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分析和解释翻译现象,或验证关于翻译的种种假说。从本质上讲,语料库翻译学是描写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与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相结合的跨学科产物。

语料库用于翻译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Laviosa-Braithwaite 2002: 1,21),但通常认为,贝克(Baker)(1993)的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一文是语料库翻译研究范式(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Paradigm)开始建立的标志。1998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主办的翻译研究季刊 *META* 出版了拉维奥萨-布雷斯威特(Laviosa-Braithwaite)主编的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专号 *META* 43 (4),从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宣告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翻译研究范式。以贝克(1993)为标志,语料库翻译研究可划分为前语料库(pre-corpus)和基于语料库(corpus-based)的两个时期(Laviosa-Braithwaite 2002;Olohan 2004),前者是指大规模机读翻译文本用于翻译研究之前,通过人工采集原文和译文文本,并对与翻译有关的语言现象进行对比、分析和统计的时期。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范式产生以来,其研究范围覆盖了从翻译过程到翻译产品的各种翻译现象,特别是翻译共性(translation universals)、翻译过程(translation process)、翻译转换与规范(translation shift and translation norms)、译者文体(translator's style)、翻译教学等诸多方面。国际上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发展较快,目前此领域中以对翻译共性和译者文体的讨论最为突出。国内起步较晚,规模较大的双语对应语料库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研制的 3 000 万字/词的"通用汉英对应语料库"等,相关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研究可见以上所列的参考文献。

(王克非,黄立波)

翻译研究语料库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指为翻译研究目的而建立的,对翻译的性质和特征进行描述的双语或多语语料库,国外始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技学院语言工程系翻译研究中心贝克(Baker)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她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翻译英语语料库。她认为,与翻译研究有关的语料库有三类: 1. 平行语料库(parallel corpus),收集某种语言的原创文本和相应地翻译成另一种文字的文本。目前已有英-法、英-意、英-挪和英-德语言的平行语料库。平行语料库的建成使语言学家能对比两种文本在词汇、句子和文体上的差异(例如,文本长度上的区别,词汇的对应程度),并能反映成对语言翻译行为中的特征,归纳出其中的等值关系,研究翻译腔产生的原因和特点。平行语料库最适用于翻译者培训、双语词汇教学、词典编纂和机译;2. 多语语料库(multilingual corpus),是根据类

似设计标准建立起来的两个或多个不同语种语料文本组成的复合语料库。其中的文本完全是源语文本，不收集翻译文本。欧洲多语词典编纂委员会现已建立起这样的语料库，其中包括英语、德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匈牙利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3. 可比语料库(comparable corpus)，收集某种语言(比如英语)的源语文本，同时也收集从其他语言翻译成英语的相关文本。通过两种文本的比较分析，探索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翻译的规范，发现翻译活动的一些特殊规律，即翻译的普遍性。

24. 翻译产业　机器翻译

翻译产业　translation industry

指为社会公众提供语言或文字翻译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翻译产业可分以下三个层次。

1. 核心层：传统的人工翻译服务，包括笔译、口译、手语翻译；2. 外围层：以语言或文字翻译服务为主体或目的，需要借助于计算机技术来实现的翻译服务，包括软件和网页的本地化、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3. 相关层：其他与翻译相关的活动，以研发、生产或销售其他产品为主导的一系列活动，包括翻译培训、图书翻译、影视作品翻译、翻译软件或翻译机器的研发、生产或销售、多语言语音技术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或销售等。翻译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文化产业”　（朱现超）

本地化　localization

指将软件或网络产品按特定国家、区域或语言市场的需要进行加工，使之符合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包括软件本地化和网站本地化。前者指将产品的用户界面和文档资料与在线帮助菜单进行语言转化，使之适应某一外国语言和文化的细微差别；后者指根据当地的语言文化习惯，对网站的文本、图标和格式进行调整，包括改变时间、货币格式、联系信息及其他网站元素，使之符合本地访问者的要求。软件本地化的内容包括通过翻译并调整菜单、图形或文本标签，使之适用于某种本地语言，还包括翻译用户手册、对话框、联机帮助等。软件本地化工具使翻译人员能从一个电脑程序中抽取文本字符串重新组合到相关的软件中，使之成为另一种语言的电脑程序版本。需要本地化的软件一般具有经常或定期更新内容的特点。软件本地化在世界翻译市场中占了相当的份额，一些跨国公司都在从事软件本地化的业务，通常和源语文本的开发同步进行。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字翻译之外，软件本地化还包括语言项目管理、软件工程和管理等。因此，软件本地化工作者不仅要具备较高的翻译水平，而且要掌握相关的信息技术。

本地化和传统翻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两者间又有明显差异：1. 翻译只是本地化业务的一个环节，后者还包括适应文化差异和工程技术处理等内容；2. 传统翻译处理的更多的是文档和手册，本地化则从处理软件开始；3. 传统翻译的质量要求是准确和流畅，而本地化除了保证正确外，还要符合目的语市场的传统和习俗；4. 本地化的翻译按源语的字数报价，而传统翻译通常按目的语的字数报价；5. 本地化公司的客户绝大多数来自欧美等国外市场，而传统翻译公司的客户多在国内；6. 本地化公司遵守本行业的国际规则，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应用先进的辅助工具。参见“国际化”　（贺显斌）

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亦称“全球化”，指使软件和网络产品具有普遍适应性，从而无须重新设计就可适应多种语言和文化习惯的过程。国际化主要涉及程序设计和文档制作两个层次。“国际化”是“本地化”的延伸，就中国来说，“本地化”亦称“汉化”，主要是使外国企业的产品符合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习惯，而“国际化”则更多地面对国内企业，为的是在世界各地出售和推广使用中国的科技产品，是民族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国际化的工作包括：文件制作图标，使各类文件的文字可以很容易转换成为另外一种语言，并预留扩充的余地；使用者界面预留翻译所需的空间(例如：硬件卷标、求助页、在线目录等)；制作适当的平面或网站图文件，让翻译文字卷标的过程既方便又节省成本；在小册子中预留空间，方便填入不同长度的各国语言文字；把文字从图像中分离出来，或把网页内容从网站应用程序和软件的标示语言中抽离出来；使用全球易于接受的范例；确保工具和产品可以支持国际字符集；在软件方面，确保拥有足够的数据空间，让单字节的字符码(例如英文)可以翻译成为多字节的字符码(例如日文、汉字)，等等。参见“本地化”　（贺显斌）

同传设备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equipment

同传设备是实现高级别国际会议同步翻译不可缺少的系统设备。通过该设备，可以保证演讲者在演讲的同时，演讲的内容被同声翻译译成指定的目的语，再通过另外的声道传送给与会代表。与会代表可以随意选择自己能听懂的语言频道。为了满足不同语言的需求，同传设备一般有两通道、四通道、六通道和八通道几种，每个通道传输一种语言。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为六通道，可以实现六种语言的翻译。根据设备的传输原理，可分为有线和无线两种。有线同传设备多用于一些固定的会议场所，不便于搬运。无线又分为布线型和红外型。由于布线型在会场布置时较为麻烦，目前市场上已经不多，将很快被淘汰。而红外同传设备是世界上目前比较流行、比较先进的一种设备，信号通过红外传输，抗干扰，声音传输稳定，效果好。

随着红外技术的不断发展，红外频率不同，效果也有所不同。目前市场上，只有飞利浦(PHILIPS)、雷蒙(RESTMOMENT)等产品，采用了高频红外线传输，信号不受节能灯等外界干扰。

一套完整的同传设备，由即席发言主机、中央控制器、红外发射主机、红外辐射板、音频媒体接口、译员机、翻译间、同传耳机(代表接收单元)等组成。译员机和翻译间的个数将根据会议语言种类数来定。同传耳机(代表接收单元)根据与会人数来定。

翻译版权　translation copyright

是对翻译活动、翻译作品和翻译工作者的法律保护与制约。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和我国加入的国际版权公约，译作属文字作品，是版权保护的客体之一。译者对译作享有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权利。人身方面的权利包括发表译作的权利；在译作上署名、表明译作身份的权利；修改或授权译作的权利；保护译作的完整性，使其不受歪曲和篡改的权利。财产方面的权利包括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即以复制、表演、播发、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以及以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译者对译作享有的权利是一种专有权，除另有法律规定外，未经译者同意，其他人不得行使。但如果原作仍有版权，则译者翻译该作品必须事先取得原作者或其他版权所有者的授权，译者对译作行使版权时不得损害原作版权所有者的权利。译作对译作享有版权，但对所译的原作不享有权利。译作的版权受到侵害时，可以三种方式寻求版权保护：1. 与侵权者直接交涉，要求其承认错误，停止侵害，赔偿损失；2. 请求侵权行为发生地的版权管理部门制止侵权行为，对侵权者予以处罚，并责令其赔偿损失；3. 向侵权行为发生地或侵权人的居住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侵权方同意，也可以到仲裁机关或双方认可的政府机关或协会团体进行仲裁。(沈仁干 1997：25)　(贺显斌)

翻译服务　translation services

指为顾客提供两种以上语言服务的有偿经营行为。(GB/T 19682 - 2005)

翻译职业道德　professional ethics of translation

指翻译服务机构和译员在从事翻译服务时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和规范。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服务委员会为提高翻译行业的法治化、规范化和市场化水平，于 2005 年 10 月制定出《翻译服务行业道德规范》。该道德规范共五章 18 条，摘要如下：

第一章　总　则

1. 为规范翻译服务市场，促进翻译服务行业诚信体系建设，特制定本规范。

2. 本规范所指翻译服务行业包括提供翻译服务的机构和个人。

3.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模范执行相关标准和规范。

4. 恪守职业道德，严格自律，诚信为本。

5.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章　满足顾客需求

6. 不断完善质量保证体系，把好质量关。

7. 明确计量标准，杜绝欺诈行为。

8. 礼貌待客，热情周到，严守顾客秘密，提供优质服务。对顾客提出的不能满足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对不合理的要求，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9. 自觉接受顾客监督，认真处理顾客意见和投诉，切实维护顾客利益。

10. 以顾客为中心，信守承诺，认真履行合同。

第三章　合作双赢

11. 尊重同行，真诚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12. 及时向合作方反馈顾客需求信息，协助合作方按顾客要求提供翻译服务。

13. 不得利用合作方提供的信息，损害对方利益。

14. 遵循公平公正、平等自愿的原则，尊重译者劳动，维护译者权益。

第四章　行业自律　有序竞争

15. 加强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抵制不正当竞争。

16. 加强行业自律，接受社会监督，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第五章　附则(略)

保密　keeping secret

指翻译服务方应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为顾客保守商业和技术秘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顾客的商业或技术秘密。(GB/T 19363.1 - 2003)

译文质量评定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根据《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的国家标准，译文质量主要根据以下各类因素评定。

a) 译文使用目的：

1 类——作为正式文件、法律文书或出版文稿使用；

2 类——作为一般文件和材料使用；

3 类——作为参考资料使用；

4 类——作为内容概要使用。

b) 原文文体、风格和质量；

c) 专业难度；

d) 翻译时限。(GB/T 19682 - 2005)

翻译质量评估的功能-语用模型　functional-pragmatic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由德国语言学家豪斯(House)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建构。豪斯在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1977)一书中最早提

出这一翻译质量评估模型,后来对这一模型进行修改,并在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 A Model Revisited* (1997)一书中推出修订版。翻译质量评估的功能-语用模型包括四个层级(four-tiered):文本功能——体裁——语域——语言/文化,主要用于分析原文和译文中所使用语言的特质,比较原文和译文的文本概况及在此基础之上对原文和译文的匹配程度进行评估。此模型中译文与原文对等的基本要求是译文功能与原文功能的对等[这里的功能指的是韩礼德(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

在评估原文与译文的匹配程度时,要对层面型不匹配(dimensional mismatches)与非层面型不匹配(non-dimensional mismatches)进行区分。层面型不匹配属于语用错误,与语言使用者和语言使用有关;非层面型不匹配指原文的所指意义与译文的所指意义不匹配,及目的语语言系统在各个层面与原文语言系统的不匹配。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House 1997:105~107;Munday 2001:93):1. 建立原文语域的文本档案(textual profile)。2. 描述由语域所实现的原文语篇体裁。3. 在1和2的基础上作出原文的"功能陈述",内容包括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换句话说,传递了什么信息,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的关系如何)。4. 对译文同样展开上述三个步骤。5. 比较译文和原文文本概况,对"不匹配"或错误作出陈述,并根据语篇体裁及语域和体裁的情景层面进行分类。6. 对译文的质量做出陈述。7. 最后,译文可归为两类:显型翻译或隐型翻译。详见图1。参见"显性翻译""隐性翻译" (钱宏)

翻译服务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of translation service

指在标准意识的指导下,管理者规范化的管理制度、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服务项目、程序与预定目标的设计与培训,向翻译产品的顾客提供统一的、可追溯和可检验的重复服务。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作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过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部门批准,以特定的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是标准化的实质,"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则是标准化的目的。制定标准是为了规范行业内的企业行为,并方便社会公众对业内行为规范的识别和监督。从2002年开始,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和企业编制翻译服务行业的国家标准,迄今为止,已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实施《翻译服务规范 第一部分 笔译》(GB/T 19363.1-2003)、《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GB/T 19682-2005)和《翻译服务规范 第二部分 口译》(GB/T 19363.2-2006) (据张南军 2006)

导译(服务)标准 guide-interpreting (service) norms

指用来评判导译或陪同口译所提供的整体(服务)质量的标准。由于它既具有鲜明的专业性和职业性,又具有经济、旅游服务、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跨)文化和民间外交等属性,故与其他口笔译标准不同。中国学者提出十几个公式以评判导译的整体质量,并反映导译工作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元性。导译标准除了具有学术性,还能创造出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资本。最重要的是,导译标准能显示出导译员的主体性,且具测试性。

导译标准并不(完全)是传统上甚至中外翻译界所讨论的那种"标准",它涉及对人评价的标准,并成为影响判断导译标准的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承担陪同口译或涉外旅游接待,导译员必须把整个接待过程视为一个"交际单位",或"一个完整单位的交际"。这一交际单位的构成成分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六要素(行、游、住、食、购、娱)"。假设在其他五个要素没有出原则问题的前提下,"完整单位交际"是否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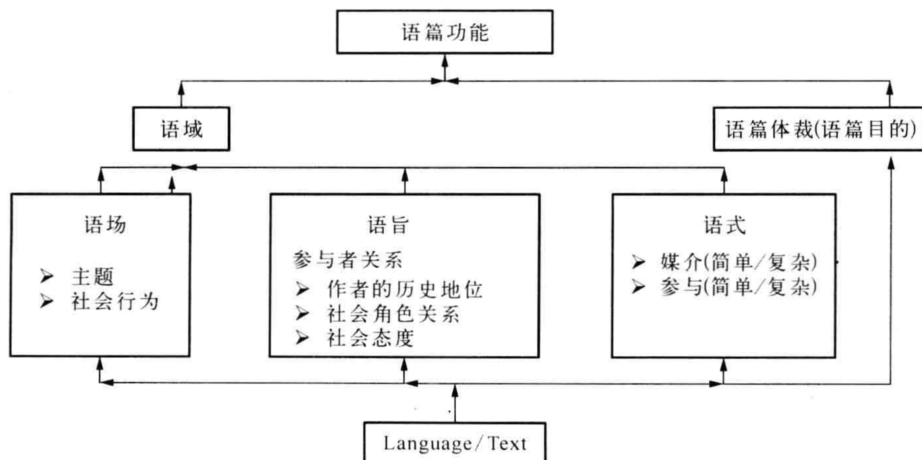


图1 原文与译文分析比较图(House 1997:108;张美芳 2005:30)

功,就完全看在旅游者"游"(第二个要素)的过程中导译员是如何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陈刚 2006: 222～231)

翻译工具 translation tool

通常指协助翻译人员进行翻译工作的软件包,包括:文字处理组件(word-processing packages)、个人术语管理系统(personal terminology management system)、基于CD-ROM的术语库(terminology banks on CD-ROM)、文档数据库(documentary data bases)、计数器(word counters)、拼写检查工(spelling checkers)、搜索工具(search utilities)、翻译对比工具(version comparison utilities)。扩大地说还包括机器翻译系统:有通用翻译系统(general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s)、专用翻译系统(dedicated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s)及翻译记忆器(translation memories)三类。

网络论坛 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

指利用电脑网络进行信息交换的"电子公告牌系统"。它是一个开放的、互动的公共空间,不受时空限制,信息更新迅速,门类齐全,查找便捷。作为一个虚拟社区,BBS要求参与者必须注册才能参加讨论,要为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为负责,所发帖子必须要符合版块的相关规定,否则版主可执行管理权限予以剔除。BBS的主要功能为讨论,因而也称"讨论组"或"论坛",有人喻之为"公共茶馆",颇为神似。BBS论坛大多是依据主题设立,如综合性论坛、政经类论坛、英语学习论坛等,不一而足。论坛内部再按照不同的主题分成若干个子论坛。

比较著名的翻译论坛,如中国日报的"Chinadaily BBS",面向译员和翻译学习者,具有翻译互助、新词翻译讨论、翻译擂台赛、名家点评、回答问题等功能。注册人数超过四万的"译网情深"论坛还提供翻译技术交流、网上译员招聘、翻译项目招标等服务。"ECO论坛"(Economist China Organization)围绕 *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杂志交流思想,练习翻译。翻译论坛的出现,为译界从业人员、翻译学习者实现资源共享、交流翻译心得提供了良好平台,为翻译公司、译员、客户之间搭建了一座合作的桥梁,但以讨论译学理论为主题的网络论坛似尚未出现。(据贺莺 2007)

光学符号识别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

翻译工作使用的工具之一,可配合扫描仪识别录入文件,储存并供编辑。如果源语文件是印刷品,要想在翻译这些资料的时候使用CAT软件,就必须首先将印刷品转换为电子文档。手工录入费时费力,而使用扫描仪扫描书籍,得到的是图像文件,其中的字符其实都是以像素的形式储存的,无法编辑、搜寻和引用,也无法导入TM软件建立翻译项目。要想将这些图像中的文字转换为可以编辑的字符,就必须借助OCR软件来实现。在汉字识别方面,比较成熟的有汉王系列的OCR软件。而对于英文,目前最佳的选择可能是俄罗斯的Abby FineReader,此外还有OmniPage,TextBridge等。配合普通的平板扫描仪,使用Abby FineReader可以在一天时间内轻松识别三四百页的外语书。国外许多大学的电子图书馆中的书籍,就有不少是通过OCR配合专业扫描仪识别录入的。其代表如Project Gutenberg(http://www.dbta.com/columnists/marge/a_la_marge_1103.html),以及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的Electronic Text Center(http://etext.lib.virginia.edu/),这些电子图书馆的建立都大量使用了OCR技术。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China Aptitude Test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ATTI)

该考试是根据建立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精神,在全国实行的统一的、面向社会的、国内最具权威的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认证,是对参试人员口译或笔译方面的双语互译能力和水平的认定。其目的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加强我国外语翻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便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翻译专业人才的水平和能力,更好地为我国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与合作服务。

根据国家人事部《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暂行规定》(人发[2003]21号)的精神,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在国家人事部指导下,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组织实施与管理。中国外文局根据《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暂行规定》组建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拟定考试语种、考试科目、考试大纲和考试命题,研究建立考试题库等有关工作。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负责该考试的具体实施工作。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合格后,由国家人事部统一印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证书》。该证书在全国范围有效,是聘任翻译专业技术职务的必备条件之一。根据国家人事部有关规定,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已经正式纳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该考试在全国推开后,相应语种和级别的翻译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不再进行。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于2003年12月进行首次试考。现每年5月份和11月份举行,上半年考试语种为:英语、法语、日语、阿拉伯语,下半年考试语种为英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同声传译每年11月份举行考试。各地报名时间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网www.catti.net.cn会及时公布。(据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 2007)

翻译技术 translation technology

指在翻译实务、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实际使用

或可能使用的各种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包括电子词典、软件、语料库、在线翻译服务等。大致可分四大类：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机器翻译工具、电子资源、一般工具。各大类均包括若干子类。1. 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可细分为七个子类：翻译记忆系统(translation memory systems)、术语管理系统(terminology management system)、对齐工具(alignment tools)、软件本地化辅助工具(software localization support tools)、网页本地化辅助工具(web localization support tools)、字幕辅助翻译工具(subtitling support tools)、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套件/翻译工作站(translation workstation)。2. 机器翻译工具按用户和用途也可细分为七个子类：家用机器翻译系统(MT system/home use)、网页机器翻译系统(MT system for Web)、专业译员用机器翻译系统(MT system for professional use)、企业用机器翻译系统(MT system for enterprise)、口语机器翻译系统(MT system for spoken language)、在线机器翻译服务(MT service for on line)、在线机器翻译服务入口(MT portal)。3. 电子资源可以细分为以下七个子类：电子词典(electronic dictionary)、电子百科全书(electronic encyclopedia)、单语语料库(monolingual corpus)、平行语料库(parallel corpus)、类比语料库(comparable corpus)、翻译语料库(translational corpus)、万维网语料库(web as corpus)。使用电子资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检索，即要从海量信息中搜索到翻译工作者所需的信息。4. 一般工具指通用的软件，如文字处理软件(Microsoft Word)、字数统计工具(CATCount Microsoft Word)、拼写语法检查工具(Aspell Microsoft Word)、审阅工具(Microsoft Word track changes)、文本对比工具(Exam-Diff)、网络工具(Internet Explorer)、图像编辑软件(Photoshop)、PDF文件处理软件(Acrobat Professional)、桌面出版工具(FrameMaker)等。(据王涛，鹿鹏 2008)

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

指交际中投入的社会努力，包括生产、辨别、转移、翻译和评价信息所需的费用。翻译虽不总是出现在这个链条中，却是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原因是：1. 翻译用于特定的跨文化交际场合，共同的规范尚待牢固树立；2. 成本虽高但可以调节，否则合作就会失败；3. 翻译成本与译作评价是有关联的，机译成本低，但可读性差，翻译的低成本正好给提取相关信息所需的高成本抵消。翻译是一种特定的受经济和伦理制约的可变交易成本。(Pym 1995：594～605)总体来说，无论就投入的社会努力、译员的薪水标准还是翻译错误的影响而言，翻译都可算一种成本较高的活动。按照协商理论(negotiation theory)，交际中投入的交易成本不可超过合作所取得的效益，因此，要尽量降低翻译成本，减少不必要的翻译，有时可摘译或编译，或先翻译目录和提要，再决定翻译的完整程度。全译无用信息，不光翻译费用提高，读者获取信息所花的时间和努力也会增多。按照交易成本理论，译者除了翻译外，还应该预先对信息进行提炼，对文本的翻译方法和实现合作的最佳手段提出建议。翻译和语言学习都是跨文化交际的手段，从交易成本来说，前者适合短期合作，后者适合长期合作。交易成本理论为编译提供了经济学依据，对文学翻译同样有解释力。文学翻译可看做传承世界知识的成本，不少文学翻译有引进新思想、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等功利因素。总之，不管当时出于何种目的，翻译本身总是有意无意地成为促成合作所付出的成本。　(贺显斌)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亦称"智能模拟"，是现代信息科学的重要分支。在分析人脑思维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电子计算机和各种电子设备模拟人脑的信息处理过程，包括图形识别、学习过程、探索过程及环境适应等理论和技术。与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研究密切相关，如机器翻译即是模拟人脑对外族语言的接收、理解、分析和用本族语表达的过程。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新一代机器翻译中的语义分析建立了基础。参阅"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　expert system

指模仿某一领域专家的思维活动，利用知识库进行推理，向用户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计算机应用系统。目前主要用软件实现，对作出决策的过程作出解释并有一定的学习功能(即在专家或用户的训练下自行增长解决问题所需的知识)。专家系统一般由接口、知识库、知识获取和推理机组成。专家系统是人工智能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用于那些必须用专家知识与经验才能求解问题的领域，包括诊断、预测、设计、控制、辅助教学等。现在，大多数专家系统采用工具开发，工作效率可提高几十倍。今后实用专家系统及专家系统工具的发展，对计算机体系、计算机应用及软件的发展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机器翻译　machine translation (MT)

亦称"机译"或"自动化翻译"，是利用计算机把一种自然语言转变成另一种自然语言的过程。用以完成这一过程的软件叫做机器翻译系统。机器翻译是应用语言学中一门新兴的实验性学科，研究如何利用电子计算机按一定程序自动进行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机器翻译自20世纪30年代初由法国科学家阿尔楚尼(Artsouni)提出设想，已经历了70多年，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至今已进入初步的实用阶段，广泛用于天气预报、文献加工与检索、通信以及与工农业有关领域。

机器翻译的研究是建立在语言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这三门学科的基础之上的。语言学家提供适合于计算机进行加工的词典和语法规则，数学家把语言学家提供的材料形式化和代码化，计算机科学家给机

器翻译提供软件手段和硬件设备，并进行程序设计，三者相辅相成。

人机交互机器翻译　interactive machine translation

指在自动翻译的主要过程——分析、转换及生成中，允许人的介入。在某些情况下，如语言结构产生歧义时，机器无能为力，人的介入会使问题轻而易举地解决。人的介入应是目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的最佳出路。人机交互机器翻译的基本理论依据是：语言是一种离散的、海量的、开放的现象。语言统计分析表明，语言单位的使用频率高低悬殊。现代英语中不到一万个常用词对英语文献的覆盖率可以达到99%，而几十倍于此的词汇只是覆盖了余下的1%。语法规则也有类似情况。能解释99.9%的语法现象的规则是有限的，而要对其余0.1%的罕见语法现象都能进行处理的规则，很难完善地建立。基于这一情况，只让计算机系统做它擅长的工作，而把那1%或0.1%的离散的、无明确规则的工作留给翻译人员来完成，使两者互补长短、各尽所能，则必将大大简化机译系统，提高翻译速度和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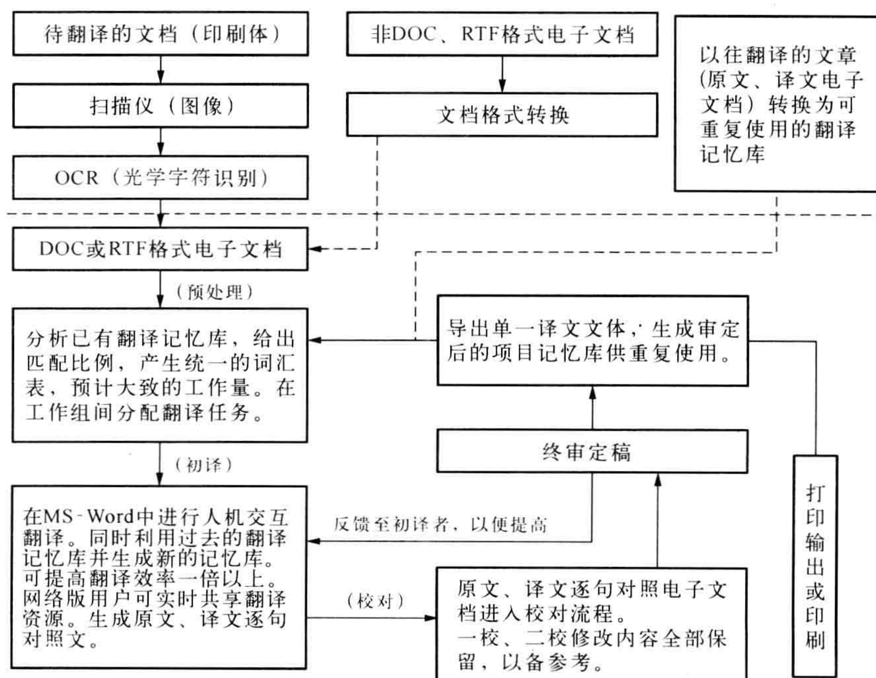
机器提问而操作员随时解答这种人机交互的工作方式是机器翻译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创举之一。它和现阶段机器翻译研究的整体水平是相适应的。因此，目前正在研制的各类机译系统，无论是大型机上用的还是个人机上用的，都会带有某种交互式的因素。一些系统可以选择"全自动模式"或"交互式模式"，后者用于对译文要求较高的场合。英国机器翻译专家哈钦斯(Hutchins)预言：在不久的将来，译者很可能将在一种被称为"译者工作站"的计算机上工作。这种工作站由一个文字处理器、一个包括词典与其他参考书的电子工具书库、一个多层次的交互式机译系统和一个全自动通用型机译系统组成。译者可以根据所译材料选择使用何种系统。

电话自动翻译　auto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elephone

即把语音识别、语音合成技术应用于机器翻译，实现语音机器翻译。1987年10月在日内瓦召开的TELECOM'87会议期间，举办当时最新的通信技术国际展览会，表演了自动翻译电话的试验。试验把机译系统与办公用通讯网(NTT，KDD，PTT)结合起来，利用通信卫星，在瑞士与日本之间通话并作自动翻译。目前，电话自动翻译在可视电话会议口译、媒体口译、接力同声传译等方面已有广泛应用。

机助翻译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CAT)

亦称"半自动翻译"，是一个完整的文字处理系统，具有输入、显示、翻译、编辑、保存、打印等功能。其原理是：计算机存贮词语于数据库中，建立机器词典，再由计算机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进行词汇自动检索，如查找对应的术语、成语等，由译者在句法、语义、修辞等方面再加工，在人的参与下完成整个翻译过程，其翻译质量与人工翻译等同，但翻译效率可提高一倍以上。有的还配有增强工具，可将翻译过的资料转换为资源库，避免重复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的流程见下图：



计算机辅助翻译流程

机译过程　proces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指利用计算机模拟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转换的过程。人工书面翻译和机译过程相似，都可分为五个步骤，两种翻译的步骤对照见下图：

步骤	人工书面翻译	机器翻译
1	阅读原文	输入原文
2	查生词	识别单字
3	分析原文	分析原文
4	转换生成译文	转换生成译文
5	写出译文	输出译文

人工书面翻译和机器翻译步骤对照

机译软件　software for translation

亦称“翻译软件”(MT software)，指计算机辅助翻译使用的软件，一般用于专门用途文体(如科技文体)的翻译。有的虽冠以 AUTO，但并非完全代替人工进行翻译。实际上，译者只是利用其提供的操作平台，减少重复的和机械的劳动，提高工作效率。国内外大多数翻译软件基于语法结构的翻译内核，即对语言的语法结构分析后，归纳总结成规律，用于机器翻译。这对原文符合标准逻辑语法的句子是有效的。然而，语法现象千变万化，词汇含义和搭配各不相同，语境纷繁多样(虽然软件常分为不同的专业版推出)，所以这类软件很不理想，译后加工量是很大的。另一种翻译软件基于模式结构的翻译内核，即基于传统语法树和自然语言的一种广义语法，可让计算机根据设定的规则举一反三进行翻译，模仿人工智能，不断学习新的语法，扩大规则范围。广义语法的基础是句型和“类”。这使语法的表示形式更简易，具有扩展性，并可分类继承，提高系统的专业翻译水平，改进多义词的选词机制。现以软件 *TransBridge* 为例。当条件满足编程规则时，以下译文尚可差强人意：The movie summarized the projects *that* students would need to complete during the semester. 译为：**电影概述那些学生将会在学期期间需要完成的计划**。而如果同一句子，意思不变，形式略作改变，如把其中的关系代词 that 去掉，则该软件译为：**电影概述那些计划学生将会在学期期间需要完成**。译文既不达意，又不通顺。

网上机器翻译　on-line machine translation

亦称“在线翻译”，指应用计算机通过互联网查询，在浏览资料时借助联机翻译软件进行的实时翻译。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用不同语言写成的电子信息均可在网上发表。网上机器翻译应信息全球化交流之需应运而生。至今，已有多种系统问世。如 SYSTRAN 公司的免费网页翻译服务，已为欧盟成员国采用，实现了英、法、德、意、西、葡等多种语言的互译。Globalink 公司提供 Web Translator 的翻译软件，可进行英、法、德、意、西五种语言的互译；而 CompuServe 公司提供环球公众论坛(World Community Forum)在线翻译服务，论坛参与者可用英、法、德、西中的任何一种语言在网上交谈，稍等片刻，即可有另外三种译文的文本出现。

统计机器翻译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统计机器翻译的思想最早来源于香农(Shannon)和韦弗(Weaver)的信息论。早在 1949 年，韦弗就在著名的机器翻译备忘录中提出了机器翻译的基本思想。他认为可以通过统计方法来找出语言共性，发现共同语，从而为语言之间的互译提供简便的途径，由于当时缺乏高性能的计算机和联机语料，采用统计机器翻译在技术上还不够成熟，他的方法难以实现。随着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在速度和容量上都有了大幅提高，大量的联机语料可供使用。20 世纪 90 年代初，IBM 的布朗(Brown)等人又提出基于信源信道思想的统计机器翻译模型 Candide，应用于英法双语的互译，并且在实验中获得了初步成功。目前，统计机器翻译可以大致分为基于信源信道思想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基于句法结构的统计翻译模型、基于最大熵思想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等主流派别。

统计机器翻译可以实现对现有译文的充分利用。其基本工作方法是建立统计模型，制订算法规则，并使用大量高质量的双语平行语料对系统进行培训。算法规则尤其是对齐模型(alignment model)是统计机器翻译的核心，需要大规模的双语语料库来估计有关参数。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以机读格式存取的双语文本浩如烟海，一旦对齐模型建立后，只需将双语文本对齐、加工，即可由统计机器翻译引擎读取、学习，从而大大提高了建设效率和翻译质量。例如 Google 公司就将 200 亿词级的联合国多语种官方文档导入其翻译引擎进行培训，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了翻译引擎的质量。

传统的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工作机制是通过对语言规则进行深入研究并不断修订，通过词汇、句法等层面的机器转换而实现翻译的，这种转换的研究复杂而艰巨，而转换结果却生硬、不自然，无法与人工翻译相媲美。统计机器翻译另辟蹊径，用人工翻译的高质量译文来培训翻译系统，使得翻译系统中的语料更加真实地道，更符合人工翻译的规范。

最早的统计翻译系统是基于词的翻译模型，只考虑词与词之间的线性关系，没有考虑句子的结构及上下文信息，在两种语言的语序相差比较大时效果不好。随着研究者不断的努力，出现了基于短语的翻译模型，基本思想是从大规模语料库中抽取大量对齐短语片断，利用这些短语片断来匹配组合要翻译的句子。由于短语的限制使得词的翻译选择更为准确，而且有助于一些常用语及成语的翻译，并且相对确定了翻译的语序，使得翻译的结果更加符合目的语言的特征。由于统计机器翻译是在词汇、习语乃至篇章层面

针对海量双语平行语料的挖掘,因而比基于规则的传统机器翻译质量更高。而且,统计机器翻译的建设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更加快捷,成本更低。

特别在某些专门领域,如法律或新闻,利用大量的专业双语语料对翻译引擎进行训练,就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较短的时间取得良好的效果,从而实现该领域的高质量翻译,这或许是未来统计机器翻译的一个趋势。在这方面,Google 通过对联合国官方文档来训练其翻译引擎,其良好的政治文献翻译能力就是充分的证明。(据王正,孙东云 2009)

后编辑 post-editing

机器翻译中的术语。指对机器翻译系统产出的译文加以调整和修改,以便消除那些影响译文理解的错误,或使译文的语言更加自然流畅。机器翻译经常出错或生搬硬套,因此后编辑是必要的。但后编辑所费的时间、精力不能超过人工翻译,否则机器翻译就没有必要了。

预编辑 pre-editing

指机器翻译前对原文的处理。大部分机器翻译系统对于较复杂的语言结构都无法分析,因此,译前有必要对原文的语法结构和词语进行简化。预编辑的方式很多,其中包括重写、简化句型、减少关联词或增加明确无误的连词等。预编辑通常由人工进行。

作者型机器翻译 writer-oriented machine translation

塞杰尔(Sager)(1994)在 *Language Engineering and Translation: Consequences of Automation* 一书中所用的术语表示这是一种与原文作者关系密切的机器翻译。这种翻译涉及先编辑。如果机器无法分析语言,必须有专人(如作者)对它进行解析,作预处理。这种翻译的最大优点在于不带译者色彩,较好地显示出原文作者的最初意图。

读者型机器翻译 reader-oriented machine translation

塞杰尔(Sager)在 *Language Engineering and Translation: Consequences of Automation*(1994)一书中用该术语表示:通过机器翻译快速产生译文,以便让目的语读者对原文及早有一个初步了解。因为机译又快又省,塞杰尔认为,译文即使难读,读者也可接受。这种译文是个"毛坯",没有经过后编辑。它的优点是快速提供给读者有一定篇幅的、包含原文基本语义和术语的译文。

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 machine translation based on examples

在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系统中,系统的主要知识源是双语对照的翻译实例库,实例库主要有两个字段,一个字段保存源语句子;另一个字段保存与之对应的译文,每输入一个源语的句子时,系统把这个句子同实例库中的源语句子字段进行比较,找出与这个句子最为相似的句子,并模拟与这个句子相对应的译文,最后输出译文。

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系统中,翻译知识以实例和类义词典的形式来表示,易于增加或删除,系统的维护简单易行。如果利用较大的翻译实例库并进行精确的对比,有可能产生高质量译文,而且避免了基于规则的那些传统的机器翻译方法必须进行深层语言学分析的难点。这在翻译策略上是很有吸引力的。建立在大规模真实文本处理基础上的机器翻译,是机器翻译研究史上的一场革命,它将会把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基于语料库的机器翻译 corpus-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

宏观上,基于语料库的机器翻译的运行机制分成五个环节:1. 文本扫描:机译引擎从用户所指定的原文执行逐词扫描,将字符流进行一定的标记之后,输入文体缓冲池;2. 文体缓冲池:启动自动文体分析引擎,首先对源语文本进行"文体关键词的自动判断",然后在文体特征数据库中查询文体关键词究竟是属于哪一个语域;同时,也对源语文本的句型进行文体分析,从而提高对源语文本的整体和局部文体特征判断的准确率;3. 文本缓冲池:在对源语文本(包括整体和局部)的文体作出判断的基础之上,启动自动文本分析引擎,该引擎将利用源语语料库的各种语料信息(特别是单词与词组的用法概率及其不同意义的用法概率)和源语句型库(包括各种句型及其一般使用概率和基于语域的使用概率),对单词词性和多义词的具体含义作出自动判断;在上述文体和文本句型及词义分析之上,进一步分析、判断并记录词从之间的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4. 译文缓冲池:在接收到文本缓冲池输入的文本字符流和各种分析资料之后,译文缓冲池内部的目的语句型引擎将根据文本缓冲池所分析得出的修饰语与被修饰语的数据,同时查询目的语句型数据库,对经过上述自动处理的"临时译文"进行符合目的语句型的修饰语与被修饰语相对位置的自动化调整;5. 最终译文:经过四个计算机处理环节之后,源语文本的机译结果将以一份文本文件(*.txt)的形式出现在用户指定的文件夹或者该基于语料库的机器翻译程序的默认文件夹中。由于技术原因,基于语料库的机器翻译离真正实施尚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翻译记忆 translation memory

是计算机翻译文件和专业文献的一种较新的核心技术,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发展。它的工作原理为:用户利用已有的原文和译文,建立起一个或多个翻译记忆库,在翻译过程中,系统将自动搜索翻译记忆库中相同或相似的翻译资源(如句子、段落),给出参考译文,使用户避免无谓的重复劳动,只

须专注于新内容的翻译。翻译记忆库同时在后台不断学习和自动储存新的译文,扩大记忆量。

翻译记忆实现的是原文和译文的比较和匹配,支持多语种之间的双向互译。以德国塔多思(TRADOS)公司为例,该公司的产品基于UNICODE(统一字符编码),支持55种语言,覆盖了几乎所有语言版本的Windows 95/98/NT。换句话说,一套产品就实现了各语种间的双向互译。

从一个典型的翻译记忆系统的工作流程来看,翻译记忆软件通过对项目进行分析和预处理,在用户开始翻译之前,就自动翻译完所有高度重复的内容,再通过网络共享翻译资源,每个局域网的成员都可以共享翻译记忆库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该技术以神经网络数据库作为平台,所以整个翻译流程都可以通过数据库在局域网轻松实现翻译质量监控、数据更新和修改,为翻译工作工业化、产业化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翻译编辑环境　environment of translation edition

指译者进行翻译工作的文字处理程序环境。依翻译编辑环境不同,目前所有的翻译记忆系统可分为嵌入式和独立式两类。

嵌入式系统需要借助文字处理程序Word为工作界面,安装后会创建一个新的Word模板,借助Word中的VBA功能增加用于翻译记忆操作的工具栏和宏命令。译者仍然在Word中进行文档翻译。简单的嵌入式系统(如Wordfast)可以仅仅是一个Word模板文件,复杂的嵌入式系统(如Trados)还有外部程序(workbench)同内置的Word模板相连接,提供更为高级的功能。

独立式系统的翻译过程不使用Word等外部文字处理程序作为编辑器,全部翻译工作都在系统内进行。翻译之前通过各种内置过滤器(filter)将相应格式的文档中的源语言导入,在系统内部完成翻译后导出为原文档格式的译文。一些独立式系统(如Catalyst)专门面向软件的本地化,虽属翻译记忆系统范畴,但已被视为本地化工具。(据苏明阳 2007)

翻译记忆检索　retrieval of translation memory

指通过翻译记忆系统对翻译资源进行检索。翻译记忆匹配检索技术归为两类:基于字符串的匹配检索和语言学知识增强匹配检索。基于字符串的检索方式是翻译记忆检索的传统方式,目前的翻译记忆系统绝大多数都是基于字符串的检索,借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的"编辑距离"(edit distance)比较字符串之间的相似程度,并用一个百分比表示匹配率。这种检索方式仅考虑到语言的形式而不涉及语言的意义,检索精确度不高。曾有研究者在Trados中用以下三个句子进行了测试:

(1) The wild child is destroying his new toy.

(2) The wild chief is destroying his new tool.

(3) The wild children are destroying their new toy.

系统给出的结果是(2)与(1)的匹配率高于(3)与(1)的匹配率,然而(1)与(3)之间仅仅是主语单复数的不同,从意义上来说更为接近。

语言学知识增强检索技术是翻译记忆系统发展的新趋势,但实际应用这种技术的系统为数不多。其中,Similis翻译记忆系统在句段切分后运用词频统计,Ngram模型将句段进一步切分为语块(chunk),借助于单语字典和语法范畴识别算法进行语法标注。而一款名为Masterin的翻译记忆系统据称可以根据翻译记忆库(知识库)中的例子更为灵活地切分源语文本的句段,并对每个句段都进行语法信息标记,构成一个"翻译模式"(translation pattern)供深层检索。同时出现多个翻译记忆匹配时,系统还会结合内置字典给出的语义、使用频率和领域信息进行筛选比较。若无匹配,系统还会综合利用库中已有资源构建模糊匹配提供给译者。

利用语言学知识增强的匹配检索技术目前也被非正式地称为"第二代翻译记忆技术",它在匹配检索能力和匹配精度上较基于字符串的匹配检索技术有所改善。但"第二代翻译记忆"更依赖于特定语言的语言学知识与资源,因此建立一个能有效运用于翻译的语言学知识库并非易事。(据苏明阳 2007)

翻译记忆模型　models of translation memory

即翻译记忆的储存方式。根据国内研究者的分类(王华伟,崔启亮 2005:107),目前翻译记忆模型共有两种。其一是数据库模型。在这种模型下,翻译记忆以"翻译单元"(translation unit)的形式储存,源语句段与目的语句段精确对应。目前绝大多数翻译记忆系统使用的都是这一模型。另一种是引用模型。这种模型并不将源语句段同目的语句段成对保存为翻译单元,而是利用"双语文本字符串"(character-string-in-bitext,CSB)检索技术(Gow 2003:34~37)检索并引用其在文档中所出现的位置。采用这种模型的翻译记忆系统有MultiTrans、LogiTrans和STAR Transit等。

这两种模型各有优劣。引用模型建立大型翻译记忆库时更为快捷;用户检索的任何结果都附有上下文语境;双语文本保持完整,可作为译者背景阅读材料或培训资料。而数据库模型中的数据更易于管理和维护;翻译记忆为即时更新,能够识别并处理同一文本中的重复性文本,而不像引用模型中的翻译记忆必须在当前文本翻译全部完成后才能更新为翻译记忆。此外,目前的翻译记忆交换标准TMX是基于数据库模型的,这使引用模型翻译记忆较难共享与交换。(据苏明阳 2007)参见"翻译记忆"

翻译系统　translation system

1. 指计算机根据某种规则,将一种代码换为另

一种代码的程序。计算机能执行用机器语言编制的程序,而用其他语言编制的源程序,需通过翻译系统翻译成机器语言程序才能投入运行。代码转换前后它们的功能是等同的。翻译程序或翻译系统有汇编程序、解析程序、编译程序等;2. 人工智能领域的翻译系统,指实现各种自然语言之间相互翻译的计算机软件系统。配有翻译系统的计算机称为翻译机。目前,各国研制的翻译系统或翻译机种类繁多,如英俄、俄英、俄德、俄法、英法、德法、日法、英意、汉英,等等。翻译系统把大量的单词存入计算机,然后计算机一边查字典一边进行语法分析,以实现自动翻译工作。目的语可以是语音的,也可以是文字的。目前技术资料、科技论文的题录和文摘的翻译和编排已部分地采用翻译系统。

25. 翻 译 史

翻译史 translation history

指记述人类社会翻译活动和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的历史。西方世俗作品的翻译可追溯到公元前 3 世纪。公元前 6 世纪,罗马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社会,建立了奴隶制贵族共和国,取代了希腊在地中海的统治地位,成为强大的帝国。希腊有灿烂的文化遗产,从公元前 3 世纪起,即在共和国鼎盛时期,罗马人便开始大规模翻译,汲取希腊的典籍,模仿继承希腊文化。西方第一位著名翻译家是罗马史诗和戏剧的创始人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约前 284～约前 204),他的第一个译品是荷马史诗《奥德赛》。欧洲的翻译主要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移植开始,历经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直至现代,通过世俗作品、碑文史诗、希腊戏剧、经典著作等的普遍传播,使欧洲文化得以普遍繁荣和发展,而《圣经》的翻译又似一条主线贯串西方翻译史的始终。

"大概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就有了传译之事。……当时中原文化高于边陲民族,所以通达志欲只限于言语的沟通,也即所谓口译。"(罗新璋 1984:1)当时尚未出现文字,谈不上文字翻译。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也不滞后于西方。笔译的起点不是始于汉以后的佛经翻译,而是始于先秦时期的诗歌翻译。《越人歌》即是我国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最早的部族之间的诗歌译作。在我国的翻译发展史上,出现了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前后的西学翻译三次翻译高潮,而目前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每个翻译时期不仅造就了一批杰出的翻译家,而且形成了互有联系、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我国的翻译史是一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历史,是我国吸纳外来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的历史。

中国翻译史分期 historical division of Chinese translation

我国翻译史的分期尚无定论。马祖毅认为"五四"运动之前有三次翻译高潮:1. 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2.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3. 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周作人认为可分为三个段落:1. 六朝至唐之译佛经;2. 清末之译《圣经》以至《时务报》时代;3. 经严复、林纾过渡到新文学时期。陈福康则按一般的中国历史分期,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时期:1. 古代时期大致与马祖毅、周作人的第一时期相当,即佛经翻译时期;2. 近代时期涵盖了马祖毅提出的后两次翻译高潮。这是我国的一个启蒙与救亡的时代,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继佛经翻译衰落,西学(特别是科技)东渐的时期;3. 现代时期是指"五四"前后直至 1949 年全国解放的时期。"五四"前夕,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或是周作人所言的"新文学时期"开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李大钊、鲁迅等纷纷加入《新青年》行列,译坛明星迭出,译介国外新思想、新观点以及革命文学作品成为时尚,对译论的探讨和争论异常热烈;4. 当代时期始于 1949 年,是我国历史上翻译事业发展规模最大的时期。

佛经翻译史 history of Buddhist sutra translation

自印度佛教传入时起,中国本土就兴起了佛经翻译事业。从 148 年(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安世高译经到 1037 年(北宋仁宗景祐四年)译场停顿,凡 889 年,计有知名译家 192 人,译出佛典 1 333 部,5 081 卷(据《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印度佛教大小乘之经、律、论三藏几乎全部被译成汉文。在这八百余年间,佛经翻译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一、草创时期,从东汉至西晋,中国佛经翻译事业信而有征,当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始。最早的翻译家有两人:安世高、支娄迦谶(简称支谶)。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色,主要有大小乘两大系统,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因此,早期传入中国的佛经可以说是大小乘同时并行。三国时最有成就的译家是支谦。支谦译经很讲究文丽简略。他首创了合译和译注的方法。初期经典的传译并非直接从印度而来,而是从大月氏、康居、安息等西域诸国间接引入。当时翻译所根据的经典大都是由西域当地的语言或文字写成,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此一时期的译经多属个人翻译,并无固定人员共同参与译经,限于人力、财力,只能译出小经小品,缺乏系统;且来华的高僧皆在传教余暇译经,并未取得朝廷的护持,翻译工作亦无特定地点,文体不一,译名混淆,故称为译经的"草创期"。二、发展时期,东晋至隋代。东晋到南北朝之间,译经初期多为私人小规模的组织,后来逐渐受到国家重视,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译经组织,以前二人对译的形式开始转向多人合作,集体翻译,于是出现了佛经译场,使译经事业更加蓬勃。

译经师大都来自印度,精通梵文,兼解汉文,主要代表人物有鸠摩罗什、佛陀耶舍、竺佛念、昙无谶、求那跋陀罗、真谛、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法显等人。译出的经典主要有大小乘经论、大小乘禅经、密教经、律典等,内容广泛,涉及印度佛教各个流派,促进了当时佛学思潮的发展。这一时期道安还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彦琮著有《辩正论》,总结出"十条八备"的翻译理论。这一阶段最杰出的译家为鸠摩罗什和真谛,他们均被列入中国佛教四大译家。此期译经的特点是传译较完备,译经师有系统地介绍佛经,分判不同宗论著作,确立翻译文体,翻译作品不求华美,力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佛经的进展期。三、成熟时期,到唐朝时,佛经翻译进入成熟期。前两期的译经活动虽有中国人参与,然总体上均以印度、西域高僧为主译。此时的特点是:主译经师以中国僧人为主,他们都精通华文、梵文,佛学造诣深;译经的计划性很强,节译选译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且以朝廷力量设置组织完备的译场,进行大规模的译经事业。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四大译家,有两名(玄奘和不空)都出在唐代。所译佛经在忠实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代。这一时期的典型译家是玄奘和义净,其他还有般若三藏、菩提流志、实叉难陀等人,也都为译经事业缔造了佳绩。这是中国译经的巅峰期,同时也是佛教的全盛期。四、衰微时期:北宋。自唐末至北宋太平兴国时约200年间,中国佛经翻译事业一度停顿。983年(太平兴国八年)始重建译场,至1037年(景祐四年)最后结束,凡56年,译出五百余卷经论。前后译家可考的有15人,即法天、天息灾、施护等。宋代的译场组织虽极完备,译经总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

西方译论史　histor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斯坦纳(Steiner)把西方翻译理论史分为四个时期:1. 从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到18世纪末坎贝尔(Campbell)和泰特勒(Tytler)二人所谓"翻译三原则"的发表,为古典译论时期。古典译论取哲学之精华,又不囿于哲学权威的定论。西塞罗和霍拉斯(Horace)(前65～前8)提出的"自然"与"和谐"的翻译美学观,很显然受到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理性论的影响。西塞罗强调理念的相对性,认为译者"不应以僵化的理念(rigid reason)为原则来指导翻译中的模仿,及致损害原文的风貌"。霍拉斯也赞成模仿,但他明确地反对"词对词"的翻译,主张"意义对意义"(sense for sense)的翻译。古典时期是翻译理论的准备期,以译家的经验之谈为主,虽然也具有哲学和诗学的某些特点,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2. 始于18世纪末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止于20世纪中,为翻译理论的探索期。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诠释主义学派(Hermeneutics)对欧洲中世纪(公元500年至17世纪末)愚昧主义进行挑战。诠释派的宗旨是对意义求本溯源,反对中世纪教廷对《圣经》的解释,冲破了经院哲学神秘主义的壁垒。施莱尔马赫提出以文本的共时的共识为依据确定语义,反对武断;同时,词义须以语境为参照。这样就否定了对《圣经》的神权论教条主义的解释,代之以人文主义的批判态度。施莱尔马赫的思想被后人继承和发展。3. 20世纪40年代末以及50～60年代为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以欧美结构主义发展为契机和背景,与之相应的是翻译理论中语言学派的兴起。这是翻译理论的现代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第一批机器翻译论文的发表,前苏联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和批评家继承了形式主义运动,把语言学和统计学应用于翻译研究。奎因的《词语与对象》(1960)则描述了形式逻辑与语言转换模式之间的关系。信息论被介绍进翻译研究的领域。费道罗夫(Фёдоров)的《翻译理论概要》在1951年发表。而布劳尔(Brauer)《论翻译》(1959)和阿罗史密斯(Aerosmith)和沙特克(Shattuck)《翻译的技巧和上下文》则代表了翻译研究的新方向。此外,代表人物还有维奈(Vinay)、奈达(Nida)、穆南(Mounin)、卡特福德(Catford)等。4. 从20世纪70年代起,翻译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趋势,表现在对本雅明(Benjamin)《译者的任务》一文的重新发现和海德格尔(Heidegger)等一批哲学家的加入,重新复活了阐释学,并对翻译和阐释进行了形而上学的探索。转换生成语法引发了语言的共性论者(universalist)和语言的相对论者(relativist)之间的争论。解构主义、认知语言学、关联理论等引入翻译研究,对翻译理论又有了新的影响。

西方的翻译高潮　major phases of Western translation

指西方翻译史上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西方翻译史上出现过六次高潮:1. 肇始阶段:公元前4世纪末,希腊文学(尤其是戏剧)被翻译成拉丁语,介绍到罗马;2. 罗马帝国后期到中世纪初期: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的《圣经》被翻译成拉丁语和各种民族语言;3. 11到12世纪,西方翻译家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4. 文艺复兴时期(14至16世纪):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民族语言翻译开始兴旺;5. 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大量古典的和近、现代译作问世;6. 二战以来:范围扩大到科技、商业领域,规模超过以前,出现职业翻译,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人们兴办高等翻译教育,成立各种翻译组织,开展机器翻译研究。目前,西方的翻译仍处在第六次高潮中。(谭载喜 2000a)

《辩正论》　*Bianzheng Lun* (*On the Right Way*)

是隋代名僧彦琮(557～610)的翻译专论,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翻译的论文。全文记录在《彦琮传》中,广为流传,影响深远。他著名的"八备"说,系统论述译者主体要求的八条内容(参见"'八备'说")。

除此之外,《辩正论》中还有其他若干重要的理论

观点：1.《辩正论》以直言不讳的态度批评了前人翻译佛经的得失，强调“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转引自罗新璋，1984：46）的翻译原则，在基本精神上坚持了道安所提倡的“质”译（与当时的“文”派相对）的贵朴原则。2. 肯定了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理论所体现的远见卓识，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进一步阐发了道安的本体论思想。例如，《辩正论》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全文摘引了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的论述。但是，彦琮并不隐讳道安的缺点，而是如实地批评了道安和当时许多人不辨胡语梵语所造成的重大误解，曰：“安虽远识，未变常语。……莫分真伪，良可哀哉！”（转引自罗新璋，1984：45）3. 其中的翻译“十例”，或者转述道安的思想，或者是彦琮自己首倡，尚难以断定。中国古代缺乏著作权概念，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它几乎涉及佛经翻译的方方面面：包括字声、句韵、问答、名义、经论、歌颂、呪功、品题、专业、异本等，其隐含的价值不可限量。可惜因为缺乏详尽的解释和说明，无法作进一步的研究。4. 提倡和强调人人学习梵语，就可以不用翻译，并免除翻译可能造成的传译之失了。“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代代咸明，除疑网之失。”（转引自罗新璋，1984：45）实际上，这里已经提出了翻译在逻辑上终归会消亡的理论预见，可谓远见卓识。就此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说，彦琮以他的翻译功能消亡论，大大地推进了自道安以来的翻译本体论观点。其立论之精当，判断之明晰，观点之彻底，当垂范译事千古。（王宏印）

《福乐智慧》 ***Kutadgu Bilig: A Turko-Islamic Mirror for Princes***

原名《库达德库 · 比里克》，意即“给予幸福的知识”，是一部维吾尔族古典长诗，成书于回历 462 年，即公元 1069 或 1070 年，作者为巴拉萨衮人优素甫，因为献此诗给当朝的统治者布格拉汗而获封“哈斯 · 哈吉甫”的称号，作者又称优素甫 · 哈斯 · 哈吉甫。这首长诗共计 13 290 行，以古典的玛斯纳维体即双行押韵体写成，中间夹杂有 200 首被称为柔巴依的四行诗。作品通过四个虚构的象征性人物的寓言故事，以对话形式表达了作者的政治理想、社会思想和人生哲学。作品原稿早佚，现在通行的版本是土耳其学者阿拉特（Arat）以三个手抄本（维也纳抄本、开罗抄本和费尔干纳抄本）为基础整理而来的校勘本。作为维吾尔文学史和突厥伊斯兰文学史上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大型文学作品，《福乐智慧》具有突出的文学和文化史价值，为研究古代维吾尔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提供了难得的可贵史料。随着三个手抄本的相继发现、刊布，以及阿拉特校勘本的出版，《福乐智慧》受到我国和国际东方学界的瞩目，出现了多种语言的节译本、全译本。到目前为止已有土耳其语译本、俄语译本、德语译本、英语译本等 11 个全译本，包括 1984 年和 1986 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维吾尔文诗歌体对照诠释本和汉文译本。《福乐智慧》这样一部具有多重性质，多维价值的作品，作为民族典籍，尤其是维吾尔族典籍的典型代表，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复杂性，其翻译研究对于体现我国翻译学和典籍翻译研究的完整图景具有重要意义。（李宁）

《高昌回鹘馆杂字》 ***A Classified Chinese-Huihu Terminology***

明代编纂的一部汉文和回鹘文对照的分类词汇集，成书于永乐（1403～1424）年间。到目前为止发现的版本主要有：清刻本《高昌馆译书》，收 716 词；清抄本《高昌馆杂字》，收 716 词；明抄本《华夷译语 · 高昌馆杂字》，共 10 册，包括蒙古、女真等几种语言，其中高昌馆杂字占三册，收 940 词，是收词最多的版本；东洋文库晒兰本，收 208 词，词数虽少，却有 62 词是其他版本不曾收录的。现在通行的《高昌馆杂字》是 1984 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由胡振华、黄润华整理的汉文与现代维吾尔文对照的校勘本。此本以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华夷译语 · 高昌馆杂字》为底本，综合各种版本中的词语汇编而成，包括 1 002 个词语。全书中的词汇分为天文门、时令门、鸟兽门、文史门、人物门等 17 门。《高昌馆杂字》的抄写格式是每半页四个单词，分上下两排，每个回鹘文单词及其汉义和标音从右至左分三行竖写。可以看到，《高昌馆杂字》实际上是一部汉文和回鹘文词典，不仅给出汉语意义，还给出回鹘文单词的汉文标音。也可以说《高昌馆杂字》是一部回鹘文对应翻译词典，包括了意译和音写两项内容。《高昌馆杂字》校勘本不仅对各版本收录的词语进行汇编，使之尽可能完整，同时在正文之前对《高昌馆杂字》及有关资料作了介绍，对书中所使用的回鹘文字的特点和借词情况作了仔细的分析。另外，在书末附有东洋文库本勘误表和词汇索引。此校勘本对研究明代吐鲁番、哈密一带维吾尔人使用的回鹘文字及其语言特点有很大参考价值。（李宁）

《突厥语大词典》 ***A Turkish-Arabic Dictionary***

11 世纪新疆喀喇汗王朝维吾尔伊斯兰学者麻赫穆德 · 喀什噶里编写的用阿拉伯语解释突厥语的综合性知识辞书。成书于 1071～1073 年（伊斯兰教历 464～466 年），1074 年经修订后献给阿拔斯王朝第二十七任哈里发穆格泰迪（1075～1094 在位）。全书用阿拉伯字母标音，用阿拉伯文注释，共收词约 7 500 条，按词的语言结构分为海木宰部分、萨利姆部分、穆扎埃夫部分、米萨尔部分、三字母部分、四字母部分、滚乃部分和带有两个静符的词条部分等八部分，每一部分又分为名词和动词两篇，每篇又分若干章，章内又依各词条所含字母的多少、词型、语音结构之不同以及词尾字母的顺序编排。这种编排体例为麻赫穆德 · 喀什噶里所独创。

《突厥语大词典》通过丰富的语言材料，广泛地介绍了喀喇汗王朝时代维吾尔和突厥语系各民族政治、

经济、历史、地理、文化、宗教、哲学、伦理方面的知识和风土人情。序言概述了突厥语的重要性、编纂该书的目的、资料来源、体例、突厥语的构词法、回鹘字母、突厥各部落的语言特点。书中附有突厥语系各民族分布地区的圆形地图,标明了突厥诸部和突厥语言的分布情况,但它的价值却大大高于一般的方言分布图。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运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关于中亚地区的丰富知识,创造性地描绘出了作者所认识的世界。这幅圆形地图,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中世纪历史地理学的重大成就。在条目释文中,除关于语音、词义的演变、语法结构及例句外,还收入了大量成语、谚语、民歌、诗歌、格言、哲理警句、轶闻掌故等,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体现了维吾尔和突厥语系各族人民对宇宙、人生、宗教、社会道德准则等问题的见解。全书条理清晰,结构完整,所记载的史料可从中国汉文史书及有关东方学家的著作中得到印证,堪称是一部当时最完备的简明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无论对突厥语的研究,还是喀喇汗王朝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民俗和社会情况的研究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文献。

《突厥语大词典》原稿失传,现存唯一手抄本是1256年由穆罕默德·伊本·艾布·伯克尔抄写的,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民族图书馆。后土耳其学者克里斯利·里弗埃特再度转抄,交付铅印。铅印本出版后,立即引起国际上许多著名突厥学家的重视。1928年,德国学者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第一个用德文发表了这部词典的索引,后来又把词典中的诗歌和谚语单独汇集成册发表。1939年至1941年,土耳其学者伯西姆·阿塔拉伊连续发表了《突厥语大词典》的土耳其文译本(三卷)和一部索引,同时正式影印出版了词典的阿拉伯文抄本。1960年,前苏联出版了《突厥语大词典》的乌孜别克文译文,后相继出版阿塞拜疆、哈萨克、土库曼文的节译本。1981~198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现代维吾尔语全译本。1982~1985年美国学者丹柯夫(Dankoff)翻译出版了英文译本。1985年开始,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汉语全译本,共三卷。 (李宁)

罗塞达碑 Rosetta Stone

1799年在埃及尼罗河口的罗塞达城郊发现的一块古埃及祭司为国王树立的歌功颂德的石碑,镌刻于公元前2世纪。碑刻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最著名的翻译文献。碑上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和稍后的俗体文两种字体书写的碑文,并刻有该文的希腊文译文,为解释古埃及象形文和揭开古埃及的奥秘提供了线索。当然,罗塞达碑并非正式翻译的最早见证,据记载,公元前两三千年前已有翻译活动。

百年翻译运动 The Arabic Century of Translation

亦称"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是指从公元830年至930年一百年的时间里,以巴格达为中心,在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哈里发的大力资助和倡导下,大规模、有组织的翻译活动,是世界文化史上古代东西方文明成果译介、注释活动中规模最宏大,内容最精彩的一个阶段。文化史学家艾哈迈德·爱敏(Ahmad Amin)用三个阶段来勾勒这场文化译介活动的全貌:第一阶段(初期):起自曼苏尔哈里发,止于拉希德时代,即从伊斯兰教历136年至193年。第二阶段(中期或称鼎盛期):起自麦蒙时代,即伊斯兰教历198年,止于300年。这一时期翻译了希腊各个学科的最重要著作,重译了托勒密(Ptolemy)的《天文大集》,翻译了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金色格言》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与加伦(Galen)的全部著作,以及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Aristotle)《范畴篇》。这些著作都是由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及其学人翻译的,其中大部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由他的儿子易斯哈格翻译的。第三阶段(尾声):伊历300年~400年(约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中叶)翻译的主要作品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物理学》及其注释。著名的翻译家有麦泰·本·优努斯、萨比特·本·古赖等。在百年翻译运动中,翻译活动涉及医学、星象学、天文学、哲学、历史、政治、文学、数学、物理学、音乐等学科领域,其中尤以希腊哲学著作的翻译最为突出。这场翻译运动,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融合建构作用,同时以伊斯兰教为媒介进一步对波斯和西域(含今新疆地区)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在回鹘典籍《福乐智慧》中就可以找到痕迹。 (李宁)

《圣经》 *The Holy Bible*; *The Bible*

是基督宗教三大宗派罗马公教(Catholic)、正教(Orthodox)和新教(Protestant)共同信奉的经典,源自希伯来文Kĕthudhim。Bible译自拉丁语biblia,意即"一组小书"。它不是一本书,而是许多卷书的合订本,是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著作汇编。《圣经》本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经典的总称,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圣经》一般是指基督教的经典而言。《圣经》包括《旧约》《新约》和《后典》三部分,故今本汉文《圣经》称《新旧约全书》。《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后为基督教所承袭;《新约》乃基督教所独有;《后典》指被早期基督教教会接受的《旧约》希腊文本中的12本书和3本"额外读物",共15篇。

"圣经"一词并非这部书的原名。最初翻译成汉文时,译者按照我国把重要著作称为"经"的传统,称为"经",并在前面冠一个"圣"字,从此才有《圣经》这个名称,而"圣经"一词也就成了这部基督教经典的专名。早在7世纪,《圣经》的部分经卷已译成中文。《圣经》的版本在我国品种繁多,有全译本、缩译本、简译本及注释本,有文言本、白话文及各地方言本。其中,第一部白话文《新约圣经》出版于1857年,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汉文《圣经》是1919年出版的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迄今尚无其他权威中译本可以取代它。

《圣经》翻译　*Bible* translation

是西方翻译史的一条主线,几乎贯串其始终。早在公元前 285 年至前 249 年间,有 72 名"高贵的"犹太学者汇集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从事把希伯来文《旧约》翻译成希腊文本的工作。其译本冠名为《七十子文本》、《七十贤士译本》或《七十子希腊文本》。该译本的立足点是"准确",许多地方完全照字面直译,措辞生硬,并有"古味"和"怪味",此后成了"第二原本",甚至有时取代希伯来文本。此后的一些古拉丁语、斯拉夫语和阿拉伯语译本即以《七十子希腊语文本》为蓝本。《新约圣经》也早有译本,最初是用古叙利亚语和拉丁语翻译,随后为适应迅速发展的基督教徒的需要,相继用科普特语、埃塞俄比亚语、哥特语、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来翻译。早期的《圣经》翻译均有"重词句、轻神理"的倾向。公元 384 年,哲罗姆(St. Jerome)受罗马教皇之委托主译拉丁文《圣经》,即《通行本圣经》。这一译本以原有的拉丁文本为基础,参考《七十子希腊语文本》,并根据《旧约》希伯来语原本翻译修订而成。它的发表使读者有了第一个"标准"的《圣经》译本,并很快成了罗马天主教所承认的唯一的文本,从而替代《七十子希腊语文本》而成为此后欧洲各国不少译者的原本。哲罗姆"按照意思翻译,而不是逐字对译",尽管就其翻译方法来说,主要还是归于直译。此后,不断有新译本问世,如雷伊纳(Reina)的西班牙文译本、英王詹姆斯(James)一世的钦定英译本,但在 16 世纪,西欧翻译领域里影响最大的当推路德(Luther)。他先从希腊语译了《新约》(1522 年),又从希伯来语译了《旧约》(1534)。在翻译中,路德用通俗易懂、能为大众接受的德语进行翻译。他的译本被誉为"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尽管在他之前翻译上已有侧重于达意的趋势,然而明确地认识到译文必须畅晓易懂的还是路德。路德的译本是欧洲翻译史上对民族语言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一部译作。之后,1525 年廷代尔(Tyndale)首次把《新约》译成现代英语并印行。他的译本于 17 世纪初被当作钦定本的主要参考译本。此后成为所有英译本仿效的版本。当代专门从事组织和指导《圣经》翻译的奈达(Nida)把语言学应用于《圣经》的翻译,创建了当代的翻译理论,他的理论不但对当代《圣经》翻译,而且对当代的翻译研究有重要影响。我国最早的《圣经》汉译本为节译本,名《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又名《出像经解》),为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Aleni)所写(资料多取自《新约》),共 8 卷,1635～1637 年间在福州印行。

《圣经》汉语方言译本　*Bible* translations in Chinese dialects

《圣经》的上海话最早译本是 1847 年在上海出版的《新约》中的《约翰福音》,此后,1853 年、1870 年、1872 年先后有上海话《圣经》译本,其使用波及江浙一带周边地区。1877 年出版了杭州话《圣经》译本。最早的福州话译本是《马太福音》,1852 年在福州出版。1884 年厦门话汉字《圣经》全译本在上海出版。1894 年广州话《圣经》汉字全译本在上海出版。1908 年出版了苏州话全译本《圣经》,而最早的苏州话《新约》部分译本则在 1880 年在上海出版。1880 年台州话《马太福音》译本在台州出版,1914 年在上海出了拉丁字母拼写的台州话全译本《圣经》。1916 年客家话《圣经》汉字全译本在上海出版。汕头话《圣经》汉字全译本于 1922 年在上海出版。另外,金华话、山东话、胶东话、建宁话、汉口话、汀州话等方言的《圣经》译本也都出版过。需要说明的是,《圣经》各种方言译本,有的是汉字本,有的是拉丁字母拼写本,在文字上是不统一的。　（王宏印）

《圣经》民语译本　*Bible* translations in ethnic languages in China

《圣经》的民语翻译由来已久。早在 1833 年和 1835 年就有满洲文译本《新约》出版。1896 年出版蒙古文《新约》译本,《旧约》译本则在 1840 年出版。1911 年出版高丽文的《圣经》全译本。1914 年哈萨克文《新约》译本在德国出版。其实早期民语译本多在俄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出版。西藏文的《圣经》全译本于 1935 年出版。我国台湾地区当地语译本早在 15 世纪荷兰人占领时期就有翻译出版,1965 年起,台湾圣经公会组织翻译五种山地语《圣经》译本。花苗族译本《圣经》最早出版时间是 1917 年,其他苗族语的多种分支语言《圣经》译本也陆续出版,除少数采用汉字以外,大部分以拉丁字母拼写出版。　（王宏印）

《圣经》翻译的途径　approaches to *Bible* translation

《圣经》包括《旧约》(希伯来圣经)、《新约》和《外典》(次经)。世界范围内的圣经翻译是西方翻译史的一条主线,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犹太教派时期,公元前 200 年～公元 4 世纪,圣经版本主要是希腊文。第二时期是天主教时期,公元 4 世纪～1500 年,译本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主。第三时期是新教时期,1500～1960 年,译本主要是德语、英语。第四时期是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群体合作期,从 1960 年至今,译本以英语为主。西方圣经翻译史上涌现出哲罗姆(St. Jerome)、威克利夫(Wycliffe)、廷代尔(Tyndale)、路德(Luther)、罗杰斯(Rogers)、塔瓦纳(Taverner)等圣经翻译家;犹达欧斯(Judaeus)、奥古斯丁(Augustine)、哲罗姆、伊拉斯谟(Erasmus)、坎贝尔(Campbell)、奈达(Nida)等著名圣经翻译理论家的翻译思想,在世界翻译理论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奈达把西方的圣经翻译史总结为三种途经或方法:1. 语文学途径(the philological approach)注重作者的背景、独特风格、文学类型、文本转换历史、文学批评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文本诠释的方法。哲罗姆认为,词的意义应优先于词本身,他的观点明显区别于古拉丁语的圣经翻译。新教宗师马丁·路德用平民

的语言将圣经翻译成德语,打破了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本》传统。廷代尔也认为《圣经》应该为每个普通人所明白,他的英译本词汇在很大程度上为之后的“钦定本”所采用。“钦定本”的译委会尤其注重译文的典雅和诵读节奏,享有独尊地位长达近两个世纪,并对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圣经翻译影响极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考古发现和古代圣经文献重见天日,许多圣经内容有了更新的理解。1885年英国推出的“钦定修订本”和1901年美国推出的“美国标准本”代表了当时对《圣经》的理解和翻译水平,但其过分直译的倾向影响了读者的接受。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若干《圣经》英译本。2. 语言学途径(the linguistic approach)注重语言学成果在圣经翻译中的运用,1945年之后成为主要的翻译方法。1946年,专门指导圣经翻译的机构“联合圣经公会”在荷兰成立,并于1947年开始出版专门探讨圣经翻译的期刊 *The Bible Translator*。关于圣经翻译的专著也相继出版。此外该机构还准备了一些针对释经学和文化问题的翻译指导手册,为圣经译者提供语言方面的培训。语言学途径主张翻译“四步法”:分析→转换→重组→检验。第三步要考虑读者对目的语的恰当接受水平,最后一步要基于读者的反应检验译文的准确程度和自然对等程度。3. 交际学途径(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的理论基础是交际理论。交际学途径涉及如下因素:信息源(圣经的神圣性和世俗性)、信息内容(包括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受众、噪音干扰(在信息转换过程中任何导致信息变形的因素,如抄写错误)、信息反馈(即受众的反应)、交际语境(包括原文的初始语境和目前的交际语境)。交际学途径还涉及文化人类学。“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是指导交际学翻译的方针。在具体操作中,圣经翻译应综合考虑词汇、语法和语篇三个层次的转换效果。

当代的圣经翻译具有四个特点:一是翻译多样化,译本功能多样化;二是从“神学翻译”转向“非神学翻译”;三是语言浅易化与译本学术化并存;四是“形式对应”和“动态对等”两种翻译方法并存。由于圣经翻译面向不同读者群,具体翻译语境多样,不同阶层使用的方言不同,所以奈达指出应该至少推出三种《圣经》译本,即“信徒版”“大众版”和“学者版”。

(任东升)

《圣经》汉译 *Bible* translations in Chinese

《圣经》自唐代(公元635年)作为“真经”传入中国,迄今已有1 300余年的历史。圣经汉译史经历了西人主译、西人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中国翻译家独立翻译三次翻译主体的更替,采用过文言(文理)、浅文言(浅文理)、官话(白话)和现代汉语四种语体,印行和出版过摘译本、单册本、多册本和全译本。

《圣经》的汉译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景教士译述期(公元635~845年),原文是古叙利亚文本,这一时期的汉译本被称为“景教本”,如最早的圣经汉译片断《序听迷诗所经》(公元636年)。第二阶段为耶稣会士摘译期(17~19世纪初),原文是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本”(*The Vulgate*),主要译本有:阳玛诺的《圣经直解》(1636)、“巴设译本”(1700)、贺清泰的《古新圣经》(1803)。这些译本被称为“明清本”。第三阶段为新教士全译期(1819~1919),主要翻译蓝本是英文本,如“钦定本”(*The Authorized Version*,1611)及其“修订本”(*The Revised Version*,1885),主要译本有:马礼逊的《神天圣书》(1823)、“代表译本”(1852;1854)、施约瑟的浅文理“二指版”(1902)、“官话和合译本”(1919)。我们把这些《圣经》全译本称为“近代本”。第四阶段为圣经汉译多元化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今),包括教内(天主教和基督教两个宗派)的圣经翻译、中国翻译家的圣经诗歌翻译、《圣经后典》翻译以及各种《圣经》改写本的翻译。教内的圣经翻译蓝本有希伯来文、希腊文和英文译本。主要全译本有:天主教思高圣经学会根据原文翻译的“思高本”(1968)、吕振中译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全译本(1970)、以“现代英文圣经”(*Today's English Version*,1976)为蓝本的“现代中文译本”(1979)、译自希伯来、希腊原文的“圣经新译本”(1992)。这些译本可称为“现代本”。

《圣经》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译著之一。1894年,全国万名女教徒捐银子翻译出版《新约全书》为慈禧太后祝寿,标志着《圣经》中译本第一次进入皇宫。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的出版对新文学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严复1908年用文言文翻译《马可福音》片断为标志,《圣经》汉译呈现文学化的趋向;以李荣芳1931年采用“骚体”翻译《耶利米哀歌》、启用“亚卫”神名译法为标志,《圣经》汉译出现了多元化局面。1935年,郑振铎提出包括重译《圣经》的“世界文库”计划;1941年,朱维之提出根据《圣经》不同文类采用不同文体翻译的设想;1987年,张久选翻译了《圣经后典》;进入21世纪,冯象开始了把《圣经》当作文学来翻译的实践。中国诗学传统对李荣芳、朱维之、吴经熊、张久选等中国翻译家的《圣经》诗歌翻译具有强大制约作用,中国文人读经传统和现代中国的文学认知语境对《圣经》的文学性阐释和接受发挥了重要影响。

(任东升)

严复的《圣经》片断翻译 partial translation of *Bible* by Yan Fu

严复对《圣经》内容和《圣经》在西方和中国的翻译历史均十分熟悉。1908年,基督教组织大英圣书公会的驻华代表文显理(Bondfield)(1855~1925)出资,请时在上海的严复翻译《马可福音》,想借严复的译文去影响能欣赏文言文的封建士大夫。结果严复由于公务繁忙,只试译了前四章,约3 400汉字,为文言文,为此得到300银两的报酬。大英公会委托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印行少量,并向全国各地寄发了400本严译《马可福音》,还向70多位重要的教会人物发出

了调查表,听取他们的意见。审读者被要求就译文的整体风格和个别章句的准确性作出具体的评价。此外,文显理还给审读者提出三个简单的选择题:1. 严译是否比旧译有改进? 2. 严译是否忠实? 3. 出版严译是否是明智之举? 多数读者认可严复的译文确实优胜于过去的文言译文,认为应该出版。对于严译"信"的程度,大部分读者不予认可。

严复所译《马可所传福音》版本原件是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圣经》档案部(*The Bible Society Archival*,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的特藏。该馆所藏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本共四本:大英圣书公会档案藏三本,东亚图书处藏一本。四本译书之尾,均缺少第四章最后四节,即第38～41节的译文,可能在当时装订时有一页漏收。非基督徒的严复不是出于基督教信仰而投入《圣经》翻译的。严复在翻译时既遵从教会的《圣经》汉译传统,又保持自己鲜明的翻译风格,著作特征十分明显。如善用单字、措词古奥;句式长短相间,讲求平仄、顿挫。他的译文有明显的归化倾向,格义、会通兼施,故意改变原文的地理环境,甚至删除原文中与中国传统的"公道"观念相抵触的"马太效应"一节。

严复介入《圣经》翻译的举动是圣经汉译史上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作为清末少数几个对西方文化精神有着真正体会的"西化"知识分子,严复介入《圣经》翻译的举动,符合其一贯奉行的翻译介绍中政治自由主义原则。同时,他所处的"薪俸译书"时代和翻译"赞助人"的惯例促成了这一翻译事件。教会和严复择定既有宗教价值又有文学品质的《马可福音》,彼此的目的既有相同的一面,又各有侧重:双方都期望有一个"精华版"译文供中国文人认识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这既符合教会方面借助严复的文笔改变中国文人对《圣经》俚俗化的误解,也符合严复译介整体西方文化的策略和把西方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圣经》介绍给国人的愿望。严复介入《圣经》翻译,并不受教会方面制订的任何翻译程序、原则以及翻译标准的支配,他在翻译中注入了自己对《圣经》的诠释,淡化了其宗教功能,从而使他的译文具备文学和诗学功能。严复以自己的翻译风格,创造了"古雅"的圣经话语,不仅对传教士的《圣经》主导话语形成一股冲击力,而且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外来文化(基督教文化)进入国门之际应有的立场和心态。严复开辟了中国人独立翻译《圣经》内容的先例,标志着《圣经》汉译文学化的开端,同时也证明了他全面介绍包括宗教和文学内容在内的西方文化的努力,显示了他作为杰出翻译家的自觉和启蒙思想家的伟大。 (任东升)

通天塔 Tower of Babel

据《圣经》记载,天下人最初说的是同一种语言,那时,人类自行筹建通天塔以便直通天堂。上帝对这一过分要求感到十分恼怒。为了惩罚并阻止人类的这类邪恶行为,上帝下令"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各地且言语不通"。从现代翻译研究的角度来看,"通天塔"的流产不仅导致人类频繁的翻译活动,产生一代又一代的译者,而且也促进了翻译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有学者甚至主张通过翻译来再建通天塔。

东方文化复兴 revival of oriental culture

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一个非常直接而重要的结果,就是"东方文化复兴"。根据李雍整理、分析梅兹(Mez)详细论述的资料,公元9～10世纪(亦延续至11世纪),阿拉伯哈里发王朝的统一政治虽然已经衰落了,但在伊斯兰世界的东方——东伊朗与中亚细亚,却出现了一个思想文化的大复兴时期。"东方文化复兴"亦称"伊斯兰文化复兴",是指从公元9世纪开始,阿拉伯的麦蒙哈里发统治时期,在广大的伊斯兰学术领域,出于对解释'真主'属性的需要,引发出了绵延不断的翻译并采纳古希腊哲学大师们的理论著作的热潮。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繁盛。阿拉伯学者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柏拉图(Plato)等人的哲学著作,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伦(Galen)等人的医学著作,欧几里得(Euclid)、阿基米得(Archimedes)、托勒密(Ptolemy)等人的数学、天文学著作以及印度的数学和天文学论著等都翻译成了阿拉伯文。"东方文化复兴"不仅带来了阿拉伯半岛以及伊斯兰文化的发展高潮,在阿尔·法拉比、伊本·西拿、伊本·鲁西德等阿拉伯哲学家的努力下获得很高成就,甚至对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产生了积极影响。从"百年翻译运动"到"东方文化复兴",可以看到,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文化的深刻变革与飞跃式发展往往借助于大规模的,特别是思想类著作的翻译活动来实现。类似的情况还有我国晚清以及五四以前的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发展。 (李宁)

印度文学的藏译 Indian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 Tibetan

在中国西藏,印度文学的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 000多年以前的吐蕃王朝时代,就翻译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13世纪,著名翻译家泽曲泽摩和郎卡桑布翻译了印度长诗《云史》,使之成为第一个外国语译本。此外,印度格言诗也被译成藏文,仅《丹珠儿》修身部就包含《百智部》、《智慧树》、《益世格言》、《颂藏》等内容。印度格言诗的翻译直接促进了藏族格言诗的兴起和发展。 (王宏印)

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是14世纪至16世纪欧洲文化和思想发展的潮流,其文化特点是复兴被遗忘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把古希腊、古罗马的人文主义文化从中世纪基督教的蒙昧主义中拯救出来。(实际上,文艺复兴也是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萌芽。)这一时期,翻译作品大量涌现,其中大多译自希腊文,以重新发

现古代世界。当时不少译者走出教会培养的经院哲学的圈子,用人民大众的语言来翻译世俗作品。不过,一般来说,水平不高,其原因正如阿莫斯(Amos)所说的:“世俗作品的译者不像《圣经》的译者那样长期苦心钻研,精雕细琢。”《圣经》的翻译仍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16世纪最出色的《圣经》译本是雷伊纳(Reina)的西班牙文本。这个译本几经修改,一直作为主要的西班牙文本流传在讲西语的国家和地区。但是由于西班牙在欧洲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日趋衰落,这个译本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远不如英文和德文的译本那样大。英王詹姆斯(James)一世钦定《圣经》英译本的译者们特别注意采用适宜于大众的文体,该译本在好几个世纪中沿相使用,使其他多种语言的《圣经》译本黯然失色。

16世纪,西欧翻译领域里的显耀人物首推路德(Luther),他明确地认识到译文必须畅晓易懂,特别是在神学问题的激烈争论中,路德不仅一般为自己的原则辩护,认为这样译才能使人理解《圣经》,而且还详细地、系统地写出了他的翻译原则的含义,实属难能可贵。但是最早系统地阐述翻译理论的功劳应归于多雷(Dolet),他于1540年曾发表了一篇论述翻译原则的文章。参见“路德”

《越人歌》 ***Song of Yue Nationality***

是我国有文字记载下来的最早的部族之间的成功的诗歌译作。它完整地保存在汉刘向《说苑·善说》篇中。春秋时,楚康王的弟弟鄂君子晳泛舟江上,遇一越国姑娘,姑娘用越语对鄂君子晳唱道: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
泽予昌州州𩜱州焉
乎秦胥胥缦予乎昭
澶秦踰渗堤随河湖

鄂君子晳听不懂,找人翻译了过来: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中有木兮,木有枝,
心说(悦)君兮君不知。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部族间零星的诗歌翻译要比汉朝有规模的佛经翻译早数百年。

《大藏经》 ***Dazhuang Sutra*** **(*term for all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in Chinese*)**

佛教典籍的丛书。以经、律、论为主,并包括若干印度、中国等国其他佛教撰述在内。南北朝时称“一切经”,隋代以后才有此称,原指汉文佛教典籍,现泛指一切文种的经典丛书。有巴利文的《南传大藏经》、汉译《大藏经》、藏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日本《大藏经》以及西夏文《大藏经》(残本)等。《大藏经》因其主要内容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又称《三藏经》。“经藏”是佛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梵名“素坦缆”,亦称“修多罗藏”。“律藏”是佛为信徒所制定的宗教生活规范,梵名“毗荼耶”,亦称“毗尼藏”。“论藏”是佛弟子解释经文和阐明经义的各种论述,梵名“阿毗达磨”,亦称“阿毗昙藏”。经律论三藏又有大乘、小乘之别。小乘三藏以四部《阿含经》等为经藏,《四分》、《五分》、《十诵》律等为律藏,《六足》、《发智论》等为论藏。大乘三藏以《华严经》等为经藏,《梵纲经》等为律藏,《中论》、《百论》等为现藏。小乘三藏因重在自我解脱成道,故又称“声闻藏”。大乘三藏因主张自觉觉他为觉行圆满,故又称“菩萨藏”。此外尚有显密教三藏之分。显教三藏如上所述。密教三藏则有藏传佛教所译的经律论和日本东寺所译东密《大毗庐那金刚顶经》等,《苏婆呼经根本部律》等,《菩提心》、《摩诃衍论》等。(转引自林煌天 1997:116) (马霞)

汉译《大藏经》 ***Dazhuang Sutra***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汉译佛教典籍的丛书。自东汉末译经以来,汉译佛经和著述逐代增加。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载目611部858卷;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载2 162部4 328卷;隋法经《众经目录》载2 257部5 310卷。隋以后的“入藏录”(钦定载入《大藏经》目录)所载佛典数字是: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中为1 076部3 292卷;唐智昇《开元释教录》为1 076部5 048卷,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为1 258部5 390卷。北宋惟净《天圣释教总录》载目为6 197卷。元代以后,译经极少。从北宋始,佛经由手写改为雕印,主要依《开元释教录》的“人藏录”编印,即经律论皆分大小乘,“贤圣集”(纪传等)分“梵本翻译”和“此方撰集”(中国撰述),此后,历代雕印《大藏经》皆据此例。(转引自林煌天 1997:271) (马霞)

白马寺 **White Horse Temple**

建于公元69年(东汉永平十二年),位于洛阳之东12公里处,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松林古木之中,雄伟的殿堂,高耸的宝塔,这就是素有“中国第一古刹”之称的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场所,以驮经的白马命名。(关于白马寺的命名另有二说。)相传东汉永平七年,明帝闻西方有异神,遣郎中蔡愔、秦景等人赴天竺求法。他们遇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取得佛经、佛像,并邀同回洛阳。此年建此寺居之。学会了汉语的摄摩腾、竺法兰便在此处译经,译出了《四十二章经》等。《四十二章经》对佛教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东汉著名的译经僧安息王子安世高、月氏人支娄迦谶等据传都是在白马寺从事译经活动的,与他们同在洛阳译经的还有竺佛朔(天竺人)、安玄(安息人)、支曜(月氏人)、康孟祥、康巨(康居人)等。北魏时印

度僧人佛陀扇多(BuddhaSanta)也曾在白马寺译经。总之,白马寺在中国佛典翻译和佛教传播中起过很大作用,是中国佛教最早的历史见证者。

译场 workshops for translation

始创于苻秦时期。前秦苻坚(338～385)命赵政和释道安主持译场,自此佛经翻译由私译转入官译,由个人翻译转入集体翻译。苻秦译场分工明确,除口授、传言和笔受外,还有记录(梵文)、正义和校对三道工序,有时一道工序有数人参加。此后,姚秦有逍遥园译场,北凉有姑臧的闲豫宫译场,梁代有建业的寿光殿、华林园、占云馆和宝云殿译场,北魏有洛阳的内殿译场,参加译经并听讲经的往往有数百人至上千人。隋代在上林园设置的翻经馆,已成为常设机构了。译场组织之完备,人才之精粹,分工之细密,还以唐代为最。唐代自 629 年(太宗贞观三年)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 811 年(宪宗元和六年)才终止,前后主持译事的译师达 26 人。所有经费由国家供给,译出的经论常由帝王御制序文标于经首。朝廷不但钦命大臣监护译经,而且还诏集天下英才,建立严密而完善的译经组织。当时玄奘的译场模规庞大,组织完善,助译者系各地寺院出类拔萃的人物。据记载,唐代译经机构大致有 10 种岗位,包括:1. 译主;2. 证义(与译主研讨经卷原文);3. 证文(听译诵读梵文以检验之);4. 书字(据源语文本写成中文,但依梵音);5. 笔受(译梵为汉);6. 缀文(调理文词);7. 参译(参核汉梵两种文字,防止语意出入);8. 刊定,即校勘;9. 润文(润色文辞);10. 梵呗(以新译唱经,以检验译文是否通达顺畅)。

佛经翻译 Buddhist translation

西汉末,丝绸之路已经开通,我国与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佛教也通过商人和使节传入中土,朝野开始致力于佛经翻译,我国翻译事业随之兴起。东汉初期,公元 69 年,我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在洛阳建立,这也是我国第一所译经寺院,一批重要的佛经译本经此问世。我国佛经翻译事业以隋唐为鼎盛。此后逐渐衰落,到北宋仁宗景祐年间,佛经译场停顿。元、明、清三代虽有译经活动,但已不足道。

在我国近千年的佛经翻译史中,文质之争贯串始终,两者起伏跌宕,彼此消长;两者又交相辉映,孕育新译。在整个译经活动中,外来僧人始终是主体,他们不谙汉文,常由民间信徒担任助译,也有文人学士奉敕润文。就翻译方法而论,只是依靠转写。直至玄奘(602～664)时期,我国佛经翻译事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翻译方法也更趋完善。玄奘直译意译兼顾,确切地表达了佛经的原意,形成一种清新朴质、严整凝重的独特风格。佛经在我国持续时间长、影响大,导致佛教逐渐融入我国的本土文化结构,但是佛经翻译和外来译者却始终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带。国家和地方的统治政权经由多种途径制约佛经翻译和外来译者,使之成为强化政权职能、巩固意识形态的辅助方式。

《江格尔》 *Jangar*

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Jangar*)是与藏族史诗《格萨尔》(*Gheser*)、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Manas*)并列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蒙古族英雄史诗。它以神话传说为根基,以英雄故事为主干,以诗韵说唱为形式,经过历代民间艺人江格尔奇的千锤百炼,内容不断丰富,篇章日益扩展,最终发展成为长达 60 余章、10 多万诗行的鸿篇巨制,是蒙古族劳动人民长期的集体的智慧成果。《江格尔》不仅保留着蒙古族早期的历史印记,代表了远古蒙古族文学的最高成就,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珍贵的史学价值,而且对于研究远古蒙古族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诸方面的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认识作用。

对《江格尔》现代意义的科学的搜集出版是 19 世纪初首先从国外开始的。在俄罗斯,最早记录和介绍《江格尔》的是在俄罗斯工作的日耳曼人别尔格曼(Bergman),他从卡尔梅克人中搜集到《江格尔》的片段,译成德文于 1804 年在里加发表。19 世纪中叶,俄国蒙古学者米哈伊洛夫(Михайлов)从阿斯特拉罕省搜集记录两章《江格尔》,由鲍勃洛夫尼科夫(Бобрювников)译成俄文,发表在 1854 年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报上。这两份资料是《江格尔》的最早外文译文。《江格尔》在俄罗斯有多种版本的蒙古文抄本,同时还有俄罗斯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格鲁吉亚语、阿塞拜疆语、哈萨克语、爱沙尼亚语等多种民族文字的译文。

我国于 1950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边垣编写的《洪古尔》一书,这是国内首版《江格尔》故事的汉文改写本。目前流行的《江格尔》汉译本主要有两种:一是色道尔吉的 15 章《江格尔》汉译本,以"13 章本"为基础,另增补哈萨克巴、托·巴德玛从新疆搜集的两章,由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一是霍尔查的汉译本,即宝音和西格、托·巴德玛搜集整理出版的 15 章《江格尔》的汉译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我国搜集出版的《江格尔》还有德、日、俄等多种语言文字的译文在国外出版。(据荣苏赫等 2000)

(邢力)

佛经藏译 Buddhist sutra translated into ancient Tibetan

输入印度佛经,是我国藏族的主要活动。这种活动从唐代开始迄于明代,历时 900 年,译品约 4 200 种。吐蕃国弃松德赞普(或译赤松带赞王)在位时(754～797)推行佛法,兴建寺院,剃度藏人,派人去印度学习声明与翻译,又从印度、尼泊尔和内地请高僧译家,开辟译场,广译经论。弃猎松赞普(即徕巴瞻

王)继位(798～815)后,也大宏佛学,延揽译经人员,进一步译经,于开场翻译之先,厘正译语,凡在前代未经译传,或译不雅训者,皆加以补订。现存《西藏大藏经》中的显乘要籍,大半是此时译出的。这一阶段参加译经的人员众多,著名的有贝绕杂耶(或译贝茹杂耶)、阿难陀(克什米尔人)、旦马则芒、娘古马惹、马阿杂利耶忍秦乔(或译玛仁钦乔)、昆路易班保、葛哇贝则、交绕路易绛粲、香那昂班德易希特等九人,习惯上称为"前三译师、中三译师和后三译师",或称为"三老年译师、三中年译师和三青年译师"。1037 年以后,佛教复兴,译经活动继续开展,印度的佛教经典,尤其是密宗基本上译全,其他有关印度文学、艺术、工巧等方面的著作也逐渐译成藏文。这阶段的高明译家有摩德迦纳、阿底峡和仁钦桑布等人。 (夏勤)

《四十二章经》 *Sishierzhangjing* (*Sutra in Forty-two Chapters*)

佛教经典,一卷。相传此经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但由于中国文献中对此经的传译、名称及性质等记载多不相同,因而引起中外学者的长期争论,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早在 166 年(东汉延熹九年)襄楷上书桓帝时就曾引用此经。此后,三国时《法句经序》、东晋郗景兴的《奉法要》亦曾引此经,足见汉晋间此经已为佛教界所熟知。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录《出三藏记集》中,《四十二章经》已见著录,并于其补充说明中提及明帝遣使者赴西域求法,"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梁惠皎《高僧传》中称丝法竺与摩腾俱至洛阳,"译《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僧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然而,现存经本,文辞雅丽,非汉译原貌,故常令人置疑。据隋费长房《历代三保记》所载,此经原有二译,其一为东汉时译(已佚),其二为吴支谦译,是"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故得流传,唐以后又屡有改易。 (马霞)

藏译汉经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ed into Tibetan

早在吐蕃时期,中国西藏地区就开始翻译印度佛经及文学作品,同时也开始翻译中原汉族的经典。现今在敦煌文献中就发现有《尚书》、《左传》、《战国策》等古典文献的藏文译本,还有孔子的故事。在自然科学方面,医书的翻译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囊日松赞时期,汉地医书随天文历算一起传入吐蕃,到吐蕃时期传入藏区的医书有 27 部,当时译成藏文的有《汉地大小杂病疗法》、《月王药珍》等。更早翻译的时论历数,就包括《时论经》等汉地典籍。另一方面,藏文的优秀文史作品,特别是史诗也陆续翻译为汉语。其中重要的包括《格萨尔王传》、《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萨迦格言》等,遂逐渐形成了藏汉、汉藏文献互译的传统。 (洛松泽仁,王宏印)

藏文译场 Tibetan translation workshop

据藏族最早史书《拔协》(8 世纪时作品)记载:779 年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在今札囊)建成,寺内南部之"迦嘎林"(意为印度佛殿)为译师、论师们从事翻译佛经的专门场所,这就是藏族第一个译场。在译场中从事翻译的人有"翻译""校订""书写"的分工。翻译者又有"大译师""译师""助手"之分,校订者有"大校订者""校订者"之分。佛经的翻译由精通梵语(或汉语)的论师和精通藏语又懂梵语(或汉语)的译师合作进行,因此保证了佛经翻译的质量。(转引自林煌天 1997: 900) (周季文)

元代硬译公牍文体 government documents translated from Mongolian in the Yuan Dynasty

元代文献中,有一大批词语奇特、句法乖戾的公牍,既不能用古汉语书面语常规训释,又与纯粹的元代汉语口语不同。这是一批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径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公文。我们把元代公牍的这种文体,称为硬译文体。这种硬译公牍文体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元代蒙汉文通行,元世祖在制定蒙古新字后,便规定诏书制诰及官方文书一律以蒙古字为正本,附以各地区流行的文字,因此公文诏书之类必须译成汉文,于是便出现了这类不伦不类的典型硬译文体。它的语汇采自元代汉语口语,而语法却是蒙古语式的。流传至今的元代硬译文体公牍,多是元廷庙议记录、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内容十分广泛,散见于《元典章》、《通制条格》、《宪台通纪》、《南台备要》、《永乐大典》所收《经世大典》残篇,以及元代圣旨、令旨碑文和《高丽史》、《元史》等书。不同于元代白话,这类硬译文体有着自己的特点:在词汇方面,硬译文体中常夹杂着蒙古语和其他民族语借词,有的是直接的音译,如"札萨"(蒙古语:法,法度)、"术忽"(蒙古语,疒子波斯:犹太教士,犹太人),有的是意译,如"肚皮"(蒙古语:贿赂);在词法方面,机械地翻译蒙古语的复数、格介词和静动词、动词词尾,按蒙古语词法规则黏着于词后,不顾汉语规范,如"把你"写作"你行""你根底","对他们"写作"他每根底"等;在句法方面,保留蒙古语句式,如宾语在谓语前面,长定语,助动词"么道"前的长句等。一份典型的硬译公牍,等于一份死死遵循蒙古语词法和句法,用汉语作的记录文字。在翻译上,元代硬译公牍有很大的任意性,时而十分拘泥于原文的语法结构,时而省略其中某些部分,时而又夹杂穿插地道的汉语句子,用字也不统一,因译者而异。(据亦邻真 1982) (邢力)

四方馆 foreign office in the Sui Dynasty

隋代开始设立的官方外文翻译机构。据《隋书·百官下》说:"初,炀帝置四方馆于建国门外,以待四方使官,后罢之,有事则置,各隶鸿胪寺,量事繁简,临时损益。东方曰东夷使者,南方曰南蛮使者,西方曰

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唐代保留了这种四方馆,以通事舍人掌管,隶属中书省。据说中书省就设有蕃书译语10人。宋代也置四方馆,掌管文武百官朝见谢辞。

《翻译名义集》 *A Collection of Names and Their Explanations in Buddhist Translations*

该翻译辞典编于1143年,共7卷,64篇,收录音译梵文2 040余条,资料来自佛经和经史,由法云主编,参编者百余人,参考书籍400余种,资料翔实,编撰严谨。《翻译名义集》与《释氏要览》、《教乘法数》一起,并称“佛学三书”。此外,该书中还记载和保留了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唐玄奘的“五不翻”就是一例。《翻译名义序》是一篇为其所作的序,另有法云本人所写的《翻译名义集自序》,都是翻译理论的重要文献。本书各篇开头均有总论,叙述大意,次出梵语的音译和意译,一一列举异译、出处、解释,或加以发挥。它所根据的资料,除经论本文而外,还旁采经论的音义、注疏,但有些都从各书中转引而来(如关于唯识旧注,即由《宗镜录》中转引等)。另外还引用世典经史之类,有时只举著作者姓名,称其人说云云,这样引用书籍共四百余种。本书的梵语解释,与一般一切经音义等有不同处。它就比较重要的名相,根据教理推论其义,并依天台的解释为主。如《十种通号》第一解释三号当于三谛说:“正遍知即般若真谛也,应供即解脱俗谛也,如来即法身中谛也。”又如《法宝众名篇》第五十释法界:“今就一法界各有十法,所谓如是性相等。十界即有百法,十界互相有则有千法,如是等法皆因缘生法。”像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卷末补订的文里,关于方便刹土等,长篇大论,专对天台山外异说有所辩驳,就更出乎音义等范围以外了。其次,本书以解释翻译名义为主,因而对历代重要译家有专篇(第十一《宗翻译主篇》)记述。另外,还保存了一些有关翻译的理论,如卷一特引玄奘的五种不翻。至于玄奘、义净等新译经论中名相的音译,多和旧译不同,而奘、净二师往往认旧译为讹略。作者以为新旧翻译不同,只是由于时间地点不同、方言有别而已。这种说法,虽未能详细解释出新旧两译不同之真正原因,但从全面立论,可谓公允。

除了汉语版本外,公元9世纪,藏王赤热巴坚在位时,印度高僧和藏族著名译师对历代翻译的藏文佛经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修订了译文,审定了卷帙,并编写出了一部梵藏对照佛学词典——《翻译名义集》。《翻译名义集》帮助后人翻译和修订了很多佛教经典,而且被后来的学者编辑成多种版本,成为世界公认的佛学词典。《翻译名义集》国内外有多种版本,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佛教文化的基本工具书。据藏文史料记载,《翻译名义集》分大、中、小三种,其中《翻译名义中集》即《语合》之正文,收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共收词语9 000余条。1915年日本荻原云来据此编译成《梵汉对译佛教辞典》,但注明为“翻译名义大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清代整理成书的梵、藏、汉、蒙四种文字对照的手写本,1916年日本神亮三郎据此及北京版《丹珠尔》中之《语合》整理成《梵、藏、汉、和四译对校翻译名义大集》出版。其中“梵”“藏”均为拉丁文转写,“汉”为汉文,“和”为汉字日文。 (马霞,周季文,陈大亮,王宏印)

四夷馆 the language school in the Ming Dynasty

1407年(明永乐五年)所设,乃中国最早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最初设鞑靼(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1441年(正统六年),增设八百馆;1579年(万历七年),又增暹罗馆。四夷馆的生员,一开始是选国子监生入学,人给米一石,后来则选官民子弟入馆学习蒙古语、藏语,以及印度、缅甸、暹罗和回教国家的语言。清初改名四译馆,省蒙古、女真二馆。1748年(乾隆十三年)并入会同馆,更名会同四译馆,合并八馆为西域、百夷二馆。毕业的学生分发各部,充当译员,凡外国人与中国官员书信往还,谈话交际,都由他们翻译。为提高翻译人员的身份,明成祖特准他们在开科时就试,合格,准出身,可以中进士。

《女真译语》 *Nüzhen-Chinese Terminology*

译释女真文的重要工具书,为1407年(明代永乐五年)四夷馆中女真馆所编辑。全书分“杂字”和“来文”两部分。杂字专辑女真文语汇,包括女真字、汉义及汉字注音,共分19门,计有女真单语800余条,分列于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人物、人事、身体、饮食、衣服、珍宝、方隅、声音、数目、通用、续添、新增等19门中。来文是移录当时女真各部(主要是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卫、所官吏向明朝进贡的表文,以女真语汇依汉文语法堆砌而成,显是四夷馆人所代拟。来文存世的各种版本共79通,是学习和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最好材料。明代后期,会同馆又编辑一种《女真译语》,仅提供女真词汇的汉字注音,无女真文字,专为口译之用,但语汇较多,对研究女真语言文字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夏勤)

明末历局 the translation bureau in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科技翻译机构。1629年(崇祯二年),崇祯帝下令徐光启督修历法。徐光启遂创设历局,并提出了一个从政历出发而“度数旁通十事”的计划,即系统翻译介绍当时西方与数学有关的十门学科或学科分支。在历局中先后参加译编西方历算书籍的,除徐光启、李之藻之外,外国传教士有意大利龙华民(Longobardi, 1559~1654)、德国邓玉函(Johann Terrenz, 1576~1630)、意大利罗雅各(Jacques Rho, 1593~1638)与瑞士汤若望(Schall von Bell, 1591~1666)。为了培养通晓西方历算的人才,徐光启还吸收了一批中国科技人员在编译时担任辅

助工作。历局译编的书籍分五批进呈崇祯皇帝。徐光启生前经手三批,李天经在徐谢世后两批。五次进呈共计历书、历表、图像135卷,外加星屏1架与恒星总图1折,共137件。以上135卷系缮写后进呈的。

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 science translation during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in China

从16世纪末叶到18世纪的两百年间,是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的时期。来中国的耶稣会会士,为便于传教,曾与当时的士大夫结合翻译了一些西方科学著作。最早前来传教的耶稣会会士有利玛窦(Matteo Ricci)、龙华民(Longobardi)、艾儒略(Aleni)等,稍后的有汤若望(Schall von Bell)、南怀仁(Verbiest)等,到清康乾时期则有戴进贤(Ignaco)、蒋友仁(Benoist)等人。知名的总计在70名以上,一般都有译著,共成书三百余种,除宣扬宗教迷信的书籍外,其中有关科学的占120种左右。在这120余种科学书籍中,利玛窦、汤若望、罗雅各和南怀仁四人的译著就达75部之多。在天文历算方面,有龙华民、邓玉函(Johann Terrenz)、罗雅各、汤若望等会士参加《崇祯历书》的编修,在成书的150卷中,有汤若望译撰的《交食历指》4卷、《交食历表》2卷、《交食诸表用法》2卷、《交食表》4卷、《古今交食考》1卷、《恒星出没表》2卷等,罗雅各译撰的《月离历指》4卷、《月离历表》6卷、《日躔坛》1卷、《五星图》1卷、《日躔表》1卷、《火水土二百恒年并周岁时刻表》3卷、《五纬历纬指》8卷、《五纬用法》1卷、《日躔考》2卷、《夜中测时》1卷等。汤若望还将1616年法兰克福出版的塞都利的著作译成中文,题名《远镜说》。数学方面,最著名的是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译出的《几何原本》6卷(原书15卷)。其后两人又合作译了《测量法义》1卷。利玛窦还与李之藻合作译了《圜容较义》,又编译了《同文指算》。罗雅各则译有《测量全义》一书。清康熙时,张诚则有《几何原理》的满、汉文译本。物理学方面,有熊三拔与徐光启合译的《泰西水法》和邓玉函与王徵合译的《奇器图说》。采矿冶金方面,有汤若望与杨之华、黄宏宪等合译的《坤舆格致》。人体解剖生理学方面,有邓玉函与毕拱辰合译的《泰西人身说概》与罗雅各(Jacques Rho)译的《人身说概》。生物学方面,有利类思(Lodovico Buglio)译的《狮子说》和《鹰论》。军事技术方面,则有汤若望与焦勗译的《火攻挈要》三卷,又名《则克录》。耶稣会士向中国输入西方的科学,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转引自林煌天 1997:498)

(马祖毅)

第一首汉译英诗 the earliest Chinese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poems

据钱锺书考证,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是最早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他写了一篇题为《汉译第一首英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的文章,后收入《七缀集》。钱锺书所指的是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与董恂的合译,时间在1864~1972年之间,另说为19世纪60年代中期。然而,后来有人考证,1854年《遐迩贯珍》第9号登载的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的十四行诗《论失明》(*On His Blindness*)是更早的汉译英诗。《遐迩贯珍》系英国传教士麦都思(Medhust)、奚礼尔(Hillier)、理雅各(Legge)于1853年起在香港编辑出版的中文月刊(少数两月合刊),至1856年停刊。《论失明》出自麦都思的译笔。

台湾学者李奭学考证后得出新的结论:如以国家为准,不以语种为界,则艾儒略(Giulio Aleni)译《圣梦歌》(*Visio Sancti Bernardi*)又比上述两诗的汉译早了200多年。此外,《圣梦歌》还创下中国文学史与翻译史上的另一项纪录,它也是汉译戏剧诗之始,因为风行于欧洲中世纪的辩论诗,其中的角色至少两人或两物以上,可谓某种简略的戏剧诗。(李奭学 2007)

艾儒略是晚明耶稣会士,出身意大利,汉译《圣梦歌》完成于1637年。《圣梦歌》首版刊刻于福建晋江,原由"清源张子"序,此公即闽人张赓。张赓是万历年间举人,工诗文,奉教后常臂助会士中译。张序曾引艾儒略之言曰:《圣梦歌》之始也,乃"西土诗歌",不过艾儒略愿以"中邦之韵"出之。所以全诗276行在宗教相关的考虑外,可谓耶稣会"自觉性"的"文学翻译"之始。

《圣梦歌》译自拉丁文原本。作者的"国籍"或写作地点是英格兰或不列颠。此诗最早的雏形若非12世纪的头韵诗《坟墓》(*The Grave*),就是往前再推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灵魂对身体所述之言》(*The Soul's Address to the Body*)。后者以古英文写成,乃一独白体诗作(如今仅存残卷)。《圣梦歌》的拉丁文成诗年代不会晚于12、13世纪之交。诗中角色多出以中古托喻诗习见的拟人法。所以诗中"灵魂""身体"俱为抽象言谈的化身。灵魂出言冷峻,严词谴责身体堕落,致令不能上天堂。诗中另蕴如下天主教义理:灵魂得来不易,系天主悯悯世人而遣天使下凡所致,故此凡人切毋沉溺于肉体之乐,尤其不可罹下道德重罪,否则审判之日后,灵肉必然两橛殊途。

1637年版的抄本除卷末有"崇祯十年晋江景教堂梓"字样外,书题下另有"远西后学艾儒略译述"数字。按耶稣会的传统,"译述"两字表示艾儒略译书并非逐字全译,而是既译又写的所谓"译写"(transwriting)。就译笔而言,艾儒略信笔走译的风格当然是以归化形成的策略。艾儒略虽称自己昧于"中邦之韵",但《圣梦歌》的声韵结构整齐,不论平仄或用韵堪称有序,唯一不遵守的地方就是诗节,简直如自由创作,而且常以中国固有的对句出之。如将原文易为两节各四句的八行诗,《圣梦歌》中译得毫发不差的六句,摘录如下:

Ferreos in minibus stimulus gestantes,

Ignemque Sulphureum per os emittentes,
Similes ligonibus sunt erum dentes.
Visi sunt ex naribus predire serpentes.
Aures errant patule, sanie fluentes,
Et errant in frontibus cornua gerentes,
Per extrema venenum fundentes,
Digitorum vngula vt aprorum dentes.

口吐硫磺炽火炎，手持铁茅芒相逼。齿如爬锄鼻出蛇，耳泻臭浓不可即。额角峥嵘赤发散，状如野猪又如獭。(据李奭学 2007;周振鹤 2005)

《诗经》西译 *Book of Odes* translated in the West

《诗经》对外翻译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16世纪，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最早翻译了《诗经》。一百多年后，另一名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选译了《诗经》，其译本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收入《中华帝国全志》。1733年，法国传教士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用拉丁文翻译出版《诗经》。其后有鲍吉耶(Guillaume Pauthier)用法文翻译的《诗经》。还有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 于1896年翻译出版的《诗经》。葛兰言(Marcel Granet)于1911年在《中国古代歌谣与节日》一书中选译了《国风》中的诗篇68首。在德国，律刻特(Friedrich Richert)是第一个把《诗经》译成德文的翻译家。第二个德文《诗经》译本是史淘思(Victor Von Strauss)翻译的《〈诗经〉：中国经典诗集》。此外，克拉默(Cranmer)、迦伯伦兹(Gabelentz)以及左托力(Zottoli)也都先后选译了《诗经》。在俄国，《诗经》翻译发生在19世纪以后。最早的俄语译本由西维洛夫(Амитрий летровлч Сивиллов)于1855年完成。什图金(Штукин)的全译本出版于1957年。

《诗经》翻译在英美开始得较晚，但成就突出。威廉·琼斯爵士(William Jones)曾经于18世纪80年代用拉丁文翻译了《诗经》中的《卫风·淇奥》等三首诗，后又译成英语，此为《诗经》英语翻译的滥觞。《诗经》英语翻译真正的开山鼻祖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理雅各(Legge)。理雅各分别于1871年、1876年、1879年三次翻译了《诗经》。1871年译本是全译本，采用的是无韵体形式，译文分行，分节，与原文完全对应。同时，也十分讲求字面意义的对应，字面上看似多余的字用方括号标出，基本上保留了原文的形式。译文后有注释，包括诗篇题解和文字训诂。1876年译本也是全译本，是理雅各与其他人合作在1871年译本的基础上重译而成的。由于追求句尾押韵，译文基本上无法追求字与行的对应。为了迎合韵律，译者常采用释意的方法，有时数行合一，有时则一行分译成数行。译文的准确度较首译本有所降低。1879年，理雅各应穆勒(Muller)的要求又选译了《诗经》部分内容，包括《颂》、《雅》的部分诗篇和《风》的部分有宗教意味的诗篇共114首。其译诗不分行，只分节，每节之内是连续一体的散文形式。具体到一首诗来说，节译现象很普遍，译者只选译了被认为有宗教神学意义的部分。

继理雅各之后，詹宁斯(Jennings)于1891年翻译出版了《诗经》韵体全译本。这是第二个英语韵体全译本。詹宁斯译本以理雅各无韵体译本的注释为主要参考依据，受理雅各的影响较大。几乎与詹宁斯同时，阿连壁(Allen)也于1891年翻译出版了韵体《诗经》。阿译在翻译上较为自由，常采用释意的方法对原诗的内容进行抽象和概括。译者先从诗的意义出发，在意义确定后，重新用英语诗歌的形式改写，表现出了较强的读者中心意识。韦利(Waley)于1937年翻译出版了英译本《诗经》。他把全部诗篇从人类学角度重新划分为17类。威译通篇不用韵，诗文节对行应，翻译讲求忠实和准确，但仍存在不少误读误译现象。威译代表了西方《诗经》翻译史上的一种翻译模式——文化研究型翻译，文学价值和文化研究价值都较高。195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诗经》英语全译本，引起了中西诗经学界的强烈反响。高本汉的《诗经》翻译是在对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深入探讨的基础上进行的，译文为后世所称道。译者采取严格直译的策略，忠实度较高。美国诗人庞德(Pound)的《诗经》全译本于195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诗前无题解，后无注释，只有诗篇正文。很多译诗用韵，但有的韵律较整齐，有的则不够整齐，且韵律常随内容而变换。译诗从主题到字义都有较大改动，但诗味较浓。

国内的《诗经》翻译开始更晚，而且以英译为主。杨宪益于1983年选译《诗经》，书名为 *Selections from the Book of Songs*，其中的诗篇全部选自《国风》。1993年12月，许渊冲翻译的《诗经》出版。这个译本以语义型翻译为主要特色，比较注重保留原文的文化历史内涵，释意较多，在很多情况下不能保全原诗的基本艺术手法和特色。译诗讲求行对句应，韵律一般采用双行押韵或隔行押韵的韵律。1995年，汪榕培、任秀桦翻译出版了《诗经》。诗篇译文分行，追求押脚韵，韵律多采用双行和隔行押韵的形式，较为整齐。汪译本比较注重体现原作的文学性，尤其是音韵特性，但原诗的音韵特性也只在译诗的韵脚押韵方面有所体现，而其他方面，如双声、叠韵、重章叠唱等特性则都基本上消失了。

除了以上全译本之外，另有一些零散的《诗经》翻译。例如《诗经》选译38篇(L. Cranmer-Byng, 1905)，内容改写较严重。其他选译《诗经》诗篇的有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Herbert A. Giles, 1922), *Lyrics from the Chinese* (Helen Waddell, 1951), *A Golden Treasury of Chinese Poetry* (John A. Turner, 1976), *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Burton Watson, 1984)。国人翻译或合译的有丁祖馨、拉菲尔1986年选译的《中国诗歌精华——从〈诗经〉到当代》，许渊冲1992年著《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其中选译《关雎》等诗10篇。

(李玉良)

《蒙古秘史》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蒙古秘史》是蒙古民族的文化元典,它记录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辉煌历史。全书亦文亦史,是记载蒙古民族世系传承和勃兴经历的经典民族文献。由于原本亡佚,它是以奇特的明朝汉译本形式保存下来的,全书282节,由正文汉字音写、旁译逐词训诂和总译大意概括三部分组成。所以,可以说这部典籍在文本特征上具有两重性:形式上是汉语文本,性质上是民族典籍。它在明初汉译之后被广泛流传,多方研究,自19世纪60年代外译后更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秘史学"热潮,是一部引起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代表性民族典籍,极富研究价值。这部典籍一直与翻译紧紧联系在一起:它的存世是借助明初汉译得以实现的;"秘史学"在国际范围内的兴起则有赖于文本的对外翻译;而它在流变、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现象则是崭新而经典的翻译问题。遗憾的是,《蒙古秘史》的翻译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处于学术空白状态。

《蒙古秘史》在1368年(明朝洪武初年)汉译。这个文本独特的存在形式不仅使它具有极高的历史语文学价值,而且在翻译形式上成为一种经典特例。不仅如此,置之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我们会发现《蒙古秘史》的元明汉译本是作为蒙汉文化融合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之一而存在着的。时代症候渗透于文本的每一个毛孔之中,从标题到形式,再到内容,它承载着元明交替之际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和蒙汉民族的碰撞融合,具有深刻的内涵。它的存在为我们揭示出这种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在《蒙古秘史》的多个语种的翻译和研究中,最为典型的还是它的英语翻译和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节译改写,迄止2004年罗依果的英文全译结集成书,《蒙古秘史》的英译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涌现出十几个译本。其中,最有影响的还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柯立甫译本、罗依果译本和奥依译本三种全译。它们在文本上各有特色,呈现出不同的翻译类型来:柯立甫英译主要受到"经史"典籍观主导,是典型的学术型译本;罗依果译本在动机上既有意区别于柯立甫,以读者为导向,同时又保有对学术品位的坚守,可以界定为通俗经典化;奥依则由于译者身份的不同在翻译中表现出史传翻译与文化阐释的合一。

此外,《蒙古秘史》的翻译过程中还出现了大量值得从崭新角度予以关注的翻译现象,例如古本复原、音写、对译等。对于它们的探讨无疑有助于从整体上补充和完善翻译研究。《蒙古秘史》的存在及其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为我们提示了其背后更大学术范畴的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巨大学术潜力。 (邢力)

《蒙古源流》 *Qad-ün ündüsün erdenin tobciy-a* (*Earlist Records of History of Mongols*)

《蒙古源流》最初的书名为《*Qad-ün ündüsün erdenin tobciy-a*》,意思是《记载〈蒙古〉诸汗根源的宝卷》,简称《额尔德尼·脱卜赤》,即《宝卷》。人们习惯上按照乾隆皇帝改定的书名称其为《钦定蒙古源流》。这部杰出的历史文学著作由鄂尔多斯乌审旗伊科锡巴尔的名门后裔萨刚彻辰写就。它记载了宇宙的形成、人类的起源、印藏王统以及蒙古诸汗源流,从蒙古始祖孛儿帖·赤那写到成吉思汗、忽必烈汗、达延汗直至林丹汗,既是一部蒙古族通史,又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在17世纪产生的几部同类著作中,被称为"流传最广、刊译最多、声誉最著的作品"(周清澍,额尔德尼·巴雅尔 1983: 508),在海外影响很大。

在西方,早在1820年,德国学者施密特(Schmidt)就将《蒙古源流》向欧洲作了介绍。1829年,他将《蒙古源流》译成德文,以《东蒙古及其王室史》作为书名出版。1933年,德国海涅士(Hanisch)将《蒙古源流》的满文译本《蒙古诸汗之源流》转写成拉丁文在莱比锡出版。同西方相比,东方翻译出版《蒙古源流》,就时间来说,差不多晚了近一个世纪。1940年,日本弘文堂正式出版了由江实译成日文的《蒙古源流》。同年,藤岗胜二以拉丁文转写并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了一部所谓《喀喇沁本蒙古源流》。(所谓"喀喇沁本",不过是将《蒙古源流》之上半部和《黄金史纲》的下半部合二为一罢了。)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如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乌兰、阿·波波夫、内滕湖南、石滨纯太郎、沙·比拉等都对其进行过专题研究。作为一部享有国际声誉的民族文化典籍,《蒙古源流》丰富的译介背景和扎实的研究基础已经向我们展示出就其进行专题翻译研究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召唤着译届同仁瞩目投身其中。 (邢力)

《古兰经》的汉译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Koran*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基本经典。原文是阿拉伯语,词义深奥,加之宗教原因,长期以来,有的人不主张翻译,所以在客观上延误了《古兰经》的传播。明末清初开始有片段的翻译,后来有马联元和马德新的节选本问世。最早的全译本是李铁铮根据日译本转译的,于1927年在北京出版。姬觉弥根据英译本转译的也于1931年在上海出版。《古兰经》翻译史上最为重要的译者为王静斋。早在1925年,王静斋就从阿拉伯语直接完成了《古兰经》全文的翻译,几经修改,1932年在北平出版。这是第一个译自阿拉伯语的文言版本。后来王静斋又分别于1942年在宁夏出版了经堂语文本,1946年在上海出版了白话文译本,后者附有1 943条注释、小注及附说。王静斋三译本统称为《古兰经译解》,分别标以甲种、乙种和丙种。王静斋译解和注释重视"教中嫡派,论理折中",直译意译兼顾,有很大的影响。此外,还有几位译者和几个译本需要一提。一个是马坚。他留学埃及,1939年归来,花费十年时间翻译《古兰经》,可惜因早逝而未能完成其后的注释,但其译文忠实流畅,其正文作为《古兰经》范本在沙特与原文合璧出版,而国内1980年出

版的马坚译本则没有注释。1943 年刘锦标的《可兰经汉译附传》在北京出版,1947 年杨仲明的《古兰经大义》在北京出版,1958 年时子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在台北出版。中阿合璧的《古兰经》译本有三个:1988 年北京出版了林松的《古兰经韵译》;仝道章的译本和周仲羲的译本,均于 1990 年分别在南京和新加坡出版。此外,国内还有一些节译本。据统计,《古兰经》的汉译本不下十种。 (李华英,王宏印)

《西域同文志》 *A Dictionary of Six Languag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全称《钦定西域同文志》。是一部满、汉、蒙、藏、托忒蒙古、维等六种文字对照的大型人名地名辞书。由清朝大学士傅恒(1720~1769)等奉敕编撰,成书于 1763 年(乾隆二十八年),共 24 卷。卷首附乾隆《御制西域同文志序》和傅恒等的告成奉表。全书按地区编排,主要包括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地名、山名、水名以及各部上层人物名、官名、喇嘛名。每一名称均用六种文字标明,并注有汉字"三合切音",以及用汉文注释语源、含义、转音、地方沿革、地理位置、人物世系和简历等内容。该书为研究中国西部地区地理、历史、少数民族语文的重要参考书。(转引自林煌天 1997: 756) (伊明·阿布拉)

墨海书馆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

属伦敦布道会产业,是我国近代有组织译介西书的起点,成立于 1843 年。先由英国教士麦都思(Medhurst)主持,后由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接任。墨海书馆出版的重要译著如《几何原本》(后九卷)、《谈天》、《代微积拾级》以及王韬与伟烈亚力、艾约瑟(Joseph Edkins)合作编译的《西国天学源流》、《格致新学提要》、《重学浅说》、《光学图说》、《泰西著述考》、《华英通商事略》等。墨海书馆的重要,不仅在于当时设备先进,还在于它"所交多海内知名士",成为其时中外俊彦合作译书、切磋学术和进行科学实验的重要场所。馆内几位西士,如麦都思"著书甚勤",伟烈亚力"专工数学",艾约瑟"学问尤粹然",皆为传教士中的佼佼者。而受聘馆内合作译书的三位中国士子:李善兰是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数学家;管嗣复是桐城派古文家管同之子,"于古文亦具有家法";王韬"才气横逸,下笔辄数千言",为著名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在墨海服务 13 年,通过他,墨海与中国知识界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墨海书馆联络与锻炼了一批学者,为后来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馆造就了骨干,在近代西学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

《六合丛谈》 *Shanghai Serial*

月刊,1857 年 1 月(咸丰七年正月)于上海创刊出版。次年迁至日本,旋即停刊。刊物主编为英国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印行单位为墨海书馆。本刊为我国早期出版的一份涉及近代科学知识的中文刊物,对国人当时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起过一定的作用。(转引自林煌天 1997: 435) (黎难秋)

同文馆 Tongwen School

继明代四夷馆之后我国第二个培养翻译人员的外国语学校。恭亲王奕䜣提议设京师同文馆(1862 年设),后又设上海同文馆(1863 年设)及广州同文馆(1864 年设)。京师同文馆初设英文馆,翌年设法文馆和俄文馆,1872 年设德文馆,1896 年又设东文馆。1866 年起还设算学馆,学生除学习外语之外,还学习算学、化学、国际公法、生理等课程。入学者是经过挑选的八旗子弟,八年毕业,最后两年讲求译书。学生除正课外,须为总理衙门兼任译员,必要时须出国任职。同文馆是我国最初培养外交官的摇篮。翻译出版西书是同文馆重要的活动。译成的书由馆内印刷所以聚珍版(木活字)刊印出版。所译的书范围较广,政治方面有:《万国公法》、《拿破仑法典》、《政治经济学》、《公法会通》、《新加坡律例》等;历史方面有:《俄国史》、《世界史纲》等;自然科学方面有:《自然哲学》、《化学初步》、《高等化学》、《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天文学》等;此外,还翻译出版外交、财经、地理等方面的西书,以及《英文文法》、《同文津梁》、《法华字典》等书。1902 年 1 月,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上海、广州两地同文馆的影响远不及北京同文馆。

同文馆的翻译考试 translation test in Tongwen School

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主试人则规定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担任。1865 年 10 月 11 日至 21 日,同文馆举行第一次考试,英、俄、法三馆由恭亲王奕䜣主持考试。初试是将各国洋字照会译成汉文,复试则将有关各国条约(汉文)摘出一段译成洋文。奕䜣等人不识洋文,乃饬总税务司赫德与各国外国教习会同阅看。另外,怕学生于外国文字虽能通晓,而语言未必娴熟,再行复试。由主试人密出汉语条字,按名交学生译成外国语言,向隔座外国教习口讲。再令外国教习将言语译汉写明,两相核对。初试洋译汉,复试汉译洋,再试口译。借助于外国教习的这种翻译考试办法大概是我国早期办学的有代表性的翻译考试。参见"同文馆"

上海广方言馆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于 1863 年 3 月(同治二年正月)创设,是上海最早设立的外语学校,也是继京师同文馆后我国早期外语学校之一,经江苏巡抚李鸿章奏准设立。该馆开设经史文艺及外国语言课程,三五年后便可培养出"读书明理""精通番语"的人才,供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选作翻译官员或各种洋务官员。上海广方言馆章程共 12 条,系冯桂芬等拟定。其肄业生额初设 40 名。学制三年,学生食宿全免,主要学习英语、法语及

算学、经学、词章。广方言馆前后办了40多年,培养出了不少翻译、外交与"洋务"人才,其中杰出者有汪凤藻、席淦、刘镜人等。

俄罗斯文馆 School of Russian Language

清末俄文学校。1863年(同治二年)开办,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分前、后馆两级,各馆学习期限初定三年,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改为前馆五年,后馆三年。初课程仅有语言文字,后添设天文、算学、物理、历史、地理、政法各科。学生初由八旗保送,后经总理衙门考试入学,待遇优厚,毕业后从事外文工作。教习聘请俄国传教士等担任。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2月随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广州同文馆 Guangzhou Tongwen School

1864年(同治三年),广州将军瑞麟、两广总督毛鸿宾仿北京、上海设立外语学馆例,奏准设立广州同文馆。当年招收满、汉学生20人,年龄多在14至20岁之间,也含20岁以上已有科举功名的学生。清廷给予学生津贴,以资鼓励。初始仅设英国教习一名,每日教授英语三个小时,学生同时学习汉语。学制三年。此后外语增加到英、法、日、俄四种,学生数量也不断增加。广州同文馆是清末广州最早的新式外语学校,培养出了不少外语人才。其中有的担任翻译工作,有的专门译述外国书刊,也有的成为外语教师。以英语、日语人才为多,翻译书籍则多属政治、史地与教育类。

福建船政学堂 Fujian Marine Art College

福建船政学堂(亦称"福州船政学堂")是福建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或"福建船政局")的组成部分。学堂除了培养大量海军军事与工矿企业科技人才之外,还是近代中国翻译人才的摇篮。严复、马建忠、陈季同、王寿昌等翻译家均出自该学堂。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创办福建船政学堂,要培养本国的人才。1867年学堂在福州成立。从学堂的专业设计和课程设置来看,并没有培养翻译家的初衷。但是,一些翻译家在三五年的时间内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诞生了,而其他毕业生成了科技专业与外语兼具的双料人才,英语成了工作语言。福建船政学堂外语与专业教学合二为一。左宗棠认为学员必须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与数学,能够依书绘图,理解制造原理,掌握操作技术。这种指导思想的培养结果不存在"专业人才不懂外语,外语人才不懂专业"的问题。学堂大量聘用外教,使学生日常外语学得地道,学专业知识和专业外语术语学得到位。学堂注重海外留学与实习,避免纸上谈兵。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Translation Office Attached to the Jiangnan Machine-Building Bureau

设于1867年(同治六年),徐寿主其事,分设翻译格致、化学、制造各书提调一人、口译二人,笔述三人、校对图画四人。翻译时,洋人与华人合作,先由洋人将所译的书看熟,吃透意思,然后用汉语讲出来,华人记录在案。如有意义不大明了之处,与洋人互相探讨,直至含义清晰。然后由华人润色加工,使之合乎汉语语法,有疑难之处再与洋人商量改定。担任口译的外国人,主要有傅兰雅(Fryer)、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金楷理(Kreyer)、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玛高温(Mac-Gowan)等。主要笔受者为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徐建寅、赵元益、李凤苞等。其中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于1868年(同治七年)起在翻译馆担任编译工作28年,译书最多。《江南制造局图书书目》共收该馆图书178种,除了少数几种为著作外,163种为该馆翻译出版的科学书籍。

《中西闻见录》 *The Peking Magazine*

月刊,1872年8月(同治十一年七月)创刊于北京,共出36期。1875年(光绪元年)7月停刊。它是一本以科学为主的综合性杂志。由京都施医院编辑,实际主持人为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Martin)和英国人艾约瑟(Edkins)。内容有论述、科技史、图说、试题分析、近事及其他。其中论述类主要介绍西方新科技知识;科技史类多为刊登人物传记,如《亚里士多德传》、《亚尔奇默德传》等,近事类内容广泛,涉六大洲31个国家,该刊在清末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普及近代科学知识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转引自林煌天1997:968)

(任荣珍)

益智书会 Yizhi Book and Track Society

1877年5月,上海召开"全国传教士大会"。会上决议成立教会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对外称益智书会。傅兰雅(Fryer)、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丁韪良(William Martin)、韦廉臣(Williamson)等为该会会员。该会在1877~1886年间编译出版教科书104种(其中傅兰雅编译的约占四分之一)。该会一开始即重视统一译名,要求收集各科中文术语,以备汇编各科术语表。1891年该会设立以傅兰雅为主席的地名人名委员会;科学术语的译名统一则由该会的出版委员会负责,并由狄考文(任主席)、傅兰雅、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等分科主持。1896年,益智书会召开第二届大会,傅兰雅发表《中国科学术语展望》的报告,会后成立科技术语委员会。委员会中的狄考文、赫士(Hayes)和师图尔(Stuart)此后负责编纂出版了几种双语科学术语辞典,如《协定化学名词表》(1901年出版)收入无机物译名近千种;《术语词汇》(1904年出版)收词12 000余条,包括科学技术各学科分支50余类,并含少量社会科学词条,大致算得上是一本反映当时学科发展和译名状况的综合性科技辞典。

广学会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由基督教新教士在上海设立的翻译机构。1887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在上海创立同文书会(The Chinese Book and Track Society),自任督办。1890年韦廉臣去世后,另一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继任。1892年同文书会更名为广学会,其英文名为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由英文名可知,广学会始以传教为宗旨,主要出版传教书刊。其后又“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为号召,出版西学书刊。其中影响较著者有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自西往东》,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中东战纪本末》正续篇,李提摩太译《泰西新史揽要》,李思伦(John Lambert Rees)著、白约翰(John Barr)译《万国通史》和林乐知编《五洲风俗通考》等。该会发行的《万国公报》、《大同报》,当时曾风靡一时,朝野人士无不阅读,对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及光绪皇帝等均有一定的影响。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广学会曾编印过一些反共反苏的政论书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会外籍人员逐渐离开中国。参见“《万国公报》”“《大同报》”

强学会　Society for Learning from the West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7月,翰林院学士文廷武等倡设强学会,以议维新救国之策。会员有江标、袁世凯、黄遵宪、陈宝琛等。后康有为加入,强学会声势大振,成为维新运动之总机关。命梁启超负责编译出版《中外纪闻报》,日出一册,免费分送各官邸,以宣传维新。此事为守旧派所忌,奏请封禁。同年8月,于北京强学会之后,应康有为之请,张之洞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分会。分会章程云:“尝考讲学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译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人人能解,成才自众,然后可给国家之用。”(转引自黎难秋 1993: 107)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1月上海分会创办《强学报》,译刊时事新闻与西学,但仅出三期,即遭查封,上海强学会也同时消亡。强学会在历史上虽仅存半年,但影响较大。

《知新报》　*The Reformer China*

1897年2月(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在澳门创刊出版,停刊时间未详。始为五日刊,自第22册起改为旬刊,至第112册又改为半月刊。本刊为广东维新派重要宣传刊物之一。总理为顺德何廷光(穗田)、南海康广仁(幼博)等。梁启超曾为刊物作“叙例”。报道的科学译文内容涉及各国有关章程、条约、科学、技术以及商、农、工、矿等。刊物还连续报道一些科学译书,主要译人有周灵生、周逢源等。(转引自林煌天 1997: 942)　　(黎难秋)

译书公会　The Translation Society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由董康和赵元集在上海创办。董、赵二人同年主办《译书公会报》(周刊),总主笔为余杭章炳麟(太炎)及无锡杨模(范甫)。该刊除报道译自东西各国报刊的时事新闻外,还刊载译著。译书公会“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宗旨”,“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汽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次第译成,以餍海内同志”。“译书之法,凡翻译能中西并通者,则亲自涉笔;否则,一人口授,一人笔述,后仍互相勘校,务与原书语气不差累黍,事迹不少增减,方为定本”(《译书公会章程》)。已译之书,有《五洲通志》、《东游随笔》、《交涉纪事本末》、《中日构兵纪》、《拿破仑失国记》、《威灵吞大事记》、《英岁政比较》、《五洲与地图考》、《西事纪原》、《泰西志林》等。

《西学书目表》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Academic Writings*

梁启超编纂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9月,时务报馆刊本。此书有的版本与梁启超的《读西学书法》合装。《西学书目表》基本上是题录式检索工具,但作者对少数书籍作了极简单的说明。全书凡四卷,分别为上、中、下和附卷。上、中卷著录当时的科学译书计299种,梁启超将它们列为算学、电学、史志等22个门类。下卷为杂类书籍,多为国人所撰。附卷除国人著作119种外,另有明末清初译书86种,新译未印书籍72种。本书目表的分类法在我国近代图书分类学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读西学书法》实际上是梁启超阅读翻译西书之札记数十则,分别介绍了《西学书目表》所录各种译书的内容、优缺点及重要程度,一定意义上起到了《西学书目表》所录各译书之提要的作用。《西学书目表》的缺点是著录过于简单。例如,译书的原著者未录;一些书籍的译者与著者未加区分;西方“撰译人”前未加国籍;同时,出版年代亦阙如。(转引自林煌天 1997: 753)　　(黎难秋)

《西学书目表》卢辑本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Academic Writings* (ed. by Lu)

本书的辑印者为清末沔阳人卢靖,增辑付印本书时为溗阳书院的教师。当时学生常向他请教应读之西书,他苦于无法买到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于是便于1897年付梓重刻《西学书目表》发给学生。卢辑本与梁本相比有两个特点,第一,对梁本所录许多译书补充了出版年代,且大部分是可靠的。第二,补充收录了极少量的最新译书。参见“《西学书目表》”(转引自林煌天 1997: 753)　　(黎难秋)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1897年2月创建于上海,1954年迁北京。创始人为夏瑞芳(1872～1914)、鲍咸恩、鲍咸昌兄弟与高凤池等人。1902年,馆内设编译所,聘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1867～1957)任所长。成为我国出版翻译著作时间最长、品种最多的出版机构。从20世

纪初相继出版严复的《严译名著丛刊》(8种)、林纾的《林译小说丛书》(100种)到30～40年代出版《汉译世界名著》(230种)和《世界文学名著》丛书(154种),该馆一直具有出版外国学术、文学名著的历史传统,译者中包括马君武、蔡元培、王国维、郭大力、王亚南、贺麟、朱光潜、周建人、杨东莼、傅雷、梁实秋等名家。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对外虽无编译所的名称,但仍保持和发扬翻译外国社科名著的优良传统。特别是1958年起恢复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不再出版文学名著)以后,确定按轻重缓急出版16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学术著作为主要方针,其中又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为重点,适当兼顾其他古典名著和当代著作。1982年起,该馆陆续把前已组译出版的古典学术著作汇编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六辑,260种),同时出版《美国丛书》、《日本丛书》等,在国内外读书界、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100多年来,商务印书馆出书30 000余种。目前以翻译介绍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为主要任务,兼及研究著作、教材、普及读物等。我国香港和台北以及新加坡、吉隆坡都设有商务印书馆。

《译书公会报》 *The Translation Society Weekly Edition*

周刊,1897年10月(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创刊,在上海出版。停刊时间未详。主办机构为译书公会,总理为阳湖(属今江苏常州)恽积勋(叔畬)、阳湖陶湘(兰泉)等人,总主笔为余杭章炳麟(太炎)及无锡杨模(范甫)。该刊除报道译自东西各国报刊的时事新闻外,还刊载译著。中国翻译人员有吴宗濂、周传谋、沈晋熙等十余人,日本翻译人员为安藤虎雄。(转引自林煌天 1997: 842)　(黎难秋)

大同译书局 Datong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Bureau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秋冬间,由梁启超等集股创设于上海,康广仁任经理,是清末维新派的编译出版机构。译书局计划首译各国变法之书,以资借鉴;次译教科书,以育人才;再译各国宪法,以明立国之本;译各类章程,供办事参考;译商务书,兴中国商务,向外挽回利权。曾刊印《日本书目志》、《大彼得变政考》、《经世文新编》等。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谓:"故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译书局创办之宗旨由此可明。《叙例》还强调版权,对"翻印射利者究治"。

广智书局 Guangzhi Press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由广东人冯镜如、何澄在上海设立。所译印的书主要介绍西方新思潮,配合维新变法。广智书局的翻译人员有麦孟华、麦仲华、麦鼎华兄弟(皆直接或间接为康有为弟子,梁启超至交),梁启超、梁启勋兄弟,罗伯雅(康有为的弟子),赵必振等。该书局仅在成立的第一年里就译书数十种,包括政治、历史、哲学、社会学各类。其中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出版《近世社会主义》一书,是我国早期系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第一部译著。原著者为日本福井准选,译者赵必振。全书上下二册,共四编。第二编"德意志之社会主义"主要介绍马克思(译作"加陆·马陆科斯")及其主义;第四编介绍欧美各国社会主义现状。书中盛赞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伟人";说明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全为空理空想之一夕话",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深远之学理,精密而研究之,以讲究经济上之原则,而认信真理与正理,故以多数之劳民,容易实行其社会主义"。

京师大学堂编译馆 The Editing and Translating Office Attached to Beping School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5月,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在"奏陈开办京师大学堂办法摺"中,请于大学堂内附设编译局。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京师同文馆解散。翌年12月,同文馆归并大学堂。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4月,大学堂正式设立编译局,同年11月设译书分局于上海。12月张百熙奏请于上海分局附设印书局,承担大学堂所有编译书籍的印刷出版。编译局实分为译书局与编书处。严复任译书局总办,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专译各种西学教科书,计分几何、代数、三角、力学、伦理学等35门。担任译述工作的还有常产(伯奇)、曾宗巩(幼固)、胡文梯(步青)与林纾(琴南)等。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便译成书籍十余种。但于第二年停办。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early promulg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委托胡贻谷翻译的《泰西民法志》一书最早提到了马克思其名。中文报刊上最早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122号《万国公报》刊载了由蔡尔康撰、李提摩太译的《大同学》,其中提到:"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二曰恩格思(即恩格斯)。"

从19世纪晚期至1919年"五四"运动,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侧重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自日文的转译。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902年4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生平及学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1903年3月,广智书局出版了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作;1903年10月,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运动组织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由中国达识社译为中文,该书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了详细介绍,并依据唯物史观原理分析社会。

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朱执信最早于1905年在

《民报》第 2 号上，译介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简要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概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主要内容。他还参考日文译本，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片段，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直接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此外，马君武、刘师培、江亢虎等人也撰文译述马克思的学说。

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国内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从追求真理的意义上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激增。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涌现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李达译《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著作，李汉俊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恽代英译《阶级斗争》。1920 年 8 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版。此后，《〈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全译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章节译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摘译本、《反杜林论》第三篇第二章摘译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唯物史观部分的节译本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译本也陆续面世。这些译本的选择在内容上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主，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很受重视。译文为通俗而流畅的白话文，有利于宣传和传播。此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以及对苏俄及列宁著作的译文及活动的介绍，也陆续刊载和出版。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的翻译情况，从最早引进阶段的零散翻译和转译，到大量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再从翻译走向编译、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打开了中国人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窗口，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初期语境。（据李百玲 2009）

俄清学校　Russia-Qin Government School

沙俄在旅大地区办的学校。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沙俄侵占旅大后，先后在该地区设置了 15 所俄清学校。学校规则规定：为关东州各衙门培养俄语翻译人员；课程设置除俄语、算数、初等地理、历史外，还设有村长和村书记（即文书）、警察署员及翻译人员的业务实习；培训四年后发给特别证书，并享有当村长、试用教师、翻译以及州内行政官衙里职员的优先权。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俄日战争后，日本占据旅大地区，遂停办。

京师译学馆　The Peking Translation School

同文馆归并大学堂（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12 月）后，于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9 月开学创办，至 1911 年（宣统三年）结束，前后共九年。学生分习英、法、德、俄、日五国文字，五年学习期满，考试合格者奖于出身。五届共有毕业生 347 人。共有外籍教师 19 名，中国教师 103 名，蔡元培、丁福保、许寿裳曾任教。报考译学馆者甚为踊跃，每年招生时，"抱文书，担簦笈，望门而求试者，率常达数千人"。经一试再试，"择其尤颖异者而进之，大率数十人而得一焉"。毕业生中特优者由外交部、商务部选用，或咨送出洋留学；优秀者充任驻外翻译领事，或任各省外语教师。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The Editing and Translating Office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1902 年，商务印书馆内设编译所，聘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1867～1957）任所长。参见"商务印书馆"

《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1900 年 1 月 25 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号称"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自己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中国日报》在香港创刊。先后由冯自由、谢英伯、陈少白等主编。该报的宗旨是"大抵以开中国之风气，祛中国人之萎靡颓庸，增中国人兴奋之热心，破中国人之拘泥于旧习，而欲使中国维新之机勃然以兴，莫之能御也。"重要栏目有论说、评论、国内外新闻、广东和香港新闻等，并设有附刊《鼓吹录》。《中国日报》先后译载过英国哈葛德的《黄金藏》、霍尔克尼的《厌世之富翁》、法国大仲马的《几道山恩仇记》、威尔曼的《活地狱》等，它们都是最早的译本。（转引自林煌天 1997：959）（任荣珍）

《新小说》　*New Novel (a monthly)*

月刊，1902 年 11 月 14 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创刊于日本横滨。由梁启超主编、赵毓林编辑兼发行。次年改在上海出版，由广智书局发行。1906 年 1 月（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停刊，共出 24 号。该刊物以发表小说（包括翻译小说）为主，兼及诗歌、戏曲、笔记和文艺理论等。著译作分别为 70% 和 30%。《新小说》以开导中国文明进步为办刊宗旨，持改良主义政治倾向，是我国近代初具规模的新型小说刊物，对促进小说繁荣具有重要影响。它刊载过的外国小说主要有吴趼人改译的《电术奇谈》（日本菊池幽芬著，方庆同译述）、浣白子译的《二勇少年》（十八回）以及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毒药案》、《毒蛇圈》（法国鲍福著）、《失女案》、《双公使》、《神女再世奇缘》（英国解佳著）等。但这些小说大多用文言翻译，只有《电术奇谈》用白话译出，可读性也比较强。（转引自林煌天 1997：783）（任荣珍）

《翻译世界》　*The World of Translation*

月刊，上海支那翻译会社编译的杂志，马君武主编。1902 年 12 月（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创刊，停刊时间未详。只见到四期。全部为译文，不署译者姓名。支那翻译会社在设立之趣意中说："本社以养成人民世界的知识为公责，研究一切学术而沟通之，翻译地球各国国文之书。"该社考虑到当时国内新办学校教授各科，都没有专书，特取早稻田大学的讲义意译，作为国内大学的课本。讲义篇目有：哲学、社会

学、社会主义、宗教、政治学、法律、经济学和教育史，每期刊载一部分，连续译出。此外，该刊还译载过描写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小说《大冒险谭》和由日文转译的探险小说《人外境》。《翻译世界》在当时对青年学生介绍西方各种新的学术和思潮起了一定的作用。(转引自林煌天 1997：184) (任荣珍)

《中华妇女界》 ***The World of Chinese Women (a monthly)***

月刊，1915年1月创刊于上海。中华妇女界社编辑及发行，中华书局总发行。1916年6月停刊。第一卷共出12期，第二卷共出6期。该刊设插画、文艺、成绩、特别纪事等栏目。刊载的译作有《美国女实业家盎特鲁夫人传》(英国康谋斯多著，青霞译)、《石油灯》(天笑，毅汉译)、《一百贤妻之自述》(瘦鹃译)、《狄波拉之家族》(美国戈达德著，薛锦琴女士译)等。(转引自林煌天 1997：964) (任荣珍)

《月月小说》 ***The All-Story Monthly***

月刊，1906年11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创刊，在上海出版。1909年1月(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停刊。由月月小说社发行。编辑兼发行者最初为汪庆祺(汪惟父)；第一年第四号起，印刷兼发行者仍为庆祺，而编辑者改为吴趼人；第一年第九号起，编辑者改为许优民，印刷兼发行者则改为沈济宣。在第一年第一号上，则载有："本社总撰述吴君趼人、本社总译述周君桂笙、本社总经理汪君庆祺"。刊物刊登大量的翻译小说，提供译稿的主要人员有：上海知新室主人(周桂笙)、天笑生、罗季方、角胜子等十余人。周桂笙创建的译书交通公会，以本刊为其机关报，曾在本刊第一年第一号上刊载"译书交通公会试办简章"；在第一年第二号(1906年11月30日)与第三号(1906年12月30日)上又分别刊载"译书交通公会广告""译书交通公会报告"。(转引自林煌天 1997：895)

(黎难秋)

译书交通公会 The Communication Society of Translators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我国翻译工作者最早的组织——译书交通公会成立。发起人为周桂笙(1873～1936)。他在《译书交通公会序》中说："……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我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发明之效。此非译书者所当有之事欤！"序言又说，鉴于当时译界互通声气不够，出现同一书籍重复翻译；彼此切磋不够，导致译书质量不高、译名不够准确且难以统一等弊病。为了克服"译书家声气不通，不相为谋"的状况，周桂笙倡议组织译书交通公会，以便翻译工作者之间"交换智识，广通声气，维持公益"。公会简章要求所有会友要将所译科学书籍与小说在公会登记，按月交流，以免重复翻译。公会尚拟代售译书、代购原书。公会借月月小说社为会所，并暂以《月月小说》报为会报。会员除翻译人员外，"各省学务处，学堂教员、学生，书局编辑所、印刷所等处一切人员"，皆可入会。可惜当时我国译界反应并不热烈，在发布两次公会会报后，旋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3月宣告暂行停办。

清代的翻译考试 examination in transl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翻译科分满文翻译和蒙古文翻译两类。翻译考试有童试、乡试、会试三种。童试三年两考，考满文者，不论满洲人、蒙古人或汉军人均可报名。考时，将汉字四书直解限300字内译成满文，十余人取一名，共取生员60名。考蒙古文者，限蒙古人，于满字日讲四书内限300为题，翻译成蒙古文，每10人取1名，共9名。乡试满洲题四书满字论一篇，翻译汉字四书题一道。蒙古题是翻译满字四书内题一道。二者录取名额不定。录取者便是翻译举人。会试满洲题目是：第一场试四书满文一篇，孝经性理满字论一篇；第二场试汉字题翻译一篇。蒙古文题目是：用满字四书性理等书内一道为首题，用满字奏事一道为次题，翻译蒙古文两篇。中者都赐进士出身。这是清朝选拔满、蒙古文翻译人才的一种办法。(转引自林煌天 1997：545) (马祖毅)

西学东渐 translating Western learning in China

指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的一段时期内，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潮被译介到我国的历史状况。鸦片战争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及香港等东南沿海地区涌现出更多的近代化文化设施，成为西学传播的有力媒介。于是，近代西学东渐开始。这是继18世纪末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等人来华传播和翻译天文、算学、地理、物理、水利等西学著述后的又一次翻译高潮。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徐建寅、严复等一批翻译家脱颖而出。一些翻译出版机构应运而生。重要的如墨海书馆，1843年创立于上海；京师同文馆，1862年创立于北京；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7年创立于上海。

在19世纪后半期，翻译出版了大批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学术图书。《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摘译)也都在这段时期内先后翻译出版。

综观这一时期，传入的西学知识多半粗浅杂泛，没有严密完整的体系，从思想上不具备在短期内彻底改造旧学的力量。至1898年，在已译成中文的数百种西学著作中，绝大部分是汽机兵轮一类的实用书籍。

虽然西学东渐的内容侧重于自然科学，但宏观地

看,它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更多的却在社会价值。科学知识对人类社会思潮本来就具有渗透作用。当时西方科学的引进,没能促使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同步发展,却与社会改革的思潮相呼应。

随着译事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译学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马建忠、严复、梁启超等人分别提出"善译""信达雅""翻译文体"之说。

晚清小说翻译活动　novel translation in the Late-Qing Period

晚清小说翻译活动的直接动力来自小说界革命,梁启超等从意识形态上把小说纳入"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学大旗下,给小说披上文学救国的正统外衣,为新小说的输入制造舆论和思想准备。因此,晚清的小说翻译活动,与其说是一场文学活动,不如说是一项经世济民的实业。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致用方向从本质上决定了晚清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评论准则,使晚清的小说翻译活动实质上成为文人译者试图参与社会、改造文化、经世济民的实业活动。

在翻译策略上,晚清小说翻译活动主要经由两种翻译途径,即根据原文的直接翻译和经由日文的间接翻译。翻译英、美、德、法、俄等西方强国的小说,充分体现了晚清社会由被西方强国侵略到向它们学习富强之术的必然历程,经由日文的欧美小说转译则再次证明甲午战争之后中日权力关系的逆转。所用语言既有文言,又有白话,体现出当时文言与白话既相争又相容的现实。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译意不译词"和"直译"("直叙")是晚清小说翻译话语和实践中并存的两种翻译方法。这种并存现象似乎有违后人对"直译"和"意译"之间二元对立的假定。在文本操作层面,长篇白话章回体和短篇文言笔记体并行不悖,同时出现文言长篇章节体和白话短篇等新体制,也出现了新型的叙事方法和叙事文体。在文学形象上,晚清翻译小说中的典型人物被摘除了种族特征和异域色彩,披上了浓厚的中国式外衣。

在晚清小说的翻译中,大多数译本都是合翻译、批评二者为一体的特殊文本。通过翻译兼批评,晚清文人翻译群体把小说翻译这一客观的知识输入活动转换成一种积极的文化参与和文化批评活动,使译作不仅仅成为被动接受的知识产品,更成为宣传个人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以及进行社会批评的工具。在翻译形式上,独立翻译主体形式占据主流,而佛经翻译、科技翻译中常见的合作翻译则居次要地位,出现了"译""译述""译意""演义"等复杂多样的完成形式。它们在文本特征上的共通性和在译者表述中的互换性,证明其间并不存在以"忠实度"为标尺的等级序列。这对传统的"翻译"定义提出的挑战,也为我们重新审视什么是"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晚清的小说翻译批评不同于现代以文本对照为主要手段、以对等忠实为主要内容、以评判译者外语水平和汉语表达为主要目的的批评话语,而是以道德评判和艺术审美为主要内容,自觉地承担社会监督和作品审查任务。其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责任感不仅有效地反过来影响和监督翻译策略,而且和译作一起积极实现新民的社会变革任务。(据胡翠娥 2007)

"五四"时期的翻译　translation in May 4th Period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一段时期,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历史的发端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是"五四"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产物,也是从近代翻译文学到现代翻译文学的一个发展。其中新青年社及《新青年》杂志起着重要作用。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先后加人"新青年"的行列。他们都十分重视翻译工作,或发表译作,或发表译论。当时,新青年社的翻译活动,其规模和影响超过了近代任何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主要特点是:思想上目的明确,有意识地、自觉地以翻译为武器,为当时的政治和新文学运动服务;在翻译队伍的组织上,新文学社团不断涌现,其成员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初步形成了不同的翻译流派和风格;在翻译作风上,大多数译者严肃认真,忠于原著,"意译"之风下降,"直译"之风开始占主导地位;在翻译语言上,译者都用白话文进行翻译,一改过去多用古文,甚至桐城古文的译法;从原文国别上,扩大了选题范围,尤其是注意俄国文学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此后,中华民族突破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状况。在世界思潮,特别是世界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域,包括翻译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新文学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翻译领域内的地位。当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马列主义理论的翻译和传播、现代西方科学思想和成就的译介和引进,也是这一时期翻译工作者不可忽视的业绩。

外国语学社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共产国际协助上海共产党组织建立的培养革命青年的学校,1920年在上海渔阳里六号创办,主要负责人杨明斋。杨明斋、库兹涅佐娃(Кузнецова)等主讲俄文,此外还有英、法、日文等课程。学员多由各地革命组织选派。学员在校主要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以便送往俄国学习深造。1921年春,先后有20多名学员被分批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王一飞、汪寿华、彭述之等。1921年冬,学社停办。

文学研究会　the Literary Society

1921年成立于北京,后迁上海,发起人有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郭绍虞、朱希祖、蒋百里、耿济之、孙伏园、周作人、瞿世瑛等12人。文学研究会一成立就十分重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外

国文学理论。会刊为《小说月报》,着重翻译介绍了俄国、法国、北欧、东欧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名著,尤其注重现实主义作家,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微支等。该会重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和"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作品,但对其他流派的作家作品也"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文学研究会云集了"五四"以来的文学家、翻译家一二百人,它既是新文学的主力军,又是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主力军。1932 年"一·二八"事件爆发,《小说月报》停刊,此时,文学研究会已消散于无形之中。文学研究会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参见"《小说月报》"

创造社 Society for Creation

成立于 1921 年 7 月,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都是当时留日学生。他们身居异邦,深受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创造社的宗旨是以"创造"为标语,建设新文学,清算新文学阵营内的投机分子和投机的粗制滥造、粗翻滥译。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译介活动,翻译各种著作,有诗歌、小说、戏剧,等等;介绍各种文学思潮,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未来派、表现派等等;同时提出关于翻译问题的主张,提倡理想的诗译;检讨批评别人的译作。创造社也有自己的主要阵地,如《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创造季刊》创刊于 1922 年,出至第二卷第二期停刊。创造社成员的译介活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译作方面,主要是译介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和文学思潮,译风上具有一种激情和创造性。创造社译介活动中的这一特点,也可以说是创造社所标示的"创造精神"在译介活动上的反映。

新月社 The Crescent Society

1923 年在北京初步形成,先是聚餐会,后来发展成俱乐部。成员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林徽音等人。1926 年俱乐部终止活动。1927 年春胡适、徐志摩、余上沅等人在上海筹办新月书店,第二年 3 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社正式开始活动,并引起海内外文化界关注。参加者有闻一多、梁实秋、罗隆基、邵洵美、潘光旦、储安平、刘士英、张禹九、饶孟侃、叶公超等人。新月社很注重外国作品的译介工作,在 1927 年到 1933 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取得了可谓丰硕的成果:《新月》月刊(共四十三册)和《诗刊》几乎每期都有译作发表,而书店出版的单行本书籍中,也有大量的译著;他们翻译过诗歌、戏剧、小说、散文、文学评论。1933 年 6 月,《新月》出完第四卷第七期后停刊,书店被商务印书馆接收,新月社解散。

未名社 Weiming Society

1925 年成立于北京,是一个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为己任的文学团体,由鲁迅始创并支持。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韦丛芜、台静农等。主办《未名》丛刊,出版《未名》半月刊,团结、培育了一批有志于译介外国文学的青年。未名社重视译介苏俄文学,介绍过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和尼采的超人思想。未名社是从出版鲁迅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李霁野译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往星中》开始的,出版过近 20 种译作,于 1933 年 4 月停止活动。

汉译世界名著丛书 *Library of Chinese Versions of World-noted Writings*

1929 年,商务印书馆编印出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第一批图书,第二批图书是 1933 年出的,共出了 200 多种。

早在 1953 年,按中宣部的部署,时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的陈原就开始进行西方学术名著的选译工作。他组织制订了《外国名著选译 12 年(1956～1968)规划总目录》,共收书 1 614 种。三联书店据此组译。1958 年译印外国学术著作的任务移交商务印书馆后,上述总目录成为商务印书馆 1959 年拟订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长期规划的重要依据。

1963 年陈翰伯主持制定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到 1966 年前,在陈翰伯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名著有 500 多种。

在极"左"思潮占上风的年代,出版要按一定的口径增附前言、导言,还有的用"内部发行"的方式。像商务印书馆出版《麦克米伦回忆录》时,按例也加上了这样的导言,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时,要将这本中文版的传记作为礼品赠给她,为此商务印书馆还专门做了一本删去了导言的《麦克米伦回忆录》。一些名著请的是"靠边"的"右派"学者翻译,出版时不能署其名,只好用笔名。像马元德翻译的《西方哲学史》就用了代用名,重印时才改回真名。

"文革"后,中央重申商务印书馆出版方针任务不变,译介世界学术名著又提到工作日程上来。陈原决定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形式出版西方学术著作。(张隽 2005)参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Library of Chinese Versions of World-noted Academic Writings*

继"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之后,商务印书馆 1981 年开始编辑,1982 年第一辑 50 种出版。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的出版,激起了新一波思想启蒙的时代浪潮。至 2009 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名著珍藏本 400 种,其中 383 种是前十辑中已经出版的书籍,还有 17 种计划在 2010 年出版的第十一辑中选取的。

从出版规模来看,这次出版的汉译名著珍藏本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

这套丛书收录了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到近代、现代的世界各国的重要学术著作，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各流派学说、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地理学和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名著的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段、一种思潮或一个流派的先驱者、代表人物，他们踏着前人的足迹，开拓了新的道路，他们积累了时代文明的精华，留给后人去涉猎、检验和汲取精神营养。这些著作都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从中可以看到世界各国历代所达到的学术水平。为了更好地汲取人类的精神文明，这套丛书将长期出版。(参阅林煌天 1997: 271)

左联　The League of Leftist Writers

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简称，于 1930 年 3 月 2 日成立于上海。鲁迅、冯雪峰、柔石、沈端先、冯乃超、李初梨、彭康、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田汉、阳翰笙等 40 余人出席了成立大会。郭沫若、茅盾、瞿秋白、郁达夫等都参加了左联。茅盾、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丁玲、周扬等先后担任过左联行政或党组的领导。左联除将鲁迅主编的《萌芽》和原太阳社刊物《拓荒者》作为机关刊物外，还陆续出版《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后改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学月报》等机关刊物。左联从 1930 年成立至 1936 年解散，历经六年时间，对翻译文学事业十分重视，前后翻译文艺理论书籍达 139 种，其中尤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流。左联的译介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翻译介绍。鲁迅编译了《高尔基文集》，瞿秋白翻译了《高尔基论文选》、《高尔基创作选》，夏衍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等。这些译著不仅给中国作家提供了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范本，促进了我国革命文学的创作，而且激励了我国成千上万的读者，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

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　Chinese Department of the Soviet Union Foreign Workers Press

成立于 1931 年，30 年代末易名为外文出版局。有工作人员约 20 人，其中担任翻译工作的主要是当时留苏的中国学生。1931 年至 1955 年期间出版了理论、社会、经济、历史、文艺等方面的书籍 750 余种，共 2 000 多万册，其中大多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中译本。40 年代中期，除原有主编唯真外，李立三、陈昌浩、张锡俦等也参加该部工作。解放初期，我国曾派遣十几名翻译人员到莫斯科去支援外文出版局中文部的工作。1953 年，我国成立中共中央编译局。之后，苏联外文出版局又改名为进步出版社，仍设有中文部，不过其任务不是翻译马列经典著作，而主要出版宣传苏联社会主义成就的刊物、画报和小册子。该部自 30 年代至 50 年代初翻译出版大量马列著作，传播马列主义，推动了中国革命进程。

《世界文库》　*The World Library*

1935 年 5 月由郑振铎在上海生活书店创刊。《世界文库》计划以丛书代刊的形式，系统地介绍和整理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是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最早有系统、有计划地出版中外文学名著的大型丛书。主编郑振铎在《世界文库发刊缘起》中雄心勃勃地论述其创办的宗旨和出版计划：

> 我们的工作，便是有计划的介绍和整理。将以最便利的方法，呈现世界的文学名著于一般读者之前。
>
> 我们将从埃及、希伯来、印度和中国的古代名著开始，《吠陀》、《死书》、《新旧约》、《摩诃巴拉他》、《拉马耶那》和《诗经》、《屈原》，一切古代的经典和史诗民歌，都将以同等的注意。

文库编委会阵容强大，当时文化界知名作家、翻译家几乎都囊括其中，达一百多人，其中包括鲁迅、蔡元培、周作人、朱自清、茅盾、谢冰心、夏丏尊、郁达夫、叶绍钧、巴金、丰子恺、李广田、许地山、耿济之、胡仲持、卞之琳、李健吾、李青崖、孙大雨等。郑振铎拟定的《世界文库》第一集目录"外国之部"开列了上至古希腊罗马、下至 19 世纪外国文学名著近四百种。第一册于 1935 年 5 月 20 日正式出版，此后一年内陆续刊译了俄苏文学及法、英、美、德、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挪威、波兰、比利时等 10 个国家一百多部文学名著，其中有小说、诗歌、传记，译介的著名作家有果戈理(Гоголь)、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高尔基(Горький)、塞万提斯(Cervantes)、巴尔扎克(Balzac)、雨果(Hugo)、司汤达(Stendhal)、莫泊桑(Maupassant)、易卜生(Ibsen)、哈代(Hardy)、勃朗特(Bronte)等著名作家的作品。

《世界文库》第一年如期出版了 12 册，外国文学部分译载了外国文学名著和佳作 61 种，其中包括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傅东华翻译的《吉诃德先生传》、李霁野翻译的《简爱自传》、霍桑(Hawthorne)的《牧师的黑面纱》(蹇先艾，陈家麟译)、司汤达的《法妮娜·法尼尼》(李健吾译)、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败坏了海德来堡的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抒情诗歌集〉序言》(曹葆华译)、高尔基的《马尔华》(陈节译)、《蒙田散文选》(梁宗岱译)、罗逖(Loti)的《冰岛渔夫》(黎烈文译)、奥维德(Ovid)的《拟情书》(茅盾译)、尼采(Nietzsche)的《苏鲁支如此说》(徐梵澄译)等，还译载了文艺理论著作。此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日益扩张，时局不稳，《世界文库》停刊。《世界文库》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它的出版使外国文学翻译第一次形成了规模效应。(据谢天振，查明建 2004: 107～110)

时代出版社　Times Press

1941 年在上海由中共地下党与前苏联合办的以"苏商"名义公开活动的出版社，出版过《时代周刊》、《苏联文艺月刊》、《时代日报》、《苏联医学》等报刊以

及大量文艺、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各方面的书籍。时代出版社成立以来,经历了三个时期:敌伪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时期。苏方主要负责人为塔斯社远东分社社长罗果夫(Porob)。中方主要负责人为姜椿芳。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出版社进行重新分工组合时,该社并入商务印书馆。时代出版社先后翻译出版了前苏联著名作家的文艺作品近300种,为国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俄苏文学编辑和翻译人才。他们后来分散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等科研和出版部门。

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　Shanghai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1949年,上海一批文学艺术翻译工作者为了团结翻译界同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在上海文联领导下成立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一个群众翻译学术团体。由董秋斯、陈原、吴景崧、刘思慕、陈麟瑞等人负责,隶属于上海市文联。该会在上海地区发展会员,出版会刊《翻译月刊》,购置外国文学作品建立图书馆。1951年,该会主要领导人调往北京,自行停止活动。参见“《翻译月刊》”

《华夷译语》　*Minority Nationality Languages-Chinese Dictionaries*

我国明清两代官方编纂的多个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对译的辞书的总称。已经发现的《华夷译语》有几十种,为明清的会同馆和四夷馆(清初改为四译馆)所编译,大多是抄本,刻本甚少。一般是词汇(称为“杂字”)的对译,也有一些公文(称为“来文”)的对译。杂字一般分11至20门排列,收词在500至2 000之间,每个词下列有汉字记音和汉义,也有列有原字(即民族文字)的。据1930年日本石田幹之助的分类和1948年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的增补,《华夷译语》共有四种:1. 明代火源洁用汉字记写蒙古语的《华夷译语》,无原字;2. 四夷馆本,收杂字和来文,有原字;3. 会同馆本,仅收汉字记音的杂字,无来文和原字;4. 故宫所藏42本,仅收杂字,大都有原字。有原字的比无原字的语言学价值高一些,因为用原字注音较确切,从所附来文中亦可看出语法的梗概。这种译语大多保存了较早的拼写形式和语音面貌,是研究有关语言或拟测古音的重要资料。

汉藏对音　Tibetan-Chinese transliteration

指汉译藏音或藏译汉音。例如,据822年(唐长庆二年)唐蕃会盟碑铭刻,唐朝的官名“大夫”的藏译音为thai cu da'i phu;a khri btsan吐蕃的人名źan khribtsan的汉译音为尚绮立赞。后来发现的敦煌千佛洞所藏佛经写本和识字课本(多为残卷)里都有这种对音。根据这种对音,可以推测当时的汉字读音。是研究古代音韵的重要资料。

汉梵对音　Chinese-Sanskrit or Sanskrit-Chinese transliteration

指汉译古印度梵文的咒语、宗教颂诗和佛经里所用的汉字译音。如天城体梵文字母ट ठ ड ढ ण,玄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初分辩大乘品》对译为“吒”“搋”“茶”“择”“拏”;梵音koṭi,《玄应音义》对译为“俱致”,《慧琳音义》对译为“俱胝”。汉梵对音主要保存于汉译的各种佛典中。清允禄等纂集的《同文韵统》内“华梵字母合璧谱”录有经藏文翻译的汉梵对音的材料。近代学者把梵文原文与用汉字音译的梵语加以对照,便可以推断那些汉字在当时的音读。

《万国公报》　*Chinese Globe Magazine*

周刊,创刊于1868年9月(同治七年七月),为美国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所创办和主编,上海林华书院刊发。第1~300卷名《教会新报》以宣传宗教为主。从第301卷起改名《万国公报》,成为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出至第750卷停刊,至1889年2月(光绪十五年正月)复刊,改为月刊,册次重起,成为广学会的宣传刊物。仍由林乐知主编。1907年(光绪三十四年)年底停刊。前后达40年左右,是中国创办最早、历史悠久的一个刊物,特别是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影响较大。复刊后的报序称,“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敦政本也。略评各国琐事,志异闻也。其他至理名言,兼收博取,端学术也。算学格致撷其精蕴,测其源流,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皆在所不当遗也。”值得指出的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和他的科学巨著《资本论》的名字,最早也是在《万国公报》上出现的(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2至4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节译英国进化论者颉德(Kidd)的《社会进化论》中提到)。

《格致汇编》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

1876年(光绪二年)2月创刊于上海。其前身是1872年(同治十一年)在北京创刊的《中西闻见录》(*The Peking Magazine*)。刊物主编为英人傅兰雅(Fryer),但主其事者为我国化学家、翻译家徐寿。刊物发行前后跨17年(1876[光绪二年]~1892[光绪十八年]),中间停刊两次,共计出版发行7卷60册。在创刊号上,徐寿写道:“此汇编之意,欲将西方格致之学,广行于中华,令中土之人不无裨益”。该刊登载多为科学译文,内容十分丰富。除了报道自然科学知识外,还大量报道西方新的工艺技术。同时,评介或摘译、连载西方新出版的科技书籍,发行遍及国内70个城市,远销新加坡、日本,为当时一份重要的科学刊物。

《时务报》　*The Chinese Progress*

旬刊,1896年8月(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创刊,在

上海出版，为戊戌变法前维新派重要的宣传刊物之一。总理汪康年。先后担任主笔的有梁启超、麦孟华、章炳麟、徐勤、欧榘甲等。1898 年 8 月(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停刊，另出《昌言报》。共出 69 册。该报有一半左右的篇幅是译载东西各报的新闻，它先后聘请了六个通外文的人从事英日等报的翻译工作。该报还译载过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所作的《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片断《继女诳女破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张坤德译)。这是《福尔摩斯侦探案》在我国最早的译本。

《大同报》 ***Datong Newspaper***

上海广学会出版。自 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至 1917 年止，每周发行，分论说、译著、新闻三部。译著材料最丰富，包括哲学、教育、历史、宗教、农业、动植物等。

《小说月报》 ***The Novel* (a monthly)**

创刊于 1910 年，原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种主要文学刊物，从 1921 年起改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由沈雁冰主编。此后的《小说月报》和以前大不相同，紧密地配合新文学运动，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翻译外国现实主义文学，及时地介绍各国的文学动态，为翻译文学历史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小说月报》翻译介绍了俄国、法国、北欧以及被损害民族国家等现实主义因素较强的作品；介绍了世界文学潮流、派别、文艺理论、文学发展概况；刊出了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被损害民族文学等专号；同时也刊出了外国著名作家如安徒生(Andersen)、拜伦(Byron)、莫泊桑(Maupassant)、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泰戈尔(Tagore)、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法郎士(France)、罗曼 · 罗兰(Romain Rolland)等的专号。

《论翻译名义》 ***On Translating Terminology***

章士钊于 1910 年 11 月 22 日在《国风报》第 29 期上以“民质”为笔名发表的文章，其宗旨在于“讨论意译、音译之得失”，其实是以考察意译的得失为主提出音译的主张。文章从提出问题开始，颇具玄学的思辨深度：“一、以义译名，果能得吻合之译语乎？二、以义译名，弊害何在？三、纵得吻合之译语，果即为适用之译语乎？四、如不能得吻合之译语，吾宁择其近似者，抑将弃掷义译之法乎？五、如欲得义译之良译语，有不可犯者何病？六、以音译名，利弊何如？”显然，这组问题的要点是意译与音译的利弊和选择，从其论述要点是侧重于意译弊端的思考来看，尤其可以说是关于意译的形而上学思辨题目。至于音译的必要性问题，章士钊强调得并不很过分。他认为，意译即便可以找到吻合的词语，也不一定适用，因为有的术语在原文中就有问题或异议，照译之，必不妥。他的结论是：“在认义译为必要时，吻合之译语既不可得，则惟有取其近似者之一法；在义译极困难，而又认为不必要时，则宜诉之他法。”这便是“音译”。至于音译的理由，章士钊又从文字上补充说：“吾国字体，与西方迥殊，无法采用他国文字。以音译名，即补其短也。语其利也，则凡义译之弊，此皆无有，即为其利。至语其害，则人或觉其生硬不可读外，可谓无之。”此外，章士钊又以音译作为佛经翻译的成功之因而论证说：“佛经名义之不滥者，译音之法乃确为一绝大之保障。至今‘涅般’，‘般若’等字，未闻有人苦其难读者。”至于音译的好处，后来朱自清在《译名》一文中认为不外有三条，即不滥、持久、免争，为此作了总结。

(王宏印)

《论译名》 ***On Translating Terminology***

为胡以鲁的一篇文章，发表于 1914 年 2 月 15 日《庸言报》第 26～27 期合刊上。文章一开始就提出音译不是译，而是“借用语”的概念。胡以鲁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晚清以来主张音译而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的六派认识：“一、象形文字，多草昧社会之遗迹，思想变迁，意标依旧；于是以为非借外语不足以表彰新颖名词，嫌象形之陋，主张借用外语者。此一派也。二、意标文字，多望文生义之蔽，名词为通俗所滥用，习为浮华，泛然失其精义；则利用外语之玄妙，以严其壁垒。此一派也。三、侨居其地，讽诵其书，对于外语名词，联想及其文物，乡往既深，起语词包晕之感，以为非斯词不足以尽斯义者。此一派也。四、名词之发达不同，即其引申之义不能无异，辗转假借，又特异于诸语族之所为，借以表彰新事新理所含众义，往往不能吻合；则与其病过不及，毋宁仍外语之旧，以保其固有之分际。此一派也。五、习俗不同则事功异，风土不同则物产异，西势东渐，文物蒸蒸，吾国名词遂无以应给之；此土所无，宜从主称者。此一派也。六、北宋之亡，民日以偷，文敝言庞，常用不过千名而止，事物虽繁，莫能自号，述易作难，故且因循者。此又一派也。”

胡以鲁在该文中的翻译思想可归纳为：1. 语言的命名来源于模仿，而且有先天之不周和缺陷。胡以鲁借用西方哲人缪勒(Müller)的语言哲学思想，杂以中国老子思想，提出“天地之始无名也。名之起，缘于德业之模仿”的卓越见解，实为难能可贵。2. 思想既与语言如此不同步，语言之更新实应求助于古代文化渊源。中西文化，各有源头可索求，其语言之情况大抵相同。中西语言，如今都有不能适应新情况的问题存在。照此推论，则各国语言之问题，皆应到其古代的源头寻求其应变之资源。3. 语言乃民族精神之所系，保有语言纯洁即是保持民族自尊。这里作者没有进一步把民族精神在语言中的方方面面分析下去，而是把本族语言的保护提高到保国和自尊的高度，同时包含着反对音译倡导意译的思想基础以及主张民族语言的纯化与反对外语污染的思想。但从总体上说，语言的民族精神不应导致保守的语言发展策略。4. 翻译须明了国语外语之本质，有适宜借用的，也有

不适宜借用的。借用外语为不得已,但有的语言不得不借,如波兰之于俄语,又如波斯语借阿拉伯语,日语借汉语,英语借希腊语、拉丁语、法语。但他认为汉语不适宜借用外来语:"吾国语则反是。"他举了佛经翻译的"五不翻",认为是少数。蒙古与满清夺取统治权后,反被中原文化和汉语同化,只是"殆于晚近,欧西文物盛传;借用外语者方接踵而起。"胡以鲁的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不能因为在历史上一种语言借别的语言少就认为该语言不适合借用外来语,何况事实上汉语在历史上的外来语已经不少,而且其中很多是音译而来的。5. 在谈到汉语和汉字的相对优势和缺点以及同化和借用外来语的机制时,胡以鲁认为汉语"不足云者,文化短绌,未尝具体概念;语词发达,又以在物质在感觉者居多;表形上之思,粗笨不适也。""汉语学术不精,术语自必匮乏。"但汉语汉字也有优点:"词富形简,分合自如,不若音标之累赘,假名之粗率。"

应当说,胡以鲁立足语言的性质特点来说明翻译问题,是很有见地的。他还进一步借助中文和外文的差异,说明音译的困难和借助意译的同化功能纯洁祖国语言的必要性。他说:"况意标文字中,取借用音语杂糅之,诘屈聱牙,则了解难;词品不易辗转,则措词句度难;外语之接触,不仅一国,则取择难;同音字多,土音方异,则标音难。凡此诸难事,解之殆无术也。"胡以鲁指出了音译的诸多难处,而他的基本主张是用音译加紧外语的同化过程。(据黄嘉德 1940:201～224)

(王宏印)

《新青年》 *New Youth*

1915年9月创刊于北平,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1926年7月停刊。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阵地,又是现代翻译文学的发源地。1915年至1917年侧重欧洲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的翻译介绍,1918年后注意介绍世界"弱小民族"作家作品。1915年至1921年,《新青年》发表的翻译作品,原文国别包括俄、英、美、法、日、印度、挪威、西班牙、丹麦、葡萄牙、波兰等十余国家。作家包括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契诃夫(Чехов)、莫泊桑(Maupassant)、易卜生(Ibsen)、显克微支(Sienkiewicz)、安徒生(Anderson)、高尔基(Горький)、武者小路实笃(Mushanokōji Saneatsu)、王尔德(Wilde)等。译者大都是新青年社的成员或其主要撰稿人,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郑振铎、沈雁冰等。他们以翻译为武器,为现实服务;大都从改革社会、改革文学、教育大众的立场出发。

《新青年》作为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发源刊物,它的翻译活动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新青年》的翻译文学,既是"五四"革命文学的先导,又是它的重要内容。其次,它的译者大多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们译介外国文学有着鲜明的目的,就是引入新思想和新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的楷模。第三,《新青年》的译作与近代翻译文学比较有了很大的发展,译者大多具有很高的外语水平,与林纾的不懂外文而采用意译或译述,并常常改变原作的状况相比,有了很大发展。此外,它还培育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最早的一批优秀翻译家。

《译名》 *On the Translation of Terms*

朱自清1919年在《新中国》第1卷第7期署名"佩弦"的文章。文章总结了胡以鲁和章士钊持续十年的关于译名问题的论争。朱自清分别就意译和音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最后关于译名统一问题提出下列解决办法(各条后括弧内的解说是后加的):一、政府审定。(即政府的语言政策和有关法令)二、学会审定。(即专业学会有关译名统一问题的决议或议案)三、学者鼓吹的力量。(即专家的理论观点、具体措施,或宣传鼓动)四、多数意志的选择。(即社区公民在社会实践中对于译名的取舍和历史的淘汰)译名的统一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其中也许包含着音译和意译问题的最终的翻译社会学的解决。朱自清认为,译名的统一问题,需要借助诸多的社会力量的联合行动方能生效,而其最终效用则在于便利学术和思想的交流和发展。

(王宏印)

《译文》 *Rendition*

由鲁迅和茅盾创办并领导的文学翻译期刊,于1934年在上海创刊,是我国最早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该刊办了近三年,发表过100多篇译作,其间还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过。在该刊上发表译作的译者中除了鲁迅和茅盾外,还有周杨、傅东华、耿济之、胡愈之、黎烈文等。他们译介了俄苏文学及法、英、德、意、匈、荷、日本、丹麦等许多国家的作家作品。同时,《译文》还出版了"高尔基逝世纪念特刊""罗曼·罗兰逝世纪念特刊""普希金纪念特刊"。《译文》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在介绍外国作家作品、传播外国进步文艺思想、培养翻译人才、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翻译月刊》 *Translation* (a monthly)

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刊,1949年创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的一份翻译专业刊物。该刊设有编委会,编委包括上海翻译出版界人士:董秋斯、胡孟昌、吴景崧、李青崖、李纯青、陈麟瑞、叶水夫、刘思慕、赵邦铄、刘咨之等人。该刊主要刊登外国文学译作、探讨翻译问题的文章以及翻译出版信息等。到1951年4月已出版到第4卷第4期。1951年后随着协会停止活动而停刊。

《翻译通报》 *Translation Bulletin*

出版总署翻译局出版的翻译专业刊物,于1950年7月1日正式创刊。其宗旨为:加强翻译工作者的联系,交流翻译经验,展开翻译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翻译水准。该刊为月刊,16开本,第1卷共六期,

非卖品。1951年第2卷第1期起改为公开发行，至1952年下半年停办。该刊由董秋斯主编，主要栏目有：翻译理论与经验、翻译书刊评介、外文书刊评介、翻译问题解答、统一译名商讨、翻译界动态、翻译计划、每月翻译书刊汇报、翻译短论等。该刊曾多次组织翻译工作者笔谈会。

《翻译通讯》 *Translators Notes*

双月刊，1979年试刊，1980年2月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编辑出版，公开发行。办刊方针是：认真执行“双百”方针，交流英汉互译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工作经验，开展翻译评论，普及翻译知识，沟通译界情况，团结广大翻译工作者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贡献一份力量。1980年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翰伯的《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春天》(代发刊词)的文章以及老一辈翻译家张仲实、范存忠、师哲、朱光潜、张谷若、劳陇等的文章。1983年起《翻译通讯》交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作为会刊接办，1986年起改名为《中国翻译》，延续至今。

《编译参考》 *Translation and Editing for Reference*

《编译参考》创刊于1979年，2004年停刊，是综合性知识性月刊。它精选海外报刊的代表性报道评论、新闻人物、书评书讯等，尤其注重海外人士对中国当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反应，注重新情况、新动向、新思潮的引进，讲究知识性与趣味性兼顾，配有照片和讽刺漫画，发行广泛，受到读者欢迎。 （孟德胜，王宏印）

中国翻译的沉寂期 lull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翻译研究处于相对低潮的一个短暂时期。我国翻译研究在80年代出现过高潮，翻译界从此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经验主义的束缚，开始从语言科学的高度来认识翻译理论。特别是系统地引进了费道罗夫(Фёдоров)、纽马克(Newmark)、奈达(Nida)、卡特福德(Catford)、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等人为代表的语言学翻译理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虽然它本身在不断地完善)，加上西方语言和文化跟汉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异质性，这一理论不能有效地来指导汉外、外汉翻译实践，并与相继引进的其他理论的方法与原则相左。于是有学者提出要“丢掉幻想”，认为“翻译不可能成为科学”，不要再“不断制造空洞的理论”，翻译中“不存在什么汉语转换的规律”。这一时期我国虽有大量译论、译著问世，翻译理论研讨会不断，但多往复徘徊或流于空泛，少有新的突破。

翻译的后语言学时期 postlinguistic perio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翻译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符号学、解构主义、认知科学、信息论、后殖民思想等的引入，使翻译研究走出单纯依靠语言学的樊篱，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加上哲学家对翻译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把翻译研究引向深入，传统译论和当代译论的一些基本观点都受到了挑战。翻译成了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哲学家要阐释他们的思想，首先必须弄清语言和意义的问题。哲学家们断言，“所有的哲学都是语言哲学”。而语言的意义问题，很可能在翻译研究中最终得到揭示。再如，翻译中的文化研究也提高到空前重要的地位。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各种文化的汇聚和交融。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的。在现代国家中，绝对不受外来影响的固有文化是不存在的。

《文学翻译报》 *Literary Translation Newsletter*

月报，1988年创刊，1992年停刊，四川省作家协会翻译文学委员会和四川省翻译文学学会合编，重庆大学主办。该报立足四川，面向全国，宗旨是团结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文学爱好者，介绍评介外国文学佳品，沟通国内外文学翻译信息，开展文学翻译理论探讨及批评，发现和培养文学翻译新人，以促进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繁荣。其特色是短、精、新、雅、博、趣。开设“译坛纵横”“译坛人物”“名家谈翻译”“文坛风景线”“新诗英译”“希望园”“新译扫描”等栏目。

名词审定机构 organizations of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of terms

我国近代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始于1906年，当时，在大学院设立了科学名词馆，由严复任编纂。辛亥革命胜利后，江苏教育会理化教授研究会曾组织过物理学、化学等名词术语的审定工作。1918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查会，着手分学科组织术语审定，1927年设立译名统一委员会，1928年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专设编审处负责各学科名词审订工作，1932年成立国立编译馆，组织专门队伍开展了多学科名词术语的审定，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馆尚有数十种各学科名词术语草案，为新中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提供了素材，打下了初步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置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任命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为主任委员。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受到政府的关怀和重视，被提到了重要地位，正像郭沫若院长在1954年出版的《地质学名词》序中指出：“这些工作乃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在学术工作上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最起码的条件。由于这样，统一学术名词工作才具有它实际的迫切的需要，……”

1966～1976年10年期间，名词审定工作中断。改革开放后，国务院委托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于1985年组建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该委员会陆续公布了各科的学术名词，许多采用英汉对照

的形式。经其审定的自然科学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现该委员会正努力按国务院的要求按学科专业逐个组织审定与统一工作。

《国际歌》 *Internationale*

1871年6月,巴黎公社失败后,公社诗人鲍狄埃(Pottier)写下了《国际工人联盟》一诗。17年后在诗人逝世7个月时,法国工人狄盖特(Degeyter)为它谱了曲。这就是被列宁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歌"的《国际歌》。《国际歌》的翻译史是一部不断修改和完善的历史。《国际歌》歌词最早的汉译文刊登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周刊《劳动者》第二期上,时间是1920年10月10日。先后参加歌词翻译的有列悲、张逃狱、耿济之、郑振铎、李大钊、瞿秋白、陈乔年和萧三等。他们对《国际歌》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译文质量的不断提高都作过有益的贡献。然而谙熟法文的翻译家们对我国目前流行的《国际歌》(1962年经萧三修订)的译文仍有不满意之处,对歌词的汉译文提出意见。一首歌的歌词经过那么多人翻译,仍没译到比较理想的地步,充分说明了歌词翻译之难。我国现行的《国际歌》歌词,基本上是根据俄文版本转译过来的,大体上沿用了瞿秋白1923年6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共产国际》号上的译文。

大中华文库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Chinese-English)*

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古籍整理和翻译的巨大文化工程,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也是深层次的对外宣传工作,意义深远重大。《大中华文库》整体筹划周全、版本选择权威、英译准确传神、体例妥当完善,浓缩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可以向世界说明中国。它几乎是涵盖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精华,包括:《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全2册)、《荀子》(全2册)、《儒林外史》(全3册)、《牡丹亭》(全2册)、《西厢记》、《陶渊明集》、《楚辞》、《墨子》(全2册)、《汉魏六朝诗三百首》(全2册)、《红楼梦》(全6册)、《西游记》(全6册)、《水浒传》(全5册)、《三国演义》(全5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搜神记》(全2册)、《颜氏家训》、《长生殿》、《关汉卿杂剧选》、《汉魏六朝小说选》、《南柯记》、《封神演义》(全4册)、《儿女英雄传》(全2册)、《菜根谭》、《文心雕龙》(全2册)、《邯郸记》、《镜花缘》(全2册)、《老残游记》(全2册)、《浮生六记》、《管子》(全4册)、《吕氏春秋》(全3册)、《六韬》、《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黄石公三略》、《黄帝内经素问》(全3册)、《列子》、《新编千家诗》、《阮籍诗选》、《四元玉鉴》(全2册)、《商君书》、《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全2册)、《元曲三百首》、《初刻拍案惊奇》(全4册)、《黄帝四经》等51种92册。

《大中华文库》有着强大的学术翻译与编辑出版阵容,学术顾问委员会中有我国最为知名的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季羡林、任继愈、袁行霈、李学勤、金开诚、杨宪益、叶水夫、沙博理、韩素音、李赋宁等;总编辑为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后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杨牧之。

《大中华文库》编委会同时着手制定中国近代和现当代的名著翻译出版计划(含约100种书目)。除了英文版以外,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也正在着手编辑其他外文版,包括法文版、西班牙文版、德文版、阿拉伯文版等,其中朝鲜文版已经翻译出4种,于2007年6月份与韩国合作出版。另外,在适当的时候,还会出版从书的普及版,让它走近更多的读者。

爱尔兰驻华大使戴克润称,汉英对照的《大中华文库》是五千年中国文化的新篇,堪称真正的"中国芯",更应是"人类的文化芯片",因为这些经典富含着东方人的智慧,也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季羡林认为:"我们常讲一句话,说'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问题是弘扬的范围是什么?弘扬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后代。更重要的是,《大中华文库》对我们整个人类的进步、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张隽 2007)

译名论争 argument for better terminology policy

20世纪初发生在章士钊和胡以鲁之间关于译名的论争,这是二者之间一场并不指名道姓的论辩,发起人是章士钊。他于1910年11月22日在《国风报》第29期上以"民质"为笔名发表了《论翻译名义》,欲"讨论意译、音译之得失",其实是以考察意译的得失为主提出音译的主张。文章发表后得到很强烈的反响,不少人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但都是就音译本身提出反对意见的。章士钊则继续发表文章作出反应,并且吸收了论辩对方的一些观点。章士钊的主要对手是系统地提出意译方案的胡以鲁,胡以鲁于1914年2月15日《庸言报》第26~27期合刊上发表了长文《论译名》,文章显然是针对章士钊的意见的,但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章士钊,而是直接论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到了1919年,朱自清在《新中国》第一卷第七期署名"佩弦"发表了兼论二者的文章《译名》,基本上结束了这场持续十年的译名问题论争。至于他们争论的意义,早已经超出了音译、意译本身而进入到语言命名的本质问题。而争论的问题,则可以上朔到唐玄奘提出的"五不翻",而且三人对"五不翻"都有所评论。众所周知,"五不翻"的精神是音译,而章士钊便是近代主张音译的第一人。

这场论争中所涉及的学术观点,给我们提供了若干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珍贵的思路上的启发。1. 翻译研究应当建立自己具有独特学科性质的语言学研究。理想的翻译语言学研究应当能够借助语言-世界-思想三重架构的精神,包括语言学、逻辑学和思维科学在内,通过比较研究回答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2. 译名和译名统一问题是翻译十分重要的一项

基础工程建设,涉及文理各科专业术语的统一和协调问题,需要在各学科内外进行系统的合作研究,而人名、地名、物产等专有名词的翻译则需要涉及各民族和地区的语言演变、命名惯例、生态环境、历史事件、地理变迁、地名沿革、风俗习惯等,需要多学科多方面的配合工作。3. 音译意译的关系可以有几个层次的理论观点的延伸性解释。音译和意译作为相互补充的翻译概念,共同完成了翻译的整体观。作为并行不悖的两种翻译方法,可以说明翻译的可译性的限度。在文本层面上保持音译和意译的适当比例,可以完成翻译的明晰性和含混性两种功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以鲁和章士钊二人的论争,树立了一个优良的学风典范。1. 二者都是以坚实的学理依据(主要是语言学、逻辑学、文化史)来建立自己的翻译观点,并且在展开学术论争的时候,使得各自的翻译观点得以深化和系统化。2. 文章不仅有学理,有观点,有一贯的语言策略和翻译主张,而且有丰富的例证来深入全面地探讨翻译问题。3. 论争者能够以真理为追求之最终目标,在坚持和申辩自己主张的同时,随时准备接受对方观点中有用的东西,纳入自己的理论思考,作为同一真理之两面的补充。

(王宏印)

“信达雅”之争　arguments about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严复的“信达雅”,从一出世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多方面的评论,产生过种种的误解和误传,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简直成了开言必谈的话题。总结百年来的研究情况,可归类如下:

第一类,赞成者:严复的理论发布一百年来,赞成者不少,不少有身份的翻译家或理论家都持赞成态度,而持赞成态度的又可大体分为下列四派:1. 影响派:认为“信达雅”历史悠久,承上启下,影响深远,不可小视,故而加以肯定。2. 系统派:认为“信达雅”三字在理论上系统完整,简明扼要,故而加以肯定。3. 传统派:认为严复的“信达雅”植根于中国文学传统,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故而能流传久远。4. 理论派:认为严复的“信达雅”有极高的理论价值,甚至是至高至善、无以复加的科学。

第二类,反对者:持反对意见的人各有其不同的根据或动机,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 草率否定:虽然认为严复的翻译实践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全盘否定“信达雅”的理论。2. 多方怀疑:既怀疑“信达雅”本身,也怀疑严复,还怀疑后人对严复的研究。3. 部分否定:有的人认为“信”是对的,“达雅”则不必要或不正确。4. 不宜再用:持“历史局限”说的人认为,“信达雅”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有其历史局限性,不能继续作为标准或翻译理论来使用。

第三类,修正者:所谓修正,就是在严复“信达雅”三字诀的基础上作些许改变,或者借鉴其方法重新订立翻译标准,甚或寻求其他可能的替代说法以求超越之。近百年来,修正者是较扎实地做工的人,仅举有典型意义者数例。1. 一字之改:“信达雅”本来三位一体,今人因为“雅”字有问题,故而改动一字,以为修正或改良之策。以刘重德为最具典型意义,他的方案是“信达切”(切合风格)。2. 另立门户:有的人认为严复的“信达雅”或者本来不确,或者今已不行,但其三字结构似乎可以继承。以黄药眠的“透、化、风”三字比较出名。3. 比附生新:有的人基本赞成严复的“信达雅”,但觉得不过瘾,于是仿照其法,再造三字与之并存,以为创造。著名作家郁达夫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此举,认为“信达雅”三字是翻译的外部条件,“举出‘学’、‘思’、‘得’的三个字来,作为翻译者的内的条件。”4. 寻求替代:所谓寻求替代,实际上是对信达雅的一种超越,不是直接模仿,而是提升扬弃。杨镇华想用陈西滢的“三似论”(即形似、意似、神似)取而代之,以求信。

“信达雅”本身作为翻译理论,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只是传统译论中可以称为“翻译标准”的一种说法。试图把它扩大而说成是整个翻译理论,或者认为它不够一个翻译理论体系的容量而予以全盘否定,都是不对的。作为翻译标准,“信达雅”是一个小系统,有自己的结构方式和完整的意义。说它把一(信)分成三(信达雅),或者主张把三(信达雅)归为一(信),都是不符合严复原义的。“信达雅”原本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写作理论,但严复已经作了向翻译理论的转变。认真研究这一转变在理论上的意义和把翻译理论建立在写作理论基础上的合理性,是今日建立新的中国翻译理论可以借鉴的。　(王宏印)

直译意译之争　literal translation vs. free translation

极而言之,直译意译的争论古已有之。但在很长时间里,例如在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漫长时期里,所谓的直译意译之争实际上是和中国译论中典型的文质之争分不开的。(参见“文与质”)进入20世纪的20至30年代,随着西方翻译思想的进入和大量西学东渐的翻译实践活动,翻译界又展开了一场直译意译之争。这场直译意译的争论可以说是古代文质之争的延续与发展,但也并不完全是同一个问题。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在20世纪20年代初便鲜明地使用“直译”这个术语来概括他们的翻译主张。他们提出“直译”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翻译界盛行的任意删削、颠倒、附益的翻译方法。直译派认为意译让“洋人穿了长袍马褂”,是“削鼻剜眼”的翻译;意译派认为直译以辞害义,语言不通顺,读者不知所云。20世纪50年代初,大量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的方法论要求,使得直译意译之争又起,但不如20和30年代的论战激烈。此后两派之争虽然并未完全停止,但主张调和的中间派占了统治地位,大多数人认为直译和意译可以结合为一种理想的翻译方法。后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奈达(Nida)翻译思想的引入,直译意译之争部分地为科学艺术之争所替代或遮蔽,但后者更加倾向于翻

译性质的认定而不是翻译方法的争论。近年来,由于韦努蒂(Venuti)归化异化理论的传入和翻译学上的文化问题的突出,直译意译之争又发展为归化异化之争,其争论的焦点可以说是由语言转向文化。归化派认为,译文归化是为了让读者容易理解,而且译文归化与保存异域文化并不矛盾;异化派则认为,归化抹杀了源语文化特点,是对原文的歪曲,片面归化的译文阻碍了文化交流,造成了文化失真,客观上蒙蔽了读者。就翻译理论本身来说,随着归化异化问题的深入讨论,直译意译之争基本上已接近尾声。但在翻译实践中,直译意译作为两种基本的翻译方法,还将继续下去,因此其讨论和探讨就永远不会结束。

(王宏印,陈大亮)

艺术与科学之争 science vs. art

我国的翻译史是以文学和艺术为主的翻译,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表现。自20世纪70～80年代国内引进了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以后,翻译界就逐渐产生了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这种争论在90年代变得最为激烈。实际上,翻译界的"艺术"与"科学"之争在西方也早就存在,几乎可以追溯到古代经典的翻译及理论探讨。美国圣经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关于翻译是科学与艺术的并行的提法,引起国内译界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另一方面,前苏联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间的争论也引入国内翻译界,促进了这一争论在学科和学派上的分化。在我国,语言学派(即科学派)主张对语言进行科学分析,旨在建立一种科学体系,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规律。文艺学派(即艺术派)则认为,翻译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因而要求译者应该具有像原作者那样的审美情趣、想象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他们把翻译视为原作者在用译入语进行再创作,因而要求译文注重神韵,臻至化境,甚至还鼓励译文超越原文。总之,艺术派要求译文本身应该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原文一样能够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美的感受。一种倾向于折中的中间派则认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是科学与艺术的辩证统一,主张翻译既有科学规律可循,也有艺术创造的成分。还有人认为,翻译在实践上是艺术的,但在研究上是科学的、理论的。这就把科学与艺术之争进一步引到关于翻译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的轨道上。因此,翻译界关于理论与实践、可译与不可译、形式与内容、继承与引进等问题的争论,或多或少都和翻译的艺术与科学之争有关。

20世纪80年代后,翻译理论的发展方向是科学化和结构主义化,因此在翻译学建设中,科学主义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在理论思考时,经验性的因素受到怀疑,翻译研究力求抽象和体现普遍性。于是翻译中的规律性东西成了研究的重点,翻译理论就是要体现这种规律性。然而,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理论一直是中国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两大主流。科学化的抽象和规律的提取尽管是新的学科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却显然并不能涵盖翻译研究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文学翻译研究。因此,此时的译坛表现为一方面学习和大力发展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另一方面仍有大量关于翻译的艺术和美学方面的文章和专著出版并受到欢迎。艺术观无疑更具有历史渊源和中国学术基础,渗透着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艺学的思想。科学观则是满足了新时代的学科发展的某种需要,和西方现代语言学有直接的联系。

关于翻译科学和艺术之争的性质,有的认为是根源于研究方法的分歧,因此,科学和与艺术之争也可以看做研究方法之争。科学的研究方法重在探讨双语互译的规律,关注规范性和模式化,研究方法力求科学化,其重点是翻译中理性的部分。而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则看重翻译中灵感和创作的部分,强调体悟美感、重视神韵,研究方法重在体验,更看重翻译中的创造性。此外,科学和艺术之争还关涉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的界定。在一段时期内,"翻译是科学"在很大意义上实际上指的是"翻译研究是一门科学"。随着概念的清晰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便作出了"翻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而翻译学是一门科学"的区分。如今,翻译的科学和艺术之争中,偏激的观点已经很少出现,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翻译本身兼具艺术性与科学性,而翻译理论研究中也需要兼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王宏印,李林波,陈大亮)

归化异化之争 domestication vs. foreignization; adaptation vs. alienation

归化与异化之争是近年来中国译界最具影响力的争论。无论在参与研究者的数量还是在讨论成果或者是在持续的时间上,都超过了其他的争论。《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还推出"异化归化谈"专栏。这两者之争如此激烈,原因一是它直接与旷日持久的直译意译之争相接,因此表面上的异化归化之争在一些地方其实是直译意译之争的延续,正如林克难(2005)指出的那样:"在不少学者口中念念有词地叨叨归化异化的时候,实际心里想的还是直译意译。"为了澄清这种混乱,学者们对这两组争论做了区分。王东风(2002)认为异化与归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续,但又超越了直译意译之争。杨自俭和刘艳丽(2002)认为直译意译是表达形式层面的争论,而归化异化则涉及语言表达形式和文化因素两个层面,并对归化和异化对应的两对英文术语(domestication vs. foreignization; adaptation vs. alienation)的来源和内涵作了严密的辨析。归化与异化之争在世纪之交成为一个聚焦点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又涉及文化、意识形态、文学形式等多种因素,因此和新兴的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等都能建立联系。例如,随着韦努蒂(Venuti)的译论的译介,归化异化之争中出现了后殖民主义和政治的因素。因此,伴随着这些理论热潮的兴起,以及文化的本土化与全球化问题成为

整个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归化异化问题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点。

"归化"与"异化"这两个术语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并不是一对同时出现的对立词,异化的出现要远远晚于归化。刘英凯(1987)的《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被公认为是归化异化之争的开始,但"异化"这个术语在刘英凯的文章中并没有出现。在很长时间内,在异化的位置上,更为常见的是"洋化""西化""移植译法"等词语。从标题上看,异化与归化作为一对对立术语的出现应该是在刊登于 1998 年第 2 期《外国语》上的《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作者是郭建中。不过,在这篇文章中,归化与异化的英文对应词不是我们现在常用的 domestication 和 foreignization,而是 adaptation 与 alienation。文章将奈达(Nida)和韦努蒂分别作为归化和异化的代表人物。有一些研究者区分直译意译和归化异化时,认为前者指的是翻译方法,而后者指的是更大的层面——策略。然而在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归化异化在很多研究者的概念中也可能指方法,或者对方法和策略不加区分。目前,归化异化之争至少在三个层面上进行:一是语言层面,二是文化层面,三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

在归化和异化的相容性和排斥性上也有不同意见。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含义层面的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涉及的是翻译方法,二者是互补的,可以以一方为主,但另一方没有被绝对排斥在外。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归化和异化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非此即彼的排斥性。许多研究者解决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办法是不能直译就意译,并以此推至归化与异化之争,得出尽量异化、不能异化就归化的结论。因此,异化在这种讨论中和归化相比而言显示出了绝对的优势。孙致礼(2002)等认为,文学翻译将会以异化为主。王宏印与张智中(2003)认为:"作为翻译策略的归化与异化,只是在面临翻译选择时的一种状态,而且是文化交流中差距较大、比较极端的选择状态。而在多数情况下,即并非截然对立的情况下,翻译的两极之间存在大片的灰色地带。"在这种认识下,异化与归化就不再体现为泾渭分明的两种状态,甚至有了统一的可能。 (李林波)

"特色派"与"共性派"　characteristics vs. universalistics

翻译研究中的"特色派"与"共性派"指的是在中国的翻译理论建设中要不要"中国特色"的问题。"特色派"的说法最先是由张南峰(2002)提出来的,用来指刘宓庆、孙致礼、张柏然、桂乾元等强调翻译理论的民族特色的一批学者。后来,他自己则被纳入与"特色派"相对立的"共性派"中,同属此派的代表人物还有谭载喜、王东风等,他们认为理论不应该强调国别特色。特色派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特色,中国的翻译理论必然会带上中国特色。而共性派则认为翻译理论应该有普遍适用性,特色只会体现在应用翻译理论中,纯理论不应有国别特色,而且认为对民族特色的强调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要分析这个争论,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特色?特色派认为这个特色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一个体现在语言文字的特殊性上,另一个体现在文化上,中国的人文学科中的思想是文化特色的主要内涵。被归于"共性派"的王东风(1999)则认为文字技巧和转换层面的研究既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更不是翻译理论的核心,而国学既不能包罗万象,且本身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译学界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口号已有多年了,但至今似乎仍停留在口号上",并以此来作为事实层面的反驳。

还有一种观点处在"特色"与"共性"的中间,如朱纯深(2002)的"'特色'抹不掉""'特色论'不必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特色不会因为特色派的强调而夸大,也不会因共性派的否定而消失,理论研究以解决问题为主,不必在这个不属于学术问题的词汇语用上花费太多精力。王大伟(2000)等认为特色派与共性派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者最终会殊途同归。杨自俭(1999)则认为这样的争论很没有必要,特色的说法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其实,"特色派"和"共性派"的观点并不像他们在争论中显得那么对立和不可调和。事实上,"特色派"的人也并没有排斥西方理论,"共性派"的也不会轻易否认本土人文资源的价值。两方代表了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不同方向和途径,从整体上看,则是互补、不相冲突的。如蔡新乐提出要用中国哲学重建中国翻译学,刘宓庆明确提出翻译理论要有针对性,这种针对性就体现为"中国特色",而张南峰等人则主要致力于西方翻译理论的介绍、研究和应用上。这两种做法都有益于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本身并不会体现出排斥性。(李林波)

关于《红与黑》的讨论　discussion about Chinese versions of Stendhal's *Le Rouge et le Noir*

讨论于 1995 年在《文汇读书周报》、《读书》、《中国翻译》等报刊进行,围绕名著复译问题,有众多读者、译者和翻译研究者参与,历时半年。讨论的反响大,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翻译界前所未有的盛举。

《红与黑》的第一个汉译本发表于 1944 年,由赵瑞蕻执译,译本只有十五章,不完整,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至今,《红与黑》相继有十几个汉译本问世,复译的情况复杂。为了使翻译事业健康发展,发挥翻译批评的作用,借助读书界和翻译界对《红与黑》复译情况的关注,许钧发起了这次讨论,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有益尝试:一、对那些有抄袭、剽窃之嫌的译本,从维护翻译事业神圣性的高度出发,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二、对复译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从理论和实践上澄清人们对翻译的模糊认识。三、突破了翻译批评经常出现的"是非判别"的简单化倾向,通过不

同译文的对比,对不同翻译者的立场、方法和审美旨向进行深刻的剖析。四、以往的文学翻译批评往往局限于译文与原文的情态对比,对涉及或影响翻译过程的因素很少加以考虑。这次讨论确立了“原作作者(包括原作历史环境)——原作——(原作读者)译者——译作——译作读者(包括译作历史环境)”的翻译系统,将不同时代的审美因素、社会因素容纳在文学翻译理论的研究范围之内,初步构建了从点到面的立体理论框架。五、批评者以求真求是的态度,进行翻译探索,一扫文人间以批评之名行相互攻讦之实的积习。六、针对译界翻译探讨与翻译实践相脱节的状况,以实际例子来说明两点:一是翻译是有理论的,而且不仅有理论,还有不同的理论与观点;二是翻译理论是有指导性的,在不同的理论与观点的指导下,会有不同的实践。

此次讨论进一步加强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建设,探讨了文学翻译批评的途径和方法,为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健康而繁荣地发展鸣锣开道。从实践的角度看,这次讨论是翻译批评的一次有益尝试,期间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理论问题。(据许钧 2003: 416～419)

关于翻译学的讨论　discussion about translation studies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翻译理论深入研究,国内翻译学科建设的学术热情开始高涨。1996年5月在青岛召开了以学科建设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其重点议题为:1. 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与结构;2. 译学建设继承我国译论的宝贵遗产和吸收外国译论精华以及二者如何结合问题;3. 本科翻译课教学大纲与教材的内容、结构、理论、方法问题;4. 翻译专业硕士学位课程内容及其与选修课的关系问题。会上,多数人认为学科建设是当务之急。但也有别样的声音:认为翻译学不是“学”,翻译谈不上“学”,抑或只是一个“难圆的梦”。之后,《中国翻译》也以“翻译概念纵横”为栏目组织了文章,来讨论译学概念的主要问题。

为明辨是非,进一步推动译学建设,1999年第10期《外语与外语教学》杂志以张经浩《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一文为引子,发动了新一轮大讨论。主编张后尘发表了题为《翻译学:欢迎深入扎实的基础工作》的文章,鼓励翻译界同仁积极参与。

张经浩等少数人的基本观点是翻译无规律,翻译理论不能解决翻译中的实际问题,并用“翻译理论家的译作中也有错误”来证明“翻译理论无用”。他们认为,翻译学应能解决翻译过程中实际问题,否则就不能称为科学。

一般认为,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正是在“科学”与“规律”的问题上,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学者们普遍认为,翻译理论实质上是对翻译性质和规律的认识问题,亦是翻译观的问题。任何译者或多或少、或隐或显、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翻译理论的指导,或者说受到某种翻译观的支配。这种观点可以反映在译者对具体语言问题的处理上,最终反映在译作的效果上。而且,作为系统理论的翻译学不仅仅局限于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方面,他还有对翻译的认识功能、预测功能、方法论功能、检测功能和批判功能等。

从实际情况来看,到20世纪末,我国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经存在。其标志有:1. 1979年北京对外贸易大学和上海海运学院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7月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以“翻译理论与实践”这个二级学科为专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海运学院的硕士点;此后,在“外国语言文学”下招收翻译学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学校不断增加。2. 1989年国家开始为翻译研究设立基金项目;3. 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4. 1982年中国译协成立,之后全国各省市先后成立了翻译协会,1994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内设立了翻译研究会,同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成立并设有翻译研究专业委员会,1995年中国译协也设立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可见翻译学的研究和教学当时已全面展开,翻译学的客观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翻译学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外语与外语教学》的有关翻译学的讨论历时一年多,以杨自俭于该刊2001年第6期发表《我对当前译学问题讨论的看法》一文而暂告段落。

(林 夕)

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21世纪初,我国翻译实务大增,翻译研究的力度加大,国外各派译论纷至沓来,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再一次凸显出来。对此,《上海科技翻译》编辑部组织译学界进行了讨论。《上海科技翻译》2003年“讨论不是为了统一观点,而是为不同学术见解的争论和争鸣提供一个平台,但求活跃思想,沟通理义,向真理性认识前进一步。”(该刊2003年第1期编者按)讨论中观点各异。郭建中认为“重视实践,也要重视理论”。王东风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互动的”。孙致礼强调“理论来自实践,又高于实践”。许渊冲认为“实践第一,理论第二”。吕俊列述了翻译理论的功能,分析了否认翻译理论的倾向。韩子满分析了对翻译理论的偏见,认为“偏见虽然只存在于少数学者中间,但影响不可小视,这种偏见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翻译理论与实践向前发展的绊脚石”。黄振定从哲学高度阐明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王宏印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就实践层面、评论层面和理论层面这一个连续体的三个维度来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温秀颖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纽带是翻译批评”。林克难以自身的经验说明“翻译需要理论指导”。张经浩因“学习翻译几乎没有沾理论的

边”,因此设问“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吗?”郭著章结合自己编教材的经验说:“翻译理论,在教材中,一定要很好地结合翻译实践”。居祖纯针对有些教师“只会重复一些时髦的翻译术语,不教学生怎样‘捉老鼠’”的情况,提出“‘猫论’对翻译界应有的启示”。毛荣贵认为,“近年来,‘翻译’被人炒作,衍生出玄虚的理论,这种理论呈现了越炒越繁缛、越炒越奇谲的局面”,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王大伟阐述了宏观理论、微观技巧和语言实践三者的关系。黄忠廉以“研究植根于泥土,译论生发于事实”为题,探讨了“翻译事实如何走向理论”的问题。曾利沙的论题是“翻译实践的社会性与翻译理论的成型性”,他认为:探讨两者的关系“不应停留在‘翻译有没有理论’或‘翻译理论有没有用’的认识层面,而应从群体的、社会的、历史的、发展的、文化的、民族理性建设的角度去认识”。杨自俭“试谈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几个问题”的讨论稿带有总结性。他指出:“这场讨论不仅对翻译界意义重大,如果深入下去会对中国整个学术界的,尤其是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观念和研究范式的变革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据《上海科技翻译》2003年1～4期)　　(林夕)

《中国翻译年鉴(2005～2006)》　*China Translation Yearbook: 2005－2006*

2007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国翻译行业发展现状、展现中国翻译行业最新成果的大型工具书,也是中国翻译界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译界成就和形象的一部大型参考书。这部《中国翻译年鉴》近100万字,设有法律法规、特别报道、翻译工作概览、译介出版物、译界组织机构、译界人物、大事记、资料统计、国际译界、附录等10个篇目和诸多专栏。内容丰富,资料珍贵,几乎涵盖了这两年间我国重大的译事活动、国际往来、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翻译服务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其中的“资料统计”向社会公布了从1980年到2006年间国家权威部门有关我国翻译人才的各项统计数字。作为中国翻译界第一部年鉴,它还特别收录了中国翻译协会自1982年成立以来前23年的宝贵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的缺憾。另外,《中国翻译年鉴(2007—2008)》已于2009年出版发行,并将陆续定期出版发行,保持其资料性、权威性、实用性的特点,起到中国翻译的百科全书的作用。　　(王宏印)

26. 国外人物

安德罗尼库斯(约前284～约前204)　Andronicus, Livius

古罗马著名翻译家,原为希腊人,生于意大利东南部的塔伦图姆(即现在的塔兰托)。安德罗尼库斯曾在罗马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由于当时罗马没有任何拉丁语教材,他只好求助于翻译。于是,约在公元前250年,他采用意大利粗略的萨图尔努斯韵律,翻译了《荷马史诗·奥德赛》。由于是第一部重要的拉丁长诗,也是第一部译成拉丁语的文学作品,译文对引导当时罗马青年一代了解希腊文化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公元前240年,在罗马一年一度的“罗马赛会”上,主持人为了打破惯例,上演一种“真正的”戏剧,即舞台表演,委托安德罗尼库斯翻译一部希腊悲剧和一部希腊喜剧,并改编成拉丁语剧本,以供演出使用。这样,通过安德罗尼库斯的翻译,罗马的舞台表演艺术诞生了。此后,安德罗尼库斯继续从事希腊戏剧的翻译和改编,有时还当导演或参加演出。经他翻译和改编的悲剧有九部、喜剧有三部。

西塞罗(前106～前43)　Cicero, Marcus Tullius

古罗马著名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修辞学家,同时也是重要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出身骑士家庭,早年在罗马、雅典等地学习修辞、法律、文学和哲学,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写过大量著作,翻译了荷马的《奥德赛》、柏拉图的《对话集》和《普罗塔格鲁斯》、色诺芬的《经济学》、阿拉图斯的《论现象》等希腊名著。通过翻译这些著作,他传播了希腊人的哲学思想,给罗马乃至整个欧洲带来了不少哲学词汇,为欧洲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认为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位重要的翻译理论家。他对翻译理论问题的阐述主要见于《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论善与恶之定义》两部著作中。自这两部重要著作发表以来,翻译在欧洲开始被明确看做一种艺术创作,翻译中形式与内容、原作与译作的区分、译者的权限等问题便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而他提出的所谓“解释员”式翻译与“演说家”式翻译,即没有创造性的和具有创造性的翻译,确定了翻译中的两种基本方法,开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之先河。

贺拉斯(前65～前8)　Horace(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罗马帝国初期翻译家、诗人、批评家。早年在罗马和雅典受教育,当过士兵和小官吏。他翻译希腊诗篇和戏剧,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见于《诗艺》(*Arts Poetica*)的长文。贺拉斯的《诗艺》在西方文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同时也促进了翻译理论的研究。他在《诗艺》中说过:“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字死译。”这句话常被后人引用,成为活译、意译者用来批评直译、死译的名言。

斐洛(约前15～约50)　Philo Judaeus

古埃及《圣经》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操希腊语的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犹太教会上层人物。他力图把《圣经》同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和斯多葛派的哲学融合起来,认为《圣经》反映了希腊的哲学思想。他撰

写了大量著作，对《圣经》首五卷进行了诠释。他对翻译问题的阐述也都散见于这些著作中。其主要观点是：《圣经》翻译是神圣的，译者单凭精通两种语言而无神的感召，是不能从事翻译的。他的观点对《圣经》翻译起了重要作用，他首次提出只有神学者才有权译《圣经》，用现代术语说就是：翻译专门材料，必须具有专门知识。他认为，只要得到了神的感召，就能确定旧译本是否需要更新，译者只是一种"听写工具"，毫无自主权。译者的责任是在词序和措词等方面做到字字对译，不必顾及译文语言中的特殊形式和表达习惯。他的理论被不少人奉为衡量《圣经》翻译的准绳，译者必须有"上帝的感召"。以直译死译为本的做法由此支配了早期西方的《圣经》翻译。

昆体良(约35～96)　Quintilianus, Marcus Fabius

古罗马翻译理论家、演说家、修辞学家，生于西班牙卡拉古里斯，青年时期在罗马求学，后定居罗马。是继西塞罗、贺拉斯之后提倡意译的另一著名人物。他对翻译的观点发表在其主要著作《演说术原理》一书中。尽管该书的重点在于阐述演说术的基本原则，然其中心思想是：罗马人在一切翻译、写作中，都必须与希腊人比高低。他在该书中说："我所说的翻译，并不仅仅指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翻译也是创作，这种创作必须与原作媲美，译作应力争超过原作。""翻译同样是创作"的这一观点早先已由西塞罗提出。但具体提出与原作"竞争"之说的，却源出于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

哲罗姆(约347～420)　St. Jerome

古罗马后期最有影响的宗教翻译家，早期西方基督教会四大神学博士之一，古罗马神父中最著名的学者。他生于今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卢布尔雅那市附近的斯特里多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徒家庭，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12岁到罗马求学，攻读语法、修辞和哲学。他酷爱拉丁文学，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主译的拉丁文《圣经》，即所谓的《通行本圣经》，是在各种原有的拉丁文本的基础上，参考希腊文的《七十人译旧约》、希腊文的《圣经·新约》原本，并根据《圣经·旧约》希伯来语原本翻译修订而成的。这本译作的发表结束了长期以来拉丁语《圣经》翻译的混乱现象，使读者有了第一个"标准"的《圣经》译本，并很快成了罗马天主教所承认的唯一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它取代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文本，而常被后世欧洲各国的不少译者当作原本翻译。哲罗姆的翻译观是：1. 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而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特别是对那些可以加以"适当更改"的作品(指世俗作品)，译者可以掺入自己的性格色调，使译作像原作一样优美；2. 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前者可以采用易于理解的风格传达原作的意思，后者主要应直译；3. 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他不相信在用词造句上会有什么"上帝的感召"。

奥古斯丁(354～430)　St. Augustine

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神学的主要代表者，充任北非希波地区主教。他研究过希腊、罗马文学，当过修辞教授，早年有美学著作《论美与适合》，传世作品有《神之都》、《忏悔录》和《论基督教教义》。后者是一本从神学角度论述语言学的著作，书中许多论述都直接或间接涉及语言问题以及翻译问题，可认为是西方古代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的重要文献。奥古斯丁的语言和翻译观还体现在他的几篇有关《圣经·诗篇》的诠释辞和两封书信中。他极力鼓吹所谓"神的启示"，从现代语言科学的角度看，这纯属无稽之谈。尽管如此，奥古斯丁的整个语言和翻译理论对当时以及对后世的语言和翻译研究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的。他的符号理论被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当作共同财产。

波伊提乌(约470～524)　Boethius, Manlius

中世纪初期欧洲最重要的神学家、政治家、哲学家和翻译家。他生于罗马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曾先后担任意大利境内东哥特王国的执政官和首席行政官，后失宠，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被国王狄奥多里克处死。波伊提乌从小受基督教的教育，但他具有唯物主义思想。他曾打算把所有的希腊哲学著作都翻译成拉丁语，但因遭厄运处死而未果，只译了帕尔菲里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并发表重要著作《哲学的慰藉》，引起罗马研究、探讨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热潮，对欧洲中世纪的学术界、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波伊提乌对翻译实践也有独特见解。他注重翻译实践，主张翻译凭经验而不凭理论。在他的影响下，欧洲翻译界出现了一种重实践、轻理论的实用主义思潮，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出现新的翻译理论。

阿尔弗烈德(849～899)　King Alfred

英国国王、早期翻译家。他在国内建立寺院，引进教师、学者、组织一批人大量翻译拉丁语作品。他本人也是一名多产的译者，主要译作包括波伊提乌(Boethius)、奥古斯丁(Augustine)等人的作品。他对翻译理论问题所阐述的观点见于多部译品的译序里。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译者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取舍；翻译有极大的灵活性。他主张"有时逐字译，有时意译，力求译文清楚易懂"。(转引自林煌天1997：998)他的这种翻译与当时英国一些以外来素材为基础的创作相类似，被视为"随心所欲的活译"。

伊拉斯谟(1469～1536)　Erasmus, Desiderius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荷兰文学家、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生于荷兰鹿特丹的一个牧师家庭，早期教育受奥古斯丁教规的影响，后留学巴黎，又先后旅居英、德、意、瑞士各国，接受人文主义思想，反对经院神学，

成为北欧文艺复兴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学识渊博，擅长语言研究，具有非凡的希腊和拉丁文学知识，对文学和风格问题发表过精辟著述，对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也有巨大贡献。伊拉斯谟翻译过路吉阿诺斯(Lukianos)、欧里庇德斯(Euripides)等人的古希腊文学作品，并在原手抄本的基础上，于1516年编辑出版了第一本希腊语《新约》，后附有他本人所译的拉丁文本以及他的评注。这个《新约》对照本的出版，轰动了整个西方学术界，对后世欧洲的《圣经》研究和翻译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翻译理论是集人文主义思想和多种文字的文学风格鉴赏的产物。

路德(1483～1546)　Luther, Martin

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出生于德国一矿主家庭。早年入爱尔福特大学攻读法律，受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毕业后又研习神学，曾担任维滕堡大学神学教授。1517年发表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不久又多次发表论说，否定教皇权威。他先从希腊语译了《新约》，于1522年出版，后从希伯来语译了《旧约》，于1534年出版。两个译本的出版，都被事实证明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翻译中，路德遵循通俗、明了、能为大众接受的原则，以图林根一带比较统一的公文用语为基础，吸收中东部和中南部方言中的精华，并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使译文成了现代德语的优秀典范。这部《圣经》的问世，使德国农民和平民能够直接援引《圣经》中的章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辩护，它不仅对德国人民的生活和宗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为德语创造了一种广为接受的文学语言形式，对德国语言的统一和发展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路德的《圣经》翻译是欧洲翻译史上对民族语言发展造成巨大而直接影响的第一部翻译作品。

廷代尔(1494～1536)　Tyndale, William

英国《圣经》翻译家、新教改革派。1523年，他从新教徒的立场出发，从希腊语翻译《圣经 · 新约》，遭到英国教会的反对和迫害而未能出版。1524年他逃往德国，经过一番波折于1525年使译本首次印行。1526年他又违背教会的意愿将译本偷送回国，试图借《圣经》的新译本传播新思想，在英国发展新教徒。教会立即采取对策加以围攻。廷代尔毫不妥协，继续用自己的观点译释《圣经》，于1530年译出《圣经 · 旧约》的首卷，1531年译完《旧约 · 约拿书》，并于1534年出版《圣经 · 新约》修订本。教会当局于1536年以信奉异教的罪名对廷代尔处以火刑。但廷代尔的译本并未因此销声匿迹。相反，它一版再版，影响愈来愈大，直到17世纪初还被当作钦定本的主要参考译本，并在以后几个世纪成为所有英译本仿效的版本。廷代尔译本的最大成就，在于它兼顾学术性、简明性和文学性三方面，通俗易懂，开创了独特的《圣经》英译风格。

诺思(1535～1601)　North, Thomas

英国16世纪下半叶的著名翻译家，早年在剑桥大学求学。1557年，他从法语译了西班牙作家格瓦拉(Guevara)的《王子的计时器》，1601年从意大利语译了一部东方寓言。他的成名作是从阿米欧(Amyot)的法文译本转译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其英语运用自如，译笔朴素优雅，又独具风格[既不似普卢塔克(Plutarch)原作，也不似阿米欧法译本]，对英国作家，包括莎士比亚，很有影响，莎士比亚的希腊罗马悲剧(如《恺撒大帝》)就曾取材于诺思译本，连语言也多有借用。

利玛窦(1552～1610)　Ricci, Matteo

耶稣教士、天主教义与科技译著家。规范译名玛提欧 · 利奇，号西泰。意大利马切拉塔人。1568年到罗马学习法律。不久，加入天主教耶稣会。1580年在印度果阿升为神甫。1582年(明万历十年)，到澳门学习汉语。次年，同罗明坚至广东肇庆建教堂传教，始用华名利玛窦。后被罗马教皇任命为在华耶稣会会长。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与教士郭居静北上，欲觐见皇帝未可，但结识了进士李之藻、徐光启等，向他们传授介绍西方科学知识。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又同庞迪我神甫等乘船沿运河北上，经清州被下狱，半年后获释。到北京后，以自鸣钟、八音琴与万国舆图等呈贡朝廷，帝大喜，准其在京居留。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杨廷筠等当朝官员与名士，又对他们传授数学与其他科学知识。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卒于北京，朝廷拨地安葬。

利玛窦在华期间，与徐光启、李之藻合译书籍约20余种。主要有《天学实义》(即《天主实义》)、《交友论》(1595年)、《坤舆万国全图》(1598年)、《乾坤体义》2卷(1605年)、《几何原本》6卷(1607年)、《畸人十篇》(1608年)、《测量法义》1卷(1617年)、《园容转义》1卷(1614年)、《同文指算》11卷(1614年)、《勾股义》1卷(1617年)等。其中最有价值的，当首推《坤舆万国全图》，该书扩大了中国人的眼界。另外，由他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也以定义精确、叙述简练，文体优美而名噪当时。梁启超曾誉之为"字字精金美玉，千古不朽之作"。但《几何原本》仅译出前6卷，没有译完全书，后9卷直至250年后，才由李善兰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译出。《同文指算》由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翻译。

霍兰(1552～1637)　Holland, Philemon

英国翻译家，所译作品在数量上超过同时代任何译者。他当过外科医生，还当过中学校长，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有研究古代文学和谚语的天赋，并通修辞学。他于1600年译李维(Livy)的《罗马史》，1601年译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博物志》,1603年译普卢塔克(Plutarch)的《道德论说文集》,1606年译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十二恺撒传》,此外还译了色诺芬(Xenophon)的《长征记》。他有极高的声誉,曾被誉为伊丽莎白时代的"翻译大将军",真正懂得"翻译的秘诀"。霍兰的翻译主要有两大特点:1. 翻译为现实服务;2. 翻译讲究风格。他给后世留下的不是一般的翻译作品,而是一系列有鲜明风格特征的翻译作品,甚至能经得起现代风格学家的严格分析。

查普曼(约1559~1634) Chapman, George

英国翻译家、文学家,对翻译理论问题颇有建树。他说:"我鄙视译者陷入逐字对译的泥坑,丧失本族语的活的灵魂,用生硬的语言给原作者抹黑;同时我也憎恨不求简练,使用繁文缛语来表达原意。"在他所反对的种种译法中,首当其冲的是逐字死译。他认为:"翻译任何作品,尤其是荷马的作品,采用逐字死译是最不自然、最为荒唐的,……用最适合译作语言的词法和表达风格、形式来表现和装点译文。"查普曼指出,虽然希腊语和英语的意思表达和语言风格性质各异,但译者只要认真鉴别,理解原作精神,吃透原作的语法和词汇,就能在意思和风格上使译文与原文媲美。他的理论由17、18世纪的许多译者继承下来,因为他反对两个极端,主张采用折中的方法。查普曼写剧,写诗,也译诗,都很出色。但是他震动后世的译作却是荷马的两部史诗(1616年合出)。他极尊重荷马,把译荷马认为是毕生第一大事,所以译完之后说:"我是为这件工作而生的。"(转引自林煌天 1997:1121)

(谭载喜)

艾儒略(1582~1649) Aleni, Jules

明末来华耶稣会教士、科技译著家,规范译名尤莱斯·阿莱尼,字思及,生于意大利布雷西亚(Brescia)。1600年加入耶稣会。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来华,先到澳门,教授数学。后至北京。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至上海、扬州、山西。1620年(泰昌元年)又转杭州、常熟等地布教。曾在开封访求犹太教经典。1623年(天启三年)被召用。1625年(天启五年)到福建传教。1638年(崇祯十一年),因另一教派成员行为轻率惹祸而遭牵连,被逐至澳门。次年仍回福州。1641年(崇祯十四年)继任在华耶稣会会长。1649年(顺治六年)卒于福建延平。

艾儒略的译著不下三四十种。在天主教义方面的译著有《弥撒祭义》、《天主降生言行纪略》、《耶稣言行纪略》、《景教碑颂》、《万物真源》等十余种。科技方面的译著有《西学凡》一卷(1623年)、《几何要法》一卷(1631年)、《职方外纪》六卷(1623年)、《坤舆图说》等多种。

汤若望(1592~1666)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明末来华耶稣会教士、天主教义与科技译著家。规范译名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字道未,日耳曼人。1611年加入耶稣会。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与金尼阁等22名教士抵澳门。两年后入广州。不久,到北京学习汉语,后由该会派至西安、南京等地传教。1630年(崇祯三年)邓玉函(Johann Terrenz)病逝,明廷召汤若望至北京,继其位管理历局,与罗雅各(Jacques Rho)合造天文仪器,编成《崇祯历书》137卷。汤若望还筹办过规模较大的科学图书馆,又受命监铸西式大小钢炮500余门,并监修炮台,颇得崇祯帝信任。清兵入关后归清,1645年(顺治二年)任钦天监监正,兼太仆太常寺卿,敕锡通微教师。1650年(顺治七年)赐金1 000两,在宣武门内建天主教堂一座。1651年(顺治八年)任通议大夫,1658年(顺治十五年)晋光禄大夫,祖先三代均追赐一品封典。1664年(康熙三年)排教运动起,汤若望为前钦天监杨光先参劾,被控以修历为名,谋为不轨,汤若望与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同时入狱,判死刑。旋因发生地震,太后疑是错判所致,汤若望因此获释。但新历全废,复用明代旧历。汤若望时已75岁,口舌结塞,无从分辩。1666年(康熙五年)在北京幽愤而死。

汤若望译著甚多,大多为天文历算之作。主要有《历法西传》、《新法历引》、《新法表异》、《大测》、《学历小辩》、《测天略说》、《浑天仪说》、《西洋测日历》、《星图》、《恒星表》、《恒星出没》、《恒星屏障》、《测食说》、《古今交食考》、《交食历指》、《交食表》、《交食表用法》、《交食蒙求》、《恒星历指》、《八线表》、《远镜说》、《火攻絜要》、《共译各图》。

罗雅各(1593~1638) Rho, Jacques

耶稣会教士、天主教义及科技译著家,规范译名雅克·罗,字味韶,意大利人。1616年加入耶稣会,1617年升神父。1622年(明天启二年)抵澳门,1624年(天启四年)同高一志神父潜入绛州、开封等处传教。1630年(崇祯三年)被召入北京历局,协助汤若望继邓玉函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1638年(崇祯十一年)卒于北京。

罗雅各译著颇多,天主教义方面的译著有《圣若瑟传》、《天主经解》、《天主圣教启蒙》、《圣记百言》、《圣母经解》等约10种。天文历算之书计有《测量全义》10卷、《五纬表》11卷、《五纬历指》9卷、《月离历指》4卷、《月离表》4卷、《日躔历指》1卷、《日躔表》2卷、《黄赤正球》1卷、《筹算》1卷、《比例规解》1卷(1630年)、《历引》2卷、《日躔考》、《昼夜刻分》、《五纬总论》、《日躔增五星图》、《火木土二百恒星表》、《周岁时刻表》、《五纬用则》、《夜中测时》、《周岁警言》、《天文历法国师》等。其中较著名的有《人身图说》,该书介绍人体生理构造,系与龙华民、邓玉函合译。

利类思(1606~1682) Buglio, Luigi

耶稣会教士、天主教义与科技译著家。规范译名路易吉·布利奥,字再可,意大利西西里人。1622年

加入耶稣会。1637 年(崇祯十年)来华,在北京学习汉文。此后在江南布教,又应明末宰相刘宇亮之邀入川,是第一个在四川传教的西方教士。明末农民起义,利类思被张献忠挟持在起义军中供职,制天体仪、地球仪等天文仪具。1647 年(顺治四年),他又被入川的清军所俘,解至北京,准予继续传教。朝廷且赐地建造教堂,称北京东堂,后入历局修历。1664 年(康熙三年),他与汤若望等一同系狱,后获释遣粤,数年后,受召回京,1682 年(康熙二十三年)卒于北京。

利类思的译著不下 20 余种,大多属天主教义,如《天主正教约征》、《主教要旨》、《司铎要典》、《性灵说》、《弥撒经典》、《圣事礼典》、《超性学要》等。其中《超性学要》译自托马斯 · 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共 30 卷。科技方面有:《御览西方要纪》1 卷(1669 年)、《狮子说》1 卷(1678 年)、《进呈鹰说》1 卷(1679 年)、《西历年月》1 卷(1679 年)。

南怀仁(1623～1688)　Verbiest, Ferdinand

耶稣会教士、科技译著家。规范译名费迪南 · 韦比埃,字敦伯,又字勋卿。比利时人。1641 年加入耶稣会。1656 年偕该会教士柏应里等来华,至地中海为海盗所掳,赎出后于 1658 年 7 月抵澳门。1659 年(顺治十六年)至西安传教。翌年顺治帝召至北京,襄助汤若望修历。后因汤若望案牵连下狱。获释后幽居北京,直至康熙亲政后复被起用。1669 年(康熙八年)与钦天监副监吴明煊分验日影,钦天监有误,南怀仁遂代吴任钦天监副监;翌年监正杨光先革职后,又任监正。康熙笃好西学,常与南怀仁研习几何、天文、历算之学。1674 年(康熙十三年),改造观象仪,建成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及天体仪等六种天文仪器,并制图列说,编成《新制灵台仪象志》16 卷,加太常寺卿衔。1678 年(康熙十七年)著成《康熙永年历法》32 卷,升通政使。他又奉旨铸造大炮数百门,炮位精坚,再晋工部右侍郎。1675～1677 年沙俄派斯巴法里-米列斯库使华时,南怀仁为要求俄国开辟耶稣会教士自陆路来华的路线,对俄使曲意逢迎,提供私绘的中国地图及清朝政治、经济、军事机密情报多件。1688 年(康熙二十七年)卒于北京。

南怀仁译著共 39 种,绝大部分与天文历算有关,主要有《仪象图》、《测验纪略》、《验气说》、《坤舆全图》、《坤舆图说》、《历法不得已辩》、《康熙永年历法表》、《赤道南北星图》、《简平仪总星图》、《坤舆外纪》、《妄推吉凶辩》、《熙朝定案》、《妄占辩》、《预推纪验》、《形性理推》、《光向异验理推》、《理辩之引咎》、《目司图总》、《理推各图说》、《御览简平新仪式用法》、《进呈穷理学》、《吸毒石原由用法》等。此外,他还编有满文字典一部。

于埃(1630～1721?)　Huer, Daniel

17 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翻译评论家。他是阿弗兰歇的红衣主教,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等多种语言,学识渊博。1661 年,他写了专著《论翻译》(*De interpretatione*),采用对话形式,以朴素的语言批评了古代西塞罗(Cicero)、贺拉斯(Horace)、哲罗姆(Jerome)等人的活译法,同时也猛烈抨击了当代"漂亮而不忠实"的翻译家。其翻译原则是:翻译的唯一目标是做到准确,只有在语言上准确地模仿了原作,才有可能准确地传达原作者的意思;译者无权任意选词或更改词序,因为在选词或词序上"偏离"原文便会导致偏离原意。他认为:"译者首先紧扣原作的意思;其次,如有可能,也紧抠他的字眼;最后尽可能再现他的性格;译者必须仔细研究原作者的性格,不删减削弱,不增添扩充,非常忠实地使之完整无缺,一如原作。"(转引自林煌天 1997:1115)于埃的主张得到当时一些最杰出的古典主义作家的赞同,也受到现代许多人的颂扬。

德莱顿(1631～1700)　Dryden, John

英国 17 世纪最伟大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他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分法,认为翻译可分为三类:逐字译(metaphrase)、拟作(imitation,逐字译的另一极端,实际上是一种创作而不是翻译)和意译(paraphrase)。德莱顿主张在意译中重意不重词。译作必须忠于原作者的意思,但同时必须考虑读者,因此在词语表达上可以有某种自由。三分法原则的意义在于批评了前人翻译实践中过分直译(死译、硬译)和过分意译(乱译、拟作)的两种极端。他提出的折中主张——意译,为他同时代和后世的许多翻译家所接受。三分法原则是对西方翻译传统的两法——意译和直译——的一个重要发展。弗罗斯特(Frost)在他的《德莱顿与翻译艺术》(1955)的最后一章中,把德莱顿的翻译放在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德莱顿的翻译融合了现代英国启蒙主义思想和人们对古希腊史诗的怀恋,德莱顿在翻译方面的最大贡献即在于此,并由此而推动了英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

罗蒙诺索夫(1711～1765)　Ломоносо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俄国诗人、学者、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奠基者,出身渔民家庭,1730 年到莫斯科求学,后被保送进彼得堡科学院并派往德国留学,1741 年回国后一直在科学院工作。罗蒙诺索夫深通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和法语,翻译过不少科学和宗教文献以及文学作品。罗蒙诺索夫的时代,有大量外来词汇进入俄罗斯语,其中主要来自斯拉夫语、荷兰语、英语、德语、法语和波兰语,商业信函、翻译作品乃至俄语创作中均有夹杂。在科学术语方面,照搬外国词汇尤为突出。为此,他决心清理俄语词汇,在他的创作和翻译中创造了一种接近口语、平易明白的语言。他还为俄罗斯科学术语的纯洁化、统一化做了大量工作。他把外国科学术语译成俄文,使之俄罗斯

化。经他翻译的术语,有的早已成标准用语,如 удельный вес(比重),пружиние тела(物体弹性),преломление лучей(光线的折射),等等。他并不排斥一切形式的外来语。他认为,如果外来语不能正确地译成俄语,或已约定俗成,那么可允许它们在俄语中存在下去,但必须把它们改造成最接近俄语或最便于发音的形式。他的做法和主张后来被俄国翻译界普遍接受。

泰特勒(1747～1814) Tytler, Alexander Fraser

18 世纪英国最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他生于爱丁堡,在爱丁堡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教授。1770 年改当律师,但一直酷爱文学和翻译。泰特勒写过各种历史书籍,翻译过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Petrarch)的作品。1790 年,发表了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书,提出翻译三原则。他还精辟地论述了文学风格和译诗这一传统的艺术,谈了习语的翻译,并提出了优秀译者的标准。泰特勒的翻译理论是比较全面、系统的。它不仅是英国翻译理论史上,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西方翻译理论史上一座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泰特勒首先给所谓"优秀的翻译"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所谓"优秀的翻译",就是要使"原作的优点完全移植在译作语言之中,使目的语使用者像源语使用者一样,对这种优点能清楚地领悟,并有着同样强烈的感受"。接着,泰特勒便依据这个定义提出翻译必须遵循的三大原则:1. 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 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3. 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

这是三项总的原则,在每项总原则下又分若干细则。泰特勒从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之间的名作互译中旁征博引,以印证他所提出的原则和观点。首先,泰特勒认为,译者要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就必须精通原作的语言,并十分熟悉所译题材。这两个条件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原文意义暧昧不明和含有歧义的地方,译者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力,选择与上下文连贯或与作者常用的思想方式和写作风格最相符合的意义。仿效原文的隐晦或暧昧是一种错误,对多义词作出多种解释则是更大的错误。(Tytler 2007: 1～122)

歌德(1749～1832)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德国杰出的诗人、作家、学者和思想家,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富裕市民家庭,学过法律。他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和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对于作为世界文化交流之桥梁的翻译,他向来重视。歌德从年轻时代起就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在《歌德全集》中,就收有整整一卷他翻译的外国文学精品。他译过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本,意大利雕刻家切利尼的论著,法国文学大师拉辛、高乃依、伏尔泰、狄德罗的名篇,还译过欧洲不少国家名诗人的大量作品。在进行这些翻译实践的同时,他对翻译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与思考,这些论翻译的文字散见于他的论文、作品序、对话录、日记和书信中。他从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交流这个大背景出发,考察了翻译的地位与作用,探讨了翻译的可行性与方法。他认为,历史上实际有着三种不同类型的翻译:第一种翻译,目的只是了解外部世界,进行这类以了解外界为目的的翻译,采用散文体是一种较好的方式;第二种翻译,其目的不仅仅是要我们适应外部存在的表现,而且还试图要吸收外部世界的精神,将其融于我们的精神之中;第三种翻译,试图使译文与原文一致,在形式与精神两个方面取代原文。

施莱尔马赫(1768～1834)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德国著名的神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1787 年入哈雷大学研究各派哲学,特别对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发生兴趣。1804 年至 1806 年任哈雷大学教授,1810 年起任柏林大学神学教授。他精通希腊和拉丁语言,1796 年译了柏拉图的作品。1813 年,他在柏林皇家科学院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论翻译方法》的论文,30 多页的篇幅。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的原则和方法,区分口译与笔译、文学性翻译与机械性翻译的不同范畴和特点;提出翻译的两种不同途径:让读者去接近作者或是让作者去接近读者。他的思想理论在 19 世纪的西方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马礼逊(1782～1834) Morrison, Robert

1804 年入伦敦会,系基督教新教来华布教第一人。1807 年抵广州,随即开始学习汉语。1809 年开始任汉文翻译,以掩护其传教活动。马礼逊在华活动二十余年,花相当部分精力从事翻译编纂工作。他经过五年努力于 1813 年译完《圣经》中的《新约全书》,在广州秘密排印 2 000 册,从 1814 年起,又花了五年时间译出《旧约》,于 1823 年在马六甲出版,计 21 卷,取名《神天圣书》。把基督教的经典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以马礼逊为最早。马礼逊历经 13 年心血编纂成《华英字典》,共 3 部 6 卷。第一部题名《字典》,按汉字笔划分成 214 个字根排列,主要依据《康熙字典》编译而成;第二部为《五车韵府》,根据发音,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第三部为《英汉字典》,内容包括单词、词组、成语和格言的英汉对照,解译颇为详尽。整部《华英字典》从 1815 年在澳门出版第一卷,直到 1823 年才全部出齐。《华英字典》出版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作为中国英汉字典编纂之嚆矢,为后来英汉字典的编撰提供了范例,被以后寓华的传教士奉为"圭臬"。马礼逊在编纂字典时坚持这样一个宗旨,即学好一种语言必须深刻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风俗、礼仪、宗教等内容,这使他的《华英字典》富含有关中国在上述诸方面的资料,堪称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尤为重要的是,《华英字典》对现代汉语

新词的创制也起到很大作用。

普希金(1799～1837)　Пуш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俄国大诗人、新文学的奠基者。他在每一个创作阶段都从事翻译活动。主要译了17、18世纪法国诗人的讽刺诗篇、古罗马贺拉斯的颂诗、古希腊抒情诗的片段、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作品的片段、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叙事诗以及《古兰经》和《圣经》片段。在普希金的文学生涯中，翻译的比例不大，但它的艺术价值同样是高超的。普希金的译笔明白流畅，纯朴自然。在他的译作中创造性地运用了俄罗斯的活的语言，使其达到高度完美的境界，从而创立了罗蒙诺索夫半个世纪前倡导的那种标准而又出色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在他不多的译评中，普希金发表了精辟的见解：1. 译者在选择原文材料上必须有自己的主张，不能人云亦云，受别人思想的支配；2. 译者在处理原著的过程中，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他特别反对不讲究译文艺术性而追求表面准确的逐字死译；3. 原著独具特色，译者必须尽量保留其特色。普希金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评论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翻译向前发展。正如费道罗夫所说，普希金在俄国翻译史上的贡献，就像他在整个俄国文学史与俄国标准语言史上的贡献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纽曼(1805～1897)　Newman, Francis W.

英国学者，翻译家，伦敦大学拉丁语教授。19世纪50年代，他抱着为一般读者而译的目的，翻译出版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译文出版不久，即受到当时另一英国学者马休 · 阿诺德撰文批评。纽曼不接受阿诺德的批评，写了一篇长文予以反驳，题为《论翻译荷马作品的理论与实践：答马休 · 阿诺德》(*Homeric Transl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ply to Matthew Arnold*)。这就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文艺界在荷马史诗的翻译问题上展开的一场著名论战。纽曼与阿诺德的这场论战，不仅涉及荷马史诗的翻译问题，而且澄清了许多翻译的一般性理论和原则。参见"阿诺德"

别林斯基(1811～1848)　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俄国文艺评论家、翻译理论家。1829～1832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1830年写成剧本《季米特里 · 卡里尼》。同年初开始法文翻译，1833年译出波尔 · 德 · 科克的长篇小说《玛格塔丽娜》。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因写作反对沙皇政权的剧本被校方开除。他写过几十篇文章、一百多篇书评，研究翻译问题，分析、推荐译作。他有一整套翻译观。他认为翻译是为不能读原作的人服务的。将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译成另一民族的语言，目的是为了使人民之间互相了解，相互传播思想，从而繁荣各自的文学。他特别重视翻译文学对本族文学的作用，极其注意翻译作品的选择。他经常宣传外国文学的优秀作品，推荐文学、科技、政论作品，要求译者译成俄语，发表在他所领导和支持的进步杂志上。1838年，他在重论波列沃依的译本《哈姆莱特》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必须建立翻译理论。他把文学翻译的理论看成是整个文艺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理雅各(1814～1897)　Legge, James

规范译名詹姆斯 · 莱格。少时学业优异。1837年入希格伯利神学院读神学，翌年加入伦敦会。1839年由该会派至马六甲布道，任当地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随书院迁至香港。为便于传教，立志深造汉语、翻译中国典籍。1861年，理雅各编纂翻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在香港出版。接着，他以惊人的毅力，至1886年出到了第五卷，内容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诗经》、《春秋》、《左传》等我国重要的古代典籍。在编译中，理雅各得到多名中西人士的帮助。理雅各还译有《楚辞》等我国古典名著及其他古典文论等，计十余种。理雅各的译本价值不仅仅在于翻译，还在于他对译文所做的详尽的注释。这些注释不仅对英语读者很有帮助，对中国读者也不无裨益。他的五大卷《中国经典》在二战后曾影印出版，1994年台北南天书局又重印，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理雅各译笔细腻，简洁雅致，对于原作理解基本正确。有关理雅各的翻译水平，著名英国汉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翟里斯(Giles)有一段评价："凡是读过理雅各所译中文经典的人必定会惊叹他的毅力与专一。他的译文是对中文研究者的最大贡献，将为后代学人所永远怀念。"1876年，牛津大学设立汉学课程，理雅各受聘为第一任中文教授。在我国翻译史上，理雅各是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外籍翻译家。

伟烈亚力(1815～1877)　Wylie, Alexander

19世纪伦敦会来华传教士、汉学家、数学家、科技翻译家。规范译名亚历山大 · 怀利，又名卫礼。生于英格兰，在伦敦时即自学汉语。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来华。在上海为"布道会"管理印刷业务，工作余暇学习法、德、俄文，以及满、蒙诸语。与李善兰合译《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曾在上海一度设墨海书馆，为华人讲学，并从事数学翻译。1860年(咸丰十年)回国，辞去伦敦会职务。翌年又回上海，成为大英圣书公会的代理人。他曾深入我国内地各省推销《圣经》。并任上海《教务杂志》编辑数年。此后应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之聘从事科技翻译，前后共8年。1877年(光绪三年)，因眼疾回英国，同年卒于伦敦。

伟烈亚力为当时知名的汉学家，对我国的文献目录学与历史都有研究。著述颇多，著名的有《中国文献记略》(1867年)、《中国研究录》(1897年)、《匈奴中国交涉史》(1874年)等。同时对景教碑也颇有研究。生前曾为上海亚洲文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他还与清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合译数学书籍数种,其中有《几何原本》(1857年)后9卷,完成了徐光启与利玛窦250年前未竟之业。此外,还译有《谈天》(1859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等。

合信(1816～1893) Hobson, Benjamin

今译本杰明·霍布森,生于伦敦,曾获英国医学硕士学位,是皇家外科学会的会员。1839年(道光十九年)来华,在澳门伦敦布道会任医师。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在该会香港医院任院长。以后在广州西关外金利埠开设惠爱医馆。1857年(咸丰七年)又转任上海仁济医院医师。1889年(光绪十五年)退休回国,1893年(光绪十九年)病逝。他一生编译过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中文著作,其中《博物新编》就是一本风行一时的综合性科技知识的启蒙读物,1855年(咸丰五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该书共分三集。初集分地气论、热论、水质论、光论、电气论五部分,介绍了气象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知识。该书介绍近代化学知识,要比同文馆出版的《格物入门》早13年,比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化学鉴原》早近20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分讲化学等科学的书籍。

合信还与陈修堂共同编译了《全体新论》(全体学即生理解剖学)(1851年),这是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介绍西方生理解剖学的书作。合信还翻译了《妇婴新说》、《西医略论》(1857年)等医书和《物理学提要》(1855年)等自然科学书籍。此外,编有《英汉医学词汇》(1858年),这应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英汉医学辞书。这些著述和译作都出版于19世纪50年代,是鸦片战争后最早出现的一批科技译书。

威妥玛(1818～1895) Wade, Thomas Francis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随英国军队参加侵略我国的鸦片战争。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退伍,任英国驻华汉文副使。1853年(咸丰三年)任驻上海副领事。1855年至1871年(咸丰五年至同治十年)任使馆汉文正使。1871年(同治十年)起任英国驻华公使,直至1882年(光绪八年)。1888年任剑桥大学第一任汉文教授。1867年他编著的汉语课本《语言自迩集》(*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采用了他1859年首创的、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为后人所沿用。翟里斯(Giles, 1845～1935)后来稍加改进,用于自己1892年出版的汉英字典中,此法世称 the Wade-Giles System(威妥玛-翟里斯译音法)。此法的缺点是不能精确地给汉字译音。1975年5月,中国国务院颁布汉字拼音改革方案,并于1977年9月由联合国通过采用;至此,威妥玛-翟里斯拼音法宣告作废,但海外不少中外人士仍未放弃。

阿诺德(1822～1888) Arnold, Matthew

英国诗人、翻译评论家。以评论荷马史诗的翻译,与纽曼论战而闻名于19世纪英国学界。19世纪50年代,伦敦大学拉丁语教授弗朗西斯·纽曼翻译出版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译本出版后不久,阿诺德于1861年写了一篇《论翻译荷马作品》的译评。纽曼不服,写长文予以回敬。阿诺德也不让步,又发文《再论翻译荷马作品:答弗朗西斯·纽曼》(1862年),进一步批评纽曼。阿诺德的两篇论文都很有分量。他不仅评论纽曼,也评论其他译者,如查普曼、蒲柏、考珀等人。同时,文中讨论的问题也不仅限于荷马的翻译,还涉及整个译诗的艺术。在许多方面,他对译诗的艺术比德莱顿阐述得更为明确。参见"纽曼"

艾约瑟(1823～1905) Edkins, Joseph

19世纪中叶英国伦敦会教士、翻译家。1848年来中国任伦敦会驻上海代理人。1861年在天津设立教会,两年后转至北京传教。1880年,受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之聘,担任海关翻译。后自北京转沪,15年后卒于上海。

艾约瑟的著作有《中国的宗教》(1878年)、《鸦片史,或中国的罂粟》(1898年)、《中国的佛教》(1893年)、《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1871年)、《中国的通货》(1901年)、《中华帝国的岁入和税制》(1903年)、《中国的金融与价格》(1905年)、《北京记》(1898年)等(均以英语写成)。艾约瑟译作颇丰,历史方面的译著有《希腊罗马史》等,对当时我国的知识界有一定的影响。地理方面的译著有《地志启蒙》四卷(赫德原著)。艾约瑟在沪期间曾译出一些科技著作,由伦敦会教士编译出版机构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 Press)出版。他聘请李善兰的好友张福僖与他合译天算格致的书籍多种,其中之一《光论》(1853年)是我国最早译自西方的系统的光学专著。此外,他还把杭州人戴煦的数学论文《求表捷法》译成英文,这可能是最早译成外文的中国数学论文。

傅兰雅(1839～1928) Fryer, John

英国人,1861年(咸丰十一年)来华。曾任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1863年(同治二年)任北京同文馆英文教习。1867年(同治六年)入江南制造局,任翻译,历二十余年之久。创设格致书院与华人讨论科学,并经营印刷科学书籍。1894年(光绪二十年)赴美,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学教授。傅兰雅翻译的科学书籍,范围既广,为数又多,虽不免略近于滥,但仍功不可没,主要译著有:《运规约指》(1870年)、《化学分原》(1872年)、《化学鉴原》(1872年)、《代数术》(1874年)、《微积溯源》(1874年)、《化学鉴原续编》(1875年)、《三角数理》(1877年)、《数学理》(1879年)、《电学》(1880年)、《化学补编》(1882年)、《代数难题》(1888年)、《化学杂质》(1883年)、《化学求数》(1883年)、《重学图说》(1885年)、《格致须知初集》(1887年)、《量法须知》(1887年)、《代数须知》(1887

年)、《电学图说》(1887 年)、《格致须知二集》(1888 年)、《三角须知》(1888 年)、《微积须知》(1888 年)、《曲线须知》(1888 年)、《水学图说》(1890 年)、《热学图说》(1890 年)、《光学图说》(1890 年)、《植物图说》(1895 年)、《算式解法》(1899 年)、《物体遇热改易说》(1899 年)、《通物电光》(1899 年)、《测绘海图全法》(1900 年)、《算式辑要》、《声学》、《电学纲目》、《测地绘图》、《海道图说》等。自 1876 年(光绪二年)起,傅兰雅创刊《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该刊为我国第一部出现之定期科学刊物,自任主编,月出一期。两年后因返国暂停,回华后改为季刊,中途又中断一次。1892 年(光绪十八年),出完第七卷后停刊。

黑岩泪香(1862～1920)　Kuroiwa Ruiko

本名汉译为黑岩周六,日本翻译家,平民家庭出身,1878 年进大阪英语学校,第二年到东京,几乎是靠自学成为报人,1892 年自己创办了《万朝报》,他的译作相当大一部分发表在该报上。以复仇、探险为特点的侦探小说是他喜欢译的书,也是明治时代翻译小说中最受人欢迎的。他的翻译完全是译述型的(比中国最早的小说译家林纾意译度更大)。他读了许多英文侦探小说后,有趣的故事情节尚在脑中,便坐在《万朝报》的编辑室里,不看原书,信笔译去,创所谓通俗易读的“泪香风格”。翻译时,他全身心地投入,与作品中人物共悲喜,这使他的译作有动人之处。他还有一个特点,是借翻译小说从事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的趣味,这与他曾经有志于政治、有经世济民的思想有关。

森鸥外(1862～1922)　Mori Ōgai

日本军医、小说家、翻译家,原名汉译为森林太郎,号鸥外,别号观潮楼主人、鸥外渔史。津和野(岛根县)人,生于医学世家。4 岁起读四书五经,8 岁起学荷兰语,12 岁入东京医学校预科,19 岁毕业于东京第一医科学校,22 岁留学德国,历四载,回国后,历任陆军军医、军医总监、军医局局长。晚年任帝室博物馆馆长,帝国美术院院长等职。他留学归来后,同井上通泰等人创办《新声社》,发表歌德、易卜生等人的诗歌翻译集,并靠这部翻译集的收入另创办《栅草纸》等文学刊物,介绍西方美学理论,开展文艺批评,致力于戏剧改良、诗歌革新活动,在日本近代文学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森鸥外任军医局长之后,进入了又一个创作高潮,同时也翻译了颇多的外国文学作品。代表译作有:《即兴诗人》、《智利地震》等。森鸥外采取极其自由的译法,不像二叶亭那样认为原作绝对神圣,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则是通俗易懂。

二叶亭四迷(1864～1909)　Futabatei Shimei

近代日本文学的开创者,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东京人,1881 年进东京外国语学校俄语系,后肄业。当过雇员、俄语教员、《朝日新闻》社俄语翻译、驻俄特派员。他从 1888 年译屠格涅夫《约会》(即《猎人笔记》一部分)开始,共翻译了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等著名俄罗斯作家的 35 种作品,是为日本输入俄国文学的第一人。二叶亭在翻译上主张移植(即再现)原作风格情调,不拘原文语言形式,因为他认为在欧洲语言中有特别的节奏和句读,若照搬进日译文,效果会适得其反。他更看重风格,追求清新的文体;原文若是明快、活泼的口语,他就用日文中类似的口语译之,力图使译文读者获得近似于原文读者看原文时的感受。

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　Алексеев, 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俄罗斯汉学家、翻译家,出生于彼得堡一个职员家庭。1902 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1916 年获硕士学位,1929 年获博士学位,1923 年当选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 年成为院士。先后在多所大学执教,1933～1951 年任亚洲博物馆中国部(后为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主任,曾多次来华,1907 年参加发掘河南新石器时代遗址,1912 年来华收集民族学资料。他酷爱中国悠久而丰富的文化,并不断地将它介绍给本国人民。作为一名汉学家,他曾应邀赴英、法作有关中国文学史的学术报告。他翻译过屈原、宋玉、司马迁、司马相如、欧阳修、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等中国著名诗人的辞赋、诗词、散文,被选编成《中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散文集》。除此之外,他还系统地翻译了不同世纪的难度较大的中国古代文集,如《古文观止》、16 世纪的文学家李攀龙编辑的《唐诗选》等。但最受前苏联读者欢迎、流传最为广泛的还是他翻译的《聊斋志异》。他著有《中国古典文学俄语新译法与风格》、《翻译原则》、《论汉译俄的若干特点》、《论诗歌翻译》、《列宁选集汉语译法原则》等。阿列克谢耶夫的翻译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他曾说:“译者就是译者,他可以掌握句子、词汇,甚至形象,但翻译拜伦书的人不是拜伦;翻译普希金书的人不是普希金;翻译《聊斋》的更不是《聊斋》作者本人。如果译者能在自己内心深处,将两个不同的世界——俄文和中文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如果他能用优美易懂的文学语言将原文译成俄文,而他的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没有为迎合读者而作出妥协让步,那么,作者和译者都可以感到满意了。”

丘科夫斯基(1882～1969)　Чуковский, Корней Иванович

前苏联作家、翻译家,出身贫苦。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倡议成立世界文学出版社,他出任该社英美部主任,从事英语文学翻译工作。曾将许多英美作家的作品译成俄语,其中包括惠特曼、马克·吐温、欧·亨利、菲尔丁、切斯特顿、柯南道尔、吉卜林等人的作品。

他还是一位知名的翻译理论家,苏联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的奠基人。丘科夫斯基的《崇高的艺术》1941年初版,后又不断有修订版再版,直至1980年代末。此书已译成英文,在当代西方译界也很有影响。该书起始于当时他的一篇长文《文学翻译的原则》(载1930年《翻译艺术》)。《崇高的艺术》一书被视作前苏联译坛文艺学派的代表作之一。该书虽然理论性并不强,但由于立足于大量丰富的翻译实践,所谈问题很实际,诸如译文中的语言错误、语言使用中的"不确切的确切"、译文的风格、译诗的节奏,等等。该书还用了不少篇幅整理、总结成功的译例,尤其是一些有成就的翻译家的经验。

库恩(1884～1961) Kuhn, Franz

德国汉学家、翻译家,被国际文坛誉为"架设德中文化桥梁的巨匠"。库恩生于德国萨克森州的弗兰肯贝格市。1909年,25岁的库恩作为德意志帝国驻华使馆的一名译员来到中国,1912年被召回国。三年的外交生涯为他学习和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并为他以后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一生共翻译、出版了中国长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34篇。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有《好逑传》(1926)、《二度梅》(1927)、《金瓶梅》(1930)、《红楼梦》(1932)、《水浒传》(1934)、《玉蜻蜓》(1936)、《三国演义》(1940)、《子夜》(1940～1956)以及《肉蒲团》(1959)等。

赛珍珠(1892～1973) Buck, Pearl

著名美国女作家、翻译家,全名珀尔·西德恩斯特里克·巴克(Pearl Sydenstricker Buck),父为在华长老会教士,她自幼随父母长期侨居中国。后回美国就读康奈尔大学。曾在弗吉尼亚州教授心理学。1921年至1931年任南京金陵大学英国文学教授。1922年起即从事文学创作,所写作品达50余部,题材大多与亚洲尤其是中国有关,其中有的作品曾引起中国读者的争议。最著名的代表作是1931年出版的三部曲《大地》、《儿子》、《分家》,获普利策奖。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美国妇女中获此奖的第一人。译作虽少,却颇有名。1933年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水浒》的第一种英译本。译者使用口语表达法,多用直译,以使西方读者如读原书。有人认为她的译笔确实比较生动活泼,近似原著,但译文过直,时有失实失雅之处。

理查兹(1893～1979) Richards, Ivor Armstrong

英国文学评论家、语言学家和诗人,就学于剑桥大学(1922～1929),后相继在中国清华大学(1929～1930)和美国哈佛大学(1931～1960)任教。长期致力于研究心理学、文学与语义学之间的关系。其对文学理论的研究在英、美现代文学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著作有《文学批评原理》(1924)、《科学与诗》(1925)等,是新批评理论的代表作。20世纪20年代,理查兹在剑桥大学做了个著名的写作研讨班实验。后来他又是美国60年代翻译研讨会的先驱。两个研讨班都是为了教会学生欣赏、理解和阐释文学作品,试图发现一些规律和原则。1953年,他发表题为《翻译理论探索》(*Towards a Theory of Translating*)的文章。他强调"翻译也许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为复杂的事件",认为经过恰当的训练,对复杂的意义达到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也正是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理查兹认为,翻译不仅是为了让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更好地相互理解,而且,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翻译本身和理解意义(翻译就是为理解意义服务的)。这就是说,在新批评的文学理论里,翻译只是理解和阐释的一个方面。

奎因(1908～2000) Quine, Willard Van Orman

美国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受业于哈佛大学。1948年,奎因任哈佛大学教授。他是一个多产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一生共写了十多本著作和大量的论文,其中有一半属于逻辑方面的著作,一半属于哲学方面的著作。在哲学方面的著作中,有一本题为《语词和对象》(*Word & Object*, 1960)的专著,通过对翻译的不确定性(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的讨论,对意义理论进行了探索,在西方哲学界、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奎因认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编纂一些把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手册,所有这些手册都与言语倾向的总体相容,但它们彼此之间却不相容。"奎因理论积极的一面是使我们对翻译采取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我们可以为不同的翻译目的确立不同的翻译规范;但也要防止其消极的一面,把翻译的不确定性误解为翻译无客观标准可循,从而走向了极端。(转引自郭建中2000:90～97)

戴乃迭(1919～1999) Yang, Gladys

英国人,出生于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老专家、著名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家,前中国译协理事。193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中国文学,获学士学位。1940年冬与杨宪益在重庆共缔良缘。其后,相继在中央大学、贵州师范学院、复旦大学讲授英文。1943年出任南京国立编辑馆特约编审,1952年入北京外文出版社,后为外文出版局《中国文学》高级专家。数十年来,她潜心译事,与杨宪益密切合作,译出了大量文字艰深、前人未涉的经典名著,对推介中国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经她翻译的主要作品(与杨宪益合作)有:《诗经选》、《楚辞》、《史记选》、《关汉卿杂剧》、《唐代传奇》、《宋明平话小说选》、《古代寓言选》、《红楼梦》、《暴风骤雨》、《白毛女》、《鲁迅选集》等。此外,她独自译出的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沈从文的《边城及其他》和

《湘西散记》、古华的《芙蓉镇》、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邓友梅的《鼻烟壶及其他》、新凤霞的《回忆录》等。

霍克斯(1923～2009)　Hawkes, David

英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1941年,霍克斯考得牛津大学克赖斯特丘奇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奖学金,第二年全年在牛津大学学习拉丁和希腊文学。后入军事情报部门任职,余时偶读韦利、林语堂等人的书,由此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兴趣。1945年战争结束后,霍克斯回到牛津大学转学中文,1947年底毕业。1948年初,吴世昌来到牛津,霍克斯向吴世昌又学了几个月。是年夏天,他到北京大学学习,至1951年。他研究屈原,回国后出版了译著《楚辞》,还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刷发行过一本杜甫研究专著《杜甫诗歌入门》。1951年霍克斯回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1953年被牛津大学聘为中文系讲师。当时,中文系的专家有杜伯斯和吴世昌,霍克斯翻译《红楼梦》追根溯源要算得益于吴世昌的红学研究。两年后,霍克斯获得博士学位,论文为《楚辞的年代与作者》,论文中翻译了王仪(音译)编的《楚辞》,1959年由牛津大学克拉伦顿出版社出版。1959～1960年,霍克斯在美国哈佛大学远东系担任客座讲师。是年岁末,霍克斯被聘任为牛津大学中文系教授。1960年,霍克斯用原型批评法研究《楚辞》,发表《求宓妃之所在》。

1971年霍克斯辞去教职,潜心翻译《红楼梦》。他与女婿闵福德(Minford)合作,于20世纪70～80年代将《红楼梦》全部英译,书名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霍克斯译前80回,闵福德译后40回,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一译本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几乎同时,是当今世界上仅有的两种《红楼梦》英译全译本。

霍克斯在《红楼梦》英译笔记中抒发过一些有关翻译的议论。如他曾说:"我认为,译者应该谦卑,应该专注于如何透彻理解原著,忠实表达原著,不要斤斤于如何发挥自我创造力,怎样多得声誉。""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什么原则。也许,还是有一些模糊的原则吧。但我在翻译时,要说真有什么规矩的话,那也是因要解决所译小说中的问题,即遇到的问题,而定的规矩。"

欧阳桢(1939～　)　Eoyang, Eugene Chen

美籍华裔学者,生于香港。195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71年获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为该校东方文化系教授。1981年2月至5月曾来北京在外文出版社协助工作。他对中国古代诗歌、中国白话小说与文学理论有深入的研究并有丰富的汉英翻译经验。他对翻译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专著《透明的眼睛:关于翻译、中国文学和比较诗学的思考》(*The Transparent Eye: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1993)中。尽管该书是他已发表的论文的结集,但组合起来,自成体系。该书论述了翻译的认识论、本体论、现象学等翻译的根本问题和翻译方法、文化交流、比较诗学、读者反应等问题,并着重探讨了中国文学的英译问题。书中,他以《圣经》为例,对原作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同一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圣经·旧约》的原著失去了两千多年,一直只能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译文当作原著,直到1948年才在死海古卷中发现。其次,翻译之所以一直受到轻视,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对原作和模仿的偏见。但原作不见得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纯正,《圣经》本身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此外,"克隆"的爱因斯坦,一定不会受到爱因斯坦本人一样的尊重。因此,同一性是不存在的。翻译再好,也不会受到原著一样的评价,尽管模仿超过原作在任何艺术领域都存在——绘画、雕塑、音乐和文学。

关于翻译理论,欧阳桢认为,在现代语言学出现之前,谈不上有什么翻译理论。所谓的理论,只是翻译的实用问题和技巧问题。在过去的所谓翻译理论中,存在着一些谬误的观点,如《圣经》翻译中的所谓"上帝灵感的召唤",诗歌翻译中所谓"只有诗人才能译诗"的观点。欧阳桢是不同意"只有诗人才能译诗"的观点的。他认为,历史上许多优秀的诗歌翻译,并不都是由有成就的诗人翻译的。(据郭建中 2000)

热玛尔(1942～　)　Gémar, Jean-Claude

加拿大著名翻译教育家、翻译理论家。生于法国,具有加、法双重国籍。热玛尔早年在法国图卢兹学习,先后获图卢兹政治研究院外交系证书、图卢兹文学院教育文学学士和图卢兹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合作法博士。曾在英、美等国任法语教员,在蒙特利尔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任语言官员;1975年起在蒙特利尔大学语言文学系任翻译教授,曾任该大学语言和翻译系系主任。他曾任加拿大著名翻译杂志 *Meta* 的编委会秘书长,哥伦比亚法语教师协会荣誉会员、阿根廷法语大学教师协会荣誉会员。1988年获法国教育勋章。他的主要作品有法律语言与翻译、法律翻译与行政翻译、法律语言学工程、笔译方法论等方面的专著。他通晓法、英、德、西等多种语言,曾在法国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讲授笔译原理、术语研究、文献积累和笔译人员培训等问题。

27. 国内人物

安世高(约2世纪,生卒年份不详)　Anshigao

原名清,字世高,西域安息人,最早的佛经翻译家之一。据说是安息国的太子,自幼刻意好学,"外国典籍,莫不该贯",博学多识,笃信佛教,持戒精严。轮到他继承王位时,"乃深悟苦空,厌离名器",便将王位让

给叔叔,出家修道,离开本土,游化西域各地,于公元148年(桓帝建和二年)到达洛阳,"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高僧传》)。从公元148年到172年(灵帝建灵五年)20余年间,译出有关止观法门的种种经论。据梁启超考证后推论,安世高实译佛经34部,其中有《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道地经》等,开后世禅学之源。

安世高所译经论主要内容是传播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修行方法的,由于他通晓汉语,故译文能比较正确地传达出原本意义,梁慧皎(497~554)的《高僧传》评他的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说他说理明白,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安世高是我国翻译史上最早的直译派代表,他的不少译作一直流传到近代以后。

支娄迦谶(生卒年份不详) Lokaksema

简名支谶,西域月支人,东汉末僧人,我国最早的译经家之一。《高僧传》称他"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他通晓汉语,到公元184~189年(灵帝中平年)为止译出若干部佛经。据道安经录,有年代可考的是三部十四卷,即《般若道行经》十卷和《般舟三昧经》二卷(现存本三卷),公元179年(光和二年)译;《首楞严经》二卷(现缺佚),公元185年(中平二年)译。《般若道行经》开后世般若学之源。其译文特点是直译、音译较多。所译佛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弃文存质,深得经意"。(转引自林煌天 1997: 941)

支谦(约3世纪,生卒年份不详) Zhi Qian

一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故姓支。他受业于同族人支亮,支亮则受业于支娄迦谶,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他的祖父在东汉灵帝(167~189在位)时曾率月支国人数百名归化中国,受封率善中郎将。支谦出生在汉地。他译经的时间是从公元223~253年(孙权黄武元年到孙亮建兴三年)。在这30多年间,他搜集了各种原本和译本,未译的补译,已译的订正。特别是对支谶的重要译作如《般若道行经》、《首楞严经》等加以重译,又帮助从印度来华的维祇难和竺将炎翻译。传说他到东吴后曾得吴王的信任,叫他辅导太子登。后来太子死了,他就去穹窿山过着隐居生活,以六十岁卒于山中。

支谦译经较多,道安经录著录了30部,《出三藏记集·支谦传》说有27部,《高僧传》作49部,现经考订的译本只有《大明度无极经》等29部,译得"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高僧传》),为继安清、支谶之后的译经大师。支谦首创"会译"(编译),他曾把《无量微密持经》和两种旧译对勘,区别本末,分章断句,上下编排。译文的加注也始于支谦。我国翻译史上直译意译之争始于当时,亦即文质之争。支谦主张文丽简略,在《法句经序》中他说:"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该序中又通过众人引用老子和孔子的话来附和赞同,强调译经"实宜径达"。

钱锺书认为,严复所提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在此经序中早已出现。此序还涉及翻译中信与美的矛盾。支谦的序是现存古籍中最早谈到翻译标准的文章。

竺法护(230?~308) Dharmaraksa

梵名昙摩罗刹(刹一作察),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原姓支,八岁从竺高座出家,改姓竺,据说"诵经日万言,过目即能(记忆)"(《高僧传》)。他感到曹魏末年的僧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视对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深以为憾,于是"慨然发愤,志宏大道",随师游西域诸国,学会了36种语言,搜集大量经典原本,带回长安。从公元266~308年(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终身写译,劳不告倦"(《高僧传》),而且有些经是在旅途中翻译的。据《出三藏记集》说,竺法护的译籍共有159部,309卷,但僧祐所见的写本只剩下95部,206卷。以后又有散失。据近人研究,尚存84部。竺法护译经的特点是:1. 面广量大,当时在西域流行的经典,大部分被翻译过来了,为大乘佛教在中国打开广阔的局面创造了条件;2. 存真偏质,提高质量,以前译家对原文往往随意删略,法护则尽可能传达出原本的真意;3. 助译者多,共襄其成。当时,为竺法护助译的有不少佛教界著名僧人。他们各施其才,或参与笔受,或参正文句,或编目校勘。

道安(314~385) Dao An

俗姓卫,又称释道安,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出身士族,早丧父母,7岁读书,天资聪敏,再览能诵,12岁出家。他对我国佛教普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东晋高僧慧远、僧叡、昙翼、法遇、慧持、慧永、道立等都是他的弟子。道安博览群书,挥笔成文。著有《光赞折中解》、《光赞抄解》、《性空论》等。注释佛经颇多,共注二十二卷,如《道行品经》、《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他还整理新旧译的经典,编成《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佛教经录,为日后的佛经目录学奠定了基础。道安不但是东晋著名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对东晋佛教的发展厥功甚伟,而且也为当时的佛经翻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时在龟兹的鸠摩罗什远闻他的名声,赞他为"东方圣人";梁启超也誉他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虽然他本人未译过佛经,但苻秦时代的译业,实由他主持;苻坚迎鸠摩罗什到内地,是根据他的建议;四《阿含》、《阿毗昙》等经的创译,是他所组织;翻译文体也由他厘正。他协助赵政主持前秦的佛经译场,组织中外学僧翻译佛经。在两人的监译之下,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与竺佛念等著名译家译出了新从天竺与西域传入的小乘说一切有部的经典,共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凡百余万言。他整理译经颇为精

审。在翻译文体方面，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论，力主译胡为汉要特别慎重，译文应该质朴。自谓他所监译的经书“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转引自林煌天 1997：123）他倾向于直译，对后来的译经文体产生很大影响。

鸠摩罗什（344～413） Kumarajiva

略称“罗什”。后秦时的僧人。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七岁跟随母亲出家，开始学习小乘佛教，以后遇莎车国大乘名僧，改学大乘。他广泛阅读大小乘经论，闻名西域各国。382 年（前秦建元十八年）吕光破龟兹，以龟兹王女妻罗什。385 年（前秦太安元年）罗什到凉州。401 年（后秦弘始三年），国君姚兴派人迎他到长安（今西安），请他住进西明阁及逍遥园，待以国师之礼。从这以后的八年内，与弟子一起系统地翻译介绍了龙树中观学派的著作，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还有《成实论》、《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这些经论后来都成为中国佛教宗派的依据的重要著作。罗什在翻译文体上一变过去朴拙的古风，创造出一种读起来使人觉得具有梵语与汉语调和之美的文体，既充分照顾到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习惯，又力求不失梵文原意，翻译态度严肃认真。（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室 1989：30－31）他的译经很注意保存原作的流畅与声韵。罗什虽提倡意译，却从不随意乱译，且能发挥僧徒们的集体智慧，通过辩论博采众长。僧叡在《大品经序》中说：“法师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与诸宿旧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他译《十住经》时，“一月余日，疑难犹豫，尚未操笔。”一直等到其师佛陀耶舍到达，解决了疑难之后，方肯动笔。罗什是我国古代的一流译家；不但译经数量较大，而且在内容的表达以及词语的运用上都达到新的水平，译经意信文美，能够流传久远，时至今日，仍存 39 部 313 卷，可谓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的意译方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翻译开辟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新时期，世称“新译”。

真谛（499～569） Paramartha

南朝梁、陈时代僧人。他本来是西天竺人。他与弟子共译经论纪传 64 部 270 多卷，其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大乘瑜伽行派的思想，所译《摄大乘论》影响最大，是南朝摄论学派的主要理论依据。他的翻译有几个特点：一是他传译的范围比以前任何译家都要广泛。他大量翻译了古印度大乘瑜伽行派的无著、世亲、陈那等人的佛学论著，介绍了此派主要开拓者世亲的传记《婆薮槃豆传》和佛教的逻辑思想；二是他翻译态度严肃。慧恺说：“法师（按：指真谛）游方既久，精解此土音义，凡所翻译，不须度语。……于一句之中，循环辩释，翻覆郑重，乃得相应”；三是他“行翻行讲”，译讲并举；四是他译经注重融会贯通，因此表达比较圆活。（据林煌天 1997：933）

彦琮（557～610） Yan Cong

俗姓李，赵郡柏（今河北隆尧西南）人，为北朝末年及隋初僧人，初名道江。从印度僧达摩及多询求外国史地。琮后随隋文帝东巡，在杨广内堂讲经。592 年（开皇十二年），奉诏入京住大兴善寺掌管译事，帝礼遇甚隆。602 年（仁寿二年），奉敕撰《众经目录》五卷、《西域传》十卷。王舍城沙门谒帝，将还本国，帝敕彦琮把《舍利瑞图经》与《国家祥瑞录》译成梵文十卷，赠给西域。彦琮当是我国历史上译汉为梵的首位译家。另著《沙门名义论别集》五卷。又与裴矩修纂《天竺记》。前后共译经 23 部 100 余卷，写译序多篇。著有《达磨笈多传》、《僧官论》、《辩正论》等，而以《辩正论》最为闻名。《辩正论》共数千言，论述译经的要求、格式等，是彦琮多年翻译经验的总结。论中着重提出了“八备说”，列出译经者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在翻译文体上，彦琮主张“宁贵朴而近理，不贵巧而背源。”总的看来，他是个直译论者。（据林煌天 1997：814）

玄奘（602～664） Xuan Zang

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三藏”“唐僧”，唯识宗的创始人之一。本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他的西行求法事迹，经过《西游记》等文艺作品渲染，在我国几乎妇孺皆知。他从 629 年（贞观三年）到 645 年（贞观十九年），西行求法，从长安到古印度，往返五万里，“所闻所履，百有三十八国”（转引自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室 1989：31），带回大小乘经律论六百多部。回国后在唐太宗支持下专心译经，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共 75 部，1 335 卷，其中主要有《大般若经》、《大菩萨藏经》、《解深密经》、《称赞净土经》、《瑜伽师地论》、《大毗婆沙论》、《成唯识论》、《俱舍论》等，他还把《老子》及《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传入印度。玄奘梵文造诣精深，翻译出来的经论非常精确，在他的主持下纠正了旧译的许多错误，后人通常称玄奘主译的经论为“新译”。玄奘在翻译理论上就佛经翻译中的音译与意译问题，提出“五不翻”的原则。梁启超评论道：“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转引自林煌天 1997：806），认为玄奘直译意译融合，恰到好处。参见“五不翻”

义净（635～713） Yi Jing

唐代僧人。他在 671 年（唐高宗咸亨二年）由海路前往印度求法，历时 20 多年，游历了 30 余国，在 695 年（证圣元年）回国，带回梵本经、律论约 400 部，以后一直从事译经，先后译出《金光明最胜王经》、《大孔雀咒王经》、《法华论》等经、律、论共 61 部，239 卷。义净译经之余，仍教授僧徒，弟子遍于京洛。所译诸经，大多逼肖原文，富有文采。圆寂后，玄宗命在洛阳龙门建塔旌表。义净与法显、玄奘并称“三大求法高

僧”。义净虽遍翻三藏，但偏攻律部。律部的翻译，到义净而趋于完备。密旨教义，义净是始传者。

不空(705～774) Bu Kong

唐代密宗的创始人之一。本是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人，后随师来华。因他有很强的政治活动能力，逐渐获得唐王的信任，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备受朝野倾心崇奉。译有大乘及密教经典共77部、1 200多卷。他自幼长期在中国居住，熟悉中国文化与语言，翻译条件优越。他的译经可分为五类：一为显教类，如改译《任王般若经》二卷，重译《密严经》三卷与《文殊师利佛刹功德庄严经》二卷；二为杂密类，如《金刚大道场经》中的一些经轨、文殊咒藏各法；三为金刚界类，如《金刚顶经》；四为大乐类，如《般若理趣经》；五为杂撰类，如《金刚顶经义诀》。

徐光启(1562～1633) Xu Guangqi

上海人，字子先，号玄扈。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中举，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成进士。1623年(天启三年)授礼部侍郎。累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参机务。卒于1633年(崇祯六年)。

明末王朝，沿海受倭寇之患，北方受满族的威胁，内外交攻，亡兆已征。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出于富国强兵的愿望，与学习过先进科学的传教士结合起来，翻译合编了一些先进的自然科学著作。其中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有克拉维斯注释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该书13卷。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译出前6卷，其中许多名词，诸如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等等，均是徐光启首定，沿用至今，影响至日本、朝鲜等国。

在测量方面，徐光启又和利玛窦合译了《测量法义》一卷，我国有经纬度的精确观念，实始于此。他还比较了中西的测量方法，用几何原理，阐述其一致性。

1612年(万历四十年)徐光启与意大利人熊三拔合作，撰成《农政全书》，是对我国农业发展的一大贡献。所译《泰西水法》6卷，经实验有实用价值，确属先进方法，后编入《全书》。书成后，在天津辟水田试用新法，获利甚丰。

明代通行的历法是《大统历》，其根据及计算方法完全沿用元朝的《授时历》，当时尚有一种《回回历》，系13世纪自阿拉伯传入，沿用既久，错谬颇多。1629年(崇祯二年)日食，光启以西法推算无误，而以《大统》及《回回历》推论皆错。于是礼部奏议以徐光启督修历法，至1634年(崇祯七年)告成。新历法137卷，称《崇祯历书》。

李之藻(1565～1630) Li Zhizao

浙江仁和(杭州)人，字振之，1598年(明万历二十六年)中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他于天文、算术、几何、地理与工艺等几乎无所不精。1601年，他在北京结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西方传教士一起译述了多种西书。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李之藻译出了德国著名数学家克拉维茨著的《浑盖通宪图说》，宣传了地圆说与地动说；译出了克拉维茨著的《圆容较义》，还翻译了克拉维茨的《同文指算》，全书分《前编》2卷、《通编》8卷与《别编》1卷。《前编》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加、减、乘、除的笔算法；翻译了《寰有诠》与《名理探》两书。《名理探》原书凡30卷，译本只是其中的10余卷(康熙二十二年，即1683年，在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续译完该书，续译本名《穷理学》)。该书首次向国人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此外，他还为一些书润色、审阅并撰写序言，如《西学凡》、《职方外纪》、《万国舆图》等。

李之藻卒前，刻印了《天学初函》丛书，汇集了李之藻、徐光启及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译著20多种，52卷，32册。其中“理篇”9种，多为宣传耶稣教义。“器编”9种，全部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明末清初，此书流传极广，为国人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提供了极大便利。

王徵(1571～?) Wang Zheng

明末科学翻译家，字良甫，号葵心，又号了一道人，支离叟，陕西泾阳人。1571年(明隆庆五年)生，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24岁)中举，1622年(天启二年)(52岁)登进士，1627年(天启七年)补扬州推官，1631年(崇祯四年)擢山东佥事，监军海外，次年登莱城陷，被俘。后泛海归朝，幽禁西曹，论罪遣戍。先后在仕途不到十年。1626年(天启六年)，他协助金尼阁(法国人，1611年来华)完成《西儒耳目资》。1627年(天启七年)，又与邓玉函(瑞士人，1646年来华)合作译出《奇器图说》。此书言重心比重之理凡61款，言杠杆滑车轮轴斜面之理凡92款，每款都有例证。又述起重、引重、转重、取水以及用水力代人力的诸器械及其用法。该书初刻本的原名是《奇器图说录最》。既称“录最”，当有其选择标准，即取最适用且简便、精妙而价廉(制作时花费少)者。王徵本人就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精通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著有《诸器图说》及《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两书，他自己所制作的奇器就有自行车、自转磨、轮壶(即自鸣钟)、代耕、连弩、活动兵轮、活动掮木、活揭竿、活舂竿、活闸、运重机器、活动地平、活杓、弩机、火机、拒马刀、龙尾等55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即用于水利灌溉者，用于战争攻守者，用于交通运输者和用于日常生活者。可见王徵研究科学，全是为国为民，讲求实用，非一般猎奇者可比。武位在《奇器图后序》里对之作出非常公允的评价，说“公有奇器，实利万民”。

林则徐(1785～1850) Lin Zexu

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竢村老人。出生于一个比较贫寒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他生性聪慧，幼时即饱读经史百家，但也受到具有革新思想的师友的影响。13岁以“郡试冠军”雄鸣

闽府，自此在科场及仕途上捷步青云，一帆风顺；由秀才、举人而成进士；从监察御史、道员、按察使和布政使逐步升到巡抚总督的高位，成为位居一方的封疆大员。1839 年初，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办鸦片事件。在广州禁烟期间，和英国侵略者展开顽强的战斗，为长我国民志气、反对外国侵略树一大旗，成为当时对外抵抗派的首领。林则徐在抵御侵略者的前提下，亦不排斥借鉴敌人的长处，曾"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参阅魏源《圣武记》），并设立译馆。林则徐不谙外文，但精通满文，曾把司马光《谏院题名记》、韩愈《师说》译成满文，名扬京师，"钦取翻译第一名"。由他初译，经他亲自修改、加工、润色，最后定稿的译著有《澳门月报》五辑：《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及《华事夷言》；还有英人慕瑞（Murry）1836 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名为《四洲志》）。林则徐提倡、组织并参加翻译工作，虽然主要限于介绍西方文化科学知识，他在翻译上的开创之功是卓著的。

魏源（1794～1857） Wei Yuan

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清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翻译编纂家。道光进士，后任高邮知州。鸦片战争时，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任职，曾参加浙东抗英战役。痛愤时事，著《圣武记》。能诗文，著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诗古微》等，还协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

魏源对译事的贡献主要是编纂《海国图志》。全书附图 73 幅，可说是一本世界地图集。书中收入林则徐译的《华事夷言》录要，内有西尔沃尔（Thelwall）所写《反鸦片论》（*Pamphlet Against Opium*）一文的译文，讲中国文化艺术、风土人情、政治经济等问题。还收入林则徐译《澳门月报》五辑。据考订，原文可能选自《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与《广州周报》等报。

《海国图志》的编辑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编者建议制造枪炮、轮船与其他"有益民用"的机器工业产品，以加强海防，抵抗外国侵略；还要求改革漕运、盐法、减轻赋税，兼顾商人利益。《海国图志》对后来我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陈澧称之为"奇书"，张之洞视为中国知西政之始。后来传至日本，对明治维新也产生了影响。（参阅马祖毅等 2007）

哈斯宝（约生于 18 世纪末，卒年不详） Qasbo

19 世纪在蒙古族文学史和蒙汉文学关系史上承前启后和牵动全局的一个人物。他以其卓越的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活动为启动近代蒙古族文学的大幕吹响了先锋号角。哈斯宝大约生于 1795～1800 年（乾隆至嘉庆年间），卒于道光至光绪年间，是一位对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蒙古族翻译家、评论家。他的翻译活动主要采用编译形式，先后编译了《今古奇观》（1816）、《唐宫逸史》（1830）、《唐宫逸史补》（1833）、《新译红楼梦》（1847）等著作。自哈斯宝翻译《今古奇观》开始，蒙古族翻译汉文小说的活动才日渐活跃并形成一定规模，对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和蒙汉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编译的《唐宫逸史》、《唐宫逸史补》则堪称蒙古族故事本子新作的雏形。他的《新译红楼梦》虽是节译，却是国内将《红楼梦》译为少数民族文字的首次尝试，对其后的蒙古族文学巨匠尹湛纳希等以及蒙古族文学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不仅如此，哈斯宝在节译《红楼梦》的同时，对其进行了独到的评论，从而又成为蒙古族文学批评的开创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研究方便，这个《红楼梦》蒙译本的评论部分在现代又由著名蒙古族学者亦邻真回译成了汉语。这种结合了资料研究性的回译与往复翻译的做法极为特殊，值得研究。不言而喻，哈斯宝以其令人瞩目的影响与地位而成为民族翻译领域一位值得关注的代表人物，由此也提示我们民族翻译研究领域所蕴含的科研契机。（邢力）

冯桂芬（1809～1874） Feng Guifen

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曾受林则徐的影响，并成为其门生。当 1832 年林则徐到苏州任江苏巡抚时，冯桂芬还只是一个 24 岁的秀才，就得到林则徐的赏识，称赞冯桂芬为"一时无两"，并以"国士"相期。后来冯桂芬到上海，又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他主张改良政治，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他是我国近代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冯桂芬重视翻译工作。据《清史稿》记载，他在上海曾"设广方言馆，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代表著作，是 1861 年写成并出版的《校邠庐抗议》一书。该书共 40 篇，较早地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变法改良思想。书中的《采西学议》一篇，论述了翻译事业的重要性，把翻译工作视作"天下第一要政"。他的主张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根源。）冯桂芬最早提议创办"翻译公所"，他写了《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原建议设"翻译公所"，鉴于 1862 年北京已设同文馆而改名。）议文末段提到："至西人之擅长者，……至译者十之一二耳。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如能操赜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

李善兰（1811～1882） Li Shanlan

浙江海宁人，字壬叔，号秋纫，清代数学家，翻译家。撰《则古昔斋算学》13 种，共 24 卷，《考数根法》1 卷。对尖锥求积术、三角函数与对数的幂级数展开式、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等都有研究，其中的尖锥求积术已有初步的积分思想，他还得出一些有关二项定理

系数的恒等式和判定素数的定理。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合译《几何原本》后九卷，竟成徐光启、利玛窦(Matteo Ricci)未完之功。1868年(同治七年)入北京，任同文馆算学总教习。1882年(光绪八年)卒于北京。译成《几何原本》后九卷(1857年)、《谈天》(1859年)、《代数学》(1859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奈端数理》(不全)、《重学》(1859年)、《圆锥曲线说》(1866年)以及《则古昔斋算学》(1867年)等书。

徐寿(1818～1884) Xu Shou

江苏无锡人。字生元，别号雪邨，青少年时代曾立志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但屡遭挫败。太平天国在天京(现江苏南京)定都后，转而开始研究自然科学。徐寿是我国最早通晓制造工艺学的人。1861年(咸丰十一年)入安庆军械所，为工程技术人员。在制造轮船、枪炮、弹药方面有所发明，曾自制镪水、棉花、药汞、炸药，并与著名数学家华蘅芳及吴嘉廉等在该军械所制成我国第一台蒸汽机。1864年(同治三年)，又制成第一艘轮船"黄鹄"号。1865年(同治四年)，江南机器制造局(上海江南造船厂前身)成立，他为首任襄办。在他的指导下，造出我国首批兵船及各类船用大炮。

徐寿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兼任翻译期间，与傅兰雅共译西书多种，包括《化学鉴原》(1871年)、《化学鉴原续编》(1875年)、《营城揭要》(1876年)、《西艺须知》(1877年)、《宝藏兴焉》(1880年)、《化学补编》(1882年)、《化学求数》(1883年)、《化学考质》(1883年)、《物体遇热改易说》(1899年)、《法律医学》(1890年)等。他系统地介绍了19世纪70～80年代的化学知识，对在我国传播近代化学知识起了重大作用。此外，译有《汽机发轫》(1871)、《测地绘图》等书。徐寿一生译书13种，共数百卷。

徐寿还与傅兰雅合作，首创了一套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如钾、钠、锰、钴等。

容闳(1828～1912) Rong Hong

广东香山(今珠海)人。字达萌，号纯甫，出生于澳门附近南屏镇上一个贫寒之家。幼年在澳门一所教会学校读书，随后升入澳门美国教会马礼逊学校，不久随校迁至香港。1847年，得教士之助，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回国。相继担任美国代理驻华公使派克的书记，香港高等审判厅译员。1856年到上海后，先在海关当翻译，继转宝顺洋行等外国企业充任买办。同情太平天国革命事业。1863年秋，他应曾国藩之邀离沪到安庆。由于他创办机器厂的建议受到曾国藩采纳，故很快被曾国藩派到美国购买机器。两年后，中国第一座比较完善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终于建成，因此受到清廷奖掖，被提拔为候补同知府，任江苏巡抚衙门译员。1870年，他曾以译员身份跟随曾国藩、丁日昌赴天津办理教案，1872年夏率中国首批留学生30人赴美，并在美国主持建立了"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此期间，还曾兼任驻美副公使。1895年回国。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过往甚密，对一系列新政措施参与意见。1900年8月，自立军起事失败，为免缉捕，遂亡命日本，会见了孙中山，积极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容闳最终病逝于美国。他除用英文撰写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涯》(中译名《西学东渐记》)一书外，还译有歌尔顿《地文学》、派森《契约论》等。

王韬(1828～1897) Wang Tao

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原名利宾，字仲弢，号紫诠。出生于破落地主家庭，自曾祖以下，皆以茂才教授乡里。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中秀才，改名为瀚。翌年，赴南京应乡试落选，自此致力于经世之学。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到上海，在英国教士麦都斯创办的墨海书馆任教职，历时13载，其间曾潜心于西方的舆图、格致诸学的研究与翻译。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大致可分为两期：前期以译《圣经》为主，后期以译西方科技书为主。王韬所译的《圣经》句意清楚，行文流畅，当时流传甚广。其间所译西书主要有五种：《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重学浅说》、《西国天学源流》以及《华英通商事略》各一卷。此后王韬赴香港帮助英人理雅各完成《中国经典》英译五卷，向外介绍中国文化。

王韬所译西书逐渐对他产生思想影响，形成他独树一帜的观念：以"器"来通"道"，藉"器"而见"道"，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王韬系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他学识渊博，著述共达40种，其中《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为其代表作，曾广为流传，在近代产生过影响。

华蘅芳(1833～1902) Hua Hengfang

字若汀，江苏无锡人，清代数学家、翻译家。初入曾国藩幕，官至直隶州知州。1873年(同治十二年)入江南制造局，任提调，兼翻译，并主讲格致书院。著有《行素轩算稿》六种，共23卷。译有《金石识别》(1872年)、《代数术》(1873年)、《地学浅识》(1873年)、《防海新论》(1873年)、《御风要术》(1873年)、《微积溯源》(1874年)、《测候丛谈》(1876年)、《三角数理》(1877年)、《代数难题》(1883年)、《决疑数学》、《合数术》(1888年)、《算式解法》(1899年)等书。他的译书题材广泛，涉及数学、地质学、地文学等领域，但主要是在数学方面。

李凤苞(1834～1887) Li Fengbao

字海客，号丹崖，出生于江苏崇明(今上海市)。他苦读各种数学著作，并研究"泰西新法"，尤通天文历算之学。他著有地学著作《平圆地球论》。在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工作时，还参与吴淞炮台工程。他与美国人金楷理(Kreyer)合作，翻译了许多西方军事技术

著作,对于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及其战术要则,起了很大的作用。李凤苞的译述还包括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著作,如16册之巨的《各国交涉公法》。在李凤苞参与编译的著作中,《四裔编年表》一书尤其值得重视。这是第一部专门介绍西方历史的年表体著作。上限起自公元前2349年(少昊十年),下限迄至1861年(咸丰十一年),逐年排列各个时代主要国家的盛衰兴亡沿革,并始终以中国年号相对应,使熟悉国故的士大夫们能一目了然地知道在中国某朝某代,各国发生了什么大事。在欧洲的几年,他利用直接接触西方科学技术的机会,译述了《陆战新义》、《海战新义》、《布国(普鲁士)兵船操练》、《铁甲船程式》、《美国兵枪法》、《各国水雷鱼雷制》、《雷艇图说》、《城堡新义》等著作。他一生兴趣广泛,博学多闻,著作包括《自怡轩算书》12种,《文藻斋诗文选》、《广前考正》、《闻政汇编》、《使德日记》等。

周桂笙(1873～1936)　Zhou Guisheng

字树奎,一字辛盦,又作新庵,上海人,肄业于上海中法学堂,治英、法文。初为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杂志撰稿,后在汪庆祺主办的《月月小说》任译述编辑,自此开始了他的译著生涯。他曾发起组织译书交通公会。周桂笙不仅积极倡导广译西学,而且身体力行,笔耕不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译作采用直译法,并以浅近的文言文和白话文为工具。可以说,最早把西洋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当属周桂笙,直译西洋文学作品,特别是使用白话翻译,也以周桂笙开其先河。他的译作除少量随笔和儿童文学作品外,多为侦探小说。他一生译有英、法小说三百余种,美国小说不下百种。此外,还有许多译品散见于《新小说》、《月月小说》及其他晚清杂志报纸上。

赵元益(1840～1902)　Zhao Yuanyi

江苏新阳(今昆山)人,字静涵,举人出身,系华蘅芳表弟。通晓中医,熟悉格致之学。1871年进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有各类西书17种。其中医学方面有《儒门医学》、《西药大成》正补编、《内科理法》、《保全生命法》、《济急法》;军事方面有《临阵管见》、《爆炸纪要》、《水师保身法》、《行军指要》等;另有《数学理》、《光学》、《海塘辑要》、《冶金录》等。《光学》系19世纪中国介绍西方近代光学的最主要著作。

徐建寅(1845～1901)　Xu Jianyin

江苏无锡人,一名寅,字仲虎,系徐寿次子。中国近代翻译家。他早年曾在江南制造局与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人从事西方著作的译介工作。这些译著的内容除了自然科学外,还有对西方政治的介绍。其后,他相继担任山东机器总办、福建船政局总办、驻德使馆二等参赞、直隶候补道等职。戊戌变法期间,同端方、吴懋鼎一起被任命为"督办农工商局新政"。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在湖北监造无烟火药之时,不幸因火药爆炸身亡。曾译有:《器象显真》两册,《器象显真图》一册,《兵法》八册,《轮船布阵》二册,《欧游杂录》二册,《德国合盟本末》一册,《德国议院章程》一册等。

陈季同(1851～1907)　Chen Jitong

字敬如(镜如),号三乘槎客,法文名Tcheng Ki-tong (Chean Ki Tong),福建侯官(今属福州市)人。1866年,15岁的陈季同考入福州船政局附设的求是堂艺局前学堂读书。学堂的教员多为法国人,用法语讲课,所用的教材也是法文书,所以陈季同打下了扎实的法文基础。1875年陈季同毕业,因"西学最优"而受船政局录用。同年,他随法国人日意格到英、法各国参观学习,1876年底回国,任教师。翌年,他以翻译身份随官派留欧生入法国政治学堂学"公法律例"。后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并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四国参赞,在巴黎居住16年之久。

由于长期在欧洲工作和生活,陈季同通晓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特别是其法文造诣在晚清中国可谓独步一时,对西方文化也有较深入的了解,同时又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为了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人、中国文化及其价值,他著、译了七种法文书,在当时的西方很有影响。

陈季同曾把《聊斋志异》译成法文。译作名为《中国故事》(又名《中国童话》),1884年在法国巴黎由卡尔曼出版社出版;次年,由米林格伦(James Millingron)译成英文在伦敦等地出版。戊戌维新前夜,为了帮助国人了解西方法制,效法西方民主国家以法治国的实践,陈季同翻译了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1897年,在与其弟陈寿彭在上海合办的《求是报》上,他从创刊号起,一直担任"翻译主笔",译介西学,连载其所翻译的法典,宣传维新思想,颇具影响。他曾连续译载法国作家贾雨的纪实性长篇小说《卓舒及马格利小说》。可惜刊物中途停办,小说没有译完。但他翻译出版了雨果的小说《九三年》及剧本《吕伯兰》、《欧那尼》、《银瓶怨》,莫里哀的《夫人学堂》及左拉的《南丹与奈依夫人》等著名作品,成为近代中国"译介法国文学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先驱者",是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

20世纪初,陈季同曾在南京主持翻译局。据说他"每当译书时,目视西书,手挥汉文,顷刻数纸"。他的译笔总体流畅可读,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人。(据林本椿2004:30～38)

林纾(1852～1924)　Lin Shu

字琴南,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少时起即发奋苦读经史诗文,文笔挥洒自

如。21岁起,他为了维持生计,边读书边执教,还从画师学画。31岁中举。其后考进士七次,都落第而归。甲午战败后,他主张变法维新。46岁时不幸丧偶;应自巴黎归国的友人王子仁之请,合译哀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于1899年在福州问世,读者反应热烈,风靡全国。50岁家迁北京。拜桐城派末代传人吴汝纶为师。55岁任京师大学堂预科与师范馆经学教师。"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发表文章维护古文古书,反对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位古文家,他留给后人的文集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畏庐笔记》与《闽文新乐府》等。林纾译书共184种,达1 000万字以上,其中世界名著达40余种,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等世界文豪的巨作,都有他的中译本。钱锺书把他近30年的翻译生涯分为两期:1913年他译完《离恨天》之前为前期。此期他精神饱满,笔酣墨浓,得心应手,所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他的"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转引自马祖毅等2007:430)。前期的译本绝大多数有自序、跋等,反映了译家的拳拳爱国之心,也不乏独到的翻译见解与具有开创性的比较文学理念,后期这类作品却大大减少。他不懂外文,却译出如此大量畅销的外国文学作品,堪称翻译史上的奇迹。他译书时先请王子仁、魏易等前后达16位懂外文者口授,然后由自己笔译。能"耳受手追,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转引自林煌天1997:416)。林译虽有不少错漏与删节,但从体裁、内容到人名、地名,都基本上忠于原作,从而改革了旧的翻译风气。林译善于保存原作的风格与神韵,中外译家至今仍津津乐道,视为典范。总之,林纾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奇才,在我国文学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辜鸿铭(1857~1928)　Gu Hongming

又名辜汤生,福建同安(今厦门)人。他是我国将中文经典译介给西方的一位著名学者。辜鸿铭出生于马来亚华侨世家,少年时便随义父伯朗赴英国求学。先后十余次在欧洲各国获得十余种学位。1881年(光绪七年)、1882年(光绪八年)之交,他受聘为一支来华英国探险队的翻译,留住香港,苦读四书五经。1885年(光绪十一年),他被两湖总督张之洞聘为翻译兼税务督办。辜鸿铭为了将古老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艺术、道德与政治介绍给外国,从驻留香港始,便开始从事一项中国人前所未做的事业,即将《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翻译成英文。由于他兼精中西文化,又充分采取了中西文化比较对证的手法,因此,他的译著迅速引起外国学者的注目,他们深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深厚所震惊,从而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不小的汉学研究热。辜鸿铭还用英文翻译过《春秋大义》,撰写过《尊王篇》与《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二书。他用五言诗体翻译了英国诗人柯珀(William Cowper,1731~1800)的长诗*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 Linen Draper*,在英诗输入中国的初期,他起到了先驱的作用。

辜鸿铭通晓英、德、法、意、日、拉丁、希腊、马来语等八门外语,尤其英文被誉为"中国第一",而他认为汉语是唯一现存的优秀语言。

康有为(1858~1927)　Kang Youwei

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从小攻读经史。1879年(光绪五年)游香港,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1882年(光绪八年)到上海,精心研读各种西学译著。1888年(光绪十四年)10月第一次以个人名义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要求学习西方,实行维新,挽救国家。上书受到扣压,但康有为的名声在爱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以后他又多次上书皇帝,提及培养翻译人才之事。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他偕同文廷式、陈炽等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即"译书局"),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等报刊,内容大多是国外情报、资料的翻译。同年在上海《强学会章程》(署名张之洞,实际上是康有为所写)中指出,译书为讲求西法的"第一义"和"根本",而且明确公布了他主持译书的先后缓急的内容。他特别注重译政法等各类学术著作,这也是维新派与洋务派思想路线的不同在译学上的表现。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1月康有为在向光绪皇帝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一书的序文中又强调了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以及就近翻译日本有关书籍对于我国变法的有利性和重要性。他是我国近代最早强调翻译东籍之士。

伍光建(1866~1943)　Wu Guangjian

广东新会人,较早翻译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的中国译者。年青时曾在严复主持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毕业后被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对英国文学、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和相当的研究。回国后,在清朝末年曾编写物理教科书和英语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广为流传。伍光建编写的中学理科教材包括力学、光学、动电学、静电学等九种,从英文理科课本上翻印插图,并选其习题,经演习无误才收入。这是中国当时仅有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理科教材。伍光建自19世纪90年代起,应约为上海《中外日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他的译作用白话文,颇使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伍光建先后从事翻译50多年,译有文史哲方面著作130余种。

蔡元培(1868~1940)　Cai Yuanpei

字鹤卿,浙江绍兴人,1883年(光绪九年)考取秀才,1894年开始涉猎外国译著和有关新学著作,1898年开始学习日语,1899年又学英语,1903年学德语,1913年学法语,1923年又学意大利语。他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早年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1902 年与章炳麟等发起教育会，1907 年赴德留学，1912 年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被迫辞职，1927 年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1940 年病逝香港。在 1902 年办爱国学社、编《警钟日报》时，从日文翻译或转译《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论理学原理》等有关哲学和伦理学的著作。其中《伦理学原理》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课外精读书籍之一。译文约十余万字，毛泽东写了近 12 000 字的批语，可见蔡元培的译著在当时对社会的影响。

杜亚泉(1873～1933)　Du Yaquan

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浙江绍兴人，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1898 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越二年，为提倡科学，培养人才，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堂书室)，同时出版《亚泉杂志》。1903 年应商务印书馆之邀赴沪，将其普通学堂书室并入商务，任商务编译所博物理化部主任，负责编辑教科书。经其编辑的教科书不下百余种，其中代数所用的盖氏对数表就是他编的。迄今一直在沿用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也是出于他的首创。1911～1920 年，他主持《东方杂志》笔政近 10 年，其间著有《人生哲学》，并译有叔本华《处世哲学》。辞去《东方杂志》主编职务后，又担任编辑课本工作，并创办中华学院。淞沪战争爆发，他避难回乡，60 岁时病逝。(据马祖毅等 2007)

陈独秀(1879～1942)　Chen Duxiu

安徽怀宁人，早年留日，1915 年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起易名为《新青年》)，并在创刊号上发表署名论文《敬告青年》，为世所瞩目，被公认是新文学运动的先声。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家。陈独秀"五四"前翻译诗歌，如印度泰戈尔(Tagore, 1861～1941，陈独秀译为达噶尔)的诗歌就是由他最先译介到中国的。除了翻译实践，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作为《新青年》的主编组织团结了一批译者，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提供了阵地。他是《新青年》翻译文学的倡导者、组织者。他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对"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运动产生过推动作用。

马君武(1881～1940)　Ma Junwu

原名道凝，字厚山，号君武，广西桂林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爱国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他 19 岁考取体用学堂，专攻数学、英文。后入震旦学院学习法文。1901 年留学日本，学习化工。1902 年 12 月他和马一浮、谢无量共同创办《翻译世界》，马君武任主编。1905 年他在日本京都大学毕业，回国后创办中国公学，担任教育长职务。1907 年去德，入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冶金。在德留学时期，他翻译了《温特渥斯平面几何学》(科学会堂编译部，1910 年)和《微分方程式》(科学会堂编译部，1913 年)。民国成立后，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等职，晚年任广西大学校长。用歌行体翻译拜伦、席勒等人作品。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有四部著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0 年他翻译了达尔文的重要著作《人类原始及类择》(现在的译名是《人类原始及性选择》)，由商务印书馆编入"万有文库"第一集出版。此书 1932 年又收进《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参见"马一浮"

马一浮(1883～1967)　Ma Yifu

名浮，号湛翁，浙江绍兴人，著名学者，翻译家。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应县试，与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同榜，马一浮名列榜首。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马一浮赴上海学英语，后又习德、日、法语，均有所成；他还通拉丁文和梵文。在沪期间，曾和马君武、谢无量、邵廉存等人组织"翻译学会"，出版中国最早以翻译为专业的《翻译世界》月刊，积极介绍西方文化。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他赴美国，阅读了许多东西方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著作。1904 年(光绪三十年)他又东渡至日本学习日文。约在 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初回国。他是第一个把德文版《资本论》带回中国的人，当时他每日翻译数纸，供挚友阅读。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苏曼殊(1884～1918)　Su Manshu

字子谷，后改名玄瑛，曼殊为其法号，清末民初的一位艺僧。广东中山县人，母亲是日本人。曼殊出生在横滨，少年时代则在中国度过。后来曾多次去日本。他聪颖过人，通英语、日语、法语、梵文，并且对中国古典文学十分熟悉。他写过好几篇传奇小说，做了不少诗，也能绘画。早年译过法国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曼殊译诗，数量不是太多，但质量优。他译拜伦《去国行》、《赞大海》、《哀希腊》等诗歌，于 1909 年出版了《拜伦诗选》。此外苏曼殊还翻译过英国诗人雪莱、彭斯和德国诗人歌德的诗歌。他还把中国古诗词译成英文，结集为《文学因缘》。英诗汉译，曼殊是一个先驱者。

王云五(1888～1979)　Wang Yunwu

祖籍广东中山，出生于上海。原名之瑞，小名日祥，派名鸿祯，后改字云五，号岫庐，笔名出岫、龙倦飞。王云五系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辞书编纂家、出版家、翻译家。1903 年春，入守真书馆攻习英文，翌年春，因事辍学，暑假后入日文馆修习英文。历一载，任同文馆教生，继后任益智书室英文教员，课余常给《南方日报》供给译稿。1906 年春，改任振群学社社长；是年 10 月，任中国新公学英文教员，学生中有朱

经农、胡适、杨铨等人。1911年后历任教育部主任秘书兼署专门教育司司长、全国煤油矿事宜处编译股主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公民书局《公民丛书》主编。1921年9月,以胡适之荐,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翌年发起编译《教育大词典》。1924年10月起,先后担任东方图书馆馆长、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主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等职。1932年1月,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是年7月,任总经理兼生产部部长及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其间曾主编《大学丛书》,印行《小学生文库》、《万有文库》第2集,《四库全书珍本》、《四部丛刊》续编,《幼童文库》、《丛书集成》、《四部丛刊》3编,并编辑《中山大辞典》、《国学基本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督导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40年起,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发明协会理事长、经济部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等职。1950年由港赴台湾省定居,曾任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兼任教授,"行政院"副院长、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职务。

周建人(1888～1984)　Zhou Jianren

浙江绍兴人,本名松寿,笔名克士、乔峰、松山、高山、蒿山,系鲁迅的二弟,在家行三,幼时读书于三味书屋。在鲁迅的鼓励下自学外语和生物学,后来成为著名的生物学家、翻译家。除发表学术论著外,还译有:《现代小说译丛》(1922年,与鲁迅合译)、《遗传论》(1922年),《性与人生》(1927年)、《性与遗传》(1928年)、《吸血节足动物》(1933年,合译)、《新哲学手册》(1938年)、《生物进化论》(1930年)、《物种起源》(1947～1956年,与叶笃荘、方宗熙合译),其他译作还有坂村微《原形体》、内田昇三《生物学与人生问题》、《优生学》、《赫胥黎传》等。

翁文灏(1889～1971)　Weng Wenhao

浙江鄞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我国最早期的地质学家。1902年考中清朝秀才,清末留学比利时,获鲁文(Louvain)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13年回国,历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所长、清华大学代理校长、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经济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秘书长。早年在《科学》杂志发表《地质时代译名考》(1923)、《火成岩译名考》(1924),审订《地质矿物学大辞典》(1930),20世纪30年代参与国立编译馆编订《矿物学名词》和《地质学名词》。1949年辞职去法国。1951年回国,被选为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中国地质学会发起人之一,并曾任理事长。有六七十种科学著作,与丁文江、曾世英合编《中华民国新地图》(1933)。晚年还翻译了美国沉积学专家施罗克名著《层状岩石的层序》(1955)和G.马柯威的《石油矿床学》(1956),并在《地质译丛》发表译文,参加地质名词审定工作及法文辞典的编译工作。

李达(1890～1966)　Li Da

号鹤鸣,湖南零陵人,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授、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出生于佃农家庭。1909年到京师优级师范学习。1913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师范理科。1920年与陈独秀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等职。著有《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书,均收入《李达文集》。

李达是我国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前辈。1918年再去日本后,译出《唯物史观解说》(1920)、《社会问题总览》(1921)等书,在国内出版。还译有《马克思经济学说》、《工钱劳动与资本》、《资本论入门》(1921)、《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1923)]、《中国关税制度论》(1924)、《法理学大纲》(1928)、《现代世界观》(1929)、《社会科学概论》(合译,1929)。1928年至1930年间还译了《政治经济学批评》(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该书最早的中译本。1930年还译有《农业问题之理论》。1933年所译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共31万字,是李达译作中篇幅最长的一种。

据不完全统计,李达自译与和他人合译的书不下35种(其中专著25种),达200余万字。这些译作宣传了马列主义,有的还配合了当时的无产阶级斗争。李达的译笔谨严简练。译文基本上用白话文,比较通俗易懂。他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翻译(尤其是社会科学翻译)中的重大作用。

刘仙洲(1890～1975)　Liu Xianzhou

河北完县人,1918年毕业于香港大学,获工程科学学士和"头等荣誉"毕业文凭,历任河北大学讲师,北洋大学校长,东北大学机械系主任、教授,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副校长,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教授,七种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会长。

刘仙洲编订了《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商务印书馆1934),为翻译及统一中国机械工程名词作出了贡献。在编订工作中,他广泛收集明朝以来有关的出版物30多种,调查当时机械工程界已有的各种名称,工人是怎么叫的,日文又怎么译法,然后逐个做成卡片,按照"从宜""从熟""从简""从俗"四大原则,从中选定一个。如pump一词曾有14种汉文译名:起水筒、抽水筒、吸水机、唧筒、邦浦、泵等,最后选定为泵。

有些词很难翻译,就另创新词。如《热工学》中的重要名词"熵""焓"等字,就是刘仙洲创造的。初版编成11 000多个词,后又于1936年、1945年两次增订至20 000多个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编订的《英汉机械工程词汇》就是以《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为基础的。

陈望道(1890~1977)　Chen Wangdao

浙江义乌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文艺理论家、马列主义翻译家。早年东渡日本,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1919年回国后,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教师,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及宣传马列主义。翌年与陈独秀等于上海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并翻译出版我国第一个译本《共产党宣言》。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其间曾创办《太白》杂志并任总编辑,积极倡导社会改革、妇女解放、汉字改造,曾与鲁迅并肩发起"大众语"运动。1927年后,相继任劳动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抗战期间,曾随复旦大学西迁入川,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1949年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务。他的著译颇丰,其中主要的著作有:《修辞学发凡》、《作文法讲义》、《美学概论》、《艺术简论》、《文学与艺术之技术的革命》、《因明学》、《望道文辑》等。其主要译作有:《共产党宣言》、《苏俄文学理论》、《艺术社会学》、《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等几十种。此外,还主编《辞海》。

赵元任(1892~1982)　Chao Yuenren

语言学家、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祖籍江苏常州,生于天津。1910年,以名列第二的成绩考取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先后在美国几所著名大学读书,先学数学,后攻哲学。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21年起,研究语言学。1925年回国,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等学术单位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赴美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3年应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人文组主席顾问。1981年重访大陆,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

赵元任对汉语深有研究,能说三十多种方言。又精通英、法、德、日等语言。此外,他又擅长数学、物理学和音乐。译学界最熟悉的,是他在1969年用中文发表的《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这早先是1967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所作的一次英文演讲,后经扩充发表在1969年第29期《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半月刊)上,英文题目是:*Dimensions of Fidelity in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后收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社会语言学面面观:赵元任论文集》(*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Essays by Yuen Ren Chao*,1976)。赵元任在文中认为,原文不雅不达,译文如果达而雅,那就"失信"了。所以,"还得拿信作为翻译中的基本条件。"但要做到"信"必须考虑许多彼此相关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信的幅度"问题,由此,赵元任实际上涉及许多当代翻译理论问题。另一论文《不用机器的翻译》(*Translation Without Machine*),发表在1961年第九届国际语言学大会上,谈的是机器翻译的可能性和困难,实际上是谈一般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问题。

张资平(1893~1959)　Zhang Ziping

广东梅县人,地质学家、科技翻译家,1911年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1921年7月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创造社",翌年回国。1924年以后,历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教授等职。1940年3月,出任日伪南京政权"技正",专管技术人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到法律追究。

张资平的著作有:《冲积期化石》、《资平小说选》、《时代与爱的歧路》等。另有《石油与石灰》(合著)。张资平译作也颇多,主要有《文艺新论》、《近世社会思想史纲》、《衬衣》、《矿床生因论》、《岩矿化学》、《中国地史》(汉译世界名著)、《矿物与岩石》、《化石人类学》、《生物地理概说》(合译)、《民族生物学》、《人类住域之地理的研究》、《石油天然煤气及岩页油工业》、《土沥青工业》、《液体燃料之合成》、《木材干馏工业》、《酸性白土与活性炭》等。

傅东华(1893~1971)　Fu Donghua

原名傅则黄,笔名伍实,作家,翻译家,浙江金华人。1912年于南洋公学的中院毕业后,考取中华书局,任编译员。1929年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33年起,历任《文学》月刊执行编委、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1950年后任上海市政协特邀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委员、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语文学会理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编审、《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语词学科主编等。傅东华博学多才,系我国现代著名文学翻译家、文字学家、教授、作家。早年曾为《世界文库》和《小说月报》撰稿,20世纪30年代创办文学社,在文学和文字学方面著述颇丰。傅东华所译多属外国文学名著,特别是译著《飘》,影响很大。他在译序中说:"译这样的书,与译Classics究竟两样,如果一定要字真句确地译,恐怕读起来反要沉闷。即如人名地名,我现在都把它们中国化了,无非要替读者省一点气力。"他在翻译通俗小说时完全采用归化的做法,具体讲来,他的译本有以下特点:1. 语言非常简洁,读起来朗朗上口,普通老百姓比较易于理解。2. 省略了一些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例如第35章删节了约八九千字关于Scarlett的心理和Tara庄园的描写,又如第41章删节了约四五千字关于Scarlett的心理描写。3. 人名、地名都采用中国化。尽量不保

留外国的文化色彩,使读者产生像读中国小说一样的感觉,不但将地名、人名,而且将成语、对话都汉化了。4. 英语中长句比较多,而汉语短句较多。傅东华在翻译时大量地使用汉语短句,改变了英语句子的结构。

陈西滢(1896～1970)　Chen Xiying

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现代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幼年在南洋公学读小学、中学,16 岁赴英国留学,先学中学课程,毕业后入伦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与王世杰、周鲠生、杨振声等人创办《现代评论》,主编该刊的《闲话》专栏。此后一度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曾被国民党政府派往英国工作。后长期寓居伦敦,直到 1966 年辞职退休,1970 年因脑溢血去世。主要译作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梅立克小说集》《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并著有:《西滢闲话》《西滢后话》等。早在 70 多年前,陈西滢在《论翻译》(1929 年)中称:"译书要信。怎样才是信?要读者读了译文所受的感动,与读了原文所受的感动一样。"这跟等效翻译论如出一辙。

萧三(1896～1983)　Xiao San

原名䌷三,湖南湘乡人,1922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到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期间,与陈乔年一起将《国际歌》译成中文。1930 年起,在莫斯科东方学院任教。同年秋,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代表身份出席在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会议,会后参加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工作,主编《国际文学》中文版。在苏十年,萧三运用民族形式写了许多诗篇。于 1939 年回国,在延安先后任鲁迅艺术学院翻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文协主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主编当时在延安创办的《大众文艺》和《中国导报》。延安时期的萧三除创作外,还翻译了不少苏联名剧、列宁论文化和艺术的文章,以及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

曹靖华(1897～1987)　Cao Jinghua

河南卢氏人,中国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我国苏联文学翻译界泰斗。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参加由共产党主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及马克思主义。1921 年在上海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派赴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底回国。1922 年至 1924 年在北京大学旁听。1925 年赴开封参加北伐,任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1927 年后,再度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等校任教。1933 年秋回国,在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1938 年底举家入川至重庆,在中苏文化协会主编《苏联抗战文艺联丛》。1945 年秋随协会迁到南京。1948 年秋应聘赴清华大学任教。1949 年后,任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教授。1956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作协顾问、中国译协名誉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顾问、苏联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鲁迅博物馆顾问等职。曹靖华系我国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自 20 年代初开始从事俄苏文学的翻译工作至 1946 年底的 20 多年中翻译出版作品 40 种,达 300 万字。其主要译作有:《铁流》、《保卫察里津》、《虹》、《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契诃夫戏剧集》、《第四十一》、《烟袋》、《死敌》、《城与年》、《望穿秋水》、《侵略》、《油船德宾特号》等几十部作品。鲁迅对他的作品非常欣赏,称赞他"一声不响,不断地翻译"。

老舍(1899～1966)　Lao She

北京人,满族,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书同时补习英文。1923 年经人引见认识了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英籍教授伊文思(Evans),便利用空余时间在该校旁听英文课。他勤奋的精神、扎实的学识以及笃诚的性情获得了伊文思的赞赏。经伊文思举荐,老舍于 1924 年前往伦敦东方学院任教。在英国期间,老舍帮助艾支顿(Clement Egerton)翻译了《金瓶梅》(*The Golden Lotus*),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英译足本。在该书出版时,译者在扉页上写道"To C. C. Shu, my friend"。老舍在东方学院的英文名就是 Colin C, Shu。1931～1935 年期间老舍翻译了一系列文论、散文和诗歌,如叔本华(Schopenhauer)的《学者》、丘奇(Church)的《但丁》、《维康韦子惟兹》、贝雷斯福德(Beresford)的《隐者》、伍德(Wood)的《客》、巴克(Barker)的《出毛病的大么》、莫洛亚(Mauroi)的《战壕脚》等。他翻译了尼奇(Nitchie)的《文学批评》一书的大部分章节,还译有沃尔夫(Wolf)的诗《我发明的花》、《爱》等。

他第二个高潮是在访美期间。1947 年由他本人创作的英文话剧《五虎断魂枪》(三幕四场)完成。1948 年上半年,老舍完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的写作,同时他与浦爱德(Ida Pruitt)合作把其翻译成删节的英文本,题为 *The Yellow Storm*,于 1951 年由 Harcout, Brace and Company 出版。1949 年完成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的创作,与华裔女作家郭镜秋合作完成英文翻译,题为 *The Drums Singers*,后又与郭合作完成了《离婚》(*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的翻译。这些作品是老舍与他们合作翻译自己的作品。老舍本人单独翻译的一部作品是萧伯纳(Bernard Shaw)的《苹果车》(*The Apple Cart*),完成于 1956 年。

老舍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北京市文联副主席。

文洁若在回忆性散文《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中写道:1978 年,挪威汉学家伊丽莎白·艾笛由于研究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开始和他通信。转年初

春,她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8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发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孙坤2007)

吴经熊(1899～1986)　Wu Jingxiong

浙江宁波人,著名法学家,青年时代曾留学于美、法、德等国,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回上海任教,做法官,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是一位博古通今、兼通东西方文明的中国学者,在英汉互译方面也有较深造诣。1942年6月,吴经熊前往重庆,宋美龄请他将《圣咏集》(*Psalms*)(天主教徒对《诗篇》的叫法)和《新约》都翻译成中文。同年11月,在蒋介石的资助下,吴经熊正式着手翻译《诗篇》。他对原文进行明显的归化处理,做了多方面的"改写"。如根据每首诗的主题自拟题目,这些"画龙点睛"之笔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味道;其次,他用中国传统诗体置换原诗体制,有时在一首诗内使用两种以上中国传统诗歌形式。此外,他用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置换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汇。吴经熊的所有译稿都呈交蒋介石过目,不懂英文的蒋介石仔细阅读译文,三阅译稿,建议采用《诗经》的结构和风格,改成四言体,使文句更紧凑,呈现出古雅的风格。

采用了四言、五言、七言、骚体等中国传统诗体的150首"圣咏"取名《圣咏译义初稿》,在蒋介石的资助下,于1946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本封面印有"蒋主席手订",扉页收录了蒋介石致吴经熊的亲笔信影印件和蒋的校阅稿影印件。此本有两位主教分别作序。"于主教序"称赞吴经熊的译笔"清新俊逸,引人入胜。……既深得圣咏之神韵,且妙句天成,不见斧凿之痕"。"朱主教序"认为"文笔古茂,音节铿锵,咏之为咏,名副其实。"于主教预计该译本"为译界开一新纪元可也"。吴经熊的诗篇译本不仅在天主教圈内很受欢迎,而且在新教传教士中间也产生了良好反响。有两位新教传教士评论道:"《诗篇》这一文理译本无疑是一件艺术品,在中国基督教宗教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一些与宗教毫无关系的报纸和杂志纷纷发表评论,大加赞赏。第一首译诗的开头一句"长乐惟君子,为善百祥集"甚至被非宗教日报的头版头条当作了标题。当时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常常从吴经熊的诗体译文里摘出漂亮诗句写下来送人。《圣咏译义初稿》具有"钦定"意味,加之吴经熊的优美文笔,出版后在中国译坛引起轰动,仅5年内就印刷了11次。若干年后,吴经熊公开承认自己的译文并不是"文字对译",只是作为一种"解释",其翻译的首要目的是"为基督而织的一件中式外衣",以"引发中国大众对《圣经》的兴趣"。1975年,《圣咏译义初稿》在台湾出版了修订本。

(任东升)

王亚南(1901～1969)　Wang Yanan

湖北黄冈人。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翻译家,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后去日本留学,旋转德国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清华大学教授等职。

王亚南与郭大力合作翻译的《资本论》(1～3卷)于1938年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汉语全译本的《资本论》。它的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王亚南还翻译了世界经济学及其他方面的名著多种,主要有:克赖士《经济学绪论》(1933年)、李嘉图《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合译,1931年)、亚当·斯密《国富论》(合译,1931年)、乃特等《欧洲经济史》(1935年)、柯尔《世界经济机构体系》上、下册(1939年,1941年再版)、高富素之《地租思想史》(1931年)与爱德华·卫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1930年)等。

郑太朴(1901～1949)　Zheng Taipu

名松堂,字贤宗,号太朴,生于上海,著名教育家、数学家和杰出翻译家。曾赴德国哥廷根大学专攻数理,勤奋著译,先后翻译了《数学全书》(Van. H. Weber著)中的第一册算术、第二册代数、第三册解析几何(共8册),编著了《近代物理学一瞥》(百科小丛书)等,寄回国后在商务出版。1932年他受聘于同济大学,在工学院任数理教授。不久,商务印书馆聘太朴为该馆特约编译。从此时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近四年中,是他学术译著上最为丰收的一个阶段。他先后为商务翻译了《数理方法论》(算学丛书)、《科学与方法》(汉译世界名著,彭加勒著)、《代数方程及函数概念》(算学小丛书)、《社会经济史》(汉译世界名著,韦伯著)等多种名著;编写了《微积学发凡》(算学小丛书)、《物理学小史》(百科小丛书)等较通俗的读物。同时,在浙江省立医学专科学校任数理和德文教授。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作和著作达26种,且不少著作多次再版。这些著译的内容包括:哲学、数学、物理学、经济学、中外科技史等,其中尤以数学方面为多。

沈志远(1902～1965)　Shen Zhiyuan

浙江萧山人,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哲学与经济学翻译家。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由党派遣前往莫斯科;1927年进中山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同时担任英语翻译工作。1930年至1931年,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中文书刊编译处任编译。1931年回上海,在上海暨南大学任课,因言论进步被解聘,便闭门译书。1936年,应李达邀请,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主任。1944年参加民盟。1946年任香港达德学院教授兼经济系主任。1949年初回北京,任燕京大学教授。翌年,任北京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

1952年调上海,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沈志远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是一位成就很大的社会科学翻译家。主要译作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下册(1936年,1938年)、《形式逻辑》(1939年)、《哲学译文集》(1940年)、《今日之美国》(1944年)、《马卡洛娃讲演集》(合译,1950年)、《包德列夫讲演集》(1950年)、《当代科学的历史唯物论》(1952年)等。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译作有《社会经济形态》(拉苏莫夫斯基著)(1938年)、《资本主义》(列昂节夫著)(1939年)、《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著)(1939年)、《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詹姆斯・艾伦著)(1948年)等。

张仲实(1903～1986)　Zhang Zhongshi

陕西陇州(今陇县)人。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家、出版家。青年时期参加共青团,开始追求革命。1926年去苏联,先后在东方大学与中山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开始翻译工作。1930年回国,翻译马列著作与进步书籍。1935年到生活书店工作,后来主编《世界知识》杂志。邹韬奋被国民党迫害离开后,张仲实接任该店总编辑。后日寇占领上海,他难以开展工作,便前往新疆与茅盾共同领导新疆文化协会,并在新疆学院教授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1940年前往延安,参加校审《列宁选集》20卷本的译稿。1943年主管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1949年,协助中央拟定《干部必读》12种书目,并负责编译其中3种:《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发展简史》。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苏友好》杂志主编、中宣部国际处处长。1954年起历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任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有《马恩传略》、《列宁传略》。

张仲实是杰出的马列著作翻译家。译有《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著)、《论民族问题》(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著)等。与经济有关的译作则有《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著)、《政治经济学教程》(拉比杜斯与奥斯特维强诺夫合著)、《政治经济学讲话》(列昂节夫著)等。

钱歌川(1903～1990)　Qian Gechuan

原名慕祖,笔名歌川、味橄,湖南人,著名散文家、翻译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英国,攻读英美语言文学。归国后在中华书局工作多年,主编过《中华杂志》。1950年任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此后一度在南洋教书,退休后去美国定居。其主要译作有:《地狱》(辛克莱著)、《安娜哀史》(托尔斯泰著)、《娱妻记》(哈代著)等。钱歌川也是一位翻译研究家、文学理论家,其译学论著颇丰,主要有《翻译的基本知识》、《论翻译》、《翻译的技巧》、《英文疑难详解》(正、续篇)等;文论著述有《文艺概论》等。

张谷若(1903～1994)　Zhang Guruo

原名张恩裕,山东烟台人,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幼时私塾教育奠定了很深的古文根基,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30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京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授,1949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任教授。由于在文学翻译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1991年获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士。他从青年时期就开始研究、翻译英国著名小说家哈代及其作品,被西方文学界誉为哈代专家。所译《还乡》、《德伯家的苔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35年和1936年初版,曾被香港有关评论家称为"译作的楷模"。张谷若集翻译与研究于一体,以其译文忠实精雅、注释详尽深入而享有盛誉。他说:"我认为注释是翻译的必要工作,未作翻译而先要作注释。我所谓的注释,当然不是字典和词典搬家,那是人人都会作的。我所谓的注释是针对所译的地方,解决疑难问题。"(转引自王寿兰1989: 453)他做翻译有两条原则:不能逐字死译;用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其译文爱用汉语四字结构,还尝试用山东土话来表达英国威塞克斯的方言。主要译作还有:萧伯纳的《伤心之家》,哈代的《无名的裘德》,狄更斯的《游美札记》、《大卫・考坡菲》,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都尼》,亨利・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史》等。

(黄希玲)

许孟雄(1903～1994)　Xu Mengxiong

福建福州人,原名许梦熊,著名翻译家、英语教育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由沈阳东北大学本科开始英文教学工作。抗日战争期间,转到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执教,曾业余时间利用报纸有关材料,每月撰写抗战英雄事迹,应约寄给美国《亚美月刊》,进行抗日宣传。该刊总编威尔希曾来信称赞。1937～1938年间,在董必武同志领导下,与史沫特莱、王炳南合作,首次把毛泽东有关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与战术、国内革命战争问题等文章译成英语出版,是国内最早把毛泽东著作译成英文的译者,曾得到埃德加・斯诺、乔治・霍格等人士的热情赞勉。1939年秋在重庆中央大学教授英语,期间曾向美国月刊《亚洲与美洲月刊》撰稿,刊载20余篇,其中数篇由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转载。1943年到1944年间,为配合国际法庭控诉日本战犯罪行的需要,曾受王宠惠的委托,把有关资料译成英文。1945年被国民党政府派往马来亚、印度使馆任外交官。1949年回国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英语教授,业余把《暴风骤雨》与《子夜》译成英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1956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任英语教授。1978年起,曾先后参加审订《简明汉英词典》(北京语言学院编);修订《英汉四用词典》(新知识出版社,1981年),并作为主要的译者之一,参加了由许多知

名人士发起组成的翻译巨型工具书《韦氏三版英语大词典》编委会的工作，主持辞典语言部分的审阅与修改。此外还撰写有关译学论文，发表于《中国建设》、《翻译通讯》、《英语世界》、《大学英语》等有关刊物。(据林辉 1988)

吕叔湘(1904～1998)　Lü Shuxiang

江苏丹阳人，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1926年毕业于前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曾先后在丹阳县立中学、安徽省第五中学等校讲授英语。1936年赴英留学，相继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就读。1938年回国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央大学教授、开明书店编辑。1950年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调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8年改属社科院)，历任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兼《中国语文》编委、主编。1954年起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80年起兼任该会副主任。他对汉语语法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著有：《中国文法要略》、《文言虚字》、《语法修辞讲话》(合著)、《汉语语法论文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现代汉语八百词》、《语文常谈》等。主要译作有：《英译唐诗绝句百首》、《伊坦 · 弗洛美》、《飞行人》、《吕叔湘译文集》等。他的《翻译工作和"杂学"》(1951)一文强调译者须作坚持不懈的努力来掌握更多的背景知识。他的《由"rose"和"玫瑰"引起的感想》(1984)短小精悍，道出了词语翻译中的难处。他一直提倡双语对比研究，早在1947年在《中国人学英语》中就说："我相信，对于中国学生最有用的帮助是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别。在每一个具体问题——词形、词义、语法范畴、句子结构上都尽可能用汉语的情况来跟英语比较，让他通过这种比较得到更深刻的领会。"1977年，他发表了《通过对比研究语法》，此文像一声号角，在刚刚复苏的语言教学和研究的阵地响起，它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的语言(特别是外语)教学和双语对比的研究，同时也为我国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活力。

巴金(1904～2005)　Ba Jin

四川成都人，曾用名李芾甘、李尧棠，笔名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余三、余五、余七、巴金等。1920年就读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7年赴法学习，在旅居法国巴黎期间，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上卷，并撰写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1928年底回国。1931年"九 · 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同时致力于文学创作，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影响的小说，其中尤以《家》雄鸣于世，自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常务委员。以后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译协名誉会长、《收获》主编等职。

巴金从192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到1999年2月续写《怀念振铎》一文，一生中共创作与翻译了1 300万字的作品。其主要译作有：〔德〕戴 · 斯托姆《迟开的蔷薇》(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英〕王尔德《快乐王子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1953年；平明出版社，1955年；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俄〕迦尔洵《红花》(上海出版公司，1950～1953年)、《一件意外事》(上海出版公司，1951～1953年)、《癞蛤蟆和玫瑰花》(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俄〕屠格涅夫《蒲宁与巴布林》(平明出版社，1949～1954年)，《处女地》(文化生活出版社，1950～1953年新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门槛》(文化生活出版社，1950年)、《木木》(平明出版社，1952～1955年；作家出版社，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父与子》(平明出版社，1953～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1962年；1979年再版)、《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前夜》(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俄〕赫尔岑《家庭的戏剧》(平明出版社，1954～195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往事与随想》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等。(据林辉 1988)

郭大力(1905～1976)　Guo Dali

江西南康人，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经济学翻译家。1923年考入厦门大学学化学，翌年转到上海大夏大学改读哲学。1928年初，郭大力试译《资本论》，半年译完第1卷。其后数年，为了准备翻译《资本论》全文，他刻苦钻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自修德语，并系统阅读、翻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名著，包括亚当 · 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约翰 · 穆勒的《经济学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杰文斯的《经济学理论》、朗格的《唯物论史》等。从1934年起，郭大力重译《资本论》，到1936年译完第1卷与第3卷的大部分，1937年，王亚南参加翻译工作。1938年，《资本论》(1～3卷)终于正式出版，共180余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以汉语出版的《资本论》全译本。它的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39年，郭大力又赶译并出版了《资本论通信集》。1947年编译出版了《恩格斯传》中译本。郭大力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是从1940年春开始的，历时四载才告完成，共120万字，后来反复修改，于1949年出版。1947年春，郭大力应王亚南邀请任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此期间著有《西洋经济思想》(1949年)与《凯恩斯批判》(1950年)。新中国成立前，郭大力还结合国内实际，出版《我们的农村生产》、《物价论》、《生产建设论》等著作。新中国成立后，郭大力先后担任北京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马列学院(现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曾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

届全国人大代表。

周煦良(1905～1984)　Zhou Xuliang

安徽东至人,曾用笔名舟斋、贺若壁、文木等。1905年出生于一个前清大官僚家庭。1920年起在上海大同学院读中学、大学。1926年春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1928年春赴英国,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和文学;1932年获文科硕士学位回国。1933年翻译了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秦斯的通俗著作《神秘的宇宙》。1935～1937年任教于暨南大学,应《新诗》月刊的要求,翻译了现代英国文学论文和诗歌。包括艾略特的《诗的用处与批评的用处》、叶芝的《牛津现代诗选序》、加劳德的《诗的研究》和霍思曼的《希罗普郡少年》。1938年到四川大学英语系任副教授。1940年翻译英国湖畔诗人柯勒律治的《老水手行》三章,并以英汉对照形式在《西洋文学》杂志上发表。抗战胜利后,周煦良在光华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同时,同傅雷主编《新语》半月刊。1945～1947年间翻译了两部小说:美国巴马与威理合著的科学幻想小说《地球末日记》、美国劳勃特·纳珊的《珍妮的肖像》。1951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1958年秋调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会联合会,任《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副总编。周煦良的译著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主要译作还有:考塞夫臬考夫的《活命的水》、保斯托夫斯基的《金羊毛的国土》、史悌芬·海姆的《理性的眼睛》、法捷耶夫的《封锁期间的列宁格勒》、金斯莱的《水孩子》、凡尔纳的《天边灯塔》、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毛姆的《刀锋》;主要论著有:《外国文学作品选》(1～4卷,任主编)、《纪念霍思曼诞生一百二十周年》、《谈译诗的几点体会》等。

周煦良对翻译的论述主要见于《翻译三论》一文,收入罗新璋所编的《翻译论集》(1984)。周熙良在文中论述以下三个问题:1. 还是信、达、雅好;2. 究竟什么是直译? 3. 翻译与语言。他指出:"忠实和准确实在都是信的变相说法,通顺和流畅本身既有些重复,而且都跳不出达的范围。""林语堂于忠实、通顺之外,加上一个美的标准,这个'美'字仍然是严复'雅'的变相。""美既不能用,雅又不能照严复当时提出的那样去理解,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呢? 我认为应当作为'得体'来理解。得体不仅仅指文笔,而且是指文笔基本上必须根据内容来定;文笔必须具有与其内容相适应的风格。""译文要具有与内容相适应的体裁,这就是我叫做的雅。今天要我解释信、达、雅,我会说,信就是忠实于原文的意义,达就是使译文能使人看得懂,雅就是和原文的内容和体裁相称,要得体。"(转引自罗新璋 1984:972～974)　(贺爱军)

董纯才(1905～1990)　Dong Chuncai

湖北大冶人,我国现代著名科普翻译家、作家。1920年离开家乡赴上海求学,期间曾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学生运动。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他的翻译活动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几十年来,曾译出了数量巨大的世界科普名著,开拓了我国科普翻译的道路。主要译作有:法布尔的《科学的故事》(1931年),《坏蛋》(1931年),《动物的奇观》(1931年),《鸟类的胜利》(1931年),伊林的《几点钟·钟的故事》(1933年),《白黑·书的故事》(1933年),《十万个为什么〈室内旅行记〉》(1933年),《人和山〈人类征服自然〉》(1933年),《不夜天·灯的故事》(1933年),《五年计划的故事》(1933年)等。

陈昌浩(1906～1967)　Chen Changhao

湖北汉阳人。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任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同年12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1943年至1952年在苏联外文出版局工作。1952年回国后担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1953年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直到1967年去世。陈昌浩在前苏联外文出版局工作期间,主要致力于马列著作中文版的翻译工作。他参加翻译的《列宁文选》(两卷集)在中国大量印行,对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他还翻译了苏联文学名著《日日夜夜》、《旅顺口》。同时编了《俄华辞典》——一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俄语教学和翻译工作的主要工具书。1953年任编译局副局长后,参加并组织领导编译《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工作。

伍修权(1908～1997)　Wu Xiuquan

湖北武汉人,不仅是杰出军事家、外交家,还是人们熟知的"将军翻译家"。1925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两年后,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改学军事。1930年在苏联远东保卫局成为联共(布)党员,并被正式任命为翻译军官。1931年,进入江西中共苏区,先后担任红军学校的团政委和红军师政委、分区司令员等军政职务。其时,曾协助校长刘伯承翻译、校订过不少俄文军事条令、训练教材等。1933年秋调到中央军委,为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当翻译。1937年起,他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处长。1941年由兰州回延安任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中央组织翻译马列经典著作时,他曾参加了部分的俄文校阅工作。1945年前苏联对日宣战,并进军我国东北。彭真、陈云到沈阳,代表八路军与苏军联系,由他做翻译。1949年,他被任命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曾多次为毛主席、周总理等任口译。1955年,他被委派到南斯拉夫任首任大使。此后他还担任过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职务。他曾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

罗大冈(1909～1998)　Luo Dagang

浙江绍兴人。1928年入上海震旦大学"特别班"专修法语。翌年入北平私立中法大学文学院,1933

年毕业后公费留法，入里昂大学文科，1937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39 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大学时期开始发表诗歌并作文学翻译。那时即根据法文译文转译高尔基的中篇小说以及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苏佩维埃尔的散文《塞纳河上的无名女子》，并将《唐人绝句百首》、《古镜记》译成法文，又用法文撰写七位中国古代诗人小传，均由瑞士巴岗尼埃出版社出版。1947 年从马赛回上海，同年赴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授并陆续发文介绍法国当代文学。1951 年调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 年调北京大学任教。1964 年起，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文所研究员、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罗大冈系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家。为表彰他用法语写作及翻译法国古今文学作品所作出的贡献，巴黎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译著和专论甚丰。

徐梵澄(1909～2000)　Xu Fancheng

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湖南长沙人，哲学家、翻译家。徐梵澄不仅通晓国学各脉，且能用英、法、德、梵、日、拉丁、古希腊、印地等语言进行研究，在中西哲学、宗教、文艺、诗歌每一领域都涉猎颇深，是位集中、印、西学于一身的哲人、学术大师、翻译家。徐梵澄早年追随鲁迅，是鲁迅最宠爱的弟子。1929 年至 1932 年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回国后翻译尼采著述。抗战期间，他先任教于中央艺专，后任中央图书馆编纂，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5 年，赴印度任泰戈尔国际大学教授。1951 年，入南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翻译、著述、讲学 27 年。1978 年底只身回国，经任继愈推荐，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回国后的 20 余年，他的个人研究达到巅峰，学贯中、西、印三大文化圈。徐梵澄系统译出了印度民族大法，即古今韦檀多学一系的经典，有"当代玄奘"之称。

徐梵澄有五大学术贡献：以精神哲学的进路阐释中国古典思想(《老子臆解》、《陆王学述》等)；用英文著述及翻译中国古代学术菁华(《小学菁华》、《孔学古微》等)；在中国较早翻译尼采作品；系统地翻译印度古代经典(《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等)；全面地介绍印度现代"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思想(《神圣人生论》等)。

2006 年出版的《徐梵澄文集》共 16 卷，其中 4 卷著作，2 卷译作，共 650 万字。收录的作品包括：徐梵澄早年翻译的尼采作品《朝霞》、《快乐的知识》、《苏鲁支语录》、《尼采自传》；翻译并重新修订过的《薄伽梵歌》、《五十奥义书》等古印度文明中的经典；阐发中国哲学的《老子臆解》、《陆王学述》等著述；《小学菁华》、《孔学古微》、《肇论》、《周子通书》、《唯识菁华》、《易大传——新儒家入门》等英文著作；翻译的印度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著作，如《神圣人生论》、《瑜伽的基础》、《瑜伽论》、《瑜伽论札集》等 4 部。徐梵澄最突出的学术成就，是印度古、今经典之翻译与介绍、会通。

艾思奇(1910～1966)　Ai Siqi

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1924 年随父到香港，入教会中学，后返云南省立一中就读。1927 年东渡日本，自修日文、德文，参加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并在福冈高等工业学校冶金系攻读。1931 年因"九 · 一八"事变弃学回国。翌年起，一直在上海从事进步的文化活动，先任翻译，继任教员，后任《读书生活》杂志编辑等职。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到延安。在延安时期，业余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的通信及其他著作。1949 年后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及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对外文委常委、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务。除发表许多富有影响的哲学著作之外，还译有：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与郑易里合译)、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蒲格达诺夫的《火星》、《伏尔加船夫曲》、菊池正士的《最近物理学展望及宇宙线问题》、高尔基的《论现实》等。艾思奇发表过《谈翻译》(1937)等著名译论，提出"要用最适当的字句表现原意，就同时要正确地理解和融会原意。在这样的意味上，意译和直译，不能把它看做绝对隔绝的两件事。"(转引自罗新璋 1984：436)他主张"准确的直译"。

萧乾(1910～1999)　Xiao Qian

原名萧秉乾，生于北京，蒙古族，著名记者、作家、文学翻译家。1935 年于燕京大学毕业后，相继任天津、上海、香港《大公报 · 文艺》主编，兼任旅行记者。作为战地记者，他曾辗转于西欧战场，并采访过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其间，1942 年曾进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攻读研究生。1948 年赴香港参加《大公报》起义，并协助地下党英文刊物《中国文摘》的编辑工作。建国后任《人民中国》副总编辑，1953 年改任作协《译文》编委、编辑部主任。1985 年调中央文史馆任馆长。萧乾自幼学英文，后又就读于教会大学，在英学习、工作七年，英文纯熟。有英文著述四种，英文演讲稿多篇。他自称是"打游击"翻译家，但仍有他的目标，选择以幽默讽刺作家的作品为多，如《好兵帅克》、《大伟人江奈生 · 魏尔德传》、《汤姆 · 琼斯》、《培尔 · 金特》和《里柯克幽默小品选》等都非常成功。晚年译出《尤利西斯》(上、中、下，合译)，轰动国内文坛。萧乾专论翻译的文章不多。只有《答辩》中的《论翻译》、《漫谈文学翻译》(《羊城晚报》1984 年 4 月 9 日)以及《翻译的艺术》(《英语世界》1992 年第 6 期)。萧乾强调翻译文学作品应首先考虑传达原作的情感内容，还应把"口吻"和"意向"尽力传达给读者，并认为"得体"是翻译的最高标准。认为"得体"比"雅""神似""化境""等

值”“等效”的说法更通俗、更准确、更有概括性,既适用于口译与笔译,也适合于各类不同的文种。

纳训(1911～1989) Na Xun

纳训为其号,名光政,字鉴恒,云南通海县人,翻译家、穆斯林学者,受家庭熏陶,自幼笃信伊斯兰教。1933年由昆明明德中学送到埃及留学,1941年毕业于开罗艾资哈尔大学。还在学生时代,便开始翻译活动,几年内,将《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谭》)、《阿拉伯哲学家传》译成中文;同时将鲁迅、朱自清和曹禺等人的作品译成阿拉伯文。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他译的《一千零一夜》三卷本,计80万言。后来,他又对此书作第三次校订,于80年代初脱稿,分为六卷,计200万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姜椿芳(1912～1987) Jiang Chunfang

江苏常州人,中国翻译家、编辑出版家。1928年到哈尔滨读书,并专修俄文。曾任英亚电讯社(即前苏联塔斯社电讯社)俄文翻译。1936年7月南行上海,先后在亚洲影片公司和上海大戏院任俄文翻译,1941年改任《时代》杂志翻译、编辑。1942年兼任《苏联文艺》月刊编译。1945年起,历任《时代日报》总编辑、时代出版社社长。1949年后任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校长、上海市文化局对外文化联络处处长。1952年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著作翻译室主任,翌年转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1982年改任顾问;1978年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全国文联理事、苏联俄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1982年兼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为全国政协五届、第六届常委。姜椿芳从事俄文翻译,前后达50年之久。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所翻译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时事、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诗歌、小说、电影剧本等。此外,曾于50～60年代参加《毛泽东选集》、刘少奇著作及中央文件等的中译俄的翻译、定稿工作。

戈宝权(1913～2000) Ge Baoquan

江苏东台人,我国现代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中外文学关系史、翻译史和比较文学研究家。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起,即开始翻译和研究俄国、苏联、中欧、东南欧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有50余种。早年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即开始学习英、俄、日、法和世界语。1932年大学毕业后,进上海《时事新报》任编辑。1935年到莫斯科,任天津《大公报》驻前苏联记者,兼上海《新生周报》、《世界知识》、《申报周刊》等国内刊物特约通讯员。1938年回国后,先后任《新华日报》、《群众》、《中苏文化》和《文学月报》编委。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上海,先后在生活书店、时代出版社编辑部供职,其间曾负责编辑《苏联文艺》、《普希金文集》、《高尔基研究年刊》等。1949年后,历任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和参赞、《译文》、《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学术委员等职。从1957年起,兼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顾问。

叶君健(1914～1999) Ye Junjian

湖北红安人,小说家、文学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以翻译《安徒生童话》享誉世界文坛。1933年入武汉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在东京讲授英文和世界语。1938年初在武汉参加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国际宣传工作。武汉失守后,到香港主编英文刊物《中国作家》,向欧美和前苏联介绍中国抗战文艺作品。后任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英文教授。1944年赴英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伟大斗争。战后在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欧洲文学,并开始用英文创作,在英国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1949年秋回国。在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工作,业余编辑不定期的英文刊物《中国文学》;1953年该刊改为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的定期刊物,任副主编至1974年。

叶笃庄(1914～2000) Ye Duzhuang

安徽安庆人,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进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学习,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肄业于农学科。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并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兼科技翻译委员会主任等多种社会职务。

叶笃庄除了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外,把大部分精力奉献给科技翻译事业。自1951年起他与周建人、方宗熙合译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他主译完成了《达尔文进化论全集》。达尔文的语言并非完全平易,言辞中有对宗教思想的抗衡。为了充分理解其内涵,除深入钻研英文原文外,他还参阅日文和德文译本。他强调科技翻译工作的三要素:专业、外语、汉语,认为“要在专业大学培养科技翻译”,“普通外语学校毕业做专业翻译的要补课。”

梅益(1914～2003) Mei Yi

原名陈少卿,曾用笔名梅雨、萧扬等,1914年1月9日出生于广东省潮安,中国新闻家、翻译家。1930年在潮州省立四中高中一年肄业,同年夏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仅读一载,即回到家乡小学任教。1932年到北平。1935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其时所译作品多在《北平晨报》、《文史》(北平)、《时事类编》(南京)和《国际译丛》等报刊上发表。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地下党文委工作,其间,潜心摘译上海《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等外文报刊的重要社论和文章,专供延安中共中央参考,同时为《文汇报》柯灵同志主编的副刊《世纪风》翻译有关书籍。开手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世界文学名著。1937年冬,上海沦

为孤岛后，为突破敌人对新闻的封锁，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除白天参加党的活动外，晚上又要编报，曾出版《华美周刊》，并与夏衍、林淡秋、姜椿芳等合力出版从外国报刊及通讯社电讯取材的四开日报——《译报》，开创了报纸全部刊登翻译的新闻、社论和通讯文章的先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第一书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

其主要译作有：〔苏〕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海新知书店，1942 年初版；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再版），〔美〕斯诺《西行漫记》（合译，上海复社，1938 年），〔美〕N · 威尔斯《续西行漫记》（上海复社，1939 年），《列强军备论》（英国著名军事论著，上海生活书店，1940 年），〔印度〕尼赫鲁《自传》（上海青年协会，1941 年），《她有一支来复枪》（外国短篇小说集，收入前苏联作家爱伦堡、法国作家古久列等人的作品；上海光明日报，1940 年），〔苏〕尼 · 普里波衣《对马》上、下册（上海新知书店，1940 年）等。（据林辉 1988）

杨宪益（1915～2009） Yang Xianyi

生于天津，1934 年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到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1940 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1941 年至 1942 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1942 年至 1943 年任成都光华大学教授，1943 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1953 年起，杨宪益任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迭翻译了《古代寓言选》、《宋明平话选》、《唐宋传奇选》、《长生殿传奇》、《关汉卿杂剧选》等 10 余部作品，被英美一些大学列为教材，成为西方汉学家普遍重视的英译的中国古典著作。他的其他英译作品还有《楚辞选》、《文心雕龙》、《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宋诗歌散文选》、《牡丹亭》、《宋元话本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英译作品有《鲁迅文集》、《边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青春之歌》等。20 世纪 60 年代初，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最终于 1974 年完成，并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英译本之一。1993 年杨宪益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82 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的“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杨宪益认为，译者要“竭尽全力把原文的意思忠实地传达给读者，使他们能尽量理解原作的内容。我们不应过多地把自己的观点放进去，否则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创作了”。“译者要充分把握原文的语境，若要翻译几百年前的作品，译者就得把自己置身于那一时期，设法体会当时人们所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在翻译成英文时，再把自己放在今天的读者的地位，这样才能使读者懂得那时候人们的思想。”（转引自张经浩，陈可培 2005：136～138）

爱泼斯坦（1915～2005） Israel Epstein

又名艾培，犹太人 1915 年 4 月 20 日生于波兰，犹太民族。1917 年随父母迁居中国。1921 年在天津读书。1931 年中学毕业后，进《京津泰晤士报》任记者。后历任《北平时事日报》编辑，美国合众社、重庆美国《联合劳动新闻》记者。1933 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战绩，曾多次深入抗日前线和根据地，采访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1944 年 5 月至 1944 年 10 月参加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革命根据地采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其间，经他改写，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1951 年，应宋庆龄之邀到中国参与创办了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1990 年 1 月改名为《今日中国》）杂志。1957 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执行编辑、总编辑，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顾问，三 S 研究会副会长、顾问，中美友协理事，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副主席。2001 年 3 月任第四届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六届至第十届常委。

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状况》、《西藏的转变》以及 30 余万字的英文自传体回忆录《见证中国》。（据《中华读书报》2005 - 12 - 14）

裘克安（1920～2008） Qiu Kean

浙江嵊县人。1941 年浙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4 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攻读英国文学，获硕士学位。1948 年至 1949 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副教授。建国后到外交部工作，曾任翻译室副主任。后任外交学院教授、宁波大学副校长。先后兼任中国译协理事和名誉理事。

裘克安长期参与《毛泽东选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以及重要外交文件的英文定稿工作。有《冯至十四行诗》（英译）、利普曼的《冷战》、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和丘吉尔通讯录》、《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卡特保持信心》、《基辛格白宫岁月》等译著多种。1991 年离休后，裘克安在东西方语言和莎士比亚研究和推介方面笔耕不辍。曾任商务印书馆《莎士比亚注释丛书》的主编和主笔，共完成 41 本注释本。

叶水夫(1920～2001) Ye Shuifu

翻译家。浙江宁海人,自幼在上海求学,曾求读于沪江大学。1942年起为上海时代出版社的综合性刊物《时代周刊》和文艺刊物《苏联文艺》译稿。翌年正式进入该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建国初期,任时代出版社副总编辑兼上海编辑部主任。50年代中期,调北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任苏联东欧文学组副组长、"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主编等职。1978年起先后任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外国文学小组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副主编等职务,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评议组成员。80年代起担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会长。

叶水夫长期从事苏俄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并为我国翻译和翻译研究做了大量组织工作。他一生翻译了大量苏俄作品,有重要影响的如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1947,1954)、季莫菲耶夫的《苏联文学史》(1948,1954)、杰缅季耶夫的《法捷耶夫的创作》(1955)等。

刘祖慰(1922～2005) Liu Zuwei

上海人,著名翻译家。1940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学习,翌年冬上海陷落后辍学,于1942年赴安徽绩溪任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译员。1943年进重庆中央大学改习国际关系和国际法,194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一载,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翌年夏在联合国秘书处任实习口译,1949年回国。曾任中国译协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理事、第五届名誉理事,是上海科技翻译学会的创办人之一。曾担任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研究》编委会顾问,中国科技史翻译组召集人,中国科学院科技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常务理事,欧美同学会留英分会会长。

在美国前总统卡特和前财政部长布鲁门撒尔访沪期间曾担任翻译,为李约瑟博士担任过学术口译。主要译作有: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化学篇)、《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英译)、《敦煌数学史手抄稿》(英译)、《中国造纸史》(英译)、《中国火箭史》(英译)等。

译论百部

1. 论文集

翻译论集　黄嘉德编　上海西风社　1940年

本书编者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翻译课教师，译有《萧伯纳传》、《萧伯纳情书集》、《乡村求爱》(萧伯纳)、《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新女型》等多种作品。编者在自序中谈到编选本书的目的时说，因为"以有系统有条理的文字讨论译事的著作委实不多。本书所选的文章均以内容的充实适当与否为标准，务使读者阅后，对于翻译的原理，方法，历史诸方面，都能有相当的认识，因而在技术的训练上，间接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帮助。"

本书共分四辑，计24篇。第一辑"翻译通论"收有严几道(即严复)的《译天演论例言》、林语堂的《论翻译》、胡适的《论翻译——与曾孟朴先生书》、周作人的《陀螺序》、傅斯年的《译书感言》、鲁迅的《关于翻译的通信》(节录)、曾虚白的《翻译的困难》等14篇。第二辑"论译名"收有胡以鲁的《论译名》、《科学名词审查会物理学名词审查组第一次审查本凡例》、容挺公的《致甲寅记者论译名》等5篇。第三辑"论译诗"包括曾孟朴的《读张凤用各体诗译外国诗的实验》(节录)、成仿吾的《论译诗》和刘半农的《关于诗的一点意见》，共3篇。第四辑"翻译的历史"包括胡适的《佛教的翻译文学》(节录)和郑鹤声、郑鹤春的《科学翻译史》共2篇。

本书收文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主，也有清末的若干篇。四辑中第一辑"翻译通论"涉猎最广，包括翻译原则、翻译标准、翻译方法以及对翻译问题的各种看法等，收选的文章占本书篇目一半以上。"论译名"专设一辑(第二辑)反映了当时对译名问题的重视。陈独秀、沈雁冰、郑振铎、刘半农、林语堂均先后对译名问题发表过专论，西谛(郑振铎)还在《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12期上发文《文学上名字译法的讨论发端》，发起对译名问题的讨论。译诗，由于它的复杂性和当时的多议性，也有单独一辑。最后一辑就是"翻译的历史"。

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汇集了一段时期的名家名论，但也不无遗憾地漏收了清末马建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重要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在编辑分类上也有可改进之处，如陈西滢的《论翻译》和曾虚白的《翻译中的神韵与达》应列入第三辑"论译诗"。因为两文中所说的神韵和引证的文字，大部分是指诗的翻译而言，虽然偶亦论及其他文学体裁的翻译。又如在第一辑"翻译通论"里把严几道的《译天演论例言》置编首，而把吴挚甫的《与严几道论译西书书》置编末，似有不妥。在翻译史上，严吴论翻译的信札交流不少，且吴挚甫对严几道所奠定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亦有较大的贡献。所以，吴挚甫的书札似应放在严几道的"例言"之后。

本书虽然在收文和编辑上有一定的缺憾，但是作为集名家大作于一体的论集，在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具有开创性，为当时和此后有志于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人士集中地提供了上佳的论作，彰显了我国翻译研究一个阶段性成果。该书1940年1月出版，过了两个月又出了第2版。

(张顺梅)

翻译论集　刘靖之主编　香港三联书店　1981年

本论集收录我国大陆及港台地区与海外翻译文论计37篇，多为名人名篇。文集内容分为三组：第一组文章属总论性质，主要论述翻译标准与翻译原则；第二组属专论性质，谈翻译理论与经验；第三组论文是对译作、译者的评介及有关翻译史事的研究。书首有编者的代序《重神似不重形似——严复以来的翻译理论》，书后附有自1932年至1980年间的翻译研究书目和论文索引。

编者在"代序"中对我国传统译论进行了全面梳理与总结，对众多具有代表性的译论进行了深入剖析与评论，颇富真知灼见。他指出："自严复以来，我国的翻译理论经过了几个成长期，从'信、达、雅'开始，经过'字译'和'句译'、直译、硬译、死译和意译，然后抵达'神似'和'化境'，这其中有不少争论和误会，但大方向都是正确的。严复、林语堂、赵元任、胡适、傅雷、林以亮、钱锺书等人的翻译观点固然是一脉相承的，瞿秋白的又何尝不是如此！鲁迅的翻译的确与众不同，但瞿秋白在许多地方指出了鲁迅翻译的'硬'和'讹'。由此可见，在过去的80年里，我国的翻译理论是朝着同一个方向，那就是'重神似不重形似'，以便达到翻译上的'化境'。"编者的结论是：神似是翻译的最高标准，翻译者与演奏家一样，有对原作诠释的权利。

由于该书史料丰富，且多次重印，广泛散布于海内外，极大地方便了广大翻译工作者的研究工作，促

进了翻译经验的交流与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肖红文，佘协斌）

翻译研究论文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年

该论文集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现更名为中国翻译协会)根据章程的有关规定，委托《翻译通讯》(现为《中国翻译》)编辑部编辑，分上下两集，分别于1984年2月和11月出版。上集辑录1894年至1948年间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书籍上有关翻译理论的论文51篇，下集收录1949年至1989年间发表的论文63篇。所录文字大多为各个历史时期在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有代表性创见的论文，取舍的标准视文章对译学研究有无价值而定，而不因人废言。文集涉及作者90余人，多是我国不同时期在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方面成绩斐然的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论述的内容广泛而全面，举凡翻译的性质、标准、原则、方法、技艺、困难、矛盾、风格、语言等，文学翻译、科技翻译、口译、笔译、翻译批评等，均有论及，并富真知灼见。我国翻译史上发生的历次大争论，如"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信"与"顺"之争等，亦可在文集中找到对立双方的原始资料与观点，颇富学术研究与史料价值，为翻译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该论文集出版后，受到广大翻译工作者、科研人员、大专院校师生的欢迎，在翻译学术界起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凡论者论译，多有参阅援引。这部论文集和同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新璋编《翻译论集》，为几年后中国掀起的翻译研究高潮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梁海军，佘协斌）

翻译论集　罗新璋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陆第一部影响广泛的翻译论文集。该书收录了自汉末至1982年有关翻译的文论180余篇，按年代时期分为五辑：第一辑为古代部分，第二辑为近世部分，第三辑为近代部分，第四辑为现代部分，第五辑为当代部分。全书涉及论者近120人。内容包括译论、译技、译评、译介等，领域涉及宗教翻译、科技翻译、文学翻译等各个方面，地域以大陆为主，兼及港台地区和海外。所选文论大都为独具创见的论述，可谓博采众长，百家争鸣，极具学术性与史料价值。书末附有自1914年至1982年间重要翻译论著与文章索引，可供作进一步研究的查找线索。

该书除所录翻译文论本身的价值外，另一重大贡献是编者在浏览、研究历代翻译文论之后，指出我国的翻译理论"自有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似可不必妄自菲薄"。他在卷首的长篇序言《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对我国自汉末以来的1 700多年间的翻译理论及其发展脉络，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梳理与恰如其分的评述，可以说是一篇总结我国传统译论的权威研究文字。编者认为我国的传统译论源远流长，"植根于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取诸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慢慢由合而分，逐渐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翻译学"。文中特别对我国古代译家主张的"案本而传"，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傅雷推举的"神似"论以及钱锺书提出的"化境"说等有重大影响的译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将它们与外国译论加以比照，然后指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从而破除了长期以来认为中国只有翻译经验之谈而无翻译理论的看法。编者还认为，由于语言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一种翻译理论对不同国家不会都是"等值"的，生搬硬套，往往格格不入。因此对外国译论，既要虚心学习，广泛介绍，又不能生吞活剥，盲目崇拜，而是要能"通"能"化"，将它们与我国汉外互译实践相结合，取长补短，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

这部《翻译论集》及其序言出版后，引起我国译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书中的许多译论观点，编者序中的许多精辟议论与看法，屡屡为论者论译时所引述。

（佘烨，佘协斌）

翻译新论　杨自俭、刘学云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年

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阶段翻译研究的大型论文集，选文时间上接罗新璋《翻译论集》，从1983年开始，跨度10年。编者从400余篇论文和30多部著作中精选出54篇文章编成此文集。全书分三编：第一编"翻译研究"，选文18篇，既有笔译、口译、机译和英汉互译研究，又含诗歌、散文、小说、学术著作、科技、法律等多种文体的翻译研究。第二编"译学研究"，选文28篇，包含翻译学学科本体的总论、翻译观、翻译理论、翻译策略、翻译标准、翻译单位、翻译美学与风格、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翻译史、译论史等方面的研究。第三编"跨学科研究"，选文8篇，主要涉及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文化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相关学科。

44位论文作者都是认真做过翻译或从事翻译教学并重视理论研究的老中青译界学者或翻译家。所选文章均有创见或独到的见解。本文集从各种文体的翻译研究、翻译学本体研究、翻译学跨学科研究三个不同层面展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阶段我国翻译研究所取得的新成就和新发展。翻译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已引起译界的关注，展现出最初步的形态。本文集所收文章大多理论性较强，编者的目的之一是为译论史研究收编文献。本文集出版后引用率较高，并成为硕士、博士生研究中国译论的重要参考书。

本文集和其他文集的最大不同是编者对54篇文章都写了"读后感"，总字数约12万字，不仅介绍了作

者的学术生涯和有关的学术成果,还点评了选文的核心内容和相关问题,扩大了学术视野,提示了读文的方法,引发了理论的思考。书末所附 52 种翻译研究论著和 327 篇论文索引对这个时段的翻译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该书由王宗炎作序,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译界的发展与问题、翻译标准、译者条件、理论派别及其局限等。这篇序言后收入他的个人文集《语言学和语言的应用》(1998)和《英汉语文问题面面观》(2006)。编者的长篇前言《论我国近期的翻译理论研究》,对这个时期的中国翻译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指出翻译的领域扩大了,翻译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理论研究的意识有明显增强,学科建设在各类专题翻译研究、译学本体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三个层次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翻译》和香港《中国语文通讯》先后转载了此文。Tessara Thomson 将该文译成英文,发表于叶步青主编的 *Journal of Macrolinguistics*(《宏观语言学》)1996 年第 6 期、第 7 期合刊上。

文化与翻译　郭建中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年

翻译被认为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是文化交流的桥梁;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文化交流。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兴起了翻译研究派理论,提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口号,中国也随即兴起了翻译与文化的研究高潮。1997 年 11 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就收到了大量有关翻译与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说明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本论文集主要收集这次会议有关这一议题的文章,并适当收进 1997 年以前发表的有关论文,共计 29 篇。

本论文集的主要特点如下:1. 收入了我国老一辈外语专家教授和中青年翻译研究者的论文。老一辈外语专家教授的论文开创了当代文化与翻译研究的先河;中年翻译研究工作者的论文功底深厚,学风严谨,起到了中流砥柱、承上启下的作用;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勇于探索,生气勃勃,是我国翻译研究未来的希望。2. 收入的文章有的从宏观方面研究文化与翻译的关系。这些文章考察了翻译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种文化是怎样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去的,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文化是怎样逐步结合起来的。3. 收入的文章也包括了从微观方面来研究文化与翻译的关系。翻译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更要克服文化的障碍。这些文章考察了哪些文化因素影响和制约了翻译,探讨了译者怎样既能克服文化的障碍,又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进而探索了词语中的文化因素怎样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同时也考察了由于文化因素而产生的误译。

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在比较两种语言与文化的基础上,还要研究译入语中的表达方式,以及这种表达方式在目的语读者中的理解和反应,从而达到文化移植、文化融合和文化交流的目的。该论文集代表了文化与翻译研究在我国当时的水平。

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　张柏然、许钧编　商务印书馆　2002 年

本书是 21 世纪初出版的一部重要翻译理论研究文集。全书 675 页,收入《关于译学研究的一些想法》、《翻译学的建设:传统的定位与选择》、《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等文 45 篇。作者大多是我国外语界目前专门或主要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他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或对翻译学进行理论性的元思考,或对翻译学进行科学分析性研究与应用性探讨,内容大致涉及五个方面:一、对中国译学研究的回眸、反思与展望;二、翻译学及其理论研究;三、文学与诗歌翻译;四、文化与翻译;五、翻译与教学及其他。

本书既有对 20 世纪译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又有对 21 世纪主要研究方向、任务与对策的前瞻性展望。内容涵盖翻译学的定位、理论构建、基础研究以及翻译活动、翻译标准、翻译因素、翻译功能、翻译方法、翻译层次、翻译批评、翻译教学、文学翻译、同声口译等各个层面。书中辑录了"传统派"翻译理论家对中华民族宝贵翻译经验和巨大理论资源的理性思考和"西学派"对中国译学与国际接轨、构建国际翻译学的筹划,彰显了中国译界学者对翻译本体的反思和中国翻译学由框架构建到板块组合的建造过程。五大专题互为补充,相互连贯,分别从哲学、语言学、文化社会学、符号学、文艺学、美学、心理学、逻辑学等不同视角,对所论专题进行立体的、多元的、开放性的研究与诠释,展示了我国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新时期 20 年间译学研究领域所作的不懈努力,以及在融通中西译学、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译论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在"编者絮语"中,编者认为译学研究既要重"科学特性"又要重"文化性格",主张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明确提出中国翻译学应该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寻求曾经孕育了她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根,重建传统,同时吸取西方翻译学的智慧,参照现实变迁的需要,创建一种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翻译学。

概言之,这部翻译论集内容丰富厚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实际指导意义。该书是世纪之交两位编者出版的《译学论集》(译林出版社,1997)的姊妹篇,也是对后者的充实和延续。　(辛红娟,佘协斌)

2. 翻 译 史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马祖毅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年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翻译史,填补了翻

译史学研究的空白,系我国翻译通史的开山之作。该书史料翔实,条理清晰,系统地介绍了我国从奴隶社会初期到"五四"运动以前的翻译理论、翻译机构、翻译名家和翻译著作。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从周朝到东汉桓帝前的翻译活动";第二部分叙述"从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的翻译活动";第三部分叙述"元代的翻译活动";第四部分叙述"从明代到鸦片战争前的翻译活动";第五部分叙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活动"。从翻译形式上看,书中既讨论口译活动,又涉及笔译;从翻译内容来看,有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也有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从翻译的组织者来说,既有个人的翻译活动,也有政府组织的翻译活动;从翻译的主体来说,既有汉译外,也有外译汉,同时也记载了少数民族的翻译活动。该书的主要特点是:一、内容全面且重点突出。如书中介绍三大宗教经典在中国的翻译传播时,以佛经翻译为重点,第二章用大量篇幅介绍从东汉到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二、将翻译活动放在历史的广阔语境中,综合分析译事、译人、译作,使人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如在探讨严复的翻译理论和译作时,详细介绍当时的时代背景、意识形态、严复本人的文化背景与价值取向,从而使读者对"信达雅"的理解远远超出翻译标准的范畴。三、作者治学严谨,论述有理有据,遇有争议的地方,采取以史代议、求同存异的做法。如讨论我国最早译出的佛经时,作者指出,《浮屠经》和《四十二章经》究竟何者为先,学界各执一端,难做定论。同时又明确指出,"我国佛经翻译,确凿可考者应自东汉桓帝时安世高译出的《明度五十校计经》始"。杨自俭在序文中指出:"这部专著史料非常丰富,这是史书的根基,做到这个程度是很难得的;再一点就是翻译事业的脉络清晰,重点突出,这是史书的脊梁。此书读完之后,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国古代到近代的翻译事业和翻译理论的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是我国翻译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对于开展翻译史、翻译名家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中国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书的出版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系统的史料,深受读者欢迎。该书已入选国家经典名著千卷本"中国文库"。作者于 1998 年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更于 2006 年完成毕生宏愿,出版了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该书上起公元前 841 年(西周共和元年),下迄公元 2000 年,分古代卷和现当代卷两大部分。计古代卷一册,现当代卷四册,全书共 415 万字,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张映先,仲文明)

中国翻译文学史稿　陈玉刚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 年

19 世纪中叶以来,许多作家、翻译家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优秀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艺思想、艺术形式和文学语言,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影响深远,尤其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然而对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一般中国文学史很少论及。编者的这部中国翻译文学史,系统全面地回顾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和成就,记载了文学翻译家的功绩与贡献,可以说是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之作。

该书的主要特点是:采用历时性编排方法,以时代发展为序,以文学翻译活动事实为基础,以脉络为主,阐明翻译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规律,并力图对翻译文学和新文学发展的关系,各个时期翻译文学的特点,重要文学翻译家的翻译主张以及他们之间的继承和相互影响,翻译文学最基本的特征及与其他形式文学的不同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全书 405 页,33.5 万字,除绪论和编后记外,根据中国翻译文学发展的五个阶段分为五编。第一编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1840～1919);第二编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发展的初期(1915～1930);第三编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发展的中期(1930～1937);第四编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发展的后期(1937～1949);第五编为中国当代翻译文学(1949～1966)。书中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批重要文学翻译家如梁启超、严复、林纾、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瞿秋白、林语堂、朱生豪、梅益、李健吾、傅雷、戈宝权、方重、萧三、姜椿芳等人的翻译主张、活动、功绩与贡献,进行了全面回顾与阐释。

该书出版后,在文学界与翻译界引起较大反响,评价颇高,在翻译文学研究领域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受该书的影响与启迪,在世纪之交,中国译论界出现了一个研究翻译文学的热潮,相继出版了一批研究翻译文学的著作。其中有郭延礼于 1998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该书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研究项目;谢天振、查明建于 2004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该书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 (佘烨,佘协斌)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陈福康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我国第一部具有开拓性的翻译理论史。全书除引言外,共分四大章:1. 中国古代译学理论;2. 中国近代译学理论;3. 中国现代译学理论;4. 中国当代译学理论。书后附有"翻译文论参考篇目"1 500 余篇。该书对我国自古至今的译学理论进行了发掘、整理与总结,涉及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及旅居海外的译论家(包括早期的传教士)100 多人。作者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挑选重要的译论家及其译论,分别进行介绍与评述。每一位译论家的研究既单独成篇,又相互联系,显示了历史的连贯与动态发展。每章之后的"章末片谈"则对相关历史时期的译论特点进行小结。内容涉及译学内部研究(本体研究),包括翻译的实质、原理、标准、思维方式、可译性、方法(直译、意译、音译等)以及翻译程序、翻译美学、翻译艺术、风格、技巧等,同时涉及外部研究(即翻译与外界的关系),包括

在翻译横断学科网络中的位置,翻译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关系,以及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工作者队伍建设、译者修养、翻译工具书和教材编写、中外专家合作等等问题的研究。举凡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当令易晓,勿失厥义"、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辩正论"、玄奘的"五不翻"、徐光启的"翻译与超胜"、王徵的"翻译资用说"、魏象乾的"繙清说"、傅兰雅的科技翻译思想、马建忠的"善译说"、严复的"信达雅"说、郭沫若的"创作论"、鲁迅的"易解与丰姿"说、曾虚白论"神韵与达"、陈西滢论"形似、意似、神似"、傅雷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钱锺书论"化境",以及许多译绩显赫的翻译大家如梁启超、林纾、周桂笙、胡适、茅盾、成仿吾、朱生豪、朱光潜、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翻译思想与主张,作者都有画龙点睛式的介绍与恰如其分的分析与评述,既指出各家译论的贡献,亦指出其不足与局限。书中引经据典,夹述夹议,不乏精辟见解与精彩议论。

作者在书中指出: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无限过程,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理论,不仅需要横向引进,更需要纵向继承,因此必须先摸清"家底"、理清"家谱"。而他的这部史稿就勾勒出了中国译学理论的轮廓,理出了其流变的线索,具有较高的资料与学术价值,标志着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发展。2006年,作者又对该书作出了修订。

（佘烨,佘协斌）

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　孙致礼著　译林出版社　1996年

该书是作者199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重要研究成果,着重回顾了1949～1966年间中国英美文学翻译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翻译事业蒸蒸日上,国内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译者,出版了大量优秀的译作。作者选择这一时期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旨在肯定老一辈翻译工作者的成绩,总结他们的经验,以供后来者学习和借鉴。

该书是我国翻译研究领域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断代文学翻译史,相对于一般的翻译通史或简史,此书提供了更加充分翔实的历史材料。作者按体裁分类,以发表年份为序,逐一将建国以后17年间出版的460种英美文学译作在我国的出版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和说明,对众多译家的翻译功绩进行了公正的评价。作者不仅对其中300多位翻译工作者的翻译活动作了概述,而且将其中较为重要的26位译家的生平、译作、翻译见解和影响等作了恰如其分的论述和客观公正的评析,既赞颂了他们的成就与贡献,也指出了其不足和缺陷。作为一部翻译史学著作,作者的目光没有被局限在翻译历史文献资料的介绍与概括上,而是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进而提出改良方针和措施,促进翻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章,主要内容是对建国以后到1966年这数十年间我国的英美文学翻译出版状况进行详尽的考察和总结。作者按照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电影剧本将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分类,分别对各个门类中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我国的译介情况进行介绍和概括。指出我国17年间出版了245种英国文学译作,215种美国文学译作,共有300多位译者参与了这些译本的翻译工作。第二部分包括第四至第八章,详细介绍了17年间我国比较重要的26位英美文学翻译家。作者将他们分别概括为莎剧翻译家、诗歌翻译家、小说翻译家和综合型翻译家,不仅对他们的生平、译作、译论作了介绍和总结,而且选取了其译作中的典型段落,进行对比赏析。在探讨翻译理论的同时,加入实践分析,令读者耳目一新,印象深刻。最后一部分总结和概括了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的翻译活动所带来的经验和启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认为文学翻译工作应加强组织领导,实行计划译书;开展翻译批评,提高翻译质量;注意理论研究,提倡百家争鸣。

（马新强,屠国元）

西域翻译史　热扎克·买提尼牙孜主编　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4年

这是我国第一部对西域各民族、各时期的翻译活动进行整理研究的翻译史著作。其时间跨度从先秦一直到清代,其地域范围以狭义的"西域"为主,同时由于需要对各民族的翻译活动历史进行梳理,涉及的地域范围实际上已经突破了狭义的"西域"。全书将西域的翻译活动划分出五个阶段:一、早期萌芽阶段,从远古到东汉桓帝时期(147～167年),亦即内地佛经翻译兴起之前的阶段,历时2 300年左右。此阶段以口头翻译活动为主,以西域土著民的语言同匈奴语以及匈奴语同华夏语互译为主要翻译类型。二、东汉至隋的阶段,从147年至617年,经历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等几个朝代,历时近500年。这一阶段佛经翻译开始兴盛,主要是从梵文佛典翻译为胡文佛典,也就是"胡本"大量出现的阶段。据推测,西域康居、安息、大月氏、于阗、龟兹、焉耆等地的僧人翻译了大量梵文经典,随后出现僧人东渐、去内地传教的活动高潮和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包括安世高、支谦、竺法护、鸠摩罗什等。这一阶段以佛经翻译为主,此外还有其他宗教典籍的翻译,文学翻译则以佛经中的寓言、传说,梵文《弥勒会见记》的焉耆文翻译,《敕勒歌》的翻译为代表。三、唐宋时期的翻译活动,从618年至1279年,经历北宋、南宋、辽、金政权在内的600多年。在这一阶段里,翻译活动丰富,成果大量涌现。此阶段延续了上一阶段的佛经翻译活动,只是译经所依据的源本逐渐由胡本变为梵本。同时,除佛教以外,其他宗教典籍的翻译活动也较为兴盛,包括摩尼教的《二宗经》、《摩尼教徒忏悔词》,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文学翻译主要有焉耆语的《弥乐会见记》、汉文的《善恶两王子的故事》、希腊语的《伊索寓言》等作品的回鹘语翻译。四、元明时期的翻译

活动,从1206年至1644年的两个朝代,400多年的时间。元朝时期,中央组织的翻译活动丰富,在国子监下分设的回回国子学和蒙古国子学充当了重要的翻译部门,主要奉旨翻译佛经或汉文典籍。据考定,元朝时期去内地的翻译家中维吾尔族人占多数。明代也同样以官方组织的翻译活动为主,设立的四夷馆掌译书之事,其中有回回馆和高昌馆,编成《华夷译语》。另外,还有《高昌馆课》、《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等。元明时期的翻译活动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察合台文学翻译活动。察合台汗国境内,在察合台语和用阿拉伯字母改制的察合台文的基础上,产生了察合台文学。察合台文学翻译主要包括由波斯、阿拉伯文学向察合台语的翻译。五、清代翻译活动,1644年至1911年。这一阶段的翻译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官方的翻译,中央下设的四译馆、西域馆和百夷馆都是组织翻译活动的机构。二是仍然兴盛的察合台文学翻译活动。总之,《西域翻译史》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分期合理,内容翔实,对于研究远古以来直至清朝的翻译活动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和翻译史、文化史价值,特别是对于"西域"这一重要地域的各种族、各民族的翻译活动研究极具参考意义。 (李宁)

汉籍外译史 马祖毅、任荣珍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年

本书是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之一,是国内比较系统地介绍汉籍外译历史的专著。其目的是全面地记述中国汉籍外译的渊源与发展、成就与不足及其对中外文化事业的影响和贡献,以促进汉籍外译事业的新发展。

全书共六章,基本上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按照时代先后顺序介绍世界各国的汉籍译介情况。第一章为绪论,首先考证了汉籍外译起于北魏,指出汉籍翻译的两个先决条件:书籍和翻译人员。接着论述了汉学研究的主要国家,指出汉籍外译过程中存在的几种现象:一是转译的普遍存在;二是除独立移译外,还有合作翻译;三是由节译到全译,由零星翻译到结集或全集型的译介,由随意的翻译到系统的翻译,翻译质量也由低到高,逐步臻于完善。最后指出汉籍外译对西方思潮和世界文学领域产生的影响。该书的第二章至第四章分上、中、下三篇,分别介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在国外的翻译情况。其中,第二章分三节介绍《四书》、《五经》等诸子著作的翻译,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著作的翻译及佛教、道教和景教等宗教文献资料的翻译。第三章包括第四节至第八节,第四节主要介绍历史书籍《史书》、《汉书》、《三国志》、《世说新语》一直到现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及中共人物传记等的翻译。第五节至第八节分别介绍历代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著作的翻译,以及音乐、书画、服饰、岩画等艺术作品和理论的翻译。第四章介绍文学作品和其他社科类著作的外译,其中文学翻译按照国别进行陈述,包括从欧洲到美洲、从东亚到西亚各国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情况。第五章主要介绍《梦溪笔谈》等自然科学著作的外译,并重点介绍了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著作感兴趣的两位西方科学界名人达尔文和李约瑟。第六章介绍中国国内外译汉籍的总体情况,按时间顺序介绍了从南北朝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的汉籍外译人员及其翻译活动。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一、时间跨度大。从北魏到新中国成立后,跨越了千余年。二、地域跨度广。从国内到国外,从欧洲到美洲,从东亚到西亚,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研究汉学的国家。三、材料丰富,史论结合。不仅有丰富的史料作为证据,而且讨论了汉籍外译对世界的影响。本书描绘出一幅逼真、细腻的汉籍外译的历史画面,对构建完整的翻译史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于2003年对该书进行了修订。 (陈明玉)

翻译文化史论 王克非编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年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将翻译置于文化史的大背景中,考察、研究翻译对目的语文化的意义与影响的论集。全书分为三部分:中国古代部分、中国近代部分和外国部分。书中通过对以往国内外关涉翻译文化史论题的著作和重要的文、史、哲著作的中外不同译本进行研究,考察翻译对于文化的影响和意义,翻译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作者特别考察了通过翻译摄取异域文化精华时,翻译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进而达到了什么样的目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作者将翻译文化史研究对象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中国翻译文化史,二是世界翻译文化史,三是比较翻译文化史。前两类是纵向研究,以主要的翻译活动划分历史时期。后一种属横向研究,包括对中国与日本 、中国与印度等在不同时期翻译和摄取外域文化时表现出的相同或不同的心态、结果、作用进行比较。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一、翻译文化史研究实质上是翻译史和思想史、文化史的结合,通过对历史上翻译活动的考察,研究不同文化接触中的种种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社会、语言、文学的变化,并探究它们在思想文化上的意义。二、翻译文化史应视为文化史的一部分。翻译沟通了两个或多个民族的文化,而翻译文化史则考察两种或多种文化如何发生交流,以及这种交流产生的因素、过程、结果和影响。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翻译文化史更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三、只有将翻译置于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其意义才能凸显出来。作者认为,翻译虽是两种语言文字间的转换,却代表和反映了社会的交往、文化的沟通与互惠互促。本书还精选了前人某些有价值的论述。概言之,本书既为我们认识翻译的文化价值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又为我们全面研究翻译目的、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之间的关系开拓了新的论域。 (黄荃)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郭延礼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

该书分为上、下两篇，共19章。作者首先在"绪论"中对中国翻译文学进行界定，认为"从科学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翻译文学'应当是指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据此界说，中国翻译文学当开始于19世纪的70年代"。上篇第一、第二章论述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脉络、发展阶段、主要特点以及文学翻译理论；第三至第九章根据翻译文学体裁，分门别类总结和论述中国近代翻译诗歌、翻译小说(含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翻译戏剧以及伊索寓言的译介等。下篇则详细论说各个时期重要文学翻译家的译介活动、译事主张与译品特点及其功用与影响。其中既有创作家兼翻译家的梁启超、严复、林纾、苏曼殊、马君武、曾朴、周桂笙、徐念慈、包天笑、周瘦鹃、徐卓呆、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等，亦有人们了解甚少、专门从事翻译而不兼创作的翻译家，如以翻译俄罗斯文学闻名的吴梼，以翻译侦探小说著名的奚若，以及翻译德国诗歌并出版《德诗汉译》的应时，翻译欧美小说的女翻译家陈鸿璧等。在本书的"结束语"中，作者还深入分析与论述了近代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文体类型的健全与近代化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指出翻译文学作品大大开拓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读者不仅可从翻译文学作品中了解到世界各国的自然风光、风俗民情，以及众多人物形象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从而在思想上受到启示和教育，而且也可从中学到许多新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诸如第一人称叙事、倒叙、插叙，以及环境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及至意识流写法，从而为小说创作的近代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如民主思想、自由平等观念、竞争进取精神)和艺术借鉴，并为现代作家的脱颖而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五四"时期一大批著名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冰心、庐隐、郁达夫、茅盾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近代翻译文学的影响。

该书是继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后该领域的又一力作，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研究项目，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学界的重视，并被许多高校列为中文系高年级本科生和各类研究生的教材和参考书。书中观点及史实屡被论者援引。(余烨，余协斌)

中国科学翻译史　李亚舒、黎难秋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年

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科学翻译历史的学术性专著，时间跨度从古代两汉时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涵盖中国2 000多年的科学翻译史。

全书分五大篇，共29章，第一篇"总论"对中国科学翻译史的研究对象、科学翻译的基本理论、中国科学翻译的发展、科学翻译学创立的设想这四个问题进行了系统性阐释。第二篇和第三篇为中国古、近代科学翻译史，内容涉及"汉至明初的科学翻译"和"明清两代的科学翻译"，分别介绍了我国古代、中古代时期科学翻译的历史和科技背景、千年译经运动、明初以前的科学翻译和明末清初外译汉的笔译、清末外译汉的笔译、明清科学翻译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科学翻译理论之发轫等七个问题。第四篇"民国时期的科学翻译"从六个方面回顾了民国以来我国现代科学翻译活动及其发展，重点介绍了这一时期翻译出版机构、科学翻译人才、翻译的主要成果、科学翻译理论方法、科学译名统一与双语科学词典等方面展开的活动及其成果，并将这一时期出版的近千部科学翻译著作逐一列出。第五篇"新中国的科学翻译"共12章，对中国当代科学翻译发展史进行了全面总结，按历史进程划分为艰苦创业发展(1949～1966)、"文革"动乱(1966～1976)和振兴中华(1977～　)等时期，并就科学翻译理论的发展、科学翻译人才培养、科学名词术语审定、口译的发展、机器翻译的发展、外国科学资料的汉译、中国科学资料的外译等问题作出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评述。

本书主要特点是：一、作者追根溯源，取精用弘，旁征博引，其时间跨度之大、史料范围之广，国内至今尚不多见，填补了中国科学翻译史上的研究空白。二、史料丰富，内容翔实，脉络清晰。全书以我国科学翻译发展的史实为经，以翻译活动的机构、人物、成果及影响为纬，全面展示了我国源远流长、千姿百态的科学翻译历史。三、评述中肯，不乏真知灼见。作为史书，本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简明而又珍贵的翻译史料，还通过作者生动的讲述，再现了往日译界群英的风采。书中很多独到的见解，例如对科学翻译的定义及其基本特征的描绘(客观性、规范性、科学性、现实性、继承性、快捷性、完美性、逻辑性)，对各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对科学翻译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的评述等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概言之，本书可使读者对我国科学翻译的来龙去脉及其发展进程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对中国科学翻译的产生、发展、地位、作用、规律及其成果有一个明确清楚的认识。对于想了解我国翻译历史的读者而言，特别是这方面的研究人员，本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案头必备书。(贾文波)

中国口译史　黎难秋主编　青岛出版社　2002年

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口译史书籍。自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翻译史的著作相继出现，但多限于笔译史，时代也多局限在民国之前。尽管一些著作中已出现若干口译的内容，如马祖毅在《中国翻译简史》(1984)及增订本《中国翻译史(上卷)》(1994)二书中，就分别介绍了"五四"前的不少口译史事，但内容基本上属于外交领域的译人与译事。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填补口译史研究空白的著作。

该书的特色是，以时间岁月为经，以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为纬，全面阐述我国的口译历史，彰显了我国数千年来广大默默无闻的口译人员在各个领域所

作出的重大贡献。全书共11章,466页,36万字。第1章至第3章记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在外交、对外贸易与军事战争中的口译史。第4章至第7章论述了翻译科学书籍、文学作品、佛教经典及课堂授课时的口译情况。第8章至第9章论述了中国人出国访问考察和外国人来华访问考察时的口译情况。第10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中的口译情况。第11章论述了历代培养口译人才的学校。书中不仅研究了我国早期直至明清两代借用懂汉语的外国人(包括外国商人、僧人、"质子"、官员、军人、战俘、传教士等)担任口译工作的历史及其利弊,还着力发掘并介绍了本国自己的口译人员在各种口译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中包括专职的口译人员,也包括非专职临时担任口译的人员。本书的重点是研究中国语言与外国语言之间的口译历史,但也涉及历史上少数民族语言与汉族语言之间的口译。

该书史料翔实,考察深入,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口译人物,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是一部研究我国口译史的必读著作。 (陈静,余协斌)

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 谭载喜著 商务印书馆 2004年

该书初版于1991年,2000年重印,2004年出增订本,共六章,343页,书末另有附录三个:"西方翻译史大事记""参考文献""重要人名索引"。该书采取西方常用的历史分期(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近代、现代)方法,以译事发展为经,以时代、国别为纬,史论结合,纵横贯通,对古罗马以来各个时期西方译事的发展变化、主要流派及其动向,以及相关历史事件作了简要的回顾,论及重要翻译人物近300位,重点介绍了较为杰出的翻译家和理论家的译事经历、代表译作和论著。该书增订版扩充了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至21世纪初的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不仅反映了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而且也展现了西方翻译理论在世纪之交蓬勃发展的最新面貌。作者不仅从"历时"的角度,分时期、分阶段对西方翻译的发展作了简要的回顾,同时也从"共时"的角度,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分为布拉格学派、莱比锡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交际理论派、前苏联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叙述、评论了各流派的代表人物、代表译作、思想观点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等。

第一章"绪论"概述了西方翻译的起始时间和理论发展的梗概与变迁,对几个主要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其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从历史的角度陈述了对西方翻译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二章为"古代翻译",探讨了自公元前3世纪《圣经》的希腊语翻译到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覆灭时止800年的翻译状况。第三章为"中世纪翻译",展现出一幅从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到15世纪文艺复兴时止的翻译历史画卷。第四章为"文艺复兴时期翻译",以路德(德)、阿米欧(法)、诺思(英)等十余位翻译家的翻译实践与翻译思想为主线,探讨德、法、英三个欧洲主要国家的译论译史。第五章为"近代翻译",以巴特(法)、施莱尔马赫(德)、德莱顿(英)、普希金(俄)近20位翻译家的翻译实践与理论为主线,论述了法、德、英、俄四个国家在17至19世纪间的翻译实践与译论发展。第六章为"现代和当代翻译理论",内容得到了很大扩充,既概述了现、当代的翻译实践(第一节、第二节),又以中欧、英、美、德、法、低地国家、以色列、前苏联等地的翻译理论为主线(第三节、第四节),具体而深入地探讨现、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与嬗变;最后一节"当代翻译理论"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新扩充的,不仅在时间跨度上从初版的20世纪80年代延伸至2003年,而且在空间范围上也扩展不少,同时增加了按流派分类讨论的内容,指出这个时期翻译理论发展的两个"质"的飞跃:一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由奈达等人把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概念引入当代翻译研究中,二是70年代与80年代由霍姆斯等人提出了把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理念。两次飞跃给翻译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该书是对西方翻译历史的重要探索,详略得当地记载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丰富成果和遗产,为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作者在对西方译事译论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评价。概言之,该书是一部理论性、系统性、实用性较强的译学著作,已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翻译专业研究生教学用书。 (张映先,肖才望)

3. 翻译教程

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 陆殿扬著 北京时代出版社 1958年

该教材分为上、下两册,每册各十章。上册先阐述翻译的基本原理,然后以此为依据分别就各种词类进行英、汉对比分析,讨论符合标准的译法,再进一步探讨词在句子中各种译法的灵活运用。下册先举出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确切翻译的意义,然后分别介绍翻译的六条重要原则:删略、增益、重复、转变、颠倒、否定。上、下两册均自成系统,并以理论贯串全书。为了阐释翻译技巧,书中多举实例。每章之后均附有大量英汉互译口、笔头练习。练习题材涉及范围较广,且由浅入深,由短而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时事、文学等内容,参差搭配,针对性强,书后另附答案。全书正文用英语撰写,为帮助学生理解,作者还加有大量的英语注释。教材内容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例句和练习大多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有较深的时代印迹,整体编排简约实用。

该教程初稿编于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国内各大军事院校英语系高年级试用,1956年经教育部批准,作为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材公开出

版。付印前曾经著名翻译家朱光潜和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详加审阅,签注修改意见。由于此前我国尚无此类教材,该书被誉为正规翻译教程的奠基之作,成为此后编著翻译教程的参考模式。

当然,由于时代背景的限制,特别是由于当时我国尚无系统全面的翻译理论资料可作参考,该教程在今天看来亦有诸多不足,如书中所述翻译理论原则多为技巧方法之类,对翻译理论的阐述比较薄弱,缺乏理论高度与深度,所举例句及练习参考译文亦多有可商榷之处,等等。但任何学科都是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肤浅到深入不断发展起来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应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数十年前的教材,而应充分肯定作者为填补空白所作出的努力和该书在历史上为翻译教学所作出的贡献。 (易奇志)

翻译的技巧　钱歌川编　台湾开明书店　1972 年

本书是作者英语翻译教学的一个总结,编撰前后达十年之久。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汉译英与英文句型,第二部分是英文惯用法及其翻译,第三部分是疑难句法及文章译例。这三部分中,第一部分是各式各样的英文句型的翻译,让学生熟悉英文的语法规则和句式,以补救英文基础较差的缺憾。第二部分的重点转移到英译汉,分门别类地介绍英文的惯用句,各种特殊的表达法,配以适当的汉译,加以详尽的解说,每种句法都附有习题,供练习之用,以便学生学完一种表达法后,随即进行习题练习。第三部分的主体以长篇的中译英和英译中翻译材料为主,既有英文类似句的研究,也有容易译错的文句以及正确的译法。中文材料有浅近的白话,也有深奥的文言文。英文材料的内容涵盖哲学、政治、语文、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以便译者可以接触到英文表达的各种风貌。

本书的特点有三:一是属于典型的词法、句法翻译教材。以传统的英语语法为基础,以词法和句法为线索编排全书的内容,用演绎法比较系统地归纳英语句式的构成,通过大量的联系和翻译对比,让读者自行学习翻译的技巧;二是重视两种语言的对比,强调语法的分析及翻译的对比,坚持翻译的准确性;三是注重实用性,密切联系英汉翻译教学,配以大量的翻译实例和练习,适合各阶段的学生学习。总的来说,该书既有理论,又有可操作性,而且又能针对具体的教学实际,有方法有系统地研究翻译,这些特点在当时均具有开拓意义。该书后于 1980 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重印,1981 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印。

(张沉香,黄荃)

英汉翻译教程　张培基、喻云根、李宗杰、彭谟禹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0 年

该教程是我国 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部翻译教材,系当时国家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组织编写,由国内十多家外语院系的知名专家审定后出版,作为国内许多高校英语专业本科生的翻译教材,并沿用至今。该书自初版以来已 32 次印刷,印数达 100 多万册。

该教程共分六章。第一章简明扼要地介绍我国的翻译史;第二章提出若干关于翻译的根本理论问题:翻译标准、翻译过程以及对译作的要求;第三章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概括性的对比,揭示其异同,着重指出其相异性;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通过大量译例介绍英译汉常用的 15 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各章节后配有大量单句练习,书后另附 36 篇英语短文翻译作业及参考译文。这些短文及译文不仅语言优美,而且体裁多样,风格迥异,不仅可让学生领略到英语的美妙,而且还能感悟到翻译的精彩。编者较为全面而系统地阐述翻译方法和技巧,并通过广泛的反复练习,让学生学习翻译知识,培养翻译能力,掌握翻译技巧。

该教程具有以下特点:一、采用以句子为单位的翻译教学法。作者通过比较研究英汉两种语言在文字上最普遍、最典型的特点和差异,提出几种适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供学生在翻译课实践中根据原作具体思想内容加以采用,对于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大有裨益。二、例句丰富,选材范围广。教材中大部分所选例句和练习来自国外出版的书刊、杂志,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外交等多方面内容。三、分类清晰明了,译例翔实,注重翻译的方法和技巧,少有空泛的理论阐释。四、多种题材、体裁和风格的文本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代表性,能够激发学生的翻译欲望。五、适应面广。该教程的主要对象是英语专业翻译课程学习者,但因其体系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也受到国内许多英语爱好者和翻译工作者的欢迎,将其列为学习英语和翻译方法及技巧的必备之书。

该教程自 1980 年初版以来,几乎年年再版,但从未修订。在我国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革、国内外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取得巨大进展和成就的今天,该教程显然存在内容老化,信息过时,有些译文的词语搭配不当等瑕疵,但它对我国翻译工作及翻译教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曹志希,易奇志)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　柯平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该书的编写基于对翻译研究的两点认识:一、翻译研究虽与许多学科密切相关,但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探索领域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比较文学"或"应用语言学";二、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讨论带有浓重的随感式与印象式色彩,现在是突破这种局面的时候。编写此教程的目的一是为了改变当时翻译界围绕一些内涵界定不清的概念(如"直译"和"意译")争执不休,而忽略整体研究的现象;二是为了在探讨与解决问题时大家能抱有某些基本的共识,即翻译研究须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必须条理化和系统化。

该教材共四章,每章分三至五节。第一章探讨翻译对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翻译

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以及翻译的概念与译者应具备的三方面条件等问题；第二章引进符号关系中的语义关系、句法关系和语用关系三个方面的理论，提出符号学的翻译原则：在目的语句法和惯用法规范以及接受者能够接受的限度之内，采取适当的变通和补偿手段，以保证上下文中最重要的意义优先传译为前提，尽可能多和正确地传递源语信息的多重意义，争取原文和译文最大限度的等值；第三章重点阐述翻译过程中"理解"和"传达"这两个重要的环节，科学地分析在对原文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恰当地表达以及理解与表述之间的关系问题；第四章从言内因素、言外因素和译者有意或无意遵循的翻译原则三方面来剖析翻译错误的原因。作者首次把英汉和汉英翻译问题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以期用统一的符号学意义理论把英汉与汉英翻译中的主要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与方法组成有机的整体，让读者更清楚地理解英汉两种语言内部和语际之间的转换规律。与其他翻译教材不同的是，该书各章节后未附练习，只在书后配有英汉翻译和汉英翻译练习十篇。

该教材具有如下特点：一、内容新颖独特。作者运用符号学的观点来研究翻译的过程，以理论贯串全书，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阐述翻译过程。二、兼具较高的理论和艺术价值。作者认为，翻译不但需要工匠的技巧和汗水，而且需要艺术家的灵感和良知，通过变通和补偿手段来设法调和科学和艺术的矛盾，达到科学和艺术的统一："理解"需要科学的技巧，而传达需要更多的艺术，因此全书已脱离翻译教学的一般特点。该教程自1993年出版以来已十余次印刷，是一部颇获好评的翻译教材。 (曹志希，易奇志)

新实用汉译英教程　陈宏薇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

本书主要介绍汉译英的基本方法。作者以语言的社会符号性为基本原则，以汉英两种语言对比为核心，融合符号学、社会符号学、对比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文体学、篇章分析学、文章学、修辞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从词、句、段和篇四个层面讨论汉译英过程中正确理解与贴切表达原文的方法与途径。书中将翻译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旨在帮助读者掌握西方思维方式和汉英两种语言的异同，从而有效克服汉译英遣词、造句、谋篇过程中常遇到的障碍。

前言和第一章概述译学中涉及的符号学基本知识和相关概念，指出作为汉译英的理论基础，符号学对翻译研究与实践有着重要指导作用。第二章主要介绍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沿革以及如何运用该方法实现编者提出的翻译标准。作者首先引用奈达的观点，对翻译的性质进行界定，继之以孙犁所著《"藏"》的英译本来解释翻译的全过程，即准备、工作和校核，阐明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然后归纳古今中外众多翻译名家对于翻译标准的评判，分析各自的利弊，并指出这些差异是由译者的社会地位和语言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作者认为，翻译的标准应该是：意义相符、功能相似。最后借严复之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说明译事工作的艰难，强调译者的素养对于翻译实践的重要性。作者认为，译学是杂学，译家是杂家，提倡翻译工作者虚心学习，大胆实践，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在第三至第六章中，作者用大量篇幅分别从词语处理、句法处理、段落及篇章处理等方面具体阐述翻译技巧在实践中的运用。该部分通过对翔实的译例和精确细致的分析解说来帮助读者巩固加深对翻译理论的认识，从而掌握翻译技巧，培养翻译能力。作者强调，社会符号学可作为翻译学的重要基础理论，因为它有利于将其他学科知识熔于一炉，用以再现语言的意义（指称意义、言内意义、语用意义）与功能（信息功能、表情功能、祈使功能、美感功能、应酬功能与元语言功能）。

该书融合多种学科的基础知识来分析讲解译例，且译例多取自较为时新的有代表性的报刊、杂志和小说等出版物，新颖实用，有利于举一反三。多数译例均辅以分析解说，言简意赅，有利于启发思维。书中练习由浅入深，文体多样而实用，并附有参考译文。本书对从事语言研究或学习的教师和学生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对于爱好英语的非专业学生和英语自学者也大有帮助。在国内大部分翻译研究工作者专注于外译汉领域的情形下，该书的出版就显得更为重要。 (毛帆陵，范武邱)

英汉翻译教程　庄绎传编著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年

全书分为10个单元，共30篇课文，30篇练习，每单元课文、练习各3篇。各单元课程内容分别为：故事翻译、历史题材翻译、地理翻译、经济类翻译、文化翻译、文学翻译、科普翻译、法律翻译和演讲词翻译，每课先提供英汉、汉英对照文章各一篇供读者阅读，着重英汉语篇对比。作者在每单元安排一则"译学点滴"(1～4单元)或"翻译理论简介"(5～10单元)，介绍翻译理论常识。各单元结尾还附有"小结"，对课文内容予以归纳。

本书主要特点是：一、体裁丰富，涉及面广，内容涵盖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文学、科普、法律、时政等多个领域，有小说、散文、时政文章、科技小品文、工商经济文件、法律文书、合同、中外政要演讲，等等，反映了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紧跟时代发展。二、编排合理，配置科学，理论与实践结合，并有配套辅导教材。理论介绍不局限于一家之言，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并举，给读者以简明清晰的概念。课文和练习篇幅与难易度适中，针对性较强，且英汉、汉英翻译内容分布比例适当。三、选材精良，不论课文还是练习，所选材料不乏上乘之作，特点鲜明，内容生动，能给读者以不同的体味和感悟。四、集词法、句法、语篇翻译为一体，有机相连，打破了传统单句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将翻译技巧的运用置于完整的语篇

之中,语篇与单句讲解相结合。作者还将理论部分化整为零,穿插于全书各章节,形式活泼,简短易记,给授课教师提供了充分的回旋余地。

该教材一反惯常单纯以技巧或理论阐释为主线的章节划分方式,宏观知识与微观技能并举,论述与文本分析、要义与基本常识有机结合,注重实践和能力培养,对爱好翻译、学习翻译的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好教材。该书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曾多次再版。 (贯文波)

中国翻译教学 穆雷编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年

本书正文三章内容为:中国翻译教学的历史、中国翻译教学的现状和翻译教学的改革。第一章通过对中国翻译教学历史的考察,探寻中国翻译教学的历史渊源,分析中国翻译教学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具备的特点,从而为中国翻译教学进行正确的历史定位,明确其自身的发展基础。第二章从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师资培养、教学方法、口译教学、翻译测试和教学研究等八个方面对中国翻译教学的现状进行系统的分析梳理。作者首先对翻译学科的归属与定位、学科建设的规划与管理、翻译人才培养的机制、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教学的互动关系、翻译教学的方法论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从事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的人们所关心的许多问题,始终抓住"翻译学学科建设"这个根本问题,从多个角度对涉及翻译教学的主要问题进行全面的观察与分析。第三章讨论翻译教学改革的有关问题,包括提高认识、重视理论、重视信息社会对翻译教学的影响、博采众长等建议措施。书后有翻译论著书目选录、翻译教学研究论文选录、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题目选录、翻译专业简介和重要的翻译研讨会论文选录等附录,为从事翻译教学及其研究的广大师生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许钧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把本书的研究思路和目的概括为:梳理历史、分析现状、立足改革、促进教学。他认为:"没有空泛的言论,也没有主观的臆断,每一个观点的提出,每一个问题的分析,都有丰富翔实的资料和多方面的调查作为基础。"他还认为作者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表现出宽阔的学术视野,在对中国翻译教学现状的分析中,善于吸收外国翻译教学研究的成果,没有孤立地就翻译教学论翻译教学,也没有陷入中国翻译教学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的纠缠之中,而是始终把握翻译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这一系统工程的内在联系,在对涉及翻译教学诸方面问题的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成功的经验,进行理论的梳理,着力于理论升华,为翻译教学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与措施。

英汉翻译教程 吕俊、侯向群编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年

该书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国首套"高等院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之一。作者对翻译学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在注意吸收传统翻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融入了很多新的思想、观点和内容。全书以传播学的框架结构将翻译总体论、本体研究、载体研究、客体研究、环境研究、主体研究、控制研究及效果研究等八章内容归于其中,涉及翻译学的多个方面。

该书共八章,每章分若干个小节。其突出特点是:一、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作者从翻译的本质入手,将建立翻译学的各个分支体系,按照传播学所提供的理论框架进行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在书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以语篇例证为主,题材涉猎广泛,其类别有诗歌、散文、小说、时事、法律、科技、写景等。作者对其中某些语篇列出几种译文进行分析和比较,让读者了解不同的译者对同一原文有不同的理解、翻译和传达。每章后配备有思考题与讨论题,以利读者进一步加深理解和记忆。二、编排体例规范化。作者参照国家标准局的有关标准以及国际上的通行体例进行规范,在书的每一章后列出进一步阅读的书目,为读者提供可资参考的线索和材料,便于读者"按图索骥",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相关内容。这样人性化的设计有利于培养读者的研究能力,提高思维水平。三、内容广,思想新,寓繁于简,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作者根据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将当代语言学与翻译研究、中西方翻译理论有机结合,破除传统翻译研究的束缚,从全新的视角来诠释当代翻译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故该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继承性,更重要的是开拓性,使它更适用于有一定翻译理论基础和研究能力的研究生,是近年来我国出版的一部较为重要的翻译教程。

21世纪的翻译研究已走出传统翻译研究的阶段,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该书的出版为我国翻译学的建设和翻译教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王小凤,易奇志)

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 庄智象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年

翻译专业是2006年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本科新专业。本书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翻译专业建设的专著,对这一新专业作了多层次、多学科、全方位的描写和研究,内容包括翻译学的理论与范畴、翻译专业的定位与任务、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规格、教学原则与大纲、课程结构与特点、教学方法与手段、师资要求与培养、教材编写与出版等。作者广泛借鉴国内外翻译教学经验,深入分析我国翻译专业本科的现状,阐述了翻译教学和专业建设的新观念、新思路,并提出了多条具体的措施和建议,具有较强的开创性和可行性。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运用需求分析的相关理论,论证翻译专业的建立符合国际一体化趋势和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社会需求、学习者的个

人需求和翻译学科发展自身的需求；剖析翻译专业建设学术理论意义与实践应用价值；简要地阐释我国翻译专业建立的历史过程与基本情况。第二章为翻译专业建设研究文献综述与元研究。首先界定了元研究，将学术活动划分为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两类，同时对国际国内的前期研究成果（如论文、著作、课题等）和相关学术交流（如翻译研究组织、机构、研究活动、主要杂志等）进行分析评述。第三章主要为翻译专业建设的相关理论分析。在评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几对容易混淆的基本理论概念进行剖析，如翻译、翻译学与翻译专业，翻译教学与教学翻译，翻译能力与翻译培训等，尝试提出自己的界定与看法。第四章为翻译专业的比较研究及问题。在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如加拿大、法国、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等翻译专业设立状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我国翻译专业建设现状，指出我国翻译专业建设的问题。第五章为我国翻译专业的定位与任务。主要涉及翻译专业科学、准确、合理的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模式、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等。第六章为我国翻译专业的教学与评估。对翻译测试与评估的宏观体系与微观方式进行探索性研究；探析翻译教学大纲等。第七章为结论。在总结本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翻译专业学科建设提出建议，分析本研究的长处和所存在的不足。（张顺梅）

4. 翻译批评

林纾的翻译　钱锺书著　商务印书馆　1981年

这是一部集翻译批评与理论建树于一体的著作，可视为钱锺书的译论代表作。全书文字不多而意义深远，广为译界同仁所称许。该书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评论林纾的翻译。在我国历史上开文学翻译之先河的林纾及其译品，钱锺书之前曾有不少论述，但均不及此书全面、深刻和客观、公正。书中引录大量具体译例，分析考评林纾的翻译，指出林译小说在历史上所起之“媒”与“诱”的作用，以及林译对钱本人的影响，认为至今“没有丧失吸引力”；剖析论述林译小说中由于口授者和林纾本人的双重原因而出现的种种错讹、删节和增补；指出林纾译书所使用的语言并非一般人认为的古文，而是“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指出林译小说前优后劣并分析其原因；最后论及林纾因其译绩显赫而获得康有为“译才并世数严林”的赞誉，而林纾本人却重文轻译，自负为“古文创作”的“文雅雄”，看轻“非自家物事”的翻译。总之，正如罗新璋所言，钱锺书这篇译评，“妙绪纷披，胜义络绎”，极富“深思创见”。

二是提出自己的翻译见解。该书在评析林纾译品的同时，将翻译的性质、功用及难以避免的毛病和作者向往的最高境界一一透示出来。作者认为，翻译是居间者、联络员，起“媒”与“诱”的作用；翻译难以避免的毛病是“讹”，即译文相对于原文而出现的“遗失”“损伤”“失真”和“走样”；翻译的最高境界则是“化境”，即“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样的译品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且“读起来不像译本”。但钱锺书又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在这里，钱锺书将自己的译学主张归结为一个“化”字，可谓“言高而旨远，辞约而义微”。“化境说”一出，即颇多称引，因为这个“化”字，既关联翻译的性质、定义，也关联翻译的标准与要求；既是译者应追求的“最高理想”，也具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丰富的内涵值得人们深入挖掘与领悟。此外，钱锺书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个独特新颖的看法，即将翻译分为“好翻译”与“坏翻译”两种，“好翻译”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引诱读者抛开译本读原作；“坏翻译”的作用是“消灭原作”，“破坏原作的名誉”，“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关于翻译的这一作用，我国译界此前似无人提及。

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发前人所未发，特别是其“化境说”将翻译从美学的范畴推向艺术的极致，成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张峰，佘协斌）

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　袁锦翔编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0年

该书为研究名家翻译的论文集，收入著者的35篇论文。头两篇是理论文章，第一篇略论我国名家翻译的研究，第二篇论佳译赏析，提出了翻译美学的一些原则，分析了翻译赏析的过程与标准。其余各篇分别评论、赏析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著名译家林纾、严复、梁启超、辜鸿铭、鲁迅、郭沫若、李达、林语堂、茅盾、郑振铎、闻一多、巴金、朱生豪、杨宪益以及汉学家傅兰雅(Fryer)、理雅各(Legge)、翟里斯(Giles)、韦利(Waley)等30余人的翻译理论或译作(所译原作绝大多数是世界名著)。论文涉及多种题材、体裁，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科技、历史、哲学、经典著作等。有些文章研究与赏析结合得比较紧密，研究中有赏析，赏析中有研究。作者写作此书的指导思想是把名家的翻译论述、传译经验条理化，使广大译者译有榜样，学有楷模，进而提高翻译审美意识与鉴别能力。

此书是开创性专著，多篇文章填补了译学研究的空白。出版后颇获国内外学术界好评，认为著者在名家翻译研究这个领域里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些大学指定该书为英语专业研究生翻译课教学用书。该书突出了篇章的翻译，把翻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对名家的典型译例进行了剖析，读后受益匪浅。

此书于1990年9月参加了北京第三届国际书展，1992年2月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

（陈袁菁）

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　许钧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

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文学翻译批评专著。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股外国文学名著复译热,仅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当时就有15个中文译本,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持续半年多时间的《红与黑》汉译大讨论,参与者在多种报刊杂志上以专论、书信、对谈、调查等形式,对《红与黑》汉译,进而对当时读书界与出版界共同关注的外国文学名著复译,以及翻译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文学翻译等值与再创造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引起了国内读书界、学术界、出版界、新闻界乃至海外学界的极大关注。

本书编者参与了讨论的全过程,将这场讨论的主要争鸣文字与研讨文章汇编成此书。全书分上编(讨论)、下编(专论)和附录三部分,共315页,27万字。书中不仅收录了《红与黑》汉译读者意见征询和316份反馈意见的综述,还汇集了部分《红与黑》的复译者与活跃在当今译坛的翻译理论家们的研讨文章,共计45篇。书前另有编者的长篇"代引言",内容涉及文学翻译的目的、层次、方法、标准、风格、忠实与再创造、名著复译的苦与忧以及文字、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各位论者讨论争鸣时既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又直抒己见,观点鲜明,充分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与风气。

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借《红与黑》复译的讨论,集文学翻译研究与批评于一身,既宏观又微观,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具体实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后期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繁荣景象。

（陈静,佘协斌）

英美名著翻译比较　喻云根主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

本书是一部比较评析英美名著不同译文的文集,收录的译品原文涉及多种体裁: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共14篇。每一篇包括作品原文、各种译文、作者简介、译者简介、原文简介、译文比较评析等内容。书中所选原文和译文多出自有名望的作家和译家之手,具有一定的讨论价值和相当的难度。

本书的特点在于紧密联系翻译实践,总结译界名家的宝贵经验,探讨翻译过程的基本规律,为促进翻译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与一般的译文评析不同,本书并不局限于指出译文是"对"还是"错",而是对其之所以"对"与"错"进行深刻的剖析,对译文中表述欠妥当之处,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译者和读者的心理状态,考察其原因。进行译文评析时,作者先进行文学分析,然后再进行具体的语言分析,对译文的总体感觉进行考察。此外,本书还将局部评价和整体评价结合起来,站在整体的高度来分析局部是否恰当合理。这样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分析,有效地避免了片面的评析。为了保证译文评析客观公正,本书从多视角、多学科地对译文的得失优劣进行全面透视,从而避免个人的好恶和偏见。本书坚持的观点是:译文的好坏并无绝对标准,孤立看来"好"的译文,比较起来可能会发现还有更好的译文;孤立看来"不好"的译文,比较之后可能会发现它还是"较好"的。对译文的比较评析可以使译文在各个侧面、各个层次上优劣互见,瑕瑜分明。单篇译文评析,往往止步于译者用什么手法达到什么效果。不同译文的比较评析,可以看出不同的译者如何运用相同或不同的手段来处理同一语言现象,达到相同或不同的效果。这对研究翻译方法、建设翻译理论都有重要意义。

翻译批评是翻译实践的有益参照,是译作价值的重要呈现形式。作为译学研究领域既薄弱又敏感的一个课题,由于标准尚未确立,翻译批评往往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近年来,虽然在翻译批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对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也存在对翻译批评的基本范畴界定不严格、对基本理论研究不够等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对翻译批评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本书比较评析英美名著的不同译文,实际上也是翻译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出版以来受到翻译工作者、高校英语教师、相关专业研究生和业余英语爱好者的喜爱,并被多所高校指定为翻译专业研究生的参考用书。

（王华玲,屠国元）

翻译名家研究　郭著章等编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

本书共收入了20位作者的专题论述。全书共分为15个章节,根据出生年月和从事译学活动的先后,依次介绍了当代中国16位在翻译业绩方面有特殊贡献,并且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翻译名家。他们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林语堂、徐志摩、茅盾、梁实秋、钱歌川、张谷若、巴金、傅雷、萧乾、戈宝权、王佐良和许渊冲。每一章的结构大体一致,首先介绍译家的翻译生涯,然后详细分析译家的翻译理念与特色,并举例予以佐证,最后列出该译家的译事年表,记录该译家各个时期的代表译作以及翻译成果。尽管各章节布局有相似之处,写法却不拘一格。通读本书后,读者对于近当代中国翻译概况将有更为全面具体的了解;对于深刻影响中国译界的翻译名家及其理论实践,也会有更加清晰透彻的认识。该书还有利于读者对各译家进行客观的比较与分析,从而把握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同时作出恰当的评价与总结。

概括起来,本书有三个特点:一、选材方面重点突出。国内读者都已相当熟悉的译家及其思想,书中便不作赘述;而对于国内读者来说相对陌生的译家,如长期身居港台地区和海外的林语堂、梁实秋、钱歌川和胡适,则予以翔实的介绍以及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于他们的生平、背景、翻译生涯以及主要译作,书中

都有详细的记录，如梁实秋一章中关于20世纪30年代那场关于翻译标准的论战就单独列出一节。本书还不局限于英汉翻译研究，对于法汉翻译名家傅雷、俄汉翻译名家戈宝权，同样予以研究与述评。这样无疑填补了有关这些译家信息的空缺。二、内容论述全面深入。对于每一位译家的译作及翻译理念都进行了细致的发掘与淘炼；对于他们的翻译渊源、特点和发展都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从而使得本书有条有理地呈现各译家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全书给读者提供的不仅仅是对于各译家大而化之的介绍，而是基于大量材料进行研究后的成果，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和探索价值。三、本书不仅记录各译家的翻译思想与实践，同时还作出相当精辟的评价。可贵的是，这些以实际的翻译文本为基础提出的独到见解，不仅体现在对译者及其译作的溢美之词上，而且对其不足、局限及可商榷之处予以中肯的分析评介，提出自己的观点与建议，纠正某些错译。本书提供的详尽信息与评价，对于提高读者的欣赏、实践水平，帮助读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付臻，范武邱）

中西诗歌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　辜正坤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翻译标准问题是翻译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本书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诗歌翻译实践经验，结合中国诗学传统，提出一套关于诗歌鉴赏和诗歌翻译标准的理论。全书共四卷22章。卷一为中西诗歌鉴赏与比较理论；卷二为中西诗歌鉴赏举隅；卷三为翻译理论与技巧；卷四为翻译与学术文化。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一、探讨中西诗歌鉴赏理论。作者根据汉语语言特点，分别从视象、音象、义象、事象和味象等五个方面，向读者展示汉语诗歌的奥妙，提出汉语诗歌鉴赏五象美论；在中西诗歌比较鉴赏中，必须考虑时间、空间、作者、作品、读者、年龄、性别、社会文化、阐释者和译者十个方面的因素；诗歌具有纯审美性、娱乐性、教谕性、认知性和实用性五大功能，作者借用这些功能作为中西诗歌鉴赏的五大标准；作者还运用中国传统的阴阳理论归纳出中西诗歌阴阳论，勾勒出东西方诗歌历史中的阴阳性七大潮。二、提出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作者从哲性多元认识论角度，尝试建构一套翻译学科的普遍理论即玄翻译学理论，提出翻译的标准系统：绝对标准（原作）——最高标准（最佳近似度）——具体标准（多元分类）。由于翻译的功能表现为模拟信息、揭示思维模式、审美娱乐性、丰富目的语和目的语国家文学和文化，以及缩小世界语言距离等五大方面，又由于译文的读者不同，译者的审美情趣各异，具体标准必然会多元化，各种标准相辅相成，补充完善，可弥补单一标准的缺陷。三、讨论学术界的经典话题。作者从翻译学科的建设、翻译与文化、翻译与学术等各个角度讨论翻译界的经典话题，指出当代译坛、译道、译论的弊端，举隅说明诗歌和散文的翻译对策；提出外来术语翻译与中国学术的建构问题；此外还讨论了翻译与外语学习以及翻译与文化输出的关系。

作者充分吸收外来学说，并与中国历代文论精华相结合，抓住东方诗歌和西方诗歌的传统，系统全面地构建出诗歌美学框架，初步建立起一个诗歌评价和翻译的理论体系。（吴泳）

翻译批评导论　杨晓荣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年

我国的翻译批评历来以感性批评、印象式批评为主，缺乏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理性探索，而且方法也比较单一。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翻译界开始对这种状况予以反思，陆续出版了一些以翻译批评为主题的书籍，但仍然缺乏对翻译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全面梳理。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该书的主要特点是：一、从廓清与翻译批评有关的各种基本概念入手，全面梳理翻译批评基本理论，使之形成一定的体系，为建立本体论意义上的翻译批评基础理论作了一些开创性工作；二、从认识和观念入手，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与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有关的种种问题，形成具有哲学色彩的翻译批评标准论。作者在这一方面的主要观点是：摒弃翻译标准问题上的二元对立绝对化思维方式，关注两极之间的“第三种状态”，即在翻译中追求诸多因素制约下的平衡和协调；强调条件即制约因素对形成和实现翻译标准的重要意义，主张特别关注这些制约因素的性质和作用方式，并以此作为制定翻译标准的依据；三、本书以翻译批评理性化为基本的指导思想，特别强调翻译批评方法论的重要性，从技术层面和学科层面对翻译批评方法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探讨，体现了翻译研究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质。

作为我国第一部翻译批评理论专著，该书出版半年内即再次加印，当年即被选送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并为国内多家高校选为翻译方向研究生必读书。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　王宏印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年

作者借鉴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建构体制，参照多学科关照的广阔学术视野，综合性地审视当前典型的文学翻译现象，提出鉴赏性和研究性相结合的文学翻译批评概念，初步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框架。全书正文包括九章：第一章绪论提出建立文学翻译批评的七个条件，以克服翻译批评的无序状态和翻译无批评的放任状态。第二章考察西方的批评概念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传统，审视当前中国翻译研究的三大转向与建立翻译批评的学理基础。第三章从正面进入翻译批评的性质界定、类型划分和功用发挥，扩大了翻译批评的概念和关注的范围。第四章结合文化的分层概念和多学科交叉关联，论述翻译批评的主体建设、批评方法与操作程序，并

提出一系列基本的方法论原则。第五章继承中国批评传统讨论翻译批评的原则、标准和分级评价等问题,提出了一个尝试性的译作评价范例体系。第六章吸收现代西方文论研究翻译批评的文本、文体和互文性问题,肯定了翻译中的文体变异概念和上升与下降的变通倾向。第七章考察文学翻译批评的文化参与和跨文化交流问题,提出了古本复原、往复翻译、无原文的回译等新的翻译类型,并讨论了翻译批评的读者反应问题。第八章结合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写作规范,讨论文学翻译批评的六种写作类型。第九章回顾中国翻译批评的优势和劣势,结合翻译学典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考察翻译批评在译学建设总体中的学科地位,展望翻译批评的发展前景。本书的写作构思一方面满足了博士生开课的需要,以古今诗歌翻译鉴赏为原型启发,兼顾理论建构性和学术批判性的双重品质;另一方面结合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模式,吸取西方现代文论与译论研究成果中的合理因素,建立了具有可操作性基础的翻译批评机制、分级评价系统和批评写作范式。本书在修辞风格上采用散点透视和系统构建的双重策略,吸收文学批评、文学评论和文化研究的表述方式,探讨文理科的基本学理和方法论结合的可能,旁涉读者反应、意识形态、文本批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判等领域。鉴于文学翻译批评是一个新兴学科,正文之外还插入了若干内容新颖的附录,补充了必要的知识背景和伦理规范,使得本书内涵愈加丰富。本书可视为作者建立新译学的系列探索性成果之一。

5. 翻译研究

繙清说　魏象乾著　清朝乾隆五年内府刻本 1740 年

这是作者的一篇翻译专论,由于是清廷内府刻本,相当于今天的单行本,故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部翻译研究单篇专著。作者魏象乾的籍贯与生卒年不详,据考证为乾隆四年(1739 年)满洲进士,曾参与清雍正朝实录的满文翻译工作,是一名"御用"的专业翻译工作者。《繙清说》全书共六页,约 1 600 余字,论述翻译的原则、标准,以及初学翻译者如何入门与提高等问题,是作者本人"攻苦多年"的翻译经验总结,亦是对我国古代"翻译之道"的精彩小结。该书由我国著名语言文学家刘半农于 1932 年发现于旧书店,他认为该书"持说乃多与今世译人不谋而合,是固译界一重要史料也"(转引自王若昭 1988)。这本书现珍藏于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为海内孤本。《中国翻译》杂志曾于 1988 年 2 月披露其全文。

《繙清说》一书的精华在于作者首先提出了"正"译标准:"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意,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也。"这段精彩精练的论述,是非常符合现代翻译标准的,即译文须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再现原文的话语风格。但是作者又并非绝对地、形而上学地看待这个正"译"标准,于是他又写道:"间有增减、颠倒与取意者,岂无故而然欤? 盖增者,以汉文之本有含蓄也,非增之,其意不达;减者,以汉文之本有重复也,非减之,其辞不练。若夫颠倒与取意也,非颠倒则扞格不通,非取意则语气不解。此以清文之体,有不得不然者,然后从而变之,岂恃此以见长哉?"本书的第二部分通过对原文(满文)和译文(汉文)的词汇与语言结构特色比较,对当时满译汉文经典的翻译水平进行了评述。最后介绍了作者自己的翻译经验,建议初学翻译者通过对照阅读、熟读强记等方法,循序渐进地掌握翻译技巧。

这部翻译专论出版之前,我国的翻译研究多是零星、片断的议论。该作的出现要比其后马建忠与严复论翻译标准早 100 多年。虽然由于是内府刻本而被尘封 200 年之久,但其意义不可低估,值得译界认真挖掘其深义(转引自陈福康 2000: 74～78)。

(余协斌)

翻译学通论　蒋翼振编著　上海美利印刷公司 1927 年

作者蒋翼振,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任安庆圣保罗高级中学校长,执教翻译学课程。本书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版。

全书十二章,首末两章系作者自撰,其余十章均直接引用名家之作,每章前有名家简介,章末有思考题若干。十二章的目录为:第一章"导言";第二章"梁任公佛典之翻译";第三章"清吴势父与严几道论译西书";第四章"清严几道《译天演论例言》　清严几道群已权界论译凡例";第五章"梁任公论译书";第六章"胡以鲁论译名";第七章"容挺公致甲寅记者论译名";第八章"章行严答容挺公论译名";第九章"胡适输入学理　胡适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第十章"傅斯年译书感言";第十一章"何炳松、程瀛章外国专名汉译问题之商榷";第十二章"蒋翼振翻译学概论"。新词的定名是当时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从蒋翼振编选的译论中可反映出来。书中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十一章都专门讨论译名问题,包括译名原则、定名策略、音译方法、地名人名之类的专名等,第四章中的"清严几道群已权界论译凡例"实际上也是讨论译名问题的,其他各章也各有所涉。

第十二章《蒋翼振翻译学概论》占 1/4 篇幅,共分五讲。第一讲"译学家的通病",包括对不求甚解和粗制滥造译者的批评,对"好空言不务实"的空头批评家的批评。第二讲"译者未译书以前应有的预备",强调要熟习汉文,精读原文,特别要注意虚字的用法,弄清词源,善用辞典等。第三讲"译书时应有的设备和态度的商榷",包括翻译动机、翻译目的、翻译标准、选书、忠实原文及"达""雅"诸问题。第四讲"译者译完

后的改正和试验”，包括改正谬误、默诵译文、征求意见等。第五讲“译学泛论”，包括译书先浅后深，结合特长，循序渐进，追求真善美等。

作者在本书第五页对“翻译学底我的定义”描述为：用乙国的文字或语言去叙述甲国的文字或语言；更将甲国的精微思想迁移到乙国的思想界里，不增不减本来的面目；更将两国或两国以上底学术作个比较研究，求两系或两系以上文明的化合，这个学术，叫做翻译学。这段话以分号为界，表明三层意思。第一层说明翻译是语言文字的转换，第二层进一步说明翻译是“精微思想的迁移”，内容上不增不减。这两层意思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上对“翻译”予以界定，并为定义翻译学作舖垫。第三层意思是翻译学就是学术——包括对两国或两国以上的翻译学术作比较研究和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文化系统的相互借鉴和融合。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有言：“翻译学当然以译学原理和方法为重要。”可见，作者的“学术”主要指译学原理和方法。

综观作者的翻译思想，虽然重视译学理论和经验对于译者的指导作用，具有当代译学的萌芽，但受时代所限，作者所缺的是翻译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不过，在翻译学的一张白纸上，作者在80年前已画上了浓浓的一笔，不能苛求了。可见，翻译学不是舶来品，我国译界先贤早有研究，并早就开设了名为翻译学的课程。但是，一直以来，执著于传统文论、崇尚实践经验和感悟的我国学者艰难地探索，此后较长时期内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张顺梅）

翻译研究　思果著　香港友联出版社　1971年

这是散文家兼翻译家思果的一本关于翻译的著作。该书从具体的翻译实例出发，根据翻译操作的程序，探究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全书正文共23章，主要内容如下：一、讨论翻译的一般原则和方法。作者认为，翻译的原则是“信、达、贴”，初学翻译的人，先不要求译文的精彩，而是要求贴切。评价译文好坏的标准有三个等级：像中文；过得去（还可以读懂）；不是中文。与此相关的是对待翻译的两种基本态度：一种主张译文要像中文；另一种主张译文就是译文，不一定像中文。为了写出纯粹精妙的中文，作者强调翻译应该是一种创作，需要译者极大的创作才能，甚至认为“翻译不是翻译，是重写”。二、提出英译中的六项基本条件：能用中文写作；懂得英文；有治学训练；对文字敏感；有想象力；勤劳精细。三、在讨论翻译的要点时，提出七大戒条。作者认为，切不可译字/词，要译意，译情，译气势。翻译是译句，句子是活的，字/词是死的，字/词必须在句中，在上下文中才会有生命。文字上的直译、硬译、死译，是假精确，不是真精确。四、面对当时欧化的中文横行，拙劣不堪的翻译影响到一般写作的现象，出于对中文纯洁度的保护和爱惜，作者特意提出“中国的中文”这一观点，从而回应了译文要像中文的主题，因为当前的许多文章，虽然是用中国字写就，其实已不是纯正的中文。针对畸形欧化的种种病态，作者作出精细的诊断，提出具体的治疗方案。究其病源，这些都是劣译导致的恶果。

本书的特色是：一、实用性强。全书的主体内容探究的都是在实践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尤其对那些熟视无睹的毛病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让人豁然开朗，获益良多，作为翻译教材尤为适合。二、强烈的现实关怀。本书所持的核心观点是翻译要像中文，作者提出“中国的中文”就是意在保护中文的纯洁性，这样至少可以唤起读者的敏感，避免再犯习以为常的错误。本书初版于1971年，翌年由台湾大地出版社在台湾发行，2001年被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列入“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在大陆出版。　（肖志兵）

意态由来画不成？　翁显良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3年

这是一部关于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是作者在文学翻译方面的代表作。全书分为六部分：一、意态由来画不成？二、写实与寓意；三、观点与笔调；四、见全牛又不见全牛；五、千面千腔；六、意象与声律。分别从记叙文、论说文、小说、戏剧、诗歌五种体裁来讨论文学翻译问题。

作者认为文学翻译是再创作，意态由来非画成不可。风格是可译的，原作意象的隐或显、婉或直、艳丽或质朴、庄重或谐谑都是可以译的，且又非译不可。对于文学作品中不明晰的意象，在翻译上可采取以隐对隐的方法。对于用典的隐，翻译时宜化隐为显，将典故的含义融入文本，以含蓄的说法唤起读者的联想，而后选词炼句以再现原作的笔调、艳丽或质朴的风格、庄重或谐谑的语气。文章的婉转曲折，直抒胸臆都不是形式上的问题。译者必须领悟而达到与原作大致相同的艺术效果。要达到这种效果，文学翻译必须有打破原文表层结构的自由，从而再现原作的艺术效果——意态。对记叙文的翻译，作者认为要得作者之志，用汉语之长，求近似之效。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吃透文章全篇的寓意，然后钻出来重新构思再创造，用汉语之长，或分或合，或伸或缩，灵活处理，充分发挥本族语所固有的优势，再现原文的艺术性。为表达原文的意思，可以打破原文的语句形式。对于论说文的翻译，作者认为不但要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作的观点，而且要尽可能近似地反映原作的风格、技巧、笔调，实现原作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浅中有深，显中有隐。对于小说的翻译，作者认为有三个前提：一曰熟，二曰近，三曰得。即熟悉原作者，熟悉小说的背景，熟悉其中的人物；译者要与原作者性情相近，阅历相近，风格相近，与原作者产生共鸣，得之于心。小说的翻译还要注意避免因粗疏产生的形象畸变，因仓促导致的误译；同时要避免因才识不及导致的错译，或因扬本族语之长而盖外语之短导致的“顺而不信”。对于戏剧的翻译，作者认为译者要进入剧中所有角

色,将戏剧语言的语调、语气、语势、文雅或粗俗用汉语恰当地表现出来。对于诗歌翻译,由于语言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再现原意象时可以有取有舍,同时避免引起与原诗意象不调和的联想。在声律改创方面,无须亦步亦趋,只要在轻重徐疾上不与原作迥异,用言和押韵均可改创。该书最大特点是用汉语传统诗学话语来探讨文学翻译问题,论述很有见地。

（龚桂芳）

翻译的艺术　许渊冲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年

该书收录了作者有关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学术论文 18 篇。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创的翻译原则:《前言》中主张文学翻译工作者应再创造出“胜过原作”的译文,给世界文化灌溉新的血液,使世界文化更加光辉灿烂。《翻译中的几对矛盾》一文中提出了“直译与意译新论”,认为无论直译、意译,都要符合“忠实”“通顺”的标准,尤其要吸收新鲜用语或者“创新”,符合“三确”(正确、精确、明确)、“三用”(通用、连用、惯用)的要求。《翻译的标准》一文中提出了“发挥译语优势论”。《忠实与通顺》一文中提出了“诗词翻译的‘三化’论”(浅化、等化、深化)。《意美、音美、形美》一文中提出了“诗词翻译的‘三美’论”。《“三美”和“三似”的幅度》一文批评了对诗词的散体译法。《译文能否胜过原文》一文中提出了“文化竞赛论”,要在竞赛中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文学翻译等于创作》一文中提出了“文学翻译以创补失论”,认为“好的翻译等于创作”,但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翻译,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另有几篇论文分别对毛泽东、周恩来、鲁迅、李清照诗词的英、法译文进行了评论与研究。

该书的主要特色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文中伴有大量译例与分析,加上译论新颖,在译界影响颇大,屡被称引。但对作者“胜过原作”等观点译界也有不同看法。

（李伯和,佘协斌）

翻译学(英文版)　*Translatology*　黄龙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这是中国新时期大陆第一部以“翻译学”命名的理论专著,是作者在慨叹系统阐述翻译学专著迄今尚付阙如的情况下,荟萃诸家,博采众议,加上自己数十年的研究心得用英文撰成发表的。全书共 17 章。前 8 章为通论,论述翻译的界说、属性与职能、中国翻译简史(含中译外)、翻译准则、矛盾性与可译性、准确性、谐韵性等;后 8 章为分论,内容涉及诗歌翻译、《圣经》翻译、句法翻译、同声翻译、科技翻译、电脑翻译与翻译教育;最后一章瞻望翻译事业未来,与之前的历史回顾相呼应。

此书的主要特点除所论述的内容比较全面和系统外,还在于作者在吸取译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翻译七大观:一、唯物辩证观。认为翻译受矛盾统一规律支配,翻译中各种矛盾的对应双方互相依存,对应存在;孤立或割裂之,均有悖于翻译观念。二、知行统一观。认为空泛理论和盲目实践均不足取,以知驭行,以行验知,知行统一才是正道。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引大量译例,多为己出,其技艺之精彩,足资借鉴。三、三位一体观。作者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赋予新的解释和意义,认为三者互为表里,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四、体貌相称观。主张以古译古,以今译今,以文译文,以野译野,以韵译韵,以谚译谚。所译均须符合原文体貌,得其神髓,各逞风骚。五、寓美于微观。认为翻译之美贵在微观,于毫末处得精神,故应“肥”则肥,应“瘦”则“瘦”,应“静”则“静”,应“急”则“急”。译品务须情文并生,曲尽其妙。书中以自译与他译相比较,令人信服。六、信息时代观。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各种科学知识日新月异,故书中将科技翻译、电脑翻译、同声翻译等等内容一并纳入,以应时代之需要。七、智能科学观。认为翻译智能开发有赖于翻译教学,翻译过程即为学习外语过程,而外语学习即为心译、口译、笔译之过程。最后指出翻译学建立在其他学科基础上,为“知识塔”之上层,故须广泛运用相关学科的现代学理来研究翻译理论,开辟新的视野与途径。

此书出版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翻译学尚处于襁褓时期,可以说是一部颇富启迪意义的发轫之作。当然,书中论述的内容与格局不能说无懈可击,用英文发表也限制了读者范围。故作者又于同年 10 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翻译艺术教程》,内容与观点跟英文版《翻译学》大致相近,主要内容包括:序言;翻译与翻译学的界说观;翻译的社会职能观;翻译的艺术观与科学观;翻译的辩证观;翻译的神韵观;翻译的美学观;翻译的文体观;翻译的是非观;翻译的微观性;翻译的直观性;翻译的双关性;翻译的追溯性;翻译的外位法;翻译学的综合教育观;翻译的语言心理学观;翻译的人工智能观;翻译的人才观;外来语的翻译;附录。(陈福康 2000:456～461)

（易奇志,佘协斌）

翻译:思考与试笔　王佐良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年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收集了作者自 1978 年至 1987 年间写的有关翻译的文章,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文学翻译理论和学术思想。这部分共九篇文章(包括广播讲话、会谈纪要、专题发言等),既从文体学和文化等角度论述了翻译的困难及经验,又高瞻远瞩,针对当时的翻译状况,给后人提供了一些值得研究的具体课题。第二部分则是作者的译作实例,所选译文以外研社 1980 年出版的《英国诗文选译集》为基础,如培根的随笔,彭斯、麦克迪儿米德的诗歌和科贝特的散文,斯威夫特、蒲伯等人的杂文、随笔;还包含中译英的内容(如曹禺的《雷雨》等)。作者的译作

虽不多,但其语言清新隽永,可以说篇篇皆精品。

作者在该书中指出,翻译主要涉及两个过程,即透彻理解原作和灵活运用语言表达。他认为:绝大多数的思想概念(即使不是所有的)都是能够翻译出来的,不易翻译的是原作的气氛,或者说力量。对译者来说,最大的困难一是对原文的理解,二是对本族语的掌握。理想的译者必须经常锤炼自己的语言,才能自如地表达和再现原文的风采,还要注重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对比。虽然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但面对的则是两大片不同类型的文化。该书将"可靠""可读"视为翻译标准。"可靠"就是忠实,"可读"就是流利,即翻译要辩证地选用翻译方法——尽可能地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作者的译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理解深刻,语言新鲜自然,不仅在遣词造句上见功夫,在文体风格上更能统领全局。他认为,语言运用要充分考虑其社会适应性,常有程度不同的个人变异,而变异的目的在于造成突出,引起注意。译者的任务则在于再现原作的面貌和精神。当然,也要注意词义学和文体学运用于翻译的局限性,因为有时翻译问题涉及不到它们,所以更重要的还是译者本身要有长期的、多方面的实践,从中积累甘苦自知的经验。在一定时候同其他译者交流是必要的,这样做的好处可能远超过阅读任何语言学和翻译理论著作。在翻译过程中追求与原作蕴涵的"神似"是一种艰苦但又充满乐趣的有意义的工作,因此,翻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充满语言魅力的创造性工作。作者认为,真正的翻译高手正是那些能运用最简单的词、句、形象、韵律而取得迷人效果的人。

概言之,该书不仅能给人以理论指导,还有实际译文作范例,为翻译爱好者开阔视野、领略译笔风格提供了方便与帮助,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陈莉莉,范武邱)

等效翻译探索 金隄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 年

本书较全面地阐述了等效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以等效概念为纲,全面探索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诸多基本问题。该书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兼顾的特点,是现代译学中的一部重要理论著作。

全书共四个部分,九篇论文。第一部分为等效原则的探索;第二部分论述灵活与准确的关系;第三部分探讨准确与通顺的关系;第四部分为附录,主要谈外语教学中的翻译技巧训练问题。1997 年,作者又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补充了新作(增订本分为五部分,其中前三部分内容不变,后两部分均为新作)。

作者在书中吸收中外名家严复、奈达等人的理论精髓,通过对大量实例进行剖析,探索符合翻译实践原则、切实有效的翻译途径。作者在第一部分充分肯定了奈达的"动态对等"与"功能对等"原理,同时也指出奈达从反应角度给功能对等下定义有失偏颇,提出了自己的"等效翻译"概念,把等效理解为"在可能范围内最接近原著的效果",即"效果对等",认为等效翻译所追求的目标是:"译文与原文虽然在形式上很不相同或完全不相同,但是译文读者能和原文读者同样顺利地获得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信息,包括主要精神、具体事实、意境气氛。这就叫做等效或基本等效,这个目标应该适用于一切种类的翻译。"作者还指出,"等效翻译"是解决"信"与"顺"矛盾的一把金钥匙。他在该书第三部分论述"准确与通顺的关系"并不是"鱼与熊掌"的关系,认为等效论使得"忠实"和"通顺"可以两全,翻译中应该"明确地提出要求:既要准确,又要通顺,二者必须兼而有之"。增订本第四部分《〈尤利西斯〉翻译实践中的追求与探索》是作者运用其等效原则翻译《尤利西斯》所获得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论证了"等效翻译"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本书出版以来,颇获好评。1997 年出版增订本,被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收入"翻译理论与务实丛书",成为翻译研究工作者和学习者的重要参考著作。

(袁圆,屠国元)

文学翻译十讲(英文版) *Ten Lecture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刘重德编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1 年

该书是作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梳栉整理而成的翻译理论专著。全书用英文撰写,共分十大部分,分别为:1. 翻译的性质;2. 翻译的原则;3. 翻译的忠实性;4. 直译和意译;5. 常用译法;6. 怎样翻译英语定语从句;7. 汉译英中的形象翻译和断句;8. 文学风格的可译性;9. 译诗问题;10. 英诗汉译。

作者文笔流畅,书中译例翔实,对翻译原则、文学风格以及译诗应掌握的技巧艺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如作者在该书第二章"翻译的原则"中推陈出新,吸取严复和泰特勒翻译原则的精华,在"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基础上提出了"信达切"的翻译标准。作者认为严复的"信、达"二字仍可沿用,但指出"不是所有的翻译都能用一个'雅'字概括得了的",而"切"字适合各种不同风格。简单地说,所谓"信达切",就是"信于内容","达于其分","切合风格"。其中的"切",亦指贴切,切合实际,切中要害。作者在第四章"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上单刀直入,有声有色地总结自己多年的翻译实践经验,认为应把"直译法"和"意译法"巧妙地结合并加以灵活运用。在第八章"文学风格的可译性"中,作者认为"要想比较好地再现原作风格,译者在着手翻译之前必须具备两个观点:首先是宏观的观点,即文学观点;其次是微观的观点,即语言学的观点"。在如何把握运用"宏观观点"和"微观观点"进行翻译实践方面,作者详细论述了在翻译实践中再现原文风格的技

巧。在第九章“译诗问题”和第十章“英诗汉译”中，作者总结了自己“入于诗，出于诗”的经验，阐明了自己的译诗观，归纳出许多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见解，提出了理想译诗的两大灵魂：一是要保持原诗的艺术性，译者应竭尽所能译出其形美、音美和意美；二是译诗要忠于原作，即忠于原诗的情感、内容和形式。

此书1991年初版以来，受到广大翻译工作者的欢迎与好评，并于1998年再版，同时被收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袁圆，屠国元）

实用翻译美学　傅仲选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1年

该书从美学视角探讨翻译问题，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为概述，综述了全书的内容；第二章“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第三章“翻译中的主体”；第四章“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第五章“翻译美的标准”；第六章“翻译中审美再现诸手段”。后五章内容均为实用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

本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全书重点放在对具体语言材料进行分析探讨上，但并没有否定理论的作用。在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审美实践要比没有理论指导更富成效。因此对于翻译美学的理论问题，本书也进行了必要的探讨，但着眼点是在实用性上，即读者能借助这些理论，通过对具体语言材料的分析，去鉴别译文的优劣。本书把翻译、美和实践相结合，讨论了翻译过程中美的实现，审美主、客体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翻译过程中的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等等。二、指出实用翻译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如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文体学、修辞学、语义学、词汇学等都有密切的关系。本书通过具体的语言材料分析，阐明实用翻译美学与这些语言材料之间的密切关系，归纳它们各自对翻译审美所起的不同作用。三、把客观现实比作第一现实，把原文比作第二现实，译文比作第三现实，将原文的形式与内容跟译文的形式与内容一一进行对比，尽可能达到最佳的和谐统一。四、分别从英语、俄语名著及其相应的汉语翻译中列举具体语言材料，对不同版本的译文进行对比分析鉴别，从而使讨论的范围更广，得出的结论比仅从英、汉语的原文与译文进行探讨更有说服力和权威性。五、详细讨论了翻译中审美再现的七种手段，即增词法、减词法、引申法、替代法、反面着笔法、合译法和分译法，其中特别讨论了反面着笔法，即在保持原文意思的情况下，变换表达角度，把词面意义从正面表达改为反面表达，或从反面表达改为正面表达。这一命题在一般的翻译理论著作中并不常见。《实用翻译美学》既继承了一般翻译理论中的既有研究成果，同时也广泛吸收了其他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剖析了翻译活动中客体的审美构成和主体的能动作用，提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审美再现类型和手段以指导翻译实践。

该书可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其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

（何莉，范武邱）

翻译学概论　张振玉著　译林出版社　1992年

此书于1964年3月先在我国台湾出版，原供台湾大学外文系诸生研习翻译参考之用。嗣后台湾及海外若干大学采用为教本。该书多取材于名著名译，共23章，分别为释译、中国翻译史略、中国之翻译论、普通译名、文学译名、称谓、典故、双关语、语态、数和量、骈与散、补足、解释、断句、削浮词、删烦文、改倒句、修正、论直译、论意译、误译、象征与写实、丑与美等。

英文汉译诸例，多采自《圣经》，吴经熊的《圣咏译义初稿》，梁实秋、朱生豪、虞尔昌等人所译《莎士比亚戏剧集》，梁实秋所译《咆哮山庄》，李荠野所译《简·爱》，张谷若所译《还乡》，其他尚有《安娜·卡列尼娜》、《块肉余生述》、《威克斐牧师传》、《撒克逊劫后英雄传》、《金银岛》、《林肯传》等书。汉文英译例证多采自英译《四书》、《尚书》、《左传》、《老子》、《庄子》、《离骚》、《史记》、汉文、唐文、宋文、唐宋诗、明清小品、《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西厢记》、《红楼梦》、《聊斋志异》、《老残游记》、《断鸿零雁记》、林语堂所译《浮生六记》、《古文小品》，时昭瀛所译《雅舍小品》（梁实秋著）等。

作者在自序中说，“翻译系以原文为素材，以译者之语言文字为工具，以译者之匠心为主宰，就译者所理解之原文而求近似性之表现。译者亦须应用自己文字技巧，表达作者之思想、情感、风格、文体。于此等表现上遂显示译者之艺术修养，然亦显示译者之个性。译文既显示译者独特之技巧与个性，故译文亦系译者之创作。故原文虽同，译文亦因译者而异。”

（张顺梅）

翻译经纬　张泽乾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年

这是一部较全面地研究翻译史、翻译观与翻译论的力作。全书453页，分上、中、下三编。该书的特色是：以翻译“术”与“史”为经，以翻译“学”与“论”为纬，以翻译“观”为连接点与交汇点，对翻译体系的各要素进行了宏观的、立体的、动态的、开放的和完整的研究与探讨。

上编探讨翻译史，作者首先对人类翻译历程进行全面梳理，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活生生的翻译发展史；继之对中外古今的译论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述，揭示中外译论研究的发展脉络、基本规律与异同。中编探讨翻译观，指出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是翻译的哲学观、科学观、艺术观，亦即哲学、科学、艺术相统一的翻译观，主要涉及翻译哲学、翻译科学与翻译艺术三个范畴。作者分别阐释了翻译哲学观中的辩证唯物观、社会历史观与方法论，翻译科学观中的整体观、动态观与方

法论,以及翻译艺术观中的认识与实践观、哲学与美学分析等。下编探讨翻译论,分八章阐释翻译的必然与局限、层次与等级、过程与性质、原则与标准、技巧与方法、风采与风格、欣赏与批评、功能与价值。全书以"翻译十论"为导言,论述翻译的概念,翻译的三要素——人、物、场,翻译与语言符号,翻译与思维心智,翻译与文化、观念,翻译研究的指导思想,等值论与等效论,翻译研究方法——比较法与交叉法;最后以结论式、定义式的"翻译百思"作结。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眼于在译论研讨的宏观领域内进行开拓,为读者展示了一个经纬交织、纵横交错的翻译总体研究"经纬图"与新视角。 (罗俊美,佘协斌)

文学翻译的释义学原理　蔡新乐、郁东占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西方阐释学开始影响到中国国内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同时不可避免地逐渐渗透到翻译研究的各个方面。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用释义学原理讨论文学翻译问题的理论专著,旨在提醒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应把注意力多放在'我'与'物'之间的关系上,当'人'的地位确定下来之后,翻译理论才可能是'我'的。设若对'我'不予关心,翻译理论仍会沦为机械论或者某种崇拜"。

全书包括前言、结语共十个部分,从文学及文学翻译的局限谈起,分别探讨跨文化文学翻译的释义与空白,释义超越认识、伦理和审美的范畴规定,提出文学翻译是艺术的释义,分析释义的对应、意蕴指向与释义的简化以及跨文化翻译中的释义特征,最后阐述多元艺术释义的成因及作用。

作者首先论述中国翻译理论界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其实质,对文学翻译中阐释的艺术性与多元性给予肯定,论证"翻译即阐释"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并强调译者在多元阐释中的能动作用。该书主要以海德格尔(Heidegger)本体论阐释学原理为理论框架,从中国文化、汉英互译出发,将阐释学同中国哲学的某些观念结合起来,讨论文学翻译中的语义空白、对立和多元并存。作者指出,文本留有"空隙""空虚"和"空白"等待读者来解读,"释义的成功便是想象发挥其功能,填补空白的成功";作者认为,人与文本的关系是对话关系,是"一场灵魂的对话",译者应努力寻找译文与原文"对应的配合","最终促成新的文本在释义中只能起到和原作对应的作用";由于意蕴的复杂性,译者只有从原文的意蕴指向入手(包括艺术语言意蕴指向、作者创作意图以及文化内涵指向),才能构筑出与原文对应的目的语文本,从而得出释义只有在表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时才会是对应的结论。

本书的特色是以释义学的观点立论,将国外译论与中国翻译研究相结合,鲜明地提出语义空白、对立和多元并存的翻译理论框架,尝试构建一种新的文学翻译理论体系。书中采用大量的实例论证理论,反过来又用理论来分析实例,原始资料丰富翔实,立意新颖,敢于质疑,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与创新。但译界对该书的语言风格存有争论,有人认为作者的文字表达较为深奥费解。 (袁圆,屠国元)

文体与翻译(增订版)　刘宓庆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年

该书突破以往从字、词、句入手来探讨翻译问题的传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文体方面来研析原文与译文的翻译技巧。作者从翻译实践需要出发,兼顾翻译理论和文体学问题,分成七个单元进行阐述。前六个单元集中分析报刊文体、论述文体、公文文体、描述及叙述文体、科技文体以及各种应用文体的特点及翻译要点。第七单元探讨翻译作风、翻译修辞及翻译风格等理论性问题。

该书主要有四个特点。一、实用性强,所涉及的各类文体及大量例证都紧扣时代主题,体现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翻译的新任务和新特点。书中题材范围涉及各类不同文体,所引用的例句大多出自名家名作,有些取自现代英美报刊或书籍,各章节后的大量练习分梯级安排(中级、中高级及高级),条理清晰,循序渐进。教程对翻译原则问题阐述较多,旨在启发和引导读者进行独立思考与钻研,了解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一般状况及成果。由于此书融实用性、指导性、时代性、广泛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特别适合自学与翻译教学。二、以汉英对比为出发点,以重理解、重对比、重文体、重神似四个原则为指导,以文体为单位,围绕翻译要点引导学习者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进行多样化的翻译实践。该书主要使用对象为有一定英语基础的读者,因此阐述力求详尽,例句及解析力求丰富,使读者在大量练习中逐步熟悉英汉各类文体的语言特征,在比较中领悟各种翻译要领,在翻译过程中顺应原文需要,做到量体裁衣,使译文文体与原文文体相适应,包括与原文作者个人风格相适应。三、根据不同文体特点,选用相关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重点展开讨论。这些重点分别是语序(新闻报刊文体)、词的翻译(论述文体)、长句的翻译(公文文体)、情态的翻译(描述叙述文体)、动词形态的翻译及倍数表示法(科技文体)、介词的翻译(应用文体),如此安排布局,令读者在遇到不同文体之时,事先在头脑中形成条理清晰、主次分明的概念,恰当地选择不同的翻译技巧进行文本翻译。四、在侧重翻译实践的同时,大体上顾及了翻译应用理论的系统性。作者强调,为保证翻译水平的不断提高,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译者应当深入了解翻译基本理论问题,用以解决翻译中的实践问题。

此书是适应时代要求出版的一部以实用性为主、理论性为辅的翻译研究佳作。全书例证丰富,编排合理,实用性强,被认为是应用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必读书目。 (吕俊,范武邱)

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　沈苏儒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年

此书为纪念严复《天演论·译例言》刊行一百周年而发表,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严复"信达雅"说的综合性总结式专著。全书共七章。第一章：绪言；第二章：严复的"信达雅"说；第三章：各家对"信达雅"说的评价及各种新说；第四章：在我国流传较广的几种外国译学新说；第五章：从翻译的本质看"信达雅"；第六章：从翻译的实践看"信达雅"；第七章：继承和发展"信达雅"说。书前有罗新璋"序",书末有附录与后记。全书的思路如下：第一步,正本清源,正确认识严复"信达雅"说的本意及与之有某种传承关系的古代佛教译论；第二步,全面总结几十年来对"信达雅"说的评论与评价；第三步,比照外国译学理论原则,研究同"信达雅"有无相通之处与有无融合的可能；第四步,在中外译学理论研究启示下,探讨翻译(translation)的本质和翻译实践(translating)的过程,并与"信达雅"说相印证。

严复的"信达雅"说,诚如罗新璋在该书序言中所言："几道先生的抉译及精义以三言,表现出他译理方面的睿智与卓识。见高于世,杰然自立。首先,三难说具有强固的奠基意义。……其次,三难说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复次,三难说具有某种真言性质。……思无定契,理有恒存,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然而自"信达雅"说诞生以来,虽屡推不倒,百年不衰,但也是争论不断,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部分肯定部分否定者亦有之。本书作者总结了我国 20 世纪 20～30 年代、50 年代、80 年代至今三次"信达雅"之争高潮中各方的观点,然后进行深入探讨,指出尽管评价不同,但"信达雅"说百年来作为我国翻译工作者所遵循的总原则,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作者在书中"纵的方面古今衬映,横的方面中外比照",深入挖掘、分析了"信达雅"说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普遍意义,主张秉持"继承、融合、创立、发展"的态度,正确认识与进一步充实、提高严复为人们留下的宝贵译学遗产,为创立适应我国现实、有鲜明特色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而奋斗。

（佘烨,佘协斌）

翻译理论与实践　彭卓吾著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年

该书作者不满意中外翻译理论的现状,认为无论中国,还是国外,翻译理论都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迄今在翻译理论方面还没有产生出一部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权威性著作,因此提出,"要想真正建立起堪称为科学而系统的翻译理论,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来进行"。

该书的特点是结合马列著作的翻译实例,以哲学为指导,分析、研究和解决翻译领域中的种种问题,如"用矛盾观点分析和阐述翻译""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理解原文表达原文","坚持唯物主义原则、哲学分析翻译的定义、翻译的程序、翻译的原则",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翻译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与辩证唯物主义翻译观"等,将翻译的定义、翻译过程中的"理解""表达"以及"原作的思想""原作的风格"等问题都纳入哲学的范畴。因此,该著作被称为用马列主义研究翻译的专著。作者在书中批评把翻译放在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单科框架内进行研究的做法"不能真正指导翻译实践",认为"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我们所看到的无非是翻译家就翻译问题所发表的一些零碎而片段的翻译观点而已","远不能构成一种科学而系统的翻译理论",主张建立独立的"翻译学",并论证建立独立翻译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认为"不建立翻译学就不能建立系统的翻译理论"。

该书出版后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该书对翻译理论的历史与现状所作的分析,以及译论界对该书的评介在我国翻译界亦引起激烈的争论。　（陆永昌）

翻译新论与实践　方梦之著　青岛出版社　1999 年

本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概论》和第二章《译学的相关学科》,着力于全书的理论架构和理论界说。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原作》、第四章《译者》和第五章《译品与读者》,着力于研究翻译的主客体互动关系,第三部分包括第六章《文体与翻译》、第七章《英汉语言对比》、第八章《翻译的层次与单位》,着力于翻译策略的理论概述。第四部分包括第九章《词的处理》、第十章《词组转换》、第十一章《句子翻译》、第十二章《语段翻译》和第十三章《篇章得体》,这部分结合翻译实践,按翻译的主要单位自小至大地具体讨论翻译的策略和技法,为本书的重点。

本书作者早年从事翻译实务,后来进行翻译教学并做翻译研究。这为写作提供了充实的实践和理论素材。在理论上,全书虽然以语言学为主线,但作者并不偏执。作者运用哲学、逻辑学的原理和方法,以社会符号学、心理学、思维学科为支柱来构建他的理论体系。其中,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以及心理学和思维科学分别在语言的转换与生成、思维的规律与方法——翻译学的这两个切合点上交叉。书中通过以上六门学科综合地、系统地描述和分析译学对象的种种问题,同时也不排斥其他相关学科的作用。

本书将译品分成五类：全译、节译、编译、摘译、综译,并分别阐述其翻译原则和操作过程。如对于节译,作者提出针对性、客观性、简明性三原则。对于综译(综述),作者提出的操作步骤为：确立专题、检索文献、提取符合专题需要的文本、分篇节译、综合编辑等。作者将编辑学的思想结合到翻译研究上来,产生独特的效果。

对译者的研究涉及翻译思维、翻译心理、译者的情感和需要等这样一些问题。翻译的内在规律在于人脑思维。翻译过程中,人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式是一个核心问题。本书在这些方面都作了深入系统

的讨论。本书除对英汉语言特点作系统的对比外,对英汉语语言逻辑和思维逻辑也作了有序的比较;提出了与翻译单位相辅相成的结构单位;对常用翻译技巧和方法按照从词到篇章的翻译层次分别作了扼要的归纳。其中不乏新的尝试。

本书在理论上取各家合理的内核,不以一家之说为圭臬。无论是译者内省式的"信达雅",还是外向读者性的灵活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无论是理想主义的等值论,还是意义功能对等的符号说,都有其合理部分,都有可供借鉴的成分。

该书1999年初版,2002年再版,并多次印刷,被不少大学用作本科或研究生翻译教材或指定参考书。

(张顺梅)

译介学　谢天振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年

这是一部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学术著作。该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大量新信息与丰富例证,将翻译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与评述,从而提出了与中外文化交流、翻译文学史编写等直接相关的一些重要观点。

全书除绪论外,共分六大章:1. 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学传统;2. 20世纪文学翻译研究的趋向;3.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4. 翻译研究与文化差异;5. 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6. 翻译文学史的名与实。全书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一是论证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质,揭示它与文学创作的相通之处,从理论上肯定文学翻译家劳动的创造性价值;二是论证翻译文学在国别(民族)文学中的地位,指出汉译外国文学作品与汉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三是提出编写中国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的设想,从而把自古以来文学译家的创造性劳动及其贡献与价值以史的形式展示在世人面前。译介学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分支。作者认为,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或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而是原文在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是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意义。由此,作者将翻译置于跨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提出了翻译中存在创造性叛逆这一独特见解,并将其视为译介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作者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特别鲜明、集中地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受到的阻滞、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这种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不仅指译者,而且也涉及读者与接受环境等。文学翻译中的误解与误译、信息的失落与增添、文化意象的变形与扭曲,有时并非是译者的无能与无奈,而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正是译者根据不同文化的差异在翻译中进行再创造,才使原作的生命以新的语言面貌,在与原作不同的另一个新的文化圈中得以重现与延伸。作者还认为,通过从理论上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地位与归宿加以研究,才能为撰写一部完整的国别(民族)文学史创造条件。

(罗治荣,佘协斌)

翻译学　谭载喜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0年

这是一部关于翻译学的概论性著作。作者从理论角度对翻译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内容,以及翻译学的研究目的、范围、任务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全书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第二部分为"翻译学的任务和内容";第三部分为"翻译学的研究途径";第四部分为"翻译学与语义研究";第五部分为"翻译学与词汇特征";第六部分为"翻译学与西方译史译论研究";第七部分为"翻译学的分支学科:比较译学";第八部分为"中西译论的比较"。

作者的主要观点有:一、明确翻译学的学科性质、任务和内容以及研究途径。作者指出,翻译不是科学,翻译学才是科学。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论、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性科学,亦称"边缘交叉性科学"。其任务是对翻译过程及其出现的问题进行客观的描述,揭示翻译中具有共性的、带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上升为客观反映翻译实质的理论。内容上包括三个部分: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基本的研究途径有文艺学途径、语言学途径、交际学途径、社会符号学途径和翻译学途径。二、提出翻译学中的语义及文化对比研究。作者指出翻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语义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为翻译操作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翻译学的语义指存在于言语符号和该符号标志物之间、符号使用者和使用场合之间以及其他符号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状关系,言语符号的意义就体现在这些关系上,翻译中对意义的处理,也就是对这些关系的处理,协调好关系网中的各个环节,并在译文中产生相应的一个关系网。翻译学的语义理论包括句法、修辞、词汇三个层次以及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两个方面。只有通过科学的手段,对语言的各种意义,特别是联想意义的性质有了充分掌握,才有可能真正讨论等值翻译、功能对等翻译等问题。再者,由于生活经验的相同与不同,人们在词汇的选择方面存在着共同点和差异,具有词汇偶合、词汇并行、词汇空缺、词汇冲突四大基本特征。因此从英汉文化对比的角度研究这四个特征就是翻译学所必须承担的任务。三、主张对中西译论进行比较,建立比较译学学科。其目的是通过比较来明确翻译学的任务和研究方向,开阔视野,从别国的经验中摄取对我们有益的养分,以形成我们自己的翻译理论特色。

(龚桂芳)

语篇翻译引论　李运兴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年

该书包括绪论和八个章节。绪论部分是有关翻译研究的总论,重点讨论跨学科移植的问题及其所应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即相关性、层次性和适存性,并结合典型的移植成果分别予以讨论。第一章为语篇翻译概述,对语篇及其相关概念进行介绍,并通过对以"信"为本的传统翻译标准和奈达的"动态/功能对等说"的分析与评价,提出语篇翻译标准,即以源语语篇多元系统、目的语语篇多元系统和翻译情境多元系统三者构成的参考系统进行动态的、综合的评估。第二章介绍语篇的层次性及翻译转换趋势。首先讨论语篇的层次化问题,然后探讨英汉语在语篇层次上的对比及翻译转换问题。作者将语篇级层体系分为操作级层和决策级层,指出操作级层上的各层次总是受决策级层制约,后者是前者的活动背景,对原文字句的理解和译文字句的构建都必须以决策级层为参照。同时,决策级层又是操作级层各层次特点的宏观与综合体现。第三章讨论语篇的功能,在综合分析各家之说的基础上,重点区分叙述功能、描写功能、说明功能、指示功能、制约功能以及成篇功能这六大主要语篇功能。第四章讨论语篇的语域,重点从组成语域的语篇范围、语篇方式及语篇体式三方面对语篇进行观察并进行实例分析。第五章论述语篇的语境,着重介绍语篇翻译下的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第六章为衔接方式,结合实例讨论词汇衔接、照应、省略和替代等几类主要的衔接方式。第七章讨论译文连贯,重点分析连贯不当的体现以及在译文中保持连贯的方法。第八章论述语篇结构,以实例探讨英汉互译在叙事结构、行为视角、信息布局、话题结构、时空顺序以及语篇范式调整等语篇结构问题。书中第三到第五章侧重讨论语篇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章则侧重讨论语篇实体本身的问题。

全书运用从静态的词句视角到动态的语篇视角的研究方法,在借鉴语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实例分析向读者全面系统地介绍语篇翻译理论的基本知识,并由此提出多元系统翻译标准。该标准的提出打破了传统译论中"作者至上""原文至上"的观念,破除了认为原文具有既定的终极意义的迷信。语篇翻译从功能语言学和语言使用的角度来探讨翻译,从自上而下、由宏观到微观的角度审查操作级层上的处理,有利于减少误读误译。语篇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的翻译研究方法,为我国翻译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书已成为从语篇视角研究翻译问题的必读书目。

(张志武,范武邱)

新译学论稿　萧立明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一方面发掘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引进外国的翻译理论,出现了中西结合、呼吁建立翻译学的新局面。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对翻译学的基本框架的建立没有达成共识,翻译学研究又面临了一段沉寂时期。但是我国中青年学者始终热衷于这一课题,到了 21 世纪,对翻译的研究又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形势。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形势。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1. 对翻译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两个语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这个基本命题出发,阐述了科学的翻译和翻译的科学;拟定了翻译学所涉及的主要相关学科和建立翻译学理论框架的初步构想。2. 体现了翻译研究的系统性和辩证论译的思想。在翻译广论中,作者以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为依据,批判继承了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论证和肯定了传统译论指导当今翻译实践的现实意义,同时兼容并蓄,认真吸取西方翻译理论的可取成分。在文学翻译的原则与方法上,作者依据文学作品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翻译原则。3. 作者文字简约,理论结合实际,将学术观点的陈述与鉴赏评析名著名译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翻译实践有较强的启发性和指导性。

本书的前身为繁体字版《翻译新探》,列为台湾书林出版公司出版的译学丛书首卷,成为我国港澳台地区高校翻译方向硕士生主要参考书之一。《新译学论稿》是十年后的修订本,作者不仅增加了新的内容,而且使体系更为完整。

余光中谈翻译　余光中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年

本书作者是著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批评家。全书共收入译论作品 22 篇,按内容可分为七部分:一、针对教育界、学界对翻译不够重视的现状,作者强调译者、翻译与批评的重要性。文中论述了译者和学者、作者的关系,认为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是没有创作的作家;指出翻译乃大道,对文化可以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还列出了成为批评家的四种必备条件。二、主要以诗歌为例,比较中西文学的内在和外在差异:思想和文化背景,语言和文字。作者分章具体论述了外文文法的繁杂和中文文法尤其是古典诗的简练与伸缩自如。三、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强调翻译教学中理论和实践应该相辅相成,教师本身更应两手都要硬。四、针对当时译界鱼龙混杂的状况,为读者列出了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识别"假洋学者"的几块试金石,并对外文系培养出真正的学者寄予厚望。五、以自己的翻译实践阐明译者在翻译中应遵循的原则: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作者批判直译硬译的"翻译体",认为过于追求精确而不通顺的译文是对原文的不忠。六、对以英美学者为主体翻译的《中国文学选集》进行了评价,并对该集内译文的选择和某些作品的翻译质量的可靠性等问题提出了质疑。七、回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80 年间各时期的白话文发展状况。一方面,作者肯定西化趋势的不可

避免和良性西化现象对中文白话的功绩；另一方面，作者结合各时期文坛大家的译文和创作实例，集中篇幅批判了白话文从早期青涩到后期繁琐的发展过程中，恶性西化所导致的各种病态，如文体繁硬、句式累赘、滥用虚词、“的的不休”，等等，这也是全书的精要之所在。作者还指出，在教育制度和大众传播的影响下，英文对中文的影响已经不仅止于表皮，而是渗入文法，中文日趋式微，长此以往将会威胁整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因此必须及时警惕，预为良谋，中文之求变应以中文之自有常态为基础，切忌太快、太甚。

本书各篇章写作时间跨度大(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较为客观地从纵向概述了“五四”以来中国翻译和白话文的发展，尤其是就恶性西化和中文式微所敲的警钟，不论是对中国译者、学者还是作者都极具指导意义。但作者强调意译，与当前译界一些人认同的应以直译为主的翻译主张多少有些相左；另外，书中案例分析多为诗歌，较少涉及其他文体，这显然与作者的诗人身份有关。 (张芳)

变译理论　黄忠廉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年

本书是基于变译事实及其规律研究而产生的原创性理论著作。全书分为三大部分：上篇为变译理论立说，共4章；中篇为变译基本理论，共14章；下篇为变译主客体论，共3章，共同构成变译的理论体系。上篇为立论，拟建立变译理论体系。作者从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大量变译事实，提出一对全新的翻译范畴：全译和变译，并明确二者的分野及其辩证关系，阐明变译理论的定义及其产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讨论变译理论的研究对象、方法、任务、作用等，明确指出变译研究是对变译活动整体的研究，包括从变译现象到变译规律再到变译原理这样一种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中篇为本书主体，论及了变译的实质、系统、变通手段、方法、体系、单位、章法、过程、机制特效、规律、标准、范围以及变译的价值等，旨在建立变译理论的总体框架。下篇进一步深化论证变译理论的依据，分析变译过程中读者、译者和原作的作用，论述读者、译者和原作与变译之间的关系，指出变译主客体间的相互制约作用。

本书特点有三：第一，原创性强。作者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为“离经叛道”的“变译”正名，确立变译在译学研究和翻译实践中的地位。作者立足实际，以其独到的视角，将自己的思辨和研究上升为系统理论，自成一家。第二，事实充分，有理有据。作者总结概括了一千多年来古今中外翻译实践大量的变译事实，从古希腊翻译活动到现代西方各国间的信息高速传播，从唐代佛经翻译到19世纪末中日两国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想的摄取，再到我国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外国科技文化的引入以及中国文化的输出，以此肯定变译现象的存在，明确提出其核心概念——“变译”这一理论的基石。第三，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该书在阐述变译新论的过程中，逐步深入、层层递进，强调变译是译者的目的性行为，是为了满足读者的特殊需求，突出变译最大的特点是“变”，改变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乃至风格，变的操作由译者完成，而读者是潜在的动力，等等，从多维的角度论述了变译理论这一新的译学思想。

当然，对于“变译”之说，究竟是翻译还是改写或是演绎，译界尚有不同看法。作者若能结合当今译论相关学说对“变译”予以平行对照和适当佐证，或许会使“变译”理论更显丰满完善一些。(贾文波，廖春兰)

翻译论　许钧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全书由“翻译本质论”“翻译过程论”“翻译意义论”“翻译因素论”“翻译矛盾论”“翻译主体论”“翻译价值与批评论”等七大章组成，深入讨论翻译学中带本质性的七大基本问题。作者围绕这七个几乎囊括译学所有问题的轴心，一方面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经典译论进行全面的梳理与论述，一方面又将这些译论重新加以整合与研究，阐明作者本人对翻译与翻译学的认识，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新见解。该书综合中外各家之言集中解决翻译与翻译学本质问题的方法，在国内尚不多见。

第一章全面回顾并阐释了中外各种理论对翻译本质的界定，并在深入分析翻译的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历史性等特征后，将翻译的本质重新定义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第二章从“翻译过程的实际体验与总结”“翻译的历史性”“文本生命的拓展与延伸”等六个方面探讨了翻译过程这一热点课题，其特色是把许多本来与过程研究貌似无关的观点和理论在明确的主体意识引导下，创造性地整合到翻译过程论这一主题之中。第三章对中外各种有关翻译意义的理论进行综合论述，结合作者本人在内的翻译家们的实践，阐述翻译过程中意义再生的条件、机制和方式，区分了“涵义”“信息”“效果”“意图”“风格”“内涵”“不言之义”等七个与意义翻译有关的概念，概括出不同意义分类的三个共同点：明确注意区分语言和言语；重视上下文或语境因素；重视发讯人、收讯人和语符之间呈现的各种关系。继之提出了翻译中让意义再生的三大原则：去字梏；重组句；建空间。第四章对翻译因素进行探讨，包括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等方面的内容。第五章“翻译矛盾论”具有较强的论证性，具体探讨“可译与不可译”“异与同”(包括“异化”与“归化”)“形与神”等三对矛盾，主张用辩证观来看待和处理这些矛盾。第六章从“译者传统身份辩”“从忠实到叛逆”“创造性叛逆与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等方面阐述翻译的主体及其作用，指出在作者、译者、读者这三类翻译主体中，译者居于中心地位，起着最积极的作用。第七章主要论述翻译的功用与价值，包

括社会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重点探讨了翻译批评的理论体系、原则与方法,主张开放式的批评视野与指导性的批评功能。书中还以《红与黑》汉译本的调查和研究成果支持作者关于翻译批评的见解。

概言之,《翻译论》是一部综述与论证相结合的著作,体现出明确的跨学科研究意识,所涉及的相关学科理论有哲学、语言学、文论、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等;涉及的当代翻译理论有解构主义翻译论、后殖民翻译论、女性主义翻译论、新历史主义翻译论、多元系统翻译论,等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夏高琴,佘协斌）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　王宏印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这是一部运用解释学方法系统清理中国翻译理论传统的专著,旨在为建立中国现代译学进而建立世界译学准备条件。杨自俭为本书作序,认为"全书是经过梳理、阐释、转换、终结、升华等过程而完成的,这种方法既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又有很高的方法论价值,在我国译学的研究领域有不可低估的开创性意义,特别在传统译论的研究上,这本书不能不说是新时期开始的重要标志。"全书分上中下三编,分别研究了古代(148～1840)、近现代(1840～1949)和当代(1949～2000)译论。作者从各个时期选取最有代表性和原创精神的十家翻译理论,其中涉及佛经翻译的四篇,用哲学方法探讨翻译理论的两篇,回归中国传统和借鉴西学论辩的两篇,属于文艺学性质的译论两篇,结合众多先哲时贤的有关研究加以评论,进行文本分析和理论阐释。每一种理论根据不同情况,按照历史评价、理论评判、创造转化的原则进行评述和学术批判,并根据建立现代译论的需要,努力实现其基本论题转换、概念范畴转换、理论形态转换。每一章后有 20 个思考题,供研究和讨论之用,以加深、扩充本章所涉专题并使之系统化。在历史分期研究中,一方面按照传统译论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分期;另一方面则按各派翻译理论论题发展的继承关系划分为肇始阶段、古典阶段、玄思阶段和直觉阶段,进一步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结合并对应起来,勾画出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脉络。本书《绪论》和《结语》部分在讨论理论设定和研究方法的同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传统译论的界定和分期、优势和不足,以及文化渊源的特点和理论终结的必然,在继承中国传统译论人文精神的前提下,指出使传统译论实现向现代译论转化的再生前景。余论部分以"新译学探索"为题,将研究的时间下限更新到 2003 年,纳入了作者本人关于中国新译学建设的基本思考,涉及文学翻译表现手法、翻译批评评判标准、中西译论概念的区分与综合创新思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和国学特色。

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　郭建中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年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科普和科幻翻译的专著,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科普著作和科幻小说分属科技写作和文学写作两个不同范畴的写作样式。作者为顺应我国的传统观念,把科普翻译和科幻翻译放在同一本书中研究,但在具体处理时,还是把它们严格区分开来。全书分理论篇、技巧篇和实践篇。理论篇分别论述了科普、科幻写作与翻译发展的历史、范畴、作用、特点、类型、意义等问题;技巧篇摒弃叙述一般翻译理论和罗列各种翻译技巧的写作套路,强调科普与科幻翻译的要求和标准,通过案例分析,用实证的方法论述译者的修养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实践篇附有 21 篇科普与科幻小说的译文及注释、译评,与理论篇和技巧篇相互印证对照。

本书主要特点如下:1. 理论联系实际,侧重理论应用;强调言之有物,不强求系统化;详谈翻译特性,略谈翻译共性;以外译汉为主,切合中国需要。2. 强调翻译策略的选择,译意而不是译词;强调翻译中要改变结构或重组改写,而不是亦步亦趋。3. 对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重新定义,并用科幻翻译的实例加以论证。

作者长期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和英汉/汉英翻译实践,具有丰富的翻译科普和科幻小说的实践经验,翻译和编辑出版科幻小说 900 余万字。本书不但对科普与科幻翻译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一般的翻译工作也有现实意义。

机器翻译研究　冯志伟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年

本书共 16 章,系统地介绍了机器翻译的历史和现状、各种类型的机器翻译系统、机器翻译的实现过程。书中通过大量的实例,有血有肉地描述计算机分析自然语言的过程,使读者对机器翻译有更加清楚而具体的认识。

第一章为"机器翻译概述",介绍了机器翻译的基本概念,澄清了人们对机器翻译的一些误解,叙述了机器翻译的历史。第二章讲机器翻译系统的类型,将机译系统分为基于规则的系统、基于语料库的系统、多引擎机译系统和口语机器翻译系统。第三章为"机器翻译的实现过程",比较详细地介绍基于规则的机译系统的实现过程。为了让读者对目前机译系统的翻译水平有所了解,作者介绍了自己对国内的三个基于规则的英汉机译系统用 1 100 个句子进行测试的结果。第四章至第九章分别介绍形态自动分析、基于转移网络的自动句法分析、基于上下文无关语法的自动句法分析、基于特征结构的自动句法分析、基于依存语法的自动句法分析和基于概率的自动句法分析。这是本书的重点,写得最为详尽,使读者对于形态和句法的自动分析获得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认识。在第

十章“语义自动分析”中，作者不但介绍一阶谓词、语义网络、概念依存、框架等意义的形式化和表示方法，也对知识本体、词网和框架网络作了介绍，这些内容基本上涵盖了目前语义自动处理的主要技术。第十一章为“词义排歧方法”，专门讨论机器翻译的难点——歧义问题。第十二章“语用的自动分析”介绍“所指判定”“文本连贯”和“修辞结构理论”等方面的内容。第十三章“机器翻译中的转换”含有三节：语言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从机器翻译看汉语的特点，词汇转换和结构转换。这一部分用大量的例子说明语际转换的困难性和问题，如：词汇选择的差异、形态转换的差异、句法结构的差异、题元关系的差异、中心语的改变、词类范畴的差异等。第十四章讨论机译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目的语生成。作者首先介绍一般的自然语言生成系统的结构，然后又介绍系统功能语法、功能合一语法和意义文本理论，并探讨了这些语言理论对于目的语生成的价值和意义。第十五章研究机器翻译的词典，分别讲述分析词典中语言信息的描述方法，词典查询结果的排歧，转换词典和生成词典等。第十六章“因特网上的翻译工具”介绍一些通过网络可以使用的机器翻译系统，使得读者在阅读本书后，马上就可找一些系统来进行试验。附录所载的“关于机器翻译和计算语言学的对话”是很有价值的一篇文献，它记录了作者研究机器翻译和计算语言学的历程。

内容丰富、选材新颖、讲解透彻是本书的主要特点。作者多年来从事机器翻译和计算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亲自实现过几个机器翻译系统，这些经验使得该书不仅具有理论上的价值，而且也可作为机器翻译系统开发的实践参考书。该书受到文科和理工科广大读者的欢迎，曾获中国出版集团优秀图书奖，在2004年12月出版后，又在2005年9月第2次印刷。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　刘宓庆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年

本书前身为《现代翻译理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经修订改版，易名为《当代翻译理论》(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近又经过重大修订，改名为《新编当代翻译理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发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原则、原理、方法论以及中国翻译学科架构的理论专著，已入选国家经典名著千卷本“中国文库”。许多大专院校皆指定本书为翻译教材或必读的参考书。

作者力图继承古典和近代译论的历史功绩，摆脱其局限性，努力对每一个翻译理论课题进行符合现代思维科学和逻辑学的科学证论，克服传统译论在概念界定中的内涵流变性，绘制出重描写的翻译理论功能规范而不是规则。

本书以系统论的观点，把我国翻译学建设的架构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两个结构体系。内部系统是翻译学的本体，包括翻译史、翻译理论和翻译信息工程；外部系统是参照，包括与哲学思维、社会文化和语言符号三大领域形成的网络体系。内部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理论、应用理论、跨学科理论。跨学科理论被添加到内部系统并且与基本理论、应用理论同属一个层次，而原来属于应用理论的翻译方法论、翻译程序论、翻译风格论及翻译教学研究不再与翻译基本理论同属一个层次。根据自己的宏观研究成果，作者提出了由汉语参与的翻译理论的基本模式，即“重描写的语义-功能模式”，用以阐释汉外转换的种种规律和作用机制，构建完善的理论体系。作者同时指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必须重描写。这是由理论的对象性和对策性以及汉语的基本语法特征决定的；其描写的核心之一就是汉语的语义结构，只有重语义结构，才能保障有汉语参与的语际转换实现意义的对应转换；一切意义的陈述又受制于功能机制表现为语言形式，因此“汉语的翻译理论”必须重视功能的机制与功能的表现研究。书中针对汉外互译提出的许多理论主张及对策都是其他译论(包括外国译论)未曾触及或深入探讨过的。

作者认为：中国翻译理论是指有汉语参与的语际转换理论，它是世界翻译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建设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翻译科学作出贡献。世界翻译科学与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作者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并非某些学者所认为的“特色派”翻译理论体系，并非纯理论体系，而大体上是应用理论体系。

(张顺梅)

文学翻译原理(修订版)　张今、张宁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基于翻译研究的第一次转向(即文艺转向)的理论成果和第二次转向(即功能转向)的理论成果，《文学翻译原理》初版一面世，即受到翻译界的关注。此后，作者又吸收了翻译研究的第三次转向(即文化转向)的理论成果，对第一版进行了全面修订。

本书的主体内容为张今所著，张宁所撰写的《从语言学角度看直译与意译》作为补充收在书的附录部分。导论部分首先介绍文学翻译原理的概念、作用和意义。指出文学翻译原理是文学翻译理论的一个分支，是从美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作为艺术创造过程的实质和一般规律，也可以叫做翻译艺术学或翻译美学。文学翻译原理具有实践意义，可以促进文学翻译乃至整个翻译事业的发展。第二章探讨翻译的性质及分类，认为源于文学本身的艺术性，文学翻译将永远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第三章阐述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认为这一过程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关于理解阶段，作者指出，译者要想使自己的理解和解释符合或接近原作内容的本真精神，就必须首先做到遵守哲学诠释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学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主要是解决十对具体矛盾、寻求主客观一致的过程。这十对矛盾

是：译者世界观和作者世界观的矛盾；社会真实和细节真实的矛盾；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矛盾；译者风格和作者风格的矛盾；译文艺术内容和原文艺术内容的矛盾；译文语言形式和原文语言形式的矛盾；译文语言形式和译文艺术内容的矛盾；译文整体和细节的矛盾；译文语言自然性和民族性的矛盾；译文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矛盾。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作者围绕这十对矛盾展开详尽的论述。此外，作为补充，作者还向读者简要地介绍了历史上的三种翻译方法、翻译标准以及曾产生重要影响并具有代表性的四位翻译理论家泰特勒、阿诺德、费道罗夫与奈达的翻译思想。在最后一章即第十四章中，作者就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职责和修养提出自己的见解。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将唯物辩证法同翻译理论有机地结合，指出翻译的实践过程就是要合理解决十对矛盾的问题。在具体讨论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尤其是关于翻译的思想性、真实性和风格性问题上，作者概括出"真、善、美"的翻译标准，将翻译再次纳入美学范畴。该书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地探讨文学翻译原理的著作。（魏国珍，范武邱）

口译理论概述　鲍刚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年

该书初版于 1998 年，由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是中国第一部口译理论专著。作者对从口译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各种现象与基础性问题，如口译有哪些程序，口译工作中可分离出哪些基本技术，译员在口译中的智力机制有何表现，译员的双语状况如何等，进行细致、深入的探讨与阐释，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与实用参考价值。

全书分为六章，内容涉及口译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口译理论研究的十种方法（经验总结法、归纳思辨法、内省法、黑箱法、现场观察法、调查法、原译语资料分析法、口译模式设定法、实验法、跨学科借鉴法），口译根本特征及其对口译的制约，口译"工作言语"概念的提出及话语语类，译员身上的双语现象及外语提高的方法，双语人才的筛选，口译中的听辨与理解，原语储存与笔记，双语互译及口译程序，口译工作的组织与译前准备等问题。口译形式涉及同声口译、交替口译、会议口译等。每一章末附有思考题、科研习题和自我进修习题，既可供广大口译研究人员、口译教学人员和研究生使用，也可供广大译员参考阅读。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运用世界上的先进口译理论和相关学科理论成果，来阐释和支持作者自己的观点。由于该书的撰写曾得到法国释意派理论创始人塞莱斯科维奇（Seleskovitch）和勒代雷（Lederer）的亲自指导与支持，书中不仅对释意派翻译理论进行了描述和肯定，还在各个章节中借用。

在中国，口译工作历史悠久，但口译理论的研究还是一门新兴的年轻学科。口译中的许多基本问题尚处在探索发展阶段。本书可以说是填补口译理论专著空白的首创之作。但也正因为是首创，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怎样更加紧密地结合汉外互译实践，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指导中国口译实际工作的口译理论体系，都有待进一步探索。（陈静，余协斌）

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　张美芳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本书以语言功能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系统地论述翻译功能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是国内第一本较全面评介翻译功能各学派理论并结合翻译实例论证的专著。

本书共五章，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两大部分。前三章为理论篇。第一章介绍翻译研究的范畴与途径，内容包括：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问题、其性质与目标、架构与范围，并详细描述了霍姆斯（Holmes）的译学构想及中国学者的译学构想等。第二章评介以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派，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学者的研究方法：卡特福德（Catford）的等值论及翻译转换论、豪斯（House）提出的以语域变量为基础的译文质量评估模式、贝尔（Bell）以话语参数为依据的翻译思考模式、哈提姆（Hatim）与梅森（Mason）从韩礼德语域语篇模式拓展到语用分析的语境分析模式以及贝克（Baker）应用韩礼德理论进行自上而下的语篇分析途径。第三章主要评介以德国翻译界著名学者为主的功能主义学派及其研究途径。书中先介绍了翻译功能主义的理论基础，即布勒（Bühler）的语言工具模式和雅各布森（Jakobson）的语言功能模式，接着重点评介了赖斯（Reiss）的文本类型理论、弗米尔（Vermeer）的目的论，赫尔兹-曼塔里瑞（Holz-Mänttäri）的翻译行为理论和诺德（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同时也评介了有着共同理论基础的英国学者纽马克（Newmark）的功能翻译理论。后两章为实践篇，分别与第二章和第三章呼应。其中第四章为英汉翻译中的语篇分析，主要沿用语篇分析学派的相关理论，涉及英汉翻译语篇分析的重点、语篇体裁与语域分析、文化情景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语言的评价意义与译者的价值取向、译文的衔接性、翻译情景与信息转换以及图式分解隐喻中的认知过程。第五章是英汉翻译的功能与翻译策略，从宏观的角度，讨论文本功能与翻译策略、意图与翻译策略、信息发送者与翻译策略、编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策略透视和术语翻译问题。每章均由引言开篇、小结完篇。附录部分有功能翻译术语及其中文译名，书末还附有完备的参考书目。

全书例证翔实，体裁广泛，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到金庸的作品，从广告语篇到 IT 术语，从新闻报道、大学概况介绍到经典诗歌、意识流小说，作者均结合各派功能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本书弥补了中国翻译界在功能理论研究方面相对缺乏的遗憾，是翻译专业研究生和翻译理论爱好者了解翻译研究功能途径不可多得的参考书。（潘莉）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　吕俊、侯向群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年

作者在本书中首次提出了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理论，认为建构的翻译学是“一种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建构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翻译研究”，并主张把这一研究对象作为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来建构。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关于翻译学的学科性思考，第二章是对已有几种翻译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批评，第三章提出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知识基础，第四章着重阐述分析建构主义的翻译学，第五章主要介绍翻译伦理学。

作者把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的交往行动理论和普遍语用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以此来构建一种崭新的翻译研究模式。书中首先阐述翻译学的学科性质与特点，分析翻译学的机体结构模式和理论框架模式，继之客观审慎地比较语文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四种翻译研究范式及其异同，然后分别从哲学基础、认识观、理想观、真理观和语言观等五个方面论证建构主义翻译学的合理性，对翻译研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启迪作用。作者总结出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翻译标准是“不违背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这些原则体现了建构主义翻译学特有的开放性、实践性、社会性和“主次清晰、多元丰富”的特点，能更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和研究。最后，作者提出解决文化间不对称交往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翻译伦理学”和“国际共同认可的翻译伦理准则”，认为翻译活动需要道德和伦理规范的制约，而翻译伦理学的原则是要追求平等与公正，要在文化上取长补短，相互尊重，共同进步，帮助翻译工作者树立积极向上的翻译观。

概言之，作者在书中试图构建一种崭新的翻译知识体系，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对科学合理地规划和促进翻译学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袁圆，屠国元）

中国翻译话语读本(上卷)(英文版)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 Ⅰ)　张佩瑶负责编辑注释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6年

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早期的佛经翻译》，时间跨度从早期到20世纪前10年，历时千年之久。(下卷《13世纪到20世纪》，主要涉及西学东渐时期的翻译，直到辛亥革命，本书截稿前尚未面世。)

就选材而言，上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早期到东汉，共25种文献，其中有孔孟、老庄、易经、礼记、尚书、国语等，选其与语言和交际有关的片段进行注疏。第二部分：佛经翻译(分三个时期)，共67种文献，包括道安，僧肇、彦琮、玄奘、赞宁等人的翻译理论资料。书中95%的文献是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对外披露。编者力求从四个方面实现其厚重翻译(thick translation)理念：1. 尽可能传达中国翻译话语中关键概念的丰富含义，而不是依赖目的语中显而易见的对应概念加以替代，以免忽略其中重要的差异和区别；2. 尽可能超越语言与文化的鸿沟，确保中国翻译话语的突出特点获得充分体现；3. 尽可能使关键概念所植根的文化传统得以表达，或文化传统的感觉得以激发出来；4. 尽可能提供必要的历史与其他背景信息以便促进理解。

继承传统学术精神和善于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是这个选本的一大特点。例如，在关于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评论中，注释者首先提到了古人，例如彦琮的研究，然后又着重介绍了现当代著名学者的研究情况，例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基础上从形式、风格、语言特点等文类因素的丧失角度对道安问题的认识。钱锺书既认为道安的论述重要，但也有不足，力图在翻译的性质和可译性理论方面有所发展。罗新璋则认为中国传统译论有其自己的体系，而“案本”是其中关键术语之一。

本书除正文、脚注和疏解、评论外，书前书后还有大量的附录，如地图(包括丝绸之路)、中国历史朝代纪年表、汉英系统发音对照表、书中的人物小传、引文出处索引、分类参考文献；以及主题、姓名及一般文献索引等。

为帮助西方读者确切地了解中国古代的翻译情况，本书在地域及其语言方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西域”和“胡语”的概念，区分了和“西方”相对的地理知识，以及与“梵语”相对的“胡语”知识。

（王宏印）

6. 丛　书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今

该丛书列选国家“十五”规划项目和湖北省“九五”“十五”重点图书规划，主要目的是通过从多方面探讨、记述中国翻译的渊源与发展、成就与不足以及翻译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影响和贡献，促进中国翻译事业的新发展。丛书由著名专家学者精心著述，囊括翻译研究三大方向：译史、译论史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和探讨，翻译实务与批评，对翻译进行多学科、多方位、多角度的学术透视，具有原创性、权威性、系统性。这是第一套总结、研究我国翻译诸多方面问题的全面、完整、系统的大型学术丛书，为我国及世界各国的翻译工作者、汉学家以及从事翻译研究的专家学者，系统地了解中国翻译事业的成就与发展，进一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丛书从第一本《翻译新论(1983～1992)》于1994年7月出版起，已走过了16个年头。第一辑已出版的13册翻译论著，对译史、译论史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和译作品评这三大翻译学科的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较大的进步和深入，特别是某些领域的专题研究和填补空白的前沿性课题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如译史

研究、名家翻译、歌剧翻译、诗歌翻译研究等。每一本论著都代表翻译研究的一个课题，一个领域，代表中国翻译学科的基础建设，给从事翻译研究的人们以启示和经验。从书第二辑 10 本也已经出齐，其选题内容关注两大方面：一是新世纪呈多元性趋向发展的翻译特点，开拓选取有价值的前卫课题；二是继丛书第一辑的特色和优点，继续做翻译专题性与综合性研究。目前丛书第三辑已开始出版。总的来说，“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反映了中国译界专家学者的学术实力和个性，显示中国翻译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张顺梅）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罗进德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今

该丛书是“九五”“十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丛书着力发掘前辈的译事经验，总结各类翻译实务技法，及时推出各种当代翻译理论，旨在促进我国翻译学科的建设，提高我国整体翻译水平。丛书的特点可用“新”“全”“精”三个字来概括。

“新”指丛书具有原创性，关注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的新趋势、新成果，大部分著作都有新理论、新观点、新材料或新方法，“全”指丛书几乎覆盖了翻译学科各交叉领域，主题广泛，内容丰富，包括翻译史、国外译论介绍与研究、翻译理论研究、译事实务指南、非文学翻译、翻译批评、翻译教学、跨学科研究等。丛书突出理论与实务的统一，多角度、多层面地把读者带进译学的殿堂。丛书不但关注翻译的新理论和新思想，而且关注科技、经济、法律、贸易、金融、旅游、传媒等非文学领域的翻译实务。“精”指走精品之路，展现国家级出版水平，自主策划，独立研编，作者队伍中既有耄耋之年的译坛耆宿，也有初出茅庐的译界新秀；既有港台地区的著名学者，也有大陆的学术中坚。编校质量高、装帧得体也是丛书成功不可或缺的原因。

连续十来年坚持不懈，每年出书数种，该丛书已出版 50 余种，在外语类成套书中独树一帜，是翻译界、英语教师和青年学子案头的必备书。丛书的重版率达到 90%以上，其中有几种已重印若干次；有的已向港台地区输出了版权，有的获得了各类奖励。

（张婉凝）

7. 国外论著

翻译理论概要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　费道罗夫(Андрей Венедиктови Фёдоров)著　莫斯科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出版社　1953 年

该书是前苏联语言学派奠基作。作者在世界范围内最早系统地将翻译纳入语言学研究的范畴，认为翻译过程是使用语言的过程，翻译理论研究属于语言学范围，并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对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提出挑战。

书中提出了一条重要的翻译理论原则——“等值论”(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 一词源于拉丁语 Aequivalens，根据《苏联大百科词典》的解释，意为：“物体或数量等价、等义，或在某个方面与别的相对应、能表达或者替代”，用在翻译方面具体表示：1. 与原文作用相符(表达方面的等值)2. 译者选用的语言材料等值(语言和文体的等值)，认为翻译是语言运用的一种特殊形式，翻译过程就是把一种文字材料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材料，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异同、转换规则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对象，因此，等值是翻译研究的核心，并不强调语言形式上的对应。作者还认为，可译性问题是整个翻译理论中最有原则性的问题，尽管存在差异，但由于人类生活的共性，可译性的原则是可以实现的。

该书首次出版后，受到俄罗斯传统的文艺学派激烈的批评，作者的观点在后来的版本中有所演变，在强调解决翻译问题必须借助于语言来解决的同时，对把翻译看成是纯语言学问题的看法作了修正，承认只通过文艺学或只通过语言学的途径研究文艺翻译已经过时。该书的主要贡献是首次把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就翻译领域提出的“等值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的反响，世界不少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如美国的奈达(Nida)、法国的维纳(Vinay)、达贝尔纳(Dalbernet)等都受到该著作理论的影响。奈达在等值论中的核心——意义功能与艺术功能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等值论(dynamic equivalence)。

该书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在国外出版。中文本由李流等翻译，由中华书局于 1955 年在我国出版发行。

（陆永昌）

翻译的理论问题　*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著　巴黎 Gallimard 出版社　1963 年

该书是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穆南的代表作，被西方译界称为划时代的经典之作。此书是作者的国家博士论文。全书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语言学与翻译”，第二部分为“翻译中的语言障碍”，第三部分为“词汇与翻译”，第四部分为“世界映象与翻译”，第五部分为“文化多样性与翻译”，第六部分为“句法结构与翻译”。作者的主要观点是：

一、对翻译活动持科学和客观的态度。认为 20 世纪 50 年代初，西方的翻译语言派与文艺学派之间不可调和的观点，对翻译活动缺乏客观、科学的全面分析，各自虽含合理成分，但都失之片面，走上了极端。在翻译的可行性认识上，反对“翻译万能论”和“不可译论”的绝对观点，明确提出“翻译是可能的，但它确有限度”的辩证观点。作者一方面从“语言的意义单位”“句法结构”“交际环境”等诸方面探讨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指出语际翻译转换过程的困难与

局限，另一方面又分析了文化的多样性对翻译构成的障碍，在奈达(Nida)归纳的“生态环境、物质文化、社会习俗、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外，还提出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认为通过对翻译中各类不同障碍的描述，明确其产生的原因，有助于人们在翻译中采取相应的科学手段加以克服。

二、对翻译活动始终持发展、辩证的观点。认为“可译性”存在于翻译的限度之中，而这个限度也不是唯一的或不变的，明确指出“翻译活动的成就是相对的，它所能达到的交流思想的水平是变化发展的”。坚持“人类语言能力与人类对世界认识”之间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提出人类文化是在人们克服困难、不断认识世界、相互交流的运动中发展的，而异语交际，即翻译活动，其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作者还从理论上说明译本不断更新的必要性。在本书结论部分，作者指出奈达关于“翻译就是归宿语言中产生与出发语言的信息之间最接近的自然对等，首先在意义方面，其次在文体方面”的观点虽然正确，但“如果把这个公式固定化，认为既然有两种语言，能自然产生相应的信息与译文，由此而产生的最接近的自然对等便可一次完成，这仍然是一种僵死的、反辩证的观点”，因此，翻译中追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此外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作者提出克服“囿于经验的实践”和“抽象空泛的理论”这两种倾向，主张建立两者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坚持对翻译问题进行多角度开放式研究。作者是语言学家，善于从语言学途径如语音、语义、句法结构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但与此同时也致力于在人类思维与文化结构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以便在翻译中找出普遍的共有现象，实现异中求同。作者还从交际学和符号学途径探讨蕴涵意义的构成与传达障碍，从人种学、文献学等途径探讨不同文化的可渗透性以及语义的可传达性，等等。 （李伯和，余协斌）

翻译科学探索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著 荷兰 E. J. Brill 出版社 1964 年

该书以《圣经》翻译为例，将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把语言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动态对等、形式对等等重要概念。

全书共十二章。第一章为引言，简要介绍历来对翻译活动所持的批评态度和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当代不同学科对翻译活动的启示和指导意义。第二章讨论西方世界的翻译传统，主要以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圣经》翻译为例，总结、回顾和梳理西方的翻译史，介绍翻译名家及其翻译思想。第三章是对意义本质的介绍。第四章重点论述语言学意义。第五章重点介绍所指意义和情感意义。第六章从信息论的角度出发，主要论述翻译中语言的能动性，认为翻译活动中的语言不仅是一种代码，更是一种信息交流的意义载体。第七章论述译者的作用。第八章和第九章讨论翻译对等原则，包括翻译的类型、原则和对等的类型，重点对“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两个概念进行分析。第十章介绍翻译实践中的实用性技巧。第十一章讨论翻译的程序，介绍个体翻译与集体翻译在翻译流程上的不同。第十二章介绍机器翻译这个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作者认为，语言的共性总是大于个性，因而翻译这一语际间的转换活动是完全可能的。作者还认为，翻译活动既是艺术，更是一门科学，因而必须用客观原则来加以规范和描述。该书重视读者反应，扬弃“文本中心论”，提出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的概念，明确指出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目的语信息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目的语接受者和目的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这样一来，就把翻译标准的焦点从原文与译文的对比转移到读者的反应上来，为翻译标准开拓了新的视角，也给两千多年来相持不下的“直译”“意译”之争提供了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奈达翻译理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传入我国，至今仍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被介绍得最早、最多也是影响最大的理论。在我国，最早较系统地介绍奈达翻译理论的是谭载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于 1984 年出版了他编译的《奈达论翻译》。尽管过去 20 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从起初‘人人言必称奈达’到近来不少人‘言必称奈达理论之缺陷’的转变”，奈达翻译理论的科学性和指导性却仍将影响翻译界。本书是奈达翻译理论成熟期的一部著作，是对其多年翻译工作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内容丰富，论证详尽，奠定了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领域中的权威地位。该书原版已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 2004 年重印，在中国发行。 （张志武，范武邱）

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卡特福德(J. C. Catford)著 英国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5 年

该书十分注重语言学和翻译之间关系的研究，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途径。全书共十四章。第一章是普通语言学理论，为后面的理论介绍和论证打下基础。第二章是翻译的定义和基本类型的介绍。第三章主要讨论翻译等值这个重要问题。第四章介绍形式对应。第五章论述意译和完全翻译。第六章讨论转移问题。第七章讨论翻译等值的条件。第八章探讨基于音位学原理的音位翻译。第九章基于字型学原理的字型翻译。第十章讨论音译问题。第十一章主要介绍语法翻译和词汇翻译。第十二章介绍翻译转换。第十三章讨论翻译中的语言变体。第十四章探讨可译性的限度。

该书的主要观点和创新点有：一、翻译理论属于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翻译的理论基本上是应用语言学的理论。翻译可在任何一对语言或方言之间进

行,不管它们彼此间有无联系。二、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是寻找目的语的翻译等值成分。翻译的等值基础是语法等级,即语素、单词、词组、子句和句子。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界定翻译等值关系的条件和性质。根据翻译的范围、层次和等级规定出宽泛类型或范畴很有必要。三、首次将概率的概念引入翻译理论研究,用概率理论定量说明翻译等值关系,给翻译等值这个抽象概念赋予具体的内涵,指出翻译规则是文本翻译等值关系概率的"外推"或"外化",并且强调文本等值与形式对应必须区分开来。四、意义的重要性体现在翻译特别是完全翻译中。意义决定于形式关系和上下文关系。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有可能进行限制性的"意义转移",但是这并非通常所说的"翻译"。五、翻译转换是指源语进入目的语过程中偏离形式的对应。它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叫做层次转换,即目的语的等值单位处于不同的语言层次,另外一种是范畴转换,主要指翻译过程中形式对应的脱离。六、探讨了可译性限度问题,包括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文化的不可译性。七、指出翻译等值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确立翻译等值关系的方法和条件。八、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框架详尽而系统地描述翻译理论中的不少问题和传统概念(如直译、意译、逐字翻译、全文翻译、部分翻译、完全翻译、有限翻译、音位翻译、词形翻译、音译、语法翻译和词汇翻译等),使对这些问题的评判有了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了理论上的阐释。

此书被英国20世纪60年代翻译理论学派称为划时代的经典代表作。该书已有穆雷的中文译本,由旅游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 (李成静,范武邱)

语言与翻译 ***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巴尔胡达罗夫(Леонид Степанович Бархударов)著 莫斯科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出版社 1975年**

该书是前苏联语言学派代表作,是继苏联语言学派奠基人费道罗夫(Фёдоров)《翻译理论概要》之后的另一部著作。作者强调语言学理论对于翻译的重要性,认为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是翻译理论的核心,从语言学角度论述了翻译的定义、可译性、翻译理论的实质、语言的意义与翻译的关系、翻译单位、翻译转换法等问题。

作者在书中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的语言产物在保持内容,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主张借鉴话语分析、语义学、语言功能等语言学理论。研究翻译理论不仅要研究语言学,还要研究超语言因素,语际的综合处理是从语言学意义上的翻译过程,把翻译理论归属于宏观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作者认为:"翻译单位是指原著中存在而在译作中能够找到对应物的单位,而其组成部分分开来看在译作中并没有对应物……翻译单位乃是原语作品中存在,而在译入语作品中有对应物的最小语言单位",并从语义角度系统全面地把翻译单位划分为六个层次:"音位层"(书面语是字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话语层"。作者同时认为,各个层次的翻译单位本身不分主要或次要,应根据具体情况在语言等级体系的相应层次中准确地选择一个翻译单位,"足层",即"源语在目的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单位(最低限度)的语言单位",是等值翻译,而层次偏低的翻译是"逐词死译",层次偏高的翻译是"自由发挥"。作者还在苏联语言学派奠基人费道罗夫创建的"等值论"基础上提出"语义等值(semantic equivalence)",并将语义等值分为表层意义等值和深层意义等值、语义外延相等,认为意义传达的顺序是:所指意义——语用意义——语言内部意义。关于"翻译学",作者认为"从各个不同角度研究翻译的各门学科,可以总称之为翻译学。翻译学的核心部分是翻译语言理论,围绕这一理论还有翻译研究中的其他流派,如文艺学派、心理学派、数控论派,等等。"

该书出版后不久就被翻译成德语,在国外出版。在我国,该书已由蔡毅、虞杰、段京华翻译成中文,于1985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陆永昌)

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After Babel —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著 英国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年**

本书是18世纪以来第一部对翻译理论及翻译过程作出系统性研究的著作。该书涉及多种外语,内容广泛,分析深刻,论述精辟。作者在书中不仅对整个语言研究的历史进行了梳理,而且对人类翻译活动的历史作了系统的追溯。它规划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迅速成为一部既有争议又有重大影响的作品。即便是今天,作为一部现代经典著作,它的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其中的许多精辟见解依然令人振奋和发人深思。但本书并非是一部纯粹的翻译理论专著,事实上,书中至少有一半内容是对语言和文化的思考。然而,通读全书则不难发现,作者就自然语言在诗学、文学批评、文化史等诸多方面所作的考究,最终都将服务于对翻译行为的阐释。从原书的副标题"语言与翻译面面观"可以看出作者是把语言和翻译结合起来考虑的。关于"翻译"这一概念涉及的范围,作者采用了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Jakobson)的提法,即翻译包括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在翻译理论部分,作者引入了阐释学理论(hermeneutics),并对语言和翻译理论进行精辟的论述。他提出了基于阐释学分析的四个翻译步骤: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mport)和补偿(compensation)。然而,作者不限于此,而是进一步提出"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在语言研究部分,他首先引入了历时(diachronic)和共时(synchronic)概念,指出语言永远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而在语言的历

时和共时现象中,解释或翻译活动始终如一地贯串其中,即一切交际或交流都是通过解释或翻译来实现的。

本书初版后,作者又进行了全面修订,不仅增加了新的注释,而且还对已有的注释进行了扩充,并对参考文献作了全面修正和更新。第二版和第三版新增序言又将本书置于阐释学、诗学以及翻译研究的环境之中,并就社会、技术、政治等的发展动态与翻译的关系作了探讨。但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作者在书中个别地方流露出一些不妥当的观点,读者在阅读时应注意批判、鉴别。我国庄绎传编译了本书的主要内容,于1987年由中国对外出版公司出版,书名为《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这是国内对乔治·斯坦纳最早的译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引入本书原版,在中国重印发行。

(王华玲,屠国元)

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著 英国 Methuen 出版公司 1980年

苏珊·巴斯内特是英国沃里克大学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她与勒菲弗尔(Lefevere)均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共同提出的"文化转向"学说使翻译研究者的目光跳出了传统的"真空"状态下的语言学范畴,进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多维层面,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勒菲弗尔在1976年比利时卢万举行的"文学与翻译论坛"上首次提出"翻译研究"这一命题,从而拉开了彰显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地位的序幕,宣告翻译研究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或比较文学的一个特定区域,而是一个有着"众多分支的繁富领域"。与其遥相呼应,巴斯内特于1980年出版了此书,为翻译及相关学科更深广的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在书中系统地勾勒出翻译研究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指南。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翻译所涉及的语言与文化、翻译分类、对等论、不可译性等核心问题,使读者对翻译过程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第二部分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历时性的描写研究,从古罗马时期一直到20世纪翻译研究大爆炸年代,追溯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昭示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以及对翻译的不同理解;作者还着重探讨了欧美,尤其是英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历史以及人们在不同时期的看法;第三部分提供了大量的翻译实例,主要集中在诗歌、小说及戏剧翻译领域,意在论证前两部分的理论陈述。正如作者本人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翻译学研究者应既从事理论研究又开展实践活动,不然,就如同一个精于修理汽车的机械师却不会开车一样。

该书初版于1980年,之后分别于1991年和2000年再版,广为流传,成为英语国家翻译教学的入门教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首次在中国出版了此书原版,为国内的翻译研究工作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马新强,屠国元)

口笔译理论与教学 *Interpréter pour traduire* 达妮卡·塞莱斯科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玛丽亚娜·勒代雷(Marianne Ledérer)合著 法国 Didier Erudition 出版社 1984年

本书的两位作者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实践家、翻译教育家和翻译理论家。她们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与翻译教学的基础上从事理论研究。塞莱斯科维奇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举创立了翻译的释意学派理论,勒代雷则发展了这一理论。本书集两位翻译理论家之大成,可视为释意派理论的精髓。

全书分为三章。第一章为"什么是翻译";第二章为"口译教学";第三章为"翻译和语言"。全书的主旨是:翻译不是建立在信息的语言结构上,而是建立在对文献内容解释的基础上。因此,翻译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解释性的,换言之,翻译建立在对意义的领会和再现的基础上,应以释意、达意为唯一宗旨。作者认为翻译过程应分为如下三步:理解、脱离源语外壳(déverbalisation)和重新表达。这是因为:人们在翻译时并非是由一种代码转换成另一种代码,而是领会其意思,并将这种意思重新表达出来。因此,讨论如何理解与用何种办法表达意思,才是翻译研究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翻译人员,作为时而是理解原作者所欲之言的读者,时而又是使读者理解自己之言的作者,决不是简单地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是以最为易懂的方式,把言语转达出去,把作者所欲之言和读者所欲理解之言融为一体,这便是翻译的美德和职责之所在。翻译者为了理解与表达,必须具备足够的语言知识和相关的主题(或百科)知识,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作者认为翻译学是介于注释和语言学之间的一门学科。她们在对西方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批判后,牢固地确立了本学派由词义轴心过渡到意思轴心的翻译实践模式。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观点贯串在全书有关口译实践与口译教学的论述之中。两位国际驰名的翻译实践家在本书中饶有风趣地介绍了她们在口译实践过程中碰到的许多问题及聪颖灵活的解决办法,可以说是她们当年叱咤风云的翻译经验之大成。与此同时,释意派翻译理论也受到西方实证派理论的怀疑与批判,认为该理论只是一种翻译模式,有忽视语言形式之嫌,不具备普适性。在我国也有人质疑,如该理论在我国的继承者与传播者之一刘和平就指出过释意派翻译理论的不完善之处,认为该理论缺乏足够的实证分析数据来证明其科学性。

该书在中国已有两个译本。一是由汪家荣、李肖森、史美珍合作翻译的译本,1990年由旅游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口译理论实践与教学》;二是孙慧双的译

本,1992年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口笔译概论》。随着该书中译本的出现以及两位作者多次到中国和世界各地传播她们的译学主张与观点,释意派翻译理论因之在中国和世界译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国的鲍刚在作者及该书的影响下,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口译理论专著《口译理论概述》,1998年由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再版。

（关虹,余协斌）

翻译教程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著 英国Prentice Hall国际有限公司 1988年

该书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翻译中的诸多问题,包括翻译过程、文本分析、翻译方法、篇章作为翻译单位、翻译程序、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格语法及成分分析法在翻译中的运用、隐喻翻译等,还讨论了翻译批评、科技翻译、文学翻译、译文修改、翻译测试及参考书的使用等问题,并专门探讨了双关语、方言及歧义的翻译。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翻译的理论原则,包括文本分析、翻译过程、语言功能、翻译方法、翻译单位和语篇分析等。第二部分通过对13篇翻译文本的分析,介绍翻译方法的具体应用。作者认为,人类所有的语言都具有同等的表达效力,并从现代语言学和翻译功能的角度出发,将翻译方法与文本类型相结合进行研讨。

本书的理论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根据雅各布森(Jakobson)修改的比勒(Biller)的语言理论,将文本类型按语言的功能分为抒发功能文本、资讯功能文本、呼唤功能文本、审美功能文本、应酬功能文本和元语言功能文本,其中前三种为主要文本。通常一个文本不会纯属于某一类,而是几种功能兼而有之,只是侧重不同而已。与此对应,作者提出了八种主要的翻译方法。即,1. 逐字翻译;2. 直译;3. 忠实翻译;4. 语义翻译;5. 编译;6. 自由翻译;7. 地道翻译;8. 传意翻译(交际翻译)。作者指出,只有意译法和交际译法才能完全实现翻译须精确和精练的两大目标。大体上说,语义翻译适于翻译抒发性文本,而传意翻译从读者视角出发,因而多用于翻译资讯性或呼唤性文本。这种文本分类与翻译分类相结合的理论颇具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之前奈达(Nida)提出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过于集中在解决译文的可懂性和交际问题上,从而限制了其适用范围,而作者强调具体采用何种翻译方法要视文本的类型而定,这就提高了其理论的可参照性和适用范围。二、讨论了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将语言中的文化成分按来源分为生态学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以及由风俗习惯、观念意识产生的文化等。作者认为,译者解决文本翻译中文化差异问题的最好途径是理解文化词在原文中的文化效应,通过成分的分析和转化来实现原文文化词最为贴切的表达。三、在认同奈达提出的翻译是科学、技巧和艺术外,作者还提出了翻译是情趣的观点。他告诫译者不应满足于产生令人满意的译本,而应严谨地对待翻译,积极地欣赏翻译,通过不断拓展自身的理解水平和表达能力,力求实现译作的尽善尽美。

此书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在辩证求实地论述前人和同行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全面阐述了作者个人的翻译观和方法论。该书曾获英国应用语言学协会奖。2001年,该书原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重印在中国发行。

（陈莉莉,范武邱）

多元系统理论研究 *Polysystem Studies* 伊文-佐哈(Even-Zohar, Itamar)著 英格兰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年

作者伊文-佐哈系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是特拉维夫学派的代表人物。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多元系统”(polysystem),第二部分为“多元系统研究”(polysystem studies),第三部分为“文化中的系统和形式库”(system and repertoire in culture)。多元系统理论初次发表于1978年,是作者在研究希伯来文学时,在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同时,这些系统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亦即是由多个相交甚至叠加的系统组成的。该理论后又经不断修正,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尤其为描写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伊文-佐哈也因此被视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

本书在翻译研究方面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用系统的观点分析翻译文学与其他多元系统的关系。作者认为任何多元系统,都是更大的多元系统的一部分。这些系统有的处于边缘位置,有的处于中心位置,而且是不断变化的。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决定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当某一文学还处于比较“稚嫩”“边缘”或“较弱”阶段时,或者处于转折期、危机期或真空期时,翻译文学将处于中心位置,译者会更重视译文的充分性(adequacy),策略上倾向于异化。反之,译者更为重视译文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策略上倾向于归化。其二,用历时的观点研究翻译,强调历史和文化因素,并把翻译置于一个动态的、多元的系统内加以考察。其三,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考察,探讨翻译文学在目的语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推动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通过将翻译置于动态、发展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多元系统理论在“语言学派”和“文艺美学派”之外另辟蹊径,使得文化翻译观渐入人心。美国著名翻译评论家根茨勒(Gentzler)评价说:“多元系统假说扩展了翻译研究的理论疆界,将翻译文学嵌入了一个更为广大的文化语境,为翻译研究最终走出规定美学的局限开辟了

道路"。

多元系统理论介绍到中国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学者对其观点表示赞同,也有学者对其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多元系统理论模型假设尚不完善,研究范围更多地囿于文学和文化层面,只考虑到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略译者的主观文化定位等等。这些质疑在一定意义上丰富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为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张映先,仲文明)

语篇与译者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巴兹尔·哈蒂姆(Basil Hatim)、伊恩·梅森(Ian Mason)合著 英国 Longman 出版社 1990 年

该书的两位作者被认为是篇章语言学领域的著名理论家,对话语分析在翻译中的应用研究有很深造诣。贯串本书始终的中心论点是把翻译看做在一定社会情景下发生的交际性过程,而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语际转换活动。全书共十一章,第一章回顾翻译过程与翻译结果、翻译评判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直译与意译、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诗歌翻译、原文风格在译文中的再现问题以及以作者为中心、以文本为中心和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等问题。第二章探讨语言学对译者的影响,并寻求语言学理论研究辐射下的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第三章到第八章分别从语域、语用学、符号学、互文性及文本类型等角度论述了它们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第九章论述篇章结构与翻译。第十章对语篇组织与翻译关系进行了讨论。第十一章阐述翻译工作者不仅需要双语工作能力,还需要一个双文化视野,以便在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不同文化交流这一动态过程中起到连接纽带作用。哈提姆和梅森对语篇与译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讲得颇为透彻。他们首先从译者的观点出发,认为对比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均对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没有很大帮助,因为前者重点研究语言范畴形式的对应与非对应,后者重点研究自然的语言能力,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与词语在篇章语境中的确切意义均不够重视,而译者最关注的却正是这一点及其相应译文的可读性。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一方面必须透彻理解原文词语在语境中的内涵意义、暗示意义和推测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在译文中如实地充分予以表达再现。

总体来看,该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以一个理论模式为中心,逐层推进地展开讨论,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二、与传统的语言学翻译理论相比较,该书十分强调情景语境的作用。三、该书探讨的是超过句子这一层次的语篇类型、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并关注这三个层次之间的交互作用。四、注重对翻译总体策略的探讨。该书对翻译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既承袭翻译研究的既有成果,又对翻译研究的领域有所开拓和创新。全书论述透彻详尽,覆盖面广,不仅适用于翻译专业类读者,对应用语言学、交际学、英语教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的读者亦有借鉴和启发作用。 (邓静子,范武邱)

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著 美国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出版社 1992 年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各大学的翻译研究系陆续建立,促成了翻译研究在西方的全面深入。1992 年,旅美比利时的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推出了该书,旨在为大学比较文学系、语言系、英语系提供一部文学翻译教材。

该书重点阐述翻译过程和译作问题,其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纵向概述西方翻译研究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演进与发展。西方翻译思想自 30 年代以来逐渐由语文学阶段向语言学阶段发展,语言学阶段又可分为等值阶段和语篇语言学阶段。等值阶段的成分分析法和语篇语言学的功能分析法至今在翻译研究中仍起着重要作用。作者还提到了同样以语言学为基础的阐释学翻译理论,并肯定该理论提出的完美的翻译是不可能的说法。作者坚信翻译不会在真空中进行,而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二、从语言和文本的角度探讨翻译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首先在语言层上,作者主要着眼于"言外言语行为"的传译问题。提出两条指导原则:1."言外言语行为"的语言运用牵涉特定时期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等问题,辞典不可能涵盖每个词语的所有语境,因此翻译中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通则。2.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处理好直译和意译的关系。理想的译作既能忠实地传递原文语义信息,又能迎合目标语读者传达出其"言外言语行为"之意。本书还通过实例探讨了在这方面出现的 18 类实际问题。其次,在文本层上,作者认为译者不仅翻译语言片段,而且翻译整个文本、文化万象、诗学和意识形态。书中还将影响翻译过程的四大制约因素依次排序为:意识形态、诗学、文化万象和语言。三、阐述翻译在文化中的作用及前景。翻译在语言转换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以及所包含的思想意识和态度,对民族文化的交流、沟通与相互接受有着重要的影响。指出 20 世纪 90 年代来,翻译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翻译作品还是翻译研究,在学术领域中的地位都比较低。为改善这一现状,作者对翻译研究者提出三项要求:1.做好翻译;2.分析翻译作品;3.分析翻译作品在接受文学和文化中发挥的作用。

该书作者十分注重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不仅对翻译实践提出了许多实际可行的建议,同时也对翻译理论作了深入的探讨。无论是对翻译实践者还是对理论研究者来说,这都是一本颇具指导意义的好书。该书于 2006 年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印在中国发行。 (张芳)

换言之：翻译教程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莫娜·贝克(Mona Baker)著 英国 Taylor & Francis Limited 出版集团 1992 年

本书共分七章，书中对翻译中词的对等、词组的搭配、句子对等、篇章对等等问题分别作了详尽而系统的阐释。除第一章"导言"外，作者在第二章"词层的对等"中，重点阐述"不同语言之间词的不对等问题"，指出这种不对等有程度上的差异：有时完全不对等，有时部分不对等，并提出了八种处理方法。第三章论述"词层以上的对等"，着重在词的搭配和成语、固定表达法这两个方面。第四章讨论"语法对等"，分别论述了不同语言间词法、句法上的差异甚至语序问题。第五章为"篇章的对等：主体结构与信息结构"，讨论了在篇章这一层面构成信息流时语序所起的作用。第六章"篇章对等：词义连贯"是前一章的继续，研究篇章各个部分之间的语法、词汇关系，进而达到篇章的连贯顺畅。第七章"语用对等"是全书的终结，讨论了在涉及作者、读者和文化背景等变量的交际情境中如何使用语篇的问题。

本书既有较强的理论性，又具有实际指导意义。最大的特点是，理论结合实际，分析详尽，所有问题的研究始终不离翻译本体——文本语言的分析，从词的搭配组合到语法规则、语义结构再到语篇功能无不一一涉及，循序渐进，其理论范围涵盖词法学、句法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篇学、语用学等，理据充分，例证丰富。另一特点是，内容编排由简到繁，科学合理。全书从词、词组到句子再到篇章逐一展开，与汉语"集字成句，集句成章，集章成篇"之说不谋而合，采用的是自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的方式，语言简洁朴实，循循善诱，启发思维，易于不同层面读者理解和接受。同时作者在每章中还提出一些启发性的问题，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每章后另附几项练习题供读者思考和练习。

本书是迄今为止被广大读者一直看好的西方翻译教材之一，享有与纽马克《翻译教程》齐名的殊荣，对学习和研究翻译的读者而言，是一本值得信赖的高质量翻译必读教材之一。该书原版已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 2000 年重印在我国发行。 （贾文波）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著 英国 Routledge 出版社 1992 年

勒菲弗尔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于 1990 年和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共同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一说，从而使翻译研究脱离静态环境中语言转换的传统轨道，将其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本书着重探讨的不是文学创作的问题，而是那些自中世纪起就已经存在的对文学原作的改写现象。作者在书中首次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改写"(rewriting)。该概念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过程。作为翻译研究学派的重要作品之一，本书提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改写者往往会在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影响下，对文学原作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修改和调整，从而使文学作品能够更好地被改写者所处时期的读者所接受。随着文学作品的普遍世俗化以及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之间的交融，不仅仅是自主创作的文学作品在我们的研究视域中表演着独角戏，对文学原作的各种改写形式也逐渐显现出其在文学演变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作者在这一方面的深入探讨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本书共十二章，作者在第一章中首次提出"改写"理论并对其进行界定和分析，在第二章到第八章中分别探讨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论域和语言等各外界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和作用。作者认为翻译应被分为四个层次：意识、诗学、论域和语言，翻译不仅是字、词等语言层面的对等问题，更涉及翻译意识、诗学和论域等社会因素。因此翻译研究不应该被局限在传统单一的语言层面，而是应该深入到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多维立体环境中。本书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分别讨论其他四种形式的改写：撰史(historiography)、编选专集(anthology)、批评(criticism)和编辑(editing)。作者指出，在这些改写过程中，许多著名文学家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加以处理，这是因为改写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诗学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有意识地对文学原作加以调整和处理，以求其能更好地融入他们的文化体系，尽可能地被读者广泛接受。

本书于 2004 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重印在中国出版。 （马新强，屠国元）

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修订本)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Second Edition)* 爱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著 英国 Multilingual Mattes 出版社 1993 年

本书是巴斯内特(Bassnett)和勒菲弗尔(Lefevere)主编的翻译丛书之一，第一版由 Routledge 出版社于 1993 年出版，第二版更新了各学派的观点，增添了最新的研究结果。作者在书中对当代翻译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从科学论、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等不同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介绍了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直至今天影响甚广的几大翻译流派的主要观点，并对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出了预测。

全书共分七章。作者分析了五大翻译学派中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同时阐述自己的见解：1. 北美译坊学派：从理查兹(Richards)对文学作品的"实践性

批评”和文本细读方法对翻译的影响,庞德(Pound)要求对细节和意象的准确表达,到威尔(Will)的“翻译的悖论”,以及韦努蒂(Venuti)反思翻译中译者的“隐身”,北美译坊学派成员普遍强调研究翻译过程,要求保留原作的文学价值;2. 翻译科学学派:从乔姆斯基(Chomsky)句法学研究的“基本结构”到奈达(Nida)将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运用到翻译研究,从威尔斯(Wilss)的翻译科学说到德语国家的功能主义翻译,这一学派强调翻译本质和目的的研究,要求把科学客观的和不带价值评判的方法和程序运用到翻译研究领域;3. 早期翻译研究学派:受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列维(Levý)、霍姆斯(Holmes)和勒菲弗尔(Lefevere)等前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荷兰、比利时等低地国家的学者强调翻译要求译文有与原作艺术形式相同的效果,文学翻译不能丧失原作的文学性,巴斯内特甚至把陌生化当作评价译文的标准;4. 多元系统学派: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蒂尼来诺夫(Диниленов)的文学系统的演变到伊文-佐哈(Even-Zohar)关于系统内部文学的联系,该学派认为翻译在多元文化系统内与系统其他各层次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其中图里(Toury)又发展了伊文-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主张以观察、描写和解释等经验方法来进行翻译研究;5. 解构主义学派:其主要思想包括福柯(Foucault)的“解构原作”,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命名的限制”,以及德里达(Derrida)的“翻译和延异”等。解构学派认为,原作与译作是一种延续和新生的关系,不同的语言构成各种不同的表意方式,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存异”。后殖民主义在解构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了翻译在历史文化背景中的作用。

作者夹叙夹议,把各种理论放在历史的维度里进行讨论,分析各个流派的长处,研究各个不同学派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指出某些理论的误用和不足以及各理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该书对翻译研究领域影响甚广,同时对文化、文学理论等领域研究的学者都有借鉴和启发作用。该书已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 2004 年重印在中国发行。 (吴泳)

译稿杀青!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文集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霍姆斯(James S. Holmes)著 荷兰 Rodopi B. V., Amsterdam-Atlanta, GA 出版社 1994 年

本书作者詹姆斯·霍姆斯是低地国家翻译理论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研究涉及诗歌翻译和学科建设两方面。该文集共收录霍姆斯于 1968 年至 1984 年间发表的译学论文十篇,从内容上可分为两部分:

一、诗歌翻译(前五篇),主要介绍作者在诗歌翻译技巧方面的认识。这部分阐述诗歌翻译中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并对译诗形式进行了简明科学的划分:形式派生式、内容派生式(或有机式)、游离式(或变相式)。其中形式派生式又有两种不同形式:模拟式和类比式。作者还探讨了文学翻译中遵古与循今的译学之争及归化与异化倾向,保持原样性翻译与再创造性翻译等问题,并对传统的翻译对等标准进行了颠覆性论证。

二、翻译研究(后五篇),反映了作者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总体关注。作者全景式地描述了西方文学翻译研究的历程,指出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前翻译研究的种种不足,及其以后的一些新发展。作者还阐述了文学翻译过程的模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两层面、两映象、两层次的模式,并指出在翻译的不同阶段需要遵循的三种规则:推导规则、匹配(对应或对等)规则、投射规则。文集还谈到翻译的前景,作者罗列了翻译研究中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特别强调有实践经验的翻译家参与创建翻译理论的重要性。在所有的这些论文中,《翻译研究的名与实》是作者最重要的译论文章。该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翻译范畴作出了明确界定,首次勾勒出翻译研究的学科结构框架。作者在此将翻译研究分为纯粹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两大类,其中纯粹翻译研究又有两个分支,即描写翻译研究以及翻译理论。该文在翻译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被普遍认为是翻译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也是作者在翻译理论史上作出的巨大贡献。

本书作为霍姆斯文学翻译研究主要成果的结集,是翻译研究者认识翻译理论研究总体框架的必读著作。该书于 2007 年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印在中国发行。 (张芳)

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著 英国 Routledge 出版社 1995 年

本书是意大利裔美籍学者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代表作之一,也是研究西方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著作。该书通过提供一系列写就历史的谱系学理来干预当今英美文化中译者的处境和行为,追溯了从 7 世纪开始形成的英语翻译中的透明话语历史,揭示了作为通顺翻译起源的各种不同的文化霸权,使翻译可以为本土程式服务。这种翻译方法提示了翻译文本中同时作为或同时可以理解为典律化和边缘化的本土化过程,以重新评价它们在当代英美文化中的价值。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共七章,第一部分包含一、二、三章,主要阐述翻译作品的不可见性和归化翻译方法的历史渊源以及异化翻译的缘起;第二部分为四、五两章,介绍了意大利翻译家塔尔凯蒂(Tarcheti)对意大利文化的贡献以及“通顺”翻译在 20 世纪受到的挑战;第三部分为最后两章,作者结合当代意大利诗人德安吉利斯(De Angelis)的创作和作者自己的翻译实际提出了“阻抗式翻译策略”。

“隐身”一词是韦努蒂用来描述当代英美文化语境下译者的境况和翻译行为的术语,用来指两种相互制约的现象:一种是话语给读者造成的错觉效果,即

译者操控目的语文本后所造成的错觉效果;另一种是指长期在英美流行的对阅读和评价翻译文本的实践方式。他批判英语翻译中的归化策略,揭示翻译话语中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实质,进而提出“阻抗式翻译”的翻译策略。此举旨在为翻译确立自身的地位,即翻译可以被读作翻译,具有自身存在的价值,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将强势文化作品译入弱势文化的时候,归化的翻译是否也应该是抵抗霸权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呢?韦努蒂对此并未作出清楚的解释。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从语言到文化的转向,将研究层面拓展到诸如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上来。解构主义译学近二十年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主要表现为呼应文化转向,扬弃封闭的套路。韦努蒂顺应这一潮流,既使翻译学科定义得以延续并深化,又使富于使命感的西方人文主义译论在当代获得回应。该书原版已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重印在我国发行。（甘莉,贾文波）

描述翻译学及其他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著 John Benjamins 出版公司 1995年**

本书作者是以色列描述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多元系统论的基础上研究希伯来文学的翻译,提出以目的语为中心(target-oriented)的翻译观,强调以实证的方法对大量译本进行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从而找出目的语文化中制约翻译过程中种种决定的常规。他认为,翻译是受制于常规的,而翻译的常规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活动及翻译产品在目的语文化中的位置。

《描述翻译学及其他》是“描述翻译学派”(亦称“常规学派”)的代表著作。本书系统地阐明了描述翻译研究的方法论。作者秉承霍姆斯(Holmes)对翻译学的分类框架,力主在翻译学范围内建立基于方法论的、系统的描述翻译学分支学科。霍姆斯将翻译研究分为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其中,纯翻译研究下的一个分支叫做描述翻译研究。在霍姆斯之后的20年中,描述翻译研究是翻译研究中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图里以多元系统理论为框架,集中研究了翻译文学如何受到目的语文化,特别是其文学传统的影响。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常规理论的研究上,认为描写性翻译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发现制约翻译活动的潜在性常规,并揭示出它们如何影响译者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作者在书中引进了“常规”(norms)概念,即社会文化对翻译的约束力,它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一个是总体性的、比较绝对的规则(rules);一个是纯粹的独特性(idiosyncrasies)。常规是解释社会活动的最根本的概念,是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解释文化、翻译活动的关键。作者之所以引入“常规”理论,是希望借此对翻译活动及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及变异作出解释。

作者提出,应把描述翻译学列入翻译研究的分支学科,并认为该分支学科具有理论和应用并重的双重属性。本书在探讨方法论的同时对不同类型的个案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强调了上下文语境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全书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描述翻译学这一分支在翻译研究中应处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进行系统的方法论探讨,构建描述翻译学的理论依据,为随后的个案研究作必要的铺垫。第三部分是个案研究,认为任何个案研究都应遵循同一个指导原则,即将每个问题都置于更高层次的上下文中加以研究,既考虑整个文本和行为方式,又考虑文化背景。第四部分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对翻译进行描述性研究获取的知识有何用处?由于为翻译实践活动制定法则和提供启示超越了目前描述翻译学的研究范围,作者另外加以阐述,书中的“及其他”即源于此。

赫曼斯(Hermans)认为,图里在该书中的理论基本上是重复他1980年《翻译理论探索》中的观点;也有人认为,作者填补了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而且将霍姆斯提出的翻译学构想变成了现实。该书被广泛认为对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读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该书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2001年引进在中国发行,被不少大学用作研究生指定参考书。（王华玲,屠国元）

翻译的模因 ***Memes of Translation*** **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著 荷兰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年**

本书是集中讨论翻译规范的著作。作者针对当时翻译理论的研究状况,提出了翻译模因论,试图把各自为政的翻译研究整合起来,构建一个互为连贯、系统的翻译理论框架。他借用社会生理学中的“理念因子”(meme)一词,在图里(Toury)的相关理论基础之上,对翻译规范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规范的来源、规范对具体翻译活动的影响、规范背后的价值观等,首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构建出自己的翻译规范理论。

全书共七章,按照从理论到实践的体例进行编排。第一章为“模因的生存机制”,介绍翻译的五种超级模因,并提出一种“波普尔式”模因理论。第二章为“翻译模因的演化”,以先后顺序介绍八种不同的翻译文化基因。第三章为“从模因到规范”,指出规范是描写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当某一模因被某一社团广泛接受后便成为规范。同样,当某一翻译模因在某一时期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翻译模因就演化成了翻译规范,而其他翻译模因则处于被压制的弱势地位。第四章为“翻译策略”,介绍翻译策略的特征及分类。第五章为“作为理论的翻译”,介绍翻译作品的五种评价模式,即回溯性评价、预期性评价、侧面评价、内省式评价和教学性评价。每一种评价模式都有相对应的翻译规范。第六章为“翻译能力的发展”,介绍规范与翻译教学和培训。第七章为“论翻译的道德标准”,指出

制约翻译规范的道德标准有四种：明晰、真实、信任和理解。大多数译者似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信奉这些价值观。总的来说，书的前三章探讨翻译规范的形成，第四至第六章讨论各种规范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最后一章讨论隐藏在翻译规范背后的道德价值。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理论性强。作者提供了多种理论视角，探索了研究翻译的多种途径，并给出一个将各种互不相关的翻译观点联系起来的概念性结构——模因；受哲学家波普尔(Popper)的影响，作者提出了一种"波普尔式"翻译理论，把翻译史看做是不同翻译文化基因的更替，或是文化现象的传递过程。模因的隐喻则指出翻译过程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作者还纠正了历来质疑乃至否认翻译理论存在的观点，指出没有理论指导的翻译是盲目的翻译；理论是翻译过程中思维和决策的基本工具，对译者、学生和教师大有裨益。尽管书中的某些论述还不够具体充分，但对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的指导意义显而易见。

(陈明玉)

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著 英国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年

本书为诺德的翻译理论代表作，是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作品系列之一，亦是了解西方功能翻译理论的必读书籍。

全书除导言外共分九大章。第一章"历史回顾"对功能翻译理论(特别是德国功能学派)的形成过程作了简要的梳理。第二章"翻译与行为理论"从翻译互动、意图互动、人际互动、交际行为、跨文化行为以及文本加工行为这六个方面对翻译行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特别是对翻译的"人际互动"关系，即翻译活动参与者的作用做了明确的阐释。第三章重点阐述了功能翻译学派核心理论"目的论"的实质及其基本概念、翻译要求、语内与语际连贯、文化概念与文化特质、充分翻译与对等翻译、文本分类的作用等内容，提出了"目的论"的三大法则(连贯法则、忠实法则、目的法则)及其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第四章讨论了功能翻译学派的重要思想——"译者培训"理论，为本书重点之一。作者在布勒(Bühler)的三大语言功能基础之上，增添了文本的"寒暄功能"，并据此提出了"纪实翻译"与"工具翻译"两大翻译法，还通过实例就分析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按翻译要求、文体规约等进行实际操作进行具体阐述。第五章讨论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运用，对如何跨越文学翻译的文化障碍提出了具体的各项"对等要求"，并作了一些个案分析。第六章论述如何将功能翻译理论运用于口译的问题。第七章详细举例说明了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自形成以来受到的各种批评，并针对批评中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第八章为本书又一重点，明确提出了作者的"功能＋忠诚"原则这一新概念，该原则不仅可以防止目的论成为一种滥用模式，而且可减少"激进"功能主义的规定性成分。第九章在总结世界各地功能翻译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之上，对功能翻译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展望。

本书脉络清晰，要点突出，语言简洁，是作者第一次用英语对功能翻译理论的形成过程和基本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对该理论在译者培训、文学翻译和口译中的运用以及对译者翻译道德观念的影响等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使功能翻译学派的核心内容更加明确。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德国功能翻译学派领军人物之一，作者还在书中首次提出了翻译"忠诚"原则，强调"忠诚原则"是一种"人际范畴"，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指出译者、原文发送者、目的语接受者和翻译发起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不同于对等论中的"忠实"观。这样就形成了"功能翻译理论"中"目的原则"和"忠诚原则"这两大基本原理，拓展和完善了功能翻译学派的理论体系。该书原版已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 2001 年重印在我国发行。

(贾文波)

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道格拉斯·鲁宾逊(Douglas Robinson)著 英国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年

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翻译史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然若非覆盖面不广，就是篇幅有限，本书正好弥补了这些缺陷，是西方翻译史(20 世纪之前)研究领域里迄今最为完整、翔实、颇具参考价值的著作。

全书收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 90 位代表人物的 124 篇作品，均为 20 世纪以前西方各个历史时期主要的翻译理论著述，其中含九位女性论述翻译的文献，历史跨度长达 2 300 年之久。原文非英语的文献有 90 篇，其中有些史料首次以英译出现。本书所论话题几乎无所不包，从翻译的方法、技巧、过程、本质、原则、标准到语言特征和文化特征、原文和译文以及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等。除收集了大量论述翻译问题的理论性文献外，还有各个时期的相关文献；选材不局限于传统的"逐字译""直译""意译"或"自由译""怎么译"等话题，将关注的范围扩展到那些讨论较为抽象、宏观问题的篇什；有些文献未直接论及翻译，但从不同侧面涉及与翻译相关的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因其在《历史》中有两节讨论了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如何交流的问题，也被纳入本集。这样就将西方译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约 400 年。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结构严密，史料翔实，注解详尽，文字通达，可读性强。全书按历史人物的先后排序，不论国别，不分地域，凸显了西方传统和西方整体意识。每个人物独立成篇，每篇分为三部分：背景介绍、所录作品和注解；包括作者生平、著述及其历史

评价和影响,并伴有大量的脚注。非英文原作的译介相当成功,既考虑到作品的历史特性,又关涉读者的接受,其译文流利,通达可读。不过本书在重要史料文献的收集方面仍不够全面,对于欧洲其他主要语种的史料挖掘明显不足,如未涉及东欧诸国,尤其是未能把极具代表性的俄罗斯翻译理论纳入在册。 (肖志兵)

翻译与语言:语言学理论解读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 彼特·福西特(Peter Fawcett)著 英国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年

本书是为不太了解语言学的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撰写的专著。诚如作者所言,受语言学影响的翻译研究主要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本书的重点正是介绍这一时期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鉴于语言学的影响此后从未中断过,而且近年来又有卷土重来之势,作者还介绍了语言学的一些最新进展。

全书共十二章。第一章介绍语言学的几个最基本的概念;第二章至第五章介绍与词的翻译相关的语言问题;第六章介绍超越词层语言单位的翻译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学问题;第七章至第九章介绍超越句层语言单位的翻译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学问题;第十章介绍社会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相关的问题;第十一章介绍语用学与翻译研究相关的问题;第十二章介绍心理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相关的问题。可以说,本书始终是围绕语言学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的。近年来,许多语言学家声称对翻译理论不感兴趣,一些翻译理论家甚至还指责语言学中拿不出任何东西可供翻译学借鉴。本书作者不完全赞同这种对语言学持怀疑的态度,也不一味地将语言学视为翻译研究的救星,而是相信翻译中有许多方面可以通过语言学加以描写和解释,因此强调译者要对语言学有基本的了解。作者还认为早期关于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主要集中在对比语言学方面,而对比语言学并不等同于翻译语言学。不过他并未界定出何为翻译语言学,只是相信关于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应当在对比语言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上升到篇章的结构和功能;书中还讨论了翻译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翻译如何受到发生时间和地点的制约。

本书论点鲜明,内容翔实,是当代翻译研究中的一部力作。该书于2007年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印发行。 (黄荃)

翻译史研究方法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著 英国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8年

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兴盛,翻译史著作日益增多,但质量良莠不齐。作者认为,治翻译史同样需要研究方法的规范。本书正是为解决治翻译史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包括如何选题、如何写作、有何研究意义等问题而撰写,它的出版对翻译史写作和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书共十二章,分别论述翻译史研究的历史、重要性、编纂书目、操作定义、频率、网络、规范与系统、共有系统、原因、译者、交互文化、交叉学科等专题。全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一至六章)注重联系实际,围绕怎样撰写翻译史这一主题,详细论述编写翻译史的方法,包括选题、编纂译作书目、绘制图表、运用统计数据、用各种线索确定不同史实之间的联系等;第二部分(七至十二章)侧重理论问题的探讨,主要介绍如何研究翻译史,运用何种方法,如何解释翻译活动形成的原因及其内在规律。作者在前言中拟定了四条研究规则:1. 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为什么译作会出现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即翻译史应回答翻译的社会起因;2. 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上下文系统或语言方面的特点,而只能是作为人的译者;3. 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故翻译史的撰写需要围绕译者及其经历过的社会环境展开;4. 翻译史应表达、讨论或试图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个人的主观介入不可也不应避免,反而需要大力提倡。

本书的主要特色如下:一、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翻译史。皮姆把翻译史看成是翻译研究中一个完整、独立的领域,与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同等重要;研究对象是作为人的译者以及他们的社会行为,尤其应注意译者的多重身份及从事翻译的多重目的。他认为翻译史是跨文化史的一部分,是一门交叉学科,至少可以分为三个研究领域:翻译考古学、历史批评和解释(翻译行为发生的意义等)。二、全书前后两个部分交相呼应,相得益彰,前一部分相当于一本翻译史写作教材,其指导性和实用性均较强;作者以人为本,视野开阔,眼光独到,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可惜没能论及女性译者的特点;此外全书语言极具个性,写作以口语为主,清新易读。该书于2007年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印发行。 (肖志兵)

系统中的翻译 *Translation in Systems* 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著 英国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年

本书作者是描写翻译学与多元系统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70年代,西方随着系统概念的提出,加速了翻译研究的革命。作为描写翻译研究的一种,系统理论打破了规约翻译研究着眼于"翻译应该怎样"的讨论,转而鼓励研究者探索翻译在具体文化背景中的作用。作者在书中详细追溯了当代描写翻译学的产生与发展,并概要地介绍了该学科的基本理论。该书集中对描写翻译学的各流派进行了梳理与分析,阐释了"描写及系统理论"中的一些主要问题。

全书共分十二章,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解释翻译研究的描写及系统范式。作者认为,"翻译研究"现在一般指整个翻译学科,其新范式是"描写及系统范式"。书中通过回顾约翰·麦克法兰(MacFarlane)、列

维(Levy)、波波维奇(Popovič)等学者的观点,介绍了"描写及系统范式"的来源及其理论形成,并概括了各种观点的共同特点。二、对描写和系统理论中的主要观点予以阐释和批评。作者讨论了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规范、对等、多元系统、社会系统等,同时对图里(Toury)的描写翻译学理论、伊文-佐哈(Even-Zohar)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此外作者还引入了其他各种系统理论,分别介绍了列维、霍姆斯(Holmes)、伊文-佐哈、图里(Toury)、勒菲弗尔(Lefevere)、兰伯特(Lambert)等人的观点,特别提到了布尔迪厄(Bourdieu)和卢曼(Luhmann)的新观点。三、指明今后翻译理论与方法论研究的方向。作者在最后一章中指出"描写及系统范式"未来的研究方向有三:第一是加强翻译史的研究;第二是寻找合适的角度或辅助机制来研究翻译;第三是加强理论研究。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作者把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历史现象来研究,探索翻译的背景及制约因素,并寻求新的解释方法。其次是作者的论述透彻深入,覆盖面广;另外本书中用大量篇幅阐释"描写及系统范式"的一些主要概念和观点,其阐述理论性强,条理清楚,有助于初学者对这一学派的深入理解。作者对如何进行翻译研究这一现实问题的关注,使本书成为翻译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学术参考著作。 (张璐)

翻译与规范 *Translation and Norms* 克里斯蒂娜·谢芙娜(Christina Schäffner)编 英国 Multilingual-Matters Ltd 出版社 1999 年

本书是一次专题论坛的成果,主题围绕图里(Toury)和赫曼斯(Hermans)关于"翻译规范"的概念展开,通过各翻译理论家对翻译中的"对等"概念的两次争论,将"翻译规范"的概念与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中的各种课题相互交织。编者认为,规范是社交过程的产物,是一个社会科学概念,是社会行为的准则。在翻译中引入"规范"概念,就是要将翻译置于社会之中,并把它当作社会活动来研究。

最先在翻译研究中引入"规范"概念的是图里,他认为,翻译时帮助译者作出决定的基础是"翻译规范",译者的选择实际上是对规范的选择。另外由他引入的"对等"概念,也是本书的辩论焦点。图里的"对等"概念和传统的规定性的定义不同,它不具备实际语言上的单一固定的等值,而是拥有描写性的定义,属于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对等"代表译文与原文的一种关系,它随"规范"的变化而变化,即不同的文化、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对等"概念。赫曼斯则反对在规范理论中使用"对等"的概念,他认为翻译理论突出的是翻译中表现出来的权力关系、价值取向,突出的是"操控"。翻译不是桥梁,不是双向交流;翻译从来就是单向的,反映的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第二次争论中,切斯特曼(Chesterman)就"对等"的问题提出一种折中立场,提出用"相似"来代替"对等"。这次争论中由赫曼斯提出的后现代观念,基本上否认了图里、切斯特曼等人的"客观描写",认为描写不可能不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同时切斯特曼、皮姆(Pym)、吉尔(Gile)等分别从理论、教学、实践等方面做了补充。而现代语言学家也注意到"对等"概念的缺陷,因为单在语言层面译文往往也与原文不会对等。雅各布森(Jakobson)的"对等"就包含了"差别",卡特福德(Catford)则描述了在语言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超出"形式对应"的位移现象,维奈(Vinay)和达贝尔纳(Darbelnet)也提到了几种"间接翻译",即"非对等"翻译,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则把"对等"称为一种"幻觉"。"规范"的理论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范畴,同时也受到来自激进派和传统派两方面的批评。以国际译联副主席布什(Bush)为代表的激进派认为图里倾向否认翻译研究的主观性;传统派的批评以纽马克(Newmark)为代表,他始终坚持翻译是对真理的追求,翻译研究要从"求同"入手,他还使用了"近似"一词来讨论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本书在讨论翻译与规范概念的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问题,以引起对翻译有关的社会、历史、文化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思考。该书于 2007 年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印发行。 (龚桂芳)

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玛丽亚·蒂莫奇科(Maria Tymoczko)著 英国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年

传统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在两种平等的文化之间的一种自由交流信息的行为。但在后殖民语境中,翻译活动是在殖民地与帝国主义宗主国两个不平等的文化中进行,它受到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环境、权力斗争关系以及译者自身身份地位的影响和操控。本书作者通过对早期爱尔兰的英雄史诗《库秋林》(*Táin Bó Cúailnge*)多个英译版本的研究,旨在向人们展示翻译家对英国殖民主义及其文化压迫的反抗方式。

全书除引言外共十章,内容可概括如下:1. 翻译是一种改写行为。在爱尔兰爱国运动的政治背景下,《库秋林》的英译被看做重塑爱尔兰古老文化原型的手段。译者对原作有意改写、节译,以转喻,即部分代替整体的方法,改变原作人物形象。译文回避原作中不符合政治需要的内容,以此号召爱尔兰人民反抗殖民压迫,投身民族主义运动。2. 翻译是一种殖民暴力行为。在后殖民语境中,为了得到殖民地读者的接受,或为了改变爱尔兰文学被视为落后文学的地位,或因译者本身受殖民文化影响,译者在翻译时有意识地对爱尔兰文学传统进行改写,从形式到内容改变原作,使其与英国的文学传统接轨。这实际上是殖民主义对译本的暴力,也是强势文化操控弱势文化的表现。3. 翻译也是殖民地人民一

种去殖民化的行为。为颠覆殖民文化,重塑自身文学传统,译者有意识地采取陌生化的译法,保留爱尔兰语言的行文习惯和语言结构。直译原文和大量加注,使读者更加关注原文的文化传统,这是对英国文学经典的一种反叛。

作者治学严谨,博采众长,每章末均附有大量注释,既有各种相关翻译理论的介绍,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本书对英国第一个殖民地文化轨迹的开创性分析,是对后殖民主义研究的重要贡献,也为研究其他有过类似殖民遭遇的文化提供了一个参照模式。

(吴泳)

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恩斯特·奥古斯特·格特(Ernst-August Gutt)著 英国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0 年**

本书是作者 1991 年博士论文完善后的再版,是第一部从关联理论切入翻译研究的学术专著。

全书分三大部分,共七章。第一章为"艺术的地位:评论综述",对翻译研究的现状作了简要介绍与评论,肯定了翻译研究属于交际范畴的说法,为关联理论用于翻译研究做了相应铺垫。第二章为"关联论途径",简要介绍了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关联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作者对关联理论基本概念的阐述。第三章至第七章为本书主体,作者在介绍各翻译流派的同时,阐明了关联理论在各种颇有争议的翻译现象中的应用与发展。其中第三章"隐性翻译"指出在跨语际交际中,译文与原文是否吻合有时对交际过程并无多大影响,在关联理论原则下,对这类现象应该用描述性的方法予以解释。第四章"翻译原文意义"对译文必须保留原文语义的观点进行了深度分析,并讨论了如何处理翻译中"二级交际情境"所导致的问题。第五章"翻译:跨语际阐释性运用",从译者和读者的角度分别对"语际阐释"的忠实性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第六章"翻译表达的内容"分析了当翻译只为保留原作文体特色这一狭义概念下翻译的可能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交际线索"这一概念及其"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法。第七章"翻译的一元化认识"首先就"交际线索"与"直接翻译""间接翻译"的关系和定义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论证了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翻译概念,都是从关联理论体系中自然衍生的产物,最后讨论了利用翻译进行成功交际的必要条件。

本书打破传统理论解释翻译本质的交际模式,明确提出关联理论原则下的明示-推理交际模式,强调翻译模式的交际本质,其目的是让译文读者在理解译文文本时能正确推导出原作者的意图。本书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创新性,是作者首次将关联论这一语用学原理恰当自然地运用到翻译研究领域,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该书原版已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 2001 年重印在我国发行。

(贾文波,邓谧)

解构主义与翻译 ***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凯瑟琳·戴维斯(Kathleen Davis)著 英国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1 年**

本书是一部从解构主义视角分析翻译学的理论著述,2001 年收入皮姆(Pym)所编《翻译理论阐述》丛书第八辑。全书阐述了法国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的早期研究成果,并以此为突破口重新思考了翻译中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通过对德里达早期作品的细读,作者详细论述了德里达的诸如"撒播""异延""增补"等与翻译理论有直接关联的概念,纠正了学术界对德里达的误读。德里达最基本的解构策略是要解构传统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在一个特定的时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异延"是差异的游戏,是差异、区分及延搁推迟。德里达认为,符号不存在同一性,能指和所指之间是有差距的,且差距难以弥合,意义在差异中扩张与发展,异延使意义难以确定,造成了现时的不在场,因而,意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文本是运动的、开放的。作者借鉴德里达的这些解构主义思想,通过对德里达作品的不同英译的分析,深入阐述了解构主义对翻译的指导意义。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共六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从解构主义视角探讨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立足解构学说阐释其对翻译理论的意义。作者认为,如果没有本源,没有超验的意义,就不可能视翻译为意义的传递或是对原文被动的再现,因此应考察译者在翻译中作出的决定和承担的责任。译者由于各自的经历和所处时代的不同,往往对原文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经验,故在原文不断被改写、转换、组合的过程中,译文往往或多或少留有译者经验的痕迹。戴维斯对这一复杂领域的审视,从对作为指涉问题模式的专有名词分析入手,修正了对限制、单一性、普遍性、文本定义、写作、可重复性、意义和意图等语言学概念的理解。

书中详细论述了解构主义对翻译理论产生的指导意义,从而使得对可译性的理解更加深入和丰富。作者在理论论述过程中还对翻译的两种方法——语言学方法和交际法——进行了尖锐批评,同时还通过对"关联"翻译理论的考察,探讨了翻译学与伦理学的相互关系。作者首次明确提出,翻译与解构一样,都是一种风险承担行为。

概言之,本书是对解构主义与翻译彼此充实与融合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思考。该书原版已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 2001 年重印在我国发行。

(辛红娟)

翻译研究语料库入门 ***Introducing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梅芙·奥罗汉(Maeve Olohan)著 纽约 Routledge 出版社 2001 年**

该书是作者从事翻译语料库研究的总结,重点探讨翻译研究语料库的应用,为熟悉翻译研究但缺乏语料库知识的研究者介绍语料库方面的知识。全书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十章。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绍翻译研究

中语料库运用的理论背景。第三章和第四章介绍翻译研究中常用的两种不同语料库：平行语料库和对比语料库。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聚焦于语料库的设计和语料库的分析工具问题。第七章和第八章总体回顾翻译研究语料库的使用方法。第九章和第十章为如何在译员培训和翻译实践中使用语料库提供有益建议。

本书对语料库运用于翻译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困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就方法论而言，作者提倡不同类型语料库的结合使用和跨学科研究。书中虽然没有多少原创性观点，但介绍的研究方法为有志开展翻译语料库研究的读者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指导。作者认为，语料库作为翻译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具有明显优势。借助平行语料库可进行双语词典编撰、翻译教学和译员培训等。此外，借助可比语料库还可研究翻译规范、发现翻译的普遍性，也可对译者个人所偏爱的语言使用形式（如句长、词频、句型、搭配方式）进行量化研究，发现译者的翻译风格，还可以通过语料库来验证翻译性质的有效性和翻译方法的可行性。但语料库方法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如在使用平行语料库时，作为分析工具的词语索引有时不能提供足够的语境，会妨碍对语义现象的分析。语料库软件开发和语料库资源共享也一直是难题。此外，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实证主义倾向可能会导致研究者更加强调翻译规范，忽略译者的主观创造性。

本书在写作中采用了不少个案来阐释理论观点和讲解语料库分析技巧，还提供了图表、数据表、术语表和索引等，每章末都推荐了阅读书目，绝大多数章末配有问题供读者讨论，这些都有利于读者进行更深入研究。概言之，本书实用性强、论述简洁且具有前瞻性，为翻译语料库研究提供了实用的分析框架和清晰的方法论，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入门书。 （黄勤）

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著 阿姆斯特丹/费城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年

作者在书中指出，翻译研究这门学科已发生过多次转向，需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加以描写。书中对翻译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回顾和评价，重点论述了最近20年来的新发展，并对其未来的走向作了预测。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语用转向使翻译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80年代的文化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了它的基本框架。本书共六章。第一章和第二章追溯了翻译研究80年代在低地国家、以色列、英国、德国、芬兰和巴西等国发生的文化转向，分别介绍了描述翻译研究、目的论、翻译行为论、解构主义或"食人主义"（cannibalism）等翻译理论，并对一些使学科研究范式发生重大改变的重要论述进行了点评。作者认为，80年代翻译研究主要呈现出两大派别：一是在多元体系的基础上为文学翻译提出了一个新范式，创造了描述翻译研究这一派别；二是弗米尔（Vermeer）开创的、主要以德语为写作语言的功能学派（包括目的论和翻译行为理论）。与描述翻译研究相比，目的论可以应用到本学科更多的领域中。第三章和第四章对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盛况作了分析，着重谈及这一时期交叉学科研究和一些重要术语的引入。例如图里（Toury）的"规范"（norms）和切斯特曼（Chesterman）的"模因"（memes）以及翻译伦理等问题。作者认为，翻译伦理的大讨论仍将继续，翻译研究的"道德转向"即将开始。第四章总结了翻译研究90年代经历的两大基本"转向"：一是方法论上的转向，翻译研究者对笔译和口译进行了更多的实证研究；二是研究手段的转向，计算机辅助翻译和翻译语料库的建立在翻译研究中占有了相应地位。第五章评述了翻译研究在21世纪初的发展状况。"回归语言学"研究成了热门话题。作者认为，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看法，其主要原因是跟这些学者相关的学术背景或思想派系有关。第六章预测了翻译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指出翻译研究近年出现了"意识形态转向"和"社会学转向"，这种转向是否创造了学科的新范式还存在争议，但作为一种取向，给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张顺梅）

译 学 百 论

1. 国内译论

马建忠(1844～1900)

字眉叔，别名乾，学名马斯才，江苏丹阳人，生于丹徒(今镇江)。1876年，由清廷派往法国留学。精通英、法、拉丁语，兼谙希腊文，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任中国驻英、法公使郭嵩焘与李凤苞的随员。回国后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著有《适可斋记言记行》。1898年撰成《马氏文通》，这是我国用近代语言学观点编写的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至今仍被公认为我国语法学的经典著作。1894年他向清廷呈递了著名的奏折《拟设翻译书院议》，不仅提出了"善译"主张，而且还就设翻译书院的宗旨、生源、学制、师资、课程设置、规章制度、教学管理、应译之书等九大方面予以条分缕析，吹响了振兴翻译事业、挽救民族危亡的号角，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份宝贵财富。马建忠在奏折的篇首说：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语言，而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夫中国于应译之书既未全译，所译一二类又皆驳杂迂讹，而欲求一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而造其堂奥，足当译书之任者，横览中西，同心盖寡。则译书之不容稍缓，而译书之才之不得不及时造就也，不待言矣！(转引自罗新璋 1984：126～127)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阐述了两个方面：其一，提出了"善译"的翻译思想，并从"善译"的条件、过程、实质和效果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二，分析了当时的外语现状，进而论述了设立翻译书院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此外，马建忠还在这篇奏折中提出了设立翻译书院的宗旨、课程设置、应译之书等方面：

翻译书院之设，专以造就人才为主。诸生之入院者，拟选分两班，一选已晓英文或法文，年近二十而资质在中人以上者十余名入院，校其所造英、法文之浅深，酌量补读，而日译新事数篇以为工课。加读汉文，如唐、宋诸家之文，而上及周、秦、汉诸子。日课论说，务求其辞之达而理之举。如是者一年，即可从事翻译，而行文可免壅滞艰涩之弊。

选长于汉文，年近二十二天姿绝人者亦十余名，每日限时课读英、法文字，上及辣丁(现译拉丁)、希腊语言。果能工课不辍，用志不纷，而又得循循善诱者为之指示，不过二年，洋文即可通晓，然后肆力于翻译，收效必速。盖先通汉文，后读洋文，事半功倍，为其文理无间中外，所异者事物之称名耳。(转引自罗新璋 1984：127～128)

马建忠把亟须翻译之书，分为三类："一为各国之时政"，如"上下议院之立言""各国外部往来信札、新议条款、信使公会之议"。二是"居官着考订之书，如行政、生菜、交邻诸大端所必须者。"三是"外洋学馆应读之书"，如"万国史乘，历代兴废政教相涉之源……"由此可见，奏折把当时的待译之书分为政法、社科与科技三大类，提出了要培训这三方面的翻译人才(转引自林煌天 1997：461～462)。 (贺爱军)

严复(1854～1921)

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4岁考入了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接受了严格的自然科学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朴次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醉心于西方的文物制度，潜心研读西方政治学术理论，尤为赞赏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1879年回国后在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执教，继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教习、总办。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战败深深地刺激了严复，他以深邃的西学素养，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倡新叛旧，尊民贬君，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自此他名声大振，积极参加维新变法运动，与人创办维新喉舌《国闻报》。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严复遭受重大挫折。自义和团起义到辛亥革命的十年间,严复倾全部精力于翻译西方启蒙学者的学术著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他翻译了《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了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其后,他又陆续翻译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斯宾塞(Spencer)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法意》等,首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严复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观趋于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1921年10月27日病逝于乡里。

严复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他的著述有《俞懋堂诗集》、《严几道文钞》、《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等。然而,严复一生对社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翻译方面。自1898年起,他先后翻译出8种重要的社会科学著作,率先把西方学术思想系统地引入中国。发表的译著包括《天演论》、《穆勒名学》、《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名学浅说》、《劝学篇》、《中国教育议》、《支那教案论》等,译作达170万字以上,外加注释17万字。"严复翻译名著的目的十分明确: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发挥启蒙作用,促进变法维新,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以实现其'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译《天演论》是为了传播'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原理,反对当时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保守思想,向全国人民敲响祖国危亡的警钟;译《原富》等书旨在引进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的基本原理。"(林煌天 2005: 812)"他译《名学》,则在于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提倡归纳法,反对先验主义。"(马祖毅 2004: 382)经他译介引入的思想推动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成为"五四"时期先进分子的思想启蒙读物。蔡元培评论道:"五十年来介绍西方哲学的,要首推侯官严复为第一。"毛泽东也高度评价严复:"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写道:"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翻开一看,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还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转引自方华文 2005: 17)严复是近代中国译坛第一人,他的译著和思想成为中国翻译史上不朽的典范和里程碑;他是译事的楷模、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奠基人。

"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核心。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明确提出:

>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
>
>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转引自罗新璋 1984: 136)

钱锺书认为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都出于支谦所撰《法句经序》。严复引用了儒家经典《易经》和孔子的论述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并吸收了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在总结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基础上,进行高度理论概括和升华,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成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核心。关于"信达雅"的关系,严复认为,翻译应求其"信",但如不"达",等于没译,所以在"信"之外还得求"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严复提出的"雅"是指"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转引自罗新璋 1984: 136)由此可见,所谓"尔雅"就是要用汉代以前的字法句法,讲究"修辞",要有"文"采,以期"行远"(流传)。严复提出这个标准是有其特定的翻译对象的,即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精理微言"。这类著作,确实不大适宜用过于"利俗"的文字;同时这个标准的提出是有特定的读者对象的,即19世纪末中国的士大夫、上层知识分子和官僚。1902年严复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对"雅"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 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曰:"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期是耳。且执事既知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矣,而其论中国学术也,又谓战国隋唐为达于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矣,则直用之文体舍二代其又谁属焉?且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晚近世之文章,以与其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在学术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至于律令体制,直谓之无几微之异可也。若夫翻译之文体,其在中国,则诚有异于古所云者矣,佛氏之书是已。然必先为之律令名义,而后可以喻人。设今之译人,未为律令名义,闯然循西文之法而为之,读其书者乃悉解乎?殆不然矣。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转引自罗新璋 1984: 141)

综合上述,"信、达、雅译事三难"的提出,继往开来、言简意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梁启超、郁达夫、周作人、沈苏儒等对此有高度的评价。梁启超说:"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郁达夫说:"信、达、雅三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周作人也说:"信达雅三者为译书的不刊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其权威是已经确定的了";(转引自陈福康 2000: 111)沈苏儒指出:"历史已经证明,'信、

达、雅'理论80年以来一直在对我国的翻译工作起着指导作用,至今还有它的生命力。许多学者先后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翻译原则(标准),但看来还没有一种能够完全取代它。"(转引自韩江洪 2006:9)

"达旨"——翻译策略的集中体现。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还提出了"达旨"的翻译策略。"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转引自罗新璋 1984:136)严复自己也承认他的这种"达旨"式的自由译法非翻译正法,不希望后人学习。他在译《原富》时,对其中有些地方"文多繁赘而无关宏旨,则概括要义译之",有些地方"所言多当时琐节,则删置之",并不是严格的直译。同样他在《名学浅说》译者自序中说道:"中间义指,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朋友或訾不佞不自为书,而独拾人牙后慧为译,非卓然能自树者所为。"(转引自罗新璋 1984:146)贺麟认为严复这种"达旨"、删节、换例译法"实在为中国翻译界创一新方法。……若能用得恰当,也是译外国书极适用的方法。"(转引自罗新璋 1984:152)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谨的翻译态度和对译名的厘定。严复的翻译态度极其严肃认真,可谓"字字由戥子称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他采用"达旨"的方法进行翻译和加了不少"案语",正是对读者负责和治学严谨的表现。严复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从译名的厘定中可见一斑。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译名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定名"的原则,而且在实践中严格遵守。严复在"《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中把译名的厘定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他说:"今夫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言之必有物也,术之必有涂也,非是且靡所托始焉,故曰权舆。识之其必有兆也,指之其必有棨也,否则随以亡焉,故曰归宿。"(转引自高慧群,乌传衮 1992:109)由此可见,严复把译名的厘定看做翻译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正确的译名,整个翻译工作就没有依托,就会失去载体,就没有统一的认识,就会以讹传讹,造成种种歧义和谬说。高慧群和乌传衮在《翻译家严复传论》中把严复的定名原则归纳为六条:

一、要十分重视专名的译法,对译名有严格的要求,那就是"名词者,译事之权舆""言之必有物也,术之必有涂也,非是且靡所托始焉""识之其必有兆也,指之其必有棨也"。

二、寻根求源,力争追索到外文词的词源本意与词义演变,以及探明多义性的使用搭配情况。如rights一词的译法,严复在初定译名之后三年才认为得到了足够可靠的论据。

三、尽量找出中文旧有名称,如二者含义相当,便可沿用。

四、对新名作出界说,赋予其一定的含义,有的明确规定其内涵和外延,使使用者获得同样的概念。

五、将中西文词汇意义参照对比,衡量得失,自行命名。如liberty一词,曾有人建议译为"公道",严复举出该词的同义词、反义词来反复对比,认为这个译名不妥,应该译作"自由"。

六、对于已定译名,也不强求统一。

另外,严复也提出了重视"译才"的思想,论述了如何办好译书局、如何翻译课本等。 (贺爱军)

张元济(1867～1959)

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1892年清光绪壬辰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主事。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达70年之久。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创始人。他最初请几位留学生翻译东西各国科学书籍,后来编译人员增至百数十人,馆外帮忙的还不在其内。商务编译所首先按照学期制度编辑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按课本另编教授法,定名为《最新教科书》,开中国新式学校用书的新纪录。

在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期间,除以编撰学术课本作为重点外,还侧重于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如严复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等。还有工具书字典辞书的编纂,如陆尔奎、高梦旦、方毅等主编的《辞源》,始于1908年,历时八载而后成,于1915年出版,行销甚广。又如1902年印行《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4年出版了邝其照编的《华英字典》,都是我国最早自编的外语字典。

1897年9月20日(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由张元济带头,与工部主事夏偕复、内阁中书陈懋鼎、王仪通四人,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送上呈文,要求批准他们在京创办"通艺学堂",以"讲求文字术艺之学"。张元济在呈文中对外文学习和翻译,对"西学"都有了深刻的认识:

数月以来,悉心研究,觉其条理之密,孳乳之蕃,字句之后先,词气之轻重,例繁类杂,融贯为难。自非深于华文,无以究洋文之精奥。又其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气尚象之法,体国经理之规,各有专门,足资借镜。而非博通中国古今之沿革,亦无由考求而得其会通。向来士族儒流,多鄙视别国方言为不屑;而习攻翻译,大抵闾阎寒贱、性识暗钝之人。毋惑乎互市数十年,欲求一二通达中外文字学术之人而寥寥罕觏也。职等设立学堂,来学者多系京员及性质聪颖之官绅子弟,其于中学均已具有规模。现在定立课程,先习英文暨天算舆地,而法、俄、德、日诸国以次推及。其兵农商矿、格致制造等学,则统俟洋文精熟,各就其性质之所近,分门专习。一俟筹款稍充,再行延洋教习,广购仪器,分建藏书、译书等馆,以期考核精审,温故知新,并遵照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总理衙门议复刑部侍郎李端棻推广学校章程,选派优等学生游历外国,扩其才识。或再入各国大学堂肄业,期底大成。(转引自陈福康 2000:129～130)

张元济在上述引文中涉及两点翻译理论：一、要领会外文之精奥，必须先深通华文，"自非深于华文，无以究洋文之精奥"；要翻译、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法规，必须博通中国历史之沿革。只有这样，才能互为借鉴，融会贯通，"而非博通中国古今之沿革，亦无由考求而得其会通"。二、他批判了历来"士族儒流"鄙视翻译工作的错误观念，提倡设立学堂，开设译书馆。

张元济四人的这一呈文被光绪皇帝批准。光绪皇帝召见了张元济和康有为两人，专门询问了张元济有关通艺学堂的情况。然而，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惩处，随即由李鸿章推荐给上海的盛宣怀。1898 年 11 月，他来到上海，被安排在译书院任职。据邹振环统计，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日张元济给盛宣怀的报告中称：当时已译成的共 31 种，其中兵政 20 种、教案 1 种、商务 3 种、理财 1 种、国政 2 种、学校 3 种、税法 1 种，其中 14 种(兵政 12 种，教案、商务各 1 种)已经出版，其余正陆续付印"。(转引自邹振环 2006)

1902 年，张元济到了商务印书馆工作，先后担任编译所所长、经理、董事长等职，成为我国近代出版事业最杰出的开拓者。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翻译著作，其中包括严复翻译的外国政治、经济学著作，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名作。同年 3 月，他在上海《教育世界》杂志第 20 期发表了《答友人问学堂事书》，涉及他对学习外语和翻译工作的见解：他反对盲目标榜"讲求西学之名"，认为"此可哂者也"，强调"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之精神"；他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文化侵略阴谋，强调民族独立精神。他提出"勿以洋文为常课"，在教学外语的同时必须重视汉语教学，因为"语言文字者，生民之大用，立国之精神也。未有语言文字亡而其国尚能存者"。他还强调"勿以外人主持学事"，"国家之气，恃教育以维系之。此为何事，岂可授之外人着?"他也反对"沿用洋人课本"，认为"洋文读本宜自编纂"，华文教科书更不能采用各教会所刊者。

张元济在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中，还偶尔为翻译书籍撰写序文。1939 年他为《德译汉诗》撰写的序文中提出了对翻译理论的见解：

> 昔尝读《玄奘三藏法师传》，当时翻译经文，有证义、缀文、笔受诸职，有字学、证梵语梵文诸大德为之赞助，其后又有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杜正伦等时为阅看，随时润色。盖两国文字迥殊，沟而通之，若是乎其难其慎也。海通以还，译学大启，异域名编，日新月盛；顾未闻由援唐世译经之例以从事者。余友侯官严几道，少习英文，归修汉学，其自定迻译之例，一反当世苟简之为。厥例有三，曰"信、达、雅"。读其成书，殆无愧色。窃尝闻其绪论，谓译词章家言，最为不易。盖词章由文字而生，文字已移，词章何所附丽？牵强附会，必有害辞害志之失。余于英文所造极浅，然聆其言而深信之。近有创"直译"之说者，关节脉络，一仍其朔，仅摘其所涵之实义，易以相对之辞，诘屈聱牙，不可卒读，即读之亦如坠五里雾中。此穷而思遁之术，自欺欺人，未可为训者也。(转引自陈福康 2000：133～134)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张元济认为"唐世译经之例"可以为当今译者参考，并高度肯定了严复的"自定迻译之例"；他还批评了当时盛行的"直译"，认为这是"穷而思遁之术""自欺欺人"。 (贺爱军)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又有"饮冰""少年中国之少年""曼殊室主人"等笔名。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与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人称"康梁"。梁启超首先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作为晚清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他的视野较他的同时代人更为开阔，他对西方先进思想的反应也远较他的同时代人更为敏锐。1896 年，他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该报设有"域外报译"或"西文报译"的专栏，不仅翻译有关世界局势的动态报道，还发表外国小说的译作。该报第一册就发表了一部完整的侦探小说《英国包探话喀特医生奇案》，此外，还连载过《华盛顿传》(黎世谦译)等传记作品。由此可见，梁启超很早就已经注意到译介外国的小说、传记，用冒险、自治的精神启导读者，并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

1902 年，梁启超在日本又先后创办并主编了《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进一步大力宣传西方新的政治、哲学和文化思想。诸如卢梭(Rousseau)、孟德斯鸠(Montesquieu)、培根(Bacon)、笛卡儿(Descartes)、达尔文(Darwin)、康德(Kant)、斯宾塞(Spencer)、福泽谕吉(Fukuzawa)乃至古希腊的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苏格拉底(Socrates)，等等，几乎都有译介。对中国翻译文学史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他在他主编的这两份杂志里，还刊载了相当篇幅的翻译文学作品，如周桂笙翻译的柯南·道尔的《歇洛克复生侦探案》、佚名的科学小说《窃贼俱乐部》、红叶阁风仙女翻译的法国朱保高比的小说《美人手》、卢藉东翻译的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南野浣白子翻译的冒险小说《二勇少年》、披发生翻译的侦探小说《离魂病》、周桂笙翻译的法国鲍福的侦探小说《毒蛇圈》、奇情小说《神女再世奇缘》、无歆羡斋翻译的法律小说《宜春苑》、方庆周和吴趼人翻译的日本菊池幽芳的《电术奇谈》，等等。他本人也翻译发表了《俄皇宫中之人鬼》、《世界末日记》等译作。这些翻译作品，在早期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上都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并有一定的影响。

1896 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等系列文章，在其中的《论译书》一文中梁启超首先列举事实，阐明翻译在西方各国历史上所发挥的富国强民

的重大作用,他写道:“泰东西诸国,其强盛果何自耶?泰西格致性理之学,原于希腊。法律政治之学,原于罗马。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习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大彼得躬游列国,尽收其书,译为俄文,以教其民,俄强至今。日本自杉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洎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其旨。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

接着,他又驳斥了当时一些反对译书的保守人士,强调了翻译的必要性,指出:“世之守旧者,徒以读人之书,师人之法为可耻,而宁知人之所以有今日者,未有不自读人之书,师人之法而来也。”他甚至不无夸张地指出:“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西书为强国第一义。”他在另几篇文章中也说了同样的话:“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话,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

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梁启超通过对政治小说功用的夸大更是把翻译和翻译文学的作用推崇到了极点,认为翻译外国的政治小说能够启发民智,改造社会,所谓全国之议论可以为之一变,国家之政界能与之日进。梁启超对翻译的这些评价和推崇,不仅提高了翻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为文学翻译打下了良好的舆论基础。

梁启超通过对佛经翻译的研究以及从他自身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心得体会,丰富了我国的翻译理论思想,提高了国人对翻译的重视和认识。他写有《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等文,总结了中国翻译史上直译与意译交替出现的规律,他说:“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初期译本尚希,饥不择食,凡有出品,咸受欢迎。文体得失,未成为学界问题也。及兹业寖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然而矫枉太过,诘鞫为病;复生反动,则意译论转昌。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此殆凡治译事者所例经之阶级,而佛典文学之发达,亦其显证也。”

在《论译书》一文中梁启超则更是具体地提出了翻译应注意的三个主要问题:“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这就抓住了当时中国译界三个最主要的问题:一、谨慎选择应该翻译的原著。在梁启超看来,那些“兵学”之类的实用书籍,“虽毋译焉可也”,应该选择那些使西方之所以能富强起来的书籍,也就是西方的法律、政治、历史、教育、农学、矿学、工艺、商务、学术名著等著作;二、建立翻译规范。梁启超分析了因中西社会、体制不同、文化存在差异而在翻译过程中应予注意的问题,提出在人名、地名、官制、名物、度量衡、纪年等方面应统一译法;三、培养翻译人才。梁启超认为,“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他在文中还指出了翻译中应注意避免的两大弊病,他说:“译书有二蔽:一曰徇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徇西文而梗华读。……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在中国翻译文学史的草创初期,能提出如此切中肯綮的意见,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中国翻译文学史来说,梁启超最大的贡献当然应推他于1898年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以及他身体力行的翻译实践。我们当然知道,梁启超倡导译印政治小说,他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小说,是翻译文学,不如说是政治,是改良群治,是宣传西方先进思想的一种手段。但是,由于政治小说这一兼具政治性和文学性的特殊文学类型,因此通过梁启超的大力倡导译介西方政治小说,不仅拓宽了国人对小说的理解,也引起了国人对小说翻译的重视,从而促进了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大发展,却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从而使梁启超能够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令人注目的一席之地。(参阅谢天振,查明建 2004)

王国维(1877～1927)

字静安,浙江海宁人,著名国学家、美学家、文学家、翻译家。15岁中秀才。甲午战争后,向往新学,在《时务报》任职。1898年,在东方学社半工半读,学习日文、英文,并对康德(Kant)、叔本华(Schopenhauer)的哲学产生很大兴趣。后到湖北农学校任日文翻译。1901年赴日本留学。数月后,因病回国,在通州师范教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对康德、叔本华、尼采(Nietzsche)等人的哲学进行深入研究,并予以介绍。1922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年,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自沉于昆明湖。

王国维从日文、英文翻译出版或发表过《日本地理志》、《法学通论》、《心理学概论》、《叔本华与尼采》、《教育心理学》、《辩学》、《教育学》、《中等教育动物学教科书》等著作。

关于翻译理论,王国维曾写过三篇文章,即《论新学语之输入》、《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和《译本〈琵琶记〉序》。《论新学语之输入》,载1905年4月《教育世界》第96期,是王国维专门谈哲学著作翻译的。文章开头便说:

近年,文学(意指学术)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是非独两国人民之言语间,有广狭精粗之异焉而已。国民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此在文化相若之国犹然,况其稍有轩轾者乎?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

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王国维 1905)

思想方法与特点之不同，因而语言遂有精粗广狭之差异，王国维以此立论，来谈翻译中新词语输入之现象，自有其独到之处。他接着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由于当时通过日本为"中间之驿骑"输入西方"形上之学"，在翻译作品中遂大量出现"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对此现象，"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王国维认为这两种态度都不对，正确的态度是，对"日本已创之新语"，不妨"沿用"，只要不是"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再说，"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也。"因此，王国维进而认为，采用日人之译名有两大便利：一是"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二是"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王国维 1905)

《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发表于 1907 年，到 1925 年又重刊于《学衡》第 43 期。王国维认为，译古代哲理性著作，必须"忠于古人"，而最难者在于如何找出与原文相当的名词，他说：

夫古人之说，固未必悉有条理也。往往一篇之中，时而说天道，时而说人事；岂独一篇中而已，一章之中亦复如此。幸而其所用之语，意义甚为广漠，无论说天说人，时皆可用此语，故不觉其不贯串耳。若译之为他国语，则他国语之与此语相当者，其意义不必若是之广；即令其意义等于此语，或广于此语，然其所得应用之处不必尽同。故不贯串、不统一之病，自不能免；而欲求其贯串、统一，势不能不用意义更广之语。然语意愈广者，其语愈虚，于是古人之说之特质，渐不可见，所存者其肤廓耳。译古书之难，全在于是。(王国维 1925)

据此，王国维认为辜汤生(即辜鸿铭)译《中庸》有二病：一是"过于求古人之说之统一"，二是"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前病失之于减古书之意义，而后病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王国维的这篇评论颇为尖刻，一一罗列辜汤生译文中大弊小弊，几乎全盘否定。他没有将辜汤生的翻译活动置于儒经西译的历史过程中去加以考察，而是从他本人对儒经的精湛理解出发，将辜汤生的译文与经文一一对照，这样就使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些不准确或弊病之处，而看不到辜汤生译经的长处。20 年后，在重刊此文时，王国维特加附记云：

此文对辜君批评颇酷，少年气习，殊堪自哂。案辜君雄文卓识，世间久有定论，此文所指摘者，不过其一二小疵。读者若以此而抹杀辜君，则不独非鄙人今日之意，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转引自马祖毅等 2007：423)

日本早期戏曲研究家西村天囚译出中国南曲传奇《琵琶记》，1913 年夏，王国维特为之作序。其《译本〈琵琶记〉序》云：

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欲知一国之文学，非知其国古今之情状学术不可也。近二百年来，瀛海大通，欧洲人之讲求我国故者亦伙矣，而真知我国文学者盖鲜。则岂不以道德风俗之悬殊，而所知所感亦因之而异欤？抑无形之情感，固较有形之事物为难知欤？要之，疆界所存，非徒在语言文学而已。以知之之艰，愈以知夫译之之艰。苟人于其所知于他国虽博以深，然非老于本国之文学，则外之不能喻于人，内之不能慊诸己，盖兹事之难能久矣。……

癸丑夏日，得西村天囚所译《琵琶记》而读之。南曲之剧，曲多于白，其曲白相生亦较北曲为甚。故欧人所译北剧多至三十种，而南戏则未有闻也。君之译此书，其力全注于曲，以余之不敏，未解日本文学，故于君文之趣味神韵，余未能道焉。然以君之邃于汉学，又基于本国之文学，信君之所为，必远出欧人译本之上无疑也。(转引自马祖毅等 2007：424)

王晓平在《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内根据此文，对王国维关于文学翻译的观点缕析为三条：

一、王国维认为"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欲知一国之文学，非知其国古今之情状学术不可也。"他将"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主张，"温故知新"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翻译理论中，认为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因而文学翻译者必须对于所翻译作品及其国家民族的这些情况，都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把翻译工作做好。

二、王国维认为，两国文学"疆界所存，非徒在语言文字而已"，这是因为，由于不同国家道德风俗的悬殊，而所知、所感也因之而异，且"无形之情感"，较之"有形之事物"难知。这就是说，不同民族的文学，不独反映了这些民族独特的风俗，特有的世情，而且也反映着各自民族不同的心理和情感。由于后者更需要深入其中，长期体验才能捕捉，人们在未曾达到这一步时，往往以本民族的心理情感去揣摩、理解对方，因此较之前者，后者更难以深知。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搞好翻译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王国维认为，翻译者还必须"老于本国之文学"，不然，"则外之不能喻于人，内之不能慊诸己，盖兹事之难能久矣"。这里所说的"慊"，就是满足、惬意，即获得鉴赏的快感；这里所说的"喻"，也就是把这种快感传达给读者。只有"老于本国之文学"，才能深得他国文学之妙趣，并把这种妙趣用本国的语言文字加以创造。而判断一个译本的优劣，便需邃于彼而老于此，才能道出其"趣神味韵"。(王晓平 1987)(转引自马祖毅等 2007：421～424)

鲁迅(1881～1936)

原名樟寿,字豫才,学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鲁迅"是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的笔名,其他笔名还有:庚辰、索士、巴人、葛何德、封余、许遐、隋洛文、乐雯等,共有128个之多。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翻译家,也是世界文坛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鲁迅的翻译活动贯串他的一生。自1903年他22岁翻译凡尔纳(Verne)的《月界旅行》开始,到1936年逝世前翻译果戈理(Гоголь)的《死魂灵》为止,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鲁迅共翻译了14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200多部(篇)作品,共计300余万字,大致跟他一生的创作量相当。鲁迅的译品除了外国文学外,还包括外国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方面的论著。鲁迅翻译作品的范围之广、体裁之多、数量之巨,在我国翻译史上是罕见的。鲁迅还是一位翻译工作的组织者,在艰难的条件下,他组织了"未名社""朝花社",创办了《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刊物。这些社团和刊物在培育文学新人,团结国内广大进步翻译工作者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他发表的文章里,涉及翻译的大致分为三类(王友贵2005:155):一类是专论翻译的文章;另一类是夹杂在论述中外文化关系、中外关系的文字里,涉及重要的翻译问题;第三类是他翻译之后写的"译者前记""后记""小引"之类的文字。其中比较重要的翻译论述接近30篇,按照发表年份的顺序排列如下:

《坟·摩罗诗力说》(1907)、《文化偏至论》(1908)、《域外小说集》序言(1909)、《域外小说集序》(重印版,1920)、《热风·不懂的音译》(1922)、《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南腔北调集·关于翻译》(1933)、《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1933)、《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1933)、《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1934)、《花边文学·论重译》(1934)、《且介亭杂文二集·非有复译不可》(1935)以及《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1935)等。从以上书籍中我们可以总结出鲁迅的翻译思想:

一、启蒙翻译观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就萌发了译书拯救中华、译书再造中华的启蒙思想。他在《域外小说集》初版《序言》里,清楚地表明了自己译书的启蒙立场:"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

他还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启蒙、为人生的翻译目的:"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里如是说:

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

由此可见鲁迅从事翻译实践的目的。他的很大一部分翻译言论都是围绕启蒙、改造社会、改造国民而展开。

二、"直译"与"硬译"的翻译思想

鲁迅关于直译的主张,在给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中表达得非常明确具体。他在信中说:

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甚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者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

鲁迅主张直译,主张"宁信而不顺"是为了忠实于原作。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易解"是为了读者易于阅读。"保存原作的丰姿"是为了忠于原作,保存洋气。对原作负责,也是对读者负责。

鲁迅主张直译,不是毫无批判,生硬照搬,他《关于翻译的通信》强调在翻译时"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他要求"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即主张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

鲁迅主张直译,是希望把外文的语法、句法翻译出来,以弥补新文学的不足,为新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这就是翻译的辩证法!

鲁迅的"硬译"理论也广为人知。1929年1月,鲁迅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中写道: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

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转引自陈福康 2000：291)

鲁迅一开始并不是有意提出"硬译"这个口号，也没有想要上升到理论高度，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在翻译理论书籍中尚未找到更好的译法，便只得"硬译"。然而"硬译"一提出便受到梁实秋的指责。梁实秋在 1929 年 9 月 10 日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指出鲁迅的"硬译"离"死译"不远。

针对梁实秋的这篇文章，鲁迅在 1930 年 3 月 1 日发表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对梁实秋的论点进行辩驳。鲁迅从学术角度阐述了他对"硬译"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1. "硬译"与"死译"有区别，并不是故意的"曲译"；2. "硬译"(主要指翻译科学的文艺理论及其他革命理论著作)自有需要它的读者对象，它在他们之间存在；3. "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因为思想对立的人觉得"气闷，憎恶，愤恨"是当然的，至于那些对理论知之不多的"批评家"，本是应该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4. "硬译"不仅为了"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同时也可以"逐渐添加了新句法"，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同化"而"成为己有"；5. "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转引自陈福康 2000：292～293)

三、"重译"和"复译"的翻译思想

"重译"和"复译"是鲁迅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对繁荣我国翻译事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鲁迅在《论重译》一文中写道：

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转引自陈福康 2000：301～302)

鲁迅的重译观，乃是基于启蒙思想和文化建设的高度提出来的。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外语人才匮乏，加上懂得某国外语的人才未必有翻译的兴趣，而中国又亟须译介外国文学的菁华，这便是重译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至于复译，鲁迅是积极主张应该有复译的，他在《非有复译》一文中写道：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需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其，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

在鲁迅看来，复译可以打击乱译，驱逐乱译。不同的译本可以比较、比赛，犹如赛跑一般。此外，他认为，语言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通用语需要不同的译本。这一复译观点，与当前世界翻译理论完全一致。

四、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出于启蒙的目的，鲁迅将翻译同创作等同视之。他在这方面的言论集中体现在《关于翻译》和《"题未定"草》中，现摘录如下：

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促和鼓励着创作。

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需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到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来，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

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转引自王秉钦 2004：127)

五、翻译批评："剜烂苹果"思想

为了提高翻译质量，鲁迅还提倡开展翻译批评。他在《为翻译辩护》一文中说："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

鲁迅在《关于翻译(下)》一文中，非常形象地提出一种"剜烂苹果"的思想：

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以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还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转引自陈福康 2000：305～306)

鲁迅在 1934 年 7 月写的《再论重译》中，再次谈到了翻译批评的问题，他认为翻译批评担负着"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的责任。他更指出："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而且，如遇到参酌各种译本而成的译本及重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因为他"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因此，他认为"批评工作要着重"，只有这

样,翻译事业才能兴盛。

鲁迅"剜烂苹果"的翻译批评言论,文字琐碎,体现出一副"婆婆心肠",与他平素犀利尖锐、不留情面、老辣的笔锋形成鲜明的对照。正是这种"琐碎文字婆婆心",体现了鲁迅对翻译事业的殷切期望和一片真心。

总而言之,鲁迅的翻译言论、思想主张几乎涉及了翻译问题的各个重要方面,这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中极其宝贵的财富,对今天翻译学独立学科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贺爱军）

周作人(1885～1967)

原名遐寿,字启明,鲁迅胞弟,浙江绍兴人。早年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随后留学日本立教大学文科。回国后,历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浙江省第五中学教员,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教授。1924年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系主任,提倡闲适平淡的小品散文,曾批判军阀统治。1941年任伪华北政务会教育督办。1946年5月以叛国罪判有期徒刑十年。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获新生。政府宽大为怀,在郑振铎等人的建议下,让其发挥一技之长,在家里从容地做他喜爱的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翻译工作。周作人一生著述甚丰,出集50余种,作为现代散文家,他的风格"平和冲淡"、朴素自然,仿佛与友人谈心,别具一格。周作人的翻译始于留学扶桑时期,并多与其兄鲁迅合作。1907年他俩开始合译英国作家哈格德(Haggard)与安德鲁·兰(Andrew Lang)合著的小说《红星佚史》(原名《世界之欲》),正文由周作人用文言翻译,十六节诗歌由鲁迅用骚体诗译出。他俩合译的作品以《域外小说集》的影响为大,据该书序言称,37篇短篇中,周作人用文言译出34篇。他俩在翻译上的合作直到1924年因家庭纠纷割断手足亲情而终止。在此期间,周作人单独译出的有(波兰)显克微支(Sienkiewicz)的《酋长》、《炭画》,出版《现代小说译丛》。他还在《新青年》上发表译文,与陈独秀、鲁迅、茅盾、胡适等人共同开创翻译文学的新风。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新译和修订旧译多种。并在《翻译通报》上以其原名遐寿发表译论十余篇(可惜未被人充分注意)。

周作人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全面的外语知识和独特的文化品位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中独树一帜。然而,由于他在中国现代史上一段特殊的政治经历,长期以来对周作人整个文学活动中占半壁江山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重视不足,研究不够。

按照周作人文学翻译的内容,可以把他一生的翻译实践分为三个部分:希腊文学的翻译(约210万字)、日本文学的翻译(约171万字)、"弱小民族"或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民族"的翻译(约110万字)。(孟昭毅,李载道 2005:318)

在翻译之余,周作人还在《翻译通报》、《亦报》、《大报》等上面发表了大量的译论文章,阐述了他的直译观和音译原则等。

一、直译观

周作人受其兄长鲁迅的影响,也主张"直译"。他与鲁迅1909年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对当时流行的"豪杰译""林纾翻译模式"进行了反驳,开了五四以后新的译风之先河。1918年,在《文学的改良与孔教》中,明确地论述了他的直译理论:"我以为此后译本……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还是逐字译,不得已也要逐字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转引自孟昭毅,李载道 2005:325)1925年6月,他在《陀螺·序》中,进一步说明了直译的含义,标志着他的直译理论的成熟:

> 我翻译向来采用直译法,所以译文实在很不漂亮,——虽然我自由抒写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譬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一句,不译作"仰卧着"而译为"卧着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词了。据我的意见,"仰卧着"是直译,也可以说即意译;将它略去不译,或译作"坦腹高卧"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羲皇上人"是胡译;"卧着在他的背上"这一派乃是死译了。

周作人认为从汉语的表达能力来看,许多译名无法得到对应。这一方面要求译者尽可能用汉语现有的表现方法传达原文意思;另一方面,对于汉语中没有的表现手法,应尽量从源语中吸收,尽量"欧化",从而为汉语输入新的表现方式,增加其表现能力。

周作人直译理论的提出,源于其对佛经翻译理论以及清末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批判继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在理论与方法上,解决了近代文学翻译中存在的不尊重原作胡译乱译问题,解决了用古文翻译外文所造成的将外国文学强行'归化',从而失去模仿价值的问题。""周氏兄弟提出的'直译'理论,是在日本文学翻译中被绝大多数译者普遍遵守的一种翻译方法。与欧美文学翻译比较而言,日本文学翻译中的'直译'更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日语中有大量的汉字词汇,特别是日本近代翻译家和学者们用汉字译出的西语词汇,对于丰富现代汉语的词汇,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引进的必要性"。(王向远 2001:50～51)

二、"名从主人"的音译原则

1927年11月,周作人发表了《希腊人名的译音》,提出了人名翻译的三个原则:主张音译;用汉字译音时不能译成中国名字的样子,不故意采取华丽或古怪的字,不把百家姓分给外国人;实行"名从主人"。1951年1月11日又在《亦报》上发表《名从主人》,2月15日在《翻译通报》上发表《名从主人的音译》,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原则。他认为:"凡人名地名,尽可能

地依照它本国的读法，忠实地用汉文对译出来。"当然，他又说："这是标准办法，但自然也有例外。"如有的地名原是有意义的文字，各国都用意译，自当同样地译出，又如通用已久的音译，虽与原本不符，也只好沿用。针对依照英语本位的读音去译英国以外的人名和地名这一问题，周作人在1952年6月15日《翻译通报》上发表了《英语本位的英译》，深刻地阐述了以英语本位的读音翻译其他国家的人名地名的本质以及纠正办法。他认为"中国在过去受着外国(主要是英美)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文化的侵略，英语几乎成为唯一的外国语，有些人即使学过其他外语，无意中也仍是以英语为主，而在译音上也往往无批判地跟了它走。别国的语言文字的优劣我们不管，但这不符合'名从主人'的原则，'而且一切以罗马字拼法用英语读法为标准，以英文为唯一正宗外国语这种错误看法，更非加以纠正不可。'"(转引自陈福康2000：396～397)

"名从主人"虽然是孔子在2 000多年前讲过的话，但是在翻译刊物上明确提出并予以详细阐述，实始于周作人。

三、保留语言特色的儿童文学翻译观

周作人还是"五四"期间儿童文学翻译的先驱，其对儿童文学译介活动最突出的贡献是译介安徒生(Andersen)的作品。在1908年，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第2卷末刊出的"域外小说集以后译文"的目次中，就提出自己翻译"丹麦安兑尔然"(今译安徒生)的作品。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卖火柴的女儿》，后又翻译《皇帝之新衣》。周作人对安徒生的译介活动推动了安徒生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带动了一大批学者，如刘半农、郑振铎、顾均正等人对儿童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进程。郑振铎在《小说月报》1925年16卷第8期的《安徒生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一文中评论道："使安徒生被中国人清楚认识的是周作人"。

对于童话的翻译，周作人认为应从民俗学角度切入。他认为"要研究讨论儿童文学的问题，必须关于人类学、民俗学、儿童学等有相当的修养，……根据人类学派的学说来看神话的意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讲童话的应用，这个方向总是不错"。周作人在翻译儿童作品时考虑到了儿童的年龄和心理特点，特别注意译文的句子和词汇，以便于儿童阅读理解，为儿童乐于接受。对此，周作人撰文写道：

> 至于实在能否受到儿童的爱顾，那在我现今却是别无什么把握。我最不满意的是，原本句句是意思明白文句自然，一经我写出来便往往变成生硬别扭的句子，无论怎样总弄不好，这是十分对不起小朋友的事。我的希望是满天下的有经验的师父肯出来帮一下子，仿佛是排难解纷的侠客似的，便是在这些地方肯毅然决然的加以斧销，使得儿童更易于了解。(周作人1932：423)

周作人认为，安徒生的童话之所以成为传世经典，是其童话所承载的思想和童话文本的语言二者完美的结合："……上面说安德森童话的特色：一是言语，二是思想。——他自己说，'我著这书，就照着对小儿说话一样写下来。'……这用'说话一样'的言语著书，就是他第一特色。"由此可见，周作人很欣赏安徒生"简易如小儿"的语言，认为这"就是他第一特色"。他反对译者抹杀安徒生的这种语言特点，曾批评《十之九》的译者将"小儿的言语"译成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因而"安德森的特色就不幸地被抹杀掉了"。

除以上三点以外，周作人还在翻译批评、重译、古文与白话、中国翻译史的编写以及外语词典的编写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贺爱军)

胡适(1891～1962)

原名胡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赴美学农，后转至哥伦比大学攻读哲学、文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Dewey)，1917年获哲学博士。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曾任《新青年》编辑，力倡白话文，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提倡文学革命。曾参与创办《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国学季刊》、《现代评论》等刊物。1926年游历欧美，在各国讲学。1928年后与徐志摩、梁实秋等出版《新月》月刊，并写文章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委员兼编译委员会主任，主持世界文学与学术名著的翻译活动。1932年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出任驻美大使。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移居美国。1962年2月24日病逝于台湾。著有《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戴东原的哲学》、《国学文学史》(附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尝试集》、《尝试后集》、《短篇小说集》等，编选有《词选》。胡适对我国的译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尝试集》与《尝试后集》中收录了不少译诗，代表作有《哀希腊》、《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等篇。其中《老洛伯》是迄今所知我国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译诗。胡适十分重视西洋短篇小说的翻译，在1919年10月出版的《短篇小说(第一集)》里自译了欧美短篇小说11篇，多为19至20世纪现实主义作品，与当时充斥书坊的言情、侦探、义侠译作大异其趣。1930年起，由胡适主持、由丁文江、赵元任、陈寅恪、梁实秋、陈源、闻一多、竺可桢等13位知名学者参加的编译委员会，拟订了一个庞大的翻译名著计划。后来由各方面专家译出的作品经审阅后陆续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关琪桐译的培根(Bacon)《新工具》、张谷若译的哈代(Hardy)《还乡》、罗念生译的希腊悲剧数种以及《鲁滨孙漂流记》、《马可波罗游记》等，而梁实秋受胡适之托，奋斗30余载，独力完成的《莎士比亚全集》更为震惊海内外译坛之作。胡适对佛经翻译史有精湛的研究。他在所著的《白话文学史》中指出：译经文学对中国文学，尤其是白话文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胡适的翻译思想内容丰富，既有语言层面的研

究,也有救国救民的政治意图,还有关于翻译策略的探讨。除此之外,胡适还系统探讨了佛经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翻译的语言多样性　胡适对翻译中语言多样性的重视首先体现在提倡拼音文字。他曾经说过:“外来语,往往不容易找到适当的字……我认为拼音字,值得提倡。”(胡适 1993: 331)其次还体现在主张在翻译中不要限制方言的使用,方言对发展中国文学具有借鉴意义。第三,针对当时文言文翻译的弊端,胡适提倡使用白话文翻译。他在《佛教的翻译文学》里提到译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开创了白话文体。

二、翻译的政治性　胡适翻译短篇小说,“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急需激发民众的爱国意气来抵抗外来入侵,他所翻译的都德(Daudet)的《最后一课》,就是借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法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热忱和抵抗侵略的坚定决心来鼓舞中国人民;而胡适早期的诗歌翻译也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政治化倾向,译诗洋溢着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六百男儿行》、《军人梦》、《缝衣歌》和《惊涛篇》都蕴涵了胡适的文学和翻译的理念,表现了反清救国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变革的强烈意识”。(廖七一 2003)

三、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系统总结　胡适是白话翻译诗歌的首倡者,他的白话文翻译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巨大,不仅为翻译理论和实践作出了贡献,而且改良和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由于‘五四’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胡适提倡的用白话文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与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相吻合,有力配合了当时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得到了热烈而普遍的响应,在一大批作家中白话文学翻译蔚然成风,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这一时期中国文学通过翻译从外国文学中吸收了大量营养,从创作题材、表现形式、写作方法到诗歌韵律等都被翻译过来,补充中国文学,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其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赵俊姝 2005)胡适系统总结了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在中国文学最浮靡又最不自然的时期,在中国散文与韵文都走到骈偶滥套的路上的时期,佛教的译经起来,维祇难,竺法护,鸠摩罗什诸位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遂造成一种文学新题。这种白话文体虽然不曾充分影响当时的文人,甚至不曾影响当时的和尚,然而宗教经典的尊严究竟抬高了白话文体的地位,留下了无数文学种子在唐宋以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佛寺禅门遂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这是一大贡献。

(二)佛教的文学最富有想像力,虽然不免不近情理的幻想与“瞎嚼蛆”的滥调,然而对于那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国古文学却有很大的解放作用。我们差不多可以说,中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是印度的文学影响的产儿。这是二大贡献。

(三)印度的文学往往注重形式的布局与结构。《普曜经》,《佛所行赞》,《佛本行经》都是伟大的长篇故事,不用说了。其馀经典也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式。《须赖经》一类,便是小说体的作品。《维摩诘经》,《思益梵天所问经》……都是半小说体,半戏剧体的作品。这种悬空结构的文学体裁,都是古中国没有的;他们的输入,与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佛经的散文与偈体夹杂并用,这也与后来的文学体裁有关系。这种文学体裁上的贡献是三大贡献。(转引自罗新璋 1984: 76)

四、归化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　胡适国学底蕴深厚,深谙四书五经,熟读佛经翻译文学,因此早期坚持以中国本位文化为主,“基本采用归化的手法,用中国传统的五七言旧体诗来再现和传达西方的‘新意境’。1918 年以后则采用异化的手法,即模仿和引进英美诗歌的诗体和形式,促进中国白话新诗的草创。《老洛伯》和《关不住了!》等完全摈弃了传统诗格律的束缚,基本保持了原诗均匀整齐的形式。语言也采用全新的白话口语,音节和节奏也一如原诗,顺着诗意的自然起伏而变化。”(廖七一 2006: 141)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拟定了三条翻译西洋名著的方法:1. 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2. 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3. 创造。针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胡适在《论翻译——寄梁实秋,评张友松先生评徐志摩的曼殊斐儿小说集》一文中提出了“翻译是一件难事,谁都不免有错误。错误之因不止一个。粗心和语言文字的程度不够是两个普遍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观的成见。同一句话,你听了毫不介意,他听了便生疑心,这都由于一时的主观的成分不同。翻译别国文字的书,也往往因主观的成分不同而发生歧义的解释。”

(贺爱军)

郭沫若(1892～1978)

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1914 年赴日本留学,1918 年入九州帝国大学学医。这期间广泛阅读世界文学名著。“五四”时期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运动。1921 年以第一部诗集《女神》震动了文坛。同年,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创办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出版《创造季刊》。1926 年参加北伐,任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流亡日本,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与考古学,继续从事创作和翻译。抗战爆发后,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9 年 10 月以后,历任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等职。

郭沫若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在现当代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翻译具有显著的特色,其翻译活动和创作活动几乎是同时开始。从 1918 年移译海涅(Heine)的《悄静的海滨》直至辞世,他的翻译生涯长

达60年,翻译出了不少震惊国内外译坛的作品,其中包括《浮士德》《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沫若译诗集》等。他的译作覆盖面广,包括戏剧、小说、诗歌、文艺理论、马列著作与科技作品等不同体裁。他精通日、英、德、拉丁文等语种,译作三十余种,大致可分为四类:(一)外国文学作品。托马斯·格雷(Gray)的《墓畔哀歌》,雪莱(Shelley)的《雪莱诗选》,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的《争斗》、《法网》、《银匣》,沁孤(Synge)的《约翰·沁孤戏曲集》,尼采(Nietzsche)的《查拉图司屈拉钞》,歌德(Goethe)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赫曼与窦绿台》,席勒(Schiller)的《渔歌》、《华伦斯太》,海涅的《海涅诗选》,施托姆(Storm)的《茵湖梦》(与钱君胥合译),霍普特曼(Hauptmann)的《异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三部曲《石炭王》、《屠场》、《煤油》,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的《新时代》,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的《鲁拜集》,迦梨陀娑(Kalidasa)的《秋》,泰戈尔(Tagore)的《泰戈尔诗选》,枷里达若的《沫若译诗集》,日本的有《日本短篇小说集》;(二)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马克思(Marx)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艺术的真实》,马克思与恩格斯(Engels)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Kawakami)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三)美术考古学著作。板垣鹰穗的《西洋美术史提要》,米梅里斯(Michaelis)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林谦三的《隋唐燕乐调研究》等;(四)科学文艺著作。英国威尔斯(Wells)父子与赫胥黎(Huxley)合著的《生命之科学》,威尔斯的《人类展望》等。(参阅王秉钦 2004: 143～144)

郭沫若不仅译介了大量的外国作品,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也颇多建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翻译"创作论"。郭沫若最突出的翻译观点是"好的翻译等于创作",这是郭沫若翻译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他强调翻译家不是"鹦鹉名士",如果对所译作品没有涌动起"创作精神""创作冲动",没有对所译作家和作品的"精深的研究""正确的理解",那就只能是"鹦鹉学舌"了。他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以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翻译工作者要精通本国的语文,而且要有很好的外文基础,所以它并不比创作容易。"(转引自王秉钦 2004: 148)

二、"以诗译诗"的主张。郭沫若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明确提出了"以诗译诗"的主张。"他(指雪莱——编者)的诗便如像我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转引自罗新璋 1984: 334)他认为译者要紧的是再现原诗内在的韵律,要感听诗人的心声,与他共鸣,合而为一,然后运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新的创作。

三、"学者型"的翻译态度。郭沫若一向认为,翻译是一桩严肃的事业,译者必须认真对待。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尖锐地批评"随便抓一本书就翻""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滥译者。他指出译者"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在翻译之前,必须慎重选择,准备周到。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广泛地参考,多方面请教,尽量地琢磨"。郭沫若强调要搞好文学翻译,必须做好研究工作,"纵则要对于古代思想的渊流,文潮代涨的波迹,横则要对于作者的人生,作者的性格,作者的环境,作者的思想,加以彻底的研究,然后才能胜任"。(转引自林煌天 2005: 257)1923年郭沫若在《理想的翻译之我见》一文中提出了理想翻译的先决条件:"(一)译者的语学知识要丰富,(二)对于原书要有理解,(三)对于作者要有研究,(四)对于本国文字要有自由操纵的能力。"针对当时许多饥不择食和躐等躁进的倾向,郭沫若提出了挽救方法:"(一)在译者方面:应该唤醒译书家的责任心;望真有学殖者出而从事完整的翻译;(二)在读者方面:应该从教育着手,劝知识未备的青年先从事基础知识的储积;注重语学的研究,多养成直读外籍的人才;望国内各大书坊多采办海外的名著。"(转引自罗新璋 1984: 331～332)

四、翻译批评。20世纪20年代前期,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曾与以郑振铎、茅盾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发生过文艺理论上以及翻译理论上的论争。在论争中,郭沫若揭露出了当时译界的某些弊端,指出了某些译作的错误。例如,他在1921年11月6日写给郁达夫的信中说:"我们国内的创作界,幼稚到十二万分,……连外国文的译品也难有真能负责任——不负作者,不负读者,不欺自己——的产物;也无怪乎旧文人们对于新文学不肯信任了。这样的译品,说是世界最大文豪的第一首佳作,读者随自己的身份可以起种种的错感:保守派以为如此而已,愈见增长其保守的恶习;躁进者以为如是而已,愈见加紧地粗制滥造。我相信这确是一种罪过:对于作者蒙以莫大的污辱,对于读者蒙以莫大的误会。这样地介绍文艺,不怕就摇旗呐喊,呼叫新文学的勃兴,新文学的精神,只好骇走于千里之外。"(转引自陈福康 2000: 256)(贺爱军)

林语堂(1895～1976)

原名和乐、玉堂、语堂。福建龙溪(今漳州)人。1901年,入坂仔教会办的铭新小学读书,13岁小学毕业后入厦门寻源书院读中学。1912年寻源书院毕业,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6年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清华学校任中等英文教员。1919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后转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语言学,获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先后在国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到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外交秘书,六个月后离开武汉回到上海。20世纪30年代创办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参加鲁迅支持的"语丝社",为该社撰稿,成为"论语派"的主要代表。1936年赴美执教,从事英文著译。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

任。1954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1966年定居台北。1967年任香港大学教授，主持编写词典。1976年病逝于香港。

林语堂学贯中西，蜚声海外，“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出版的作品有：《剪拂集》、《开明英文读本》、《开明英文文法》、《大荒集》、《我的话》、《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中国的乡村生活》、《北京之日》、《无所不读》、《京华烟云》、《风声鹤唳》、《语堂文存》、《语言学论丛》等。翻译的作品有：《卖花女》、《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励志文集》、《徬徨漂泊者》、《墨子》、《镜花缘》(选译)、《论语》、《老残游记》、《苏东坡》、《古文小品》、《浮生六记》等。编辑出版了语文工具书《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国语辞典》。林语堂精通英、汉双语，英汉互译俱佳，“尤其擅长汉译英，译时能吃透原意，处处考虑到原语与译语的文化差异，以及译文能否为英语读者所理解与欣赏，并经常进行文意补足、语法补足与语音补足。因此译文明白流畅，颇能传神。”(林煌天 2005：420)林语堂一生中涉及翻译理论的最系统的文章，当推其万言论文《论翻译》。这是他为吴曙天编选的《翻译论》撰写的序言。在《论翻译》一文中，林语堂开宗明义地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的论断。“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种的艺术。翻译是一种艺术。凡艺术的成功，必赖个人相当之艺才，及其对于该艺术有相当之训练。翻译的艺术所倚赖的：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

在《论翻译》中林语堂还提出翻译的三个标准：忠实、通顺、美。“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这三个标准与严复的“译事三难”大体上正相比符。林语堂认为：忠实就是“信”，通顺就是“达”，至于翻译与艺术文的关系，“雅”字难以包括。他认为这三条标准是译者的三种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关于翻译的“忠实标准”，他提出共有四义：1. 非字译。“译者对于原文有字字了解而无字字译出之责任。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组成的语意。”“字义了解的确是句义了解的根基，但是所谓字义，不能看做死的，固定的，分立的，须当做活的，有连贯的，不可强为分裂的东西。”2. 须传神。“译者不但需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3. 非绝对。“译者所能谋达到之忠实，即比较的忠实之谓，非绝对的忠实之谓。”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4. 须通顺。

关于“通顺的标准”，林语堂认为，要达到“通顺”的标准必须以句译为本位，必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关于“美的标准”，林语堂以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

林语堂还提出了“句译”的原则。他指出，翻译只能以句为主体的“句译”，不能以字为主体的“字译”：

> 句译家对于字义是当活的看，是认一句为结构有组织的东西，是有集中的句义为全句的命脉；一句中的字义是互相连贯互相结合而成一新的“总意义”(Gesamtvorstellung)，此总意义须由活看字义和字的联贯上得来。其对于译文方面，是取一种态度，先把原文整句的意义明白准确的体会，然后依此总意义，据本国语言之语法习惯重新表示出来。若能字字相对固善，若此总意义在本国文不能用同样之辞字表出，就不妨牺牲此零字，而别求相当的，或最近的表示方法。倘是一成语，在本国语中果为最准确翻译原义的，就是不与原文所用的相同，也可不顾；与其求守原文逐字意义，毋宁求达原文语意，这是字译与句译的区别。

林语堂最早注意到了翻译的心理问题，《论翻译》有两段分别讨论“行文之心理”和“译者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这至今仍是值得译论界探索的课题。(参阅罗新璋 1984：417～432)　　(贺爱军)

茅盾(1896～1981)

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翻译活动的组织者和实践者。1913年考取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1920年任《小说月报》主编。1921年与郑振铎、叶圣陶等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流亡日本。1930年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鲁迅并肩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国内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先后到新疆、延安执教讲学，后转赴重庆、香港、桂林等地。1946年赴苏联访问。1949年10月后，担任文化部部长多年。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发表过许多中、长篇小说，其中《子夜》震动了文坛。著有《茅盾文集》十卷、《茅盾评论文集》、《茅盾译文选集》上、下册等。他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1917年他编译的《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五四”之后，他认为译介外国文学是为新文学运动奠定基石，而且特别注重译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工作。仅1920年至1921年两年，他就翻译发表了《美国共产党党纲》、《国家与革命》第一章以及土耳其作家哈里德的《桃园》等短篇小说八九十篇。茅盾一生发表过40种外国文学译作，240篇译文。他的翻译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至左联成立时期；第二阶段是左联成立以后至1949年；第三阶段为建国以后。

茅盾对翻译的另一贡献就是他的翻译理论。他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撰写了大量有关翻译问题的文章,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载1920年1月3日、4日《时事新报·学灯》)到1980年的《茅盾译文选集·序》,总计有近20篇。他的翻译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人生"的翻译目的观

茅盾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最早提倡者之一。在刚主持《小说月报》时,他就反复强调,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是人的精神食粮,使人的精神向上。他的翻译观与其文学观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为了使人的精神向上,"自古至今的文学家没有一个人曾经独力完成了这件大工作,必须合拢来,乃得稍近于完成;必得加上从今以后无量数的文学家努力的结果,乃得更近于完成。在这意义上,我觉得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另外,他又就创作技巧上来说,认为"当今之时,翻译的重要性实不亚于创作。西洋人研究文学技巧所得的成绩,我相信,我们很可以,或者一定要采用。采用别人的方法——技巧——和徒事仿效不同。我们用了别人的方法,加上自己的想象情绪……结果可得自己的好的创作。在这意义上看来,翻译就像是'手段',由这手段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自己的新文学。"(转引自陈福康 2000:232)

茅盾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目的不仅在于发展新文学,而且在于传播新思想。他说:

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凡是好的西洋文学都应该介绍这办法,于理论上是很立得住的,只是不免不合我们的目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我们应是不承认的。……那属于近代的,如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人生装饰观"的著作,也不是篇篇可以介绍的。王尔德的"艺术是最高的实体,人生不过是装饰"的思想,不能不说他是和现代精神相反,诸如此类的著作,我们如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与成就新文学运动的目的是不经济的。所以介绍时的选择是第一应得注意的。(转引自孟昭毅,李载道 2005:150~151)

1922年7月,为了回应郭沫若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的《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一文,茅盾写了《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提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在理论上有客观的动机;翻译一件作品除主观的强烈爱好心而外,还有一个"适合一般人需要""足救时弊"的动机。他强调指出:

我觉得文学作品除能给人欣赏而外,至少还须含有永存的人性,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我觉得一时代的文学是一时代缺陷与腐败的抗议或纠正。我觉得创作者若非是全然和他的社会隔离的,若果也有社会的同情的,他的创作自然而然不能不对于社会的腐败抗议。我觉得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我觉得,翻译者若果本此见解而发表他自己的意见,反对与己不同的主张,也是正当而且合于"自由"的事。(转引自陈福康 2000:234)

"为人生"的翻译目的观,即为传播新思想和发展我国的文学事业而从事翻译,是茅盾一贯的主导思想。20世纪50年代,他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又一次强调了这种思想。他指出:"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对于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是起了极大的鼓舞和借鉴作用的。如果说,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其中有很大部分,是由于吸取近代世界文学中现实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厚养料而成长起来的,那也不是一句过分夸张的话罢?"(转引自罗新璋 1984:502)

二、"神韵"说

茅盾在1921年2月发表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指出,译文要保留原作的"神韵"。1921年4月,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再次详尽地阐述了他的"神韵"理论。他说:"但直译的时候,常常因为中西文字不同的缘故,发生最大的困难,就是原作的'形貌'与'神韵'不是同时保留。"(转引自陈福康 2000:237)他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神韵'与'形貌'未能两全的时候,到底应该重'神韵'呢,还是重'形貌'?"

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保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文学的功底在感人(如使人同情使人慰乐),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译本如不能保留原本的"神韵"难免要失去了许多的感人的力量。再就实际上观察,也是"形貌"容易相仿,而"神韵"难得不失。即使译时十分注意不失"神韵",尚且每每不能如意办到。可知多注意于"形貌"的相似的,当然更不能希望不失"神韵"了。(转引自罗新璋 1984:337~338)

茅盾同时指出,"从理论方面看来,'形貌'和'神韵'却又是相反相成的;构成'形貌'的要素是'单字''句调'两大端,这两者同时也造成了该篇的'神韵'"。他认为单字与句调作为一篇文章的要素,就像线点位置与色彩作为一幅画的要素一样;不同的色彩配合与点线位置能使图画表现出种种不同的神韵,同样,单字与句调的变化也能转移一篇文章的神韵。译者如欲不失原作的神韵,究竟也可以从"单字"与"句调"上设法。如果"单字"的翻译完全不走原作的样子,再加之"句调"能和原作相近,得其精神,那么译者译时虽未尝注意与"神韵"的一致,或者"神韵"已自在其中了。

三、艺术创造性翻译论

1954年,作为文化部长的茅盾在全国文学翻译

工作会议上作了《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这个报告可以说是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科学总结，也可以说是对他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事文学翻译的经验总结。在报告的第三部分——必须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茅盾提出了著名的“艺术创造性翻译”思想，文中明确提出“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是文学翻译的根本任务。他说：

对于一般翻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至少应该是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但对于文学翻译，仅仅这样要求还是不够的。文学作品是用语言创造的艺术，我们要求于文学作品的，不单单是事物的概念和情节的记叙，而是在这些以外，更具有能够吸引读者的艺术意境，即通过艺术的形象，使读者对书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强烈的感情。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适合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过程，是把译者和原作者合而为一，好像原作者用另外一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转引自罗新璋，陈应年 2009: 575)

茅盾的“艺术创造性翻译论”与他的“神韵说”一脉相承，是切实可行的翻译标准。他说：“文学翻译的主要任务，既然在于把原作的精神、面貌忠实地复制出来，那么，这种艺术创造性翻译就完全是必要的。”

四、关于译者条件的论述

茅盾在《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和《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中，讨论了翻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条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 翻译者必须“精通本国语文和被翻译国的语文”，这是从事翻译工作的起码条件。文学翻译者除了精通语文之外，“还须具备一般的文学修养”，而要做到“艺术的创造性的翻译”，翻译者应该是个“研究文学”和“有些创作天才”的人。由于文学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忠实地传达原作的意境，如果一个文学翻译家没有一定的创作天才，那么他只能机械地传达原作的内容，难以艺术创造地传达原作的意境。2. 翻译者“必须具有广博丰富的生活经验”。文学作品是描写生活的，译者和创作者一样，也要具备生活经验。“译者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生活体验愈丰富，对于不同国家和时代的生活也愈容易体会和了解。”3. 翻译者“必须对原作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正确分析、研究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社会、生活环境以及作者的思想和风格。他认为，大文豪的著作差不多篇篇都带着他的个性；反映着他生活中各个时期的境遇。如果不知道文学家的生平和著作的特色便开始翻译他的著作，是件危险的事。所以要想翻译一篇文学作品，必须先了解这篇作品的意义，理解作品的特色，这样，译文才能不失原作的“真精神”。4. 翻译者必须了解新思想，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5. 翻译者最好能够“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摆脱原文语言的束缚，使译文运用的是“纯粹的祖国语言”。 （贺爱军）

成仿吾(1897～1984)

笔名石厚生，湖南新化人。1910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1918年开始同郭沫若、郁达夫等在日本从事进步文学活动、筹办创造社。1921年回国成立创造社，相继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刊》、《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多种文学刊物，并总揽社务。1924年赴广州任广州大学教授，兼黄埔军官学校教官。1927年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出国，翌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1931年，从法国回到上海，继后转入鄂豫皖苏区。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任干部团政治教员。次年到达延安后，历任中央党校教员、教务主任，陕北公学校长。1949年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历任华北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74年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1978年起，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等。成仿吾系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文艺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作家。早在1937年任陕北公学校长时，就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974年又致力于马列主义著作的宣传工作，校译了《共产党宣言》及《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早年还写有《论译诗》等译论。

成仿吾的译论活动是从翻译批评开始的。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先后发表过三篇翻译批评文章，分别针对胡适和文学研究会的代表人物茅盾和郑振铎。针对胡适对郁达夫的批评，成仿吾于1922年10月写了一篇反批评《学者的态度》。文章一开头就提出讨论翻译应有的正确态度，即四个“要知道”、三个“不要忘记”和三个“不可有”，对开展翻译批评大有裨益。四个“要知道”是：

第一，要知道我们的讨论，为的是图谋进步。第二，要知道我们的讨论，为的是人类的全体的利益，因为进步是对于人类全体有益处的。第三，要知道我们的讨论，为的是朋友的切磋，因为与我们研究同一问题的，都是我们的一些好朋友。第四，要知道我们的讨论，最要紧的是问题本身，不是微末的枝叶。

三个“不要忘记”是：

第一，我们不要忘记了研究的态度。第二，我们不要忘记了感情这条恶狗，是想往斜路上走去的。第三，我们不要忘记了问题的本身。

三个“不可有”是：

第一，不可有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第二，不可

有攻击人身的论调。第三,不可有捉人话头的毛病。(转引自陈福康 2000:271~272)

尽管成仿吾本人在后来的两篇批评文章中并没有遵循以上原则,这些原则的提出,对于时下风起云涌的翻译批评具有借鉴作用。

成仿吾在翻译理论上的主要贡献,体现在诗歌翻译方面。他在《论译诗》这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中提出了"译诗应当也是诗"的主张:

译诗虽也是把一种文字译成第二的一种文字的工作,然而因为所译的是诗——一个整个的诗,所以这工作的紧要处,便是译出来的结果也应当是诗。这是必要的条件,也可以说是十足的条件。有些人把原诗一字一字译了出来,也照样分行写出,便说是翻译的诗,这样的翻译,即很精确地译出来,也只是译字译文,而绝不是译诗。

译诗应当也是诗,这是我们最不可忘记的。其次,译诗应当忠于原著。诗歌大略可以分为内容、情绪与诗形三部分来讨论。诗形最易移植过来;内容也是一般翻译者所最注意;只有原诗的情绪却很不易传过来,我们现在的翻译家把他全然丢掉了。

所以理想的译诗,第一,它应当自己也是诗;第二,它应当传原诗的情绪;第三,它应当传原诗的内容;第四,它应取原诗的形式。(转引自罗新璋 1984:383~384)

成仿吾还提出了诗歌翻译的两种方法:

我现在为便利起见,假定两个特别的名称:一、表现的翻译法(Expressive method),二、构成的翻译法(Compositive method)。我所谓的表现译法,是译者用灵敏的感受力与悟性将原诗的生命捉住,再把它用另一中文字表现出来的意思。这种方法几与诗人得着灵感,乘兴吐出新颖的诗,没有多大的差异。这种方法对于能力的要求更多,译者若不是与原诗的作者同样伟大的诗人,便不能得着良好的结果。所以译诗的时候,译者须没入诗人的对象中,使诗人成为自己,自己成为诗人,然后把自己胸中沸腾着的情感,用全部的势力与纯真吐出……

我所谓构成的翻译法,是保存原诗的内容的构造与音韵的关系,而力求再现原诗的情绪的意思。这是一般人所常用的方法,但他们每每只把原诗一字一字地翻出,依样排列出来,便以为工事已经完毕了;他们绝少致力于音韵的关系与情绪的构成的。这种方法的要点,是在仿照原诗的内容的关系与音韵的关系,求构成原诗的情绪。译者须把原诗一字一字在内容上的关系与音韵的关系拿稳,然后在第二的一国语言中求出有那样的内容的字,使它们也保存那种音韵上的关系。(转引自罗新璋 1984:384~387)

成仿吾"理想译诗"的四条标准和两种方法,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理论建设的一大贡献。他关于理想译诗的论述,从标准和方法都贯穿着一种浪漫主义文学翻译思想,与它所属的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创作思想是一致的。同时针对当时误译横行的现状,成仿吾还进行了翻译批评:"这个问题很重大。胡适之君说为糊口或介绍译书,译错了也可以原谅,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这样讲。我想不论目的是什么,总要自己先懂了,才能介绍。……我们现在所谓新文化书籍之中,所以没有几本好书的,有两种原因:第一,是因为我们的著作家,大多数只是一分学识,偏要吹成十二分;第二,是因为我们的翻译家,大多数自己还不懂,倒先出来拼命的翻译。这两种人我觉得非有人出来痛击一番不可。我只愿我们的翻译界,一天天进步起来,给我们这些才开眼界的同胞,一些好点的粮食。"(转引自王秉钦 2004:158~159) (贺爱军)

朱光潜(1897~1986)

安徽桐城人。1923 年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1925 年考取安徽公费留学,入爱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等课程。毕业后又入伦敦大学,学习莎士比亚课程。四年后赴法国入巴黎大学学法文与法国文学。随后前往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学德语,并准备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1933 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艺术学院、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46 年冬,重返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讲授外国文学和美学等课程。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历任中国文联理事、中国作协委员、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评议委员、中国译协顾问、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二届、五届委员。朱光潜系我国现代杰出的美学家、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贡献的翻译家。早在英伦时期,他已开始写作和翻译。他熟练地掌握英、法、德语。几十年来,翻译了 300 多万字的作品。他早期翻译的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Croce)的《美学原理》,为我国介绍西方美学开了先河。他的译作多涉及美学和文学理论,也有文学作品〔包括萧伯纳(Bernard Shaw)的戏剧集二册〕。译学论文有:《谈一词多义的误译》、《〈共产党宣言〉译文校对的小结》、《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等。朱光潜的翻译观点主要体现在《谈翻译》一文中,他对翻译的观点可以归纳为:

一、透彻的阅读、恰当的表达。"谈到翻译,这并不是一件易事。据我个人的经验,译一本书比自己写一本书要难得多。要译一本书,起码要把那本书懂得透彻。这不仅要透懂文学,还需透懂文字后面的情理韵味。……阅读已是一个难关,翻译在这上面又加上一个更大的难关,就是找恰当的中文字句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阅读只要精通西文,翻译除要精通西文之外,又要精通中文。许多精通西文而不精通中文的人所译的书籍往往比原文还更难懂。"(转引自罗新璋 1984:447~448)

二、"信"字当头。"严又陵以为译事三难:信,达,雅。其实归根到底,'信'字最不容易办到。原文'达'而'雅',译文不'达'不'雅',那还是不'信';如果原文不'达'不'雅',译文'达'而'雅',过犹不及,那也

还是不'信'。所谓'信'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把它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对原文忠实,不仅是对浮面的字义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同时忠实。""信"最难,原因甚多。头一层是字义难彻底了解。朱光潜把意义分成不同的层面:字典意义(indicative or dictionary meaning)、上下文决定的意义(contextual meaning)、联想的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声音节奏影响意义、历史沿革的意义(historic meaning)和习惯语的意义(idiomatic meaning)。(转引自罗新璋 1984:449～452)

三、中西文语句组织比较。"拿中文和西文来比较,语句组织上的悬殊很大。先说文法。中文也并非没有文法,只是中文法的弹性比较大,许多虚字可用可不用,字与词的位置有时可随意颠倒,没有西文法那么谨严,因此,意思有时不免含糊,虽然它可以做得很简练。其次,中文少用复句和插句,往往一义自成一句,特点在简单明了,但是没有西文那样能随情思曲折变化而见出轻重疾徐,有时不免失之松散平滑。总之,中文以简练直截见长,西文以繁复绵密见长,西文一长句所包含的意思用中文来表达,往往需要几个单句才行。"(转引自罗新璋 1984:453)

四、"理想的翻译是文从字顺的直译"。"所谓'直译'是指依原文的字面翻译,有一字一句就译一字一句,而且字句的次第也不更动。所谓'意译'是指把原文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不必完全依原文的字面和次第。'直译'偏重对于原文的忠实,'意译'偏重译文语气的顺畅。……忠实的翻译必定要能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思想情感与语言是一致的,相随而变的,一个意思只有一个精确的说法,换一个说法,意味就不完全相同。所以想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必须尽量保存原文的语句组织。因此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不过同时我们要顾到中西文字的习惯不同,在尽量保存原文的意蕴与风格之中,译文仍应是读得顺口的中文,以相当的中国语文习惯代替西文语句习惯,而能尽量表达原文的意蕴,这也并无害于'直'。总之,理想的翻译是文从字顺的直译。"(转引自罗新璋 1984:453～454)

朱光潜在《谈一词多义的误译》一文中提到:"一词多义是各国语言中普遍现象。翻开任何一部较详细的字典,都可以发现在一个词条下往往举出几个乃至几十个意义。在翻译一篇文章时碰到一个有疑义的词怎么办呢?一个词不能单就它本身而确定它的意义,要看上下文来决定,要看字典里所举的许多意义之中究竟哪一个意义符合上下文再作出选择。如果单凭自己所记得一个词的最常用的意义,那就不免要犯错误。"(转引自王寿兰 1989:171)

(贺爱军)

郑振铎(1898～1958)

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县,出生于浙江永嘉县。1917年进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1921年与茅盾、叶圣陶等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长期主编《小说月报》,致力于介绍前苏联及各"弱小民族"的文学,发表了大量译作。1927年出游欧洲。1929年回国后,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后曾任燕京大学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课)、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主编过《世界文库》,参加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他主编《世界文库》,旨在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中的精品,得到蔡元培、鲁迅、茅盾的积极支持。可惜只出了第一集12册。1949年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10月18日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逝世。

郑振铎的一生没有离开过翻译,成果颇丰。他的译作大多是从英文转译的,主要可分为三类:俄国文学、印度文学以及希腊和罗马文学。

郑振铎的翻译作品主要特点有:

一、体裁广泛,内容丰富,做了多方面的实践。他翻译了不少作品,体裁涉及诗歌、小说、儿童文学、散文等,而且多有探索和创新。他是较早把俄国文学、印度文学、希腊和罗马文学介绍到中国的一位,具有开风气和补空白的意义。但因种种原因,他没有译出具有里程碑式的世界名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他的译作鲜明地反映了个人风格,也发挥了社会功能。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有所为",都是为反映和改造人生而译。但是由于工作和斗争的紧张与急迫,有时他未及仔细修饰文字,过于直露或粗糙,使得作品的审美价值不及认识价值。但他却不乏一些艺术性和思想性达到完美结合的作品,如他所译的泰戈尔的诗集等。

在翻译理论方面,郑振铎的贡献主要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翻译理论建树和一生提倡翻译事业建设。作为一名诗人、散文家和知名学者,他对我国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的翻译见解经受了历史检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现介绍如下:

一、"文学是绝对能够翻译的"

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随着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的提高,有些人对译作是否能保持原著的思想、艺术风格表示怀疑,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是绝对不可译的。对于这个问题,郑振铎认为,"文学不可译"的观点本质上是狭隘的文学观念的产物,如果否认了翻译的可能性,实际上就否认了文学的国际交流,否认了世界文学的意义。郑振铎在《译学的三个问题》中提出,"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转引自林本椿 2004:136)他还认为文学的"风格"就是文学的"表达",而"表达"可以把人类思想具有共通

的东西"移植"成文字。这种对于文学可译性的论述,消除了某些译者和读者的疑虑,在当时,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翻译不仅是"媒婆",而且是"奶娘"

郑振铎认为翻译最好有两种功能:1. 能改变中国文化传统。2. 能引导中国人和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思想相接触。他认为,"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在《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一文中提出,"翻译家的责任非常重要,无论在哪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受别国文学影响的痕迹。而负这种介绍责任的,却是翻译家。"(转引自林本椿 2004:136)他在发表的《处女与媒婆》、《翻译与创作》、《盲目的翻译家》等文章中,反对盲目的翻译,认为只有有选择的翻译才能使我们的创作丰富而有力。他反对把翻译与创作对立起来,认为翻译的作用不仅是"媒婆",而且是类似于"奶娘","创作绝不是闭了门去读《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诸子百家文集",而是"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郑振铎关于翻译的目的和功能的论述,对于端正我国现代翻译的方向无疑起了作用。这种精神对于我国当前翻译界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翻译的三原则

郑振铎重视翻译的质量,在关于翻译的艺术、方法和原则上,他首次向国内翻译工作者介绍了英国翻译学家泰特勒(Tytler)的《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及其中的三原则。他对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其一,翻译必须讲求"忠实"。其二,强调贵得"中道",防止走入"死译"与"放纵"两个极端。(转引自陈福康 2000)

关于严复的"信达雅"三字理论,他认为,"直译"的文章只要不是"不通"的中文,仍然是"达"的。假如将原文割裂以迁就译文方面的流行,虽"雅"却不足道矣。所以译文是以"信"为第一要义,但要努力使其不至于看不懂。他的这些翻译论述是十分精当的,在当时也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

四、对近代翻译史的评述

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严格地说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郑振铎认为,这一时期的翻译具有很大的气魄,但终归于失败。原因有五点:1. 内容上妥协于中国读者的口味和伦理观。2. 简单地利用外国作品作为改革的工具。3. 消遣性的侦探言情小说译得很多。4. 缺乏正确的文学常识。5. 不忠实于原著。但是,他仍然充分肯定其影响,认为最显著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影响于后来的创作;二是影响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他认为,清末翻译与"五四"时期的翻译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是"无意识的介绍",而后者则是"有意识的介绍"。郑振铎的这些论述,为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定下了框架和基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语言的"欧化"问题

20世纪20年代,随着外国文学翻译的日益增多,语言"欧化"问题被提到文艺理论的议事日程上来。郑振铎在《文艺丛谈》、《语体欧化之我见》等文章中,提出赞成语文体"欧化",并提出"欧化"是为求文学艺术精进的一种方法。但他反对简单的模仿,认为"欧化"要保有一个度,即"虽不像中国人向来所写的语文体,却也非中国人所看不懂的"。郑振铎关于语言"欧化"的论述,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对于今天的文学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瞿秋白(1899～1935)

原名双,正式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1917年在北京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不久,开始翻译普希金(Пушкин)、果戈理(Гоголь)、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等人的作品。1919年"五四"运动中,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20年底,他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苏联访问。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曾两次见到列宁。这一时期他写出了许多优秀散文,分别收入《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中。1923年初由莫斯科回国后,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同时编译《现实》,介绍经典作家著作,并翻译革命文献。1931年至1933年在上海与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1934年2月到瑞金。红军长征后。在江西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23日随军过汀江时不幸被俘。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同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

瞿秋白不但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卓越的翻译家。他译有长篇小说(片断)2部、中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19篇、诗歌3篇、剧本2部、论文39篇。他的文学翻译活动,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早期(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翻译介绍俄国的文学作品。他的第一篇小说是1919年9月15日发表在《新中国》上的托尔斯泰的《闲谈》。之后,又陆续翻译了托尔斯泰的《祈祷》、《风雪》、《丽城小记》、《伊拉司》、《野果》、《论教育》、《告妇女》等,果戈理的《仆御室》、《妇女》、都德(Daudet)的《付过工钱之后》,倍倍儿(Bebel)的《社会之社会化》,列宁(Lenin)的著名论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等政论文章。其中心思想是主张科学和民主救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他翻译了《国际歌》,发表在同年6月《新青年》创刊号上,是翻译《国际歌》的第一人。后期(20世纪30年代)是他翻译事业的鼎盛时期。这时,剧烈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矛盾的新形势,要求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所以瞿秋白重点译介高尔基(Горький)以及其他苏俄作家的文学作品,同时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具体有《高尔基创作选集》(内含《海燕》)、革拉特珂夫(Gladkov)的《新土地》、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别德内

依(Bedny)的讽刺长诗《没工夫唾骂》、普希金的《茨冈》、绥拉菲莫维奇(Serafimovich)的著名报告文学《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等。其间重要的译作要数《海燕》,《海燕》译文"准确贴切,简洁流畅,音韵协美,铿锵有力!既保存了原诗的战斗精神,表达了原始的意境,又保存了原作散文诗的艺术风格,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体现了他'信顺统一'的翻译思想,神形兼备的艺术手法,至今仍不失为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堪称译作中的精品"(孟昭毅,李载道 2005: 187)。

瞿秋白有关翻译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他写给鲁迅的两封信里。第一封信是1931年12月5日写的《论翻译》。第二封信是1932年发表在《文学月报》第2期上的《再论翻译——答鲁迅》。瞿秋白在信中赞扬鲁迅翻译的《毁灭》非常忠实的同时,批评了严复和赵景深的翻译理论,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现在赵景深之流,又来要求: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赵老爷的主张,……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国读者,信口开河的来乱讲海外奇谈。第一,他的所谓'顺',既然是宁可错一点儿的'顺',那么,这当然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这不是创造新的言语,而是努力保存中国的野蛮人的言语程度,努力阻挡它的发展。第二,既然要宁可'错'一点儿,那就是要蒙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第三,他显然是暗示的反对普罗文学!他这是反对普罗文学,暗指着普罗文学的一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创作的翻译"。(转引自孟昭毅,李载道 2005: 193~194)在批判赵景深的同时,瞿秋白提出翻译应当用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翻译,帮助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他说:"翻译——除了能够介绍原来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转引自孟昭毅,李载道 2005: 193)瞿秋白和鲁迅对翻译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瞿秋白既不同意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意见,也不同意鲁迅的"装进异样的句法",然后"据为己有"的观点。瞿秋白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用"绝对的白话文"来翻译,他说:"当翻译的时候,如果只管'装进异样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里能够说得出来,——那么,这些'异样的句法'始终不能够'据为己有'。新的表现法,将永久是'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表现法!我们应该改变一个新的方针:就是竭力使新的字眼,新的句法,都得到真实的生命,——要叫这些新的表现法能够容纳到活的言语里去。不应该预先存心等待那自然的淘汰。固然,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之中,也许仍旧有许多要淘汰掉的,然而,假使个个翻译家都预先存心等待自然的淘汰,而不是每一个人负起责任使他写出来的新的字眼和句法尽可能的能够变成口头上的新的表现法,那么,这种翻译工作就不能够帮助中国现代文发展。"(转引自孟昭毅,李载道 2005: 194)瞿秋白不仅阐述了"信"和"顺"的矛盾,而且在翻译实践中提出了"概念相等"的翻译原则。他在1931年写给鲁迅的信中指出:"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可以讲得出来白话来写。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不用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的,容忍着'多少的不顺'(就是不用口头上的白话),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精神。"(转引自罗新璋 1984: 270) (贺爱军)

董秋斯(1899~1969)

原名董绍明,常用笔名求思、求实。河北静海(今属天津)人。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期间,先后参加了"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爱国运动。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底参加北伐战争,在十九军政治部担任宣传工作,曾主编《血路》月刊。1929年在上海结识了美国革命女作家史沫特莱(Smedley),曾陪同她会见鲁迅,任临时翻译。1930年参加左联和社联的发起工作,并主编《国际》月刊。在此期间翻译了苏联作家革拉特柯夫的长篇小说《士敏土》,受到了鲁迅的关注。随之,又赶译了戈庚的《伟大的十年文学》部分内容。1945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民主》周刊编委。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翻译》月刊主编、中国作协编审、《世界文学》副主编。1950年调北京出版总署编辑局工作,主编《翻译通报》。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担任《译文》月刊副主编和编委。译有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多丽丝·莱辛的《高原牛的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爱尔文·斯通的《杰克·伦敦传》、《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传》、奥兹本的《精神分析学与辩证唯物论》、加德维尔的《跪在上升的太阳下》、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列昂诺夫的《佳作》和《索溪》、鲁丝·莫尔的《安静的森林》。主要论著有《论翻译理论的建设》。

1951年,时任《翻译通报》主编的董秋斯在该杂志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了《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建立翻译(科)学的主张,并详细分析了建立翻译学的理据、步骤以及翻译学建立的标志。当时翻译工作者对翻译学存在两种态度:"一种说:翻译是一种艺术,只能'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受任何理论的约束。理论不过是小说法程、戏剧做法一类的东西,事实上没有多大用处。另一种反对意见说:

翻译是一种技术,类似油漆匠的工作。油漆匠学会了用颜色,就可以照样本画山水人物。翻译工作者只要看懂外国文,会写本国文,又了解一本书的内容,就可以翻译。油漆匠从来不讲究什么理论,翻译工作者要理论作什么呢?"(转引自罗新璋 1984: 536)针对这两种态度,董秋斯认为具有一千几百年历史的翻译工作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却"进步迟缓""简直是在兜圈子","是与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很不相称的"。究其原因,董秋斯以为"过去科学不发达,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不能运用科学方法,总结前人的经验,发现进展的法则"。董秋斯进一步明确提出"翻译是一种科学","从这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在工作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以遵循,并不完全靠天才或灵感。"(转引自罗新璋 1984: 537)他提出:

我们首先得考察各国语文的构造、特点和发展法则,各学科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各时代和各国家的翻译经验。然后把这三样东西的调查研究所得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翻译界有了这样一种东西,就等于有了一套度量衡,初学的人不再要浪费很多时力去搜索门径,也不至于不自觉地蹈了前人的覆辙。从事翻译批评的人也有一个可靠的标准。在这样的条件下,毫无疑问,翻译工作的品质是可以飞跃一般地提高的。(转引自罗新璋 1984: 537)

董秋斯不仅提出"翻译是一种科学"的主张,而且还进一步详细探究了翻译学建立的具体步骤:

第一步,就翻译工作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如直译和意译问题,审校制度问题,译文标准问题等等,在短期内制成一个方案,提交全国翻译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作为翻译工作者临时的'共同纲领',以便据以进行翻译计划中所规定的工作。因为这个方案是在短期内制成的,来不及总结古今中外的全部翻译经验,作深入的探讨,概括性不大,若干问题可能解决得不够彻底,所以只能是一个临时的方案。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还要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工作。

第二步,伴同翻译计划的执行,或就作为翻译计划的一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有关翻译工作的领导机关,组织专家,从事下列各项工作:

一、编著'中国翻译史',用正确的历史观点,总结东汉以来一千几百年的翻译经验,从发展的进程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和法则。

二、搜罗东西方各国有关翻译理论和翻译制度的专书和论文,加以编译,作为我们建设理论和制度的借镜。

三、依照斯大林的语言学观,用科学的语言学方法,比较中外语文的特点和发展方向,指出当前译文应守的范围和'欧化'的限度……

四、加强翻译批评工作,提供时间和力量,广泛地寻找典型,优良的加以推荐,粗滥的加以批评,这样,不但提高翻译工作者的积极性,也给翻译理论的建设提供丰富的实例。

五、号召负责翻译和审校的人,把总结经验作为自身工作的一部分,随时提供心得,与同工者观摩切磋,既可提高业务的水准,也有助于翻译理论的建设。

六、办好翻译工作的机关刊物,使散居各地的翻译工作者(至少在目前,集中在一个机关的可能性是很少的),随时互通消息,交换意见和心得,发表研究的成果。(转引自罗新璋 1984: 542)

按照董秋斯的观点,要建立中国翻译学必须编撰"中国翻译史",必须借鉴西方翻译理论,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必须建基于现代语言学理论之上,开展中外语文比较研究。不仅如此,董秋斯进一步明确提出翻译学建立的标志是写成中国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学两部大书。"这两部大书的出现,表明我们的翻译工作已经由感性认识的阶段,达到了理性认识的阶段,实践了'翻译是一种科学'这一个命题。"(转引自罗新璋 1984: 543)董秋斯在翻译界的贡献还在于大力提倡开展翻译批评。他在《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中指出:过去即使在进步翻译工作者中,也常存在四项缺点:选择不精,辨别不明,态度不严肃,工作不认真。要克服这些缺点,都有待于翻译理论的建设和翻译批评的开展。在同年 8 月,他又发表了《怎样建立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以前用"吹毛求疵"来代替批评,或将批评看做"打擂台",今后则要:一、分清对象;二、找到重点;三、掌握原则;四、推荐成功经验;五、注重作风问题;六、建立正确的理论;七、讲求说话态度。同年 10 月 15 日,董秋斯发表了《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一文,再次更详尽地论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翻译批评的根本困难大致有两条,一是"没有一个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二是"没有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他说:"反观我们中国,虽然有一千几百年的翻译经验,从事翻译的人也是以千计以万计的,但是研究翻译理论的人,几乎可以说没有。我们所有的,是一些供临时参考的翻译条例和片段的经验之谈。尽管这些东西是很宝贵的,有过很大的功效,但是,无可讳言,不能合成一个体系。一种体系的构成,是一种广泛地调查研究的总结。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不但要了解中外语文的特性,还要从历史上观察全部翻译工作的发展。到此为止,我们还不见有人从事这样一种工作,至少还没有显然可见的成绩。"(转引自陈福康 2000: 361) (贺爱军)

梁实秋(1902～1987)

本名梁治华,浙江余杭人,生于北京。1915 年进清华留学预备学校。1919 年与闻一多等成立清华文学社。1923 年赴美,先后就读于科罗拉多大学英语系、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926 年回国,历任北大、北师大、中山大学教授。梁实秋是以胡适、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的骨干之一。1928 年主编《新月》时,与鲁迅开展"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论战。抗战开始后,梁实秋入川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与《中央日报》副刊主编。1949 年 6 月去台湾,任台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台湾大学教授与

“国立编译馆”馆长等职。1966年退休后专事文学翻译。梁实秋译著颇丰，他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于1977年出版，行销海内外，影响广泛。梁实秋对译事的最大贡献是经过37个寒暑(1931～1967)独自译完《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梁实秋是莎剧研究者，他将莎剧原文“无韵诗”全部译成散文，认为“中文根本无此体裁”。他在体裁上的改译自谓既不是直译，也不是意译，而是以句为单位进行翻译，是“求其能达原意，至于原文节奏声调之美，则译者力有未逮，未能传达其万一”。对于翻译理论，除早期与鲁迅的论战外，梁实秋在《翻译的艺术》等著作中亦有阐发。

梁实秋同鲁迅的那场论战，涉及了翻译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很多思想在今天依然有重要意义。梁实秋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人之一，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工具性，认为文学的核心是人性。当然，梁实秋首先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学问是他的本业。梁实秋具有翻译理论家、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倡导者和严谨的学者这三重身份，因此以下将从这三个方面探讨梁实秋的翻译思想：

一、作兼顾读者和原作的翻译家

梁实秋主张翻译活动应从读者理解的需要出发，他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指出，翻译的目的“是要把一件作品用另一种文字忠实表现出来，给不懂原文的人看”，翻译家的职责在于“尽力使译文不失原意而又成为通顺之中文而已”。因此，译文务必忠实通顺，并且符合汉语规范，绝不可译成欧化文。在与鲁迅论战的过程中，梁实秋提出“信”“顺”统一的翻译观。他既不赞同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也反对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他认为：

坏的翻译，包括下列几个条件：1. 与原文意思不符。2. 未能传达出原文的“强悍的语气”。3. 令人看不懂。三条有其一，便不是好翻译；若三条具备，便是最坏的翻译。误译、曲译、死译、硬译都是半斤八两。误译也不要笑硬译，莫以为指责别人译得误便能遮盖自己译得硬。(梁实秋 1933)

梁实秋以读者为第一要义，强调“信”与“顺”的统一，亦即译文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通顺可读。他说：“翻译要忠于原文，如能不但对原文的意思忠实，而且还对‘语气’重视，这自是最好的翻译。虽能使读者懂而误译原文，这种翻译是要不得的。既误译原文，而还要令读者‘硬着头皮’去懂，这是太霸道了。”(梁实秋 1933)

梁实秋始终坚持“信”与“顺”的统一，并以“存真”为要旨，再现了莎士比亚作品的原貌。直至晚年，梁实秋仍然强调“信”的重要性。关于信与顺的关系，他的见解颇为精辟：

常听人说，最好的翻译是读起来不象翻译，话是不错，不过批评翻译之优劣必须要核对原文，与原文不相刺谬而又文笔流畅，读起来不象翻译，这自然是翻译的上品，若只是精解原文大意，融会贯通一番，然后用流利的本国语文译了出来，这只能算是意译，以之译一般普通文章未尝不可，用在文艺作品的翻译上则有问题，文艺作品的价值有很大一部分在其文字运用之妙，所以译者也要字斟句酌，务求其铢两悉称，所以译者经常不免于搔首踟蹰。(转引自刘天华 1990：22)

刘炳善曾经如是评价梁实秋的翻译：“梁译本不以文辞华美为尚，而以‘存真’为宗旨，紧扣原作，不轻易改动原文，不回避种种困难，尽最大努力传达莎翁原意，他的译文重视、细致、委婉、明晰，能更多地保存莎剧的本来面貌。”(刘炳善 1992)

梁实秋反对鲁迅倡导的“硬译”，将鲁迅的翻译称为“死译”，并对鲁迅所说的“中国文本本来的缺点”是他译文“艰涩”的两个缘故之一进行了批评。他说，“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有些文法是中文里没有的，翻译之难即难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文有‘本来的缺点’便使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最后他呼吁，“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梁实秋，2002)。

鲁迅认为，中国文法太不严密，连讲话都时时词不达意，而“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说，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要医这病，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转引自罗新璋，1984：276)。梁实秋则与鲁迅观点相左，他不但认为中文没有缺点，还指出中文是如此“圆滑含混”以至于“许多欧洲文繁杂的规律在中文都不成问题”(黎照 1997：589)。

梁实秋不但反对欧化文，而且还认为，欧化文的产生是翻译尤其是“硬译”的结果，并不是中文不精密不合用。译者或者因为外文能力不足，或者拙于表达，于是形成了欧化文：

中文而欧化，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西文句中多子句，形容词子句或副词子句等，若是按照西文的文法亦标明其为子句，或是将子句纳入主句之中，则冗长累赘，往往不能令人卒读，不高明的翻译(如硬译)助长这种欧化的趋势。(转引自赵军锋，魏辉良 1996)

二、作为自由主义文学倡导者的文学翻译家

梁实秋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明确提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他是一个坚定的人性论者，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反对将文学作为启蒙工具和政治工具。他说：“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作品之基础，……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唯一之标准。”梁实秋反对阶级文学论和文学工具论，在他眼里，文学就是文学，文学的核心是描写人性。

梁实秋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反映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所选作品应当是经典的著作，应该反映“永久的人性”。梁实秋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指出，翻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介

绍给国人:"愚以为有学术性者,有永久价值者,为第一优先。"梁实秋提倡"读一流的书,译一流的书",反对没有鉴别地翻译外国作品,尤其是西方三、四流的作品,他指出:

普遍的同情并不因此而止,由社会而推及于全世界,于是有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被损害民族的文学","非战文学",应运而来。报章杂志上时常有许多翻译和诗文,不但那外国作者的姓名我们不大熟悉,即其国籍我们也不常听说。

他主张译介一流的作品,并且身体力行。他译介的作品,皆择取名家名篇,如《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织工马南传》、《咆哮山庄》、《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西塞罗文录》、《雅舍译丛》等十余部作品,这些作品的选材,大多与梁实秋的文学应该描写"永恒的人性"的文艺思想一脉相承。由此可见,梁实秋的文艺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翻译活动。

三、作为学者型的翻译家

梁实秋在多所大学任教,是一名严谨的学者。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反映在他的翻译实践上。梁实秋认为,"从事翻译的人若自己不先彻底明白他所翻译的东西就冒昧翻译起来,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遇到引经据典的地方,应该不厌烦地去查考,查出来应加以注释,使读者明白。"(梁实秋 1967)由此可见,翻译在梁实秋那里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译介行为,而且是严谨的治学工作。在梁实秋看来,翻译本身就是做学问。他对于翻译的这种态度,集中反映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上。

在翻译莎士比亚的过程中,梁实秋意识到翻译"有时候也要牵连上一点点的研究工作","翻译要适当地与研究相结合;不进行研究,有些地方就'搔首踟蹰,不敢落笔'"(梁实秋 1967)。为此,他设法搜集莎士比亚的各种版本,以及与莎士比亚有关的各种书籍资料,日积月累,竟然"比起国内任何大学图书馆还要壮观一些"(梁实秋 1967)。最后他选定了由 W. J·克雷格(Craig)主编的《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1892年版),这个版本未经删节,最具莎剧原貌。对于这版莎剧中的猥亵性词语和笑话,梁实秋认为,"戏剧里的插科打诨,本自有其时代背景的意义。纵然涉及猥亵,亦无伤大雅,有时且可以表示一种心里健康的意味。牛津本是个完整的本子,没有任何删节,我翻译时也没有顾及任何忌讳,我努力试行恰如其分地把原文忠实地翻译出来,以存其真。"(梁实秋 1967)因此,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除了翻译作品内容部分以外,还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在《莎士比亚全集》的每一部前都有一篇序,详尽介绍版本历史、著作年代、故事来源、舞台历史、文本研究情况,等等。作品里的内容或语言技巧如双关语、俗语等都有大量注释,这种大量加注的方法被有些专家称为"学者翻译法"。这种译文无论对于读者阅读还是对于学者研究,都极具参考价值。除此之外,梁实秋还对莎士比亚做了大量研究,并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如《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在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是诗人还是戏剧家?》,等等。研究表明,"梁实秋是第一个引介英美西方传统的莎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开启了中国台湾东方莎学研究之先河。"(陈淑芬 2002)

梁实秋并没有系统提出自己的翻译理论,但是从他在同鲁迅的论战、莎剧翻译和莎学研究以及对其他外国文学作品的评论中,可以梳理出梁实秋为读者的忠实译者、自由主义文学倡导者和严谨的学者这三重的翻译家身份,而正是由于这三重身份,梁实秋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贺爱军)

贺麟(1902~1992)

字自昭,四川金堂人。现代哲学家、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翻译家。1919 年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二年级。清华期间受到梁启超、梁漱溟、吴宓等人的影响。1925 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严复的翻译》,讨论其翻译的意义与特点,推崇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1926 年,他出国时,吴宓写长诗赠他,其中两句"学派渊源一统贯,真理剖析万事基"使他终生难忘。从此以后,他沿着吴宓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道路,把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作为自己终身志业,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到美国后,他在奥柏林大学攻读西方哲学,获学士学位。1928 年 9 月转入哈佛大学,选听康德(Kant)哲学、斯宾诺莎(Spinoza)哲学以及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教授的课程,1929 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在此期间,翻译了鲁一士(Josiah Royce)《近代哲学之精神》一书中"黑格尔:为人及其学说概要"一章,并译出鲁一士的《近代唯心论讲演集》有关黑格尔(Hegel)精神现象学的几章,合为一书《黑格尔学述》。1930 年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31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课。1936 年升任教授,讲授西方哲学史、黑格尔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等课程。他在教学的同时,从事翻译,曾发表《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概要》。1938 年初到昆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任教。同年 10 月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任教。一年后仍回西南联大任教。1946 年 10 月北大复原,贺麟返回北平,1947 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代理主任。1953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5 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先后兼任西方哲学史研究组组长、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黑格尔全集》中文版编译委员会名誉主编,西方哲学名著研究编译会名誉会长等职。

贺麟开拓了我国对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工作。他所译的《小逻辑》,是国内最畅销的西方哲学著作之一,所译黑格尔、斯宾诺莎著作多种,均列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同时他还是一位翻译史研究家,曾撰有《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追溯了近百年来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翻译情况。他翻译的《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中文版《黑格尔全集》第一卷出版。此外贺麟的译著还有:《翻译

与文化交融》,E·凯尔德的《黑格尔》,鲁一士的《黑格尔学述》,斯宾诺莎的《致知篇》、《伦理学》和《知性改进论》,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讲演录》。(林煌天 2005: 279～280)

贺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的翻译家,他一向主张"研究什么翻译什么","搞懂搞透"才能翻译。他的翻译思想根植于哲学,他在《论翻译》一文中从哲学角度探讨了翻译的可行性和理解原文义理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慢慢就可明了翻译所包含的哲学原理了。因为意与言或道与文是体与用、一与多的关系。言所以宣意,文所以载道。意与言、道与文间是一种体用合一,而不可分的关系。故意之真妄,道之深浅,皆可于表达此意与道的语言文字中验之。……今翻译之职务,即在于由明道知意而用相应之语言文字以传达此意、表示此道。故翻译是可能的。因道是可传,意是可宣的。再则,意与言、道与文既是一与多的关系,则可推知同一真理,同一意思,可用许多不同的语言文字或其他方式以表达之。

从哲学意义上讲,翻译乃是译者(interpreter)与原本(text)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communication),其中包含理解、解读、领会、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translation),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而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亦即言与意、文与道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某种意义上的"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是可能的;但言不可尽意却可表意,文不可尽道却可载道,因言为心之声,为意之形。……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前者为一,后者为多。二者颇似哲学中谈论的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正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即可用无限多的语言去发挥、表达之处。(转引自王秉钦 2004: 191～192)

同时,贺麟还认为,翻译最大的价值和贡献在于"内化外学",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就要让世界进入中国。他指出:"须知,一个不能兼容并蓄其他民族文化并向其他民族学习请教的民族,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中华文化几千年绵延不绝,发展至今仍保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不能不说与容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有关。佛学的东渐,西方科学技术的输入,以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均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在当今世界跻身强族之林。故翻译的意义和价值乃在于华化西学,使西方文化中国化。"(转引自林煌天 2005: 1032～1033)　　(贺爱军)

傅雷(1908～1966)

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市南汇县人。20 世纪 20 年代初曾在上海天主教创办的徐汇公学读书,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论激烈,被学校开除。在大同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讲演游行,险遭逮捕。1927 年冬离沪赴法,在巴黎大学文科学习;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留学期间游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1931 年秋回国后,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美术史和法文。翌年入法新社担任笔译。1935 年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长。抗战时期,闭门不出,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1945 年,与马叙伦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为候补理事。1955 年当选为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1962 年为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永久会员。1966 年 9 月 3 日,傅雷辞世。傅雷翻译的作品,共 33 种,600 余万字,累计发行近千万册,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其中巴尔扎克(Balzac)的占 15 种:有《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译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罗曼·罗兰(Rolland)的 4 种: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Voltaire)(现通译伏尔泰)的 4 种:《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Mérimée)的 2 种:《嘉尔曼》、《高龙巴》。莫罗阿(Maurois)的 3 种:《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此外还译有苏卜(Soupault)的《夏洛外传》,杜哈曼(Duhamel)的《文明》,丹纳(Taine)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Russell)的《幸福之路》和牛顿(Newton)的《英国绘画》等书。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 1981 年起分 15 卷出版,现已出齐。

傅雷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曾就翻译问题发表过一些重要的意见,保存下来的有:1951 年为《高老头》重译本写的序文,1957 年应《文艺报》写的《翻译经验点滴》以及和林以亮、罗新璋等人有关翻译的通信。其中,"重神似不重形似"是傅雷的重要翻译思想。傅雷在 1951 年写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这样说:

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以实际工作论,翻译比临画更难。临画与原画,素材相同(颜色,画布,或纸或绢),法则相同(色彩学,解剖学,透视学)。译本与原作,文字既不侔,规则又大异。各种文字各有特色,各有无可模仿的优点,各有无法补救的缺陷,同时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像英、法,英、德那样接近的语言,尚且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中西文字的扞格远过于此,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转引自罗新璋 1984: 558)

相隔十年后,傅雷在致罗新璋的复信中又再次提到,"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傅雷在此以自己深厚的文艺素养和长期的译事经验,借助绘画和诗文领域里的"形神论"来探讨文学翻译的艺

术问题，将译论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独特的傅译风格，“在文学翻译界，独树一帜，卓然成家”。对傅雷颇有研究的罗新璋对“神似”阐述得较为具体，他说：“神似，也即传神，顾名思义，就是传原文的精神，透过字面，把字里行间的意蕴曲达以出。……各种文字各有特色，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而翻译决不是直线似的字当句对，而是多层次的传神达意。所谓‘重神似不重形似’，是指神似形似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倚重倚轻，孰取孰弃的问题。”（转引自罗新璋1984：11）20世纪50年代，傅雷在致林以亮的信中进一步阐明了翻译不可字面硬搬，而必须保存原作的精神和美感特征。他指出：“民族的 mentality（精神面貌）相差太远。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是综合的，诗的。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转引自罗新璋1984：547）傅雷还从中西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方面的不同，谈到了翻译中“传神”的不易。20世纪60年代，他在给罗新璋的信中，仍这样说：“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增，而传神愈感不足。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此两种 mentalité（精神面貌）殊难彼此融洽交流。同为 métaphore（隐喻），一经翻译，意义即已晦涩，遑论情趣。不若西欧文字彼此同源，比喻典故大半一致。”（转引自陈福康2000：390）

傅雷告诫译者，要了解两国文字的不同和文化的差异，翻译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他如是说：

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风格传统信仰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涵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转引自罗新璋1984：558～559）　　（贺爱军）

钱锺书（1910～1998）

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幼承家学，饱读经史典籍。先后在无锡东林小学、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读完小学和中学。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专习西方语文”，同时，他也没有忘记“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钱锺书1984：346）钱锺书在大学期间专攻西文，同时不忘中文，形成了中西兼顾的知识结构。在大学期间，他就以“中书君”为笔名，在《清华周刊》、《大公报》、《新月月刊》上发表文章。

1933年钱锺书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受聘于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在光华大学期间发表了大量五言、七言旧体诗和一些学术性著述。比如“论俗气”“论不隔”“论复古”“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和“与张君晓峰书”等，论述他早年的文学史观，对文学的定位、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以及对文言和白话等问题的见解。

1935年秋，钱锺书携新婚夫人杨绛同赴英伦留学。牛津学风严谨，馆藏丰富，两年后，钱锺书完成毕业论文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获文学士学位。之后随杨绛女士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归国，先后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兰田师范学院英语系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起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20世纪50年代参加过《毛泽东选集》英译及其定稿工作。1972年8月《管锥编》定稿。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

钱锺书是博学多才的散文家、小说家、文学研究家，也是不可多得的翻译家。他所提出的翻译“化境”说，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经典论断。钱锺书译著，整篇的不多，只见《精装本〈堂吉诃德〉引言》、德·桑克蒂斯（Sanctis）的“三论”和《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里的两段译文，其余的散见于《管锥编》、《谈艺录》等书里大量引语的翻译。《管锥编》中的译句“下笔研精，片言生辉”；翻译理论方面除了《林纾的翻译》、《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等专论以外，主要散落于《管锥编》和《谈艺录》中。

钱锺书认为，不同类型的文化、不同风格的学术存在共性，“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因此翻译的主要功能在于“打通”。“夫‘译’一名‘通事’，尤以‘通’为职志。”“语言变乱不通，则不能合作成功，……非译莫解。”（钱锺书1979：540）

钱锺书对早期佛经翻译和翻译史料的挖掘同样别出心裁。他认为我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释道安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全三国文》卷七五支谦《法句经序》仅发头角，《学记》所谓开而弗达。《高僧传》二集卷二《彦琮传》载琮‘著《辩正论》，以垂翻译之式’，所定‘十条’、‘八备’远不如安之扼要中肯也。”（钱锺书1979：1262）对于道安的“五失本”钱锺书也仔细予以评析。其“五失本”之一曰：“梵语尽倒，而使从秦，”可见“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五失本”之二曰：“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则梵自有其“雅”与“文”，译者以梵之“质”润色而为秦之“文”，自是“失本”，以梵之“文”损色而为秦之

"质",亦"失本"耳。"失本"之三、四、五皆指译者之削繁删冗,求简明易了。(钱锺书 1979: 1263～1264)

钱锺书通过对佛经翻译的研究,发现严复所提的"译事三难: 信、达、雅"早见于支谦《法句经序》:

仆初嫌其为词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阙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 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梵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旨,不加文饰。按"严"即"庄严",与"饰"变文同意。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 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支、严于此,尚未推究。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不达而不信者有之矣,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一人讽时,制"撒谎表"(Bugie),胪列虚伪不实之言,如文人自谦"拙作"(la mia modesta poema),征婚广告侈陈才貌等,而"直译本"(la traduzione letterale)亦与其数,可谓善滑稽矣。(钱锺书 1979: 1263～1264)

由此可见,钱锺书认为"信"是翻译的第一要义,既能得原文之意,忘原文之言,妙传原作之旨,又能保持原作的风格,才可以称为"信"。"达""雅"涵蕴于"信"之中。能"达"者未必能"信",不"达"者必不能"信","雅"是指译文要与原文保持相同的文体风格。

翻译求达、求信、求雅,其根本目的还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翻译的独特功效,即"打通"不同语言文化的壁垒,尽可能准确地剔抉出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求信、求达、求雅与钱锺书从许慎关于翻译训诂中独具只眼地发现的关于翻译的丰富意蕴一脉相承(季进 2002: 188)。他指出:

《说文解字》卷十二《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讹'。"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讹"、"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的"虚涵数意"(polysemy, 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所能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钱锺书 2002: 77)

"诱""讹""化"也正是钱锺书翻译理论的三个主要内容。

"诱"是指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媒介作用。钱锺书以为"媒"和"诱"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钱锺书 2002: 79)。

"讹"是指翻译中的误译和叛逆。钱锺书指出:"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合原文。那就是'讹'。"(钱锺书 2002: 78)钱锺书所说的"讹"可以看做是"翻译者即反叛者"和"创造性叛逆"的同义词。在翻译中某种程度的"讹"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钱锺书 2002: 78)钱锺书对翻译中"讹"的看法比较客观公允,他说:"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像林纾那样的手痒;他根据个人的写作标准和企图,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信有点铁成金、以石攻玉或移橘成枳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钱锺书 2002: 85)

"化"是翻译的最高标准。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钱锺书 2002: 77)

(贺爱军)

季羡林(1911～2009)

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时还是一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1930 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西方文学,以英文为主,辅之以德文和法文,同时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1935 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发表多篇论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1948 年回国,被胡适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1956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 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季羡林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他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诠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他的 100 多部著作已汇编成 24 卷《季羡林文集》。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季羡林是我国当代杰出的翻译家,几十年来,从事英文、德文、梵文等文学作品的翻译,发表、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他的翻译活动以译介印度文学,尤其是印度古典文学名著为主。主要译作有: 德国

女作家西格斯(Seghers)的《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55),印度迦梨陀娑(Kalidasa)的《沙恭达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印度古典名著《五卷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印度迦梨陀娑的《优哩婆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印度蚁垤的长篇史诗《罗摩衍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984),以及印度黛维夫人(Maitraye Devi)的《家庭中的泰戈尔》(漓江出版社,1985)等。其丰富的译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为古代中外历史和文化关系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鉴于季羡林在文学翻译领域的巨大成就,中国翻译协会在庆祝2006年国际翻译日之际特别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季羡林的译文规范流畅、符合原文要求,曲传原文之妙。例如《沙恭达罗》的文体为散文韵文相杂,季羡林的译文保留了原作的风格,在散文式的独白或对白中采用朗朗上口的口语语言,在诗体部分形式整齐、节奏清晰、押韵严谨,尽力传达原作中诗的韵味,从而营造出诗的意境,传递出无穷的回味。在其译作中,尤以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最为世人瞩目。《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已经译成世界多国文字,规模巨大,有煌煌七大卷八大册,篇幅长达两万颂,译成汉语差不多有九万诗行。季羡林的译文出版后好评如潮。其中的一些描绘自然景色、叙述离情别绪,以及恋人间临风相忆的章节,诗意浓烈,艺术水平很高。但由于史诗自身的印度"口传文学"的性质,大多数篇章拖沓、重复、平板、单调,看起来符合诗的韵律,其实没有一点诗的味道。但是为了忠实原文,他煞费苦心地把这些佶屈聱牙的名字一个一个地译出,并且还要为它们找到合适的韵脚。在翻译《罗摩衍那》的过程中,他先后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文体。前半部分采用的是"顺口溜式的民歌体",特点是"每行字数不要相差太多,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从第六篇的下半部起,他基本上采用更接近中国民歌体的七言绝句或五言绝句进行翻译,以使译文既能做到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又能保留原作史诗的风格。《罗摩衍那》的翻译填补了我国翻译史上的一项空白,被称为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在长期的翻译工作实践中,季羡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翻译有许多独到而精辟的见解,这些见解散见于他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的《谈翻译》、《谈梵文纯文学的翻译》以及之后多部译作的"前言""译后记"等。季羡林的翻译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反对转译。针对我国20世纪20～30年代一批粗制滥造的"译者"出版了一大批据说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当时很流行的文艺理论著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其译文"不知所云"的原因是"从日文翻译过来,而日文译者也似乎没有看懂"(转引自谢天振2006)。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变形。不管译者如何努力地去贴近原作,竭力把原作风采忠实完整地表现出来,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信息的失落、增添或扭曲。直接译原文的译作尚且如此,那些通过另一种外文转译的,尤其是那些粗制滥译者,其译作对原文的背离和歪曲可想而知。季羡林正是痛感于这种现象,所以才大声疾呼文艺作品"万万不能"重译。他要求译者鼓起勇气,老老实实地去学习所译作品的语言:"倘若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就应该自己知趣地走开,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不要在这里越俎代庖,鱼目混珠。我们只要有勇气的人!"(转引自谢天振2006)

其次,季羡林主张直译,强调要对原文负责,要尽可能地忠实原文,不歪曲原文的意思,同时又要对译文负责,使译文明白流畅,使译文读者能得到与原文读者同样的感受。作为一位具有深厚的语言学造诣的语言学家,他所关注的不光是如何在翻译中尽可能地贴近原文、如何在翻译中尽可能地忠实传达原文的问题,而且还进一步考虑如何通过翻译来促进目的语,即我们的母语——汉语的发展和完善的问题。他回顾我国汉语言的发展历史,具体指出外来语对我国文言演进的作用:"从西域、特别是印度,借来了大量的新词",连文法方面,"也受了外来的影响","梵文那种绵密的、抽象的,有时候却又有点重复得过火以致弄得头绪不清楚的表现法也在中文里留下了痕迹,譬如苏轼的文章有些地方就受佛典翻译的影响。"(转引自谢天振2006)他还指出,近代以来,我们对欧美日本书籍的大量翻译给我国的语言、文字、文体、表现手法等带来很大影响。他对直译中的欧化句法显得相当宽容,理由之一是他希望通过这种比较贴近原文的翻译给中国"逐渐输入一点欧化句法进来",可以"把我们不太精密的文法慢慢地有步骤地改造得精密起来",这对于发展我国的语言、文体等很有裨益;理由之二是他觉得"有些欧化句法最初看到也许不大习惯,但慢慢总会看惯了的"。(王寿兰1989:579)但是季羡林所说的"直译"决不是一个字对一个字的死译,他说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让读者茫然、懵然,什么也看不懂"。季羡林的所谓直译,"是在汉语习惯允许范围以内,逐渐引进一些外国语法比较周密的表达方式,使我们祖国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表达方式已经很丰富的语言更加丰富、更加有生命力、更能适应我们的需要。"(王寿兰1989:581)他认为,"在中国语言史上,千余年前佛经的翻译,近百年以来西方典籍的翻译,对我们的语言已经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最后,季羡林还非常强调和重视翻译史的整理与编纂。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一文中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翻译历史之长,翻译东西之多,翻译理论之丰富,哪一个国家也比不上中国。这一份最可宝贵的遗产可惜到现在也还没有认真总结、继承。一千多年以前释道安提出了'五失本'的主张,差不多同时,后秦鸠摩罗什'手执胡经,口译秦语,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可以说是意译直译两大派的代表。中间许多翻译家都或多或少讲了一些翻译的理论。到了近代,严复提出了信、达、雅三字标准。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将近一

百年,但是现在许多讲翻译的文章仍然提到这三个字,而且同意这三个字。我也一样。我认为,这三个字实在是精炼之至,用它来总结中国千年的翻译经验,也未尝不可。"(转引自王寿兰 1989: 581)(丁欣)

朱生豪(1912~1944)

浙江嘉兴人。少时聪颖,17 岁被保送到杭州之江大学,主修中国文学,兼攻英文,并任美籍教授窦维思的助教,在校参加"之江诗社",为该社领袖。在中外名师的熏陶下,对莎士比亚(Shakespeare)、雪莱(Shelley)、勃朗宁(Browning)等名家的作品有较深的研究。1933 年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开始翻译莎剧。1939 年就职《中美日报》,编国内新闻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失业,贫病交迫。1942 年回乡,坚持翻译莎剧,直至病逝,时年 32 岁。朱生豪是我国系统翻译莎剧的先行者之一。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翻译莎剧前后十载,终于译出莎翁的悲剧、喜剧、杂剧与史剧共 31 部半。其中 27 部由世界书局于 1947 年作为《莎士比亚全集》出版,震惊了国内外译坛。人民文学出版社先于 1954 年分 12 卷出版《莎士比亚全集》,于 1978 年再出的《全集》共 37 部,其中绝大部分为朱生豪所译。朱氏文学修养颇深,汉、英语都很有造诣,所译莎剧字斟句酌、晓畅易懂,较之他人的译本以典雅传神见长。初期所译的几种多为喜剧,如《暴风雨》、《仲夏夜之梦》等,译笔轻快。后期所译多是悲剧、历史剧,因时隔数年,译笔更见精辟而流畅。莎剧学者贺祥麟认为,严复所提的"信""达""雅"三项标准朱译都达到了。朱译的"最大特点是文句典雅,译笔流畅,好像是高山飞瀑,一泻千里,读之朗朗上口,绝无佶屈聱牙之弊"(林煌天 2005: 981)。许国璋在评点梁实秋和朱生豪的译文时,对朱译也有一段中肯的评价:"我们追记往昔,对比梁朱境遇,后者既缺图书,又无稿费可言,以一人之力,在不长时间里完此译事,是由于什么动力?我想首要的是天才的驱使。朱译似行云流水,即晦塞处也无迟重之笔。译莎对他肯定是乐趣,也是动力,境遇不佳而境界极高,朱译不同于他人也高于他人。"(转引自王秉钦 2004: 197)罗新璋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朱生豪译笔流畅,文词华赡,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译著问世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罗新璋 1984: 1)朱生豪一生只是埋头翻译,极少写译论文字,翻译见解仅见于 1944 年 4 月写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

中国读者耳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尝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

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廿四年春,得前辈同事詹文浒先生之鼓励,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越年战事发生,历年来辛苦搜集之各种莎集版本,及诸家注释考证批评之书,不下一二百册,悉数毁于炮火,仓卒中惟携出牛津版全集一册,及译稿数本而已。厥后转辗流徙,为生活而奔波,更无暇晷,以继未竟之志。及三十一年春,目睹世变日亟,闭户家居,摈绝外务,始得专心壹志,致力译事。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管不辍。凡前后历十年而全稿完成(案译者撰此文时,原拟在半年后可以译竟。讵意体力不支,厥功未就,而因病重辍笔),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兹矣。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然才力所限,未能尽符理想,乡居僻陋,既无参考之书籍,又鲜置疑之师友。谬误之处,自知不免。所望海内学人,惠予纠正,幸甚幸甚!(转引自罗新璋 1984: 456~457)

从以上的译者序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朱生豪的翻译思想、翻译方法:

一、伟大的爱国翻译思想。爱国思想是朱生豪翻译事业的基础。他之所以呕心沥血,矢志译莎,除了对莎士比亚的浓厚的兴趣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决心为民族争气的爱国思想。他的胞弟朱文振在《朱生豪译莎侧记》一文中也写道:

那些年月里,日本帝国主义欺辱中国人民气焰嚣张,而恰好讥笑中国文化落后到连莎氏全集都没有的又正是日本人,因而我认为他决心译莎,除了个人兴趣等其他原因之外,在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欺凌中国的压力之下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大概也是主要的动力。

翻译莎剧是"他生命、生活、思想、情绪的转折点,正如在汪洋大海中漂流的小艇,看到了前进的航标;有如经过严冬行将干枯的种子,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准备发出'根'来"(方华文 2005: 335)。朱生豪就是这样满怀着朴素的爱国思想和炽热的民族感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替中国近百年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用莎士比亚笔下的众多形象和戏剧旋律美化了中国的艺术画廊,从而表达了他的拳拳报国心。

二、严肃而认真的翻译态度。朱生豪翻译态度极为认真,一丝不苟。在翻译之前,花了整整一年时

间,收集莎剧的各种版本、诸家注释等以及莎学的资料,比较和研究这些资料的优劣得失,对莎剧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莎翁生平、思想成就、艺术特点、版本考证、戏剧分类,都有过细致的研究。为了使译笔准确通达,朱生豪经常不辞劳苦,绞尽脑汁,一字一句往往煞费苦心。例如:他曾经讲过翻译中的"你"和"您",这两个字就很缠得头痛。You 相当于"您",thou,thee 相当于"你",但 thou,thee 虽可一律译成"你",You 却不能全译作"您"。这些细微之处,他都能做到仔细琢磨,毫不苟且,真正做到了严复所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三、自然流畅的口语化语体特色。有人把朱生豪的翻译特色归结为"神韵说"(王秉钦 2004: 200),朱生豪的译文之所以能够保持原作的神韵,完全得益于他选择了口语化的白话文风格。朱生豪动手翻译莎剧时,白话文已经发展了近 20 年,具有相当的表达力了。中国的戏剧重唱,外国的戏剧重说。既然重说,就脱离不了口语。朱生豪在翻译的过程中,"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内容十分庞杂,语言相当通俗;"他的写作既有独白、洋洋洒洒的演说,又有插科打诨、出口伤人甚至不折不扣的胡说八道。他借用故事不分地点,不分国界(有些故事显然不值一提)。他笔下的人物可以俗不可耐,有时吓人一跳,也可以口没遮拦,夸夸其谈,或者呼天抢地,狂泻怒斥"(苏福忠 2006: 219~220)。在当时,朱生豪选择了运用极具表达力的口语化的文体,恰如其分地再现了莎翁戏剧的庞杂与通俗。朱生豪这种口语化的译文,使得剧中角色不管身份如何,都能让他们声如其人,即使人物在喜怒哀乐的情绪支配下说出的十分极端的话,同样能表达得淋漓尽致。(贺爱军)

刘重德(1914~2008)

河南滑县人。1934 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就学于梁实秋、朱光潜、叶公超、潘家洵、钱穆、皮名举、吴宓等名师门下。抗战爆发后,他历尽坎坷,负笈南下到西南联大继续求学,师从罗常培、柳无忌、冯友兰、燕卜荪等著名学者。1938 年从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先后在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大学(现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学校任教。曾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湖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后名誉会长)。曾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91 年荣获中国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刘重德以提出"信达切"的翻译原则而闻名。在中国翻译史上,他是译介英国女作家奥斯汀(Austin)《爱玛》的第一人,刘译多次重印,1993 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又出版了《爱玛》重译本。

刘重德的文学翻译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他的《文学翻译十讲》一书中。该书于 1991 年 2 月出版,随后又数次重印再版。作为一本全面系统论述文学翻译方法论的专著,该书可称为刘重德数十年翻译研究的经验总结和知识总汇。全书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一、翻译的性质。刘重德认为,就文学翻译而言,无论是科学派还是艺术派,都有其优缺点:"前一派认为翻译时应通过语言对等形式的转换再现原作信息,它强调对翻译的过程及语言的结构和形式的描述性研究,以解释翻译中存在的客观规律。后一派提倡通过运用另一种语言中的表达再创造一部文学作品,它强调的是翻译的效果。"综合这两派的观点,他提出:"翻译不仅是一门有着自己规律和方法的科学,也是一门再现和再创造的艺术。"二、翻译的原则,实际上就是翻译的标准,这是翻译理论的首要问题。刘重德认为,"严复为翻译所定的三条原则,在今日看来,似有重新商榷的必要。我们既不可一概否定,也不能全盘接受。正确的态度是批判地予以继承,吸收其对我们有用的部分"。对此,刘重德于 1979 年在《湖南师院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试论翻译的原则》,并在《外国语》1993 年第 3 期上发表了《翻译原则再议》。在参考严复和泰特勒(Tytle)观点的基础上,根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去粗取精的学术研究准则,精练地提出"信(信于内容)、达(达如其分)、切(切合风格)"的翻译三原则。同时,在《文学翻译十讲》中再次重申他对翻译标准进行的反思。他认为,严复的"信达"两字仍可沿用,而"雅"字应改用"切"字。这是因为:"'雅'字实际上只不过是风格中的一种,和'雅'相对立的,就有所谓'粗犷'或'豪放'。'粗犷'和'文雅'显而易见是迥然不同的两种文体,因此,翻译起来不能一律要'雅',应该实事求是,酌情处理,恰如其分,切合原文风格。'切'是一个中性词,适用于各种不同的风格。他还说:"所谓'切',指的就是要切合原文风格,理由是原作风格有雅俗之分,人物对话也有雅俗之分,一律雅之,显属不妥。一篇文章或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语言表达和风格的特点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文学翻译也必须是其完整的统一体的如实再现。"刘重德从辩证发展的观点,对翻译原则加以认真的研讨,并大胆提出:"雅"不符合实际要求,应以"切"来代替。"信达切"的翻译原则在翻译界引起强烈反响。三、翻译方法研究。刘重德认为,直译和意译是"均不可少,相辅相成,前者为主,后者为辅,或分或合,灵活处理"。他提出以直译为主,是因为"直译有助于我们更加容易达到下列三个标准:1. 忠于原文内容;2. 反映有关的异国风味;3. 吸取新的表现法"。他进一步解释说:"凡是能够极力保全原文意义、形象和基本语法结构而译文又通顺可读的,才称得上正当的直译,否则就只能叫作逐词翻译的死译;凡是脱离原文形象和基本语法结构但对原文真正含义没有任意损益的,才能称得上正当的意译,否则就只能叫作任意上下其手的胡译。"他进一步指出:"翻译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句句直译实际上是行不通

的”，句句意译，也不必要。正确的态度是：“对那些结构相近，取譬相当的句子一般说来，就应该采取直译法，对那些结构和取譬都大相悬殊的句子；对那些部分相同、部分不同的句子，则最好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加以灵活运用，须知翻译方法是为圆满实现翻译三原则服务的。”四、诗歌翻译。刘重德认为译诗有两个基本要求，缺一不可：(一) 原诗是一件形神兼备的艺术品，译诗也必须是一件形神兼备的艺术品；(二) 既然是译诗，不是创作，忠于原文，理所当然。所谓忠于原作，就是译者应传原诗的情绪，应传原诗的内容，应取原诗的形式。只有符合这两条要求的译诗，才算得上理想的译诗。他还特别指出，译诗决不可只满足于达意，必须力求传神，首先是必须保留原诗的意义和意境；其次，在此前提下，还应字斟句酌地推敲译诗是否具有一定的形式、韵律、节奏。在谈到中国古诗的英译问题时，他的见解是：“用格律诗译格律诗，如能讲求格律，又无损原意，自属上乘；但在确实不能用格律诗来译的某些具体情况下，则不妨考虑运用自由诗体来译，以便尽量保留原诗的思想、情节、意境和形象，总比死守诗行的长度和韵律而对原诗的内容任意增删好得多。”总的说来，对于译诗，他提出“诗可译，但难译”，“译诗应当也是诗，译诗应当忠于原诗，译诗必须信于内容、达如其分、切合风格。这也就是‘入于诗，出于诗，只见诗，不见人(译者)’”。五、翻译风格再现。刘重德认为：“要想比较好的再现原作风格，译者在着手翻译之前必须具备两个观点：首先是宏观的观点，即文学观点。译者要时刻记得自己所译的乃是别人写的文学作品，因而应该力争用适当的或相当的文学语言，使译文成为能表达符合原作思想、感情和语言风格的另一件艺术品，同样感人，同样生动，读者能够得到同样美的感受。光是译出原作意思，而不去设法再现风格，就文学翻译而论，那是远远不够的。其次是微观的观点，即语言学的观点。在翻译过程中，章章句句字字，都要推敲琢磨，选择最佳的表现来满足再现原作思想、感情和风格的需要。风格，从语言学的观点看，主要是通过章、句、字的巧妙配合而成。因此，如果有个别字句译得不够理想，也影响不了整篇或整部作品的风格大局的。只要字句章所配合形成的总的情调或神韵再现出来了，也就可以说再现了原作的风格。”六、翻译的忠实性。刘重德指出，译者想要做好翻译的忠实性，必须：“(一) 深刻领会语言的实际情景；(二) 辩证地运用有关语言的对应规律；(三) 考虑读者对象；(四) 灵活处理句法结构和实际含义的矛盾；(五) 掌握 and, or, but, when, who 之类常见词的特殊用法；(六) 注意行文的逻辑性；(七) 以相当的成语词组来译成语词组；(八) 重视不同的表达习惯；(九) 掌握形象的译法，根据情况，或直译，或意译，或转换形象；(十) 区分部分否定和全部否定；(十一) 活现说话者的神情和口气；(十二) 推敲琢磨，精益求精。”(刘重德 1991)

刘重德的专著还有：《英语 AS 的用法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翻译漫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文学翻译十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浑金璞玉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翻译论稿》(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此外，公开发表翻译论文几十篇。

译著包括：《老马和小马》(合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黑奴吁天录》(缩写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瘾君子自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湖南出版社，1991)、《汉英对译千家诗》(主要译者之一，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爱玛》(重译本，花城出版社，1993)、《瘾君子自白》(英汉对照版，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德·昆西经典散文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汤姆大叔的小屋》(浙江儿童出版社，2001)、《黑奴吁天录》(修订本，浙江儿童出版社，2001)。

校注、主编的书籍包括：《汉英四书》(合校，湖南出版社，1992)、《英汉语比较研究》(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三湘译论》(主编，湖南出版社，1995)、《英汉翻译与比较》(主编，青岛出版社，1998)、《英汉翻译例句词典》(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

(晓彬)

王佐良(1916～1995)

浙江上虞人。1935 年进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任教。1947 年秋考取公费留学，赴英国牛津大学茂登学院研究英国文学。1949 年回国，应聘至北京外国语学院执教。旋即参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曾为北京外国语学院顾问、教授，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译协理事、北京市译协副会长。王佐良对英国文学的两个领域(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现代诗歌)作过专门研究，并对英语文体发表过许多论著。同时又翻译了不少英美著名作家如培根(Bacon)、彭斯(Burns)、雪莱(Shelley)等人的作品；其中主要的有：《彭斯诗选》、培根《论读书》、《英国诗文选译集》、《苏格兰诗选》等。在中译英方面，由他所译的曹禺《雷雨》剧本，在西方享有一定的声誉。翻译理论方面，曾发表《严复的用心》、《关于文学翻译答客问》、《词义、文体、翻译》、《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翻译与文化繁荣》、《译诗与写诗之间》、《新时期翻译观》等论文。他的翻译观对我国翻译界，特别是翻译理论界有重大影响。王佐良的翻译理论主要体现在如下四方面：

一、文化翻译论

——“翻译者必须是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

王佐良很早就注意到了翻译的综合性和多种相关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如何辩证地处理这些相互作用的诸要素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和对立统一关系。他在《文学翻译中的语言问题》一文中说：

翻译理论研究，它天生是比较的，跨语言、跨学科

的,它必须联系文化、社会、历史来进行,背后有历代翻译家的经验组成的深厚的传统,前面是一个活跃而多姿多彩的现实世界的不断变化,但不论任何变化都永远需要翻译,并对翻译提出新的要求,新的课题。(转引自王秉钦 2004:272)

王佐良在《严复的用心》、《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翻译与文化繁荣》几篇文章中论述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他指出,"在历史上,一个大的文化运动往往有一个翻译运动伴随或作为前驱。中国在19、20世纪之交酝酿着一个文化上的巨变,也有一个翻译运动应运而生";"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在翻译中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片文化"。

王佐良积极提倡把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他说:

如果我们能进而探讨翻译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作用,或者进一步把它同比较文化这个新学科结合起来,那就会……使我们在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更能透视全局,综观古今,更能根据不同对象,提高实际效果。因为文学翻译的研究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转引自王秉钦 2004:277~278)

他的文化翻译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国内出现了一股翻译文化热,一度形成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学派,这与王佐良的开创性研究密不可分。这一翻译观点与西方译学"文化转向"观点几乎是同步。当代西方学者西蒙(Simon)指出:"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转引自王秉钦 2004:278~279)这足见王佐良翻译思想的远见卓识。

二、读者论

——"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忽视的大事"

王佐良深入地研究了严复的翻译思想,并于1982年撰写了《严复的用心》,文中得出结论:严复的用心就在"接受者"身上,心目中预定的读者——士大夫阶层身上。他还进一步得出结论:"吸引读者——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忽视的大事。""而严复之所以选择'汉以前字法、句法',也不过只是从语言或风格着眼的。他从事翻译是有目的的,即要吸引士大夫们的注意。这些人足以左右大局,然而却保守成性,对外来事务有深刻的疑惧:只是在多次败于外夷之手以后,才勉强转向西方,但也无非是寻求一种足以立刻解决中国的某些实际困难的速效方法而已。严复比他们看得远;他知道事涉根本,必须彻底改革中国社会,而要改革奏效又必须引进一整套新的思想。""但他又认识到这些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转引自林煌天 2005:1094)

王佐良深得严复的良苦用心,继承严复的翻译思想,提出了"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忽视的大事"的翻译思想。

三、等效论

——"应使整篇译文在总的效果上与原作一致"

王佐良不仅强调译文要吸引读者,而且还十分注重译文的效果,认为好的译文应该产生和原作相同的效果。他指出:

一个出色的译者总是能全局在胸而又紧扣局部,既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便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的……译者的任务在于再现原作的风貌和精神:原作是细致说理的,译文也细致说理;原作是高举想象之翼的,译文也高举想象之翼。

译者重要的是要译出整个概念,或者整片情感。……应使整篇译文在总的效果上与原文一致。

……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的翻译中,还有比词对词、句对句的对等更重要的通篇的"神似"问题。这一切使得翻译更为不易,但也正是这点不易使翻译跳出"技巧"的范畴而变为一种艺术,使它能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无数世代的有志之士——他们明知其大不易而甘愿为之,而且精益求精,乐此不疲;他们是再创造的能人,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搭着桥梁,他们的努力使翻译工作变成一种英雄的事业。(转引自罗新璋 1984:834~837)

四、诗人译诗论

——"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

对于诗歌翻译,王佐良有其独到的见解。他的理论是以诗译诗、诗人译诗。他说:"译诗是会有所失的,但所得都是深层的文化对话,是新的创作生机,是给这个多难的世界以慰藉和希望";"诗歌翻译需要译者的诗才,但通过翻译诗才不是受到侵蚀,而是受到滋润。"(王佐良 1984a)他认为:

首先一点,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其次,诗人译诗也得益于他自己的创作。……第三,除了译者个人的天才和素养之外,他所使用的语言必须处于活跃状态,即一方面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适应任何新的用法,另一方面又有足够的韧性能够受得住任何粗暴的揉弄。……换言之,在好的译作里面,传统同创作是并存的。……更深一层看,诗的翻译对于任何民族文学、任何民族文化都有莫大好处。不仅仅是打开了若干朝外的门窗;它能给民族文学以新的生命力,由于它能深入语言中心,用新的方法震撼它,磨练它,使它重新灵敏、活跃起来。如果去掉翻译,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将大为贫乏;整个世界也将失去光泽,宛如脱了锦袍,只剩下单调的内衣。(转引自林煌天 2005:

1093) （贺爱军）

林以亮(1919～1996)

原名宋淇，笔名宋悌芬、欧阳竟、林以亮、余怀、杨晋等，浙江吴兴人。1935年考取北平燕京大学，两年后，相继到武汉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借读；1939年重返燕京大学，1940年毕业于该校西语系，是年留校执教，讲授英文和翻译，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学校为日军封闭。1943～1945年在上海从事话剧活动，编有舞台剧《皆大欢喜》，与傅雷、钱锺书等过从甚密。1948年移居香港，先后担任美国新闻处编译部主任、电懋影业公司制片部主任、邵氏影业公司编审委员会主任。1968～1983年间，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负责高级翻译文凭课程，前后共六届，并任该校校刊编辑。其间，曾兼任翻译中心及比较文学与翻译中心主任，《译丛》执行编辑，香港翻译学会义务秘书、副会长、会长等职。林以亮是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剧作家、红学家和文论家。他的译学论著有《林以亮论翻译》、《文学与翻译》；他编译杜威(Dewey)的《自由主义》、欧文(Owen)的《无须骑士》、詹姆斯(James)的《碧庐冤孽》、奥康纳(O'Connor)的《美国七大小说家》、《美国诗选》、《美国文学批评选》等。(参阅林煌天 2005：630)

林以亮的翻译理论著作有《文学与翻译》等。1974年3月，由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的《林以亮论翻译》一书，是当代港台译学界的代表著作之一，书中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为香港和内地的各种翻译论文集收录。在这篇文章中，他归纳总结出翻译者所应具有的三个条件："(一) 对原作的把握；(二) 对本国文字的操纵能力；(三) 经验加上丰富的想象力。"(转引自罗新璋 1984：757)针对把握原文的重要性，他说："对原文的彻底了解和把握，说起来容易，在实行时却到处荆棘。明明在字面上是清清楚楚，而无可置疑的意义，有时不是另有所指，就是另有含意，令人防不胜防。""电影剧名，舞台剧名和书名以短居多，不是一语双关，就是另有来源。翻译者如果不知道它们的内容和典故，就凭字典将字面上的意义译了出来，可能犯了错误而不自知，尤其是中国人，对圣经和莎士比亚不熟悉，更容易上当。"(转引自罗新璋 1984：759)针对本国文字能力，林以亮说："严格说来翻译是不可能的。……因此所谓'直译'和'意译'之争本身并无意义可言。"(转引自罗新璋 1984：764)他认为"宁信而不顺""这种做法对翻译者而言当然省事，对读者则是一种精神上的虐待。等到读者发现某一种表现方式到底'不顺'时，已经忍受了这种莫名其妙的语法不知有多久了"。(转引自罗新璋 1984：764)"以中西文字相差如斯之巨而必欲完全'直译'，此不辩而知其不可能也。亦有两方语句，不约而同，顺笔写来，自然巧合着，当是时也，虽欲不'直译'岂可得乎？……不管'直译'和'意译'的成分多少，好的翻译必须合乎本国语文的语法。"(转引自罗新璋 1984：764～765)林以亮进一步提出翻译者对原文文字及内容的把握和对本国文字有极高的表现力，也不一定就此成为一个胜任愉快的翻译者。除了以上两个条件之外，还需要第三个条件：经验，也就是译事上的训练。翻译者如果没有充足的经验，很难在初试时就达到操纵自如的水准。"有时候不是一个字，一个名词，或一句句子的问题，而是译文的风格和表现形式上的问题。这就更加需要译者的判断力和创造力来选择，甚至创造一种特殊的文体来传达原作的精神和风格。"(转引自罗新璋 1984：770)

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一文的最后，林以亮以夏济安所译霍桑(Hawthorne)的《古屋杂记》一文为例，说明了什么叫理想而成功的翻译。他说："这再也不是普普通通的翻译，而是原作美感经验的再度创作。我们如果拿原作和译文再多读几遍，就会觉得译者和原作者达到了一种心灵上的契合，这种契合超越了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打破了种族上和文化上的樊笼。在译者而言，得到的是一种创造上的满足；在读者而言，得到的则是一种新奇的美感经验。"(转引自罗新璋 1984：776)在这段文字中，林以亮把翻译过程和翻译的文字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和层次：译者和原作者心灵上的契合，译者的创造上的满足，读者的审美愉悦。 （贺爱军）

程镇球(1919～2007)

江苏宜兴人，1941年重庆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1942年至1944年在中央大学法科研究所深造。后赴英留学，进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政治理论。1949年5月回国，在北平外事学校(即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执教。1956年以后，曾多次参加重要文献的英译定稿工作。1965年调外交部，从事英文定稿。曾任翻译室副主任、顾问，外交学院兼职教授，外交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等职。程镇球自1960年起，曾分别参加《毛泽东选集》第1～5卷英文版的定稿及修订定稿工作；1980年以后，主持了《周恩来选集》上卷、《刘少奇选集》上卷的英译定稿工作，并参加《邓小平文选》英文版最后阶段的定稿通读，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撰有《翻译问题探索》、《论汉译英的几个问题》等著作。

在谈到信达的关系时，他说："《毛选》翻译要求在文字和精神上均完全忠实于原文。信与达是统一的，要信就要求达，不达就难以做到信。这样讲，在理论上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具体翻译实践中，更为重要的是：信与达往往又是矛盾的。翻译中的难处就在于，译文既要信又要达，很不容易，尤其是汉英两种文字，它们之间存在着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巨大差异。解决信与达的矛盾也就是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尽善尽美的译文只是我们追求的理想。有一位英国学者曾经指出：'All translation is compromise.'('翻译就是妥协。')当然，这不是说翻译因此可以马马虎虎，草率从事。恰恰相反，翻译应该精益求精，这

方面是永无止境的。"(程镇球 1993)

对于汉英翻译,他还说:国内外翻译界人士都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翻译应以译入本国(族)语为主。……也就是说,中国人应以英(外)汉翻译为主。因为除了少数例外,人们对母语的掌握比对外语的掌握总要好些。真正精通两种语言(bilingual)的人是不多的。但是我们需要对外介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国际交流,也就是说,需要进行大量的汉英翻译工作。汉英翻译既然有相当的难度,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因此放松努力,要正视汉英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尽可能提高质量,改进工作。(程镇球 1991)

关于提高汉英翻译的质量问题,程镇球认为:第一,翻译质量要高,译员的素质就要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培养一个好的汉英笔译人员并不容易。首先,要能吸引有才华的人来干这一行。笔译在后台工作,默默无闻,不像口译出头露面,周游列国,有机会见到世界名人,工作本身就有相当的吸引力。成为一名合格的汉英笔译人员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和磨炼,但是他们没有得到社会上应有的尊重和物质上适当的待遇。现在愿意终身从事汉英笔译的青年寥寥无几,老翻译深感后继乏人。其次,缺乏领导的支持。有些领导口头上也说要重视翻译,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并不懂得翻译的甘苦。一篇中文稿写好了,既没有给翻译讲文章的中心思想和应注意的地方,又没有考虑给翻译以推敲的时间。只要译文能按时完成,译文好坏并不太在乎。这种情况恐怕一时也难以改变。我们对青年翻译当然应该严格要求,要讲求无私奉献。但是思想教育不等于政策。如果领导思想上对汉英翻译不重视,不采取"倾斜政策",汉英笔译的前途是不容乐观的。第二,就译文本身而言,提高汉英翻译质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避免所谓"中文式英文"(Chinglish)。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文字来表达另一种语言文字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思想要通过文字才能表达出来,但文字不完全等于思想。形式与内容既统一又矛盾。翻译的最大课题之一就是摆脱原文字面的束缚。汉英翻译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有些词汇和短语,特别是政治性词汇和短语,由于中、外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翻译难以处理恰当。这类词语关系重大,既要扣紧原文,又要使外国读者能够正确理解。(程镇球 1991)

关于翻译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程镇球说:"翻译理论源于翻译实践,又用来指导翻译实践,这是大家都会同意的。目前存在的情况是:在翻译单位,由于工作需要,往往强调解决实际翻译问题的能力,不太重视理论。另一方面,教学单位要求科学的系统性、科学性,往往翻译实践不多,谈起翻译理论来却头头是道。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些脱节,而且有越来越隔离的倾向呢?翻译主要是实用的学科,最终还要看有没有培养出好的翻译人才,译出好的翻译作品。英语里有这样一句谚语: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 对翻译来说恐怕应该是:The proof of the translation is in the reading (whether it reads well or not)."(程镇球 1991)

(张顺梅)

沈苏儒(1919～2009)

浙江嘉兴人。1945 年自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即从事新闻及外文编辑出版工作。历任新中国第一张英文日报《上海新闻》(*The Shanghai News*)及第一本多语种外文刊物《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编辑,宋庆龄创办的多语种外文刊物《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现名 *China Today*)副总编辑,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编译顾问等职。曾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第一届理事。翻译论著有:《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对外报道教程》、《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后两本书于 2003 年五洲传播出版社初版,曾被广泛用为对外传播、对外交流干部培训教材及高校新闻传播院系教学用书);译学研究论文有:《继承·融合·创立·发展——我国现代翻译理论建设刍议》、《关于中译英对外译品的质量问题》、《论信达雅》;主要译作有:《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合译)等。为受国务院表彰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受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表彰的资深翻译家。曾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国外文局对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沈苏儒的翻译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沈苏儒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严复信达雅的重新阐释方面,其专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以严复的"信达雅"三难说为研究对象,以阐释、梳理严复的翻译思想为基础,以强烈的理论意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通过百年来国内译界对"信达雅"说的各种评价与新说的检阅与审视,探索其生命力之所在,找出其合理的内核,予以继承,加以发展。他对"信达雅"的概括性阐释在该书的续篇:《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中作了言简意赅的总结:

在这里应该说明,我们现在所说的"信达雅"比当初严复在《译例言》中所作的诠释,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充实。我们现在的理解是:

(一)"信"——译文须忠实于原文的内涵(意思、事实、语气、风格等)。

(二)"达"——译文须尽可能充分地明白晓畅地表达原文的全部信息。

(三)"雅"——译文须用规范化的语言,并达到尽可能完善的文字(语言)水平,还要适合译入语使用群体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背景,以使译作为其受众所便于理解、乐于接受或欣赏。(沈苏儒 2006:8)

关于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关系方面,沈苏儒认为

"中外译论应融合而非互相排斥",他在《继承 · 融合 · 创立 · 发展——我国现代翻译理论建设刍议》一文中提出:

首先是继承我国翻译界先驱和前辈留下的宝贵遗产,这是我们前进的基础……但在继承问题上我们固然要抱批判的态度,更要抱尊重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不苛求于古人,以致厚诬古人。……如何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发展,主要的途径就是"认真吸取国外各个学派的精华",并使之与我们自己的研究相结合。……在这里,重要的是融合。融合不但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单纯引进外国翻译理论,而不与我国自有的翻译理论相结合,在中国翻译界难以生根,因为它同实践脱节,不能对实践起指导作用。(沈苏儒 1992)

沈苏儒还就"归化"和"洋化"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所以,我以为"归化"和"洋化"与其说是翻译的理论问题,毋宁说是翻译的实践问题,因为在理论上,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不难取得共识的,梁启超所概括的"既需求真,又需喻俗"这八个字就代表了这种共识。所谓"归化"和"洋化"不过是翻译实践中所使用的两种不同的方法。为了使译文的受众便于理解、接受和欣赏,以达到交流的目的,应尽可能"归化"——外译中时力求使译文是规范的、地道的、流畅的中文,前提是必须忠实于原文。为达到引进外国文化以丰富和发展本国文化的目的,必要的、适当的"洋化"是有益的。……我的主张是"归化"仍须以"信"为前提,即不能背离原文作者的时空条件和人文背景。换句话说,译文所用的言语材料及表述方式,如果不是原文作者在其时空条件和人文背景下所可能使用的,那么就不应该用,否则就是"归化"过"度"如 a good day for the affair 译作"办事的好日子",to hand over 译作"交给"也就可以了,如果译成"黄道吉日""拱手赠与"就过"度"了,因为原文作者是外国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要从中汲取教训的是:"洋化"如果不符合译入语在结构和语法上的基本规律、不适应译入语所属文化的基本形态、不符合译入语使用大众的心理状态,那末很可能得不到预期的效果。(沈苏儒 2006)

沈苏儒在《我对翻译研究的基本认识》一文中强调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指导实践的必要性。他说:

任何理论如果不明确联系实际、不是来自实践经验的概括提高和升华,那么这样的理论就不可能指导实践,因而是一种空洞的、缺乏实际意义的"理论"。就联系实际而言,首要的是要从外国的文化和语言出发,特别注意到它们同其他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在属于不同语系、语族的两种语言之间进行互译,与属于同一语系、语族的两种语言之间进行互译,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两者的翻译理论和指导原则自然有异。如果再加上文化上的差异,当然两者的特性比共性更重要得多。由此可见,我们研究和创建中国的翻译理论必须有"中国特色"。(沈苏儒 2007)

(林夕)

金隄(1921～2008)

出生于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小学和初中阶段就接触并阅读了大量文学书刊,产生了浓厚的文学兴趣,并开始诗歌创作。后就读于杭州高中,抗战时转入国立贵州中学,受当时科学救国论的影响,曾一度热衷于科学,并考入西南联大电机工程系,后由于热爱文学转入外文系。

金隄最早接触英语是在 12 岁上初中时,高中时他又学德语,之后还学了俄语、法语和日语。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就在英国诗人白英(Robert Payne)和沈从文的鼓励和支持下翻译沈从文的小说集,并以 *The Chinese Earth*(《中国土地》)为名于 1947 年在英国出版,后于 1982 年在美国再版。1945 年大学毕业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1947 年兼读研究生,获得英国著名文学家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指导。1949 年初参加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不久调回北京中央军委机关任编译。1955 年 5 月自部队转业,任英文杂志《中国建设》编辑兼记者。1957 年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文革"期间下放农村劳动。1976 年到天津外国语学院任教直至退休。曾担任中国译协理事,天津译协顾问。

在多年的翻译实践中,金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翻译理论。早在 1978 年,他在《联合国文件翻译工作简报》上发表的《论翻译的准确性》一文中就初步表达了他的"等效翻译"思想。在他随后发表的翻译研究论文中大体可以见到他等效翻译思想的形成轨迹,比如他在《谈准确和通顺的关系》中就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因素:"准确也好,通顺也好,都不能脱离读者。翻译是沟通两种语言的信息传递,所谓准确的翻译,就是把原文变成译文之后,译文给读者的信息基本上相同。"(金隄 1984b)在《灵活用词,准确达意》一文中他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等效的概念:"弄清两种词汇之间有什么对应关系,主要是为了防止和纠正我们头脑中的机械对等,不是为了在翻译中去处处追求词汇对等。翻译中是有一个对等问题,但不是词与词之间的对等,而是整句或整段译文给读者的感受和原文给读者的感受之间的对等。"(金隄 1985a)一位听过他的演讲的美籍教师认为,他的翻译思想与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很接近,并介绍他认识了奈达。与奈达相识,使他走上了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科学译论相结合的道路,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等效翻译理论。1984 年出版的 *On Translation*(《论翻译》)和 1989 年出版的《等效翻译探索》就是他在翻译理论研究上的成果。金隄提出的等效翻译理论,是在总结我国传统译论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等研究成果,并在自己长期的翻译实践中逐渐摸索总结出来的。等效论不仅为翻译实践提供了一

种可资借鉴的方法,也为翻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等效翻译不主张在翻译中简单地用忠实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认为忠实在表示"忠实的译文"的同时,也在指译者的态度,在概念上具有模糊性和不科学性。等效翻译明确提出了效果概念,即"翻译对接受者(听众或读者)的效果,应该与原文接受者的效果基本相同"。在等效翻译中,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直译和意译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如果以等效为翻译原则,译者的着眼点就应该放在效果上,而不是斤斤于直译或意译。金隄也曾明确表示自己在翻译时从来不考虑直译还是意译,唯一的考虑就是译文的效果。

在接受奈达等人的西方翻译理论时,金隄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批判地吸收。在解释和发展奈达理论上,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译文对接受者的作用(impact)和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response)加以区别。他认为,翻译所要达到的效果只包括信息对接受者的作用(即接受者的感受)不包括接受者的反应。他明确提出,等效翻译所要传达的是原文的主要精神、具体事实、意境气氛。

金隄对中国翻译界和文学界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最早翻译了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文学作品之一的《尤利西斯》。他最早的译文只有一章,刊登于1981年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随后于1986～1987年出版《尤利西斯》选译本,其中包括"涅斯托尔""哈德斯""游动山崖"三章全文和"喀尔刻""珀涅罗珀"两章的片段。1993和1994年分别在台湾九歌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译本上卷,1996年出版全译本下卷。1994年,萧乾和文洁若的译本也同时出版,由于两个译本采取了迥然不同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结果是出现了两个风格样式迥然不同的译本,又由于他们翻译的是极具挑战性的文学名著,所以,双方译者无意间为译界提供了研究文学翻译的绝好教材。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金隄的译文更忠实于原文。

在中国翻译界,像金隄这样既从事翻译实践又从事翻译理论,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受人推崇的经典作品传世的翻译家并不多。他还是乔学研究专家,他关于《尤利西斯》的研究论文多次在 *James Joyce Quarterly*(《乔伊斯季刊》)等著名刊物发表,为乔学研究作出了贡献。他不但是最早全面翻译《尤利西斯》的中国人,而且是最早全面研究和介绍乔伊斯(Joyce)与《尤利西斯》的中国研究者。

主要学术著作: *On Translation*(与尤金·奈达合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增订版,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6);《等效翻译探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繁体字增订版,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8;简体字增订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Shamrock and Chopsticks*(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Literary Translation, Quest for Artistic Integrity*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2003)。

主要译作:《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集》(中译英,与 Robert Payne 合作,伦敦 Allen, Unwin 1947;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女主人》(俄译中,作家出版社,1956);《绿光》(俄译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赵一曼传》(中译英,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神秘的微笑——赫胥黎中短篇小说集》(英译中,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尤利西斯》(选译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尤利西斯》(全译本,上卷,台湾九歌出版社,199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全书修订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987年,金隄应乔学界邀请到美国进行《尤利西斯》的翻译和乔伊斯研究,后一直侨居美国进行翻译教学和学术研究,曾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圣母大学、德莱赛大学、华盛顿大学、全美人文学科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等单位任研究员和客座研究员,自2003年任俄勒冈大学客座教授(英文系)。金隄还曾多次在翻译研讨会和乔学大会发表论文,在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台湾、香港等地及美国、瑞士、德国、西班牙、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的近百所大学作学术演讲,传播中国文化。他还在国际译联会刊 *Babel* 和国际乔学会会刊 *James Joyce Quarterly* 等多种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在国际翻译界和乔学研究领域唱出了中国人的声音。

由于金隄在文学翻译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1997年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终身成就)。2005年,爱尔兰翻译协会(ITIA)授予金隄荣誉会员称号。 (王振平)

许渊冲(1921～)

江西南昌人。1938年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1年在美国志愿空军任英文翻译,翌年重返母校。毕业后在昆明天祥中学执教。1945年至西南联大外文系兼任助教。1948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莎士比亚(Shakespeare)与拉辛(Racine)。1951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1960年起,先后任教于张家口外国语学院、洛阳外国语学院,1983年至北京大学任教。

许渊冲是一位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并重的翻译家。其著作包括诗歌翻译、小说翻译、戏剧翻译、翻译理论,以及创作等。诗歌翻译以汉译英为主,如《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也有少量英译汉,如《飞马腾空》等;汉译法代表性著作有《唐宋词选一百首》、《中国古诗词三百首》等。小说翻译以法译汉为主,如《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约翰·克里斯托夫》等,也有少量汉译法,如《农村散记》。戏剧翻译总体数量不多,但也是英、法、汉三语兼涉,如英译汉《一切为了爱情》、汉译英《西厢记》、法译汉《雨果戏剧选》等。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有《翻译的艺术》、《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文学翻译谈》、《文学与翻译》、《译笔生花》等。创作主要包括英文回忆录 *Vanished Springs: The Life and Love of a Chinese Intellectual*,以及《追忆逝水年华》、《诗书人生》、《山阴道上书与人——

许渊冲散文随笔选》等中文回忆录或散文集。1994年，英国企鹅公司出版了许渊冲英译的《中国不朽诗三百首》，标志着许渊冲的古诗词英译开始走向世界，被国际译坛所承认。

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主要浓缩于“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这十个字当中。

“美”，指三美论和再创美论或三美补论。三美论是诗词翻译的本体论，三美指意美、音美、形美。译诗要像原诗一样能感动读者的心，这是意美；像原诗一样有悦耳的韵律，这是音美；还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形式，这是形美。三美之中，意美最为重要，音美其次，形美最后。在提出把三美论作为诗词翻译的本体论之后，许渊冲进一步指出：推而广之，文学翻译就是把原文的美转化为译文的美，把一国之美转化为全球之美。换言之，文学翻译就是美的再创造。如果三美论是诗词翻译的本体论，再创美论则是文学翻译的本体论，即三美补论。

“化”，指三化论和化学论。三化指深化、等化、浅化；三化论是文学翻译的方法论。所谓深化，包括特殊化、具体化、加词、一分为二等类译法；所谓浅化，包括一般化、抽象化、减词、合二为一等类译法；所谓等化包括灵活对等、词性转换、正说、反说、主动、被动等类译法。如果译文内容比原文内容更深刻了，那就是深化；而浅化正好相反，指把深奥难懂的原文化为浅显易懂的译文。总之，所谓等化，指形似的译文；所谓浅化，指意似的译文；所谓深化，指神似的译文。浅化就是避短，深化却是扬长，等化也可以说是半扬长半避短。在钱锺书的“化境说”、许渊冲本人的“三化论”的基础之上，许渊冲提出“译学是化学”的翻译命题，这就是许渊冲的“化学论”：文学翻译是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另一个国家的美，甚至是全球美的“化学”。

“之”，指三之论。三之指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论是文学翻译的目的论。知之是翻译的基本或最低目的，好之是翻译的较高目的，而乐之则是翻译的最高目的。其中的“乐之”，包括读者的乐之和译者的乐之。要使读者乐之，译者必须首先乐之，这是翻译的成败关键。

“艺术”，指翻译艺术论。文学翻译不是科学，而是艺术；不仅文学翻译是艺术，文学翻译理论也是艺术。因为：科学研究的是“真”，艺术研究的是“美”。文学翻译不单是译词，还要译意；不但要译意，还要译味。文学翻译理论与创作理论、音乐原理一样，是一门艺术。对美的追求、探索、传达，构成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理论的基调。因此，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理论，尤其是诗歌翻译和诗歌翻译理论，都是一门艺术，是“美化之艺术”。

“创”，指再创论和以创补失论。再创论即创译论。翻译要使读者愉快，得到美的享受，仿佛是原作者在用译语写作，这就是再创作论。再创指语言上的再创，而非内容上的再创。翻译的艺术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不逾矩”就是不违背原文的精神，“从心所欲”则是在不逾矩的最大限度内发挥译语优势进行再创作。以创补失论认为：译诗有得有失，并可以创补失。许渊冲认为，诗不可译论也有一点道理，因为译诗不能百分之百地传达原诗的情趣和意象；但诗不可译论的错误，却是认为译诗一点也不能传达原诗的情趣和意象。有了以创补失论，诗歌就不再是不可译的了；并且，只有以创补失，才能译出原诗的情趣和意象。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所创大于所失，译诗或可胜过原诗。

“优”，指发挥译语优势论。发挥译语优势论建立在三势论的基础之上。三势论是两种语言关系的认识论，三势即优势、均势、劣势。用译语来表达原文内容时，经常存在三种情况：一是译语处于劣势，表达方式不如源语；二是两种语言处于均势，表达方式不相上下；三是由于历史或文化的原因，译语处于优势，表达方式胜过源语。基于这种认识，译者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就应该改变译语的劣势地位，争取均势，最好能够发挥译语的优势。一般说来，改变劣势，可以用浅化的方法；争取均势，可以用等化的方法；发挥优势，可以用深化的方法。浅化可以使读者知之，等化可以使读者好之，深化可以使读者乐之。忠实于原文内容，通顺的译文形式，发挥译语的优势，可以当作文学翻译的标准。忠实和通顺是翻译的低标准，发挥译语优势是翻译的高标准。发挥译语优势论的内在含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当译语处于优势、源语处于劣势时，或当译文高于原文时，可以扬长避短，发挥译语语言的优势。其二，当源语处于优势、译语处于劣势时，或当原文高于译文时，则应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发挥源语语言的优势。

“似”，指三似论和三似新论。意似、音似、形似三似论构成三美论的基础。意似就是传达原文的内容，不能错译、漏译、多译。形似指译文在形美方面与原文相仿佛。音似有两种含义：一是原诗第一、二、四句押韵，译诗也是第一、二、四行押韵，二是译诗用词的声音，与原诗用字的声音相近。一般说来，意美和意似、音美和音似、形美和形似应该是一致的，但事实上，三美和三似之间往往又有矛盾。为了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译文意似、音似、形似的程度是可以变更的。意美指的是深层结构，意似指的却是表层结构。因此，意似和意美有时会发生矛盾，也就是说，译文虽然和原文意似，却不能传达原文的意美。三似新论指形似、意似、神似。形似一般是指译文和原文在字面上或形式上相似，意似是指译文和原文在内容上、有时也在形式上相似，神似则是指译文和原文在字面上或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内容上或精神上却非常相似。

“竞赛”，指文学翻译竞赛论。文学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而且是两种文化的竞赛。具体而言，文学翻译可以看做是译语之间或译语和源语之间的竞赛，看哪种语文能更好地表达原文的内容。“竞赛”二字，当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指译文与原文的竞赛，或译者与原作者的竞赛。其二，指一个译文与同类其他译文的竞赛，或一个译者与同一作品的其

他译者之间的竞赛。在翻译的竞赛中,要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许渊冲提出的"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翻译界引起激烈的反响与争论。特别是围绕着"优势竞赛论",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辩论。 (张智中)

翁显良(1924~1983)

祖籍广东顺德,1940考入香港大学,主修政治与经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因不甘受辱,转到中山大学法学院。1944年夏辍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秋回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复学;次年毕业,随即进入粤赣湘边区工作,任武工队副队长和政治教员等职务。后因在突围的战斗中与部队失去联系,故于1948年重返香港,任《德臣西报》(*China Mail*)和英文《虎报》(*Hong Kong Standard*)记者。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即从香港回到广州,先后任《南方日报》记者、编辑,广州外语学院外语系教授,暨南大学外语系副主任、教授。1978年起,兼任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理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理事、广东语文学会副会长、广州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长、《世界文艺》杂志主编等职。翁显良的主要译作有:《古诗英译》124首、《紫罗白贮》、《重来金粉地》、《罗马热病》、《初进南州》、《各有千秋》、《百词莫辩》、《浮沉会合》、《卜卢先生的奇祸》、《火星纪事》、《午餐会》、《百事通》、《一着之失》、《飘摇四唱》、《多佛海滩吟》、《多佛海滩谣》、《墓畔哀歌》、《燃烧》、《李察·苛利》、《栅栏》、《神灵光照的儿女》、《鲛人怨》等。此外,1972年到1975年曾先后为珠江电影制片厂翻译出口电影多部,主要有:《一代新人在成长》、《三八带电作业班》、《庐山植物园》等。参加翻译并总校《拿破仑一世传》下卷、《汉英分类插图词典》。同时撰有专著《英语语音概要》(1979)以及经过修订的《英语语音教程》(1984)。在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文章有《意态由来画不成?》、《文学翻译讲座》、《译诗管见》、《情信与词达——谈汉诗英译的若干问题》、《意象与声律》、《自由与不自由——试译稼轩词十首附言》、《以不切为切——汉诗英译琐谈之一》、《浅中见深——汉诗英译琐谈之二》、《本色与变相——汉诗英译琐谈之三》、《确解与确译》和《速成与慢成》等。

翁显良在《意态由来画不成?》一文中提出了"得作者之志,用汉语之长,求近似之效"的翻译观。好的文学翻译,注重"神韵",要"得作者之志"。所谓"得"就是译者要充分理解和诠释。所谓"志"就是作者的情志、作者的灵魂、作者的神韵。那么,怎样才能得作者之志呢?翁显良认为,文学翻译"最好坚持三个前提:一曰熟,二曰近,三曰得"。所谓熟,指的是熟悉原作者,熟悉小说背景,熟悉其中的人物。所谓近,指的是作为译者,应与原作者性情相近,阅历相近,从而风格相近。所谓得,指的是读了原作有所感受,产生共鸣,得之于心。凡是自己不熟不近而无所得者,则以不译为宜。文学翻译"既然是再创作,就要重新构思……不受原文表层结构的束缚,……用译文语言之长,……充分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翁显良1983:2)。翁显良认为,真正的忠实于原文应该是"领会了作者的观点,考察了作者的手法,探索了某些词语在文内的特殊含义,从笔调看出了作者的态度,就可以摆脱原文表层结构的束缚,按照汉语规律,发挥汉语优势,重新构思再创作"(转引自林煌天1997:1095)。汉译的技巧说到底,无非是摆脱原文表层结构的束缚而自由运用汉语再创作的技巧。据守表层而谈技巧,恐怕没有多大的作用。文学创作没有定法,文学翻译也没有定法。翻译是艺术。凡属艺术,均无定法。匠心变化,妙不可言。"外国文学翻译的技巧只不过咀嚼原文之后超脱原文而运用汉语进行再创作的技巧。既然是再创作,就要有一定的自由;所谓一定,即以不违原作者本旨为度。现在的问题似乎不是自由过度,而是可自由处不敢自由,因为没有把握。"(翁显良1989a:686)文学翻译所求的不是字面上的准确,而是与原作大致相同的艺术效果。所谓"求近似之效"是指译作和原作的内容,境界气象和作者的思路感情要近似。至于语言形式,翁显良认为"译者不必拘泥于原文的表层结构,原文的句法和篇章特性可能或必须改变。但是他强调翻译时的再创作必须是在不违反原文本旨的限度内进行再创作;换句话说,在相似的框架内用另一种语言进行再创作。这样就可以取得译文与原文相似的艺术效果。"(包家仁,梁栋华2003)

关于译诗,翁显良主张以诗译诗,他指出:"诗言志。赋诗言己之志;译诗则言人之志,这就要求以作者之心为心。而要以作者之心为心,不能不知人论世。""译诗固然要做他人的梦,咏他人的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做自己的梦,咏自己的怀。不做他人的梦,不咏他人的怀,随心所欲,无中生有,实行作者未必然,译者未必不然,就不能称为诗。不做自己的梦,不咏自己的怀,无所感悟,言不由衷,就不能成为诗;译诗而不成诗,恐怕也难以称为诗。""译诗难,难在再现意象与改创声律。诗人创作,不是对客观事物无动于衷,机械地依样画葫芦;译者再创作,也不是依着原作一笔一画去临摹。如果把客观事物比作葫芦,那么葫芦也有各种画法。同一葫芦,可以用西洋技法作油画,也可以用中国技法作水墨画;同一画家画成两幅,其神可能很相似,其形则可能不很相似,甚至很不相似。同样的道理,将外国诗译成中国诗,由于语言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只能力求神似,不能强求形神皆似。"(转引自林煌天2005:1095) (贺爱军)

段连城(1926~1998)

云南昆明人。1947年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49年回国在国际新闻局从事对外宣传工作,曾任《人民中国》杂志(英、俄、日文)编辑组长。1951年到朝鲜开城中国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工作,负责同外国记者的联络事务。其间曾在板门

店记者招待会上任口译。1954 年参加我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新闻处工作，同年回国后，任《人民中国》编委。曾被借调参加接待英国工党领导人代表团访华、尼赫鲁总理代表团访华等重要外事活动的口笔译工作。1958 年至 1968 年在《北京周报》社从事编译工作，曾任编委、英文部主任。1960 年分别随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尼泊尔及阿富汗，负责文件译文定稿工作。1972 年至 1979 年主持《北京周报》中文编辑部工作。1980 年至 1984 年先后任外文局副局长、局长、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成员，曾兼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等职。

段连城对对外宣传中的翻译工作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对外宣传材料的英文译文的"常见病"分"甲型病状"和"乙型病状"两种。"甲型病状"主要表现是"白字"连篇，语法错误与用词不当。"乙型病状"主要表现是，虽拼字无误，语法不错，但外国读者会感到难懂或不懂，如：1. 译文中充满了中国地名、人名、朝代名和典故的文字；2. 充满了政治语言；3. 充满了中国"行话"(每个行业的常用术语)；4. 在华丽的词藻里充满了极度的夸张。段连城认为："'甲型'很清楚，是外文水平不高，而且工作不够认真，甚至未经校对就付印了。""到各地讲课时，我常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干部不够重视，也不太懂行，认为某人学过几年外文，交给他翻就行了。我自己做了一辈子外文出版工作，深感此道非易。自己的母语——汉语，尚难确保流畅，要做到外语通顺，下笔无误，是需要长期苦练的硬功夫。……因此，改进的办法是，有关领导必须明确要求，凡公开对外的译文，必须请水平高的同志或各地都有的外国教师看过，而且要参加校对，以免'白字连篇'。付点稿酬，所费不多。'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各地译协内外就有许多行家嘛，只是还没有把他们的力量调动起来。所以说，关键还是在领导。""'乙型病例'即译文无误，但读者费解，其'病因'在于中外文化(广义的文化)差异甚大，我国大陆的情况尤其特殊。本来，一般外国人对中国事物就知之不多(正如一般中国人对外国事物也知之不多一样)。再加四十年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巨变，影响到大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语言文字作为信息、思想、观念和感情交流的符号，随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陆上大量独特的词汇和说法，在外语中难以找到现成的词汇来表达。""前述'乙型病'的产生和流行，就是由于存在着巨大的中外文化差距，照搬中国的说法对外，人家就感到难懂或不懂。针对这种'症状'，我曾经提出一个'处方'，叫做'一般对外宣传工作中的解释性翻译'。""多年的对外出版工作经验表明，不管写得多好的中文，如果机械地逐字逐句译成外文，而不在翻译阶段进行必要的加工，就不可能成为流畅的外文。""实际上，称职的翻译不是词句转换的'对号者'，而应是沟通思想的'搭桥人'。他应该懂得怎样译才能使读者感到清晰易懂，喜闻乐见。为此，他可以，而且应该在无损基本原意的范围内，进行必要的词句加工。我主张'一般对外宣传的解释性翻译'，是与文献和专业性翻译相对而言。""进行'解释性翻译'，译者可以，而且应该对原文加工，一般是动三种'手术'。""一是'镶补'，即补充外国人不懂的背景，通常是加几个字或最多加一两句话就行。""'解释性翻译'常动的另一种'手术'可以称为'减肥'。这指的是对堆积词藻的'美文'进行加工，删节'溢美之言'和'不实之词'。""……诗词非常难译，有时费尽心血，勉强译出，读者也不一定能够欣赏。……如果一篇介绍文字反复出现这类诗词，效果是无法卒读。诗词的翻译，可留给专家去做，一般对外宣传不宜多用，若堆积过多，或译出无味，译者可以实行'减肥'。另一种常动的'手术'，可称之为'重组'，就是按外文表达的需要，把原文的句子拆散，重新组合。一般而言，句子以简短为好，比较符合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段落也可重分，一般而言，段落也以短为宜。"(段连城 1990)

蔡毅(1927～)

祖籍福建闽侯，生于北京。1949 年 6 月毕业于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毕业后即到北京外国语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俄语，直至 1994 年 5 月离休。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教研室主任兼《俄语学习》主编，俄语系主任兼外国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导师，苏联塔什干大学东方系教授，《中国俄语教学》副主编等职。兼任第二届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第三届俄语教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

作为我国俄语界苏联翻译理论方面的专家，蔡毅是较早向国内译介苏联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且成绩卓著的一位，撰有论文《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介绍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翻译理论的文艺学派——介绍加切奇拉泽的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并编译了《语言与翻译》和《文艺翻译与文化交流》这两部苏联翻译理论两大流派(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的代表作。由他及其学生段京华编著的《苏联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更是对苏联翻译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他就曾提出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内对译学建设日渐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时，蔡毅再次提出要"建立具有我国特色、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他认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统一的翻译理论，各国翻译理论界的百花争艳就是明证。而"我们的特色，首先表现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不故弄玄虚"(蔡毅 1991)。要创立这样一个体系，就应当"在总结前人宝贵的翻译理论和丰富的翻译实践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参考国外的经验"(蔡毅，段京华 2000：318～319)。这就涉及一个如何继承、发扬我国翻译理论的优秀传统，同时引进、消化国外先进理论的问题。蔡毅主张"我们不

仅要继承我国翻译理论的遗产,还应以现代科学为基础发扬这一遗产……我们既要反对排斥一切'舶来品'的国粹主义,也要反对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甚至数典忘祖的倾向。把翻译理论囿于围绕'信、达、雅',无止境地争论固然不妥,但是'言必称奈达'或'言必称加巴'(指苏联翻译理论家加切奇拉泽和巴尔胡达罗夫)的倾向同样值得警惕……把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知识标上外国术语的做法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而对尚未弄懂的东西妄加评论,甚至一笔抹杀的做法更为不妥"(蔡毅 1991)。他进而精辟地指出:"引进必须消化,择其善者,为我所用。应当在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国外翻译理论的精华(不是皮毛,更不是糟粕)。"(蔡毅 1991)

蔡毅还从跨学科的角度和视野对翻译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话语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等。他认为"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就必须跳出'信、达、雅'的圈子,对翻译过程进行多方面的探讨"(蔡毅 1984)。因此,他积极寻求这些学科与翻译理论的接触点,将其他学科的成就引入翻译理论,进行学科间的双向互补,以此促进翻译理论和其他学科的共同发展。

在长期的俄语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蔡毅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翻译教学思想。他认为,在本科阶段,翻译课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翻译技巧,因此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必须保证一定数量的翻译实践,要把翻译实践贯串于各种课型中。但翻译课也要讲授必要的翻译理论知识,让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针对硕士阶段,蔡毅则提出"翻译研究生的培养规格应是具备一定的翻译理论修养和独立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能力,同时还具备较高的翻译实践能力"(蔡毅 1992),即理论与实践并重,要把"理论从实践中来,又用于指导实践"这一唯物辩证观点贯彻到研究生教学的全过程。

自20世纪50年代起,蔡毅就开始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刊登译作。他的译著以政论文居多,主要有俄国民粹派人物尼·康·米海洛夫斯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的《英雄和群氓》《再论英雄》《再论群氓》,苏联专家有关《联共党史》的讲稿,苏联党代会文件等。另外,他还参加了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列宁文选》中部分译文的校订、研讨工作。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第一届工农兵学员翻译的《远东国际关系史》也是经他认真校对后定稿的。科技方面的译作则有《火成岩》等。他最倾心的还是文学翻译,如译有《黑崖村》等以及一些文学评论和电影评论。翻译之余,他将自己的体会撰写成文。1951年,他在《俄文教学》上发表的《副动词译法研究》是他写的第一篇有关翻译的文章。以此为起点,他还先后发表了《翻译与民俗》、《翻译与语义》、《词汇·民族文化特点·翻译》等一系列文章。

蔡毅主编的《俄译汉教程》(上、下册)自1982年5月出版以来被全国多所高等院校俄语专业定为高年级翻译课教材,得到广泛使用。1989年,他对该教材进行了修订,修订本获1991年"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后来,他又再次对《俄译汉教程》作进一步修改和补充。(林本椿 2004:324～333)

张今(1927～)

河南安阳人,1946年华北联合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1947年4月至1958年10月,在新华社总社翻译部工作,开始研究翻译理论。1960年以后,转到教育岗位上工作,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和校订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并继续研究翻译理论和英汉对比语言学。1987年以来在河南大学外语学院任教,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英汉对比语言学、东方(周易)辩证法。

张今的文学翻译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文学翻译原理》一书。该书始写于1964年,出版于1987年,修订版印行于2005年,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文学翻译原理的专著。他把"文学翻译原理"看成是"文学翻译理论"四个分支之一和中心环节,试图从"原理"的层面全面研究文学翻译中的基本问题,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翻译原理体系。他在《文学翻译原理》中的主要建树可以分述于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运动规律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提出了文学翻译的十大矛盾及对应的十大问题。十大矛盾是:译者世界观和作者世界观的矛盾;社会真实和细节真实的矛盾;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矛盾;译者风格和作者风格的矛盾;译文艺术内容和原文艺术内容的矛盾;译文语言形式和原文语言形式的矛盾;译文语言形式和译文艺术内容的矛盾;译文整体和细节的矛盾;译文语言自然性和民族性的矛盾;译文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矛盾(张今 2005:46～47)。张今将翻译中这些根本问题汇入更有概括力的哲学范畴,从而为它们的解决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第二,不仅重视文学翻译的艺术本质,而且关注它的社会作用。他从列宁的反映论出发,认为"文学翻译也是一种用艺术形象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形式"。"文学翻译既然是艺术,就应该发挥艺术所特有的社会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张今 2005:11)"这个观点是以更高的尺度要求文学翻译为社会服务的一个标志。

第三,在强调"无论是翻译科学还是翻译艺术都必须接受翻译哲学的指导"的前提下,提出了"翻译哲学、翻译科学、翻译艺术相统一的观点就是我们的翻译观"的思想。这意味着,翻译理论包含着翻译哲学、翻译科学和翻译艺术三大组成部分。只有认真对它们进行探索,翻译理论才有可能是全面的和深入的。这样便避开了长期以来人们就"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这一问题所进行的争论,同时强调了翻译理论这门学科的哲学特征。而突出翻译理论的这种"深厚"

内涵和开放态势,自然会对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第四,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新标准:"真、善、美"。这个标准分别指翻译的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原则,并以"真实性原则"为核心。除了强调善——思想性的标准,并将严复的"信达雅"与新的"真善美"标准作适当的对应外,张今还对这个标准所要求的"社会效益"原则进行了强调:"我们的文学翻译作品要有为我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服务的动机和效果(张今 2005: 53,225)"。他引证奈达(Nida)有关译品要"吸引读者"以及"接受美学"的思想也都是为了着力强调"社会效益"是翻译标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第五,把文学创作方法引入翻译理论,提出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翻译方法"的命题。这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方面,我们主张按照原作艺术意境的本来面目如实地加以再现,力求保持原作的全部深刻性、复杂性,甚至矛盾性;另一方面,我们也主张译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运用自己的全部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把自己的灵魂倾注到译文中去,对原作艺术意境积极给予社会和审美评价。"(张今 2005: 224)这一命题实际上提出了译者能动地再现原作或参与作品"二度创作"的问题,是对文学翻译规律的新概括,对文学翻译实践的新总结,对于确立和提高翻译文学的文学地位,繁荣文学翻译事业,意义深远。

第六,主张"真正的译学理论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辩证统一体"(张今 2005: 220)。张今指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这两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而且各有各的功能,不能互相取代。"(张今 2005: 220)这里,宏观研究指人们所说的"纯理论研究",微观研究指"传统翻译理论"。《文学翻译原理》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在宏观上,它吸收了翻译研究三次转向的理论成果,修订版又增补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学要点的论述和关于原型-模型论要点的论述;在微观上,它紧密联系文学翻译的具体实际与实例,甚至还总结出了文学翻译操作规程和操作规则。可以说是宏观与微观互为映照,相得益彰。

张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揽文学翻译的基本问题,并由此构建出了一套独立自在的新的翻译理论体系,在文学翻译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独树一帜。张今的《英汉比较语法纲要》初版于 1981 年,得到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肯定。他和张克定合著的《英汉语信息结构对比研究》"做到了洋为中用,理论为实践服务,有助于英语界和汉语界的沟通"(张今,张克定 1998: 序言)。

关于语言的发生问题,张今在《英汉比较语法纲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始动词假说,后来又在《英语句型的动态研究》中加以详细阐述,最终又在《思想模块假说——我的语言生成观》中系统化。他提出的思想模块,"首先是指远古人最先产生的一团朦胧模糊、没有分化、没有结构的思绪星云"。张今认为,"远古人的这种朦胧模糊的思想模块,一旦直接发之为声,就变为原始语结。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这种原始语结就在各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各民族的逻辑-心理结构的调控下,逐步分化和展开,最后转化为语言。"(张今 1997: 15)他的语言生成观揭示出了英汉两种语言的句子结构常式:英语为三分,即 SVO;汉语为两分,即 TC(话题和说明)。这个观点,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英汉语句子结构的转换规律,指导翻译实践有着立竿见影的实际功效。

最近十多年,张今主要致力于东方辩证法(周易辩证法)研究,著有《东方辩证法》一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其研究成果也见于用来说明翻译理论问题。

代表性科研成果有:《英汉比较语法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英译汉理论与实例》(北京出版社,1984);《文学翻译原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英语句型的动态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英汉语信息结构对比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东方辩证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思想模块假说——我的语言生成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英汉翻译技巧》(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英语抽象名词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文学翻译原理(修订版)》和《英语句型的动态研究(修订版)》2005 年改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译著有:《美学史》[(英)鲍桑葵(Bosanquet)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美学原理》[(美) H. 帕克(Parker)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杨清平)**

余光中(1928～)

福建永春人。早年相继就读于金陵大学、厦门大学,随后转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学习。1952 年毕业。1959 年获美国衣阿华大学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1966 年返回台北,重返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现代文学。1972 年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1985 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1985 年至今,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余光中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 21 种,散文集 11 种,评论集 5 种,翻译集 13 种,共 40 余种。具体而言,余光中的译作有:《梵谷传》、《冬人和大海》、《英诗译注》、《美国诗选》、《英美现代诗选》、《满田的铁丝网》、《录事巴托比》、《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合译)。余光中兼诗人和翻译家于一身,因此,谈起翻译问题来,往往能够切中要害,发前人之未发。他的代表性译论体现在《余光中论翻译》一书中。在该书中余光中提出翻译是一种艺术,应该强调译者的

主体地位。他说:"翻译是一种很难的艺术。大翻译家都是高明的'文字的媒婆',他得具有一种能力,将两种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是冤家的文字,配成情投意合的一对佳偶。"(余光中 2002:303)翻译既然是一门艺术,在翻译的过程中就一定要发挥译者的主体地位。他在《余光中论翻译》的开篇中提到:"译者未必有学者的权威,或者作家的声誉,但其影响未必较小,甚或更大。译者日与伟大的心灵为伍,见贤思齐,当其意会笔到,每能超凡入圣,成为神之巫师,天才之代言人。此乃寂寞之译者独享之特权。"在翻译名家作品的数月甚至数年之间,译者能够与一个伟大的灵魂朝夕相对,"按其脉搏,听其心跳,亲炙其阔论高谈,真正是一大特权。译者当然不是莎士比亚,可是既然译笔在握,就可见贤思齐,而不断自我提升之际,真欲超我之凡,而入原著之圣。就像一位演奏家诠释乐圣,到了入神忘我之境,果真就与贝多芬相接相通了。到此境地,译者就成了天才的代言人,神灵附体的乩童与巫者。这就是译者在世俗的名利之外至高无上的安慰。"(余光中 2002:177)除此之外,余光中还根据自己创作诗歌的经验,提出"翻译也是一种创作"的论断。"俗见常视翻译为创作的反义词。其实创作的反面是模仿,甚至抄袭,不是翻译。分得精细一点,也许该说,直译、硬译、死译正是创作之反,因为创作的活鸟给剥制成译文的死标本,羽毛一根不少,却少了飞翔。但是真正灵活、真有灵感的翻译,虽然不能径就取代原作,却也不失为一种创作,一种定向的、有限的创作。"(余光中 2002:174)"同样,创作也可以视为一种'不拘的翻译'或'自我的翻译'。在这种意义下,作家在创作时,可以说是将自己的经验'翻译'成文字。(读者欣赏那篇作品,过程恰恰相反,是将文字'翻译'回去,还原成经验。)不过这种'翻译',和译者所做的翻译,颇不相同。译者在翻译时,也要将一种经验变成文字,但那种经验已经有人转化成文字,而文字化了的经验已经具有清晰的面貌和确定的涵义,不容译者擅加变更。译者的创造性所以有限,是因为一方面他要将那种精确的经验'传真'过来,另一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还要保留那种经验赖以表现的原文。这种心智活动,似乎比创作更繁复些。"(转引自陈福康 2000:442)

余光中教翻译多年。他认为理想的翻译教师应有"三德":一要有见解,包括理论水平、见识等;二要目光犀利,要眼光高;这两德属于学者。第三德属于作家,即手高。翻译教师仅仅"眼高手低"不算称职。手高包括了眼高,一个人不可能眼低而手高,手高也包括有见解。任何译作都是翻译理论不露声色的实践,所以只要手高就证明眼高,也许会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也许没有写出来,但是一定会有。余光中曾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叫"作者、学者、译者"。其中一段话说:"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即译者必定相当饱学,善于运用双语,其中一种应尽窥其妙,另一种要能运用自如。"(转引自穆雷 1998)理想的手高也应有"四德":一是应个别、详细批改学生作业,不能粗枝大叶;二是应尽量保留学生原来的译文,因为"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学生的作业中总有可取之处。教师若彻底否定,学生会丧失学习兴趣,也没有自信了。因此余光中认为,尽量保留能用的部分,实在太糟的再动手术,加以修改,保留得越多,学生越有自信;第三德是顺应学生译文的风格,这样才能鼓励学生朝自己的方向发展,形成自己的风格;第四德应做一个称职的文体家,这个要求也许太高了,这是一个很高的理想,很难达到,不过不失为我们奋斗的境界和目标。翻译家一定是一个各种文体都拿得起的文体家。名师是否能出高徒?状元教师是否能带出状元徒弟?我们有了一套很好的理论,有了称职的教师,学生也必须具备起码的条件,双语根底要厚。可是中英文俱佳者未必是一个好译者,未必掌握了两种语言就能使二者成为"佳偶",也许会变成"怨偶"。理想的翻译,从译出语进入译入语,译文比起原文来,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孪生"——双胞胎,退而求其次,至少二者应像兄弟姐妹,再差一点至少是表兄弟,堂兄弟。如果搞到后来变成"远亲"或"同乡",那就差得太远了。因此翻译能力除了双语功底外,还需要一种特别的调整适应能力,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协调各种关系。而社会环境给学生提供的往往是翻译的反教育,反教学。

余光中的结论是:身为翻译教师,应时时自我反省,看看我们的笔下和口头,语言是否流畅、清新、自然、地道、优美,否则自己就会变成一个污染源,自己习于西化而不自知,误人子弟。翻译教师正如国文教师,广义上还包括广大的学者,对于维护中文的清新、自然、优美都有重责大任。因此,翻译是另一种"国防",是一种防御措施。

余光中认为,翻译理论要配合翻译批评、翻译书评或翻译某一题目的专论,泛论式的理论固然需要,但针对个别翻译的成就得失的评论即个案处理的评析也同样需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实践,学生要尽量多实践。他认为,名师未必能出高徒,可是名师未必不能出高徒。名师指点的那个徒弟,如果是可以点化的,可以造化的,名师可以帮助他成为高徒。他不赞成说"Outstanding translators are born, not made.",他认为翻译家要有见解,要眼高,也要手高。眼高和有见解是修炼出来的,手高也许倒是有点天生的,因为手高牵涉到作家的写作素质。前面两"德"是学者之德,学者一定要自我锻炼,自我锤炼,绝对不是天生的,即使有天赋也需要修炼,有先天也要有后天,就连天才的作家也仍须自我修炼。(穆雷 1998)(贺爱军)

王秉钦(1935~)

笔名秉公,天津宁河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教授,翻译家。历任莫斯科大学客座教授、国家教育部翻译学科通讯评审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天津市政协委员。1986年加入中国天津作家协会。1999年起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翻译博士

点专家。1959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同年执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长期从事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史和对比语言学研究与教学。1995～1996年应莫斯科大学邀请为翻译学硕士研究生讲授现代翻译理论；2000～2001年在美国费城曾任《华夏时报》专栏作家，发表《夏威夷之梦》等散文随笔数十篇，后结集出版《路漫漫》(香港凌天出版社，2005)。撰写和主编的专著、教材、词典、译著等近30种。代表性学术著作：《文化翻译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初版，2006第二版)、《语言与翻译新论——语义学、对比语义学与翻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其他著作有：《高等学校外语教材：俄语(1,2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新编俄汉翻译教程》(海洋出版社，1990)、《简明俄汉翻译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汉英俄外经外贸词典》(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俄汉文学翻译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等。主要译著(含合译)有：《崇高的心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夜幕中的闪光》(新华出版社，1984)、《果戈理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加里宁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社会主义和科学》(人民出版社，1986)、《苏联科学院简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苏联历史档案文献》(40卷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等。语言学与翻译学术相关论文，如《现代俄语元音交替的历史和发展》(获天津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逾百篇。

王秉钦在翻译理论建设中的创造性贡献主要表现在文化翻译学、篇章翻译学、对比语义学和翻译思想史等领域：

一、关于“文化翻译理论”三论。他的近著《文化翻译学》是文化学、文化语言学与翻译学交叉融合形成的，其研究对象是翻译活动的文化特质，即语言文化中的翻译问题和翻译中的语言文化问题的统一。他运用德国学者哈贝马斯(Habermas)提出的“沟通”理论，把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通，置于人类文化交流宏大背景和综合关系网络之中，置于世界科学开放的复杂体系之内，从其他学科特别是一些新兴学科吸取营养，借助学科群的知识，拓宽自身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并基于对文化系统的哲学分析，从时空系统、主客观系统、物理心理系统入手，构建基本理论体系；以“观念论、行为论、影响论”三论涵盖文化学的三个子系统(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精神文化)的中心内容，其中翻译观念和文化观念是文化翻译学研究的基本范畴。他认为，物质形态，通过审美取向直接表现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精神；观念形态则不直接表现在具体的文化样式中，而隐蔽在深层文化结构中：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习俗信仰……他的“观念论”，突显了译者的文化精神，以译者主体的创造性来确立文化翻译学的方法原则。文化翻译，是两种异质文化之间互补互融的对话活动，是两种文化不断相互影响、交叉、重叠与转换活动，须调动一切“文化元素”，依据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和习惯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解读与重构，并针对东西方思维方式、文化价值观、语言文化差异，为文化翻译学建立了系统的方法论体系和相应的规则系统。这是他对翻译理论建设的一大贡献。

二、关于“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史”的独见。他的近著《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当代中国译学思想发展史的专著。它以20世纪中国翻译学术思想为“经”，以学者为“纬”，贯穿百年翻译思想史的发展主线，第一次划分并论述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转折、发展、鼎盛四个时期，并概括总结了自近代学者严复的“信达雅”说至当代一系列有影响、有价值的思想学说。对于认识近百年来中国翻译学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他从科学立场出发，坚持人文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以西方译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为背景，概括20世纪中国翻译学术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深深根植于我国悠久、丰富、灿烂的文化历史，是以中国古典文论和古代哲学及古典美学为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建立的中国(本土)翻译思想(不排除西方传统语言理论和传统译学理论的影响)。中国的翻译思想(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翻译思想)是中西方学术融合的结晶。对中国翻译思想的发展史，他具有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具有恰当的批评眼光和相当的科学意识，敢于批评学术界的定论和有争议的见解，以详尽、客观的事实为依据，以独到的学术眼光，追踪和研究中国现当代译界学者的学术见解，分析其思想见解的合理性和理论价值，对20世纪中国译学理论发展史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三、关于“篇章翻译”的“七字理论”。在翻译思想方面，王秉钦首次提出“篇章翻译”，并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的部分进行论述，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文论思想，将文章学的“七字理论”(事、理、情，声、色、次、势)创造性地移植于篇章翻译，使之具有可靠的科学体系和理论价值。他提出走出“句本位”的传统观念，主张“段本位”“篇本位”的整体理解、整体翻译的原则，将微观语言单位的翻译及语体翻译融于篇章翻译之中。运用“段旨”“文脉”等核心概念，抓住全篇的整个思想和感情，在词与词、句与句之间建立“意念上的联系”，避免翻译中常见的“孤立地读每个句子都没有错误，可是读完全篇(段)，反倒不知所云”的怪异现象。并运用语言特点区分语体之间的个性和共性，即运用语言的“度”区分非文学翻译(理解度)与文学翻译(理解度、感官度、感觉度、想象度)，通过具体把握这些“度”，处理不同语体的翻译。

四、关于“翻译三角形理论”。王秉钦的《语义学、对比语义学与翻译》是我国目前研究语义学、对比语义学与翻译理论之间内在规律的一本新著。该书以现代语义学基本理论(如语义三角形理论、语义基本类型理论、语义场理论等)和对比语义学基本语义

范畴为中心命题，以语义功能对比为基本方法，揭示了语义学、对比语义学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透视了非亲属语言间共时和历时形态的特点及其转换的基本方式。在论述中，(1) 他成功地运用语义三角形理论，推出翻译三角形理论，旨在探索"意义(思想)"与"语言形式"的关系。科学地解释非理性意义与直译，理性意义与意译，直译与意译的三角形关系。运用索绪尔(Saussure)"语言是表达思想的一种符号系统"理论，论证了翻译的过程是同一思想在"意义一致"的基础上的不同语言符号的复杂的转换过程。(2) 他在论述语义变化的社会化进程出现新的语义概括进而被录入词典这一现象中，深刻地揭示了"常体→变体→常体"这样一条语用学规律。(3) 他运用"语义相同"的原则，科学地阐述了对比语义学和翻译理论的紧密联系，从而得出"对比语义学是翻译理论的语言学基础"的结论。（金颉）

方梦之(1935～)

笔名舟晓航，生于浙江嵊县，1957 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海翻译》主编。早年在科研院所从事科技信息的翻译、研究和编辑工作，翻译和审校的外文文字包括英文、俄文、德文、日文四种。1978 年末调入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社会兼职有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理事长、中国翻译协会二至五届理事，曾任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委员及科技翻译委员会委员，是国内多家出版机构翻译研究丛书或翻译专业教材的编委。他至今在国内外期刊上已发表翻译和语言方面的文章上百篇。他是《中国翻译词典》(林煌天主编 1997)的编委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主编"高校英语系列翻译教材"丛书(6 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出版编、译、著书稿 20 余种。在学术研究和翻译理论上，方梦之的贡献主要有如下的几方面：

一、从文体角度切入科技翻译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科技英语语法"的研究和出版兴盛一时。当时，把科技英语发展成"独立学科"的呼声此起彼伏。方梦之对此持不同意见。他另辟蹊径，立意在文体学的框架内，以语域的视角研究科技英语及翻译。传统的文体学主要分析文学家的作品风格和文学语言特点，方梦之率先开始英语科技文体系统研究。在总结十余年科技翻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他撰写了《科技英语实用文体》(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修订版)。该书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从文体学的表达性来说明科技英语文体特征，从文体学的功能性来分析几种常用科技文献品种的形式与语言结构。并专章讨论科技翻译，指出语言代码呈现一定的文体特征，得体与否正是译品高下的尺度之一。《科技英语实用文体》出版后，王佐良给作者的信(1989－08－27)中鼓励说："尊著不仅内容井然有序，而且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在国内似尚无第二本。"杨自俭在《翻译新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载文总结一个时期我国翻译研究时指出，该书是"取得突出成绩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二、方法论研究与实践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期，我国多学科的翻译研究兴起，涉及相关学科一二十门，但是，同一问题往往作多学科多侧面的反复讨论，而对翻译过程中的译者问题缺乏研究。对此，方梦之先后发表文章，如《译论研究的综合性原则——译学方法论思考之一》(《中国翻译》，1996 年第 4 期)和《译论研究的系统和系统性原则——译学方法论思考之二》(《中国翻译》，1997 年第 3 期)，从方法论上加以阐述。提出：1. 翻译研究须立体交叉，相关学科要协同工作，优势互补，而不是简单的层次重叠；2. 中西互补，外来新理与我国传统译论结合；3. 平衡发展，就"原文-译者-译品"三位一体的简单流程来说，当时对译者的研究很少，有中间薄弱环节；4. 译者研究要涉及翻译思维、翻译心理以及译者的情感和需要等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以上方法论的指导下，方梦之出版了他的另一代表作《翻译新论与实践》(青岛出版社，1999)。该书试图用与译论关系最密切的四门学科(语言学、社会符号学、心理学和思维科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来描述、分析和归纳译学对象的主要问题。对翻译活动中影响翻译主体的多种因素进行宏观考察和具体分析，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思维、心理和情感活动进行了探索。该书还以翻译文体论为基础，对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经贸翻译、法律翻译等的翻译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编辑学的原则，具体研究了节译、选译、译要、编译、综译等不同译品的操作过程；强调为使译文整篇得体，必须使译文的词、词组、句子、语段得体。

三、创导应用翻译研究

方梦之(2003a)曾对 20 世纪下半叶我国翻译研究论文作过定量分析，发现 20 世纪末，应用翻译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论文数超过文学翻译，但学术含量亟待提高。特别需要对应用翻译的理论作系统研究和对翻译方法作与时俱进的探讨。于是，在他的策划和主持下，2003 年 9 月 18 日至 21 日，中国译协和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在上海大学联合主办了 2003 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时任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的林戊荪在会议闭幕词中称，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应用翻译开始深入研究。会后，方梦之(2003b)发表题为《我国的应用翻译：定位与学术研究》的文章，指出应用翻译范围较广，包括人们日常接触和实际应用的各类文字。应用文体的次语域很多，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其共有的主要特点是信息性、劝导性和匿名性。应用翻译以传达信息为目的，但同时应考虑信息的传递效果。劝导性实际上是应用性文本人性化的一面，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在会议的推动下，应用翻译研究涌现了一批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较好的成果。其中，由方梦之主持国内专事不同语域翻译实践和研究的七名教授共同编写的《英汉-

汉英应用翻译教程》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 2004 年出版,2008 年再版。

四、编纂译学辞典

方梦之在长期从事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以及主编《上海翻译》的基础上编撰了《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辞典融汇历年来国内外翻译研究的主要成果,采用通用的或权威的术语(英汉对照),以明确的概念,汇集译论的各种流派和观点,点明国内外前辈译家和当代译家的方法和技巧,勾勒出中西翻译史的粗线条,罗列翻译学科的要点及其相关学科,以促进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理论研究。编者广泛地收集译学的常用术语,并对之作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梳理工作,按照确定术语的单义性、简明性、科学性、系统性的原则编撰该词典。方梦之编词典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整体构想,这就是他译学发展体系的"一体三环"论。他把译学发展而形成的体系归纳为"一体三环"。一体,就是译学本体,这是千百年来不断孕育、不断壮大、不断完善的,译学之所以有今天正是有着这样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紧靠着本体的是内环(一环),这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由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构筑起来的,它的意义在于使翻译研究从感性走到理性,从经验走向科学。内环之外是中环(二环),是 20 世纪 70～80 年代由哲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信息论、交际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开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意义在于使译学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单一的语言学科走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向综合性学科过渡。中环(二环)之外又有外环(三环),这就是文化,翻译的文化研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兴旺起来的。它的意义在于把翻译研究跟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全面地联系起来,从而使翻译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方梦之 2006)整部词典就是"一体三环"理论的反映,是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杨自俭在《译学辞典》的前言中说:"(这是)这部词典的突出特点,也是这部词典对译学建设的重要贡献。"

五、创办《上海翻译》

方梦之是《上海翻译》(前《上海科技翻译》)的创办人之一。该刊以研究应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为特色,是我国外语类核心期刊之一。 (文晔)

李亚舒(1936～)

生于湖北公安,祖籍湖南湘阴。解放初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修法语,兼修英语,师从齐香;后由高教部派遣赴越南留学,在越南河内综合大学文学系读研究生,师从邓泰梅,主修越南文学,兼修法语。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至今,先后在科学院文献资料情报中心哲学社会科学部担任《亚非文献》中、法、越、英文编辑,科学院外事局翻译,项目官员,现任中国译协副会长兼科技翻译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译协副会长、《中国科技翻译》主编、《中国科技术语》编委。曾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一、二届理事会(1994～2002)副会长。30 多年来,曾多次参团、组团或带团访问亚洲、欧洲、美洲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李亚舒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就从事小说诗歌和文献翻译。近 30 年来一直从事科学翻译实践,并在实践中思考科学翻译的理论问题和学科建设问题,对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为:

一、科学翻译史研究。1990 年前后,李亚舒走访了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包括科学院院士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知名翻译家,记录了他们对科技翻译在科学研究、国际交流、外语教学和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汇编出版《译海采珠——科学家谈翻译》。1996 年合编出版了《中国科技翻译史料》,完成了科学翻译史研究的奠基工作。2000 年编著出版了《中国科学翻译史》,理清了中国科学翻译发展的脉络,阐明了中国科学翻译史的研究对象、科学翻译的发展及其基本理论,对各个历史时期科学翻译的内容、形式、机构、活动、代表性译者的学术成就进行了重点介绍,对中国科学翻译理论的发轫、发展、译才的培养、建国后翻译活动的分期等均有独到的认识。该书的出版被严济慈誉为"我国科学翻译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著作",时任中国译协副会长的叶笃庄称其"填补了中国科学翻译史上的研究空白"。

二、科学翻译学的创立。1991 年在无锡第五次全国科技翻译学术研讨会上,李亚舒首次提出了建立中国科技翻译学的构想;1993 年 5 月 3 日在《中国科学报》上撰文论述中国科技翻译学的特定对象、内涵及其理论体系、规范、方法和术语问题。后来逐步拓展为"科技翻译学""科学翻译学",对"科学"作品采取广义的理解,即指一切非文艺作品。2002 年李亚舒在重庆第十次全国科技翻译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科学翻译学'论纲"一文,进一步发展了科学翻译学,从总体上勾勒了科学翻译学的轮廓,设计了建立科学翻译学的思路。2004 年,与黄忠廉合著的《科学翻译学》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标志着"科学翻译学"的创立。同年,由李亚舒、黄忠廉主编的"十五"国家重点图书《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科学翻译研究卷》开始出版,这是我国首次系统研究科学翻译的学术丛书,揭开了我国科学翻译研究新的一页。

40 多年来,李亚舒一直从事法、越、英等外语的口笔译工作,多次为国家领导人担任越语口译,多语种译文达 400 余万字,发表论著 150 余篇部,在国内外发表诗歌、小说、散文 80 余篇部。

李亚舒的主要译作有:诗文集《越南的女儿》(上海译文出版社,1959);长诗《通往友帮之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中篇小说《海鸥》(《世界文学》1963 年第 10 期);科技著作《从原子到生活》(科学出版社,1994);长篇小说《熄灯》(文津出版社,1996);戏剧《亨利六世》(第三部)(新世纪出版社,1997);社科著作《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文津出版社,2000)。

译论与著作有:《论科技翻译的特点及其组织作

用》(《中国科技翻译》,1989年第2期);《中国科技翻译学的科学内涵》(《中国科技翻译》,1991年第3、4期);专著《译海采珠》(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3);主编《科技翻译论著集萃》(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中国科学翻译史的学术观》(FIT第14届世界翻译大会,澳大利亚墨尔本,1996);主编《新英汉缩略语大词典》(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中国科学翻译的发展》(FIT第15届世界翻译大会,比利时蒙斯,1999);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主编《中国科技翻译论著新萃》(中国气象出版社,2000);合著《科学翻译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主编《简明英汉成语大词典》(青岛出版社,2006)。

(黄忠廉)

罗新璋(1936～)

罗新璋,浙江上虞人,生于上海。法国文学翻译家,在北京大学上学时期即以译作向傅雷求教,以傅译为师。曾在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长期从事中译法文学翻译,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攻法国中世纪文学。译作包括《巴黎公社公告集》、《特利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阿邦赛拉琪末代王孙轶事》、《红与黑》、《猫球商店》、《艺术之路》、《黛莱丝·戴克茹》、《栗树下的晚餐》、《禁止的游戏》、《不朽作家福楼拜》等,校读《傅雷译文集》全15卷。撰有《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读傅雷译品随感》、《钱锺书的译艺谈》、《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释"译作"》、《翻译发微》等文。

罗新璋在中法文上都下过苦功。译《红与黑》时,"朝译夕改,孜孜两年",每天4点就起来翻译。为求神似原文,"翻译时力求字字不闲;凡可有可无的字,一概删却净尽,以求一种洗练明快的古典风格"。(罗新璋1995)不拘原文束缚,句子短小,句式精练,搭配匀称,逻辑严谨,读起来朗朗上口,堪称罗新璋译文的一大特色。

罗新璋不仅在翻译实践方面成绩斐然,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也颇有见地,所编《翻译论集》是我国自古以来的翻译资料汇编,囊括上自汉魏,下迄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量论述,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此书分古代、近世、近代、现代和当代五个部分,汇编了各个时期重要译家的主要论述,其中不少古代佛典翻译家的论述都是首次揭载,如支谦、道安、罗什和僧睿、彦琮以及道宣关于玄奘的论述,等等。这部被誉为"纵跨千余年,汇集百家言"的史料集,收集了约一千七百年间探讨翻译理论、经验和翻译史料的文稿180篇,约80万字,称得上是一部鸿篇巨著。其收集时期之长、涉及人物之广,堪称空前。他在该书序言《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梳理了传统翻译学的发展轨迹,提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个概念,认为"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新璋1984:18～19)

在《"似"与"等"》一文中,谈到文学翻译时,他指出:"文学翻译固然是翻译,但不应忘记文学。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艺术;文学翻译,自然也该是一种艺术实践。文学语言,不仅具有语义信息传达功能,更具有审美价值创造功能。"对译者的主体性,罗新璋这样说:"译本的优劣,关键在于译者,在于译者的译才,在于译者的译才是否得到充分施展。重在传神,则要求译者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神明英发,达意尽蕴。翻译理论中,抹煞译者主体性论调应少唱,倒不妨多多研究如何拓宽译者的创造天地,于拘限中掌握自由。大凡一部成功的译作,往往是翻译家才能得到辉煌发挥的结果。泯灭译者的创造生机,只能导致译作艺术生命的枯竭。今后的翻译理论里,自应有译者的一席之地!"

由此可见,罗新璋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他在《释"译作"》中也说:"文学翻译也是一种艺术创造,一种美的创造。我们不只需要简单照搬原作的译本,更需要从艺术上把握原作的译本"。这两种译本就是他所谓的"译即作"和"译而作",而他显然更赞成后者,即"主观之译作"。译者的这种主体性相对于原作,是一种"二度创作"。既不是拜倒在原作前,无所作为,也不是甩开原作,随意挥洒,而需要一定的自主自制,在两种语言交汇的有限空间里自由驰骋,能够脱离原文,又能离形得似的译文,才是上等译文。罗新璋译毕《红与黑》,写有《译书识语》,提出"译事三非",即:"外译中,非外译外;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这就需要译者不但要精通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还要具有驾驭语言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艺术。

(贺爱军)

杨自俭(1937～2009)

生于山东省金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67年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先后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八年。1972～1975年在山东大学外语系、北京语言学院外语系进修英语。受教育部派遣先后赴斯里兰卡维迪亚兰卡拉大学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立现代语言学院任教四年。1977年调入山东海洋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前身),1992年晋升教授,2006年退休。先后任该校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主任、外语学院院长、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和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等职。长期从事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和翻译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数年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生讲授方法论、对比语言学和翻译学以及中西哲学比较等课程。主要学术方向和研究领域为对比语言学、翻译学以及英汉文化、哲学、逻辑比较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其中翻译研究论文40余篇;译作6部,其中有福斯特(Foster)的小说《印度之行》(1990/2003)、《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合译,1992)和《永恒的时刻》,利奇(Leech)的《语义学》(合译,1987)等;编著12部,其中有《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合编,1990)、《翻译新论》(1994)、《译学新探》(2002)、《语言多学科研究与应

用》(2002)、《英汉语比较与翻译》3～6辑等。代表性论文有:《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中国翻译》,1989年第4期),《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现代外语》,1996年第3期),《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山东师大外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曾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1998～2006)和中国译协理事和翻译理论和教学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名誉会长;曾任《中国翻译》编委,曾任《中国外语》编委、《外语研究》特约编委和《外语与外语教学》顾问等。

杨自俭与人合译了《继嗣佳人》(1986)和《语义学》(1987)。与此同时他开始了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并兼顾翻译实践。他一开始就关注学科建设,1989年《中国翻译》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文章提出了学科研究对象是翻译的全过程;翻译科学的性质是思维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学科架构为翻译学(基础科学)、翻译艺术(技术科学)、翻译工程(工程技术)。还提出了有关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刊物出版、译著地位等五项战略任务。他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推动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用了四年时间从400余篇论文和30多部著作中精选出54篇文章编成《翻译新论》,而且每文后都有画龙点睛的短评,展现了他对翻译研究各个领域中许多问题的理论思考。1994年他在《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和翻译理论建设》中提出了有关译学建设的十个问题,分析了译学理论滞后的原因,特别论证了研究方法在学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1996年在《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中论述了学科定性定位、建设规划与管理、人才培养机制和方法论建设等重要问题,明确提出了翻译科学应提升为跟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并列的一级学科。1997年在给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写的序文中提出了通过研究学科史,尤其是理论史,推动学科建设的看法。1999年在《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以世纪末学术反思的态度讨论了13个问题,涉及发展基础、中外结合、学科的条件、相关学科、普通翻译学与具体翻译学、研究对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翻译标准、意义研究和译学建设、文学翻译的科学性、方法论建设、人才培养以及新世纪给译学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等。文章提出了中外结合应通过比较、扬弃、加工、化合来实现对旧范畴的改造;明确了包含八大要素的翻译全过程为译学研究对象;翻译标准以“忠实”与“通顺”为共性部分,以文体特征为个性部分,可表示为TC＝A＋B＋X。同年在上海翻译研讨会上提出了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与五条标准(发表在《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1999～2001年间协助《外语与外语教学》主编张后尘组织“翻译学是否为梦”的讨论,起草了“编者按”,写了讨论的小结《对当前译学问题讨论的看法》。2001年在青岛主持了全国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作了主题报告《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主编了会议论文集《译学新探》。2003年在给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写的序文中提出传统译论现代转化首要任务是认真进行哲学范畴、译学范畴及其体系的中西比较研究,同时应探讨译学元范畴。2005年在给赵彦春《翻译归结论》写的序文中对翻译的本质属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文体有了新认识。同年在给司显柱《翻译研究:理论·方法·评估》写的序文中探讨了中国译论史的分期与转化问题。2006年通过写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魏志成(《汉英比较翻译教程》)、孙迎春(《翻译学词典博士文集》)三本书的序文表达了他对翻译批评的范围与标准、翻译教材与教法以及创新能力培养问题的新看法。2007年在给黄忠廉《翻译方法论》写的序文中构想了包含实践、理论研究、教学与批评四个子系统的译学方法论系统。在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中,杨自俭除给“翻译”和“翻译学”下了新的定义之外,还提出了翻译学科的广狭两个系统,前者叫学科制度系统,包括学科深层理念、学科规范体系、学科法律与管理系统;后者就是学科规范体系,按距实践远近和抽象程度高低,此体系依次包括元理论系统、翻译哲学、译学理论系统、策略选择系统、方法技巧系统。 (木辛)

阎德胜(1937～)

河北唐山人,196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俄语系,同年任唐山工程技术学院俄语教师。后任唐山理工学院外语系教授,曾兼任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唐山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在国内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实用俄汉科技翻译技巧》、《翻译新探》及《翻译的艺术》等三部专著。

阎德胜是我国逻辑翻译理论的创导者,他的理论自成体系。他认为,包括科技语体在内的任何语体的翻译,都必须从思维活动的研究入手,必须围绕着思维活动的规律来展开。原文的词语和句式,特别是超出句子以外的句群、段落、段群、章节以至篇章的翻译处理,归根结底,不是以语法分析为依据,而是以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为基础。因此,就其实质而言,“翻译科学是应用逻辑,翻译活动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其决定的因素是思维活动,翻译的过程是思维活动的过程”。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思维活动的研究。这是因为“翻译活动与思维活动的联系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思维活动在翻译活动的心理机制中占有中心的、主导的位置,思维活动的规律制约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阎德胜 1989)

翻译科学是应用逻辑这一理论系由大量的翻译实践经验总结而得,也是由列宁关于“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这一科学论断推理而来。根据列宁这一理论,“无疑,系统科学(系统论)也是应用逻辑。我们进行的是逻辑翻译研究,最重要的,就是根据系统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来确立两个民族语言文字的动态的、整

体的翻译观。首先要确立的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翻译观。其次是连贯的而不是孤立的翻译观。再次，是发展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翻译观。最后，是灵活的而不是呆板的翻译观。”(阎德胜 1994)

他的《论翻译中的动态平衡》(阎德胜 1997)一文是实践上述逻辑翻译理论的力作。文章虽然是从语境理论、系统论和文化学的角度探讨翻译中组织汉译文时语言结构动态平衡的理论与实践，然而探讨研究的最终依据仍然是思维和逻辑。就是说，翻译中“表达形式的选择与平衡是在两个不同民族语言中转换进行的；而不同民族之间对语言求新、求美的创造活动又是在不同民族思维活动的动态平衡中完成的。所以，我们翻译工作者必须对译文有一种求创新、求协调、求美感的动态语言运用意识，根据不同上下文思维活动的有机联系选用或构造不同的表达形式来处理原文语言现象，从而求得译文语言结构的动态平衡，以忠实确切、通顺流畅地传达原文的内容与风格。”“语境是思维活动的载体，思维逻辑的有机联系是某一语境赖以存在的基本特征。”“可见，语境对语词的使用具有绝对的选择性，其根本的依据就在于：语词所处特定语境这一上下文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不同上下文的逻辑联系赋予语词以不同的含义。所以，必须把原文的语词看做发展、变化的动态语言现象，视不同上下文逻辑联系的需要选用或构造不同的表达形式来组织汉语译文，在语词的动态调整中寻求译文语言结构的动态平衡。”“任何科学著作都是一个科学系统，是作品中大大小小的逻辑层次的综合体现。”“因此，研究和组织任何翻译作品，其着眼点都必须是逻辑。”(转引自方梦之 1998) （张顺梅）

郭建中(1938～)

生于上海，浙江大学教授。1957年考入浙江师范学院，1961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后留校任教，1999年从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退休。曾任原杭州大学省重点学科英语专业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副研究员，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研究员；曾任中国译协理事兼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译协会长；现为中国译协理事、浙江译协名誉会长，浙江省社联理事、浙江省作家协会全省委员会委员兼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曾先后兼任浙江对外友协《文化交流》等杂志和浙江电视台英语新闻主编、《中国翻译词典》编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副主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委员、“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翻译资料与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委员、《上海翻译》编委会委员等学术职务。

郭建中40余年的学术生涯有三个特点。

第一，教学与研究密切结合。郭建中的不少论文是其教学实践的理论总结，而不少教学内容又是自己翻译实践和研究的成果，两者相得益彰。

第二，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密切结合。以近年来发表的几篇有影响的论文如《汉译英的翻译单位问题》、《汉英/英汉翻译：理念与方法》等为例，这些论文都是他在翻译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同时，他把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用到翻译实践中去。这体现在他撰写的译序里，例如《鲁滨孙漂流记》的译序和修订版译序(译林出版社，1996/2005)和《摩尔·弗兰德斯》译序(译林出版社，2003)，在对作品研究分析的基础上，郭建中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点和翻译策略，及其采取所用策略的理论依据。他还主张，译文语言一定要通顺流畅(某些特殊文体和作品例外)，但同时要尽可能移植源语文化。他的英汉/汉英翻译作品都体现了这种翻译观。

第三，英汉、汉英翻译并重，译作数量大，范围广。他翻译、校对、编辑的文字，超过1 000万字，包括文学名著如笛福(Defoe)的《鲁滨孙漂流记》和《摩尔·弗兰德斯》、库伯(Cooper)的《杀鹿人》，以及索尔·贝娄(Saul Bellow)、辛格(Singer)、詹姆斯·肯尼迪(James Kennedy)等名家著作，工具书如《麦克米伦百科全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世界英语俚语词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和《中国语言文化背景汉英双解词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with Cultural Background Information*)(商务印书馆，1998)；主编和翻译了多套国外科幻丛书，其中六大卷中文版《科幻之路》(*The Road to Science Fiction*)，被誉为“科幻宝典”。由于他在译介国外科幻小说方面的突出成就，1991年被世界科幻小说协会授予“科幻小说恰佩克翻译奖”，是中国至今唯一获此殊荣的人；1997年又获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翻译奖——“金桥奖”。此外，他还翻译了很多政治、经济、体育、旅游等方面的宣传材料，其中选出的二三十篇译文，发表在《中国翻译》、《上海科技翻译》等有关专栏上。

在翻译的理论研究方面，至今他发表了有影响的翻译论文数十篇，专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2002)和《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2005)和主编论文集《文化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2001)等。从他的文章和专著中，我们可以窥见郭建中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

首先，他对翻译问题的看法比较辩证。他自己曾经说过，学术研究应避免走极端。例如，在对理论与实践的看法上，他一方面主张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相结合，并提出了三点建议：1. 把理论研究建立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对翻译的实践经验作出理论的解释；2. 研究特定的两种语言(如汉、英)和文化之间转换的特点和规律；3. 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理论与技巧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理念与方法统一起来。

同时，他也认为需要有人做纯理论的研究，也充分肯定翻译普遍理论的研究对翻译应用理论与翻译

实践的指导作用。早在 1993 年 5 月四川乐山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上他就提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译者的翻译观问题。至于理论与技巧的关系,他认为,技巧可以上升为理论,但新的理论也可以产生新的技巧。翻译的哲学研究与翻译实践似乎相去甚远,但郭建中认为,这对译者翻译观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译者的翻译观,则直接指导了翻译实践,影响了翻译效果。

在翻译的语言研究方面,郭建中发表了《汉译英的翻译单位问题》(《外国语》,2001 年第 6 期)。王菊泉、郑立信在他们所编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1995~200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的“前言”中对该文评论说:“在综述了国内外种种有关翻译单位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讨论翻译单位应该考虑具体转换的特定的一对语言,翻译单位的划分应易于分析和操作;就汉英翻译而论,作者主张以自然段落作为翻译过程中分析和操作的单位。……文章观点明确,论述紧紧围绕上述优越性展开,所举实例紧扣汉英语言在不同层面上的种种差异,分析点评到位,很有说服力。”

在论文《汉英/英汉翻译:理念与方法》(上、下)(《上海翻译》,2005 年第 4 期;2006 年第 1 期)中,郭建中对语言操作的词语、短语、句子、段落和语篇的层面,分别提出了译意、替代、重构、重组、重写的方法,并提高到对翻译本质的认识问题上加以论述,认为特别是替代和重写是汉英/英汉翻译本质的观点。

在翻译的文化研究方面,他主编的《文化与翻译》论文集,影响较大。他在论文《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外国语》,1998 年第 2 期)和专著中,特别就归化与异化策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结起来有四点:1. 从归化向异化倾向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需要时间;2. 采用何种翻译策略,最终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归化和异化的译本,在目的语文化中起不同的作用,都有其存在的价值;3. 重新厘定直译、意译和异化、归化的概念。他把直译与意译的定义限定在语言形式的转换;把异化和归化限定在文化因素的移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种翻译方法:直译+异化;直译+归化;意译+异化;意译+归化。方梦之认为,这一重新定义“具有重要的价值”;4. 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由于英语 rewriting 译成汉语,既可以是“重写”也可以是“改写”,郭建中提出了汉语中“重写”和“改写”的定义。他把翻译研究派强调对原作文化因素的摆布,定义为“改写”,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操纵,定义为“重写”。这一观点在他的《当代美国翻译理论》(2000)中已初见端倪,在《科普与科幻翻译》(2004)一书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重写:科普文体翻译的一个实验——以〈时间简史〉(普及版)为例》(《中国科技翻译》,2007 年第 1 期)一文中趋向了成熟。根据他自己汉英/英汉翻译长期的实践经验,就语言操作而言,改变句子和段落结构的形式,就是“重写”。他认为,“重写”既是翻译的方法,也是汉英/英汉翻译的本质所在。

郭建中学术兴趣广泛,近年来又连续发表了《关于路名标识的拼写问题》(《中国翻译》,2003 年第 5 期)、《再谈街道名称的书写法》(《中国翻译》,2005 年第 6 期)和《街道路牌书写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中国翻译》,2007 年第 5 期)。在这些文章中,他依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委员会的有关决议,论证并强烈维护用汉语拼音书写路牌的规定。

最后,必须提一下的是他的两部有影响的专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和《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

《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出版之后获得一致好评。该书专辟一章,介绍了旅美华人学者的翻译研究成就,填补了目前国内翻译研究的一项空白。许钧认为,该书“以开阔的文化视野,将翻译置于了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文化层面去审视,对我们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客观评价翻译的作用,探讨翻译在文化碰撞与交流中所采取的策略,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许钧 2000)。《中国翻译》2001 年第 1 期中王东风、孙会军以《一双透明的眼睛》为题,发表了长篇评论。评论指出:“该书对当代美国的翻译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填补了我国翻译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作者的视角颇为独到、明晰,像一双‘透明的眼睛’,敏锐地透视当代美国多彩纷呈的翻译流派,冷静地观察当今国际译坛的最新成果。…… 该书在我国翻译界是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新成果。”评论还指出:“再者,虽然作者介绍的是美国译论,但他在书中没有孤立地谈论美国译论,除了欧洲译论有所涉及外,还时时把中国译论拿出来,与其进行横向比较,将中国译论放在美国乃至国际译论的大框架中去观照。介绍完一个流派或是一位翻译理论家,作者往往要辟一到两节,对其作出独到的评述和客观的评价,并联系中国译界中与其相关的内容进行讨论,这一点难能可贵,也使读者受益匪浅。”

李亚舒和方梦之则分别为《科普与科幻翻译》一书写了序言,并作了高度的评介。李亚舒认为,“因为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科普科幻翻译的专著,它填补了我国(科学)翻译研究的空白。”方梦之认为,“如果说我国译坛有译诗第一人的话,那么译科幻、科普的第一人非郭建中教授莫属”,并也认为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郭书理论联系实际,不但对翻译科普与科幻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一般翻译工作也有现实意义”。

(铭章)

刘宓庆(1939~)

祖籍湖南,定居香港。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巴尼分校学习,并曾在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组担任专职翻译,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及台湾“国立”师范

大学翻译研究所执教，并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现任同济大学外语学院特聘教授，其基本理论思想属于功能学派。刘宓庆著述颇丰，发表专业性学术论文共计36篇，出版译学专著11本，并于2005～2006年对部分已出版的著作进行了修订，推出了《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共计11卷；其著作研究领域主要有对比语言学、翻译美学、翻译文化学、翻译与语言哲学、翻译教学法、口译理论以及翻译学比较研究。刘宓庆翻译理论集传承性及学术创新性于一体，参古论今，中西兼顾，在翻译研究的多个领域起到了开拓作用，形成了中国功能主义翻译流派。

刘宓庆翻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关注我国传统翻译理论；80年代到90年代，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取向，主要关注文本研究，90年代初，开始了以维特根施泰因(Wittgenstein)哲学为基础的功能主义译学研究；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开始以功能主义为主，兼取结构主义之长的综合研究取向。(王建国2006：Ⅳ～Ⅴ)刘宓庆翻译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翻译学性质和学科架构

刘宓庆认为翻译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他把翻译学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两个结构体系。内部系统由翻译史、翻译信息工程和翻译理论组成，其中翻译理论是核心，具体又包括三部分：翻译基本理论、翻译应用理论和翻译学跨学科理论。翻译学的内部系统衍生出了一个与之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外部系统，它为内部系统提供理论思想，使翻译学内涵从内省的、本体自足性发展为开放的、横断交叉性学科，具体包含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效果论和价值论。

2. 翻译的“文化战略观”

刘宓庆认为，“翻译从来就是一种以文化-政治为目的的语际交流行为，古今中外，概莫例外。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就具有明确的文化战略目的。当时的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文化资源匮乏，完全依赖希腊文化的‘输血’，而这些‘供血者’正是罗马的千百个翻译家。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汉代佛经翻译也具有鲜明的文化战略色彩。东汉(公元25～220)以来，儒学开始神秘化，谶纬之说盛行，儒学已经无力解决社会的现实和思想问题，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精神慰藉和诉求。甚至可以说当时汉代的国家权力意志，也亟待某种精神力量的振兴。佛教和佛经翻译能够进入中土而且立即蔚然成风的根本原因，正是投合了这个文化战略考量。佛经翻译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修身养性的伦常规范，而且更重要的是异域政教合流的一整套典章文物，对沉闷衰颓的西汉的‘劣政遗风’以及正处在‘彷徨的选择’中的东汉的统治阶层来说，可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可见，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势下蔚然而兴的佛经翻译被赋予浓重的政治功利色彩，文化战略考量为中国翻译思想和翻译传统之肇始，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贺爱军2007)“从明清科技翻译开始，这种文化战略观大体经历了三个内涵蜕变的演进期：(一)明清科技翻译，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以济世图强的民族发展意识为特征；(二)清末至20世纪上半期社科翻译，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文学翻译以林纾为代表，以民族忧患意识为特征；20世纪上半期这种忧患意识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更发展为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三)自20世纪下半期起中国大陆的综合翻译，以民族复兴、振兴意识和国家复归统一的意识为特征。”(刘宓庆2005b：75)每个民族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势都并非等量齐观，但每个民族要生存、发展，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生存、发展战略——文化战略正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的“文化战略观”论包括以下重要内涵：

第一，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和自我定位来看待中国翻译事业，振奋精神，不断进取，高标准从严要求自己，做到心高志远，奋发有为；

第二，继承和发扬译界先驱和前辈心系民族危亡和国运盛衰的崇高精神和心志，将个人的事业心与忧国感时之志密切结合，将一词一句、一篇一著之“译”与国家、民族多元文化之“业”密切结合，做到林纾所说的“天下爱国之道，当争有心无心，不争有位无位”；

第三，回应时代要求，努力钻研理论、发展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学。按人口计算，汉语是世界第一大语言，服务于发展潜力极大的中国经济体和大中华文化体，学汉语的人与日俱增，中国人应该对世界翻译学作出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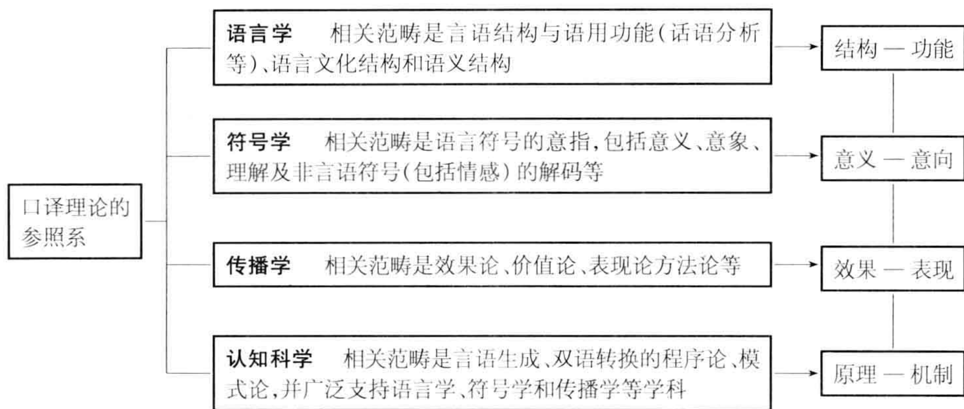
第四，积极清理我们自己的发展理念，端正对待西方学术和理论，尤其是端正对待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态度；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提倡创新，力戒盲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离不开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母体和特定国情的需要。对待外国的理论我们可以参照、借鉴，但不能抄袭、照搬，就是刘宓庆提出的“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中国的理论应该源自中华文化母体，紧贴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中国翻译理论界应该掌握理论话语的主导权和自主权。(贺爱军2007)

3. 口译理论

刘宓庆的专著《口笔译理论研究》(2004)以维特根施泰因的语言观为理论指导，以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以及认知科学为理论参照，按照“特征描写—机制描写—实施描写—效果描写”(刘宓庆2004：14)的程序模式探讨口译理论。

“口译行为是一种语际解释行为(explanatory act)，它的根据是原语的语言符号化表现，通过对语言符号化表现的解释获得对原语意义的理解。”(刘宓庆2004：2)

口译理论的参照系及基本格局见下图(刘宓庆2004：2)：



口译理论的参照系及基本格局

4. 翻译美学理论

刘宓庆师承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其研究对中国翻译理论的体系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既是对传统的传承,也是出于对现实的文化战略考量。翻译与美学结缘正是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

翻译美学的任务就是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包括对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与接受者的关系的研究,对翻译中审美体验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对翻译中审美再现手段及翻译美的标准的探讨,等等。……翻译的审美客体就是原文,判断原文审美价值的依据是原文的审美构成(aesthetic constitution)。原文的美学要素按其性质可以分成原文的美学表象要素以及非表象要素;翻译的审美主体就是译者,审美主体的审美条件是:文化素养、审美意识和审美经验;翻译中的审美体验一般遵循以下规律:审美态度(目的性、意向、观念)→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构成的认识→对审美认识的转化→对转化结果的加工→对加工结果的再现;翻译的审美标准具体是:必须确立翻译标准的相对性;必须确立翻译标准的时代性;必须确立翻译标准的社会性;必须确立翻译标准的依附性。(刘宓庆 2005a:242)

5. 译学比较研究

刘宓庆的《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兼顾历时观照与共时比较,立足于中西译学的对比研究。他在书中首倡"翻译研究师墨"的主张,其原因在于:墨家重用、重经验、重身体力行;墨子重知性思维、逻辑思维;重语言哲学探讨;重兼蓄包容;重艰苦自持、独立无畏。译界学人应该尽可能去发掘和重估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资源,肯定墨家的现代价值,重构中国译学传统。另一方面,他还系统总结了中国翻译传统和中国翻译理论的特色:

中国的翻译传统的四个特点:(一)文化战略考量;(二)"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三)关注意义,兼及审美;(四)强调悟性,强化主体。中国翻译理论独具特色,原因在于:(一)中国译论具有鲜明的地缘人文、地缘社会和地缘政治特色,以文化战略为第一考量;(二)中国翻译思想植根于丰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三)中国翻译理论有其独特的发展渊源、沿革和模式;(四)中国语言文字自成体系。(刘宓庆 2005b:43)

刘宓庆在该书中除了主张"师墨"和系统阐发中国翻译传统和中国翻译理论的特色以外,还对西方当代译论的源头、西方当代翻译思想及流派以及西方当代译论的局限性予以探究。

对西方当代翻译理论而言,这中间有三个时期最重要,这三个时期的人文思想和思潮,就成了它们的主要源头。第一个时期是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泛指古希腊文化的蔚兴期……第二个时期是现代主义。西方现代主义研究界认定以马克思致卢格的信(1843)作为现代主义之始,直到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为期整整一百年……第三个时期是后现代主义。西方后现代主义研究界认定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于法国的反传统思潮为肇始,以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和博德里拉德(J. Baudrillard)为代表。(刘宓庆 2005b:234)

刘宓庆认为以上三个"主义"是西方译论的源头,是当代西方各种翻译流派[语言、功能、释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此处主要指文论)、认知、心理、新直译论学派]的发源地。在把西方林林总总的翻译流派分成七个主要学派的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探讨了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的局限性:"一、'精神匮乏'即缺乏足以引导和支撑整个学科发展的导向理论或者说缺乏主导思想(学科理念和人文理想);二、忽视宏观的整体研究,只注意论题的精而微,以求新出奇为至上追求,导致学科整体性研究薄弱;三、因此不可避免地将意义边缘化、空洞化;四、由于只顾疏离传统,热衷于出奇制胜,并竭力向商业利益倾斜因而其主张及论述难免流于片面、武断、偏激,有不少浅薄之见,亦有仍自鸣得意者;五、理论话语缺乏理论应有的清晰性和深刻性;不少译论言不及义,品味不高,文风较俗;六、缺乏学术上健康批评和自我批评。"(刘宓庆 2005b)

刘宓庆非常注重整体性整合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功能主义翻译流派"的主张，该流派的基本主张和理论原则纲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坚持翻译的文化战略观，将翻译定位为兴邦振国和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不可或缺的战略武器；这不是口号而是我们的行为准则；第二，注重翻译基础研究和整体性整合研究，这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但以基础研究为第一位，以整体性整合研究为第二位，二者相济相融，相辅相成；第三，翻译基础研究中的主体是基本理论的发展研究，指汉外互译的意义理论、理解理论（文本理论）以及交流中话语传播和表现理论等；在翻译实务中强调"把握交流中的意义"；第四，注重汉外（不是"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树立"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原则，不能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第五，必须发展翻译美学，使翻译美学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组成部分；以欣畅的汉语作为主体的行文风格特征；第六，中国翻译理论的对策论核心思想是"代偿"（compensation redeem）而不是"对应"（equivalence），前者关注"以交流中的意义为核心"的语言功能的充分发挥，后者关注的则是语法形态（特别是句法结构）的两相（源语与目的语）对应；第七，具有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全局观，学习、借鉴外国实务和理论的优长，积极进行互动交流。（刘宓庆 2006）

（贺爱军）

孙致礼（1942～ ）

生于山东蓬莱，1960 年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1965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20 世纪 70～80 年代曾两度外出访学，进修英、美文学。在 40 余年的外语教学工作中，因成绩突出，多次立功受奖，1993 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4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现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导师组组长、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生指导教师。

孙致礼教学之余，已翻译了近 30 部英、美等国的文学作品，共计约 600 万字。其主要译作包括：奥斯丁（Austin）的六部小说《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爱玛》、《曼斯菲尔德庄园》、《劝导》、《诺桑觉寺》，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的《呼啸山庄》，哈代（Hardy）的《德伯维尔家的苔丝》，克莱恩（Crane）的《街头女郎玛吉》，豪威尔斯（Howells）的《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莫拉维亚（Moravia）的《罗马女人》，普佐（Puzo）的《末代教父》，科克（Cook）的《狮身人面像》，法因德（Finder）的《重罪》。孙致礼的译文既力求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意韵，又很注重文采，因而颇受读者青睐和好评，很多译作至今还在大陆和台湾等地一次次印刷。

从 1993 年起，他负责英语翻译专业的研究生教学工作，自此，他对翻译的关注，就从翻译实践转向翻译教学和对翻译理论的探索上。十多年来，他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完成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3 项，出版了《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译林出版社，1996）、《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译林出版社，1999）、《新编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等著作。20 世纪末，他应邀为《中国翻译》"自学之友"专栏做了两年半的撰稿人……以上种种，在我国外语教学界和翻译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他现兼任中国译协常务理事、翻译理论和教学委员会委员、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南省译协副会长，以及《中国翻译》、《译林》、《英语世界》等杂志编委。

孙致礼对翻译理论的建树，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一、他认为翻译理论的精髓是辩证法，文学翻译应全面贯彻对立统一原则。1993 年，他在《文学翻译应该贯彻对立统一原则》一文中，阐述了翻译辩证观的三个核心原则：第一，就翻译的实质而言，应辩证地处理好"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文学翻译是语言的再现艺术，这"再现艺术"四个字，恰好说明了文学翻译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它是艺术，另一方面，它又带有科学性。实践证明，缺乏艺术性的译作是没有感染力的，而不讲科学性的译作，则不是"再现"原作，而是歪曲原作，背叛原作；只有将艺术和科学熔为一炉，才算得上合格的翻译。第二，就翻译的标准而言，应辩证地处理好神似和形似的关系。神似和形似也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无论"重神轻形"，还是"重形轻神"，都有失偏颇。作为表达的出发点，译者切不可顾此失彼，而应在神似和形似之间全面权衡，尽量做出"神形皆似"的传译。第三，就翻译的方法而言，应辩证地处理好直译和意译的关系。一般说来，"神形皆似"的译文都是直译的结果。因此，就头脑酝酿表达的程序而言，应该先从直译试起。如果直译能够晓畅达意，则坚持直译；如果直译不能完成达意，则可采取一定的补偿措施；如果确实无法进行直译，则应知难而退，转而采取意译。1996 年，孙致礼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一文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翻译中的"十大关系"：一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辩证统一，二是保存"洋味"与避免"洋腔"的辩证统一，三是神似与形似的辩证统一，四是直译与意译的辩证统一，五是"克己"意识与"创造"意识的辩证统一，六是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的辩证统一，七是忠于作者与忠于读者的辩证统一，八是整体与细节的辩证统一，九是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一，十是得与失的辩证统一。此后，孙致礼又接连发表了《关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引导学生树立辩证的翻译观》、《译者的"克己"意识与"创造"意识》、《翻译的异化与归化》、《翻译与叛逆》等文，更加具体地阐述了他的辩证翻译观。他的这一系列论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4 年，Benjamins 翻译文库出版的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一书，全文收入了他的《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的英文译文。

二、他主张翻译要力求"文化传真"。1999 年，他在《文化与翻译》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这样一个观

点：进行文化交流是翻译的根本任务，"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意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的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特别不宜归化，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翻译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尽量保存原文所蕴涵的异域文化特色，简而言之，翻译要力求"文化传真"，避免"文化失真"。基于这一目标，译文应该是越异化越好；然而，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又不得不容许一定程度的归化。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好异化和归化的关系呢？他认为要遵循这样一条原则：文化上要尽量争取异化，尽量避免归化；文字上不得已进行归化时，也要以尽量不引起"文化归化"为前提。孙致礼的这一论点也在翻译理论界引起热烈的反响，不少学者在著述中加以借鉴和阐述。

三、他力主我国翻译界改变重归化轻异化的倾向，对异化译法给以足够的重视。他在《中国翻译》2002 年第一期和 2003 年第一期上，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文：《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表达了他的这一主张。在前一篇论文中，作者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对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翻译作一回顾，并对 21 世纪文学翻译策略的发展趋势加以展望。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的文学翻译除"五四"后十余年异化译法一度占上风外，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归化译法为主调。20 世纪最后 20 年，中国翻译界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异化译法开始受到重视。人们有理由相信：21 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进一步趋向异化译法，而这异化译法的核心，就是尽量传译原文的"异质因素"，具体说来，就是要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异语语言形式以及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后一篇论文从国际形势大发展趋势、我国的国情、国策以及文学翻译的基本使命，进一步分析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策略的可取性和可行性，着重指出异化译法的三大好处：一是可以更好地促进文化交流，增加中国读者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二是更能满足读者对翻译文学的审美期待，三是更有利于汉语的丰富和发展。作者最后表明，他所说的"异化为主、归化为辅"，是一个辩证统一概念，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译者应有"异化为主"的意识，在翻译实践中，但凡能异化的要尽量异化，不要一遇困难就轻易妥协，动不动拿归化来应对；二是还要有"归化为辅"的意识，实在不能异化时也不要勉为其难，弄巧成拙，而应退而采取归化处理。总之，驾驭两者关系的原则是：可能时尽量异化，必要时尽管归化，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的这些观点体现了对"他者"文化的尊重，因而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四、他呼吁我国翻译界关注翻译伦理问题。在《中国翻译》2007 年第 4 期上，他以"译者的职责"为题，借鉴切斯特曼（Chesterman）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结合中国的翻译实际，提出并阐述了五种翻译职责：再现原作，完成委托人的要求，符合目的语社会文化的规范，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恪守职业道德。这五项职责对译者形成了一个"张力网"，规范、制约、平衡着译者的翻译活动。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综合文本性质、翻译目的、社会文化规范、读者对象以及职业道德等因素，以此来决定自己的取舍、策略和方法。作者特别强调，译者应以伦理观念驾驭自己完成以上五项职责，具体说来，译者应以真善美为理想，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卓越为追求，才能更好地完成以上五项职责。

（易 文）

汪榕培（1942～ ）

上海人，1964 年上海外国语学院本科毕业，之后，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就读研究生，师从词典大师葛传椝。1967 年硕士毕业，1985 年晋升为英语教授。1985 年 6 月到 2001 年 9 月担任大连外国语学院院长。曾获政府特殊津贴、陈香梅教育奖励基金一等奖、辽宁省优秀专家、大连市优秀专家等奖励。现任大连大学特聘教授，兼任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校博士生导师。汪榕培发表论文 70 余篇、论译著 70 余部，主审《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等三十余部著作。出版的专著有：《实用英语词汇学》(1983)、《英语词汇学教程》(1997)、《英语词汇探胜》(1999)、《英语词汇学研究》(2000)、《八十年代国外语言学的新天地》(1992)、《九十年代国外语言学的新天地》(1997)、《比较与翻译》(1997)和《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2000)。近年来，汪榕培在中国古典文学英译和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先后出版了《老子》、《庄子》、《墨子》、《易经》、《诗经》、《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陶渊明集》、《牡丹亭》、《邯郸记》、《吴歌精华》、《评弹精华》、《昆曲精华》、《苏剧精华》等译著，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辽宁日报》、《大连日报》、《大连晚报》等报刊都曾发表通讯和报道，介绍他的事迹。

汪榕培属于典型的学者型翻译家，他译的大部分典籍距今年代久远，其意所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两千多年来，对其训诂解释，名目繁多。他从这纷繁复杂的语意当中，爬梳剔抉，把握真义。不但如此，他在翻译之前，还收集古今中外各种版本、诸家注释以及相关资料，比较和研究诸家译本的优劣得失。例如，汪榕培仔细比较研究了《庄子》的九种译本；《诗经》的十种译本，并且把《诗经》的十种译本归纳为五种类型："学者型、半形似型（韵体）、神似型（自由体）、半形似型（无韵体）、神形皆似型"（汪榕培 1997：79～80）；为了准确地翻译陶渊明的诗歌并撰写《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汪榕培到陶渊明的故乡江西省九江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拜谒了陶渊明的古墓，并费尽周折找到陶渊明的后裔，向他们了解陶渊明的另外一面；为了译好汤显祖的作品，在翻译《牡丹亭》之前，汪榕培奔赴汤显祖的故乡江西省抚州市进行实

地考察。《牡丹亭》出版之后，汪榕培还到浙江遂昌——汤显祖曾任知县的地方和南安——《牡丹亭》故事发生地，亲身感受体验；"在翻译《邯郸记》的时候，汪榕培于2001年9月和10月到河北省邯郸市和湖南省岳阳市进行实地考察。在探访了黄粱梦村和岳阳楼风采之后，汪榕培更走进了汤显祖，了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并为自己的翻译提供了感性认识。"(霍跃红 2005)值得一提的是，汪榕培虽然在翻译之前阅读了国内外的各种译本和注释，但是他并没有"依照某一个特定的版本或某派阐释，而是作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汪榕培 2007)汪榕培是国内一流的英语词汇学专家，其译文用词准确恰当，没有为了强求押韵而颠来倒去，因此读来通顺流畅，无佶屈聱牙之弊。比较而言，他的译本是非常适合普通读者的，也得到了译界的普遍承认，汪译七部作品因此入选了中国新闻出版署重点项目《大中华文库》。正如他所说："我们的译文不是以西方的学者或研究者为主要对象，而是以当代西方普通读者为对象……"(汪榕培 2007)

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汪榕培提出了"传神达意"的诗歌翻译标准。"要说我自己的翻译标准，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里写过，只有四个字——更确切地说，是一条四字成语——'传神达意'。关于这四个字还要两条注释。第一，'传神'就是传达原作的神情，包括形式(form)、语气(tone)、意象(image)、修辞(figures of speech)，等等；'达意'就是表达原作的意义，尤其是深层意义(deep meaning)，尽量照顾表层意义(surface meaning)。第二，这四个字不是并列结构('传神'和'达意'不是并重的)，而是偏正结构('传神'是'达意'的状语，即'传神地达意')。一首好的译诗首先要表达原作的基本意义，传神是在达意的基础上传神，是锦上添花，不达意则无神可传。"(汪榕培 1997：119)在汪译《诗经》被收入《大中华文库》即将出版之际，汪榕培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诗经〉的英译》一文，对"传神达意"的诗歌翻译标准作了进一步阐释："首先，'达意'是翻译的出发点，我们试图准确地体现自己对于诗篇的理解和阐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无达诂'的说法，与当代的'读者接受论'、'译者主体性'，乃至'解构主义'等观点有相通之处，我们在译文中就是要表现我们对诗篇内容的解读思路。"(汪榕培 2007)"其次，单纯的'达意'还不够，必须是'传神地达意'，因为'传神'是翻译文学作品，尤其是翻译诗歌的精髓。'传神'既包括传递外在的形式，也包括传递内在的意蕴。关于内在意蕴方面的'传神'，自然是从整个篇章出发，涉及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诗篇的背景、内涵、语气乃至关联和衔接等等。……从通过外在形式来'传神'的角度来看，只有以诗歌的形式来译诗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因为诗歌跟一般的叙事作品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主要功能不是表意的交际功能，而是表情的美学功能。诗歌的外在形式包括诗节、分行、节奏、韵律、意象等等，尽管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诗歌翻译的时候必然会失去某些原有的特点，但是完全可以通过补偿的方式使其获得新的生命。"(汪榕培 2007)

汪榕培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向西方译介中国典籍。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典籍英译之中，为在域外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完成了爱国主义的文化托命。他有感于典籍翻译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毅然担当起以"准确真实的本来面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他说："中国古典名著的英译本，多数是有英美译者完成的。他们的英文通顺流畅，但是由于中国古典名著的内容博大精深，社会文化内涵丰富，西方的译者往往抓不住原著的精髓，误译的地方较多。许多按字面意义翻译的'直译'使西方读者不知所云，许多未识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真面目的'意译'又使西方读者不得要旨。把中国传统文化以真实准确的本来面貌推向世界，反映当代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中国译者身上。"(汪榕培 1997：Ⅰ)"西方出版的《诗经》译本对于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诗歌的悠久传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些译本出版年代较远，未能体现《诗经》研究的最新成果，加上译者对于中国文化理解的局限、当时诗风的影响，未能完整地体现诗篇的真正内涵。我国译者有责任担当起重新翻译的任务，使英译的《诗经》能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内容、思想面貌和诗歌特色。"(汪榕培 2007)

(贺爱军)

张柏然(1943～)

江苏武进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专家特殊津贴获得者(1993年起)，于1966年南京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其间曾作为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比较文学和美国文明史。现兼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主任、全国辞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协会会长、教育部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还兼任《中国翻译》、《中国外语》、《译林》的编委以及《现代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的顾问，其主要研究领域是翻译学、词典学和语料库语言学。

张柏然主编《译学论集》、《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等论文集及"译学新论丛书"，翻译《人生的枷锁》、《死胡同》、《绿荫山强盗——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选》等英美文学作品，发表《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辨》、《翻译本体论断想》、《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全球化语境下的译学研究》、《翻译学的建设：传统的定位与选择》、《后殖民之后：翻译研究再思——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西方现代翻译学学派的理论偏向》等重要学术论文。其译学研究兴趣在于探讨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定位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古与今、中与西

的问题。他的主要译学观点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应立足传统和自身，放眼当代和西方，并坚持翻译本体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相结合、科学性和人文性相结合的原则。

张柏然早在1997年就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意识到翻译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他认为，构建中国翻译学要立足本位，也要参照外位，既要注重共性，也不能忽视特性。具体说来，构建中国翻译学要立足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从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现实出发，依据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描写翻译实践过程，展开翻译理论研究。要在全球化对话中建立中国译学理论体系，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结合当代学理，对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译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读”，从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中，迸发出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西方译论建基于西方语言文化之上，并不必然具有理论普适性。对待西方译论的正确态度是，结合中国译学研究成果和翻译现象，吸收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共性描述的合理部分，而非机械照搬和套用西方翻译理论模式。他提倡尊重不同翻译传统的差异性，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寻求普遍性，即从东、西方翻译理论中抽象出真正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翻译理论。他指出，中国翻译学和纯翻译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特殊性，后者是普遍性，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重视译论的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普遍性的诉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以对特殊性的牺牲为代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唯有立足民族语言、文化和翻译传统，同时参照和借鉴国外译论，超越非此即彼的东西文化冲突模式，努力发展自身，方能真正参与国际对话，为构建多元互补、平等和谐的世界文化景观作出应有的贡献。

他指出，构建“中国翻译学”，处理好翻译本体研究和外围研究的关系，既要坚持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也要保持译学研究的独立学科意识。翻译涉及文本、译者、读者三大关系，融合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审美心理等多种因素，是一门涉及多学科、具有多层面的综合性科学。建立翻译学就是要运用语言学、文化学、美学等学科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并从心理学、美学、哲学等角度对译者、读者加以认识。针对20世纪以来译学研究“(作)译者研究系列”“(作)译品研究系列”“读者研究系列”次第登场的静态分割这一问题，他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出发，指出翻译活动的存在使三大系列形成一个有机完整的翻译板块，认为翻译本体论的重建是把“活动”作为翻译生态的根本性存在，并以此出发形成丰富的“活动研究”系列。就翻译本体研究与文化研究而言，他主张从翻译本体纵观文化外围，再从文化外围透视翻译本体的交往互动研究。就翻译的跨学科性而言，他主张跨学科研究不能把翻译学的外延和边界无限模糊，导致消解翻译的本体研究。他以批判性的眼光指出，西方现代翻译的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各有其理论偏向：语言学翻译研究使翻译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由于该派或以翻译研究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研究自身的途径和手段，或在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关照下对翻译过程作静态的语言分析，过强的功利性容易造成翻译理论学科的消解；而文化翻译研究由于将翻译学与媒介学、文化学、比较文学等紧密相连，过于注重翻译研究的宏观和外围层面，使得翻译研究的结论是相关学科结论的验证或补充，导致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边界变得模糊。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西方译论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翻译学学科的良性发展必须既保持翻译本体的独立，又结合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

他主张，构建“中国翻译学”必须坚持科学化与人文性相结合的原则。对翻译的内在规律作抽象的、形式化的描写使翻译研究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同时，因为翻译是涵盖面极广的社会现象，对翻译的社会性、实践性和主体性的研究又使翻译研究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在翻译研究中，一方面应该警惕一味分化求细、忽视抽象和综合的科学化倾向。翻译研究中的语言是充满灵气和智慧的生命编码，翻译活动亦是跳动生命旋律的动态过程，背离翻译的人文性，必然会把翻译研究简单化。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用翻译研究的人文性来否定翻译研究的科学化。不能因为翻译研究的人文性而认定翻译研究中的随意性、重复性和低效劳动是合理的，也不能据此认为传统翻译研究的路子是至善至美的。要建立中国翻译学，必须坚持将二者统一起来。

张柏然同时也是我国知名的双语词典编纂家，在词典理论研究和词典编纂实践方面均有建树。在《双语词典(编纂)学刍论》、《语料库与双语词典编纂》及《论翻译学词典的特征与释义原则》等文章中，他十分强调双语词典编纂要有自主原创性，主张在汉语语言文化语境下编出适应英语学习者和工作者需求的英汉双语词典。他认为，仅仅跟在作为蓝本的英语单语词典的后面亦步亦趋是断乎不成的，唯有针对中国人学英语、用英语的特点，继承我国双语词典编纂的优秀传统，吸收国内外语言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分而大胆地借鉴他山之石，特别是借鉴发轫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英语学习词典的编纂经验，顺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辞书从“编者视角”向“读者视角”转换的大趋势，坚持独立研编的编纂方针才能有所作为。此外，他主张词典编纂要充分利用语料库，并身体力行，主持创建“南京大学英汉语料库”以及“英汉双语词典计算机编纂软件系统”。2004年他主编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正是这种理论认识的产物。这部英汉词典无论在词目的选择、释义、例证和现代英语实际运用的描述方面，还是在编纂手段的现代化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为当代英汉词典的编写提供了

典范。此外,他还先后主编出版了《英汉百科知识词典》、《当代英语口语词典》等。 (于德英,蒋林)

桂乾元(1943～)

德语教授。生于上海,1961年至1965年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学院(1995年起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德语系主任(1995～1996)。1983年10月至1985年6月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进修翻译理论并在该校汉学系教授汉语,1991年10月至1993年6月在瑞士伯尔尼大学进修翻译理论,并在瑞士洛桑大学作有关中国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状况的讲座,1997年10月至1999年7月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进修翻译理论,并在德国弗里堡大学汉学系教授汉语;2003年9月至2005年6月聘任为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德语系指导教授,2004年9月迄今聘任为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德语教授、德语专业主任,并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特聘编审。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会秘书长、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科院翻译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是德国翻译家协会和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桂乾元在翻译理论建设中的主要贡献有:

一、1986年他在《中国翻译》杂志上载文,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他认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翻译事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社会地位也与日俱增,进而促使翻译事业蓬勃发展。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既必要,又非常迫切。我国译界要在研究世界各国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体系。他把翻译学分为两大类:一般翻译学和特殊翻译学。他把一般翻译学又分为四个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关联的部分:一是基础翻译学(研究翻译本质、翻译标准、翻译过程、翻译基本功、翻译要素、翻译种类、翻译困难、翻译历史等涉及译者翻译工作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二是应用翻译学(研究翻译技巧、翻译错误、翻译工具书、翻译评论、文学翻译、诗歌翻译、科技翻译、机器翻译等涉及在翻译实践中应用基本翻译理论的问题);三是理论翻译学(研究翻译等值、翻译冒险、翻译创造、翻译界限、翻译超越、翻译单位、翻译美学、翻译未来等与翻译实践有一定距离,有的甚至似乎没有直接关联的,但对翻译工作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前瞻性的问题);四是发展翻译学(研究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推动翻译实践,推动翻译教学,推动翻译理论研究,促进翻译评论,促进翻译人才培养,促进我国翻译事业不断蓬勃发展)。所谓特殊翻译学,就是结合其他学科,比如语言学、修辞学、社会学等进行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的科学,也可以称之为边缘翻译学。他认为,中国翻译学的特色具体体现是:建立翻译学的根本宗旨,在于研究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促进中国翻译事业发展;要研究中国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史,向我国翻译先辈学习;要研究国外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的翻译学体系,结合中国国情学习借鉴、筛选提炼国外的翻译理论,既要研究指导性、超前性的翻译理论问题,更要研究紧密联系翻译实践的基本翻译理论问题;要用汉译外、外译汉的翻译实例阐述、论证有关翻译理论;要构建科学的、独立的中国翻译学体系。

二、1994年他在《外国语》杂志上发表论文,提出要正确认识翻译评论,要充分发挥翻译评论的推动促进作用,繁荣我国的翻译事业。首先,他对采用"翻译评论",而不用传统的"翻译批评"的概念或表述作了论述,接着对我国翻译评论现状作了四字概括:"少"(翻译评论数量少)、"偏"(指导思想有点偏)、"死"(评论方法比较死板)、"差"(翻译评论的效果差),并分析了其原因。随后,他对翻译评论的目的和功能,以及翻译评论的出发点和依据作了阐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论文中要求规范翻译评论的内容和模式,并列出了翻译评论的基本模式和原则性内容,尤其突出了对译文与原文的"三同"(即同值、同神、同效)分析和评述及举例论证的重要性。在文章中,他分析了造成翻译评论难的七大原因,还提出了翻译评论的方法——"八字四法",即"科学、求实、辩证、全面"和"仔细分析、以理服人、一分为二、理论结合实际"。最后,他呼吁大力加强我国的翻译评论。

三、1995年他在国际译联刊物 *BABEL* 上发表德语论文,提出了"翻译的本质是创造"的观点。他从翻译本身、翻译目的、翻译标准、翻译要求、翻译过程、翻译技巧和生活哲理等七个方面对其观点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并列举了大量德汉和汉德的翻译例句,阐述了该观点的实践依据。他还对科技翻译也需要翻译创造进行了分析论述,并对全面、正确认识"翻译的本质是创造"提出了四点意见:涉及翻译整体,译者必须并有权创造,翻译创造是有限制的,是对传统观念"翻译是雕虫小技"的反叛。其论文结语是:没有翻译创造,就谈不上翻译的艺术和乐趣,翻译工作也就会失去其生命力和吸引力。翻译创造看不见,摸不着,很难描写,似乎是很抽象的东西,但它存在于翻译过程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阶段之中。翻译工作每前进一步,每一个翻译困难的克服,每篇译作的成功,都需要翻译创造,都是翻译创造的结果。翻译创造是艰难困苦的,但也是有苦有甜的。有人愿意献身翻译事业,终生从事这一冒险的工作,就因为翻译需要创造,就因为翻译创造能展示创造才能,带来欢乐和满足。

四、1996年《外国语》杂志刊载了他的论文《翻译超越论评析》。文章针对某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名家"译作可以超越原作"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评析,提出了"译作不能超越原作"的相反见解,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翻译的本质不允许译作超越原作,译作也不能超越原作,翻译创造并不意味着翻译超越,译作读者多于原作读者并不意味着超越。最后,他指出,假如"翻译超越"就是"拔高""美化""雅化"原作,就是以"超越原作"为目的的"译者自我体现",那么,这样的"翻译超越"是不可取的,应予以否定的。翻译就是

翻译,是原作的艺术再现,不是凌驾于原作之上的"超越";翻译不需要"超越",翻译只需要"创造",艺术地再现原作的"创造",表达技巧的"创造",而不是任意发挥的"超越",不忠于原作的"超越";翻译讲究"同值""同神""同效",但不允许"喧宾夺主"式的"超越"。他断言,翻译中不存在"翻译超越",而只存在"超越翻译",即"创造性的翻译"。

桂乾元在翻译理论研究方法方面的理念是"三个坚持":

一、坚持"洋为中用,以我为主"——研究他人的理论是为了学习和借鉴,为了自己的理论研究,为了赶超他人的研究。

二、坚持"深入浅出,重在普及"——研究理论要有深度,但更要注重普及,不能神秘化、概念化、玄乎化。精深的理论要让"外行"也能看懂,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坚持"紧联实践,意在促进"——研究理论不能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促进翻译实践和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桂乾元在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1.《汉德翻译教程》(全国德语专业统编教材)(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2. *Praktische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mit chinesischen Prägungen und Übersetzungsbeispielen*,德语专著《实用翻译学》(德国斯图加特海因茨出版社,2000);3.《德语翻译入门》(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4.《翻译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桂乾元在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1.《为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而努力》(《中国翻译》,1986年第4期);2.《论翻译等值》(《外国语》,1991年第3期);3.《我国译学研究现状评析》(《语言与翻译》,1992年第1期);4.《翻译标准论》(载《日耳曼学论文集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5.《谈中国译学特色》(《外语与翻译》,1995年第3期);6. *Das Wesen des Übersetzens ist kreativ* (*BABEL*, 1995年第3期);7.《翻译的"黄灯特区"——诗歌翻译的界定认识》(《外语研究》,1995年第4期);8.《为翻译正名——兼论翻译的本质》(《语言与翻译》,1995年第4期);9.《翻译超越论评析》(《外国语》,1996年第5期);10. *On "Overstepping the Original" in Translation* (*BABEL*, 2000年第4期,合作)。

陈宏薇(1944～)

湖北武汉人。196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198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系作为访问学者进修一年,1993年晋升为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同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她从事英语专业本科和硕士教育42年,其中20余年从事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生的翻译教育,担任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委员(2003～2009)、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武汉译协副会长、湖北省译协常务理事、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武汉理工大学、三峡大学、黄冈师院、郧阳师范高等校客座教授。

陈宏薇已出版学术著作10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汉译英教程3本:《新实用汉译英教程》(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6/2000),《汉英翻译基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新编汉英翻译教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

陈宏薇一贯重视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1984年,她在《翻译教学的初步体会》一文中明确提出"重理论,在联系实际中讲深讲透;抓实践,在理论指导下抓细抓深"的教学原则。她也重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研究。1986年她应邀参加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举行的美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二十七届年会并宣读论文 *Cultural Barriers in Translation* (翻译中的文化障碍),获得与会者好评。该文收入大会论文集 *Building Bridges* (《架设桥梁》),由美国 Learned Information Inc. 于1986年出版。

正是因为认识到理论教育与文化教育对翻译教育的不可或缺性,陈宏薇对社会符号学和符号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努力将符号学与翻译学两门学科融合在一起,深化翻译研究的途径。她编著的《新实用汉译英教程》便是较为成功的尝试。该教程中她创造性地运用了社会符号学翻译法。该法源于美国翻译理论家、《圣经》翻译家奈达(Nida)创导的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融入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关于语言的社会符号性的理论,吸收了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Newmark)的语言功能六分法,结合对比语言学、语用学、篇章分析学、文体学、文化学、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从词、句、段、篇四个方面讨论了汉译英过程中正确理解与贴切表达原文的方法。符号学的观点是每个符号都具备功能和意义,她据此提出"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翻译标准,并将符号学意义观引入该教程。

据张美芳的问卷调查(回应者分布在全国71所大专院校),该教程在15种较受欢迎的翻译教材中名列第二,它获得读者好感的主要原因是:"1. 用社会符号学解释翻译,颇有时代气息,角度新,有独到见地。2. 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较好。3. 书中举例精当,文字明白晓畅,适用于教学。4. 编排结构好,内容丰富。"(张美芳 2001: 128)

1998年,陈宏薇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之邀,为21世纪英语学习丛书主编了一部《汉英翻译基础》。该教程通俗易懂的语言加大了理论对比的力度。她撰写的理论部分,首先通过译例将汉族心理文化与英美人心理文化、汉语语言文化与英语语言文化作为四个符号系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对比,以帮助读者掌握

西方思维方式和汉英两种语言的异同,有效地克服汉译英遣词、造句、谋篇过程中常遇到的障碍;接着介绍了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沿革以及运用该方法如何实现作者提出的翻译标准——“意义相符、功能相似”。该教程发挥了译学融汇百川的特点,融合多种学科的基础知识分析讲解译例,启迪读者思维。她坚信,用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研究学习翻译,有助于译者学会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处理信息;学会在宏观上把握原文的功能与意义,通过微观的理解与表达实现宏观的整体效果;学会把握整体,观照细部,处理细部,不忘整体的翻译方法,有效地提高翻译水平。

陈宏薇的教程不仅展现了她开阔的学术视野,也体现了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讲授翻译不仅要讲授语言和文化的异同与转换,更重要的是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教育学生用开放的心态在各种学科符号系统的网络中获取知识,在理论指导下努力实践,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陈宏薇一直在探讨在符号学与翻译研究的交界域构建翻译符号学理论,并已发表相关论文12篇。她认为,翻译研究天生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因为翻译是一种以意义转换为核心的交际活动,意义的表述除了自然语言,还有许多形式,它们受制于社会和文化因素,同一种意义表述形式在不同社会或文化中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因此,翻译理论不仅应研究语言意义的转换,还应研究其他表意方式所承载意义的转换以及转换的条件。她还认为,翻译研究本身的多学科性和复杂性,使其需要一种理论能有效地将各种学科研究有机地结合到翻译研究中。符号学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与相关理论的关系密切,而且具备串接多种理论的功能。若以符号学为基础,结合翻译学建立集成理论系统网络,一定能将翻译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她相信完全可以运用发展成熟的符号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构建一个多元理论系统,研究翻译的符号性、社会性、无限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特别应该研究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动物,如何在翻译活动中起作用。这种理论涵盖面宽,包容性强,可以研究翻译过程、翻译作品、翻译家、翻译批评、翻译史、翻译人才培养、翻译伦理以及翻译活动。它既能研究翻译的本体特征,又能研究翻译与影响翻译的一切社会因素的关系。翻译符号学理论既是翻译研究的一部分,也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它的创建是两门学科嫁接的硕果,为两门学科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它有助于我们避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偏差,有利于全方位、多视角、更深入地研究翻译这一社会现象,有助于将翻译研究与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多元符号系统联系起来,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 (陈浪)

范守义(1944~)

生于内蒙古包头。本科与研究生均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曾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1988.9~1989.9)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5.10~1996.10)进修。曾任外交学院英语系系主任(2000~2007)、教授。1998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和2004年北京市优秀教师,2006年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第五届中国译协理事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理论和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2003~2005;2005~2007)。研究兴趣主要在翻译理论方面,也从事美国华人英语文学作品研究和中英诗学对比研究。已发表论文及译作数十篇。理论专著《翻译研究:另类视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华裔美国作家英语名著系列丛书《通往金山之路》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范守义的主要论文收入《翻译研究:另类视野》中,分史论篇、理论篇、META理论篇、分析篇和书目篇。他在题解中特别提出“另类”有着推动和丰富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功能,是理论创新的动力。他强调跨学科研究对理论创新的好处。从他的论文构思、结构都能看出他的翻译思想的创新。

史论篇含三篇论文,大致贯串了中国翻译界古今译论的主要议题,同时也通过综述引出个人颇有见地的观点。《定名的历史沿革与名词术语翻译》一文从中国古代的翻译文论中选取“定名”或“名目”为主要内容,并将其置于现代语言学和翻译学研究框架中去审视不同历史时期对“定名”的不同看法和论述。《评翻译界五十年(1894~1948)的争论》是《中国翻译》1986年第1期刊登的第一篇文章。该文从近代众多的译论中,选取“信达雅”翻译标准、“直译和意译”翻译方法以及“雅”的风格三个主要命题,展开综述和评论,利用了当代语言学的原则,探讨了翻译界的主要论争。《走向科学: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1950~1992)》一文从纷繁的译论中,从传统话题方面(翻译标准、方法和定向分析)入手,考察引进西方新论后有何成果(文本结构,等值翻译,定量分析)。最后对翻译学的建设提出几点看法,提出了理论、技巧和百科三个维向的翻译理论构建的框架。

理论篇含四篇论文,是理论创新的重要部分。《概念、语义与翻译——翻译原则的认知心理学与语言学理据》一文综合使用了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以及逻辑学、认知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探讨“词、概念和语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与“语义三角形”理论不同的理论;构建“中心信息、附加信息和结构信息”的语义信息结构。对语义进行静态、动态描述,探讨语义调节和控制机制,描述了翻译过程中思维机制的功能。《模糊性:语义调节-控制与翻译的对策》一文进一步使用模糊学的原理和生理学原理对语义调节-控制机制进行描述,析出四种基本翻译模式;使用这一理论可以解释诸多模糊词语中英对译中的语言现象。《定名的认知语言学理据与名词术语翻译》是与《定名的历史沿革与名词术语翻译》同时构思的姊妹论文。在论文结构上相仿,是理论性探讨。探

讨人类对客体的观察、概念形成的机制以及定名的基本模式;对比中英名词术语对译时有哪些变异或无变异,从而导出他的"翻译对应论"的思想。《概念的定位:非典耶?萨斯耶?》试图使用"初级定名"和"次级定名"的概念,对一些有关呼吸系统疾病名称进行分类,从而确定"非典"和SARS都不是初级定名名称,而是次级定名名称,并且指出SARS不是疾病的常规名称,而是"症状集合",不妨称之为"准疾病"名称,它是比"非典"更为笼统的上义概念。文章建立了概念定位模型,有助于对疾病名称进行归类。结论是"非典"和SARS已经进入了汉语语汇,可以这样使用下去。

分析篇包括《关于〈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的文本对比研究》和《衔接与连贯:从源语到目的语——文本语言学与译文文本研究》两篇论文。前者使用语法学、句法学、词汇学、文体学的原理对两篇历史条约进行文本语言对比研究。对于进行国际条约制定和研究者有一定的帮助。后者使用语篇分析或文本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对 Watering Place 的两个中译文本进行对比分析。可以说是语言学知识和百科知识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应用;也从应用的角度说明,翻译的过程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作者还将格赖斯(Grice)的数量、质量、关联、方式的"合作准则"运用于对翻译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度"的把握,并增添了一个准则,即"贴切"准则。在此基础上,指出格赖斯的"合作原则"运用于翻译和翻译研究与信达雅有异曲同工之妙。

Meta 理论篇含《理论构建与论文写作——关于翻译研究的 Meta 理论思考》和《翻译理论与横断学科:新的途径——与〈现代翻译理论〉的作者商榷》两篇论文。Meta 理论是研究理论的理论,对于理论的构建起指导作用,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前一篇文章试图使用 Meta 理论的一般原则,对翻译理论的构建提出一些思考。第二篇论文是他在熟读刘宓庆作品和洪堡特(Humboldt)的《语言论》(刘宓庆的理论基础)数遍之后,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探讨刘宓庆理论的得失。该文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模糊集合理论、模型方法的视角进行翻译理论的跨学科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也是 Meta 理论的一种研究方法。

书目篇即《20世纪后半叶中国翻译教程和翻译研究著作出版状况》。文章列出了他用八年时间搜集的1 584条书目,为学者和研究生提供了截至2004年夏最全面的书目。

未收进《翻译研究:另类视野》一书的有他首先使用模糊数学的理论方法对译文进行评价的探索:《模糊数学与译文评价》(《中国翻译》,1987年第4期);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进修期间在 *Target* (1990:2:1)发表的 *A Statistical Method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在中英诗歌比较研究和翻译方面,他使用语言学上的音变理论,有效地揭示了中国诗学中"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格律诗诗诀。

谢天振(1944～)

1966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1982年获该校外国文学硕士学位。历任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等职,现任该校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暨翻译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中国翻译》编委,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暨翻译研究会会长,上海市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兼理论组组长,中国译协理事兼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翻译委员会委员。同时受聘为复旦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译介学方向),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外语学院、三峡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中国社科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顾问。自1986年起,先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翻译系、浸会大学英文系、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比较文学系、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等校高级访问学者,应邀出席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南非、巴西等国家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大会主题发言十余次,研究方向包括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译介学、中外翻译史和翻译理论。

谢天振是国内比较文学界最早关注翻译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是国内第一个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的学者。早在1989年第6期《上海文论》上,他就发表了《为"弃儿"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从翻译文学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和再创造角度论述了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明确提出翻译文学是国别(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澄清了国内长期以来把翻译文学等同于外国文学的认识误区。之后,他在1994年由台湾出版的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中,进一步从译作的国籍归属和原、译作之间的必然差异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史中的地位,引起海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谢天振对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的思考,以及他提出的"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2001年起出版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首次正式收入由他主编的"翻译文学卷"即是一个标志。在其学术专著《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中,他对上述问题作了更清晰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这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给予廓清。此后的两部专著《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合作)和《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与查明建合作),是他对翻译文学的理论认识的具体体现。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2006年国家社科项目课题指南把译介学研究列为外国文学专业的八大研究课题之一,国家"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06～2010)也把译介学列为重点研究课题之一。

谢天振还是国内较早地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

究的学者。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学界对翻译的认识和探讨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具体的语言文字转换层面,较多的是对翻译标准的探讨和译本优劣的比较。谢天振提出,翻译研究应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语言层面,在这个层面上研究翻译的本质、语言转换的机制和规律,研究翻译的标准、"怎么译"等问题;另一个层面是从文化层面上来研究,就是根据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质,探讨目的语文化对所译作品的"文化利用""文化过滤"等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为研究"为何译""译作的意义和影响""制约翻译的各种文化因素"等问题。从文化角度来研究翻译并不是否定从语言角度研究翻译的价值意义,而是对翻译研究的拓展,从而完善翻译学学科建设。谢天振的译介学研究契合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趋势,从20世纪我国文学翻译史的一些典型现象入手,开拓了我国翻译研究中一系列新的领域。如通过对特定时代文化语境的考察,探讨文学翻译择取倾向和翻译策略;通过不同译本的比较和译著序跋的研读,分析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时代文学观念、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制约和影响;从不同时代同一作家作品的翻译选择、翻译方式来探讨原作家和作品人物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形象变迁;等等。

谢天振是国内较早注意到当代西方翻译前沿理论的学者,也是最早论述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学者。他不仅早在1999年出版的《译介学》一书中就介绍了引发西方翻译理论界"文化转向"的"多元文化系统"理论,而且在之后几年中不断撰文针对多元系统论、解释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和流派在我国翻译理论界的接受情况作了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作了进一步梳理。他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并不仅仅在于介绍其主要观点,更重要的是探讨这些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翻译理论语境中的适用性,这使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研究者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

谢天振对我国翻译理论界的另一个贡献是对学科规范的重视。早在2001年,谢天振就针对我国翻译界和翻译理论界存在的认识误区撰写过专文论述。他敏锐地指出,我国翻译理论界主要存在着三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把"怎么译"的研究当成翻译研究的全部,二是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三是忽视中西翻译理论的互通性,惯于强调"自成体系"或"中国特色"。谢天振指出,只有通过真正学术层面上的翻译研究,通过严谨的理论层面上的阐发,翻译的性质才能被人们真正认识和理解,也只有这样,翻译才能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并获得它应有的地位。2004年,谢天振在将西方翻译界自20世纪50～60年代至今的最新进展总结为"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的基础上,又一次提出我国翻译理论界的"译学观念的现代化"问题,指出:当今翻译的文化语境和翻译的内涵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要求我国的翻译研究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正确处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从多角度探讨翻译的本质。在中国译学观念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该首先重估中国传统译学理论的价值,然后再考虑如何引入西方新的译学理论范式。他强调说,翻译学理论必然是开放性的,因此它必须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以拓展它的研究视野。他呼吁建立一支有独立译学理论意识、能全身心献身于中国译学学科建设的人才队伍。谢天振对翻译学学科地位和规范,以及对我国翻译学理论建设的重视与呼吁,引起了我国学界相关学者的强烈共鸣,促进了国内首个翻译学学位点的建立和发展。

谢天振的主要编、译、著作有:专著《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出版社,2003)、《译介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九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与查明建合作,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台北业强出版社,1994),论文集《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度翻译文学作品集《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每年一本,已出6本),译著《比较文学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当代名家小说译丛"(广东花城出版社,2000),以及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译作数种。 (丁欣)

吕俊(1946～)

生于河北省香河县,196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世纪90年代初曾被国家教委公派赴美国加州大学访学并讲学一年。归国后参加了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创建工作,并曾担任第二、三届副会长。现为该会常务理事及中国译协理事。任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等数所院校的兼职教授。

吕俊于1983年开始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教学,并同时开始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先后在外语类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翻译出版国外学术著作和外国文学作品五部,编写出版本科生使用的英汉教程两部,高等院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使用的英汉翻译教程一部。学术专著三部、个人论文集一部。

吕俊在研究中注重翻译学的学科结构,也重视个人知识结构的合理性,所以他的研究具有知识视阈宽广、系统性强的特点。他善于在译学的学科结构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努力寻求突破。他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将传播学的7W动态模式引入译学研究并将它作为翻译学学科的机体模式,从而打破长期以来只将翻译研究局限于文本之内与语言之中的静态格局。因此,他也将翻译活动定义为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播(communication)的活动。这7W即:1. 谁传播

(who says);2. 传播什么(say what);3. 通过什么渠道(in what channel);4. 向谁传播(to whom);5. 传播目的是什么(why);6. 在什么场合传播(where);7. 效果如何(with what effect)。这本是传播学的内容,但是经他改造后成为译学的动态模式,他据此将翻译学分为总体研究、本体研究、载体研究、客体研究、环境研究、主体研究、控制研究与效果研究等不同领域,这一成果集中在他与侯向群合著的高等院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之《英汉翻译教程》一书中。该书在国内影响甚广,成为国内高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学方向研究生的教材或必读书目。

二、他主张用学科学的理论指导翻译学的建立,并积极参与了2000年国内关于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大讨论。早在1997年,他就曾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学科学的角度谈翻译学的建立》的论文。这篇文章首次从学科学的理论角度讨论了翻译研究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依据与条件是什么,它的学科定位又是如何确定的,学科性质又是什么(如是系统学科、交叉学科还是综合学科等),在群体学科中的位置又怎样,等等。2001年又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对翻译学构建中几个问题的思考》的论文,重点指出在译学建构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他的这些观点对我国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

三、在国内率先以范式批评的方法展开译学理论发展动态模式的研究。他认为我国译学研究基本上是"问题式"的研究方法,但又不很符合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问题四段式的思想方式,而在范式批评(或范式革命)的研究方法方面,仍是一个空白区。他运用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革命的理论对我国译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译学理论的哲学基础、认识论基础、真理观、理性观、语言观的整体转换的情况论证了我国译学理论发展经过了传统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多元范式这三大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建构主义译学新范式,实现了译学理论发展的新突破。这几种范式的知识基础完全不同。例如,语文学范式的哲学观是直觉主义心灵哲学,理性观是神秘主义非理性,真理论为心灵真理,语言观为过程论语言观,认识观为主体维度的认识观;而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哲学观是认识论主体哲学,理性观是目的——工具理性,真理观为符合论真理,语言观为结构主义语言观,认识观为主——客体维度认识观;解构主义多元范式的哲学观为诠释哲学,理性观是反理性,真理观为存在主义真理观,语言观为本体论语言观,认识观为主——主维度认识观,而建构主义译学范式的哲学观为实践哲学,理性观为交往理性,真理观为共识性真理,语言观为行为论语言观,认识论为主-客-主维度的认识观。他的研究为我国译学理论的范式研究填补了空白,对译学理论发展的规律性有深刻的揭示性,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专著《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一书和《论学派与建构主义翻译学》与《范式批评与问题意识》等论文中。

四、首创建构主义译学范式。这是一个全新的译学范式,如前所述,它无论在哲学观、认识观、真理观、理性观甚至语言观上都不同于以往的译学思想,它是在反思与批判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译学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体现了当前世界学术发展的新思潮,建构主义翻译学有如下几个特点:1. 它认为翻译学同其他任何知识一样,都是一种社会、文化与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共同建构,它不是凭借一个事先设定了的理性标准,而是主体间不断协商与对话形成的共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向着一切可能开放,并在演进中通过实践逐步修正,因此它强调共识性真理观而不是符合论真理观。2. 强调社会交往中的理性,接受哈贝马斯(Habermas)提出的商谈伦理学的思想,并提出建立翻译伦理学的构想。3. 建构主义翻译学持客观相对主义立场而不是主观相对主义立场。相对主义意味着对绝对主义的弃绝。这说明建构主义翻译学既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译学那种客观决定论的绝对思想,也反对解构主义那种只强调主-主之间对话的意义任意生成,因为那是主观相对主义。4. 强调语言的媒介作用,认为它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联结的纽带。这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本体论语言学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或神秘领域,它把语言看成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采用日常语言与行为论语言观,所以既强调语言的构成规则,更强调言语的协调规则。5. 建构主义翻译学奠基于生活世界。因为生活世界是以人的意义与价值为目的的,在这种基础上的译学研究不会脱离服务于人与社会的终极目的,另外,认为生活世界是自明性的,或明证性的,它可以把文本中的各种意义在生活世界得到检验。这是与其他范式的译学研究很不相同的。他的建构主义翻译学思想主要见诸与侯向群合著的《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及他撰写的一些论文。

五、首次提出翻译批评学的理论。在完成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理论论述之后,他又针对翻译学的批评问题作了理论探讨,提出了建立翻译批评学的思想,他区分了翻译批评与翻译批评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他指出,翻译批评是实践指向的,是对翻译具体问题或现象进行批评的,所以是应用性的,具体性的,是以特定译文文本为客体对象的。它是以翻译理论为指导的。而翻译批评学则是对翻译批评的批评,对现有翻译理论的批评,因此是理论指向的,它是整体性的或总体性的,它的客体对象不是一些具体翻译现象,更不是个别文本与字句,而是翻译活动的总体,包括翻译批评的依据,它的理论指导是评价理论,而评价理论是价值哲学的一部分,因此,它是以价值哲学为理论指导的。这些思想主要见于他2005年至2007年发表的文章以及2009年出版的专著《翻译批评学

引论》。

吕俊的代表性著作有：高等院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之《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导文库,《吕俊译学选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代表性译著有：《释梦》(长春出版社,2004)；《马拉默德短篇小说集》(译林出版社,2003)。

李运兴(1946～　)

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基础课部英语师资班,1979年考入天津师范学院外文系研究生班,1983年获南开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天津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教授。担任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编委、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客座教授以及天津电视台译审。

李运兴在30余年的高校教学和科研中,一直致力于将语篇语言学、语用学等语言学领域的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运用到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探索建立翻译研究中的语篇描写模式。近年来尤将文化学派的有关研究成果融入自己的研究,探索建立翻译语境描写模式,以期在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间建立沟通界面,进一步揭示语境诸因素的语篇体现和与语篇构建的互动机制。

李运兴认为,现代翻译研究的发展走的是一条移植相关学科理论模式或概念的路子,因此很注意研究跨学科移植规律。他指出,现代翻译学的知识积累呈现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新理论的提出往往不是建立在同行学者们的著述之上,而是移植自相关学科;因此,翻译研究必须强化对植入理论的深化研究,使植入的理论或其变体进一步顺应翻译研究的实际,使移植自不同领域的研究模式相互融合,最终形成自成一体的研究领域。我国的翻译研究必须进一步贴近包括汉语在内的语言对组的翻译实际,合理挖掘我国固有的翻译理念。只有如此才能提出以汉外互译语料为基础的、对翻译事件有揭示力的理论模式。

他指出,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可以有三种模式。一是某某理论和翻译研究,简写成 X ‖ TS (X＝供体理论;TS＝翻译研究);二是翻译研究中的某某理论,简写成 X}TS;三是将某某理论融入翻译研究,简写为 $TS_{[x]}$。X ‖ TS 的目的是检验供体学科的可应用性和可操作性。这类研究中,植入理论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状态,即原有概念、定义、范畴等基本保持不变,是供体理论的应用领域。X}TS 模式所植入的概念或模式往往针对解释翻译现象的需要经历一些变通。这种移植可为翻译研究提供有用的理论工具,是跨学科移植的起始阶段。$TS_{[x]}$ 模式将翻译研究整体理论框架的确立看做最终目标,因此注意被移植理论概念间的变通和整合,重视实际翻译语料分析对理论的选择和筛选作用,这种模式应该是建立自立的翻译研究体系的希望所在。包括语言学在内的相关学科不是,也永远不会是,翻译研究的全部,只有翻译学者——而不是其他学科的学者——才能决定所移植的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

李运兴重视现代翻译研究发展史,从"途径和模式"的视角进行了思考和概括,认为语言学派注重的是作为语际交际的信息载体的语篇,而文化学派则突显了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事件的属性。它们各自偏重于翻译活动的一个层面,移植不同的供体学科的相关理论。这两种移植趋势应该在发展中相互借鉴、丰富,而不应各行其是,分道扬镳。只关注语篇本身的翻译研究是不充分的,而对翻译现象的文化思考也必然会回映到语篇特征上来,没有对语篇的观察和描写,文化思考会成为无皮之毛。有人认为语言学理论的移植在近十几年中已渐衰落,已经被文化学、文学,乃至人类学、阐释学的移植取而代之——这种认识将同一学科领域中不同研究范畴的发展误认为是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历时更迭,未能从学科体系的角度理清其中的发展脉络,认清其中的联系。

准确地说,翻译研究在整体定向范式(orientation paradigm)上并未发生"文化转向"。事实是,文化派开辟了一个新的与语言学派的针对产品的研究平行发展的描写范畴。它从一开始就体现出明确的针对功能的研究倾向,属于所谓"社会翻译研究"(socio-translation studies)。它丰富和充实了翻译描写的内容,但绝不是语言学派的后续或更高发展阶段。另一个事实是,在"文化转向"发生后,语言学诸领域的最新发现继续被植入语言学派的研究中,语言学派仍在按自己的轨迹发展。如果说发生了什么转向的话,应该说:随着有关语言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对翻译活动认识的深化,静态的结构主义的对比语言学方法让位于体系明确、强调语篇与语境关系的动态的语用学、语篇语言学理论;关注的焦点从对等、转换转向了语篇功能、语篇类型、语域等更具系统性的特征。语言学途径的这种语篇转向,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严格地说,在90年代才有了明确的发展,其标志为哈蒂姆(Hatim)和梅森(Mason)于1990发表的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李运兴对语言学途径在经历了语篇转向之后的发展也进行了思考。以"语境张力"为视角的回顾表明,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学途径经历的是一条不断语境化的过程,这也是它今后发展的主动力。关键是要构建这样一个语篇分析框架,它既能对语篇进行有效的结构分析,又能在需要的时候系统和充分地反映出语篇特点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要促进语言学途径的深化和发展,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第一,继续致力于语篇分析,分析的工具应不局限于语篇语言学,还应吸收语用学、叙事学和文体学的有益成分,使对语篇的观察和认识更系统化和更具揭示力。第二,更重要的是,必须将语篇分析置于更宽泛的语境之中,使历时和共时的社会文化因素、语篇使

用者和语篇的构建之间产生合理的、更具解释性的分析界面。这就是语言学途径今后的取向，简称语境转向。为此李运兴移植语用学和语篇语言学的相关概念，提出了翻译语境的概念，并初步建立了翻译语境描写框架。他指出，语境转向不是向文化学途径的趋同，语言学途径将仍然是它自己，语境转向是它自身发展的必然。语言学派对意识形态等文化派的立论主题的关注自有其独特的角度与日程，它更注重语篇分析的体系性和语境化；它的分析往往比文化派"更为细致、多样"(Baker 2001：23)；它强调语篇体系的自身运作规律，而不一定刻意突显"译者有意而为的操控"(Baker 2001：23)，因为译者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接力者，其认知过程的可见性程度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存在差别的。

语境转向不再寻求一个翻译研究的综合模式，而是一个语言学途径和文化学途径共存、互动的研究范式。

对于文化学途径的各种理论而言，由于它们的理论中并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语境框架，语境在它们的论述中更多的是一个不证自明、天经地义的笼而统之的概念。他们的理论发展进程中也没有经历像语言学途径那样的语境化的过程，而是一开始就从语境因素入手的。所以文化学途径要和语言学途径互容、互动的关键就在于，它必须将自己的研究明确纳入一个语境框架，明确认可语篇层次的存在，明确认识到语篇本身也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在翻译过程中和其他系统和子系统是互动的，这样它就能对语言学途径所提供的语篇分析模式有所借鉴，进而乐于借鉴，直到系统互动，使其研究范式中已有的某些对语篇分析的关注系统化，体系化。于是两大流派就找到了共同的领域。

李运兴将理论研究的成果运用于翻译教学，形成了语篇翻译教学体系。具体内涵是：1. 将译者的视野从字句扩展到句群、篇章等大于句的单位。突显不同语言级层上翻译操作的特点。强调篇章——一项翻译任务所处理的语篇整体——是翻译操作的最终决策级层。2. 语篇类型、交际功能与翻译策略、方法密切相关。3. 语篇在一定的语境中发挥交际功能。翻译操作必须考虑翻译活动发生时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他认为，技能教学中的理论成分不应呈系统态势，而应是要点式、问题解决式的。也就是一条"从实际问题出发—— 寻求理论指导—— 制定教学指导原则"的始于实践又终于实践的路径；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制定指导原则，然后用于教学实践的演绎路径。教师的理论素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不懂理论的教师不是合格的教师，只能停留在师徒相传的经验加实践的层次上。

李运兴还认为，汉译英教学应有别于英译汉。这两类翻译活动的区别决不单单是一个方向相反的问题。他将互文性原则运用于汉译英教学，提出汉译英要以英语阅读为先导，因为译文最终将在同一/相似类型的译语语篇世界中运作，阅读此类译语语篇有助于学习者在翻译实践中摸索和确立自己应遵循的目的语之语言、语体和语用规范。

李运兴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40 篇。编著有：《语篇翻译引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英汉语篇翻译——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汉英翻译教程》(新华出版社，2006)。另有译著 100 万字。

(永琴)

廖七一(1950～)

生于四川重庆。四川外语学院教授，重庆市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外国语文研究中心翻译研究所所长、四川外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曾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获四川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1989 年至 1990 年赴美国弗吉尼亚东门诺大学、印第安纳戈申学院访学，1999 年至 2000 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系访学。

1985 年研究生毕业后执教于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曾任英语系副主任、主任，四川外语学院副院长。曾兼任教育部第二届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重庆市第一届、第二届学位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译协理事、专家会员、中国英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理事、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外国语言文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重庆市翻译学会会长、重庆市高校教师外语学科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广西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专家特殊津贴。

廖七一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英美文学、文学社科翻译到翻译研究三个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从事美国犹太文学研究，从神话和原型批评分析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 · 贝娄(Bellow)的小说《奥吉 · 玛琪历险记》，并旁涉文学和学术著作翻译与跨文化研究。翻译了《裸猿》(人类学著作，合译，天津百花出版社，1987)、《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中国学汉译名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女巫的扫帚》(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性学总览》(合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哲学、数学、文学》(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伯特兰 · 罗素卷，合译，漓江出版社，1992)、《在美国》(译林出版社，2003)等，以及科技文献资料 300 余万字。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转向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方译论的译介，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与方法论研究。

廖七一(2000：6)认为，既然翻译是人类普遍的文化交流活动，必然有其共性或规律，他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跟踪和译介西方翻译理论的前沿成果。研究对象包括奈达(Nida)、纽马克(Newmark)、威尔

斯(Wills)、卡特福德(Catford)、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费道罗夫(Фёдоров)、科米萨罗夫(Комиссаров)和穆南(Mounin)等,涉及根茨勒(Gentzler)提出的五大翻译流派,动态对等、语义翻译、交际翻译,以及翻译与信息论等。其中《论翻译中的冗余信息》(《外国语》,1996年第6期)获重庆市第一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跨学科综合、文化回归、多元互补——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外国语》1998年,第5期)获重庆市第二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系原四川省教委重点社科项目。许钧在序言中称此书是“我国学者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第一部系统的研究著作……为我国翻译教学提供珍贵的资料,为研究者拓展新的思路”。

1999年至2000年赴英国学习期间,与纽马克(Newmark)、哈蒂姆(Hatim)、梅森(Mason)、赫曼斯(Hermans)、巴斯内特(Bassnett)、贝克(Baker)和马尔姆克亚(Malmkjær)等多位著名翻译理论家广泛联系,完成教育部优秀教师基金研究课题子项目《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详细分析介绍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翻译思潮,如诠释学翻译理论、语言学翻译理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心理语言学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文化翻译研究、多元系统和语料库研究。上述两部著作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国外翻译研究成果的尝试,被多所院校指定为研究生必读书或教材。此外,《语料库与翻译研究》、《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翻译规范与研究途径》等专题论文,从多角度分析阐述西方翻译思潮与研究方法。廖七一认为,当代翻译理论呈现出多元互补的态势;理论只是研究翻译现象的工具,是一种话语构建;每一种理论都有特定的适用领域和盲区,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无法证伪的理论。

廖七一认为,纯粹的理论译介只能使我们永远在西方后面爬行,翻译研究的终极对象应该是翻译与翻译活动本身;用西方主流的研究范式考察中国特有的翻译现象才能产生有原创性的成果,才能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2001年以后研究重心转向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重庆市教委重点社科项目《胡适诗歌翻译研究》从文化转型、时代精神、多元系统与经典建构等不同视角系统研究五四前后的诗歌翻译,探讨翻译与中国文化、中国的文艺复兴、白话运动,以及与新诗的草创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上海《文景》杂志曾以《国内文学翻译的一大突破》为题,发表长篇书评,称《胡适诗歌翻译研究》的“意义决不简单地在于‘补白’”,而且将翻译研究提高到“广阔的文化研究层面”,并“为国内比较文学界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个案研究的范例”(谢天振 2005)。

廖七一主持的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五四前后文学规范研究》则聚焦于晚清到五四短短二十年间中国文学翻译时尚与潮流的转变,从社会规范理论与社会话语理论的视角考察翻译规范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互动,影响方式与影响渠道,强调规范在驱动与制约翻译活动的同时,翻译活动也能动地建构、消解、强化或弱化翻译规范。以《论马君武译〈哀希腊歌〉中的“讹”》(《中国翻译》,2006年第4期)、《梁启超与〈哀希腊〉的本土化》(《外语研究》,2006年第3期)、《现代诗歌翻译的“独行之士”——论苏曼殊译诗中的“晦”与价值取向》(《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1期)等为代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应用了较新的研究视角,发掘了新的材料,而且超越了将规范视为社会既定事实的简单思维模式,提出了理论和规范的建构性,探讨规范的生成机制。

廖七一积极参与和推动翻译学科的发展,更新翻译研究观念与方法,提出中国译学应该扩大视阈、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使研究方法客观科学化(廖七一 2001);认为国内学科体制上的缺陷严重制约了译学的发展,使翻译研究缺乏跨学科的横向扩展,缺少具有原创性、能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的研究成果(廖七一 2004)。在研究方法上“满足于诠释与跟踪,因袭多而创新少,证实多而证伪少;守护多而诘问和质疑少”(廖七一 2006)。在系统分析2005年中国翻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照霍姆斯(Holmes)的学科结构,提出中国译学学科体制有待完善、国外翻译理论的研究有待深入、创新和学派意识有待加强、研究方法有待更新(廖七一 2008: 139)。

他已出版专著、编著、译著16部,发表论文80余篇,不少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和参与了多项省部级和国家项目,《胡适诗歌翻译研究》、《跨学科综合、文化回归、多元互补——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加拿大百科全书》等成果获重庆市优秀成果奖。

辜正坤(1951～)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4)“诗歌鉴赏五象美与翻译标准系统论”主持人;现国家社会科学“十五”重点科研课题“外国古代神话和史诗研究”项目主持人。历任北京大学文化文学与翻译研究学会会长,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法中文化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理事,美国国际名人传记研究院顾问等。曾为美国瓦西塔大学师生讲授道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两个学期。曾任联合国教科文总部文化翻译。在国内外共发表著、译、编、校著作47种(部),论文100余篇。同时发表创作水墨国画9幅(并获奖)。可阅读英语、法语、古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日语及世界语文献。其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下面十个方面:

1. 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首次在中国翻译理论界提出并建立起系统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1)翻译标准是一个由一元抽象标准和多元具体标准构成的标准系统:绝对标准(原作)——最高标准(最佳近似于原作)——具体标准(多元分类标准);(2)具体

翻译标准多元化的根源在于读者、译者文化素养、审美心理及其他功利性目的的多样化以及翻译的多功能;(3) 具体翻译标准群中又有主、次标准之别,但这种主次的划分是相对的,是依据不同的时代、地点、主体的需要而发生变化的;(4) 多元具体标准是互补的,一个翻译标准所具有的优点正是其他翻译标准所具有的缺点,各式各样的标准代表了译作价值的各个方面;(5) 多元化的翻译标准因之可以满足人类对译作的多元化需求。该标准打破了两千年来译学界对一元标准的追求。

2. 诗歌可译不可译问题。首次把诗歌翻译可分为全可译、大半可译、小半可译、不可译等诸种因素,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从而解决了这一争议颇久的难题。全可译因素包括诗歌的行数,一些等值词汇、短语等,某些人名地名(音译法),基本情节(叙事诗),一些句法结构及诗的基本思想等。半可译因素包括很大一部分词汇、短语、句法形式、修辞手法、文体风格等。不可译因素包括韵律、节奏、音节发音、特殊的修辞手法等。也就是凡属于语言本身的固有的属性(区别于他种语言)的东西往往都不可译。他认为,以符号学的观点来看,那部分仅仅依赖符号本身的结构才能产生艺术效果的东西往往是不可译的。

3. 增色-减色翻译原理。首次论述其基本原理为:汉语是描写性特强的语言;英语是逻辑性特强的语言。相对说来,汉语多华丽修饰语,而印欧语要少得多。译者可根据原作品和译语作品所处时代、区域、读者对象、翻译目的、审美需求等若干因素,灵活地采取使目的语更加生动、富于文采的译法。英译汉——简→繁。归化还原增色法可近似程度地将英语的本色罩上汉语的浓妆。汉译英——繁→简。归化还原减色法可近似程度地将汉语的华丽色彩淡化为英语的本色。这一方法主要可不同程度地适用于外汉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

4. 玄翻译学原理。首次在国际翻译界提出玄翻译学理论。这是一种翻译哲学,即译理之理。玄翻译学并非实用性理论,而是建构翻译理论的"前导研究"(metaphysical),其用途是解释、评价或解构一般的翻译理论或观点,其要旨在阐明厘定译学术语、创建翻译理论时所采取的步骤与遵从的规则。玄翻译学关注的不是要说明什么而是如何说明。在玄翻译学中,对翻译本质、翻译理论术语的厘定、翻译批评的标准、创建翻译理论的可能性、翻译论者应遵守的前导原则、翻译理论评价机制、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译者与译文的关系、翻译与社会、文化、经济及个人因素的关系及其他要素进行了阐述。

5. 翻译容错率问题研究。首次提出翻译容错率论。容错率是一个衡量错误或误差的容忍程度的指标。在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应容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犯错误,不能求全责备。但同时,应要求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把其错误尽量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或最合情理的程度,即错误量或错误比例应该是在可容忍的限度内。这样的可容忍的限度或比例称之为翻译容错率。在通常情况下,文学翻译的容错率应该大于非文学翻译的容错率。或者说,情感性文本翻译的容错率大于理智性文本翻译的容错率。

6. 筛选重译论。首次提出合法抄袭概念。主张合理利用一切已经产生的译本,去粗取精,并注入新的更好的表达方法,最终合成翻译出最佳度近似于原作的译作。筛选是指:(1) 筛选值得重译的作品;(2) 筛选旧译的长处(如好的句子、好的风格、好的处理技巧,等等)。重译指的是在旧译基础上再次或多次翻译某一作品。并建议在制定相关的翻译作品权益的著作权法方面兼顾继承旧译的精华又鼓励后来译者的创新。筛选重译会最大限度地促进翻译业的发达,尤其是促进翻译作品质量的稳步递增。他并且把这种思想扩大到认为整个人类文化其实也是以此种方式积淀发展的。

7. 翻译与人格理论。首次论证翻译批评受制于批评者的个性与道德水平。指出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批评家的性格、个性或者说气质之类对他们的理论倾向、理论接受、理论建构及批评取向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有时甚至有着强有力的制约关系。从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信奉什么样的理论即可看出这个人在特定的时期内是什么样的人。同理,从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信奉什么样的翻译理论即能推知该学者在特定时期内的个性。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其理论意义绝不只限于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而是不同程度地适用于解释一切理论和理论批评行为的成因。

8. 翻译体系与语言文化的关系。立足于中国传统,针对翻译界现状,分析比较中西文化异同,从他建立的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出发,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体系框架。用平行的文字可表述为:翻译学:玄翻译理论←元翻译理论(翻译理论、翻译技巧论、翻译批评等)→泛翻译理论。玄翻译理论是翻译理论的理论。元翻译理论指本体翻译理论。泛翻译理论指的是非本体翻译理论,多半涉及翻译与其他学科或领域的关系,不是纯粹的翻译理论,往往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领域交叉。

9. 超过原作的译作不一定就是最佳译作。他认为端正翻译风气不应鼓励译作超过原作。如果把拙劣的原作过分美化,是对原作者的嘲弄,对读者的欺骗。超过的部分,属于译者而不属于原作者,其译作一方面增大了有效的文化信息量,另一方面却又阻碍了读者对原作真面目的认识。这种方法可与其他种种方法并存,并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适当鼓励它,但通常不应过分抬高其价值。

10. 翻译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他认为对于机器才能完成的翻译活动来说,翻译行为是科学性行为;但对于需要大量地用人脑来完成的翻译工作,如高级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翻译行为来说,翻译又是艺术。说翻译是科学或艺术都是相对正确的,关键在于弄清"翻译"二字有时指行为、有时指作品、有时指

翻译家，人们应该用不同的概念站在认识坐标系统的某一点来作出具体衡量。

辜正坤著、译、校、编著作47种，代表性专著有：《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译学津原》（文心出版社，2005）；《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莎士比亚研究》（英文，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古希腊文学史》、《莎士比亚概论》（参阅《欧洲文学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9）。译著有：《毛泽东诗词》（英汉对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老子道德经》（汉英对照，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英汉对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译林出版社，1997）；《元曲150首》（汉英对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易经译注》（汉英对照，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编著有：《世界诗歌鉴赏大典》（主编，上下卷，台湾地球出版社，1992）；《世界名诗鉴赏词典》（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国际翻译学新探》（国际翻译名家论文集，执行主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姜莉）

杨晓荣（1952～ ）

1977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英语专业，1988年毕业于上海海运学院外语系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至2003年在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大学翻译暨跨文化研究中心访学。现为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协会专家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外语研究》主编，《上海翻译》编委。

杨晓荣长期以来致力于翻译批评理论和翻译教学研究，前者主要集中于翻译批评基础理论和翻译标准研究，后者重点是汉译英原理及其教学实践。

杨晓荣翻译批评理论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其代表性著作《翻译批评导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和此书出版前后她发表的下列著述中：《二元对立与第三种状态——对翻译标准问题的哲学思考》（《外国语》，1999年第3期）、《翻译标准的依据条件》（《外国语》，2001年第4期）、《翻译标准制约因素分析》（《外国语》，2004年第6期）、《翻译层次说评述兼谈翻译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外国语言文学》，2004年第2期）、《翻译批评标准的传统思路和现代视野》（《中国翻译》，2001年第6期）和《关于翻译批评的主体》（《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杨晓荣的主要理论贡献如下：

一、在国内第一次全面整理翻译批评基本理论，廓清与翻译批评有关的各种基本概念，梳理其基本原则、主要方法，使之形成一定的体系，为建立本体论意义上的翻译批评基础理论作了开创性的工作。这些基本概念包括翻译批评的定义、性质、种类，翻译批评的主体、客体、参照系，翻译批评的目的、功能、意义以及基于其上的基本原则，翻译批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等等。

二、提出翻译批评理性化的主张，并深入探讨了理性化的实现途径。感性化批评和理性化批评各有其优势及适用范围，我国翻译批评的问题是感性化已成习惯而理性化批评严重欠缺，因此影响了翻译批评的社会效应。理性化批评的主要体现之一是注重论证过程，方法论意识即是解决论证问题的关键。翻译批评方法论的内容依层次可以分为具体的操作方法（如共时或历时的译本比较）、学科性方法（体现某一学科特点的理论途径或多学科、跨学科综合性理论途径）和思想方法（哲学性质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如翻译观、翻译标准观、翻译主体观，等等）。

三、对翻译批评理论的核心领域翻译批评标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索，包括对传统标准的清理，对当代新观念影响的清理，以及从实践出发对翻译批评标准的直接观察。她从哲学角度对翻译批评标准进行的研究，重视摆脱翻译标准研究中的两极化倾向，突破了二元对立的传统思路，重视相关因素对翻译标准及翻译批评标准的制约作用，为后来的研究者开阔了视野。她的主要观点是：事物的常态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极端，而是一种和各相关因素协调得恰到好处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可以暂称为“第三种状态”；翻译标准问题也是如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一般并不会在贴近原文和考虑读者接受这二者之间走极端，而是力求能根据翻译目的、作品性质、接受者状况等要求，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背景知识，在特定时代和社会因素的限定下，协调各方关系，选择最合适的译法，使译文达到一个尽可能较好地满足各方要求的状态。根据这个思想，翻译标准不是一个单向度静态的概念，而要依具体翻译行为的具体条件而定。翻译批评标准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四、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与翻译标准有关的哲学观念、观点等作了整理，归纳为四论，即翻译标准的中和之论、辩证之论、多维动态之论、实践之论。从理论来源上看，这四论里既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古典哲学思想的影响，也有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在哲学层面上探索翻译标准问题的努力及其成果。

杨晓荣的另一本专著《小说翻译中的异域文化特色问题》（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孕育了其对翻译标准问题的理论思考。该书提出的文化对等和文化可接受性这两个互补性的原则，以及一些具体的分析和说明，至今仍有较高价值，在实践中也具有可操作性。

（舞阳）

谭载喜（1953～ ）

翻译学教授、香港浸会大学驻校学者、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山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译协翻译教学与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翻

译》编委会委员、"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翻译学丛书编委会委员等。1975 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英文系,1981 年获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普通与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方向)硕士学位,1999 年取得该校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方向)博士学位。专著包括:《西方翻译简史(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2006)、《翻译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2005)、《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2001)、《跨语交际》(漓江出版社,1993)、《新编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2001)、《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1991/2000)等。译著包括:《汤姆·索亚出国旅行记》(湖南少儿出版社,1983)、《幸运的吉姆》(笔名:谭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998 年入选"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译林出版社再版)、《翻译研究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编写 *English Course*(《英语教程》合编,1987)、*Conversational English 365*(《英语口语一日一题》,合编,香港版:1996/1998;内地版:1999/2000;台湾修订版:2000/2002)等教材。《中国翻译词典》(林煌天主编,1997)主要词条纂写人之一,并为《中国译学大辞典》(方梦之主编,2011)供稿;参与《翻译学概论》(许钧,穆雷主编,2009)重要章节编写;所撰作品被收入《翻译文化史》(王克非 1997)、《译学英华:宋淇翻译研究论文奖 1999～2004 文集》(孔慧怡编,2005)、《翻译新焦点》(刘靖之主编,2003)、《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张柏然,许钧主编,2002)、《译学新探》(杨自俭主编,2002)等十多部译学著作与文集。发表论文 80 多篇。现从以下六个方面,对谭载喜的翻译思想和观点作一总体描述和评价。

1. 提出作为独立学科发展的翻译学思想。继董秋斯(1951)论翻译理论的建设后,谭载喜旗帜鲜明地在中国呼吁建立翻译学,最早全面深入地分析翻译学的性质、内容、任务和方法等问题。在 1987 年第 1 期《外语教学与研究》上,谭载喜与奈达(Nida)合著的长篇论文《论翻译学的途径》引起译界同仁的思考。文章指出,翻译研究中最基本的途径有:文艺学途径、语言学途径、交际学途径和社会符号学途径。这四种途径运用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进行文学、语言、符号系统、社会文化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第五种途径,即翻译学的途径。这是一种综合性途径,它着眼于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研究。他认为: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它通过对翻译的性质、过程、方法等方面进行客观的、科学的描写,提出系统的翻译理论,推动翻译的实践。翻译学的研究是语言对比、社会文化对比、符号系统对比的研究。谭载喜用对比分析的方法讨论了五种途径各自的特点,指出翻译学途径综合一切翻译研究途径的优点或特点,不仅研究语际翻译、语内翻译,而且研究符际翻译,其方法论包括进行多层次的对比、提出多层次的标准和建立多功能的理论模式三个方面。接着,他在《必须建立翻译学》(1987b)中,又提出了译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国的翻译理论为什么不发达?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原因,并指出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的方法。为了对翻译学的学科性质和内容结构等问题作进一步探讨,谭载喜写出了《试论翻译学》(此文在 1987 年"全国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上宣读后,引起与会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后刊于《外国语》1988 年第 3 期)。在这篇论文中,他分析了关于翻译的通俗的、文艺学的和语言学的定义,论证了"翻译不是科学,翻译学才是科学"这一论点。他认为,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应当包括五个组成部分,即阐明翻译的实质、描述翻译的过程、界定翻译的原则和标准、描述翻译的方法和说明翻译中的各类矛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翻译界,大部分学人都未能认识到建立翻译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谭载喜凭着自己对重大理论问题的高度敏感,认识到这一点,并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研究、去探索、去呼吁译界同仁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为后来翻译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开启国内西方翻译史研究。谭载喜最早对西方翻译史进行系统研究,将其概貌向中国译界进行全面介绍,填补了当时中国译界西方翻译史研究的空白。1985 年在《翻译通讯》上,谭载喜以《西方翻译史浅谈》为题,介绍了西方翻译史。后来,为了使国内译界对西方的翻译理论发展过程有更为详尽的了解,他经过数年的积累,终于撰写出一本专著《西方翻译简史》(1991)。这部 25 万字的著作包括西方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近代和现代等五个历史时期的翻译实践史和翻译思想发展史,从古罗马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作品,一直写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欧美几个主要国家翻译理论领域的最新成果。这本书史料翔实,覆盖面广,自古至今涉及了近 300 个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并涉及了与翻译有关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南木在为此书作的"代序"中,认为谭载喜"在既无国内的先例可循又缺少国外的蓝本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项带开拓性的科研工作,实属难能可贵。"评价它为"大胆的尝试,可贵的创举"。后来,谭载喜又推出了《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2004),更新了原书中引文编排格式,与当今国际学术惯例接轨,还进一步扩充了内容,使之结构更加严谨,条理更趋清晰,叙述流畅,例证丰富。这本专著在中国翻译研究领域里,受到了广泛关注并得到很高的评价,是中国教育部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

3. 系统介绍奈达翻译理论。谭载喜在国内最早对美国现代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进行全面介绍。在《翻译是一门科学》(1982c)中,他在中国率先评介了奈达的代表作之一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1964)。他参考了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Nida, Taber 1969),从理论原则、翻译的功能、语义分析及翻译的原则和方法等四个主要方面剖析了奈达翻译理论的特点,同时指出了奈达理论的局限性,如奈达没有强调在翻译中有关的两种语言

间,从语音、语法到语义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对比分析,等等。随后,在1983的《翻译通讯》中,谭载喜指出奈达论翻译的性质,包括翻译的定义、怎样判断译文的正确性、什么是最理想的译文以及翻译中的四个重点注意事项。在此基础上,1984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谭载喜编译的《奈达论翻译》。该书一出版,就受到了译界的欢迎和好评。1989年第5期《外国语》再次刊登了他的论文《奈达和他的翻译理论》,对奈达的翻译思想体系及其演变过程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并结合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其理论上的功过得失作出评判。他考察了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de Waard, Nida 1986),将其编译整理后出版,书名为《跨语交际》(1993),重点选取了有关翻译即交际、翻译中的语言交际功能及其他、圣经翻译的基本问题、翻译必须译意、修辞意义、语法意义、词汇意义等七个方面的论述。该书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奈达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反映出奈达学术思维活跃,不囿于成见,敢于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并进行新的阐发。

4. 开拓中西译论的比较研究。在中国译界,谭载喜为中西译论纵、横向系统研究开先河之人。1995年,他在《外国语》上发表《中西现代翻译学概评》,对中西译论进行共时比较,提出科学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驳斥了中国译坛流行的"建立中国的翻译学"的观点,并对当时中西译界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在1998年的《中国翻译》上,他再次强调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并在1999~2001年,在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e Hong Kong Linguist*,《中国翻译》等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就中西译论的相似性和相异性、比较译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等问题,作了深层次、高度系统化的比较和探讨。自2006年以来,谭载喜聚焦于翻译比喻的系统研究,对中西翻译比喻进行全面调查,运用翻译学的描写原则和比较手段,从多个方面对翻译比喻的意义、翻译比喻研究的方法及价值进行探讨,已发表数篇论文,如 *Metaphors on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2006)、《翻译比喻衍生的译学思索》(《中国翻译》,2006年第2期)、《翻译比喻中西探幽》(《外国语》,2006年第4期)等。

5. 率先开展翻译中的语义与文化对比研究。谭载喜认为,科学的翻译研究,或曰译学,能够并且也应该被看做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与语义学紧密相关。然而,翻译中对原文的理解,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对于译者来说,没有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因此,他特别重视从语义和文化角度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如他发表的《翻译中的语义对比试析》(1982b)、《文化对比与翻译》(1986)、《中西翻译传统的文化烙印》(2000b)就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翻译学与语义》(1991),此文重点在于从翻译和翻译学的角度来探讨语义问题,或者说把语义特别是对比语义研究引入翻译理论研究的范围。他在文中指出:"翻译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语义即语言或言语的意义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科学分析,为翻译操作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他遵循这一指导思想,从翻译学的角度,对语义的种种解释模式作了概括和剖析,并对照奈达倡导的理论框架,从句法意义、修辞意义、词汇意义和所指意义、联想意义等多个层次两个方面,对语义的内容实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究,从而对奈达的思想作出了有益的补充和发展。近年来,谭载喜对于翻译和文化的关系有了新的阐发。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语境里,他特别提出了翻译相对与绝对属性以及文化身份相对性的问题(Tan, Shao 2007;谭载喜 2007b),同时,他还立足于这一文化观,运用翻译比喻来对译者身份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Tan 2007)。

6. 在翻译教学领域的实践与理论贡献。谭载喜积累了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出一套重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全人"教育观,认为大学翻译学位层面的翻译教学,其目的所在不仅仅是译者培训,而是培训(training)、教育(education)二者兼顾,并且后者往往重于前者。通俗地说,是培养、培育翻译人才,而不是培训翻译人员。"培训翻译人员"应当是翻译或外语培训中心,而不是大学翻译学位课程的责任和任务。按此理论框架,谭载喜提出大学翻译学位课程的"综合素质培育"模式(2007c)。 (邵璐)

王宏印(1953~)

陕西华阴人。1976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在西北电管局中心试验研究所从事科技翻译五年,后转入陕西师范大学任教至2000年,遂调入南开大学任教。1983~198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举办的高校英语教师训练班,主修应用语言学。1988~1990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留学,攻读跨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传播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曾任系主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翻译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外文化典籍翻译及翻译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兼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暨天津市译协)专家会员、天津市作协会员、《国际诗坛》艺术顾问等职,受聘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已出版各类书籍40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或参加省部级及校级科研项目5项。

代表性研究成果:1. 翻译教学与研究:《英汉翻译综合教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初步建立了以理论、技巧、习作、欣赏为主的翻译教学体系,2002年由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出修订版,2007年再版修订;《古诗文英译选析》(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世界名作汉译选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汉英翻译表现手法述要》,探索出一套十种"写意型"翻译方法,获陕西省首届翻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作为教育部"十一五"教材规划项目和精品教材,80万字的《中外文学经典翻译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结合了文学翻译教学与翻译批评。2. 典籍翻译与研究:《白话解读"公孙龙子":文本翻译与思想重建》(三秦出版社,1997),运用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学解读先秦名家典籍《公孙龙子》;《"诗品"注译与司空图诗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从文化史、文学史和美学角度系统评述了司空图的诗学思想;《"画语录"注译与石涛画论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系统地阐释了石涛的绘画美学思想体系,考证比较了《画语录》与《画谱》的关系,颇具特色的个人典籍翻译与研究渐成系列。3. 诗歌翻译与研究:加拿大白蒂诗《孕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将翻译和诗歌评论相结合,获加拿大领馆赞助和陕西省第三届优秀文学翻译特等奖;《英诗经典名译评析:从莎士比亚到金斯伯格》(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评论传统格律诗翻译,并率先进入现代派诗歌的翻译批评;《〈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比较评析了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英译本;《穆旦诗英译与解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提出穆旦诗歌十大主题与"被围者"意象,开穆旦诗翻译与研究之先河;《新诗话语》(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体现了新诗创作的理论探索和个人新诗创作面貌。4. 翻译理论与研究:《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现代阐释——作为建立翻译学的一种努力》(《中国翻译》2002年第2期),率先提出中国传统译论系统阐释和现代转换论题;《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是第一本用解释学方法系统研究中国传统译论的专著,旨在梳理、分析、继承和总结中国传统译论,实现其在现代翻译学中的新生和转化;《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借鉴西方文论并吸收国学营养,奠定了文学翻译批评分支学科框架和理论基础。

代表性理论观点:1. 翻译过程理论:提出翻译过程综括模式,构成一般翻译理论的基础。它以创作为翻译的逻辑起点和基础,分为原作世界和译作世界的概念,各由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作品世界构成,两组世界的对应和转换关系构成翻译过程的横向平行路线,从原作世界向译作世界的深入和浅出则构成翻译过程的纵向行进路线,由此解决理解与表达的三个层次和三种水平的发展模式。综括模式可具体化为一级模式,或科学翻译模式和二级模式,或文学翻译模式,分别对应于实用翻译(再现类文本的翻译)和文学翻译(表现类文本的翻译),所有翻译方法分别为再现法和表现法(具体化为文学翻译表现手法十种)。(王宏印 2002)结合翻译中的归化异化理论,提出翻译过程本质上是从异化(区别于既定原作)向归化(倾向于理想译作)运行的统一过程,在原则上是不可逆转和重复的行为,而其中顺向转换的中点是等化,在企图返回原作的回译过程中,则是既保留原译因素又具有创作因素的一个虚拟的返回中点。由此可知企图用回译检验译文质量的做法(如纽马克的观点)是相对的,而"研究性回译"对于深入认识翻译过程和本质至关重要。(王宏印,张智中 2003)2. 翻译类型理论:结合翻译的本体失落理论,提出"古本复原"翻译类型,以《蒙古秘史》汉译和蒙译为例,提出古本复原的假设条件,例如,原始文本确实存在过的证据,可能具有的残篇痕迹,音写作为准确恢复原文语义的技术手段,译者具有相关的历史文本知识和语言操纵能力等。(王宏印,邢力 2006)在前人基础上阐释"往复翻译"翻译类型,以《论语》和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和汉译回译为例,论证了往复翻译作为文化反哺行为,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经过西学洗礼返回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重新认识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注释和疏解有特殊价值。(王宏印 2006)以林语堂《京华烟云》的英文写作和三个中文译本为例,提出没有原译的回译概念作为翻译的另类。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包括,异族语写作对于本国文化的表现力是否充分,缺乏原译的回译是否可能,以及导致多线索回译版本的汇通评价问题,旨在建立以本族文化作为终极文本(历史文本),而其他文本只是派生文本的翻译概念。(王宏印 2006)3. 翻译批评理论:针对翻译批评主体性建设问题,提出翻译批评的认识主体、交互主体和交流主体三重架构理论。(王宏印 2006)在翻译批评方法原则上,结合人文学科的阐释学方法和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提出文学翻译批评的五条统一原则,即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阐释性与论证性、个案性研究与普遍启发性、审美个性与社会认识价值,以及独立批判功能与文化参与功能等相统一的思想。提出并阐释了细读法、取样法、比较法、逻辑法、量化法、阐释法、互文法、历史法、模型法、评价法十大具体方法。(王宏印 2006)关于翻译标准和评价,考察了传统译论的一元(化境)、二元(形神)和三元("信达雅")理论在逻辑结构上的优缺点,提出六条标准:语言要素、思想倾向、文化张力、文体对应、风格类型、审美趣味。并参照中国传统艺术品鉴赏和用人"九品中正"制度,提出三类九等分级评价标准及作品评价等级。(王宏印 2006)4. 文化批评理论:针对文化转向和研究的可能误区,提出文化研究要能够进入学科研究,提出文化作为文明单元,作为文学内容,作为语言信息,作为文本意义和作为翻译对象等层次进行分析,基本上解决了以文化为核心概念和贯穿思路打通各学科的问题。(王宏印 2006)针对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流行说法,提出所谓强势文化必须具有文化资源上的源远流长、综合实力上的强大持久和心理认同上的凝聚力等概念(至少具有其中的两项)。处于具体交际情景中的文化双方是动态的,要结合具体参与项目和力量

对比进行分析才能下结论,反对将中国文化笼统地称为弱势文化的荒谬观点。(王宏印 2004)针对文化转向以来在中国翻译界出现的一些倾向,例如将中西文化对立起来,将文化研究与语言研究对立起来,满足于文化的泛泛之论不能进入学科研究,把文化翻译等于直译加注,把翻译策略归结为归化异化,不加分析地滥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概念等,提出十点予以批评告诫。(王宏印 2007b: 110～114) 5. 译学建设理论: 在中西学术的结合思路上,提出以中国传统译论的学理阐释和现代转化为起点,经过现代翻译理论的自主创新走向世界性普遍译学的基本思路,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命题并考察了其文化资源,提出历史评价、理论评判与创造转化三个层次。(王宏印 2003a)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提出纯理论研究、翻译实践、翻译批评三重架构(以翻译批评作为中介),各自具有的理论与实践层面共计六个层面的系统理论,此为"执两用中"的致思方略。(王宏印 2003b)在翻译教学领域,提出一切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必须能够进入课堂教学,才能成为人类稳定的知识资源的教学理念,提倡中外翻译双向打通,中外文学形成比较规模,读写(译)贯串于教学全过程,进一步将译介学和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合为一个教学过程。在教学的层次上,提出外语本科、硕士(包括翻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面各有不同任务和侧重的基本估计,尤其是博士阶段培养的基本规范模式,包括从招生到授课、从选题到预答辩及答辩一条龙的培养思路和学术规范与创新的激励机制。(王宏印 2007a)

(晓风)

曾利沙(1953～)

湖南新化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教授,翻译学方向博士生导师,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1981年湖南邵阳师专外语系毕业;1988 年华南师大外语系研究生毕业;1991～1993 年留学英国 Warwick 大学;1995～1999 年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贸易学院副院长兼外语系主任;1997 年获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称号,2004 年获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称号。社会兼职: 广东省外国语言学学会理事,广州市外事翻译学会理事,广州市公共场所公示语译文规范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译审、副译审技术资格评审委员。学术成就: 发表学术论文 70 多篇;论文多次在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获奖,2002 年获香港"宋淇翻译研究论文奖";先后承担省部级一般项目 5 项,重点项目 1 项,出版编著 1 部,译著 3 部,教材 1 部。现主要从事翻译学、应用翻译学、翻译批评、翻译思维与心理机制模型研究、认知-语篇语言学研究。

曾利沙的译学研究特点主要表现在其理论思维、学术思想和研究视角与方法论方面。他立足于本硕层次翻译教学实践和语言学理论基础,善于综合相邻相关学科理论成果作为研究工具,创造性地运用于翻译理论研究之中。

他一方面坚持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另一方面深入钻研哲学、逻辑学、西方文论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坚持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其研究课题始终围绕着翻译学系统理论的哲学基础——发生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系统论进行深入研究,致力于建立翻译学核心系统理论范畴。在"文化转向""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话语霸权""意识形态"等翻译观层出不穷的当今译坛,他认为,翻译学系统理论的建构基础和核心在于对文本语际转换过程中所衍生出一切问题作科学系统的研究,即使是"文化转向"也应是文本内的理论范畴问题,因为翻译的根本问题就是基于文本的语言文化问题,而语言文化翻译的本质问题就是"义"与"意"的价值形态及其在目的语中的再现与表现问题。在系统理论范畴内,研究者的兴趣可以转向,但"文化"翻译是转不了向的,因为"文化"问题脱离不了语言,其实质就是特定"意义"层次的价值体现,必须置于特定文本、特定层次之中才具有翻译理论意义。此外,他认为任何与译学相关的研究都从属于系统理论中核心的或外围的某个特定范畴,宏观理论范畴的内容应在微观层次范畴得到印证,而微观层次问题应能在宏观层次得到阐释,理论范畴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印证、相互制约的。他重视典型译例的理论阐发,在阐释其翻译理论与翻译思想时总会结合大量翻译实例对理论进行深入浅出的说明。

在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论上,他继承和吸收了西方的分析型研究模式与思辨型思维方式,克服了国内译学传统研究中印象性和整体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其研究逻辑严密,长于推理,善于论证,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的各种问题能进行条理性阐释,并善于加以归纳、概括、演绎和提升,形成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高度理论化成果;其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涵盖了宏观指导和微观操作的各个层面,对文学翻译和应用翻译等领域的语言、翻译批评、文化转换规律等进行了揭示。

曾利沙将其他学科的前沿成果运用于翻译学系统理论范畴化研究。他在研究中善于批判性地理解和接受其他学者的成果,并综合(艺术)哲学、逻辑学、系统论、信息控制论、现象学、接受美学、阐释学、语义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理论,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他对译学理论建构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翻译学系统理论范畴化的建构、翻译批评研究、应用翻译理论范畴化建构和翻译研究的哲学思辨等四个方面。

他在翻译学系统理论范畴建构方面的研究特色体现在他结合现象学的"意向性"和"视域"理论与阐释学成果提出"文本特征论"的本体论理论范畴,并形成系统理论框架和相应的概念体系,其代表作有《论操作视域与参数因子—兼论翻译学理论范畴"文本特征论"的研究》(《现代外语》,2002 年第 2 期)、《关于翻译操作的"多度视域"研究—兼论译学系统理论研究的范畴化与概念化》(《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 年

第4期)、《化理论为方法 化理论为知识——翻译专业研究生学科理论教学谈》(《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文本主题与主题倾向关联下的概念语义生成机制》(《外语教学》,2007年第3期)。他的理论范畴观是基于学科理论的逻辑范畴化的推演机制,是基于本体论与认识论之上的理论研究,是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心理表征和操作理据的实证研究,也是对译本意义生成机制的可描写性、可印证性、可操作性、可阐释性的系统研究。其理论的根本目的有二:一是研究形式转换规则,从理论上建立一种形式转换的描写-功能规范;二是研究转换规律,从应用角度研究翻译思维发展模式以及语言符号的语义-功能换码行为模式。

他对翻译批评的研究特色体现于他将逻辑理论、参数理论及语义学、认知语言学、语篇语言学、语用学等成果应用于翻译批评研究。其代表作有《对ALTOGETHER AUTUMN两种译文的比较评析——兼论多种译本批评的方法论》(《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小议翻译操作中的"多度视域"——兼对十三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参考译文的商榷》(《中国翻译》,2001年第2期)、《主题关联性社会文化语境与择义的理据性》(《中国翻译》,2005年第4期)、《古典诗词互文性解读的"阈限"问题——兼论文本(翻译)阐释的主题与主题倾向关联性语境融合》(《修辞学习》,2006年第1期)。他在提出翻译批评的参数理论之后,又进而提出了社会文化语境关联性融合下的主题与主题倾向制约性文本批评模式,从宏观统摄的视角,将语篇微观语义生成推导理据和心理机制的阈限性纳入翻译批评的认识论范畴。该理论是篇章语言学在翻译理论探索中的应用性研究不可多得的成果之一。

在翻译哲学思考方面也见解独到,他的论文《论"规律"——兼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9期)对翻译规律的二级本质特征从哲学的高度进行阐述,并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详细阐述,该文于2002年获得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颁发的[港、澳、台、内地]"宋淇翻译研究论文奖"。他在《翻译本体论批评与价值判断的逻辑基础》(《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一文中就翻译活动和理论研究的逻辑特质进行了论证。他认为,逻辑特质是翻译批评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中的基本属性,翻译多元化不应该以拒斥逻辑为前提。

在应用翻译系统理论研究方面,他以逻辑范畴论、社会行为学、行为价值学、信息控制论等学科理论为基础,提出应用翻译(学)理论原则范畴化的建构,并从对外宣传文本和旅游文本等翻译研究入手,提出了目的-需求原则范畴、价值原则范畴、策略原则范畴、辅助性准则与可操作性规则的范畴系统,并对范畴间的逻辑推演机制及其内在联系进行了论述。其代表作有《论投资指南的翻译原则》(《国际经贸探索》,2000年第2期)、《论旅游指南翻译的主题信息突出策略原则》(《上海翻译》,2005年第1期)、《对〈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英译文的评析——兼论对外宣传翻译"经济简明"策略原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从对外宣传翻译原则范畴化看应用翻译系统理论建构》(《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年第7期)。这些研究成果对应用文本的翻译提出了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系统理论。

(*颜方明*)

张美芳(1953～)

197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1年至1982年在香港大学研修英国当代文学及翻译课程,1996年赴香港浸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9年获(翻译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山大学教授、英语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英汉语对比研究会常务理事。现为澳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教务委员会委员、澳门大学翻译研究生课程主任、澳门翻译员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理事、香港翻译学会终身会员;兼任《中国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等学术刊物编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国外翻译研究丛书"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专家委员会成员。

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已发表论文近50篇,出版专著、译著多部,专著有《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和《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译著有《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图说香港电影史》(香港三联书店,1997)、《牛津青少年百科全书》(合译,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8)等。其学术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 研究及评介中、西方的翻译教学及教材;2. 评介当代西方翻译理论;3. 率先应用语篇分析理论和功能主义途径研究英汉翻译问题;4. 研究澳门地区的翻译现象及推动该地区翻译研究的发展。

张美芳的博士论文《中国大陆翻译教材发展研究》,对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115种英汉翻译教材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归纳各类教材的特点,追踪其理论根源,并探讨各类翻译教材的优点及有待改进之处。在研究中,她根据所研究的翻译教材的理论倾向将其分为三大流派:1. 词法、句法流派;2. 功能流派;3. 当代译论流派。其专著《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王宗炎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材料充实,二是态度客观"。在对我国翻译教材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她还广泛研究了西方出版的翻译教科书。其学术论文《从经验、文本到解构翻译概念》(《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评介了西方有代表性的翻译教程:纽马克的《翻译教程》(Newmark, 1988)、

贝尔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Bell, 1991)、贝克的《在语际之间：翻译研究教程》(Baker, 1992)以及罗宾逊的《速成翻译教程》(Robinson, 1997)。她指出，这些出版于不同时期的西方翻译教程反映了翻译研究从经验到科学、从文学到语言学、从文本到解构主义的发展趋向。她还认为，翻译教科书既是编著者的研究成果，也反映了某一时期翻译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张美芳曾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十几篇论文，评介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家及其理论，在《中西方译学构想比较》(《中国翻译》，2001 年第 1 期)一文中，首次将霍姆斯(Holmes)的译学构想详细介绍给中国读者；她还写了多篇论文着重对德国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诺德(Nord)的翻译理论作了评介。

张美芳在不同的时期研究侧重点不同：初期偏重于以语篇分析途径研究翻译，即以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从语言使用及语境的角度研究翻译功能；近期则注重运用德国功能主义途径研究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以赖斯(Reiss)、弗米尔(Vermeer)、赫尔兹-曼塔里(Holz-Mänttäri)和诺德等为代表的翻译学者提出的功能主义为基础，从较宏观的角度研究翻译功能。最初，她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境论，分析查良镛于香港回归祖国之日发表的文章“河水井水，互不侵犯”及其英译，以探讨“动态对等”论的局限性(《上海科技翻译》，1999 年第 4 期)；后来，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基础上，她从语篇体裁和语域变体两方面对英汉翻译中的问题进行研究(《现代外语》，2001 年第 1 期)；再后来，她尝试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新发展出来的理论——评价理论，探讨翻译中的“不忠实”现象及产生“不忠实”译本的各种因素(《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 年第 7 期)。此外，她还引入德·布格兰德(de Beaugrande)和德莱斯勒(Dressler)的篇章语言学理论对英汉翻译实例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对篇章的信息性(《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 年第 5 期)和意图性(《外国语》，2001 年第 2 期)的深入分析。

在谈到语篇分析途径对翻译研究的贡献时，张美芳指出，翻译研究的语篇分析途径“是以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理论为基础，对原文和译文及其使用的语境进行分析比较，找出其对等和不对等之处，并进而探讨产生不对等的原因，其最终目的是为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提供参考依据。语篇分析翻译研究途径有比较成熟的语言学理论作为基础，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也比较科学，语篇分析的变量是客观而不是主观的。例如，如果想评价一篇译文整体上是否合适，可以从对原文和译文的语域分析入手。语域分析包括三个变量，即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虽然这只是语篇分析的途径之一，但可以说明，这一途径研究的是原文和译文本身的一些客观要素，分析手段也相对客观，因而有助于解释一些翻译现象，其研究结果也可不断累积，为后人进行研究提供参照。这就是语篇分析途径对翻译学的最大贡献”[《疯狂英语》，2007 年第 5 期(教师版)封面人物访谈]。

张美芳的《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一书以语言功能作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系统地论述了翻译功能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尝试把部分理论应用于英汉翻译研究之中，是国内第一本全面评介翻译功能各理论学派并结合翻译实例进行论证的专著。

张美芳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澳门公共牌示语言及其翻译研究》(《上海翻译》，2006 年第 1 期)、《澳门翻译的历史和现状》(《中国翻译》，2006 年第 1 期)等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同行对澳门翻译现象的关注；同时，她还积极策划、参与筹办澳门翻译联合会和推动其他与翻译相关的活动，使澳门地区的翻译、翻译教学及翻译研究逐渐得到澳门政府和各种机构的关注和扶持。

（何力）

曹明伦(1953～)

四川自贡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河北大学特聘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及河南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四川理工学院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四川翻译文学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学翻译、翻译学及比较文化研究。著有《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和《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译有《爱伦·坡集》、《弗罗斯特集》、《威拉·凯瑟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培根随笔集》和《司各特诗选》等多种英美经典，与人合作编注有《英诗金库》。论文见于《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国外文学》、《名作欣赏》、《外国文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及若干大学学报。

曹明伦的代表性科研成果是其 2006 年 6 月在北京大学答辩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翻译之道——对翻译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实证性研究》。该论文后更名为《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于 2007 年 10 月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指出：在当今之中国，随着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翻译学的文化转向，不少翻译学者也纷纷转向，其中有些人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文化研究的传媒研究范畴，从而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学科概念混淆和学术理路混乱，致使有些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极不和谐，呈现出“分道扬镳”之势，“水火不容”之态，某些翻译学者甚至极力要人们相信“理论不一定能够与实践结合”，“纯理论对翻译实践无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翻译实践失去了规矩方圆，许多翻译理论流于清谈空论，所谓翻译研究几乎成了一方谁都可以在里边建构理论的无界线领地。这种现状不仅阻碍了翻译学科的建设，影响了翻译教学的效果，而且使我国的翻译实践陷入了困境。

针对这种现状，该书以实证考据和逻辑思辨相结合的方法，按历时描述和共时批评相交叉的理路，在

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学术视野内，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证明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都是与生俱来的，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此基础上，作者考察了"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辨析了均用 Translation Studies 为其能指的译介学和翻译学之差异，指出了这两个学科的学科概念混淆的原因，明确了译介学和翻译学各自的学科概念，并发出了翻译学应该划定学科界线、保持学科特点、避免学科危机的呼吁。作者进而指出，翻译概念的发展只是其外延的增加，而非其内涵之变化，因此翻译的本质属性并未改变，从而重新明确了翻译的基本概念及其能指，进一步明确了翻译活动的性质。

该书最具独创性的贡献在于作者重新审视了翻译的目的、任务及其标准，首次提出了"文本目的"这个概念，首次区分并论证了翻译的"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翻译的"文本行为"和"非文本行为"这两对概念，明确了翻译之"文本行为"乃译者的基本行为，翻译之"文本目的"乃译者的根本目的。这对明确翻译的本质属性、界定译者的根本任务、规范译者的基本行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该书还尝试性地规划了翻译学的学科范围，明确了翻译理论的位置，把它与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一道作为构成翻译学的三个有机部分，而且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

该书最末两章分别对当今中国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进行了反思，进一步分析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关系失调的原因，并指出了恢复其互构互补互彰的和谐关系的途径。曹明伦最后指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从来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道路永远都是翻译活动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循的理想之路。 （裘炻）

许钧(1954～)

浙江龙游人，1975 年毕业于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1976 年至 1978 年留学法国，1985 年至 1988 年在南京大学外文系攻读硕士学位，1992 年破格晋升为南京大学教授，1995 年具备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现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上海大学顾问教授，兼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法语分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翻译家联盟科学文献委员会委员、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并担任 *META*、*BABEL*、《外国语》、《外语教学与研究》、《译林》、《南京大学学报》等国内外 10 余种重要学术刊物的编委或通讯编委。

许钧在翻译基础理论、翻译批评和翻译文化研究领域进行探索，先后主持国家教育部"八五""九五""十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及国际合作项目九项，其中《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将文本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国内翻译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在对老一辈翻译家的翻译思想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文学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入选教育部 2002～2003 年度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他的理论新著《翻译论》对翻译活动的本质、过程、翻译的根本任务、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活动的矛盾、影响因素及翻译的价值与批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探讨。该书既注意吸收传统译论的精髓，又体现了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外译论的发展和主要研究成果；梳理出了翻译研究的明晰的理论脉络，并提供了丰富、可信和前沿的学术资料线索，为翻译研究拓展了思考空间。许钧在学术研究中还特别注重国际交流，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推向国际，如他与王克非合作，主编了《中国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以专号形式发表在 *META*(1999 年第一期)上，在国际翻译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许钧集实践、教学与研究于一体，把前沿的理论与基层的翻译实践紧密结合。在国内翻译界，他主持的两个重要活动可以佐证："一是他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有读者、译者和学者参与的关于《红与黑》的翻译大讨论。在那次大讨论中，很多涉及翻译的问题都被提了出来，为我国的翻译学建设提供了大量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次大讨论表面上看只是一次调查，但背后却隐含了一系列的方法论运作和理论思考，如译本研究的范式、译文读者的实际反应、本土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介入、异化与归化的本土考验等等。他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动作就是对一批著名翻译家的访谈，如对季羡林、罗新璋、施康强、李芒、许渊冲、萧乾、吕同六、屠岸、郭宏安、江枫、赵瑞蕻、方平、杨武能、陈原、李文俊，等等。众所周知，这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一批学者型的翻译家。在对这样一批翻译家访谈的时候，志同道合的交流迸发出了许多闪光的思想火花，这些火花既证实了许多理论的假设，同时也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关于译者主体意识的背景资料。这种方法其实是在西方盛行的 TAPs(think-aloud protocols，有声思维资料分析法)模式的实际运用。当代翻译学界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翻译过程。具体操作是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说出他的心中所思，研究者记录下来以研究大脑黑匣子的实际运作，从而解开译文生成之谜。许钧的这种非实时的访谈，可以视为 TAPs 的一种比较有操作性的方法，从中所揭示出来的问题虽没有经典的 TAPs 那么具有过程论的意义，但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为理论的升华提供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伍小龙，王东风 2004)

文学教授程章灿指出，许钧"不仅有丰富的翻译实践，而且有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他所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卷四)、《名士风流》、《邦斯舅舅》以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已经显示了他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才华和成绩，并为他赢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法

兰西金质教育勋章”。他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当代法国翻译理论》等著作,则表明他在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等方面都有广泛而深入的思考。许钧所著的《翻译论》是他在上述各有关学术领域的素养和功力的综合体现。这本书纲目清楚,思路清晰,包括翻译本质、翻译过程、翻译意义、翻译因素、翻译矛盾、翻译主体到翻译价值与批评。作者不仅深入探讨了“何为译”以及“如何译”的问题,更精微剖析了“为何译”以及“译何为”等理论问题。(参阅程章灿 2004)

许钧从文化交流的高度出发,赋予翻译以深刻的文化内涵,主持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与学术译丛,如《杜拉斯文集》(十六卷)(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现代性研究译丛》(与周宪合作,30 种)(商务印书馆,2000);《文化与传播译丛》(与周宪合作,20 种)(商务印书馆,2000);《法兰西书库》(60 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06);《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共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巴别塔文丛》(12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等。他翻译的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界所称道,作家池莉在《沉下去浮上来》一文中写道:“感谢许钧先生在这个时候出现。他的法语造诣和翻译技巧的精到,使得我们有机会如此接近和了解法国的当代文学。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许钧翻译的《桤木王》。《桤木王》的文字,是那么典型地表现出了法语的细腻,繁复,感性与敏感,在久违了的巴尔扎克时代之后,我们重又感受到了法语在当代小说血脉中的经典跃动。”

因许钧在翻译、翻译研究和文化交流中取得的成就,法国政府于 1999 年授予他“金质教育勋章”;香港翻译学会于 2005 年颁授他以荣誉会士衔(荣誉会士衔系香港翻译学会授予国际上在翻译与翻译研究领域成就卓越的杰出人士)。 **(高方)**

罗选民(1954～)

生于湖南省衡阳市。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外语系学术委员、副主任,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香港岭南大学翻译学博士。现任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学会理事、加拿大 McGill 大学学刊 TTR(《翻译·术语·写作》)国际顾问、伦敦大学(SOAS & UCL)亚非文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副主编,《中国翻译》、《英语世界》、《中国外语》等多份杂志编委。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副秘书长兼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第二届学位委员会委员,文学/历史学科组组长(2000～2003)。曾任耶鲁大学访问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富布赖特研究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专家特殊津贴。

罗选民运用话语语言学理论指导翻译的研究与实践,创立了话语翻译理论。他从动态的、功能的角度区分了翻译的两类单位:分析单位和转换单位。话语层的分析单位为话语,转换单位为小句。罗选民进而提出话语层翻译的七项标准:“意图性、信息性、可接受性、形式连接、意义连贯、章际性和场合性”。他的话语层翻译理论被认为是“中国近十年来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思路,新的开拓”(杨自俭 1993),被誉为“罗氏话语翻译学”(杨自俭 1993)。罗选民开创的话语层翻译理论至今仍是翻译研究的热点。

近年来,罗选民致力于互文性翻译研究,力图运用互文性理论建立一条互文性翻译研究的途径,以此指导翻译理论和实践。他的互文性翻译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论著《互文性与翻译》中。他对西方不同流派的互文性理论进行了梳理,并从中国话语实践勾勒出中国互文思想的演变,提出互文性翻译的三个准则:关联准则、经济准则、中和准则。该书系统探讨互文性与翻译的专著,对文学批评、语言研究、文化研究、翻译研究必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罗选民的研究不仅限于翻译理论,还面向翻译教育、翻译实践。他认为,不能忽略大学翻译教学。在中国 80%以上的西方经典著作由科学、工程、经济、历史、哲学等领域的学者翻译,从中国这个大环境来考虑,大学翻译教学尤其是非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必须重视。罗选民指出,应把大学翻译教学视为一种合格的教育,鼓励教师从多角度进行大学翻译教学;制定一套整体教学大纲,用来指导中国大学翻译教学;要培养学生在翻译中的创造力;要筹建翻译教学研究中心。罗选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大学翻译教学:理念与实践》(2005)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目前,罗选民正在进行中国现代性与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活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性的形成。他已发表系列文章:《梁启超的翻译与文化传播》、《意识形态与梁启超的翻译实践》、《通过翻译来塑造中国现代型:梁启超的案例研究》、《作为文化的记忆:重新认识鲁迅的翻译》、《作为暴力的翻译:论鲁迅的“易解”》等。

罗选民为我国翻译研究做了大量组织工作。他组织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会年会、中国英汉语对比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等多种会议。近年来,罗选民以其国际学术眼光,组织和主持了首届清华—岭南“翻译与跨学科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十四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大赛暨清华翻译高层论坛、国际译联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社会科学翻译研讨会等学术会议等。其中,首届清华—岭南“翻译与跨学科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该会议创立了一个模式,促成其能够定期举行;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社会科学翻译研讨会由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CLS,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和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是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持的"社会科学翻译项目"(SSTP,Social Science Translation Project)结题的后续会议。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在美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界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罗选民作为中方主席是"社会科学翻译项目"中唯一的中国成员。会议邀请了国内知名社会科学家及译者、国内外重要编辑及出版界代表、高校翻译教育界主要负责人,具有充分的跨学科、跨行业代表性,为推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和翻译事业的共同进步发挥了作用。另外,罗选民参与创办了《外语与翻译》杂志。

罗选民应邀多次进行国(海)外学术演讲,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3、14届大会、术语:社会科学的翻译,社会科学翻译研讨会(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国际译联2005国际大会、翻译:中国近代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耶鲁大学2006～2007东亚学术系列讲座等。罗选民的演讲立足于全球化的大背景,将中国翻译研究的优秀传统和最新成果介绍到国外,为实现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起到促进作用。

罗选民1990年以来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散见于《外国文学评论》、《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中国翻译》, *Tamkang Review*, *Perspectives*, *Meta* 等国内外重要学刊,主要著作:《话语分析的英汉语对比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主要编著有《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文学翻译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文化批评与翻译研究》(外文出版社,2005)、《语言认知与翻译研究》(外文出版社,2005)、《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起)、《视角:翻译学研究》第3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等。

罗选民翻译了约200万字的著作,其中学术著作大多涉及美学、哲学、文论或语言学各方面。如其学术译作《耶稣基督的上帝》(卡斯培著,香港道风书社,2005),原作"题旨看似平淡,却正是整个基督宗教思想的核心",原作者学识渊博,在这部30余万字的著作中,游刃于《圣经》阐释、教父学研究、中世纪思想和近代各种神论哲学论辩之间,翻译难度大。罗选民深刻地把握原作思想,经过十年努力,精心雕琢,使这部著作重放夺目的光彩和迷人的魅力。罗选民另一译作,雅克·马利丹(Maritain)著《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1991)则填补了我国研究马利丹诗学思想的一个空白。

罗选民主持过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分别是《中国大学翻译教学:理念与实践》(2005)、《话语分析的英汉语比较研究》(1996);美国学术联合委员会研究基金:社会科学著作翻译;韩国集团亚洲研究出版基金项目:Translation, Cogni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等项目以及多项省部级项目,并多次获奖。

(王璟)

王宁(1955～)

江苏扬州人,生于南京市,1978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获北京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90～1991年获荷兰皇家科学院博士后基金,在乌德勒支大学从事比较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论研究,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1992年晋升为教授。曾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兼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外语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王宁的学术研究和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他主要从文化的视角对翻译进行研究,即研究广义的文化翻译。王宁的学术研究特色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文化理论和文学的接受与影响研究。王宁较早从事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的研究。他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创造性地将西方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翻译)改造后应用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并据此对西方理论进行质疑甚至重构,从而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最终对西方学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流变的研究使得荷兰学者佛克马改变了原先所认为的只有一种(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并邀请他为其主编的大型研究文集《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1997)撰写"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专章。他于1995年主持了在大连举行的首次"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会后他参与编辑的专辑发表在国际顶尖文学理论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上,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跨学科的文化和翻译研究。王宁较早提倡比较文学"超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在《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中,他一方面全面评介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及其对西方和中国文学的影响,还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阐释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从而达到了理论的双向旅行和交流。书中有三篇文章曾用英文撰写,分别发表于荷兰刊物《中国信息》(*China Information*)以及国际文学和精神分析学大会学术论文集,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多元共生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是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这部专著至今仍有重要影响。他研究后现代主义的特色具体体现在从理论和哲学思辨入手,最后落实到文学作品的分析及作家的研究上。他不满足于简单地将西方理论介绍到中国或应用于中国文学作品分析,而是通过中国的文学实践来质疑西方理论的局限性,从而达到了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的境地。在《后现代主义之

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中,他首次将后现代主义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考察研究,指出后现代主义已经走出西方世界,成为一股国际性的理论大潮,尤其在传播到东方时在不同的国度产生了不同的变体,从而消解了西方理论的“霸权”。他还深入讨论了后现代主义衰落之后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及其代表人物赛义德(Said)和斯皮瓦克(Spivak)的理论,并结合中国当代文学和电影中的后殖民和反殖民倾向提出了中国学者的文化知识策略。

3. 跨文化的翻译研究与文学经典重构。王宁深知比较文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探讨西方文学和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更重视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在他和另两位学者合著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中,他不仅全面地考察了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西欧和北欧的翻译、传播和接受史,分析了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之形象的演变,同时还提出了全球化时代汉学的更新以及与国学的共融和对话。《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是他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反映了作者一贯的学术前瞻视角,对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地位提出了质疑。翻译学这门以前被很多人否认的学科,在王宁的专著中成为讨论的一个重点。他认为,“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该包含所有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和翻译研究中的理论。”他还高屋建瓴地指出:“要把我们的文化、文学和理论纳入全球化的视野,文化层面的翻译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他创造性地在中文语境下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问题,并将这种“转向”拓展为跨东西方文化的翻译学转向,从而与国际文化翻译理论界进行直接的、高层次的对话与讨论。至于这种文化翻译的功用,作者认为它“是中国的理论批评话语建构和重构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借此有望实现“中西方文学和文化之间真正平等的对话”,而在对话过程中,中国学者可以把“借来的(西方)话语”与“我们本土的批评和理论话语融为一体”,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为世界批评理论作出贡献。该书还对西方文化研究的最新走向和未来前途作了理论描述,对流散理论、媒介研究、语像批评和性别研究等几种“后理论时代”颇具代表性的理论思潮的现状及走向作了勾勒,并以巴赫金(Бахтин)和德里达(Derrida)的理论在不同国家的传播为例,提出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的策略。可以用这样几个词来概括王宁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翻译研究特色:理论性、前沿性、跨学科性和国际性。

王宁认为,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学者在用母语著述的同时,也要努力用英文撰写论文并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以便对西方学者产生影响。2005年,应罗伯逊(Robeson)和肖尔特(Schulte)的邀请,王宁作为唯一一位来自亚洲的副主编参与他们主编的《全球化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四卷本)的编写和审稿工作,负责整个人文科学部分,组织了近40个条目,其中有10多个条目由他邀请中国学者撰写,他本人也亲自撰写了三个重要条目:比较文学、翻译和东方主义。该百科全书于2006年10月由路特利支出版社出版。他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虽然英语的强势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定,但翻译的功能仍没有丧失,而应当越来越显得重要。而对于中国的翻译工作者来说,如果说过去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翻译的重点是外译中的话,那么在当今时代,紧接着中国经济腾飞的则应是中国文化的崛起,在这方面,翻译的重点则应转变为中译外,也即把中国文化的精髓翻译成世界主要的语言,最终使中国从一个“理论消费大国”变为“理论生产大国”。

王宁的其他主要著作还有:《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阐释》(台湾淑馨出版社,1996)、《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文学与精神分析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全球化、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Singapore 2004)、《神奇的想象:南北欧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等;此外,他还在国内外70多种期刊或文集中发表中英文论文400余篇,内含英文论文60篇,其中26篇收入国际权威数据库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论文索引),收录ISSHP(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学术会议文集)4篇,少数论文被译成意大利文、德文、丹麦文、西班牙文和朝鲜文。

王宁担任了多种学术职务,其中包括: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国际文学理论刊物*New Literary History*(新文学史)和*Critical Inquiry*(批评探索)中文版主编,翻译期刊*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视角)顾问编委,国内《文学评论》、《中国翻译》等十多家中文CSSCI来源期刊编委。他的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理事等;并任国(境)内外2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兼职教授、兼职研究员或客座教授。 (清伊)

刘和平(1955～)

1982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学院法语专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10月赴法国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学习,次年6月获翻译学硕士学位。1993年3月至1996年4月为该校博士研究生,获翻译学博士学位。1996年回国后致力于口译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并从事口笔译实践。现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北京市译协常务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委员,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法语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Forum*编委。

刘和平师承塞莱丝科维奇(Seleskovitch)和勒代雷(Lederer)。在译作《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

(2000)、论文《翻译的释意派理论》(2001)和《释意学派理论对翻译学的主要贡献——献给达尼卡·塞莱丝柯维奇教授》(2001)等系列作品中,刘和平系统地介绍了释意理论的基本内核和术语、翻译程序与翻译评价标准,以及释意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并对释意学派理论的诞生、特点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述评,为释意派口译理论在中国译界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他是在中国对释意派提出质疑最多的人,同时也是释意派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刘和平(2006)在《法国释意理论:质疑与探讨》一文中,不但详细讨论了释意派理论的内核,还总结了西方各国对释意派理论的多种批评,在文章最后也提出了释意派理论的不完善之处。她认为,由于释意派诞生的时代在语言学、语言心理学、神经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学等相关学科尚未得到长足的发展,释意派理论缺乏足够的实证分析数据来证明它的科学性。因此,必须同其他相关学科专家合作,来探究人类大脑这个黑匣子在翻译中的"表现行为",从而从理论上证明"脱离原语语言外壳"后的记忆形式,因为光用"意义在大脑中呈意识状态"来解释这种记忆形式是远远不够的。其次,关于特殊语言与翻译的关系也有待证明,比如说汉语,由于汉字属于象形文字,汉字与其所指和能指的关系有其特殊性,讲汉语的人形象记忆功能更发达,这一切是否对翻译有独特的帮助,等等。

她不仅致力于在中国传播释意学派理论,而且借用释意派的理论内核,拓展了口译教学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她在《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一书中借助国内外最新的翻译,特别是口译研究成果,在正确把握思维与口译程序、翻译技能与翻译教学法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推出了一套系统的、具有创新性的推理教学法。所谓"推理"教学法,指的是以人为本,旨在训练学生的翻译思维,激发学生的口译技能意识,提高学生口译技能的教学方法。在全书的四个章节中,第一章从理论上宏观描述了双语思维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翻译思维的基本特征、阐述技能的可训练性,并通过分析翻译教学与教学翻译的差别及翻译心理学特点,说明推理教学法的科学理论基础。在第二章中即推出了口译推理教学大纲,就大纲原则、目标、教学内容与方法、教学进度、入学和毕业测试等进行了细致的阐述。第三章则以理论和大纲为基础,发展了她的交替传译"四步"教学法。第四章探讨了口译教学与语言进修的关系及个人进修方案。显然,刘和平的目的不是探讨翻译教学的结果,而是致力于对翻译教学过程的探讨。在对动态的过程进行观察研究的同时,探讨思维与翻译程序、翻译技能与翻译教学的关系。她的这套"授职于以渔"的教学理论源自于释意派,但却对释意派翻译教学理论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上的拓展。在释意派的教学理念中,首先,主要致力于培养翻译技能,语言问题由受训者自己解决;其次,主要进行职业化训练,不主张专业化训练;第三,在掌握双语之前不能进行翻译技能训练。而刘和平的著作表明,语言训练与技能训练可以同时进行,以技能为主,语言为辅;职业化训练应与专业化训练相结合;在掌握双语之前可以进行口译技能训练,其训练方法就是她在这本专著中所阐述的四个过程。刘和平的这本专著使我们有机会认识思维科学带给翻译教学的影响。她用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了推理教学法在实际运用中的可操作性。近些年,她开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试图进一步论证口译推理教学的科学性,并分析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为不断提高口译教学质量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刘和平发表译著多部,主要有:《世界60位作家和她们的母亲》(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街心花园》(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世纪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宝宝的诞生》(香港三联出版社,2002)、《北京的陷落》(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地下幽深处:幽冥国度的追问》(作家出版社,2005)、《笔译训练指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等。此外,她先后出版专著《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口译理论与教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等。

刘和平在国内外多家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有:《语言教学中的翻译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3期)、《技能化口译教学法原则》(《中国翻译》,1994年第6期)、《中国九十年代同声传译的现状与思考》(《译友》,2000年第5期)、《科技口译与质量评估》(《上海科技翻译》,2002年第1期)、《职业口译程序与翻译教学》(《论翻译教学》,2001)、《翻译的动态研究与口译教学》(《中国翻译》,1999年第4期)、《再论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口译理论与教学研究现状及展望》(《中国翻译》,2001年第2期)、《关于制订口译教学统一纲要的理论思考》(《中国翻译》,2002年第3期)、《职业口译新形式与口译教学》(《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翻译教学方法论思考》(《中国翻译》,2004年第3期)、《股份回购与跨文化研究——译员在交流中的新角色》(*L'HARMATTAN*,2004)、《中国文学翻译的经验与理论》(合作,*Meta*,2004年第12期)、《口译理论研究成果与趋势浅析》(《中国翻译》,2005年第4期)、《法国释意理论:质疑与探讨》(《中国翻译》,2006年第4期)、《口译教学的市场与定位》(《教育技术资讯》,2006年第7～8期)、《谈口译研究与专业口译培训》(《中国翻译》,2007年第1期)、《译前准备与口译质量——从口译实验课谈起》(《语文学刊》,2007年第7期)、《口译培训的定位与专业建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不同层次的职业化口译——中国特色》(*Forum*, 2007年第6期)。

刘和平2001年被法国教育部授予教育棕榈骑士

勋章。

穆雷(1957～)

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全国翻译研究资料中心主任、广东省重点文科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团体任职：曾任陕西省译协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主任/青年译者委员会主任、斯诺研究会理事；海南省译协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理事；香港语言学会顾问等。现任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编委、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比翻译研究会副会长/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译协理事、广州译协/广州科技译协/广州外事翻译学会常务理事、香港翻译学会终身会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委等。

穆雷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翻译教学：包括著作《中国翻译教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和几十篇翻译教学研究论文，以及《翻译测试：理论与实践》(博士论文)等。她的成果主要涉及翻译学的学科发展与翻译教学、翻译教学体系的设计、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师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与翻译教学、翻译测试与评估，以及翻译教材建设等方面。她从1987年开始就注意到翻译教学在翻译学学科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注意到区分“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的重要性，注意到翻译理论对于翻译教学的重要指导作用。她曾几次对全国翻译教学现状、师资情况、教学研究机构情况等进行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研究，与大量的翻译教师和研究生进行访谈，提出在中国内地的语境下发展翻译教学体系的思路。她的博士论文应用模糊数学原理和计算机技术，结合翻译类型的研究成果，建立翻译教学中翻译测试的评估模式，并通过实验证明此模式的实用性。近几年来，她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翻译教学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如改进研究生教育方式，培养研究生形成方法论意识、学术规范意识、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团队合作意识等，带领研究生参与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生，也收获了一批实践与研究成果。

二、翻译家研究与翻译史研究：包括著作《通天塔的建设者——当代中国中青年翻译家研究》(开明出版社，1997)，还有系列翻译家、翻译史的研究论文，如《加强译史研究，总结翻译经验》、《重视译史研究，推动译学发展》、《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家研究的启示》、《翻译家研究：翻译研究的新空间》(合作)和《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合作)等。她把谭载喜、许钧、刘宓庆、方梦之、杨自俭、郑海凌、范守义、郭建中、孙致礼、林少华、杨武能、谢天振等对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贡献进行了及时的梳理和总结。她还与查明建一起，从多元系统理论和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理论等视角，把翻译家和翻译史的研究提升到理论高度进行分析，改变了过去单纯总结归纳翻译家和理论家实践研究成果的感性研究方法，推动了译者主体性的深入研究。

三、西方翻译理论译介：包括译著《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旅游教育出版社，1992)、与文军主编《西方翻译理论著作概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参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选择、编辑、介绍、出版了多套国外翻译理论丛书以及部分研究论文。她始终关注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从中获益，向国内读者进行多种方式的介绍，并借鉴其成果推进自己的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

四、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包括系列论文如《心弦——女翻译家金圣华教授访谈录》、《翻译界：男性的一统天下？——香港女翻译家孔慧怡博士访谈》、《翻译与女性文学——朱虹教授访谈录》、《一个西方女记者眼中的中国妇女》等。她不仅自己关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还指导了十几名研究生从事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形成著作《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即将出版)，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性别研究理论，开展本土化的翻译研究，分析我国女作家如王安忆、张洁、虹影等人作品的译作，也研究英美文学作品如《紫颜色》等的汉译。

五、编写翻译工具书与参考资料：参编《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中国译学大辞典》、参与文军主编的几千万字的《翻译资料与翻译研究丛书》工作。她还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多方征求同行的意见，推出研究生必读的翻译理论研究书目，为翻译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王东风(1958～)

1982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分配至安徽省安庆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开始从事翻译教学。1992年4月调至华南理工大学外语系任教，1993年升任副教授。1996年考入北京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方向博士学位，师从申丹教授，研究领域为翻译学，1999年7月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被南京大学特聘为教授。2000年12月进入广州日报集团，先后在国际新闻部和要闻部任编辑、政文部任记者、广州英文早报任副总编。2002年6月任教于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2004年10月进入中山大学外语学院，担任英语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两个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翻译学院常务副院长。已在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编论文集一部、词典一部、翻译出版长篇小说7部、长篇译著2部，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一项。王东风的翻译研究分为五个主要部分。

第一,翻译的语义学研究,主要时间段: 1989 年至 1997 年。他运用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利奇(Leech)的语义学理论连续发表了五篇论文,分别是《语义类型及其翻译》(《中国翻译》,1989 年第 5 期)、《语言功能与翻译》(《中国翻译》,1991 年第 3 期)、《英译汉中含蓄意义的处理》(《中国翻译》,1992 年第 2 期)、《英汉语序的比较与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 年第 4 期)、《英汉词语翻译中的义素对比分析》(《现代外语》,1997 年第 1 期)。

第二,翻译的美学与诗学研究,主要时间段: 1996 年至 2007 年。主要论文有六篇:《翻译中"雅"的美学思辨》(《现代外语》,1996 年第 1 期)、《论"达"》(《福建外语》,1998 年第 3 期)、《从审美干涉到伦理干预: 论影响翻译过程的跨文化因素》(香港《翻译季刊》,1998 年第 7、8 期)、《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 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中国翻译》,2001 年第 5 期)、《反思"通顺": 从诗学的角度再论"通顺"》(《中国翻译》,2005 年第 6 期)、《从诗学的角度看被动语态变译的功能亏损:〈简 · 爱〉中的一个案例分析》(《外国语》,2007 年第 4 期)。

第三,翻译的文化研究,主要时间段: 1998 年至 2003 年。主要论文有七篇:《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中国翻译》,1998 年第 5 期)、《文化差异与读者反应: 评 Nida 的读者同等反应论》(载郭建中编论文集《文化与翻译》,203～220)、*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论影响翻译过程的诸因素)(*Meta*,1999 年三月号)、《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中国翻译》,2000 年第 4 期)、《文化认同机制假说与外来概念引进》(《中国翻译》,2002 年第 4 期)、《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中国翻译》,2003 年第 4 期)、《一只看不见的手: 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中国翻译》,2003 年第 5 期)。

第四,"连贯与翻译"的主题研究,主要时间段: 1997 年至 2007 年。主要论文有五篇:《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外国语》,1997 年第 6 期)、《语篇连贯与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 年第 6 期)、《变异还是差异: 文学翻译中文体转换失误分析》(《外国语》,2004 年第 1 期)、《小说翻译的语义连贯重构》(《中国翻译》,2005 年第 3 期)、《有标记连贯与小说翻译中的连贯重构》(《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 年第 5 期)。

第五,翻译理论批评,主要时间段: 1996 年至 2007 年。主要论文有七篇:《翻译学之我见》(《外国语》,1996 年第 5 期)、《中国译学研究: 世纪末的思考》(《中国翻译》,1999 年第 1、2 期)、《归化与异化: 矛与盾的交锋?》(《中国翻译》,2002 年第 5 期)、《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互动的》(《上海科技翻译》,2003 年第 1 期)、《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中国翻译》,2004 年第 6 期)、《韦努蒂对传统忠实观的批判》(香港《翻译季刊》,2005 年第 3 期)、《功能语言学与后解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07 年第 3 期)。

王东风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就体现在这五个方面。就翻译的语义学研究而言,他是国内第一个系统地将语义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就翻译的美学研究而言,他是在当时严复的"雅"受到普遍质疑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用美学的原理为严复的"雅"作全面辩护的,同时又是第一个用美学的理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述严复的"达"或"通顺"的;他也是国内最早用诗学的理论来探讨翻译的学者,他的基于诗学原理的论文《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 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一文曾获 2005 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就翻译的文化研究而言,他的一系列文章在翻译学界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和译者的文化态度》和《文化认同机制假说与外来概念引进》分别获得了 2001 和 2003 宋淇翻译研究评判提名奖。王东风最具有个性化特色的研究见于他有关"连贯与翻译"的系列论文,他提出了翻译就是重构原文的多维连贯系统的观点,并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论证,他的这项研究还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他的翻译理论批评也很有特色,最突出的特点是批判性和反思性,《中国译学研究: 世纪末的思考》一文获 2000 年江苏省人文社科二等奖。

王东风的代表性译著有:《牙买加客栈》(长篇小说,译林出版社,2001/2003)、《最后的纳粹》(长篇小说,《译林》,2005 年第 3 期)、《爱情故事》(长篇小说,英汉对照,译林出版社,2007)。

王东风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团体或重要学术期刊的任职有: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委员会委员、第十八届国际译联大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考试中心全国外语翻译证书考试第二届考委会委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译协理事、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编委、《外语研究》编委、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广州外事翻译学会副会长等职。

(东篱)

蔡新乐(1964～)

河南唐河人,文学博士,现为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翻译理论研究所所长,其研究方向是翻译理论与文学理论;著有《〈围城〉艺术论》、《文学翻译的释义学原理》、《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众妙之门——女权主义的生命哲学批判》、《翻译的本体论研究》、《翻译与汉语——解构主义视角下的译学研究》及《相关的相关: 德里达的"相关的翻译"思想及其他》等,译有《王尔德传》、《詹姆逊文集》(部分论文)、《国际文化与文学:〈疆界 2〉论文集》、《西方学术大师演讲集》及《美国研究的未来》等,参与主编、翻译《约翰 · 霍普金斯文学理论与

批评指南》、参与翻译新型百科全书《文化、社会与理论》等;发表论文《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比较》及《逻辑能走多远?——译论与实践的关系简论》等40余篇。

《文学翻译的释义学原理》以释义学的原理为理论框架,以批判目前译学界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出发点,认为有关问题存在的实质是"人的失落",继而探讨了海德格尔(Heidegger)哲学对翻译研究的作用,最后提出了空白说、对应论和多元并存观。蔡新乐认为,翻译应从释义学开始,并经释义完成;文本的语义单位之间有诸多空隙,留待读者想象,同时由读者的想象力引出的释义中也包含着空虚。这两者之间矛盾的解决就是空白的出现——释义从超越的飞升达到无极限的某个极限。其中空隙、空虚与空白三者是相对性的,类似于黑格尔(Hegel)本质论中"从无到无"的观念。释义中空白的出现意味着释义空间的形成。蔡新乐还认为,人与文本之间是一场灵魂对话;对话的结果——译文与原文是"对应的配合"关系。释义总是要表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才会是对应的。他最后强调,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我"与"物"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摆正了这种关系,当"人"的地位确定下来之后,翻译理论才可能是"我"的。如果对"我"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翻译理论势必会沦为机械论或者某种崇拜。

《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以"含意本体论"为理论框架,从精神、文化和语言诸层面入手,探讨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以及翻译过程,认为真正的翻译理论应当回到现象学的思路上来。全书共分十一章。在介绍了何谓"含意本体论"之后,第一章指出,在文学翻译中,人的存在本身才是翻译的源头。第二章在追溯了"间"的汉语历史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它的存在论意味。第三章以第二章中对"间"的认识和分析为依据,回顾了自严复以来的中华译学的哲学建树,进而提出翻译的最高原则是"诚",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如如"。第四章讨论了研究翻译与精神的关系。第五章指出,语内翻译产生的条件——"我"的生存论意义是以"我"的个体化构成为表现的。第六章则讨论对话以及翻译本身的隐含性问题。第七章指出,含意本体论上的意义才是原初的意义。第八章认为,语内翻译实质上是指自我在精神作用下的语内转换,而语际翻译只是它的扩大化,它们的目的都在于扩大生存空间所必需的精神扩张。第九章讨论了翻译过程和语际翻译中的理解过程。第十章批判了海德格尔的阐释循环。在最后一章的总结中,作者指出,任何解释都存在表述的表面化与含意化的深入化这一问题,这或许是翻译中真正不变的因素,而翻译本身的结构变化取决于翻译场中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变化。

《翻译的本体论研究》从翻译与人的关系这一全新的视角入手,以试图为"科学观"与"艺术观"两个极端之外的翻译研究提供新的途径为主旨,通过对当前翻译研究中的工具论倾向的批判提出翻译的本体论应该是翻译学研究的最终出路。本书共分前言、后记和正文七章。首章以德里达(Derrida)对待翻译的态度为切入点,开门见山地提出"走向第三条道路"。第二章则解释何谓"第三条道路"。第三章通过对德里达翻译思想的批判,分析了西方理性主义之外的翻译思想的可能性。第四章以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解释实践"(事件)为实例,说明历史上的"翻译"本身就是强势话语的实施。第五章以"主体间性"中的"间"为依托,追溯了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中有关"间"的思想资源,探讨了语内和语际翻译中的主体间性问题以及"间"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第六章主要探讨了主体本身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元翻译""反翻译"和"非翻译"等全新的思想。最后一章提出"通化翻译"的思想,并突出了翻译的多元化特征。

《翻译与汉语——解构主义视角下的译学研究》以解构主义的方法,通过质疑历史的既定性,来回顾翻译研究中的思想冲突和"现代"展开。全书收有十篇论文。第一篇从西方对中华文化思想的哲学品性的轻视入手,试图揭示出汉语在汉英翻译中被政治化、丑化、低俗化和野蛮化的同时,其生命力遭到破坏的事实。第二篇通过对中国现代有关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鲁拜集》译文的两次批评的分析,指出统一的知识标准,即"欧洲中心主义",会危及语言以及翻译赖以生存的基础——多元性。第三篇提出,清末以来的翻译很大程度上只是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集中表现;要加以破除,就需要对翻译进行再概念化。第四篇论述了翻译是对抗逻辑普世主义的有力武器。第五篇以过分依赖逻辑会造成不可通约性的封闭局面为基础,论证了译论建构不应局限于理论与实践这种二项对立模态,而是应该探寻逻辑之外的可能性。第六篇文章从现代语言学导入,通过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在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史学方法论中所起的作用的分析指出,陈寅恪所要强调的是民族文化的自足,但走向的却是一种可与解构主义相比较的道路。第七篇对陈寅恪在翻译研究领域的贡献进行了综述。第八篇以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天真之歌》的四种译文为例,描述翻译的居间特性。第九篇论证钱锺书的"不隔"说标志着翻译的可行性。最后一篇重点分析了钱锺书"化境"思想中含有的反翻译倾向及其"不隔"说可能对翻译研究带来的启示。

《相关的相关》是研究德里达翻译思想的一部专著,主要致力于对德里达论述翻译问题的有关论著进行细读,其中包括《什么是"相关的"翻译》、《如果有理由去翻译之一》、《如果有理由去翻译之二》以及《翻译的神学》。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探讨了德里达所说的"相关的"的"巴别塔化"指向,即"语言即翻译"的反逻辑态势。其次,以德里达对《威尼斯商人》中所含有的宗教自我中心主义以及西方文化的反

交流倾向的批判为基础，引入了中华文化中有关“易”的思想，将翻译纳入“天人合一”的格局，以期在结构主义译学研究走入死胡同之后，为翻译学找到一条新的出路。第二部分主要梳理了德里达对“普世主义”及“翻译的神学”解构的有关观点。本书认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实质上只是在描述“问题的问题化”，其中含有不可避免的虚无主义倾向，所以，他的翻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概念，甚至连意义本身在他那里也不能派上用场。但这也就是西方思维模式走向终结的表现。因此，翻译研究应该出现另外一种思维方式。

关注理论创新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试图揭示出西方思维存在的缺陷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在翻译研究中导致的结果，同时重视中华文化思想资源在译论探索中运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试图深入理论的形而上化，这是蔡新乐的翻译研究的一个特色。（乔颖）

黄忠廉（1965～ ）

生于湖北兴山县。博士，教授，黑龙江大学（俄汉）译学博导，华中师范大学（英汉）译学博导。1983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俄语系，1987年考取本校翻译学方向研究生，1990年获武汉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分配至江汉石油学院。1997年调入华中师范大学俄语系从事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同年评为翻译学方向硕士生导师；1999～2000年公派留学于白俄罗斯国立语言大学翻译系，讲授汉俄互译课程；2002～2005年师从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2005年进入黑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李锡胤教授。1997～2007年十年间历任系副主任、代主任和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曾任华中师范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北省高等学校跨世纪学术骨干。2007年8月入选“2007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9月调入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10月进入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现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译协科技翻译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安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客座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兼职教授、武汉科技学院外语系特聘教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国外翻译研究丛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翻译资料与翻译研究丛书”专家委员会委员或编委。

近二十多年来，黄忠廉从事俄/英汉翻译与教学工作，其译学研究涉及翻译本质、变译理论、科学翻译、全译理论、汉译语言、翻译测试等。其译学研究特色为：

一、提出变译理论。变译理论是从变译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反映变译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原理和思想体系，研究变译过程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寻求适于一切变译方法的一般原理和方法，是关于变译的本质、特性、必然联系或操作规律的理性认识。该理论确立了变译范畴（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构筑了整个变译理论体系，如变译的实质、系统、手段、方法、单位、章法、机制、过程、范围、价值。变译理论具有原创性；同时将零星的变译方法范畴化，系统化，建立了变译方法论体系。黄忠廉通过《翻译变体研究》、《变译理论》、《科学翻译学》三部专著，将变译研究从方法发展到原理和体系。

二、建立科学翻译学。世纪之交，黄忠廉协助李亚舒建构了科学翻译学的学科框架。“科学翻译学”是以传达科学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及其相关问题的学科，隶属于翻译学，是翻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其基本学科体系为：基本策略、翻译简史、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2004年，黄忠廉、李亚舒合著《科学翻译学》，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科学翻译学》是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的产物，是第一本系统研究科学翻译的专著，通过特性研究揭示了翻译的共性问题，建构了科学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体系，标志着“科学翻译学”的创立。同年，由李亚舒、黄忠廉主编的“十五”国家重点图书“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科学翻译研究卷”开始出版，首次比较系统地研究科学翻译，揭开了中国科学翻译研究的新篇章。2007年，《科学翻译学》入选国家经典名著千卷本“中国文库”。

三、坚持上行为主兼顾下行的研究路向：黄忠廉关注国外译学发展，植根汉外互译事实，既发掘翻译事实，又注重理论构建，迄今主要坚持从事实到理论的上行研究路向，颇具特色。

迄今为止，黄忠廉主持国家、省部级及海外科研项目8项，出版著译作15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国际国内会议文集和学术会议上发文近140篇，其中核心期刊刊文90余篇；三次获省市政府社科成果奖。其成果具体包括：

一、项目：1998～2007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变译理论研究”，“汉译词汇规范问题研究”），教育部基金项目2项（“汉译句法规范问题研究”，“俄汉翻译开发教程”），教育部重大项目1项（“汉语句法机制与汉外互译〈全译＋变译〉本质探索”）、湖北省研究项目2项（“翻译测试研究”，“变译教学研究”）、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资助项目1项（“明末清初传教士变译考察”）。

二、著作：主编《大学核心英语词汇补充词典》（航空工业出版社，1995）；合著《翻译名家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专著《翻译变体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专著《翻译本质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合著《中国科学翻译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专著《变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主撰《科学翻译学》（中国对外翻译出

版公司,2004);主撰《俄汉翻译开发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主撰《译文观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主编《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科学翻译研究卷》(共五本,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2008年出齐)。

三、译著:参译《夸美纽斯教育论著选》(俄译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合译《含油气盆地分析新进展》(英译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合译《知识分子与革命》(俄译汉)(东方出版社,2000)。

四、论文:*The system of variation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Jan.-Dec. 2005);《CET-4新增翻译题型调查与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3期);《Language acquisition与language learning汉译之我见》(《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1期);《句群中枢变译说》(《外语学刊》,2003年第4期);《CET-4翻译题命题原则及其方法》(《现代外语》,1997年第2期);《重识严复的翻译思想》(《中国翻译》,1998年第2期);《翻译研究的"三个充分"》(《外语研究》,2006年第5期);《汉译变异原因探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7期);《翻译教学:需要建立开发意识》(《外语教学》,2004年第1期);《论科技翻译中的形象思维》(《中国科技翻译》,1991年第4期);《论翻译策略》(《上海翻译》,2003年第4期);《小句中枢全译说》(《汉语学报》,2005年第2期);《外国作品中外语词句的翻译原则》(《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双语科技词典词目宜注重音》(《辞书研究》,1997年第4期);《汉译偏正结构中"的"字最佳用量探析》(《修辞学习》,1997年第6期);《翻译:CET-4不可或缺的题型》(《外语界》,1996年第1期);《翻译测试研究:进展与方向》(《中国俄语教学》,1998年第3期);《"似"的必然——翻译的内在规律探索(之一)》(《语言与翻译》,1995年第3期);《大学外语翻译电化教学》(《外语电化教学》,1997年第4期);《变译理论: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国外外语教学》,2002年第1期);《变译的性质及其宏观特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科学翻译的三大原则》(《外语语言文学》,2004年第3期);《双语科技词典外语术语注音状况调查及改进》(《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5期);《经典能守住母语的根》(光明日报,2007-2-3)。

五、获奖:2003年《翻译变体研究》获湖北省社科研究成果(专著类)三等奖,2004年《变译理论》获湖北省社科研究成果(专著类)三等奖,2006年《科学翻译学》获武汉市社科研究成果(专著类)二等奖。

(余承法)

孙艺风

重庆外国语学校毕业后,考入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后在英国与荷兰留学,就读于卡迪夫大学、西敏斯特大学、剑桥大学与莱顿大学,分别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曾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主持英语教学节目,为英国国家电影研究所和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任口笔译等。现任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主任,翻译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和文学翻译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兼暨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孙艺风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团体或重要学术期刊的任职包括: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IATIS)副主席、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及其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委员、英国皇家人文学会会士(FRSA)、英国语言学会会员、香港翻译学会会员、《中国翻译》编委、《翻译学报》编委、《东方翻译》编委、《中华翻译文摘》编委、《中国英语教学》编委、《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编委、《外国语言与文学研究》顾问、《英语世界》顾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翻译研究丛书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翻译与跨学科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专家委员会成员、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孙艺风在以下几方面作了独创性的研究:

一、翻译的距离转换

"距离"(distance)一词和布勒的"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以及伊塞尔的"审美距离"(aesthetic distance)相关,是后两者的发展。文学翻译中的距离涉及很多:源语和目的语间的距离、原作和译作间的距离(可分为表层形式和深层结构两个层面的相互距离)、原作之于源语读者相对于译作之于目的语读者的距离、源语中能指与所指的距离、目的语中能指与所指的距离、原作到译作再到目的语读者的距离以及目的语中不同经历和性别的读者与译作间的不同距离。而文学翻译是译者在这些距离构成的多维立体空间中进行动态把握的过程和结果,意味着译者既要考虑到原作和译作的文化历史语境(自然也就包括比较源语读者和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认知能力),也要考虑到目的语文化的互文资源,更要考虑到翻译文化交流的终极目的。其结果是在关照目的语文化中认知、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化兼容等因素的前提下进行对目的语文本表层干预和操纵,以期达到适合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的目的语读者的距离和译本。单一的消除距离或过度拉大距离都无益于文化交流以及目的语文本的阅读接收——这是对美学中的"距离悖论"(the antinomy/paradox of distance)的创造性运用。

二、差异和张力及意义改写

翻译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和语言的移位(displacement):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形式被并置(juxtaposition),源文本和译本读者被从原来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抽离(uproot)出来,在翻译所产生的似家非家、非家又似家的离散(diaspora)空间遭遇。并置和抽离导致疏离(alienation)、张力(tension)、冲突(conflict)甚至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从而影响着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态度及其对译本的接收。在全球

化的、后殖民的语境下，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抵制和对文化殖民的恐惧使原本就荆棘丛生的语言和文化阐释(cultural interpretation)在种族、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的干扰下更是险象环生，使目的语文化在面对充满异质性(foreigness)的译本时焦虑重重，跨文化交流的难度陡然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所引起的差异并置和张力阻碍了文化交流。

三、对“他者”的研究

他者性(alterity, foreign otherness)，在文化翻译的整个体系中不可忽视，因此给予了系统的探讨。它在自我与他者的遭遇中无处不在且变动不居：它存在于翻译所带来的接触和差异并置中，在加达默尔(Gadamer)意义上的由于视界(horizon)的变迁导致的误读中(这里指翻译语境下的误读)，在克里斯蒂娃(Kristiva)所讲的自我分裂中；它既可外在地表现为形式，也可在暗度陈仓之中隐入于本质。翻译就是自我与他者的遭遇和磨合，其中他者虽因新奇而令人神往，但由于陌生难以捉摸以致引起迟疑、焦虑乃至恐惧。究其原因，翻译带来的他者可能威胁和动摇目的语系统中的语言意指方式(signification)、文化思维方式和社会政治秩序；更有甚者，当他者的遭遇勾起被殖民的记忆，对他者的恐惧和焦虑油然而生。相对主义、西方主义、狭隘的国家/民族/种族主义等都加剧了对这种未知他者的认知困难和焦虑感。因此，面临他者，目的语文化经常有意无意地忽视他者，或出于文化无意识的伪翻译和伪阅读，或出于怀疑的简约(reduction)，或出于文化优越感的轻视与删除，或出于抵制和自我保护的文化制裁乃至诋毁，不一而足。然而，作为文化交流的翻译应以排除自我和他者的两极对立作为出发点和归属，应制定和应用相应的策略帮助目的语文化在他者中发现自我并在自我中发现他者，或认同他者，或暂时成为他者，以此来构建文化中间地带。该地带是个混合体，为他者性留出创造性空间并将其视角显化。从长远意义来讲，文化中间地带有助于目的语文化的自我反思和发展并促进跨文化交流和融合。

四、离散与翻译

“离散”原指(被)放逐于异国他乡的人(the diaspora)/经历和体验(diaspora)，外指身份上的政治离散，内指体验上的文化离散。将“文化离散”的角度首度引入文化翻译，有助于揭示文化翻译的身份、功能和策略等，从而理解其中译者所应扮演的角色以及应具备的能力。作为既能被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欣赏又能让其体验异域文化的异质性(foreigness)的文化翻译(文本)，其身份必然是一种文化杂合体，处于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中间地带，构成了离散的空间，是“自我”与“他者”两极的融合。在离散的空间中，目的语读者的视角被导引和拓宽，遭遇着被熟悉化了的陌生和被距离化了的熟悉，始终在“错位”(displacement)中体验异质性和审视反思原有的自我。最终，其文化身份被再定位(relocation)——他乡变为家乡，文化排异转向文化融合，文化交流的空间也随着目的语读者的视野的扩展和目的语文化的扩张而提高。构建这样的离散空间便是有直接离散体验的译者的文化使命。

五、全球本土化

孙艺风把翻译置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语境下考察，对翻译功能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全球化(globalization)意味着各种本土文化在全球语境下的相互接触，是将差异并置——当然，这里不排除某些本土文化比其他本土文化更为强势。本土化则是某个本土文化对文化他者的抵触、同化和吸收，是对他者的不同程度的消解和对自我的更新——不管这种更新是否有意为之。两者不可分割，同时进行。在此之中，翻译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翻译既推动了离开它便难以为继的全球化，又依赖且促进着本土化。全球化通过翻译激发了本土化——首先便是译本本土化，本土化在翻译中抵制和调和着全球化。最后，翻译的结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在全球本土化中，翻译一方面使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成为可能，使跨文化因子进入本土文化的疆界，推动着文化杂合和多维度多视角的全球语境诞生以及对本土文化的改造；另一方面翻译又充当着文化过滤器，消解了文化殖民和全球文化单一化的倾向，为了本土可达性，使用本土化策略而彰显了本土文化和身份，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和本土语言潜力的激活。翻译中的本土化策略包括对本土整体文化和本土具体情景等知识的把握，进而对本土文化需求的掌握，尽管在此过程中的本土也是变化发展着的本土。

孙艺风的代表性科研成果有：

Displaced Anxie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Translations of Foreign Otherness (forthcoming), *Translations: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co-editor)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8), *Cultural Exile and Homeward Journey: R L Stevenson and American Fic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006)，《翻译研究关键词》(合编，与国际翻译联合会及国际大学口笔译协会合作项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Fragmentation and Dramatic Moments: Zhang Tianyi and the Narrative Discourse of Upheaval in Modern China* (Peter Lang 2002), *Opening the Cultural Mind: Translatio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an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A Journal of Literary History*, Duke University Press, Vol. 69, Issue 1, 2008), *Displacement and Intervention: Re-Creating Literary Texts through Cultural Translation* (*Neohelicon: 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 Vol. XXXIV, No. 2, 2007), *Cultural Diaspora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Vol. 10, No. 1, 2007), *(Multi)*-

Cultural Context: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Adrift (*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Vol. 53, No. 3, 2007), *Translating Foreign Othernes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Vol. 7, No. 1, 2006), *Mediating Cultural Tensions in Translating Foreign Otherness* (*Translation, Cogni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ed. by X Luo,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6), *Transla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Vol. 11, No. 1, 2003), *Cultural Translation: Globalization or Localization?* (*Neohelicon: 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 Vol. XXX, No. 1, 2003),《翻译研究与意识形态：拓展跨文化对话的空间》(《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翻译距离与视角转换》,(《翻译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03),《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 (彭勇穗)

张南峰

1983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翻译科,获得一级荣誉文学士,1987年获得哲学硕士学位(香港大学),1998年获得哲学(翻译学)博士学位(英国University of Warwick)。现任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教授。

代表性研究成果：专著有*Yes Prime Manipulator: Translating Work of British Political Humour into Chinese*(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中西译学批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西方翻译理论精选》(与陈德鸿合编,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译著有《王尔德喜剧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好的,首相》(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并在*Babel*, *The Translator*, *Perspectives*, *Target*,《外国语》,《中国翻译》,《中外文学》,《翻译学报》等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翻译研究方面的论文多篇,其中四篇论文获得“宋淇翻译研究论文纪念奖”。

张南峰是中国最早提倡建立“翻译学”的学者之一。他从早年的文学翻译实践中深切认识到中国传统译论以及西方应用理论的局限性,因此将研究注意力转向文化语境中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其在翻译理论上的贡献主要在批判传统的应用导向的翻译研究,探讨译学建构的内容与方法,译介、批评西方当代译论,以及西方理论之于中国翻译现象适用性的研究等方面。

一、对传统译论的批评。张南峰指出中国翻译传统上的三组矛盾现象：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翻译文学的位置与行为的矛盾、对忠实标准的极端强调与翻译为意识形态服务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认为中国传统译学是“以‘忠实’为目标的应用翻译学”,“目的在于寻求一种指导翻译实践的统一的、绝对的翻译标准,其结晶是‘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而且这种研究大体上是印象式的,无系统的,因此也是缺乏学术价值甚至实用价值的。”(张南峰 2004：Ⅻ)

二、对翻译标准有效性的质疑。张南峰认为传统译学研究的注意力基本都集中在建立翻译标准上,而实践证明,译本是否符合某些标准与是否成功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翻译标准也并没有起到指导实践、提高质量的作用。此外,翻译标准不是恒定不变的,任何翻译标准都有其局限性,因为每一种翻译方法、策略都有不同翻译目的,不可能用一种翻译标准来衡量所有翻译。大部分翻译标准过分强调忠于原文,而忽视了译入语文化中意识形态、诗学、翻译动机、译文用途、译文读者等影响译文面貌的因素,局限了译学研究的范围,使翻译研究走上了一条死胡同,出路在于“建立一门独立的翻译学”,“只有建立了独立的翻译学,才能真正地研究、解决翻译活动特有的问题。”(张南峰 1995)强调翻译理论的作用,应该是发现由文化具体环境决定的翻译规范,而不是自定规范,要求译者遵守。译者依从与否,各由其主。批评翻译的依据不应该是看它是否违反了某种理论的规定或某种文化的规范,而只能是看它能否达到想望的目的。

三、倡导建立翻译学。张南峰认为只有建立了独立的翻译学,才能真正地研究、解决翻译特有的问题。针对中国传统译学研究“规模不大”“范围不宽”“方向不对”方面的缺陷,提出中国的译学建设应扩大研究范围、开展描述性的翻译研究、建立开放的翻译理论。针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观点,指出其过分突出国别翻译学的地位,而忽视了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之间特性与共性的关系,有可能导致阻碍对外国译论的借鉴。纯理论对应用研究有指导作用,具有普遍适用性。中国传统翻译研究里没有纯理论,需要向外国借鉴,作为研究中国翻译现象的框架,然后加以改良,从而参与世界翻译学的构建。

四、对西方应用理论的批评。张南峰针对中国内地偏重于对奈达(Nida)、纽马克(Newmark)等人的应用理论的译介和接受,而缺乏对其局限性的认识,指出奈达译论的贡献在于把焦点从原文与译文的比较转到两个交际过程的比较,把可能影响信息接收的各种语言和文化的问题都考虑在内。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对圣经翻译实践的总结,只在一定范围中适用,但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其他文本。奈达理论最主要的问题,是忽视翻译的目的等社会文化因素,过于重规范而轻描述。针对纽马克提出的文本类型及其翻译方法,指出此理论在论证上的缺陷：文本类型不是固定不变的;纽马克的文本分类法与翻译分类法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翻译方法也不单由源文文本类型决定。虽然纽马克提出了八种翻译方法,但还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翻译目的的需要,而是将合法的翻译范围限于语义翻译和传意翻译两种。应用理论的通病,是试图找到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范性理论,能够完全运用于各种不同的翻译任务。但实际上,每项翻

译任务都有跟所有其他任务不同的语境和目的，而任何先验的规定都不可能把所有种类的语境和目的都考虑到。应用理论的出路，在于增强描述性，减低规范性。

五、对西方纯译论的译介。张南峰在批评中国传统翻译研究的同时，积极译介西方当代翻译理论，尤其是描述翻译学理论和文化学派的理论。针对中国翻译界只关注西方应用翻译学理论的现象，其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合编)，偏重于译介不以指导翻译实践为目的的描述翻译理论，各篇译文前都写有导读导言，提纲挈领，点明源流，勾勒重点。此外还撰有多篇专文，介评多元系统理论等描述性翻译理论以及目的论、双关语翻译理论、文化专有项翻译理论等兼具描述和规范性质的理论。

六、对多元系统理论的批评与扩充。张南峰指出，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套宽阔的理论框架，让研究者可以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对翻译的过程、产品和功能作描述性的研究。但此理论也有不足之处和局限性。由于伊文-佐哈(Even-Zohar)、图里(Toury)集中研究的是语言/文学多元系统，多元系统论在理论上未能充分发展，尚不足以全面阐释翻译多元系统的现象与文化中其他多元系统的现象之间的关系。针对此不足，张南峰对多元系统论作了补充和修订，提出了一个"为翻译研究而设计的多元系统论精细版"，在伊文-佐哈原有版本基础上增加了多元系统分类法的复杂性，以便更具可操作性。"精细版"假设，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语言、文学、翻译等六个多元系统是支配翻译规范的主要来源。这些不同类型的规范，可能互相配合，也可能互相竞争，把译者往不同的方向拉，最终于译者的反应达致一个平衡点，就成了支配该次翻译活动的合成规范。

七、西方翻译理论之于中国翻译现象的适用性研究。1. 运用多元系统理论、三因素论、目的论等描述性理论，以张南峰自译的英国政治幽默讽刺小说《好的，首相》为具体个案，反思中国翻译传统，探讨中国当代翻译文学生产中的政治、文艺政策、赞助系统、创作与翻译的自由度、译作的意向读者等问题。张南峰指出，翻译是在语言、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层面上的有意识操纵的产物，其面貌取决于除源文之外的诸多因素，尤其是译者的诗学和意识形态与目标文化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学和翻译传统的相互作用。2. 以戴维 · 洛奇的《小世界》中译本为例，演示"多元系统理论精细版"。3. 以英汉翻译事例，考察德拉巴斯蒂塔(Delabastita)的双关语翻译理论在英汉翻译中的适用性。4. 通过《傲慢与偏见》两个译本，探讨中国幽默传统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

在译学研究方法上，张南峰对西方任何译学理论都持客观、批评、借鉴的态度，在深入研读的基础上，结合典型翻译事例，分析其合理性、适用性，指出其局限性，并力图加以修正和完善。 （查明建）

2. 国外译论

本雅明(1882～1940)

沃尔特 ·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是 20 世纪上半叶德国影响最大的散文作家、文学批评家和语言哲学家，在翻译学研究上也颇有建树。他的翻译理论和观点主要见于 1923 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译者的任务》的论文。该论文阐述的道理较为深奥，并且带有明显的"灵知"(genostic)或神秘主义的色彩。他的观点新颖，自成一家，在西方翻译史上稳占一席之地。主要可归为如下三点：1. 原文的可译与不可译，取决于原文本身有无翻译的价值；2. 翻译不是译意思，而是译形式；3. 最理想的翻译法是逐行对照式翻译，即逐字对译。现说明如下：

在本雅明看来，传统翻译观中试图通过翻译来传达的信息、内容，甚至于艺术或诗歌作品中的某种诗意的、言外的、神秘莫测的意蕴，都是"非本质"的。因为"一部文学作品究竟'说'(say)些什么？它传达什么？对领悟了作品的人来讲，它几乎什么也没有'告诉'(tell)。文学作品的基始特性不是传达或告之信息。任何意在执行传送功能的翻译，所传送的只能是信息，亦即非本质的东西。这正是劣质翻译的标志"(Benjamin 1996: 253)。

本雅明所持的语言观并非工具主义的语言观，他的翻译观也不可能仅仅是内容和信息的传达和对应，而是有其更为本体的、终极的、带着浓重的救赎色彩的目的的。那么，在这种持续转换的过程中，翻译完成了什么样的任务，而最终又要实现什么目的呢？本雅明认为，通过翻译，原作语言被带进了译文语言的崭新领域，"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最新的、持续不断更新的、最全面的呈显"(Benjamin 1996: 255)，使其经历了一次死后重生的过程。译文就是原文的"后起生命"(afterlife)，在译文中，原作的生命被带到另一个领域或阶段，亦即"历史生命"(life of history)；而与此同时，译文语言也在与原作语言相遇的过程中得以更新。也就是在此意义上，本雅明说："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翻译承担了一种特殊使命：照管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和译作语言的分娩阵痛。"(Benjamin 1996: 256)而翻译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让有着不同的意指方式的语言之间恒定地流动，让不同的语言在相遇和互补的过程中显示出它们之间的亲缘性，最终让纯语言从各种意指方式的协和中呈现出来，达到救赎的终点。而翻译，也在保证在这个恒定的流动过程不断地对语言的发展加以检验，检验它离纯语言有多远，推动着它向纯语言的方向发展。简言之，翻译的使命就是使通天塔后的语言碎片重新整合成纯语言，完成人类的救赎。因此，作为翻译者应该有着把许多语言整合成一种真正语言的抱负，这样一种真理的语言(a language of truth)"无冲突地、默默地存储着一切思

想所要努力获得的终极秘密"。正所谓"道并行而不悖"(《庄子·齐物论》),各种有着不同的意指方式的语言之间最终能够得以在真理语言中形成这种"无张力"的存储,正是因为这种真理语言包容了一切的思想和事物,它就是我们的存在。

然而,在方法上,翻译如何才能使人类语言在通往纯语言的方向发展呢? 怎样才能使语言间那种似乎玄之又玄的互相补充的总体意念得以显示呢?

本雅明再一次对传统的翻译理论进行了反拨和诠释。他提出翻译中的"信"(loyalty)与"自由"(freedom)的问题。但是,"信"是由直译而保证的形式再生产,或曰意指方式的信;而"自由",则是在意义的保留和转换上的自由与不受限制。当然,"翻译时照搬句法使意义复制成为泡影,而且还直接威胁到译文的可理解性,"(Benjamin 1996: 260)这一点本雅明丝毫不打算回避,他甚至还戏谑地说:"在19世纪,贺尔德林翻译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正是这种直译的怪异代表。"(Benjamin 1996: 260)但是,在本雅明看来,这正是真正的翻译所必须做到的,因为真正的翻译就是要达到纯语言的人类救赎的终极目标,要将被打碎的圣器重新黏合在一起。而"如果将一个器皿的碎片粘接到一块,尽管它们的大小形状不必一模一样,但彼此之间必须完全地吻合。同样道理,译作不是要仿造原作的含义,而是要周到细致地与原作的意指方式融为一体,从而使译作和原作共同一起被识别成一个更大的语言的碎片,就像是一只器皿的碎片那样"(Benjamin 1996: 260)。这种"更大的语言"指的当然就是纯语言。而在方法上,只有通过对意义保留和转换的拒绝以及形式再生产方面的"信",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换言之,翻译就是要颠覆一种语言内部意指方式和意指内容之间的稳固的关系,特别是意义和内容对意指方式的控制和固化,引入异质语言的意指方式,打破自身语言已经腐朽了的障碍,从而"……在自己的语言中,将流亡到各异质语言中的纯语言释放出来"(Benjamin 1996: 261)。

本雅明认为,"原作的语言品质愈低、自身特色愈少,它就愈靠近信息,为翻译提供的沃土就愈少,直到原作的内容——内容远非形式完美之翻译的杠杆——取得绝对优势,终使翻译成为不可能。"(Benjamin 1996: 262)换言之,原文愈是重于内容和信息的传达,它对于语言改造的意义就越小,而可译性就愈低,而在真正可译的作品中,意义只是昙花一现似的一笔带过,其译文中的语言也是如此深邃,"以至语言触及含义(sense)的方式,犹如风奏琴(aeolian harp,一种风吹自鸣的梦)被风儿吹拂"(Benjamin 1996: 262)。在本雅明那里,可译性是"某些作品的本质特征"(Benjamin 1996: 254),或曰翻译的价值,是某些文学作品固有的本体特征和"再生"能力。

本雅明对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理解与各种"后"学思想家们的翻译观和文本观之间的内在的神似是不言而喻的。本雅明认为,"译作不是服务于原文,而是因原作而获得自己的存在",它只是由于原文本质的可译性而最接近于原文,而原作则在译文中"获得了最新的、持续不断更新的、全面的呈显"(Benjamin 1996: 254)。这种对传统的译文与原文的关系的颠覆,与德里达(Derrida)的解构手法十分相似。

本雅明的可译性文本是通过对所指意义的否定,使意指方式能够在语言间流动,从而实现语言的互补和创新,让"纯语言"得以显现。本雅明赋予翻译的这种终极的救赎使命,使得他的翻译观和翻译方法卓然超之于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的形而下的论争,而获得了某种形而上的意义。

本雅明把神秘的直觉论和美学、哲学观点一并融于翻译理论中,把上帝的某些特性,包括上帝的不可知性,统统变为语言的特征,从而引出某种不可译论和翻译研究中的神秘主义。本雅明的理论代表翻译研究中的一种思潮,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值得从多方面加以研究、挖掘。(黄海容 2007)

庞德(1885～1972)

埃兹拉·庞德(Ezra L. Pound)生于美国爱达荷州小镇海利(Hailey)一个没落的中产阶级家庭。1901年,庞德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主修艺术与科学;1903年,庞德转至汉密尔顿大学学习古普罗旺斯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1905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罗曼语,次年春获文学硕士学位。1908年初,庞德开始到欧洲闯荡,从此步入诗歌与翻译的丰收阶段。1927年,庞德因其诗歌贡献获得"日晷奖";1949年,庞德因其《诗章》获得"博林根诗歌大奖",1972年逝世于威尼斯。

庞德先后出版诗集、文学评论以及翻译作品20余部,主要包括:1. 诗集:《诗章》(*The Cantos* 1～117, 1970),《熄灭的细烛》(*A Lume Spento*, 1908)和《坎佐尼抒情诗》(*Canzoni*, 1911);2. 文学论文与散文集:《罗曼语精神》(*The Spirit of Romance*, 1910),《阅读入门》(*ABC of Reading*, 1934),《日日新》(*Make It New*, 1934),《文化指南》(*Guide to Kulchur*, 1938),《庞德文学论文集》(*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1954)和《庞德散文选集》(*Selected Prose*: 1909～1965);3. 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初步》(*ABC of Economics*, 1933)和《金钱何为?》(*What is Money for?*, 1939);4. 译作:《华夏集》(*Cathay*, 1915),《日本贵族戏剧选》(*Certain Noble Plays of Japan*, 1916),《神曲》(*Divine Comedy*, 1934),《孔子:〈中庸〉、〈大学〉与〈论语〉》(*Confucius: The Unwobbling Pivot, The Great Digest & The Analects*, 1947)等。庞德的译作还包括中世纪拉丁语黎明颂歌翻译《阿尔巴》(*Belangal Alba*, 1905)、卡图鲁斯(Catullus)的《水手》(*Seafarer*)、中世纪诗人卡瓦尔坎蒂(G. Cavalcanti)的诗歌翻译《卡瓦尔坎蒂

十四行诗与抒情诗》(*Sonnets and Ballade of Guido Cavalcanti*),以及大量民谣作品的翻译,所涉及的作者包括丹尼尔(Daniel)、德·文塔多恩(de Ventadorn)、德·马勒伊(de Mareuil)和维达尔(Vidal)等,这些译作后来收集在《人格面具》(*Personae*, 1909)、《狂喜》(*Exultations*, 1909)和《罗曼语精神》中。

庞德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并通过翻译发现诗歌创作的源泉。在庞德看来,创新是诗学的核心,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二者水乳交融,你我难分,而创新的目的在于构建新的诗学与文学传统,从而拯救整个西方文明。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庞德的翻译主张与他的文学主张、经济思想与政治抱负紧密相连。

首先,从经济思想与政治抱负来看,道格拉斯(Douglas)和奥奇(Orage)的社会信贷理论,以及法克(Fack)、库根(Coogan)和库格林(Coughlin)的反犹太学说使庞德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条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出路,认为社会的根本变革不在于经济的整体变革而在于天才的思想和天才的能力。因此他强烈推崇个人主义,并逐渐走上了反犹太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其次,从文学主张的角度来看,庞德受尼采(Nietzsche)、柏格森(Bergson)、布拉德利(Bradley)、休谟(Hume)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响,崇尚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超验主义,并逐渐形成了其意象主义的文学思想,获取了其创新诗学的源泉。

创新是庞德诗学的核心,通过翻译对美国诗歌进行创新是他创新诗学的集中体现。他批判模仿型艺术家(symptomatic artist),提倡做创新型艺术家(donative artist);批判模仿意识(mimetic consciousness),提倡勃发意识(germinal consciousness);批判接受型思维(receiving mind),提倡构建型思维(conceiving mind)。他企图通过创造性的翻译以及不断尝试新的写作技巧来复活"逝者的声音(dead voices)",并在翻译实践中把过去与现在、历史与将来、传统与创新的张力关系加以创造性运用。在他看来,翻译中的原作代表的是过去、历史和传统,原作的声音是一个"逝去的声音",我们要继承过去、历史与传统中一切有用的东西,但决不能将其神圣化,重要的是要通过译作来实现创新。因此,他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诗人倍加称赞,因为他们创造性地翻译了拉丁先贤的诗歌,从"逝者的声音"中发现了新的价值,复活了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

在翻译实践中,庞德一直秉承"日日新"(Making It New)的创新诗学,从过去的传统中发现新的价值。在他的眼里,对原文作者意图的忠实远没有恢复"诗人恒久的精神状态"重要。他并不关注源语文本的意义,他所关注的是这一文本激发新思想的潜能。他翻译的《致普罗佩提乌斯》以牺牲对原作的忠实复制为代价,以重现普罗佩提乌斯的智慧、他那辛辣的讽刺和丰富的情感为己任,以此"让一个死去的诗人恢复生命,呈现一个活生生的诗人形象;"他翻译卡瓦尔坎蒂诗歌和卡塔鲁斯的《水手》时重视其诗歌中的节奏与音步等音乐特性,为了复制这些特性不惜采用"粗暴的手段(atrocities)",努力探索英语诗歌在音乐表达方面的潜质;同样,他在中诗英译集《华夏集》中,更是通过翻译来表现源语文本内在的新的层面与魅力,通过中国诗来激发英诗的最大表达潜能,从而在中国诗里发现了"新希腊"。

庞德的翻译思想散见于其文学评论中,是其诗学主张的有机融合,涉及翻译的主旨、标准、方法等诸多方面:1. 庞德翻译理论的核心是他的"语言能量"(energy in language)观,"语言能量"是庞德翻译理论的本体。庞德的"能量"观实质上是他反复提到的诗歌的核心或者诗歌不可磨灭的部分(the indestructible part)。他认为单个词语的意义是不可靠的,可靠的是诗人不可磨灭的情感;意义的游移与不确定性正是庞德对意义实质的把握。2. 赋予日常词语最大的能量并寻求人类情感的等式(equations for human emotions)是庞德翻译理论的目的,这也同时体现了他本着自己的诗学主张对源语文本进行操控的改写意识。庞德说:"若论我翻译中是否使用了粗暴的手段(atrocities),我只能为自己辩护说,这些手法的运用大多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是与我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初衷是一致的。"(Pound 1968: 172)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庞德用所处时代口语化的英语进行翻译,彰显其翻译语言的现代性。3. 翻译方法。在庞德的实际翻译中,他并不简单地认为内容与形式孰重孰轻,而更看重原文突出的特质。另外,庞德认为事物本身具有美,这种美是指"原文热烈的情感(emotional intensity)"(Pound 1968: 268)。在庞德的翻译方法里,情感是打开语言能量宝库的唯一钥匙。4. 庞德对诗歌翻译的标准是译者是否传达了原作者的"思想状态(state of mind)",是否传达了原作的"情感之力",达到了理想的"效果",实现了事物本身的"美"。简言之,就是"美"和理想的"效果"。

同时,庞德倡导精确再现细节、词语、片断和对意象的描绘,因此庞德的翻译理论很多时候被称作"细节翻译理论"(Gentzler 1993: 19)。他认为,关键细节和意象的精确呈现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事物本身,传达诗人的情感。他把诗歌分为声诗(melopoeia)、形诗(phanopoeia)和理诗(logopoeia)三类。他认为声诗是诗歌的音乐特质,是不可译的;形诗是"视觉想象上意象的浇铸",可以分毫不差地翻译;而理诗虽然本身不可翻译,但其表达的意思则可以翻译。在文学与翻译的关系上,庞德认为,文学可以从翻译那里获取必要的营养,文学依靠翻译而发展,翻译为文学提供养料,许多优秀的译作本身就是杰出的文学作品,而优秀的译作又可以开阔人们的文学视野,引导人们去阅读原作。庞德主张避免注释的使用,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是既传达了原文的精神主旨,又尽量少地使用注释。他还从文学传统的角度对译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认

为原作者进行创作时,要让笔下的词语充满能量,就必须借助于"传统的力量和数千年来民族意识、默契和联想产生的力量",因此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进入这一传统,明白这一意识,然后通过操控目的语内在的传统和民族意识,重新复制源语的传统和民族意识。

由于庞德的特殊经历,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首先,庞德近半个世纪倾力创作的诗歌巨著《诗章》被誉为现代主义诗歌史上的丰碑,对美国乃至世界现代诗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因此于1949年获得"博林根诗歌大奖"。但有的人认为将这一大奖颁给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和亲法西斯主义者是不合适的,认为他的《诗章》长而不当,内容空洞,只是一场诗人卖弄学问的游戏。其次,人们对他的诗歌翻译褒贬参半。贬抑者认为,庞德不懂外语(特别是汉语),翻译过程中又对原作进行随意删改,其作品算不得翻译。褒扬者认为,庞德的译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华夏集》更是引发了欧洲声势浩大的意象主义运动和美国的自由诗运动,应该从学理上予以相当的关注。就翻译史而论,许多大获成功的译作都是创造性翻译的结果,西塞罗(Cicero)、贺拉斯(Horace)、乔叟(Chaucer)、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严复、林纾、苏曼殊等莫不如是。跟这些翻译家一样,庞德高度重视译文的文学性,为了实现译作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在翻译中采用了创造性的手法。他不仅翻译了诸多西方文学名家如但丁(Dante)、荷马(Homer)的作品,而且对中国古典诗歌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极大的关注,先后翻译了李白等中国诗人的作品和中国儒家经典著作,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此观之,庞德的"翻译"不应该被驱逐出翻译的神圣殿堂,理应对其进行深入而严肃的研究。

当然,对庞德诗歌及其翻译的争论并不影响他在美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他的诗歌,无论是创作的还是翻译的,都贯穿着庞德诗歌理论和晓之以"景"又动之以"情"的意象主义诗歌特色。正因如此,庞德才被公认为意象派诗歌运动的旗手,是20世纪英美诗歌史上堪与艾略特(Eliot)、史蒂文斯(Stevens)等媲美的现代主义诗人,美国译坛的翻译巨匠。

(祝朝伟、周国瑞)

巴尔胡达罗夫(1894~1983)

巴尔胡达罗夫(Л. С. Бархударов),苏联语言学博士,曾任莫斯科多列士外国语师范学院翻译教研室主任、《翻译工作者札记》丛刊主编。他的《语言与翻译》一书的问世,在苏联翻译界引起广泛的反响,被认为是苏联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一部代表作。该书的最大特点是把翻译理论同当今世界上语言学的最新成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出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就是对比话语语言学,更确切地说,是对比不同语言中语义相同的话语,以及正确地传达句子的实际切分乃是求得等值翻译必不可少的条件等一系列崭新的论点。

巴尔胡达罗夫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变换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话语的过程。翻译的对象并不是语言体系,而是话语。翻译中重要的不是各个词的等值,甚至不是各个单句的等值,而是全文的等值。因此,两种语言在语义上的差异并不能成为翻译中不可克服的障碍。在翻译过程中要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即意义,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话语。这里所讲的意义,更确切地说,是原话语中所表示的各种意义的总和。翻译理论要反映翻译中的一切重要规律,必须首先明确原作语言和译作语言中表示同一意义的方法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找出克服其不同之处的最典型的方法(翻译技巧)。这一任务,就其实质来说,是语言学的任务。而翻译理论既然承担这样的任务,就只能是一门语言学学科。巴尔胡达罗夫认为,在确定了翻译理论是一门语言学学科之后,还要进一步确定它在各语言学学科中的地位。现代语言学分为两大类:微观语言学和宏观语言学。微观语言学指狭义语言学,它只研究语言本身,包括一些传统学科,如语音学、音韵学、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等。宏观语言学即广义语言学,它联系超语言现象,即联系语言本身之外的因素来研究语言。宏观语言学包括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种语言学、语言地理学等。此外,语言学学科又可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后者包括直接研究人们在各种活动中如何实际运用语言的一些学科。巴尔胡达罗夫认为,翻译理论属于宏观语言学,同时又属于应用语言学。把翻译理论列入宏观语言学,这意味着翻译理论与超语言因素有关,而不是把它建立在纯语言学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任何话语都有以下三要素:一、话语的主题,即话语的内容;二、交际环境;三、言语活动的参加者,即发讯人和收讯人,双方都必须具有一定的实际经验,其中包括语言方面的,也包括非语言方面的(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没有上述三个超语言因素,就不可能有言语活动。正如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言语活动一样,上述超语言因素同话语赖以形成的语言手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彼此密切配合。了解或揭示话语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这些超语言因素。因为,第一,它们可以排除话语中语言单位的多义性;第二,它们可以补充话语中省略的语言单位。巴尔胡达罗夫认为,翻译理论的研究要依靠语言学理论的原则与方法的指导,然而翻译是各种学科而不是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从各种不同角度研究翻译的各相关学科总称为翻译学,而翻译学的核心是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林夕)

雅各布森(1896~1982)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生于俄罗斯,后旅居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移居美国,加入美国国籍。雅各布森是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创

始人之一,写过大量有关语言学的论文和论著,同时又是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该文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及其普遍存在的问题,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该文自1959年发表以来一直为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作品之一。

雅各布森对翻译理论问题的论述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翻译分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中用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变说法"(rewording)。语际翻译是指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所谓符际翻译(亦称跨类翻译:transmutation),就是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旗语、手势变成言语表达。这三种类型的翻译实际上早已存在,人们也在不同的场合有过论述,但第一个把它们如此高度概括起来的乃是雅各布森。

二、对词义的理解取决于翻译。雅各布森把翻译概括成三类的目的在于说明,在语言学习和语言理解中,翻译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不赞同英国哲学家罗素(Russell)关于经验决定对词义的理解的观点,认为人们对词义的理解,进而也就是对整个语言含义的理解,并不取决于人们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世界的知识,而首先取决于语言本身,取决于对语言的翻译。例如,对于cheese(干酪)这个英语词,任何一个来自不吃干酪的国家的人只要他知道在英语中"干酪"指的是"凝乳",那他就会懂得英语中的"干酪"这个词。所以语言的含义应当附加在符号上,而不应附加给符号所代表的物体本身。没有符号,也就无意思可言。

三、准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对等。对一个词做语内翻译,可以选用同义词,也可以采用迂回表示法。但一般说来,同义词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词。如"凡是'独身生活者'都是'单身汉',但'单身汉'却不一定都是'独身生活者'"。同样,在语际翻译中,符号与符号之间一般也没有完全的对等关系。例如cheese这个英语词及其俄语对应同义词сыр并不完全对等。而要做到准确地翻译一个词或相当于一个词的词组,就必须采用多个词的意义对等的组合,即采用相等信息。而且,人们通常不是用一种语言的信息来替代另一种语言中的单个的符号,而是用信息替代信息。译者把接收到的语言信息译成信号,然后又发出去。因此可以说,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对等信息。

四、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如果语言中出现词汇缺乏,那么人们可以通过译借词、新造词、语义转移和迂回表达法等方式,对语言进行修饰加工。例如,在西伯利亚北部的楚克奇人(Chukchees)的新生标准语中,"螺丝"译为"旋转钉","钢"译为"硬铁","锡"译为"薄铁","粉笔"译为"写字皂","手表"译为"锤动的心"。即使是一些似乎矛盾的迂回表示法,如最初俄语中用来表示不用马拉的电车名称"电马车"(электрическая конка)和西伯利亚的科尔亚克(Koryak)语中用来表示飞机的名称"飞轮船"(jena paragot),也只不过是用来说明马车的电动类似物和轮船的飞行类似物,这并不影响信息的交流。

五、语法范畴是翻译中最复杂的问题。这对于有时态、词性、词数等语法形式变化的语言,尤其是个复杂的问题。语法结构决定着哪些东西是非表达不可的。例如,把I hired a worker(我雇了一名工人)这个英语句子准确地译成俄语,就必须有附加的信息,弄清楚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已经完成还是没有完成,所雇的人是男人还是女人。这是因为,在俄语中,动词有完成体和未完成体之分,名词有阴性和阳性之分。但不管俄语选用哪些语法形式,翻译上述英语句子,都回答不了我"雇过"(英语的过去时)还是"已经雇了"(英语的完成时)工人的问题,也回答不了所雇的男工或女工是特指某个人(英语用定冠词)还是泛指一个工人(英语用不定冠词)。因为英语和俄语的语法结构所要求的信息不一样,所以翻译中就会有各种不同的选择。这样,一个没有上下文的英语句子在俄语中就可以有一系列的译法,反之亦然。于是译文就有可能完全背离原文的意思。同样,词性的处理也往往是翻译中的一大难题。例如,阴性词不能指男性,阳性词不能指女性。当人们使用拟人手法解释非动物名词时,也受到了这些词性的影响。例如,俄国画家列宾对德国画家把"罪恶"刻画成女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他没有看到"罪恶"这个词在德语中属阴性,而在俄语中则属阳性。俄国儿童在阅读译成俄语的德国故事时,非常吃惊地发现,死亡明明是女人(在俄语中属阴性:смерть),却被德国人描绘成老头(在德语中属阳性:der Tod)。"生命——我的妹妹"(my sister life)这种说法在俄语中是完全自然的,因为"生命"(жизнь)属阴性,但要译成捷克语,简直会使译者束手无策,因为这个名词在捷克语中是阳性词(Život)。

在诗中,言语对仗是做诗的一个原则。句法和词法范畴、词根、词缀、音素以及音素成分(如区别性特征)等都会在类同和差异的基础上相互对立、并列、接近,各自有各自的语法意义。另外,当人们说笑话、做梦、玩魔术、使用双关语或做别的文字游戏时,语法范畴的意义也都占有很重的比例。在这些情况下,翻译就变得更复杂,更加容易引起争议,甚至变得不可能了。

(谭载喜)

卡什金(1899～1963)

卡什金(Иван А. Кашкин)是苏联现实主义翻译

学派的创始人。他在前苏联翻译界具有很高的威望，被誉为"代表俄国翻译史上整整一个时代"的理论家。他一向重视翻译理论研究，把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说他一生是为翻译而研究理论，为研究理论而进行翻译。他认为：如果译者不注意研究理论，不关心翻译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原则问题，那他就是翻译匠，而不是翻译家。单凭经验的技术是无法上升到艺术的高度的，永远无法成为艺术。在卡什金看来，理论对译者是行动的指南，是斗争的武器。卡什金创立的现实主义翻译理论概括起来就是忠于原作，忠于读者，忠于现实，充分发挥译者的创作个性。他认为作者与译者不同，作者可以自由选择思想驰骋的领域，整个世界都是他的素材。译者的选择是有限的，只能囿于原作的范围，既要受创作规律的限制，又要受科学规律的限制，既要受语言规律的制约，又要受美学规律的制约。他不同意译者与原作者是敌对的关系。翻译不是决斗，而是竞赛、媲美。译者与作者友好、合作。译者决不应掩盖原作者的声音、原作者的风格，译文表现的是原作者的个性，而不是译者自己。因此译者应具备一些特殊的素质，如对风格的敏感，善于自我节制等。翻译是艺术，它富有创造性，但它必须受原作的约束。随心所欲、自由发挥都不是翻译。译者有一定的自由，但他总是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他必须遵从原作，而且要受到历史条件和翻译水平的限制，受到词语规范的限制。译文的语言必须地道，但必须要让人看到原作者的风格。因此必须保留原作的全部思想内容、结构、形象、民族特色以及语言的艺术特点。译者对语言环境和表达能力要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估计，还要有灵感、有激情。要研究原作，进入原作。译者既是作者的深入研究者，又是作者具有创造性的代表。文学翻译是语言领域中的创造性活动。卡什金强调译者的个性，强调翻译风格。通过译作来表现原作，而不是表现自己，这就是译者应有的个性。翻译风格取决于译者的世界观和他所属的文学流派及其美学观点。译者的天分越高，就越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文学才能，越能充分地领会作者的特点。但是，如不加克制，也很容易使读者看不到原作者的面貌，使读者不能准确地理解原作。翻译同创作一样，其美学观点也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和自然主义之分。自然主义翻译不满足于确切地描写原作中表现的意境，往往在细节上润色。印象主义翻译在忠实传达原作的同时，还要加进自己主观幻想的成分。现实主义的翻译则是真实地、全面地、小心翼翼地保持原作的典型特点，使之区别于自己的风格。原作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决不放过。所谓现实主义的翻译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指力求忠实于原文、接近原文、利用译语的种种手段，再现原作反映现实的手法。这里所说的现实不是译者表面上看到的形式上的现实，而是译者创造性地看到的现实，包括主题以及一切重要的细节。所谓现实，不仅包括语言，也包括形象、艺术等领域。译者不要满足于根据文字获得的大致概念，而应看到实际现象，领悟思想内容。深入理解词语，是为了深入理解原文的客观现实，包括经过艺术加工的现实。译者不仅要探究原文的各个局部，而且要再现原文的整体。为了整体，局部不可避免地要有所牺牲和替补。但这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发挥，而是有根有据的合理行动。总之，译者应力求通过语言手段和文学手段（形象），再现原作中反映出来的现实（意境、现象、思想、感情）的特点。

（李蟠）

纳博科夫（1899～1977）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原籍俄国，1919年移居西欧，1940年去美国，1945年入美国籍，晚年侨居瑞士，是西方评论家最推崇的现、当代文学家之一。由于长期生活在美国，英语便成为他的第二母语，虽然他早期的作品是用俄语写的，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当时他正旅居英、法等国），他就开始用英语进行翻译和创作。他首先译出自己的俄语创作，主要有1938年出版的译著《黑暗中的笑》（*Laughter in the Dark*）、1959年译的《请君斩首》（*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1964年译的《防御》（*The Defense*）、1965年译的《眼睛》（*The Eye*）和1966年译的《绝望》（*Despair*）。此外，他和儿子德米特里·纳博科夫（Dmitri Nabokov）于1944年合译普希金（Пушкин）、莱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和丘特切夫（Чутчев）的部分诗作，1958年翻译出版莱蒙托夫的名作《当代英雄》（*A Hero of Our Times*），1964年又译出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Eugene Onegin*），译文共四卷，前面附有长篇序言和评论。从纳博科夫的整个译文以及读者对这些译文的热烈反应来看，他的译作是成功的。因此，他在英语世界里不仅获得了"20世纪重要小说家"的地位，而且可称得上20世纪的优秀翻译家之一（谭载喜2004：150～151）。纳博科夫早期的翻译以极端意译为主，中年辗转美国的时候翻译转向极端直译，而晚期则倾向于重写。

一、极端意译：纳博科夫早期翻译活动（1917～1940）的特征

纳博科夫比较出色地翻译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柯拉·布勒翁》和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在翻译过程中，纳博科夫采取了各种大胆的归化翻译法。比如，《柯拉·布勒翁》译成了《尼柯尔卡·别尔希克》，《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成了《安妮娅漫游奇境记》，都是俄语化了的标题。尤其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翻译，其归化的翻译法十分引人瞩目：小说中背诵莎士比亚作品的英伦少女爱丽丝变成了背诵普希金作品的俄罗斯小姑娘安妮娅，英国的威廉大帝变成了基辅中世纪的伟大王子弗拉基米尔，英镑也兑换成了卢布。这样的例子在他的翻译中比比皆是。除了翻译小说之外，纳博科夫这一时

期还翻译了许多英语诗歌和法语诗歌，涉及的诗人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济慈(Keats)、拜伦(Byron)、丁尼生(Tennyson)、叶芝(Yeats)以及法国的兰波(Rimbaud)和波德莱尔(Baudelaire)等。这些诗歌的翻译仍然采取了他后来翻译实践中断然摒弃的所谓"优雅模仿"式的翻译策略。(Coates 1999：93～94)

纳博科夫的早期翻译活动中采取狂热的归化翻译法的原因大致有三(李小均 2003)：其一，从阅读接受者的角度来考虑，纳博科夫译文的读者主要是那些失去家园、流亡欧洲的白俄群体，归化的翻译作品便于唤起他们共同的民族记忆，容易产生共鸣，从而有利于加强流亡途中俄罗斯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其二，从翻译对文学创作的启蒙功效来看，纳博科夫可能把"优雅模仿"式的翻译视为是他文学见习的特殊形式，因为翻译能够为其后来的创作提供可资挪用的素材，他翻译过的点点滴滴几乎都能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找到或隐或显的痕迹，这一点可以从《洛丽塔》中丰富的文学素材得到证明；其三，从翻译者的心态来看，那时的纳博科夫正年少气盛，自恃才高八斗，所以有心与原作争强斗胜，自然在翻译的时候要逞能使性，使用归化的文字与原作一比高低。纳博科夫早期的翻译实质上继承了俄罗斯的翻译传统，即通过翻译的归化与挪用来丰富和拓展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视野，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输血补气之功效。正如普希金、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和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一样，纳博科夫有意识地通过翻译挪用了欧洲其他国家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来充实俄罗斯文学。

二、极端直译：纳博科夫中期翻译活动(1940～1960)的特征

初到美国时，纳博科夫把普希金的一些诗歌用他惯用的意译方法译成英语，并立即取得了成功。他的朋友、美国作家艾德蒙多·威尔逊(Edmund Wilson)就对这些翻译作品推崇备至，认为是他平生见到的最好的普希金的诗歌英译。大约 1945 年后，纳博科夫的翻译思想才发生了真正的剧变。他开始意识到，在那些优美流畅的意译之作中，原作者的声音已经被一种假声代替，原作的神韵已经在翻译的过程中遗失，于是，他开始不遗余力地鼓吹直译论。在 1955 年发表的《翻译问题：奥涅金的英译》一文中，他开门见山地宣称："最糟糕的直译也比最漂亮的意译有用一千倍"(Nabokov 1992：127)。因为意译就像"鹦鹉的聒噪"和"猴子的喧嚣"，是对原作的"亵渎"，彰显出译者的堕落(Steiner 1998/2001：252)。他宁愿用直译加注的方式，"我希望翻译中充斥着大量的注释，它们像摩天大楼一样直抵这一页或那一页的顶端，只留一句诗行，在注释和永恒之间熠熠生辉"(Nabokov 1992：143)。

纳博科夫的直译加注释的翻译法集中体现在他翻译的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这项卷帙浩繁的翻译工程始于 1950 年，前后历经了十余载才大功告成。《奥涅金》1964 年的英译本共 4 卷，约 1 500 页，译文 250 页左右，译者序 250 页左右，索引 100 多页，余下的 800 多页全是详尽的注释。这么多的注释立刻受到指责也并不奇怪。早在 100 多年前，德国的施莱格尔(Schlegel)就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诗歌再创造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是让那些无法接近原作的人尽可能不受干扰地欣赏译作。"所以，译者不应该采取注释的方式，因为"对文本的微言大义进行烦琐的考证于读者意义不大。"(Lefevere 1975：50～51)

格雷逊(Grayson 1977：168)猜测，纳博科夫采用直译，也许在于为自己贴上一层学者的标签，以改变因写作《洛丽塔》一书在美国人心目中留下的不佳形象。爱德华·布朗(Edward J. Brown)认为，纳博科夫故意把译文搞得奇特古怪，甚至带上异域情调，实质上是在迎合现代诗歌翻译的异化趋势(Friedberg 1997：154)。勒菲弗尔(Lefevere 1975：27)反诘道："如果翻译能够在字字逐译的基础上达到对等的话，还需要注释吗？如果需要，我们只能被迫得出结论，'直译'本身是无法应付所要翻译的原作的，因此，使用注释无异于说明采用直译的译者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斯坦纳(Steiner 1998/2001：77)的看法最具代表性：纳博科夫坚持直译只是一种策略，不是通过直译再现原作的精神实质，而是以此证明"翻译是不可能的"。另外，李小均(2003)认为，纳博科夫采取直译的动机也许还应该包括以下三点：其一，原作《奥涅金》在俄罗斯文化中具有经典的地位，有俄罗斯文化中的《圣经》之喻，加上普希金又是纳博科夫最崇敬的作家，这无形之中给作为译者的纳博科夫以一定的压力，从译者在翻译时所具有的心态来讲，面对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直译无疑是洗刷不"忠"罪名最保险的选择。其二，从接受对象的期待角度来看，直译是纳博科夫非常可行的选择，因为纳博科夫理想中的读者是他在大学中授课的那些学生，他们有一定的俄语基础，所以他可以在译文中尽量地"存异"，以引导这些学生穿越译文和原著间的中间地带去欣赏俄罗斯文化的精妙之处，而这样的中间地带蕴涵的精妙之处往往为先前那些采用归化方法翻译的流畅译本所抹杀。其三，从译者的文化心态来看，直译是纳博科夫合理的选择，因为在美国的流亡生活中，纳博科夫深切地感受到俄罗斯经典作品英文译本的质量是多么低下以及美国读者对俄罗斯文化是多么缺乏认识。就以《奥涅金》为例，在纳博科夫的译本之前，已经有了四个英译本，纳博科夫在对其他译者的勤勉工作表示由衷地赞赏时，亦不免感叹其中充斥着诸多谬误。因此，纳博科夫希望自己的译作能弥补先前那些翻译中的缺陷，恢复被意译作品抹杀了的异域色彩，揭示俄罗斯文化的丰富特性，重塑俄罗斯文化在美国读者心目中应有的地位，获取相应的尊重和崇敬。要言之，纳博科夫客居美国

时期的翻译工作，不仅是他身为美国大学俄罗斯文学教授的职业需要，更是一种精神需要，是一个来自异域的作家希望自身的文化传统在他乡能够得以彰显和播撒。通过翻译，他成功地打造了自己作为“他者”的文化身份。

三、创造性的叛逆：纳博科夫晚期翻译活动(1960～1977)的特征

1960年，纳博科夫移居瑞士，直至1977年逝世。这一时期，大致可以视为其翻译的晚期阶段，纳博科夫主要的翻译活动是把他早期的俄语著作，如《王、后、杰克》(*King, Queen, Knave*, 1928)、《防御》(*The Defense*, 1930)、《光荣》(*Glory*, 1933)、《失望》(*Despair*, 1936)、《天资》(*The Gift*, 1937～1938)、《请君斩首》(*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 1938)等相继翻译成英语。另外一项比较引人瞩目的翻译活动是纳博科夫自传的翻译。这本书1951年用英语写成出版，标题为《终极证据》(*Conclusive Evidence*)，1954年纳博科夫把这本书翻译成了俄语，1968年他又把俄文版翻译成英文后修订再版，亦即现在美国许多大学英文系的必读书目《讲吧，回忆》(*Speak, Memory: the Autobiography Revisited*)。纳博科夫晚年的翻译活动以译自己作品为主，翻译受到了出版市场的操纵，成为重(改)写的再创造行为，以符合纳博科夫功成名就后的大师形象。纳博科夫的翻译观表面上看来是流动变化的，随着其流亡生活和创作活动的变化，其翻译观也随之而变。但是，纳博科夫翻译观流动表面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即出于对俄罗斯文化的忠诚。因为，尽管纳博科夫名义上是一个美国作家，一个用英语写作的大师，但是，他的骨子里和灵魂里还是流淌着俄罗斯文化的血液，这份对俄罗斯文化的忠诚促使他在早期的翻译中采取了归化的翻译法，从欧洲其他文化传统中吸取养分来丰富拓展本族文化的视阈；出于同样的忠诚，他在流亡美国的中期翻译生涯中，不惜牺牲一切，如文字的流畅、音韵的铿锵、意义的明晰、品位的高雅，甚至英语的文法，也要用极端直译的方式传达出俄罗斯经典作品独特的韵味和句法结构，尽量靠近原作，抵制英语国家文化帝国主义使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对俄罗斯文化的蚕食和鲸吞、消解和挪用，从而全力维护本族文化的独特性；在他晚期的翻译中，采取创造性叛逆的翻译，同样是希望全力维护自己身为俄罗斯文化传人的形象。(据李小均 2003) **(邵璐)**

穆南(1910～1993)

乔治·穆南(George Mounin)是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自1961年起至退休一直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教授语言学与符号学，毕生从事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其翻译思想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都具有重大影响，被誉为当代法国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和最重要代表。主要理论作品包括《美而不忠的翻译》(*Le belles infedeles*, 1955)、《翻译的理论问题》(*Les problemes the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1963)、《机器翻译》(*La machine a traduire: Historie des problemes linguistiques*, 1964)、《翻译的历史、理论与运用》(*Die Ubersetzung: Geschichte, Theorie, Anwendung*, 1967)、《语言学与翻译》(*Linguistique et traduction*, 1976)与《符号的实践》(*Semiotics Praxis*, 1985)等，其中，《翻译的理论问题》一书最为当代西方理论界所推崇。该书以翻译为研究对象，运用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阐释翻译，将翻译纳入科学的研究范围，并被法国教育界和学术界所认可，为翻译研究登入科学研究的大雅之堂打开了通道，也明确提出了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并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探索和审视，在法国翻译研究领域竖起了第一面观点鲜明的语言学旗帜，为翻译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书中的主要观点如下(许钧 2001: 24～63)：

一、翻译与语言学。在西方翻译理论界，前苏联的费道罗夫(Фёдоров)最早且较为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研究应属于语言学研究范围。他在1953年发表的《翻译理论概要》中明确指出，翻译的过程是使用语言的过程。在翻译中，语言问题应放在头等重要位置。他认为，翻译研究首先应从语言学角度加以研究，并宣称只有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手段，才能科学地揭示翻译的规律和本质。关于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他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却一直被语言学研究所忽视。他认为，现代语言学对翻译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熟视无睹，将翻译排斥在其大门之外，是“语言学的耻辱”。因此，当费道罗夫、维奈(Vinay)和达贝尔纳(Darbelnet)为翻译大声疾呼，要求获得科学研究独立客体或独立领域地位时，穆南认为这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新开端。然而，穆南看到争取使翻译在普通语言学论著中获得一席之地，让翻译像双语现象、语言接触现象、语言地理学或词源学一样，受到语言科学的重视，并非易事。除了语言学界的排斥之外，还受到众多翻译家的异议。他们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种严格隶属于科学认识范畴，特别是隶属于语言分析范围的活动。例如，法国的加里，他是著名翻译家，有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的丰富经验，有在国际重要会议担任同声传译的经历，他认为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活动，涉及多方面因素，无法复归于语言学完全合理的科学定义的统一性。在穆南看来，翻译，尤其在戏剧、电影、口译方面，确实具有非语言的方面，但任何翻译活动的基础部分都包含着一系列隶属于语言学的分析和活动内容，而实用语言学能比任何技巧性的经验之谈都更准确、更可靠地给予启示。他认为，翻译和医术一样可以说是一门艺术——一种建立于一门科学基础之上的艺术。

二、翻译与意义。穆南指出：“既然世界被视为一个物质的或精神的、区别明确的事物大仓库，那么

每种语言便以一种独有的标签,一种独特的编号给事物编目选册;既然原则上每个事物大致只有严格标签,且每个编号只代表预先交给所有编目者的同一仓库中的一件物品,那么人们就可以毫无差错地从一种目录过渡到另一种目录。"(Mounin 1963: 22)穆南认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非常复杂,涉及许多方面。他深入地分析了索绪尔(Saussure)、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哈里斯(Harris)、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等语言学家有关语言意义的论述,指出意义问题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但也不像上述语言学家认为的那样不可捕捉。

三、翻译与"映象"理论。穆南通过研究现代语言学的意义理论,指出人们对意义的传统认识并不科学,而索绪尔、布龙菲尔德、哈里斯等语言学家从某种程度上摧毁了传统的意义观,从而对翻译活动的正当性间接地提出了异议。"翻译在大多数人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简单交换,一种纯模仿的技术性工作,不需任何创造。……这一简单的认识造成了人们对翻译的种种误解。"(许钧,袁筱一 1998: 31)鉴于此,穆南说:"看来,翻译的困难源自一些偶然情况,如译者没有抓住源语某一表达法的全部内容实体,致使传译不完整;或如译者对目的语中丰富的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了解不充分,运用有误。在这两种情况中,翻译的错误都是译者造成的错误。若避免了这两类错误,那翻译的其他困难都仅仅来自审美的差异,而不属于语言学的问题,如果原作很美,而译者与之相比无法令人满意,那是因为译者没有才气。"(转引自许钧,袁筱一 1998: 31~32)然而,叶尔姆斯列夫认为,人们并不能通过对所指事物的自然描述,就可有效地显示出某一共同体所采用的语义习惯群体评价与社会舆论的特征。因此,对内容实体的描写首先必须把语言与社会其他结构联系起来,构成语言学与社会人类学其他分支的接触点。正因为这样,同样的自然事物可以根据不同的文明对象得到完全不同的语义描写。穆南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从中看到了一个事实:每一门语言在现实中切分着不同的一面。(忽视另一门语言所揭示的东西,发现另一门语言所疏忽的东西,而且对同一现实的切分单位也有差别,这几乎成了法国翻译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共识。)他认为,这些观点对于翻译而言是致命的,一旦意义没有普遍性的保证,便无法捕捉,因而也就无法翻译。在探讨翻译时,我们决不应该回避新洪堡学派在对语言思维与现实、语言与"世界映象"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时提出的观点,这些观点虽然有些极端,但是对我们打破以往过于简单的认识,进一步认识到不同语言的传情达意规律的深刻差异,从而更全面地认识与发现翻译中的本质障碍,提高翻译活动的自觉性无疑是有益的。

四、翻译、语言与人际交流。翻译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人类文化交流活动,尽管理论上有种种障碍,甚或被看成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都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穆南认为,探讨翻译的理论问题,必须从本质上去认识。只有在深刻认识翻译可行的基础上、认清翻译的基本障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更进一步认识翻译的本质和译者所承担的任务。他认为,古人对翻译的各种见解都基于一种假设,那就是人类的经验、思维具有一致性,人类的认识形式具有普遍性,因此,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很快使一切得到交流,然而,他通过研究现代语言学所探讨的一些有关语言、思维与世界关系的理论问题,看到翻译的困难比人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其障碍也要比古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除了与语言本质密切相关的翻译障碍,还有着世界映象与文明差异等造成的种种困难,但他认为,"当今的语言学在使翻译陷于瘫痪状况的同时,又给了翻译以救助。它通过揭示翻译障碍,使人们不再无视这些障碍的存在。通过描写这些障碍,它同时指出了排除这些障碍的限度,以及如何排除的可能性。通过对语言事实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它使译者得以更为准确地估价其相对的信的程度、自觉地测定其不信的限度,以至不可译的限度。"

五、翻译的可行性。从理论上看,当代语言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新观点似乎都在对翻译的可行性提出质疑。在穆南看来,当代语言学的许多观点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这些假设的正确与否,需要以事实加以证明。而讨论翻译,研究翻译,决不能忽视翻译"实践"本身。因此,他提出,重点是要"探讨翻译者的实践活动相对而言为何又怎样是可行的,尤其要弄清翻译活动的程度和限度。"(转引自许钧,袁筱一 1998: 43)穆南还指出,关于不同世界映象与不同语言切分以及具有差异性的各种文明无法相互渗透的观点,虽然试图在理论上说明翻译的不可能性,但是,只要稍稍用逻辑学的观点进行一番观察,许多特例便可攻破。比如,比亚鲁普(Pyallup)的印第安人关于鲑鱼,爱斯基摩人关于雪,某些非洲部落关于棕绿和阿根廷高丘人关于马的皮毛的叫法之丰富,令人瞠目结舌。对于不同的世界看法和文明是否可以相互渗透的问题,还可以进行更为深刻的讨论,这就是穆南所引用的普通语言学的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语言共相现象"(universaux de langage)的概念和暗示语言中意义的人类学和文化共相现象的概念。实际上,语言学并没有完全否认最后的"共相"一词所覆盖的概念,但是共相现象的存在往往是在研究别的领域时偶尔被发现的,一般都具有附带性的性质,或者只是在涉及分析体时使用的一种逻辑的预防措施,语言或不同类型语言之间的一般区别几乎总是语言学研究的客体。不过,共相的发现对于描写语言学来说虽然是次要的,但对翻译理论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翻译理论一直致力于探索人们为何又怎样进行语言间的交流,尽管有种种说法,甚至有人认为不同语言系统之间存在着彻底的差异。穆南认为,语言有着语言的形态共相,如任何语言都通过一种形式来传达一种实体,又如能指与所指、表达与内容、系统与话语、纵聚

合与横组合之间相互对立与相互依存的关系，句法的三大功能和某些语义范畴。语言的共相或各语言间存在的相似性是宇宙、生态、生理和心理等共相现象存在的必然结果，它们为建立各种不同语言间的交际理论构成了一个较为充足的基础。他以共相的存在为依据，以科学方法论证了不同文明与不同语言之间并非完全隔绝，互不渗透。从翻译的角度看，各语言与各种文化之间的共性，构成了翻译的可行性或哲学意义上的可能性，而不同语言或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则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同时也构成了翻译的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穆南对翻译及翻译理论问题的探索远远超越了一般经验主义的范围，加深了人们对翻译及与翻译密切相关的一些本质问题的认识。从译论建设的角度看，他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穆南对翻译活动持科学和客观的态度。他对翻译活动科学、客观的认识特别表现在对翻译可行性的分析上面。对于翻译可行性的认识，翻译理论确实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从“翻译万能”与“不可翻译”的观点对立阶段逐渐进入了一个认识相对统一的阶段：翻译是可行的，但存在一定限度。其次，穆南对翻译活动始终持发展辩证的观点。他认为，翻译的可行性存在于其限度之中，而其限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语言能力与人类对世界认识”之间是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人类文化史是在人们克服困难，不断认识世界，相互交流的运动中发展的。异语交际，即翻译活动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这一观点对从根本上认识翻译的意义，辩证地处理文化结构与语言符号结构之间的关系，克服翻译活动的盲目性无疑是大有裨益的。穆南对翻译水平的这一认识还从理论上说明了译本不断更新的必要性，也从实践上对更大限度地接近原文，追求译文质量的不断提高提出了客观的要求。随着人类文化与语言的不断相互接触，随着人类知识与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翻译的可行性必将不断扩大，因此，翻译中追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再次，穆南对翻译的探索是多角度的。翻译是一项多层次、多因素参与的复杂的活动，这一特征规定了翻译理论研究的综合性。他的多角度探索表现在对“共相现象”的研究上。他在客观分析翻译障碍的同时，致力于人类思维、文化结构、语言结构的分析与对比，从中发现存在着一些普遍的共有现象，指出语际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异中求同，说明这些共同现象构成了语际翻译的依据与基础。穆南还从人类学、文献学等途径，探讨不同文化的可渗透性以及语义的传达性。穆南作为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更善于从语言学途径去研究翻译的有关语言各个层次问题，他认为，语音结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对比关系研究是翻译研究不可缺少的一个课题，它有助于译者认识语际翻译的等值限度，采用灵活的翻译手段，克服语言各个层次存在的客观差异，以完成翻译所担负的交流思想、交流信息的任务。

翻译理论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穆南对翻译理论的多角度的综合探索也只是从各个不同侧面研究了翻译的某些问题，并带有明显的语言学倾向，而对翻译科学的基本对象、基本内容、基本方法尚未展开研究。（许钧，袁筱一 1998：57） （黄勤）

加切奇拉泽(1914～1974)

加切奇拉泽(Г. Р. Гачечилазе)是格鲁吉亚翻译家，第比利斯大学教授，苏联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译作很多，诗歌翻译尤为出色。他译成格鲁吉亚语的外语作品，包括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戏剧和十四行诗，拜伦(Byron)、雪莱(Shelley)、歌德(Goethe)、雨果(Hugo)等欧洲诗人的诗作，俄罗斯、乌克兰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中的优秀作品，特别是普希金(Пушкин)、莱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谢甫琴科(Шевченко)、马雅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等人的名作。还译过英国民间叙事诗如罗宾汉的故事等。他译诗的技巧圆熟、韵味隽永，译文能创造性再现原著的风格，是公认的文学翻译典范。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翻译理论家。1964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文学翻译理论问题》。1970 年他的《文学翻译理论引论》问世，这是苏联高等学校第一部文学翻译理论教材。他的代表作是 1972 年出版的《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也是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的代表作之一。

他把文学翻译中常见的三种方法上升为三种“主义”：一、自然主义——仅仅复制原文，而不是原文的创造性再现；二、浪漫主义——对原文主观叙述，译文完全服从于译者的创作手法；三、现实主义——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与风格。自然主义的翻译僵死地复制原文，逐字表达每个词的内容，从而损害原作的形式(逐词死译)；或者相反，机械地复制原文的形式，从而损害原作的内容(形式主义)。浪漫主义的翻译方法能赋予所译作品以它本来没有的崇高风格，给译者的幻想、个人构思以充分自由，并且随意地改变原作的形式。只有现实主义的翻译才能排除上述两种偏向。现实主义翻译方法旨在辩证地解决随意翻译和逐词翻译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这种方法不求形式上与原文逐词逐句地一致，它帮助译者在译文语言中发现对应的完全符合原作风格的修辞手段。这样，能更正确地达到逐词逐句翻译者想要达到而未能达到的目的：让读者不失去对译文的民族真实感(语言、风格、叙述形式)；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翻译方法决非让译者随意转述原文，随心所欲，而是要创造性地把原文作为一个艺术整体加以表达。加切奇拉泽认为，文艺翻译是文学创作的形式之一。文艺翻译中的原文，其作用正如原创作中的现实生活一样。也就是说，译者心目中的原文等同于作者心目中的现实生活。既然原文等同于艺术现实，而翻译又是这一现实的反映，加之读者是现实主义

者,那么,译者的反映方法就应当是现实主义的。译者总是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反映原作中的艺术现实,译文在再现原文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时,也势必表现出译者的创作个性。译者的天赋越高,创作个性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不仅关系到译者本人的人生观,而且也取决于译者领会原作者的人生观和原作风格的能力。在谈到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原则时,加切奇拉泽认为,文艺上的等值翻译,可以是语言上的不等值翻译,用不同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时,采用各自不同的语言因素。但是,各种语言因素本身在文艺翻译过程中也同在创作过程中一样,只起次要的作用。作者是一种语言的大师,译者则是两种语言的大师。如果译者既精通原作语言,又精通母语,那么在寻找语言上的对应时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但是翻译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寻求语言上的对应,而是选择最恰当的语言手段来再现原文的各种艺术因素。他还认为,文艺翻译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必须服从艺术创作的规律。文艺翻译同语言规律的关系,正如原作同语言规律的关系一样。总之,问题的关键在于:是把文艺翻译看成一种技巧,研究它的技术问题,还是把文艺翻译看成一种创作,研究它的美学问题。（林夕）

奈达(1914～)

尤金·奈达(Eugene Nida)出生于美国中南部的俄克拉何马城,1936年毕业于洛杉矶加州大学,1943年在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和弗赖斯(Fries)两位著名语言学家的指导下获语言学博士学位。奈达还从事过语言学、语义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他于20世纪80年代退休之前供职于美国圣经公会翻译部,长期担任翻译部执行秘书;主要从事《圣经》翻译和译本修订的组织工作以及《圣经》译员的培训和理论指导。他精通多国文字,调查研究过100多种语言,尤其是非洲及拉美地区的一些小语种。1968年,他担任过一届美国语言学会主席。虽然他不以教书为职业,但他却有着极为丰富的翻译培训和讲学经历。除较长时期在著名的美国暑期语言学讲习所兼职讲授语言学和翻译课程外,他还在多所美国大学担任过客座讲师和教授,并经常应邀到欧洲、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作短期讲学,获得多个荣誉博士称号。美国圣经公会为了肯定他在翻译研究,特别是在《圣经》翻译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于2001年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该公会的学术研究所。自1982年起,奈达先后十余次应邀来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讲学,与我国许多学校和学界同仁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和交流。

奈达是一位多产的语言和翻译理论工作者。自1945年至2004年,他共发表文章200多篇,著作(包括与人合作和编辑的著作)40多部,其中关于语言与翻译理论的著作20余部,还出版了一部论文集。集中代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有1964年出版的《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1969年与泰伯(Taber)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1975年出版的《语义的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 of Meaning*)和《语言结构与翻译:奈达文集》(*Language Structure and Translation: Essays by Eugene A. Nida, ed. by Anwar S. Dil*)、1986年与德·瓦德(de Waard)合著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1996年出版的《跨语交际的社会语言学视角》(*The Sociolinguistics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以及2001年出版的《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奈达的翻译思想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主要发展阶段,即早期带有明显美国结构主义色彩的语言学阶段、中期的翻译科学说与翻译交际说阶段以及后来的社会符号学阶段。

奈达翻译思想的语言学阶段,时间从1943年他写出博士论文《英语句法概要》算起,到1959年在布劳尔(Brower)编辑的论文集《翻译论》中发表《从圣经翻译看翻译原则》(*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s Exemplified by Bible Translating*)为止。在这一阶段,奈达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英语句法现象和词法现象的著作和文章,试图通过对句法、词法和语言翻译问题的描写,阐明语言的结构性质。奈达早期受美国结构主义派布龙菲尔德和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的影响较大,在语言研究中重视语言素材的搜集和分析。他通过到世界各地考察和接触各种不同语言的机会,收集到不少有关言语差异的实例,但他不是把言语差异当作语言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是当作相同本质的不同现象来加以描写。奈达关于语言的这种见解,与乔姆斯基(Chomsky)"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概念相比,至少早提出五年。

奈达翻译思想的翻译科学说与翻译交际说阶段,从1959年《从圣经翻译看翻译原则》一文的发表,到1969年《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出版,前后共十年。这个阶段的研究成就,对于确立奈达在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而不仅仅是在《圣经》翻译理论界)的权威地位,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1959年,《从圣经翻译看翻译原则》作为头号文章刊载在布劳尔编辑的《翻译论》中。《翻译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最有影响的翻译文集之一,195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1966年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其中有许多文章被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奉为经典。奈达的名声也因此从《圣经》翻译界扩大到了世俗作品的翻译研究领域。1964年,奈达的翻译研究达到高峰。这一年,他出版了重要专著《翻译科学探索》(以下简称《探索》)。虽然许多人认为,《探索》中阐发的思想,在他1947年出版的《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一书中已见雏形,但就涉及的广度、深度和书中思想的成熟度而言,《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远远不能与《探索》相比,《探索》是奈达翻译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随后,奈达又

于1969年与泰伯合写了《翻译理论与实践》。这是一部翻译教材,它以《探索》阐述的观点为理论基础,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提出理论,又强调实践,在许多方面补充和发展了《探索》。这个阶段的奈达翻译思想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翻译科学说。奈达在他的中期(20世纪60至70年代)主要著述里,多次使用a/the science of translating/translation(翻译科学)之说,曾经指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描写翻译的功能,即翻译作为科学、技巧以及艺术的层面。他的所谓翻译是一门"科学",是指可以"采用处理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来处理翻译问题",即采取一种语言学的、描写的方法来解释翻译过程。如果说翻译的原则和程序看上去带有某种规范性,那也只是因为在特定的翻译范围里,这些原则和程序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最有用的。然而,"对不同语言里相应信息间的关系进行任何描写和分析,都必须是语言学的描写和分析",因此也就是"科学"的描写和分析。奈达这种"翻译即科学"的观点,在西方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曾有过较大反响。德国学者威尔斯(Wilss)甚至把1947年出版的蕴含这种观点的奈达著作《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视为翻译科学派的起始点。但后来,奈达又基本上放弃他先前提出的"翻译即科学"之说。

二、翻译交际说。奈达把通讯论和信息论用于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就是交际(translating means communicating)。二次大战后,不仅广告家、政治家、商人十分重视语言的可懂性,而且学者、作家、编辑、出版家和翻译家也都认识到:任何信息倘若起不到交际作用,就毫无价值可言。因此,评判一篇翻译是否成功,首先要看它能否被接受者即时看懂,能否起到思想、信息、感情的交流作用。于是,在翻译研究领域里,诸如"交际翻译""功能翻译"以及与之相关的"同等反应论""同等效果论""同等作用论""同等力量论"等形形色色的名称与说法,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而奈达所提的"翻译即交际"以及下面讨论到的他的"读者反应论""动态对等论""功能对等论",也就成了西方翻译研究领域交际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

奈达"翻译即交际"一说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共性论。奈达和雅各布森(Jakobson)一样,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具有同等的表达能力,能使说该语言的本族人表达思想、描述世界、进行社会交际。论点立足于一个"同"字,例如,在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国家,语言中会出现不少科技词汇,而在生产力不太发达或很低的国家,语言中便可能缺乏科技词汇,但这并不等于说后者在表达能力上次于前者,而只能说明在不同的语言里,人们对于语言有不同的要求而已。缺乏科技词汇的语言,并不是因为该语言不能产生科技词汇,而是因为说该语言的人没有,或暂时没有,使用科技词汇的要求。一旦有了这种要求,语言中就会出现相应的词汇,或是"土生土长"的科技词汇,或是从外来语移植过来的"洋"词汇。总之,各种语言的表达效能是一致的。

奈达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使读者看了译文就能一目了然。这就是说,翻译的行文要流畅自然,读者无须源语文化背景知识就能看懂。这就要求在翻译中尽可能少地搬用生硬的外来语,尽可能多地使用属于接受语的表达法。例如,在苏丹的一种语言里,对"悔过自新"这一说法如采取直译,就会使人感到茫然,而应译成当地熟用的"在某某人面前往地上吐痰"。又如,在没有"雪"的语言里,"白如雪"可能令人不解,而应说"白如霜"或"白如白鹭毛"等相应的惯用法。又如在古代的西方,人们见面打招呼的习惯是彼此"神圣地亲吻",而到现在则应变成"非常热情地握手"。

在某种意义上,翻译交际说是奈达翻译思想第二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他整个思想体系最大的特点之一。特别是在《翻译理论与实践》发表以后,奈达的翻译交际理论在西方翻译界,包括东欧和苏联翻译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点从德国莱比锡学派的许多理论家如卡德(Kade)、诺伊贝特(Neubert)以及苏联交际功能派的利沃夫斯卡娅(Львовская)等人的著述里即可看出。

三、动态对等说。这是奈达翻译理论中最为人们熟悉的一个说法。所谓动态对等的翻译,实际上就是翻译交际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具体说来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接受语中用切近(原文)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语信息"。在这个定义中,有三点是关键:一是"自然",指译文不能有翻译腔;二是"切近",指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三是"对等",这是核心。"自然"也好,"切近"也好,都是为寻找对等语服务的。翻译中没有绝对的对等,但译者应在寻求"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上下工夫。在这一方面,翻译必须达到四个标准:1. 达意;2. 传神;3. 措辞通顺自然;4. 读者反应相似。很明显,要达到这四个标准,内容与形式之间无疑会出现某些难于调和的矛盾,有时不是形式让位于内容,就是内容让位于形式,在一般情况下,为了保存内容,必须改变表现形式。内容是首要的,但同时又不能绝对化。应当看到的是,在任何语言信息中,内容和形式往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只管内容不顾形式,通常反映不出原文的美感,使译文显得枯燥无味;只顾形式不管内容,则不能忠实地表达原文的信息,使译文显得华而不实。译者不得机械地理解内容与形式统一、内容先于形式的原则,因为说到底,翻译(特别是译诗)是一种"再创造",而不是"再生产"。

按照奈达的定义,动态对等的翻译不等于传统上的"自由翻译"或"活译",因为动态对等翻译有严格的要求,它要求接受语文本在不同的语言结构里尽可能完满地再现源文本旨意;而自由翻译或活译

则没有此种要求，自由翻译往往是译者毫无节制的自由发挥。

虽然奈达的翻译交际理论和动态对等之说一直到20世纪60～70年代才广为人知，但这些基本理念在他的早期研究中即开始形成。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他担任美国圣经公会翻译部执行秘书数年之后起，奈达即已开始用动态对等翻译理论来指导《圣经》翻译的实际工作。当年出版的《圣经·现代英语译本》就是根据这个理论译成的。该译本出版后，赢得了读者普遍赞誉。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今时今日，特别是在美国圣经公会组织的翻译项目中，译者普遍遵循的一直是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因此，至少在《圣经》翻译领域，奈达的这个理论较好地显示出了它的实用价值。

四、翻译功能说。奈达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对象。要判断一部译作是否译得正确，必须以读者的反应为衡量标准。译文读者作出的反应如果基本等同于原文读者对原作的反应，那就可以认为这部译作是成功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注意语言交际的动态特质，不仅要考虑到语言词汇本身的意义和翻译，同时还要考虑到在语言交际中由于各种因素和语言环境所产生的语用意义以及这种意义的翻译。动态地再现原文主要表现在对以下因素的考虑：1. 语言交际的内容；2. 语言交际的参与者（包括作者与读者）；3. 说话写作的过程；4. 语言交际中使用的具体语言（如特定方言）；5. 传递内容的具体方式。这就是说，翻译要想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必须使译文从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章风格、语言文化到社会因素等方面尽可能多地反映出原文的面貌。

奈达在论述语言与翻译理论问题时，对各种语言交际功能着墨较多。他指出，语言交际功能是多方面的，主要有：1. 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指作者或说话人自我表现时所用的那种语言功能；2. 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指用语言进行思维的功能；3. 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主要包括交感功能 phatic function），指通过语言建立人际关系、进行谈判、辨明或显示身份等的功能；4. 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即传递信息内容的功能；5. 祈使功能（imperative function），指通过语言影响人的行为、导致新的行动的功能；6. 司事功能（performative function），指用语言改变某种状况的功能，如法官宣布某人有罪时所用的语言便具有司事功能；7. 情感功能（emotive function），指通过所用语言使人在感情上作出反应的功能；8. 美学功能（aesthetic function），有时称作"诗功能"（poetic function），指采用各种修辞手段，如比喻、节奏、重复、倒装等，以加强语言的美感和效果。奈达指出，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这些语言功能常常是并用的。例如，表达功能可能和祈使功能同时并举；抒情诗歌旨在引起愉快的反响；交感的言语可能是信息传送的前奏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翻译时不可忽视的。

翻译的正确与否取决于译文读者能在什么程度上正确理解译文。译者的任务不仅是使读者能够大致理解译文，而且要保证读者不对译文产生歧解。从这个角度来谈翻译的正确性，自然就意味着能称为"正确"的翻译会不止一种。如果译文读者是精通源语的学者，那么，即使是最矫揉造作的死译也会是"正确"的，因为读者对译文的意思不会产生歧解。另一方面，在大多数使用语言的地方，特别是当人们使用的是所谓的大语种时，由于社会和文化教育因素的影响，人们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就会有不同的水平。因此，如果要使每一个人都能"正确"理解，就必须考虑词汇和语法结构的难度大小，作几种不同水平的翻译，这一原则尤其适用于《圣经》的翻译。

有些人认为，翻译古典作品，译文所采用的语言形式必须保持古老的风貌才算忠实于原文，才算正确。奈达则认为，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古代作家的服务对象是他们的同时代读者，而不是千百年后的现代读者，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当时是不会含有什么"古味"的。因此翻译中也应当以同时代读者能看懂为目的，而无须一味追求语言上的"古色古香"。

五、四步模式说。这是指翻译过程而言的。奈达提出，翻译的过程是：分析、转语（把分析得到的意义从源语转移到目的语）、重组（按目的语规则重新组织译文）、检验（对照源文本检测目标文本）。在这四步当中，"分析"一步最为复杂，也最为关键，是奈达翻译研究的重点所在。而分析的重点又在语义，因此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中都用了很大篇幅来分析语义问题。他从语义的角度区分四种词类：物体词、活动词、抽象词和关系词。在语义分析中，他介绍了三种方法：线性分析法、层次结构分析法和成分分析法。在对语义的具体分析中，他重点分析了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亦称"感情意义""联想意义"）。语法意义是指词与词、词组与词组、句子与句子之间存在的关系。凡是词组以上的语言单位，其意义并不简单地是词组中各个单词的总和。词组的整体意义有一部分是由该词组的特定结构所决定的。例如，在"老人""灰屋""大树"这样的结构中，第一个单位与第二个单位之间存在着一种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该结构的语法意义。这就是说，词的组合是有意义、有组织的、不可随便调换的。如分析"那些老人盯着我们"一句中词与词之间的组合关系时，不能把它分成"那些老""人盯着"，也不能把"人"和"盯着"的位置倒转过来等。

一般说来，结构相同的词组、句子，其语法意义是相同或相近的。但并非所有相同的语法结构都有相同的语法意义，这是翻译中尤其要引起警惕的问题。例如，his car, his failure, his arrest 和 his goodness 这四个英文词组，在语法结构上可说完全一样。可是各词组中 his 一词与随后各词之间的关系却不相同。

从语义上说，his car 等于“他有车”；his failure 等于“他失败了”；his arrest 等于“他被捕了”；his goodness 等于“他是善良的”。换言之，两个词组之间的关系在第一个词组中是“A 占有 B”，在第二词组是“A 做了 B”，在第三词组是“A 是 B 动作的目标”，在第四词组是“B 是 A 的特性”。奈达认为，以上这些相同结构之所以意义不同，是因为它们均由不同核心句转换而来。因此，要弄清某一结构的表层意义，有必要追溯到这一结构的深层。

所谓“所指意义”，是指用词语来指某一客观事物、某一思想观念时语言所获得的意义。所谓“内涵意义”是指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附加给语言的或由语言导致而产生的感情色彩。“所指意义”是客观的，通常是词典上所载明的基本意义。“内涵意义”则是主观的，由人们的感情所产生，是词典上在给词项上定义后加上“粗俗语”“俚语”“迂腐语”“污秽语”“儿语”等时所指的意义。也就是说，内涵意义指的是词语本义之外的意义。

“内涵意义”的分析比“所指意义”更微妙、更有趣，对于翻译问题的处理也更重要。要正确理解语言的内涵意义，必须考虑三大因素：1. 词语使用者；2. 词语使用的社会场合；3. 词语的语言环境。

首先，某些词语与特定的语言使用者联系在一起，便可能获得与人们对那些人的态度紧密相连的内涵意义。例如，儿童用语会有一种“说话幼稚”的内涵意义，因而不适于用作成年人的语言。又如，社会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乡下人和城里人所用的语言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常见的情况是，人们对某个词的使用者所持的态度无论是好还是坏，都可能变成对所使用的那个词的态度，即可能变成那个词的内涵意义。

其次，内涵意义与词语的社会场合有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使用同一个词，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比如，在教堂和酒店使用 damn（罚……入地狱）这个词，即使是出于同一人之口，在两种场合里所具有的含义也会大相径庭。此外，有的语言表达法往往与特殊的环境相关，如在拍卖场、市场、警察局、住所、避暑胜地、学术讨论会等，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根据所在场合的不同而使用几种不同“语体”，每一种语体又都自有其内涵意义。

最后，内涵意义与语言环境有关。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可能产生不同的含义。例如，在 green with envy（十分妒忌）、green at the gills（气色不佳）、a green worker（业务生疏的工人）和 green fruit（未熟的果实）等惯用语中，green（绿色）含有贬义或否定意义。又如，有些词语具有专义，如 once upon a time 并不真正指“很久以前”，它的含义恰恰是指从未发生过的事，是童话的开场白。语音也常有含义。如在某种纽约方言的发音里，bird 变成了 boid，girl 变成了 goil，third 变成了 thoid 等等。要听懂这些发音并不难，但人们认为这是不标准的发音。“不标准”也就成了这些发音的内涵意义。

以上是奈达翻译思想第二发展阶段的几个主要特点。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以后，奈达对他的翻译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和补充。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原来的交际学派的理论，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把原来理论中的有用成分纳入新的模式。这个新模式，就是奈达翻译思想第三发展阶段的社会符号学模式。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奈达研究最多的是语义问题。如上所述，他的观点是：跨语交际的问题主要涉及语义，若是语义问题解决了，跨语交际，即翻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后来，奈达逐步采用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的方法来处理翻译问题。他认为，必须把语言看做一种符号现象，对它进行解释时不可脱离它的社会环境。集中反映他这些思想的是 1986 年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和 1996 年的《跨语交际的社会语言学视角》。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书中，由奈达主笔的理论部分较完整地反映出了奈达 20 世纪 80 年代的研究成果，可视为奈达翻译思想第三发展阶段的代表作。

与以往的著述相比，奈达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中有以下四点改变和发展：一是立足于社会符号学的翻译理论，强调文本的一切都具有意义，其中包括言语形式，因此不可轻易牺牲形式。就是说，形式也是有意义的，牺牲了形式也就牺牲了意义。二是指出语言的修辞特征在语言交际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翻译中不可不对这些特征予以重视。三是不再采用“动态对等”一说，以“功能对等”取而代之，意在使术语含义更清楚易懂。四是不再采用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的区分法，而是把意义区分为修辞意义、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各类意义又各分为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两个层次。此外，书中对意义与大脑、意义与心理的关系作了阐述，并且提出了意义产生过程中的“同构”概念。

应该说，这些改变基本上具有正面意义。例如，奈达原先提出“动态对等”，后来改用“功能对等”一说。我们知道，不论是语内交际还是语际交际，两篇不同的话语之间并无绝对的对等可言。译者寻求的只能是“切近的自然对等”。不过，“切近的自然对等”是指什么而言呢？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解释是，它是指意义和语体而言；而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中，奈达又把它解释为是指功能而言。语言的“功能”是指语言在使用中所能发挥的言语作用；不同语言的表达形式必然不同，不是语音、语法不同，就是表达习惯不同，然而它们却可以具有彼此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因此，使用“功能对等”似乎比“意义对等”更加准确，因为严格说来，两篇言语材料在意义上是不能真正对等的。

当然，奈达的理论和著述亦非完美无缺。首先，他的理论过于集中在解决译文的交际性和可懂性的问题上，因而其适用范围受到了限制。在《圣经》翻译

领域强调译文的可懂性自然有其道理，但如果在世俗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也始终把译文的可懂性摆在第一位，势必导致译作语言的简化，甚至非文学化。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Newmark)曾经指出："如果把《圣经》中那么多奈达认为读者不能理解的比喻统统删去，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意义的大量走失。"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较多地使用比喻的和新颖的语言，作者的真正意图可能要到字里行间去体味、去捕捉。如果把原作中的比喻形象统统删去，把一切联想的意味统统明说出来，那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译文懂是好懂，但却索然寡味，达不到文学的目的。近年来，奈达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不断在修改和完善过去的一些观点。例如，他后来不再偏重译文的可懂性，而提倡一种"三性原则"，即可懂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并重的原则。另外，他不再全盘否定"形式对应"，而是认为翻译中不可随意打破原文的表达形式。为了扩大自己理论的适用范围，他还特别增加了修辞学内容。然而，尽管奈达作了这些修正，他对其新观点却没能作出更加深刻的阐述；与其说他已使有关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不如说他只是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 (谭载喜)

纽马克(1916～)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生于捷克，少年移民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早先在中伦敦理工大学从事翻译与翻译教学，曾任语言学院院长，是香港浸会大学名誉博士，后在英国萨里大学翻译中心任客座教授。他通晓多种语言，曾创办翻译课程，毕生从事英德、英法互译教学。

纽马克自称，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是他"对普通翻译理论最主要的贡献"(Newmark 1991: 10)。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也说，纽马克"详细分析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重在传达原文的语义内容，交际翻译则注重读者的理解和反映。纽马克照顾到了文本的广泛差异性，这使以上两种不同的翻译法显得特别重要"(Newmark 1988: vii)。纽马克是这样解释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他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英法、英德翻译工作，对历代西方各种翻译理论加以归纳总结而得来的，其中，语义翻译更是受启发于纳博科夫(Nabokov)的语义学理论。这两个翻译法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辅相成，但其基本思维还是囿于传统的翻译二分法。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称法也不是最为理想，因为任何翻译都离不开原文语义的传达，无不是为了人们思想的交际、沟通。上述称法容易招致人们的误解和批评。英国翻译理论界一些人对其理论就颇有微词。有鉴于此，1991年纽马克在对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作了重新审视后，提出了一个新的翻译概念。1994年这个新概念趋于成熟、完整。他将其称之为"翻译关联法"(a correla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并指出这个翻译关联法并不排斥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而是在此基础上将二者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纽马克认为，过去40年来，大量翻译理论的研究主题一直是文本类型学、语言学习、篇章语言学和功能法等。翻译理论家们一直认为：所有的文本都可以大致类分为表达型、信息型和指示型，每个类型要采用不同的翻译法。表达型倾向作者、源语语言和文化；信息型面向读者，重在信息的传播；指示型则意在读者获得信息后所施的行为。所有翻译作品都有明确的目的，译者所要做的是让读者或客户满意。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在许多特殊情况下，翻译这项复杂的工作被看得过于简单化了。翻译并不永远只考虑到文本、话语以及作者和读者、源语和目的语、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等二元论范畴。如果对翻译活动作最基本的概括就会发现，翻译的基本层次主要体现在文字的细节处理上，即对译文进行调整、变更，而这样做时就会出现欠译(undertranslation)，如将隐喻转换或不译，要么出现超译(overtranslation)，译文加入原文所没有的信息。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完全根据整个文本来确定翻译法。从文本考虑固然重要，但稍远了一点，翻译活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词、句的处理上。意义是由搭配、语境或情境来决定的。

翻译关联法的基本定义：原作或源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就越要紧贴原文翻译(The more important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or source language text, the more closely it should be translated.)。

这是两个并行的对比结构从句，两个从句都可以是描写性或评价性的。第二个从句是前一个从句的结果，关联关系是灵活变化的，它不是一个完整、教条化、绝对化的关系，而是反复循环，它可形成后面要论及的几个关联关系，比起传统的翻译二元关系——直译和意译、词与意义、作者与读者、译出语与译入语等——有力得多。那么在上述定义中，"重要"(important)和"紧贴"(close)以及"语言"(language)这三个术语如何界定呢？

纽马克认为，"语言"指的是：书面上的文字，即能指，如声音、节奏、语法、词、标点符号、词序、有形记号等；与此相对的是所指，如思想、内容、思想意识、内在的概念、字面下文本(潜台词)、言外的事项等。

源语的"重要"程度要看译文的特定场合，比如，根据译文阅读对象来确定。但是，一些文本的语言原本就非常重要，如诗歌(诗歌最充分地使用了语言的一切表达形式)、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严肃剧本、法律条文、官方法规、标准术语、谚语、条约、政府政策通告，等等。如果原文读者读来顺顺当当，译文读者却因文化障碍而大惑不解，译者也许就要在译文外面的注解里加上前言或后语。任何重要的文化差异，无论是在作为指示用的惯用语句或报告的格式里，都可以转化到表达目的语文化的惯用语句里。而有一些表达语常常是"超文化的"(即文化之外的)，更合乎逻辑，用它们来翻译当然更好。

纽马克把"紧贴翻译"(close translation)定义为

最贴近字字对译的翻译。它既要保存词的本义(denotation),也要保存词的内涵意义(connotation),不但保存原词、词语等的意义,还保留其用法。贴切是和准确(accuracy)和等义(equivalence)联系在一起的,紧贴的程度因上下文而异。一般说来,非文学文本的翻译有可能比文学文本的翻译更准确。比起非文学翻译者,文学翻译家有更多的文化因素、语言现象要重新处理。在文学翻译的关联关系中,美的因素至关重要:如果作品不是严肃性题材,其语言越优美,译文语言也越要优美,这样意义(sense)就会受些损失;意义越不重要,就越能展现原作的声响修辞效果(sound)。这在翻译剧本(喜剧、喜歌剧)时尤其要注意到。

因此有必要把翻译题材分成两类:真实性题材(fact),虚构性题材(fiction)。虚构性题材在声调和节奏上更加丰富,它涉及想象事物。而真实性题材以事实、数据为本,务求存真。技术翻译者和文学翻译者是不同的人,工作背景不同,要求的条件也不一样,但他们都要有很好的语感,都能写出好文章。翻译文学作品比翻译非文学作品所碰到的文化障碍要大得多,但这两种不同的翻译工作都要致力于一个共同的重要目标:准确、简明、得体(accuracy, concision and usually an agreeable style)。

由上述翻译关联法基本定义,还可以衍化出其他关联关系。

一、原文的语言或原文任何一个层次的语法单位越不重要,就越无须紧贴地翻译过来。因此,如果文本的某一部分不重要或写得不好,就可以用一般性社会习惯用语替换。

二、原作意义(meaning)的细微差别越不重要,其信息(message)则越重要,欠译则越说得通,因而使用译文的一般词语或成语效果更佳。信息强调的是言语行为(语内表现行为),其目的在使读者响应或采取行动,它和意义形成对照,意义纯粹是描述性的。采取这种简化、澄清、强调和对比的翻译法乃翻译信息文本之常法,但却不适宜翻译严肃性的作品。

三、翻译一篇普通的信息文本,如技术报告、新闻报道,或旅游、宣传材料等,原文写得越不好或结构越差,越要加以重写或重组。当然,翻译一篇市长的市情报告不能与翻译一篇普通材料相提并论。翻译一般材料时,译者可以在文本语言和结构上更充分发挥译写水平。

四、译文读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能接受源语表达法。反之,其程度越低,就越不能接受这种表达法,可采用删除,或用目的语特有表达法替换。原文越正规,越不能在译文内添加信息,而要采用加注的形式。其实,所有的翻译多多少少都是解释或阐译。例如西班牙语中,Entramos en Talpa cantando el Alabado 译成英文是 We entered Talpa singing the Alabado, the morning song of praise. 在这里译者增加了 the morning song of praise 以解释 the Alabado。

五、意识形态的成分越少,译文越容易贴近;意译的程度越大,说明意识形态的成分越大。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指的是译者当时流行或不流行的相关思想、概念。这也涉及译者与原作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有时间性也有区域性。

六、原文文本越复杂,翻译时可供选择的措施就越多,这就越有赖于译者的创造性阐译。文本文化性越少,译文越易于表达。

概而言之,纽马克的关联翻译法把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糅成一体,以一种连动的形式再加以表达。他始终从语言细微处来讨论翻译问题。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把翻译题材分为真实性和虚构性两大类,对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的差别解释得相当透彻。(杨士焯 1998)

(林夕)

卡特福德(1917～)

约翰·坎尼森·卡特福德(John Cunnison Catford)一直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是著名的英国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他能流利地使用法语,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俄语和现代希腊语,还略懂德语、梵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和印度尼西亚语等语言,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语言学家。

卡特福德的学术著作主要是语音学方面的。卡特福德论翻译的代表作是《翻译的语言学理论》,该书196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入牛津大学语言与语言学习丛书。1967年再版。1979年此书曾由委瑞内拉大学出版社译成西班牙文出版。还有一篇名为《翻译和语言教学》的文章则是1964年在法国南锡大学文学与人文科学系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

卡特福德在该书前言中开宗明义地阐述了该书的目的是分析什么是翻译和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在语言描述中已经确立的范畴,并揭示这些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的前言里指出:"由于翻译与语言有关,因此分析和描述翻译过程时,必须充分使用语言描述中所已确立的各种范畴。换言之,必须采用一种语言的理论,即普通语言学理论。"他还提到,在该书撰写过程中,有很多章节他曾与爱丁堡大学的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博士讨论过。从书中也不难看出,该书应用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主要是韩礼德所提出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弗思(Firth)著作的影响。

卡特福德借用了韩礼德的系统语法及其对语言"层次"的分类来说明翻译转换现象。翻译转换指翻译过程中语言形式发生变化的现象。他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系统论述了翻译转换的定义和类型。系统语法理论有三套基本层次(形式、实体和上下文)、四个基本范畴(单位、结构、类别和系统)和三个阶(级阶、说明阶和精密阶)。卡特福德的转换理论主要使用了语法和词汇两个层次,单位、结构、类别和系统四个语法范畴。

卡特福德运用韩礼德的“阶和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来描写语言与翻译,可以称作“描写性”翻译理论。他用阶和范畴语法中“级阶”(rank)这一概念,解释了“直译”“意译”“逐字翻译”等传统概念。根据他的理论,“意译”往往不受“级阶”限制,等值可以在级阶上上下自由变动,并且总是趋向于往较高的级阶上变动,有时甚至可以在比句子更大的单位之间变动。“逐字翻译”主要在词素或单词这一级阶上进行。“直译”介于这二者之间,即在直译中可做“级转位”(rank shift)。但直译中的级转位仅限于词组或句子,也就是说,直译始于逐字翻译,然后按照译语语法进行变化,使其变为词组对词组或者句子对句子的翻译。

《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翻译等值。作者认为确立翻译等值的基础是语法等级,即词素、单词、词组、子句和句子。他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翻译等值的性质和条件。

该书还采用了主要来源于弗思的意义理论。弗思把意义定义为:与任何语言形式或它可能具有的任何形式(文本、文本中的条目、结构、结构成分、级别、体系中的术语)有关系的总网络。卡特福德认为,翻译理论必须依靠意义理论。他指出:“意义在翻译中,特别是在完全翻译中非常重要。”因为“翻译往往是按所指意义的意义来界定的。”(卡特福德 1991:42)他还指出,按照弗思的观点,认为源语和目的语文本“具有相同的意义”或者认为在翻译中发生“意义转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他从语言学理论出发,详细论述了翻译的定义和各种基本类型,说明如何根据语言学的概念去划分和区别全文翻译与部分翻译、完全翻译与有限翻译、直译、意译和逐字译,还有音位翻译、词形翻译、音译、语法翻译和词汇翻译。他还围绕源语和目的语在语言结构和文化诸方面的差异,探讨了翻译的原则、翻译的转位和可译性限度等一系列有关翻译的理论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卡特福德试图提出一种系统而全面的翻译理论,该理论可以适用于任何具体翻译问题的讨论。

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的创立和发展是有开创性的。

一、卡特福德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详细解释了翻译中的转换现象。“转换的方法是翻译实践最基本的方法。‘翻译’这个词本身就是指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也就是说把一种语言的语音、文字、词汇和语法等系统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各个系统。只要我们承认各种语言表达思想观念的方法各不相同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就应该承认翻译转换的合理性,正是转换的必要性使得语言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没有转换,就没有翻译。”(李汉林 1987)卡特福德根据语言的层次和范畴,将转换分为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阐明了转换现象的理论根据。翻译转换是机器翻译的重要理论依据,实现机器翻译就要制定一系列转换规则。因此,从理论上阐释翻译转换也有助于机器翻译的发展。

二、卡特福德指出了翻译等值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确立翻译等值关系的方法和条件。翻译等值并不意味着再现原文的全部内容或者说全部信息。他提出译者的任务主要是寻求内容等值,而不仅仅是形式对应。他把翻译理论与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谈论翻译,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等值的译文,理论的目的在于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这种语义的等值。(谭载喜 1985)他还首次将概率的概念引入翻译理论研究,用概率定量地说明翻译等值关系,给翻译等值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以比较具体的内容。

三、他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框架详尽而系统地描述了翻译理论中的不少传统概念,如直译、意译、逐字翻译、全文翻译、部分翻译、完全翻译、有限翻译、音位翻译、词形翻译、音译、语法翻译和词汇翻译等,使原先对一些问题的主观判断有了一个客观的标准,得到理论上的阐释。例如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将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直译”“意译”之争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比较满意的答案。

四、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翻译理论。这一理论本身虽有欠缺,但它为翻译理论研究的科学化指明了方向。近几十年来,语言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外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除卡特福德外,还有苏联的费道罗夫(Фёдоров)和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英国的纽马克(Newmark)、美国的奈达(Nida)和法国的穆南(Mounin)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翻译理论研究中运用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着重成分分析,强调翻译对等,力求使翻译研究更加客观,更加准确,更加科学,从而对翻译实践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五、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不少是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中从来没有涉及的。触及语言的本质特点,当中其实有不少真知灼见。而最为津津有味、永远不会‘过时’的是他对于意义的精辟论断。令人遗憾的是,卡特福德的理论没有引起国内学界足够的重视”(林克难 2001)。

今天看来,卡特福德理论的缺陷是比较明显的。跟所有其他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一样,卡特福德也认为翻译理论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卡特福德的理论主要分析和描述了翻译过程和翻译转换,但却没有提及翻译标准,没有说明为什么在翻译中要采用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的方法。因此,他的理论是不全面、不完整的。翻译的目的在于交际,翻译研究不仅要考虑信息的发出者,也要考虑信息的接受者;不仅要研究原文和译文

本身,还要研究译文的读者。 (穆雷)

塞莱丝科维奇(1921～2001)

达妮察·塞莱丝科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出生在法国巴黎,二战后在巴黎索邦大学和高等商业学校学习会议翻译,毕业后,先后在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华盛顿国际原材料大会做译员,随后到卢森堡让·莫奈主席领导的欧洲煤炭与钢铁共同体做译员。1956～1969 年她的足迹遍布各大洲,完成了 100 多种不同主题的会议的翻译,其间为戴高乐将军和铁托总统等国家元首担任翻译工作。1956 年开始在当时的口译学院任兼课教师,这所学院发展为后来的巴黎高等翻译学校(ESIT)。1969 年被提升为讲师,1973 年完成国家博士论文答辩。1975 年被聘为巴黎第三大学教授。1982 年开始担任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校长,直至 1990 年退休。她于 1974 年在该校创立了第一个翻译科学博士学位,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成为释意派理论的研究中心。截至 2006 年有近 60 名博士毕业。她还是国际口译工作者协会(AIIC)的创始人之一,为改善译员工作环境和保护译员的权利义务作出了贡献。

丰富的翻译实践经历使塞莱丝科维奇对言语科学与交际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68 年她发表了《国际会议译员——言语与交际问题》(*L'interprète dans les con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 problèmes de langage et de communication*),"释意理论"(théorie interprétative / théorie du sens)从此诞生。1975 年她的《言语、语言和记忆——交替传译笔记研究》(*Langage, langues et mémoire-étude de prise de notes en interprétation consécutive*)出版,对言语、语言、认知、记忆、意义等作出了明确的定义,说明译员翻译的不是语言,而是语言所表达的内容,这也为当时的语言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塞莱丝科维奇和勒代雷(Lederer)1984 年和 1989 年合著的《释意翻译》(*Interpréter pour traduire*)与《口译推理教学法》(*Pédagogie raisonnée de l'interprétation*)集中反映了释意理论观点,也成为欧洲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教学指南。

释意理论研究主要围绕翻译对象、翻译过程、翻译的层次、意义、意义单位、语言知识与认知知识、语言与记忆的关系等展开。该学派认为,意义在未经表达之前,并非是以语言的形式储存在人的头脑之中。意义一经用某一语言表达,又会在别人的头脑中以"非语言"的形式形成某种概念。因此,翻译过程应该是:理解——脱离源语语言外壳——表达。为了证明翻译的对象是意义,塞莱丝科维奇和她的研究团队进行了多年的论证和研究。

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学派不同,塞莱丝科维奇选择了有鲜明交际特点的口译作为观察、解剖和研究的对象。她放弃了当时盛行的语言比较和对翻译结果的研究,把精力投入到对翻译过程的解剖和论证上。第一阶段她提出要严格区别"教学翻译和职业翻译""口译和笔译",研究重点放在论证在两个语言体中间有意义产生这样一个阶段,即理解后意义的产生,在用目的语表达时,选择表达方式的依据仍然是意义,而不是源语形式。应该说,释意理论是"翻译程序的基本理论"(Lederer 2005: 89)。

作为译员的塞莱丝科维奇非常清楚,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运作,从事翻译的人是用一种语言把作者的所欲之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这远远超出了语言范畴,与认知有更密切关系。她在阅读当时最有影响的作者时感到十分惊奇,因为几乎所有的作者都忽视了人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研究的都是语言问题。她希望深入研究言语和记忆机能,因此先后对交传和同传进行实验。释意理论当时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意义是怎样产生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在意义形成中分别起什么样的作用?语言外因素与陈述的关系是什么?听众/读者先前的认知知识对意义的构建起何种作用?陈述提供的认知环境扮演什么角色?理解后产生意义,如何表达这个意义?

释意理论通过实验提出"语言对应"(correspondance)和"意义对等"(équivalence)概念,认为,篇章的整体意义、提喻概念等要采用意义对等翻译方法,单一意义的词(例如数字、专有名词等)采用语言对应翻译方法。译员/译者的任务是采用明喻或暗喻方法实现篇章意义的对等。因此,提喻可以从理论上解释释意模式。勒代雷最终提出了翻译中的"意义单位"概念,即口译中篇章的理解基础不是语言,也不是事先能切割成段落的陈述。每一个听话人认知知识水平不同,处理信息的能力不同,因此意义单位长短会因人而异,而意义单位衔接在一起就构成篇章意义。

释意理论从其诞生就具有跨学科特点,研究人员借助神经学、心理学、语言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理论不仅试图回答翻译学本身提出的基本问题,而且超出翻译学范畴,努力回答言语机制、语言与篇章的关系等问题。从最初的感知到对翻译成功经验的分析和思考,从对口译的实证研究到对不同翻译形式的研究,释意理论无论在概念上、理论上、方法上,还是术语上都与各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流派有过碰撞或冲突。塞莱丝科维奇从一开始就面向其他学科,或者是为了批评他们的观点,例如同一些语言学家的争论,或者是为了找到理论上的支持和帮助。她和勒代雷同神经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紧密合作,1980 年召开的以"理解言语——语言学家、口笔译人员和神经心理学家的见解"为题的研讨会便是很好的例证。塞莱丝科维奇指导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有很多跨学科翻译研究,涉及的学科有:科塞留(Coseriu)的言语理论、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的交际演绎模式、范戴克(van Dijk)的篇章语用实用理论、巴赫京(Bakhtine)的语言创造美学论、巴尔特(Barthes)和热内特(Genette)的叙述和符号学理论,还有阅读

的认知论、术语、皮亚杰(Piaget)的遗传心理学及电影和剧本创作理论等。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在语言层面的明喻中加入隐喻内容才能形成意义。鉴于语言间存在差别，在相同的东西需要用不同表达方式表达的时候就要“明喻+隐喻”。正因如此，需要建立篇章层面的对等，语言的对应只能视情况在必要的时候使用。

对于释意理论来说，intention(intention 意图)，vouloir dire(to want to tell 所欲之意)和 sens(meaning, sense 篇章意义)是有严格区别的，翻译的对象是篇章意义，而这个意义中需要融进讲话人/作者要表达的意思，但不是交际意图。篇章意义(信息)+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情感信息+恰当的语言形式，这是译者要理解和表达的内容。

塞莱丝科维奇创立的释意理论对译学的主要贡献有三点：

一、在特定时期提出以译者为研究对象，从而将传统的翻译研究从静态和语言层面的思考带入了动态和认知层面的探究。换句话说，语言研究被言语研究替代，这是对言语科学的重要贡献；另外，为避免在借鉴其他学科时造成理解和表述上的混乱，该学派不断规范了翻译研究术语。

二、释意理论是翻译程序的基本理论，它指出思想与语言的差别，特别是在理解后有脱离源语语言形式的意义产生阶段，译者表达的恰恰是脱离了语言形式的思想(信息)。在翻译研究中，人们一直围绕可译性进行论争，而“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得意忘形)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信息意义是可译的，且不受各语言之间的差异影响；在职业翻译中，意义对等是第一原则。

三、严格区分职业翻译教学与语言教学，为培养高层次翻译人才提出了以翻译理论为指导、以技能训练为原则的一整套相对完善的教学方法。

(刘和平)

赖斯(1923～　)

卡塔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德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德国功能翻译学派四大代表人物之一，弗米尔(Vermeer)和诺德(Nord)的老师。先后任教于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维尔茨堡大学(University of Wuerzberg)、美茵茨大学(University of Mainz)。赖斯迄今已发表 90 多篇文章和评论，许多论著被译成多种语言。《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是赖斯翻译研究的代表作。

赖斯在自己的翻译批评理论模式中首次提出了文本类型学的概念，其相关著述构成了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学术基础(Snell-Hornby 2000：foreword)，对当代翻译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和贡献(Chesterman 1989：105)。她认为，文本类型分析是客观全面的翻译批评和评估的首要前提，不同类型的文本需要不同的翻译评估标准(Reiss 2000/2004：16～17)。一般情况下，原文的文本类型是评估译文的参照标准，翻译批评和评估不可脱离原文进行(Reiss 2000/2004：3)，原文的理解和分析是使翻译评估获得客观而有建设性结果的必要保证(Reiss 2000/2004：9～15)。译者对文本类型的区分则是确定翻译方法的首要因素。

赖斯文本类型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布勒(Bühler)的语言功能三分法(Reiss 2000/2004：25)。遵循布勒把语言功能分为三种基本功能(表现功能、表情功能、诉求功能)的提法，赖斯根据文本的主要功能把文本划分为三种类型(Reiss 2000/2004：25)，即信息型(informative)、表情型(expressive)和操作型(operative)。赖斯还提出了第四种文本类型：声音媒体类型(audiomedial type)。这种文本不是用来阅读，而是用来说或者唱的，通常有非语言的媒体辅助或伴随出现。

赖斯还对文本的两种分类形式作了区分：文本类型(Texttypen)是按照主体交际功能分类，文本体裁或文本种类(Textsorten)则是按照语言特征或惯例常规分类(如划分工具书、讲演稿、讽刺作品或广告所依照的标准)。在她看来，每种文本类型都可能包括多种不同的体裁，但一种体裁(如书信)不一定只涉及一种文本类型，因此也不限于一种交际功能。由于各种语言中的文本体裁约定俗成，相互对应，因此结合体裁分类的文本类型分析对确定翻译策略有重大意义(Reiss 2000/2004：25～26)；同时，同种体裁在不同语言中其语言特征和文本结构形式、语篇特征经常不尽相同，确定文本体裁可避免因遵守源语惯例常规而导致译文功能与原文功能不对等(Reiss 1981/2000：125)。赖斯概括说，在翻译过程中划分文本类型与文本体裁的意义在于：文本类型确定总的翻译方法策略；文本体裁确定语言惯例和文本常规结构形式(Reiss 1981/2000：126)。

赖斯(1976)曾讨论过基本文本类型与各种文本体裁的关系，切斯特曼(Chesterman)后来用图表描绘出她的两种分类的大致关系(见下页图 1)。图中可见，最典型的信息性文本的例子是参考用书，诗歌最具表情功能，广告则是最具感染力的类型。在参考书、诗歌和广告三者之间，还有一些具多重功能(compound functions)的文本类型，例如人物传记可能是信息性与表情性兼备的类型，布道则是既有信息性又具感染力的多功能文本类型。

赖斯后来进一步阐述了各种文本类型的语言特点，并总结了文本类型与翻译方法的总体关系(Reiss 1989a：108～109)，即文本的主要功能决定翻译的方法：信息型文本应译成简朴的白话文；表情型文本的翻译应采用仿效法，以使得译文忠实于原作者；操作型文本则适宜编译，以达到与原文本等效，具体见下页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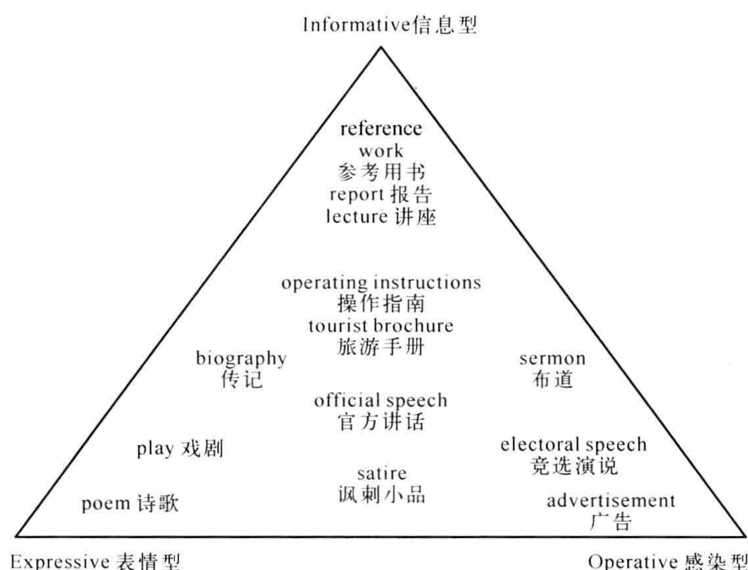


图1 赖斯的文本类型与文本种类(张美芳 2005a：72;Chesterman 1989：105)

文本类型 Text type	信息型 Informative	表情型 Expressive	操作型 Operative
语言功能 Language function	信息的(表达事物与事实) Informative (representing objects and facts)	表情的(表达情感) Expressive (expressing sender's attitude)	感染的(感染接受者) Appellative (making an appeal to text receiver)
语言特点 Language dimension	逻辑的 Logical	审美的 Aesthetic	对话的 Dialogic
文本焦点 Text focus	侧重内容 Content-focused	侧重形式 Form-focused	侧重感染作用 Appellative-focused
译文目的 TT should	表达其内容 Transmit referential content	表现其形式 Transmit aesthetic form	诱出所期望的反应 Elicit desired response
翻译方法 Translation method	简朴的白话文,按要求做到简洁明了"Plain prose", explicitation as required	仿效,忠实原作"Identifying" method, adopt perspective of ST author	编译,等效 "Adaptive", equivalent effect

图2 文本类型的功能特点及其跟翻译方法的联系(张美芳 2005：71,据 Munday 2001：74)

图2中没有包括赖斯分出的第四种文本类型：最初她称之为"声音媒体文本类型"(Audio-medial text type),1981年起称之为"多媒体文本类型"(multi-medial text type)(Reiss 1981/2000：124)。1977年之前她把这种类型与其他类型并列,之后她认识到,这种文本类型相对于其他三种文本具有"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的特点,并把这种"超类型"置于别的文本之上(Reiss 1989a：111;Reiss 1981/2000：125)。不过她明确表示,不应该把寒暄功能和诗学功能作为决定翻译方法的另外两种文本类型,因为这两种功能都分别依赖三种基本文本类型来实现(Reiss 1981/2000：124)。另外,虽然不少文本具备多种功能,但是它们总是有主有次的。赖斯认为,原文的主要功能决定了翻译的方法,换句话说,翻译方法应因文本类型的不同而不同(Reiss 1989a：109)。

赖斯早期(1980年前)的理论很强调"对等"和"理想的翻译"的实现条件。她提出,翻译批评不仅要考虑翻译作为完整交际行为这种理想的翻译情况,即翻译目的为"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以及交际功能等方面实现对等"的情况(Reiss 1989a：112),还要考虑当对等是所有翻译共同的目标时,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下需根据不同的文本概念和对于对等概念的不同理解而争取不同程度的对等这种情况(Reiss 1989a：113)。她指出,不同的文本概念产生不同的翻译类型,并归纳出四种文本概念和对应的翻译类型以及翻译目的,曾列表说明相互之间的关系(见下页图3)。

文本概念 text concept	翻译类型 translation type	翻译目的 translation aim
文本＝词语的集合 text＝sum of words	逐词翻译 word-for-word translation(interlinear)	对比语言学研究 comparative linguistic research
文本＝句子的集合 text＝sum of sentences	直译(语法翻译) literal trans. (grammar trans.)	外国语言学习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文本＝基本的语言符号 text＝basic linguistic sign	学术翻译(有意标记＋注释) learned trans. (deliberately marked＋commentary)	不同语言中文化词语差异的研究 study of culture-bound language differences
文本＝交际过程的言语成分(功能文本) text = verbal component of a comm. process (text-with-a-function)	交际翻译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a) 普通情况 normal case b) 特殊类型 special subtype	a) 完整的交际行为 integral comm. performance b) 功能各种形式的改变 all kinds of changes of function

图 3 赖斯的文本概念、翻译类型和翻译目的(Reiss 1989a: 115)

尽管赖斯强调,上述翻译类型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为特定的翻译目的服务(如图 3 所示),但她坚信"交际翻译"是最理想的翻译类型。她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译文,其语言形式忠实于原文,交际目的与原文相同,同时在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都与原文完全对等(Reiss 1989a: 114)。

值得注意的是,赖斯的对等概念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对等,而是把"对等"与"合适"的上义概念联系起来(Nord 1997: 34)。她说的"合适"是和翻译行为过程有关的动态概念,而"对等"是一个以结果为取向的静态概念,描述的是两个文本,或者较低层次上的字词、短语、句子、句法结构等之间的"交际价值对等关系"(Nord 1997: 35～36)。赖斯认为,对等可能是翻译的一个目标,但不应当作一个永远适用的翻译原则(Nord 1997: 35～36)。目的论中,对等就是适合目的,即要求译文具有与原文同等的交际功能,保持原文和译文功能不变。也就是说,对等概念可以归结为赖斯所言的"交际翻译"在文本层次上的"功能对等"(Nord 1997: 36)。

赖斯翻译批评理论的核心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用于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的、客观全面的评估体系及有关分类方法(Reiss 2000: 16)。她提出客观可靠的翻译评估必须考虑五个方面: 文本类型、语言要素、非语言要素、特殊目的和特殊读者群体以及译者和评论者的个人因素。这五个方面分别对应翻译批评的五个范畴: 文本类型的分析属于文学范畴,语言要素的分析属于语言范畴,非语言要素的分析属于语用范畴,特殊目的和特殊读者群体属于功能范畴,个人因素属于个性范畴。她指出,翻译批评要做到客观而公正,则在评估以文本为导向的(text-oriented)的翻译方法产生的译文时,应考虑到文本的类型、文本的语言要素以及对文本产生影响的非语言要素,采用适合该文本类型的批评标准;而对于以目标为导向的翻译方法产生的译文,应该考虑译文的特殊功能以及译文所面对的读者群体,采用翻译批评中的功能范畴的标准。翻译批评还应该注意,无论是以文本为导向的译文,还是以目标为导向的译文,译者阐释过程本身就受到主观条件的制约和个性的影响,同时批评家自身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影响,因此,翻译批评中应该将这些主观因素都考虑进去。

在早期的著作中,赖斯创立的是一种以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功能关系为基础的翻译批评模式,对译文功能的两种情况和相应的评估标准进行了区分,即在译文与原文功能一致、读者群体一致的普通翻译的情况下,对等仍是这些译文的翻译批评标准;对于译文与原文功能不同、读者群体不同的特殊翻译的情况,译文的功能是翻译批评的标准(Reiss 2000/2004: 89～90)。赖斯把译文功能与原文功能不同的情况排除在"翻译"的范围之外,并建议将其称之为"转换"(transfer)(Reiss 1989: 114),这种情况下,翻译的功能优先于对等标准,而且翻译批评家不再依赖对原文的文本类型和原文文本语言及非语言特征的分析,而是要根据翻译的环境来判断译文是否具有预期的功能。

后来,赖斯把文本类型理论和翻译策略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具体的理论,放在她和弗米尔(Vermeer)合著的《普通翻译理论基础》(1984)中,该书第一部分由弗米尔著,这一部分提出了作为以行为为导向的一般翻译或口译理论的"目的论"的基本原则。第二部分由赖斯著,这一部分集中讨论将赖斯的文本类型融入功能理论框架后的具体理论。"具体"意指要求翻译目的与原文功能相同这一特殊情况。(参阅 Nord 1997: 150)

芒迪(Munday)指出,"赖斯的理论的重要之处是,它超越了纯语言的层面、超越了纸上的文字及其意义,把视野拓宽到翻译的交际目的。"(Munday 2001: 76)诺德(Nord)称赞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颇具里程碑意义(Nord 1997: 9)。原因在于,在此之前,人们讨论翻译的时候总是要求对等的标准,而根据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在特定情况下,翻译的功能应优

先于对等论的标准。然而,赖斯的理论并非完美无缺。在过去多年,人们对赖斯文本类型理论提出了一些问题。(参阅张美芳 2005a: 73) （潘莉,张美芳）

什维策尔(1923～)

亚历山大·达维多维奇·什维策尔(Александр Давидович Швейцер)是俄罗斯著名翻译理论家与实践家、资深社会语言学家。他出生于莫斯科,1941 年考入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英语和德语,1944～1945 年他在作战部队任军事翻译;二战结束后,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甲级战犯开庭审判,他担任翻译。他还曾任苏美首脑会谈苏方译员及联合国同声翻译译员。1949～1956 年他在军事外语学院教授翻译理论;1955 年完成了高等军事学院研究班的学业,通过了有关日耳曼语研究的副博士论文答辩;1956～1968 年任副教授;1967 年通过了有关美式英语不同现象研究的博士论文答辩;1969 年任莫斯科语言大学(当时为莫斯科国立莫里斯·多列士外国语师范学校)教授、教研室主任;1982 年起任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负责翻译理论研究,同时还在莫斯科语言大学任教,并分管研究生工作。

什维策尔积极参与同国外语言学家的对话。1987 年他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国际语言学家代表大会全会,并作了大会发言——《语言形成的社会标准》;20 世纪 80 年代,他多次参加苏美有关符号学等方面的国际研讨会;20 世纪 90 年代,他翻译出版了《英语的美语变体历史》(《Истор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варианта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1993)和《翻译与文化》(《Перевод и культура》, 1997～1998)。他的许多论著被翻译为外文,在美国、中国、荷兰、德国、西班牙、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出版。

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什维策尔在俄语翻译界最早认识到"语境对应"的思想。在俄罗斯著名的翻译学刊《翻译工作者札记》(创刊号,1963)发表的《试析翻译中的语法现象》论文中,他指出:"翻译理论实际上对比的不是语法形式本身,而是语法意义与词汇意义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最典型的语境…… 翻译中应把词汇和语法现象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即应把这种统一体看做实际语境中的那样。"(Швейцер 1963)什维策尔当初所说的语境,侧重于狭义的言语上下文语境,当今的翻译语境对应思想还应当包括译文与原文广义语境对应,指作品的风格、读者层次等的对应。这都是在什维策尔最初的翻译"语境对应"思想基础上的发展。

什维策尔认为翻译过程需传达三种意义:所指(事理)意义、联想(修辞)意义、语用意义。遂译所指意义需使用语法转换、词汇——句法套用及情境模式。词汇——句法套用指用语义模式传译原文的所指意义,该模式等同于"从含义到语篇(смысл — текст)"模式。翻译的情境模式关涉原文和译文的语义对应关系,涉及译文中语义成分的增补与替代。翻译的修辞问题与语体有关。报刊政论文的交际目的是传递信息并令人信服,因此其译文的特点是信息丰富并具有表现力。他认为,原作与译作接受者的同等反应,指相同的修辞表现力,这可借助不同的修辞手段达到,如同音法(在一句或一行中重复使用相同的辅音字母)、隐喻、比喻,以及俗语、行话、双关语等的修辞性运用。他指出,奈达(Nida)所言的动态等值,指基于语言表达与交际行为参加者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内容的语用因素。因此他提出区分两种等同——语义等同(传达原文内容并遵守目的语规范)和语用等同(关注表述的语用因素)。他认为,等同(адекватность)是把翻译看做一种过程,研讨翻译语境对应,而等值(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乃将翻译视为一种结果(最后状态),考察原文与译文语篇的对应关系。(Швейцер 1989)在其《翻译与语言学——报刊信息型和军事政论翻译》(1973)一书中,他归纳了许多翻译术语,并予以独到的解释,表现出作者在翻译研究系统性、规范性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什维策尔主张从多角度探讨翻译理论,翻译研究既要考察翻译过程,又要考量该过程的结果。不仅应从纯语言学视角,而且还必须从社会文化角度研讨影响翻译的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超语言因素。他尝试用语义学、符号学、社会语言学、语篇语言学的术语,对翻译进行综合探讨,力求确立翻译理论的地位,并阐明翻译理论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如他界定了翻译理论与对比语言学的关系,翻译理论旨在揭示翻译的本质、翻译实施的机制与方略以及影响翻译的语言内外因素和调节标准。翻译理论应探讨两类问题:描写性(回答是什么和怎么表达的问题)与说明性(回答为什么和为何目的问题),而对比语言学研究两种语言功能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仅能为翻译理论奠定必需的基础,因为许多类型的翻译转换起源于不同语言的结构、功能差异等。

有关翻译的社会语言学方面,什维策尔研讨了三类问题:1. 翻译作为社会景象的反映;2. 翻译作为社会交际限定过程;3. 翻译的社会标准。第一类问题涉及两个基本方面:译文传达原文社会文化中的社会特有事物,并体现语言中的社会分化。第二类问题关涉译文的社会符号特点及制约译文的情境。第三类问题是一种机制,借此社会可以限定译者的行为。

有关语篇翻译,什维策尔在其主编的文集《不同类型的语篇翻译问题》(1986)的序言中指出,语篇理论为翻译学开辟了新的前景,这并非偶然,因为翻译作为语际交际行为的基础并非是寻求某些语言单位对应表达,而是创建等同反映原文语义和语用的语篇。构建话语的语义、句法和语用规则,随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的不同而产生变异。因此,对翻译理论尤其具有意义的是对比话语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如对翻译颇有价值的是,对比分析话语的交际结构、其实义切分。话语的形式变异可体现语际间的实质差异。语篇理论关注翻译的焦点之一是对比分析话语的意义结构。这说明语言的情境模式可广泛应用于翻译领域,可将有时零星观察到的语际间语义特征的差异加以明确和系统化。这些特征是描写制约选

择某些翻译程序的不同情境和区别的基础。对考察翻译理论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语篇语用问题。语篇语用探讨话语作为过程的产生机制,它与交际情境,包括表达交际意向和社会意向的交际者,紧密相关。再现话语的语用功能是翻译的基本任务。翻译的语用理论扩展、深化了对翻译颇有价值的对比修辞研究成果,并要求关注体现于创建源语和目的语交际情境中的文化和民族差异。因此必须借助社会学、民族学和心理学等独特视角,形成与语言的交叉学科,研讨语篇问题。

在社会语言学方面,什维策尔提出,俄罗斯最为迫切的社会语言学问题是:多语和双语现象、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之间的交际语言、语言建设和语言政策等。西方许多国家的社会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是语言的社会分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语言学家最感兴趣的是,民族标准语的形成和确定,以及选取何种语言作为国家通用的标准语。不同国家在社会语言学理论和研究课题方面还存在"共同核心",这首先涉及与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原理紧密相关的一般方法论性质问题,如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在诸多方面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息息相关。为此务必研究语言学中这类根本性的哲学问题。社会语言学理论是在与语言学和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及民族学的结合点上形成的,因此需要明确,社会语言学应建立在何种社会心理学和民族学的理论基础之上,这至关重要。

各种社会语言学流派的"共同核心"还包括许多理论课题,这与下列问题密切相关:社会语言学学科的概念体系和研究对象、该学科与其他语言学和非语言学学科的关系、社会言语过程模式化的种种尝试、探讨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元语言等。社会语言学的概念体系是一个复杂、多维的系统。它由若干相互交织的概念系列构成,这些概念系列以"语言—言语""层次变异—情境变异""客观标记—主观态度"等对立概念为基础。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语言和客观社会诸因素(社会结构的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还涵盖主观社会诸因素(社会态度、社会价值等)在语言和言语活动中的体现。社会语言学与语体学的基本切合点是语言规范、惯用法、功能语体和语域及语篇语言学问题。

属于这种"共同核心"的还有社会语言学的许多一般问题:语言的社会分化、双语现象和双语现象的社会语言学方面、语言状况的类型、语言建设、民族语和标准语及其社会功能等。应兼用静态和动态研究法描述双语现象和双语现象的各个社会方面。静态研究旨在揭示两种并存和相互影响的语言和方言之间的关系,动态研究目的是分析社会的和社会心理的诸因素对言语活动的影响。要首先确定每种因素在某种具体情境中的相对"力量",并以此为基础揭示这些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这是用动态研究法分析双语言现象和双言语现象最重要的任务。

应该建立一种理论,能把语言学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对语言现象予以有效分析。什维策尔的社会语言学著作(1976,1978,1983)论证了兼用上述两种方法探究受社会制约的语言变体形式—语言的层次变体与民族情景变体。

此外,什维策尔的专著《美国现代英语概论》(1963)及《美英标准英语》(1971)首次对美式英语各结构层次的不同特点予以详尽地科学描述。

什维策尔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翻译学方面:1.《翻译与语言学——报刊信息型和军事政论翻译》[Перевод и лингвистика(О газетно-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м и военно-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1973)];2.(主编)《翻译理论问题》(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1978);3.(主编)《不同类型的语篇翻译问题》(Проблемы перевода текстов разных типов, 1986);4.《翻译理论——地位、问题、方面》(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Статус, проблемы, аспекты, 1988);5.(合作)《语篇与翻译》(Текст и перевод, 1988)。语言学方面:1.《美国现代英语概论》(Очерк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ША, 1963);2.《现代美国语言学中的语言社会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социологии язык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1971);3.《美英标准英语》(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в США и Англии, 1971);4.(主编)《国外社会语言学问题》(Проблемы зарубежной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ки, 1976);5.《现代社会语言学——理论、问题、方法》(Современная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методы, 1976,卫志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6.(合作)《社会语言学导论》(Введение в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ку, 1978);7.《美国英语的社会划分》(Социальная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ША, 1983);8.《对比修辞学——英语和俄语的报刊政论语体》[Контрастивн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 (Газетно-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й стиль в английском и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1993]。

(陈洁)

霍姆斯(1924~1986)

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 Holmes)生于美国,1949年到荷兰定居,20世纪60年代起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普通文学系担任讲师,后来升任高级讲师,1986年死于艾滋病。他是诗人、翻译家、文学家、学者,曾因在荷英诗歌翻译方面的成就而获得代表荷兰文学翻译界最高荣誉的奖项。他一直致力于把翻译的学术研究和译员培训结合起来,建立一门完整的学科。在他的努力下,阿姆斯特丹大学在1982年成立了翻译研究系。他的主要论文都收入了为纪念他而出版的个人论文集 *Translated!*。

霍姆斯在1972年初次发表的《翻译学的名称与性质》这篇纲领性的论文中,提出了 Translation Studies 这个学科名称并且勾勒了它的内容。20世纪70年代之前,翻译研究是没有学科地位的。在霍姆斯看来,在西方,传统上只有一些作家、语文学家、文学家和神学家偶尔谈一下翻译问题,但他们常常把个人的规范,或者一个民族、一个时期的规范当作普遍的翻译规律;而且,他们的研究往往流于印象主义,毫

无方法可言；二次大战之后，翻译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研究者主要是语言学家；他们另辟蹊径，致力于为源文的词、词组和句子寻找脱离语境的对等翻译，结果走进了死胡同（Holmes 1988：67，99～100）。他引述社会科学家的分析，指出每当学术界注意到新的问题，邻近领域的研究者就会走过来，把在自己的领域证明有用的理论和模式应用于新的问题上，而结果不外乎两种，一是在某种旧有的理论或模式的框架之下，能够分析、解释新问题并且找到起码是局部的解决方法，于是新问题就理所当然地被归并到已建立的学科之下，成为它的分支；二是旧有的理论或模式用处不大，研究者发觉有必要另找方法，于是就会与志趣相投者建立交往的渠道，发展出一个新的学科乌托邦，向大学当局或其他机构争取合法地位。他认为，尽管一些语言学家不会同意，但在与翻译现象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上，出现的显然是第二种情况。（Holmes 1988：67～68）

但是在当时，发展新学科乌托邦的主要障碍有两个，一是没有一个得到广泛接受的名称，二是对学科的范围和结构没有共识。霍姆斯指出，这门学科不应称为翻译科学，因为它应置于社会学与文史哲而非数理化的行列；也不应称为翻译理论，因为理论建设远远不是学科的全部；至于 translatology 这个词，前半部分源自后期拉丁语，后半部分源自希腊语，因此不可接受。相比之下，studies 常用来为新兴学科命名，尤其是人文学科，因此，以 translation studies（这里译为“翻译学”，但也可以译为“翻译研究”）作为学科名称最合适。（Holmes 1988：68～70）

关于翻译学的性质和内容，霍姆斯提出，作为一个纯研究领域，也就是为研究而研究，毫不关心自己领域之外的直接实际应用问题。翻译学这门实验学科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描述我们身处的世界上出现的翻译现象，二是订立普遍原则以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因此，纯翻译学有两个分支：描述翻译学和理论翻译学。描述翻译学可分为面向产品、面向功能、面向过程三种类型。面向产品的描述翻译学描述现存译本，传统上是翻译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由描述个别的译本开始，进而对一个时期、一种语言或一种文类的译本进行整体描述，而最终目标可能是编写翻译通史。面向功能的描述翻译学描述译文在译语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功能，要解答的问题是某时某地翻译了什么，没有翻译什么，译本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一向不如译本研究那样受到重视，但如果大规模进行，有可能发展出翻译社会学，或者社会翻译学。面向过程的描述翻译学关注的是翻译的过程或者行为，也就是译者用另一种语言创造一个与源语语篇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的新语篇时，在译者的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过程异常复杂，还没有多少人在实验室条件下对之进行系统研究，但心理学家正在甚至已经设计出先进的方法来分析和描述其他一些复杂的思维过程，希望将来能发展出一门翻译心理学或者心理翻译学。他批评传统的译本研究非常幼稚，完全无视过程的问题，并强调必须了解过程的性质才能了解产品的性质。（Holmes 1988：71～73，81）

理论翻译学的任务，则是利用描述翻译学的成果，结合相关学科提供的资料，发展出一套普遍翻译理论，以解释和预测一切翻译现象，而不理会任何不属于这个范畴的现象。当时已有的所谓翻译理论，霍姆斯认为有不少根本算不上理论，而只是一堆格言、规定和假设而已；有些理论虽然冠以“普遍”之名，但其实只触及普遍理论应该涵盖的整个领域里的一两个方面，所以只是局部理论。他把局部翻译理论分为六大类；第一类是特定媒介理论，指专门讨论利用某种媒介来进行翻译的理论，可分为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理论，人工翻译理论又可再细分为笔译和口译理论；第二类是特定区域理论，区域可按所牵涉的语言或文化来划分，两种划分方法的结果通常并不重叠；第三类是特定层次理论，只探讨语篇以下的某个层次，例如单词或者句子的翻译问题；第四类是特定文类理论，例如文学翻译、圣经翻译和科技翻译理论；第五类是特定时代理论，就是专门探讨当代语篇或某个历史时期的语篇的翻译的理论；第六类是特定问题理论，专门讨论普遍翻译理论中的某些方面，有些是带根本性的，例如翻译中变和不变的限度、对等的性质，有些则比较专门，例如隐喻、专名的翻译。许多理论的局部性是多重的，例如对比语言学家提出的翻译理论，可能不单限于某个区域，而且限于某个层次、某个时期。（Holmes 1988：73～76）

在纯翻译学之外，霍姆斯又提出，翻译学的另一个分支是应用翻译学，包括译员培训、工具制作、政策制定和翻译批评四个方面。他总结说，三个分支的关系是辩证的，任何一个分支都为其他两个分支提供素材，又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虽然每个时刻有不同的需要，但必须同时关注三个分支，翻译学才能发展壮大。（Holmes 1988：76～79）

霍姆斯提出的 Translation Studies，曾被用作操纵学派的另一个名称，后来则被广泛接受为学科名称。他所说的面向产品、面向功能、面向过程的描述翻译学的三种类型，前两种现在已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至于第三种，迄今似乎还很少研究“在译者的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另一种较宏观的过程研究，即探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和译者个人因素对产品的影响，也在蓬勃发展。可以说，翻译学取得今天的学科地位，描述翻译学取得今天的成就，全赖霍姆斯奠下的基础。正如赫曼斯（Hermans）所言，“翻译学的名称与性质”是翻译学的“独立宣言”（Hermans 1999：30）。

霍姆斯提议的翻译学的结构，今天看来则似乎有商榷的余地。局部理论的六种类型，其实在描述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也同样存在；例如，我们可以对英汉双关语翻译（特定区域、特定问题、特定层次）同时展开理论、描述和应用研究。归根结底，“如果没有理论告诉观察者应该注意些什么以及如何评估被观察的现象的意义，就不大可能进行有焦点的观察”（Hermans 1999：34），所以，凡有一种描述，就需要有一种理论，描述翻译学和理论翻译学看来不应有不同

的分类法。再者，翻译理论有纯理论和应用理论之分，前者指导翻译研究，后者指导翻译实践，但应用理论在霍姆斯的分类法中却没有位置。 （张南峰）

科米萨罗夫（1924～2005）

科米萨罗夫（В. Н. Комиссаров）是莫斯科语言大学的资深教授，也是俄语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是翻译教学法专家。他终身致力于翻译理论研究与教学，包括口语（连续翻译和同声翻译）、笔语翻译理论与教学实践。他发表著作近百部（篇）。他的主要著作有：《论翻译》（1973）；《翻译语言学》（1980）；《翻译理论（语言学方面）》（1990）；《翻译教学法的理论基础》（1997）；《普通翻译理论（国外学者对翻译学问题的阐释）》（1999a）；《现代翻译学》（1999b）。

他对翻译的研究贡献颇多，突出围绕以下七个方面：

一、有关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问题：作者指出，翻译作为基于人类思维机制的一种实践活动，它本身并非是科学。这种实践行为可在某种程度上顺利实施，其成就可被视为翻译艺术。翻译作为科学并非指翻译实践行为，而是指对翻译实践的分析、思考所形成的理论原理（Комиссаров 1999c：5）。

二、有关翻译学研究涵盖范畴：对该问题的探讨俄罗斯翻译界曾存在着“过程与结果”的分歧。赞成研究翻译过程者认为，翻译理论只能或主要研讨译者所为，构成翻译过程的其思维机制与行为。然而，这些思维机制是在译者头脑中实施的，无法观测，只能根据其结果，即通过与原文对比的译文来评判。“过程与结果”争鸣的结果是，两种观点的融合与互补。

科米萨罗夫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对其研究应囊括影响交际行为的所有因素，其中包括翻译过程（译者的思维机制）和翻译结果（与原文相比较的译文话语）。翻译像其他交际行为一样，在翻译交际过程中信息的损失不可避免，因此，持不可译论是不可取的。翻译学应考察借助人与机器用另一种语言的某种方法传译话语内容的所有情景，因此，它应研讨纯翻译（собственно перевод）和其他语言中介（языковое 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形式，如简介（реферирование）、摘要（аннотирование）和转述（пересказ）等。

三、有关翻译等值：等值（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这一概念，传统上解释为一个翻译评价性术语，即要使译文正确无误，或承认其为翻译，它应该是等值的。对此概念另一解释的依据有两点：1. 等值这一术语不应是评价性的，它只是表示译文与原文语义接近程度，它本身并不能决定译文质量，而是与其他因素一起是值得翻译考察之处。所以必须引入一个评价性术语——翻译等同（адекватность перевода,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остулаты）（Комиссаров 1999c：11），翻译等同指译文符合语际交际具体行为的要求和条件。2. 译文与原文语义接近程度并非是依据某种原则事先“给予的已知定量”，而是通过对比大量的译文与原文予以启迪性地确立。等值可分为不同的层次，每一层次可用不同的语言学术语加以描述，如语义等值、语用等值等。

针对译文质量的评价，科米萨罗夫曾明确区分使用五个术语：等同翻译、等值翻译、准确翻译、逐词翻译和自由翻译。等同翻译（адекватный перевод），指在最可能达到翻译目的等值层次上执行翻译的语用任务，并不破坏目的语规范、习惯，遵守翻译的体裁-修辞要求，符合社会公认的应时翻译标准（конвенциональная норма，该标准要求，译文要符合本时期对翻译的作用和任务所持公认态度）。等值翻译（эквивалентный перевод），可在某一等值层次上再现原作内容，包括所指（外延）、内涵和语用信息。（Комиссаров 1990：246～250；陈洁 1999）准确翻译（точный перевод），仅能等值地复制原作的事理逻辑（所指）内容，可能不符合目的语的体裁-修辞标准及使用规范。逐词翻译（буква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只传译源语中不起交际作用的（形式）成分，从而导致破坏目的语规范和习惯，或歪曲（未传译出）原作内容，该类译文翻译单位的选择偏低。自由翻译（свободный перевод，即意译），指层次偏低的翻译，较为严重背离原作的自由翻译，变为原作主题的“改写”（переложение）或独立表述，该类译文翻译单位的选择偏高。

四、有关翻译策略：科米萨罗夫指出，影响翻译策略（стратегия перевода）的三个最重要因素是原文类型、译文接受者类型和翻译目的。原文类型可分为两大类：文艺性的和信息性的。文艺性翻译侧重传译原文文艺审美价值，信息性翻译着重准确迻译信息。考虑译文接受者必然要涉及翻译的文化、语用因素。

五、有关语用翻译：翻译的语用任务有三项：1. 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2. 针对译文不同层次的接受者进行相应的翻译处理；3. 译者可能有自己的语用目的——政治性的、经济性的或意识形态性的，因为翻译是具体语境下的交际行为。在此情形下，评价译者的工作质量并非在于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而是着眼于翻译是否达到了既定目的。当语用目的上升为首位时，语境对应比忠实于原文更为重要。译者可根据他人或个人需要进行等同翻译，或有所改变地、或完全地、或部分地迻译原文信息，使译文适应所接受文化的需要。

六、有关语篇翻译：科米萨罗夫认为，语篇内容包括纵向结构（вертик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即语篇的形式—主题内容）、横向结构（горизонт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即语篇中表述之间的形式及意义关系）和深层结构（глуби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深层结构包括三个层次：语篇的纯语言内容、具体上下文含义和附加含义（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смысл）或隐含意义（имплицитный смысл）。他认为，翻译的任务系传达原文语篇内容。语篇的全部内容指所表达的意义，包括隐含意义。翻译的最佳结果，即准确地再现原文语言内容，使译文接受者能够以此内容为基础，独立地推论出具体的上下文含义及隐含意义。

科米萨罗夫指出，翻译行为主要是语篇的理解与

构建。许多译者将语篇作为翻译的主要单位有充分的理据性,因为语篇是一个意义整体,其构成成分的意义相互交织,服从于这一整体。只有在语篇中才能够理解语言手段的具体上下文含义。其次,翻译时需要遵循"部分服从于整体"的原则,即为了成功传达语篇的整体内容,可以放弃那些较次要的细节。此外,译者的最终目的是创建符合其形式与意义要求的语篇。综上所述,语篇既是翻译的目标和客体,又是翻译的结果。

七、有关翻译的创造性：科米萨罗夫指出,近来翻译理论研究者探索了翻译最玄妙的方面——翻译的创造性,译者采用直觉处理的过程。先前翻译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发掘翻译过程的基本规律,阐明影响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客观因素,该方面研究观点论证充分,且富有逻辑性。但是它并未揭示研究对象所有复杂现象,因为译者如何进行翻译,这不仅是根据他个人对一切有关因素的客观分析,而且还凭借他个人的直觉。

翻译的直觉、创造性取决于人类思维的共同规律以及影响译者思维机制的专门因素。人的思维过程或者是基于分析程序,或者是依靠先验的假设、瞬间的顿悟或直觉结论的结果。可以预设,翻译过程有时具有非限定性特点,译者采取的许多决定在相当程度上是随意性的,甚至当译者尽量顾及一切有关因素时,因为缺少有关原文、作者、翻译目的、预设读者等的信息,结果译者不得已采用根据直觉的主观决定。翻译理论不应忽略上述事实。探讨该问题有以下方法：

前联邦德国翻译理论家威尔斯(Wilss)(1988)认为,可采用认知心理语言学有关人的直觉行为的知识研讨翻译过程(参阅陈洁,赵丽君 2001)。该观点可阐明翻译创造作为人的创造力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若干构想。另一种方法力求剖析翻译创造的语言学根基。倘若对译者的创造性行为可给予狭义或广义的解释,那么,狭义的翻译创造性指创造在此以前未存在的、全新的东西。这种狭义解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未必合适,因为"新的"这一说法本身太主观,且模糊。某种成功的发现对译者似乎是种新的发明,而实际上是其他译者解决类似问题时多次使用的典型方法。广义的翻译创造性指译者采取直觉(而非某种规定性因素)处理。甚至当译者遇到需斟酌该不该采取直觉处理时,也可能存在着创造性成分。

在广义理解翻译创造性基础上,可分出并研究至少三种类型的创造机制：解释、选择和创新。不难看出,这些思维机制基于翻译过程的语言认知特点。翻译过程的所有阶段皆具有启迪性质,这与必须选择不同类型的方法密切相关。探究选择的疑难、必须选择的原因以及有利于某种选择的直觉决定,可能窥视到译者的秘诀(кухня),这无疑是兴趣盎然、富有前景的研究领域。

(陈洁,赵丽君)

威尔斯(1925～　)

沃尔弗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是萨尔大学语言学和翻译教授,专门从事口、笔译人才培养。他的研究侧重于翻译的宏观理论,发表了大量的翻译理论文章,编辑了多部研究论文集。他是当代德国翻译研究的所谓"萨尔派"的主要代表,这个学派以德国萨尔大学为研究基地,主要认同奈达(Nida)"翻译即科学"的基本理念,主张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萨尔派成了奈达翻译科学说在欧洲旗帜最鲜明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威尔斯也就成了欧洲"翻译科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译学思想见诸 1977 年德文版、1982 年英文再版的翻译理论专著《翻译学的问题与方法》一书中(德文版名为：*Ubersetzungswissenschaft: Probleme und Methoden*；英文版名为：*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该书共分 12 章：绪论、翻译作为现代交际工具、翻译理论的过去和现在、翻译学的方法问题、翻译的过程与程序、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翻译对等、翻译困难、翻译教学、英德翻译错误分析、翻译批评和机器翻译。威尔斯撰写此书的目的,是要帮助翻译学习者和研究者在理论上全面而正确地认识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的各个层次、翻译对等与衡量标准、翻译困难以及翻译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等问题。正如他在前言中所指出的,这本书的写成是他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产物",因而显然带有翻译理论教科书的性质。该书的主要特点是,大量引用并评述了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的各派翻译理论与观点,同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作者本人所坚持的翻译科学论。

归纳起来,威尔斯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翻译是科学。这是威尔斯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他向一切怀疑主义提出挑战,并批评奈达、图里(Toury)等人不敢理直气壮地把翻译视为科学。他指出,英语中的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翻译科学)一说不如德语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翻译学)妥帖,因为 science 常指自然科学,而翻译又确实不是一门自然科学。但是,翻译研究却具有科学的性质。

威尔斯认为,翻译的科学研究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机器翻译差不多同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奈达 1947 年发表的论文《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Bible Translating: An Analysis of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boriginal Languages*)作为起始标志。但该文虽可视为奈达 1964 年重要作品《翻译科学探索》的早期理论雏形,却一直鲜为人知,其影响力自然不及韦弗(Weaver) 1949 年关于机器翻译的那篇备忘录以及乔姆斯基(Chomsky)1957 年的那篇《句法结构》。

按照威尔斯的观点,"翻译学既不是在理论上封闭的科学,也不是在普遍规律研究上封闭的科学,而是一门认知性、解释性和联想性科学,它以灵活的方式处理言语问题,试图回答原文可译还是不可译以及原文、译文效果是否等同的问题。在方法上,它没有控制系统的那种稳定性和绝对性。它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做到现代科学理论按照自然科学模式所要求

的那种客观,并在程序方法上不受价值观念的影响”。因此,它的研究成果“只能部分地加以形式化、数学公式化,也只能部分地运用于实践”(Wilss 1982: 13~14)。说到底,翻译学是一门边缘科学,它必须不断交错地处理语言的描写性、解释性、规范性问题。它可以求助于其他理论,如交际理论,以完善其理论基础。

翻译学有三个研究内容: 1. 普通翻译学,它研究翻译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提出翻译的理论和模式,因而具有超理论功能;2. 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特指翻译学,它对源语和目的语进行描写,检验从源语到目的语的传译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3. 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应用翻译学,主要用于翻译教学。

威尔斯认为,翻译同言语行为的所有形式一样,是一种符号现象,不能完全被抽象的模式说清楚,只部分地适应于演绎手段。形式化的假设无疑有助于翻译学的发展,因为形式模式是所有科学所追求的东西,但翻译学在这一方面现已达到饱和,迫切需要的是对具体翻译步骤进行详细的描写,而不是纠缠在各种理论模式的争辩中。就是说,理论家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特指理论的研究上。特指翻译理论的任务乃是分析翻译中的具体活动,研究翻译过程所采用的方式,检验由普通翻译学制定的一般理论和模式。特指翻译理论采取素材分析,面向两种具体语言的研究方式,制定原则以指导如下三方面的活动: 1. 系统地描写、区分、解释两种具体语言的翻译程序,主要关心两种语言中不能对号入座的句法、词汇以及社会现象,即那些必须采用补偿译法加以处理、非字面对等的现象。2. 对与翻译学相关的话语进行分类。这里有两个主要方面: 一是在微观场合层次,即句子,和宏观场合层次,即句子以上的层次,上对源文本作出说明;二是检验传译的方法是否有效,考虑话语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因素。3. 提出译文质量的检验标准。简言之,只要从一般理论、特指理论和应用理论等方面着手,翻译学的研究就会得到完善的发展,翻译学的地位就会日益巩固。

二、翻译应以语篇为基本单位。这是翻译研究中语篇语言学派的一种观点。简单地说,是要把范围大于句子的语篇结构当作研究的对象。威尔斯指出,语言交流总是以语篇形式而不是以句子形式出现的。翻译也是如此。译者所处理的不应是单个的词或句子而应是语篇,除非句子本身具有语篇的地位。翻译是一项产生语篇的活动。它是在两种语篇之间进行的如何使用语言表达法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词汇与语法这两个语言层次形成一种功能联合体,这联合体的构件不单是句子、从句、词组、单词和语素,更重要的是语篇。因此,如果给翻译下定义,最贴切的定义乃是: 翻译是把源语篇变成最适当的对等的目的语篇。它要求译者在语法、语义、风格等各个层次上全面理解源语篇。每一语篇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的交际功能,具有相同基本交际功能的语篇可以组合成同一种语篇类型。在翻译中,对不同类型的语篇需要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也需要采用不同的衡量翻译是否对等的标准。例如,文学是一种语篇类型,科技文章也是一种语篇类型,但它们各有各的所指意义、联想意义或社会文化意义,各有各的遣词造句的具体方式,在读者身上也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语言与超语言的反应。 **(谭载喜)**

列维(1926~1967)

伊日·列维(Jiři Levý)是布拉格语言学派一位有代表性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是捷克斯洛伐克翻译研究领域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也享有重要地位。列维的翻译理论代表作有《翻译的艺术》(*Umĕni Překlady*, 1963)、《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Die literarische Übersetzung: Theorie einer Kunstgattung*, 1969)和论文《翻译理论对翻译工作者有用吗?》(*Will Translation Theory Be of Use to Translators?* 1965)、《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 1967)。列维在其著作中,运用语言学理论讨论文学翻译的标准和技巧等方面的问题,其翻译思想有以下四个要点:

一、文学翻译重在再创作。列维继承自古罗马戏剧翻译家泰伦斯(Terence)开始的传统,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学艺术,焦点在于再创作。文学翻译研究应当摆脱对翻译作品的一般性评论,扎扎实实地在目的、方法和效果上狠下工夫。文学翻译的目的在于使读者感到他所读的是艺术作品,能从中获得智慧、知识和美感。文学翻译应该使译作具有和原作相应的艺术感染力,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文学素养、译者是否熟悉原作内容以及能否判断并再现原作的文学风格和特征。因此,就文学翻译理论而言,比较历代的作诗方法、创作方法以及分析阐明译者在翻译中的职能和任务,乃是构成这种理论的先决条件。

二、文学翻译必须采用“错觉”理论。所谓错觉,就是指译者隐匿在原作后面,以原作者的面目出现,使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读的不是经过中间人(即译者)处理的译作,而是在直接读原作。这种错觉理论最适合于文学翻译,因为它最能客观地反映读者的心理: 戏剧观众明明知道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是不真实的,但他却要求演出逼真;小说读者明明知道所读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他却要求小说遵守可能性原则,要求小说合乎情理。同样,译作的读者知道自己不是在读原作,但他要求译文保持原作的特征。换句话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必须使译作读起来不像译作,而像用目的语写成的原作。否则,文学翻译就达不到标准,译品就缺乏文学性或艺术性。

三、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就目的而论,翻译是一种交际过程,目的是把外国原作的知识传递给读者。但就实际翻译操作而论,翻译却是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遇到一系列连续发生的情况,必须在一系列的选择中作出一个选择。例如,让英译者翻译德语剧名 *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塞丘安的好人》),译者会面临两种选择: 1. *The Good Man of Sechuan*(《塞丘安的好男人》);2. *The Good Woman of Sechuan*(《塞丘安的好女人》)。因为,在语义和风

格价值上，英语中没有一个词与德语的 Mensch 等同(person 一词与 Mensch 不属于同一风格层次)，Mensch 在含义上包括 man(男人)和 woman(女人)。这种选择贯串于翻译的全过程，并且各个选择又彼此相连，最先作出的选择为后来的选择创造了某种上下文。在这种意义上，翻译好比下象棋，每走一步都受到前面各步的影响和牵制。结果译的好坏取决于译者从最初的理解到最后的润色能否正确圆满地作出判断和抉择。

四、翻译必须正确对待更改原文的问题。列维通过实验证明，译者在翻译中往往以两种方式更改原文：1. 在几个对等语中为一个原文词作出选择，译者必然趋向于选择一个词义比原词广泛的词；2. 译者在用词造句时，往往喜欢把原文没有表达的思想逻辑关系表达出来，以此弥补原作思想中的"断线"现象，使表达"正常化"。这两种更改都有其思想原因。在第一种情况中，译者在同义词中作选择，自然会选择最先想到的词。一般说来，这种词用途广，易于想到。在第二种情况中，译者认为自己有解释原文的义务，必须把内隐的语义逻辑关系明说出来，使译文易于为读者看懂。也就是说，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表达出原文在形式上没有、但是意义上已经存在的东西。对于这两种更改，必须抱有正确的态度，适可而止。不恰当地选择泛指词，会剥夺原文具体而生动的特征；处处把内隐成分变成明说形式，会使译文显得简单肤浅而不能发人深省。 **(谭载喜)**

斯坦纳(1929～)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出生于法国巴黎，在巴黎和纽约长大，后定居英国，执教于英美多所大学，主要讲授语言和翻译理论。因受家庭和周围的语言环境影响，斯坦纳从小懂法、德、英三种语言，是一位操三种母语的多语使用者。1975 年，斯坦纳用英语出版了一本语言和翻译理论专著，书名为《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正是这部著作使他一举成名。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纵横古今；分析精深系统，见解新颖独到。该书出版之后，在西方学术界(包括翻译研究和语言哲学界)立即引起很大反响，被学界广泛评价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 1975 年初版、1992 年再版、1998 年出第三版以及 2001 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根据授权出中国版。

该书共分六章：第一章阐述理解语言对翻译的作用以及理解与翻译的种种内在联系。第二章讨论语言的性质以及有关语言的各种神秘主义的观点。第三章阐述语言与物体的关系。第四章评述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主要的翻译理论和语言理论。第五章用解释学(hermeneutics)的眼光，阐述翻译的步骤。最后一章讨论有关文化的各种类型学。在这些章节中，斯坦纳把诗学、哲学、语言学、文学批评和文化史学的理论运用于对语言的阐释。他系统地追溯和梳理了从柏拉图(Plato)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再从洪堡(Humboldt)到索绪尔(Saussure)到乔姆斯基(Chomsky)的西方语言研究史；深入阐述了现代语言学有关语言的"共时"与"历时"观；认为语言是一种动态现象，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而在人类对语言的理解中，无论是在共时还是历时层面，翻译始终都起着关键作用。书中阐述的重点也始终落在翻译这个中心问题上。

斯坦纳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实际上乃是一个翻译过程。翻译是语言的基本因素。在最基本的思想交流中，翻译是内隐的；在人类数千种不同语言的共存与相互接触中，翻译则是一项外显的活动。翻译的基础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语言。然而，强调语言共性的存在，决不应忽略语言个性的存在，否则对语言的解释就会神秘化，就会不符合语言的客观现实。斯坦纳看到了语言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但他并未因此而提出不可译论。他指出："语际层面的翻译会引出堆积在一起的、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在语内交流这个更加隐蔽的或历来被人们忽视的层面上，这些问题同样大量地存在……不管是语内还是语际，人类的交流都等同于翻译。"(Steiner 1975: 47)既然交流是可能的，因此翻译也是完全可能的。

从斯坦纳解释语言和翻译的观点来看，他代表了当代西方语言和翻译理论中独具一格的解释学理论派。在语言分析中，典型的语言学方法是把重心放在语言的表达手段上，把语言当作工具，认为语言的实质可以通过把观察到的言语行为和科学模式联系到一起加以描写。斯坦纳不是采用这样的方法，而是采用解释学辩证法，把分析的矛头对准语言的相互作用，分析的中心点不是可以观察到的语言行为，而是对语言交流赖以发生的语言认识意义和感情意义的理解。

《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它所阐述的理论思想极具深度和广度。但由于它的主要目的是要阐明翻译是语言的基本因素、翻译和语言理解不可分割这么一个观点，它就势必把重点放在有关语言和翻译的一般性理论问题上。书中没有集中论述翻译的目的、性质等基本的翻译问题，也没有集中讨论翻译的实际操作过程和结果等具体翻译问题。正如凯利(Kelly)所说，它并没有提出完整的翻译理论(Kelly 1979: 31)。

然而，这部著作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其表现不仅在于它广泛深入地评述了西方语言研究和翻译研究的丰富遗产、从历代文学名著中引用并剖析了大量语言与翻译的实例以及对语言和翻译的本质作了深刻有力的阐发，而且尤其在于书中对翻译步骤所作的诠释。

按照凯利的观点，斯坦纳所提的翻译模式，是一个基于"正题"(thesis)、"反题"(antithesis)和"合题"(synthesis)三个概念之上的黑格尔式理论模式。源语与目的语是"正题"与"反题"，而最终产生出的目的文本则是二者的"合题"。(Kelly 1979: 61)

斯坦纳认为，翻译的步骤分为：1. 信赖(trust)；2. 侵入(aggression)；3. 吸收(incorporation)；4. 补

偿(restitution)。首先,在着手阅读和翻译之前,译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历"信赖"这一步骤,即"相信"原文是有意思的,译者必须加以透彻理解。人们通常问:"原文说了些什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信赖,相信原文中一定存在着某种意思。当然,有时译者读完原文后,发现"原文毫无意思",如一些玩弄字眼的打油诗,这类无聊的原文是不能翻译的,因为它们在词义上不起任何交流作用,但就有意思的原文而言,原文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个问题又会由于文章体裁、类型的不同而各异,或由于翻译目的之不同而不同。人们对于原文意思、韵味的认识,往往各异其趣。在西方翻译史上,宗教、科技翻译者大都倾向于照字面去理解原文意思;古代、文艺复兴时期以及 19 世纪的文学翻译家基本上紧扣原文,但中世纪、新古典主义时期以及某些现代文学翻译者却往往不忠实于原文。

翻译中的第二步是"侵入"原文。这种"侵入"可理解为译者直觉中两种语言之间、两种思想形式之间的冲突。在语际翻译中,对原文的理解、认识和解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入侵活动。正如古罗马理论家哲罗姆(Jerome)所比喻的,译者会把原文意思当作俘虏抓获过来。在理解过程中,译者打破原文的外壳,抽出原文的精髓,然后带回去。就好比一个露天矿井,把矿采光了,在地面上留下一片空荡荡的印痕。有些原作通过翻译被全盘移植到译文语言中,原文语言里的东西一点儿也不留。有的原作则无须人们再去阅读,因为译作比原作出色。

第三步骤是"吸收"。原文的意思和形式被移植过来,不是在真空中移植,也不是移植到真空中去。译文语言的语义场已挤满了语义。对于引进的成分会有各种各样的同化和应用。有完全同化的,如路德(Luther)的德译《圣经》和诺思(North)的英译《名人传》;也有长久令人感到奇异的,如纳博科夫(Nabokov)英译的普希金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但不论同化的程度如何,从原作中的引进总有可能搅乱或重组译文语言的结构。通过翻译,译文语言可以变得更加丰富,但也有可能被原文语言俘虏过去,而丧失译文语言的本色。译者应该看到外来成分吸收过程中的这种辩证关系。吸收原文是一项思维活动,但它是以语言的使用为标志的。在科技翻译中,吸收原文的任务不会太难,因为读者只须在一个层次即客观事实和知识的层次上下工夫。在文学翻译以及在某些宗教文献的翻译中,对原文的吸收就必须在多个层次上进行,有的层次纯属译者的直觉范畴,因此吸收得好与坏完全取决于译者本人。

至于翻译的第四步骤,则是对翻译过程中的走失进行"补偿",即把原有的东西归还到原来的地方。"补偿"是翻译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第一步,译者倾向于原文而失去平衡。接着,译者在认识上"侵入"原文,理解原文的意思。尔后,译者对原文进行索取,给目的语增进可能导致不同后果的新成分,于是又一次失去平衡。因此,译者必须作出补偿,通过交互作用以恢复平衡,也就是达到理想的翻译。这一点,正是翻译原则与技巧的核心所在。　(谭载喜)

德里达(1930～2004)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当代解构主义理论大师。1930 年 7 月 15 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德里达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60～1964 年在巴黎第四大学(索邦)教授哲学,自 1965 年起任高等师范学校哲学教授。他曾创立巴黎国际哲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逝世前长期担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德里达在 20 世纪后半叶西方文化理论界的巨大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美国的学术活动以及美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对他的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因此他在美国的影响甚至超过在法国的影响。

德里达长期以来并不被人认为是一位翻译理论家,但由于他的理论对当代翻译研究的重大影响,他本人也多少介入了关于翻译理论的讨论。他对翻译研究最有影响的一个概念就是他自创的一个法语词"延异"(*différence*),这个词其实并非意指(语言)存在于那里,而是想表明它的不在场和缺席(Gentzler 2001: 157)。他的翻译理论始终围绕差异和延缓的游戏而阐述。按照德里达的意思,意义同时具有差异和延缓的特征,最后的确定性和终极性是不可能达到的。他的翻译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点上的。他专门讨论翻译的著述主要是两篇论文:《巴别塔》(*Des Tours de Babel*)和《什么是确当的翻译?》(*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在前一篇论文中,德里达把翻译之困难比作攀登"巴别塔"。在他看来,由于人类之间交流的困难和不便,"翻译就成了十分必要的但也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就好像是为了攫取名称而奋力争斗的效果那样,在两个绝对的专有名称之间的间隙显得既十分必要同时又不可能办到。"(Derrida 1992: 223)由于这类专有名称是上帝赐予的,因而也就是"不可译的"(Derrida 1992: 224)。在这篇文章中,德里达还讨论了雅各布森提出的三种翻译模式:语际(interlingual)翻译,语内(intralingual)翻译,和语符(intersemiotic)翻译。总之,他的结论是,既然巴别塔这个名称是上帝规定的,因此"巴别塔就是不可翻译的"(For Babel is untranslatable)(Derrida 1992: 227)。但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德国思想家本雅明(Benjamin)的启发,认为所谓原文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译者通过对原文的翻译而使得原文的价值得以延缓和存活。后来的解构主义翻译学派就秉承了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论,使得翻译变成了一种阐释和再现。

在《什么是确当的翻译?》一文中,德里达对早先的不可译性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和推进。他从差异的思维模式出发,对"什么是好的翻译"作了详细的界定,对翻译的标准问题以及终极意义等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他这里所指的"翻译"(translation)早已超越了"逐字逐句"(word for word)翻译的狭隘境地,而是将其提升到了一种在文化层面上对文字表层背后所隐含的意义的"逐译"或"阐释"。他仍不相信有某种绝对准确的翻译的合法性和本真性,在他看来,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相对于另一些事物的。因此"确当的"(relevant)翻译决不意味着"翻

译理论中的新鲜东西,尽管它必须受制于各种规定,在最近几百年里尤其如此"(Venuti 2001: 170)。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解构的重要概念:真理的相对性和无终结性。在德里达看来,绝对"确当的"翻译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如果译者尽了最大努力的话,相对"确当的"翻译还是可以做到的,而无数译者的相对"确当"合在一起就形成绝对的"确当"。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指涉(确当的)翻译的焦点正在转移:从纯粹语言学意义上的转换过渡到能动的文化阐释和再现之境地。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德里达更可算作一位理论上和文化上的阐释者—翻译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者。

德里达喜欢词语(word),并且十分擅长于玩弄文字游戏,但是这个"词语"应当是大写的Word(道),而非其字面意义。它同时产生其语言学层面和文化层面上的意义:"至于词语(在此并非我的主题)——语法或词汇都不能使我产生兴趣——我相信我可以说,如果我喜爱词语的话,那也只是其地道的单一体系这一点,也就是说,在得以产生翻译的激情的地方,就好像一束火焰或一个充满情欲的舌头伸过来舔它一样:开始时尽可能地靠近,然而却在最后的那一刻拒绝去威胁或还原,拒绝去消费或完成它,从而使得另一个身体依然完好无缺,但却仍促使他者出现——在这种拒绝或退却的边缘——"(Derrida 2001: 175)这种生动却抽象的比喻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德里达本人对词语的情有独钟,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层面上对翻译的理论和实践有着启迪作用。

从解构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不可终极性这一既定的思维定式出发,德里达还在文章中对翻译的标准问题作了描述。按照一种理想的翻译标准,人们一般认为,"没有一种翻译策略能够一成不变地紧紧依附于文本效果、主题、文化话语、意识形态或惯例。这种关联对于文化和政治情境而言是偶然性的,在这种情境下便产生出了翻译者。逐字逐句的翻译策略实际上已经在翻译史上被人们反其意而用之了。"(Venuti 2001: 172)而在德里达看来,"简而言之,一种确当的翻译就是'好的'翻译,也即一种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翻译,总之,一种履行了其职责、为自己的受益而增光、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或义务的译文,同时也在接受者的语言中为原文铭刻上了比较准确的对应词,所使用的语言是最正确的,最贴切的,最中肯的,最恰到好处的,最适宜的,最直截了当的,最无歧义的,最地道的,等等。"(Derrida 2001: 177)由此可见,德里达并不反对翻译的标准,他所规定的上述标准显然是一种很高的甚至是一种理想化的标准。按照解构理论的原则,真理是不可穷尽的,你尽可以说你已经接近了真理,但你却无法声称你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因此这种真理的相对性原则也为原文的不可再现性和译文的不断修改更新性铺平了道路,为文学名著的不断重译也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德里达的学术声誉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解构主义哲学密切相连,这种哲学又称"后哲学",对传统的理性哲学有着强有力的挑战和消解作用。由于德里达的后哲学的穿透力,它实际上消解了哲学与文学的界线,也加速了"哲学的终结"和"文学的解放",为一种新兴的人文学(human science)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尽管德里达多次辩解说解构并不是一种理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理论的策略,但其结果却充当了曾在美国一度风行的解构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础。

德里达对当代文化理论、翻译理论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他始终关注语言问题,并曾一度迷恋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语言学和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批评。但反对结构主义的那种诉诸单一结构的片面语言观,认为语词有着诸多的层面和多重意义,因而对由语言词汇组成的文学文本的解释就应当是多重的。显然,这一观点对认为言语是交流的直接形式的看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同时也反拨了文本的作者就是意义的掌握者的观点。因而在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和探索下,书面语言摆脱了语言结构的束缚,为意义的多重解释铺平了道路。这也是他的理论对翻译研究有着重要启示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位多产的创造性理论家,德里达将自己的著述定位在哲学和文学之间,或者说是一种文学化了的哲学著作。他一生著述甚丰,几乎所有的著作一经问世,就迅速进入了英语世界,并在北美的批评理论界产生重大的影响。他自1967年以来出版的著述有:《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 1967)、《写作与差异》(*L'e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1967)、《言语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enomene*, 1967)、《播撒》(*La Dissemination*, 1972)、《哲学的边缘》(*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1972)、《丧钟》(*Glas*, 1974)、《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 1980)、《他者的耳朵》(*L'Oreille de l'autre*, 1982)、《哲学的法则》(*Du Droit a la philosophie*, 1990)、《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 1993)和《他者的单语主义》(*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 1998)等。这些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解构理论。但由于德里达的哲学思想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哲学范畴,融入了人类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成分,形成了一种范围更广的批评理论,因而他在经院哲学界的地位始终受到质疑。德里达在英语学术界的影响主要得助于三位美国批评家:斯皮瓦克(Spivak)、卡勒(Culler)和米勒(Miller)。在这三位美国学者中,斯皮瓦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将德里达早期的代表性著作《论文字学》准确地译成英文,并在长达80多页的译者前言中系统地阐释了德里达艰深的解构思想,为其在美国批评界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卡勒的《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一书则是全面阐释德里达的早期理论的最为清晰的一部著作;米勒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及时地把德里达在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具体化在文学批评和阅读上。

(王宁)

伊文-佐哈(1939~)

伊塔马·伊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是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的始创人;1939年生于以

色列，1972年在特拉维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世纪70年代在该大学的诗学与比较文学系任翻译理论讲座教授；1986年创立文化研究学院，现任该学院的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符号学与文学理论讲座教授。他除了精通希伯来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瑞典语、阿拉伯语、挪威语、世界语、意大利语之外，还能阅读德语、丹麦语、冰岛语、俄语、荷兰语、葡萄牙语等多种语言。他早年从事文学和翻译研究，20世纪90年代起转向文化研究；发表论文约100篇，主要的英文论文分别收入三个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 (1978)，*Polysystem Studies* (1990)，以及 *Papers in Culture Research* (2005)。他的著作已被翻译成十多种欧洲和亚洲文字；大部分论文及其译本都已收入他的个人网页http://www.even-zohar.com。

伊文-佐哈在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多元系统论，目的不单是要改善文学研究的方法，而且要修订文学的概念，也就是修订研究对象本身(Even-Zohar 1978: 7)。这套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应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充分地理解和研究。这些社会符号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因此是多元系统，也就是由若干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这些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但多元系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地位不同的系统，永远在互相争夺中心位置。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必然与整体文化以及整体内的其他多元系统相互关联；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mega- 或 macro-polysystem)。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转变，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转变因素联系起来研究(Even-Zohar 1990a: 9～26)。

例如，文学多元系统可按不同的研究需要而采用不同的划分法，分为成人文学、儿童文学，或分为原创文学、翻译文学等(Even-Zohar 1990a: 13)；前者通常处于中心，后者通常处于边缘。其中的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形下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 文学多元系统依然"年轻"；2. 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由若干文学组成的大多元系统中的)边缘，或者处于贫弱状态，或者既边缘又贫弱；3. 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Even-Zohar 1990b: 47)。伊文-佐哈对第二种情形的解释是，当一个系统单凭自己的形式库(repertoire)无法应付当前局面，它就是处于贫弱状态，可能需要从其他系统引进一些项目(Even-Zohar 1990b: 80～81)。"边缘"是系统相对于其他系统的地位问题，较易作出客观的判断；"贫弱"则是系统的内部问题，而内部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向外求助，往往要凭自己的主观认定而不是别人的判断，又常常没有客观可言。

伊文-佐哈认为，任何系统的产品，制造和使用方式都由"形式库"控制；形式库由规则和材料两部分组成；例如，语言的形式库就是语法加词汇(Even-Zohar 1990b: 39)。保守的系统严格按照形式库定下的模式制造产品，可预测性很高，称为二级(secondary)产品；革新的系统则会注入一些新元素，从而扩大和改造形式库，使产品的可预测性一个比一个低，结果就是一级的(primary)产品。一级模式在形式库中占据支配地位，从而走进系统的中心时，系统就会发生变化，但这些模式走进中心之后，不久就会固定下来，变成二级模式，系统就处于稳定状态，形成新的保守主义(Even-Zohar 1990a: 21)。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有时又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再以翻译文学为例，它处于中心时，往往参与创造一级模式，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着重译文的"充分性"(即复制原文的主要文本关系)；处于边缘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结果远离"充分性"(Even-Zohar 1990b: 50～51)。

伊文-佐哈提倡超然客观的、纯学术的描述性研究。他认为，以多元系统论为框架的研究，不应以价值判断作为选择研究对象的准则。在这套理论之下，把以前被忽略甚至被排斥的现象纳入研究范围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全面认识任何一个多元系统的必要条件。例如，不把标准语放在各种非标准语的语境之中研究，就不能对标准语作出充分的描述和解释；对文学多元系统的历史研究不能局限于所谓"名著"，虽然有人会认为"名著"是文学研究唯一的存在理由。这种精英主义与文学的史学研究是不兼容的(Even-Zohar 1990a: 13)。他对于被纳入研究范围的现象，也不会作出诸如正确错误、优劣高下之类的价值判断。他和他的同事图里(Toury)一再强调，不能混淆"研究"与"批评"两种活动；前者是纯学术活动，目的在于描述、解释、预测客观现象，而后者属于应用研究，目的是要改造客观世界(Even-Zohar 1990a: 13; Toury 1995: 9, 17～19)。

传统的学术抱着指点江山的态度，只孤立地研究文化产品(而且往往局限于标准语言、文学"名著"等官方产品)，看不见产品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以及整体文化状况对产品面貌的影响，因此只能提出一些局部的解释，例如翻译研究中的"错误""误解""效颦"之类的评语。而多元系统论的优胜之处，在于能够看到产品的复杂的对外关系，解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产品的面貌(参阅 Even-Zohar 1990a: 15, 23)。伊文-佐哈的文化理论，对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他认为，较大的社会实体，例如国家、民族，并不是自然物体，而是因一些个人的行为而形成的。要长期维持这样的实体，不能单靠武力，而必须在实体内部制造凝聚力，因此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形式库，供实体的成员在集体和个人的层面上组织生活；在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一种工具。同时，文化形式库中被赋予最高价值的某些部分，会被抽取出来，奉为"文化遗产"，用来把该实体与其他实体相区别，以建立一种集体身份；在这

种意义上的文化,是一种货物。文化工具和文化货物可以互相转化。在文化形式库得到接受并且稳定下来之后,要引进新的形式库或者项目就可能遇到阻力(Even-Zohar 2005)。我们如果作进一步的推论,就可以说,外来的项目会影响原有形式库和集体身份,对实体的凝聚构成双重威胁,所以会遇到双重阻力。因此,翻译文学在一般情形下会在边缘,只在目标系统自觉贫弱,需要引进外来项目以解决困难时才可能进占中心位置,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发挥强力文化工具的作用。但是,从文化工具转化为文化遗产这个典范化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翻译文学除非经过归化的程序,否则不可能成为本国文学,译者也不可能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

多元系统论令翻译研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导致一个学派的形成,"改变了翻译分析的性质,并且大大拓宽了如今称为翻译学的领域"(Bassnett 1996: 13),在20世纪80年代主宰了西方的翻译研究,引领这个学科实行文化转向(Bassnett 1999: 215)。它提高了翻译的文化地位,同时也提高了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Bassnett 1998: 108; Hermans 1999: 41~42, 110)。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及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有不少翻译学者用多元系统论作为研究框架,也提出了不少批评和建议。

(张南峰)

斯内尔-霍恩比(1940~)

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是西方翻译研究学派或翻译文化学派在德语世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弗米尔(Vermeer)、赖斯(Reiss)的弟子。她是维也纳大学翻译学系教授,长期从事英德两种语言的翻译和研究,是欧洲翻译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译学论著是1988年初版、1995年修订再版的《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另外还分别于1994年、1996年与他人合作编辑了论文集《跨学科的翻译研究:翻译研究学术会议论文选》(*Translation Studies — An Interdisciplin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Congress*)和《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一书中,斯内尔-霍恩比回顾、分析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着重对欧洲翻译研究的两个主要流派:莱比锡学派和操纵学派进行比较研究。前者视翻译研究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后者则把翻译研究归属于比较文学研究之下。斯内尔-霍恩比认为,语言学和比较文学都不能涵盖翻译研究,应该把翻译研究从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的羽翼下脱离开来,视其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而,她以格式塔整体理论和原型学为基础提出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借用相关学科如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比较文学的有益成分,提出对翻译研究采用一种集各家所长的综合型研究途径。她特别强调翻译过程中对于文化因素的处理,认为翻译者不仅应当通晓相关的双语,而且应当通晓双文化,因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这是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相关理论如语篇及话语分析理论、情景语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都从各自的角度对译者的翻译选择活动发生着影响,译者只有充分考虑到来自各方面的诸如语言的、文化的以及交际场合的因素,才能提供出合格的目标文本来(谭载喜 2004: 260~261)。

斯内尔-霍恩比提出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层化模式,其中包括多个垂直的和水平的平面,并从普遍层次(宏观层次)演化到特殊层次(微观层次)。斯内尔-霍恩比的理论以罗施(Rosch)与伯林(Berlin)两人的理论为基础。罗施的理论曾对美国的语义学影响很大,从根本上证明了范畴化的古典理论是错误的,并建立起"自然"范畴化理论。该理论以原型形式出现,具有一个"硬核"和模糊的边缘。人种生物学家伯林则认为那样的原型可以从心理上加以确定。(Snell-Hornby 1988/1995: 27~28;廖七一 2000: 47)

斯内尔-霍恩比讨论了索绪尔(Saussure)的语言两分法以及从层次(dimension)与视角(perspective)两方面谈隐喻的翻译等问题。斯内尔-霍恩比通过丰富的实例探讨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和概念与翻译研究的潜在关系,如篇章语言学与翻译过程中的文本分析,菲尔莫尔(Fillmore)的场景-框架语义学("scenes-and-frames" semantics)与翻译,言语行为理论在公共告示翻译中的运用及翻译此类告示时要考虑的几个因素,以及词义的动态特性与翻译活动中词典(单语、双语)的使用等。斯内尔-霍恩比认为,翻译研究的对象不应局限于文学文本,还应包括普通语言文本和特殊语言文本(法律、经济、医学、科技等)。(Snell-Hornby 1988/1995)按照斯内尔-霍恩比的解释,翻译中的"对等"(equivalence)"以语言间的对称为先决条件"(Snell-Hornby 1988/1995: 16),"作为翻译理论中的基本概念是不合适的"(Snell-Hornby 1988/1995: 22),因为它把翻译过程简化为纯粹的语言练习,忽视文化、文本以及其他语境因素,而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因素在翻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认识使得一些学者用不同方法进一步划分对等概念(谭载喜 2005: 67)。

对于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斯内尔-霍恩比在较学术的层次上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感觉,她认为"技术产品无论多么复杂,它都不能与人脑的创造力相比,对此现在已不再有丝毫怀疑"(Snell-Hornby 1988/1995: 66)。然而事实上,较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异常活跃,现代的机器翻译手段倾向于更现实、冷静。以前关于机器翻译最终会取代人工翻译的假说已让位于关于其潜能的更理性的评价(谭载喜 2005: 134~135)。

斯内尔-霍恩比(1988/1995)强化了将翻译研究用作学科整体名称的倾向,她选择用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这个术语统一"操纵"学派和翻译科学派各自的兴趣点和关注点。斯内尔-霍恩比强调,"翻译研究学科必须涵盖从文学到科技的所有翻译,并且还应扩展到被忽略的口译领域。"(Snell-

Hornby 1991: 19)在她看来,这门学科——或者用她更喜欢的术语,这门"交互学科"——包括了"特殊语言研究、术语和词典编纂、机器翻译和机器辅助翻译;语义学、对比语法、语篇语言学、社会与心理语言学等语言学的相关领域;文学翻译(包括各种形式的舞台翻译、电影对白和配音、配字幕等);以及从文学史到心理学的相关领域"(Snell-Hornby 1991: 19)。

然而,芒迪(Munday)对斯内尔-霍恩比的分类方法提出异议,认为:将所有问题和文本类型都纳入一个详细的、包罗万象的分析框架,这种尝试本身是否可行值得怀疑。前后不一的现象难免会出现,如:1. 所有的"报章文本"能否真的全部归为"普通语言翻译"呢? 2. 既然广告语言很可能与富有创意的诗歌语言更具共通之处,为什么与普通文本相比,"广告文本"的位置离文学文本的距离更远呢? 3. "文化史"对医学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或许相差无几;4. "专业学科研究"对于文学文本所需的背景知识也很适用,例如,不研究十字军的历史,就无法翻译萨拉马戈(Saramago)的《里斯本围攻史》(*História do cerco de Lisboa*),而翻译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Der Zauberberg*)则需要了解 20 世纪 20 年代阿尔贝斯的疗养院制度;5. "是否上空"无须限于文学作品。如为卡弗沙姆(Caversham)的英国广播公司国际新闻翻译的稿件常常都是用来播报的,书面演讲稿的翻译也需要保留或重现原文的节奏或声音。另外,芒迪还批判道:斯内尔-霍恩比虽然是在讨论"文化",却将重点特别放在功能理论以及语言学意义上的规范的研究上。"文化"方面只局限在对某一文本或短语所隐含的文化意义的考虑,并没有对翻译的文化作用进行全面的分析。其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也是有限的:斯内尔-霍恩比引用了多种语言学和心理学理论(语义学、话语行为、原型和格式塔理论等),但目的都是为了支持相对传统的文本阅读和文本分析。(芒迪 2007: 236~237)

总的来说,斯内尔-霍恩比"代表着新一代有丰富语言学知识的翻译理论家"(陈德鸿,张南峰 2000: 154),她借用了"原型"这个概念对各种文本进行了分类,并依照有待分析的文本类型,引进了文化史、文化研究、社会文化研究及区域研究;对于法律、经济、医学和科技翻译,她又引入了相关专门领域的研究。她批评了传统语言学的一些缺失,却又同时从语言学与翻译理论的辩证关系中找寻到新的立论途径。

(邵璐)

图里(1942～)

基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翻译教授,《目标》(*Target*)翻译研究杂志的主编。他以同为以色列人的当代著名文学及翻译理论家伊文-佐哈(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为出发点,沿着霍姆斯(Holmes)开创的翻译研究学派的基本路线,做了大量的翻译描述和理论建设工作,被普遍视为文化和操纵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图里的主要译学著作包括 1977 年出版的《翻译规范与希伯来语文学翻译(1930～1945)》(*Normot shel tirgum ve-ha-tirgum ha-sifruti le-ivrit ba-shanim 1930～1945*)、1980 年的《探寻翻译理论》(*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和 1995 年的《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另有 1980 年编的《翻译理论选读》(*Translation Theory: A Reader*)、1987 年编的《跨文化翻译》(*Translation Across Cultures*)、1991 编的《翻译理论文选》(*Introducing Translation Theory: Selected Articles*)以及 1981 年与伊文-佐哈合编的《翻译理论与跨文化关系》(*Translation Theory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等。其中,《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一书由《探寻翻译理论》扩展而来,是他的代表作。

翻译研究学派创始人霍姆斯的翻译研究框架,曾把描写翻译研究分为纯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方面,在纯研究之下又分为理论翻译研究与描写研究两个分支。但历来的翻译研究一般都集中在理论翻译研究或应用研究领域,而未能给描写研究以应有的重视。图里指出了这种不足,并展开了对描写研究这一翻译研究分支学科的理论构建工作。他对于翻译理论的贡献也就集中体现在他所试图构建的描写翻译研究理论上。图里认为,描写翻译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对实际发生的翻译现象进行描写,并通过对具体翻译个案的描写和分析,归纳出对翻译实践具有示范或启示作用的理论原则来。换言之,构建描写翻译研究理论的基础是大量的具体个案研究。而每个具体个案又都必须置于更高层次的语境中,即充分考虑它们的语境因素如文本和翻译行为模式、文化背景等,这样才能使研究产生有用的结果。

图里的描写翻译研究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翻译与规范(norms)关系上所阐述的独到见解。他提出一个描写翻译行为的三分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规范"位于"能力"(competence)与"运用"(performance)之间,或从另一角度来说,位于规则与译者风格之间(Toury 1995: 54)。这里的所谓"规范",就是在特定文化或文本系统中,被优先而且反复采用的翻译策略。图里认为,在翻译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以及翻译产品的各个层面,有关规范都在起作用。翻译的规范分为"预先规范"(preliminary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前者指译者对于翻译政策、翻译本质等问题必须作出的考虑;后者指支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抉择的因素,如文本中语言材料的分布模式即结构规范(matricial norms)、文本的表述方式即文本规范(textual norms)等。译者可能遵循源语规范,强调进行"充分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也可能倾向于遵循目的语规范,侧重于目的文本的可受性(acceptability)。在现实翻译中,译者的决定实际上常常是这两个极端的混合或妥协。传统翻译观的对等概念与实践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从"规范"这个切入点来谈论翻译的"对等"问题,则不失为对传统概念的一个富有建设意义的升华。在"规范"解释模式中,要判定目的文本与源文本对不对等,或在何种程度上对等,必须充分考虑各个层面的"规

范”因素,其中包括“预先规范”因素如目的文化系统对于翻译的种种政策、政治、文化方面的限制,还包括不同语言文化系统对于对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对翻译普遍特征的不同鉴别,以及不同语言文化系统中,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所处的不同位置等(谭载喜 2004: 271~273)。按照图里的解释,“无遗留”原则(“no leftover” principle)是描写翻译分析中采用的一种技巧。该原则的目的,是为单个源文本片段与目的文本片段之间建立准确关系提供指引。以这种方式使被替代片段与替代片段相互“匹配”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确定它们各自的边界。由于在译文中采用了增添、删减、补偿的策略,因此无法保证它们“在级阶或范围上”(Toury 1995: 79)彼此相同。这样,“无遗留”原则就指导研究者只将以下这种目的文本片段视为替代性片段,即在该片段的边界之外,“对某个由源文本一个片段所表现的翻译问题,在解决方案不存在任何遗留,不论替代片段与源文本片段在级阶和范围上是相同还是不同”(Toury 1995: 79;沙特尔沃思,考伊 2005: 153)。

图里把“那些并没有真正源文、而在目的文化中却被视为翻译的目的语文本”称作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Toury 1980: 31)。伪翻译概指作者试图把源文本作为译本来呈现。图里指出,这一现象对翻译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两点:首先,伪翻译有时用来“向文学系统引入新的形式,当该文学系统反对偏离文学标准模式与规范时尤其如此”(Toury 1984: 83)。其次,由于伪译者通常采用真正翻译常用的语言与文本项目,因而,伪翻译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那些体现译本特征的主要观念。它们的存在印证了这么一个观点,即“目的文本作为翻译的地位首先取决于与接受系统相关的因素,而与源文本不一定要有什么联系”(Toury 1984: 81)。因此,伪翻译对于目的文本取向(target text-oriented)这个翻译方法有着特别的意义。

对于图里方法论的批评,总的来说,有如下三点:1. 选择原文与译文中的耦合对子进行比照的过程仍远不够系统化;2. 虽然有关专有名词的翻译研究得出了有趣的结论,而且这些名词可以看做是最受文化约束的元素,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体翻译策略是相同的,很可能是最好的选择,霍姆斯的建议——设计一个有待考察的清单,即使该清单并不是那么全面;3. 翻译在目标文化语境中的位置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限制。研究重点可以转移到更深刻地探讨不同文化、意识形态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研究译者和出版界本身。(Munday 2001: 123~124;芒迪 2007: 155)

综上所述,在图里看来,“规范”无论在翻译的实践或是理论层面,都是十分重要的概念;“规范”是存在于语言、文化以及翻译现实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描写翻译研究及其理论就是要把包括“规范”在内的、属于翻译范畴的各种客观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对这些现象进行描写和解释,提出必需的定义、基本假设和假说。这样的描写研究,也就拉近了翻译理论与实际翻译行为之间的距离,进而有助于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化与发展(谭载喜 2004: 273)。 (邵璐)

诺德(1943～)

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1967 年毕业于海德堡大学,主修西班牙语和英语;1983 年在海德堡大学获(浪漫主义文学研究)博士学位。1993 年获维也纳大学颁发的应用翻译学与翻译教学资格证书,1998 年至 2000 年任该校副校长。她曾得到德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到印度、印尼、泰国、阿根廷、巴西、古巴和越南等国家做短期访问教授,并到过西班牙、丹麦、芬兰、比利时和其他欧洲国家讲学。诺德集译者、教师、翻译研究者于一身,发表了约 80 篇/部有关翻译教学与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她的论著主要涉及几个方面:翻译中的语篇分析、译者培训、翻译功能类别等。她曾任多个学术刊物的编委或顾问,其中包括 *The Translator*(曼彻斯特)、*Sendebar*(西班牙格拉那达大学)、*Across*(匈牙利布达佩斯)、*Cuaderns*(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及 *Cadernos de Tradução*(巴西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她是德国联邦翻译协会(BDÜ)、德国西班牙语教师协会(DSV)和欧洲翻译研究学会(EST)的会员。

诺德的功能翻译观主要受其老师赖斯(Reiss)的影响。还在海德堡大学翻译学院从事翻译教学时,她就设计了“翻译导向的语篇分析模式”,后来发展成为专著《翻译中的语篇分析:理论、方法及翻译导向的语篇分析模式在教学中的应用》(1988/1991/2005)。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蓬勃发展。但是,由于语言的障碍,许多德国学者的论著与观点无法为非德语读者所熟知。诺德意识到语言在学术交流中的重要性,于是该书由德语翻译成英语出版。此书的英文版问世后在翻译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之后她直接用英语著书,《翻译是一种目的性活动——解释功能翻译理论》于 1997 年问世。

诺德的“翻译导向的语篇分析模式”是一个较为详尽的功能文本分析模式,可用于对原文中一系列复杂且具有内在相关性的文外因素及文内因素进行分析。(Nord 2005: 43~143)

文外因素包括:

·文本(信息)发送者及其意图,也即文本的目标功能;

·接受者及其期望;

·文本媒介(口头或是书面形式);

·文本交际的场所及时间;

·动机(原文制作及文本翻译的原因)。

文内因素包括:

·主题;

·内容:包括其言外之意及内容的衔接;

·前提:预想中参与者应了解的交际情景及现实世界因素;

·构成:包括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

·非语言因素:插图、斜体等;

·词汇:包括方言、语域及专门术语;

· 句型结构；

· 超音段特征：包括重音、音节及“文体标点”。(Munday 2001：82～83)

诺德认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中对译员培训最有应用价值的三个方面是：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通过对翻译纲要、原文和翻译问题进行分析与比较，学员可以清楚地知道，原文中哪些信息或语言成分应该原封不动地保留，哪些应该根据翻译意图进行调整。在分析文本功能时，诺德指出，具有不同功能的文本应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在实际翻译中，大致上有两种翻译类型，即纪实性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和工具性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Nord 2005：80～81)：

纪实性翻译“是对原文作者和源语文本接受者之间文化交际活动的记录”(Nord 2005：80)。比如，在文学翻译中，目的语文本将源语文本的思想译介给目的语读者，且目的语读者也能清楚意识到自己所读的作品是译文。诺德对纪实性翻译所举的其他例子包括逐字译、字面译、文献翻译和异化翻译。

工具性翻译“是目的语文化里新的交际活动过程中独立传递信息的工具，旨在实现其交际目的，且目的语读者不会意识到他们所读到或听到的文本曾经以另一种形式在其他交际情景中被使用过”(Nord 2005：81)。也就是说，目的语读者所读到的译文就好像是用源语写成，而且原文和译文应具有对等的功能，如一些机器的操作手册和商业信函等。

她提出的这两个类型的翻译都是建立在功能概念的基础之上，使人们能够理解原文特有的功能并选择与翻译目的相适应的翻译策略。她首次提出功能加忠诚的翻译理论，并在《翻译是一种目的性活动——解释功能翻译理论》一书中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功能加忠诚”的原则主要是针对赫尔兹-曼塔里(Holz-Mänttäri)的翻译论说。赫尔兹-曼塔里把文本视为实现交际功能的纯粹工具，认为其固有的价值完全从属于其目的，译者只需对目标环境负责，目标文本可以完全独立于原文。诺德则认为，自由重写不属于翻译的范畴，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没有原文，就没有翻译”(Nord 2005：32)。虽然“功能”是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但并非唯一的因素。译者应同时对原文和译文环境负责，对原文信息发送者(或发起人)和目标读者负责。诺德称这一责任为“忠诚”(loyalty)。

诺德把忠诚原则引入功能主义模式，是希望解决翻译中的激进功能主义问题。她的功能主义方法论建立在两大基石之上：功能加忠诚。按她的解释，功能指的是使译文在译语环境中按预定的方式运作的因素；忠诚指的是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忠诚“使译者双向地忠于译源与译入目标两方面，但不能把它与忠信的概念混为一谈，因为忠信 (fidelity/faithfulness) 仅仅指向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而忠诚 (loyalty) 是个人际范畴的概念，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Nord 1997：125)。功能加忠诚是诺德的独特的翻译理论，更确切地说，是她的理想。

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诚模式听起来是很完美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要同时忠诚于委托人、原文作者和读者三方并不容易做到。如果译文目的与原文目的相同，功能加忠诚似乎没有问题。但是，当译文目的与原文目的不相同时，译者该怎么办呢？译者该忠诚于翻译发起人，还是忠诚于原作者或是读者？诺德说，她的原文分析理论可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每一个决定提供理论依据，但是，如果决定翻译的主要因素是委托人所制定的目的文本功能，为什么译者还要作详细的原文分析呢？译者对预定的目的文本功能进行分析，然后从原文中提取所需要的部分不就可以了吗？事实上，如果原文和译文的功能不同(诺德认为，原文和译文对等或功能完全相同是很少的)，为什么还要回顾原文原来的功能呢？这些问题均无法从诺德的理论及其解释中得到答案。（张美芳）

蒂莫奇科(1943～)

玛丽亚·蒂莫奇科(Maria Tymoczko)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兼任英国沃里克大学英国及比较文化研究中心名誉教授。她是翻译研究描写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侧重于翻译的文化研究。蒂莫奇科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凯尔特语言文学系，在文学与语言学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这使得她既可以从宏观的文化角度，又可从微观的语言学角度审视翻译。作为研究爱尔兰文学的专家，蒂莫奇科将后殖民理论与比较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对爱尔兰早期文学的英译进行研究，为后殖民翻译理论作出了贡献。她的主要作品包括学术论文《电脑化语料库与翻译研究走向》(*Computerized Corpora and 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8)、《后殖民写作与文学翻译》(*Post-Colonial Writing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1999)、《连接两种无穷秩序：翻译研究方法》(*Connecting the Two Infinite Orders: Research Metho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2002/2007)、《翻译与参政：激进主义、社会变化、地缘政治迁徙中翻译的角色》(*Transl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ctivism, Social Change and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Geopolitical Shifts*, 2000)，专著包括《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研究：早期爱尔兰文学英译》(*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1999; 2004)、《爱尔兰的〈尤利西斯〉》(*The Irish Ulysses*, 1994)、《扩大化的翻译，掌权译者》(*Enlarging Translation, Empowering Translators*, 2006)以及与布莱克门(Blackmun)合编的《生于战乱》(*Born into a World at War*, 2000)、与根茨勒(Gentzler)合编的《翻译与权力》(*Translation and Power*, 2002)、与爱尔兰(Ireland)合编的《爱尔兰的语言与传统：延续与置换》(*Language and Tradition in Ireland: Continuities and Displacements*, 2003)。

蒂莫奇科的翻译观主要见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蒂莫奇科对描写翻译学派下的定义是：在研

究翻译的过程、产品与功能的时候,把翻译实践置于时间之中,也就是把翻译实践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加以研究。蒂莫奇科指出,翻译作为语言艺术,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与时间无涉的语言规则(导致理论的规范化),或者被认为是一种超越一切的灵感(导致彻底否定理论),而强调翻译的实质,把时间与空间作为翻译研究的基础的研究方法,则把翻译理论引向了新的方向(Tymoczko 1999/2004: 25)。

蒂莫奇科创造性地将雅各布森(Jakobson)关于人类思维两大基本方式的区分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强调了翻译的换喻过程(metonymic process)(Tymoczko 1999/2004: 19)。雅各布森认为,人类思维有两大基本方式:暗喻与换喻。所谓暗喻,指的是选择与替换(selection/substitution)。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视为暗喻的过程,即一种语言中的字词、语法结构、文化标记、文学形式等为另一种语言中的相应成分所替换。这样看待翻译,就使得人们只把翻译视为一种机械劳动,只进行字词的选择,造成译者地位一直很低。蒂莫奇科认为,翻译除这种暗喻的一面外,还应该有换喻的一面,即翻译的联系/创造(connection/creation)功能。翻译是一种换喻,透过翻译,即译者对原文进行的摆布与修改,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的发展、演进以及文化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翻译过程是一个换喻过程,因此,原文本的意义在换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丧失掉一部分。一个文本的意义是由多方面决定的。文本的多重意义自然能够唤起读者对文本所在的整个文化领域(例如风俗习惯、法律、物质条件和文学规范等)的联想,而翻译并不能全部再现这些信息。受到译者所处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自身地位及翻译目的的影响,译者必须作出抉择,选择他想要转换的文本意义,而不是全部意义。全面"忠实"地再现原文,作为中西方传统翻译的标准,在蒂莫奇科看来,只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翻译就其本质而言只能是一种部分翻译,而这种部分翻译并不像传统翻译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缺憾或美中不足。蒂莫奇科认为,译者的抉择正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而同一文本多种译本之间的区别也就在于此。

三、蒂莫奇科(Tymoczko 2000)指出,语言学派的研究方法和文化研究学派的方法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水火不容,两个学派相互排斥的态度不利于翻译研究的发展。她博采两家之长,结合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教学,提出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她将前者形象地比作显微镜式研究方法,而将后者比作望远镜式研究方法。她认为,研究者在确定了研究对象,提出理论假设后,检验其理论假设时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从宏观的角度,以望远镜的方式来透视译作所在的整个文化背景,以及从微观角度,即通过显微镜来详细研究译作语言从音素、词、句到语篇等各个层次。蒂莫奇科认为,语言学和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研究工具,任何只取其一而舍弃另一个的做法无疑是一叶障目,而将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大大拓宽我们的视野,推动翻译研究的发展。蒂莫奇科(Tymoczko 1999/2004)为这种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她把爱尔兰早期文学翻译放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之中进行了系统的全方位的扫描,深刻地揭示了翻译的改写性和换喻性;同时通过选用爱尔兰史诗《库利牛袭》(*Táin Bó Cúailnge*)有代表性的十种英译本的历时和共时的研究,使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策略及社会文化功能得以全面的展示。

蒂莫奇科对翻译的定义、翻译的性质及翻译的研究方法的重新界定和阐述,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现存的翻译现象,对于译作的学术研究、翻译史、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都有深远的意义。

蒂莫奇科对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观点主要为:

一、爱尔兰是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片肥沃的土壤。爱尔兰既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又是世界上第一个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翻译在这个国家殖民化与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在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翻译,对殖民者而言,是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的产物;对于被殖民者自身而言,是一种发现和确认自身文化遗产的方式。被殖民者通过翻译重塑自身的形象,力图颠覆殖民者通过文化帝国主义塑造的形象。蒂莫奇科称自己是翻译研究中的左翼分子,权力、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与翻译的关系是她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爱尔兰早期文学作品《库利牛袭》英译本的个案研究,蒂莫奇科发现翻译在爱尔兰文化民族主义复兴、政治独立运动中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发挥了巨大作用,进而阐释了翻译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观点。

二、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在两种平起平坐的文化之间通过自由交流信息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在后殖民条件下,这种假设并不存在,翻译是在殖民地与宗主国这两个不平等的实体之间进行的,文化的不平等地位在翻译中更加突显。主导翻译模式(dominant mode of translation)认为翻译是在两个单语区域之间进行,由口译或笔译人员充当联络人。但是,在后殖民环境下,翻译是在多语多文化而又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进行的,译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本而是一个行动(Tymoczko 1999/2004: 295~296),翻译的作用与翻译的内容一样重要,翻译的环境与翻译的文本一样重要。

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不仅是语言能力问题,这里翻译的功能更加突出,而语言的对等则降到了次要地位。后殖民翻译研究者,女性主义者,巴西、加拿大魁北克以及其他关注翻译与权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人员对原文的统治地位提出质疑,因为他们都更加关注翻译过程中固有的政治、斗争功能。翻译不仅是世界文化交流的纽带,还可以反映出思想意识形态的对话协商、文化的斗争与力量对比,以及文化的建构与创造。后殖民翻译具有颠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属于权力的问题。

三、蒂莫奇科将后殖民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进行比较,两者的相似之处为我们阐明了文学翻译的一些特点。从词源学角度来看,translation 指的是将圣

徒的尸骨残骸运到另外一个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殖民文学作品可以看成是一种翻译，一种文化中的精华、神圣之处被运到另一个更安全、更为中心的地方。它在原来的环境中受人们崇拜敬仰，到了新环境中也希望能继续受人崇拜、生根，获得新生。习俗、信仰、神话等在后殖民文学创作中一般都要解释清楚，翻译也是如此。翻译中有一种现象：如果源语属于强势文化，目的语属于弱势文化，那么翻译时源语文化中的很多地方就不必明确表达出来，因为译者假定目的语读者了解强势文化中的神话典故、历史事件以及风俗习惯等。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文化霸权的一种表现。在翻译研究中，我们区分"将文本拉近读者"与"将读者拉近文本"。源语文化及原文声望越高，越容易让读者靠近文本。后殖民文学中作者的声望也可以与之类比：作者的国际声誉越高，对国际范围内的读者要求也越高，即国际范围内的读者要向作者靠拢。由于美国的文化经济霸权，许多弱势文化经济国家的作者要想赢得国际声誉，就必须直接用英语写作或将其作品译成英文。作家的作品能够在美国销售，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作家在国际文坛获得了成功，它还可以提高作家在本国的知名度。

总而言之，蒂莫奇科作为翻译描写学派的代表人物，其重要性在于揭示翻译和文化因素密切相连这一要旨。她对英国第一个殖民地爱尔兰的文化轨迹的开创性分析，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范式，是对后殖民主义研究的重要贡献，也为其他有过类似殖民统治遭遇的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模式。（参阅陶涛 2007）

（邵璐）

勒菲弗尔（1944～1996）

安德烈 · 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原为比利时学者，后长期移居美国，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德语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他是当代国际著名的文论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尽管翻译研究派起源于欧洲，但由于勒菲弗尔的影响，这一学派在美国得到了发展。他的代表作品包括《诗歌翻译：七大策略与一大蓝图》（*Translating Poetry: Seven Strategies and a Blueprint*, 1975）、《德国文学翻译传统：从路德到罗森兹维格》（*Translating Literature: The German Translation from Luther to Rosenzweig*, 1977）、《翻译、改写与文学名誉的操纵》（*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Fame*, 1992）、《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语境中的实践与理论》（*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和《翻译 · 历史 · 文化：研究资料集》（*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以及代表论文《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Translating Literature/Translated Literature*, 1980）、《翻译与比较文学：寻求中心位置》（*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Search for Center*, 1991）、《论翻译：近期、过去与未来》（*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 Recent, Less Recent and to Come*, 1993）和《比较文学与翻译概论》（*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1994）等。此外，他还与英国翻译研究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内特（Bassnett）合作，主编了多套翻译文集或译学丛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翻译研究论丛》。1996 年 3 月，勒菲弗尔因患白血病英年早逝，时年 52 岁。

勒菲弗尔主编的翻译论集《翻译 · 历史 · 文化：研究资料集》收集了从公元前 100 多年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到 20 世纪 30 年代这 2 000 年间 50 余位西方学者关于翻译问题的论述，包括昆体良（Quintilian）、哲罗姆（Jerome）、马丁 · 路德（Martin Luther）、培根（Bacon）、施莱格尔（Schlegel）、阿诺德（Arnold）、蒲伯（Pope）、洪堡（Humboldt）、哥德（Goethe）、伏尔泰（Voltaire）、雨果（Hugo）、泰特勒（Tytler）、雪莱（Shelley）等西方著名哲学家、作家、翻译家。但这本翻译论集不是按通常的以年代为序编排的，而是分成七个专题。这七个专题又按翻译所受的制约程度来安排。他的专著《翻译、改写与文学名誉的操纵》通过对历史上一些文学作品的分析，论述了他在翻译论集中的那些专题。两部著作从名家的论述和对译作的分析两个方面，对翻译是改写还是对文本的操纵这一思想作了深入的论证。而另一本《翻译、历史与文化》的论文集，则集中了当代翻译研究派的其他学者从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对上述命题的论述。这三部著作、论集和论文集，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中反映了翻译研究派，尤其是勒菲弗尔关于文化翻译的理论，具有历史的深度（翻译论集）、现实的广度（论文集）和文学批评的深刻见解（专著）；而他的《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语境中的实践与理论》则把他的理论应用到了翻译教学中去。（廖七一 2000：157～159）

勒菲弗尔是一位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理论的学者。他与巴斯内特一起，首先强调和颠倒了翻译研究在比较文学中地位。主要从文化视角来探讨翻译。他的翻译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把翻译研究的着眼点从语言学派所最关心的语言结构及语言形式对应问题，转向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在各自文化系统中的意义和功能，这是所有文化学派的共同特征。勒菲弗尔的基本翻译思想也是如此。他首先指出，文学是一个系统，由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具有某些特征的成分构成。任何文学都必须生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对它的解读和接受，始终会受到一系列互相关联、互为参照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包括文学内部的，如创作者、翻译者、评论者等从业人员自身的创作与翻译观念，以及他们所常用的创作与翻译风格和手段等，同时也包括文学外部的因素，如特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诗学原则、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作品委托者、赞助者、接受者的要求和反应等。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研究的目标就远远不止于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对不对等或怎么对等的问题，而是要同时研究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种种文化问题。（谭载喜 2004：242）

在《翻译、历史与文化：原始资料集》一书的"导论"中，勒菲弗尔提出，翻译研究应研究以下这些问

题：1. 一种文化为什么要通过翻译引进外国的文本？这样做是否意味着自身文化的不足？2. 是谁为自己的文化引进了外国文化中的文本？换句话说，是谁翻译的？为什么要翻译？翻译的目的是什么？谁选择需要翻译的文本？是译者自己吗？是译者独立作出选择的吗？还是有别的因素影响选择？3. 接受语文化的读者怎么能知道引进的文本翻译得好不好？他们信任译者吗？如果不信任，那他们该信任谁？如果没有翻译，那他们又该怎么办？可以说，译本是给不懂原文的人看的，因此，对不懂原文的读者来说，这些译本起的作用应同自己母语文化的文本的作用一样。4. 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并不是平等的。有些语言享有较高的地位，就像在某一特定文化中，有些文本占有中心的地位，如《圣经》或《古兰经》。5. 为什么以外国文本为基础来制作文本，而不是直接先以自己的母语来制作类似的文本？

勒菲弗尔从以下几个方面回答了上述这些问题：1. 思想意识在形成翻译中的作用。译作的形象受两种因素的制约：译者的思想意识和当时在接受语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2. 赞助人的力量。译者与赞助人的关系中，译者若想使自己的翻译得到出版，其所享有的自由度是很小的。3. 诗学。诗学有两个因素组成：一是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个是指观念。4. 论域。译者必须在对原作者所处的论域（如属于某一特定文化的一整套概念、思想意识、人物和事物）与译者和他的读者所处的另一个论域之间取得平衡。5. 翻译、语言发展和教育。翻译最终还得通过语言手段的运用对读者产生影响。6. 翻译技巧。在翻译中，想给出规则是徒劳的，因为翻译不仅仅是寻求语言层次上的对等。7. 中心文本和中心文化。如果某一文本代表了某一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该文化中起着中心文本的作用，其翻译必将受到严格检查，因为"不能接受的"翻译会被看做从根本上对该文化的破坏。另一方面，如果某一文化认为自己是中心文化，这种文化在对待其他文化所产生的文本时，则采取一种简慢随便的态度。正是对文本的处理，在文化中起了中心的作用；也正是中心文化翻译边缘文化的文本所采取的方法，体现了思想意识、诗学和论域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廖七一 2000：160～166）

勒菲弗尔指出，翻译研究仅限于翻译技巧的研究是不会有成果的。文学翻译的研究，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研究；只有这样，翻译研究才会出成果。

二、翻译中的操纵概念。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与文学名誉的操纵》一书中提出。其核心意义就是，译者在处理源语文本以及生成目的语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有权，也一定会取己所需，对文本进行改写。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就是对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的改写；其他文学形式如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戏剧、电影、拟作等也都是对文本形象的改写。而改写就是对文本的操纵，改写就是使文本按操纵者所选择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里产生影响和作用。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rewrite)，"改写"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续，因而具有巨大的力量。"改写"就是"操纵"(manipulation)，"操纵学派"由此而来。勒菲弗尔把翻译研究与权力、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结合起来，并提出，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现象。它实际上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由此可以巩固现存的意识形态、赞助行为和诗学因素，反之，也可以破坏它们。这些观点对以前的翻译理论简直具有颠覆性。出于对翻译哲学的思考，他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句子，甚至不是篇章，而是文化。基于词语对等或篇章对等的"忠实"根本不存在，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原文在源文化中同样的功能。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把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可以说，在他们的眼里，译文的地位不仅可以与原文平起平坐，而且有时超过了原文。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自然也提升到了"操纵者"的地位上，不过由于受意识形态、赞助行为和诗学因素等方面的影响，译者有时也处于"被操纵者"的地位。

勒菲弗尔所提出的文化学派理论中的操纵式改写，并不简单的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改写"，因为在他看来，凡翻译都是改写，哪怕是最忠实的翻译也都是一种形式的改写。作为翻译操纵者的这种改写抑或操纵，在本质上应被视作一种文化上的必然。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必然会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制约，他除了必须考虑原作者意图、源文本语境等一切与源文本相关的特征外，更主要的是还必须考虑翻译目的、目的语文本功用、读者期望和反应、委托者和赞助者要求、作品出版发行机构等一系列与目标或接受文化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以及他们因人而异的受制程度，就构成了译者对译文的必然操纵条件。因此对于译者的"操纵"，不论它是指传统忠实意义上的理想翻译，还是指各种改编式的翻译变体，如"编译""摘译""拟译""述译""缩译" "综译"等，都是文化或操纵学派翻译理论参照下的合适翻译。对于这个意义上的"操纵"，不能用"正当"或"不正当"之类的道德价值词来评判，而只能从目标文本有没有达到翻译目的，符不符合受众的期望值，能不能被接受文化所接纳等方面的"合适性"标准来评判。评判的立足点，在于接受文化而不在源文化一方。这也是翻译中"操纵"的最终目的所在，但操纵的结果却是双重的：它把异邦文化带入我族，一方面可以发展丰富我族文化，帮助我族文学和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央（归化）；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挑战进而颠覆我族文化，使我族文学和文化从原有的中心位置上逐步边缘化（异化）。

勒菲弗尔与翻译研究派的其他学者一起，为提高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次上，阐述了翻译的重要作用，从而唤起学术界对翻译研究的重视，并希望学术界重新审视翻译的社会功能，从而为翻译和翻译

研究在学术领域中争得应得的地位。原本是边缘学科的翻译研究开始向中心靠拢。

必须指出的是,翻译的语言学派也在发展,并向文化研究靠拢,并开始把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原理应用到翻译研究中去。例如奈达(Nida)近年来就特别强调社会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并出版了《论翻译的社会语言学理论》(1979)、《语言、文化与翻译》(1993)和《跨语交际的社会语言学》(1996)等专著。因此,勒菲弗尔和翻译研究派对翻译的语言学派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也是不妥当的。未来的翻译研究,将会是语言学派和翻译研究派相互补充、相互兼容的局面。 (黄勤)

巴斯内特(1947～)

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是文化翻译学派的旗手之一,现任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副校长,翻译及比较文化研究中心讲座教授,国际上知名的翻译理论家、比较文学学者、翻译家和诗人。

巴斯内特 1947 年出生于英格兰,早年求学于丹麦、葡萄牙和意大利,在中国、日本、印尼、土耳其、新加坡、南北美洲和十余个欧洲国家工作过,精通英、法、意、西班牙等语言,熟悉德语和葡萄牙语,还懂拉丁语、捷克语、丹麦语等。多样化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使她深入了解多种文化,为后来的翻译及比较文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她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了翻译研究、比较文学、妇女文学、拉美文学、戏剧研究、英国研究等。出版专著和编著 40 多种、文学和文艺理论译作 20 多种,发表论文近 100 篇。巴斯内特在翻译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专著 *Translation Studies* (Routledge 1980/1991),合(编)著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Pinter Publisher 1990),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1999), *The Translator as Writer* (Baker, Taylor Books 2006)等,其中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一书已再版两次,成为翻译学界权威著作和翻译研究的经典入门教材。此外,她还与勒菲弗尔(Lefevere)、根茨勒(Gentzler)等合作主编"翻译学丛书"(Translation Studies)和"翻译主题丛书"(Topics in Translation)。

1990 年,巴斯内特在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一书序言中描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这一由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首创的"文化转向"话语在翻译研究领域实现了普泛化,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之维的发展。巴斯内特的翻译理论体现了明显的文化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是:重视译学的文化学方法论和跨学科研究(特别推崇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提倡翻译史研究,重视翻译的学科建设,关注翻译及译者的社会地位问题。总的来说,她是一个翻译研究宏观框架理论的建构者,她的理论不着眼于细枝末节的翻译技巧或具体的翻译实践问题,她更多关注的是翻译研究整个学科的发展和归宿。

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理论首先体现在她对翻译的几个中心问题的阐述上。首先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与翻译的语言学派观点不同,巴斯内特认为,翻译虽是以语言为起点,但翻译不仅仅是利用字典和语法,将一种语言符号包含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中,而是包含"一整套语言外的规则"(Bassnett 2004:21)。她认为,如果把文化比作人的身体,语言就是心脏,只有身体与心脏相互协调,人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译者翻译时如果割离文化,孤立地看待文本,就有如外科医生给病人作心脏手术而不管病人心脏周围的身体状况一样危险。其次是翻译单位的问题。翻译界对翻译单位问题的看法是见仁见智,语言学派对此的讨论更是细致入微,音素、词素、词、短语到句子甚至文本都可以视为翻译单位。但巴斯内特认为,语言学派的翻译单位观虽然经历了从词语到文本的发展成熟过程,却没有进一步的超越;这些翻译单位的观点无法运用到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因此她认为翻译应该以文化为单位。此外,对于语言学派理论的核心概念"翻译对等"问题,巴斯内特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她首先剖析了翻译对等的内涵:对等不是寻求完全相同,因为同一文本在同一译语的两种译本中都无法求得一致,更何况是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呢?(Bassnett 2004:36)如果 1980 年时巴斯内特认为翻译对等可以通过文化功能的相似实现的话,20 年后她的翻译对等观中的文化思考就更深入了。在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的第三版序言中,巴斯内特说,随着人们对译者主体性和翻译过程中制约因素的逐步认识,对等这一概念变得越来越难以界定了。翻译对等的概念早已消融,应该退出翻译舞台。

巴斯内特对翻译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讨论都是针对语言学派的不足和片面,在这些问题上她展现了自己的超越语言学派的文化翻译关注,但她的理论的精华更多体现在宏观学科理论上。

巴斯内特对勒芬会议之前的翻译研究中话语落后的现象甚为不满,认为在一个解构的时代,人们却仍旧谈论着"确定的"翻译,"准确""忠实"以及语言和文学系统间的"对等"。和文学研究的批评话语相比,翻译研究的术语充斥着价值评判,似乎落后了几十年,直至多元系统理论的诞生。巴斯内特高度评价了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多元系统理论使翻译研究脱离了忠实、对等的枯燥乏味的讨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奇特混合体。多元系统理论注重考察译本在译语文学中的作用,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引入翻译研究,为翻译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同时她也指出了多元系统理论存在过分形式主义的根源,不能为研究翻译与各种文化现象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足够的框架。在汲取多元系统理论精髓的同时,巴斯内特发展出了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翻译理论。在巴斯内特看来,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有许多共同点:两者都有跨学科的性质,而且发展阶段也惊人地相似。文化研究经历了文化主义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阶段,分别对应于翻译研究的奈达(Nida)、纽马克(Newmark)、卡特福德(Catford)和穆南(Mounin)时

期,多元系统理论时期,以及文化转向后的多样化理论时期。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有着如此众多的共通之处,翻译研究应该更多地利用文化研究的理论;两者应该跳出各自为政的平行发展轨道,互为补充,协同发展。

巴斯内特从文化研究理论中借鉴了三个核心概念:权力关系、操纵和文本生产。她的基本观点是:翻译是一种文化互动,是权力参与下的文化对话和构建。任何文本都是存在于权力关系网中的,因此翻译不可避免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制约。译本的生产是文本生产的一种形式,只是在这种文本生产过程中各种操纵因素更加隐蔽。翻译研究要采用描述的方法,结合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出翻译是怎样构建文化的。在诸多的后现代思潮理论中,巴斯内特从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角度撰文较多,集中体现了她对权力关系的关注。

巴斯内特翻译理论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翻译史。在她唯一的翻译学专著 *Translation Studies* 中,她就花了近一半篇幅探讨翻译史,以充足翔实的史料论证了翻译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罗马帝国攻占希腊后被希腊灿烂辉煌的文化所震撼折服,罗马人开始大规模地翻译希腊文学作品以充实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翻译对促进欧洲各国民族语的形成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巴斯内特认为,"翻译决不是派生性的(secondary)活动,而是原发性的(primary)活动,是时代文化生活的塑造力量,有时译者更像革命活动家,而不是原作者或原文本的仆人。"通过翻译史的研究,巴斯内特发现翻译不存在绝对的标准,标准和准则都是依附于特定文化和特定时间的,翻译标准是变化的。对于近30年的翻译理论,巴斯内特用"对等"(equivalence)、"历史"(history)、"文化"(culture)、"显现"(visibility)等关键词进行了概括(Bassnett 1998:108~111)。她认为,1965至1975年间,翻译研究的关键词是"对等";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关键词是"历史",翻译研究的重心在于研究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文化、历史因素。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的关键词是"文化"。翻译研究开始逐步向文化研究靠拢,逐渐采用了人类学和人种志的研究方法。翻译活动中各种权力关系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到了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的关键词变成了"显现",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从被"遮蔽"到"解蔽",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得到认可。翻译的过程被认为不是一个透明的意义传送过程,在翻译过程中意义总是被操纵——过滤、延迟甚至篡改。

巴斯内特认为,一个成熟学科的标志是学科历史研究的建立,她对翻译史的重视意在构建翻译学学科。在学科建设上,她勾画出翻译研究的四大领域:翻译史、译语文化中的翻译、翻译与语言学和翻译与诗学。对于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问题,巴斯内特在《比较文学浅谈》(*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1993)一书的第七章指出,"翻译学借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已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改用'跨文化研究'之类的名称也许更加贴切"。翻译研究不再是比较文学之下一个不起眼的分支。"当比较文学还在讨论其学科性时,翻译研究已经勇敢地宣称自己是一门学科,它在这个领域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和努力似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是重新考虑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关系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要学科,而把比较文学视为其中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Bassnett 1993:160~161)在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一书中,巴斯内特则提出,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已在20世纪80年代末完成,现在轮到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了。这样翻译研究被提高到了与文化研究或比较文学同等重要,甚至比它们更高的地位。

巴斯内特的翻译理论多为宏观的抽象理论,但戏剧翻译是她撰文涉及较多的一类具体翻译理论。由于戏剧文本与表演相连,这种二重性使其成为"翻译研究最棘手同时也最受忽视的领域"(Bassnett, Lefevere 2001:90)。20世纪80年代初期,巴斯内特认为戏剧翻译有两个评判标准:可表演性(playability or performability)以及译文的功能。可表演性意味着剧本结构本身含有一些适合演出的因素。1991年,巴斯内特在 *Translating for the Theatre: the Case against Performability* 一文中,对可表演性进行了溯源。17世纪后期,戏剧商业化在欧洲蓬勃发展,剧本需求日益增长。在这种市场需求紧迫的情形下,翻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种剧本被仓促地翻译过来。为了迎合观众,同时受剧团规模、演出节目、时空限制的影响,翻译的剧本有很大变形,甚至增删。于是剧院经理人等炮制出"可表演性"这一所谓的标准充当冠冕堂皇的理由。巴斯内特认为,如果可以建立一套标准来衡量剧本的"可表演性",那么这些标准则应该会因为文化、时间、文本类型的不同而经常发生变化。众多关于戏剧翻译的模糊看法其实都源于一个守旧的"普遍性"观念,即纵使文化边界发生变化,戏剧也保持恒常不变。所以"可表演性"作为戏剧翻译的标准是不科学的。巴斯内特认为是取消"可表演性"这个评判标准的时候了,译者应该"更侧重于剧本的语言结构本身"。这其实体现了巴斯内特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建设多元文化戏剧(multicultural theatre)的文化翻译观。

近年来,巴斯内特主持了AHRB资助的研究项目——全球传媒下语言和翻译的文化政治与经济(The Cultur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in Global Media)——通过研究新闻媒体的翻译实践,评估翻译对全球信息流通的影响。在该课题已发表的一篇文章 *Bringing the News Home: Strategies of Acculturating and Foreignisation* 中,巴斯内特回顾了数世纪来同化策略和异化策略在欧洲范围内的对立和争论,指出这两者各有所长;在后殖民语境中,同化异化策略隐含着文化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韦努蒂(Venuti)倡导的异化策略只与文学翻译相关。新闻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新闻翻译的首要标准是译文的功能。最后巴斯内特得出结论:新闻翻译中流行的规则是以文化传入为目标的同化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异化翻译并不是什么阻抗式翻译,而是一种对原文文本的歪曲。

然而巴斯内特的翻译理论也有其不甚完美之处,如她反复强调翻译的"功能"(function),却对其界定模糊。但是,她擅长对各家理论进行归纳总结和评论,对翻译学的宏观发展前景作出规划。她倡导的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开辟了另一番宽阔的研究视角,促进了翻译界的话语转型,启发了各种文化研究维度的翻译理论的蓬勃发展,对世界翻译学学科的整体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李森)

根茨勒(1951～)

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是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翻译中心主任、比较文学博士、翻译学教授。他的成名译学著作是1993年出版、2001年再版的《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另于2002年与蒂莫奇科(Tymoczko)合编了《翻译与权力》(*Translation and Power*),并与巴斯内特(Bassnett)合作主编了一套译学丛书(*Topics in Translation Series for Multilingual Matters*)。他发表的多篇译学论文中,较重要的有《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来自内部的挑战》(*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hallenge from Within*, 1999)、《翻译理论:拓宽领域抑或限制发展?》(*Translation Theory: Expanding Horizons or Limiting Growth?* 2001)、《翻译、后结构主义和权力》(*Transl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wer*, 2002)、《翻译理论:单语、双语还是多语?》(*Translation Theory: Monolingual,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2006)。

根茨勒在翻译理论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使人们对二次大战以来西方各个翻译理论流派的认识明晰化,并因此而引发翻译研究领域(包括我国翻译研究领域)对于形形色色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兴趣。根茨勒在《当代翻译理论》一书中,把翻译研究置于科学论、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等不同视野中加以研究,并通过探索翻译(文学翻译实践)外围的"政治现实"(political reality),来勾勒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轮廓,引导读者对翻译定义和分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

二、在全面、系统梳理当代西方各种翻译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公正对待一切系统"的多途径合作的翻译研究观。他认为,当代翻译理论像文学理论一样,都源于结构主义理论。而所有这些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无论是美国译坊学派理论对良好品味和文学价值的强调,还是翻译科学学派对"翻译本质"的强调,或早期翻译研究学派对具有艺术功能的文学手段的强调、多元系统学派对"客观性"的强烈坚持,以及解构学派对现实文化交流的疏远,似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囿于各自的学术圈子之内:各种学派对本系统所使用的术语要求非常特殊,而且术语有限;他们对理论"正确性"或"客观性"的追求往往趋于片面,都企图在牺牲其他视角的情况下去获得学界普遍承认。结果所带来的,仅仅是理论之间的不断冲突,而没有理论之间应有的合作和交流,从而导致学术研究走向边缘化。毫无疑问,翻译理论要想有大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互相排斥的不良状况,加强不同学派彼此之间以及翻译研究与其他研究领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在根茨勒看来,各个学派的理论,从美国译坊学派理查兹(Richards)、威尔(Will)等人的文学翻译理论,到奈达(Nida)、威尔斯(Wilss)等人的科学派翻译理论,再到列维(Levý)、霍姆斯(Holmes)、勒菲弗尔(Lefevere)、伊文-佐哈(Even-Zohar)等人的翻译研究派、多元学派和解构学派翻译理论,它们在思想和方法论上其实是互为补充的。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是破除不同翻译理论注定会互相冲突、互为排斥的错误观念,在思想和方法上的互相借鉴,不断形成新的途径以及在新的平台上展开新的多途径之间的合作。

三、对翻译本质提出了一种后结构主义的解释模式。他在《翻译、后结构主义和权力》一文中,分析了德里达(Derrida)、斯皮瓦克(Spivak)等人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以及在他们解构思想影响下出现的翻译理论家如韦努蒂(Venuti)、莱文(Levine)和鲁宾逊(Robinson)等人的翻译思想,指出新的翻译解释模式不能再沿袭过去的传统,把翻译简单地定义为"从一种单一语言到另一种单一语言的转换",而应把它看做发生在一种多文化形态环境和另一种同样多文化形态环境之间的转换。"在后结构主义的翻译中,新生意义的混合场景会得以开创,新的界限会出现然后被跨越,并常常带来异乎寻常的创造性结果。在这种情境下,翻译因充满了双关词、新创词、古雅词、玩笑词以及滑稽模仿词而变成了一种乐趣。"(Gentzler 2002: 216～217)就译者扮演的角色而言,在翻译过程中,他从来都不是中立派,而是一个具有语言和文化能力、拥有自己的行事方案的个体。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以及这种世界观可能对翻译过程染上的色彩。就翻译活动而言,它不只是为一个统一的异己的"他者"提供一个窗口,它直接参与这个"他者"的构建。这样的翻译不再是没有头脑的反映文化抗争的行为,而是直接把真正的差异带到文化的前沿,为文化构建提供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通过这个工具,我们不仅重新创造了我们的先辈,同时会为未来创造了新的话语模式。(谭载喜2004: 249～250)

另外,根茨勒对翻译理论的批评主要见于:

一、对奈达的翻译科学说的批评。根茨勒在《当代翻译理论》第三章中,从解构主义的观点出发,批驳奈达的译学思想带有神学观点和改变宗教信仰立场。在根茨勒看来,动态对等旨在使接受者,不论其文化背景,都融入基督教的主流话语和思想之中。

二、对多元系统的批评,包括:1. 基于相对较少的证据而过分概括翻译的"普遍规律"(universal laws);2. 过分依赖20世纪20年代形式主义的模式,

而根据伊文-佐哈自己的演变趋势模式,形式主义模式对20世纪70年代的翻译文本可能并不合适;3.倾向侧重抽象模式,而轻视文本和译者所面对的"真实生活"(real-life)的约束;4.所提出的科学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客观的。当然,根茨勒也强调,多元系统论标志着翻译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并归纳出下面几个优势:1.对文学作品自身的研究与对社会、历史、文化力量的研究同时进行;2.伊文-佐哈从孤立地研究单一文本,走向在文化和文学系统内进行翻译研究,这种研究也只有在该系统内才能发挥其功能;3.对等值和充分性的非规范性定义可以根据文本的历史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Gentzler 1993:120～125; Munday 2001:111; 芒迪 2007:139)

三、对图里(Toury)在"充分的"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简称AT)上的矛盾,以及将假定的不变量作为普遍的给定的批评(Gentzler 1993/2001:131～132; 芒迪 2007:141)。图里(Toury 1978:93; 1985:32)将一个假定的"中间对照物"(intermediate invariant)作为"充分性翻译",对翻译的转换进行考察;然而,图里同时又承认,实践中不存在完全"充分的"翻译(Toury 1978:88～89)。图里的这一矛盾,也遭到了赫曼斯(Hermans)的批评(Munday 2001:112)。此外,根茨勒对早期多元系统研究的批评也可以看做是针对图里的,因为图里初步提出的"法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简单地再次阐述一些已获普遍接受(尽管并没有被证明)的关于翻译的观点。一个不太科学化的规范或法则研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一个诸如翻译这样的边缘领域,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邵璐)

贝克(1953～)

莫娜·贝克(Mona Baker)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语言、语言学及文化学院翻译学教授、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译学杂志《翻译者:跨文化交际研究》(*The Translator: 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主编。贝克原籍埃及,1976年毕业于开罗大学,后赴英国留学并定居,1987年在英国获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20世纪90年代获博士学位。贝克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十分活跃的人物之一。她以自己所主持的翻译研究中心和译学杂志为基地,常年开办翻译讨论会或研习班,吸引各地(包括海外各地)学人参加。此外,她还应邀担任过多所大学(包括英国和香港等地大学)的兼职或访问教授,并先后担任多种社会及学术团体的职务,包括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副会长、英格兰文化艺术协会翻译委员会成员、英国比较文学协会常务理事、英国口笔译协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主席等。贝克在翻译研究领域的主要作品包括2006年出版的著作《叙事翻译与冲突》(*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1992年的翻译教材《换言之:翻译教程》(*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1993年与人合编的论文集《文本与技术:约翰·辛克莱纪念文集》(*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1998年主编的《劳特利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以及论文《笔译口译者调停事件中的语境建构》(*Contextualization in Translator-and Interpreter-Mediated Events*, 2006)、《翻译中的相似性与相异性:基于语料库的视角》(*A Corpus-based View of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2004)、《翻译研究大环境中的语料库研究》(*Corpus-based Studies with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02)、《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未来的挑战》(*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 1996)、《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意义与应用》(*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1993)等。

从以上简单的作品介绍可以看出,贝克对于翻译研究的贡献,除了主编《翻译者:跨文化交际研究》杂志、出版颇具影响的翻译教程和编纂出版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以外,主要在于开辟了以语料库为基础的翻译研究途径。这在20世纪90年代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途径。她从语料库语言学获取灵感,并借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翻译问题展开另类调查,即广泛收集真实存在的翻译材料,借助现代化的手段建立大型资料库,挑选出各种资料样本进行分析,以此来描述翻译的真实面目和性质,揭示可能存在于翻译真实中的规律,并为翻译操作提供范式。贝克认为,为翻译研究所用的语料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平行语料库(parallel corpus);二是多语语料库(multilingual corpus);三是可比语料库(comparable corpus)。

所谓平行语料库,是指双语平行的语料库,它收集的是一种语言如英语的原创文本及其在另一种语言如法语、德语中的翻译文本,因而可以把它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翻译语料库。平行对应关系可能是一对一,也可能是一对二,或一对更多,也就是说,源文本始终是一个,译入另一语言的对应文本却可能不止一个。研究者通过对两种平行文本,即对一个源文本和一个或若干平行目标文本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发现对应文本在词汇、句法和风格上的对等关系和差异。实际上,传统的翻译批评就是根据此类平行文本的比较来进行的。采用平行语料库分析所不同的是,由于平行语料库的建立,意味着机器化、数字化手段的使用,因此它的分析速度更快,分析范围更广泛、更全面、更彻底,分析结果也往往更准确、更可靠。翻译平行语料库的建立,对于翻译培训、双语词汇教学、双语词典编纂和机器翻译等,尤其具有实际价值。

所谓多语语料库,是指收集来自两种或多种语言、体裁相同或相似的文本的语料库,这些文本都是各种语言的原创,而不是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真正的"平行"语料库,而不是翻译语料库。它与翻译研究的关系较为间接,价值主要在于,研究者可以通过对这些"平行"文本的比较,分析出它们在各自语言里文本的类型和风格特性,从而为分析或评论可能

存在的相应翻译文本建立有效的参照系数。

所谓可比语料库,是指同时收集某一语言的原创文本和从其他语言译入这一语言的、体裁相同或相似的文本,例如收集某一体裁的英语原创文本和从法语或德语译入英语的文本。根据贝克的观点,此类语料库的建立对翻译研究最具价值,因为研究者通过从词汇到语法到文字风格层面,对同一语言里原创文本和外来翻译文本进行分析和比较,可以发现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翻译的规范和翻译活动中带普遍意义的规律(廖七一 2001:397)。

翻译语料库或与翻译研究相关语料库的研究和应用,无疑可以为翻译研究创造出真实可靠的分析平台,可以帮助研究者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去认识翻译、解释翻译。因此,尽管贝克自 1995 年就已开始主持建立的首个翻译类英语语料库仍在继续开发中,但研究人员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足以证明,翻译研究中的语料库途径大有可为。 (谭载喜)

哈蒂姆

巴西勒·哈蒂姆(Basil Hatim)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从阿拉伯世界到英国留学,在埃克赛特大学专攻话语分析与翻译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初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继续侨居英国,长期在爱丁堡的赫里奥特-瓦特大学的苏格兰翻译研究中心从事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并加入英国国籍。哈蒂姆的主要译学论著包括 1990 年与另一英国翻译理论家梅森(Ian Mason)合著的成名作《话语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以及 1997 年与梅森合著的《译者作为交际者》(*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此外还有他于 1997 年单独发表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语篇语言学》(*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和 2001 年出版的《翻译教学与研究》(*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lation*),并发表了许多有关翻译研究的论文。哈蒂姆在所有这些著述中所传达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翻译者即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者。他的这个理念与多年来西方翻译研究领域流行的交际理念,如奈达(Nida)的翻译即交际的基本理念相比,并无多少新颖之处,他对于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从语篇语言学和话语分析这一新视角对跨语言文化交际的种种因素进行了深入考察和诠释。他是英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最早把话语分析结合到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特别是在其成名作《话语与译者》一书中,他运用语篇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和话语分析的基本方法,从各个方面对翻译中的语篇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分析的内容包括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中的诸多层面:语用层面、符号层面,构成语篇和话语的诸多特征,如语篇连贯、衔接、情景、互文等,影响语篇和话语意义的各种语域因素,如话语场景、话语基调、话语方式等因素以及翻译过程中处理文本时必须考虑的文本类型和文本结构等。(谭载喜 2004;廖七一 2001)具体要点如下:

翻译是特定语境中的交际过程。哈蒂姆认为,一切文本都可看成是在特定背景下进行的交际活动,所以,翻译活动应该被视为"在某种社会语境中进行的交际过程"。这一定义意味着:1. 翻译不是成品,而是一个交际过程;2. 翻译中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3. 传统的直译与意译、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形式翻译与内容翻译等二项对立的争论,都是没有考虑翻译活动进行的语境。

翻译与语境。把翻译看成交际活动的理论必然重视对语境的研究。因为在交际话语中,语境是让话语具有连贯性的所有因素中最活跃、最多变的因素。哈蒂姆将语境分为三个层面:交际层面(communicative dimension)(研究语言变体产生的条件),语用层面(pragmatic dimension)(研究言语行为、意图等),符号层面(semiotic dimension)(把交际实体及其语用含义放在整个符号系统中加以研究)。哈蒂姆注意到,单纯追求语域三因素(语场、语旨、语式)的等值,抑或只是追求语境变量的等值都未必能达到对原作意图意义的再现。因为在源语和目的语之中常常有着不同的规范系统,这些规范因素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系统中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所以他将语篇内因素重点放在交际、语用和符号三个层面,同时语篇外又指向文化和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用互文性作调节的杠杆。在他那里,译者所追求的不再是词、句、段落和语篇的等值,而是交际目的、言外之力、语篇修辞目的、话语态度和体裁规约等多声部的再现,同时尽力把这些因素有机联系起来,如将语域维度的语场与符号维度的体裁相对应,将语旨与话语相对应,将语式与语篇相对应(Hatim, Mason 1990:75)。

连贯与翻译。如果说语境是影响交际的中心因素,连贯则是在语境层次上决定交际能否顺利进行的基本点。哈蒂姆认为,对译者而言,"应该纳入考虑的,不是原文使用某种衔接手段,而是使用这种手段背后的目的"。他在语篇结构(text structure)指称性(reference)、主述位推进模式(thematic progression)等方面讨论了他们如何影响译者的选择。

此外,哈蒂姆和梅森合撰的《字幕翻译中的礼貌》是一篇将话语分析与翻译结合起来的有代表性的文章。他们认为字幕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转换类型:原声口语的浓缩的书面译文。他们总结出了字幕翻译中的四点制约,这些制约进一步解释了这个定义。1. 从话语到字幕的转换过程中,话语的一些特征,如非标准的口音,用于强调的语调、风格的转换,话语权的交替等不能够在字幕中表现出来。2. 由于屏幕的空间有限,译出来的字幕只能在屏幕上保留两秒至七秒的时间。如果对话的速度非常快,那就加剧了阅读的难度。3. 由于第二点的原因造成了原文本的缩减,有些信息会丢失,不断变更的字幕也不允许读者到前边去重获信息。4. 字幕所提供的语言信息要与视觉形象协调一致。这四点制约给字幕译者造成了许多困难(Hatim, Mason 2000:430~431)。口译和笔译中语篇方式没有变化,不存在口语和书面语间的转换,而字幕翻译则经历从口语到书面语(确切地说是文字),也包括屏幕中出现的有必要向译文读者解

释的文字。字幕译文是将话语译成书面语,这个过程本身就会丢失信息,再加上时间、空间等方面的制约,就更难保证原文信息完整地传递到译文中。在字幕翻译中容易丢失的是人际交往的语用规则,尤其是礼貌。即语言中用来建立、维持、改进语篇制造者与语篇接受者关系的方面(Brown, Levinson 1987)。礼貌理论主要集中在"面子"上。"面子"是每个人都介意的公共自我意象,包括积极面子、消极面子。消极面子指要求行动上的自由;积极面子指自我形象的渴望和维系。作为字幕翻译者,他/她要将银幕中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细腻的交流完全传递到广大影视观众那里,礼貌从一种语言传递到另一种语言,无论对小说译者还是字幕译者,都是一个常见的问题。由于字幕翻译的种种制约,礼貌的跨文化传递变得更加有难度。因此,将话语分析与翻译结合起来分析字幕译文的方法能够检验出原文信息是否完全传递到译文之中,为评判优秀的译文提供了依据,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翻译要有语言学的理论为指导,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都要明确,哈蒂姆和梅森在这些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们认为,翻译是一个动态的交际过程,译者站在这个动态过程中的中央,在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充当协调者的作用,译者不仅具有两门语言知识,而且还具有两种文化视野,他在两种不同文化中为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协调意义。协调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分析原文中各种符号间的相互作用,本文与前文本的互文关系,作者的连贯手段,然后将它们一起纳入语境之中(语境的交际层面、语用层面和符号层面),挖掘出原文的修辞意图,最后在译语中充分表达出来。

哈蒂姆的话语分析语言学翻译理论同奈达、卡特福德(Catford)的语言学翻译理论相比,的确是前进了一步。但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哈蒂姆的翻译理论忽视翻译研究中的美学因素,翻译过程研究不仅要涉及表层的语言学问题,还要涉及深层的美学问题。哈蒂姆的话语分析方法,如果一贯注重语言表层的分析,也容易忽视译文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如字幕译文的读者可以通过画面、声音、人物动作等对信息不充分的译文进行整合,将丢失的信息弥补过来。其次,哈蒂姆的翻译理论存在着语言学派翻译研究难以克服的缺陷。哈蒂姆的立论基础是"对等"。他非常强调译文对原文在体裁、话语和语篇方面的完全再现,甚至认为将原文连接隐晦的地方在译文中加以明朗化都会导致译文读者对原作者的偏离。哈蒂姆的翻译理论基本上由语言学理论组合而成,而且构成非常琐碎,在翻译实践操作中有一定的难度。但正如他在《话语与译者》一书中开篇所言,他和梅森的目的不是"教译者怎样进行翻译",而是回答"我们对翻译认识多少"的问题。 (*黄勤*)

豪斯

尤利亚妮·豪斯(Juliane House)生于德国柏林,1966年毕业于德国海德堡大学,主修翻译(英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和国际法,1970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硕士学位,1976年获普通和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1998年,由于她在翻译学领域和跨文化话语分析领域的出色成就,芬兰韦斯屈莱大学(the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她曾任教于海德堡大学(1966~1967),波鸿鲁尔大学(1974~1979),并从事口笔译的实践工作。自1979年以来,她在德国汉堡大学任应用语言学教授,并多次应邀到欧洲、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中东等地讲学。自2005年起,她开始担任德国科学基金会多语研究中心主任一职。她是德国翻译研究协会的创办者之一,并为现任主席。此外,她还是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如 *The Translator*, *TRANSKOM*, *Register and Context*, *SASE Journa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等,并担任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IT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等学术刊物顾问。

她在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跨文化语用学、对比话语分析、跨文化交际、商务交际及英语作为通用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等研究领域均有建树,出版了15本专著,发表了近160篇学术论文。她的专著包括《翻译质量评估模式》(*A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1977/1981),《翻译质量评估——修订模式》(*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 Model Revisited*, 1997),《跨语际和跨文化交际》(*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986),《跨文化语用学》(*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1989),《社交中的误读》(*Misunderstanding in Social Life*, 2003),《多语交际》(*Multilingual Communication*, 2004),《翻译与身份的构建》(*Transl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2006)等。此外,有三本翻译专著将分别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本杰明出版社和圣哲罗姆出版社出版:《翻译》(*Translation*)、《翻译:理论及批评概论》(*Transl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Criticism*),及《翻译行为与跨文化交际》(*Translatory Ac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翻译学领域,豪斯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构建了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早在1976年,豪斯在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里就针对翻译质量的评估,在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功能—语用模式。1977年,她的专著《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由德国的 Gunter Narr 出版社出版,引起很大反响,并于1981年再版。后来在吸纳了众多建议和意见后,豪斯对她的模式进行了修改,并于1997年出版了《翻译质量评估——修订模式》。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主要用于分析原文和译文中所使用语言的特质,比较原文和译文的文本概况及基于此基础上对原文和译文的匹配程度进行评估。此模式中,译文与原文对等的基本要求是译文功能与原文功能的对等,但这里的功能特指韩礼德(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

该模式从三个层面对原文与译文进行分析和比较:语言/文本、语域和语篇体裁。通过运用这一模式来描写原文语言和语境的特性,并对原文与译文进

行比较，可以得到两者之间对应程度的详细报告，再以这些报告来评价译文的优劣。对译文质量的评价基于对"语言使用者"和"语言运用"这两组语境因素的分析。语言使用者涉及地域、方言、社会阶层和历史年代；语言运用的因素包括媒介、参与者、社会角色及其之间的关系、社会态度和职责范畴等。

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基本上是沿用了韩礼德的语域分析理论模式，但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语域变量，如在"语场"部分增加了"社会行为"；在"语旨"部分增加了"作者的原意与立场、社会角色及其关系、社会态度"；在"语式"部分除了语言方式（口头/书面）外，还关注参与者的参与程度（简单/复杂）。根据豪斯的评估模式，人们可以对原文和译文的语篇体裁和语域进行剖析描述及比较，并从中区分出"非对称"(mismatches) 或"误译"(errors)。语境方面的误译被豪斯称为"隐型错误性误译"(covertly erroneous errors)，而指称方面的非对称或目标系统方面的误译则被称为"显型错误性误译"(overtly erroneous errors)。最后，在此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对译文进行"质量陈述"，并将译文归类为显型翻译（overt translation)或隐型翻译(covert translation)。

在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中，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即显型翻译、隐型翻译和文化过滤(cultural filter)。显型翻译指在语境重构过程中由于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而得到的结果之一（另一结果即为隐型翻译）。显型翻译必须表面上看起来就是翻译，而不是用目的语写出的"再版原文"(second original)。在显型翻译中，原文与源语的文化环境密切相连。需要进行显型翻译的原文通常在源语文化里已具有被读者认可的价值：它们或者适用于某一特定场合，具有特定的读者，或者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如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演说及布道等。将原文译为显性译文是一种相对直接的语言再编码，翻译中通常不需要进行精密的文化重构。在显型翻译中，译者的工作不仅重要，而且是可见的。因为译者的任务就是使目标文化读者能够通过译文了解原文对原文读者的文化冲击力。译者将目标文化读者置于观察者的位置，从"外部"观察及/或判断这一原文文本。

隐型翻译可被看做是试图隐藏译文中的翻译痕迹，从而使译文在功能上与原文对等。根据豪斯的模式，隐型翻译的方法适用于在源语文化中没有独立地位的原文，或者说原文与源语文化在语言、习俗、历史或其他方面不存在特定的关联。豪斯认为，当原文缺少特定文化特质的情况下，原文所要达到的目的可以在译文中再现。豪斯认为科学文本、旅游手册、新闻等文本类型适用于隐型翻译。在隐型翻译中，译文与原文必须具有对等的功能。为实现其功能，译者必须将两种语言环境中不同的文化因素考虑进来，进行"文化过滤"，制作出与原文功能对等的译文(House 1997：69)。译者此时的专职就是要"背叛"原文，让原文隐藏于它的变形文本之后。译者本人即使不是完全消失，也要更加隐身于文内。

文化过滤指捉捕 (capture)源语和目的语在读者期待视野和话语规约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的一种手段(House 2006：99)。豪斯认为应在隐型翻译中使用文化过滤，即"译者要试图以译语读者的视角来看待原文"(House 1997：70)，从而使译文获得与原文对等的功能。但"文化过滤"曾经引起较大的争议，因为人们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存在较大的主观性。而对翻译质量评估者来说，如果对原文和译文的社会文化差异缺乏客观的认识，会很难评估由于运用文化过滤所带来的变动是否合理。后来豪斯本人也意识到，如果能对两种语言文化环境中不同社会文化所决定的不同的交际倾向进行实证研究，将更能充实文化过滤这一概念，也更能解释在隐型翻译中使用文化过滤的合理性。她在自己的相关研究中明确提出，"合理使用文化过滤的手段不能单单依靠译者主观的、突发的直觉，而是要尽可能地与相关的实证研究相一致。"(House 2006：100)豪斯后来收集了大量语料，对德语和英语进行了话语对比研究，得出德语和英语在五个维度上的文化差异。这五个维度的文化差异使文化过滤这一概念从抽象变为具体，主观趋向客观。

虽然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参数设置不够合理，运行步骤有待优化等，但她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等理论建构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拥有比较完整的参数体系，步骤上遵循一定的程序，并适度引入定量的方法，是国际翻译批评界第一个具有完整的理论和实证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司显柱 2004)，也"可能是首个将韩礼德的话语分析模式与翻译质量评估相结合的学者"(Munday 2001：93)。且就模式的理论性来说，"尽管豪斯的评估模式是否可用于英汉翻译的评估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然而就模式本身而言，可以说这是目前我们见过的最有理论基础的评价模式"（张美芳，钱宏 2007)。（钱宏）

鲁宾逊

道格拉斯·鲁宾逊(Douglas Robinson)是当今西方非常活跃的一位翻译学者，既有丰富的翻译实践，又有卓越的翻译理论建树。他的翻译理论是当今最典型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主要包括七个方面。一、解构了传统翻译理论及一些当代翻译理论中的理性思维和结构主义观念。他在第一部翻译理论专著《译者的转向》(*The Translator's Turn*)中指出，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二元论、工具论和至善论这三种结构主义思想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于西方翻译理论之中。二元论在哲学中表现为人的身体和心灵二分，在语言学中则表现为意义和字词二分。西方主流翻译理论的基础正是这种二元论的哲学和语言学，暗含了强烈的道德立场，因而对译者构成限制；工具论在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中一直很明显，反映在翻译理论中，便是强调译者是原作者及原文的工具，不能越雷池半步，不能有任何的创造性，必须隐形；至善论源于宗教理论，在《圣经》翻译中表现得也最为明显，即要求译者受圣灵的启发，应该可以超越原文本而直达上帝真

意,从而使译文代替原文。在一般文本的翻译中,则要求译文和原文完全等值。这三种思想严重束缚了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必须加以克服。克服的办法在于充分调动译者的积极性,提倡翻译的对话性,实行新的翻译方法和翻译伦理。在后来的《翻译与禁忌》(*Translation and Taboo*)一书中,他还进一步分析了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特别是理性主义翻译思想的起源,指出理性思想统治地位的建立,依靠的并不是理性的力量,而是理性主义本应排斥的禁忌的力量。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理性主义的统治地位,肯定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合法性。二、打破刻板的翻译分类,提倡翻译的多元化。传统翻译理论中,翻译方法无非是直译与意译,翻译伦理则不超过背叛与忠实,分类极其有限而且刻板,原因在于理性主义或结构主义思维的束缚。鲁宾逊大胆提出了多种在传统理论看来或许是匪夷所思的翻译方法和伦理。在《译者的转向》一书中,他提出,译者无须死守刻板的逻辑思维,可以大胆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其中至少有六种可以经常采用,用修辞术语来说分别是转喻法、提喻法、隐喻法、讽喻法、夸张法和双重转喻法。除隐喻法以外,其余五种都是传统翻译理论所排斥的改动原文的译法。翻译伦理则可以借用霍兰德(Hollander)所说的 version 一词,分为八种,每一种名称中都包含 vert 这一词根,分别是内向(introversion)和外向(extroversion)、转化(conversion)与广告(advertising)、回复(reversion)、颠覆(subversion)、歪曲(perversion)、移位(aversion)、多样化(diversion)和对话(conversation),这些显然不是忠实或背叛可以概括的。三、重视译者的主体性。但鲁宾逊所说的并非结构主义传统中具有完全主动权的理性主体,而是受多种因素支配、经常依赖自身感受和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翻译行为者。他在《译者的转向》一书中提出了"翻译身体学"(somatics of translation)的概念。他认为语言的意义并非全然理性,而是理性与情感的结合体,因为语言意义的确定首先取决于语言使用者的身体感知,但这种感知又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语言的身体学在翻译实践中就表现为翻译的身体学,即译者主要依赖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的自身感受进行翻译,而不是某种外在的理性标准。这样的译者与结构主义理论中掌控一切的理性译者有明显区别,但也不同于传统理论中完全充当传声筒的译者,包括西方宗教翻译中宣扬的"神灵感召"式翻译中的译者。在《谁翻译》(*Who Translates?*)一书中,鲁宾逊对有关"神灵感召"式翻译的论述及这种论述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译者的主体性有多个层面,受多种因素制约,处于混乱(pandemonium)之中,而且其制约因素本身也处于混乱之中,译者主体性其实是一种分散的主体性。四、重视语言的动态性,反对结构主义的静态语言观。这与译者的主体性是密切相关的,在"翻译身体学"中已有所体现。译者通过身体感知而确立的语言意义,与结构主义理论所说的静态的意义无疑有着天壤之别,本质就是动态的。在《行为语言学》(*Performative Linguistics*)一书中,鲁宾逊进一步发展了语言动态性的观念,模仿格赖斯(Grice)的陈述性语言和行为性语言的提法,提出了行为语言学(performative linguistics)理论,以区别于传统的陈述语言学(constantive linguistics)。和陈述语言学家不同,行为语言学家对"现实世界中实际的语言使用感兴趣,对实际的说话人和写作者与实际的阐释者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对人们如何开展语言行为及如何对别人的语言行为作出反应感兴趣",最典型的行为语言学家是德里达(Derrida)和巴赫金(Бахтин),而德里达的很多理论,特别是"可重复性"理论,也可以作为行为语言学的理论支撑。最能体现语言行为特性的语言使用则是翻译,因为翻译身体学典型地显现了语言的这一特性。这样,看似属于语言学理论的"行为语言学",其实也是一种翻译理论,是一种从语言学角度提出的翻译理论,其要害在于消解了理性主义语言观的权威。五、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翻译教学理论。关于翻译教学。鲁宾逊写过一本题为《翻译速成教程》(*Becoming A Translator: An Accelerated Course*)的书和一些文章。在书和文章中,他结合当前职业译者的工作特点和翻译市场的新要求,主要参照翻译身体学的理论,对如何提高译者的翻译能力,特别是在翻译市场上生存所必需的快速翻译的能力进行了研究,提出应注重译者自身的身体感知,使译者建立无意识的翻译习惯,反对过分强调理性分析在翻译中的作用。六、注意发掘后殖民翻译理论中的解构主义思想。在《翻译与帝国》(*Translation and Empire*)一书中,鲁宾逊对后殖民翻译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在《译者的转向》等其他书中,他也多处提到这一理论。他敏锐地看出传统的二元论无法解释许多后殖民翻译现象。对于后殖民翻译理论,他特别推崇"杂合性"(hybridity),反对同一性。七、写作和论述风格具有明显的解构主义特点。鲁宾逊的文风与德里达等解构主义哲学大师极为相似,行文比较晦涩,一些段落和概念非常艰涩难懂,有意避免语义的透明,贯彻了解构主义的语言观,最明显的体现是对一词多义的使用,比如《译者的转向》一书的题目就至少有三重含义,translation 往往也不仅仅表示"翻译"的意思,还表示"转变"和"转换"的意思。更有甚者,他有时还有意曲解现有词汇,以形成语言游戏,如八种以 vert 为词根的翻译伦理,语义上与表示"翻译"的 version 一词就没有多大的联系。阐述具体观点时,则少有层层推进、逻辑严密的推理和论证,而是经常引用一些个人经历。他把这种论证方法称作轶事型思维(anecdotal thinking),与系统性思维相对应,也有其合法性。此外,鲁宾逊还写过一本题为《什么是翻译》(*What Is Translation? Centrifugal Theories, Critical Interventions*)的书,对西方近 20 年来的九部翻译理论专著和一篇论文及机器翻译问题作了点评。点评同样体现了解构主义的思想。他还编过一本题为《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的书,收录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直到近代几乎所有重要的翻译理论,体现了宽阔的学术视野。 (韩子满)

韦努蒂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费城坦普尔大学的英文教授,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美国翻译理论界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是美国翻译研究领域在"归化"与"异化"问题上发言最多也最响亮的理论人物。他的主要译学著作有1995年出版的成名作《译者的隐身:翻译史论》(*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1998年的《翻译的丑行:差异伦理标准探索》(*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以及1992年、2000年先后编辑的译学文集和读本《翻译再思:话语·主观性·意识形态》(*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翻译研究选读》(*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另有一部译学教材于2004年出版,名为《翻译研究与实践教程》(*Translation: A Textbook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此外,韦努蒂还翻译出版了近10位意大利著名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他译笔特异,风格考究,文字中渗透着他在翻译中有意阻抗(resist)目标文化——英美文化规范的异化主张。他是当今既精于翻译理论研究又擅长文学翻译实践的学者之一。

韦努蒂属于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亦即根茨勒(Gentzler)所说的"后结构主义学派"(Gentzler 2002: 200)。正如郭建中所评述,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在于"存异",而不是"求同"(郭建中 2000: 188)。韦努蒂在其译学著作中,主张文学翻译不应以消除异族特征为目标,而应在目的文本中设法把文化差异表现出来。他所阐述的,也正是这么一种解构主义的思想。具体而言,韦努蒂的主要观点是:在翻译中要求译者隐身是错误的;译者在译文中不能隐身,而应当有形可见。这就是说,翻译应当采用"异化"原则和策略,使译文保持异域风貌、异国情调,读起来像译文,而不是"归化"原则和策略,使译文完全按照目的文化的意识形态和创作规范进行改造,读起来不像异族作品,而就是目的语原创。韦努蒂对西方17世纪以来的翻译进行考察,发现西方翻译史上一直都是归化翻译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英国。究其原因,就是深藏在背后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在作怪。韦努蒂对这种以我族文化为中心的归化翻译提出质疑和批评,认为把异族的东西归化为我族的东西,这是一种"文化侵略"。异化翻译则相反,它能抑制民族中心主义对源文本的篡改,特别是在当今处于强势地位的英美语言文化环境里,异化翻译"可以成为抵御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文化上的自我欣赏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以维护民主的地缘政治的关系"(郭建中 2000: 192)。

显然,在韦努蒂看来,"归化"与"异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问题,而是必须把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范围里来考察。然而,究竟应不应该放在这样的范围里来考察,或在何种程度上作出这样的考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我们在翻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异口同声地赞许韦努蒂,认为他的"翻译异化论"代表了一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和阻抗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转换一个角度来印证这一理论的有效性?例如,把强势的英美语言与文化当作源语、源文化,而不是目的语、目的文化?如把英美作品译入某种发展中的非洲语言,而不是把非洲作品译入英语?如果在这个转换了方向的语境中,我们按"异化"原则移植了英美源文本的异族特征,所产生的结果会不会同样被看做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假如因为强势的英语变成了源语、弱势的非洲语变成了目的语,而把原本提倡的"异化"主张修正为"归化"主张,以彰显对"阻抗"殖民文化入侵的考虑,那么,这会不会意味着韦努蒂所说的"异化"只适用于把英语作为目的语的翻译?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韦努蒂似乎没有给予必要的解释。虽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也因此而给了我们更多的研究空间,并引发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

翻译从来不是以一种不受影响的方式进行的。异化翻译也好,归化翻译也罢,其实都是翻译活动受到影响后的产物。两者的差别在于,异化翻译者多受异族语言文化影响,并因此而在目的语中突显异域文本的异域性;归化翻译者则多受我族语言文化影响,并因此而在目的语中全力去除异域文本的异域性。从翻译伦理上来看,很难断言哪个好或哪个不好,因为翻译现实表明,两者在目的语言文化中"起着各自不能互相代替的作用,完成各自的使命,因此,两种翻译将永远并存,并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郭建中 2000: 199)。

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翻译理论的多样性。然而,正如韦努蒂后来所评论,有着共同的兴趣并不能保证在一个领域可以接受的理论或方法,能够满足另一个领域在概念上的要求。在西方,从古代到19世纪晚期,对翻译的理论阐述可以归结为对语言和文化的思考,包括文学理论和批评、修辞、语法、语文学等。20世纪的翻译理论研究方法和领域更加多样而广泛,体现了现代文化的多极化趋向:语言学、文学批评、哲学思辨、文化理论、实验研究、人类学实地研究,以及翻译培训、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等,莫不如此(Venuti 2000: 4)。而现代文化,包括翻译研究文化的出路是,加强学科之间、研究领域之间以及各个思想派别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谭载喜 2004: 244～246)。

芒迪(Munday)和赫曼斯(Hermans)都对韦努蒂提出过批评。另外,皮姆(Pym)对韦努蒂所说的数字表示了异议,他注意到,尽管英国和美国出版的翻译书籍所占比例看上去很低,但这一比例所代表的书籍的数量却很大,而且随着出版物总数增加,翻译书籍的数量也增加了。

尽管皮姆对韦努蒂的态度不无嘲讽,他还是提出了许多大有关联的问题,包括:1. 如果译者拒绝流畅地进行翻译,译文真的会改变吗?皮姆(Pym 1996: 174)注意到,韦努蒂的"行动号召"(call for action),对译者不断显形的要求,他本人身兼译者和理论家,正好体现了这些现象。虽然皮姆怀疑其他译者采取这种立场是否也会成功,但确实有这样的译者,比如佩韦尔(Pevear)和沃洛洪斯基(Волокхонский)翻译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新的英语译本,采用了非流畅翻译的策略就获得好评。2. 尽管韦努蒂主要讨论的是翻译成英语的译文,在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译文中,倾向于"流畅"(或"归化")的翻译策略也存在。皮姆列举了巴西、西班牙和法国为例(Pym 1996: 170)。这似乎表明,目前翻译通常都是归化的,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相对权力无关。3. 皮姆还质疑韦努蒂的"抵抗"策略是否可验证,他把这种策略归因于图里(Toury)的容忍干扰法则,而"流畅"("不容忍干扰")则经常出现在译文中;因此他(Pym 1996: 171)指出,这种现象发生在英美的翻译中,不足为奇。(芒迪 2007: 196～197)

在芒迪(2007: 197～198)看来,韦努蒂并没有为译文分析提供一套具体的方法,他所作的数量繁多的实例分析包含了一系列方法,包括讨论译者前言以及分析原文—译文对照选段,以评估特定语境和文化中主导的翻译策略。贺显斌也指出了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局限性,他认为: 韦努蒂讨论译者隐形史时忽略了非西方语言的英译;把翻译策略与翻译效果混为一谈;异化译论局限于强势文化,缺乏普遍性(贺显斌 2007)。韦努蒂对翻译贸易的解释也不够确切;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还对语言学译论有过误解。(邵璐)

西蒙

谢里·西蒙(Sherry Simon)是加拿大肯考迪娅大学法语系教授,加拿大很有影响的翻译家,也是著名的后殖民翻译理论批评家,代表著作包括《语言交流》(*Le trafic des langues*, 1994)、《翻译中的性别问题——文化等同与传递政治》(*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1996)、《文化融合》(*Hybridité culturelle*, 1999)、《翻译蒙特利尔: 在分裂的城市中生活》(*Translating Montreal: Episodes in the Life of a Divided City*, 2006),另外还编辑了《文化转型: 魁北克文学翻译》(*Culture in Transit: Translating the Literature of Quebec*, 1995),与保罗·圣皮埃尔(Paul St-Pierre)合编了《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2000)等。

在西蒙看来,无论是被肯定还是遭谴责,翻译的女性气质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历史比喻。"女人"和"译者"同被归入话语的低等地位。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接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的女性。描述翻译的语言常援引主宰与低贱、忠实与不忠的形象,随意使用性别歧视的词汇。其中最顽固持久的一种表述,即"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èles)一语,长久以来怂恿人们对一种富于文采然而有违"原意"的翻译采取怀疑的态度。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逐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一团概念。为此,它必须探讨翻译被"女性化"(feminized)的过程,并且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西蒙从不同层面来看待翻译维持并促进性别建构(gender constructs)的过程问题。首先是概念层: 翻译理论的场所(sites)是怎样暗暗地被性别化了的?这种理论如何才能得以改造? 她集中讨论不同的理论家是如何打乱描述翻译的那些陈腐语言,而替之以能够传达身份在翻译实践中起积极作用的语汇。这是基于他们对语言的述行性(performative)而不仅仅是再现性(representational)之本质的理解。这样,女性主义的翻译便把贯串于翻译史的一个徒劳无益的老问题——"忠实性"(fidelity)重新给予了表述。女性主义翻译认为,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不但见于描述翻译的比喻,而且贯串于实际的翻译实践,表现在女性借以理解和从事她们的写作活动的特定社会和历史的形式中。社会角色与写作者角色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怎样表述的呢? 一方面,特别是从欧洲中世纪开始,翻译是妇女进入文学世界的途径。由于长久被排斥在著述的特权之外,妇女便转而把翻译作为一种被允许的公开表达的形式。直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翻译一直是妇女学习写作的一种训练。此外,翻译是妇女参与其间的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比如反对奴隶制的运动。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与这次运动密切相关。妇女从事翻译是为了建立一系列交流网络,服务于进步的政治议题,以及文学传统的创造更新。在西蒙看来,性别决不是从自我的深处浮现出来的原初身份,而是多方阐说的一种话语建构,性别话语的历史多样性必须得到强调。在《翻译中的性别问题》一书中,西蒙的立场很清楚: 翻译中的性别议题与男人和女人都相关。男人可以采纳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准则;女人则可以成功地翻译男人的文本。(许宝强,袁伟 2001: 309～311,316,353)

西蒙和圣皮埃尔合编的《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用翻译研究的最新理论挑战广为接受的后殖民理论,综合运用语言学、文学、文化理论,探讨了在马来西亚、爱尔兰、印度、南美等地后殖民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最新概况,调查了文化交流、融合、断裂的复杂现象,是当代西方相关研究领域一部颇具影响的论文集。论文集共收文 15 篇。如标题所示,全书的核心词为"后殖民时代的翻译",核心思想是: 后殖民时代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最大特点,在于向殖民时代的传统术语和概念提出挑战和质疑,并提出革新的方法。文集按主题思想分为两大部分,然后以作者来分章,一章一文。第一部分题为《(后)殖民主义和翻译的力量》,所收文章聚焦于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的意义;第二部分题为《谈判的情景》,所录各文侧重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实践进行个案研究。各篇论文的文字风格迥异,研究方法互异,着眼点也各有侧重,但它们都以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理论为主题。作为整体,文集的主要目的在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 翻译在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2. 翻译的作用是只把奇异而具压制性的东西带给异

族文化,抑或它会作为交流过程的组成部分,引发一连串的积极反应和互动?文集内容广泛,考虑了地理和语言因素,将翻译作为一面多棱镜,透过它来界定和评价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涵义。印度是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研究的宝地,而在爱尔兰、中国、加拿大、美国、拉美等地,从文化历史角度切入同样也有助于对文化交流中重要术语的反思和重塑。因此可以说,对不公平的权力关系和文学交流中边缘之声的关注成了本文集的主线。翻译中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在印度、加拿大、爱尔兰、巴西等国的后殖民语境中产生,后来又受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维系。译者就像文化和经济的调解人,地位常常被边缘化。回顾历史,译者常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处于权力边缘。如果译者地处殖民或新殖民社会,就还得面对语言交流中的矛盾冲突。译者必须小心谨慎,清楚地知道全球文化交流并非自由循环,而是受贸易路线等因素支配。换言之,译作的接受程度跟译者的天资不能成正比,而是受制于通行规则(Frow 1996)。后殖民主义强调,在商业上或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译作的生成与流通依贸易规则和所有者而定(邵璐 2006)。

该文集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出"文化交往、入侵、融合和分裂这些复杂过程的结构特征"。通过对具体翻译场景的研究和分析,能更充分地了解后殖民时期文化交流的状况。在西蒙和圣皮埃尔看来,翻译研究之网已布满全球,各国学者纷纷展开新的对话。多视角、跨学科的研究已呈普遍趋势。由此,无论是对翻译的特定语境的细致考察,还是对产生当今文化动态的历史环境的全面理解,都成了必然之需。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理论本身也是受到制约的,而非自行其是。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只能超脱地域、时间、空间的限制而进行研究,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语篇都在语境中产生,我们对它们的运用也受历史因素影响。跨民族文化的研究似乎总以英语进行,而世界上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这一点却常被忽略。因此,把翻译放在全球语境下进行研究,对于解决文化交流中的语言问题有所裨益。

西蒙和圣皮埃尔重新梳理了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在地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基础上,对文化产品在传输过程中的路线和权力关系进行了规划和描述。同时,作者们从翻译理论和实践入手,重新定义和精炼了现今通行的后殖民主义概念,通过后殖民和翻译理论重新思考文化关系,对后殖民主义及后殖民主义与翻译的关系进行反省。文集运用批评的眼光,对传统理论中的种种术语和概念进行了深层考察,从而为"后殖民时代"的翻译和翻译研究提供了极具启发意义的新的范式和方法(邵璐 2006)。 (邵璐)

附录一　中国翻译要事年表

本年表自周朝至1977年由刘金龙参考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马祖毅主编的《中国翻译通史》等选编，1978年至2008年由张顺梅参考《中国翻译年鉴(2005～2006)》、《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等有关书刊的材料选编。

周朝(前11世纪中期～前256年)　武王伐纣，取商而代之。在其势力范围内和势力范围外，还有许多部族国家，这些国家与周并非同姓，亦非同族，语言有殊，若来朝贡，势必有双语人或多语人为终结，方能交流思想。《册府元龟·外臣部》有外族或外国前来朝贡的记载："周武王克商，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以诫王。自是道通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后芒即位三年，九夷来御。宣王时，追貊之国来贡。"

秦朝(前221年～前206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改周代之行人为典客，又另设典属国。典客处理有关归顺的蛮夷之国的事务，典属国则处理直接统辖的投降的蛮夷之事务，由于言语不通，当然需要译员，只是没有明文记载而已。

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至**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　与匈奴交往频繁，多有重大外交事件发生，如与匈奴和亲，匈奴来献、来朝、来降等，其中，译员当起重要的桥梁作用。

平帝元始元年(1年)　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年～75年)　犍为郡椽田恭译白狼王唐菆所作《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三首。

东汉永平十年(67年)　月氏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四十二章经》，为我国第一部汉译佛典。但此说至今无从考证。

东汉建和二年(148年)　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开始译经。20余年中先后译经35部，41卷。其中《五十校计经》为可考之最早汉译佛经。此后，中国开始大量佛经翻译。

东吴黄武元年(223年)　支谦开始译经，到东吴建兴中约30年(223年～252年)，先后译出佛经49部(此据《高僧传》，另《保录》称37部。)

东吴黄武三年(224年)　三国时期东吴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批评竺将炎的译文"近于质直"，遂在佛教翻译界引起文、质两派的争论。中国翻译史上"信达雅"的翻译标准首次提出。支谦首创"会译"法和译文加注。维祇难带来胡本《昙钵偈经》至武昌，与竺将炎共译。

东吴永安三年(260年)　曹魏颍川人朱士行"誓志捐身"，西行去求梵本。从长安出发，西渡流沙，在那里"写得正品梵书胡本"《放光般若》九十章，二万余颂，计六十余万字。

西晋秦始二年(266年)　竺法护开始译经，至西晋永嘉二年(308年)先后译出经论195部，309卷。这些译籍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打开了广阔的局面。

西晋元康元年(291年)　竺叔兰、无叉罗、祝太玄、周玄明等在陈留内仓垣水南寺译《放光般若经》。译本风行京华。

东晋咸安三年(373年)　月支僧人支施仑在凉州城内正听堂后湛露轩译出《须赖经》等四部。

东晋太元四年(379年)　前秦苻坚攻破襄阳，道安随苻坚迁到长安，以后主持译场工作。

东晋太原六年(381年)　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翻译理论，对以后的佛经翻译影响颇大。

东晋太元八年(383年)　苻坚开始有组织地翻译佛经，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　法显邀集另外四名僧人，从长安出发去西天取经。时年58岁。

东晋隆安五年(401年)　后秦王姚兴攻下凉州，于当年末将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迎到长安，准备请他译经。鸠摩罗什从402年到409年共翻译佛经98部，425卷。

后秦弘治五年(403年)　姚兴创建译场。此类译场后人加以发展、完善。

后秦弘治九年(407年)　天竺佛驮跋陀罗至青州东莱郡(今山东掖县)，译经12部，113卷。其译籍为大乘瑜伽学说东流开了先河。译文颇受罗什译风影响。

后秦弘治十年(408年)　佛驮耶舍在长安译出《四分律》60卷。

东晋义熙八年(412年)　佛驮耶舍南渡参加慧远的白莲社，在庐山译《四分僧戒律》。是年秋，法显回国，即着手译经。后与佛驮跋陀罗及宝云等合译经律论5部，49卷。河西王沮渠蒙逊占领敦煌，迎昙无谶至姑臧翻译《大涅槃经》。这部经的译出，对中国佛论的"佛性论"产生重大影响，大致解决了关于一阐提能否成佛的长期争论。

刘宋景平元年(423年)　法显可能于是年去世，时岁82。共译6部佛经，计63卷。

刘宋元嘉四年(427年)　求那跋摩于是年正月来宋京,九个月后圆寂。在此期间共译《优婆塞二十四戒》26卷。

北凉永和五年(437年)　浮陀跋摩在凉州城内闲豫宫开始译《毗婆沙论》,至公元439年完成,计100卷。

南朝梁天监七年(508年)　天竺菩提流支至洛阳,译经39部,127卷。流支译经偏重于大乘瑜伽学说。

北朝东魏定四年(546年)　印度真谛抵广州,后辗转各地,译经38部,118卷。对南朝佛经翻译贡献颇大。

南朝陈太建元年(569年)　真谛在广州病逝。23年所译经论记传64部,总278卷。现存26部,87卷。

隋开皇三年(583年)　彦琮奉诏译经。他在《辩正论》中评论了历代译人之得失,提出"八备",即做好佛经翻译工作的八项条件,对后世佛经翻译影响颇大,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者本身的问题。先后译经23部,合100余卷。

隋仁寿二年(602年)　彦琮将汉文《舍利瑞图经》和《国家祥瑞经》两部经文译为梵文,作为隋文帝礼品赠给印度王舍城佛教界,成为中国翻译史译汉为梵的第一人。

隋大业二年(606年)　隋朝炀帝在洛阳上林苑设国立译场,命彦琮掌管译事,担任译主。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担任译主的中国僧人,从而结束了外国僧人主译的局面,并由中外僧人合译向中国僧人主译转化。

唐贞观三年(629年)　中天竺人波颇奉诏于大兴善寺设立译场,翻译佛经。此为唐朝组织译场之始。

玄奘离开长安前往印度求学,历尽艰辛,四年后到达北天竺那烂陀寺。

唐贞观十年(636年)　现存最早的《圣经》汉译片段《序听迷诗所经》译成,译者不详。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　正月玄奘从印度返回长安,带回佛经657部,合520夹,并于是年开始译经。

唐贞观二十年(646年)　玄奘口述,辩机笔录,撰成《大唐西域记》,全书共12卷,全面记录了他十多年旅游生活经历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　长安大慈恩寺翻经院建成,为翻译佛经的译场。

唐麟德元年(664年)　玄奘圆寂,他译经19年,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约1300多万字。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并制定"五不翻"原则。

唐武则天长寿三年(693年)　印度菩提流志到洛阳,译经43种,101卷。其中《大宝积经》的译出,完成了玄奘的未竟之业。

唐证圣元年(695年)　齐州(今山东历城)人义净从印度回抵洛阳,"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住佛授记寺助实叉难陀译《华严经》。

唐久视元年(700年)　义净开始着手组织译场,自主译事。自此年至唐景云二年(711年)共译出佛教经典56部,230卷。

唐神龙二年(706年)　菩提流志开始译《友宝积经》。

唐开元五年(717年)　善无畏奉诏译经10余卷,其中最重要的是《大日经》,为密宗的主要经典。

唐开元六年(718年)　太史监瞿昙悉达奉唐玄宗之诏译《九执历》。

唐开元八年(720年)　不空随密宗大师金刚智到洛阳,在金刚智译场译经,尽传其学。

唐开元十八年(730年)　智升编成《开元释教录》(20卷),这是汉至唐译经目录总集,其中还附有译人传记。译经目录分七类,总计1 076部,5 048卷,对后世影响甚大。

唐天宝元年(742年)　不空奉师遗命到达狮子国(斯里兰卡)修习密法。并广事搜求密藏和各种经论。

唐天宝五年(746年)　不空从海路出发到狮子国,遍游五天竺,746年携密教《金刚顶瑜伽经》等80部,大小乘经论20部,共1 200卷回长安,并奉敕在净业寺从事翻译。计译经110部,143卷。

唐大历十四年(779年)　西藏第一个译场在桑耶寺中的印度佛殿建立。

唐建中二年(781年)　波斯景净在长安译景教经文30余卷,其中《景教三威蒙度赞》最为著名。

唐贞元四年(788年)　藏族第一部藏文佛经译典目录《丹噶目录》编成。

唐贞元十四年(798年)　罽宾三藏般若与隆观等译成乌茶国所赠的《华严后分》梵本,即新译《华严经》40卷。

唐元和六年(811年)　唐代的佛经译场终止。顷,罽宾般若评出《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唐译经基本中断。直至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才得以复兴。

唐元和九年(814年)　吐蕃赞普赤德松赞颁布有关佛经翻译总则及具体问题处理原则的法令。《翻译名义集》(藏文版)编成。

唐会昌元年(841年)　藏王朗达玛灭佛法,禁翻译,废寺院。

唐会昌二年(842年)　唐武宗毁佛,佛经翻译进一步消沉。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　宋太宗在东京(今河南开封)太平兴国寺建立译经院,重兴译经事业。至1027年,共译佛经500余部。主译者有法天、天息灾、施护等。

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　赞宁总结前人译经经验,提出"六例",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宋天圣五年(1027年)　印度以天文历算为主要内容的《时轮经》传入西藏,并开始被译成藏文,后定此年为藏历纪年的首年。

辽重熙十五年(1046年)　萧韩嘉奴开始翻译《五代史评解》为契丹文。

南宋绍兴十年(1140 年) 法云撰《翻译名义集》,20 卷,此为梵汉佛学字典。

金大定五年(1165 年) 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译《贞观政要》与《白氏策林》。

金大定六年(1166 年) 徒单子温又进译《史记》和《汉书》。

金大定十五年(1175 年) 金世宗诏译诸经,由著作郎温迪罕缔达、编修官宗壁、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杨克宗负责译解。

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 年) 金朝译经所呈以女真文翻译之汉籍,有《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列子》及《新唐书》等九种。

南宋景炎二年(1277 年) 藏族译师雄顿·多杰坚参将印度古典文艺理论及修辞学名著《诗镜》译成藏文。

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 藏汉对勘的佛教大藏经目录《志元录》编成。

元至元三十年(1293 年) 天主教士孟德高维诺来华,将《旧约》中的诗篇和《新约》译成蒙文。

元大德十一年(1307 年) 中书[左]丞索罗铁木儿以所译蒙古文《孝经》进呈武宗。

明洪武元年(1368 年) 明太祖朱元璋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并设回回司天监。

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 朱元璋诏翰林李翀、吴伯宗、回回太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译回回历、经纬度、天文等书。同年,朱元璋命翰林侍讲火原洁等编纂《华夷译语》。此书实际上是以汉语音译蒙古语的词典,按天文、地理、人事等许多类目逐条排列。

洪武十六年(1383 年) 回回历书译成。吴伯宗、马沙亦黑等都为此历书写序。

永乐五年(1407 年) 明廷设四夷馆,隶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是为我国最早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初设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正统元年(1441),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1579)又增暹罗馆。

万历十年(1582 年)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来华。初居澳门,翌年迁肇庆。

万历十二年(1584 年) 利玛窦与肇庆知府王泮首次译印《万国舆图》。利据王之建议,将中国移至地图中央。这是首次在中国印制中文世界地图,使国人首次了解世界、大洲、大洋等知识。

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 利玛窦把自己读过的西方哲人关于友谊的名言,用中文写成格言百则,请王肯堂润色后在南昌出版。

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 明代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首次在南京会晤利玛窦。

利玛窦在南京刻印《坤舆万国全图》新版(标注中文)。

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 翻译家李之藻(1566~1631)首晤利玛窦。

万历三十年(1602 年) 利玛窦在北京修订第三版《万国舆图》并刻印。翌年又印制八幅。四年后,此图传入日本。

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 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前 6 卷。李之藻、杨廷筠(1557~1628)等曾参与讨论。原书系利玛窦之师克拉维茨(Clavius, 1537~1612,亦称丁先生)之 15 卷本。

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 春,《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徐光启创译之"几何"一词,一直沿用至今。同年,李之藻与利玛窦译成《浑盖通宪图说》,郑怀魁为之刻印。在此书序言中,李之藻传播了地球形圆并处于运动状态的思想。这是第一本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中文书籍。

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 徐光启与利玛窦译成《测量法义》,西方测量学首次传入中国。同年,李之藻与利玛窦译述《圆容较义》,首次介绍西方关于圆内接多边形的知识。

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 钦天监官员周子愚上疏,称远臣庞迪我(1571~1618,西班牙传教士)与熊三拔(1575~1620,意大利传教士)携有西方历书,乞敕知历人员翻译,并修改中国历法。

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 夏,徐光启、庞迪我与熊三拔修订《几何原本》。同年,徐与熊再次修订《几何原本》。

万历四十年(1612 年) 礼部疏奏,请敕官员修历并与庞廸我、熊三拔二人共译西方天文历书。是年春,徐光启与熊三拔译述《泰西水法》6 卷,并在北京刻印。这是第一本关于西方水利与水力机械的书籍,书中还介绍了西方药露的蒸馏方法。徐光启曾据之试制某些机械。

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 李之藻与利玛窦译述的《同文算指前编》2 卷、《通编》8 卷与《别编》1 卷刻印,首次介绍西方加、减、乘、除及开方的笔算法。

同年,李之藻上疏《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不仅详述 14 项中方学者前所未述之西方天文历算知识,并介绍了其他 10 个领域的西方科技知识,请敕设局译述有关这些知识的书籍。

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 钦天监监副周子愚、卓尔康及熊三拔译述《表度说》,并在北京刻印。这是一本关于通过观测日影求知时间与季节的书籍。在序言中,周子愚表达了渴求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的愿望。

同年,李之藻为《圆容较义》作序,并在北京刻印。

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 阳玛诺(1574~1659,葡萄牙传教士)译编《天问略》,周希令、孔贞时与王应熊参与校订。孔贞时为本书撰写序言。此书介绍了伽利略六年前刚发明的望远镜。

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 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测量法义》在北京刻印。徐光启撰写了《题测量法义》。本书证明了《几何原本》的应用。

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 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再次来华时,携带西书 7 000 册,其中有不少科学书籍。李之藻等纷纷呼吁翻译此批西书。

天启元年(1621 年) 辽阳满洲兵战事急,徐光启上《台铳事宜疏》,并建议寻访传教士阳玛诺与毕方

济(1582～1649),因他们携有关制造西方枪炮的书籍《图说》。

天启三年(1623年) 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撰译书籍《西学凡》,并在杭州刻印。该书首次介绍西方大学的课程,即文学、科学、医学、法律、宗教与哲学。杨廷筠在序言中希望,集同志多人一起译述金尼阁所带入的7 000册西书。

是年夏,杨廷筠与艾儒略译述《职方外纪》六卷,并在杭州刻印。艾儒略与李之藻为译书撰序,杨廷筠也有序言。译书以庞迪我与熊三拔为万历皇帝讲述世界地理的译稿为基础,增订而成。该书首次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的自然条件、风俗习惯、气候及人文景观等。

同年,李之藻被黜返回杭州。他与傅汎济(1587～1653)等开始专事译书。

天启五年(1625年) 李之藻与傅汎济译述《寰有铨》。此书关于地球的理论十分错误,谎称地球为宇宙之中心。但引进了西方物质组成理论,即水、土、火、气"四元行"说。

天启六年(1626年) 金尼阁完成《西儒耳目资》的编纂,王徵(1571～1644)与韩云等国人对此书多有贡献。该书原意供初始来华之外国传教士学习汉语之用,但客观上也对我国的音韵学及汉字拉丁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年,传教士汤若望与国人李祖白译述《远镜说》,详细介绍了望远镜的性能、原理和制作过程,开西方光学原理传入中国之先河。这时距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仅18年。内容较新。

李之藻与傅汎济开始译述《名理探》,原书系葡萄牙Coimbre大学的哲学课本。全书凡30卷,仅译了10余卷。

天启七年(1627年) 王徵与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编译《远西奇器图说》(3卷),在扬州刻印。全书介绍力学定理61项;各类机械92项。这是一部介绍西方力学知识及其应用的中文书籍。

崇祯元年(1628年) 《寰有铨》刻印于杭州。同年,杨廷筠卒。

崇祯二年(1629年) 徐光启受命修历,建立历局,立即上奏《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他在疏中提出了"度数旁通十事"的建议,即建议翻译与几何学有关的十个学科领域的书籍。这是继1613年李之藻上奏《请译历法等书疏》之后,我国科学翻译史上又一重要历史文献。

当年秋历局创设,《崇祯历书》天文学丛书的译编工作正式开始。

是年,李之藻刻印《天学初函》丛书,共2编20种译书。其中"器编"十种都属科技译书,此前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科学译书多数皆已收入。李在"刻天学初函题辞"中再次呼吁翻译与学习金尼阁携入华的7 000册西书。《天学初函》很快传入日本,对日本学习西学曾产生重大影响。

同年,李之藻丁父忧在杭州,遂接旨火速回京协助徐光启译书修历。

崇祯三年(1630年) 李之藻病故。(一说李之藻卒于1631年)李之藻身故前半年,已与徐光启及外国传教士等译竣《日躔表》、《历指》、《测量全义与》与《比例解规》。

崇祯四年(1631年) 徐光启撰《奏呈历书总目表》,提出修历需"中西会通,超胜西法",而超胜之前,必须翻译西书。

徐光启上《奉旨恭进历书疏》并首次向崇祯帝进呈历书历表凡24卷。

徐光启上《奉旨恭进历书疏》,第二次进呈已译书籍,计有图3幅、书21卷、并图1摺。

同年,李之藻与傅汎济所译《名理探》在杭州出版。

崇祯五年(1632年) 徐光启第三次(也是他最后一次)进呈历书,计有30卷译书。

崇祯六年(1633年) 徐光启上《历法修正告成书器缮治有待请以李天经任历局疏》,推荐李天经继续督领历局事务。同年,徐光启卒。

崇祯七年(1634年) 李天经(第四次)续进历书历表29卷,并星屏一架。

同年,李天经再次续进(第五次)历书历表共32卷。

崇祯八年(1635年) 西方传教士邓玉函与国人毕拱辰译述《人身说概》。罗雅各(1590～1638,意大利传教士)与邓玉函译述《人身图说》。此二书合装,这是两部最早关于西方人体解剖学的中文书籍。

1635～1637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编译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又名《出像经解》在福州刊印发行,为圣经最早的中文节译本。

崇祯九年(1636年) 李玛诺将通俗拉丁文本的四福音书译成汉语文言文,并加注释,全书分14卷,名为《圣经直解》。

崇祯十年(1637年) 传教士艾儒略译编《西方问答》,国人米嘉惠撰序,蒋德景润订。卷1叙述西方地理、物产、制造、科学、法律与医学等,卷2介绍各地地图、历法等。

崇祯十二年(1639年) 李天经上《代献刍荛以裕国储疏》,云西方书籍《坤舆格致》已由杨之华、黄宏宪与传教士汤若望共同译述。这是第一部介绍西方矿冶的书籍。

崇祯十三年(1640年) 张时中阿訇译《十五真总义》、《四篇要道》,于是年成本。传统上称之为"回教经籍中最早之中文本"。但其他学者认为王岱舆的《正教真义》乃"清真教中第一汉译本"。

崇祯十六年(1643年) 焦勖与汤若望译述的《火攻挈要》出版。这是一本介绍西方枪炮、火药与炮攻战术的书籍。

崇祯十七年(1644年) 明亡清兴。汤若望掌管钦天监并继续翻译历书,督修历法。

顺治二年(1645年) 汤若望将崇祯年刻印的《崇祯历书》略加修改重新刻印,并冠名《西洋新法历书》,现有103卷版。收入《四库全书》时,易名为《新法历书》。

顺治三年(1646年)　波兰传教士穆尼阁(1656～1711)来华。《略人传》称赞他与人讨论西学,而不劝诱人人教信教。

顺治五年(1648年)　薛凤祚(仪甫,?～1680)与穆尼阁译述《天步真原》,凡3卷。这是一部介绍三角学的书籍。

顺治十年(1653年)　薛凤祚与穆尼阁译述《比例对数表》,首次将对数术引入中国。这在当时是先进的数学知识。

顺治十六年(1659年)　杨光先(1597～?)撰《辟邪论》,反对外国传教士督领历法事务。冬,四名西方传教士被捕入狱。他们是汤若望、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23～1688)、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1606～1682)与安文思(1606～1677)。

康熙三年(1664年)　薛凤祚编纂《历学会通》3集。正集含14种(15卷)书籍;续集共13种(19卷);外集则有14种(27卷)。其中有许多是译编书籍。

康熙四年(1665年)　杨光先上疏《摘谬论》,指摘汤若望修订之《新法历书》的十大错误。25名西方传教士被驱逐至广东省。

康熙五年(1666年)　汤若望卒。

康熙七年(1668年)　利类思译编《狮子说》。当年外国进贡狮子一只,他应询编此书述狮子之性能。同年,南怀仁参与修历。

康熙十一年(1672年)　《大学衍义》满文本译成。

康熙十二年(1673年)　南怀仁受旨修理天文仪器。钦天监官员刘蕴德(1628～?)据其所述仪器之制造、应用与安装,写成《新制灵台仪象志》,凡16卷。其中第2卷叙述材料力学,不少内容译自伽利略1638年所撰之《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一书。

康熙十七年(1678年)　利类思编译《狮子说》,于是年刊印。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冬,康熙帝命徐日升(1645～1708,葡萄牙传教士)、张诚、白晋与安多(1644～1709,比利时传教士)供奉内廷,每日为他讲授测量、数学等西方科学知识。教材多译编自西方书籍资料。

康熙三十年(1691年)　《通鉴纲目》译成满文。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　巴设将通俗拉丁文本《新约》的大部分译成汉文。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　康熙帝组织中国学者与法国传教士雷孝思(1663～1738)测量绘制蒙古与青海地图;与白晋、法国传教士杜德美(1668～1720)测绘河北、辽宁地图;与法国传教士冯秉正(1669～1748)测绘河南、浙江与福建等省地图;与法国传教士德玛诺(1669～1737)测绘河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与福建等省地图。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康熙帝组织编纂《律历渊源》丛书第一集《历象考成》,凡42卷。第二集5卷《律吕正义》亦编成。在此两集内,收入不少西方天文学与音乐知识。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　由各省地图合成的《康熙皇舆全图》(1∶1 400 000)完成,这是第一幅用西方测绘法绘制的中国精确地图,受到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称赞。此图当时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也是一幅比较精确的中国地图。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　梵蒂冈教皇派代表赴华,命令中国教徒不得拜天尊孔。康熙帝反对梵蒂冈干涉中国教务并下旨禁天主教,驱逐不懂科技知识的西方传教士回国。西学的翻译传入虽未被禁止,但已基本结束。

《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蒙文译本审订和刻版工作完成。

雍正元年(1723年)　《律历渊源》第三集《数理精蕴》编纂工作完成,凡53卷。明末清初译述的西方数学书籍几乎悉数收入。雍正帝驱逐西方传教士,仅留少数知晓天算者供职钦天监。通常这一年被视为"西学东渐第一期"的最后一年。

雍正七年(1729年)　清廷在北京设立西洋馆,以培养拉丁文翻译,招满、汉青年专修拉丁文。巴多明掌全馆事宜,宋君荣副之。

乾隆十三年(1748年)　四译馆及会通馆合并为会通四译馆,专司翻译及传授外国语。其西洋馆命西洋人译拉丁字表。故宫博物馆图书馆藏《华夷译语》中拉丁字表凡5卷,字条约2 000。

乾隆十四年(1749年)　《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译成蒙文。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及部分《丹珠尔》译成满文。

道光二年(1822年)　英国马士曼和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沙合译的《圣经》汉译本在印度出版。此为最早出版的汉译《圣经》。

道光三年(1823年)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合译的《圣经》汉译本以《神天圣书》为书名在马六甲出版,并运往中国传播。

道光七年(1827年)　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受荷兰传教会派遣来华。他改订《神天圣书》,称《旧约》为《救世主耶稣新遣诏圣书》。这两本书后由洪秀全合刊为《新旧遗诏圣书》,对太平天国革命影响很大。

道光十五年(1835年)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将华人所作《中朝日字汇》译成《中朝日英字汇》。

道光十八年(1838年)　麦都思、马儒汉、郭实腊、裨治文四人合作翻译圣经,取名《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1837)、《旧遗诏圣书》(1838),史称"四人小组译本"。

道光十九年(1839年)　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在广东禁烟时,设立翻译馆,令梁进德、袁德辉等编译外国论中国、论用兵以及重炮操作等资料,还编译了当时最新的一本世界地理书籍《四洲志》。由此,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道光二十年(1840年)　《伊索寓言》的最早中译本《意拾喻言》在《广东报》发表,署名蒙昧先生著,门人懒惰生编译。麦都思将《台湾荷兰词汇》转译为《台湾英文词汇》。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林则徐在京口(镇江)

会见魏源，希望他编撰《海国图志》，并给他《四洲志》的全部有关资料，魏源接受任务。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麦都思译编成《汉英词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魏源《海国图志》成书，初稿50卷。

麦都思于上海创设墨海书馆，组织中西学者翻译与出版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书籍。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抵沪，在墨海书馆与国人讲论西学并翻译西书。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王韬参观墨海书馆，识交麦都思等西方人士。麦都思再度译编《英汉字典》(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咸丰元年(1851年) 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生物解剖学知识的《全体新论》出版，由陈修堂与英国医生合信(1810～1873)共同翻译。

咸丰二年(1852年) 著名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抵沪，居大境杰阁，与伟烈亚力相约共译《几何原本》后九卷，本年6月开始。

魏源补辑《海国图志》40卷。

咸丰二年至咸丰八年(1852～1858) 麦都思、施敦力、裨治文、理雅各等翻译"代表译本"(亦称"委办译本"或"会使译本")，中国学者王韬受聘负责襄理。1852年出版《新约》；1854年出版《旧约》，亦称"伦敦差会译本"；1858年合订本出版。

咸丰三年(1853年) 张福僖(字南坪，?～1862)与艾约瑟合译《光论》。全书约6 000字，含插图17幅。此书在清末对国人影响甚大。

咸丰四年(1854年) 蒙族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哈斯宝于是年5月修改完蒙(古)文本《新译红楼梦》。动手翻译时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农历七月初。

咸丰四年至六年(1854～1856) 中国第一位神学家何进善注释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在香港先后出版。

咸丰五年(1855年) 墨海书馆刻印合信译著的《博物新编》。此系一本早期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科普书籍。介绍了地学、热学、光学、动物学等知识。徐寿、华蘅芳等均由此开始接触西方科技知识。同年，合信的另一译著《物理学提要》出版。这是第一次以"物理学"命名的中文书籍。

咸丰六年(1856年) 我国第一位在耶鲁大学学成的留美学生容闳(1828～1912)回国，不久于上海海关翻译处任职。因痛恨华人与英人不享同等权利，且不屑于与一些卑鄙通事为伍，旋即辞职。

同年二月初九，郭嵩焘参观墨海书馆，遇译编校对书籍的李善兰与王韬，并觅译书《数学启蒙》。

咸丰七年(1857年) 合信译著的《西医略论》、《妇婴新说》面世。

同年2月，松江韩应陛刊刻李善兰与伟烈亚力于上年译成的《几何原本》后九卷。

《六合丛刊》创刊，他同时刊载译编的科技文章，如"西国天学源流"。

咸丰八年(1858年) 美长老会教士姜别利出任宁波花华圣经书房主任，1860年迁上海后，将书房改名美华书馆。这是一所早期出版科学翻译书籍的机构。

同年，《植物学》印行，此系我国第一部关于西学植物学的译著。原书系英人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的著作 *Elements of Botany*。由李善兰与艾约瑟、韦廉臣合译。李善兰所创"植物学"等术语一直沿用至今。

同年，李善兰与伟列亚力译述《重学》，原书系威廉·休厄尔(1794～1866)的 *An Elementary Treatise of Mechanics*。这是当时一部重要的、有影响的力学著作。

咸丰九年(1859年) 我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方高等数学书籍《代微积拾级》，由墨海书馆印行，开始引入解析几何与微积分。比较全面地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的译书《谈天》印行(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李善兰在"序言"中批驳了阮元等人对日心说的攻击。我国第一部符号代数学的课本《代数学》翻译出版，译者也是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同年，郭嵩焘到天津办理外务，疏请广求谙通外语的人才。

咸丰十年(1860年) 恭庆王奕欣等奏请创设官方的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奏折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丁韪良所译的惠顿《万国公法》出版。

咸丰十一年(1861年) 冯桂芬请于广东、上海设立翻译公所，选15岁以下儿童，"聘西人课以诸国文字"。他在《采西学议》中还说："闻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进书数百种，存于方略馆，宜发院择其有理者译之"。

同治元年(1862年) 北京同文馆成立。请英人包尔腾任教师，初设英文馆，学生十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所设俄罗斯文馆也并入同文馆。

同治二年(1863年) 上海设立同文馆，后称上海广方言馆。

同治三年(1864年) 广州设立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出版第一部译书《万国公法》，由丁韪良翻译。

同治四年(1865年) 容闳自本年起，数年内译成《契约论》与《地理学》。

同治五年(1866年) 左宗棠奏准设立船政学堂于福州，招生学习英、法语言文字及制造、驾驶技术，并译刊西书。

同年，京师同文馆加设自然科学课程。

同文馆学生张彝等首游欧洲，见习翻译事务，张回国后写了游记《航海述奇》。

同治六年(1867年) 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赵元益等先后入馆译书。该馆所译化学、兵工等书籍尤多，一段时间内馆译书籍在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傅兰雅受聘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28年。至1896年，先后参与译书129部，其中77部由江南制造局出版，占该局译刊西籍总数的47.2%。

同治七年(1868年) 美国传教医生在广州创办

《广州报》(1884 年易名《西医新报》月刊),编译报道西方医药知识。

同治八年(1869 年)　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张德彝等随中国第一个到西方的外交使团到法国任见习翻译,张回国后又撰写了《再述奇》。

同治九年(1870 年)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编成《化学材料中西名目录》,系我国早期的一本化学双语专业词表。1885 年出版。

同治十年(1871 年)　张德彝作为崇厚的英文译员出使法国,目击巴黎公社起义,在写成的《三述奇》中曾记载之。

同年,清廷批准成立"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曾垣忠(兰生)任该局翻译。

同治十一年(1872 年)　同文馆添设德文馆。同年,我国早期的科技期刊《中西闻见录》创刊,在北京出版。美国人丁韪良与英国人艾约瑟等主持,京都施医院编辑。该刊包括翻译介绍西方科技知识。

徐寿与傅兰雅翻译的《化学鉴原》由江南制造局刊行,该书首先刊登了中文的化学元素表。

华蘅芳与美国传教医师玛高温译述的《金石识别》12 卷出版,是我国早期的中文地学书籍。

同治十二年(1873 年)　华蘅芳与玛高温译述地质学名著《地学浅释》(8 本 38 卷)。原书系英人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 *Principles of Geology*。书中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同年,美传教医师嘉约翰(1824～1901)译撰《内科阐微》,系一本较早介绍西医内科知识的书籍。

王韬所撰《普法战纪》印行,书中译有著名的法国《马赛革命歌》。

蠡勺居士译《昕夕闲谈》开始在《瀛寰琐记》上连载(1873 年 1 月的第 3 期到 1875 年 1 月的第 28 期),系我国近代较早的由外文译成中文白话体的长篇小说,分上、下卷。

光绪元年(1875 年)　《化学鉴原续篇》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刊印,译者系徐寿与傅兰雅。这是一本早期系统介绍有机化学的中文书籍。孔继良译《西药略释》。

同年,傅兰雅在上海开设格致书室,除贩售外国书籍仪器外,并自行译印各种科学书籍。其中尤以各种《须知》最为著名。

光绪二年(1876 年)　郭嵩焘、刘锡鸿奉旨出使英国,这是我国驻外使臣之始。张德彝、凤仪(夔九)随任翻译官,并有随员张斯徇(听帆)兼翻译官。他们是我国第一批驻外使馆的翻译官员。

英人傅兰雅编辑出版《格致汇编》,初为月刊,后改为季刊,先后出版七年(中有间断)。这是我国早期的一本科学杂志。徐寿及子徐建寅等常为之撰译稿件。

同年,李圭(1842～1903)首次代表中国,参加美国独立百年费城万国博览会,陈炽垣为随行翻译。

光绪四年(1878 年)　清廷委派崇厚出使俄国,张德彝与庆常调任崇厚的二等翻译官。同年,曾纪泽(1839～1890)奉命接替郭崇焘出使英法两国大臣。他通晓英文,并能亲自译拟外交文件,是清末少有的掌握外文的驻外大使。曾纪泽后曾"派管同文馆事务",但始终未能主持馆务。当年随同曾纪泽出使的有英文翻译左秉隆与法文翻译联兴,二人均毕业于同文馆。是年 8 月 28 日,慈禧太后在曾纪泽出使前曾接见他,并与他议及大使与翻译人员的关系。同年,李凤苞奉旨出任驻德大使,他是当时通晓外语的使者之一。他还曾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参与翻译多种书籍。

光绪五年(1879 年)　由徐寿与傅兰雅合译、江南制造局印刷出版的《化学鉴原补编》是我国早期一本系统介绍无机化学的书籍,书中介绍了 1875 年发现的元素镓。

光绪六年(1880 年)　我国第一部介绍概率论知识的《决疑数学》印行,由华蘅芳与傅兰雅合译。原书系 Gallowy 的 *Probability* 及 Anderson 的 *Probabilities, Chances or the Theory of Averages*。

同年,傅兰雅发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是一篇介绍该局译书情况的重要历史文献。

光绪八年(1882 年)　李善兰去世。

光绪九年(1883 年)　由徐寿与傅兰雅合译的《化学求数》由江南制造局刊印,这是我国最早一本系统介绍化学定量分析知识的书籍。原著为德国人弗雷泽纽斯(Fresenius)的 *Qualitative Chemical Analysis* (1876)。

同年,《金石中西名目表》在江南制造局出版,未署编纂者。此系一本早期的双语专科词表。

光绪十年(1884 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设所于唐家衖。它是我国近代最有影响的民办译书机构之一。同年,徐寿去世。

光绪十一年(1885 年)　《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它是一份早期有影响的化学专科词表。

光绪十二年(1886 年)　美国医生洪士提反翻译《万国药方》,这是早期介绍西药的书籍。

光绪十三年(1887 年)　赵元益与傅兰雅译述之《西药大成》由江南制造局出版,全书凡 10 卷 16 本。这是一套早期系统介绍西药学的书籍。《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由赵元益、傅兰雅合作编纂出版。

同年,英教士韦廉臣、李提摩太等创办广学会于上海,初名基督教普及学识传布会。1905 年改名为广学会。翻译出版不少宗教与科技书籍。

光绪十四年(1888 年)　《翻译手册》第 1 卷由江南制造局出版。这是《金石中西名录表》、《化学材料中西名录表》及《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录表》的总汇本之一。

《西学大成》丛书出版,是包含算学、天文、地理、史学等 10 余种学科的科学译书。

光绪十五年(1889 年)　《汽机中西名目表》是我国早期的一本蒸汽机专业英汉双语词表,由江南制造局编译出版。《伊索寓言》中文译本《海国妙喻》由天津时报馆出版,收入寓言共 70 则。

光绪十六年(1890 年)　《格致汇编》停刊八年后

复刊。王韬在复刊号(第五年第1卷)上作"《格致汇编》序"。

当年正月,薛福成奉旨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随员中有赵元益,翻译人员胡惟德(馨吾)、王凤喈(仪亭)、王丰镐(省山)、世增(益三)与郭家骥(秋坪)等,他们多数是同文馆培养的早期外交翻译人才。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时,饬令随员与翻译摘译大量资料。自己也曾译辑《续瀛环志略》,并将部分摘译于数十册日记中。本拟回国后竟稿,不幸于1894年夏回国后病故。

光绪十七年(1891年) 《西学大成》丛书出版。王西清辑,大同书局印。共收入12种学科的译书56种。

光绪十八年(1892年) 尹端模译《病理撮要》与《儿科撮要》二书。

光绪二十年(1894年) 马建忠上奏《拟设翻译书院议》,对翻译书院的招生对象、师资、培养目标及应译书籍等,均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同时提出"善译"的翻译标准,对翻译原则作了系统的阐述,是中国近代译学史上的名篇。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文廷式、康有为等组织强学会于北京,附设强学会书局并出版日刊《中外纪闻》。旋被查封;后准胡孚宸奏,改为官书局。

同年,严复(1853~1921)译《天演论》(赫胥黎著*Evolution and Ethics*,1894年)中的"序论"与"补充"两篇。本书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进化论。

上海设立强学会分会。张之洞发表《上海强学会分会序》,云:"尝考讲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

林纾始译《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在上海出版。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盛宣怀奏准设立南洋公学于上海,并附设译书院。两年后,张元济(菊生)任该院院长。

同年,孙家鼐在《官书局开设缘由》内,曰:"将总署所购洋报选译印行,以扩闻见"。

邹代钧撰写《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章程》,发表于《时务报》第一册。《时务报》于当年秋在上海创刊。刊物主笔先后有梁启超、麦孟华、章炳麟等。先后刊登了大量科学译文;连载最新科学译书;并介绍译书机构。

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书局报馆折》,云:"今请京师设大译书馆,广集西书……,分类译出。"

贵州学政赵惟熙奏《请开设译书公局疏》,提出"译书当以政学为前,艺学为次"。

《西学富强丛书》出版,张之洞作序。从书包含了算学、力学、电学等十余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译书。

梁启超编撰的《西学书目表》与《读西学书法》,由时务报馆刊印。

严复撰《天演论·译例言》,提出"信达雅"的著名翻译标准,对于我国的翻译理论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陈次亮建议驻外使节广译西书,他说:"欲通外事,宜译西书,密谕使臣,广行翻译。"

同年,同文馆增设东文馆。《北京歌唱》(*Pekinese Rhymes*)本刊行。由驻京的意大利使馆华文参赞卫太尔男爵搜集北京的歌谣170首,每首先列原文,次附英文注解及英文。

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脱稿。同年,梁启超在上海创设大同译书局,译刊书籍,并在《时务报》上发表"大同译书局叙例"。

董康、赵元益主持在上海新马路设立译书公会,并在《湘学报》上颁布"译书公会章程"。

梁启超发表《论译书》,论及译书范围、名词翻译及翻译人才等。

同年,《集成报》(旬刊)创刊,由陈念萱创设,在上海出版。为我国最早的文摘刊物,报道了不少科学译文。

同年,《译书公会报》(周刊)在上海创刊出版。由译书公会主办,总理为恽积勋等,总主笔为章炳麟等。

叶瀚等合译发行石印《蒙学报》周刊,所译多为科普启蒙书。

《西政丛书》出版,全部收入科学译书。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罗振玉、徐树兰等在上海组织的务农会出版《农学报》,并先后译刊农学书籍数百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光绪帝下诏变法。4月13日,杨深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员)请求多译日文近代科技书籍。

同年,李盛铎上疏请饬下出使大臣,访查日本所译西方科学书籍,全部购寄回国。

总理衙门复奏开馆译书,建议将梁启超集资所办译书局改为译书官局。光绪帝下旨:"如所议行。"同时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命办理译书局事务。

军机大臣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疏,请饬编译局统筹编译课本。

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奏陈筹办大学堂概况,共分八条。第五条"论译书",建议令编译局迅速编译西学各书。

光绪帝准梁启超奏请,设立翻译学堂。

总理衙门颁行农学章程,令各学堂翻译外国农学书籍。

康有为上奏《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摺》。

严复译书《天演论》木刻本行世。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林纾以"冷红生"的笔名译出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欧洲文学名著输入中国的第一部。此后,在近三十年时间里,林纾与别人合作,翻译介绍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小说已刊未刊者共183种,所译字数达1 200万。

徐维则编纂的《东西学书录》出版。全书分上、下册和附卷。上、下册共著录1899年以前的西文与东文译书571种。

是年,蔡尔康与李提摩太译述《大同书》(〔英国〕企德著),此系一本早期介绍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中文

书籍。

王韬编译《西国天学源流》，宣传哥白尼学说。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　安徽巡抚王之春奏请设立译书处，派翰林部员数人，率同翻译官专司其事，并多译日文书。

同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亚泉学馆，并编辑出版《亚泉杂志》及翻译出版新书。

我国留日学生戢翼翚等于东京创刊《译书汇编》，译编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著作。

同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两宫西狩"，京师同文馆遭解散。

周桂笙所译《新庵谐译》上下卷，由上海清华书局出版，上卷系《一千零一夜》最早的节译本。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　学部咨议张謇建议全国十省市之书局分门别类译书，"延致通才，分年赶译。每成一种，互相分送，全数译成，仍各分类。"

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变法疏，言译书三法：一为奖励各省译书人员；二为授以各省能译书的举贡生员以官职；三为敕令出使大臣，访求新书，每员译书若干。

钟观光、林木林、虞含章等创办科学仪器馆，编译科学图书。

刘坤一、张之洞奏设江楚编译局于南京，始名江鄂编译局。

5 月，诏立京师大学堂，并将官书局及新办之译书局并入。

是年夏，俞复、廉泉等创建文明书局于上海，先后翻译刊印了大量科学教科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主持的《译林》(月刊)创刊发行。

《励学译编》创刊，并在第一册上发表了"励学译社社章"与"励学译社缘起"。

《亚泉杂志》第六册，首次翻译刊印了《化学周期律》，译者为虞和钦。

同年，林纾、魏易合译的《黑奴吁天录》(〔美〕斯士活著)，以"武林魏氏木刻本"行世。

京师大学堂在上海设立译书分局。12 月，奉旨同文馆又归并京师大学堂。

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于上海译书分局附设印书局一所，大学堂所有编译书籍均交印书局印制。

蟠溪子(杨紫麟)与天笑生(包天笑)合译《迦茵小传》(〔英〕哈葛德著)，始载于《励学译编》第 1 册，到第 12 册载完(1902 年 2 月 22 日)，该书为节译本，是继林纾所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最为风行的爱情小说之一。

林纾与魏易合译《黑奴吁天录》(〔美〕斯士活著)，由武林魏氏木刻刊行(四册)，后有 1904 年文明书局木刻本与 1905 年文明书局铅印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　张百熙奏办大学堂疏，条陈办法计五项。第三项附设译局，上海设分局，"翻译东文、费省而迅速"；"译局非徒翻译一切书籍，又须翻译一切课本"；并建议编纂外汉专科辞典，颁行各省。

同年，《政学报》第 1 号发表《东亚译书会章程》。

3 月，京师大学堂正式设立编译局，同年 11 月设分局于上海。编译局分为译书局和编书处。严复任译书局总办，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连载文章《东籍月旦》，论及外国语言文字之学习，提倡多译日文书籍。

留日学生黄兴等在日本东京创办《游学译编》，编译教、军、史、地等科学文章。

京师同文馆改为翻译科，由速成、预备两科中择其年少质敏，洋文已有门径者入学，十二月诏以曾广铨为总办。

12 月，《游学译编》第二册发表了"湖南编译设叙"。

同年，张冶秋疏议设立译局，请于京师、津、沪、鄂、粤等处设译局数所，以上海为总局。

严复所译《原富》由南洋公学院译书院出版，原书为亚丹・斯密一本经济学著作。严复在书中附有《斯密亚丹传》。严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为自己以古文体译述辩解。

顾燮光的《东西学书录》增订本出版，比徐维则 1899 年的初版本增录译书 300 余种。

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拟订译书处章程。

马君武在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寄宿，担任《新民丛报》撰稿并译《物种起源》(〔英〕达尔文著)数章，在该报发表。

蔡元培编《文卷》三卷，由商务印书馆刊行，选文共 43 篇，皆"当世名士著译之文"，是这一时期政论散文中最富有新思潮的选本。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　马君武译达尔文《物种起源》(〔英〕达尔文著)第三章、第四章出版。(次年译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1919 年重译全书出版。)

同年，京师大学堂设译学馆于北河沿，翻译科并入。秋天，译学馆开学。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章程规定"以造就译才、品端、学裕为宗旨"，"上有应国家才之殷，下有以广士林译书之益，兼编文典，以资会通"。毕业生可授予进士、举人等出身。

浙江留日学生创办《浙江潮》刊物，翻译刊载政、经、法、史、军等科学资料。林纾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职。

文明编译书局出版严复所译《群学肄言》(原书为斯宾塞著的 *Study of Sociology*，1873)。这是一本早期的社会学中文译书。

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所译的哲学书籍，《群己权界论》(原文为穆勒的长篇论文 *On Liberty*)初译名为《自由论》。

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出版，为介绍马克思学说最早之译本。

鲁迅用文言翻译改写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署名自树)出版，并翻译法国雨果的短篇小说《哀尘》(署名庚辰译)，载《浙江潮》第 5 期。

《天方夜谭》(佚名译)始载于《绣像小说》第 11 期，到第 55 期(1905 年 7 月)止。小说是从英译书《阿拉伯之夜》转译而来的。苏曼殊在苏州任吴中公学教授，与

包天笑、汤顿相识。后去上海《国民日报》任翻译,与陈独秀、章太炎相识并翻译改写法国嚣俄(雨果)的名作《悲社会》,今译《悲惨世界》。开始文学活动。

光绪三十年(1904年)　鲁迅所译《地底旅行》在南京出版。

京师大学堂停办编译局。

顾燮光编成《译书经眼录》,收录了1902～1904年期间出版的译书凡533种,后于1935年整理出版。

《东方杂志》第9期刊出“江宁江楚编译局章程”。

严复译《社会通诠》(琴克斯 E. Jenks 著 *History of Politics*)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是政治学史书籍。

曾朴、丁芝孙、徐念慈等在上海创立小说林社,曾朴任总理,徐念慈任编辑,此刊专门出版创刊小说和翻译小说。

林纾与魏易将兰姆姊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译为中文,以《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为题出版,是最早译介莎士比亚的中译本之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严复译名著《天演论》(赫胥黎著 *Evolution and Ethics* 一书的绪论与本论两篇)。此书在当时对我国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

魏允恭编纂的《江南制造局记》出版,其卷2《建制表》内附有该局译书约170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春,学部奏拟官制职守清单,以原学务处所设编译局改为编译书局。同年,学部于四译馆旧址后院设立图书编译局,制定编译章程。章程规定“译书先择英日两国书籍,余俟聘定委员,再行编译”。

《月月小说》第一年第1期刊载“译书交通公会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翻译工作者组织译书交通公会的宣言。该会发起人为周桂笙(1873～1936)。该会响应者寡,于次年3月停办。

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第一次在我国全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项纲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商务印书馆宝山路印刷所与编译所新屋落成。抱器室主人译《几道山恩仇记》(今译《基督山伯爵》),由香港中国日报社出版。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正月,《天义报》第15卷译刊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以后又相继刊载《宣言》前两章的译文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部分译文。

林纾与魏易合译《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英〕狄更斯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是晚清小说刊行最多的一年,仅商务印书馆,小说林社,新世界小说社,广智书局等几家的不完全统计,出版小说122种,其中翻译小说有79种。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是年翻译小说有130种。

鲁迅在日本东京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并开始编译《域外小说集》,译小说《漫》、《默》(〔俄〕安特来夫著)等作品。

严复应大英圣书公会聘请翻译的文言文《马可所传福音》(即《马可福音》前四章)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代印出版。

鲍康宁自行出版官话诗韵体诗篇译本《诗篇精义》。

宣统一年(1909年)　学部在《学部官报》第99期、100期上,公布编译已成及未成书目表。学部奏设编订名词馆,统一译名,派严复为总纂,但后来基本上未编出什么专科辞典。

同年,容闳写成回忆录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译本即《西学东渐记》。不少内容述及其任职翻译与中国幼童留学美国的情况。

严复的译书《名学浅说》[杰文斯(W. S. Jevons) *Elementary Lesson in Logic*]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出版,孙景康等四人编纂,陈洙删润。

鲁迅与周作人合作编译之《域外小说集》第一集、第二集先后出版。

同年,《小说时报》在上海创刊。由冷血、天笑轮流主编,小说时报社出版,由正书局发行。以刊载著译小说为主。

宣统二年(1910年)　《小说月报》在上海创刊。月刊。恽铁樵、王蕴章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发行。刊载翻译小说。

宣统三年(1911年)　京师译学馆归并京师大学堂。

同年,周作人译丹麦安徒生童话《公主》。11月,林纾在北京《平报》“译论”专栏中发表著作和译作。

1913年　5月,《四川译学报》在成都创刊。林纾辞去京师大学堂职务。

1914年　8月,《欧洲风云周刊》创刊于上海。由中外编译社编辑发行。

12月,《马君武诗稿》由文明书局印行,收诗97首,又译有拜伦、歌德等诗38首,诗的革命思想极浓。

1915年　1月5日,《妇女杂志》(月刊)在上海创刊。王蕴章任主编。内容分论说、图画、学艺、家政、译海等。由商务印书馆发行。1916年第二卷起由胡彬夏女士主编。

陈独秀译《美国之歌——亚美丽加》(〔美〕史密斯著),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

1916年　4月,严独鹤、程小青、陈小蝶、无虚我五、刘半农、周瘦鹃等人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英〕柯南道尔著)由中华书局出版。全集收长短篇侦探小说44案,汇成文言译本,12册。

本年《风俗闲评》刊行(〔俄〕契诃夫著,陈小麟、陈大镫合译),收契诃夫短篇小说23篇,是我国第一次较全面介绍契诃夫的刊物。

1917年　3月,周瘦鹃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计上、中、下三卷,原名《欧美名家小说丛刊》),由中华书局出版。收欧洲14国,47位作家小说50篇,得到鲁迅等人的赞许。全部为文言翻译,几乎包括两个半世纪西方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每篇译文之前,均有作者像和生平简介。

1918年　6月,《新青年》4卷6号,辟《易卜生号》,发表有《易卜生主义》(胡适)、《易卜生传》(袁振

英)以及剧本《娜拉》、《国民之敌》等,以介绍外国进步戏剧家,推动社会改革。

1919 年 2 月,《晨报》在李大钊帮助下改革第 7 版,定为《晨报副刊》。增加"自由论"和"译丛"两栏。成为宣传和维护新文化运动的园地。

周作人译《卖火柴的女儿》(〔丹麦〕安徒生著),在《新青年》第 6 卷第 1 号上发表。

《新旧约全书》官话和合本翻译出版。

1920 年 7 月,茅盾著《译学的批评》,发表于《学灯》。

8 月,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德〕马克思、恩格斯著)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12 月,鲁迅译《幸福》(〔俄〕阿尔志巴绥夫著),发表于《新青年》第 8 卷 4 号。

费觉天译《资本论自叙》(〔德〕马克思著),载《国民》月刊第 2 卷 3 号。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德〕马克思、恩格斯著)全译本。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1921 年广州人民出版社重新排本,译者改用陈佛突笔名。1924 年由广州平民社出版。后又用《恩格斯、马克思的宣言》作书名。1933 年又用《宣言》作书名,译者改为署仁子。

郭沫若译《风光明媚的地方——〈浮士德〉悲剧中第二部之第一幕》(〔德〕歌德著),发表于《时事新报》1920 年 3 月 20 日,后收入创造社 1928 年版《浮士德》中。

1921 年 11 月,郭沫若译《对月》(〔德国〕海涅著),见《海外归鸿第二信》,载 1922 年 3 月 15 日《创造》季刊 1 卷 1 期。初收入《沫若译诗集》1928 年乐华版,后收入《沫若译诗集》1975 年人民文学版。

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3 号上发表《读译文书的方法如何?》,文中着重介绍了泰特勒(Tytler)的翻译三原则,开我国译论引进之先河。

卫生译《国家与革命》(〔前苏联〕列宁著)(第一章),载《共产党》月刊第 4 期。

李达译《列宁的妇女解放论》(〔前苏联〕列宁著)(摘译《劳动俄罗斯中劳动的研究》的第 1 节),载《新青年》(广州)月刊第 9 卷第 2 期。

田汉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英〕莎士比亚著)。

1922 年 4 月,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德国〕歌德著),由泰东图书局出版。

熊德山译《历史以前的文化阶段》、(〔德〕恩格斯著)《国家的起源》(即《家族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第四、第五章)和《未开文明》(〔德〕恩格斯著),均载《今日》第 3 卷第 2 期。

熊德山译《哥达纲领批判》(〔德〕马克思著),载《今日》(北京)月刊第 1 卷第 4 号《马克思号》。

1924 年 田汉译《罗密欧与朱丽叶》(〔英〕莎士比亚著)。

张太雷译《马克思政治学》(〔前苏联〕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一部分),载《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仲武译《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前苏联〕列宁著)和《亚洲的觉悟》(〔前苏联〕列宁著),载《新青年》季刊第 4 期(广州)。

蒋光赤译《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原理》(〔前苏联〕斯大林著),载《新青年》季刊第 4 期(广州)。

郁达夫撰写《读乐王当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对文学翻译者提出"学思得"三个要求。

1925 年 李春蕃(柯柏年)译《哥达纲领批评》(〔德〕马克思著),由上海解放社出版。

瞿秋白译《列宁主义概论》(〔前苏联〕斯大林著),载《新青年》不定期刊第 1 期(广州)。

上海的《中国青年》自 106 期起连载谷二译斯大林著作《列宁主义的理论及实践》。

1926 年 3 月,郭沫若所译《雪莱诗选》,由泰东图书馆出版。

李大钊译《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德〕马克思著),由《政治生活》出版。

李春蕃译《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无产阶级之失败》(〔德〕马克思著),载汕头《岭东民国日报》第 2 卷第 4 期。

1927 年 6 月,刘半农所译《法国短篇小说集》由北新书局出版。

9 月,蒋翼振编著的《翻译学通论》由上海义利印刷公司印刷出版。

10 月,郭沫若与成仿吾合译《德国诗选》(〔德〕歌德、席勒、海涅等著),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李春蕃译《国家与革命》(〔前苏联〕列宁著),载《岭东民国日报》副刊。

李铁铮翻译《古兰经》在北平出版,这是最早的中文全译本。

吴凉译《左派幼稚病》(〔前苏联〕列宁著),由浦江书店出版。

1928 年 2 月,《浮士德》(〔德国〕歌德著,郭沫若译)由现代书局出版。

1929 年 10 月,夏衍所译《母亲》(〔前苏联〕高尔基著),由大江书铺出版。

杜竹君(李一氓)译《哲学之贫困》(〔德〕马克思著),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许楚生(许德珩)译《哲学之贫困》(〔德〕马克思著),由上海春秋书店出版。

李膺杨(杨贤江)译《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德〕恩格斯著),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刘埜平译《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资本主义论》(〔前苏联〕列宁著),由启智书局出版。

胡瑞麟译《革命与考茨基》(〔前苏联〕列宁著),由华舆书局出版。黄剑锋译《马克思评传》(〔前苏联〕列宁著),由启智书局出版。

江西的《列宁青年》先后载斯大林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和《苏联工业化反右倾斗争问题》。译者不详。

1930 年 1 月,鲁迅译《毁灭》(〔前苏联〕法捷耶夫著),发表于《萌发》和《新地》日刊,翌年由大江书铺

出版。

陈启修译《资本论》(〔德〕马克思著)(第1卷第1分册),由昆仑书店出版。

陈仲涛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德〕马克思著),由江南书店出版。

李一氓译《马克思论文选译》第1集,由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

向省吾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论的片段》(〔德〕马克思、恩格斯著),由江南书店出版。

陈瑞宣译《三个国际》(〔前苏联〕列宁著),由华兴书局出版。

1931年 6月,郭沫若译《战争与和平》第1分册上集(〔俄〕托尔斯泰著),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

11月,曹靖华译《铁流》(〔前苏联〕绥拉菲摩维夫著),由三闲书屋出版。

12月,郭沫若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德〕马克思著),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12月,鲁迅著《关于翻译的通信》,收入《二心集》。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翻译标准问题就屡次提出,争论越来越激烈,到1931～1932年间达到高潮。这次争论的来源,一个是赵景深提出了"宁可错些,不要不顺"的原则,一个是瞿秋白提出了"绝对用白话做本位来正确的翻译一切东西"的原则。鲁迅没有直接参加这场争论,但他在与瞿秋白的通信中针对赵景深的观点提出"宁信而不顺"的主张,意在忠实于原作。

笛秋、朱铁笙译《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前苏联〕列宁著),由明日书店出版。

1932年 9月,郭沫若译《战争与和平》第1分册(〔俄〕托尔斯泰著),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王慎明与侯外庐合译《资本论》(〔德〕马克思著)(第1卷)上册,由国际学社出版。下册在1936年出版,译者笔名为玉枢、右铭。

潘冬舟译《资本论》(〔德〕马克思著)(第1卷第2、第3分册),由东亚书局出版。

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出版《国家与革命》。

高希圣与郭真合译《经济学教程》(〔前苏联〕列宁著),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赵景深译《格林童话集》(〔德〕阿尔尼姆与布仑塔诺合编),由北新书局出版。

1933年 3月,郭沫若译《战争与和平》(〔俄〕托尔斯泰著)第3分册,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金大声译《列宁主义问题》(〔前苏联〕斯大林著),由扬子江书店出版。

林语堂在《论翻译》一文中,主张"忠实、通顺、美"这三项翻译标准;最早注意到翻译心理,提出"译文时应具何种心理"的问题;文中较早使用"译学"之类的术语。

王元德(王宣忱)翻译的《新约全书》在青岛出版。该译本是第一部由华人独立翻译的《新约》译本。

1934年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中共苏区中央局译刊。

《列宁主义问题》,载中共中央局译刊。

1935年 1月,茅盾译《吉柯德先生》(〔西〕塞万提斯著),在《中学生》上连载。

6月10日鲁迅在《"题未定"草》中提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11月,鲁迅译《死灵魂》(〔俄〕果戈里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1935～1944年,朱生豪将莎士比亚的31个剧本译为中文,至1947年共出版了其中的27个译本。

1936年 3月,鲁迅译《死灵魂》(〔俄〕果戈里著)第2部,载于《译文》第1卷1期。

郭沫若译《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德〕马克思著),由日本质文社出版。

瞿秋白译《列宁论托尔斯泰》(〔前苏联〕列宁著),由诸夏怀霜社出版。

1937年 3月,傅雷译《约翰·克里斯朵夫》(〔法〕罗曼·罗兰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邹韬奋译《唯物辩证法》(〔德〕马克思著),由生活书店出版。

徐懋庸译《列宁家书集》(〔前苏联〕列宁著),由生活书店出版。

许孟雄等在一年的时间里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几十篇著作译成英文,为国内首译。

1938年 5月5日,在延安成立马列学院,下设编译部,专门负责马列著作的编辑和翻译工作。由洛甫(张闻天)任编译部主任。在1938～1942年间,编译部人员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的出版工作。

郭大力与王亚南合译《资本论》(〔德〕马克思著)(全译本),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吴黎平与刘云合译《法兰西内战》(〔德〕马克思著),由解放社出版。

吴黎平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恩格斯著),由解放社出版。

成仿吾与徐冰合译《共产党宣言》(〔德〕马克思、恩格斯著),由解放社出版。

艾思奇译《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的书信》(〔德〕马克思、恩格斯著),载1938年《解放周刊》第53及54期。

方乃宜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德〕马克思、恩格斯著),由解放社出版。

郭沫若译《德意志意识形态》(〔德〕马克思、恩格斯著),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

1939年 5月,巴金译《我的自传》(〔俄〕克鲁泡特金著),由开明书店出版。

同年,何思敬与徐冰合译《哥达纲领批判》(〔德〕马克思著),由解放社出版。

焦敏之译《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德〕恩格斯著)(第1册),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

章汉夫与许涤新合译《恩格斯论〈资本论〉》(〔德〕恩格斯著),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艾思奇与柯柏年、景林合译《马恩通信选集》(〔德〕马克思、恩格斯著),由解放社出版。

郭大力译《资本论通信集》(〔德〕马克思、恩格斯著),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由新华日报社出版。

1940 年　10 月,金人译《静静的顿河》(第 1 册)(〔前苏联〕肖洛霍夫著),由光明书局出版。

同年,柯柏年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德〕马克思著),由解放社出版。

吴文涛译《英国工人运动》(〔德〕恩格斯著),由延安中国工人社出版。

柯柏年译《列宁选集》(〔前苏联〕列宁著)(第 2 卷),由解放社出版。

1943 年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其中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为此特定凯丰、博古、洛甫、杨尚昆、师哲、许之桢、赵毅敏等同志组织一翻译校阅委员会,由凯丰同志负责组织这一工作。"

同年,杨宪益将《老残游记》(〔清〕刘鹗著)译为英文,在英国出版。

博古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恩格斯著),由解放社出版。

博古译《共产党宣言》(〔德〕马克思、恩格斯著),由解放社出版。

博古译《国家与革命》(〔前苏联〕列宁著),由解放社出版。

1944 年　3 月,曹禺译《罗密欧与朱丽叶》(〔英〕莎士比亚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10 月,赵瑞蕻译《红与黑》(〔法〕司汤达著),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

1945 年　何锡麟译《列宁选集》第 1 卷下册和第 16 卷,由解放社出版。

1946 年　4 月,磊然译《日日夜夜》(〔前苏联〕西蒙诺夫著),发表于《苏联文艺》第 20 期。

6 月,水夫译《青年近卫军》(〔前苏联〕法捷耶夫著),开始连载于《苏联文艺》第 21 期。

同年,解放社出版《列宁选集》第 18 卷。张仲实译《论民族殖民地问题》(〔前苏联〕列宁著),由解放社出版。

博古译《卡尔·马克思》(〔前苏联〕列宁著),由解放社出版。

唯真译斯大林著《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列宁主义问题》,均由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

1947 年　6 月,郭沫若译《浮士德》(〔德〕歌德著)第 2 部,发表于 1947 年 6 月 30 日《文萃丛刊》。

同年,戈宝权译《普希金文集》,由时代出版社出版。

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三辑)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1948 年　曹葆华与于光远合译《从猿到人》(〔德〕恩格斯著),由解放社出版。

周建人译《新哲学手册》(〔德〕马克思、恩格斯著),由上海大用图书公司出版。

1949 年　4 月至 11 月,解放社出版《列宁文选》(共 6 册),根据莫斯科中文版《列宁文选》两卷集翻印。

5 月,郭大力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德〕马克思著),由上海实践出版社出版。

6 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俄文编译局。其任务是负责全国的俄文教学和俄文干部的调配,协助中央解决俄文翻译中的各种问题,翻译马列主义著作。师哲任局长,张锡俦、王一飞任副局长。同年,中宣部设立斯大林全集翻译室,负责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工作。

9 月,解放社出版《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德〕恩格斯著,张仲实译)。解放社出版《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下册)。

9 月,解放社出版《哲学底贫困》(〔德〕马克思著,何思敬译)。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正式成立。局长乔冠华,副局长刘尊棋,秘书长冯亦代。本年,该局以外文出版社名义用英、法、俄、印尼四种外文翻译出版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八种图书。

1950 年　1 月 1 日,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英文半月刊创刊。

5 月,中宣部英译《毛泽东选集》委员会成立,徐永瑛任主任。陆续参加该委员会的学者有金岳霖、钱锺书、王佐良等,以及唐明照、浦寿昌、章汉夫、冀朝鼎等。

5 月 15 日,对外传播刊物《人民中国报道》世界语月刊创刊。

7 月 1 日,出版总署翻译局出版《翻译通报》第一期(非卖品)。该刊发表沈志远的发刊词。该刊宗旨是:加强翻译工作者的联系,交流翻译经验,展开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翻译水准。

1951 年　1 月,《翻译通报》开始公开发行。对外宣传刊物《人民画报》英文版创刊,刊名用 *China Pictorial*,是我国出版的第一个外文版画报。该刊英译稿由国际新闻局编撰处英文组承担。后来又增出蒙古文、维吾尔文和藏文版,由民族出版社协助《人民画报》编辑部出版;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俄文版(半月刊)创刊。

2 月,由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负责编译的《学习译丛第 1 辑》由学习杂志社出版。

4 月,《翻译通报》主编董秋斯在该刊第 2 卷第 4 期上发表题为《论翻译理论的建设》的长篇论文,首次鲜明地提出建立翻译学的卓见,标志着我国译学史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

4 月 19 日,出版总署翻译局举行"五四"翻译座谈会。会议由叶圣陶主持。讨论提纲:一、"五四"以来的翻译有哪一些优点应当保持;二、有哪些缺点应当革除;三、从"五四"以来的翻译经验,谈今后的翻译计划;谈今后的翻译标准;谈今后的翻译组织。出

席者有黎锦熙、朱光潜、冯至、曹靖华、季羡林、曹汀、高名凯、陶大镛等一百余人。

7 月,《人民画报》增出俄文版。

9 月,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傅雷"神似"论此后在译界产生深远影响。

10 月 15 日出版的《翻译通报》第 3 卷第 4 期发表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特辑稿。其中有:鲁迅论翻译批评;论吸收新表达法;鲁迅怎样组织和领导翻译工作;学习鲁迅一丝不苟的精神。

10 月,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文学》英文版创刊。

同年,出版总署举行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被邀请的代表 165 人。由胡愈之致开幕词;沈志远做《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的报告,叶圣陶致闭幕词。会议期间的专题报告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问题》(柯柏年);《苏联为何进行翻译工作》(张锡俦);《关于机关编译机构中的翻译工作》(曹汀);《人民大学的翻译工作》(樊以楠)。

同年,国际新闻局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用英、法、俄、印尼、德、阿拉伯等六种外文翻译出版 30 种图书。

1952 年 1 月,《中国建设》英文版创刊。这本综合性、通俗性的对外宣传刊物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创办,中国建设杂志社编译,中国福利会出版。宋庆龄亲自选定《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刊名,并为刊物制定了编辑方针: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新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中国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

7 月 1 日,国际新闻局正式改组为外文出版社。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俄、印尼、德、世界语等六种文字翻译出版《实践论》、《矛盾论》等 26 种图书。

同年,我国有四个国营电影制片厂开始用蒙古、维吾尔、朝鲜等民族语言译制国产和进口影片。

1953 年 1 月 15 日,民族出版社在北京成立。该社主要任务是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种文字翻译出版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领导人的重要著作以及其他各类图书。周恩来题写了汉文社名。

1 月 29 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在北京成立。其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编译局直属中共中央,师哲任局长,陈昌浩、姜椿芳任副局长。

3 月,马克思《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第 1 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第 2 卷、第 3 卷分别于 5 月、12 月出版。

6 月 5 日,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日文版正式创刊。政务院文委主任郭沫若为该刊撰写发刊词。

7 月,《译文》创刊,茅盾致发刊词,主要是翻译介绍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

9 月,《人民画报》增出朝鲜文版(延边语)。

9 月,由中央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 卷问世。到 1958 年,《斯大林全集》中文版 13 卷出齐,共计 336.6 万字。

12 月,《列宁文选》(两卷集)第 1 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2 卷于 1954 年 2 月出版。

12 月,《列宁文集》第 1 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2 册至第 7 册于 1954 年出版。

12 月,《共产党宣言》(〔德〕马克思、恩格斯著,成仿吾、徐冰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同年,包尔汉翻译编著的工具书《维汉俄辞典》,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维吾尔文辞书。

同年,外文出版社以英、法、俄、印尼、德、世界语、阿拉伯等七种文字翻译出版 50 种图书。其中有毛泽东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54 年 1 月,《人民画报》增出日文版、法文版。7 月增出西班牙文版。

8 月,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8 月 19 日茅盾在会上作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郭沫若发表题为《谈文学翻译工作》的讲话。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种文件由民族出版社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文字翻译出版。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度、阿拉伯、德等七种文字翻译出版 76 种图书,其中有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以及《鲁迅短篇小说选》、《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丁玲著)等。

《俄文教学》第 3 期上发表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校审室的一篇文章:《集体译校斯大林全集第一、第二卷的一些体验》。文中提到"信达雅"的辩证统一,是译校工作必须遵守的原则,接着对"信达雅"作了解释。于是便引发了一直持续到 1955 年底的一场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辩。如,《俄文教学》1955 年第 5 期发表陈殿兴的文章《信达雅与翻译准确性的标准》,与编译局校译室的文章针锋相对。第 6 期发表了何匡的《论翻译标准》一文,从正面分析了翻译对象的要素,对"信达雅"作出了新的解释。

1955 年 2 月,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为外文出版社主持召开《宋明平话小说选》的翻译出版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李季、钟敬文、李长元、严敦易、黄药眠、范宁、叶君健、张天翼、浦江清、杨宪益等知名人士。

5 月,《民族画报》在北京创刊。该刊系反映我国民族工作和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大型画报。用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六种文字翻译出版。周恩来为画报汉文版题写了刊名。

12 月,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全集》第 1 卷问世。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德、日、印尼、阿拉伯等八种文字翻译出版 129 种图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毛泽东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著)、《暴风骤雨》(周立波著)、《长生殿》(〔清〕洪昇)。

《翻译理论概要》(〔前苏联〕费道罗夫著,李流等译)在北京出版,苏联的等值论系统引进我国。(此前

有文章零星介绍)

1956 年 中央编译局夏季召开两次翻译标准座谈会,译界名流在会上的发言,大部分倾向于在新的解释下沿用"信达雅"或"信达"作为翻译标准,也有人主张用费道罗夫的翻译等值论的定义作为翻译标准。

11 月 16 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局成立。

1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出版。从 1956 年到 1974 年,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至第 39 卷的编译和出书任务。从 1977 年起,用七年时间又翻译了 11 卷(共 12 册)补卷。1985 年 1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 50 卷全部出齐,总字数达 32 000 万字。

同年,《人民画报》增出越文版、德文版。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越、泰、缅、德、汉等 11 种文字翻译出版 191 种图书。其中有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

1957 年 9 月,《人民画报》增出印地文版。

11 月,《五体清文鉴》由民族出版社影印出版。这是一部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满、藏、蒙古、维吾尔、汉五种文字对照的分类辞书,共收词 1.8 万多条。约成书于清乾隆末年(1795 年)。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越、泰、缅、印地、德、世界语、汉 13 种文字翻译出版图书 182 种。其中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孙中山纪念文集》、《中国的佛教》、《鲁迅选集》第 2 卷、《子夜》(矛盾著)、《儒林外史》、《关汉卿杂剧》等。

同年,我国的机器翻译研究工作开始。

195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 月,《人民中国》增出印尼版。《人民中国》英文版停刊。

3 月 4 日,《北京周报》英文版创刊。这是建国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本外文时事政策性周刊。郭沫若为该刊题写中文刊名。

10 月,《人民中国》增出法文版。

12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拜集》(〔波斯〕莪默·伽谟著,郭沫若译)。

1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为外国文学研究所)组建编委会,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后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翻译编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后增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这三套丛书是国内迄今最系统、规模最大的丛书。编委有:巴金、钱锺书、朱光潜、季羡林、李健吾、楼适夷、杨宪益等,主持编委会工作的先后为冯至、蔡仪、卞之琳、罗大冈、戈宝权、叶水夫。

同年,商务印书馆由文化部领导,确定该馆出版任务为"以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任命郭敬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翰伯为总编辑。该年该馆出版译著 15 种。其中有:《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伦理学》(斯宾诺莎著,贺麟译)。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越、缅、印地、乌尔都、德、荷兰、阿拉伯、古加拉提、汉等 15 种文字翻译出版 384 种图书。其中有毛泽东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郭沫若的《女神》、曹禺的《雷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及《简明中国历史》、《汉魏六朝小说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等。

1959 年 10 月,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已完成《列宁全集》38 卷的出版计划,1963 年又出版了第 39 卷。整个《列宁全集》中文第 1 版 39 卷共计 1 500 万字。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越、缅、印地、乌尔都、匈牙利、德、荷兰、芬兰、阿拉伯、世界语、汉等 17 种文字翻译出版 399 种图书。其中有《毛泽东诗词》(19 首)、周恩来的《伟大的 10 年》以及《鲁迅选集》(第 3 卷)、巴金的《家》、《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哲学史略》。

1960 年 1 月,《人民画报》增出瑞典文版。《中国建设》增出西班牙文版。

4 月,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选集》问世,共 4 卷,约 258 万字。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德、日、朝、越、缅、印地、印尼、乌尔都、阿拉伯、荷兰、世界语、汉等 16 种文字翻译出版 388 种图书。

1961 年 4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泰戈尔作品集 10 卷,共 143.9 万字,由石真等人翻译。

4 月,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4 卷英文版问世;在 1965 年又出版了选集第 1 卷、第 2 卷、第 3 卷英文版;在 1977 年出版了第 5 卷英文版。选集的俄、法、西、日文版也相继出版。

9 月至 1962 年 1 月,文化部和中央民委先后举行九次座谈会,邀请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委员会、在京语言学家、《毛泽东选集》外文版及民族文字版翻译负责人,就《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各民族文字版翻译中提出的问题座谈讨论,以解决少数民族文字翻译问题。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越、缅、印地、乌尔都、德、荷兰、阿拉伯、世界语等 14 种文字翻译出版 202 种图书。

1962 年 2 月,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印书消息》。

3 月,《莎士比亚戏剧集》(共 12 册,朱生豪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4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编译局设立毛泽东著作翻译室,1982 年改称中央文献翻译室。先后翻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军事文选》、《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江泽民文选》以及历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和其他重要文件的英、法、俄、西、日五种文字的译本。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文选》(王惠德主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8 月,中央编译局编成《斯大林文选》(1934～1952),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两卷,1985 年又出版了一卷本的《斯大林文集》(1934～1952)。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马恩列斯论德国古典哲学》、《自然宗教对话录》(〔英〕休谟著,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法〕卢梭著)等译著 63 种。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越、泰、缅、印地、德、荷兰、瑞典、阿拉伯、世界语等 15 种文字翻译出版 155 种图书。

1963 年 1 月 6 日,傅雷在写给罗新璋的一封信中提出:"愚对译事刊发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这一名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3 月,《果戈里小说戏剧选》(满涛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3 月,《北京周报》增出西班牙文版、法文版。

4 月,《中国建设》增出法文版。

8 月,《中国周报》增出日文版。

9 月,经国务院批准,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在京成立,直属国务院。该局任务之一是对我国外文书刊的出版进行总体规划。罗俊任局长,阎百真、江牧岳任副局长。

同年,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选》英文版问世。该书的法、俄、西、日文版也相继出版。

同年,商务印书馆制定《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1963～1972)规划》,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各流派、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学科,列入选题 1 378 种。同年,该馆出版《泰阿泰德 · 智术之师》(〔古希腊〕柏拉图著,严群译)、《忏悔录》(〔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周士良译)、《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阿奎那政治著作选》(〔法〕伽森狄著,庞景仁译)、《互助论》(〔俄〕克鲁泡特金著,李平沤译)等译作 85 种。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朝、越、泰、缅、印地、乌尔都、波斯、土耳其、捷克、塞尔维亚、德、意大利、葡萄牙、阿拉伯、世界语等 21 种文字翻译出版 388 种图书。

1964 年

1 月,《北京周报》印尼文版正式出版;法文版、西文版由双周刊改为周刊;9 月,增出德文版。

1 月,《中国文学》增出法文版。

1 月,《人民画报》朝文版(平壤语)正式出版;3 月,增出斯瓦希里文版;9 月,增出意大利文版。

3 月,《中国建设》增出阿拉伯文版。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越、泰、缅、印地、乌尔都、波斯、土耳其、塞尔维亚、德、意大利、葡萄牙、瑞典、阿拉伯、斯瓦希里、世界语等 21 种外文翻译出版图书 644 种。

同年,钱锺书发表《林纾的翻译》一文,提出"化境"的翻译理论。

1965 年 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朝、越、泰、缅、印地、乌尔都、波斯、塞尔维亚、德、意大利、葡萄牙、瑞典、阿拉伯、斯瓦希里、世界语等 22 种文字翻译出版图书 491 种。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编》,全书收人名 7 500 余条。同时出版王亚南主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革命法制与审判》(〔法〕罗伯斯比尔著)、《善的研究》(〔日〕西田几多郎著)等译著 31 种。

同年,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出版《毛泽东选集》第 1 至 4 卷蒙古文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

1966 年 3 月,《世界文学》杂志停刊。

9 月 3 日凌晨,翻译家傅雷在上海的寓所悴然逝世,享年 58 岁。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著 10 种。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朝、越、泰、缅、印地、乌尔都、波斯、德、意大利、葡萄牙、瑞典、阿拉伯、斯瓦希里、世界语、汉等 21 种文字翻译出版 394 种图书。

1967 年 1 月,为加强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外文出版社先后设立了德、阿拉伯、意大利、印地、葡萄牙、乌尔都、印尼、世界语、斯瓦希里、豪萨、孟加拉、老挝、蒙古、朝鲜、罗马尼亚、普什图、波斯等 17 个语种的《毛泽东选集》翻译室。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蒙、越、缅、印地、尼泊尔、乌尔都、波斯、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德、意、葡萄牙、瑞典、挪威、阿拉伯、斯瓦希里、豪萨、世界语、汉等 25 种文字翻译出版 301 种图书。其中有《毛泽东选集》1 卷俄文版,《毛泽东选集》1、2、3、4 卷缅文版,《毛泽东军事文选》西文版、《毛主席语录》、《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等。

1968 年 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朝、蒙、越、老挝、泰、缅、孟加拉、印地、泰米尔、乌尔都、波斯、土耳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匈牙利、塞尔维亚、德、意大利、葡萄牙、瑞典、阿拉伯、斯瓦希里、豪萨、世界语等 32 种外文翻译出版 767 种图书。

1969 年 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朝、蒙、越、老挝、泰、缅、孟加拉、印地、尼泊尔、泰米尔、乌尔都、波斯、普什图、土耳其、希腊、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大利、葡萄牙、瑞典、挪威、阿拉伯、斯瓦希里、豪萨、世界语等 32 种文字翻译出版 815 种图书。

1970 年 11 月,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由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译成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出版发行。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朝、蒙、越、老挝、泰、缅、孟加拉、印地、泰米尔、乌尔都、波斯、土耳其、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德、意大利、葡萄牙、瑞典、阿拉伯、斯瓦希里、豪萨、世界语等 28 种文字翻译出版 533 种图书。

1971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光潜主编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一书。同年该馆出版译著仅4种。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朝、菲律宾、蒙、越、老挝、泰、缅、孟加拉、印地、泰米尔、乌尔都、波斯、土耳其、罗马尼亚、德、意大利、葡萄牙、阿拉伯、斯瓦希里、豪萨、世界语等27种文字翻译出版图书245种。

1972年 5月,由中央编译局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4卷)问世。

同年,全国14家出版社联合翻译出版国别史,商务印书馆分担41种。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等译作17种。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朝、菲律宾、蒙、越、老挝、泰、缅、孟加拉、印地、尼泊尔、泰米尔、乌尔都、土耳其、罗马尼亚、希腊、德、意大利、葡萄牙、挪威、阿拉伯、斯瓦希里、豪萨、世界语、汉等30种文字翻译出版371种图书。

1973年 商务印书馆译印沙俄侵华史料,先后共出版52种。同年,该馆出版译著34种。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日、朝、蒙、越、老挝、泰、缅、孟加拉、印地、泰米尔、乌尔都、波斯、土耳其、罗马尼亚、德、意大利、葡萄牙、阿拉伯、斯瓦希里、豪萨、世界语、汉等26种文字翻译出版209种图书。

1974年 5月,联合国资料小组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翻译联合国文件座谈会,有13个省市的教育局和21所院校参加。

9月,联合国翻译司司长苏珊·福格斯应邀访华。

9月,国务院科教组在京召开少数民族语文教材工作座谈会,就少数民族语文教材的改革、编写、编译、印刷、出版、发行和加强领导等问题进行讨论。

同年,全国17家出版社联合翻译出版国别地理,商务印书馆分担20种。

同年该馆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共6卷)(〔英〕丘吉尔著)等译著18种。

同年,外文出版社以英、法、西、俄、日、越、老挝、泰、缅、印地、泰米尔、乌尔都、波斯、德、意大利、葡萄牙、阿拉伯、斯瓦希里、豪萨、世界语、汉等22种文字翻译出版247种图书。

同年,联合国翻译司司长苏珊·福格斯致函我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大使,要求协助安排翻译和印制联合国文件。经国务院批准,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所属45所大专院校协助联合国资料小组分担翻译联合国文件。

同年,成仿吾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表示要在有生之年,翻译几本马恩著作。

1975年 1月,联合国资料小组在天津召开第二次翻译联合国文件座谈会,有18个省市教育局和38所院校参加。

6月,马克思《资本论》(中央编译局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3卷。

7月,马克思《数学手稿》由北京大学《数学手稿》编译组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月,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等五省、自治区首次藏文图书翻译出版协作会议在拉萨举行。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日、朝、印尼、越、老挝、泰、缅、孟加拉、印地、泰米尔、乌尔都、波斯、罗马尼亚、德、意大利、葡萄牙、瑞典、阿拉伯、斯瓦希里、豪萨、世界语、汉等26种文字翻译出版308种图书。

1976年 2月,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成立了包括法、德、俄、西、葡萄牙、日、朝、越、缅、泰、印尼、印地、乌尔都、阿拉伯、世界语16种文字的《毛主席诗词》翻译班子。《毛主席诗词》除日文版出42首本外,其余各文种均出39首本。

4月,经国务院批准,"联合国资料小组"改名为"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主任为缪群,副主任为王泰雷、崔烈、何卓云。

4月,《毛泽东诗词》(三十九首)英文版出版。

8月,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问世。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等译)(3卷)等译著25种。

同年,《共产党宣言》经成仿吾校正,朱德同志过目,在中央党校印书试用。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印尼、日、朝、越、老挝、柬埔寨、泰、缅、孟加拉、印地、乌尔都、波斯、德、意大利、葡萄牙、瑞典、阿拉伯、斯瓦希里、豪萨、世界语、汉等25种文字翻译出版232种图书。

1977年 4月,在桂林召开第三次翻译联合国文件座谈会,有22个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局和45所院校参加。

7月,《北京周报》增出阿拉伯文版双周刊。

9月,《人民画报》增出罗马尼亚文版。

11月,中央编译局将未收入《列宁全集》第1版的列宁文献编为《列宁文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17卷,参加这一工作的有北京外国语学院、复旦大学外文系、上海外国语学院等10所院校。

同年,藏文译本《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德、印尼、日、朝、菲律宾、越、老挝、泰、缅、孟加拉、印地、乌尔都、波斯、意大利、葡萄牙、阿拉伯、斯瓦希里、世界语等22种文字翻译出版403种图书,879万余册。

1978年 1月,《中国建设》增出德文版双月刊。

2月,《马克思恩格斯论翻译》由人民出版社编印出版。

3月,《北京周报》增出葡萄牙文版。

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全集共11卷,约267万字,由朱生豪等人翻译。

6月,商务印书馆编《译书消息》(由茅盾题签)复刊第一期出版,继续报道国内几家出版社有关外国哲

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情况。

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系统介绍当代外国文坛优秀作家和佳作的《外国文艺》(双月刊)创刊号。

9月，《毛泽东诗词》(39首)德文版、法文版由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

10月，在镇江召开第四次翻译联合国文件座谈会，有22个省、市、自治区的48所院校参加。

10月，《人民画报》蒙文版、维吾尔文版、藏文版复刊，增出哈萨克文版。这四种文版由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

1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十字军骑士》(〔波兰〕显克微支著，陈冠商译)。

11月，中共中央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民族语文翻译局在北京成立。

11月，蒙古文版《世界文译丛》(季刊)在呼和浩特出版发行。

12月，由中央编译局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丛刊第一辑问世。

同年，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期刊《世界文字》杂志复刊，冯至任主编，陈冰夷任副主编。

同年，藏文译本《水浒》(全四册，120回)，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年至1979年，外文出版社先后翻译出版了《红楼梦》英文版第1、第2卷，由杨宪益、戴乃迭翻译。

同年，国家出版局重新确认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任务，仍为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和编印中外语文词典等工具书。该馆同年出版《爱弥儿》(〔法〕卢梭著)等译作46种。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日、朝、越、老挝、泰、缅、印地、乌尔都、波斯、德、意大利、葡萄牙、阿拉伯、斯瓦希里、豪萨、世界语等20种外文翻译出版276种，618万余册图书。

同年，金隄在《联合国文件翻译简报》上发表的《论翻译的准确性》一文中提出了"等效翻译"，后在1984年与奈达合著 *On Translation* (英文版)，系统地阐述了等效翻译理论。

同年，许渊冲在《毛主席诗词四十二首》英、法文格律体序言中提出诗词翻译"三美"论。

1979年 1月，张明益以《翻译的理论与技巧》为题，在《国外语言学》第1期上首次译述纽马克的部分翻译语言学理论。

2月，刘重德在《湖南师院学报》第一期上发表《试论翻译的原则》一文，最初提出"信达切"的翻译原则(此后又著文、著书重申)。

3月，对外宣传刊物英文版《中国妇女》复刊。

同年，《语言学动态》(1980年起改名为《国外语言学》)第2期发表郑南渡的《奈达》一文，介绍奈达其人其事其理论，拉开了我国引介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序幕。

8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改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副经理为缪群、崔烈、何卓云。

11月，外国文学季刊《译林》在南京创刊。该刊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以译介当今外国健康的通俗文学为重点。李景瑞任主编。

同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承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月刊《信使》中文版翻译、出版和发行工作。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日、朝、老挝、泰、孟加拉、印地、乌尔都、德、意大利、葡萄牙、阿拉伯、斯瓦西里、世界语、汉等18种文字翻译出版了220种图书，322万余册。

同年，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和上海海运学院开始招收翻译方向的硕士生。

同年，塞莱丝科维奇的《口译技巧》(孙慧双译)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法国释义派理论引入我国。

1980年 1月，《水浒传》翻译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在乌鲁木齐出版发行。

1月，《翻译通讯》杂志在京复刊。这是继建国初期的《翻译通报》后，翻译界又开始有了一个交流心得、探讨学术和开展翻译批评的园地。

7月，联合国《信使》月刊中文版正式创刊。

8月，喀喇汗王朝时期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编著的《突厥语大辞典》(成书于11世纪)现代维吾尔文译本第1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出版全三集。

8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公司在芝加哥正式签订合作出版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协议。这是中国以百科全书形式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第一次尝试。根据协议，美方提供条目修订稿、照片、图表等资料；我方承担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版权共有，出版后在国内外公开发行。

9月，外文出版社出版《红楼梦》英文版第3卷，由杨宪益、戴乃迭翻译。

同年，《中国银幕》(英文版)复刊。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日、朝、泰、孟加拉、印地、乌尔都、德、意、葡萄牙、荷兰、阿拉伯、斯瓦西里、世界语、汉等17种文字翻译出版了255种图书，251万余册。

1981年 7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承接翻译和出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八卷集《非洲通史》中文版的工作。

10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陆续翻译出版发行。

12月，外文出版社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水浒传》1、2、3卷英文版。

同年，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英文版问世。该书下卷于1989年出版，法、西、俄、日文版也相继出版。

同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法、西、俄、德、日、阿拉伯、朝、泰、印地、乌尔都、斯瓦希里、孟加拉等13种文字翻译出版269种图书。

1982年 6月，经中央宣传部批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在京成立。国务院领导同志王震、乌兰夫、薄一波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章程和领导机构成员名单，名誉会

长为《共产党宣言》最早译者之一成仿吾，会长为老翻译家姜椿芳，秘书长刘德有。

8月，谭载喜在《翻译通讯》第4期发表《翻译是一门科学——评介奈达著〈翻译科学探索〉》，开始介绍奈达的翻译理论。

8月，外国科普作品引进学术会议在昆明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外国科普作品翻译研究委员会主持召开，着重讨论了有关科普作品引进的方针、任务。

10月，高等院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汉英翻译教程》审稿会议在西安举行，会议由主审人之一许国璋主持。该书主编为吕瑞昌。

11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北京翻译工作者协会联合举行首都部分翻译界人士座谈会，讨论翻译界如何贯彻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问题。座谈会由中国译协会长姜椿芳主持。

11月，《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共4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2月，蔡毅在《翻译通讯》第6期发表《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介绍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开始介绍前苏联新一代的等值论。此后，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蔡毅等译）于1985年在北京出版。

同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编委会成立，主任冯至，副主任季羡林、叶水夫。

同年，商务印书馆编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50种），出版译著94种。

同年，外文局所属七个出版单位，共编译、出版各类图书458种。

1983年　1月，《翻译通讯》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接办，改为协会会刊（月刊），出版改版后的第1期。

3月14日，为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共中央编译局与有关单位合作，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了《马克思生平事业展览》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两个大型展览会。

3月，上海翻译出版公司正式成立。该公司主要从事翻译出版经济、管理、法律、国际时事、科学技术、医药保健、文化教育、音乐美术等各类书籍；同时出版向国外介绍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和优越的投资环境等方面的图书；并出版发行《上海译报》（周报）、《创业者》（双月刊）、《上海科技翻译》（季刊）、《自然科学年鉴》等期刊杂志；同时出版发行《音响与电视》、《当代主治医师》、《香港问题》等丛书。贺崇寅任公司总经理、总编辑。

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5月11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创作会议在贵阳花溪召开。

5月20日，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伍修权到会祝贺，并就翻译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大会由中国译协会长姜椿芳主持，中国译协秘书长刘德有代表常务理事会作了会务报告。

9月5日至29日，北京大学西语系举办英语翻译理论讲座，邀请美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讲学。

9月7日，中国译协和北京市译协联合举办形势报告会。程镇球作《关于政论文汉译英问题》的专题报告。

10月11日，维吾尔文版《邓小平文选》在乌鲁木齐发行。

10月15日，中央编译局在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举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展览会，历时一个月。

11月28日，中国译协理事戈宝权、高莽应前苏联作家协会的邀请前往莫斯科参加第六届苏联文学翻译家国际会晤。

同年，《高尔基文集》（第8、第9、第10、第17、第18、第19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同年，商务印书馆编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二辑（50种），出版《苏格拉底的申辩》（〔古希腊〕柏拉图著）、《西方哲学史》（〔英〕罗素著）、《地理学思想史》（〔美〕詹姆斯著）等译著152种。

同年，文物局所属八个出版单位，共翻译、出版各类图书691种。

1984年　1月，《周恩来选集》上卷英、法、西、日、俄五种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1月，全国翻译导游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万里、邓力群、胡愈之、杨静仁等领导到会祝贺。中共中央编译局顾问、中国译协会长姜椿芳代表四个举办单位致祝词。

1月，王佐良在《翻译通讯》第1期发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王佐良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翻译中的文化问题的学者之一。

3月15～20日，中国译协理事、翻译家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中国译协理事、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赵瑞蕻应邀前往新德里参加印度首届国际翻译文学讨论会。

5月17日，中国译协名誉会长、《共产党宣言》中文版译者、老一辈革命家、翻译家成仿吾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5月，中国译协《翻译通讯》编辑部编辑出版《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上、下册。

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新璋编《翻译论集》，选收公元3世纪至20世纪80年初期翻译研究的重要著述。编者在开篇"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提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印度蚁垤名著《罗摩衍那》（从1980年7月至1984年6月，分8册出版），本书由著名翻译家、学者季羡林翻译，共278.5万字。

6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翻译出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理论刊物《教育展望》中文版（季刊），梅祖培任主编。

7月5日，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药物志《中国民

族药志》第一卷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该书计划编辑五卷，除汉文版外还将翻译出版蒙古、藏等少数民族文字版和英文等外文版。

7 月，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以“翻译理论与实践”这个二级学科为专业的两个硕士点：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上海海运学院。

8 月，外文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选》和《彭德怀自述》英文版以及《彭德怀自述》日文版。

10 月，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 至第 4 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至 1990 年 12 月，新版 60 卷由人民出版社出齐。

11 月，全国二十五省、市、自治区科技翻译经验交流会在成都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翻译界的首次全国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宗旨是：探讨科技翻译问题，介绍外国科技翻译情况，交流科技翻译经验。

同年，商务印书馆编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三辑(50 种)，出版译著 87 种。

同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翻译出版《联合国纪事》中文版。

同年，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英文版问世，法、西、俄、日文版也相继出版。

同年，文物局所属八个出版单位，共翻译、出版各类图书 815 种。

1985 年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成立，由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任主任委员。预计到 1989 年可审定公布 9 个学科的基本词。

1 月，上海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省市级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由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著名科学家、中国译协副会长钱伟长教授任名誉会长，刘祖慰任会长。

1 月，新疆《语言与翻译》杂志汉文版在乌鲁木齐创刊。

4 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在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著名美国文学研究学者吴富恒、陈嘉、杨周翰、杨岂深、周珏良、巫宁坤、戴镏龄、黄嘉德、林疑今、汤永宽、赵萝蕤等共 120 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6 月 25 日，经中国译协第十次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会顾问为德林、李大万、金万善、哈米提，主任为苏荣，副主任为乌布利，秘书长为戴贤。

6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高尔基文集 20 卷(从 1981 年 6 月开始出版)，本文集由多名翻译家翻译，共 800 万字。

7 月，全国中青年文学翻译经验交流会于山东烟台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举行的全国性中青年文学翻译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探讨文学翻译问题，交流翻译经验和体会，研究翻译技巧。

全国第二次科技翻译经验交流大会在秦皇岛召开。来自全国科技翻译战线的近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8 月，第一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讨论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出席会议并致贺词，中国译协会长姜椿芳和国家民委文化司司长贾春光在会上讲了话。

11 月，《翻译通讯》杂志在 1985 年第 11 期和 12 期发表钱锺书文章《林纾的翻译》。

同年，邓小平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英文版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外文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法、西、俄、日等文版也相继出版。

同年，文物局所属八个单位，共翻译、出版各类图书 1 250 种。

1986 年 4 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在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会议。杨尚昆、伍修权、邓力群、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领导同志出席并致词祝贺，中国译协会长姜椿芳在会上作了题为《团结起来，开创翻译工作新局面》的报告。大会通过了翻译工作者协会章程、聘请老一辈翻译家严济慈、巴金、伍修权为中国译协名誉会长并选举了中国译协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和领导机构成员。

5 月，《上海科技翻译》创刊。这是由上海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一本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讨论翻译工作和翻译理论的专业性刊物。江泽民同志在创刊号上的题词为“促进中外信息交流，推动我国科技发展”，中国译协会长姜椿芳的题词为“科技翻译信息新，科技翻新四化成”，上海市科技译协名誉会长、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

6 月，经中国译协第十次常务理事会议研究通过，并经国家出版局批准，中国译协会刊《翻译通讯》自 1986 年起更名为《中国翻译》，由月刊改为双月刊。

10 月，第三次全国科技翻译学术研讨会在安徽屯溪召开，这次大会以分组进行学术交流为主，国务委员方毅、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理事长武衡等为大会发来了贺词和贺信。

西班牙大使乌塞莱以该国国王卡洛斯的名义向杨绛颁授“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杨绛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中国译协名誉理事，是著名的作家、文学翻译家。

11 月，全国外事口译工作经验交流会在西安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我国翻译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49 篇，其中中青年翻译工作者所写论文占 80%。

11 月 6 日至 12 日，应中国译协等五个单位的邀请，国际著名口译翻译家、法国巴黎第三大学高等翻译学院院长塞莱丝科维奇教授来华访问、讲学，先后在上海、西安、北京等地作了有关翻译问题的学术报告。

11 月 26 日，中国译协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成立，叶水夫任主任。

12 月 2 日，为感谢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和文学翻译家萧乾介绍挪威剧作家亨利·易卜生的诗剧《培尔·金特》所作出的贡献，挪威王国驻华使馆举行授勋仪式。阿内森大使代表奥拉夫五世国王陛下，将挪威国家勋章授予萧乾。

12 月 12 日，中国译协社会科学翻译委员会成立，宋书声任主任。

同年,商务印书馆编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四卷(50种)。

同年该馆出版《理想国》(〔古希腊〕柏拉图著)、《思想录》(〔法〕帕斯卡尔著)、《论世界帝国》(〔意〕但丁著)、《农业志》(〔古罗马〕加图著)、《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法〕基佐著)等译著98种。

1987年　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召开授奖大会,授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江西省译协会长王贤才医学翻译工作特别奖。表彰他用四年时间完成了美国医学巨著《希氏内科学》第15版的翻译工作。该书共470万字。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译完该书第15版的国家。

2月,经法国国民教育部批准,巴黎第八大学授予我国著名学者、翻译家戈宝权"荣誉博士"学位。

3月30日,军事科学院邀请军内外23个单位的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语言科学、数学、翻译等方面的专家30人,对该院运筹分析研究所研制的"科译1号"英汉机器翻译系统进行技术鉴定。

4月14日,中国译协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译协名誉会长伍修权、会长姜椿芳、名誉理事长张伯衡到会并讲话。中国译协常务副秘书长林煌天、军事科学院领导及军队系统驻京单位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

5月,桂乾元在《中国翻译》第3期发表《联邦德国的三位翻译家》,首次引进德国功能翻译理论。

5月,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收到论文35篇,涉及中、英、日、法、德、俄六个语种的翻译。

8月20日至27日,第一届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在青岛举行,首次有组织地对译学理论进行了研究讨论。

8月,国际译联第十一次世界大会在荷兰玛斯特里赫特市举行。中国译协代表团由浦寿昌、叶水夫任正副团长。团员林煌天、罗进德。会上,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译联。

10月,全国社会科学翻译经验交流会在贵阳举行。会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科翻译的成果,研讨社科翻译的问题,交流了经验。

11月,全国外事口译经验交流会在西安举行。

12月17日,著名翻译家和编辑出版家、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人、中国译协会长姜椿芳因病医治无效于在京逝世,享年75岁。

12月17~21日,香港当代翻译研讨会在香港大学举行,中国译协副会长、著名翻译家李越然、段连城等46人出席会议。

同年,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成立。该公司翻译出版理、工、农、医等学科的应用科学技术和实用技术书籍;基础理论和技术理论书籍;经济管理的书籍及科学普及读物。

同年,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授予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德国文学研究专家冯至1987年艺术奖。

同年,邓小平著《论当代中国基本问题》英文版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外文出版社出版。该书法、西、俄、日文版也陆续出版。

同年,外文局所属11个出版单位,共翻译、出版各类图书1065种。

1988年　1月15日,邓小平《论当代中国基本问题》俄文版,在前苏联出版发行。

2月,由中国译协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和《国外文学》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亚洲国家当代文学翻译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深入讨论了如何进一步促进亚洲国家当代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问题。

3月,中国译协第二届常务理事会七次会议决定译协会长职务由副会长叶水夫代理,增补文化部外文局局长林戊荪为副会长。

6月,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申请加入国际译联,这是继中国译协加入该组织后我国的第二个团体会员。(按国际译联规定,一个国家只能有两个团体会员参加该组织)。

联邦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特奥多代表魏茨塞克总统授予著名翻译家、中国译协名誉理事、南京大学外文系张威廉大十字级勋章,以表彰他在中德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

7月,《中国翻译家词典》出版。该词典由中国译协组织编纂,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10月,全国文学翻译研讨会在长沙召开,中国译协副秘书长兼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孙绳武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会议围绕文学翻译的选题、当前译文的质量、文学翻译队伍及翻译评论工作等四个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第二次全国中青年文学翻译经验交流会在桂林召开。与会代表在会上交流了翻译经验,探讨在改革中如何培养、团结青年文学翻译队伍,提高翻译质量,繁荣文学翻译事业等问题。

同年,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刊《中国科技翻译》(季刊)创刊。

同年,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陈云文选(1926~1949)》英文版问世。该书法、西、俄、日文版也相继出版。

同年,外文局所属11家出版社,共翻译、出版各类图书1 017种。

1989年　1月,翻译专业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在南京成立。

1月,辜正坤在《中国翻译》第1期首次公开提出"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1月,国际译联理事、韩国翻译家协会会长方坤教授访华。与中科院科技译协进行学术交流,签订双边合作议定书。与中国译协领导人举行座谈,探讨成立亚洲译联和学术交流事宜。

3月,《中国翻译》杂志主编叶君健在京拜会了来华访问的英籍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感谢她捐资设立"韩素音翻译奖",在国内开展青年翻译有奖竞赛活动。

5月,全国首届青年翻译理论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6 月，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追忆似水年华》（［法］普鲁斯特著）。全套共 7 卷。1991 年 10 月出齐。

8 月，第四次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在昆明举行，中国译协副会长叶笃庄致词。

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讨论会在延吉市召开，中国译协代会长叶水夫、《中国翻译》副主编林煌天向大会作了有关多民族国家翻译问题和译界情况的报告。

11 月，中国译协代会长、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会长叶水夫与中国译协副会长、中国留苏同学会副会长李越然应前苏联作家协会的邀请访问前苏联。

同年，国家开始为翻译研究设立基金项目，国家教委人文科学基金项目中也有翻译研究项目立项。

同年，外文局所属 12 个出版单位，共翻译、出版各类图书 968 种。

1990 年 1 月，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江泽民早年译作《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一书。

1 月，《中国翻译》编辑部和《上海科技翻译》编辑部决定联合编纂《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这是我国第一部介绍科技翻译人物的中型辞典。辞典编辑组设在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翻译》编辑部内。

8 月 27～31 日，中国译协与青海省译协在西宁召开第一次全国藏语文翻译学术讨论会。五省区和北京市藏语界的代表共 50 多人参加了会议。提交学术论文 25 篇。阿沛 · 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卓加向大会发来贺信。青海省委副书记桑杰加、副省长班马丹增、喇秉礼等出席了大会。会议总结、回顾了藏语文翻译工作在我国翻译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探讨了藏语文翻译标准、翻译技巧、标准语音和新词术语等问题。

8 月 2～9 日，国际译联在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第十二次世界大会。中国译协代会长叶水夫、秘书长王杰、《中国翻译》杂志编辑部副主任高峰出席了大会。中国译协代会长叶水夫被选为理事。大会通过表决，接纳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为正式会员。这次会议以“翻译，具有创造性的职业”为主题，近 60 个国家的 500 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译协的三位代表在会上分别作了专题发言。

11 月 9～12 日，全国中青年翻译家笔会在南京举行。这次笔会是受中国译协委托，由江苏省译协、南京青年翻译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12 月 4～8 日，经文化部批准，中国译协在北京召开全国中译英学术研讨会。会议旨在总结、交流中译英工作经验，通过实例探讨中译英原则和翻译技巧，研究改进中译英工作。中顾委常委、中国译协名誉会长伍修权，全国政协常委、老专家爱泼斯坦，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中宣部对外宣传局前局长高梁，中国译协代会长叶水夫，副会长浦寿昌、王子野、叶君健，段连城、宋书声、林戊荪、李越然等出席了大会。林戊荪作主题报告。从事多年中译英的专家、学者爱泼斯坦、沙博里、戴乃迭、杨宪益、叶君健，段连城、裘克安、程镇球等在会上作了报告。与会代表 110 人，会议收到论文 66 篇。

同年，由中国译协理事、江西译协会长王贤才主编的《英中医学辞海》出版。全国各地近 80 位专家参加编译工作。

1991 年 4 月 24 日，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第十四届年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本届年会下设的卡佩克翻译评奖委员会决定对世界科幻小说翻译有杰出贡献的翻译家、浙江省译协会长郭建中授予 1991 年世界科幻小说卡佩克翻译奖。

5 月，《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该辞典收录了从古至今 900 余人，钱伟长、汪道涵、张爱萍题词。

9 月，根据中国译协章程关于组建翻译学术委员会的规定，中国译协中译外委员会（2002 年更名为对外传播翻译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中国译协副会长林戊荪兼任该委员会主任，程镇球、裘克安、徐成时、戊逸伦为副主任。

11 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特别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抒情诗选》《安娜 · 卡列尼娜》《丧钟为谁而鸣》《海涅诗选》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

1992 年 4 月 16 日，中国译协科技翻译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会议推举中国译协副会长叶笃庄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刘昭东、吴鸿适、丁一、程尔晋、黄昭厚、谢裕生、刘慈勤为副主任，李亚舒为秘书长。

10 月 27～31 日，首届全国大中型企业翻译研讨会在上海宝山钢铁厂举行，会议由中国译协和上海市科技译协主办，叶笃庄副会长到会，与会者百余人。

11 月，国际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与话语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并列在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之下，成为三级学科。

同年，《邓小平文选（1938～1965）》日文版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外文出版社出版。该书英、法、西、俄文版也相继出版。

1993 年 2 月 13 日，中国译协外事翻译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推选常务副会长浦寿昌兼任该委员会主任，程镇球、李越然、王效贤为副主任，施燕华兼任秘书长。

4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第 25 卷，本卷收短篇故事集《都兰趣话》。根据该社计划，全集第二十六卷《戏剧》、第二十七至第三十卷《杂文》将于 1995 年出版。

8 月 5～13 日，第十三届世界翻译大会在英国布莱顿举行。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段连城率中国译协代表团出席大会。段连城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国际译联理事。

9 月 5～7 日，首届全国经贸翻译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黑龙江大学举行。

1993 年 9 月 14 日，国家教委教办［1993］413 号文批复同意成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1994 年 4 月，爱尔兰作家乔伊斯所著的《尤利

西斯》由萧乾、文洁若夫妇合译,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是《尤利西斯》问世72年之后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7月,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杨自俭、刘学云所编《翻译新论》,选收1983～1992年间我国重要翻译研究论文。

5月8～11日,第二届全国大中型企业翻译研讨会在杭州萧山举行,宋书声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

12月3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China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CACSEC)在中南工业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暨首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大会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刘重德为会长,萧立明(常务)、李亚舒、林汝昌、楚至大、虞建华、郭著章、刘文彬为副会长,决定筹建英汉语言对比研究、英汉翻译研究、英汉文化比较研究三个专业委员会。

1995年 6月,南京翻译家协会经南京市有关主管机关批准成立。会长由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许均教授担任,刘宗和、王守仁、竺祖慈和程爱民任副会长,吴文智任秘书长。

7月31～8月3日,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办的首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在北京举行。

10月6日,中国译协常务会长会议决定成立中国译协翻译理论和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常务副会长刘德有兼任。副主任委员:林煌天、何其莘、袁士槟;秘书长:高峰;副秘书长:许均、姚暨荣;委员:王克非、王宁、方梦之、刘宓庆、孙致礼、孙艺风、朱纯深、佘协斌、罗国林、罗进德、尚岩、范守义、杨自俭、金亚娜、郭建中、阎德胜、谢天振、辜正坤、谭载喜、穆雷;秘书:宋洪玮。

10月29～11月2日,第七次全国科技翻译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四川联合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行。会议由中国译协和中国科学院科技译协主办,四川省翻译工作者协会承办。会议以"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科技翻译"为中心议题,就"如何多渠道、多层次地培养翻译人才和关注翻译文化市场的建设和管理"等问题展开讨论。收到论文73篇。出席人数近百人。

1996年 1月2日,中国译协名誉会长,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翻译家严济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2月8～16日,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第十四届世界翻译大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会议主题:交流译事经验,探讨合作前景,研究提高翻译工作的地位和价值,维护翻译工作者的合法权益。来自五大洲的近500名翻译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林戊荪在墨尔本世界大会上当选为国际译联理事兼发展中国家委员会主席。

4月3日,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办翻译学术会议,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协办。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美国的文学翻译家、研究翻译理论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出版家。会议主题有三:一是文学翻译(批评与经验);二是翻译理论(运用与分析);三是翻译出版。

《大中华文库》丛书编辑翻译出版工作启动。1996年至2000年为第一阶段;2000年至2005年为第二阶段。

10月21～24日,第三届全国大中型企业翻译研讨会在广东珠海举行。全国20多个省市企业、翻译公司、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及信息单位的代表近60人参加了会议。

1997年 1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原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正式成立翻译系(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翻译系),确立本科高级翻译专业方向,招收英汉翻译硕士研究生。

5月17～20日,第八次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会议由中国译协科技翻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办,陕西省科技翻译工作者和西北工业大学协办。议题是商贸翻译与机器翻译。共收到论文和论文提纲68篇。出席代表近100名。

11月1～3日,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来自中国、法国、加拿大、韩国、美国、瑞士等国家的100多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会议为促进世界译学交流,切磋各种翻译问题,寻求21世纪翻译研究的新发展。

11月9日,中国译协名誉会长伍修权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1月,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收条目近3 700余条;重点介绍中国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历史、翻译人物、翻译论著和期刊、翻译出版机构、翻译与文化交流以及其他译事方面的知识,兼收外国翻译理论与著名汉译家词条;此外,分专题汇编翻译名家论翻译、中国翻译大事记以及翻译论文索引等资料。

12月2～4日,'97香港翻译教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香港翻译学会和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联合举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活动,25位学者在会上宣读了论文。本次会议对翻译教学(含课程设置和口笔译训练)和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1998年 8月13～16日,第二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在汉城(现译"首尔")举行,由韩国翻译家协会在国际译联的协助下主办,参加此次论坛的国家和地区有韩国、中国(包括港台地区)、越南、日本、伊朗、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会议期间共宣读论文近40篇。

10月23～25日,在天津召开"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研讨会"。会议由南开大学外语学院与天津市翻译工作者协会联合举办。

10月23～25日,第二届全国口译理论与口译教学研讨会在广州召开。研讨会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院主办。参加代表有60多人,共提交论文与摘要36篇。会议共三个主题:口译教学理论研究、口译教学法、口译教材的编写与口译质量的测试方法。

10 月 24～27 日，在南昌大学召开了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二届会员大会暨第三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杨自俭当选会长，萧立明(常务)、郭著章、李亚舒、刘文彬、吕俊、虞建华、王菊泉当选副会长。

12 月 19 日，著名作家、学者、中国译协名誉理事钱锺书在北京逝世。

12 月 20 日，中国外文局局长、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段连诚在北京逝世。

1999 年 1 月 15 日，'99 口译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外事翻译委员会、北京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外交部翻译室联合筹组。出席会议者达 120 人。大会收到论文 27 篇。大会对提高口译工作者的素质、规范口译队伍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同年，为表达对宋淇先生的追思和纪念，奖掖执著于翻译事业并在翻译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的有识之士，由香港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翻译》编辑部协办，联合设立“宋淇翻译研究论文纪念奖”。第一届论文奖自 1999 年开始。

同年 META 第 1 期为“中国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专号(英、法文)，刊登我国翻译研究各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章。许钧、王克非被委任为该期特约主编。

3 月 23～25 日，第四届全国大中型企业翻译研讨会在天津召开。由中国译协科技委员会主办。来自全国各地大中型企业的翻译工作者、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议主题：机器翻译的研究与应用。

5 月 6～7 日，国际翻译研讨会在澳门理工学院举行。会议讨论了笔译、口译及其质量，译员培训、语言与翻译等议题。20 名代表先后发言。

8 月 2～10 日，国际译联第十五届世界翻译大会在比利时蒙斯召开。大会分以下五个专题进行讨论：1. 文学翻译；2. 科学技术和商贸翻译；3. 口语翻译；4. 翻译工作者的专业现状和前景；5. 翻译研究。由常务副会长、国际译联理事林戊荪率领的中国译协代表团一行九人应邀出席大会。林戊荪再次当选为国际译联理事兼发展中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译协常务理事、中科院科技译协秘书长韩建国同时被选为国际译联理事。

8 月 25～28 日，文化与翻译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英语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北京大学文学与翻译研究学会、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协办。研讨会议题：1. 文化与翻译的关系；2. 翻译理论主潮研究；3. 翻译批评研究；4. 翻译史研究；5. 翻译与各学科的关系研究。

10 月，张经浩在《外语与外语教学》上发表《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一文，引起持续一年多的讨论。论者普遍认为，翻译学已不是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11 月 1～4 日，'99 上海翻译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这是 '97 香港翻译教学研讨会的延续。会议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主办，(我国)香港(地区)翻译学会、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协办。大会议题是：一、翻译理论；二、翻译教学；三、新世纪翻译的社会需求。70 多名译界学者(包括 10 余名香港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50 多篇。

11 月 6～8 日，'99 全国外事翻译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由中国译协外事翻译委员会和北京市译协联合主办。会议交流外事翻译工作经验，探索如何提高外事翻译水平。

11 月 18 日，英籍老作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家、前中国译协理事戴乃迭女士逝世。

2000 年 5 月 25～28 日，全国第九次科技翻译研讨会在长沙举行。大会由中国译协科技翻译委员会、中南大学和湖南省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办、由中南大学铁道校区外国语学院承办。议题是“多学科视野中的科技翻译”。代表来自 41 个单位 66 人；提交论文 59 篇。

6 月 9～10 日，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林戊荪和国际译联理事、中科院科技译协秘书长韩建国出席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市举行的国际译联理事会议。

8 月 17～20 日，全国中译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联合举办，并由中央编译局负责承办。

10 月中旬，第八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讨论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由中国译协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主办、新疆译协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25 个民族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70 多篇。

2001 年 1 月 12 日，中国译协网站 (http://www.tac-online.org.cn)开通。

同日，中国译协四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长宋书声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国译协副秘书长、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徐亚男代表中国译协秘书处和外事翻译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首批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常务副秘书长孙承唐代表秘书处所作的中国译协 2000 年工作总结和 2001 年工作计划的汇报。

同日，中国译协外事翻译委员会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首批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表彰在外交部、中联部、文化部、对外友协、全国总工会等单位长期从事外事口笔译工作的成绩卓著、贡献突出的 50 位老翻译家，钱其琛等有关领导向他们颁发荣誉证书。

2 月，德国大使于倍寿代表约翰尼斯·劳总统，把象征德国最高荣誉的“国家功勋奖章”授予了四川大学的杨武能教授，以表彰他为促进德中文化交流，特别是在歌德研究和译介中所作的杰出贡献。杨武能是我国德语界近十多年来享此殊荣的第一人。

4 月 21～22 日，在青岛召开“全国译学学科建设专题讨论会”。会议由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与青岛海洋大学联合主办。此次大会是我国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我国译学学科建设及翻译学研究已进入全面发展与趋向成熟的

新时期。

6月27～30日,全国外事翻译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由中国译协外事翻译委员会主办。与会代表80多人,收到论文20多篇。会议就以下方面进行讨论:交替传译与同声传译的理论与实践、外事翻译的培养和培训、我国加入WTO对外事翻译的影响、我国高等院校翻译课教学的现状和今后发展,以及其他有关外事翻译的议题。

8月16～20日,第九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讨论会在内蒙召开。由中国译协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和内蒙古蒙文翻译研究会共同主办。与会代表100多人,收到论文58篇。

8月22～26日,2001年全国中译外研讨会在西安召开。由中央编译局、中国译协、陕西省译协、西安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与会代表50多名;就中译外在我国对外宣传工作中的重要性、中译外的质量、干部培养、外语教学与中译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8月23～25日,在南京举行"全国首届翻译经营管理工作研讨会"。会议由中央编译局文献翻译部、江苏省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天津和平科技咨询翻译服务公司和江苏钟山翻译公司主办。

12月6～9日,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在香港举行,由中国译协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与会代表170名。主题:千禧年翻译研讨;翻译的洲际透视。

2002年　3月24日,中国译协顾问、原会长、原国际译联理事、《中国翻译》主编、著名苏俄文学翻译家叶水夫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4月19～21日,全国第十次科技翻译研讨会在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召开。由中国译协科技翻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办、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与会代表81人,共提交论文65篇。大会主题:21世纪的科技翻译。

5月10日,湖南师范大学翻译系召开成立大会。翻译系的建立使该校拥有了一套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体系。

5月25～27日,"第四届全国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

6月14～16日,"首届清华-岭南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会议由清华大学外语系和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共同主办。

7月24～26日,"语篇与翻译"国际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特邀大会主题发言人有奈达、贝克等。

8月2～10日,国际翻译家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温哥华举行。由国际译联主办,500多名代表参加。

8月20～23日,"全国文学翻译暨出版研讨会"在河南郑州召开。会议由中国译协和河南省译协联合主办,河南人民出版社协办。

8月8～11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讨会第五次汉英对比与翻译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大会由华东师大对外汉语系承办。主题是:"新世纪、新趋势",主要讨论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翻译学、英汉语篇学、汉语典籍英译等五个学术领域的发展趋势问题。与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和英、美、加、法、德、意、希、新等国家共300余人,提交论文300余篇,选出了该研究会第三届领导班子:会长杨自俭,副会长萧立明(常务)、吕俊、虞建华、潘文国、钱冠连、连淑能、罗选民(兼秘书长)。

10月5～7日,"全国第三次多语种翻译理论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会议由广东省翻译协会、广东多语翻译研讨会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办。

2003年　4月18日,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成立,下设口译系,笔译系和翻译研究所。学院拥有翻译学学位点,可授予翻译学硕士和翻译学博士学位。

7月12～15日,"全国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研讨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举行。

7月16日,全国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人事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侨联、中国译协、中国外文局等单位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

7月20日,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挂牌成立大会,并召开首次委员会议。

8月25～30日,第三届翻译经营工作研讨会在成都召开。由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主办。100多位代表参加。主题是:加强翻译机构的管理、提高翻译服务质量。

9月2日,第十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讨论会在延吉召开。由中国译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翻译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译协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共同主办。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137篇。主题为民族语文翻译的理论问题。

9月18～21日,'2003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由中国译协和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参加者100多人。这是首次全国性应用翻译研讨会。主题是: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和教学、应用文体翻译实践。

10月25～26日,"口译与中国——北京2003"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译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欧盟口译司、外交部翻译室、外经贸部(现商务部)交际司共同主办,外经贸大学中欧高级译员培训中心承办。

11月20～22日,国际译联在巴黎举行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国际译联理事、中国译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友义和国际译联理事、中科院科技译协常务副会长邱举良作为中国译界代表出席庆祝活动。

12月4日,中国标准化协会和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由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针对翻译服务机构制定的《翻译服务规范第一部分　笔译》国家标准中英文本已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该国家标准将于2004年6月1日起实施。

12月6～7日,首次全国英语翻译专业资格(水

平)二、三级口笔译试点考试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同时举行。这是由国家人事部统一规划指导,中国外文局负责组织实施的考试。

2004年　2月,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授权点的基础上,获准正式建立独立的翻译学科点,并于2005年起招收独立的翻译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3月5日,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结合函[2003]106号"文件要求,中国标准化协会发文(中国标协[2004]57号),成立《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

4月22～25日,首届全国翻译学博士论坛在深圳大学召开。由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和深圳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

5月22～24日,全国首届翻译学学科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四川省成都召开。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协办。

7月中旬,'2004中译外研讨会在南京举行。由中国译协、中共中央编译局、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主办,由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承办。主要议题:中译外技巧探讨;大学如何培养中译外人才及有关中译外的其他问题。

8月12～14日,在汉城(现译"首尔")召开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简称IATIS)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会议。Annie Brisset(加拿大)被选为会长,孙艺风被选为副会长,罗选民当选为理事。

8月25～30日中国译协在成都召开全国第三届翻译经营工作研讨会。会议就加强翻译机构的管理、提高翻译服务质量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10月14～17日,"2004全国翻译学辞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在山东轻工业学院召开。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办,山东大学(威海)外语系、山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烟台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协办,山东轻工业学院承办。

10月22～26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六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学会成立十周年庆典在四川外语学院举行。大会由四川外语学院承办。

10月29～31日,国际译联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由中国译协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多名翻译工作者参加。

11月4～7日,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五届全国理事会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推举产生了以刘习良为会长的新一届中国译协领导机构;对中国译协章程进行了重大修订。新章程(草案)明确了未来中国译协作为学术性、行业性社会团体的性质,使中国译协的业务和职能范围在原来的学术领域的基础上向行业领域扩展和延伸,并决定改名为"中国翻译协会",英文名称不变。会议期间,中国翻译成就展在中国军事博物馆举办,中央有关领导参观了展览并予以高度评价。

11月6～7日,国际口译大会暨第五届全国口译实践、教学与研究会议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来自九个国家及地区的160名代表参了大会,提交论文89篇。

12月1～2日,为起草第三个国家标准——《翻译服务规范第二部分:口译》,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协同有关部门在上海召开首次筹备组工作会议。

12月17日,中国译协对外传播翻译委员会中译法小组在北京举行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承办,有40多名代表出席。与会者就目前各个领域出现的一些汉语新词、疑难词汇的法语译文进行了讨论和规范,并提出了参考译文。

2005年　1月20～21日,中国译协对外传播翻译委员会中译英小组在北京举行学术研讨会。来自外交部、新华社、中国外文局、中央编译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外事、新闻及外宣部门的近30位资深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5月,经国家民政部正式核准,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国译协章程。这样,中国译协的会员构成从原来的专业社会团体拓展到从事与翻译相关工作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7月,中国译协正式启动发展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的工作。这是中国译协加强组织建设的重要措施。

8月2～7日,第十七届世界翻译大会在芬兰坦佩雷举行。会上,中国翻译协会成功申办2008年在中国上海举办下一届世界翻译大会。

9月27～29日,中国译协主办首届公示语翻译研讨会,会议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承办。

11月26～28日,在广州大学召开第四届全国多语种翻译理论研讨会。由广东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和广州大学联合主办。

12月3～5日,2005全国翻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在珠海召开。会议由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和"中国翻译"编辑部联合召开,主题是:跨学科语境中的译学研究。

12月15日,中国译协对外传播翻译委员会第七次中译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主办单位:中国译协对外传播翻译委员会;承办单位:文化部外联局。

2006年　1月,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翻译专业。教育部发文《关于公布2005年度教育部备案或批准设置的高等学校本专科专业结果的通知》(高教[2006]1号),"翻译"专业(专业代码:050255S,为在少数高校试点目录外专业)获得批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复旦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三所高校可自2006年开始招收"翻译"专业本科生。这是教育部首次批准设立"翻译"专业。

4月28～30日,以"译学前沿"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翻译学博士论坛"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会议由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中国翻译》编辑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主办。

5月24～25日,"21世纪跨文化交际发展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主办单位:上海大学,协办: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本次会议为小规模学术研讨会,邀请的都是国内外著名专家,层次高,研究议题都是国际性的问题。

5月25～29日,中国译协在上海举办中国国际翻译文化周。文化周的主要活动有:为期两天的2006中国国际翻译产业论坛、上海翻译成就展、全国省市译协秘书长会议以及为期三天的翻译与跨学科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的外语学院合办)。参加会议和活动的有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地区以及英、美、加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有关人士。

7月下旬,第十二届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由中国译协科技翻译委员会主办,中科院新疆分院协办。

8月12～14日,"翻译全球化:走向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由清华大学外语系和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10月20～21日,第六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召开。大会议题:21世纪的高质量口译。

11月2～5日,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在鲁东大学召开了第四届会员大会暨第七次全国学术研讨会。选出了潘文国为会长和罗选民(兼秘书长)、钱冠连、许余龙、杨晓荣、王宏印、王寅、王东风、屠国元等为副会长的第四届领导班子。学会现有英汉语言对比、中西文化比较、翻译研究、典籍翻译、英汉语篇对比、中西语言哲学比较等学科组。

12月2～4日,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在珠海举行。

12月16～17日,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与《上海翻译》编辑部在苏州大学联合召开2006年全国翻译高层研讨会。

2007年 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标志着翻译硕士学位(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简称MTI)在我国正式设置。

4月6～7日,由中国外文局和中国译协主办,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和译林出版社承办的"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对外传播领域首次举办的高层次专业论坛。

4月19～22日,"第四届全国翻译学词典与翻译理论研讨会"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会议由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主办。

4月20～21日,"首届全国翻译专业建设圆桌会议"(师资建设专题)在复旦大学召开。会议由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发起。

4月21～23日,"第四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学科委员会主办,广东金融学院承办。

4月,第五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在印尼茂物市召开,中国译协代表团一行19人参加,有12人在论坛上宣读了论文。除亚洲各国外,欧美及澳洲各国也派代表参加这次论坛。

7月7～8日,第二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讨论会由中国翻译协会、同济大学主办,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研究会主题:公示语翻译与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7月27～28日,"首届全国翻译教学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主办单位:中国翻译协会;承办单位: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中国翻译》杂志编辑部;论坛主题:翻译学科建设的科学化和专业化。

8月,我国第一部翻译行业的"百科全书"——《中国翻译年鉴2005～2006》出版,填补了我国年鉴类综合志书中的一项空白。这是我国翻译事业的一项重要基本建设。这部近百万字的年鉴至少起到了如下三方面的作用:第一,积累和保存史料;第二,规范和指导现实;第三,促进国际交流。

10月20～22日,首届全国旅游暨文化创意产业(多种语)翻译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由中国翻译协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主办,《上海翻译》编辑部等单位协办。讨论主题:全球化与旅游暨文化创意产业翻译。

11月17日,资深翻译家、原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中国译协名誉理事程镇球在京逝世,享年88岁。

2008年 2月11日,我国著名教育家、翻译家、前中国译协副会长刘重德在长沙逝世,享年94岁。

5月16～18日,第七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会议主要议题:口译在中国——新趋势与新挑战。

8月4～7日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主题为"翻译与多元文化"。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500位翻译界人士参会,与会国家/地区和人数均大大超过历届世界翻译大会的规模。这是国际翻译家联盟(简称国际译联)首次在亚洲举办世界翻译大会。大会组委会共收到论文1,510篇,其中精选出400篇在分论坛上宣读。作为本届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由中国翻译协会主办的"2008中国(国际)翻译产业展览会"于2008年8月4～6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际译联领导机构,其中,中国译联副会长黄友义再次当选为国际译联第一副主席。

8月15日,资深翻译家、原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中国译协名誉理事裘克安在京逝世,享年88岁。

8月初,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翻译专业委员会在上海师范大学成立。

10月11～15日,2008全国翻译理论研究高层论坛在太原中北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举行。中心议题为:中国传统译学的传承与创新。

10月17～20日,第五届典籍英译研讨会在大连大学举办,主题为:典籍英译的译者研究、作品研究、译文比较研究、标准与过程研究、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及典籍英译的学科建设等。

10月24～25日,由中国国家汉办资助,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美国)和清华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翻译研究、跨文化交际和对外汉语教学"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在美国波特兰市召开。会议就"翻译与二语习得的关系""翻译的教育和文化传播作用""如何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翻译学习和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参加会议的有海内外翻译界、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界的专家学者数十人。

11月,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建国60周年珍藏版,结集再版这套丛书的从第一辑到第十辑的全部译本。第一辑至今已25年,商务印书馆此次将从书的400种图书统一体例,规范字体,重新制版印刷,整体出版。

11月7日,著名翻译家、《尤利西斯》的首位翻译家、乔学研究奠基人金隄在美去世,享年87岁。

11月7～9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与中国译协在京联合举办首届全国高校口译邀请赛,诚邀各大学参加。

11月7～11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八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江西财经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单位的180余名代表出席大会。会议就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翻译学三个学科的新形势、新任务作了探讨。

11月13～16日,中国第一届诗歌翻译研讨会在西南大学召开。大会议题：翻译名家名作论;诗歌翻译新作点评;诗歌翻译评鉴标准;当代诗歌翻译理论与文化理论的关系;诗歌翻译史。

12月,翻译本质及译学方法专题研讨会在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召开。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等多家单位主办。

附录二　中国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分类书目

一、本分类书目主要收编翻译研究图书，选择性地收编翻译教学图书和翻译研究、教学、实践工具书，兼收一些涉及翻译家和翻译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图书。

二、本分类书目按照图书作者、编者、译者姓名的汉语拼音音序或拉丁字母顺序排列。

三、本分类书目共分六个部分：(一)英汉双向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及一般书目；(二)其他外国语与汉语双向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三)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双向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四)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五)外语原版引进本、汉译本及原版汇编本书目；(六)翻译研究、教学与实践工具书书目。

四、本分类书目中的各类资料和信息截止时间为2009年7月底。

五、本分类书目可供翻译研究人员、外语院校师生、翻译工作者以及相关人士使用。

(一)英汉双向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及一般书目

安菊梅. 英汉翻译教程.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

白靖宇. 文化与翻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包惠南. 语法与翻译. 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9.

包惠南.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包惠南，包昂. 实用文化翻译学. 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1.

包惠南，包昂. 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包家仁. 汉英句型比较与翻译.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保清，苻之. 科技英语翻译理论与技巧. 北京：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1983.

鲍刚. 口译理论概述.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8.

鲍刚. 口译理论概述.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57级全体同学集体编. 中国翻译文学简史. 北京：北京大学西语系，196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研究会，翻译与翻译教学研究会编. 语言与翻译.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2.

本社编. 导游翻译经验谈.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3.

本书局编辑部编. 英文翻译指南. 上海：文艺书局，1933.

毕秀英，张泽芬，张云霞主编. 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卞建华. 传承与超越：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卞立强. 卞立强：一个翻译家的轨迹.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薄振杰. 翻译研究新探.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

蔡华. 巴赫金诗学视野中的陶渊明诗歌英译：复调的翻译现实.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

蔡基刚. 英汉汉英段落翻译与实践.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蔡小红. 口译评估.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蔡新乐. 翻译的艺术哲学——文学翻译的含意本体论.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蔡新乐. 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蔡新乐. 翻译的本体论研究——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蔡新乐. 翻译与汉语——解构主义视角下的译学研究.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蔡新乐. 相关的相关：德里达"'相关的'翻译"思想及其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蔡新乐. 翻译与自我：德里达《死结》的翻译学解读与批判.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蔡新乐，郁东占. 文学翻译的释义学原理.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曹菡艾，赵兴民. 联合国文件翻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曹雷. 过去的回响——六十部译制片配音笔记.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曹明伦. 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曹明伦. 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曹深艳主编. 商务英语翻译实务.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曹顺发. 走近可译.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曹顺发. 走近"形美"：古汉诗英译实践点滴.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曹汀. 关于翻译标准的几个问题.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曹炜等. 文言文今译方法和规律.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柴明颎主编. 口译的专业化道路：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柴秀娟. 翻译描述中的语域：英汉虚构类翻译平行语篇的语域分析模式.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常玉田. 经贸汉译英教程.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常玉田. 经贸英译汉教程.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车丽娟，贾秀梅主编. 商务英语翻译教程.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陈艾莎主编. 飞行翻译教程.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陈达编. 英汉互译理论与实践. 成都：巴蜀书社，2003.
陈德彰. 英汉翻译入门.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陈德彰. 翻译辨误.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陈德彰. 中国人最易犯的英汉翻译错误.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陈登，谭琼琳. 英汉翻译实例评析.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7.
陈定安. 英汉比较与翻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1998.
陈定安. 英汉修辞与翻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陈定安. 翻译精要.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陈东成. 文化差异与翻译.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2000.
陈刚. 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陈光火主编. 电子翻译.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0.
陈海庆主编. 布局谋篇——英汉篇章互译技巧.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陈浩然. 外贸英语翻译漫谈. 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3.
陈浩然. 外贸英语翻译. 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7.
陈浩然. 外贸英语翻译.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陈宏薇编. 新实用汉译英教程.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2000.
陈宏薇主编. 汉英翻译基础.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陈宏薇编. 方法·技巧·批评——翻译教学与实践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陈宏薇，李亚丹. 新编大学汉英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陈建平. 法律文体翻译探索.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陈洁等. 英语口译技巧.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
陈菁. 口译交际过程中的跨文化噪音.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陈历明. 翻译：作为复调的对话.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陈茂新.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
陈明瑶，卢彩虹. 新闻英语语体与翻译研究.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陈蒲清. 文言今译学. 长沙：岳麓书社，1999/2000.
陈清贵. 翻译与翻译教学.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陈清贵，杨显宇. 翻译教程.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陈秋劲等编. 英汉互译理论与实践.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陈生保. 英汉翻译津指.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陈仕彬编. 金融翻译技法.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陈淑华. 英语修辞与翻译(英汉对照). 北京：北京邮电学院出版社，1990.
陈树培编. 英汉报刊翻译常见错误.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陈苏东，陈建平. 商务英语口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陈苏东，张新红，李明主编. 商务英语翻译(英译汉).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陈廷祐. 英文汉译技巧.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2001.
陈廷祐. 跟我学翻译——英文汉译技巧. 北京：华龄出版社，1994.
陈伟. 学理反思与策略重构——英汉词典中例证翻译的目的性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陈伟. 翻译与词典间性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陈文伯. 英汉翻译技法与练习.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陈文伯. 教你如何掌握汉译英技巧.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陈文伯. 译艺：英汉汉英双向笔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陈文伯. 译艺：英汉双向笔译.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

陈文伯. 英汉成语对比与翻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陈翔主编. 同传捷径——英语高级口译技能训练教程.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陈翔主编. 同传捷径——高级英语口译实战演练教程.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陈小慰编. 语言·功能·翻译——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陈小慰. 新编实用翻译教程.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陈晓峰,戴湘涛主编. 英汉互译学与练.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陈新主编. 英汉文体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陈秀等编. 浙江省译家研究.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陈胥华. 英汉对译指导.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1984/2000.
陈艳辉编. 英文国际贸易单证的使用与翻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陈艳辉编. 商务英语合同翻译与写作.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陈谊主编. 大学英语实用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8.
陈玉刚主编. 中国翻译文学史稿.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陈肇雄主编. 机器翻译研究进展.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2.
陈振东编. 英汉汉英口译基础教程.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陈中绳. 英译汉病句分析.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陈中绳. 汉英词语翻译漫谈.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陈中绳,吴娟. 英汉新词新义佳译. 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
陈忠诚. 词语翻译丛谈.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2000.
陈忠诚. 汉英、英汉词语翻译趣谈.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陈忠诚. 法窗译话——法律翻译絮谈.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
陈忠诚. 英汉法律用语正误辨析.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陈忠诚. 法苑译谭.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陈忠诚. 汉英语对译正误辨析.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陈忠诚. 汉英词语翻译漫话.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
陈忠诚,陈国权,陈新. 译仁译智.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陈忠诚,吴幼娟. 词语翻译丛谈续编.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陈忠诚,吴幼娟. 词语翻译新话.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陈忠诚,吴幼娟. 词语翻译趣谈.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陈忠诚,吴幼娟. 辞书与译事.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陈准民,陈建平编. 商务英语翻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陈宗余等. 现代英汉对译常见错误 1 000 例.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成昭伟编. 简明翻译教程.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成昭伟. 文学翻译概论.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成昭伟,周丽红编. 译可译　非常译——英汉互译典型错误例析.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成昭伟主编. 新英汉翻译实务.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成昭伟主编. 新汉英翻译实务.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程尽能,吕和发主编. 旅游翻译理论与实务.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程永生. 描写交际翻译学.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程永生编. 汉译英理论与实践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程镇球. 翻译问题探索——毛选英译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程镇球. 论汉译英的几个问题.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
程镇球. 翻译论文集.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褚东伟. 商业翻译导论.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褚东伟,马云霞主编. 新编经贸英语翻译教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楚至大. 翻译理论与实践——桑榆集.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从滋杭.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从滋杭. 中西方诗学的碰撞.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崔长青, 张碧竹编. 翻译的要素.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崔美曼主编. 新编实用英汉翻译教程.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崔永禄等. 实用英语口译(英汉)新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崔永禄主编. 文学翻译佳作对比赏析.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崔永禄等主编. 新编英汉口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大学英语选修课/学科课程系列教材》项目组编,龚

雪萍主编. 大学英语实用翻译教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戴剑飚主编. 专业翻译实战速成.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2008.
戴明瑜等主编. 译苑人物.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戴文进. 科技英语翻译理论与技巧.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戴云主编. 研究生英语译写教程.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但汉源. 翻译基础：原理与方法.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但汉源. 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 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
党金学编. 中外翻译理论选读.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党争胜. 文学翻译鉴赏导论.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党争胜主编. 翻译名篇欣赏.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丁大刚主编. 旅游英语的语言特点与翻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丁菲菲主编. 翻译入门——汉译英.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丁树德. 英汉汉英翻译教学综合指导.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6.
丁树德. 翻译技法详论.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丁树德主编. 英语翻译基础教程.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丁小丽,程华主编. 商务英语翻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丁孝文. 实用英语口译捷径手册.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1.
东万育. 实用科技英语翻译.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董国忠. 英译汉须知.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
董乐山. 译余废墨. 北京：三联书店,1987.
董乐山. 董乐山文集. 第2卷. 李辉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董乐山. 西行的足音.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董力争. 医学英语翻译技巧. 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
董明. 翻译：创造性叛逆.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杜碧玉主编. 法律口译教程.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杜承南,文军主编. 中国当代翻译百论.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
杜慧敏：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1901～1911).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杜建慧等. 翻译学概论.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杜瑞清,党金学主编.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术论丛(第六卷)——翻译的艺术.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杜争鸣. 翻译策略与文化——英汉互译技巧详解.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杜争鸣,陈胜利等编. 英汉互译原理与实践教程.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段初发. 文学与翻译论稿.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段峰. 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段怀清,周俐玲.《中国评论》与晚清中英文学关系.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段文颇主编. 英汉汉英翻译理论基础. 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段云礼主编. 新编商务英语翻译教程(英译汉).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段云礼主编. 新编商务英语翻译教程(汉译英).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顿官刚. 湖湘译林与外国翻译研究. 长沙：岳麓书社,2006.
樊恒夫等编. 英汉汉英实用口译教程.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
范敏. 篇章语言学视角下的译学词典研究.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
范守义. 翻译研究：另类视野.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范武邱编. 实用科技英语翻译讲评.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范祥涛. 科学翻译影响下的文化变迁——20世纪初科学翻译的描写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范杏丽编. 研究生翻译基础教程.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范勇主编. 新汉英翻译教程.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范仲英. 实用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方光源编. 翻译实习指导. 上海：世界书局,1931.
方华文. 20世纪中国翻译史.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
方乐天. 翻译手册(英汉、汉英).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1.
方梦之编. 译论纵横.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3.
方梦之. 英语汉译实践与技巧. 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4.
方梦之. 翻译新论与实践.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方梦之主编. 实用文本汉译英.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方梦之编. 英汉翻译基础教程.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方梦之,范武邱编. 科技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方梦之,马秉义编选.汉译英实践与技巧.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
方梦之,毛忠明主编.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方敏.机械工程英语的翻译方法.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9.
方平.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费小平.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费亚夫.英语否定结构的表达与翻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疯狂英语》编辑部.英语现场口译技巧.南昌:江西文化音像出版社,2002.
《疯狂英语》编辑部.高级口译现场实录.南昌:江西文化音像出版社,2004.
冯国华,吴群编.英译汉别裁.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冯建文.神似翻译学.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冯建忠.实用英语口译教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冯建忠.汉英口译实练.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冯建忠主编.英汉口译实练——联合国千年大会发言精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冯建忠主编.实用英语口译教程.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冯建忠主编.口译实例与技巧.太原:山西出版集团,书海出版社,2007.
冯梅,刘荣强.英汉科技翻译.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
冯庆华编.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2002.
冯庆华主编.文体翻译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冯庆华主编.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冯庆华.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红楼梦》霍克斯与闵福德译本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冯庆华,张健.报刊语言翻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冯世则.翻译匠语.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冯树鉴.英汉翻译疑难四十六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冯树鉴.实用英汉翻译技巧.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5.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
冯天瑜,刘建辉,聂长顺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冯伟年编.高校英汉翻译实例评析.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
冯伟年主编.最新简明英语翻译教程.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1.
冯伟年主编.最新汉英翻译实例评析.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5.
冯伟年主编.新编实用英汉翻译实例评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冯文坤.翻译与翻译之存在——关于翻译的存在论思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冯志杰.汉英科技翻译指要.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冯志伟.自然语言机器翻译新论.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冯志伟.机器翻译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冯志伟,杨平.自动翻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
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
傅浩.说诗解译:中外诗歌与翻译论集.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傅敬民等.当代高级英汉互译.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傅敬民等编.英汉翻译辨析.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傅晓玲等主编.英汉互译高级教程.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傅勇林.文化范式:译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高华丽.翻译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高健.翻译与鉴赏.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高黎平.美国传教士与晚清翻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高亮,林郁如主编.英汉·汉英口译教程:Textbook.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高亮,林郁如主编,陈菁等编.英汉·汉英口译教程:Workbook 练习分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高圣兵.Logic 汉译研究——跨文化翻译中的"格义"、视域融合与接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高永照,程勇编.科技英语的文体写作与翻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
高忠群,乌传衮.翻译家严复传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葛林.论跨文化伦理对翻译的规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耿洪敏编.实用英汉翻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耿龙明主编.翻译论丛.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耿直,张舒. 简明英汉互译教程. 哈尔滨：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6.
龚光明. 翻译思维学.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辜正坤. 翻译理论教程. 成都：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1982.
辜正坤. 中西诗鉴赏与翻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辜正坤. 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辜正坤. 译学津原. 郑州：文心出版社,2005.
古今明编. 实用英汉翻译教程. 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出版,1987.
古今明. 英汉翻译基础.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古煜奎主编. 口译实战高手. 广州：世界音像电子出版社,2007.
顾铁军. 外国新影片翻译与研究.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顾维勇. 实用文体翻译.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
顾学梁,何建乐主编. 汉英互译实用基础教程(上、下).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顾延龄,熊希龄. 英汉、汉英翻译教程. 长沙：湖南省科教语言音像出版社,1989.
顾振海等主编. 21 世纪医学共核英语翻译教程.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顾正阳. 古诗词曲英译论稿.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顾正阳. 古诗词曲英译理论探索.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顾正阳. 古诗词曲英译美学研究.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顾正阳. 古诗词曲英译文化探索.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顾正阳. 古诗词曲英译文化视角.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管新平,何志平编. 汉英等效翻译.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广州《疯狂英语》编辑部. 朱彤口译：口译技巧与实战. 南昌：江西文化音像出版社,2000.
桂扬清. 莎翁作品译文探讨.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郭岱宗编. 面面俱到口译教程(1)(2)(3).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郭富强. 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2007.
郭富强编. 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郭贵龙. 当代汉语骚语研究与英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郭浩儒主编. 当代研究生英语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郭继荣主编. 实用英汉互译教程.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郭建中编. 文化与翻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郭建中. 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郭坤. 科技英语翻译语法.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郭昆. 英语翻译释例(汉文英译之部). 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
郭兰英. 口译与口译人才培养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郭茜等编. MBA 英语翻译教程.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2005.
郭颐顿,张颖编. 商务英语翻译教程.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郭云生. 古文翻译法.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
郭著章主编. 英汉互译实用教程.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郭著章,李庆生. 英汉互译实用教程. 第 2 版.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郭著章. 英汉互译实用教程(修订本)自学指导手册.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郭著章,李庆生. 英汉互译实用教程. 第 3 版.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郭著章. 英汉互译实用教程学习指导手册. 第 2 版.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郭著章等. 翻译名家研究.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郭著章等. 文言英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国外电子技术编辑部编. 科技英译汉例解. 北京：国外电子技术编辑部,1973.
海岸选编. 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韩洪举. 林译小说研究——兼论林纾自撰小说与传奇.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韩江洪. 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韩其顺等. 英汉科技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韩启毅主编. 当代专用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2001.
韩子满. 英语方言汉译初探.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韩子满. 文学翻译杂合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郝丽萍等编. 实用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何川编. 英语导游口译手册.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何刚强. 现代英语表达与汉语对应.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何刚强. 最新英语翻译疑难详解.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何刚强. 当代英汉互译指导与实践.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何刚强. 现代英汉翻译操作.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何刚强. 英汉口笔译技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何刚强编. 笔译理论与技巧.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何高大，陈琳编. 实用英汉·汉英口译技巧. 第2版.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
何琳主编. 实用英汉互译快捷通. 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9.
何孟良. 文化驿站：突破翻译局限.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何三宁等. 实用英汉翻译教程.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何三宁. 翻译多元论实证分析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何绍斌. 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何元建. 生成语言学背景下的汉语语法及翻译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贺显斌. 论权力关系对翻译的操控.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贺雪娟编. 商务英语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黑龙江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编辑. 翻译论丛. 哈尔滨：黑龙江省译协，1988.
洪班信主编. 医学英语汉译英1 500句. 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5.
洪明编. 商业广告翻译技巧. 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侯国金编. 同声口译金话筒.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侯国金. 语用标记理论与应用：翻译评估的新方法.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侯国金. 语用学大是非和语用翻译之路.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侯艳宾主编. 研究生英语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胡翠娥. 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胡德香. 翻译批评新思路：中西比较语境下的文化翻译批评.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胡刚，陈鸿金编. 新世纪英汉同声传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胡庚申. 怎样起草与翻译合同协议.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3.
胡庚申. 怎样学习当好译员.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3.
胡庚申主编. 文献阅读与翻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胡庚申等. 国际商务合同起草与翻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胡庚申主编. 翻译与跨文化交流：转向与拓展(2005年首届海峡两岸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胡庚申主编. 翻译与跨文化交流：整合与创新(2007年第二届海峡两岸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胡开宝. 英汉词典历史文本与汉语现代化进程.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胡开宝主编. 跨学科视域下的当代译学研究.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胡开宝，郭鸿杰主编. 英汉语言对比与口译.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胡明亮. 语篇衔接与翻译. 成都：巴蜀书社，2007.
胡铁生. 英语被动语态的汉译技巧. 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胡铁生，孙萍编. 新博士生英语翻译教程.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
胡伟华编. 实用英汉翻译教程.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胡显耀，李力. 高级文学翻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胡晓吉. 实用英汉对比翻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胡孝申主编. 翻译与文化.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胡修浩，陈振东主编. 汉英英汉经贸口译教程.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胡阳，吴炜编. 英语读写译教程(下).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胡允桓. 译海求珠. 北京：三联书店，2007.
湖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编. 翻译论文集. 武汉：湖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1987.
湖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武汉市翻译工作者协会编，华先发主编. 翻译与文化.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华泉坤主编. 外语翻译与研究.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
华先发主编. 新实用英译汉教程.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2008.
华先发，邵毅. 新编大学英译汉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编，王卫平主编. 英汉互译——方法与实践.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黄邦杰. 译艺谭.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1.

黄邦杰. 汉英虚词句式.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黄成洲主编. 汉英翻译技巧——译者的金刚钻. 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

黄成洲, 刘丽芸主编. 英汉翻译技巧——译者的金刚钻. 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8.

黄德新. 英汉双向翻译教程.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6.

黄杲炘. 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黄杲炘. 英语诗汉译研究——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 第2版.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黄杲炘. 英诗汉译学.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黄国文.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古诗词英译本的语言分析.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黄海元主编. 科技英语翻译实用教程.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3.

黄河燕主编. 机器翻译研究进展——2002年全国机器翻译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2.

黄嘉德编. 翻译论集. 上海: 西风出版社, 1940.

黄建华. 翻译文苑.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6.

黄凯. 科技英语结构与翻译模式. 广州: 华南工学院出版社, 1987.

黄龙. 翻译技巧指导.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黄龙. 翻译学.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

黄龙. 翻译艺术教程.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黄龙. 最新热门专业翻译指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黄勤. 英语新闻汉译的跨学科分析.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黄荣恩. 科技英语翻译浅说.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1.

黄少政. 翻译还是演绎——功能主义翻译研究.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3.

黄维樑, 江弱水编选. 余光中选集(第四卷: 语文及翻译论集).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黄新渠. 汉译英基本技巧.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2002.

黄新渠. 译海浪花.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黄洋楼. 英汉互译实用技巧.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2.

黄雨石. 文学翻译探索.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黄雨石. 英汉文学翻译探索.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黄振定. 翻译学: 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黄振定. 翻译学: 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黄振定. 翻译学的语言哲学基础.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黄振定主编. 英汉互译实践教程.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

黄志顺编. 英语语序的汉译对比.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黄志顺. 英语理解与译作.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3.

黄志顺. 英语句子翻译技巧. 北京: 现代出版社, 1995.

黄志顺. 中级英语理解与翻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黄志顺, 臻妮. 中级汉英翻译解析.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黄中习. 中华对联研究与英译初探.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

黄忠廉. 翻译变体研究.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黄忠廉. 翻译本质论.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黄忠廉. 变译理论.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黄忠廉, 李亚舒. 科学翻译学.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稽德全. 汉英翻译研究与实践.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纪志刚. 杰出的翻译家和实践家——华蘅芳.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季健. 科技英语结构分析与翻译. 北京: 新时代出版社, 1983.

季羡林. 季羡林谈翻译. 季羡林研究所编.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

季羡林, 方重等. 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贾德江. 英汉语对比研究与翻译. 长沙: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2.

贾明舫, 杨朝春编. 英语读写译教程(上).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贾文波. 汉英时文翻译——政治经济汉译英300句析.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贾文波. 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贾文波. 应用翻译功能论.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贾文波. 汉英时文翻译教程.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8.

贾正传. 融合与超越: 走向翻译辩证系统论.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贾柱立主编. 实用英汉翻译基础教程.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7.

江枫. 江枫论文学翻译自选集.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江枫. 江枫翻译评论自选集.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江枫. 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

江峰，丁丽军主编. 实用英语翻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江苏省人事厅，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编. 江苏省外语口语/口译等级证书英语考试大纲.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江晓梅，杨元刚编. 英汉交替传译教程.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江晓梅，杨元刚编. 汉英交替传译教程.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姜倩，何刚强主编. 翻译概论.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姜秋霞. 审美过程：文学翻译中的格式塔意象再造.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姜秋霞. 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姜治文，文军编. 翻译批评论.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

姜治文，文军主编. 翻译标准论.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姜治文，文军主编. 比较翻译学概论.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蒋本良. 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蒋坚松. 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蒋坚松，黄振定主编. 语言与翻译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蒋坚松，蒋洪新编. 三湘译论(第三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蒋坚松，彭利元主编. 刘重德翻译思想及其他.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蒋林. 梁启超"豪杰译"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蒋述卓. 佛经翻译与中古文学思潮.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蒋太培. 科技英语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

蒋骁华. 符号学翻译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造.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蒋翼振编. 翻译学通论. 上海：上海美利印刷公司印刷，商务印书馆发行，1927.

教育部考试中心编. 全国外语翻译证书考试·英语翻译证书考试大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005.

教育部考试中心编. 全国外语翻译证书考试·英语翻译证书考试大纲(1～3级).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008.

教育部考试中心编. 全国外语翻译证书考试·英语翻译证书考试大纲(4级).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金焕荣主编. 商务英语翻译.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金惠康. 跨文化交际与翻译——汉英语言文化比较.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7.

金惠康. 跨文化交际翻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金惠康. 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金惠康. 跨文化旅游翻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金朋荪主编. 大学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金圣华. 桥畔译谈——翻译散论八十篇.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

金圣华，黄国彬主编. 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金隄. 等效翻译探索.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1998.

靳涵身. 诗型广告翻译研究.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靳梅琳. 英汉翻译概要.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居祖纯. 汉英语篇翻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居祖纯. 高级汉英语篇翻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居祖纯. 新编汉英语篇翻译强化训练.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居祖纯. 汉英翻译强化训练.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康晋，常玉田主编. 英汉翻译.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康志峰编. 英语高级口译实用教程.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康志峰编. 英语口译理论与实践技艺.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亢树森主编. 科技英语写作与翻译教程. 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柯平.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孔慧怡. 翻译·文学·文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孔慧怡编. 中国翻译运动经纬论文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孔慧怡，杨承淑编. 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孔令翠，蒙兴灿主编. 实用汉英翻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宽本. 水利水电科技英语阅读和翻译.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0/1985.

赖敏. 现代英语外贸口译.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

兰少宪，李清源. 实用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兰天. 国际商务合同翻译教程.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蓝纯编. 高级英汉翻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雷天放,陈菁. 口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黎昌抱. 王佐良翻译风格研究.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黎翠珍主编. 翻译评赏.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黎难秋. 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3.
黎难秋. 中国科学翻译史料.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
黎难秋. 中国口译史.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黎难秋. 中国科学翻译史.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
黎土旺主编. 英汉经贸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李宝初. 日出山花红胜火：论叶君健的创作与翻译.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
李波阳. 商务英语汉英翻译教程.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
李长栓. 汉英口译入门.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李长栓. 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李朝. 实用商务英语翻译教程.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李朝等编. 大学商贸英语翻译教程教学参考书.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李德凤等编. 法律文本翻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李德俊. 平行语料库与积极型汉英词典的研编——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词典编纂系统 CpsDict 的研制与应用.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李定坤. 汉英辞格对比与翻译.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李发根. 语言理论与翻译研究.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
李芳琴主编. 新世纪口译：理论、技巧与实践.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李芳琴主编. 实用口译教程新编——理论、技巧与实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李斐南等编译. 法律英语实务——中外法律文书编译.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李孚声编. 高级英语听译选粹. 第 1 册.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
李孚声编. 英汉口译教程.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
李河. 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解释学视野中的翻译问题.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李和庆,黄皓,薄振杰编. 西方翻译研究方法论：70 年代以后.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李寄. 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李建军编. 新编英汉翻译.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
李建军编. 英汉应用文互译：商务 · 文秘 · 旅游 · 社交.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李洁. 琴声何处不悠扬——中国古典艺术散文英译的审美沟通研究.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
李菁. 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李晶. 当代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李景端. 如沐清风——与名家面对面.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李军,韩晓玲主编. 常用英语习语翻译与应用. 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李克兴. 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李克兴,张新红. 法律文本与法律翻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李逵六. 口译——理论与实践、语言与交际.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李良佑等. 中国英语教学史.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李良玉等. 英语力作佳译鉴赏.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
李林波. 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考察：1981～2003.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李龙泉. 借鉴与批判：解构主义翻译观专题研究.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李美. 母语与翻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李明. 翻译研究的社会符号学视角.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李明编. 英汉互动翻译教程.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李明编. 汉英互动翻译教程.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李明编. 翻译批评与赏析.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李明. 商务英语翻译(汉译英).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李念培. 英语学习与翻译新概念.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
李青编. 新编英汉汉英翻译教程：翻译技巧与误译评析.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李庆学,彭建武主编. 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
李全安. 文学翻译 275 问.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李奭学. 得意忘言：翻译、文学与文化评论. 北京：三

联书店,2007.
李四清.英汉翻译教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李太志编.商务汉英特色语汇翻译.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
李太志,余祥越.商务汉英写作修辞对比分析与互译.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李天舒主编.最新简明英语口译教程.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1.
李伟.中国近代翻译史.济南：齐鲁书社,2005.
李文俊.寻找与寻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李小川主编.实用英语口译教程.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
李晓敏等编.英汉翻译教程.第2册.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李辛.实用汉译英手册.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
李欣,段燕红.英汉互译研究与实践.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
李学平.科技英语分析与翻译新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李学平.通过翻译学英语：150实例使你迅速提高汉译英能力.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李学平主编.科技翻译与英语学习——英汉/汉英科技翻译实务新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李学平,蓝俊翔.科技汉译英指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
李学术.实用英汉翻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李亚丹主编.英译汉名篇赏析.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李亚舒.译海采珠——科学家谈翻译.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3.
李亚舒等编.科技翻译论著集萃.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李亚舒等主编.科技翻译论著新萃.北京：气象出版社,2000.
李亚舒,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李延林.汉语常见词英语巧译.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
李延林等主编.英语文化翻译学教程.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李延林等主编.英语文化翻译学实践教程.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李延林等主编.英语语言文化与翻译应用教程.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李养龙主编.实用翻译技能集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李奕,刘源甫.翻译心理学概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李颖等.面向汉英机器翻译的语义块构成变换.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李颖玉,郭继荣主编.实用英汉互译教程.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李玉陈.句法与翻译.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2004.
李玉良.《诗经》英译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
李玉良,孙昌坤.英语名作佳译赏析.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1999.
李云,李和庆主编.新编大学翻译教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李运兴.英汉语篇翻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2003.
李运兴.语篇翻译引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李运兴主编.汉英翻译教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李占喜.关联与顺应：翻译过程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李照国.中医翻译导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李照国主编,朱忠宝,刘希茹编.中医英语翻译技巧.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李照国.医学论文英语翻译技巧.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0.
李照国等编.中医英语翻译技巧训练.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2.
李照国.译海心语——中医药文化翻译别论.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6.
李照国.译海心悟——中国古典文化翻译别论.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7.
李照国.熵化·耗散·重构——汉英翻译理法探微.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李照国,李萧红编著.中医古文英语翻译技巧.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9.
李正中.经贸英汉翻译基础.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
李正中等.新编英汉翻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
李正中.国际经贸英汉翻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2000.
李志英.中文英译法.上海：世界书局,1947.
李志英.英文中译法.上海：世界书局,1947.
郦青.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栗长江.文学翻译语境化探索.北京：线装书局,2008.
连淑能.新编英汉翻译教程.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连淑能.英译汉教程教师用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连淑能.英译汉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梁为祥主编.英译汉教程.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梁为祥,李刚主编. 新概念商务英语专业翻译教程.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梁为祥,吴艾玲主编. 英汉翻译技巧与赏析.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梁晓虹等. 佛经音义与汉语词汇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辽宁大学外语系编写小组编. 英语口译手册.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78/1980.
廖国强主编. 英汉互译理论、技巧与实践.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0.
廖七一等.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廖七一. 胡适诗歌翻译研究.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廖世翘主编. 涉外英语口译入门. 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
廖世翘编. 大学英语笔译实务教程. 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廖瑛,莫再树. 国际商务英语语言与翻译研究. 第2版.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林本椿主编. 福建翻译家研究.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林本椿. 英汉互译教程. 上海: 百家出版社,2004.
林本椿. 福建翻译家研究.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林超伦编. 实战口译 · 学习用书.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林超伦编. 实战口译 · 教学参考.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林彻. 地质翻译参考.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85.
林楚平. 在花毯背面. 郑州: 大象出版社,2000.
林汉达. 高级英文翻译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1.
林汉达. 英文翻译原则方法实例. 上海: 中华书局,1953.
林烈诚. 英汉时文翻译教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林佩汀. 中英对译技巧.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1.
林佩汀. 做个时尚双语人: 英汉互译技巧. 天津: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3.
林佩汀. 英汉互译技巧 Easy 通. 天津: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3/2006.
林相周. 英汉翻译中的语法问题.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9.
林相周. 英汉翻译中的语法问题.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
林相周. 英语理解与翻译 100 题.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986.
林相周. 英语理解与翻译讲话.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林相周. 英语理解与翻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林郁如,雷天放主编,庄鸿山,肖晓燕编. 英语口译资格证书考试培训教程. 厦门: 鹭江出版社,2004.
凌伟卿等主编. 21 世纪大学英语教程 · 翻译.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
凌渭民. 科技英语翻译教程.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凌熙华等. 外贸业务口译.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刘炳善. 译事随笔.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刘法公. 商贸汉英翻译专论.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9.
刘法公. 商贸汉英翻译评论.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刘法公. 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刘国善等编译. 历代诗词曲英译赏析.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09.
刘和平. 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刘和平. 口译理论与教学.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刘洪潮主编. 怎样做新闻翻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刘华文. 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刘季春. 实用翻译教程.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2007.
刘健. 电力英语阅读与翻译. 第2版.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
刘靖之. 和谐的乐声.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刘靖之,林戊荪,金圣华主编. 翻译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 香港翻译学会,2000.
刘宓庆. 文体与翻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
刘宓庆. 文体与翻译. 增订版.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刘宓庆. 文体与翻译. 第2版.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刘宓庆. 英汉翻译技能训练手册.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刘宓庆. 英汉翻译技能训练手册.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
刘宓庆. 英汉翻译技能指引.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刘宓庆. 现代翻译理论.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刘宓庆. 当代翻译理论.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刘宓庆.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刘宓庆. 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刘宓庆. 汉英对比与翻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刘宓庆. 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刘宓庆. 文化翻译论纲.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2007.
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2007.
刘宓庆. 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2007.
刘宓庆. 口笔译理论研究.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刘宓庆. 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刘牟尼. 汉译英指南. 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刘其中. 新闻翻译教程.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刘其中. 汉英新闻编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刘全福. 翻译家周作人论.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刘群. 汉英机器翻译若干关键技术研究.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刘润清，汤德馨，王贵明编. 当代研究生英语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刘绍龙. 翻译心理学.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刘绍铭. 文字岂是东西.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刘世昌，何玲梅主编. 现代英语口译. 北京：气象出版社，2008.
刘世聪. 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刘世聪. 英汉·汉英美文翻译与鉴赏(新编版).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刘世聪主编. 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刘文彬，张崇言主编. 汉英词句多译例析.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刘文捷主编. 翻译入门——英译汉.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刘肖岩. 论戏剧对白翻译.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刘昕蓉主编. 翻译.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
刘秀芝，李红霞. 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人文景观介绍翻译研究.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
刘训成. 新闻英文编译.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刘涌泉. 机器翻译浅说. 北京：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64.
刘涌泉等. 机器翻译论文选辑.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9.
刘涌泉等. 中国的机器翻译. 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
刘煜宗编. 英译汉概论(上、下册).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刘振前，黄德新. 经贸英语翻译与写作.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刘重德. 翻译漫谈.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刘重德. 文学翻译十讲.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刘重德. 浑金璞玉集.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
刘重德主编. 三湘译论.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刘重德主编.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
刘重德. 西方译论研究.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刘重德主编.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1).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刘重德主编.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2).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刘重德. 翻译论稿.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刘宗和主编. 论翻译教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卢炳群. 英汉辞格比较与唐诗英译散论.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卢红梅. 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卢红梅. 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第二部).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卢敏主编. 英语法律文本的语言特点与翻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卢念高，蒋国泰编. 导游翻译经验谈.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3.
卢思源主编. 新编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卢玮，蔡世文主编. 商务英语口译训练教程.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卢伟，高永主编. 新实践英语翻译.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2.
卢信朝主编. 挑战口译——听辨.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陆殿扬. 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上、下册). 北京：时代出版社，1958.
陆谷孙. 余墨集.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陆谷孙. 余墨二集.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陆乃圣. 英汉差异及翻译. 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93.
陆乃圣主编. 新编大学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陆文慧主编. 法律翻译——从实践出发(文集).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陆钰明. 汉英翻译指导.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吕炳华主编. 汉英双向口译教程.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吕国军. 口译与口译教学研究.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吕昊等编. 商务合同写作及翻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吕俊，侯向群. 英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吕俊，侯向群.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吕俊. 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吕俊，李德凤编. 英汉翻译的理论与方法.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
吕俊. 吕俊翻译学选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吕瑞昌等编. 汉英翻译教程.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吕天石. 汉英翻译新探.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马会娟. 奈达翻译理论研究.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罗汉编. 国际经贸高级英语：精读与翻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罗磊. 医学英汉互译技巧与实践.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4.
罗磊. 现代中医药学汉英翻译技巧.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
罗斯编. 英汉、汉英新编翻译手册.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
罗新璋编. 翻译论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罗杏焕. 基础口译教程(B级).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罗选民主编. 外语·翻译·文化(第二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罗选民主编. 中华翻译文摘(2000卷).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罗选民主编. 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
罗选民主编. 中华翻译文摘(2001卷).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罗选民编. 文学翻译与文学批评.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罗选民主编. 文化批评与翻译研究.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罗选民主编. 语言认知与翻译研究.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罗选民主编. 中华翻译文摘(2002～2003卷).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罗选民主编. 结构·解构·建构——翻译理论研究.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罗选民主编. 中华翻译文摘(2004～2005卷).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罗选民，佘协斌主编. 外语·翻译·文化(第一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罗选民，屠国元主编. 阐释与解构：翻译研究文集.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
麻争旗. 影视译制概论.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马爱英. 中英文化翻译——当代中国文本译释个案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马秉义. 汉译英入门——科技文章译法. 北京：测绘出版社，1990.
马秉义编. 汉译英基础教程.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马大森，骆贤凤主编. 英汉/汉英口译教程.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马红军. 翻译批评散论.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马红军. 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许渊冲的译学理论与实践.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马会娟编. 商务英语翻译教程.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
马建丽编. 英汉笔译教程.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马乐梅. 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原则之研究.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马祖毅. 英译汉技巧浅谈.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话.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运动以前部分.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运动以前部分. 第2版.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马祖毅等编. 汉籍外译史.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上卷，周代——清代).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马祖毅等. 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全一卷；现当代部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精装本〉.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毛华奋. 汉语古诗英译比读与研究.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毛荣贵编. 英译汉技巧新编.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毛荣贵编. 新世纪大学英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2008.
毛荣贵编. 新世纪大学汉英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毛荣贵. 翻译美学.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毛正坎. 科技英语翻译方法——英汉语比较解析.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梅德明. 英语高级口译资格证书考试·口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2000/2006.

梅德明. 英语中级口译资格证书考试·口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2003/2008.
梅德明主编. 口译进阶教程：会议同传.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梅德明主编. 口译进阶教程：联络陪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梅德明主编. 口译进阶教程：通用交传.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梅德明主编. 口译进阶教程：专业交传.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梅德明编. 商务口译教程.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梅德明主编. 通用口译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梅德明编. 新编商务英语翻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梅德明主编. 新汉英口译实践.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梅德明主编. 新英汉口译实践.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梅德明编. 英汉口译实践——成功者之路.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梅德明主编. 英语口译教程(上、下册).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梅鼎梁. 翻译漫谈. 上海：现代外国语文出版社，1947.
美国法律文库暨法学翻译与法律变迁研讨会. 法学翻译与中国法的现代化："美国法律文库暨法学翻译与法律变迁"研讨会纪实.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蒙兴灿等主编. 实用英汉翻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蒙兴灿.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孟广龄. 翻译理论与技巧新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孟庆升.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
孟庆升编. 新编实用汉英翻译教程.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孟昭毅，李载道主编. 中国翻译文学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密立根. 新约圣经流传史(附《汉文圣经译本小史》). 上海：广学会，1934.
苗菊. 翻译教学与翻译能力发展(英文本).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穆凤良编. 逻辑比较与英汉翻译.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
穆精额编. 翻译生员翻译官教习福祝隆阿年谱.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穆雷. 通天塔的建设者——中国当代中青年翻译家研究. 北京：开明出版社，1997.
穆雷. 中国翻译教学研究.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穆雷编. 英汉翻译基础教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穆雷等. 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穆诗雄. 跨文化传播——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论.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材编写组编，宁洪、吕世生编. 英语口译教程(英汉·汉英).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材编写组编，温秀颖等编. 英语翻译教程(英汉·汉英).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聂继武等. 科技英语翻译教程.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
聂继武. 英汉翻译技巧. 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
宁洪主编. 英语初级口译教程.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宁洪主编. 英语中级口译教程.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潘炳信，李正栓主编. 翻译研究.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潘红主编. 商务英语英汉翻译教程.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
潘红主编. 商务英语英汉翻译教程自学手册.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
潘能. 英语口译——理论、技巧与实践.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4.
潘能. 英汉、汉英口译教程——理论、技巧与实践.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潘文国主编. 翻译与对比研究——2002 年汉英对比与翻译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潘月洲主编. 商务英语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彭长江主编. 英汉—汉英翻译教程.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04.
彭长江主编. 英汉—汉英翻译教程·教学参考书. 修订本.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彭长江，顾延龄. 译海探秘.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彭京. 翻译杂谈.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
彭利元. 翻译语境化论稿.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彭萍. 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行为模式.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彭萍编. 实用商务文体翻译(英汉双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彭萍编. 实用英汉对比与翻译(英汉双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彭启良. 翻译与比较.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平保兴. 五四翻译理论史.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平卡姆编. 中式英语之鉴(*The Translator's Guide to Chinglish*).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戚建平,申娜娜主编. 实用汉译英教程.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
戚文琴. 经贸专业学生口译教材.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1992.
戚文琴等编. 英语高级口译教程.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1997.
戚文琴主编. 实用英语口译入门教程.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2006.
齐伟均,陈汉生主编. 英语听力与口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齐伟钧,陈汉生主编. 新编英语听力与口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齐伟钧,孙万彪主编. 英语口译基础能力证书考试·基础口译教程,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钱歌川. 翻译漫谈.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
钱歌川编. 翻译的基本知识.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钱歌川. 翻译的技巧.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
钱冠连编. 汉译英一语多说 300 例.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
钱锺书等. 林纾的翻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
钱锺书. 七缀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994.
钱锺书. 钱锺书论学文选. 舒展选编,广州: 花城出版社,1990.
钱锺书. 谈艺录. 北京: 三联书店,2001.
钱锺书. 管锥编. 北京: 三联书店,2001.
乔海清. 翻译新论.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乔曾锐. 译论——翻译经验与翻译艺术的评论和探讨. 北京: 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
秦建华. 高健翻译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秦文华. 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秦亚青,何群编. 英汉视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覃学岚编. 英汉对比与互译教程.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1.
邱俊鹏. 英语冠词的用法与翻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仇蓓玲. 美的变迁——论莎士比亚戏剧文本中意象的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曲化民. 英文译法的新研究. 北平: 化民英语研究社,1948.
任东升. 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任虹. 翻译引论.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任淑坤.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任晓霏. 登场的译者——英若诚的戏剧翻译系统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阮绩智主编. 高级商务口笔译: 口译篇.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赛文,周宇坤编. INTERNET 工具和翻译软件实用详解.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编. 中译外社科论丛.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
单德兴. 翻译与脉络.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单继刚. 翻译的哲学方面.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单其昌. 汉英翻译讲评. 北京: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9.
单其昌. 汉英翻译技巧.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
单其昌. 汉英翻译入门.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商瑞芹. 诗魂的再生——查良铮英诗汉译研究.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 严复和严复的翻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商务英语翻译师考试培训教材编委会编,沈素萍,Grace Zhang 主编. 商务英语翻译师考试培训教材(笔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商务英语翻译师考试培训教材编委会编,沈素萍,Grace Zhang 主编. 商务英语翻译师考试培训教材(口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上海电影译制厂编著. 魅力人声.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上海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八室编辑. 英语翻译技巧. 上海: 上海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八室,1980.
上海市外语口译岗位资格证书考试委员会,上海市高级口译岗位资格证书考试大纲.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002.
上海市外语口译岗位资格证书考试委员会,上海市英语中级口译岗位资格证书考试大纲.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上海市外语口译岗位资格证书考试委员会,上海市高校浦东继续教育中心. 上海市英语中级口译岗位资格证书考试大纲.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上海市外语口译岗位资格证书考试委员会,上海市高校浦东继续教育中心. 上海市英语高级口译岗位资格证书考试大纲.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本手册编写组. 英语口译手册.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邵启祥. 科技英语翻译中的陷阱、误区及其他.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1991.
邵循道编. 英语医学书刊阅读与翻译教程.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
邵志洪. 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邵志洪编. 汉英对比翻译导论.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申丹. 文学文体学和小说翻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申厚坤,梁仪编. 翻译理论与技巧(上). 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申阎春等. 英语翻译技巧与精练. 北京：地质出版社,1998.
申迎丽. 理解与接受中意义的构建——文学翻译中"误读"现象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申雨平,戴宁. 实用英汉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沈苏儒. 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沈苏儒. 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沈苏儒. 沈苏儒对外传播翻译研究文集.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9.
沈尧年. 新编科技英语翻译教程.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3.
沈银珍主编. 商务英语口、笔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石定乐等编. 实用商务英汉互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2007.
石定乐等编. 国际商务英汉翻译教程.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石定乐,蔡蔚,王纯林. 实用商务英汉互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石璠编. 英诗阅读和翻译.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史志康. 商务翻译教程.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司显柱. 翻译研究：理论·方法·评估.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司显柱. 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建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司显柱,曾剑平编. 英译汉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思果.《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选评.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思果. 翻译新究.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思果. 翻译研究.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思果. 译道探微.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思果.《卖花女》选评.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思果.《名利场》选评.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思果.《飘》选评.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思果.《推销员之死》选评.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四川省外国文学学会编. 评论·借鉴·翻译.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编. 英语语言·文化·翻译研究.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宋德文编. 国际贸易英文合同文体与翻译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宋广礼,赵忠颖主编. "翻译"科学的艺术：科普广播研究文萃.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8.
宋雷. 法律英语同义、近义术语辨析和翻译指南.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宋天锡等. 翻译新概念：英汉互译实用教程.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2003/2005/2007/2009.
苏冰. 实用英汉互译教程.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
苏福忠. 译事余墨. 北京：三联书店,2006.
苏里敏. 名片与名片翻译.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苏为光编. 英文翻译 ABC. 上海：世界书局,1930.
苏为群采访、整理. 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苏秀. 我的配音生涯.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宿荣江. 文化与翻译.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隋荣谊主编. 英汉翻译新教程.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
隋荣谊主编. 汉英翻译新教程.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
孙伯君,聂鸿音. 契丹语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孙光成,赵芝主编. 翻译技巧：翻译技巧学术研讨会文集. 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
孙海晨. 汉译英实用技能训练.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2007.
孙会军. 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孙建成.《水浒传》英译的语言与文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孙萍编. 英汉翻译导论.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
孙瑞禾. 汉语虚词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孙万彪. 英语高级口译资格证书考试·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孙万彪等. 英语中级口译资格证书考试·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孙万彪等. 英语高级口译资格证书考试·高级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006.
孙万彪. 英汉法律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孙万彪. 英语中级口译资格证书考试·中级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2008.
孙万彪. 汉英法律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孙晓梅主编. 职业英语口译培训教程.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孙艺风. 理论　经验　实践——再论翻译理论研究.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孙艺风. 视角　阐释　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孙迎春主编. 译学词典与译学理论文集(2002 烟台全国翻译学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文集). 济南：山

东大学出版社,2003.
孙迎春. 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孙迎春编. 2004翻译学词典与译学理论文集.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孙迎春主编. 翻译学词典博士文集.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孙迎春主编. 汉英对照翻译学论说.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
孙迎春编. 第二次大水——归、异翻译策略辩证.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
孙迎春. 科学词典译编.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
孙迎春. 译学词典论.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孙迎春,李云楼主编. 翻译、语法、外语教学研究文萃.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孙致礼. 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孙致礼. 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孙致礼主编.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谭宝全. 现代英语翻译诀窍.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
谭卫国等主编. 新编英汉互译教程.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2009.
谭云杰主编,胡德清等编. 英译汉技巧与实例.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谭云杰,沈金华主编. 实用汉译英教程.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
谭载喜. 翻译学.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谭载喜编译. 奈达论翻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谭载喜编译. 新编奈达论翻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初版)/2004(增订版).
汤军. 风动·幡动·心动：翻译审视. 济南：齐鲁书社,2003.
汤静芳主编. 商务英语翻译.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唐连成,吕俊. 英汉翻译教程、英汉翻译教程副册.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
唐清里等. 医学期刊摘要英译错误例析.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陶庆主编. 实用英汉汉英口译教程.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陶友兰,鲍晓英编. 高级英语口译：理论、技巧与实践.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陶友兰,查国生主编. 研究生英语翻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陶友兰. 论中国翻译教材建设之理论重构.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滕超,孔飞燕. 英汉法律互译：理论与实践.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田传茂,杨先明. 汉英翻译策略.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田惠雨等. 医用英译汉翻译理论与技巧. 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田鹏森,季建芬. 翻译教程.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田鹏森,季建芬主编. 世纪研究生英语：翻译教程.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田为平编. 科技英语汉译教程.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田向国,陈达. 科技英语翻译概要.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田玉丰. 农业科技汉译英指南. 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倜西,董乐山,张今. 英译汉理论与实例.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倜西,董乐山,张宁编. 英汉翻译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2.
仝益民主编. 说词解句——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涂和平等编. 外事翻译理论与实践.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屠岸. 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屠国元主编. 外语·翻译·文化(第三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屠国元主编. 三湘译论(第四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屠国元主编. 三湘译论(第五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屠国元. 翻译研究的多维视角.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屠国元,廖晶. 英汉文化语境中的翻译研究.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
《外国语》,《译林》编辑部编. 漫谈翻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万江波. 双语词典的翻译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汪福祥. 汉译英难点解析500例.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
汪福祥. 汉译英中的习语翻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汪福祥,伏力编. 英美文化与英汉翻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
汪榕培. 比较与翻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汪榕培. 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汪榕培,关兴华主编. 典籍英译研究(第三辑).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汪榕培,李秀英主编.典籍英译研究(第二辑).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汪榕培,李正栓主编.典籍英译研究(第一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汪榕培,王宏主编.中国典籍英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汪淑钧编.科技英语翻译入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
汪涛.实用英汉互译技巧.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006.
汪向同.我的丈夫冀朝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王宾.翻译与诠释.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王斌.翻译与概念整合(英文本).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
王斌华.口译:理论·技巧·实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王秉钧,郭正行.科技英汉、汉英翻译技巧.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
王册.科技英语翻译技巧.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王重稼.医学专业英译汉病句分析100例.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1986.
王重稼.医学专业汉译英病句浅析.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王重稼.医学英语实用语法和翻译技巧.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5.
王大伟.现代汉英翻译技巧.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
王大伟.现场汉英口译技巧与评析.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王大伟等编.汉英翻译技巧教学与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王达金,吴志芳.汉语量词英译详解.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王道庚编.新编英汉法律翻译教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王德军等主编.实用英汉翻译教程.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王定伟.英汉翻译教程.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王东风主编.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王东风.连贯与翻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王恩科等编.文化视角与翻译实践.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王恩冕编.大学英汉翻译教程.第2版.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王恩冕编.如何翻译英语报刊经济文章.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王恩冕主编.进入21世纪的高质量口译——第六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王恩冕,李正中编.大学英汉翻译教程.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8.
王逢鑫.汉英口译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王逢鑫编.高级汉英口译教程.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王逢鑫.中国人最易犯的汉译英错误.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王桂珍主编.高级汉英、英汉口译教程(上)(下).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2003.
王桂芝.英汉同声传译训练教程·对外贸易分册.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6.
王桂芝.英汉同声传译训练教程·对外交流分册.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7.
王红卫等编.商务英语英汉口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王宏主编.翻译研究新论:2006年全国翻译高层研讨会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王宏印.英汉翻译综合教程:理论、技法、习作、欣赏.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998.
王宏印.《画语录》注译与石涛画论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王宏印.白话解读公孙龙子——文本注译与思想重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
王宏印.古诗文英译选析.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王宏印编.世界名作汉译选析.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王宏印.《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王宏印.《诗品》注译与司空图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王宏印.英汉翻译综合教程:理论、技法、习作、欣赏.修订本.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07.
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王宏印评著.英诗经典名译评析:从莎士比亚到金斯柏格.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王宏印.穆旦诗英译与解析.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论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王宏印.中外文学经典翻译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概论:从文学批评到翻译教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王宏印编.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王宏志. 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王宏志. 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王洪涛. 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理论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王吉玉主编. 新编常用词语汉英快译通.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
王建国. 刘宓庆翻译散论.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王建国. 关联理论与翻译研究.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
王建开. 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 1919～1949.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王建平编. 研究生英语写译教程.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
王洁玉编. 简明口译教程.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王金铃. 文学翻译新论.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王军. 翻译中语篇解构与重构的思维模式.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论.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王克非. 从翻译史看文化差异.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王克友. 翻译过程与译文的演生——翻译的认识、语言、交际和意义观.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王蓝主编. 英译汉误差辨析.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王立大等. 实用医学英语汉译技巧. 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王连义. 导游翻译二十讲.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0.
王令坤主编. 英汉翻译技巧.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
王宁.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 北京：中华书局,2006.
王鹏.《哈利·波特》及其汉语翻译——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分析情态系统.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王平. 文学翻译批评学.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
王仆. 翻译之友.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
王琼. 英汉互译教程.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王泉水. 科技英语翻译技巧.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王仁强. 认知视角的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实证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王汝丰. 论严复与严译名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王瑞. 莎剧中称谓的翻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王寿兰编. 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王述文主编. 综合英汉翻译教程.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王铁钧. 中国佛典翻译史稿.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王卫红,张立玉编. 商务英语英汉口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王卫平主编. 高级口译英汉互译教程.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王卫平,潘丽蓉主编. 英语科技文献的语言特点与翻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王文华. 翻译的概念.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王文明. 英汉翻译现学现用.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王文秀. 医务英语翻译.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王武兴.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王武兴编. 英汉互译指导与篇章翻译.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4.
王宪明. 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王向远. 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概论.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王向远. 翻译文学导论.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王向远. 王向远著作集·第八卷,翻译文学研究.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王向远,陈言.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
王小凤. 英汉词语文化与翻译研究.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王晓丹编. 翻译史话.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王欣主编. 英汉翻译.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6.
王欣主编. 纵横：翻译与文化之间.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王学文等编. 经贸口译教程. 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3.
王学文等编. 新编经贸口译教程. 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1.
王耀庭主编. 英语写作与翻译实用教程.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王耀庭,谭弓. 科技文献汉译英概论.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王耀庭,谭弓. 科技文献汉译英概论. 第2版.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王晔主编. 新编实用英语——法律口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王沂暖编. 翻译论文集. 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1983.
王银泉编. 实用汉英电视新闻翻译. 武汉：武汉大学

出版社,2009.
王颖,吕和发主编. 公示语汉英翻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王勇. 英汉·汉英口译教程.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王友贵. 翻译西方与东方：中国六位翻译家.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王月仁. 英汉实用科技翻译教程新编.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
王运. 实用科技英语翻译技巧.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
王运,杨力田编. 科技英语句型及翻译处理. 北京：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1985.
王振国,李艳琳编. 新英汉翻译教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王治奎等. 大学英汉翻译教程.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
王治奎等编. 大学英汉翻译教程：参考译文分册.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
王治奎等. 大学英汉翻译教程. 第2/3版.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2004.
王治奎主编. 大学汉英翻译教程.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2001/2005.
王佐良. 翻译：思考与试笔.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王佐良. 论新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英文本).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王佐良. 论诗的翻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王佐良. 王佐良文集.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魏立智. 翻译转换论.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
魏向清. 双语词典译义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魏象乾. 繙清说. 北京：内府刻本,1740.
魏志成编. 英汉比较翻译教程.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魏志成编. 英汉比较翻译教程练习.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魏志成编. 汉英比较翻译教程.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魏志成编. 汉英比较翻译教程练习.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温建平等. 翻译与写作能力培养.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8.
温绍贤. 中英诗意境的异同及其翻译. 河南新郑：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美资),2003/2006.
温秀颖. 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文军等主编. 当代翻译理论著作评介.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文军. 翻译：调查与研究.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4.
文军等主编. 外语·翻译·文学.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4.
文军. 翻译课程模式研究——以发展翻译能力为中心的方法.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文军. 科学翻译批评导论.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文军,张镇华,王斌主编. 外语翻译与文学研究.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
文秋芳,王金铨编. 中国大学生英汉汉英口笔译语料库.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本书含DVD-ROM两张。
翁凤翔编. 实用翻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翁凤翔主编. 当代国际商务英语翻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翁显良. 意态由来画不成？——文学翻译从谈.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邬姝丽主编. 实用英语高级口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吴冰等. 大学英语口译(汉英)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
吴冰主编. 汉译英口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吴冰主编. 现代汉译英口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吴冰主编. 现代汉译英口译教程练习.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吴波. 论译者的主体性.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
吴存民. 分析与翻译(上、下册). 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
吴古华. 新世纪研究生公共英语教程：口语口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吴海勇. 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吴结评. 英语世界里的《诗经》研究.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吴瑾瑾主编. 实用英汉翻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吴钧. 鲁迅翻译文学研究. 济南：齐鲁书社,2009.
吴来安,汪德华主编. 城建类专业英语——阅读与翻译. 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
吴南松. "第三类语言"面面观——文学翻译中的译作语言探索.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吴其宽,吴瑞华. 文言今译技巧.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吴青. 文本显征及其在翻译中的差移：从文本看翻译效果的认知基础.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吴世醒编. 实用英汉翻译技巧. 济南：济南出版社,1995.
吴守谦编. 英语口译教程.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1999.
吴曙天编. 翻译论. 上海：光华书局,1932.
吴伟雄,方凡泉编. 实用英语翻译技巧. 昆明：云南人

民出版社,1997.
吴文安.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吴献书.英文汉译的理论与实际.上海:开明书店,1936.
吴献书.英文汉译的理论与实际(修订版).北平:开明书店,1949.
吴新祥,李宏安.等值翻译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吴永尧.快速英译汉实用技法.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4.
吴友富主编.国俗语义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吴友富主编.外语与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吴友富主编.外语与文化研究(第二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吴友富主编.外语与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吴友富主编.外语与文化研究(第四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吴友富主编.外语与文化研究(第五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吴友富主编.外语与文化研究(第六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吴云编.英语会展口译:会展场景100案例.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吴云,朱艳华等主编.当代国际商务英语口语、口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吴志杰.中国传统译论专题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吴钟明主编.英语口译笔记法实战指导.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伍锋,何庆机主编.应用文体翻译:理论与实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武力,赵拴科编.科技英汉汉英翻译教程.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
西北工业大学外语教研室.科技英语翻译初步.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奚瑞森.一得集——翻译家谈英语学习.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1999.
奚永吉.翻译美学比较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
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奚永吉.莎士比亚翻译比较美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夏登峻.法律英语英汉翻译技巧.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夏康明等.英语经贸契约翻译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夏培厚.科技英语汉译技巧.北京: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
夏廷德.翻译补偿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厦门大学外文系中英英语合作项目小组编,林郁如,罗能根等编.新编英语口译教程(学生用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厦门大学外文系中英英语合作项目小组编,林郁如,罗能根等编.新编英语口译教程(教师用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咸修斌等.涉外英语写作与翻译技巧.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1996.
肖辉,陶长安主编.新编实用英语——经贸口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肖辉,汪小毛主编.汉译英教程.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肖君石.汉英、英汉翻译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肖婉丽主编.汉英翻译教程.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
肖晓燕.走进口译——欧盟亚欧口译项目多媒体教学资料.杨柳燕译注.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萧安溥,李郊编.英汉翻译教程.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萧立明.新译学论稿.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萧立明.英汉比较研究与翻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萧立明,娄胜平编.英译汉规则与技巧.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谢葆辉,蔡芳.口译理论与实践.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
谢国章.科技英语翻译技巧.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7.
谢建国主编.英语翻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谢建平等.功能语境与专门用途英语语篇翻译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谢金顺编.世纪商务英语翻译教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谢思田."信、达、雅"解构视界下的中西译理融合.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谢天振.译介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谢小苑主编.科技英语翻译技巧与实践.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谢耀文.恼人风味阿谁知:翻译理论与技巧.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辛红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

象.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新世纪高职教材编委会组编,谢金领,吴静主编. 世纪商务英语翻译教程.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邢修祥. 科技英语读译指南.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1985.
熊文华. 英汉翻译教程(第一册).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熊文华编. 英汉翻译教程——理论与实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徐朝友编. 英汉互译教程.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9.
徐东风等. 英语口译实战技巧与训练.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徐海铭,季海宏. 实用英汉汉英口译教程.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徐江. 轻松学习英汉互译——翻译水平是这样提高的. 天津: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2.
徐来. 英译《庄子》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徐启华等. 实用英译汉教程.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
徐珺. 古典小说英译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儒林外史》汉英语篇对比与翻译研究.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徐锡华,伍锋主编. 高级商务口笔译: 笔译篇.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徐小贞,赵敏鲲,刘建珠. 商务现场口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徐亚男,李建英. 外事翻译——口译和笔译技巧.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许承军主编. 英汉翻译教程.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许国璋. 许国璋论语言.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许国璋. 论语言和语言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许建平. 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许建平. 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 第 2 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许建平主编. 研究生英语实用翻译教程.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08.
许建平. 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 第 3 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许建平编. 英汉互译入门教程.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许建忠. 工商企业翻译实务.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许建忠. 翻译生态学.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
许钧编. 翻译思考录(1987～1997).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许钧等.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1.
许明武. 新闻英语与翻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许余龙. 语言与翻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增订本).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许渊冲. 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许渊冲. 追忆逝水年华. 北京: 三联书店,1996.
许渊冲. 续忆逝水年华.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许渊冲. 唐诗翻译引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许渊冲. 诗书人生.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许渊冲. 翻译与文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许渊冲. 山阴道上书与人——许渊冲散文随笔选.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许渊冲. 译笔生花. 郑州: 文心出版社,2005.
轩治峰等编. 新编英汉翻译技巧.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
轩治峰. 英汉互译理论与技巧.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薛范. 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严辰松主编. 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严俊仁. 科技英语翻译技巧.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
严俊仁. 汉英科技翻译.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2004.
严俊仁编. 科技英语阅读与翻译——重点与难点解读.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严晓江. 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研究.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严轶伦等主编. 新理念英译汉教程.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7.
闫文培. 实用科技英语翻译要义.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8.
阎佩衡.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学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阎庆甲. 科技英语翻译方法.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1981.
阎庆甲. 科技英语翻译手册.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阎庆甲,阎文培. 科技英语翻译方法(修订本).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1992.
颜洪恩,颜宁. 翻译理论与实践.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颜惠庆编. 翻译手册. 第 3 版.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28.
颜林海. 翻译认知心理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8.

杨承淑. 口译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杨大亮主编. 大学商务英语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杨大亮,李文中主编. 高级英汉汉英口译教程(第二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杨大亮,袁彩虹主编. 高级英汉汉英口译教程(第一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杨棣华主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英语口译实务.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杨恩堂,姚秀清主编. 英语口译技巧.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
杨丰宁.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
杨丰宁,王雪编. 研究生英语写译教程.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
杨海燕等编. 电力科技英语口译.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杨辉编. 实用英汉口译教程.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杨辉,史凤春. 实用英汉口译教程. 第2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杨建华. 新理念英汉互译.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
杨立武,罗波编. 龙文鞭影译评. 成都：巴蜀书社,1993.
杨莉藜编. 英汉互译教程(上、下).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
杨柳. 林语堂翻译研究——审美现代性透视.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杨沐昀等. 机器翻译系统.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
杨全红. 汉英词语翻译探微.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
杨全红. 走近翻译大家.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杨士焯编. 英汉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杨寿康. 论科技英语与科技翻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
杨树隽,薛廷民编. 医学英语文献翻译与写作.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3.
杨天庆编. 英语导游考试翻译练习.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大地出版社,2005.
杨天权,邵念贤编. 英语医学名著汉译技巧精华. 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6.
杨文秀. 英语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杨贤玉. 翻译理论与教学实践.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杨宪益. 译余偶拾. 北京：三联书店,1983.
杨宪益. 漏船载酒忆当年.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杨宪益. 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杨宪泽. 人工智能与机器翻译.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杨晓荣. 小说翻译中的异域文化特色问题.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杨晓荣. 翻译批评导论.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杨晓荣. 汉英翻译简明教程.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杨晓荣. 汉英翻译基础教程.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
杨晓荣主编. 二元·多元·综合——翻译本质与标准研究.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杨晓荣,边彦耀编. 中译外研究.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6.
杨一秋主编. 实用英汉口译.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
杨玉林编. 实用英汉翻译技巧.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5.
杨跃,马刚. 实用科技英语翻译研究.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杨镇华. 翻译研究.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杨自俭主编. 译学新探.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杨自俭主编选.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3).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杨自俭主编选.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4).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杨自俭主编选.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5).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杨自俭主编选.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6).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杨自俭,刘学云编选. 翻译新论(1983～1992).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要同林主编. 比较与翻译.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3.
姚念赓,范岳. 英汉翻译论稿.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叶笃庄,马珂等主编. 全国第八次科技翻译研讨会论文集. 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
叶永昌主编. 化工英语文选和翻译技巧.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1980.
叶玉龙等编. 商务英语汉译教程.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叶子南. 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2008.
叶子南. 英汉翻译对话录.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易宏根主编. 英语口译教程(1、2).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尹承东主编. 翻译产业经营论集.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尹富林,阮玉慧. 英汉互译——理论与实践.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7.
于国栋. 英/汉语码转换的语用学研究.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于岚. 英汉实例翻译技巧.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7.
于艳红. 实用英汉翻译指导.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余富林编. 大学英语外贸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0.
余富林等编. 商务英语翻译(英译汉).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3.
余光中. 余光中论翻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余立三. 英汉修辞比较与翻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余石屹编. 汉译英理论读本.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余石屹编. 英译汉理论读本.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俞泰庆编. 上海市外语口译岗位资格证书培训与考试项目研究.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俞佳乐. 翻译的社会性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于德英. "隔"与"不隔"的循环：钱锺书"化境"论的再阐释.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宇文所安. 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 王柏华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喻云根等编. 新编翻译教程(英语专业教学参考资料). 洛阳：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1987.
喻云根主编. 翻译教材(英语专业用).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喻云根主编. 英美名著选读与翻译.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
喻云根主编. 英译汉教程——理论与实践.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
喻云根主编. 英美名著翻译比较.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喻云根，严维明等.《翻译教材》教学参考资料.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俞政. 严复译著研究.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原传道. 实用英汉翻译技巧.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袁锦翔. 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袁颖. 科技英语翻译与实践.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
岳峰. 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岳峰. 英汉互译举要. 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岳峰. 儒经西传中的翻译与文化意象的变化.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赞宁. 宋高僧传. 北京：中华书局，1987.
臧仲伦. 中国翻译史话.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曾诚编. 实用汉英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曾传生编. 英语高级口译——实用同声传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曾传生编. 英语同声传译.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曾道明，陶友兰主编. 研究生英语·英汉互译教程.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曾东京. 英汉/汉英语文辞书研究.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
曾东京. 翻译学词典编纂之理论研究.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曾剑平，况新华主编. 翻译技巧与研究.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2.
曾凯民. 汉译英求疵录——从中式英语到准确英语.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
曾庆丰. 实用电讯新闻翻译教程.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曾文雄. 语用学翻译研究.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查明建，谢天振. 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下卷).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翟天利主编. 科技英语阅读与翻译实用教程. 北京：新时代出版社，2003.
张保红. 汉英诗歌翻译与比较研究.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3.
张蓓. 汉英时文翻译实践.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张柏然，刘华文，张思洁主编. 中国译学：传承与创新——2008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高层论坛文集.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张柏然，许钧主编. 译学论集.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张柏然，许钧主编. 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张彩霞等. 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张沉香. 功能目的理论与应用翻译研究.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张传彪. 诗笔·译笔·钝笔：英汉语翻译与比较纵论.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
张传彪，缪敏编. 汉英误译经典例析1 000.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张春柏. 英汉汉英翻译教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张达聪. 翻译原理与技巧.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
张福林. 实用法律英汉翻译. 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
张福清编. 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 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张复星. 英语典故成语用法译法举隅.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张光明. 名译赏析导论.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
张光明. 英汉互译思维概论.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张光明. 英汉修辞思维比较与翻译.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张弘. 现代英语高级口译教程. 哈尔滨：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5.

张积玉,王钜春.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张建威. 出卖口译天机.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张建威,罗卫华. 实用英语口语同声传译.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张建文. 民航飞行英语口译教程. 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5.

张健. 报刊新词英译纵横.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

张健. 报刊语言翻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张健编. 新闻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张今. 文学翻译原理.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张今等. 英汉翻译技巧.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

张今,张宁. 文学翻译原理. 修订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张经浩. 译论.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

张经浩,陈可培主编. 名家名论名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张经浩,陈可培主编. 名家名论名译. 修订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张经浩,马珂编. 中译外社科论丛. 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

张军平. 翻译中的语段研究：形合与意合的"字本位"视角.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张克亮. 面向机器翻译的汉英句类及句式转换.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

张坤鹏,韦红佩编. 口译知识与技巧.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

张立玉等. 实用英汉汉英口译教程.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张立玉、王卫红编. 国际商务英汉、汉英口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008.

张林玲编. 商务英语合同翻译与写作.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

张鸾铃. 实用英汉翻译技巧.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2000.

张梅岗. EST 修辞与翻译.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张梅岗等. 实用翻译教程(上).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张梅岗. 实用翻译教程(下).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张梅岗. 科技英语修辞.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张梅岗. 英汉功能翻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张梅岗编. 英汉翻译新方法.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张梅岗等主编. 英汉翻译教程.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张美芳. 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张美芳. 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张梦井主编. 比较翻译概论.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张梦井,杜耀文. 汉英科技翻译指南.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6.

张南峰. 中西译学批评.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张培基. 习语汉译英研究. 北京：时代出版社,1958.

张培基. 习语汉译英研究. 修订第 2 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张培基. 英语声色词与翻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张培基,喻云根等编. 英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2008.

张其春. 翻译之艺术. 上海：启明出版社,1949.

张其春. 翻译之艺术. 上海：上海书店,1991.

张岂之,周祖达主编. 译名论集.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

张清平编. 英语口译基本技能.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9.

张蓉. 汉英口译特训.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张淑芝. 金融·经贸·科技领域翻译理论与实践. 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张思洁. 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张维为. 英汉同声传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张炜主编. 外贸英语的语言特点与翻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张文. 汉英英汉高级口译教程.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4.

张文,韩常慧. 口译理论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张新红,李明编. 商务英语翻译(英译汉).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张旭. 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张燕清,席东编. 英汉互译理论与实践：理论篇.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张燕清,席东编. 英汉互译理论与实践：实务篇.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张彦,李师君. 商务文体翻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张玉昆. 科技翻译实务.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张玉民. 汉译英技巧与英语外位结构. 北京：新时代出版社，1990.
张煜，康宁编. 实用英汉翻译教程.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张则之. 实用翻译法(汉英对照). 北平：北平科学出版社，1936.
张则之. 翻译类纂. 北平：文化学社，1945.
张振玉. 翻译学概论.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
张震久，孙建民主编. 英汉互译简明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张震久，袁宪军. 汉英互译基础.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009.
张政. 计算机翻译研究.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张志鸿. 医学英语汉译技巧.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
张志鸿. 科技英语汉译叙要.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
张治英，朱勤芹编. 跨文化交际与翻译策略.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张智中. 许渊冲与翻译艺术.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张智中. 毛泽东诗词英译比较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张宗美. 科技汉英翻译技巧. 北京：宇航出版社，1992.
章含之.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
章和升等主编. 英汉翻译概要.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章和升，王云桥. 英汉翻译技巧.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
章鸿猷. 英文计算机术语译名研究.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赵春铭主编. 医学英语阅读与翻译.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赵德全. 纯理功能的传译——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的翻译研究.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赵东林. 基于语篇类型的翻译对等研究.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赵伐. 英汉高级口译教程.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赵光育. 中国翻译小说史论.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赵广平，龙大友编. 英汉互译技巧与实例.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赵桂华. 翻译理论与技巧.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
赵桂华编. 翻译理论与技巧. 第 2 版.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
赵洪定主编. 巴蜀译论.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赵化勇主编. 译制片探讨与研究.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赵化勇主编. 跨文化传播探讨与研究.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赵继政编. 商务现场口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赵军峰. 新编经贸英语口译教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赵军峰. 商务英语口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赵立柱. 英语翻译.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赵濂直，冯燕屏主编. 英汉翻译实用教程(英汉互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赵萝蕤. 我的读书生涯.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赵敏懿，刘建珠主编. 商务现场口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赵敏懿，刘建珠主编. 商务现场口译：教师用书.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赵明编. 语际翻译与文化交融：汉英互译的理论与实践.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
赵朋编. 译海精要——英汉—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赵起编. 英汉翻译学实用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赵铁军等. 机器翻译原理.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
赵文静. 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赵稀方. 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赵萱，郑仰成主编. 科技英语翻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赵萱，郑仰成主编. 科技英语翻译 · 教师手册.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赵雪琴. 英汉双语词典中搭配信息认知模型的构建.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赵彦春. 翻译诗学散论.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
赵彦春，周国瑞编. 当文化派遭遇归结派——翻译学范式的对峙与争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赵振才，王廷秀等. 科技英语翻译常见错误分析.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0.
郑和平主编. 英译汉实用教程.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郑鲁南编. 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翻译家笔谈世界文学名著"到中国".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郑鲁南主编. 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翻译家笔谈世界文学名著"到中国"(第二集).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
郑声滔编. 翻译与文化交流：翻译学新教程. 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郑诗鼎. 语境与文学翻译.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7.
郑雅丽. 英汉修辞互译导引.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郑延国. 翻译方圆.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郑仰成. 电力科技英语翻译方法与技巧.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
郑宗杜,郑声滔主编. 学海采珠——全国优秀英语学术文集(上卷). 成都: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郑宗杜,郑声滔主编. 学海采珠——全国优秀英语学术文集(中卷). 成都: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郑宗杜,郑声滔,李鲁主编. 学海采珠——全国优秀英语学术文集(下卷). 成都: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6.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 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 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编. 联合国翻译论文集.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
《中国翻译》编辑部编. "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作品与评析.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8.
《中国翻译》编辑部编. 诗词翻译的艺术(论文集).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中国翻译》编辑部编. 中译英技巧文集.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
《中国翻译》编辑主编. 文化丝路织思——献给许渊冲学术思想与成就研讨会.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 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翻译》杂志编辑部. 科技翻译技巧文集.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中国翻译协会编. 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光盘版论文集.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08.
中国翻译协会编. 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中文).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08.
中国翻译协会编. 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Ⅰ)(Ⅱ)(英文、法文).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08.
中国翻译协会科技翻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主编. 科技翻译信息化.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5.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商务培训认证考试办公室. 国际商务英语翻译(一级).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军事训练教材编辑工作委员会编. 科技英语翻译实用教程.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2003.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 机器翻译论文选辑.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9.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编,孙光成,赵芝编. 翻译技巧: 翻译技巧学术研讨会文集. 成都: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
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编.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二级翻译口笔译考试大纲(修订版).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04.
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编.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三级翻译口笔译考试大纲(修订版).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04.
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编.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二级口译英语同声传译类考试大纲.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05.
中国外文局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杨正泉主编.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1949～1999). 北京: 新星出版社,1999.
中国外文局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周东元等编.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2). 北京: 新星出版社,1999.
中国外文局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戴延年等编.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1、2). 北京: 新星出版社,1999.
中国外文局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书刊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 新星出版社,1999.
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全国翻译服务公司协作网秘书处编印. 全国第一届翻译经营管理工作研讨会(南京)论文集(2001). 北京: 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全国翻译服务公司协作网秘书处,2001.
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全国翻译服务公司协作网秘书处编印. 全国第二届翻译经营管理工作研讨会(海口)论文集(2002). 北京: 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全国翻译服务公司协作网秘书处,2002.
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全国翻译服务公司协作网秘书处编印. 全国第三届翻译经营管理工作研讨会(成都)论文集(2003). 北京: 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全国翻译服务公司协作网秘书处,2003.
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全国翻译服务公司协作网秘书处编印. 全国第四届翻译经营管理工作研讨会(天津)论文集 (2004). 北京: 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全国翻译服务公司协作网秘书处,2004.
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全国翻译服务公司协作网秘书处编印. 全国翻译服务公司协作网成员基本情况表(2004 年版). 北京: 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全国翻译服务公司协作网秘书处,2004.
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选编. 论英汉翻译技巧(文集).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翻译服务规范. 第一部分, 笔译.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 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2005.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 翻译计划参考资料. 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1953.

钟少华. 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钟述孔. 英汉翻译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983.
钟述孔. 英汉翻译手册. 修订版.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钟述孔. 实用口译手册.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1991/1999.
仲伟合主编. 翻译研究：理论·技巧·教学.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仲伟合主编. 英语口译教程(上、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仲伟合. 口译理论研究.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仲伟合主编. 英语口译教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仲伟合主编. 英语口译基础教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仲伟合主编. 英语同声传译教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仲伟合,王斌华主编. 基础口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周方珠编. 英汉翻译原理.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2002.
周方珠. 翻译多元论.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周光父,高岩杰等. 实用英语口译(科技类).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
周国珍. 科技英语翻译十讲.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周珏良. 周珏良文集.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周玲编. 如何翻译英语法律文献.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周行. 科技英语翻译入门. 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周仪,罗平. 翻译与批评.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周玉忠. 英美文学与翻译研究.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周兆祥. 汉译《哈姆雷特》研究.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
周兆祥. 翻译与人生.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周振邦. 商务英语翻译. 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8.
周志培,冯文池. 英汉语比较与科技翻译.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
周志培. 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朱安博. 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朱纯深. 翻译探微：语言·文本·诗学. 最新修订版.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朱道敏,王桂珍编. 新编大学英语口译教程(上、下).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朱光复. 书目·书评·善本·译学：读陈译《普林斯顿大学盖斯特东方收藏》. 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
朱宏达,吴洁敏. 朱生豪传.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
朱徽主编. 汉英翻译教程.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朱健平. 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朱梅萍总主编,王艳主编. 商务英语口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朱佩芬. 实用英汉口译技巧.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
朱佩芬. 新编实用英汉口译技巧.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
朱佩芬等编. 商务英语口译教程.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
朱歧新,张秀桂. 英语导游翻译实用手册.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0.
朱歧新,张秀桂. 英语导游翻译必读(英文本).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
朱巧莲. 汉英口译实战案例.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朱巧莲主编. 会议口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朱巧莲,吴灿中编. 英汉口译实战案例.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朱庆编. 科技英语翻译思维探索.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朱世伟. 会计英语翻译浅说.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4.
朱文振. 翻译与语言环境.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朱宪超,韩子满. 译员基础教程——如何组建翻译公司.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朱伊革主编. 英语新闻的语言特点与翻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朱永强等编. 电力专业英语阅读与翻译教学辅导.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
朱毓芝. 翻译琐谈.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朱志瑜,朱晓农. 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朱庄. 科技英语翻译思维探索.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祝朝伟. 构建与反思——庞德翻译理论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祝东江,李晓燕主编. 英汉互译一本通：应用篇.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祝东江,彭家玉主编. 英汉互译一本通：基础篇. 北

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祝吉芳主编. 英汉翻译：方法与试笔.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庄明亮. 汉英同声传译技巧.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
庄绎传. 汉英翻译 500 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庄绎传. 英汉翻译教程辅导用书.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庄绎传. 英汉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庄绎传. 英汉翻译简明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庄智象. 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卓振英. 华夏情怀——历代名诗英译及探微.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卓振英. 汉诗英译论要. 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
资中筠等译. 万象译事(卷一).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邹力编. 商务英语翻译教程(口译).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邹人杰. 汉英科技翻译技巧.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
邹瑞凯主编. 英语翻译教程.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1.
邹韬奋. 译余闲谈.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邹振环. 江苏翻译出版史略.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邹振环.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 1815 至 1911 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邹振环. 译林旧踪.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邹振环. 二十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二) 其他外国语与汉语双向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1. 德汉、汉德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佛雏. 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高金岭. 朱光潜西方美学翻译思想研究.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桂乾元. 德语翻译入门.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桂乾元. 翻译学导论.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桂乾元. 德语口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桂乾元，肖培元编. 汉德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胡国理编. 科技德语的阅读与翻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黄雪媛编. 同传捷径——德语高级口译技能训练与实战演练教程.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李博. 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 赵倩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李健民编. 德汉科技翻译基础教程.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李逵六. 德语口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马宏祥. 中德国情口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钱文彩. 汉译德理论与实践.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钱文彩. 汉译德理论与实践. 第 2 版.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田飞龙编. 科技德语翻译手册. 西安：西安外国语学院，1979.
田飞龙编. 科技德语翻译技巧.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
王滨滨编. 德汉汉德综合翻译教程.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6.
王京平. 德语翻译教学新理念——翻译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卫茂平. 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杨寿国编. 德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杨武能. 圆梦初记.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杨武能. 三叶集：德语文学 · 文学翻译 · 比较文学. 成都：巴蜀书社，2005.
张崇智. 德汉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张建琪. 德汉翻译基础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赵其昌主编. 德汉科技翻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编.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 德语二级翻译口笔译考试大纲.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
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编.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德语三级翻译口笔译考试大纲.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
周恒祥. 证书证件德译技巧.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 法汉、汉法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编. 法国语言与文化研究. 北京：三联书店，2002.
陈宗宝编. 法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冯百才编. 实用法译汉教程.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

冯百才编. 新编法译汉教程.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3.
傅敏编. 傅雷谈翻译.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郭宏安. 雪泥鸿爪.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蒋向艳. 程抱一的唐诗翻译和唐诗研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金圣华编. 傅雷与他的世界. 北京：三联书店，1996.
金圣华. 译道行.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李军主编. 法汉汉法翻译训练与解析.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李治华. 里昂译事. 蒋力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刘宝义. 法语经贸谈判与口译.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
刘和平. 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刘和平. 口译理论与教学.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刘和平编. 法语口译教程：学生用书.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刘和平编. 法语口译教程：教师用书.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柳玉刚. 法汉/汉法口译教程.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5.
罗国林编. 法译汉理论与技巧.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罗顺江，马彦华. 法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罗顺江，马彦华. 汉法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马彦华，罗顺江. 法汉翻译新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余协斌. 法汉翻译文集.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
施康强. 自说自话.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宋学智. 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孙慧双. 歌剧翻译与研究.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田保荣. 译校思断录.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徐岚主编. 同传捷径——法语高级口译技能训练与实战演练教程.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许钧.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
许钧. 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许钧. 翻译论.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006.
许钧. 译道寻踪. 郑州：文心出版社，2005.
许钧主编. 法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许钧. 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许钧主编. 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许钧，宋学智. 20 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许钧，宋学智编. 走进傅雷的翻译世界：傅雷译文精选与评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许钧编. 翻译概论.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许钧，袁筱一.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许钧，袁筱一等.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许渊冲. 论法译汉. 洛阳：洛阳外国语学院，1970.
许渊冲. 追忆逝水年华. 北京：三联书店，1996.
许渊冲. 续忆逝水年华.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许渊冲. 诗书人生.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许渊冲. 翻译与文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岳扬烈编. 汉译法实践.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张成柱编. 汉译法指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张成柱编. 法译汉指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张成柱编. 文学翻译教程.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张成柱. 文学翻译研究.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张泽乾. 翻译经纬.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郑福熙. 法汉翻译基础知识.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3.
中国翻译协会编. 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Ⅰ）（Ⅱ）（英文、法文）.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编.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法语二级翻译口笔译考试大纲.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编.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法语三级翻译口笔译考试大纲.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周克希. 译边草.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2008.
庄晨燕，邱寅晨. 口译学习与实践.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庄元泳. 大学法语口译教程：接待部分.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3. 西汉、汉西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常世儒编. 西班牙语口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常世儒编. 西汉口译实用理论与技巧.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林一安. 奇葩拾零.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盛力编. 西班牙语口译.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
盛力编. 西汉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孙家孟等编. 西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赵士钰，陈国坚. 汉西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1989.
赵士钰. 新编汉西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编.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西班牙语二级翻译口笔译考试大纲.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
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编.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西班牙语三级翻译口笔译考试大纲.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

4. 意汉、汉意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吕同乐. 寂寞是一座桥.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张宓编. 意大利语高级经贸口译.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9.
周莉莉主编. 意大利语经贸谈判与口译. 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03.

5. 葡汉、汉葡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李长森主编. 实用葡汉翻译教程. 澳门：澳门理工学院出版社,2002.

6. 俄汉、汉俄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安新奎. 科技翻译理论及实务研究.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北京俄语学院,上海外语学院,哈尔滨外语学院,沈阳外语专科学校合编. 汉译俄教材. 北京：时代出版社,1957.
北京俄语学院,上海外语学院,哈尔滨外语学院,沈阳外语专科学校合编. 俄译汉教材. 北京：时代出版社,1958.
北京师范学院俄语教研室编. 俄译汉讲义. 1962～1963.
北京师范学院俄语教研室编. 汉译俄讲义. 1962～1963年.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系翻译教研室编. 翻译(俄译汉).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系翻译教研室编. 翻译(汉译俄).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贝文力,施国安主编. 同传捷径——俄语高级口译技能训练与实战演练教程.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别列什科夫. 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 薛福歧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蔡毅等. 俄译汉教程. 增修本.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蔡毅,段京华. 苏联翻译理论.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曹汀. 难句译法商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曹文学. 翻译论.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草婴. 我与俄罗斯文学——翻译生涯六十年.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陈国亭主编. 大学俄语翻译精粹.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陈国亭主编. 大学俄语翻译精粹. 第2版.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1.
陈国亭编. 大学俄语四级翻译教程.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陈洁主编. 俄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陈洁. 俄汉超句统一体对比与翻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陈石平,成英. 军事翻译家刘伯承. 太原：书海出版社,1988.
程荣辂编. 俄汉汉俄翻译理论与技巧.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3.
程荣辂编. 俄汉汉俄翻译理论与技巧. 第2版(修订版).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5.
程荣辂编. 俄汉汉俄翻译理论与技巧. 第3版(增订版).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从亚平,张永全. 俄汉口译高级教程.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丁晓梅. 汉俄科技翻译指南.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6.
丁言模,曹靖华.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董金道主编. 现代科技俄语翻译技巧.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董宗杰编. 俄汉科技翻译教程.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85.
董宗南. 汉俄科技翻译指南.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88.
《俄文教学》编辑部编. 翻译教学参考资料. 北京：时代出版社,1955.
《俄文教学》编辑部编. 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 北京：时代出版社,1956.
高等俄语院校教学大纲审订会议. 翻译理论和实践课程教学大纲：俄译汉. 北京：时代出版社,1956.
耿龙明,卢兆泉主编. 翻译教材(上).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
耿龙明,卢兆泉主编. 俄汉翻译教程(下).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3.
关秀娟主编. 商务俄语专业翻译教程.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翻译教研室编. 翻译理论汇编. 哈尔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1956.
何嵘编. 科技俄语翻译技巧与方法.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
胡谷明. 篇章修辞与小说翻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黄忠廉等. 俄汉翻译开发基础.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科尔奇洛夫. 首席翻译眼中的首脑外交. 达洲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礼长林编. 俄译中翻译教程. 北京：时代出版社,1955.
李今. 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李世俊等. 中俄名作译文选析.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李辛编. 俄译汉论文选. 北京：时代出版社,1957.

李志乔编. 科技俄语翻译概要.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
李志乔,倪家泰编. 俄汉科技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林丽等主编. 最新大学俄语翻译训练.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林学诚编. 实用俄译技巧.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陆永昌. 俄汉文学翻译概论.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陆勇编. 经贸文章文件汉译俄教程.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5.
陆勇,杨春宇编. 俄语经贸谈判与口译.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南文明编. 俄文翻译教程(第一册). 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
彭卓吾. 翻译理论与实践.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彭卓吾. 翻译学——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齐光先. 实践汉俄音译法. 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秦崴. 俄汉口译教学理论与实践.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邱榆若. 俄汉—汉俄翻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索伯列夫编. 翻译的基础. 北京：北京俄语学院,1958.
童公和编. 俄汉翻译难点译法漫谈. 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2.
王秉钦编. 新编俄汉翻译教程. 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王秉钦. 文化翻译学——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王秉钦. 文化翻译学——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 第2版.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王秉钦. 语言与翻译新论——语义学、对比语义学与翻译.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王秉钦. 语言与翻译新论——语义学、对比语义学与翻译. 第2版.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王秉钦. 对比语义学与翻译. 第2版.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王秉钦等编. 简明俄汉翻译教程.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王立刚,彭甄. 俄汉—汉俄高级口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王利众等主编. 新编大学俄语翻译技巧与训练.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
王利众,张廷选主编. 俄汉/汉俄科技口译教程.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王少山编. 科技俄语汉译技巧. 天津：天津市电子元件专业学会,1984年.
王育伦编. 俄汉翻译理论与技巧.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85.
王育伦编. 俄译汉教程.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
魏原枢等编. 俄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2.
吴克礼主编. 俄苏翻译理论流派述评.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武柏珍,张秀梅主编. 大学俄语翻译高分突破与技巧.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徐长瑞编. 科技俄语翻译技巧与练习.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徐振新编. 汉译俄技巧漫谈. 北京：时代出版社,1956.
徐振新编. 汉译俄技巧漫谈(新编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阎德胜. 实用俄汉科技翻译技巧.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
阎德胜. 俄汉科技翻译技巧：翻译新探. 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2.
阎德胜. 翻译的艺术：逻辑理论在俄汉翻译中的运用.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3.
杨仕章. 文化翻译论略.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3.
杨仕章. 篇章翻译概要.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杨仕章. 语言翻译学.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杨仕章等. 俄汉误译举要.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叶芳来. 俄语谚语俗语误译直译妙译一百例.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应云天主编. 翻译教程(俄译汉).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应云天主编,黄人杰等编. 俄汉科技翻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
渝岩编. 俄语代词用法与译法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张宝钤. 大学俄语笔译实践.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张永全主编. 实用俄汉—汉俄翻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2002.
赵红. 文本的多维视角分析与文学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汉译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郑海凌. 文学翻译学. 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
郑海凌. 译理浅说. 郑州：文心出版社,2005.
郑敏宇. 叙事类型视角下的小说翻译研究.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郑泽生,耿龙明. 俄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1.
郑泽生等. 俄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2.
郑泽生,耿龙明. 俄汉翻译教程. 修订本. 上海：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编.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俄语二级翻译口笔译考试大纲.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
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编.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俄语三级翻译口笔译考试大纲.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
周允,王承时编. 汉译俄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
朱达秋,徐曼琳,华莉编,彭甄. 实战俄语口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7. 捷汉、汉捷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丛林. 捷汉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8. 匈汉、汉匈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龚坤余. 匈汉、汉匈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9. 保汉、汉保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刘知白. 汉保保汉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10. 瑞典语汉语、汉语瑞典语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杨迅. 瑞典语—汉语口译手册.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4.

11. 土耳其语汉语、汉语土耳其语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刘钊,李智育编. 土耳其语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12. 阿汉、汉阿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高彦德等编. 阿汉翻译基础(第1册). 北京:现代出版社,1995.
高彦德等编. 阿汉翻译基础(第2册). 北京:现代出版社,1995.
关锐编. 汉语—阿拉伯语精准翻译初探.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郭黎编. 阿拉伯语汉语口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刘开古编. 阿拉伯语汉语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史丽清等编. 阿拉伯语口译.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7.
杨建荣编. 阿拉伯语经贸实用文与翻译.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编.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阿拉伯语二级翻译口笔译考试大纲.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
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编.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阿拉伯语三级翻译口笔译考试大纲.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

13. 日汉、汉日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编. 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蔡振生. 日汉翻译教程·入门篇.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蔡振生. 日汉翻译教程·实践篇.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曹云章等编. 现代日语翻译技巧.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1997.
常波涛主编. 日汉互译基础与技巧.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陈溪芳. 实用科技日语翻译基础. 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陈岩编. 新编日译汉教程.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2000.
陈岩. 实用汉日经济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迟军. 汉译日基础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刁鹂鹏编. 商务日语致辞即席口译.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杜勤,刘新梅编. 日语中级口译岗位资格证书考试·翻译教程.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冯富荣,杜英起. 汉译日多媒体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冯天瑜. 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 北京:中华书局,2004.
冯天瑜,刘建辉,聂长顺主编. 语义的文化变迁. 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高列夫. 日汉翻译理论与技巧.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高宁等. 日汉互译教程. 第2版.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高宁. 日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高宁,杜勤编. 新编汉日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高宁,周星等. 日语翻译考试津指.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高天重编. 科技日语学习与翻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郜宝文. 现代日汉翻译教程. 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5.
顾永清. 日汉双语比较互译教程.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郭殿福编. 科技日语翻译.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1996.
郭鸿雁. 日汉汉日翻译实践.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韩进旺. 经贸日语口语与口译.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4.
韩文达. 实用科技日语翻译技巧.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1998.
黄崇本,类人树编. 医学日语翻译汉译方法.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计钢等编. 日语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指南(口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贾笑寒编. 日汉翻译教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教育部考试中心编. 全国外语翻译证书考试·日语翻译证书考试大纲(第二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今富正己. 汉日对译技巧. 宁德辉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靖立青. 科技日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靖立青. 日汉翻译教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孔繁明. 日汉翻译要义.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李淼,刘青梅编. 新编日语翻译(汉译日).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李统汉编. 日语翻译例解.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梁传宝,高宁编. 新编日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刘绩生. 实用日汉对译技巧.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刘丽华等. 中日口译教程(初级).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刘丽华,塚本庆一编. 中日口译教程(中级).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刘全福. 翻译家周作人论.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刘肖云等. 日汉翻译.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刘振瀛. 日语中谓语的附加成分与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陆留弟编. 同传捷径——日语高级口译技能训练教程.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陆留弟主编. 同传捷径——日语高级口译实战演练教程.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陆留弟,蒋蓓编. 日语中级口译岗位资格证书考试·口译教程.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罗兴典主编. 简明日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庞春兰. 新编日汉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钱力奋. 日语口译资格证书考试·口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邱鸿康. 日汉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2002.
山本哲也,陈岩编. 汉译日精编教程.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山本哲也,陈岩,于敬河编. 汉译日精编教程：例文中心——日本語翻譯的理論與實際.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尚婷婷等. 入世日语口译快译通.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宋协毅. 新编汉日日汉同声传译教程：从即席翻译到同声传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苏琦. 汉日翻译教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994.
苏琦编. 汉日翻译教程(重排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苏琦. 日语口译教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000.
孙用.《鲁迅译文集》校读记.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陶振孝. 日译中教室.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陶振孝. 现代日汉翻译教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铁军主编. 通向翻译的自由王国：日语同声传译及翻译教学研究.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王成,秦刚主编. 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王健宜等编. 高级日语口译.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王健宜,魏建平编. 国际商务日语翻译.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王向远. 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王向远. 王向远著作集·第2卷·东方文学译介与研究史.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王向远. 王向远著作集·第3卷·日本文学汉译史.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王向远. 王向远著作集·第8卷·翻译文学研究.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王秀文主编. 中日语言翻译与跨文化交际.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王膺民. 科技日语翻译手册.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
王玉林主编. 商贸应用文日汉互译教程.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王郁良. 汉语日译常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王友贵. 翻译家周作人.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王友贵. 翻译家鲁迅.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王运. 科技日语翻译技巧研究.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
魏智. 科技日语句子结构分析与翻译. 北京：新时代出版社,1989.
吴大纲编. 汉译日翻译问题.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吴侃. 汉日翻译技巧与实践.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夏菊芬. 日语高级口译研究.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亚欧语系日语专业,厦门大学日本语教育研究中心编. 翻译与文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谢秀忱编. 日语翻译方法.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83.
徐冰. 日语口译学论稿.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02.
徐一平,曹大峰主编. 中日对译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研究论文集.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许慈惠编. 日语高级口译岗位资格证书考试·口译教程.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许金生. 实用日汉翻译教程.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阎明编. 日译汉常见错句例解.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阎萍编译. 日本文学翻译读本.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杨承淑，山田佳奈美. 中日口译入门教程(中文解说本).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杨承淑，山田佳奈美. 中日口译入门教程(日文解说本).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杨鸿石编. 科技日语汉译技巧.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杨秋香. 科技日语翻译.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
叶渭渠. 扶桑掇琐.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俞瑞良等编. 中译日实例解析. 大连：大连出版社，2002.
俞瑞良编. 日语翻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遇崇基编. 科技日语翻译技巧.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曾宪凭主编. 日语口译基础.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曾宪凭. 日语口译基础(电视教学版). 陆静华等改编.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音像出版社，1999.
张鸿成. 日语口译资格证书考试·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张建华，谷学谦主编. 高级汉译日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张竞千. 科技日语汉译技巧.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
张小林. 简明日汉翻译技巧研究.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
张秀华编. 高级日语笔译.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张正立等编. 日汉翻译基础.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张志平主编. 日语听说读写译技能训练·译.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郑吉雄，张宝三编. 东亚传世汉籍文献译解方法初探.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编.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日语二级翻译口笔译考试大纲.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编.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日语三级翻译口笔译考试大纲.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塚本庆一. 实用日语同声传译教程.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周殿清编. 实用中日口译 即席翻译 同声传译.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
周殿清编. 实用中日口译 即席翻译 同声传译. 第3版.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周殿清编. 实用中日口译 即席翻译 同声传译. 第4版.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周殿清，彭晓利编. 同声传译.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周明主编. 日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4.
朱蒲清. 日汉翻译技巧.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14. 朝鲜语汉语、汉语朝鲜语、韩国语汉语、汉语韩国语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陈宏，韩英主编. 韩汉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韩东吾. 朝汉诗词翻译技巧.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
韩东吾. 朝汉翻译理论与技巧.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
金海月. 韩汉翻译实践.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金兰主编. 中级韩汉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金兰主编.《中级韩汉翻译教程》参考译文及练习答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金兰，赵仙华编. 汉韩翻译教程(初中高).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金日. 中朝翻译基础.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
李玉华等编. 韩汉互译教程(一)(二).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柳英绿编. 韩汉翻译基础.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
柳英绿编. 韩中翻译基础.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
柳元武. 汉文小说翻译研究. 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6.
全香兰. 韩汉翻译技巧.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沈仪琳. 韩文汉译实用技巧.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孙金秋. 韩汉互译教程.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太平武. 汉朝翻译理论与技巧.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尹敬爱等编. 韩国语口译教程——从交替传译到同声传译.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张敏. 韩汉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张敏等. 韩中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张敏等. 中韩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张敏等. 韩中翻译教程. 第2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张义源，金日. 中韩翻译教程(韩文本).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
郑吉雄，张宝三编. 东亚传世汉籍文献译解方法初探.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周玉波著，中韩翻译教学论.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朱锡峰编. 韩中翻译教程.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
朱锡峰编. 中韩翻译教程.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

15. 越南语汉语、汉语越南语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梁远，温日豪主编. 实用汉越互译技巧.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赵玉兰. 越汉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郑吉雄、张宝三编. 东亚传世汉籍文献译解方法初探.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6. 老挝语汉语、汉语老挝语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陆蕴联，张良民. 老挝语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17. 柬埔寨语汉语、汉语柬埔寨语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尹淑华，梁鹏编. 柬汉汉柬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18. 泰语汉语、汉语泰语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高彦德，李志雄主编. 实用泰汉翻译教程.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梁源灵主编. 泰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19. 缅甸语汉语、汉语缅甸语翻译

赵瑾，张铁荣编. 缅汉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20. 印尼语汉语、汉语印尼语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陈有利编. 汉语—印尼语翻译举要.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21. 波斯语汉语、汉语波斯语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2. 世界语汉语、汉语世界语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于德全等. 世界语—汉语翻译教程. 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6.

（三）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双向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1. 少数民族地区语文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

盖兴之，宋金兰. 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汉语中介语与语言翻译研究.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买提尼牙孜·热扎克编. 西域翻译史.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1996.
《民族语文翻译研究论文集》编辑组. 民族语文翻译研究论文集（第一集）.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民族语文翻译研究论文集》编辑组. 民族语文翻译研究论文集（第二集）.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编，王正芳主编. 民族语文翻译研究.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赵国栋，牙生·哈提甫. 新疆民族语文翻译研究.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2. 蒙古语与汉语互译

巴达玛敖德斯尔. 面向机器翻译的汉蒙短语转换规则研究.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
乌恩奇. 翻译理论与技巧（蒙古文）.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3. 维吾尔语与汉语互译

阿布德别克·拜波拉托. 阿布德别克翻译论文集.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欧斯满·格拉吉丁. 翻译基础知识.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史震天，马维汉等编. 汉维翻译教程.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托合提·巴克编. 怎样翻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张敬仪主编. 汉维—维汉翻译理论与技巧.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4. 藏语与汉语互译

巴桑多吉. 汉藏翻译教程.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贺文宣编. 藏汉翻译教程.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黄明信、陈久金、商卓特·桑热. 藏历的原理与实践：据商卓特·桑热与马杨·索巴嘉参藏文原著翻译和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凌立主编. 汉藏翻译理论与实践.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
旺堆. 藏族翻译史（藏文本）.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夏吾才让. 汉藏科技翻译理论新探（藏文本）.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师范学院，青海民族学院合编. 汉藏翻译教材. 1980.
周季文编. 汉译藏教材.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74.
周季文编. 汉藏翻译讲稿.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78.
周季文，傅同和. 藏汉互译教程.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周季文主编. 汉藏（藏汉）互译教程.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5. 壮语与汉语互译

韦达编. 汉壮翻译理论与技巧.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
韦星朗. 汉壮翻译概论.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6. 苗语与汉语互译

张永祥，曹翠云. 苗语与古汉语特殊语句比较研究.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7. 彝语与汉语互译

王继超. 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

8. 满语与汉语互译

吴雪娟. 满文翻译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四）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1. 台湾地区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蔡进松编撰. 翻译文撰. 台北：志高出版社，1976.
曹仕邦. 中国佛教译经史论集. 台北：东初出版社，1986.

参话等. 佛典翻译史论. 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
陈大安编. 译评. 台北：书评书目出版社,1976.
陈定安编. 英汉比较与翻译. 台北：新学识文教出版中心,1988.
陈定安编. 英汉比较与翻译.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7.
陈定安编. 翻译精要.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陈定安编. 英汉修辞与翻译.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6.
陈定安编. 科技英语与翻译.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9/2000.
陈境圳编. 翻译. 台北：大华传真出版社,1998.
陈鹏翔主编. 翻译史·翻译论. 台北：弘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5.
陈世琪. 英文翻译精简研究. 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
陈世琪编著. 随时引用智慧英谚 900. 台北：正中出版社,2002.
陈仕彬编. 金融翻译技法. 台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陈锡蕃. 咬文嚼字话翻译.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陈锡蕃. 翻译,愈推敲,愈有趣. 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陈祖文. 译诗的理论与实践. 台北：环宇出版社，1971.
董佩兰. 翻译批评《红楼梦》德译本的删译现象. 台北：董佩兰,1995.
杜东璘主编. 翻译学研究：西语翻译学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5.
范文美编. 翻译再思——可译与不可译之间.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
范英译著. 翻译选粹. 台北：中英文周刊社,1977.
冯庆华编. 英汉翻译宝典. 台湾桃园县中沥市：凡通出版社,2002.
辅仁大学外语学院编. 第十届台湾国际口笔译教学研讨会. 台北：辅仁大学外语学院,2006.
郭岱宗编. 同步翻译 1. 台北：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2.
郭岱宗编. 同步翻译 2. 台北：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2.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台湾经济研究院编. 台湾翻译产业现状调查研究总结分析报告. 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台湾经济研究院，2004.
何伟杰. 译学新论.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9.
何耀东编. 英文翻译方法和实例. 台北：平平出版社，1964.
侯健等. 经验者的话. 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7.
胡功泽. 翻译理论之演变与发展：建立沟通的翻译观.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4.
胡品清. 中法互译范本及解析. 台北县新店市：志一，1997.
胡子丹等编. 翻译艺术. 台北：翻译天地杂志社，1979.
华美雄. 英汉·汉英翻译讲座. 台南：泰华堂,1972.
黄邦杰编. 译艺谭.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8.
黄邦杰编. 新编译艺谭.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8.
黄邦杰编. 汉英虚词翻译手册.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0.
黄朝茂. 日中翻译研究论文集. 台北：致良出版社，2003.
黄斐章. 译误正解. 台北：文鹤出版社,1998.
黄国彬. 翻译途径.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6.
黄国彬. 语言与翻译. 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
黄辉达编. 西班牙语翻译基础. 台北：新陆书局，1993.
黄文范. 翻译新语.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
黄文范. 翻译偶语.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
黄文范. 翻译小语.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7.
黄宣范. 翻译与语意之间.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
黄宣范. 中英翻译：论理与实践. 台北：文鹤出版有限公司,1978/1986.
黄英烈编. 华英翻译精要. 基隆：台湾省立海事专科学校出版组,1961.
黄英烈编. 华英翻译精要. 第 25 版. 基隆：海文出版社,1980.
黄玉贞编. 中文虚字英译对策. 台北：学习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
火源洁译,茅伯符辑. 华夷译语. 台北：硅庭出版社，1979.
季健编. 科技英语结构分析与翻译. 台北：高立图书有限公司,1995.
姜庆尧编. 新闻英语编译实务. 台北：水牛出版社，1969.
金隄. 等效翻译探索. 增订版.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8.
金莉华. 翻译学. 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
金圣华. 打开一扇门. 台北：月房子出版社,1995.
金圣华. 桥畔闲眺——谈翻译与写作. 台北：月房子出版社,1995.
金圣华编. 傅雷与他的世界.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
金圣华,黄国彬主编. 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6.
靖立青. 日汉翻译技巧. 台北：鸿儒堂,2001.
柯平编.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4/1997.
孔慧怡,朱国藩. 各师各法谈翻译. 香港：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3.
里克尔(Paul Ricoeur)著. 林宏涛译. 诠释的冲突＝le

conflit des interpretations. 台北：桂冠出版社，1995.
黎翠珍主编. 翻译评赏.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6.
黎登鑫. 中英翻译面面观.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1999.
李牧华编. 英文中译法. 台北：华青美语出版社，1970.
李慕白(Paul M. Lee)编. 英文翻译：英译中——中译英. 台北：文鹤出版有限公司，1986.
李奭学. 经史子集：翻译、文学与文化札记. 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
李永安. 三民主义重要名词英文翻译商榷. 台北：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
梁实秋等编. 翻译创作文典. 台北：清溪，1974.
梁实秋，余光中等. 翻译的艺术. 台北：晨钟出版社，1970.
廖本瑞编. 实用中英翻译及测验.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6.
林超伦. 作实战口译：实战练习. 台北：经典传讯文化，2004.
林佩汀修编. 中英对译技巧. 台北：学习出版有限公司，1990.
林信道编. 日语翻译技巧. 台北：致良出版社，1987.
林以亮. 林以亮论翻译. 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
林以亮. 林以亮论翻译. 台北：皇冠出版社，1984.
林以亮.《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林以亮编. 翻译丛论.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林以亮. 文学与翻译. 台北：皇冠出版社，1984.
林语堂等. 翻译论集. 台北：龙田书局，1981.
刘光夏. 英文汉译之分析与实力.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
刘靖之编. 翻译论集.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9.
刘靖之. 翻译新焦点.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
刘靖之. 翻译新论集.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
刘靖之. 神似与形似——刘靖之论翻译. 何伟杰主编.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6.
刘宓庆. 当代翻译理论.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
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
刘宓庆. 文体与翻译.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7.
刘宓庆. 英汉翻译训练手册.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7.
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
刘敏华. 逐步口译与笔记：理论、实践与教学. 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93.
刘明旋编著. 英语、美语对照手册. 台北：旺文出版社，1992.
刘庆刚主编. 翻译在英文写作认知过程中之定位及其影响. 台北：国科会微缩小组，1997.
刘人鹏. 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
刘宗和. 论翻译教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
龙协涛. 读者反应理论. 台北：扬智文化出版社，1997.
陆文慧. 法律翻译——从实践出发. 台北：中华书局，2002.
刘翼凌主编. 翻译津梁. 台北：福音文宣社，1980.
吕理正主编. 翻译的研究. 第3版. 台北：万人出版社，1990.
吕瑞昌. 汉英翻译教程. 台北：中国图书刊行社，1993.
吕正惠. 大陆的外国文学翻译.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印行，1996.
罗斯编. 英汉汉英新编翻译手册.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
梅中英编. 英汉·汉英翻译手册. 台南：泰华堂，1972.
庞春兰编著. 日文翻译进阶技法. 台北：三思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
裴源. 佛经翻译史实研究：中国翻译史纲(上编). 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3.
裴源. 明末清初东来耶稣会士翻译著述之研究：中国翻译史纲(中编). 台北：建一书局，1984.
彭镜禧. 摸象——文学翻译评论集.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7.
彭卓吾. 翻译学——一门新兴学科的创立. 台北：中国图书刊行社，2000.
普润编. 翻译名义集. 台北：新文丰，1979.
普润编. 翻译名义集新编. 台中：佛教莲花社，1989.
钱歌川. 翻译的技巧. 台北：开明书店，1972.
钱歌川. 翻译的技巧. 第10版. 台北：开明书店，1978.
钱歌川. 翻译的基本知识. 台北：开明书店，1972.
钱歌川. 翻译的基本知识. 台北：丹青，1983.
钱歌川. 论翻译. 台北：开明书店，1976.
钱冠连编. 中翻英300种情意、状况表现法. 台北：笛藤出版图书有限公司，1994.
乔志高. 一言难尽：我的双语生涯.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
乔志高等口述. 翻译因缘. 胡子丹等记录. 台北：翻译天地杂志社，1979.
沈苏儒. 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
史宗玲. 电脑辅助翻译：MT&TM.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4.
释道安. 中国大藏经翻译刻印史. 台北：庐山出版社，1978.
释道安. 中国大藏经翻译刻印史. 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78.
释法云编. 翻译名义集. 台北：建康书局，1956.
释法云撰. 翻译名义集(七卷).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思果. 翻译研究. 台北：大地出版社,1972.
思果. 翻译新究. 台北：大地出版社,1981.
思果. 翻译研究. 第8版. 台北：大地出版社,1985.
思果. 功夫在诗外：翻译偶谈. 台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宋雷. 法律英语翻译指南.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
宋淇编. 翻译论丛.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
苏琦编. 汉日翻译教程. 台北：大新书局,1993.
孙国钦编. 科技英语的速读与翻译. 台北：笛藤出版图书有限公司,1990/2001.
孙国钦编. 科技日语的速读与翻译. 台北：笛藤出版图书有限公司,1992.
孙述宇,金圣华编. 英译中：英汉翻译手册.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
孙述宇,金圣华编. 英译中、英汉翻译理论. 修订版.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
汤碧秋编. 实用口译技巧. 台北：学习出版公司,1988/1991.
汤雄飞. 中文英译的理论与实例.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
涂克超. 翻译之理论与实际. 台北：志文出版社,1972.
汪介之,唐建清主编. 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 台北：译林出版社,2004.
王光祈撰. 翻译乐谱之研究. 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1.
王文颜. 佛典汉译之研究. 台北：天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
王文颜. 佛典重译经研究与考录.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王武荣编. 英文翻译基础入门. 台北：国家出版社,1990.
王艳秋译著. 广播新闻翻译实质. 台北：丹青,1987.
王永庭编. 英语趣语·俚语的解说与翻译. 台北：笛藤出版图书有限公司,1992.
吴静亭主编. 突破英文翻译. 台北：汉字出版公司,1998.
吴潜诚编. 中英翻译：对比分析法. 台北：文雄出版有限公司,1982.
吴锡德主编. 翻译文学 & 文学翻译. 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吴献书编. 英文汉译的理论与实际. 台北：开明书店,1954.
吴献书编. 英文汉译的理论与实际. 台北：启明出版社,1963.
奚明远. 翻译管见. 台北：天工书局,1983.
奚明远. 翻译的艺术.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萧立明. 翻译新探.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2.
萧立人编译. 翻译程式：原理方法与工具. 台北：全华科技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
萧雄淋,许智诚. 翻译权强制授权之研究. 台北：内政部,1991.
谢天振.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台北：业强出版社,1994.
行政院新闻局. 台湾翻译产业现况调查研究. 台北：行政院新闻局,2004.
熊式一等. 翻译典范(上). 台北：腾云文化事业社,1970.
徐维主编. 英语翻译技巧. 台北：普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
许建中编著. 工商企业翻译实务. 台北：中山大学,2003.
许渊冲. 文学翻译谈.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8.
宣建人. 佛光普照：伟大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传. 高雄：佛光文化出版社,1986/1996.
薛文郎编. 英文中译实务概论. 台北：学生书局,1977/1988.
严复,鲁迅等. 翻译论集. 修订版. 刘靖之主编.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
杨爱华编译. 中译英对策.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
杨承淑. 口译的原理与方法——兼论中日文口译问题. 台北：大新书局,1988.
杨承淑. 中日口译入门教程(日文解说本). 台北：致良出版社,1996/2001.
杨承淑. 口译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 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0.
杨承淑. 口译的讯息处理过程研究. 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8.
杨静亭. 英文翻译大进击. 台北：汉宇出版公司,1998.
杨明华编. 英文翻译基础. 台北：宏业出版社,1981.
杨明华编. 英文翻译基础. 台北：鼎文文化出版社,2001.
杨耐冬编. 翻译论理与实际. 台北：联亚出版社,1981.
杨熙南,雷保德编. 翻译与吸纳　大公神学与汉语神学. 台北：道风书社,2004.
叶纯青编. 英文翻译基础(英译中). 台北：建宏出版社,1986.
叶纯青编. 英文翻译基础(中译英). 台北：建宏出版社,1987.
叶子南. 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
殷张兰熙等口述. 翻译艺术. 胡子丹编. 台北：翻译天地杂志社发行,1979.
印顺述义,昭慧整理.《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 第2版(增订本). 台北：东宗出版社,1993.
幼狮编辑部. 英汉翻译入门. 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0.
余光中等著. 翻译十讲. 台北：辰衡出版社,1969.
余绍文编著. 英汉翻译入门. 台北：雅典出版社,1988.

曾虚白等. 翻译论粹. 台北：第一文化社,1957.
张达聪. 翻译之原理与技巧. 台北：东雅,1979.
张达聪. 翻译之原理与技巧. 台北：国家书店有限公司,1996.
张达聪. 英文翻译练习典范精解. 台北：国家书店有限公司,1992.
张家焌撰. 海德格形上学研究与翻译. 台北：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印行,1976.
张培基等编. 英汉翻译教程.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2000.
张其春编. 翻译之艺术. 台北：开明书店,1957.
张为平. 新闻英文翻译. 台北：大夏,1965.
张玉玫编. 中英对译技巧. 台北：学习出版公司,1987.
张振玉. 译学概论. 台中：台中印刷厂,1966.
张振玉. 译学概论. 修正再版. 台北：张振玉,1969.
张振玉. 译学概论. 第 6 版. 台北：华南图书出版公司,1973.
张振玉. 译学概论. 再版. 台北：文翔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
张振玉. 译学研究. 台北：文翔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2.
张振玉编. 汉文英译示例. 台北：文翔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66/1988.
张振玉编. 实用英汉—汉英翻译基础. 台北：文翔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3.
张振玉. 翻译散论.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
张中良. 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 台北：秀威信息科技,2005.
章和升,王云桥编著. 英汉翻译技巧. 台北：当代世界,1997.
赵维本. 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 台北：中国神学研究所,1993.
周庭桢. 英语翻译基础. 台北：台湾开明出版社,1987.
周广荣,葛维钧,张美兰. 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从《正法华经》看竺法护的翻译特点、《五灯会元》动量词研究. 台湾：高雄县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3.
周兆祥. 翻译实务.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周兆祥编. 翻译初阶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6.
周兆祥编. 专业翻译.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7.
周兆祥,陈育沾. 口译的理论与实践.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周中天,周嫦娥等编辑. 台湾翻译产业现况调查研究总结分析报告. 台北：行政院新闻局编印,2004.
朱传誉. 谈翻译.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
朱纯深. 翻译探微：语言·文本·诗学.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1.
庄秀欣. 当巴赫碰上巴哈：译名追击. 台北：欣福,1997.
卓志诚编著. 翻译科学论文选集. 台中县乌日乡：小豆芽文化,2002.

2. **香港地区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蔡小红主编. 口译研究新探——新方法、新观念、新趋势. 香港：开益出版社,2002.
陈定安编. 英汉比较与翻译.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85/1991/1997.
陈定安编. 翻译精要.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0/1996.
陈定安. 英汉修辞与翻译.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
陈惠荣编. 中文圣经翻译小史. 香港：中文圣经新译会,1986.
陈善伟主编. *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陈仕彬编. 金融翻译技法.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方乐天编. 英汉·汉英翻译手册.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51.
方乐天编. 翻译手册.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77.
冯式. 英语翻译讲座. 香港：三育图书公司,1972.
古德明. 翻译问题. 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
韩迪厚. 近代翻译史话. 香港：辰冲图书公司,1969.
胡润之. 对英文翻译公式之研究. 香港：宏信出版社,1986.
黄邦杰. 译艺谭.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5.
黄邦杰编. 汉英虚词翻译手册.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
黄宣范. 中英翻译：论理与实践. 香港：译林出版社,1979.
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笔记. 香港：岭南大学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2000.
贾保罗编. 圣经汉译论文集. 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5.
金隄. *Shamrock & Chopsticks* (《三叶草与筷子：乔伊斯在中国》). 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
金圣华编. 傅雷与他的世界.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
金圣华,黄国彬主编. 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
金圣华主编. 翻译学术会议：外文中译研究与探讨.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
金圣华. 认识翻译真面目.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2.
孔慧怡编. 译从点滴.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05.
孔慧怡编. 译学英华：宋淇翻译研究论文奖 1999～2004 文集·第 1 卷(中文本).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05.
孔慧怡编. 译学英华：宋淇翻译研究论文奖 1999～

2004 文集·第2卷(英文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05.
孔慧怡.重写翻译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孔慧怡,朱国藩编.各师各法谈翻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3.
赖恬昌.翻译艺术与翻译专业(*The Art and Profession of Translation*).香港：香港翻译学会,1976.
黎翠珍主编.翻译评赏.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
李国宝.译经.香港：未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4.
李剑雄.港式翻译疑难解说.香港：明窗出版有限公司,1999.
林草原.忠信与操纵——当代基督教圣经中文译本研究.香港：岭南大学,2003.
林钜洸.21世纪高科技翻译教程(中译英).香港：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9.
林钜洸,罗思穆编著.概念·词汇·技巧(21世纪高科技中译英教材).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
林以亮编.翻译丛论.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
林语堂等.翻译纵横谈.宋淇编,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编辑.香港：辰冲图书公司,1969.
刘季伯.新译余漫谈.香港：大光出版社,1978.
刘靖之编.翻译丛论(一).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3.
刘靖之编.翻译丛论(1986).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86.
刘靖之编.翻译丛论(1987).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87.
刘靖之编.翻译丛论(1988).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88.
刘靖之主编.翻译新论集——香港翻译学会二十周年纪念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1.
刘靖之.翻译与生活.香港：法住出版社,1994.
刘靖之编.翻译新焦点(论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3.
刘靖之,林戊荪,金圣华主编.翻译教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翻译学会,2000.
刘天民.英文翻译方法和实例.香港：宏业图书公司,1964.
刘翼凌主编.译经论丛.巴贝里：福音文宣社,1979.
卢纪新.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香港：中国世界语,2002.
陆松龄编.日汉翻译艺术.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82.
陆文慧主编.法律翻译论集：从实践出发.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2.
吕理正主编.翻译的研究.第3版.香港：万人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
吕瑞昌等编.汉英翻译教程.香港：中国图书刊行社,1993.
吕瑞昌等编.汉英翻译教程.香港：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2003.
罗斯.翻译常识浅谈.香港：大光出版社,1977.
罗斯编.翻译手册.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79.
罗斯编.英汉、汉英新编翻译手册.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79.
普润编.翻译名义集易检(影印本).香港：正因精舍,1980.
钱歌川编.翻译的技巧.香港：开明书店,1981.
钱歌川编.翻译基本知识.香港：时代出版社,1974.
丘恩处.达成良好翻译的探讨.香港：中英社,1965.
任重编.翻译陷阱.香港：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
沙枫.中诗英译絮谈.香港：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1964.
沙枫.译林絮语.香港：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
沙枫.译林絮语(续篇).香港：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沙枫.中诗英译絮谈.香港：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沙枫.鲁迅著作英译絮谈.香港：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沙枫.译林絮语(1集).香港：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沙枫.译林絮语(2集).香港：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
沙枫.译林絮语(3集).香港：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沙枫.中国文学英译絮谈.香港：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沙枫.中诗英译絮谈.香港：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
思果.翻译研究.香港：友联出版社,1971.
思果.翻译新究.香港：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
思果.功夫在诗外：翻译偶谈.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宋淇编译.翻译十讲.香港：辰冲图书公司,1969.
宋淇主编.翻译丛论.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
苏兆龙.活用英文翻译法.香港：艺美图书公司,1971.
苏兆龙.活用英文翻译法.香港：广智书局,1975.
孙述宇,金圣华编.英译中：英汉翻译概论.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1975.
天主教香港圣经协会编.天主教中文圣经翻译简史.香港：编者印行,1991.
涂克超编.翻译之理论与实际.香港：志文出版社,1972.
万源图书公司编辑部编.英汉翻译基础.香港：万源图书公司,1979.
王秉钦.路漫漫——一个学人的足迹.香港：香港凌

天出版社,2005.
王道庚.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6.
王广滇等.翻译句型.香港:海外英语出版社,1964.
王金玲等.现代翻译论文集.香港:信风出版社,1992.
温绍贤.中英诗意境的异同及其翻译.香港:Everflow Publication,2003/2006.
吴潜诚编.中英翻译:对比分析法.香港:新艺出版社,1984.
香港公开进修学院编.翻译导论.香港:香港公开进修学院,1997.
香港万源图书公司编.英汉翻译基础.香港:香港万源图书公司,1979.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编.翻译教学研究论文集199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1997.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编.翻译在香港:回顾、现况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1999.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编.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w Horizons in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会议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2006.
虚遥.译余漫谈.香港:三育图书公司,1972.
虚遥.新译余漫谈.香港:香港: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2001.
许建忠编.工商企业翻译实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许牧世编.经与译经.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3.
颜元叔.翻译与创作.香港:小草出版社,1972.
殷德厚,张必锟.文言语译概说.香港:香港宏业书局,1983.
杨牧.译事.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7.
杨熙楠,雷保德编.翻译与吸纳:大公神学和汉语神学.香港:道风书社,2004.
尹让辙.英文翻译.香港:世界书局,1974.
余光中等.名作家谈编写译.香港:一新书店,1975.
余文景编.法律翻译的理论和技巧.香港:大瑰出版社,1976.
乐秀章.电脑翻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电脑翻译研究所,1975.
张达聪.翻译之原理与技巧.香港:东雅,1979.
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1989.
张其春编.翻译之艺术.香港:志文出版社,1973.
张云.中国习语英译法.香港: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
郑宝璇.传媒翻译.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4.
郑雅丽. *Translating Literary Texts: Theory and Practice*.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2000.
周寿昌.译刊科学书籍考略.香港:孟氏图书公司,1972.
周兆祥.汉译《哈姆雷特》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
周兆祥.翻译实务.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86.
周兆祥.翻译与人生.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5.
周兆祥.翻译初阶.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
周兆祥.专业翻译.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
周兆祥,陈育沾.口译的理论与实践.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88.
周兆祥,范志伟.财经翻译精要.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
周兆祥,周爱华.翻译面面观.香港九龙:文艺书屋,1984/1988.
庄春霖编.英汉比较及翻译法.香港:名家出版社,1989.
庄柔玉.中文圣经译本权威现象研究.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0.
Cheung Yat-shing et al.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How and By Whom*. Hong Kong Polytechnic: Centr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1993.

3. 澳门地区翻译研究与教学书目

澳门理工学院翻译暨跨文化研究中心编.英语教学,翻译与21世纪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理工学院出版社,2003.
陈双钧编.英文译法新研究.澳门:罗拔书局,1980.
程祥徽主编.语言翻译研究.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
高励新编.英文翻译及句型详解.澳门:华联出版社,1968.
李长森主编.实用葡汉翻译教程.澳门:澳门理工学院出版社,2002.
李长森,崔维考主编.新千禧翻译工作坊论文集.澳门:澳门理工学院出版社,2002.
林广寰编.常用汉语英译手册.澳门:右文出版社,1979.
林巍编.英汉互译实践与研究.澳门:澳门理工学院出版社,2006.

(五)外语原版引进本、汉译本及原版汇编本书目

阿尔卡拉兹,休斯.法律翻译解析[*Legal Translation Explained*(2002)].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阿尔瓦雷斯,比达尔编.翻译,权力,颠覆[*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1996)].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阿森西安. 公文翻译[*Translating Official Documents* (2003)].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埃利斯,奥克利-布朗编. 翻译与民族：英格兰的文化政治[*Translation and Nation: 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ness*(2001)].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艾赫贝尔. 口译须知. 孙慧双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安德曼,罗杰斯编. 今日翻译：趋向与视角[*Translation Toda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2003)].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奥洛汉编. 超越文化断裂——翻译学研究模式(Ⅰ)：文本与认知的译学研究[*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2000)].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巴尔胡达罗夫. 语言与翻译(1975). 蔡毅等编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巴斯内特. 翻译研究. 第 3 版.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ition)(2000)].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巴斯内特,勒菲弗尔. 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1998)].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鲍克等编. 多元下的统一？当代翻译研究潮流[*Unity in Diversity?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1998)].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贝尔. 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1991)].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贝尔. 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 秦洪武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贝尔托内. 巴别塔揭秘：同声传译与认知、智力和感知[*Entorno de Babel — Estrategis de la interpretacion simultanea*. Buenos Aires: Hachette. (1989)][英译本：*The Hidden Side of Babel: Unveiling Cognition, Intelligence and Sense through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trans. by Enrique Robert from Spanish. Argentina: Buenos Aires (2006)].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贝克. 换言之：翻译教程[*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1992)].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曹. 法律翻译[*Translating Law* (2007)].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长尾真. 计算机自动翻译来龙去脉. 杨德辉译. 台北：吴氏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

陈德鸿,张南峰主编.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 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陈永国主编. 翻译与后代性.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戴维斯. 解构主义与翻译[*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2001)].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道勒拉普. 翻译研究基础[*Basic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道勒拉普,罗选民主编. 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4)]. 第 3 卷.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道勒拉普,王宁主编. 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2)]. 第 1 卷.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道勒拉普,王宁主编. 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3)]. 第 2 卷.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德利尔. 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法. 孙慧双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费道罗夫. 翻译理论概要. 李流等译. 北京：中华书局,1955.

费拉德. 翻译与性别——女权主义时代的翻译[*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1997)].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费伦. 口译员的资源[*The Interpreter's Resource* (2001)].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福柯,斯皮瓦克,刘禾等.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许宝强等编选.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福克纳,海明威等. 翻译与创作. 颜元叔译. 香港：小草,1972.

福克纳,海明威等. 翻译与创作. 颜元叔译. 台北：志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

福西特. 翻译与语言：语言学理论解读[*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 (1997)].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冈萨雷兹等. 律海同传. 罡文译.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

格朗热等编.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对比和翻译研究[*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2003)].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格特. 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2000)].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根茨勒. 当代翻译理论. 第 2 版修订本.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2nd edition) (2001)].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辜正坤,史忠义主编. 国际翻译学新探.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哈伯特. 传译手册. 潘大雄编译. 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0.

哈蒂姆. 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1997)].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哈蒂姆. 翻译教学与研究[*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lation(2001)].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哈蒂姆,梅森. 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1990)].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哈蒂姆,梅森. 话语与译者. 王文斌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哈庆. 机器翻译：过去、现在、未来. 致远科技公司编译. 台北：致文,1993.
海恩波. 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 蔡锦图译. 台北：国际圣经,2000.
海恩波. 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 蔡锦图译. 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0.
赫伯特. 高级口译手册. 张晨君编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赫曼斯. 系统中的翻译——描写和系统理论解说[*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1999)].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赫曼斯编. 跨文化侵越——翻译学研究模式(Ⅱ)：历史与意识形态问题[*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Ⅱ,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2002)].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霍姆斯. 译稿杀青！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文集[*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1994)].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基特尔,富兰克编. 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研究[*Interculturality and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s*(1990)].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吉尔. 笔译训练指南. 刘和平等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
加切奇拉泽. 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 蔡毅等编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蒋国泰编. 外国专家论翻译导游.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3.
杰特. 希腊翻译家. 台北：东立出版社,1998.
酒井直树,花轮由纪子主编. 印迹：多语种文化与翻译理论论集1：西方的幽灵与翻译的政治. 钱竞等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卡坦. 文化翻译——笔译、口译及中介入门[*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 (1999)].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卡特福德. 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穆雷译.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
科米萨诺夫. 当代翻译学. 汪嘉斐等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夸. 翻译与技术[*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2006)].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赖斯. 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2000)].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兰德斯. 文学翻译实用指南[*Literary Translation: A Practical Guide*(2001)].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勒代雷. 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 刘和平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勒菲弗尔编. 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1992)].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勒菲弗尔.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1992)].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勒弗维尔. 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1992)].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李养龙. 西方翻译理论文献选读. 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7.
鲁宾逊编. 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1997)].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鲁宾逊. 译者登场[*The Translator's Turn*(1991)].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鲁宾逊. 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1997)].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鲁宾逊. 什么是翻译？离心式理论,批判性介入[*What is Translation? Centrifugal Theories, Critical Interventions*(1997)].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罗斯. 翻译与文学批评：翻译作为分析手段[*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ion as Analysis* (1997)].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罗选民主编. 2004年国际译联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翻译·认知与跨学科研究.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马会娟,苗菊编.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选读.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芒迪. 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 李德凤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米克尔森. 法庭口译导论[*Introduction to Court Interpreting* (2000)].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米兰. 翻译算法. 李锡胤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米乐. 跨越边界：翻译·文学·批评. 单德兴编译.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
莫洛佐夫. 文学翻译问题.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教研室组译. 北京：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材出版科,1959.
奈达. 跨语交际. 谭载喜编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3.

奈达. 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1999)].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奈达. 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1964)].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奈达,泰伯. 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1969)].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奈达. 语言、文化与翻译(英汉对照). 严久生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奈达. 语际交流中的社会语言学. 陈健康校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纽马克. 翻译教程：翻译的原则与方法. 赖慈芸编译. 台北：台湾培生教育发行出版,2005.

纽马克. 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1981)].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纽马克. 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1988)].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纽马克. 论翻译[*About Translation* (1991)].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诺德. 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 (1997)].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诺德. 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1997). 张美芳,王克非主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诺德. 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Second Edition)(2005)]. 第2版.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诺兰. 口译：技巧与操练[*Interpretation: Techniques and Exercises* (2005)].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皮姆. 翻译史研究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1998)].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切斯特曼,瓦格纳. 理论对译者有用吗？象牙塔与语言工作面之间的对话[*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 (2002)].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琼斯. 会议口译解析[*Conference Interpreting Explained* (2002)].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塞莱斯科维奇,勒代雷. 口译理论实践与教学. 汪家荣等译.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0.

塞莱斯科维奇,勒代雷. 口译训练指南. 闫素伟,邵炜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赛莱斯科维奇. 口译技巧. 孙慧双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1988.

赛莱斯科维奇. 口译技艺：即席口译与同声传译经验谈. 斯蒂芬妮·戴利译(英语),黄为忻,钱慧杰译. 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2.

赛莱斯科维奇,勒德雷尔. 口笔译概论. 孙慧双译.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申雨平编.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榊亮三郎编.(梵藏·汉和四译对校)翻译名义大集(2册). 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编译委员会译. 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

升曙梦. 翻译与研究五十年. 文之译. 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

史坦纳. 审视后的生命. 李根芳译. 台北：行人出版社,2007.

斯内尔-霍恩比. 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1995)].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斯内尔-霍恩比. 翻译研究：综合法. 李德超,朱志瑜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斯塔纳. 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1998)].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斯坦纳. 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庄绎传编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泰特勒. 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1791)].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提莫志克. 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1999)].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提莫志克,根茨勒编. 翻译与权力[*Translation and Power* (2002)].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图里. 描写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1995)].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托贝尔等. 文艺翻译问题. 李石民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威尔斯. 翻译学：问题与方法. 祝珏,周智谟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威尔斯. 翻译学——问题与方法[*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1982)].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威廉姆斯,切斯特曼. 路线图：翻译研究方法入门[*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2002)].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韦努蒂. 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西蒙,圣皮埃尔编. 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2006)].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西蒙. 翻译理论中的性别. 吴晓黎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希基编. 语用学与翻译[*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 (1998)].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谢芙娜编. 翻译与规范[*Translation and Norms* (1999)].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谢天振主编.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亚里斯多德，罗兰等. 名家论翻译与写作. 台北：志文出版社，1970.
亚诺史密斯等. 翻译的技巧与内涵. 郑永孝、郑高锦雪编译. 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1.
杨建华编. 西方译学理论辑要.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伊爱莲等. 圣经与近代中国. 蔡锦图译. 香港：汉译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003.
尤思德. 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 蔡锦图译. 台北：国际圣经协会，2002.
尤思德. 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 蔡锦图译. 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
查特林. 戏剧翻译及剧本改编：一位实际工作者的观点[*Theatrical Translation and Film Adaptation: A Practitioner's View* (2005)].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扎内廷等编. 语料库与译者培养[*Corpora in Translator Education* (2003)].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仲伟合主编. 西方翻译理论. 广州：广州外语音像出版社，2001.
Jin Di, Nida, E. A. *On Translation*.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Nida, E. A. 语言、文化与翻译[*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六）翻译研究、教学与实践工具书书目

奥斯特米勒. 译者的电子工具[*Electronic Tools for Translators* (2001)].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白文祥，王淑萍. 世界地名常用词翻译手册. 北京：测绘出版社，2005.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中国学室编. 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目录.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1996.
北京气象出版社编辑部编. 著编译审校指南. 北京：北京气象出版社，1996.
贝克编. 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01)].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本辞典编写组编，林辉主编. 中国翻译家辞典.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蔡文治，韩曼君编. 日汉、汉日世界地名译名手册. 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3.
曹焰等主编. 英汉翻译百科大词典(上、下).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
测绘出版社编辑部编，民政部、国家测绘局制定. 外语地名汉字译写规则(英、法、德、西、俄、阿). 北京：测绘出版社，1997.
陈善伟主编. 英汉·汉英翻译学词汇.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
戴炜栋主编. 高校外语专业教育发展报告 1978～2008.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迪里索，利加恩克，科米尔编. 翻译研究关键词. 孙艺风，仲伟合编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方梦之主编. 译学辞典.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傅昌文主编. 日本地名词典.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龚人放主编. 俄汉文学翻译词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顾彬著. 中国文学作品德译目录. 范劲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顾刚，毛子欣编. 汉英职业职务职称词语翻译手册.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顾正祥. 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1878～2008).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郭卫东主编. 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国立编译馆编. 外国地名译名.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国语日报出版部编辑组. 国语日报外来语词典. 台北：国语日报出版社，1981.
赫墨龄编. 官话字典及翻译手册. 上海：出版机构不详，1916.
胡燕平主编. 实用英汉翻译类典.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胡子丹编译. 国际翻译手册. 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1984/1988.
黄光域编. 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黄光域主编. 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黄河清主编. 中华百科要览·中国译学编.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纪力晶主编. 汉日翻译应用词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贾植芳，俞元桂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1882～1949).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江建名编. 著编译审校指南.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88.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张蔚等编. 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 上海：江南制造局，1909.
康格拉特-巴特勒. 国外翻译界. 赵辛而，李森编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

李崇岭编. 东南亚地名译名手册. 北京：星球出版社，1996.
李慎廉等编. 英语姓名词典.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李毅夫，王恩庆主编. 世界民族译名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李忠华编. 英语人名词典.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梁良兴主编. 最新汉英·英汉世界地名录，北京：外文出版社，1999.
林煌天主编. 中国翻译词典.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林煌天，贺崇寅主编. 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 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
刘靖之编. 翻译工作者手册.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1.
刘世同等主编. 汉英分类翻译词典.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刘云适编. 传世汉英辞库. 台北：刘云适自行出版，1996/1999.
刘正埮，高名凯等编. 汉语外来词词典.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刘重德主编. 英汉翻译例句词典.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
路式成，魏杰主编. 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9).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路式成，魏杰主编. 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90～1994).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路式成，魏杰，孙志主编. 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95～1999).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马克，莫伊拉. 翻译学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1997)].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彭曦编. 日本常用姓名地名译名辞典.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濮阳翔主编. 汉英翻译辞典.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
饶戈平，张献主编. 国际组织通览.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撒缪尔松-布朗. 译者实用指南[*A Practical Guide for Translators*(2004)].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编辑出版. 中国当代翻译工作者大辞典. 西安：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2001.
陕西译协本辞典编写组. 翻译家辞典.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 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上海鲁迅博物馆编，罗荪等编. 鲁迅著译系年目录.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 11 集 · 第 26 卷 · 翻译文学集一. 上海：上海书店，1990.
施蛰存主编.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 11 集 · 第 26 卷 · 翻译文学集二. 上海：上海书店，1991.
施蛰存主编.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 11 集 · 第 26 卷 · 翻译文学集三. 上海：上海书店，1991.
史企曾主编. 史氏汉英翻译大词典. 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史群编. 日本姓名词典(假名序).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史群编. 日本姓名词典(拉丁字母序).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史群编. 日本姓名词典(汉字序).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世界地名编辑组编. 世界地名手册(中外文对照).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9.
《世界姓名译名手册》编译组编. 世界姓名译名手册，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1987.
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中国外语教育要事录(1949～1989).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
孙修福编. 近代中国华洋机构译名手册. 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
孙迎春主编. 译学大词典. 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
孙迎春. 汉英双向翻译学语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孙迎春，刘新芳主编. 语言类核心期刊翻译学论文索引(1991～2005).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孙志，周俊等编. 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2000～2004).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索夫. 翻译者手册. 第 6 版. 马萧，熊霄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王继同编. 新编汉英分类词典.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王韬，顾燮光等编. 近代译书目.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编印. 全国翻译书籍目录(1～12，两册). 北京：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1956.
文军主编. 中国翻译批评百年回眸：1900～2004 中国翻译批评论文、论著索引.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6.
文军主编. 中国翻译教学五十年回眸：1951～2005 中国翻译教学论文、论著索引.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6.
文军主编. 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1880～2005 中国翻译史论文、论著索引.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6.
文军主编. 中国翻译理论百年回眸：1894～2005 中国翻译理论论文索引.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
文军主编. 中国翻译技巧研究百年回眸：1914～2005 中国翻译技巧研究论文索引.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
文军，穆雷主编. 西方翻译理论著作概要.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
吴文智、钱厚生主编. 实用汉英翻译词典. 桂林：漓江

出版社，2001.
萧德荣编. 世界地名录（上、下册）.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
萧德荣主编. 世界地名翻译手册. 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
辛华编. 英语国家姓名译名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辛华编. 英语姓名译名手册. 第二次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辛华编. 法语姓名译名手册. 北京：北京外文书店，1970.
辛华编. 葡萄牙语姓名译名手册. 北京：北京外文书店，1970.
辛华编. 葡萄牙语姓名译名手册. 修订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辛华编. 西班牙语姓名译名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辛华编. 世界报刊、通讯社、电台译名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辛华编. 德语姓名译名手册. 北京：北京外文书店，1970.
辛华编. 拉美常用缩写手册. 北京：北京外文书店，1970.
辛华编. 世界地名译名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辛华编. 俄语姓名译名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辛华编. 世界民族译名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编. 中国组织机构英译名手册.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 德语姓名译名手册. 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 世界人名翻译大词典.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2007.
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 葡萄牙语姓名译名手册（重排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 法语姓名译名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 英语姓名译名手册. 第 4 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邢维琳等编. 英国地名译名手册.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
邢维琳等编. 英国地名录.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
徐宗泽编.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北京：中华书局，1949/1989.
颜婉云，江伟萍. 英汉汉英翻译参考书书目汇编. 香港：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2000.
颜婉云，莫咏贤编. 汉英英汉香港翻译用语汇编. 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
颜婉云，莫咏贤编. 香港翻译用语汇编. 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
杨永泉，夏德富主编. 国际组织手册（增订新版）.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冶金工业出版社编辑部编. 著译者须知.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5.
张宝樑主编. 汉俄翻译词典（上、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张佳珏. 汉语虚词德译词典.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张竞干等主编. 日本姓名译名手册（罗马字—汉字对照）.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8.
张泽贤编. 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版本闻见录 1905～1933.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张泽贤编. 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版本闻见录 1934～1949.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
张祖光主编. 世界地名手册（中外文对照）.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赵苏苏编. 英汉百科专名翻译词典.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地名委员会编. 联邦德国地名译名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中国地名委员会编. 美国地名译名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中国地名委员会编. 苏联地名译名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中国地名委员会编. 外国地名译名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中国地名委员会编. 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中型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编辑部编. 著译者必读. 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8.
中国翻译协会编. 中国翻译年鉴 2005～2006.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周定国主编. 世界地名翻译大词典.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周国伟编. 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周兆祥，李达三编. 译事参考手册.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1980.
朱建成主编. 汉英称谓词典.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
Chan, Sinwai ed. *A Topical Bibliograph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
Chan, Sinwai ed.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4.
Chan, Sinwai and E. Pollard, David eds. *An Encyclopedia of Chinese/English,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5.

附录三　国内外翻译组织与期刊名录

本名录主要由裴剑波编辑。在编辑过程中，吸收了柯平、鲍川运等学者的编辑研究成果，参考了《外国报刊目录》（万国学术出版社 1999 年 5 月第 1 版）、《国外期刊目录》（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编）、*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2003 (*Bowker* 41st Edit.)、《中国翻译年鉴 2005～2006》（外文出版社 2007 年 9 月第 1 版）等书目。本名录信息来源以 2009 年为限。

一、国内翻译期刊

大陆出版的期刊 32 种：

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刊号：CN 11－2802/H，ISSN 1003－6539，1979 年 10 月创刊，月刊(外语版)，大 16 开，84 页。

出版地：北京；主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1 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邮编：100024

电话：(010)65778412

传真：(010)6577838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包括 6 期旅游版(单月发行)和 6 期外语版(双月发行)。旅游版从多学科的视角探索旅游研究和旅游管理领域中的基础理论、前沿领域和重大现实问题，主要栏目包括旅游产业发展研究、旅游理论、旅游政策与法规、饭店管理、旅行社管理、资源开发与管理、产品与市场开发、旅游文化、旅游影响研究、旅游教育以及会展经济等。外语版以学校语言优势学科为依托，跟踪国内外语言学理论发展状况，介绍外语教学的最新动态，探讨翻译及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栏目包括外语教学、语言学、翻译学、外国文学、跨文化研究等栏目。

2.《当代语言学》(*Contemporary Linguistics*)，原称《国外语言学》。

刊号：CN 11－3879/H，ISSN 1007－8274，1962 年创刊，季刊，16 开，96 页。

出版地：北京；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当代语言学》编辑部

邮编：100732

电话：(010) 85195392

传真：(010) 65126591

电子邮件：ddedit@linguistics.cass.net.cn；bjddyyx@cass.org.cn

网址：http://cass.net.cn/chinese/s18 yys/dangdai/index.htm

《当代语言学》主要刊登运用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和其他语言的论文以及有独立见地的书评，尤其欢迎对某一语言现象作深入考察并具有理论意义的文章，同时也刊登汉外对比与翻译研究的论文及评价国外语言学综述的文章。

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刊号：CN 44－1554/Z，ISSN 1672－0962，1990 年创刊，双月刊，16 开，112 页。

出版地：广州；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辑部

邮编：510420

电话：(020)36204656

传真：(020)36209506

电子邮箱：gpxb306@mail.gdufs,edu.cn

网址：http://gdwy.chinajournal.net.cn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交流涉外型专业教学与科研的新成果、新经验和新情况，探索双语教学、全英教学的新途径，为语言、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外交学和信息科学等学科的成果发表和学术交流提供园地。

4.《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刊号：CN 41－1164/H，ISSN 1002－722X，1978 年创刊，双月刊，大 16 开，128 页。

出版地：洛阳；主办：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广文路 2 号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邮编：471003

电话：(0379)64543520

传真：(0379)64543292

电子邮箱：jfjw@chinajournal.net.cn

网址：http://jfjw.chinajournal.net.cn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是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性期刊，主要面向外语教学与研究工作者，以促进我国外语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为己任。

5.《民族翻译》(*Minority Nationality Translation*)，原《民族译坛》(内刊)

刊号：CN 11－5684/H，ISSN 1674－280X，2008

年8月创刊，季刊，大16开，96页。

出版地：北京；主办：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

邮编：10008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倒座庙1号《民族译坛》编辑部。

电话：(010)62555131转6216，6213

传真：(010) 62520821，(010)62556673

邮箱：Chinaminzfy@yahoo.com.cn

《民族翻译》系国家级民族语文翻译方面的专业学术刊物，刊登有关民族语文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史、古籍翻译、文学翻译、教学翻译、科技翻译、广播新闻翻译、双语教学、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新词术语翻译、译著评析、译坛人物、民族语文翻译与和谐社会建设、民族语文翻译与时代发展、跨文化的民族语文翻译、民族语言文字与立法等。

6.《日语学习与研究》(*Nihougo no Gakushu to Kenkyu*)

刊号：CN 11-1619/H，ISSN 1002-4395，1979年创刊，双月刊，大16开，96页。

出版地：北京；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106信箱《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社

邮编：100029

电话：(010)64493203

传真：(010)64493203

电子邮箱：ryxxyyj@vip.163.com

网址：http://www.ryxxyyj.com

《日语学习与研究》，面向全国广大日语教学工作者、翻译工作者以及专门从事日本语言、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选登国内外有关日语研究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介绍国内外日语界研究动态，交流研究成果及教学经验，促进日语教育事业的繁荣。

7.《山东外语教学》(*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Journal*)

刊号：CN 37-1026/G4，ISSN 1002-2643，1980年创刊，双月刊，大16开，112页。

出版地：济南；主办：山东师范大学

地址：济南市文化东路88号山东师范大学内《山东外语教学》编辑部

邮编：250014

电话：(0531)86180155，86180844

传真：(0531)86180156

电子信箱：waibian@jn-public.sd.cninfo.net

《山东外语教学》旨在为外语教师及国内外外语工作者及语言、文学研究者提供交流经验、发表教学科研成果、开展学术讨论的共同园地。

8.《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原称《上海科技翻译》。

刊号：CN 31-1937/H，ISSN 1672-9358，1986年创刊，季刊，16开，80页。

出版地：上海；主办：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编辑：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地址：上海市延长路149号上海大学33信箱《上海翻译》编辑部

邮编：200072

电话：(021)28316080

传真：(021)65420358

电子信箱：SHKF@chinajournal.net.cn

网址：http://shkf.chinajournal.net.cn

《上海翻译》是侧重研究经贸、科技、新闻、法律、政论等各类实用文体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专业性期刊。

9.《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刊号：12-1281/H，ISSN 1008-665X，1993年创刊，双月刊，16开，80页。

出版地：天津；主办：天津外国语学院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17号《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邮编：300204

电话：(022)23285743

传真：(022)23288540

电子信箱：journal@tjfu.edu.cn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是中国常用外语研究的学术期刊，辟有翻译研究、外国语言研究、外语教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栏目。

10.《外国语》(*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刊号：CN 31-1038/H，ISSN 1004-5139，1978年创刊，双月刊，16开，80页。

出版地：上海；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

地址：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外国语》编辑部。

邮编：200083

电话：(021)65420358

传真：(021)65420358

电子信箱：jfl@shisu.edu.cn

网址：http://jfl.shisu.edu.cn

《外国语》是外国语言类学术期刊，主要刊载语言学及具体语言研究；翻译研究；以及语言、翻译类书籍评价等方面的文章；同时也刊登国内外语言学、翻译学、外语教学等学术会议简讯。

11.《外国语文》(*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tudies*)，原称《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刊号：CN 50-1026/H，ISSN 1003-3831，1980年创刊，双月刊，大16开，144页。

出版地：重庆；主办：四川外语学院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邮编：400031

电话：(023)65385313

传真：(023)65385313

电子信箱：xb2005@sisu.edu.cn

《外国语文》以提升学术品位，提倡严谨学风，倡导创新精神为办刊宗旨，以外国语言文学、翻译研究为重点，兼顾其他学科。

12.《外国语言文学》(*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原称《福建外语》。

刊号：CN 35－1266/G4，ISSN 1672－4720，1984年创刊，季刊，16开，72页。

出版地：福州；主办：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地址：福州市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编辑部

邮编：350007

电话：(0591)83465378

传真：(0591)83465216

电子信箱：fjwy@fjnu. edu. cn

网址：http：//nwyj. chinajournal. net. cn

《外国语言文学》开展语言、教学、翻译、文学研究，反映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

13.《外国语言文学研究》(*Research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刊号：渝内字00－190号，2001年创刊，季刊。

出版地：重庆；主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100083(北航)，400044(重大)

电话：(0591)3465378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主要刊载语言认知研究、语篇研究、翻译、外语教学、外国文学等方面的研究论文，也刊登学术研究资料等。

14.《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原称《国外外语教学》

刊号：CN 31－1055/H，ISSN 1008－3669，1981年2月创刊，季刊，16开，64页。

出版地：上海；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编辑部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632

电子邮箱：fltaecnu@online. sh. cn；flta@mail. ecnu. edu. cn

网址：http：//gwwyjx. periodicals. net. cn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刊登介绍国内外外语教学领域的新思想、新趋势、新方法和新经验的文章，反映世界各国外语教育的现状和动态，也刊登翻译研究的文章。主要栏目有基础研究、实践研究、翻译研究、研究评述及会讯简讯等。

15.《外语与翻译》(*Foreign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1994年6月创刊，季刊，16开。

出版地：长沙；主办：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地址：长沙市韶山南路22号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北楼三楼

邮编：410075

电话：(0731)2656892

电子邮箱：wyfy@mail. csu. edu. cn

《外语与翻译》主要辟有语言研究、翻译研究、外国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外语教育、书刊评介等栏目。

16.《外语教学》(*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刊号：CN 61－1023/H，ISSN 1000－5544，1979年创刊，双月刊，大16开，97页。

出版地：西安；主办：西安外国语大学

地址：西安市长安路437号西安外国语大学内《外语教学》编辑部

邮编：710061

电话：(029)85309400

传真：(029)85309400

电子信箱：xuebao@xisu. edu. cn

网址：http：//www. xisu. edn. cn

《外语教学》以繁荣学术、促进中国的外语教学研究为己任。

17.《外语教学与研究》(*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前身《西方语文》，1959年改为现名

刊号：CN 11－1251/G4，ISSN 1000－0429，1957年创刊，双月刊，16开，80页。

出版地：北京；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

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2号《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邮编：100089

电话：(010)88816466

电子信箱：bwyys@bfsu. edu. cn

网址：http：//wjyy. chinajournal. net. cn

《外语教学与研究》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报，设有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外语教育(包括语言教学、习得、测试)、翻译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等栏目，刊载境内外学者在上述领域的研究成果，推进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和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

18.《外语学刊》(*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前身为《哈外专教学通讯》，1980年改为现名

刊号：CN 23－1071/H，ISSN 1000－0100，1951年创刊，双月刊，大16开，144页。

出版地：哈尔滨；主办：黑龙江大学

地址：哈尔滨市学府路74号黑龙江大学129信箱《外语学刊》编辑部。

邮编：150080

电话：(0451)86608322，86609913

电子邮箱：wyxk2004@126. com

《外语学刊》，以语言学为本，语言哲学为特点，涵盖翻译研究和外语教学两个领域的多种外语类学术刊物；整个期刊以语言本体论为理念，从语言哲学、语言学、翻译学和外语教学4个维度探讨语言的存在方式。

19.《外语研究》(*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刊号：CN 32－1001/H，ISSN 1005－7242，1984年创刊，双月刊，大16开，112页。

出版地：南京；主办：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地址：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外语研究》编辑部

邮编：210039

电话：(025)80838422

电子邮箱：waiyuyanjiu@163. com

网址：http：//nwjy. chinajournal. net. cn

《外语研究》以现代语言学为先导,带动传统语言学、翻译学、外国文学理论和外语教学理论研究。

20.《外语与外语教学》(*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刊号:CN 21－1060/H, ISSN 1004－6038, 1979年创刊,双月刊,大16开,64页。

出版地:大连;主办:大连外国语学院

地址:大连市延安路94号《外语与外语教学》编辑部

邮编:116002

电话:(0411)82563258,(0411)82803121－6388(0)

传真:(0411)82563258

电子邮箱:flatt@dlufl. edu. cn

《外语与外语教学》系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是以英语为主的多语种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专业学术性期刊。

21.《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刊号:CN 61－1325/G4,ISSN 1008－4703, 1983年创刊,季刊,大16开,96页。

出版地:西安;主办:西安外国语大学

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437号西安外国语大学(雁塔校区)《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编辑部

邮编:710061

电话:(029)85309400

传真:(029)85309400

电子邮箱:xuebao@xisu. edu. cn

网址:http://www. xisu. edu. cn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由西安外国语大学主办,是以外语为主,兼顾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

22.《现代外语》(*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刊号:CN 44－1165/H,ISSN 1003－6105,1978年创刊,季刊,16开,112页。

出版地:广州;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现代外语》编辑部。

邮编:510420

电话:(020)36207235

电子邮件:gplal@gdufs. edu. cn

网址:http://ling. gdufs. edu. cn

《现代外语》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术刊物,主要刊登理论语言学、语音学与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言习得、语言教学与测试、计算语言学、词典学、社会语言学、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翻译等研究领域的文章。

23.《译林》(*Translations*)

刊号:CN 32－1029 28－52 BM1009, ISSN 1001-1897,1979年创刊,双月刊,16开。

出版地:南京;主办:译林出版社

地址:南京市湖南路47号9楼《译林》杂志社

邮编:210009

电话:(025)83216195

电子邮箱:trans@yilin. com; trans@public. ptt. js. cn

网址:http://www. yilin. com/cn/mag

《译林》系大型翻译文学刊物。译介世界各国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优秀文学作品,同时刊登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方面的论述及文学动态方面的信息。主要栏目有: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散文、外国文坛一瞥、外国文学之窗、作家介绍、作品评论、翻译漫谈、外国最新信息、世界文坛动态等。

24.《英语世界》(*The World of English*)

刊号:CN 11－1615/H, ISSN 1003－2304,1981年创刊,月刊,32开,128页。

出版地:北京;主办:商务印书馆《英语世界》编辑部

地址:北京朝阳门外大街吉庆里9号楼E-2－1005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539242

电子邮箱:wewecp@sina. com

《英语世界》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选用文学类型的范文和品位较高的作品及哲学、传记、游记等类的文章,社会科学如法律、外交、军事等类经典著作,以及科技和当代科普的上乘之作,文章采用英汉对照的方式照排,是翻译实践学习与鉴赏的首选刊物。

25.《语言教学与研究》(*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刊号:CN 11－1472 2－458 Q170,ISSN 0257－9448,1979年9月创刊,双月刊,16开,80页。

出版地:北京;主办:北京语言大学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邮编:100083

电话:(010)82303575,(010) 82303573

电子邮箱:xb@blcu. edu. cn

网址:http://www. blcu. edu. cn/yys/index. htm/; http://yyjxyyj. periodicals. net. cn

《语言教学与研究》主要发表汉语研究、语言与文化研究、汉外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研究等方面的论文。主要栏目有汉语研究、语言与文化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语言习得、语言测试理论等,有英文目次。

26.《语言与翻译》(汉文版)(*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刊号:CN 65－1015/H, ISSN 1001－0823,1985年创刊,季刊,大16开,80页。

出版地:乌鲁木齐;主办:《语言与翻译》汉文编辑部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41号《语言与翻译》汉文编辑部

邮编:830001

电话:(0991)8559426

电子邮箱:yyfy1985@sohu. com

《语言与翻译》,刊登以不同学术观点撰写的有关突厥语族诸语言的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汉语

与双语教学研究等内容的文章。

27.《中国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刊号：CN 31－1694/I, ISSN 1006－6101,1984年创刊,季刊,大32开,190页。

出版地：上海;合办：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深圳大学

地址：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上海外国语大学内《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

邮编：200083

电话：(021)65311900－2625

电子邮箱：shccl203@yahoo.com.cn; shccl@citiz.net

网址：http://www.sflep.com.cn/ZGBJWX.asp

《中国比较文学》是国内唯一一份面向国内外比较文学界,及时反映本学科前沿信息的国际性专业学术期刊。

28.《中国俄语教学》(*Chinese Russian Teaching*)

刊号：CN 11－2727/H, ISSN 1002－5510,1982年创刊,季刊,大16开,96页。

出版地：北京;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833信箱《中国俄语教学》编辑部

邮编：100089

《中国俄语教学》主要介绍中国俄语教学方面的科研成果,交流俄语教学经验,反映俄语教学研究动态,评介俄语教学与研究的书刊、资料等。刊登涉及俄语语言学、俄语教学理论、俄罗斯文学语言及修辞学、俄汉翻译、俄汉语言文化对比等方面的研究论文。

29.《中国翻译》(*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原称《翻译通讯》(1980～1985)。

刊号：CN 11－1354/H, ISSN 1000－873X, 1980年创刊,双月刊,大16开,96页。

出版地：北京;主办：中国翻译协会

地址：北京市阜外百万庄大街24号《中国翻译》编辑部。

邮编：100037

电话：(010)68326681,(010)68327209

传真：(010)68995951

电子邮箱：ctjtac@gmail.com

网址：http://www.tac-online.org.cn; http://www.zgfy.chinajournal.net.cn

《中国翻译》系中国翻译协会会刊,刊登翻译理论和技巧,报道中国翻译协会动态。文章多用中文发表,间或有用英文者。

30.《中国科技翻译》(*Chinese Science & Technology Translators Journal*)

刊号：CN 11－2771/N, ISSN 1002－0489, 1988年创刊,季刊,16开,64页。

出版地：北京;主办：中国科学院翻译工作者协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2号《中国科技翻译》编辑部

邮编：100864

电话：(010)68597754,(010)68511095

电子邮箱：jyzhang@cashq.ac.cn

网址：http://www.sttacas.org

《中国科技翻译》系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刊,刊载科技翻译理论与技巧,总结介绍科技翻译工作经验,评介科技翻译作品,介绍国内外翻译组织并报道国内外译事活动。文章用中文发表。

31.《中国科技术语》(*China Terminology*),原称《科技术语研究》。

刊号：CN 11－5554/N, ISSN 1673－8578, 1998年创刊,双月刊,16开,64页。

出版地：北京;主办：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地址：北京市东黄城根北街16号1号楼《中国科技术语》杂志社

邮编：100717

电话：(010)84010681;64032905

传真：(010)84010681

电子邮箱：esttj@263.net.cn,cnctst@263.net

网址：http://term.gov.cn; http://www.term.org.cn

《中国科技术语》辟有术语学研究、术语探源、术语与翻译、探讨与争鸣、热点词、难点词、公布名词、发布试用、两岸词苑、新词新语等栏目。

32.《中国外语》(*Foreign Language in China*)

刊号：CN 11－5280/H, ISSN 1672－9382, 2004年创刊,双月刊,大16开,80页。

出版地：北京;主办：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中国外语》杂志社

邮编：100011

电话：(010)58581936/37

传真：(010)58581353

电子邮箱：flc@hep.com.cn

网址：http://www.cflo.edu.cn

《中国外语》面向教学,强化应用。注重引导性、前瞻性、学术性和实践性,反映我国外语教学改革和理论研究成果。

港台地区出版的期刊4种：

1.《翻译季刊》(*Translation Quarterly*)

刊号：ISSN 1027 55925,1995年创刊,季刊。

出版地：香港;主办：香港翻译学会

地址：P. O. Box 20186, Hennessy Road, Post Office, Hong Kong.

《翻译季刊》系香港翻译学会会刊,为香港第一份翻译研究刊物,刊物宗旨为翻译学术研究与翻译活动提供一个交流的园地,文章用中文或英文发表,在港内翻译界有其独到之处。

2.《翻译学报》(*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刊号：ISSN 1027－7978,1979年创刊。

出版地：香港；主办：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

《翻译学报》刊载有关翻译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及外国文学的翻译作品。

3.《译丛》(*Renditions*)

1973 年创刊。

出版地：香港；主办：香港翻译研究中心

《译丛》是国际上主要的英译中国文学刊物，内容涵盖 2 000 年的中国文学，从古典诗歌、散文、小说到现当代文学，也刊登艺术、中国研究和翻译研究的文章。

4.《翻译学研究集刊》(*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刊号：ISSN 2070－9668，1996 年创刊，每年发行一次，每年 7 月底前截稿，10 月出刊，定价：300 台币。

出版地：台北；主办：台湾翻译学会

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四段 60 号 5 楼

电话：02－6632－0088　0932－770625（秘书）

传真：02－6632－9772

电子邮箱：service@tati. org. tw

网址：http：//tati. org. tw

《翻译学研究集刊》，系台湾翻译学会会刊。

二、国内翻译组织

（一）中国翻译协会及其下属九个委员会：

中国翻译协会(*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简称“中国译协”(TAC)，原称“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于 1982 年，会员分布在中国内地的 30 个省、市、自治区，中国译协于 1987 年正式加入国际翻译家联盟。

出版物：《中国翻译》(双月刊)杂志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编：100037

电话：(010)68994027(秘书处)，(010)68995903(行业管理办公室)

传真：(010)68995951(秘书处)，(010)68990246(行业管理办公室)

电子邮箱：taccn@163bj. com(秘书处) tachgb@ina. com. cn(行业管理办公室)

网址：www. tac-online. org. cn

1. 中国翻译协会对外传播翻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Translation Committee of TAC*)

原名“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对外传播翻译委员会”，简称“中国译协对外传播翻译委员会”。成立于 1991 年。

地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编：100037

电话：(010)68326681

传真：(010)68995951

电子邮箱：ictc. tac@gmail. com

2. 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服务委员会(*Translation Service Committee of TAC*)

原名“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服务委员会”，简称“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成立于 2002 年。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 号现代城 10 号楼 D 座 1509 号

邮编：100022

电话：(010)85805840

传真：(010)85805840

电子邮箱：jiayanli@ctpc. com. cn　fusuxiao@ctpc. com. cn

网址：www. tsc. org. cn

3. 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Committee of TAC*)

原名“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简称“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成立于 1995 年。

地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编：100037

电话：(010)68995954

传真：(010)68995951

电子邮箱：ttttc. tac@gmail. com

4. 中国翻译协会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Military Science and Translation Committee of TAC*)

原名“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简称“中国译协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成立于 1987 年。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厢红旗东门外 1 号

邮编：100091

电话：(010)66767488

传真：(010)66767488

5. 中国翻译协会科技翻译委员会(*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Committee of TAC*)

原名“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科技翻译委员会”，简称“中国译协科技翻译委员会”，成立于 1990 年。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52 号中科院科技翻译协会秘书处

邮编：100864

电话：(010)68597754

传真：(010)68511095

电子邮箱：wlzhao@cashq. ac. cn　jyzhang@cashq. ac. cn

网址：http：//www. sttacas. org

6. 中国翻译协会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Ethnic Languages Translation Committee of TAC*)

原名“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简称“中国译协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成立于 1985 年。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倒座庙 1 号

邮编：100080

电话：(010)62556673

传真：(010)62520821　62556673

电子邮箱：WSZ1369@163. com

7. 中国翻译协会社会科学翻译委员会(*Social Science Translation Committee of TAC*)

原名"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社会科学翻译委员会",简称"中国译协社科翻译委员会",成立于1986年。

地址:北京市王府井大街36号

邮编:100710

电话:(010)65282201

8. 中国翻译协会外事翻译委员会(*Foreign Relations Translation Committee of TAC*)

原名"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外事翻译委员会",简称"中国译协外事翻译委员会",成立于1993年。

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南大街2号

邮编:100710

电话:(010)65963800

传真:(010)65963809

9. 中国翻译协会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Literature and Art Translation Committee of TAC*)

原名"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简称"中国译协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成立于1986年。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电话:(010)65252127 65253701

传真:(010)85111921

电子邮箱:tongbao min@263. net

(二)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China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ACSEC)

由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英语、汉语、对外汉语、英汉语言、中西文化比较和英汉互译等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人员自愿组成。

挂靠单位:湖南长沙中南大学。

研究会成立之前曾用"英汉比译学会"的名义于1990年7月在井冈山和1991年8月在芜湖召开过两次学术研讨会,为学会的筹备阶段。1991年6月26日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复信同意担任名誉会长并建议学会更名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1994年12月3日在中南工业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暨首届全国学术研讨会。现有英汉语言对比、中西文化比较、翻译研究、典籍翻译、英汉语篇对比、中西语言哲学比较等学科组。

三、国际翻译期刊

1. *Babel*(《通天塔》)

国际刊号:ISSN 0521-9744,1955年创刊,每年出版4期,18开,96页,170.00NLG

出版地:荷兰阿姆斯特丹;主办:国际翻译家联盟;出版机构:约翰·本杰明公司

地址:John Benjamins B. V., Amsteldijk 44, P.O. Box 75577, 1070 AN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电话:+(31)20-6738156

传真:+(31)20-6792956

网址:http//www. benjamins. nl

《通天塔》系国际翻译家联盟会刊,刊载翻译理论和技巧,报道国际翻译工作者协会及其成员协会的动态。文章多用法文或英文发表,间有用德、意、俄文者。

2. *Comparative Criticism*(《比较批评》)

国际刊号:ISSN 0144-7564,1979年创刊,每年出版1期,68.00/GBP

出版地:英国伦敦;主办:英国比较文学协会;出版机构:剑桥大学出版社

地址:The Edinburgh Building, Shaftesburry Road, Cambridge CB2 2RU, UK.

电话:+(0223)312393

传真:+(0223)315052

电子邮箱:journals-subscriptions@cup. cam. ac. uk

《比较批评》刊载英语文学作品研究理论的评论性文章,包括文学专著、翻译作品、新诗歌、著作评论、比较文学文献等,每期一个专题。

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国际翻译杂志》)

国际刊号:ISSN 0970-9819,1988年创刊,每年出版2期,60.00/USD

出版地:印度;出版机构:Bahri出版公司

地址:Bahri Publications Pvt. Ltd., Prachya Niketan, Birla Museum, P. O. Vallabh Bhavan. Bhopal 462004, India.

《国际翻译杂志》刊载有关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文章。

4. *Interpreting*(《口译》)

国际刊号:ISSN 1384-6647,1996年创刊,每年出版2期,145.00/NLG

出版地: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机构:约翰·本杰明公司

地址:John Benjamins B. V., Amsteldijk 44, P. O. Box 75577, 1070 AN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电话:+(31)20-6738156

传真:+(31)20-6792956

网址:http//www. benjamins. nl

《口译》刊载口译研究和实践方面的文章,以促进口译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

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Aesthetics* (《比较文学与美学杂志》)

国际刊号:ISSN 0252-8169,1978年创刊,每年出版2期,18开,118页,15.00/USD

出版地:印度奥里萨;出版机构:Sambalpur大学,Vishvanatha Kaviraja比较文学与美学研究所

地址:B8 Sambalpur University, Jyotivihar, 768019,Orissa, India.

《比较文学与美学杂志》刊载有关文学和美学理

论，以及艺术、文学史、文学作品评论和翻译等方面的论述，兼及有关出版物和会议报道。

6. *Journal of Translation and Textlinguistics*（《翻译与篇章语言学杂志》）

原称《翻译与篇章语言学》（1987～1991），简称JOTT.

国际刊号：ISSN 1055－4513，1987年创刊。主编：罗伯特·L. 朗埃克（Robert L. Longacre）。

出版地：美国；出版机构：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Inc., Academic Publications

地址：7500 W Camp Wisdom Rd, Dallas, TX 75236.

电话：＋(972)708 7403

传真：＋(972) 708 7387

电子邮箱：academic_books@ sil. org

网址：http: //www. sil. org.

《翻译与篇章语言学杂志》刊登翻译与篇章语言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文章用英文发表。

7. *Language Forum*（《语言学论坛》）

国际刊号：ISSN 0253－9071，1975年创刊，每年出版4期，60.00/USD

出版地：印度；出版机构：Bahri 出版公司

地址：Bahri Publications Pvt. Ltd., Prachya Niketan, Birla Museum, P. O. Vallabh Bhavan, Bhopal 462004, India.

电话：＋(0755)551388

《语言学论坛》刊载印度语言与文学，包括印度语言与方言的规划、分析、教学，比较文学，普通语言学及翻译理论问题等方面的论文。

8. *Language International*（《国际语言》）

国际刊号：ISSN 0923－182X，1989年创刊，每年出版6期，200.00/NLG

出版地：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机构：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

地址：John Benjamins B. V., Amsteldijk 44, P. O. Box 75577, 1070 AN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电话：＋(31) 20－6738156

传真：＋(31)20－6792956

网址：http//www. benjamins. nl

《国际语言》刊载世界各国语言的发展、运用、教学，以及翻译、语言与计算机、词典学等方面的论文、评论、调查报告、动态简讯、出版物介绍等。

9. *Lebende Sprachen*（《生动的语言》）

国际刊号：ISSN 0023－9909，1956年创刊，每年出版4期，12开本，50页，113.00/DEM

出版地：德国

地址：Langenscheidt KG, Neusser Str. 3, D－80807 Muenchen, Germany.

电话：＋(089)3 60 96－0

传真：＋(089)3 60 96－2 58

电子邮箱：vertrieb@langenscheidt. de

《生动的语言》发表翻译学理论和实践研究论文，涉及翻译技巧、各种语言翻译对比研究等内容。兼载述评和国际会议消息。

10. *The Linguist*（《语言学家》）

国际刊号：ISSN 0268－5965，1962年创刊，每年出版6期，12开本，64页，35.00/GBP

出版地：英国伦敦；主办：伦敦语言学家学会

地址：Institute of Linguists, 24a Highburry Grove, London N5 2DQ, UK.

电话：＋(0171)359 7445

传真：＋(0171)354 0202

《语言学家》系语言学家学会会刊。刊载语言教学与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以及语言学家学会活动的报道。

11.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Theory*（《文学翻译理论》）

国际刊号：ISSN 1043－6928，1990年创刊，每年出版4期，450.00/USD

出版地：英国；出版机构：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

地址：STBS Ltd, Order Department, P. O. Box 90, Reading, Berkshire RG1 8JL, UK.

电话：(01734)568 316

传真：(01734)568 211

《文学翻译理论》主要刊载文学翻译理论方面的研究论文。

12. *Meta: Journal des Traducteurs/Translators' Journal*（《译者杂志》）

国际刊号：ISSN 0026－0452，1956年创刊，每年出版4期，16开本，114页，95.00/USD

出版地：加拿大蒙特利尔；出版机构：蒙特利尔大学出版社

地址：Presses de l'Universite de Montreal, C. P. 6128, Succ. A, Montreal, Que. H3C 3J7, Canada.

电话：＋(514)343 6933

传真：＋(514)343 2232

电子邮箱：pumedit@ere. umontreal. ca

网址：url: http: //www. pum. umontreal

《译者杂志》刊载翻译、术语学、文体学和修辞学的研究文章及书评，文章用英文或法文发表。

13.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视角：翻译学研究》）

1993年创刊，每年出版4期。

出版地：丹麦哥本哈根；主办：哥本哈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出版机构：哥本哈根大学出版社

《视角：翻译学研究》主要刊载翻译方法与翻译策略方面的研究论文。

14. *Poetry Nation Review*（《诗歌评论》）

国际刊号：ISSN 0144－7076，每年出版6期，12开本，80页，60.00/USD

出版地：英国；出版机构：World Wide Subscription 服务公司

地址：World Wide Subscription Service Ltd., Unit 4, Gibbs Reed Farm, Ticehurst, East Sussex TN5 7HE, UK.

电话：+(01580)200 657

传真：+(01580)200 616

《诗歌评论》刊载有关英国及其他国家的诗歌创作和翻译等方面的评论文章以及诗作、诗人评介、诗坛动态报道和书评。

15. *Target: An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目标：国际翻译研究杂志》)

国际刊号：ISSN 0924－1884，1989 年创刊，每年出版 2 期，242.00/NLG

出版地：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机构：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

地址：John Benjamins B. V., Amsteldijk 44, P. O. Box 75577, 1070 AN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电话：+(31)20－6738156

传真：+(31)20－6792956

网址：http://www. benjamins. nl

《目标：国际翻译研究杂志》刊载翻译问题的理论、方法论及描述性研究论文和有关的出版和研究活动报道。文章主要用英、法或德文发表。

16. *Traduire* (《翻译》)

国际刊号：ISSN 0395－773X，1953 年创刊，每年出版 4 期，343.00/FRF

出版地：法国巴黎；出版机构：法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办

地址：22 rue des Martyrs, 75009 Paris, France.

电话：+(33)1 48784332

传真：+(33)1 44530114

《翻译》探讨翻译技巧；交流翻译信息；评介翻译作品；报道出版动态。

17.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翻译与文学》)

国际刊号：ISSN 0968－1361，主编：斯图尔特·吉莱斯皮(Stuart Gillespie)。

出版地：英国爱丁堡；出版机构：爱丁堡大学出版社

地址：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2 George Sq, Edinburgh, Midlothian EH8 9LF, UK.

电话：+(44) 131 650 6207

传真：+(44) 131 662 0053

电子邮箱：journals@eup. ed. ac. uk

网址：http://www. eup. ed. ac. uk/Newweb/journals/Translation/.

联系人：Douglas McNaughton，联系人电话：+(44) 131 650 4420

《翻译与文学》发表各个时期有关文学翻译的各类文章、随笔和评论，重点刊登英国文学外译研究的论文，文章用英文发表。

18. *Translation and Meaning* (《翻译与意义》)，不定期出版。

出版地：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出版机构：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出版社

地址：Universitaire Pers, Maastricht, P. O. Box 694, Maastricht, 6200 AZ, Netherlands.

电话：+(31)43－3466471

传真：+(31)43－3466649

19. *Translation Journal* (《翻译杂志》)

1997 年创刊，有过刊提供，主编：盖布·博科尔(Gabe Bokor)。

出版地：美国纽约；出版机构：Accurapid Translation Services, Inc.

地址：Accurapid Translation Service, Inc., 806 Main St., Pougkeespsie, NY 12603 USA.

电话：+ (845) 473 4550

传真：+(845)473 4554

电子邮箱：mail@accurapid. com

网址：http://accurapid. com/journal.

《翻译杂志》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电子译刊，是一个"由译者办给译者看的有关译者与翻译的网上刊物"。在网上可看到文章的全文，文章用英文发表。

20. *Translation Review* (《翻译评论》)

国际刊号：ISSN 0737－4836，1978 年创刊，每年出版 3 期，12 开本，32 页，45.00/USD

出版地：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美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办；出版机构：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

地址：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P. O. Box 830688, Richardson, TX 75083－0688, USA.

电话：+(972)883 2093

传真：+(972)883 6303

《翻译评论》交流翻译各国文艺作品的情况和经验，报道翻译出版消息。

21. *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s* (《翻译研究文摘》)

国际刊号：ISSN 1460－3063，1998 年创刊，每年出版 2 期，主编：梅娃·奥洛罕(Maeva Oloham)。

出版地：英国曼彻斯特；出版机构：圣哲罗姆出版公司

地址：St. Jerome Publishing, 2 Maple Rd W, Brooklands, Manchester, M23 9HJ, UK.

电话：+(44)161－973－9856

传真：+(44)161－905－3498

电子邮箱：stjerome@compuserve. com

网址：http://www. mcc. ac. uk/stjerome.

《翻译研究文摘》所刊登的文章涉及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22. *Translatio* (《翻译》)

原称《国际译联翻译通讯 1968～1996》(*Nouvelles de la FIT Newsletter*)

刊号：ISSN 1027－8087，1968 年创刊，单价：欧洲 900/BEF；其他地区 1 100/BEF；主编：勒内·黑斯瑞恩(Rene Haesryn)

出版地：比利时；出版机构：国际译联出版

地址：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 Heiveldstraat 245, St-Amandsberg, Ghent 9040, Belgium.

电话：+(32) 9－228－3971

传真：+(32) 9－228－3971

编辑、出版与广告联系人：*Rene Haesryn*

《翻译》是国际译联会刊，报道国际译联的活动动态，以及事关译界人士利益的信息。刊登的文章包括口笔译和对比语言学方面的论文。

23. *The Translator*（《译者》）

国际刊号：ISSN 1355－6509，1995年创刊，每年出版2期，每年4月和11月出版，368页，每年出一期专刊，主编：莫娜·贝克(Mona Baker)。

出版地：英国曼彻斯特；出版机构：圣哲罗姆出版公司

地址：2 Maple Road West, Brooklands, Manchester M23 9HH, UK.

电话：＋(44)161－973－9856

传真：＋(44)161－905－3498

电子邮箱：stjerome@compuserve. com

网址：http://www. stjerome. co. uk/journal. htm

24. *TRANSST*（《国际翻译研究通讯》）

出版地：以色列；出版机构：Aviv大学，M. Bernstein翻译理论和Porter诗学与符号学学会主办出版；主编：吉德翁·图里(Gideon Toury)

地址：The M. Bernstein Chair of Translation Theory Tel Aviv University, Faculty of Humanities, Tel Aviv, Israel.

电话：＋(972)3 6407022

传真：＋(972)3 6408980

电子邮箱：toury@spinoza. tau. ac. il

网址：http://www. tau. ac. il/～toury/transst

25. 通譯翻譯(《口笔译杂志》)

1985年创刊，每年出版12期，12开，100页，13 200. 00/JPY。

出版地：日本东京

地址：T162－0825日本东京都新宿区神乐坂3－2。

电话：＋(03)3267－2766

《口笔译杂志》提供口译、笔译知识及就业信息。

26. 翻譯の世界(《翻译世界》)

1976年创刊，每年出版12期，25开，160页，8 400. 00/JPY.

出版地：日本东京

地址：T102－0083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町2－2－4。

电话：＋(03)5275－2324

《翻译世界》介绍翻译技巧与实践，报道翻译界动态。

四、国际翻译组织

1.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Permanente d'Institutes/Universitaires de Traducteurs et Interpretes（国际口笔译高等教育机构常设会议组织）

简称CIUTI。成立于1994年，是一家非营利性科教组织，旨在促进口笔译行业的研究和发展。

地址：

CIUTI

c/o Dr. Martin Forstner

Jahannes-Gutenberg-Univeritat Mainz

An der Hochschule 2 D－76711 Germersheim

电话：＋49 7274 508 35 139

传真：＋49 7274 508 35 437

电子邮箱：forstner@mail. fask. uni-mainz. de

网址：http://www. ciuti. org/

2. 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欧洲翻译研究协会

简称EST。1992年9月在奥地利维也纳成立，是欧洲的国际性口笔译协会组织，其法、德、西班牙文名称分别为*traductologie*,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traductología*。

出版物：《欧洲翻译研究协会通讯》(The *EST Newsletter*)

联系人：Sieglinde Pommer, General Secretary

spommer@gmx. at

3. European Union of Associations of Translation Companies

欧洲译协联盟

简称EUATC。成立于1994年，是欧洲唯一的翻译联盟组织。

联系方式：

President

Ms. Elizabeth Robertson

Robertson House 57～59 High Street

Twyford · Berks RG10 9AJ

United Kingdom

电话：＋44 (0) 118 934 6000

传真：＋44 (0) 118 934 6015

电子邮箱：info@euatc. org

Vize-President

Ms. Penny Marinou

27 Polymnias Street

155 61 Athens

Greece

电话：＋30 210 6525227

传真：＋30 210 6540652

电子邮箱：penny@litterae. gr

网址：http://www. litterae. gr

Treasurer

Mr. Michel Vrisekoop

Van Tuyll van Serooskerkenplein 27

NL 1076 LZ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电话：＋31 (0)20 6622662

传真：＋31 (0)20 6734050

电子邮箱：mvrisekoop@vtalen. nl

4.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

国际翻译家联盟

简称国际译联(FIT)。1953年12月创立于法国巴黎,其成员有53个国家和地区,共74个协会成员。

出版物:《通天塔》(*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国际译联翻译通讯》(*Nouvelles de la FIT/Newsletter*)

《译者/翻译》(*Translatio*)

地址: P. O. Box 21, Dr. Heinrich Maierstrasse 9, A-1184, Vienna, Austria.

电话: + (43) 1 440 3607

传真: + (43) 1 440 3756

电子邮箱: fit@ottiaq. org

网址: http: //www. fit-ift. org/

5.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ssociation

全球化与本地化协会

简称GALA。成立于2002年,是GILT领域内的非营利性国际行业组织。

地址: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ssociation

23 Main Street, Andover

Massachusetts 01810, USA.

电话: +1 206 329 2596

电子邮箱: info@gala-global. org

网址: http: //www. gala-global. org

6.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

简称IATIS。成立于2004年,是一个纯学术国际组织。

出版物:《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年鉴》(*IATIS Yearbook*)、在线期刊《新声》(*New Voices*)

地址: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P. O. Box 450, Stn. A. , School of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University of Ottawa

Ottawa, Ontario, K1N 6N5, Canada

电话: +1 613 562 5800

传真: +1 613 730 3227

电子邮箱: abrisset@uottawa. ca

网址: http: //www. iatis. org/

7.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nterprètes de Conférence

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

简称AIIC。成立于1953年,有来自90多个国家的2 800名成员。

出版物:《职业行为准则》(*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年鉴》(*Yearbook*)

地址: 10, ave de Secheron CH - 1202 Geneva, Switzerland

电话: +(41) 22 908 1540

传真: +(41) 22 732 4151

电子邮箱: info@aiic. net 100665. 2456@compuerve. com

网址: http: //www. aiic. net

8.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Translators

国际会议笔译员协会

简称IACT。成立于1962年,有来自33个国家的419名成员。

出版物:《名录》(*Directory*)、《通讯》(*Bulletin*)

地址: 15, route des Morillons 1218 Le Grand-Saconnex, Geneva, Switzerland

电话: +(41) 22 791 0666

传真: +(41) 22 788 5644

电子邮箱: aitc@atge. automail. com

9.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re for Terminology

国际术语信息中心

简称infoterm,1971年成立,是一家独立的国际非营利协会。

地址: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re for Terminology, Mariahilfer, Strasse 123/3 1060 Vienna, Austria

电话: +(43) 664 3446 181

传真: +(43) 152 4060 699

电子邮箱: infopoint@ infoterm. org

网址: http: //www. infoterm. info/

10.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s Center

国际翻译中心

简称ITC。1961年10月2日在荷兰德尔夫特成立。

11. Localization Industry Standards Association

本地化行业标准协会

简称LISA。1990年在瑞士成立,是全球化、国际化、本地化和翻译商务领域内的非营利组织。

出版物:《全球化行家》(*Globalization Insider*)、《本地化行业入门读本》(*Localization Industry Primer*)

地址: LISA Headquarters Domaine en Prael CH-1323 Romainmotier Switzerland

电话: +(41) 24 453 2310

传真: +(41) 24 453 2312

电子邮箱: lisa@lisa. org

网址: http: //www. lisa. org

12.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国际机器翻译协会

简称IAMT。成立于1991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科教机构。IAMT下设三个区域性协会:亚太地区机器翻译协会(AAMT)、美洲机器翻译协会(AMTA)和欧洲机器翻译协会(EAMT)。

AAMT

出版物:《国际机器翻译新闻》(*MT News International*)

地址：c/o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Group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3-5 Hikari-dai, Seika-cho, Soraku-gun, Kyoto, 619－0289 Japan

电话：+(81) 774 93 4625

传真：+(81) 774 93 4627

电子邮箱：aamtinfo@aamt. info

网址：http://www. aamt. info/english/org. htm/

AMTA

地址：Priscilla Rasmussen, 290 N. Eighth Street, Stroudsburg, PA 18360 USA

电话：+1 570 476 8006

传真：+1 570 476 0860

电子邮箱：business@amtaweb. org

网址：http://www. amtaweb. org/

EAMT

地址：EAMT, 40, boulevard de Pont-d'Arve CH－1221 Geneve, Switzerland

电话/传真：+41 22 379 8689

电子邮箱：info@eamt. org

网址：http://www. eamt. org/

附录四 参 考 文 献

Aixela J F.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A]. In: Avarez R, Vidal M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Alves F ed.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Anderman G, Rogers M eds. *Translation Toda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C].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89.

Andrews E. *Conversations with Lotman: Cultural Semiotic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ognition*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3.

Appiah K A. Thick Translation[J]. *Callaloo*, 1993, 16(4).

Arnold D, Balkan L, Humphreys R L et al. *Machine Translation: An Introductory Guide* [M]. Manchester/Oxford: NCC Blackwell, 1994.

Arnold M. *On Translating Homer*[M]. London: Longman, Green, Longman, and Roberts, 1861; also In: Arnold M ed. *Essays Literary and Critical*[C]. London: Dent; New York: Dutton, 1906.

Asensio R M. *Translating Official Documents, Manchester UK & Northampton*[M]. MA: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3.

Baker M. *In Other Words —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2.

Baker M.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A]. In: Baker M, Francis G, Tognini-Bonelli E eds.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Baker M.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 Overview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Target*, 1995, 7(2).

Baker M.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A]. In: Somers H ed. *Terminology, LSP and Transla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1996.

Baker M ed. *Routledge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Z].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8;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Baker M.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A]. In: France P ed. *The Oxford Guide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C]. Oxford: OUP, 2001.

Ballester A. The Politics of Dubbing. Spain: A Case Study[A]. In: Jansen P ed. *Translation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Discourse: Selected Papers of the CERA Research Seminar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1992～1993*. Leuven: CETRA, The Leuven Research Center for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s, 1995.

Barkhudarov L. Urovni yazykovoy iyerarkhii i perevod [Levels of Language Hierarchy and Translation][J]. In: Barkhudarov L S ed. *Tetradi perevodchika* [*The Translator's Notebooks*]. 1969(6).

Barnes J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Barnstone W. *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Practice*[M].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Barthes R. Style and Its Image[A]. In: Chatman S. *Literary Style: A Symposium*[C]. New York: Routledge, 1971.

Bartlett, F C. *Remember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1980/1991.

Bassnett 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Oxford: Blackwell, 1993.

Bassnett S. The Meek or the Mighty: 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 [A]. In: Alvarez R, Román A, Vidal M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Bassnett S.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ase for Doctoral Research[A]. In: Bush P, Malmjar K eds. *Rimbaud's Rainbow —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Bassnett S. Translation 2000 — Difference and Diversity [J]. *Textus: English Studies in Italy*, 1999(2).

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 [M]. Thir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Bassnett S, Harish T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C].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9.

Bassnett S, Lefevere A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C]. London: Pinter Publisher, 1990.

Bassnett S, Lefevere A eds. *Constructing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8;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Beeby L A. *Teaching Translation from Spanish to English: Words beyond Words* [M].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96.

Beekman J, Callow J. *Translating the Word of God* [M].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1974.

Bell R 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M]. London/New York: Longman, 1991.

Benjamin A. *Translation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A New Theory of Words*[M]. London: Routledge, 1989.

Benjamin W.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1923/1963) [A]. In: Störig H J ed. *Das Problem des Übersetzens*[C].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Wege der Forschung Band Ⅷ], 1963.

Benjamin W. The Task of Translat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Baudelaire's Tableaus Parisiens (1923/1963) [A]. In: Arendt H ed. *Illuminations* [C]. Zohn H tran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23/1970.

Benjamin W, Bullock M, Jennings M W eds. *Selected Writings* [C]. Volume 1(1913～1926).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Berk-Seligson S. *The Bilingual Courtroom: Interpreter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0.

Berman A. La traduction comme épreuve de l'étranger [J]. *Texte*, 1985(4).

Blum-Kulka S, Levenston E A. Universals of Lexical Simplification [A]. In: Færch C, Kasper G eds. *Strategies in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 [C]. London/New York: Longman, 1983.

Blum-Kulka S. 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 [A]. In: House J, Blum-Kulka S eds.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C].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1986.

Boase-Beier J, Michael H eds. *The Practic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onstraints and Creativity* [C].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9.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 Nice R tran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Bourdieu P.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M].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Bradbury M. *Why Come to Slaka?*[M]. London: Arena, 1987.

Brislin R W ed. *Translation: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M]. New York: Gardner Press, 1976.

Brockmann D. *Controlled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emory Technology: A Perfect Match to Save Translation Cost*[R]. In TC-Forum. 4－97. December 1997.

Brower R A ed. *On Translation*[M]. New York: OUP, 1959/1966.

Brown C H. A Survey of Category Types in Natural Language[A]. In: Tsohatzidis ed. *Meanings and Prototypes: Studies o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C]. Oxford: Routledge, 1990.

Brown P, Levinson S.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Burgess A. *A Clockwork Orange*[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2/1972.

Cai X.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A]. In: *Proceedings, 2nd Asian Translators' Forum*. Seoul: Kovean Society of Translators, 1998.

Casagrande J B. The Ends of Transl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1954, 20(4).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Chang N F. A Missing Link in Even-Zohar's Theoretical Thinking [J]. *Target*, forthcoming.

Chang S W, Pollard D E eds. *An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 Chines-English · English-Chinese*[Z].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en G. On Different Norms of Escort Interpretation [A]. In: 柴明颎. 口译的专业化道路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6.

Chesterman A. Causes, Translation, Effects[J]. *Target*, 1988, 10(2).

Chesterman A ed.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 [C]. Finland: Oy Finn Lectura Ab, 1989.

Chesterman A. Ethics of Translation [A]. In: Snell-Hornby M et al eds.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Chesterman A.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7.

Chesterman A. 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 [J]. *The Translator*, 2001, 7(2).

Chesterman A. Between Text and Culture[A]. In: Veisbergs A ed. *The Third Riga Symposium on Pragma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Proceedings* [C]. Riga: University of Latvia/Aarhus School of Business, 2003.

Chesterman A. Beyond the Particular[A]. In: Mauranen A, Kujamäki P eds. *Translation Universals: Do They Exist?*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4a.

Chesterman A. Hypothesis about Translation Universals [A]. In Hansen G, Malmkjær K. Gile D eds. *Claims, Changes and Challeng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elected Contributions for the EST Congress, Copenhagen, 2001*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4b.

Chesterman A. Between Text and Culture [A]. In: Veisbergs ed. *The Third Riga Symposium on Pragma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Proceedings* [C]. Riga: University of Latvia/Aarhus School of Business, 2008.

Clark H. *Using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oates J. Changing Horses: Nabokov and Translation[A]. In: Boase-Beier J, Holman M eds. *The Practi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Cobley P.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Z].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1.

Coleman L, de Kay O. Prototype Semantics: the English Word LIE'[J]. *Language* 1981(57).

Colin J, Morris R. *Interpreters and the Legal Process*[M]. Winchester: Waterside Press, 1996.

Collins A M, Loftus E F. A Spreading-Activation Theory of Semantic Processing[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5(82).

Coulson S. Semantic Leaps: Frame-shifting and Conceptual Blending[D]. 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Croft W. *Typology and Universal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ronin M.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M]. London: Roultledge, 2003.

Dagut M. *Hebrew English Translation: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Some Semantic Problems* [M]. Haifa: University of Haifa, 1978.

Dahl S.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 Transformation-Cultural Diversity,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Convergence*[R]. Project Presented to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Interact. http://www.stephweb.com/capstone/capstone/.shtml 1998.

Danesi M. *Semiotics in Language Education*[M].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0.

Davidson D.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M]. Oxford: OUP, 1984.

de Beaugrande, R. *Factors in a Theory of Poetic Translating*[M]. Assen: Van Gorcum, 1978.

de Beaugrande R. *Text, Discourse, and Process*[M]. London: Longman, 1980. (Digital reformatted version from: http//Beaugrande.bizland.com/TOPOpening.htm)

de Beaugrande R, Dressler W.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M]. London/New York: Longman, 1981.

de Kay O. *N' Heures Souris Rames: The Coucy Castle Manuscript*[M]. London: Angus & Robertson Publishers, 1983.

Delisle J. *L'analyse du discours comme méthode de traduction*[M]. Ottawa: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 Ottawa, 1980.

Delisle J. *Translation.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 translation of Part 1 of *L'analyse du discours comme méthode de traduction*[M]. Logan P, Creery P trans.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88.

Delisle J. *La traduction raisonnée*[M]. Ottawa: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 Ottawa, 1993.

Delisle J, Lee-Jahnke H, Cormier M C. *Translation Terminology*[Z].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1/2000.

Derrida J. *Of Grammatology*[M]. Spivak G tran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Derrida J.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M].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Bass A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1978.

Derrida J. "Des Tours de Babel," In: Schulte R, Biguenet J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Derrida J.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J]. *Critical Inquiry*, 2001, 27(2).

de Waard J, Nida E.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ng* [M]. Nashville: Nelson, 1986.

Deyes A F. *Towards a Linguistic Definition of Functional Varieties of Written English*[J]. IRAL, 1978, 16(4).

Díaz-Cintas J. *Teor ía y práctica de la subtitulación: Inglés-Español*[M]. Barcelona: Ariel, 2003.

Díaz Fouces O. The Sociology Translation [J]. Quadens, 2001(6).

Dik S C. *Functional Grammar*[M]. Amsterdam, New York/Oxford: North-Holland, 1978.

Diller H J, Kornelius J. *Linguistische Probleme der Übersetzung*[M]. Tübingen: Niemeyer, 1978.

Dries J. *Dubbing and Subtitling: Guidelines for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M]. Manchester: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the Media, 1995.

Duff A. *The Third Language: Recurrent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

Eco U. *A Theory of Semiotic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Eco U. *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Language*[M]. Fentress J tr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5.

Eco U, Nergaard S. Semiotic Approaches[A]. In: Baker M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Z].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8;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Edwards A B. *The Practice of Court Interpreting*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Eija V. Generic and Register Qualities of Texts and Their Relation[A]. In: Peter H F, Gregory M eds. *Discourse in Society: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C]. Ablex: Publishing Cooperation, 1995.

Ericsson K A, Kintsch W. Long-term Working Memory[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5(102).

Even-Zohar I. *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 [C]. Tel Aviv: Tel Aviv University, 1978.

Even-Zohar I. Translation Theory Today: A Call for Transfer Theory [J]. *Poetics Today*, 1981(4).

Even-Zohar I. Polysystem Studies[J].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special issue of *Poetics Today*, 1990a, 11(1).

Even-Zohar I. System, Dynamics, and Interference in Culture: A Synoptic View[J].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special issue of *Poetics Today*, 1990b, 11(1).

Even-Zohar I. *Papers in Culture Research* [C]. 2005. http://www.even-zohar.com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1995.

Fairclough N, Wodak 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M]. London: Sage, 1997.

Fauconnier G. *Mental Space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1994.

Fauconnier G.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M].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Fauconnier G, Turner M. Blending as a Central Process of Grammar[A]. In: Goldber A ed.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C].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996.

Fauconnier G, Turner M.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J]. *Cognitive Science*, 1998, 22(2).

Fill A. Ecolinguistics — State of the Art 1998[A]. In: Fill A, Mühlhaüsler P eds.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 London: Continuum, 2001.

Fillmore C. 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A]. In: Cogen C et al eds. *Proceed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C].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1975.

Fillmore C. Frame Semantics[A]. In: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ed.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C]. 1982.

Fillmore C. 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J]. *Quadernidi Semantica*, 1985, 6 (2).

Fillmore C, Atkins B. Toward a Frame-based lexicon: The Semantics of RISK and its Neighbors [A]. In: Lehrer A, Kittay E eds. *Frames, Fields, and Contrasts*[C]. Hillsdale/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 1992.

Fitch B T. *Beckett and Babel: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tatus of the Bilingual Work* [M]. Toronto/Buffalo/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Fodor I. *Film Dubbing: Phonetic, Semiotic, Esthetic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M]. Hamburg: Helmut Buske, 1976.

Fodor J. *The Modularity of Mind*[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Fowler R, Hodge B, Kress G et al. *Language and Control*[M]. London: Routledge, 1979.

Friedberg M.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Russia: A Cultural History*[M].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Frow J.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A]. *New Left Review*[C]. 1996.

Gabbard R. *Ecolinguistics: the Future of Linguistics* [A]. http://www.ecoling.net, 2000.

Gambier Y ed. *Les transferts linguistiques dans les médias audiovisuals*[C]. Villeneuve d'Ascq: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1996.

Gentile A, Ozolins U, Vasilakakos M eds. *Liaison Interpreting: A Handbook*[Z].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6.

Gentzler 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hallenge from within[J]. *Textus: English Studies in Italy* Ⅻ, 1999.

Gentzler E. Translation Theory: Expanding Horizons or Limiting Growth? [J]. *Target*. 2001, 13(11).

Gentzler E. Transl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wer[A]. In: Tymoczko M, Gentzler E eds. *Translation and Power*[C].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2002.

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2nd ed.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3;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Gentzler E. Translation Theory: Monolingual,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A].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w Horizons in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C]. Hong Kong, Chin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6.

Gerver D, Sinaiko H W eds.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C]. New York/London: Plenum Press, 1978.

Gibbs R W, Colston H L. The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Image Schema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5, (6)4.

Gile D. Prise de notes et attention en dé but d'apprentissage de l'interprétation concécutive-une expérience-démonstration de sensibilisation[J]. *Meta*, 1991, XXXVI(2/3).

Gile D.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M]. Philadelphi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90/1995a.

Gile D. *Regarts sur la recherche en interprétation de conference*[M].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1995b.

Gillies A. *Note Taking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 A Short Course*[M]. Manchester, UK & Northampton, MA: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5.

Goffin R. Pour une formation universitaire "sui generis" du traducteur: Réflexions sur certain aspects méthodologiques et sur la recherché scientifique dans le domaine de la traduction[A]. *Meta*, 1971(16).

Gorlée D 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he Semiotics of Games and Decisions[A]. In: Wollin L, Lindquist H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in Scandinavia: Proceedings from The Scandinavian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Theory (SSOTT)// Lund 14～15 June, 1985*, Lund: CWK Gleerup, 1986.

Gorlée D L.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M]. Amsterdam: Rodopi, 1994.

Gorlée D L. *On Translating Signs: Exploring Text and Semio-translation*[M]. Amsterdam/Atlander: Rodopi, 2004.

Gouadec D L. *Le traducteur: la traduction et l'entreprise*[M]. Paris: AFNOR gestion, 1989.

Gouanvic J-M. Towards of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 Franc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5～1960) [A]. In: Snell-Hornby M, Jettmarová Z, Kaindl K eds.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ST Congress*[C]. Prague, 1995.

Gow F. *Metrics for Evaluating Translation Theory Memory Software*[D].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2003.

Grady J, Soulson S. Blending and Metaphor[A]. In: Gibbs R, Steen G eds.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9.

Graham J F e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Gran L, Taylor C eds. *Aspects of Applied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C]. Udine: Campanotto Editore, 1990.

Grayson J. *Nabokov Translated: A Comparison of Nabokov's Russian and English Pros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Greenberg J H. *Language Universals*[M]. The Hague: Mouton, 1966.

Grice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In Cole P, Morgan J L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Grice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In: Kasher A. *Pragmatics Critical Concepts*[C]. London: Routledge, 1998.

Gutt, E-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1.

Gutt, E-A. Translation as Interlingual Interpretive Use [A]. In: Venuti L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Gutt, E-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nt*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000;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Güttinger F. *Zielsprache. Theorie and Technik des Übersetzens*[M]. Zürich: Manesse Verlag, 1963.

Haiman J. *Iconicity in Syntax, TSL 6*[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inc., 1985.

Hall E T. *The Silent Language*[M]. New York: Doubleday, 1959/1990.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2nd e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1994.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dward Anord, 1978/2001.

Halliday M A K, Hasan R.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M].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Halliday M A K, Hasan R.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Halliday M A K. Hasan R. *Language, Context,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Language Education Seri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Halliday M A K,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1976;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Halliday M A K, Matthiessen C M.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M]. London: Cassell, 1999.

Halverson S.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Representative Corpora: Establishing Links between Translation Corpora, Theoretical Descriptive Categories and a Conception of the Object of Study[J]. *Meta*, 1998(4).

Halverson S. Conceptual Work and the "Translation" Concept[J]. *Target*, 1999(1).

Halverson S. Prototype Effects in the "Translation" Category [A]. In: Chesterman A et al eds. *Translation in Context*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Harris B. *Papers in Translatology*[M]. Ottawa University, 1977.

Harris B. Bi-text, New Concept in Translation Theory[J]. *Language Monthly*, 1988. 54(3).

Harrison B.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London: Macmillan, 1979.

Hartmann R R K. *Contrastive Textology*[M]. Heidelberg: Julius Croos, 1980.

Harvey R G. (1979) Cross-cultural Awareness[A]. In: Hu W Z ed. *Selective Reading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C]. Hu Nan: Hu Nan Education Press, 1990.

Hatim B.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M]. Exeter, UK: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7;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Hatim B. Text Politeness: A Semiotic Regime for a More Interactive Pragmatics[A]. In: Hickey L ed.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C]. Clevedon/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8;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Hatim B.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Hatim B, Mason I.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7.

Hatim B, Mason I. Politeness in Screen Translating [A]. In: Venuti L 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Hatim B, Mason I.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 London/New York: Longman, 1990;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Hatim B, Munday J. *Translation —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4/2006.

Heilbron J.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Book Translation as a Cultural World-system[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999(2).

Heine B, Claudi U, Hünnemeyer F.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Hermans T.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 Beckenham: Croom Helm, 1985.

Hermans T. Toury's Empiricism Version One: Review of Gideon Toury's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J]. *The Translator*, 1995, 1(2).

Hermans T. Norm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nslation[A]. In: Alvarez R, Vidal C A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Hermans T.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9;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Hervey S, Higgins I. *Thinking Translation: A Course in Translation Method: French to English*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2.

Hickey L.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 [M]. Clevedon/Philadelphia/Toronto/Sydney/Johannesburg: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88;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Hockett C F. Translation via Immediate Constituen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1954, 20(4).

Hodge R, Kress G. *Social Semiotics*[M].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Holmes J S, Lambert J, van den Broeck R eds.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New Perspectives in Literary Studies with a Basic Bibliography of*

Books on Translation Studies[A]. Leuven: Acco, 1978.

Holmes J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A]. In: Venuti L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2/2000.

Holmes J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A]. 仲伟合编, 西方翻译理论[C]. 广州: 广州外语音像出版社, 2001.

Holmes J 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M]. Amsterdam: Rodopi, 1988;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Holz-Mänttäri J. *Translatorisches Handeln: Theorie und Methode*[M].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1984.

Hopper P J.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 In: Traugott E, Heine B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1, Vol. 1.

Hopper P J, Traugott E. *Grammaticalization*[M]. Cambridge: CUP, 1993.

Horn L. Toward a New Taxonomy for Pragmatic Inference: Q-based and R-based Implicature[A]. Kasher A ed. *Pragmatics: Critical Concepts*[C]. London: Routledge, 1998.

House J. *A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M].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1977.

House J. Acquiring Translational Competence in Interaction [A]. In: House J, Blum-Kulka S eds.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C].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

House J.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 Model Revisited*[M].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7.

House J. Text and Context in Translation[J]. *Pragmatics*. 38(3), 2006.

House J, Blum-Kulka S eds.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1986.

Hu G S.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3, 11(4).

Hu G S. Understanding Eco-translatology[R].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ng Global Culture, 2006.

Hutchins J. 机器翻译系统及翻译工具的开发和使用[J]. 中文信息学报, 1999(6).

Hutchins W J, Somers H L. *An Introduction to Machine Translation*[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92.

Hymes D.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A]. In: Pride J, Holmes J eds. *Sociolinguistics*[C]. Penguin, 1972.

Inghilleri M. 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J]. Special Issue of *The Translator*, 2005, 11(2).

Ivarsson J. *Subtitling for the Media: A Handbook of an Art*[Z]. Stockholm: Transedit, 1992.

Ivir V. Contrasting via Translation: Format Correspondence vs. Translation Equivalence[J]. *The Yugoslav Serbo-Croatian-English Contrastive Project Studies*, 1969(1).

Ivir V. Formal Correspondence vs.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Revisited[J]. *Poetics Today*, 1981, 2(4).

Ivir V. Lexical Gaps: A Contrastive view[J]. *Studia Romanica et Anglica Zagrabiensia*, 1977, (43).

Jakobsen A L. Logging Target Text Production with Translog[A]. In: Hansen G ed. *Probing th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24*[C].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999.

Jakobsen A L. Effects of Think-aloud on Translation Speed, Revision and Segmentation[A]. In: Alves F ed.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C].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Jakobson R.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 In: Brower R A. ed. *On Translation*[C]. New York: OUP, 1959.

Jiang X H.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ry Translation—with Emphasis on Motivations Underlying Literary Languag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3.

Johansson S, Dines J. *Literary Discourse: A Semiotic-pragma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

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Jones R.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Explained*[M]. Manchester, UK/Northampton, MA: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Joos M. *The Five Clock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7.

Kade O. *Zufall und Gesetzmässigkeit in der Übersetzung*[M]. Leipzig: VEB Enzyklopädie, 1968.

Kamuf P ed. *A Derrida Reader: between the Blinds* [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Katan D.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Keilson-Lauritz M, Holmes J S, Aldrich R, Wotherspoon G. *Who's Who in Contemporary Gay and Lesbian History: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 Day* [C]. London: Routledge, 2001.

Kelly L G. *The True Interpreter: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9.

Kenny D. *Lexis and Creativity in Translation: A Corpus-based Study* [M].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1.

Klaudy K. Back-translation as a Tool for Detecting Explicitation Strategies in Translation [A]. In: Klaudy K, Lambert J, Sohár A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in Hungary* [C]. Budapest: Scholastica, 1996.

Klaudy K, Károly K. Implicitation in Transl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erational Asymmetry in Translation [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5, 6(1).

Koller W. *Einführung in die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M]. 4th ed. Heidelberg/Wiesbaden: Quelle & Meyer, 1979/1992

Koskinen K. Institutional Illusions: Translating in the UN Commission[J]. *The Translator*, 2000(1).

Krings H P. *Was in den Köpfen von Übersetzern vorgeht. Eine empirische Untersuchung zur Struktur des Übersetzungsprozesses an fortgeschrittenen Französischlernern*[M].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1986.

Kroeber A L, Kluckhohn C. Cultures: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A]. *Peabody Museum Papers*[C]. Vol. 47, No. 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52.

Kupsch-Losereit S.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Error Evaluation[A]. In: Christopher T, Hieke A E eds. *Transl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C]. 1988.

Kurylowicz J. *The Evolution of Grammatical Categories — Esquisses Linguistiques II* [M]. Munich: Wilhelm Fink Verlag, 1965/1975.

Lado R.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Lakoff G.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Lamb S. *Pathways of the Brain: The Neurocognitive Basis of Languag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8.

Lambert S, Daro V, Fabbro F. Focalized Attention on Input vs. Output during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Possibly a Waste of Effort[J]. *Meta*, 1995, XL(1).

Lambert S, Moser-Mercer B. *Bridging the Gap: Empirical Research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Langacker R W. An Overview of Cognitive Grammar [A]. In: Rudzka-Ostyn B ed.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Stanford: Stanford UP, 1987/1991.

Larson M L. *Meaning-based Translation: A Guide to Cross-language Equivalence*[M].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Latour B.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Laviosa-Braithwaite S. *The English Comparable Corpus (ECC): A Resource and a Methodology for the Empirical Study of Translation*[D]. Manchester: UMIST, 1977.

Laviosa-Braithwaite S. Core Patterns of Lexical Use in a Comparable Corpus of English Narrative Prose [J]. *Meta*, 1998, 43(2).

Laviosa-Braithwaite S.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y, Findings and Applications* [M]. Amsterdam: Rodopi, 2002.

Lederer M. *La Traduction Aujourd'hui*[M]. Paris: Hachette, 1994.

Lederer M. *La Théorie Interprétative de la Traduction* [M]. Paris: Lettres Modernes Minard, 2005.

Leech G. *Semantic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Lefevere A. *Translating Poetry: Seven Strategies and a Blueprint*[M]. Assen: Van Gorcum, 1975.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Routledge, 1992a;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a.

Lefevere A ed.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C]. London: Routledge, 1992b;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b.

Leighton L G. *Two Worlds, One Art: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Russia and America*[M].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1.

Levinson S. *Pragmatics*[M]. Cambridge: OUP, 1983.

Levý J. 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A]. In: *To Honor Roman Jakobson*. Vol. 2[C]. The Hague: Mouton, 1967.

Levý J. *Die literarische Übersetzung: Theorie einer Kunstgattung*[M]. Frankfurt am Main: Athenäum, 1969.

Lewis P. The Meas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A]. In: Grahum J F e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C].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Li D. Trust Worthiness of Think-aloud Protocols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04(14).

Li J, Tan Zaixi. *Conversational English 365*. Taiwan: The Bookman Publishing House, 2000.

Luce R D, Raiffa H. *Games and Decisions in Conflict Resolution*[M]. New York: Wiley, 1957.

Malinowski B.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A]. In: Ogdan C K, Richards I A e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C]. London: Routledge, 1923.

Malinowski B.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M]. Vol. 2. London: Routledge, 1935.

Mandler J M. How to Build a Bab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 Accessible Representational System[J]. *Cognitive Development*, 1988(3).

Mandler J M. How to Build a Baby Ⅱ: Conceptual Primitives[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2(4).

Matsui T. *Bridging and Relevanc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Medin D L. Concepts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12).

Mehrablan A. *Nonverbal Communication*[M]. Chicago, IL: Aldine' Atherton, 1972.

Meillet A. L'évolution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J]. *Scientia*(Milan), 1912, 12/26.

Mikkelson H. *Introduction to Court Interpreting*[M]. Manchester, UK/Northampton, MA: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0.

Miko F. La théorie de l' expression et la traduction[A]. In: Holmes J S, de Haan F, Popovič A eds.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Essay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C]. The Hague: Mouton, 1970.

Minsky M. 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Knowledge[A]. In: Winston P H ed. *The Psychology of Computer Vision*[C].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5.

Morris R. The Moral Dilemmas of Court Interpreting[J]. The Translator. 1995, 1(1).

Mounin G. *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M]. Paris: Gallimard, 1963.

Mühlhaüsler P. *Language of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of Language: A Course in Ecolinguistics*[M], London/New York: Paul & Co Pub Consortium, 2003.

Munday J. *Systems in Translation: A Computer-Assisted Systemic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of Garcia Marquez*[D].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radford, UK, 1997.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1.

Murdoch J. Inhuman/Nonhuman/Huma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the Prospects for a Nondualistic and Symmetrical Perspective on Nature and Societ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1997(15).

Nabokov V. *Laughter in the Dark*[M]. Nabokov V. trans. and rev. 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38.

Nabokov V. Forward[A]. In: Pushkin A S. *Eugene Onegin*[C]. Nobokov V. trans. and e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vii~xii. 1964/1975.

Nabokov V.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Onegin in English[A]. In: Schulte R, Biguenet J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C].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Nadel I B.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Neubert A. *Text and Translation*[M]. Leipzig: VEB Verlag Enzyklopädie, 1985.

Neubert A. Competence in Translation: A Complex Skill, How to Study and How to Teach It[A]. In: Snell-Hornby M et al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 An Interdiscipline*[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Neubert A, Shreve G M. *Translation as Text*[M].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Neufeldt V. *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Z].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5.

Newman A. *Mapping Translation Equivalence*[M]. Leuven: Acco, 1980.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Lond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Ltd., 1981/1988.

Newmark P. *About Translation*[M]. Clevedon and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1.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London/Toronto/Sydney/Tokyo: Prentice-Hall, 1988;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Newton J ed. *Computers in Translation: A Practical Appraisal*[M]. London: Routledge. 1992.

Nida E A. Translating Means Communicating: A Socio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A]. In: Saville-Troike M ed.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C]. Georgetown University Round Table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977.

Nida E A. *Translating Meaning*[M]. San Dimas: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1982.

Nida E A. *Signs, Sense, Translation*[M]. Cape Town: Bible Society of South Africa, 1984.

Nida, E 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M]. Leiden: E. J. Brill, 1964;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Nida E A. Louw J, Snyman A et al. *Style and Discour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ext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M]. Cape Town: Bible Society, 1983.

Nida E A, Reyburn W. *Meaning across Cultures* [M].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81.

Nida E A, Taber C 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E. J. Brill. 1969/1982.

Niranjana T.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Nord C. Skopos, Loyalty, and Translational Conventions[J]. *Target*, 1991, Ⅲ(1).

Nord C. Revisiting the Classics — Text Type and Translation Method. An Objec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Criticism — Review of Katharina Reiss's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Übersetzungskritik*[J]. *The Translator*, 1996, 2(1).

Nord C. A Functional Typology of Translation[A]. In: Trosborg A ed. *Text Typology and Translation*[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Nord C. *Tes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M]. Amsterdam and Atlanta, GA: Rodopi, 199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Nord C. The Role of Auxiliary Texts in Translator Training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007(1).

Oakley T. Image Schema[A]. In: Geeraerts D, Cuyckens H eds. *To Appear in Th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Oettinger A G. *Automatic Language Translation: Lexical and Technical Aspect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Russian*[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Harvard Monographs in Applied Science 8.], 1960.

Olohan M. *Introducing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eirce C S. *The Philosophy of Peirce*[M]. NY: Harcourt, Brace, 1940.

Pergnier M. *Les fondements sociolinguistiques de la traduction*[M]. Paris: Librairie Honoré Champion, 1980.

Petrilli S. Semiotics[A]. In: Cobley P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Z].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etrilli S. Introduction[A]. In: Petrilli S ed. *Translation and Semiosis*[C]. Amsterdam/New York: Rodopi, 2003.

Phillipson R. Book Review[J]. *Language Policy*, 2006(5).

Picken C ed. *The Translator's Handbook*[Z]. London: Aslib, 1983.

Plato. The Republic[A]. In: Adams H ed. *Critique Theory Since Plato*[C]. Revised ed. Thomson Learning, Inc. , 1992.

Pöchhacker F. *Simultandolmetschen als komplexes Handeln*[M].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1994.

Popovič A. *Dictionary for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Z]. Edmonton: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1976.

Postgate J P.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M]. New York: G. Bell & Sons, Ltd. , 1922.

Pound E. *Make It New*[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4.

Pound E. *Guide to Kulchur* [M]. New ed. London: Pete Owen, 1952.

Pound E. *Impact: Essays on Ignorance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C]. Stock N ed. Chicago: Henry Rognery Co. , 1960.

Pound E. *ABC of Reading*[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4.

Pound E.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C]. Eliot T S ed.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68.

Pound E. *Confucius: The Great Digest, The Unwobbling Pivot, The Analects*[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9

Prince G.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Z].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7.

Pym A. *Translation and Text Transfe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2.

Pym A.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in Translation and its Teaching: A Seminar for Thinking Students*[M]. Teruel, Spain: Edicions Caminade, 1993.

Pym A. Translation as a Translation Cost[J]. *Meta*, 1995, 40(4).

Pym A. Venuti's Visibility (Review of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J]. *Target* 1996, 8(1).

Pym A.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 Manchester, UK: St Jerome Publishing Ltd. , 1998;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Pym, A.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0.

Quine W V. *Words and Object*[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0.

Quine W V. Meaning and Translation[A]. In: Reuben A B ed. *On Translation*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1966.

Quirk R, Greenbaum S, Leech G et al.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M].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72.

Reiss K. *Translation Criticism —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M]. Rhodes E F tran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71.

Reiss K.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Übersetzungskritik. Kategorien und Kriterien für eine sachgerechte Beurteilung von Übersetzungen*, München: Max Hueber Verlag, 1971.

Reiss K. *Texttyp und Übersetzungsmethode. Der operative Text*[M]. Kronberg: Scriptor, 1976.

Reiss K. 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A]. Chesterman A trans. In: Chesterman A ed.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C]. Finland: Oy Finn Lectura Ab, 1989a.

Reiss K. Adequacy and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 (Elaborated German Version as "Adäquatheit und aquivalenz")[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89b(3).

Reiss K. Type, Kind and Individuality of Text: Decision-making in Translation[A]. In: Venuti L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81/2000.

Reiss K.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M]. Erroll F R tran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0;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Reiss K, Vermeer H J. *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 [M]. Tübingen: Niemeyer, 1984.

Richards L A. Towards a Theory of Translating [A], In: Wright A F ed.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Robinson D. *The Translator's Turn*[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1991.

Robinson D. *Translation and Taboo* [M].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

Rosch E.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of Semantic Categorie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75(104).

Rosch E.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A]. In: Rosch E, Lloyd B eds.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C]. Hillsdale, NJ/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1978.

Rosch E. Coherence and Categorization: A Historical View[A]. In: Kessel F S e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Researchers: Essays in Honor of Roger Brown*[C]. Hillsdale, NJ/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1988.

Rosch E, Mervis C B. Family Resemblances: Studies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J].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5(7).

Rose M G. Translation Types and Conventions[A]. In: Rose M G ed. *Translation Spectrum: Essays in Theory and Practice*[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1.

Saeed. *Semantics*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1997.

Sager J C. *A Practical Course in Terminology Processing*[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Sager J C. *Language Engineering and Translation: Consequences of Automation*[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Said E. *Orientalism*[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Bally C, Sechehaye A eds. Baskin W trans. NY: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In: Bally C, Sechehaye A eds.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Albert Riedlinger,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Roy Harris. London: Duckworth, 1983.

Savory T H. *The Art of Translation*[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7/1968.

Schäffner C. Skopos Theory[A]. In: Baker M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Z]. London: Routledge, 1998.

Schäffner C, Adab B. The Idea of the Hybrid Text in Translation: Contact as Conflict[J]. *Across Language and Cultures*, 2001, 2(2).

Schank R C, Abelson R P.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M].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1977.

Schiffrin D. *Approaches to Discourse*[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4.

Schleiermacher F. Ü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n des Übersetzungs [A]. In: Störig H J ed. *Das Problem des Übersetungs* [C].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sche Buchgesellschaft, 1963: 38~70. Lefevere A trans.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J]. *Translating Literature*, 1977: 67~89.

Schmied J, Schäffler H. Explicitness as a Universal Feature of Translation [A]. In: Ljung M ed. *Corpus-based Studies in English: Papers from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Language Research on Computerized Corpora (ICAME 17)* [C]. Amsterdam/Atlanta: Rodopi, 1997.

Schulte R, Biguenet J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Sebeok T A.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 [Z].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4.

Seleskovitch D. *L'interprète dans les conferences internationals*[M]. Paris: Minard lettres Modernes, 1968.

Seleskovitch D. *Interpreting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Problems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M]. Dailey S, McMillan E N. trans. Washington, D. C.: Pen & Booth, 1978.

Seleskovitch D, Lederer M. *Interpréter pour traduire*[M]. Paris: Didier Erudition, 1984.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 [J]. *IRAL*, 1972(10).

Shackman J. *The Right to be Understood: A Handbook on Working with, Employing and Training Community Interpreters* [M]. Cambridge: National Extension College, 1984.

Shaffer E S ed. *Comparative Criticis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4.

Shama'a N.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Some Problems of Arabic to English Translation*[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1978.

Shaw R D. *Transculturation: The Cultural Factor in Translation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Tasks* [M]. Pasadena, Californi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88.

Shaw R D. The Translation Context: Cultural Factors in Translation[J]. *Translation Review*, 1990, Vol. 23.

Shlesinger M.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to Interpretation: Norms as a Case in Point[J]. *Target*, 1989, 1(1).

Shlesinger, M. Interpreter Latitude vs. Due Process: Simultaneous and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in Multilingual Trials[A]. In: Tirkkonen-Condit S ed.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the TRANS-SIF Seminar, Savonlinna 1988*[C].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1.

Shuttleworth M, 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Z].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Simon S. *Le trafic des langues*[M]. Montréal: Boréal, 1994.

Simon S. *Culture in Transit: Translating the Literature of Quebec*[M]. Montréal: Vehicule, 1995.

Simon S.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6.

Simon S. *Hybridité Culturelle*[M]. Montréal: L'île de la tortue éditeur, 1999.

Simon S. *Translating Montreal: Episodes in the Life of a Divided City*[M].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Simon S, St. Pierre P. eds. *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M].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0.

Snell-Hornby M. Translation as a Cross-cultural Event: Midnight's Children — Mitternachtskinder[A]. In: Toury G ed. *Translation across Cultures*[C]. Bahri Publications, 1987.

Snell-Hornby M. Translation Studies — Art, Science or Utopia? [A]. In: Kitty M, van Leuven-Zwart, Naaijkens T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State of Art*. Amsterdam and Atlanta GA: Rodopi 1991.

Snell-Hornby M, Pöchhacker F, Kaindl K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e*[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4.

Snell-Hornby M, Jettmarova Z, Kaindl K eds.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6.

Snell-Hornby M.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8/1995;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Snell-Hornby M. *Foreword*. In: Reiss K.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M]. Erroll F R tran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0;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1995.

Sperber D, Wilson D. Discourse, Coherence and Relevance: A Reply to Rachel Giora[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8

Spivak G C. *Translator's Preface*[A]. In: Derrida J ed.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Steiner T R. *English Translation Theory 1650～1800*[M]. Assen: van Gorcum, 1975.

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Stetting K. Transediting — A New Term for Coping with the Grey Area between Editing and Translating[A]. In: Cair G et al. *Proceeding from the Fourth Nordic Conference for English Studies*[C].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partment of English, 1989.

Tan Z X. *English Course* [M]. Changsha: Hun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Tan Z X. Metaphors on Translation[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6, 14(1).

Tan Z X. *The Translator's Identity: As Seen through Metaphors*[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 Identity and Heterogeneity". Lima, Peru. 7～9 Dec. 2007.

Tan Z X. Towards a Whole-person Translator Education Approach in Translating Teaching on University Degree Programmes[J]. *Meta*, 2008, 53(2).

Tan Z X, Shao L. Translation and the Relativity of Cultural Identities[J]. *Neohelicon: 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 2007, 34(1).

Tarasti E. *Existential Semiotic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Taylor J R.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1995.

Taylor J R. *Cognitive Gramma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ompson G.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6.

Thompson J B.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Bourdieu's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A]. London/New York: Polity Press, 1991.

Tirkkonen-Condit S. Translationese — A Myth or an Empirical Fact? A Study into the Linguistic Identifiability of Translated Language [J]. *Target*, 2002, 14(2).

Tommola J ed. *Topics in Interpreting Research*[C]. Turku: University of Turku, 1995.

Tötösy de Zepetnek S.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Method, Application [M]. Amsterdam: Rodopi, 1998.

Toury G.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orm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A]. In: Holmes J S, Lambert J, van den Broeck R, et al.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New Perspectives in Literary Studies*. Leuven: Acco, 1978.

Toury G.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M]. Tel Aviv: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Tel Aviv U, 1980.

Toury G. Transla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Pseudotranslation[A]. In: Shaffer E S ed. *Comparative Criticism: A Yearbook 6* [Z]. 1984.

Toury G. A Rationale for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 In: Hermans T 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London: Croom Helm, 1985.

Toury G ed. *Translation Across Cultures*[C]. New Delhi: Bahri, 1987.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Toury G. Probabilistic Explana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Universals — or a Challenge to the Very Concept? [A]. In: Hansen G, Malmkjær K, Gile D eds. *Claims, Changes and Challeng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elected Contributions for the EST Congress, Copenhagen, 2001*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a.

Toury G. Probabilistic Explana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elcome as They Are, Would They Qualify as Universals? [A]. In: Mauranen A, Kujamäki P eds. *Translation Universals: Do They Exist?*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4b.

Trubetzkoy N S. *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M]. Prague: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1939.

Trubetzkoy N S. *Principles of Phonolog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Tübingen: Narr, 1985.

Tymoczko M. *The Irish Ulysse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Tymoczko M. Computerized Corpora and 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J]. *Meta*, 1998(4).

Tymoczko M. Postcolonial Writing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A]. In: Bassnett S, Trivedi H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Tymoczko M. *Connecting the Two Infinite Orders: Research Metho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R]. Unpublished Paper Read at the Conference on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chester, UK. April 2000.

Tymoczko M. Transl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ctivism, Social Change and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Geopolitical Shifts[J]. *The Translator*, 2000, 6 (1).

Tymoczko M.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M].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9;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Tymoczko M. *Enlarging Translation, Empowering Translators*[M].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6.

Tymoczko M, Blackmun N eds. *Born into a World at War*[C].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0.

Tymoczko M, Gentzler E eds. *Translation and Power*[M]. Amherst and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Tymoczko M, Ireland C eds. *Language and Tradition in Ireland: Continuities and Displacements*[C].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

Tytler A F.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791/1978;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Ullmann 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M]. London: OUP, 1962.

Ungerer F, 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M]. London: Longman, 1996;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Ure J, Rodger A, Ellis J. Somn: Sleep — An Exercise in the Use of Descriptive Linguistic Techniqu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J]. *Babel*, 1969, 15(1), 15(2).

van den Broeck R. Introduction [A]. Holmes J S ed. *Translated!* [C]. Amsterdam: Rodopi, 1988.

van den Broeck R, Lefevere A. *Uitnotiging tot de vertaalwetenscha*[*Invita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M]. Muiderberg: Coutinho, 1979.

Vanderauwera R. *Dutch Novel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M]. Amsterdam: Rodopi, 1985.

van Dijk T A, Kintsch W. *Strategies of Discourse Comprehension*[M]. Orlando/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3.

van Leuven-Zwart K M. Translation and Original: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Ⅰ[J]. *Target*, 1989, 1(2).

van Leuven-Zwart K M. Translation and Original: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Ⅱ[J]. *Target*, 1990, 2(1).

van Leuven-Zwart K M. An Introduction [A]. In: van Leuven-Zwart K M, Naaijkens T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Art: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James S Holmes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Studies* [C]. Amsterdam: Rodopi, 1991.

van Leuven-Zwart K M, Naaijkens T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Art: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James S. Holms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Studies*[C]. Amsterdam: Rodopi, 1991.

Vázquez-Ayora G. *Introducción a la Traductología* [M].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77.

Venuti L. Translation, Heterogeneity, Linguistics [J].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edaction*, 1997 (1).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5/2008.

Venuti L. The American Tradition[A]. In: Baker M ed.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8a.

Venuti L.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8b.

Venuti L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Venuti L. "Introduction" to Derrida's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J]. *Critical Inquiry*, 2001, 27(2).

Vermeer H J. Ein Rahmen für eine allgemeine Translationstheorie[J]. *Lebende Sprachen*, 1978, 23(3).

Vermeer H J. *Aufsätze zur Translationstheorie* [M]. Heidelberg: Groos, 1983a.

Vermeer H J. Translation Theory and Linguistics [A]. In: Roinila P, Orfanos R, Tirkkonen-Condit S eds. *Näkökohtia käänämisen tutkimuksesta*[C]. University, Joensuu, 1983b.

Vermeer H J. Übersetzen als kultureller Transfer[A]. In: Snell-Hornby M ed.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 eine Neuorientierung: Zur Integrierung von Theorie und Praxis*[C]. Tübingen: Franke Verlag, 1986.

Vermeer H J. What Does It Mean to Translate? [J]. *Ind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87: 13(2).

Vermeer H J.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A]. In: Chesterman A ed.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C]. Finland: Oy Finn Lectura Ab, 1989a.

Vermeer H J. *Skopos und Translationsauftrag — Aufsätz*[M]. Heidelberg: Heidelberg Universität, 1989b.

Vermeer H J. Translation and the "Meme"[J]. *Target*, 1997, 9(1).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1999;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Vieira E R P. Liberating Calibans: Readings of Antropofagia and Haroldo de Campos' Poetics of Translation [A]. In: Bassnett S, Trivedi H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 London/NewYork: Routledge, 1999.

Vinay J P, Darbelnet J. *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M].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uan, C S, Hamel M J. 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 Méthode de tranduction[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58/1995.

Wadensjö C. *Interpreting as Interaction — On Dialogue Interpreting in Immigration Hearings and Medical Encounters*[M]. Linköp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1992.

Whitman-Linsen C. *Through the Dubbing Glass: The Synchronization of American Motion Pictures into German, French, and Spanish*[M].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Peter Lang, 1992.

Whorf B L.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M]. Combridge, MA: MIT Press, 1956.

Widdowson H G. *Teaching Language as Communic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William F ed. *Translation: Literary, Linguistic,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C]. London/Toront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90.

Williams J, Chesterman A. *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 Manchester, UK/Northampton, MA: St. Jerome Publish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Wilson D. Discourse, Coherence and Relevance: A Reply to Rachel Giora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8.

Wilson D. Relevance and Communication[J]. *Modern Foreign Language*, 2000(2).

Wilss W.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Probleme und Methoden*[M]. Stuttgart: Klett, 1977.

Wilss W. *Kognition und Übersetzen: Zu Theorie und Praxis der menschlichen und der maschinellen Übersetzung*[M]. Tübingen: Niemeyer, 1988.

Wilss W. A Framework for Decision-making in Translation [J]. *Target*, 1994, 6(2).

Wilss W.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r*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Wilss W.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M]. Tu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1982;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 Anscombe G E M tr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3/1958.

Wolf M. Power to the Agents in Translation: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as a Social Practi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bstract*[C]. 2005. http://www-gewi.uni-graz.at/uedo/events tran-soc/abstracts/

Xie M. *Ezra Pound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Chinese Poetry*[M]. London/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Yule G. *Pragmatics*[M]. Cambridge: CUP, 1996.

Zimmer R. *Probleme der Übersetzung formbetonter Sprache: Ein Beitrag zur Übersetzungskritik* [M]. Tübingen: Niemeyer, 1981.

Zlateva P ed. & trans. *Translation as Social Action: Russian and Bulgarian Perspectives*[M]. London: Routledge, 1993.

Ведущие языковеды мир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Z].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2000.

Верщагин Е М,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Лингв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предапав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ого, 3-еизд[M]. М.: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3.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 Слово о переводе[M].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3.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перевода[M]. Там же, 1980.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M].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0.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методики обучения переводу[M]. М.: Рема, 1997.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 Общая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Проблемы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я в освещении зарубежных ученых) [M]. М.: ЧеРо, 1999a.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M]. М.: ЭТС, 1999b.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 в XX веке: некоторые итоги[J]. Тетради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Вып.

24), М.: 1999с.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 в России[М]. М.: ЭТС, 2002.

Швейцер А Д.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анализ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х явлений при переводе[J]. Тетради переводчика, 1963(1).

Швейцер А Д.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 и адекватность[J]. Тетради переводчика, 1989(23).

GB/T 19363.1－2003 翻译服务规范 第1部分：笔译[B].

GB/T 19363.2－2006 翻译服务规范 第2部分：口译[B].

GB/T 19682－2005 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B].

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安乐哲,罗思文.《论语》的哲学诠说[M].余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

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M].蔡毅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柏乐天.伟大的翻译家玄奘[J].翻译通报,1951(5).

包家仁,梁栋华.翁显良先生翻译观初探[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3(6).

包通法.跨文化翻译中异质文化"本土化"接受视域厘定的哲学思辨[J].上海翻译,2005(4).

包振南.开拓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途径——介绍卡特福德著《翻译的语言学理论》[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2(3).

鲍刚.口译理论概述[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卞建华.对诺德"忠诚原则"的解读[J].中国科技翻译,2006(3).

蔡小红.以跨学科的视野拓展口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1(2).

蔡小红,方凡泉.论口译的质量与效果评估[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3).

蔡新乐.《文学翻译原理》简评[J].现代外语,1995(3).

蔡新乐.文学翻译的释义学原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蔡新乐.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蔡新乐.论翻译学的三个新概念：元翻译、反翻译与非翻译[J].外国语,2002(1).

蔡新乐.翻译的本体论研究——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蔡新乐.翻译与汉语——解构主义视角下的译学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蔡新乐.相关的相关：德里达的"相关的翻译"思想及其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蔡毅.翻译与语义[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4(4).

蔡毅.国外语言学中的翻译理论问题——西方十二位语言学家谈翻译[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7(4).

蔡毅.谈翻译教学[J].中国俄语教学,1991(4).

蔡毅.我是怎样带翻译硕士研究生的[J].中国俄语教学,1992(4).

蔡毅.翻译理论与社会语言学[J].中国俄语教学,1995(4).

蔡毅,段京华.苏联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1).

长庚.几条"顺"的翻译[J].北斗,1932,1(4).

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陈大亮.重新认识钱锺书的"化境"理论[J].上海翻译,2006(4).

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陈刚.导游翻译中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因素[J].中国翻译,1987(3).

陈刚.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陈国强.现代英语词汇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陈国强.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陈海洋.中国语言学大词典[Z].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陈宏薇.新实用汉译英教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陈宏薇.跨文化交际视野中的翻译研究方法——社会符号学翻译法[A].见：张柏然,许钧.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陈宏薇.苏珊·彼得里利的解释符号学翻译思想研究[J].上海翻译,2007(4).

陈宏薇,李明,浦向东.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陈吉荣.解析胡适的翻译思想[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5).

陈建生,吴曙坦.翻译认知：结构突显与翻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1).

陈建生,杨玉娟.词义的范畴化与非范畴化[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陈洁.《翻译理论(语言学方面)》评介[J].中国俄语教学,1999(4).

陈洁.俄语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管窥[J].中国俄语教学,2000(4).

陈洁,赵丽君,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谈西方现代翻译理论[J].中国俄语教学,2001(4).

陈菁.从 Bachman 交际法语言测试理论模式看口译

测试中的重要因素[J]. 中国翻译,2002(1).
陈倩,陈洁. 科米萨罗夫的翻译标准[J]. 上海科技翻译,1999(4).
陈巧玲. 脚本理论视野中的口译行为[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6).
陈尚文. 关于演绎推理定义的质疑[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陈淑芬. 梁实秋的莎剧翻译与莎学研究[A]. 见：李瑞腾,蔡宗阳. 雅舍的春华秋实——梁实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
陈婷,韩蕾. 诗歌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处理[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陈慰. 英汉语言学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陈西滢. 论翻译[A]. 见：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陈翔. 交传技能训练的五大模块[J]. 上海翻译,2005(2).
陈小慰. 语言·功能·翻译——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陈焰. 灵活自然,贴切畅达——读汪、任《诗经》新译本[A]. 见：汪榕培. 比较与翻译[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陈原. 社会语言学[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陈治安,文旭. 认知语言学入门导读[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陈忠明,黄华新. 符号学导论[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成仿吾. 论译诗[A]. 见：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成军. 范畴化及其认知模型[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1).
成善祯. 框架语用信息与语义等效[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程琪龙. 谓元语义结构概念框架[J]. 外国语,2005(5).
程琪龙. 概念框架和认知[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程琪龙. 语义框架和认知操作[J]. 外语教学,2007(1).
程永生. 描写交际翻译学[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程章灿. 翻译时代与精神——读许钧《翻译论》[N]. 文汇读书周报,2004-6-18.
程镇球. 论汉译英的几个问题[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
程镇球. 汉英翻译问题[J]. 中国翻译,1991(3).
程镇球.《毛选》英译回忆片断[J]. 中国翻译,1993(6).
崔启亮. 传统翻译公司转型本地化服务的策略与选择. [2006-05-25]. http://www.tac-online.org.cn/ch/tran/2009-10/21/content-3197781.htm
大辞海编辑委员会. 大辞海·哲学卷[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戴炜华,高军. 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评述和实例分析[J]. 外国语,2002(6).
单其昌. 汉英翻译技巧[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
德里达. 论文字学[M]. 汪堂家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德利尔. 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法[M]. 孙慧双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邓红风,王莉莉. 翻译的窘境还是文化的窘境[J]. 中国翻译,2003(4).
迪里索,利加恩克,科米尔编. 翻译研究关键词(汉英对照)[Z]. 孙艺风,仲伟合编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董秋斯. 论翻译理论的建设[A]. 见：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董宗杰. 发展翻译学,建立专业队伍[J]. 翻译通讯,1984(8).
杜承南,文军. 中国当代翻译百论[C].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
段连城. 对外宣传英译的"常见病"及解释性翻译[J]. 中国翻译,1990(5).
《翻译通讯》编辑部.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a.
《翻译通讯》编辑部. 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b.
樊军,郑志军. 翻译中的博弈：归化与异化[J]. 宜宾学院学报,2007(10).
范俊军. 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范祥涛. 描写译学中的描写对象和描写方式[J]. 外国语,2004(4).
方华文. 20世纪中国翻译史[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
方梦之. 科技英语实用文体[M]. 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9.
方梦之. 翻译中的阐释与注释[J]. 山东外语教学,1993(1).
方梦之. 英语汉译实践与技巧[M]. 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4.
方梦之. 译论研究的综合性原则[J]. 中国翻译,1996(4).
方梦之. 阎德胜与逻辑翻译理论[J]. 上海科技翻译,1998(1).
方梦之. 翻译新论与实践[M].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方梦之. 20世纪下半叶我国翻译研究的量化分析[J]. 外语研究,2003a(3).
方梦之. 我国的应用翻译：定位与学术研究[J]. 中国翻译,2003b(4).
方梦之,毛忠明. 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方梦之. 译学词典[Z].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方梦之. 译学的"一体三环"——从编纂《译学辞典》谈译学体系[J]. 上海翻译，2006(1).
方梦之. 我国早期的翻译学——简评蒋翼振的《翻译学通论》(1927 年版)[J]. 上海翻译，2007a(2).
方梦之. 序[A]. 见：文军. 中国翻译技巧研究百年回眸(1914～2005 中国翻译技巧研究论文索引)[C].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b.
费斯克等.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Z]. 第 2 版.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费小平. 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封一函. 论劳伦斯·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策略[J]. 文艺研究，2006(3).
冯建文. 神似翻译学[M].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冯建中. 论口译测试的规范化[J]. 外语研究，2005(1).
冯契，徐孝通. 外国哲学大辞典.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冯庆华. 英汉互译实用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77.
冯志伟. 现代术语学引论[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凤群. 认知语用学中的翻译观[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付克. 中国外语教育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
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A]. 见：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傅永林. 译学研究范式：转向开拓与创新[J]. 中国翻译，2001(5)
傅仲选. 实用翻译美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高惠群，乌传衮. 翻译家严复传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高健. 浅谈风格的可译性及其他——翻译英美散文的一些体会[J]. 翻译通讯，1985(5).
高亮，林郁如. 英汉/汉英口译教程[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戈玲玲. 预设及翻译技巧[J]. 中国翻译，2002(3).
葛校琴. 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J]. 中国翻译，1999(4).
辜正坤. Metatranslatology(上，下)[J]. 中国翻译，2002(4)～(5).
古今明. 英汉翻译基础[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桂乾元. 为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而努力——从国外翻译学谈起[J]. 中国翻译，1986(30).
桂诗春. 新编心理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桂诗春，宁春岩. 语言方法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桂扬清. 莎翁作品译文探讨[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郭建中. 论西方的翻译对等概念[J]. 中国翻译，1986(5).
郭建中.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 外国语，1998(2).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郭建中. 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郭沫若. 理想翻译之我见[A]. 见：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郭聿楷. 范畴结构和基本范畴词汇[J]. 中国俄语教学，2005(1).
郭著章等. 翻译名家研究[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韩江洪. 切斯特曼翻译规范论介绍[J]. 外语研究，2004(2).
韩江洪. 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韩劢. 认知心理学中概念结构观的演变[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韩庆果. 翻译规范与文本性——整合文本性的翻译规范理论初探[J]. 中国翻译，2006(2).
韩子满. 文学翻译与杂合[J]. 中国翻译，2002(2).
韩子满. 翻译的禁忌与多元化——罗宾逊的《翻译与禁忌》评介[J]. 外语研究，2004(4).
何伟，张娇. 古诗词英译中意合向形合的转换：概念隐喻分析[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3).
何自然. 语用学概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何自然. Grice 语用学说与关联理论[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
何自然. 翻译要译什么？——翻译中的语用学[A]. 外国语，1996(2).
何自然. 语用学探索[M].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何自然，冉永平. 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J]. 现代外语，1998(3).
何自然，冉永平. 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贺爱军. 翻译文化战略观考虑——刘宓庆教授访谈录[J]. 中国翻译，2007(4).
贺麟. 论翻译[J]. 今日评论，1940，4(9).
贺麟. 谈谈翻译[J]. 中国翻译，1991(1).
贺显斌. 英汉翻译过程中的明晰化现象[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4).
贺显斌. 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外国语[J].

2007(3).
贺莺.网络论坛与笔译实践教学研究[J].中国翻译，2007(6).
黑玉琴.从关联理论看口译过程中的最佳意义选择[J].中国翻译，2003(6).
侯国金.语用标记价值假说与语用标记等效翻译假说[J].外语学刊，2005a(2).
侯国金.语用标记理论与应用——翻译评估的新方法[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b.
胡翠娥.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胡庚申.怎样学习当好译员[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3.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a.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上海翻译，2004b(4).
胡庚申.从"关联序链"看译学研究视野的"生态转向"[A].见：胡庚申.第二届海峡两岸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a.
胡庚申.翻译与跨文化交流：转向与拓展[A].见：胡庚申.首届海峡两岸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b.
胡适.佛教的翻译文学[A].见：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A].见：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C].北京：中华书局，1993.
胡显耀.语料库翻译研究与翻译普遍性[J].上海科技翻译，2004(4).
胡琰，苏晓军.L. Talmy 的认知语义观评述——兼与 Langacker 和 Lakoff 理论的比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4).
胡以鲁.论译名[N].庸言报.1914－2－5(26～27).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胡壮麟.语法化研究的若干问题[J].现代外语，2003(1).
黄德先.翻译的网络化存在[J].上海翻译，2006(4).
黄国文.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黄海容.本雅明翻译观述评[J].中国翻译，2007(4).
黄嘉德.翻译论集[C].上海：西风社，1940.
黄龙.翻译艺术教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
黄齐东，郑亚南.交际意图的动态认知过程探析[J].语言学研究，2005(12).
黄倩，蒋靖芝.小说翻译中会话含义的再现——《红楼梦》英译本实证分析[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6).
黄新渠.古诗英译的自由格式[J].翻译通讯，1981(5).
黄振定.翻译学是一门人文科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2).
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黄忠廉.变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慧皎等.高僧传合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霍尔.无声的语言[M].刘建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霍跃红.本色译者——汪榕培[J].中国翻译，2005(5).
季进.钱锺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季羡林.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加乐尔.阿丽思漫游奇境记[M].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贾文波.应用功能翻译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贾文渊，贾令仪.论译感[J].上海翻译，2009(1).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江枫.译诗，应该力求形神皆似[J].外国文学研究，1982.
姜秋霞，权晓辉.文学翻译过程与格式塔意象模式[J].中国翻译，2000(1).
姜治文，文军.翻译批评论[C].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
蒋骁华.符号学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造[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3(5).
蒋小元，周永红.论关联理论框架下翻译中的关联问题[J].怀化学院学报，2006(7).
金隄.等效翻译探索[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a.
金隄.谈准确和通顺的关系[J].翻译通讯，1984b(4).
金隄.灵活用词，准确达意[J].翻译通讯，1985a(2).
金隄.灵活用词，准确达意(续)[J].翻译通讯，1985b(3).
金隄.等效翻译探索[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金圣华.三"者"合一的翻译家——余光中[A].见：林本椿.福建翻译家研究[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金岳霖.知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M].穆雷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
康澄.文本——洛特-加龙省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J].当代外国文学，2005(4).
康培.从翻译伦理透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
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M].黎炜译.浙江教育出

版社,1996.
柯飞. 汉语把字句特点、分布及英译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2).
柯飞. 翻译中的隐和显[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4).
柯平. 文化差异和语义的非对应[J]. 中国翻译,1988(1).
柯平.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拉帕耶. 文化密码[M]. 陈亦楠,李晨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
蓝纯. 认知语言学：背景与现状[J]. 外语研究,2001(3).
勒代雷. 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 刘和平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黎难秋. 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M].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3.
黎照. 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M]. 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
李安兴. 框架语义学、语料库建设与汉英词典新词的译名[A]. 见：2004 年辞书与数字化研讨会论文集[C]. 2004.
李百玲. 从翻译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 上海翻译,2009(1).
李德超. TAPs 翻译过程研究 20 年：回顾与展望[J]. 中国翻译,2005(1).
李德超,邓静. 传统翻译观念的逾越：彻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J]. 外国语,2004(4).
李斐. 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研究及进展[J].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李广荣. 文本隔栅假设在英汉翻译中经验及应用[J]. 上海翻译,2008(3).
李汉林. 论卡德福特的转换理论[R]. 青岛：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1987.
李洁. 原型范畴理论与英语方位词范畴化初探[J].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李龙泉. 为什么西方翻译理论与文本越来越远？——他者思维的延绵线索[J]. 上海翻译,2006(2).
李明. 翻译研究的社会符号学视角[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李明远. 认知心理学与口译课[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8(4).
李奭学. 中译第一首"英"诗——艾儒略《圣梦歌》初探[J]. 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7(30).
李小均. 纳博科夫翻译观的嬗变[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
李晓萍. 试论建构个体网络心理结构[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李宣松. 体裁分析与商务语篇[J]. 外国语,1997(2).
李瑛. 容器图式和容器隐喻[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5).
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李幼蒸. 历史符号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
李越然. 论口译的社会功能——口译理论基础初探[J]. 中国翻译,1999(3).
李云.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容器隐喻[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李运兴. 英汉语篇翻译[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2003.
李运兴. 语篇翻译引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李运兴. 论翻译语境[J]. 中国翻译,2007(2).
李运兴. 再谈翻译语境的性质[J]. 中国翻译,2008(5).
利奇. 语义学[M]. 李瑞华等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梁实秋. 论翻译的一封信[J]. 新月,1933,4/5.
梁实秋. 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例言[A]. 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67.
梁实秋. 梁实秋谈翻译莎士比亚[J]. 柯飞整理. 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1).
梁实秋.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A]. 见：梁实秋文集[C].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梁镛. 术语化和术语翻译[J]. 上海科技翻译,1986(1).
廖七一. 英汉翻译中意象的处理[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5(1).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廖七一.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廖七一. 论胡适诗歌翻译的转型[J]. 中国翻译,2003(5).
廖七一. 学科设置与翻译学的发展[J]. 中国翻译,2004(3).
廖七一. 胡适诗歌翻译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廖七一. 翻译研究学科发展概况[A]. 见：王维波,耿智. 译学辞典与翻译研究[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列宁. 列宁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林本椿. 福建翻译家研究[C].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林波. 交际意图的语用认知新探[J]. 外语教学,2002(3).
林煌天. 中国翻译词典[Z].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2005.
林煌天,贺崇寅. 中国科技翻译家词典[Z]. 上海：上海翻译出版社公司,1991.
林辉. 中国翻译家词典[Z].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林克难. 重新认识卡特福德翻译理论[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
林克难. 翻译研究期待百花齐放[J]. 上海翻译,

2005(1).
林同瑞. 译诗的一点体味[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0(1).
林文月. 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A]. 见：刘靖之. 翻译新论集[C].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1991.
林以亮. 翻译的理论与实践[A]. 见：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林莹. 最佳关联性——译者的追求[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5(2)
刘白玉. 译员应对口译粗话的策略[J]. 中国科技翻译, 2007(2).
刘炳善. 莎剧的两种译本：从一出戏看全集[J]. 中国翻译, 1992(4).
刘禾. 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刘和平. 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刘和平. 科技口译与质量评估[J]. 上海科技翻译, 2002(1).
刘和平. 口译理论与教学[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刘和平. 法国释意理论：质疑与探讨[J]. 中国翻译, 2006(6).
刘华文. 英汉翻译中的认知映射与还原映射[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5).
刘华文, 李红霞. 汉英翻译中再范畴化的认知特征[J]. 外语研究, 2005(4).
刘建刚, 张艳丽. 实用文体伪翻译现象研究[J]. 上海翻译, 2007(2).
刘靖之. 翻译新论集——香港翻译学会二十周年纪念文集[C].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1991.
刘连娣. 职业道德与翻译资格[J]. 上海翻译, 2006(1).
刘宓庆. 文体与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刘宓庆. 翻译美学基本理论构想[J]. 中国翻译, 1986(4).
刘宓庆. 论翻译的技能意识[J]. 中国翻译, 1987(5).
刘宓庆. 论中国的翻译理论模式[J]. 中国翻译, 1989a(1).
刘宓庆. 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模式问题[J]. 现代外语, 1989b(1).
刘宓庆. 现代翻译理论[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0a.
刘宓庆. 翻译的风格论[J]. 外国语, 1990b, (1)(2).
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M].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1995.
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刘宓庆. 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刘宓庆. 口笔译理论研究[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刘宓庆.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a.
刘宓庆. 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b.
刘宓庆. 流派初论——迎接中国译坛流派纷呈的时代[J]. 中国外语, 2006(3).
刘明东. 图式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J]. 外语教学, 2002(6).
刘琴. 称谓语的标记象似性及其语用等效翻译[J]. 宜宾学院学报, 2007(2).
刘庆元. 话语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6).
刘仁胜. 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M].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刘绍龙. 翻译心理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刘绍忠. 关联理论的交际观[J]. 现代外语, 1997(2).
刘绍忠. 认知环境、互相明白与语际语言交际[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8(1).
刘士聪. 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刘天华. 梁实秋读书札记[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刘先刚. 企业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J]. 上海科技翻译, 1992a(2).
刘先刚. 中国呼唤企业翻译学[J]. 石油大学学报, 1992b(2).
刘英凯. 归化——翻译的歧路[J]. 现代外语, 1987(2).
刘英凯. 信息时代翻译中"陌生化"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J]. 外语研究, 1999(3).
刘永富. 价值哲学新视野[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刘云虹. 翻译的本体论："科学观"与"艺术观"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翻译的本体论研究——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评析[J]. 中国翻译, 2006(5).
刘重德. 试论翻译的原则[J]. 湖南师范学院学报, 1979(1).
刘重德. 文学翻译十讲[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1.
刘重德.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C]. 青岛：青岛出版社, 1998.
刘宗和. 论翻译教学[C].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刘祖慰. 为李约瑟博士的学术演讲担任口译[J]. 上海科技翻译, 1986(4).
刘祖慰. 还是应该从语言行为入手[J]. 上海科技翻译, 1991(4).
隆多. 术语学概论[M]. 刘钢, 刘健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5.
卢长怀. 跨文化交际失败的原因[J]. 东北财经大学学

报,2004(3).
卢红梅. 翻译与混杂文本[J]. 现代外语,2003(3).
鲁迅. 鲁迅全集(第四卷)[C].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a.
鲁迅. 鲁迅全集(第五卷)[C].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
鲁迅. 鲁迅全集(第六卷)[C].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c.
鲁迅. 非有复译不可[A]. 见: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1984.
陆谷孙. 我与译文[J]. 中国翻译,1998(1).
路卿,李佐文. 共享知识在话语理解过程中的作用[J]. 教学研究,2005(1).
吕俊. 含英咀华,译苑奇葩——学习汪榕培、任秀桦两先生英译《诗经》[A]. 见: 汪榕培. 比较与翻译[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吕俊. 跨越文化障碍——巴别塔的重建[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a.
吕俊. 对翻译学构建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 中国翻译,2001b(4).
吕俊. 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J]. 外国语,2002(5).
吕俊. 翻译理论的功能——兼析否认理论的倾向[J]. 上海科技翻译,2003(1).
吕俊,侯向群.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吕叔湘. 语文常谈[M]. 北京: 三联书店,1980.
罗进德. 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J]. 中国翻译,1988(1).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罗新璋. 风格、夸张及其他[J]. 中国翻译,1995(4).
罗新璋,陈应年. 翻译论集[C]. 修订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罗选民. 从词层、句层翻译到话语层翻译[J]. 衡阳师专学报,1988(2).
罗选民. 话语层翻译标准初探[J]. 中国翻译,1990(2).
罗选民. 论翻译的转换单位[J]. 中国翻译,1992(2).
罗选民. 中国的翻译教学: 问题与前景[J]. 中国翻译,2002(4).
《逻辑学辞典》编委会. 逻辑学小辞典[Z].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马建忠. 拟设翻译书院议[A]. 见: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马萧. 从模因到规范: 切斯特曼的翻译模因论述[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3).
马祖毅. 我国最早研究翻译理论的释道安和彦综[J]. 翻译通讯,1982(5).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前部分)[M]. 北京: 中国外对翻译出版公司,1984.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上卷)[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2004.
马祖毅等. 中国翻译通史[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买提尼牙孜·热扎克. 西域翻译史[M].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
芒迪. 翻译学导论: 理论与实践[M]. 李德凤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毛荣贵. 翻译美学[M]. 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梅德明. 上海市口译资格证书考试高级口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孟凡君. "后现代"之后的翻译研究新转向[R]. 澳门: 第二届海峡两岸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2007.
孟凡胜,腾延江. 标记理论述评[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8).
孟建钢. 最佳关联性对话语交际的解释力[J]. 外语学刊,2002(2).
孟瑾,冯斗. 古诗格式塔意象和意境的传递[J]. 外语学刊,2005(4).
孟昭毅,李载道. 中国翻译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莫爱屏. 交传与明示-推理交际——口译的理性思考[J]. 语言与翻译,2003(2).
穆雷. 关于翻译学的问题[J]. 外语教学[J],1989(3).
穆雷. 从接受理论看习语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J]. 中国翻译,1990(4).
穆雷. 创建话语层翻译学——罗选民教授翻译研究述评[J]. 语言与翻译,1996(1).
穆雷. 通天塔的建设者[M]. 北京: 开明出版社,1997.
穆雷. 余光中谈翻译[J]. 中国翻译,1998(4).
穆雷. 中国翻译教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牛保义,徐盛桓. 关于英汉语语法化比较研究——英汉语比较研究的一个新视角[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9).
诺德. 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 张美芳,王克非主译. 北京: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潘卫民,李巍. 格式塔理论对翻译教学的启示[J]. 上海翻译,2007(2).
潘文国. 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质[J]. 中国翻译,2002(3).
潘学权. 无声的另一面: 食人主义与翻译研究[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4).
彭克宏. 社会科学大词典[Z].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
彭利元. 语境·对话·翻译——巴赫金语境对话理论对翻译的启示[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9).
彭利元. 再论翻译语境[J]. 中国翻译,2008(1).
皮亚杰. 儿童的心理发展[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
皮亚杰. 智慧心理学[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戚雨村. 语言学百科词典[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
钱歌川. 翻译漫谈[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
钱冠连. 语言哲学翻译论[J]. 中国翻译，2003(5).
钱绍昌. 影视翻译：翻译园地中愈来愈重要的领域[J]. 中国翻译，2000(1).
钱学森. 关于思维科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钱锺书. 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钱锺书. 林纾的翻译[J]. 中国翻译，1985(11).
钱锺书. 管锥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钱锺书. 七缀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秦秀白. "体裁分析"概说[J]. 外国语，1997(2).
邱懋如. 语言可译性及零翻译论[J]. 中国翻译，2001(1).
邱文生. 语境与文化意象的理解和传译[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冉永平. 关联理论网上通讯：关联理论讨论新动向[A]. 见：何自然，冉永平. 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a.
冉永平. 关联理论研究的又一新成果——《语用照应与关联》评介[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b(6).
任绍曾. 概念隐喻及其语篇体现——对体现概念隐喻的语篇的多维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0).
任生名. 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散记[J]. 中国翻译，1993(4).
任小平. 外交口译的灵活度[J]. 中国翻译，2000(2).
荣苏赫等. 蒙古族文学史[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芮敏. 关联理论与口译理解策略[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3).
塞莱丝科维奇. 语言教学中的翻译问题[J]. 刘和平译.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3).
塞莱丝科维奇. 口译技艺：即席口译与同声传译经验谈[M]. 黄为忻，钱慧杰译. 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2.
桑塔亚纳. 美感[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沙特尔沃思，考伊. 翻译研究词典[M]. 谭载喜主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群己权界论[A]. 见：论严复与严译名著[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邵军航，余素青. 认知语言学的经验观、突显观、注意观及其一致性[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邵璐.《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评介[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2).
邵璐. 翻译学视觉下的语言模糊性研究[J]. 外语研究，2007(3).
邵志芳. 概念的多重表征形式及其双极结构模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4).
佘协斌，梁海军. 以喻论译与科学论证[J]. 外语与翻译，2002(3).
沈宝基，佘协斌. 文学翻译与民族特色[J]. 外语与翻译，1994(1).
沈家煊.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1).
沈家煊. "语法化"研究纵观[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
沈仁干. 谈谈译者的版权保护[J]. 中国翻译，1997(2).
沈苏儒. 继承·融合·创立·发展——我国现代翻译理论建设刍议[J]. 中国翻译，1992(5).
沈苏儒. 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沈苏儒. 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沈苏儒. 我对翻译研究的基本认识[J]. 中国翻译，2007(1).
石向实. 认识论与心理学[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石源华. 中外关系三百题[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司显柱. 论功能语言学视角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研究[J]. 外语教学，2004(4).
斯立仁. 评《翻译的准则与目标》——与周兆祥博士商榷[J]. 中国翻译，1900(1).
斯滕伯格. 认知心理学[M]. 黄希庭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宋志平. 翻译：选择与顺应——语用顺应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2004(2).
苏福忠. 译事余墨[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苏明阳. 翻译记忆系统的现状及其启示[J]. 外语研究，2007(5).
苏晓军. 同声传译研究的认知模型述评[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1).
苏晓军，张爱玲. 概念整合理论的认知力[J]. 外国语，2001(3).
孙昂. 认知·意图·关联——从关联理论交际观维度对翻译研究的思考[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
孙翠兰，任怀平. 翻译中的语用推理与语境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1).
孙会军. 归化与异化——两个动态的概念[J]. 外语研究，2003(4).
孙慧双. 歌剧翻译与研究[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孙坤. 老舍与翻译[J]. 上海翻译,2007(2).
孙亚. 心理空间理论与翻译[J]. 上海科技翻译,2001(4).
孙迎春. 译学大辞典[Z]. 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
孙致礼. 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5).
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 中国翻译,2002(1).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声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覃光广,冯利,陈朴. 文化学辞典[Z].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谭理. 英美现代翻译理论侧记[J]. 国外语言学,1982(2).
谭载喜.《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史》评介[J]. 现代外语,1981(1).
谭载喜. 现代英美翻译理论侧记[J]. 国外语言学,1982a(1).
谭载喜. 翻译中的语义对比试析[J]. 翻译通讯,1982b(1).
谭载喜. 翻译是一门科学[J]. 翻译通讯,1982c(4).
谭载喜. 西方翻译史浅谈[J]. 翻译通讯,1985(7).
谭载喜. 文化对比与翻译[J]. 中国翻译,1986(5).
谭载喜,奈达. 论翻译学的途径[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a(1).
谭载喜. 必须建立翻译学[J]. 中国翻译,1987b(3).
谭载喜. 试论翻译学[J]. 外国语,1988(3).
谭载喜. 奈达和他的翻译理论[J]. 外国语,1989(5).
谭载喜. 翻译学与语义[J]. 深圳大学学报,1991(3).
谭载喜. 跨语交际[M].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3.
谭载喜. 西方翻译史浅谈[A]. 见：杨自俭,刘学云. 翻译新论[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谭载喜. 中西现代翻译学概评[J]. 外国语,1995(3).
谭载喜. 文化互惠：俄国文学名家与翻译[A]. 见：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谭载喜. 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J]. 中国翻译,1998(2).
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谭载喜. 奈达论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2001.
谭载喜. 翻译学[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a.
谭载喜. 中西翻译传统的文化烙印[J]. 中国翻译,2000b(2).
谭载喜. 坚持译学路向,迎接新世纪挑战[A]. 见：杨自俭. 译学新探[C].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谭载喜. 再论翻译学[A]. 见：刘靖之. 翻译新焦点[C]. 香港：商务印书馆,2003.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增订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谭载喜. 翻译比喻中西探幽[A]. 见：胡庚申. 翻译与跨文化交流：转向与拓展[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a.
谭载喜. 翻译本质的绝对与相对属性[J]. 广东外语与外贸大学学报,2007b(1).
谭载喜. 综合素质观照下的翻译能力[J]. 辅仁外语学报：语言学、文学、文化,2007c(4).
汤用彤. 论"格义"[A]. 见：汤用彤选集[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唐培. 从翻译伦理透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1).
唐卫华. 论翻译过程的传播本质[J]. 外语研究,2004(2).
陶涛. 译者的抉择——谈玛丽亚·蒂莫奇科的翻译观[J]. 科技资讯,2007(13).
田华. 翻译的关联主义视角[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田菱. 翻译学的辩证逻辑学派[J]. 外国语,1992(6).
田运. 思维词典[Z].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屠国元,李志奇. 论译者的思维结构[J]. 中国翻译,2007(5).
汪榕培. 比较与翻译[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汪榕培.《诗经》的英译——写在"大中华文库"版《诗经》即将出版之际[J]. 中国翻译,2007(6).
汪少华. 合成空间理论对隐喻的解释力[J]. 外国语,2001(3).
王斌. 关联理论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J]. 中国翻译,2000(4).
王斌. 概念整合与翻译[J]. 中国翻译,2001(3).
王斌. 翻译与博弈[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03(2).
王斌. 密母与翻译[J]. 外语研究,2004(3).
王斌华. 口译：理论　技巧　实践[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王秉钦. 20 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王大伟. 当前中国译学研究的几个误区[J]. 上海科技翻译,2000(1).
王东风. 中国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J]. 中国翻译,1999(2).
王东风. 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 中国翻译,2002(5).
王东风. 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 中国翻译,2004(6).
王东风. 译学关键词：*abusive fidelity*[J]. 外国语,2008(4).
王东风,章于炎. 英汉语序对比与翻译[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4).
王桂莲. 文化差异与翻译的正确性[J]. 上海科技翻译,2004(1).
王国维. 论新学语之输入[J]. 教育界,1905(96).
王国维. 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J]. 学衡,1925

(43).
王红昕. 语境知识共享率对话语推论结果的影响[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王宏印. 长安译论[C]. 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
王宏印.《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王宏印. 英汉翻译综合教程[M]. 修订版. 沈阳：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a.
王宏印. 翻译学建设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之我见[J]. 上海科技翻译,2003b(1).
王宏印. 探索典籍翻译及其翻译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规律[J]. 中国翻译,2003c(3).
王宏印. 试论文学翻译批评的背景变量[J]. 中国翻译,2004(2).
王宏印.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王宏印. 学术规范内的发现创新——翻译专业博士生培养的主导理念与规范做法[J]. 中国外语,2007a(3).
王宏印. 文化的分层概念与文学翻译批评基础[A]. 见：胡庚申. 翻译与跨文化交流：转向与拓展[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b.
王宏印,邢力. 追寻远逝的草原记忆：《蒙古秘史》的复原、转译及传播研究[J]. 中国翻译,2006(6).
王宏印,张智中. 归化异化三论：从翻译策略到翻译过程的展开[J]. 外语论坛,2003(4).
王华伟,崔启亮. 软件本地化[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王还. 有关汉外语法对比的三个问题[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1).
王建国. 论关联理论对翻译学研究的局限性[J]. 语言与翻译(汉文版),2003(1).
王建国. 刘宓庆翻译散论[C].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王建平. 汉诗英译中的格式塔艺术空白处理[J]. 外语学刊,2005(4).
王克非. 鸠摩罗什与严复[J]. 中国翻译,1988(4).
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王克非. 双语对应语料库研制与应用[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王莉娜. 析翻译伦理的四种模式[J]. 外语研究,2008(6).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1985.
王力. 中国文法学初探[A]. 见：王力. 王力语言学论文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王立第. 翻译中的知识图式[J]. 中国翻译,2001(2).
王立荣. 从框架理论看翻译[J]. 中国翻译,2005(3).
王铭玉. 中国符号学研究 20 年[J]. 外国语,2003(1).
王宁. 全球化语境下的流散及汉语写作[A]. 见：朱竞. 汉语的危机[C]. 北京：文化艺术社,2005.
王弄笙. 汉英翻译中的 CHINGLISH[J]. 中国翻译,2000(2).
王全智. 可能世界、心理空间与语篇的意义建构[J]. 外语教学,2005(4).
王仁强,章宜华. 原型理论与翻译研究[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11).
王荣. 从关联理论看字幕翻译策略——《乱世佳人》字幕翻译的个案分析[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2).
王若昭.《缮清说》简介[J]. 中国翻译,1988(2).
王寿兰. 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王涛,鹿鹏. 翻译技术的理念与分类[J]. 中国科技翻译,2008(1).
王祥兵. 论《时代》周刊中国报道文章对汉语文化词语的翻译[J]. 上海科技翻译,2002(2).
王向远. 二十世纪的日本翻译文学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王晓平. 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王学伟,崔启亮. 软件本地化[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王寅. Iconicity 的译名与定义[J]. 中国翻译,1999(2).
王寅. 认知语言学探索[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a.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 中国翻译,2005b(5).
王寅,严辰松. 语法化的特征、动因和机制——认知语言学视野中的语法化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4).
王友贵. 翻译家鲁迅[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王友贵. 从数字出发看中外关系、中外文学关系里的翻译关系[J]. 外国语,2006(5).
王正,孙东云. 统计机器翻译系统在网络翻译教学中的应用[J]. 上海翻译,2009(1).
王正元. 语用照应的制约力[J]. 外语学刊,2002(4).
王正元. 概念整合理论的发展与理论前沿[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6).
王宗炎. 英汉教学语言学词典[Z].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王佐良. 词义　文体　翻译[J]. 翻译通讯,1979(1).
王佐良. 论严复与严译名著[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王佐良. 词义・文体・翻译[A]. 见：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a.
王佐良. 翻译中的文化比较[J]. 翻译通讯,1984b(1).
王佐良. 英语文体学论文集[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6.
王佐良. 翻译：思考与试笔[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王佐良. 论诗的翻译[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韦晓萍. 语用翻译：关联与论知[J]. 广西工学院学报(增刊),2003.
魏泓. "会话含义"与翻译初步探讨[J]. 宿州学院学报,2005(5).
魏家海. 意象：诗歌翻译单位的"前景化"[J]. 山东外语教学,2003(6).
文军. 翻译课程模式研究——以发展翻译能力为中心的方法[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文军. 科学翻译批评导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a.
文军. 中国翻译批评百年回顾(1900～2004)[C].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6b.
文旭,匡芳涛. 语言空间系统的认知阐释[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3).
翁显良. 本色与变相——汉诗英译琐议之三[J]. 外国语,1982(1).
翁显良. 意态由来画不成？——文学翻译丛谈[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翁显良. 速成与慢成[A]. 见：王寿兰. 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a.
翁显良. 翁显良自传[A]. 见：王寿兰. 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b.
巫白慧. 印度哲学：吠陀经探义和奥义书解析[M]. 东方出版社,2000.
巫和雄.《毛泽东选集》英译概述[J]. 中国翻译,2007(5).
吴富恒. 译诗琐言[J]. 翻译通讯,1984(4).
吴建明. 郑振铎与翻译[A]. 见：林本椿. 福建翻译家研究[C].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吴克礼. 苏联翻译理论流派述评[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吴南松. 谈译者翻译立场的确立问题——兼评祝庆英译《简·爱》[J]. 中国翻译,2000(4).
吴南松. 翻译：寻求文化的共生与融合——也谈翻译中对原文差异性的保持问题[J]. 中国翻译,2003(3).
吴新祥. 等值论与译作定量定性分析[J]. 外语学刊,1985(1).
吴新祥,李宏安. 等值翻译初探[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84(3).
吴新祥,李宏安. 等值翻译论[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吴有富. 外语与文化研究(第五辑)[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伍小龙,王东风. 破解译学七大难题——评许钧教授的新作《翻译论》[J]. 中国翻译,2004(4).
武红. 对关联理论阐释文学翻译的一点商榷[J]. 宜春学院学报,2005(3).
习华林. 意象在英汉诗歌翻译中的地位[J]. 外语教学,2001(6).
夏征农. 大辞海·哲学卷[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夏征农主编,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辞海：1999 年版缩印本：音序[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肖锦龙.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思想性质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肖坤学. 试论词汇层面翻译的认知取向[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7).
肖坤学. 句子层面翻译的认知语言学视角[J]. 外语研究,2006(1).
肖前等.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肖晓燕,张梅. 美国电话口译的职业现状及理论分析[J]. 上海翻译,2009(1).
萧立明. 英汉语比较研究[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萧立明. 新译学论稿[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萧立明. 认知语言学与翻译[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谢群英,曾文雄等. 博观古今,传扬文化——汪榕培教授访谈[J]. 疯狂英语(教师版),2007(12).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谢天振. 国内文学翻译研究的一大突破[J]. 文景,2005(11).
谢天振. 季羡林与翻译[J]. 中国翻译,2006(6).
谢天振,查明建.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谢云才,张杰. 俄罗斯翻译模式理论概述[J]. 外语学刊,2004(4).
辛献云. 篇章象似性与英诗汉译[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7).
邢杰. 译者"思维习惯"——描述翻译学研究新视野[M]. 中国翻译,2007(5).
熊学亮. 语用学与认知语境[J]. 外语学刊,1996(3).
熊学亮. 认知语用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熊学亮. 认知语用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熊学亮. 对关联理论中逻辑的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
熊友奇. 异语交际与信息处理[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6).
熊哲宏. "模块心理学"的理论建构论纲[J]. 心理科学,2005(3).
徐梅江. 汉译英的双向理解和完美表达[J]. 中国翻译,2000(6).
徐敏慧. 浅说意义——机构与翻译关键词解读[J]. 中国翻译,2008(5).
徐盛桓. 关于翻译学研究[J]. 现代外语,1989(1).
徐盛桓. 语用推理[J]. 外语学刊,1991(6).
徐勇前. 关联理论的交际观对翻译行为的诠释[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许宝强,袁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许钧. 论翻译的层次[J]. 中国翻译,1987(5).
许钧.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2.
许钧.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N]. 文汇读书周报,2000-09-30.
许钧等.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M].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1.
许钧. 翻译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许钧,袁筱一.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许钧,朱玉彬. 我国翻译史研究的新进展[N]. 中华读书报,2007-09-19(6).
许明. 西方口译认知研究概述[J]. 中国翻译, 2008(1).
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许渊冲. 译诗六论[J]. 中国翻译,1991a(5).
许渊冲. 译诗六论(续)[J]. 中国翻译,1991b(6).
许渊冲. 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论——再谈发挥译文语言优势[J].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6).
许渊冲,许钧. 翻译: 美化之艺术——新旧世纪交谈录[A]. 见: 许钧等.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C].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1.
薛范. 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严复. 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A]. 见: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A]. 见: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阎德胜. 翻译过程是思维活动的过程[J]. 中国翻译, 1989(2).
阎德胜. 翻译与系统科学[J]. 中国翻译,1994(6).
阎德胜. 论翻译中的动态平衡[J]. 外语研究, 1997(1).
杨承淑. 口译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杨惠中. 语料库语言学导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杨莉藜. 翻译修辞学的基本问题[J]. 外语教学, 2001(1).
杨士焯. 彼得·纽马克翻译新概念概述[J]. 中国翻译,1998(1).
杨晓荣. 翻译专业: 正名过程及正名之后[J]. 中国翻译,2008(3).
杨治良等. 记忆心理学[M]. 第2版.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杨自俭. 我国近十年来的翻译理论研究[J]. 中国翻译,1993(6).
杨自俭. 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1).
杨自俭. 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J]. 中国翻译,2000(1).
杨自俭. 译学新探[C]. 青岛: 青岛出版社,2002.
杨自俭. 再谈方法论——《翻译方法论》序[J]. 上海翻译,2007(3).
杨自俭,李瑞华. 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杨自俭,刘学云. 翻译新论[C].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杨自俭,刘艳丽. 也谈"归化"与"异化"[J]. 中国翻译, 2002(6).
杨祖希. 辞书学辞典[Z]. 上海: 书林出版社,1992.
叶子南.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叶子南. 英汉翻译对话录[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亦邻真. 元代硬译公牍文体[A]. 见: 元史研究会编. 元史论丛[C]. 第1辑. 北京: 中华书局,1982.
殷习芳. 语用推理在翻译中的应用[J]. 河北理工学院学报(上海科学版),2006(4).
余光中. 余光中散文选集[C]. 第1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
余光中. 余光中论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俞维玲. 试从关联理论角度看语用翻译[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喻云根. 翻译、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0(1).
袁可嘉. 关于译诗的几点随想[J]. 中国翻译, 1989(5).
袁晓军,董粤章. 诗歌世界中意象实现的认知诠释[J]. 求是学刊,2006(1).
袁亦宁. 受控语言: 机器翻译的新途径[J]. 上海科技翻译,2003(3).
赞宁. 续高僧传[M].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曾利沙. 语言学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阐释[J]. 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3).
曾利沙. 小议翻译操作中的"多度视域"——兼对第十二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英译汉参考译文的几点商榷意见[J]. 中国翻译,2001a(2).
曾利沙. 英语名词后缀"-s"的语义嬗变与翻译[J]. 上海科技翻译,2001b(1).
曾利沙. 论规律——兼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c(9).
曾利沙. 论"操作视域"与"参数因子"——兼论翻译学理论范畴"文本特征论"的研究[J]. 现代外语, 2002(2).
曾利沙. 论翻译理论的多重属性——兼论译学理论研究的系统观与辩证观[J]. 中国科技翻译,2003(4).
曾利沙. 主题关联性社会文化语境与择义的理据性[J]. 中国翻译,2005a(4).
曾利沙. 论文学翻译艺术创造性的本质特征——从译者主体思维特征看艺术再现与艺术表现的典型性[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b(5).
曾利沙. 论翻译教学中的预设思维训练——兼论预设的语言特征与分类[J]. 外国语言文学,2006(3).

曾利沙. 论概念语义语境化生成的认知机制——兼论翻译过程研究的可推导性与可描写性[J]. 英语研究,2007a(1).
曾利沙. 论意义本体论批评与价值评判的逻辑基础[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b(1).
曾利沙. 从外宣翻译原则范畴化看应用翻译系统理论建构[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c(7).
曾衍桃. 语用认知模块性问题[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4).
张柏然,许钧. 译学论集[C]. 南京: 译林出版社,1997.
张冲. 翻译标准的功能对应一元论[J]. 外语研究,1991(3).
张德禄. 功能文体学[M].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a.
张德禄. 论语言交际中的交际意图[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b(3).
张德禄,刘汝山. 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张建木. 论吸收古代的翻译经验[J]. 翻译通报,1951(5).
张今. 思想模块假说——我的语言生成观[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张今. 文学翻译原理[M]. 修订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张今,张克定. 英汉语信息结构对比研究[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
张经浩,陈可培. 名家　名论　名译[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张隽.《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简介[N]. 文摘报,2005-06-19(48).
张隽.《大中华文库》全权首发"向世界说明中国"正当其时[N]. 中华读书报,2007-01-18(3).
张美芳. 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张美芳. 编译的理论与实践——用功能翻译理论分析编译实例[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2).
张美芳. 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a.
张美芳. 图式分析隐喻翻译中的认知过程[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b(5).
张美芳,钱宏. 翻译研究领域的"功能"概念[J]. 中国翻译,2007(3).
张南峰. 走出死胡同　建立翻译学[J]. 中国翻译,1995(4).
张南峰. 翻译为本语篇分析模式——导言[A]. 见: 陈德鸿,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张南峰. 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J]. 中国翻译,2002(2).
张南峰. Delabastita 的双关语翻译理论在英汉翻译中的应用[J]. 中国翻译,2003(1).
张南峰. 中西译学批评[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张南军. 翻译服务标准化对产业发展的意义及趋势[J]. 上海翻译,2006(4).
张培基. 习语汉译英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张培基. 英语声色词与翻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4/1979.
张培基等.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张蓊荟,沈小红. 翻译与推理[J]. 山东外语教学,2006(2).
张秀会. 认知假设动态语境幽默效果[J]. 锦州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张亚非. 关联理论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3).
张焱. 谬误是什么——从传统逻辑到非形式逻辑[J]. 前沿,2005(3).
张莹. 翻译学科世纪末的转向——评斯奈尔-霍恩比的新书《翻译研究的转向——新范式还是新视角》[J]. 中国翻译,2007(6).
赵景深. 论翻译[J]. 读书月刊,1931,1(6).
赵军锋,魏辉良. 梁实秋的翻译观初探[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6.
赵俊姝. 文学多元系统理论视角解读胡适翻译思想[J].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2).
赵丽君. В. Н. Комиссаров 论 20 世纪的翻译理论[J]. 中国科技翻译,2003(1).
赵亮,张轶前.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谈隐喻的翻译[J].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赵彦春. 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J]. 现代外语,1999(3).
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赵艳芳. 语境效果的特性与最佳相关[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2).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郑冰寒. 翻译过程的三元数据分析模式[J]. 上海翻译,2008(3).
郑海凌. 翻译标准新说: 和谐说[J]. 中国翻译,1999(4).
郑诗鼎. 语境与文学翻译[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国翻译》编辑部. 诗词翻译的艺术[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室. 佛教文化面面观[M]. 济南: 齐鲁书社,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Z]. 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要览[J]. 中国翻译,2007(1).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英汉语比较研究[C].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钟述孔. 实用口译手册[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

版公司,1991.
仲伟合.口译训练——模式、内容、方法[J].中国翻译,2001a(2).
仲伟合.英汉同声传译技巧与训练[J].中国翻译,2001b(5).
仲伟合.翻译专业硕士(MIT)的设置——翻译学学科发展的新方向[J].中国翻译,2006(1).
周凤鸣.论文化意象在翻译中的处理[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12).
周冠生.新编文艺心理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周红民,认知语境与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11).
周红民.翻译图式解析[J].上海翻译,2003(3).
周领顺.学术翻译研究与批评论纲[J].外语研究,2008(1).
周煦良.翻译三论[A].见: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周兆祥.翻译的准则与目标[J].中国翻译,1986(3).
周振鹤.比钱说第一首还早的汉译英诗[N].文汇报,2005-04-13(11).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M].上海:上海儿童书局,1932.
朱纯深.旧题新解:从国际互动看中国翻译[J].翻译季刊,2000a(1).
朱纯深.走出误区 踏进世界——中国翻译学:反思与前瞻[J].中国翻译,2000b(1).
朱纯深."特色"抹不掉,"特色论"不必要——读孙会军、张柏然论文有感[J].中国翻译,2002(6).
朱纯深.从句法象似性与"异常"句式的翻译看文学翻译中的文体意识[J].中国翻译,2004(1).
朱光潜.谈翻译[A].见: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朱光潜.谈一词多义的误译[A].见:王寿兰.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朱红文.社会科学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朱宏达,吴洁敏.朱生豪翻译活动大事记[J].中国翻译,1988(6).
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朱志瑜.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神化说"[J].中国翻译,2001(2).
祝朝伟.建构与反思[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庄智象.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邹振环.张元济和南洋公学译书院[A].见: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出版大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C].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附录五　词目音序索引

说明：标点如书名号、双引号、连字符等不参与排序。

Aa

Bb

Cc

Dd

Ee

Ff

Jj

Kk

Tt

Xx

Yy

Zz

非汉字开头的词条